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状元卷.4,大清状元卷.下/杨寄林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4

ISBN 7-5440-2224-2

Ⅰ.中… Ⅱ.杨… Ⅲ.科举考试-试卷-中国-清代 Ⅳ.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350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 2 号楼)

山西太原今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illegible] 第 1 次印刷

开本:8 张:27.75

号 0 册

定价:46.00 元

读书中文网

中华状元卷编译委员会

学术总顾问　王树民　王炳照

主　　编　杨寄林　宋大川　金　山

副 主 编　陶黎明　祁振良　郑晏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明元　郑晏明　祁振良

孙继民　杨倩描　杨寄林

李岩松　李绍平　宋大川

金　山　侯真平　姜慧颖

陶黎明　董文武　蔺瑞生

目 录

◉ 大清状元卷 ◉

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1)
会试试题 ……(1)
殿试策问 ……(1)
林鸿年 殿试对策 ……(5)
何冠英 殿试对策 ……(12)
苏敬衡 殿试对策 ……(20)
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 ……(28)
会试试题 ……(28)
殿试策问 ……(28)
钮福保 殿试对策 ……(32)
金国均 殿试对策 ……(39)
江国霖 殿试对策 ……(47)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 ……(55)
会试试题 ……(55)
殿试策问 ……(55)
李承霖 会试卷八道 ……(59)
殿试对策 ……(79)
冯桂芬 殿试对策 ……(86)
张百揆 殿试对策 ……(93)

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100)
会试试题 ……(100)
殿试策问 ……(100)
龙启瑞 殿试对策 ……(104)
龚宝莲 殿试对策 ……(111)
胡家玉 殿试对策 ……(117)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125)
会试试题 ……(125)
殿试策问 ……(125)
孙毓溎 殿试对策 ……(129)
周学浚 殿试对策 ……(138)
冯培元 会试卷二道 ……(146)
殿试对策 ……(152)

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160)
会试试题 ……(160)
殿试策问 ……(160)
萧锦忠 会试卷三道 ……(165)
殿试对策 ……(173)
金鹤清 会试卷三道 ……(181)
殿试对策 ……(190)
吴福年 殿试对策 ……(198)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207)
会试试题 ……(207)
殿试策问 ……(207)
张之万 会试卷二道 ……(211)
殿试对策 ……(218)
袁绩懋 殿试对策 ……(226)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庞钟璐　会试卷二道 …… (234)
殿试对策 …… (240)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 …… (249)
会试试题 …… (249)
殿试策问 …… (249)
陆增祥　会试卷三道 …… (253)
殿试对策 …… (262)
许其光　会试卷三道 …… (269)
覆试卷一道 …… (278)
殿试对策 …… (281)
谢　增　会试卷三道 …… (288)
殿试对策 …… (297)

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 …… (306)
会试试题 …… (306)
殿试策问 …… (306)
童　鎏　殿试对策 …… (310)

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 …… (318)
会试试题 …… (318)
殿试策问 …… (318)
孙如仅　会试卷三道 …… (322)
殿试对策 …… (331)

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 …… (339)
会试试题 …… (339)
殿试策问 …… (339)
翁同和　会试卷三道 …… (342)

覆试卷一道 …… (351)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 …… (353)
会试试题 …… (353)
殿试策问 …… (353)
孙家鼐 殿试对策 …… (357)

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庚申恩科 …… (365)
会试试题 …… (365)
殿试策问 …… (365)
钟骏声 会试卷三道 …… (369)
殿试对策 …… (378)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 …… (387)
会试试题 …… (387)
殿试策问 …… (387)
徐 郙 会试卷三道 …… (391)
殿试对策 …… (400)

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 …… (409)
会试试题 …… (409)
殿试策问 …… (409)
翁曾源 殿试对策 …… (413)

清穆宗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 …… (421)
会试试题 …… (421)
殿试策问 …… (421)
于建章 殿试对策 …… (426)

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 …… (435)
会试试题 …… (435)
殿试策问 …… (435)
洪　钧　会试卷三道 …… (439)
殿试对策 …… (448)

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 …… (456)
会试试题 …… (456)
殿试策问 …… (456)
梁耀枢　殿试对策 …… (460)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 …… (468)
会试试题 …… (468)
殿试策问 …… (468)
陆润庠　会试卷三道 …… (472)
殿试对策 …… (480)

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 …… (488)
会试试题 …… (488)
殿试策问 …… (488)
曹鸿勋　殿试对策 …… (492)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 …… (500)
会试试题 …… (500)
殿试策问 …… (500)
王仁堪　殿试对策 …… (504)

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 …… (513)
会试试题 …… (513)

殿试策问 …… (513)
黄思永 会试卷三道 …… (517)
殿试对策 …… (526)

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 …… (534)
会试试题 …… (534)
殿试策问 …… (534)
陈　冕 会试卷三道 …… (538)
殿试对策 …… (547)

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 …… (555)
会试试题 …… (555)
殿试策问 …… (555)
赵以炯 殿试对策 …… (559)

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 …… (567)
会试试题 …… (567)
殿试策问 …… (567)
张建勋 殿试对策 …… (571)

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 …… (579)
会试试题 …… (579)
殿试策问 …… (579)
吴　鲁 殿试对策 …… (582)

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 …… (590)
会试试题 …… (590)
殿试策问 …… (590)
刘福姚 殿试对策 …… (593)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601)
会试试题 ……(601)
殿试策问 ……(601)
张 謇 殿试对策 ……(605)

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壬寅恩科……(613)
会试试题 ……(613)
殿试策问 ……(613)
王寿彭 会试卷五道 ……(616)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628)
会试试题 ……(628)
殿试策问 ……(628)
刘春霖 会试卷五道 ……(631)

清代进士科殿试策题辑存……(646)

◉ 附 录 ◉

唐至清进士科前三名暨会元一览表……(758)

正续文献通考历朝登科记总目汇编后案……(825)

◉ 大清状元卷 ◉

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

殿试策问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抚绥寰宇，敬绍丕基，宵旰健勤，不敢暇逸。仰荷昊苍眷佑，四海乂安，惟益延集嘉谟，冀熙庶绩，临轩策问，其敬听之。

士以行谊为重，而科目先凭文学。文学多端，首重经史。《九经》为圣贤彝训，帝学官箴，皆从此出。故未言汉宋之讲孔孟，当先求孔孟之说《诗》、《书》。《诗》、《书》内名言至论，最补身心治道。为孔孟所引证推明者何在？汉晋唐宋传、注、疏、义，孰为醇正？《易》之费虞，《书》之欧夏，《诗》之三家，何所考见？贾公彦二《礼》孰精？《仪礼经传通解》，朱子晚年立意若何？史以《春秋》为最先，《三传》科例何殊？荀、袁两《汉纪》，继为编年之体。司马光《通鉴》，重在资治，后世资为金鉴。皆不刊之书也。多士治经学史，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裨朕治

理者也,其胪叙之。

考绩始自唐虞。询事考言,既已察之平时,而三载五载九载,何以加密?《尚书大传》谓:积善至于明五福,以类升;积不善至于幽六极,以类降。其说何如?《周官》六计,以廉为本。或训廉为察,厥义孰优?汉以六条察二千石,晋以五条考郡县;唐叙以四善,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宋因唐之四善,分为三等。详略得失,可缕析之欤?《汉书》言综核名实,故吏称其职。然或上求实效,下循虚名。将操何道而使之皆实心以任事乎?

虞廷钦恤,刑期无刑。《周官》五刑之属,各五百。《吕刑》何以言五刑之属三千?所增减者安在?魏文侯时,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后世律例所自始。然楚之《仆区》,郑之《刑书》,晋之刑鼎,不俱在李悝之前欤?汉初约法三章,厥后萧何定律令,于李悝所造凡益若干篇,叔孙通复益者何律?唐之律、令、格、式,宋之《刑统》,元之《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之《大明律令》,其轻其重,其沿其革,能详陈欤?朕哀矜庶狱,每阅谳牍,再三审慎,期于无枉无纵。司宪之吏,宜如何持平协中,以共泯刻核姑息之见乎?

自昔除莠安良之法,莫善于保甲。汉之亭长、啬夫、游徼,唐之里正、耆老,所辖之地甚近,所联之户无多。里巷之中,互相纠察,最为切近。后世幅员日广,户口日繁,生计之绌,盗贼易生。惟有编查勤密,摘发精明,庶使闾阎相安,奸慝敛迹。夫以一州一县,四境非远,果能视一邑如一家,何至藏伏盗奸,传习邪术?赵广汉、张敞固甚严明,然能消患于初萌,戢乱于未发,如龚遂至郡,盗贼皆散,不更善乎?盗之所以重乎弭者,在此也。多士来自田间,见闻较切,其各陈之。

凡此四端,皆经国之大猷,为政之本务。其稽古有年、讲求有素者,所宜悉抒谠论,毋有所隐。朕将亲览,虚衷听纳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小人背着人的时候作恶,什么都能干出来。在见到君子后他们

便会隐蔽起来,掩盖他们的恶,而彰显他们的善。

孔子钓鱼而不用横截水流的大网,用丝绳系箭射鸟而不射夜间归巢之鸟。

天下人所共尊的东西有三样: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德行。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安抚天下,恭敬地继承盛大的基业,日夜操劳,不敢片刻安逸。承蒙上天保佑,四海平安无事,想要更多地收集和采纳好的意见,使各种政事全面振兴,于是来到前殿提出策问,请各位认真听好。

文士以品行为重,而科举考试首先凭文学。文学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得注重经学和史学。《九经》是圣贤千古不变的训示,帝王的学问和做官的规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在说汉朝和宋朝所讲的孔孟学说之前,应当先讲求孔孟所讲说的《诗经》、《尚书》。《诗经》、《尚书》中的至理名言,最有益身心和治国方法。被孔孟引证和推导阐明的在什么地方?汉朝、晋朝、唐朝、宋朝的解说、注释、注疏、义疏,谁最醇正?《周易》的费直和虞翻,《尚书》的欧阳生和夏侯胜、夏侯建,《诗经》的齐诗、鲁诗、韩诗三家,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贾公彦的两本礼书疏解,哪一本最精?《仪礼经传通解》,朱子对这部著作晚年的立意是怎样的?史书以《春秋》为最早,《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书的体例有哪些不同?荀悦、袁宏的前后两《汉纪》,是《春秋》之后的编年体史书;司马光的《通鉴》,重在资助政治,后世把它当作金鉴。它们都是无须修改、不可磨灭的书籍。各位贡士研究经学,学习史学,先培养才能和见识,后学习文艺。那些能够帮助皇帝我治理天下的学问,请你们一一陈述出来。

考核政绩是从唐尧和虞舜时期开始的。咨询事情、考察言论,既然已经在平时进行考察,那为什么还要在三年、五年、九年时严加考察呢?《尚书大传》说积善达到了长寿、富足、康宁、美德、善终这五福的,应按规定提升;积不善达到了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懦弱

这六极的，应按规定降级。这种说法怎么样？《周礼》的“六计”，把“廉”作为根本，而有人却把“廉”解释为“察”。哪种意义更好？汉朝用“六条”来考察太守，晋朝用“五条”来考察郡县。唐朝用“四善”来提升官员，按具体职能分为二十七个优等，按九等定出级差；宋朝沿袭唐朝的“四善”，分为三等。它们的详略得失，能细致分析吗？《汉书》说综核名实，所以官吏称职。然而，或许上面要求实效，但下面却只看重虚名。将用什么办法使下面的人都真心实意地来办事呢？

虞舜时期对用刑十分慎重，使用刑法的目的是要达到无刑的境地。《周礼》“五刑”的附属条款，各有五百。《吕刑》为什么说“五刑”的附属条款共有三千？哪些地方增加了，哪些地方减少了？魏文侯时期，李悝所著的《法经》六篇，是后世法律条例的起源。然而楚国的《仆区》，郑国的《刑书》，晋国的刑鼎，不都在李悝之前吗？汉朝初年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制定法律条令，对李悝《法经》共增加了若干篇，叔孙通再次增加的又是什么法律？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刑统》，元朝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令》，它们的轻重，它们的沿革，能详细陈述吗？皇帝我哀怜各种犯罪，每次审阅定案报告，都再三推敲，期望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掌管法令的官吏应该如何做到公正不偏，以共同消除苛刻和姑息的偏见呢？

自古以来，除恶安良的办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汉朝的亭长、啬夫、游徼，唐朝的里正、耆老，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很近，所关联的人户不多；里巷之中，互相纠察，是最切近的。后世国家辖区一天天扩大，户口一天天增多，生活艰难，就容易产生盗贼。只有严密编户、勤查户口，精明地揭发出坏人坏事，才能使四邻相安、坏人不敢干坏事。由于一州一县，四方的边界距离并不远；如果真能把一个辖区看作一户人家，那又何至于藏伏盗贼和奸人、传授和学习邪术呢？赵广汉、张敞固然十分严明，然而，要是能把祸患消灭在萌芽之中，把祸乱制止在它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像龚遂一到达郡境，盗贼便都散去了那样，不是更好吗？盗贼之所以重在化解的原因就在这里。各位贡士来自民间，所见所闻比较切实，请各自陈述看法。

总共上述四个问题，都是治国的大计、从政的根本事务。你们都

是多年稽考古训、素有研究的人，应该把正直的言论全部阐发出来，不要有所隐瞒。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虚心听取并采纳你们的意见。

林鸿年　殿试对策

林鸿年(生卒年不详)　字勿村，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状元。后任琼州、广州知府等职。同治三年(1864)由云南布政使升任云南巡抚。同治五年，被革职回乡，在鳌峰书院执教，前后达20余年。

臣对：臣闻稽古者集益之资，熙绩者厘工之效，恤狱者敷仁之实，安民者正俗之功。聿观往牒，《书》称学古，《诗》颂宜人，《礼》重诘奸，《易》占御寇。崇规茂矩，粲然具赅。伊古帝王凝命膺图，绍天阐绎。以端蒙养，则蛾术维勤也；以协泰交，则鹣梁无消也；以惩比匪，则犴狱不留也；以睦井闾，则鼠牙胥靖也。用是有典有则，群书萃焉；是行是训，庶绩凝焉；惟畏惟明，片言折焉；相保相受，兆姓恬焉。所由蜚英声，腾茂实，跻俗寿宇，纳民福林，润色休明，藻被歌颂者，恃此耳。

钦惟皇帝陛下，玑衡宰化，金镜调元，侔舆盖于二仪，广陶钧于庶品。固已设科选俊而补衮分猷，解网施恩而族同表善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廑兼听之无遗，冀迩言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勤学、课绩、明刑、防奸诸大政。臣占毕庸愚，曷知体要？顾念对扬伊始，拜献先资，虽涓埃无补于崇深，而管蠡或窥夫万一，敢不竭刍荛之末论，抒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士以行谊为重，而科目先凭文学，因讲求夫治经学史之功。此诚敦崇实学之至意也。臣谨按《书传》有云：安民必先明道，明道必先精心。危微精一之统，肇于《尚书》。故群籍莫古于《书》，而内圣外王之蕴，实赅于此。《诗》主性情而通于政事，风、雅、颂所陈，皆化起躬修而流为治象，故孔氏雅言之。且《诗》、《书》首陈孟氏尚友之论，诵读为重。欲具知人论世之识者，舍圣贤彝训，将无以为权舆。故欲求所以补益心身、推详治道，即孔孟所引证推明者而详说

之，亦可以得其大旨所归矣。群经传、注、疏、义，迭出于汉晋唐宋之世。然诸家亦各有醇疵。史之体裁本于《春秋》，《三传》科例已自互殊。班马而后，若荀、袁两《汉纪》，其编年之体，实足以绍述前古。而至通达治原、足资化理者，如宋司马光《通鉴》之作，自谓一生精力萃于此书，实能考镜乎是非得失之林，而为行政用人之所莫外。后之讲求治理者，当奉为金鉴焉。圣朝化穆三雍，人从五典。浸仁沐义，开儒馆以献歌；砥行束躬，望桥门而式训。先器识而后文艺，固赓《棫朴》而咏藻芹矣。

制策又以询考始于唐虞，后代考课不必相同，而欲得乎实心任事之效。臣考《尚书大传》谓：积至善于明五福，以类升，故陟之；积不善至于幽六极，以类降，故黜之。九载而三考者，则天数也。《周官》六计，以廉为本。然饬篮篹，杜苞苴，稍知自爱者优为之。惟责其操守，即察其才能。故正己率下，尤贵有鉴别群伦之识焉。汉以六条案郡国，而察豪强者一，察二千石者五。唐考功法以德义、清谨、公平、恪勤叙其四善，其目自献可拾遗以至修隍诘盗，分为二十七最，又差以九等。宋因唐之四善，分为四等。或略或详，得失斯寓。夫位事惟能，良臣所以报最；而因材器使，佐理所以得人。《汉书》言综核名实，故吏称其职。夫综核，非刻绳之谓也。苟拘其迹而不察其宜，则催科政拙，考下阳城，官无异称，殿书易千，又何以博选群材，使材员之鉴别无差，期于臻上理乎？盛世廉法成风，德才课最。鹤爵笾鸣阴之和，《羔羊》传退食之歌。麟仪仪，凤师师。凡在臣工，有不争自濯磨，以日勤赞襄欤！

制策又以五刑之属，代有增减；轻重沿革，务求其详。此诚刑期无刑之至计也。臣谨按虞廷钦恤，实为言刑之祖。嗣是夏有《禹刑》，周有《甫刑》，尚已。魏文侯时，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后世律例所自始。《汉书》合兵、刑为一志，以其所施者同也；分名、法为二家，以其所出者异也。盖自汉初除秦苛政，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于李悝所造复益以数篇，叔孙通更益之。至唐之律、令、格、式，宋之《刑统》，元之《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之《大明律令》，因时增损。文网既密，故法加详焉。夫刑罚之设，原欲使民迁善远罪也。三代以还，民犹近朴，

故犯法者少,而无知干令,咸可以自新。降自秦汉,民俗日偷,法之所及且巧为趋避,故虽慈祥恺恻之主,亦不能废刑法以为治。纵囚一节,识者讥之,有旨哉!然自科条日多,虽明习者亦不能通晓,吏因缘为奸。例之相歧,可以高下其手,而良民遂受其累矣。夫好生,厚德也,而优容亦所以藏奸。明断,良才也,而武健非所以造福。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夫君子尽心焉,不存偏见,不设成心,而惟明克允在是矣。皇上法严三尺,恩浃五流,覆盆而冤必平反,扞网则罚无偏纵。有虞咨皋,成周命吕,风雷之骏肃,雨露之祥膏,非二物也。

制策又以除莠安良,莫善于保甲,而爰念夫盗之所由弭。此诚制治保邦之要务也。臣考保甲之法,始于《周官》比闾族党之经,管子因而变通之,创轨里连乡之制,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至近之事。其立法最善。汉则有亭长、啬夫、游徼,唐则有坊正、里正、耆老。里巷相从,互为纠察,凡藏垢纳污者,无难立见焉。夫盗之发也,始或出于射利之意,继或逞其好胜之心,至于习传邪术,金钱取以奉人,身家置之不顾,陷溺既深,泯棼胥起。虽由小民之无良,亦守土之吏不能化道于平日,稽察于临时。其始视为无害,而姑息以养奸,其后惧于严谴,而隐饰而不报,而为大吏者复优容调护之。不知盗之弭不弭,实为民生休戚之所关。消患在于未萌,戢乱在于未发,非良有司之责欤?诚使亲民之吏编查勤密,摘发精明,不时躬履乡井,遍询利病,四境之内如家人妇子,皆可洞悉其隐,又何奸邪之不发,而莠俗之不除乎?赵广汉、张敞、龚遂诸人成规具在,皆可师其意焉。圣世恺泽如春,修和有夏,入乡而知教之易,观蜡而知道之行。兴让兴仁,匪朝伊夕,维持而防范之,斯训俗型方之善耳。

若此者:师古以多识,慎宪以省成,赖法以防民,祛邪以善俗,廓帝纮,恢皇纲,仁圣之事赅,治平之业备矣。臣尤伏愿皇上,萝图席瑞,董轸凝和。青简已蒐而更开甲库,素丝已咏而弥励寅恭,赭衣已恤而倍切申严,黔首已驯而益防丁壮。斯时也,朝熙门穆,里忭途欢,扇六幕以同风,统八紘而禀朔。星辉云烂,赓复旦之光华;钟清砥平,巩无疆之宝祚。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研究古代是积累经验的手段,百事兴旺是整顿吏治的功效,哀怜刑狱是实施仁政的表现,民众安定是改正习俗的功劳。遍观过去的书籍,《尚书》称赞学习古代,《诗经》歌颂适合其人,《周礼》注重查办奸恶,《周易》有抵御强盗的占卜。完美的规矩,十分完备。古代的帝王,凝聚天命,承膺《河图》,禀承天意,阐发天理。用来端正个人的道德修养,就能积小成大,勤奋努力;用来协调上下关系,就能使《诗经·候人》中借用鹈鹕来讥讽的对象不再出现;用来惩处犯罪,就能使监狱不再有囚犯存在;用来和睦街巷邻里,就能使纷争停止。因此有典章、有法则,荟聚群书,博大精深;有德行、有教诲,办好各种事情;使人敬畏、显出严明,只用只言片语就解决复杂的案情;让民众相互依存又彼此承担责任,安定百姓。他们之所以英声飞扬、丰碑矗立,使民众享受太平、百姓幸福欢乐,给美好局面增添光彩,受到民众讴歌颂扬,就是靠的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放眼星象、主宰造化,手握道法、调和元气,使天地与阴阳等齐,使众人万物都受到皇恩沐浴。已经设立了科举来选拔人才,并让他们分任各种官职;宽宏大量,广施恩泽,天下人心已经向善了。但圣上却心怀谦虚,仍然殷切咨询,念念不忘听到大家的意见而不遗漏,期望在进奏的言论中能有可以采用的意见,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勤奋学习、考核政绩、明察刑狱、防备奸恶等大政来策问我们。臣下我只会背诵书本,平庸而愚笨,哪能知道国家大政的要领呢?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尽管尘土和水滴对于高山和大海没有什么帮助,但管窥蠡测或许还能看到万分之一的东西,又怎敢不竭力阐述村野小人的肤浅见识,抒发葵花向太阳的微小诚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文士以品行为重,而科举考试首先凭文学,因而讲求研究经学、学习史学的功夫。这确实是敦促人们崇尚实学的真诚愿望。臣下我细致地查考,《书传》上说:要安定民众必须首先明白道义,要明白道义必须首先使心灵精诚。“危微精一”的传

心养性要诀,起源于《尚书》。因此,所有的书籍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了,而且“内圣外王”的底蕴实际在这里就具备了。《诗经》以情感为主但与政事相通,“风”、“雅”、“颂”所陈述的,都是教育和启发人们起自天子的自身修养并进而引申到政治领域还可以辅助政治的东西,所以孔子用普通话讲述它们。而且对《诗经》、《尚书》来说,还首先陈述了孟子特就二书关于“尚友”的理论,是应该下功夫诵读的。想要具备了解人、论说世道的见识的人,丢掉圣贤的彝训,就将失去作为权衡的标准。因此,想要寻求能补益心身、推导和明了统治方法的人,通过孔孟所引证和阐明的内容而详细解说它,也就可以把握住它的主要精神了。各种经书的解说、注释、注疏、义疏,交替出现在汉朝、晋朝、唐朝、宋朝时期。然而,各家也各有优点和缺点。史书的体裁来源于《春秋》,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传的体例已经是各自不同了。班固和司马迁之后,如荀悦、袁宏的前后两《汉纪》,他们的编年体,确实足以继承前古;而达到通晓政治原理、能资助教化和治理的程度,那就像宋朝的司马光写作《通鉴》,自称一生的精力全都集中用在了这本书上,而《通鉴》确实能让人在是非得失之林中找到借鉴,而且成为行政和用人都离不了的东西。后代讲求治理的人,应当把它奉为金鉴。圣明我朝的教化在三雍宫这些场合都十分庄严肃穆,人人都遵从五种人伦纲常。用仁义来沐浴百姓,打开儒馆,让士子进献诗歌;士子砥砺品行,严格要求自己,仰望太学的四门,遵循训示。先培养才能和见识,后学习文艺,确实已经达到了《诗经·棫朴》和《诗经·泮水》所吟咏的境界了。

制策又认为咨询事情、考察言论是从唐尧和虞舜时期开始的,后代考核政绩不必相同,因而想要收到真心实意办好事情的成效。臣下我查考,《尚书大传》说积善达到了长寿、富足、康宁、美德、善终这五福的,应按规定提升,所以提拔他们;积不善达到了早死、疾病、忧愁、贫穷、邪恶、懦弱这六极的,应按规定降级,所以罢免他们。九年进行三次考核,是效法全年十二个月。《周礼》的“六计”,把“廉”作为根本。然而,端庄有礼、不行贿受贿,这是稍微知道自爱的人都能完全做到的。对官员的操守严格要求,也就是考察他们的才能。所以,

自己行得正，去领导下属，这尤其贵在要有鉴别人的能力。汉朝用“六条”来监察郡国，其中监察豪强的有一条，监察太守的有五条。唐朝的考功法按“德义”、“清谨”、“公平”、“恪勤”来铨叙官员的“四善”，在具体项目上，从出谋划策、规劝过失到城隍修建、整治盗贼，分为二十七个优秀标准，又分成九等。宋朝沿袭唐朝的“四善”，分为四等。有的简略，有的详细，得失都在其中。只有按照才能安排职务，优秀的臣子才会有优异的政绩；只有因材使用，辅佐政治才能有合适的人选。《汉书》说综核名实，所以官吏称职。综核不是刻板地照搬规定。假如拘泥官员的形迹而不去看官员的具体情况，那就会重演唐朝道州刺史阳城的故事，使优秀官员因不能完成税收而自己给自己评定为下等后，带着妻子儿女弃官而去。如果登录最下等的名册用完了上千本，那又怎么能广泛选拔众多的人才，使人才的鉴别不出差错，以达到天下治理的最好程度呢？我朝太平盛世，廉洁守法蔚然成风，根据德行和才能来评定优劣，达到《周易·中孚》所说的授官公允、《诗经·羔羊》所歌颂的奉公守法的程度，达到《法言·孝至》所赞颂的端庄肃穆的境界。所有在职的臣子还能有谁不争先自我磨砺，天天勤于政务、辅佐皇上呢！

制策又认为五刑的类属，历代有增有减；对它的轻重及其沿革，一定要做详尽的探讨。这确实是想要达到运用刑法是期望刑法消亡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臣下我细致地查考，虞舜时期所说的慎重用刑，确实是谈论刑法的开端。接着，夏朝有《禹刑》，周朝有《甫刑》。这些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魏文侯时期，李悝著有《法经》六篇，这是后世法律条例的起源。《汉书》把军事和刑法合写成一“志”，认为它们功能是相同的；把名家和法家分为两家，认为它们的起源是不相同的。自从汉朝初年废除秦朝的苛刻政令、约法三章后，萧何制定法律，在李悝所制定的法律上又增加了数篇，叔孙通又增加了内容。至于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刑统》，元朝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令》，它们因时代不同而有增有减。法禁既然已经严密，所以法令也就更加详细了。刑罚的设立，原本是想让民众向善而远离犯罪。三代以后，民众仍然近于朴实，所以犯法的人

少；而且由于无知而触犯法令的，都可以改过自新。到了秦汉以后，民俗日益浮薄，在法律的惩罚范围内，他们尚且能奸巧地逃脱，所以即便是慈祥、有同情心的君主，治理天下也不能废除刑法。有见识的人讥笑唐太宗释放囚犯这件事，是有道理的呵！然而，自从科目条例日益增多以后，即便是对法律了解很深的人也不能通晓法令，官吏因此而做坏事；由于条例相互矛盾，所以他们可以随意解释运用，良民百姓于是就受到伤害了。看重生命，是崇高的品德；但它的宽恕也能姑息养奸。明断，是卓越的才干；但它的武断和刚健却不能造福于民。刑，就是成，一成便不能改变。因此，只有君子尽心尽力，不存偏见，不先入为主，才能做到光明正大、公正无欺。皇上法令严明，恩惠遍及民众，沉冤莫白的也必定能平反，触犯法网的则罚无偏纵。虞舜咨询皋陶，周朝任命吕侯，风雷的迅速、威严，雨露的祥和、滋润，这两种东西并不是把它们看成对立的了。

制策又认为除恶安良的办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因而考虑如何消除盗贼的方法。这确实是筹划治理、保卫国家的重要事情。臣下我查考，保甲法是从《周礼》的“比”、“闾”、“族”、“党”的设立而开始的，管子承袭而变通它，创建了“轨、里、连、乡”的制度，都是用同里巷相互熟悉的人纠察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这种立法最好。汉朝则有亭长、啬夫、游徼，唐朝则有坊正、里正、耆老，里巷连片，相互纠察，凡有藏污纳垢的，不难立刻发现。盗贼的产生，开始或许是出于搞钱的目的，继而或许是想逞强好胜，以至于学习和传授邪术，把金钱拿出来送给别人，置自身和家庭于不顾；陷得太深以后，一切都乱套了。这尽管是由于小民的过错，但也是由于当地官吏在平日不能正确引导民众走正道、只是在事到临头时进行稽查所造成的。他们一开始把它视为无害而姑息养奸，到后来又害怕自己受到严厉处分而隐瞒不报，遮遮掩掩；而身为总督、巡抚的人又宽容和袒护他们。不知道盗贼是否消除，实在是与民众的生活休戚相关的。把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把动乱制止在发生之前，难道不是好的主管部门的责任吗？假如让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吏认真做好户口编制，严密查访，破案精明；不时亲自到乡村和市镇走一走，遍访民间利病；使四境之内都如同家

里人一样，所有隐私都能洞察；那又有什么奸邪不能破获，什么坏风俗不能根除呢？赵广汉、张敞、龚遂等人的现成办法都在，都是可以仿效的。圣世的慈祥和恩泽就像春天一样，使整个华夏美好而和平。走到乡间就知道民众是很容易教化的，观看腊日祭祀就知道道德已经风行民间。讲究谦让、讲究仁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维持它、防范它，这就是教化端正一地习尚的最好方法。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师法古人以增加见识，慎重对待法度来考察旧有事例，依靠法制以防止民变，去除邪恶以改善风俗。扩大五帝的权威，张大三皇的政纲，仁德圣明的事体已经全包括，太平的功业都齐备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罗列图籍聚集祥瑞，整顿疆域凝结和气。诗书已经搜采而更要打开书库搜寻，官吏已经廉洁奉公而更要谨慎恭敬，囚犯已经从宽处理而更要申严法纪，百姓已经驯服而更要防范丁壮。在这个时候，朝堂光明，门庭和穆；里巷喜乐，路途欢畅；天地四方风俗相同，八方统一俯首称臣。星辰生辉、云彩灿烂，承接帝舜的日月递相大放光明；像钟声那样清亮，大道坦荡，皇位永世相传、坚如磐石。我国亿万年美好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何冠英　殿试对策

何冠英（生卒年不详）　字杰夫，福建闽县（今福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榜眼。后曾任道光十七年乡试山西考官，道光二十年恩科乡试浙江考官。

臣对：臣闻稽古所以右文，察吏在乎课最，明刑斯能弼教，除莠乃可安良。是故《易》垂多识之文，《书》种厘工之典，《诗》咏穿墉之化，《礼》详诘慝之条。古帝王经纬万端，甄陶六合。以勤典学，缉熙本于就将；以正官常，殿最严乎察案；以断刑讼，明决著于简辞；以儆奇邪，荡涤先乎闾里。悉本夙夜勤求之实，握天人交应之机。用能斯迈斯

征，进修懋焉；有猷有守，职业分焉；适重适轻，群情服焉；相保相受，民气和焉。寰宇镜清，方隅砥平，胥一世而登之上理者，恃此耳。

钦惟皇帝陛下，治光轩顼，道协勋华，阐孚惠于垓埏，媲隆施于圜矩。固已修来懋学而澄叙有方，忠信咸孚而和亲呈象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勤蓺采而听卑，询刍言而察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勤学课吏之方，慎罚防民之要。如臣椯昧，奚裨高深？顾当嘉言罔伏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备陈所习，勉述所闻，竭管窥蠡测之忱，效土壤细流之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士以行谊为重，而科目先凭文学，因推求夫治经学史之功。此诚崇重实学之至意也。臣谨按刘勰云：三极彝训谓之经。经者，常也，万古不易之常道也。《诗》、《书》所载，皆古人名言至论，小可为身心行习之资，大可为帝王治化之本。自孔孟引证推明而后，九经之义如日月之经。夫汉晋唐宋诸儒，传、注、疏、义，条分缕析，各抒所见。虽有醇疵之别，然其阐发义理，羽翼经、传，则皆孔孟之功臣也。《春秋》本鲁史之名，自孔子修之，笔削之权，褒贬攸寄，信为后世作史者之权舆。班马以后，史才代出，有以一人而成一代之史者，有以数人而成一代之史者，而非才、学、识兼优，则不足以传世而垂后。司马光《通鉴》重在资治，后世资为金鉴，惟其择精而语详也。夫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而器识之所出处，则皆本于经史。穷经久，则前言往行既得所观法，而意气自平；学史精，则得失是非以有所览稽，而见闻自广。自乡举里选易为科目，而取士者先凭文学之优绌为进退，而文学要以经史为权衡。圣贤之谟训具于经，古今之事绩昭于史。士必研经治史，而后无诮其有忝于科目也已。皇上振兴文教，倬汉为章，鸾旗而芹藻生香，鹿野而苹蒿掇秀。多士幸逢斯盛，有不思茹古涵今、以求无负通儒之望哉！

制策又以考绩始自唐虞，询事考言必察之于平时，而后可收实心任事之效。臣惟风俗之淳漓于吏系之，而吏治之贤否于人辨之。虞廷之考绩以三载，《周官》之弊吏以六计；汉以六条察二千石，晋以五条考郡县；唐叙以四善，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宋因唐之四善，分为三等。无非以时考核，故能庶务修明。且夫庶事之康，期于矢慎，而非

怠玩者之所能胜；百度之厘，期于矢勤，而非因循者之所能理。国事所关，民命所属，吏无大小，职守匪轻。《汉书》言综核名实，故吏称其职。是故浮躁喜事者似于急公，而喜事则多不自检之失；巽懦畏事者似乎持重，而畏事则有不自振之虞。悃愊安静之吏，用之于抚绥则可以便民，而才识未优，将缓急之时或不足恃；强明干济之吏，用之于奔走则可以集事，而学养未裕，则恣睢之气或有未除。循乎其名，要必课乎其实，则吏之贤否可以周知。是惟操用人之柄者，明试之审早察之于先，旌别之精又察之于后；而大吏复体此意，以察其下，不阿所好，不徇所私，将贤能之士争自濯磨，于以熙庶绩而亮天工，不至上以实求、下以虚应矣。圣天子达聪明目，知人安民如镜斯空，妍媸必辨如绳斯直，邪正罔违。所为慎简乃僚，亦克用乂，靖共尔位，其可无愆矣。

制策又以虞廷钦恤，刑期无刑，而因思夫无枉无纵、持乎协中之道。臣考五刑之名见于《舜典》，然皋陶刑官而教民惟德，刑与德相维也。《周官》司寇三典，司刑五刑，法綦详焉。而三刺五听以致其慎，三宥八议以推其恩。盖辟以止辟，行法中之政，即以存法外之仁也。春秋时楚有《仆区》之法，郑有《刑书》之作，晋有刑鼎之铸。战国时李悝著《法经》六篇，为后世律例所自始。汉初除秦苛政，约法三章，厥后萧何定律令。唐有律、令、格、式，宋有《刑统》，元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有《大明律令》。代各立制，要之立法宜严，行法宜恕。司刑者当思人命至重，无存成心，无狃偏见，无以姑息为阴德，无以刻核为胜任，本钦恤之心，行明允之法。王应麟有言曰：明允者用刑之法，矜恤者用刑之心。可以知用刑之道矣。皇上抚绥万方，哀矜庶狱，恺恻慈祥，至周至悉，洵理刑极则也。

制策又曰：除莠安良之法莫善于保甲，而因期消患于初萌，戢乱于未发。此又防民之本计也。臣惟《周礼》比、闾、族、党之制立，而以里闬相习之人，察朝夕最亲之事。联其人于相保相受，周旋久则情伪周知；分其权于为宰为胥，耳目亲则见闻皆悉。法至善也。汉置亭长、游徼，而十月行赐食之典；唐有里正、坊正，而六品有免役之文。韩延寿守颍川，置正五长；王守仁抚南赣，行十家牌。盖上世家给人足，俗

美风淳,故不必编为保甲。后世幅员日广,户口日增,生计之绌,盗贼易生。必稽查之勤密,摘发之精明,而后奸宄无可容身,百姓可以安堵。至如龚遂治渤海以散为戢,则又德足以化之。不必故峻科条,而闾井相安,比畏秋霜之肃;亦不必多立禁约,而奸顽不作,咸游化日之舒。诚弭盗善政也。圣朝典章明备,道一风同,良有司实力奉行,成规具在。行且见画地不犯,人钦令甲之严;比户可封,吏戒胥丁之扰也已。

若此者:讲学以崇道,课绩以奏功,尚德以缓刑,抑邪以崇正,洋洋乎畅鸿庥而垂骏业,盖亘古而立隆也。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德,天健昭行。宸学已优而弥勤念典,官箴已肃而倍饬敬共,宪令已新而益思敕法,民情已协而更切诘奸。图史之奥探焉,保障之绩懋焉,蒲鞭之化洽焉,桴鼓之禁明焉。光玉镜,披金绳,奄九有以来同,总八方而为极。于以德征风动,泽沛露生,丰寿世之宏规,亮敷天之伟业。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研究古代是用来帮助礼乐仪制的,考察官吏的目的是分辨优劣;严明刑法才能辅佐教化,除去坏人才能安定好人。因此,《周易》流传着对前人言行多加记识的条文,《尚书》传播了整顿吏治的法则,《诗经》吟咏了女子贞烈的风化,《周礼》详细记载了惩治邪恶的条规。古代帝王处理人间万事,教化天下。勤奋学习,就会日积月累而有辉煌成就;端正官吏的行为规范,就能用考核优劣来严格约束百官;裁定刑事诉讼,就能通过五个方面的验核来作出英明的决断;防止邪门歪道,就能首先将村镇街巷的歪风清除干净。这都是本着日夜辛勤探求的诚意,把握天人交相感应的时机。因而能做到勤奋上进,使个人修养达到完美的境界;能做到官员具有谋略和操守,职责划分开来;能做到轻重适当,使大家心服口服;能做到相互依存,彼此承担责任,使民众心平气和。之所以寰宇太平,疆域坦荡,整整一代都能达到天下大治,就是靠的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功绩与轩辕和颛顼一样辉煌,道

德就像唐尧和虞舜一样美好;将诚信和恩惠显示在天地之间,将兴盛的教化撒播在寰宇之内;固然已经使远方的人仰慕而来,学术昌盛而选拔有方,忠信使人信服,呈现出了和睦相亲的景象。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仍然殷切地咨询,勤于采用任何有用的建议,倾听卑贱之人的意见,询问割草打柴的人而就近考察,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勤奋学习、考核官吏的方法,以及谨慎用刑、防止民变等重要问题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的愚昧无知,怎能对陛下的高深有所补益呢?然而在这任何良好建议都会得到采用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将平时所学到的和所听到的东西全部尽力陈述出来,竭尽管窥蠡测的诚心,奉献土壤和细流般微小的帮助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文士以品行为重,而科举考试首先得凭借文学,因而推求研究经学和学习历史的功夫。这确实是崇尚实学的深远用意。臣下我细致地查考:刘勰说:关于天、地、人的基本准则叫做经。经,就是常,就是万古不变的根本原则。《诗经》、《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古人的至理名言,从小的方面说,可以作为身心修养的帮助,从大的方面说,可以作为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自孔孟引证和推明以后,九经的意义就如同日月常在。汉朝、晋朝、唐朝、宋朝各位儒士的解说、注释、注疏、义疏,条分缕析,各抒所见。虽然有醇粹和瑕疵的区别,但它们阐发义理,辅佐经、传,都可以说是孔孟的功臣。《春秋》本来是鲁国史书的书名,自从孔子编修它后,在修改之中寄托着褒贬,确实是后世编写历史的人的鼻祖。班固、司马迁以后,每代都有史学天才出现,有一人而写成一代历史的,有数人而写成一代历史的,然而如果不是才、学、识兼优的,那就不足以流传后世。司马光的《通鉴》重在对政治的帮助上,后世把它视为金鉴,只是因为它选材精当而叙述详尽。读书人应先培养才能和见识,后学习文艺,而能产生才能和见识的,都是来源于经书和史书。长期研究经书,你既然能观摩和效法前人的言行了,那你的心境和气度就自然会平和;历史学精通了,那你就能看到和查考是非得失,从而见闻自然也就广博了。自从乡举里选改为科举后,选取文士的人首先是凭文学的好坏来作

为取舍标准，而文学要用经学和历史来作为权衡。圣贤的智慧和原则保存在经书中，古今的事迹清清楚楚地写在史书中。文士必须研究经学和史学，然后才能无愧于科举。皇上振兴文教，就像银河在空中闪光，使《诗经·泮水》中鲁僖公巡视泮宫、《诗经·鹿鸣》中君王大宴宾客的欢乐场面得以再现。文士有幸遇到这种盛世，能不想博古通今、以求自己无负于通儒的名望吗！

制策又认为考核政绩是从唐尧和虞舜时期开始的，咨询事情、考察言论必须要在平时进行考核，然后才能收到真心实意地办好事情的功效。臣下我认为：风俗的淳朴与浮薄完全在于官吏，而官吏政绩的好坏又在于人们对它的评判。虞舜朝廷的政绩考核是三年进行一次，《周官》考核官吏使用“六计”；汉朝用“六条”来监察太守，晋朝用“五条”来考核郡县；唐朝提升官员用“四善”，分为二十七种优秀标准，区分为九等；宋朝因袭唐朝的“四善”，分为三等。无非都是按时考核，所以能使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况且各项政事的井井有序要指望官吏誓必谨慎，而不是玩忽职守的人所能胜任的；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要指望官吏誓必勤奋，而不是因循守旧的人所能办到的。由于涉及到国家大事，关系到民众的生命，所以官吏无论大小，职责都不轻。《汉书》说综核名实，所以官吏都能称职。因此，浮躁和喜欢干事的人似乎是热心办公事，而喜欢干事就会产生许多不检点的过失；懦弱怕事的人似乎很持重，但怕事就会有不求上进的忧患。淳朴老实的官吏，用来抚慰和安定民心是能有利于民众的，然而他们的才能和见识还不够，在紧急的时候也许不能依靠；精明强干的官吏，用来办事是能办好事的，然而他们的学识和修养还不足，暴戾恣睢的习气也许还没有去除。循名责实，必须重在一个“实”上，这样，官吏的好坏就可以完全了解了。这就只有掌握用人权柄的人早在用人之前就精心审查，在用人之后又精心甄别；而且高级长官再本着这个意思，考察其下属，不阿所好，不徇所私，贤能的官吏就会争相严格要求自己，专去圆满完成各项工作而辅助天工，不至于上面求实而下面却用“虚”来应付了。圣明的天子心明眼亮，知人安民如明镜高悬，好坏分明的界限如墨线一样笔直，不会混淆邪正。由此谨慎地择任官吏，官

吏也能尽心尽力，如同《诗经·小明》所说的那样：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就不会出差错了。

制策又认为虞舜的朝廷对用刑十分慎重，使用刑法的目的是想要达到无刑的境地，从而想要做到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保持“协中”之道。臣下我认为：五刑的名称在《舜典》上可以见到，然而皋陶作为司法官却对民众只是用道德来敦劝，表明刑罚与道德相互来维系。《周礼》上说司寇掌握建邦立国的轻、中、重三典，司刑掌握野、军、乡、官、国五刑，法规十分详细。而用审讯群臣、审讯群吏、审讯万民这“三刺”以及辞、色、气、耳、目这“五听”来谨慎行事，用不识、过失、遗忘这“三宥”以及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议”来施与恩惠，这是因为刑罚只是用来达到停用刑罚的目的，施行刑法中的规定，就是用来保存在刑法之外的仁爱的。春秋时期，楚国有名为《仆区》的法律，郑国编写了《刑书》，晋国铸造了刑鼎。战国时期，李悝著有《法经》六篇，是后世法律条例的起源。汉朝初年废除秦朝的残酷政令，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制定了法律条令。唐朝有“律”、“令”、“格”、“式”，宋朝有《刑统》，元朝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朝有《大明律令》。各代各自都建立了法制，关键是立法应该从严，而施行法律则应该从宽。掌管司法的人应当想到人命至关重要，不要存有成心，不要存有偏见，不要把姑息养奸当作阴德，不要把残酷当作能办事，应该本着宽恕之心，施行公正的法令。王应麟说：严明公允，这是使用刑法的准则；哀怜体恤，这是使用刑法的精神。由此便可以知道用刑的原则了。皇上抚慰安定四方，怜悯犯罪，和蔼慈祥，十分周到，确实是运用刑法的最高典范了。

制策又说：除恶安良的办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因而期望能把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把动乱制止在未发生之前。这又是防止民变的根本大计。臣下我认为：《周礼》上的“比”、“闾”、“族”、“党”制度建立，而用邻里相互熟悉的人来察看早晚在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把他们用相互依存、彼此承担责任的关系联系起来后，往来久了，也就能相互了解事情的真伪了；把他们的权力再划分，设立“宰”、设立“胥”，让他们与民众深入接触后，所见所闻也就真实而详细了。《周

礼》的制度可以说是最好的。汉朝设置“亭长”、“游徼”，而且在十月份还为他们举行“赐食”的典礼；唐朝有“里正”、“坊正”，而六品有免役的条文规定。韩延寿做颍川太守时，设置了“正五长”；王守仁镇抚南赣时，推行了“十家牌”的制度。因为从前家给人足，俗美风淳，所以不必把民众编为保甲。后世的版图一天天扩大，户口一天天增多，生活困难，盗贼就容易产生。必须依靠勤密稽查、精明破案，然后坏人才能无处藏身，百姓才能安全。至于像龚遂治理渤海郡那样，用离散盗贼的办法来达到整肃治安的目的，那又是他的德行能够化解盗贼。所以不必故意把法令搞得很严，村镇就能相安无事，就好比害怕秋霜的残酷无情一样；不必建立许多的禁约，奸顽也不会产生，人们都能生活在祥和的环境中。这确实是消除盗贼的好办法。圣朝的典章详明而完备，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好的主管部门真心实意地奉行现成的法规，眼看着就会谁也不敢冒犯，人人都敬畏法令的严明，已经达到比户可封的境地，官吏能够制止手下的人骚扰民众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宣讲学术以崇尚道德，考核官吏以建功立业，崇尚仁德以减轻刑罚，压制邪恶以崇尚正气。伟大呀！宣播洪大的吉福而将宏伟大业永远延续，超越千古而建立最美好的社会。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道德每天都有长进，自强不息。尽管学问已经优异，但还要更加勤奋地坚持学习。尽管吏治已经澄清，但还要加倍整饬，使他们更加恭敬而勤奋。尽管法令已经更新，但还要进一步考虑制订新法。尽管民情已经平和，但还要进一步整治奸邪。做到学问的奥密探明，官吏的功绩弘扬，轻微处罚的教化家喻户晓，奸邪的禁令明确。政教清明，礼教昌盛，把握九州使诸侯来朝，总合八方而构成最高主宰，用来达到道德像风吹大地、小草随风摆动一样，恩泽丰沛，像雨露一样滋润万物；扩大太平盛世的宏大规模，显示普天之下的宏伟业绩。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的历史，也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苏敬衡　殿试对策

苏敬衡(生卒年不详)　字樵林,山东沾化人。道光十六年(1836)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次年乡试,曾任陕西考官。

臣对:臣闻观文所以成化,计吏所以经邦,出入当则大法以昭,守望严则邪慝自弭。稽诸载籍,《易》重离文之焕,《礼》详升进之谟,《书》慎狱讼之成,《传》言井闾之法。茂矩崇规,粲然具备。自古帝王,秉乾御宇,握镜临宸,典籍时陈于乙览,臣僚相勖于寅恭,协中时凛于宸居,郊野弥严于申画。用是缥帙陈书,经术懋焉;紫宸考绩,吏治隆焉;丹书无枉,刑法精焉;黔首胥安,舆情洽焉。所为覆露芸生,陶甄品汇,洋洋乎超图溢牒,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莫不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抚《图》赞化,锡极调元,仰观而式乾文,俯察而宪坤典。固已巍焕成文而翼为奏效,宽严并济而康乐有书矣。乃圣怀冲挹,深维累洽重熙之运,弥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明文学、肃吏治、慎庶狱、安良民之至计。如臣椿昧,奚足以仰赞高深?顾际广思周逮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文学多端,首重经史,而因究其有补身心治道之大者。此诚阐发图书之精意也。臣惟九经皆圣贤彝训,帝学官箴皆从此出。言汉宋之究孔孟,曷如究孔孟之说《诗》、《书》!夫《诗》、《书》以内,名言至理,最足补身心治道,故孔孟多所称引。义类博通,夐乎尚已!若夫汉晋唐宋传、注、疏、义,醇疵互见,即不尽圣人之旨,而亦多所发明。汉之传《易》,学者有施、孟等家,今惟费氏《易》独存。陆氏《经典释文》云:马融、康成、荀爽并传费氏《易》。郑长于会同典礼,荀长于阴阳上下,至汉季虞翻传孟氏《易》,又长于消息盈虚,而虞实较郑、荀为优。至《书》之欧、夏,《诗》之三家,贾公彦之二礼,咸有师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立意高而考核不疏者矣。史家编年之体昉于《春秋》,《春秋》微言大义见于三传。《左氏传》外,公羊、谷梁二家

各标旨趣。后世传习之者或以之断狱，或因之显官。汉武帝好公羊学，宣帝好谷梁学，所尚不同。惟贾逵条列公、谷二家不如左氏者数十事，后儒以为特识。荀、袁两《汉纪》继为编年之体，司马光《通鉴》则重在资治。光尝自言：生平精力尽在是书。洵足垂永久而昭法戒矣。夫士不通经，何以致用？文章之原，尤在经史，故科目之重，行谊为先。虽曰文学，亦必先器识而后文艺，文人之号庶无讥焉耳。我皇上文治光昭，修明学术，多士观光鼓舞，孰敢不争自濯磨哉！

制策又以考绩始自虞廷，而因求夫询事考言之法。此尤澄叙官方之要图也。臣考《周官》以六计弊群吏之治；汉以六条察郡国，而察二千石者五；晋以五条考郡县；唐则叙以四善，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宋则因唐之四善，分为三等。夫察吏之治，首重惟廉。廉固人臣之大节，然徒以苞苴不行，簠簋必饬，谓进退可幸无过，而燕燕居息，遂泰然忘效职分猷之义，则犹无补于政治也。汉武帝诏曰：愿与天下士大夫厉精更始。史纪宣帝曰：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而《三国志注》始有清慎勤之说。其论以慎为本，不知居官最戒怠玩，则勤乃其要乎！在国家优待臣工，方薄惩其退葸之非，而力振其因循之习。乃或以干济责之，而任事鲜有实心；以明允期之，而案牍每多留狱。所谓吏称其职者安在？《汉书》言：综核名实。使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其弊有不胜穷者。惟在长吏以率属者，虚公为心，察之于平日，核之以实迹，为与守并重，才与德兼衡，庶几三载考绩，升降幽明，法不必加密而吏治蒸然日上矣。我国家课绩用人，务求实效，所由大法小廉而庶政无不举也。

制策又以虞廷钦恤，刑期无刑，而因详举前代法律之书。臣惟五刑之设，上古不废。《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而且五禁五戒，防于未然之先；五刺五听，审于已然之后。宽之以三赦，加之以三宥，慎之以八议。何其法良而意美也！汉除苛政，萧何定律，叔孙通益律所不及者八篇，然犹袭秦气象。文帝肉刑之除，景帝笞法之减。隋文帝令高颎定新律，刑名有五，又敕苏威更定五百余条，其法简要。唐因隋制，稍为增损。宋窦仪重定《刑统》，参酌详备，世称平允。太祖立折杖之法，令详覆之议，立心尤厚。明刘惟谦等造《律文篇》，自本于唐

律,因时损益焉。夫刑狱致天下之大命,必悉其聪明,致其忠爱,始可无枉而无纵。苟以长厚求名,不计养奸之患;否则锻炼深文,而科条难避。岂辟以止辟之意乎?圣天子明慎用刑,恺恻慈祥,蔼然洽于民心,肃然昭兹令典。凡内外秉宪之臣,宜何如慎重,以期刑措不用,共征化理乎?

制策又以除莠安良之法,莫善于保甲,而思盗之克弭,在消之于初萌,戢之于未发。此尤乂安黎庶之亟务也。臣惟《周官》有比、闾、族、党之制,管子创轨、里、连、乡之法,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其法至为美备。惟是乡曲之间敛钱结会,其始不过一二莠民倡立邪说,煽惑愚众。为长吏者及时治之,固易捕除。乃不知思患预防之术,而为姑息养奸之计。及至党与渐众,邪慝丛生,守令畏于谴咎,大吏惧生事端,而宵小逞其奸矣。汉制亭有长,乡有三老、啬夫、游徼。凡为此者,皆能修行率众为善之人。唐时里正、坊正免其课役,尚有成周遗意。夫太平日久,吏或藏奸。保甲一法,王安石行之而民扰,王守仁行之而民安。则治法尤贵有治人也。虽然,治之于已然,曷若治之于未然。仓廪实则民爱其身家,学校兴则人咸礼义自守,岂惑于邪说也哉!圣朝典章明备,道一风同,所由经正民兴,共跻于荡平之域也。

若此者:综万卷之富则治弥光也,考百职之功则事无旷也,明三听之施则民维畏也,靖四民之志则盗以弭也。酌化懿纲,蜚英腾茂,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惮研已至而不废讨蒐,贤否已明而犹严甄别,嘉肺已平而弥详律令,顽愚已革而尤重纠讥。案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书;稽古论功,迈咸五登三之盛。淳良康乂,曼羡延洪,上以祇迓蕃厘,下以永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观察文采是为了教化天下,考察官吏是为了治理国家。如果量刑得当,那法令就会彰明;如果防范严密,那邪恶就会自行消亡。查考各种古籍,《周易》重视“离”卦所反映的文

明之光,《礼记》详细记载了升迁的办法,《尚书》特别注重对犯罪的审理,《左传》说到了“井闾”制度。美好的法式、崇高的规矩,都明明白白地具备了。自古以来的帝王,秉承天命控制寰宇,心怀明镜统治天下,经常翻开典籍勤奋阅读,臣子用十分恭敬来相互勉励,在朝堂时刻不忘用刑“协中”之道,殷切讲求治安管理的严密。因此能做到重视文化,使经术昌盛;考核官吏,使吏治得到澄清;没有冤案,使刑法精确无误;百姓个个平安,使群情欢乐融洽。之所以恩泽像甘露一样滋润芸芸众生,陶冶出众多的优秀人才,超过了神书秘图所载述的景象,使整整一代都步入太平盛世,靠的都是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手抚《河图》,帮助天地化生和养育万物,赐给民众最高准则,调和阴阳,仰观而效法天文,俯察而效法地理,确实已经达到了礼乐仪制昌盛而群臣辅佐奏效,宽严并济而赞颂康乐的境界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牢牢挂念着太平相承、代代光明的国运,更加殷切地保持着持盈保泰的思想,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精通文学、整顿吏治、谨慎处理犯罪、安定良民等问题来策试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无知,怎足以赞助陛下的高深?然而在遇到这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怎敢不竭力陈述平时所诵读、学习的东西,以奉献出管窥蠡测般的微小忠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文学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得注重经学和史学,因而想要探究它们中最有益身心和施治方法的东西。这确实是阐发《河图》、《洛书》思想的精当用意。臣下我认为:九经都是圣贤的基本原则,帝王的学问以及做官的箴言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与其谈论汉朝和宋朝研究孔孟,还不如去研究孔孟怎样解说《诗经》、《尚书》呢!《诗经》、《尚书》之内的至理名言,最有益身心和施治方法,所以孔孟多次称道和引用。它们意义类似、相互贯通,极其精致而深远!至于汉朝、晋朝、唐朝、宋朝的解说、注释、注疏、义疏,既有精醇又有瑕疵,虽然没有完全说透了圣人的意思,但也有许多创见。汉朝解说《周易》的学者有施雠、孟喜等学派,如今只有费直的《周易》保存了下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马融、郑康成、荀爽各自都解

说费真的《周易》。郑康成长于用典章和礼乐制度来作综合解说，荀爽长于用阴阳相互对立的关系来作解说，到汉朝末年虞翻解说孟喜的《周易》,又长于用消长盈虚的变化关系来作解说,而虞翻的解说确实比郑康成、荀爽要好。至于《尚书》的欧阳生、夏侯胜,《诗经》的鲁、齐、韩三派,贾公彦的《周礼疏》和《仪礼疏》,都有师承。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做到了立意高而且考核没有疏漏。历代史学家的编年体始于《春秋》,《春秋》的微言大义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传中可以看到。《左传》之外,公羊高、谷梁赤这两家各自都标明了自己的宗旨。后世传习的人,有的用它来判案,有的还因此做了大官。汉武帝喜欢公羊学,汉宣帝喜欢谷梁学,他们的崇尚不同。只有贾逵分条列举出数十条公、谷两家不如左丘明的地方,后来的儒生认为他有过人的见解。荀悦、袁宏的两部《汉纪》，继承前人而写成了编年体,而司马光的《通鉴》则重在对政治的帮助上。司马光自己曾说:生平的精力全部用在了这本书上。它确实可以永久流传而且彰明了政治法则。文士不精通经学,那怎么能在实际中运用呢？文章的源头，更在经学和史学上，所以科举所看重的，首先是品行。虽说是文学，但也必须先培养才能和见识,然后再学习文艺。只有这样,文人的称号才能当之无愧。我皇上文治的光华灿烂夺目,学术繁荣昌盛,文士们在观光之后深受鼓舞,谁敢不争相磨砺自己呢!

制策又认为考核政绩是从虞舜时期开始的，因而想要探求咨询事情、考察言论的方法。这尤其是整顿吏治的重要计划。臣下我考察:《周礼》用“六计”考察官吏的政绩;汉朝用“六条”监察郡国,在“六条”中,监察太守的就有五条;晋朝用“五条”考察郡县;唐朝则用“四善”提拔官吏,具体分为二十七个优秀标准,划分为九等;宋朝因袭唐朝的“四善”,分为三等。考核官吏政绩,首先看重的就是廉洁。廉洁尽管是臣子的大节,然而只凭不受贿行贿、行为端正,认为无论进退都能幸好没有过错,从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于是忘记了忠于职守的原则,那对于政治仍然没有什么补益。汉武帝在诏书中说:愿意与天下的士大夫励精图治,重新开始。据史书记载,汉宣帝说:政府的重要机关设置完善,官员的品级升降制度完备,上下相安,不要存有苟

且的心思。而《三国志注》上则首次记载了“清廉”、“谨慎”、“勤奋”的论说。它在理论上把“谨慎”作为了根本，而不知道做官最忌讳怠惰和玩忽。由此可见，“勤奋”才是做官的根本！国家礼遇臣子，只是稍稍惩罚官员不求上进的过错，而尽力改变官员因循守旧的习气。有的用完成国家大事来要求他们，而他们办事却少有实心；用精明公正来要求他们，而他们处理案件却拖拖拉拉。那所谓官吏称职，又从哪里能看到呢？《汉书》说：综核名实。假使上面要求实效，但下面却只是弄虚作假来应付，这种弊端就无穷无尽了。只有高级官员中那些统率下属的人，虚心为公，在平时对官吏进行考察，用实事进行核对，作为与操守并重，才能与品德兼衡，才能在三年一次的考核时，做到升降公平，使法令不必层层设防而吏治就能蒸蒸日上。我国考核政绩，任用官员，务求实效，因而大官守法，小官廉洁，任何事情都能办好了。

制策又认为虞舜的朝廷对用刑十分慎重，使用刑法的目的是要达到无刑的境地，因而提出要详细列举前代的法律书籍。臣下我认为：“五刑”的设立，上古时都没有废除。《周礼》说大司寇用“五刑”来纠察万民，而且用“五禁”和“五戒”来防患于未然，用“五刺”和“五听”来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进行审理；用“三赦”加上“三宥”来对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用“八议”来对犯罪进行慎重处理。这些法令和用意是多么好呵！汉朝废除残酷政令，萧何制定法律，叔孙通又增加了以前法律所没有触及到的有关条文八篇，然而还是有沿袭秦朝的意味。汉文帝废除肉刑，汉景帝减轻鞭笞。隋文帝命令高颎制定新律，有五种刑名，又敕令苏威更改制定了五百余条，法令简要。唐朝因袭隋朝制度，稍稍做了一些增减。宋朝的窦仪重新制定了《刑统》，参考斟酌十分详细完备，世人称赞它十分公平适当；宋太祖订立了“折杖”的法令，提出了死刑复审的建议，用心尤其厚道。明朝的刘惟谦等人编写了《律文篇》，原本出自唐律，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增减。刑狱关系着天下人的生命，必须要用尽聪明，本着忠爱之心，才能做到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假如用谨厚宽容来博取名声，而不考虑姑息养奸的祸患；要不然就是费尽心力罗织罪状，使人难逃处罚。这难道是用刑的

目的在于不再用刑的本意吗？圣明的天子明智而谨慎地用刑，和蔼慈祥，仁爱深入民心，严肃彰明法令。所有内外执法的臣子应该如何慎重行事，以达到刑法被搁置不用、用教化就能治理天下的目的呢？

制策又认为除恶安良的办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因而想到平息盗贼，应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把他们制止在未发生之前。这尤其是安定百姓的急迫任务。臣下我认为：《周官》有“比”、“闾”、“族”、“党”的制度，管子创立了“轨、里、连、乡”的办法，这些都是用里巷内相互熟悉的人，察看身边能眼见耳听的事情。这些办法最为完善。只是乡村之间的敛钱结会，在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有一两个坏人提倡邪说，煽动和迷惑愚昧的民众。作为地方长官的人及时惩治他们，原本是容易把他们逮捕和除掉的，然而却不知道防患于未然的手段，而采用姑息养奸的办法。等到他们党羽渐渐多了起来，奸邪丛生，太守、县令害怕受到处分，各省长官担心生出事端，因而盗匪的奸计也就得逞了。汉朝制度规定：每亭有亭长，每乡有三老、啬夫、游徼。凡是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能够注重自己的行为修养、率领众人做好事的人。唐朝时，里正、坊正都免除赋税和徭役，还保留着周朝的遗风。太平日子久了，官吏中有一些人会保护坏人。保甲这项制度，王安石施行它而民众受到了骚扰，王守仁施行它却使民众得到了安全。由此可见，好的法令尤其要有好人施行。尽管如此，在事变发生后去收拾它，还不如在事变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解决它。仓廪充实，民众就会爱自己、爱家庭；学校兴盛，人人就都会遵守礼义。又怎会被邪说所迷惑呢！圣朝典章明白而完备，道德统一，风俗相同，所以风气端正，民众振奋，已经共同迈向太平盛世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综合万卷诗书，治绩就会更加辉煌；考核百官的政绩，政务就不会荒废；刑事审判的措施得当，民众就会感到敬畏；使士、农、工、商心境平和，盗贼就会消亡。醇厚的教化，美好的纪纲，英声飞扬，丰碑矗立；仁爱、神圣的事体已经全包纳，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方法已经相当完备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天下太平更求太平，天下平安更求平安。尽管学习研究已经尽心尽力，但还要深入钻研经典；尽管好坏已经分明，但还要对官员

严格甄别；尽管审案已经公平，但还要详细制订法律条令；尽管刁顽和愚昧的人已经被消灭，但还要重视治安。对照经书而校验德行，那就在五经之上再编成六经、七经；观察古人而评论功绩，那就超越五帝三王的盛世。百姓淳朴善良，康乐平安，国运洪福无限蔓延，上以迎接苍天降福，下以永保万民平安。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的历史，也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子江　徐立群译〕

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言必信,行必果。

万物并育而不相悖。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殿试策问

[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十有八载于兹。仰蒙昊苍眷佑,列圣诒庥,府事修和,纲纪整肃。期合天下黎元,迪吉康而跻仁寿。深惟化民成俗之方,足食厚生之道,奋武卫而诘戎兵,招俊乂而襄政治。爰咨多士,式仜嘉谟。

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孟子云: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古昔盛时,道德一而风俗同,左道有诛,奇邪有禁。当其时,未尝无莠民也,特以比、闾、族、党既各以法教其所治,司谏司救,又纠劝而诛让之。渐以仁,摩以义,节以礼,俾群黎百姓相安于日用饮食之质,而荒诞不经之说,罔或奸其间。逮叔世民讹,邪说滋炽,转相煽诱,习为固然,身陷于罪,不得不绳以法。何以使桀黠者革面洗心,愚懦者中心有所守而不为所惑欤?欧阳修言:莫若修其本以胜之。行以勤而浸以渐,倘可丕变欤?

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汉耿寿昌筑常平仓,时称便矣。后汉刘般谓常平仓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其故安在?当境采买,固虞勒派;采自邻封,又添运费。例价有定,粮价无常。何以使官民两不受累,而及时奉行,不至有名无实欤?论者谓成周以后,备荒之法,莫如义、社二仓。义仓劝课当社出谷,即委社司简校收积,遇荒赈给。法

非不良也。苟非其人,敛散皆弊。官吏因而持之,害不可胜言矣。社仓之法,略与义仓同。何以隋唐行之,不久便废,至朱子而独有成效?朱子《社仓记》推原朝廷未改设社仓之意,试详述之。今欲储偫无亏而凶荒有备,将何道之从欤?

《论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古者因田猎以简军实,四时所教不同。有谓夏令不田,有谓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者。何欤?汉时都试,厥制若何?何以建武遽行停罢?罢都试无流弊欤?貙刘与乘之同异若何?唐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显德殿庭,朝臣多有谏者。岂通达之论欤?宋时教阅之法纷如,而兵力不振,无乃有名无实欤?阵法始于何时?或三,或五,或八,或十二,或三十二,或六十四,能言其略欤?管子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之方,荀子为将六术、五权、三至之道,能举其说欤?我国家以弧矢威天下,承平日久,武备尤不可不加修也。其剴切陈之。

自乡举里选之法不行,而取士悉由于科目,重文艺而轻德行。论者讥之。然居后世而复乡举里选,能行之无弊欤?唐因隋旧,设立诸科,而士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进士尤贵,得人亦最盛。然其弊至有求知己、温卷诸名目,风俗不可问矣。分路取人,司马光、欧阳修持论不同。孰者为当?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苏轼之论极通达矣。司马光又以专用经义、论策为百世不易之法,何欤?朱子亦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议若何?糊名、易书、搜检,起于何时?朝廷用之也重,则求之不得不严。有谓待士轻者,岂通论欤?

夫敦教化以正风俗,筹积贮以裕仓储,训练协经武之宜,选举副求贤之实,抚绥寰宇之要图也。尔多士学于古训,参稽有素。其悉对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人说话必须得守信用,行动必须得有结果。

万物同时生长而相互不危害。

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的为人难道能行吗？所以就要考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是追溯历史与古人做朋友。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盛大的基业，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仰蒙上天保佑，列祖列宗留下荫庇，六府三事顺畅完美，纲纪整齐严肃。期望让天下的百姓都能达到吉祥康乐、太平万年的境地。深深挂念着教化民众、培养好风俗的方法，丰衣足食、生活富裕的途径和振扬武力，整顿军事，招揽俊杰贤才，让他们辅佐政治。于是咨询各位贡士，希望你们能够提供完善的意见。

风俗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教化实际上是风俗的本原。孟子说：纲领正确，百姓就会振作；百姓振作，就不会有奸邪了。古代兴盛的时候，道德统一，风俗相同，惩罚旁门左道，禁止歪风邪气。在当时，未尝没有坏人，只是因为有“比”、“闾”、“族”、“党”的制度，既各自用法律教育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司谏”和“司救”还用道义来劝说他们，用刑罚来惩处他们。用“仁”来感化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用“礼”来约束民众，使黎民百姓相安于日用饮食的天然状态，而荒诞不经的邪说，就不会在民众中乘机作乱了。到了衰乱的时代，民众谬误，邪说越发猖獗，辗转相互煽动诱惑，习以为常，等到犯了罪，不得不被绳之以法。怎样才能使凶暴狡诈的人洗心革面，愚昧懦弱的人心中有主见而不被邪门歪道所迷惑呢？欧阳修说：最好从根本上进行治理，从而战胜邪门歪道。如果努力引导，慢慢感化，是否能让民风发生重大改变呢？

积贮是天下的根本大事。汉朝的耿寿昌修筑常平仓，当时人们都称赞它方便有利。后汉的刘般认为常平仓尽管有利民的名声，但实际上是侵害了百姓。这原因在哪里？粮食在当地采买，固然担心强行摊派；但从邻近地区采买，却又会增加运费。常平仓的价格有规

定，但粮食价格却是变化无常的。怎样才能使官府和民众双方都不受累，而且能及时奉命执行，使常平仓不至于有名无实呢？议论的人认为在周朝以后，备荒的办法，没有比义仓和社仓更好的了。义仓劝说民众交纳粮食，随即委托社司验收储蓄，遇到灾荒便赈济民众。这种办法不是不好。然而，假如主管人员不行，那收粮和放粮就都会产生弊病。如果官吏乘机把持，那危害就说也说不完了。社仓的办法，大致与义仓相同。为什么隋朝和唐朝推行它，不久便废弃了，而到朱子的时候却独有成效呢？朱子在《社仓记》中分析朝廷没有改变设立社仓的意思，请试着把它详细叙述出来。如今想要使储蓄不亏本，遇到凶荒的时候有准备，应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论语》说：用未经训练的民众去作战，就可以说是把他们的性命抛出去。古时候利用打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四季所教的内容不同。有人说夏季不打猎，有人说是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演练武艺。这是为什么？汉朝时的“都试”，它的制度是怎样的？为什么在东汉建武时期突然被取消了？取消“都试”是不是没有流弊呢？“貙刘”与“乘之”有什么地方相同、有什么地方不相同？唐太宗引进诸卫骑兵统将等，在显德殿庭练习射箭，朝臣中有许多劝谏的人。他们的劝谏难道是通情达理的言论吗？宋朝时，训练方法各种各样，但兵力却不强，这是不是有名无实呢？阵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或三阵，或五阵，或八阵，或十二阵，或三十二阵，或六十四阵，能说说它们的大略吗？管子“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的方法，荀子提出的作为将领的“六术”、“五权”、“三至”的原则，能列举其说法吗？我国以弓箭逞威天下，现在太平的日子久了，军备尤其不可不加整治。请切实陈述出来。

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不施行后，选取文士都是通过科举来完成的，因此文士大都重视文艺而轻视德行。这受到了议论者的讥笑。然而生活在后世却又恢复“乡举里选”，施行起来能没有弊病吗？唐朝沿袭隋朝旧的制度，设立了科举的各种考试科目，而文士所看重的，只有“明经”、“进士”这两科。“进士”科尤其重要，选拔的人也最多。然而，它甚至也产生“求知己”、“温卷”等名目的弊病，使风气败

坏到了极点。在分路取人的问题上,司马光、欧阳修所持的看法不相同。他们中谁的看法正确?针对取消"诗赋"、"明经"等考试科目,用"经义"、"论策"来考试文士,苏轼的论说是极其通情达理的。然而司马光又认为专用"经义"、"论策"是百世不能改变的制度。这是为什么呢?朱子也想取消"诗赋"而分成"经"、"子"、"史"、"时务",分年度考试。他的意见是怎么样的?"糊名"、"易书"、"搜检",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由于朝廷重用文士,所以挑选他们就不得不严格。有人认为这样是轻待文士。这难道是通情达理的见解吗?

促进教化以纠正风俗,筹划积贮以充实仓储,训练要适应整治军备的要求,选举要符合求贤的实际,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谋略。各位贡士学习古代训示,参证研究早有功力。请你们在答卷上将问题全部都答出来,不要空泛,不要隐瞒,皇帝我将亲自阅览。

钮福保　殿试对策

钮福保(生卒年不详)　字右申,号松泉,浙江乌程(今吴兴)人。道光十八年(1838)状元。道光二十年,出任江西乡试副主考。同年八月,任广西学政。其后,先后两任会试同考官,累官至少詹事。擅长书法,兼画山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造诣。

臣对:臣闻敷教者正俗之原,足食者裕国之本,整军者卫民之务,举贤者辅治之资。自古帝王,锡畴御宇,握镜临宸,以重师儒则教思维广,以谨出入则比户可封,以诘戎兵则武功丕著,以登宅俊则士行益修。稽诸往籍,《雅》著鼓钟之乐,《颂》传壎棁之歌,《书》详武卫之文,《礼》重宾兴之典。用是甄陶切而庠序被其休,国用饶而积仓储其备,训练明而车徒得其用,旁求广而英俊庆其升。懿纲酽化,侯其祎而。所为卢牟六合,纲纪万端,轨连胥而规轩颉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侔帱载,治炳登咸,则古圣以同民,体至仁以育物。固已四术是崇而九年有备,六师并饬而三物咸兴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深维久治之规,弥切畴咨之念。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

化俗、厚生、经武、选贤诸大政。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述平昔之所诵习者,以勉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而因思夫经正民兴之盛。此诚端本善则之至意也。臣闻虞廷教百姓亲逊,实本放勋劳来辅翼之旨,而致四方风动之休。《周礼》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下至比、闾、族、党,月吉则属民读法,各有以教其所治。司谏司救,又纠劝而诛让之。古昔盛时,道德一而风俗同,左道有诛,奇邪有禁,司化导于未发,严惩创于已萌。乐防情而礼防伪,有以渐进于敦庞;贤得民而道得众,有以日生其观感。由是德礼修而政刑皆当,渐以仁,摩以义,俾群黎百姓相安于日用饮食之质,而荒诞不经之说,罔或奸其间。逮叔世民讹,邪说滋炽,转相煽诱,习为固然,身陷于罪,不得不绳以法。夫愚民莫不自重其利,自爱其生,一惑于邪说,则金钱收以奉人,身家置之不顾。惟在上者导以大中正直之途,开其鼓舞作新之路,使桀黠者革面而洗心,愚懦者中心有所守。因势而利导,训俗以型方,如泥之在钧,金之在镕,无不受其陶铸。欧阳修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行以勤而浸以渐,庶几可以丕变矣。圣朝教泽涵濡,风俗醇茂,敷天之下,不已臻康乐和亲之治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天下之大命,而因详及夫三仓之利弊。此尤利用厚生之至计也。臣考《周官》遗人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仓人掌谷入之藏;廪人掌九谷之数;旅师掌聚野之屋粟、闲粟。所以储偫无亏,而缓急有备也。李悝曰:谷贱则伤农,谷贵则伤民。权其轻重,宜设仓以贮之。此常平之所由立。厥后耿寿昌行之于汉,一时称便。而后汉刘般谓其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夫当境采买,固虞勒派;采自邻封,又添运费。例价有定,粮价无常。苟非斟酌尽善,何能官民两不受其累,而及时奉行不至有名无实哉?成周以后备荒之法,论者谓莫如义、社二仓。义仓始于隋长孙平。当社出谷,即委社司简校收积,遇荒赈给。法非不良也。然苟非其人,则敛散皆弊。而吏胥得伺缓急以行其私,害有不可胜言矣。社仓之法略与义仓同,而隋唐行之,不久便废,至朱子独有成效。夫有治法,必贵有治人。自

朱子借常平之粟，立社仓，有社长一人稽其出入；行之三年，民以饶裕。使社长不得其人，则侵渔科派，以千家之粟利一人之谋，弊亦犹之二仓矣。他如采买之法，如陈尧佐之增价；发粜之法，如赵抃之减价。良法美意，皆可遵循也。皇上轸念民依，廑思国计，仓箱庆而亿秭歌，固已屡丰登颂矣。

制策又以承平日久，武备尤不可不加修，而因思古者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之法。此制治保邦之善则也。臣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周礼》大司马之职仲春振旅，仲夏茇舍，仲秋治兵，仲冬大阅；举凡坐作进退之节，金鼓镯铙之用，无不一时肄之。《论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因田猎以简军实，即所以豫教之矣。汉时兵制犹为近古，都试、都讲、都肄、貙刘诸制，散见两《汉书》中。建武时停罢都试，军政所由弛也。唐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赏劳有差，而朝臣多有谏者。岂为通达之论欤！宋时教阅之法纷如，禁兵、厢兵，厥制甚备。天下之兵统于枢密，京师之兵统于三卫。而兵威不振，不免有名无实之讥。夫耀德非以黩武，除暴所以安邦。管子五教之法，荀子为将六术、五权、三至之道，诚能讲明而熟究之，庶几有勇知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听从，所由慎固封守、绥靖边隅也。圣天子神武懋昭，德威远播，偃武而不忘武备，养兵而不弛兵威。用是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七德备而止戈之义益彰矣。

制策又以乡举里选之法不行，而取士悉由于科目，而因详夫德行、文艺之辨。此登明选公之要图也。臣考大司徒之法，兴贤兴能，有合于询事考言之典。自后易为科目，论者讥之。然居后世而欲复论秀书升之制，固不能行之而无弊矣。唐因隋旧，设立诸科，而士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进士尤重，得人亦最盛。然其弊至有求知己、温卷名目，风俗不可问矣。分路取人，司马光、欧阳修持论不同。苏轼之议贡举，谓以经义、论策试士，不如诗赋。盖经义、论策无声律对偶，非若诗赋之难工。其论极为通达。而司马光又以专用经义、论策为百世不易之法，朱子亦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史、子、时务之年，亦在试士者精核之耳。夫以科目取士，用之也重，则求之不得不严。糊名、易书、搜检，所以明大公之量，以收有用之才。而论者顾议其待士之轻，岂

通论欤！皇上明目达聪，求贤若渴，容才利国之臣，固皆能赞襄盛典也。

若此者：崇儒以劝学，藏富以足民，讲武以经邦，育材以佐治。洋洋乎畅鸿庥而垂骏业，盖亘古而立隆也。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栽培已至而更切陶成，功叙已歌而弥勤保乂，严翼已昭而犹申简阅，贤才已集而倍广征庸。名教之辨尊焉，储蓄之资厚焉，纪律之陈肃焉，誉髦之颂兴焉。仁风四溢，协气旁流，上以迓蕃厘，下以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施行教化是纠正风俗的本原，粮食充足是富裕国家的根本，整顿军事是保卫民众的任务，选举贤能是辅助政治的资本。自古以来的帝王，得赐大法统治天下，心怀明镜登临宝座。特去尊重老师，能使教化广泛得以推行；小心管理储蓄，能达到比户可封的境界；整顿军事，能做到武功赫赫；选拔贤能，能使文人的品德日益优良。查考古籍，《雅》诗宣扬文教的鼓钟之乐，《颂》诗传颂着储蓄富裕之歌，《尚书》详细记载了军事内容，《周礼》注重选拔人才的制度。由此而文教昌盛、学校教育发达，国家用度富饶、仓储充足，训练精良、车兵和步兵都能投入战斗，搜寻人才广泛、佼佼者都能庆幸自己被选用。良好的纪纲，醇厚的教化，都已经十分完备。之所以能经天纬地，纲纪万端，效法古代帝王骊连氏、赫胥氏，遵守轩辕、颛顼的准则，就是靠的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德行与天地等齐，政绩超过五帝三王，以古代圣人为标准来安定百姓，本着仁爱之心来养育万物，本来就诗书礼乐已经得到尊崇，国家粮食有九年的储备，军队已经得到整饬，优秀人才被广泛录用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不想遗漏任何细微的东西；深深挂念着长治久安的规模，咨询意见的念头更加迫切。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改变风俗、富裕民生、整顿军备、选拔贤能等大政来策试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能知道国家大政的要领呢？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

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小心陈述平时所学到的东西，以效法土壤和细流对于高山和大海的一点儿帮助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上说：风俗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教化实际上是风俗的本原，因而想要达到纲领正确、民众振兴的盛世。这确实是端正根本、完善准则的深远用意。臣下我听说虞舜的朝廷教育百姓亲睦和顺，实际上是本着唐尧安抚保护的意思，从而达到四方闻风而动的美好境界。《周礼》上记载：大司徒施行十二种教育方法，到下面的“比”、“闾”、“族”、“党”这些基层组织，每月初一便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各自用法律教育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司谏”和“司救”还用道义来劝说民众，用刑罚来惩处犯罪的人。古代兴盛的时候，道德统一，风俗相同，惩罚旁门左道，禁止歪风邪气，负责在事变还没有发生时进行化解和引导，在事变已经发生后严惩犯罪。音乐用来防止情感虚假，礼仪用来防止行为越轨，能使人渐渐变得淳朴；贤能可以赢得民心，道德可以赢得民众，能让人每天都受到好的影响。于是道德和仪礼完善，行政和用刑都能得当，用“仁”来感化民众，用“义”来激励民众，用“礼”来约束民众，使黎民百姓相安于日用饮食的天然状态，而荒诞不经的邪说，就不会在民众中乘机作乱了。到了衰乱的时代，民众谬误，邪说越发猖獗，辗转相互煽动诱惑，习以为常，等到犯了罪，不得不被绳之以法。愚昧的民众没有不看重自己的利益的，没有不爱护自身的，然而一旦被邪说所迷惑，那他们就会把金钱拿出来奉送给别人，自身和家庭都会置之不顾。只有管理他们的人把他们引上不偏不倚的康庄大道，为他们开辟出振作自新的道路，才能使凶暴狡诈的人洗心革面，愚昧懦弱的人心中有主见而不被邪门歪道所迷惑。因势利导，教化风俗，端正一方，那就会让风俗像泥在陶范中、金在熔炉中一样，没有不受到陶冶和铸造的。欧阳修说：最好从根本上进行治理，从而战胜邪门歪道。如果努力引导，慢慢感化，差不多能让民风发生重大改变。圣朝教化的恩泽滋润万物，风俗醇美，普天之下，不是已经达到了康乐、和顺、亲睦的境界了吗！

制策又认为积贮是天下的根本大事，因而想要详细探究三仓的

利弊。这尤其是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富裕的最好方法。臣下我考察:《周礼》说"遗人"掌管乡里的积蓄,用来救济民众的艰难;"仓人"掌管谷物的收藏;"廪人"掌管粮食的数量;"旅师"掌管征集罚没有田不耕者和无业闲民交出的粮食;所以能做到储蓄不亏缺、紧急时有准备。李悝说:谷物价格低就会伤害农民,谷物价格贵就会伤害民众。为了控制物价,应该设立仓库来储藏粮食。这就是常平仓设立的原因。其后,耿寿昌在汉朝施行,一时人们都称赞它方便有利。而后汉的刘般认为常平仓尽管表面上有利民的名声,但实际上是侵害了百姓。粮食在当地采买,固然担心强行摊派;但从邻近地区采买,却又会增加运费。常平仓的价格有规定,但粮食价格却是变化无常的。假如计划不是十全十美,那又怎能使官府和民众双方都不受累,而且能及时奉命执行,使常平仓不至于有名无实呢?周朝以后的备荒办法,评论的人认为没有比义仓和社仓更好的了。义仓是由隋朝的长孙平开始建立的。本社所交纳的谷物,当即委托社司验收储蓄,遇到灾荒便赈济民众。这种办法不是不好。然而,假如主管人员不行,那收粮和放粮就都会产生弊病。而且官吏找到机会营私舞弊,那它的危害就说也说不完了。社仓的办法,大致与义仓相同。隋朝和唐朝推行它,不久便废弃了,而到朱子的时候却独有成效。这说明有了好的制度,还必须得有好人来执行。自从朱子借常平仓的粮食,建立社仓后,便设立了一名社长,监督粮食的出入;推行三年,民众因此富裕。假使社长不称职,那么,他就会图谋贪污、摊派,用千家的粮食来喂饱一人,弊病也就同常平、义仓一样了。其他如采买的办法,如陈尧佐增价的方法;卖出的办法,如赵抃减价的办法。这些良法美意,都可以遵循。皇上挂念民众的痛苦,殷切关心国家的财政计划。就像《诗经·甫田》和《丰年》所咏颂的一样,国家粮食丰收,多得无法计算,确实已经是连年五谷丰登了。

制策又认为太平的日子久了,军备尤其不可不加整治,因而想到古代三季务农、一季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这是控制局面、保卫国家的好制度。臣下我认为:兵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以一日不备。《周礼》说大司马的职责是在春季的第二个月举行回师入城演习,在夏季

的第二个月举行野营拉练,在秋季的第二个月举行军事演习,在冬季的第二个月举行军队总检阅。凡是坐下、起立、前进、后退的规则,锣、鼓、钟、铙的用法,没有一个时候不练习的。《论语》说:"用未经训练的民众去作战,就可以说是把他们的性命抛出去。"利用打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就是用来预先对民众进行军事教育的。汉朝时,兵制还接近古代,"都试"、"都讲"、"都肄"、"貙刘"等制度,散见于两《汉书》中。东汉建武年间取消"都试",军政因此也就废弛了。唐太宗引进诸卫骑兵统将等,在显德殿庭练习射箭,赏赐慰劳各有轻重,朝臣中有许多劝谏的人。他们的劝谏哪能说得上是通情达理的言论呢!宋朝时,训练方法各种各样,禁兵、厢兵的制度十分完备。天下的军队受枢密院统领,京师的军队受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统领。然而兵力不强,不免受到有名无实的讥讽。显耀用兵道德不是为了穷兵黩武,除掉强暴是为了安定国家。管子"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的"五教"方法,荀子提出的作为将领的"六术"、"五权"、"三至"的原则,如果能讲画明白而且深入研究,那就能做到有勇有谋。指挥军队能像身体使用手臂、手臂使用手指一样,没有不听从指挥的,由此而能谨慎地固守疆界,使边境平安无事。圣明天子武功赫赫,德行和威名远远传扬,停战而不忘记军备,养兵而不废弛兵威。因此,能做到保卫天下、建立功效,安定百姓、团结众人,七种武德具备而消除战争的主旨更加鲜明了。

制策又认为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不施行后,选取文士都是通过科举来完成的,因而想要详细了解有关德行、文艺的区辨。这是选举公平的关键。臣下我考察《周礼》记载的大司徒制度,负责选拔贤能,这符合咨询事情、考察言论的典章。后来改为科举,受到了议论者的讥讽。然而生活在后世,想要恢复"论秀书升"的制度,实行起来确实会有弊端。唐朝沿袭隋朝旧的制度,设立了科举的各种考试科目,而文士所看重的,只有"明经"、"进士"这两科。"进士"科尤其重要,选拔的人也最多。然而,它甚至也产生"求知己"、"温卷"等名目的弊病,使风气败坏到了极点。在分路取人的问题上,司马光、欧阳修所持的看法不相同。苏轼议论贡举制度,认为用"经义"、"论策"来

考试文士，不如用“诗赋”。因为“经义”、“论策”没有声律对偶，不如“诗赋”难写。他的论说是极其通情达理的。然而司马光又认为专用“经义”、“论策”是百世不能改变的制度。朱子也想取消“诗赋”而分成“经”、“子”、“史”、“时务”，分年度考试。这也在于主考官认真而精当地择取罢了。用科举选拔文士，由于朝廷对文士格外重用，所以选取他们就不得不严格。“糊名”、“易书”、“搜检”，是用来表明大公无私的标准，用来收取有用人才的。然而议论者却议论说：这样是轻待文士。这哪里是通情达理的见解呢！皇上看得明、听得清，求贤若渴。能容纳人才、能有益于国家的臣子，一定都能赞助皇上完成盛大法规的施行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崇尚儒学来奖励学术，储藏丰富来富裕百姓，讲求军事来安定国家，教育人才来辅佐政治。伟大呀！宣播洪大的吉福而将宏伟大业永远延续，超越千古而建立最美好的社会。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永远保持至诚，建立政教要有恒心。移风易俗已经成功，但更要进一步培育好的风气；国家储蓄丰富，但还要进一步小心保持天下安定；军威已经昭著，但还要进一步加强训练；贤能的人才已经聚集，但还要加倍广泛征用。名教的地位得到了尊重，储蓄的财产丰厚了，纪律的规定严明了，选拔俊杰的颂歌响起了。仁爱之风四处洋溢，协和之气到处飘荡，向上迎接苍天赐福，向下保佑万民幸福。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金国均　殿试对策

金国均（生卒年不详）　字可亭，湖北黄陂人。道光十八年(1838)榜眼。道光二十三年，以编修出任陕甘学政。咸丰元年恩科乡试，任江南考官。咸丰二年乡试，以侍读学士任顺天府同考官。

臣对：臣闻化民所以成俗，足食在乎厚生。整军者讲武之规，得

士者经邦之本。综观往籍,《易》著保民之义,《诗》歌高廉之章,《书》垂振旅之文,《礼》重兴贤之典。自古帝王,体元立极,锡福诚民。以神於变则化洽万邦也,以谨盖藏则利周百室也,以严简阅则威饬六师也,以示登庸则德书三物也。茂矩宏规,粲然具备。用是防情防伪,治理隆焉;余九余三,民生赖焉;有严有翼,武备修焉;作楫作舟,群才举焉。所由法昭圜矩,道协勋华,合寰宇而跻之仁寿者,恃此耳。

钦惟皇帝陛下,治洽敦庞,功成率育,训练以彰军政,旁求以选贤能。固已化行比户而俗美丰盈,吉协师贞而典隆升秀矣。乃圣怀冲挹,深维累洽重熙之道,时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安民、裕国、经武、求贤诸大政。如臣愚昧,曷补高深?顾当嘉言罔伏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所闻,谨陈所习,以竭刍荛之一得,用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风俗为治平之本,教化实风俗之原,而因思乎经正民兴之治,渐仁摩义之方。此诚制治保邦之要道也。臣谨按《王制》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坊记》千百言,而皆所以防民。故设禁暴之官,严左道之律。盖以稂莠不去则嘉禾不生也。汉制则有三老、啬夫、游徼,唐制则有里正、坊正,此即周制闾胥、比长,所以诘奸慝而安善良也。夫民虽至愚,未有甘罹于法网者。良由治平日久,生齿益繁,财力难给,而亲民之官又不能尽心抚字,虽有饥寒而莫为之所。于是民之狡诈者,藉求福之名,以为谋财之计,而渐至酿成事变。官吏始则轻忽之,以为无害;后又惧干谴咎,而隐忍苟安。此奸民之所以日肆也。是故恃胥吏以稽察,而胥吏转为之耳目矣;藉兵役以缉巡,而兵役更为之党羽矣。有官守之责者,欲除此害,必选廉明之吏,以防之未然。盖必有张敞治京兆,而后知盗贼之主名;有韩延寿治颍川,而后见奸宄之灭迹。且同一保甲之法,乃王安石用之而民不胜其扰,王守仁用之而民或赖以安。则信乎安民必先察吏,任法不如任人也。夫欧阳修言:莫若修其本以胜之。行以勤而浸以渐,庶可致时雍之化矣。圣朝治征风动,泽洽露生,其谁不革面洗心以适荡平之路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而益讲求夫利民之实政。此诚足

国裕民之至计也。臣考《周官》所载，仓人掌粟入之藏，遗人掌委积之法，而积贮之规由此昉焉。魏李悝作平粜之法，此又仓储粜籴之事所由始也。汉贾谊请令民尽归农以禁游食，诚为储蓄之上策矣。常平之仓起于汉耿寿昌，增价减价，因时以济民之缓急，法诚善矣。而刘般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则又行之而不得其道也。义仓起于长孙平，当社立仓，丰则收之，歉则散之，法更便矣。而其弊也，借少而偿多。社仓起于朱子，主守则乡之行义，收散则请于长官，法亦美矣。而其弊也，或移用而拘催。此外若常满之有名，富人之有制，备荒之策非不甚良，而利民者或即以病民。此奉行之不得其人，故敛散之不能无弊也。夫积贮为天下之大命，在官在民而缓急皆宜有备，庶不致仓储之设有虚名而无实利也。今直省频年丰稔，州县仓储如有亏短，正当及时买补，以利生民。惟于买谷之时善立章程，使民间无所抑勒；入仓之后随时稽考，使官吏不得侵亏。则法良意美，官民各得，而仓庾常充矣。皇上轸念民依，至深且远，行见家给人足，而万姓共迪吉康也。

制策又以承平日久，武备不可不修，而因思夫简军实之道。臣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周礼》乡遂、郊甸，兵民不分，立制诚善。至管子作内政以寄军令，其用兵有教身、教心之法，已非寓兵于农之旧矣。汉有都试之制，建武时罢之；所谓貙刘、乘之，其名不同，而其制可考。惟王旅无镇卫之职，似无以重内守。故汉制虽近古，而不如古也。唐仍隋旧，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兵，而一变为旷骑，再变为藩镇，外强内弱，徒有禁兵之名矣。其在太宗时，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赏赐有差，而朝臣或有谏之者矣。宋惩藩镇之害，收天下劲兵，列营京师，以备藩卫。外兵统于枢密，内兵统于三卫。其军政则有招募、拣选等额。至王安石罢义勇为保甲，几至有兵而无将。此宋兵之弊也。阵法各有不同。管子有教阅之条，荀子论将帅之道。总之振旅、莅舍，教以时殊，而经武有规，无非使将作士气，士识将心耳。皇上万几之余，时亲校阅，凡在将弁，敢不勉为有勇知方也哉！

制策又以乡举里选之法不行，取士悉由于科目，而因深戒夫重文

艺而轻德行者。此尤敦崇实学之至意也。臣考周制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有曰儒以道得民，则士者固民之坊，亦官之朴也。汉法尚为近古，故其时吏有贤良之政，民无浇薄之风。唐因隋旧，设立诸科，有明经、进士、明字、明法等科。而明经、进士尤重，以故士类多尚之。分路取人，或谓当罢诗赋，或谓宜以经义、策论试士，或谓宜专用经、策，或谓宜旁及诸经、子、史，其论不同。夫朝廷之用士也重，则其求士也自不得不严。而谬托儒流、诡遇求合者，甚至中存侥幸，罔顾箴规，逾闲检而不知，伤风化而不觉。其处既不足以资坊表，其出又何能为贤良乎？夫惟先器识而后文艺，则士品于是而端，士行于是而正，即风俗亦因之而醇矣。圣天子崇儒重道，作养人才，研经砥行之儒，孰不争自濯磨哉！

若此者：巷祝衢歌，不足言式化也；仓千箱万，不足言利民也；连乡轨里，不足言示威也；兰省凤池，不足言俊选也。蜚英腾茂，洋洋乎仁圣之事赅，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德，天健昭行。康乐已形而弥勤保乂，仓储已裕而益切防维，止齐已习而更示张皇，乐育已宏而愈加延访。按经校德，成袭六为七之规；稽古论功，跻咸五登三之治。熙春式化，函夏归仁，奄九有而来同，总八方而为极。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教化百姓是为了养成好习俗，积蓄粮食是为了使民众生活富裕，整治军备是讲求军事的要求，选取文士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综观古籍，《周易》记录着保护民众的思想，《诗经》有歌颂积蓄粮食的篇章，《尚书》流传着军事训练的内容，《周礼》注重选拔贤能的制度。自古以来的帝王，体察初始状态，确立最高准则，把幸福赐给人民，使民众协和欢乐。去用心化导就能融洽万国，注重储蓄就能使所有民众都得到利益，严格训练就能使威名昭著、军队俯首听命，选拔贤能就能在品德上要求写明六德、六行和六艺。美好而宏大的规矩，明明白白，全都具备。因此防范人欲、防范矫伪，使治理达到完美的境地；粮食储蓄达到《礼记·王制》所规定的数量，使民众生

活有了保障;有勇有谋,军备整饬了;量才录用,使所有的贤能都被选用。之所以法令能彰显上天的准则,道德能与唐尧和虞舜相同,使整个天下都达到太平盛世,就是靠的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有效地统治万民,使社会风尚美好盛大;成功地治理天下,使百姓都得到养育。严格训练以强化军政,广泛征求以选举贤能。确实已经教化风行,每个家庭都能受表彰,风俗美好而物品丰厚,吉兆与军队端正相符合,制度在选拔人才上特完善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深深思考着使太平局面永远相传的方法,时时殷切保持着持盈保泰的思想,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安定民众、富裕国家、整顿军事、选拔贤能等大政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能弥补陛下的高深呢?但是在这任何良好建议都会得到采用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竭力陈述自己的见闻,小心陈述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竭力献出村野小人的一点心得,像葵花向阳一样,向陛下献上一片微小的诚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上说:风俗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教化实际上是风俗的本原,因而想到了纲领正确、百姓振作的政治原则和用仁义感化民众的方法。这确实是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重要手段。臣下我细致查考:《王制》说:"司徒制订'六礼'来节制民众性情,明示'七教'来提高民众道德。"《坊记》上所说的千百个字,都是用来防范民众的。所以,当时设立了禁暴的官员,制订了严厉惩处邪门歪道的法律。因为杂草不去掉,好苗就不能生长。汉朝制度则有"三老"、"啬夫"、"游徼",唐朝制度则有"里正"、"坊正",这些就相当于周朝制度中的"闾胥"、"比长",是用来惩处奸恶而安定善良的。民众虽然极其愚昧,但没有甘愿触犯法网的。他们犯罪确实是由于太平的日子久了,人口日益增多,财力难以供给,而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员又不能尽心抚慰,即使饥寒交迫也不进行安置。于是民众中狡诈的人,假借求福的名义,来作为谋取财物的手段,以至于渐渐酿成事变。官吏一开始却掉以轻心,认为无害;到后来又害怕受到处分,因而隐瞒忍耐,以求苟安。这就是奸民之所以日益猖獗的原因。出于这种原因,原本是

依靠官府办事人员来稽察奸恶，但他们却反过来成为了奸邪的耳目了；原本是依靠士兵和差役来缉捕和巡查，但他们却反过来成为了奸邪的党羽了。能够尽职尽责的官员，想要除去这种危害，就一定会挑选廉明的手下人，以防患于未然。必定要有张敞治理京兆，然后才能知道盗贼头子的姓名；有韩延寿治理颍川郡，然后才能看到奸恶被清除。况且同一种保甲制度，王安石施行起来而民众就难以忍受它的骚扰，但王守仁施行起来而民众却能依赖它得以安宁。因此，要安定民众就必须首先选拔好官吏，完全听凭法律还不如任用好人。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欧阳修说：最好从根本上进行治理，从而战胜邪门歪道。如果努力引导、慢慢感化，差不多就能达到美好教化的局面。圣朝对国家的治理就像风吹大地，对民众的恩泽就像雨露滋润万物，有谁不愿洗心革面、以走上正道呢！

制策又认为积贮是民众的根本，因而想进一步讲求利民的实政。这确实是使国家富足、民众富裕的最好办法。臣下我考察：《周礼》记载有“仓人”掌管粮食收藏，“遗人”掌管积蓄的制度，而积贮的制度就是由此而开始的。魏国的李悝制订了平粜的制度，这又是仓储卖出和买进事务的开端。汉朝贾谊请求让民众全部都务农，以禁止人们不耕作而白吃粮食。这确实是储蓄的上策。常平仓是由汉朝耿寿昌开始创立的，用加价和减价的方法，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在紧急情况下来赈济民众，制度确实很好。然而，刘般认为常平仓表面上有利民的名声，但实际上却实实在在地侵害了百姓。由此可见，它在施行中又不得法。义仓是由长孙平开始创立的，本社建立仓库，丰收时就收进粮食，荒歉时就发放粮食，制度更加便利。然而，它的弊端是借得少而还得多。社仓是由朱子开始创立的，负责仓库管理的是乡里有德行的人，收储和发放则向上级长官请示，制度也是很好的。然而，它的弊端是或者挪用，或者强行征收。此外，如“常满仓”、“富人仓”这类的相同制度，防备灾荒的办法不是不很好，可却在给民众带来利益的同时或许就损害了民众。这是因为奉行制度的人不好，所以收储和发放都不能没有弊病。积贮是天下的根本，无论是在官府，还是在民众，都应该对紧急情况有所准备，这样才不至于让仓

储的设立只有虚名而没有实利。如今,中央直辖各省连年丰收,州县的仓储如果有了亏短,那就正应当及时收买补足,以有利于民众。只要在收买谷物的时候订立完善的章程,使民间没有任何强行摊派;入仓之后随时稽查,使官吏不能侵吞。那就能做到法良意美,官府和民众都各有所得,而仓库的粮食经常都能保持充裕了。皇上关心民众的疾苦,考虑得十分深远,这样就将会看到家给人足、百姓共同达到吉祥康乐的局面了。

制策又认为太平的日子久了,军备不能不整饬,因而想到了训练军队的办法。臣下我认为:兵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不备。《周礼》上的"乡遂"、"郊甸"制度,兵民合而为一,制度制订得确实很好。到管子的时候,他制订国内政令来寄托军令,用兵有"教身"、"教心"的方法,已经不是寓兵于农的旧制度了。汉朝有"都试"制度,东汉建武时被取消;所谓"貙刘"、"乘之",它们的名字不同,但它们的制度能够查考。只是中央部队没有镇卫天下的职能,似乎无法加强对内的防守。所以汉朝制度虽然接近古代,但却不如古代。唐朝沿袭隋朝旧的制度,把天下分为十道,设置"府兵",然而,先变为"矿骑",再变为藩镇;外强内弱,徒有禁兵的名称。在唐太宗时,唐太宗引进诸卫骑兵统将等在显德殿庭练习射箭,按等级赏赐,但朝臣中却有人对此进行劝谏。宋朝鉴于藩镇的危害,征聚天下劲兵,驻扎在京师,用作藩卫。外兵由枢密院统领,内兵由三衙统领。宋朝的军政则有招募、拣选等名目。到王安石取消"义勇"、创立保甲时,宋朝几乎到了有兵无将的地步。这是宋朝军事制度的弊病。阵法各有不同。管子有教阅的条例,荀子论述了将帅的原则。总之,春季训练回师入城,夏季军事拉练,尽管训练方法因时间不同而不同,但军事训练是有规律的,无非是让将领振作士气,士卒理解将领的用心罢了。皇上在日理万机之余,不时亲自检阅,所有将士,怎敢不努力使自己做到有勇有谋呢!

制策又认为自从"乡举里选"的制度不施行后,选取文士都是通过科举来完成的,因而深深担心着注重文艺而轻视德行的问题。这尤其是敦劝和崇尚实学的深远用意。臣下我考察:周朝制度规定:用

九种职务来维系国家的民众，其中有叫做“儒”的，用道德来教育民众。由此可见，“士”确实是民众的表率，也是官员的后备力量。汉朝的制度还比较接近古代，所以当时的官吏有优异的政绩，民众没有轻薄的风气。唐朝沿袭隋朝旧的制度，设立了科举的各种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字”、“明法”等科，而“明经”、“进士”这两科尤其重要，因此士人中有很多人都很崇尚它。至于分路取人，有人认为应当取消“诗赋”，而有人则认为应当用“经义”、“策论”来考试文士；有人认为应该专用“经”、“策”来考试，而有人则认为应当广泛涉及“诸经”、“子”、“史”。他们的议论是不同的。由于朝廷对文士格外重用，所以选取他们就不得不严。混进读书人的行列、阴谋达到自己目的的人，甚至心存侥幸，不顾法规，超越了界限而自己不知道，有伤风化而自己不觉察。既然他们处世还不足以作为民众的表率，那他们做官又怎能成为优秀官吏呢？只有先看才能和见识，然后再看文艺，文士的品行才能端正，文士的行为才能规范，风俗也就能因此而醇美了。圣明天子崇尚儒学，注重道德，培养人才，那些研究经学、砥砺品行的儒士，谁不争着严格要求自己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古代里巷街衢一派欢歌的景象，也不足以形容我朝教化的风俗醇美；古代粮食堆积如山的场面，也不足以形容我朝利民的功德；古代全民皆兵，也不足以形容我朝的军威；古代秘书省、中书省人才济济，也不足以形容我朝的用人。英名飞扬，丰碑矗立，真伟大呀！仁爱、神圣的事体已都包纳，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方法相当齐备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道德每天都有长进，自强不息。尽管康乐的局面已经形成，但还要进一步使天下安定；尽管仓库储蓄已经充裕，但还要进一步注重储备；尽管军备已经整饬，但还要进一步提高军队战斗力；尽管已经人才济济，但还要进一步延访人才。对照经书而校验德行，那就在五经之上再编成六经、七经；观察古人而评论功绩，那就超越五帝三王的盛世。春风化育万物，九州归附仁德，把握九州使诸侯来朝，总合八方而构成最高主宰。那么，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

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江国霖　殿试对策

江国霖(生卒年不详)　字小帆,四川大竹人。道光十八年(1838)探花。先后充广西、顺天、江南乡试考官。道光二十六年,以编修出任湖北学政。

臣对:臣闻敷教所以善俗,利用所以厚生,经国则政在诘戎,辅治则功先吁俊。稽诸载籍,《诗》颂宜民之化,《书》陈食货之经,《易》有师吉之占,《礼》著宾兴之典。崇义茂矩,粲然具赅。自古帝王,执枢斟化,握镜临宸。保惠有谟,荒歉有备,简稽有法,宅俊有经,悉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机。用是稂莠悉除而礼教兴,廉庾维亿而丰亨著,纪律克明而军容肃,德行并录而俊乂昭。所为扬骏烈,迓鸿庥,备五福而协庶征者,洋洋乎畅垓敷埏,洵郅治之隆轨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凝鼎命,道阐坤珍,体元化以同天,溥至仁以寿世。固已旧染维新而仓箱载咏,止齐克协而杞梓兼登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采葑菲以无遗,察枢机于在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化民、裕国、讲武、求贤诸大端。如臣愚昧,曷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诵所习、述所闻,竭葵藿之微忱,以为土壤细流之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风俗为治平之本,教化实风俗之原,因求经正而民兴。诚化民成俗之至意也。臣惟析言破律,古有明法;左道疑众,国有常刑。奸民者,王政所不宥也。顾奸民之禁,止在长吏之勤明。平日教化之深,既使渐仁摩义,不至陷溺于邪途;而察核之勤,又能朝考夕稽,不使潜藏夫奸匪。庶几谨愿者可安其耳目,狡黠者可戢其心思,即有一二异言异服之徒,亦必无所容其身也。惟是稽察之道,宜酌夫宽猛之中,而侦其聚散之迹。古者闾师、党正,养万民之德;保氏、司谏,纠万民之恶。而司寇所掌邦之贼盗,察之未尝不严,而不闻激而生变者,是在得其人耳。夫必有张敞治京兆,而后知盗贼之主

名;有韩延寿治颍川,而后见奸宄之敛迹;有龚遂治渤海,而后卖刀买犊、卖剑买牛者接踵。他如虞诩之在朝歌,张咏之平益州,王守仁之抚南赣,德威互用,剿抚兼施。既有已成之效,即为前事之师。是惟抚以良吏,察以保甲,经画有人,消弭得法,则除莠安良可待矣。圣朝教泽涵濡,风俗醇古,敷天之下,不咸臻康乐和亲之治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人之大命,而因思储偫无亏,凶荒有备,足以图久远之模。此尤厚生足国之至计也。臣考《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周礼》仓人、遗人之制,即后世常平、社仓所由昉。然而昔人行之或享其利,而或滋其弊。则非法之不善,行法之不得其人也。汉耿寿昌设常平仓,增价减价,因时以济民缓急。意非不善,但出入在官,易滋流弊,不若社仓、义仓听民间自为经理之为得。夫王者爱养黎元,勤求积贮,务令州县计地之广狭,以定常平之额,可谓法良意美矣。乃日久弊生,地方有司贤愚不一,仓正不无偷卖,州县不无亏移,胥吏不无侵蚀,甚至日就歉缺,仅剩空廒。惟在督抚诸臣随时核实,则仓储自无不足之患。乃若偶逢歉岁,米价稍昂,即当设厂平粜。而商贩居积为害实深,又地方大吏所宜设法稽察,俾市侩绝其居奇,而商贾皆相通易。此稽储积,即以救荒也。皇上覆育群生,抚绥黎庶,偶值偏灾,即发粟赈饥,且令丰收各省源源相济。斯酌盈剂虚之道得,而阜财安民之法备矣。

制策又以古者因田猎以蒐军实,而严饬夫务农讲武,以期武备之加修。臣考《周官·小司徒》伍、两、卒、旅,训练之数也;《司马法》甸出长毂一乘,调发之数也。训练不嫌多,调发务从少。盖训练多则人皆习于兵革,调发少则士不苦于战征。故古者兵出而战胜。及管子作内政寄军令,轨里连乡,特一时图霸之术,而兵农始分,与周制异矣。汉初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师也。自后有募召之兵,有长从之兵,皆昉于武帝。唐置府兵,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府兵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兵无失业之忧,将无擅兵之患,其法最为近古。乃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宋有禁兵、乡兵,元立五卫,明立禁兵、边兵,制愈详矣。要之用兵之道,简阅有规,校练

有时，老弱充伍之必惩，巡防疏惰之必警。管子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之方，荀子为将六术、五权、三至之道，皆不可以不亟讲也。圣天子修和有夏，声教四讫，销剑戟为农器，固可养兵不用矣。

制策又以乡举里选变为科目，欲为士者不至重德行而轻文艺，因详夫历代试士之法。此诚厘工熙绩之先务也。臣惟虞有九德之采，周有三物之兴。汉晋以来，郡国之守相得以操荐举之权；九品有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自隋而制举始由于科目，唐代遂因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字、明法等科，而世俗所尚惟明经、进士而已。李肇《国史补》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其争名常切，其为俗亦弊，盖其势然也。唐时国子助教分十经以授诸生，宋时司马光及欧阳修并以分路均额为言。迨元祐间，经义、诗赋迭为废兴。景德、祥符之际，糊名、易书，制防已密。盖禄利之路既开，斯浮薄之风日竞。此班固已致意于《儒林》，而蔡邕欲求正乎经字也。然则欲正本澄源者，必如朱子《学校贡举私议》。凡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则求知己、温卷之习除，而亦无藉手他人、假途贵戚之讥，三代之英其可复已。夫用之也重，则求之也不得不严，而岂有轻于待士之意哉！圣朝立制，文行并重，期得真才以收实效。凡我多士生斯世者，宜何如端品诣，励躬修，讲经术，求实学，无负作人之化乎？

若此者：尚熙恬之俗则旌别严也，平粜籴之经则衣食裕也，宣弧矢之威则丰功著也，广登庸之路则儒术崇也。懿纲酝化，腾实蜚声，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民志静而倍切归仁，大有书而弥勤委积。编伍既严，愈谨戎行之制；书生既广，犹殷造士之心。法兼圜矩，成安平康乂之休；化播陶钧，跻曼羡宏延之盛。重熙累洽，咸五登三，布区宇为懿谟，书简策为治谱。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教化百姓是为了养成好习俗，积蓄粮食是为了使民众生活富裕。治理国家，大政就在于整顿军事；辅佐政治，要建立功业首先就得选拔贤能。查考古籍，《诗经》歌颂了便利民

众的风化,《尚书》陈述了管理财政经济的原则,《周易》有军队严整的占卜,《周礼》记载了选拔贤能的制度。最高的原则和最好的规矩,明明白白,全都具备。自古以来的帝王,执掌王权斟酌教化,心怀明镜统治天下。安定和爱护民众有计谋,应付荒歉有准备,训练军队有法度,选拔贤能有原则,这都是本着日夜勤奋寻求的实心,以把握天人交相感应的时机。因此能使丑恶全被清除、礼教兴盛,能使仓库的粮食亿万、人民生活富裕,能使纪律严明、军容严整,能使有道德和有能力的人同时录用、人才得到选拔。用来光大功业,迎来鸿运,具备五福而与各种气候保持协调的东西,无比兴盛,铺天盖地,确实达到了天下太平的最高水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德行凝聚着国家的命运,道义覆盖大地,体察大自然的造化来遵循上天的规则,广泛播撒最大的仁爱来使人人享受太平,确实已经是旧风俗被更新、仓库粮食堆积如山、军队步伐整齐、贤能都被选用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仍然殷切咨询,不遗漏任何微小的东西,就近考察重大问题,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教育民众、富裕国家、讲求军备、寻求贤能等大问题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足以知道国家的大政呢?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陈说自己的见闻,陈述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竭尽像葵花向阳一样的微小诚心,以作为土壤和细流对高山和大海所奉献的一点儿帮助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上说:风俗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教化实际上是风俗的本原。因而探求达到纲领正确、百姓振作这种局面的途径。这确实是教化民众、养成好风俗的深远用意。臣下我认为:妖言惑众、破坏法律,自古就有明确的处罚规定;邪门歪道蒙骗百姓,国家有既定的惩处刑律。对于奸民,王法是不会宽宥的。然而,要禁止奸民,却只能是取决于高级长官的勤奋和精明。平时教化深入,就能使民众受到仁义的感化,不至于走上邪路而不能自拔;核察勤奋,又能朝考夕稽,不使辖区潜藏奸匪。差不多就能使老实的人安于现状,狡黠的人不做非分之想;即便有一两个诡诡怪怪的人,他们也必

然会无处安身的。但是，稽察的原则，应当是既不宽和也不凶猛，要侦察好邪恶之人聚散的踪迹。古时候，“间师”和“党正”负责培养百姓的品德，“保氏”和“司谏”负责纠正百姓的过错，而司寇则负责惩处国家的贼盗，当时纠察民众未尝不严，然而却没有听说有激起事变的，这不过是因为用人恰当罢了。必须要有张敞治理京兆，然后才能知道盗贼头子的名字；有韩延寿治理颍川郡，然后才能看到奸恶销声匿迹；有龚遂治理渤海郡，然后才能有卖刀买小牛、卖剑买大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其他如虞诩在朝歌县，张咏平定益州，王守仁安抚南赣，都是德与威互用，剿与抚兼施。既然有了成功的先例，那他们就是前事之师。由此可见，只要任用好官来安抚民众，用保甲制度来纠察民众，筹划有人，清除得法，那么除掉坏人、安定好人的目的就会实现了。圣朝教化的恩泽滋润万物，风俗醇美古朴，普天之下，政治不是已经达到了康乐、和顺、亲睦的境界了吗！

制策又认为积贮是民众的根本，因而想要使储蓄不亏缺，遇到灾害和荒年时有准备，使仓储制度能够具备长久有效的规模。这确实是使民众富裕、国家富足的最好办法。臣下我考察：《王制》说：三年耕作后必须要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九年耕作后必须要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周礼》“仓人”、“遗人”的制度，就是后世常平仓和社仓的起源。然而，过去人们施行它们，有时能享受到它们的好处，而有时它们却会滋生弊端。由此可见，这不是制度不好，而是执行制度的人没有任用好。汉朝的耿寿昌设立常平仓，用增价和减价的办法，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赈济民众。他的用意不是不好，但因为粮食的出入由官府掌握，容易滋生流弊，不如社仓、义仓听凭民间自己管理为好。帝王爱护和养育黎民百姓，努力谋求积贮粮食，严格命令州县根据土地的大小，来确定常平仓的积储数额，可以说是法良意美了。然而，日子久了也就产生了弊病。地方有关机构好坏不一样，仓正偷卖粮食，州县挪用粮食、使粮食亏损，办事人员贪污粮食，甚至使粮食一天天欠缺，只剩下了空仓。只要总督、巡抚等大臣随时核实，仓储自然也就没有不足的祸患了。至于偶然遇到了荒年，米价稍稍昂贵的时候，就应当立即设厂用平价来卖出粮食。但是商贩囤积居奇的危

害确实太大,又需要地方的封疆大吏应当设法稽察,使市侩停止囤积居奇,从而使商家都能相互贸易。这样稽察粮食储积,就是用来救荒的。皇上养育芸芸众生,安抚黎民百姓,偶然遇到灾害荒年,立即散发粮食赈济饥荒,而且命令丰收的各省源源不断地接济。这样就掌握了酌盈剂虚的原则,具备了积累财富、安定民众的制度。

制策又认为古时候利用打猎来训练军队,因而严令务农和谋划军事,期望军备能得以加强。臣下我考察:《周礼·小司徒》所说的"伍"、"两"、"卒"、"旅",是训练的数量;《司马法》所说的每"甸"提供一辆兵车,是调发的数量。训练不嫌多,调发务必要少。因为训练多则人人都熟悉军事技艺,调发少则士卒不受征战之苦。所以古时候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到管子制订国家政令时,把军令隐含在了里面。他的"轨里连乡"制度,只不过是一时图谋称霸的手段。然而这时兵、农开始分离,已经与周朝的制度不一样了。汉朝初年,在郡国设置了"材官"部队,而京师有南军和北军驻扎。南军保卫宫城,北军保卫京师。自此以后,有召募的士兵,有职业兵。这些都是起源于汉武帝时期的。唐朝设置了"府兵",把天下分为十道,共设置了六百三十四个"府",而关内道就有二百六十一个。"府兵"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就耕种庄稼,发生战争就投入战斗,战争结束后就解散,士兵分散回到"府",将领回到朝廷。士兵没有失业的担忧,将领没有拥兵称雄的祸患,这种制度最为接近古代。然而,它后来先变为了"矿骑",再又变为了藩镇。宋朝有禁兵、乡兵,元朝建立"五卫",明朝建立禁兵、边兵,制度越加详尽了。总之,用兵的原则是:挑选士兵要有规则,训练士兵要按时;老弱充入队伍,一定要严惩;巡防疏忽、懒惰,一定要警告。管子的"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的方法,荀子所论述的作为将领的"六术"、"五权"、"三至"的原则,都是不可以不急切讲求的。圣明天子使整个华夏保持和平,声威和教化传播四方,剑戟已被销熔、铸成农具,确实可以做到养兵不用了。

制策又鉴于在"乡举里选"变为科举考试后,想使身为文士的人不至于重视德行而看轻文艺,因而要详细考察历代考试文士的方法。这确实是整顿吏治、振兴政事的首要事务。臣下我认为:虞舜用

“九德”来委任人物，周朝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来选取文士。汉朝、晋朝以来，郡国的太守和相国得以把持荐举人的权力；九品有“中正”，得以掌握品评人物的权柄。从隋朝起，制举开始用科举考试的办法，唐代于是因袭了这项制度。科举考试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字”、“明法”等科，而世俗所崇尚的只是“明经”、“进士”而已。李肇的《国史补》说：进士被时代所崇尚已经很久了。他们争名经常都是很急切的，这成为一种风气后便形成了弊病，也是势所必然。唐朝时，国子助教分十部经书专业来教授学生。宋朝时，司马光、欧阳修都提出了分路均摊名额的主张。到了元祐年间，“经义”、“诗赋”交替兴废。景德、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糊名”、“易书”这些防止考试作弊的制度已经很严密了。这是由于功名利禄的道路已经开通，这种浮薄的风气便日趋严重的缘故。在这一点上，班固已经把自己的看法在《汉书·儒林传》中表示出来，而蔡邕则打算在经书原文上确定标准而立石经。然而，想要正本澄源，就必须做到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所讲的那样。如果所有文士来参加考试是为道义、而不是为谋利而来，那么，“求知己”、“温卷”的习气就会消除，而且也就没有借他人之手、通过显贵来实现个人目的的讥讽，三代时候的英才便能再现了。由于朝廷对文士十分重用，所以对文士的要求也不得不严，哪有轻待文士的意思呵！圣朝建立制度，文才与品行并重，期望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以收到实效。我等文士凡是生在这个时代的，应当怎样去端正品行造诣，提高个人修养，讲求经术，探求实学，不辜负朝廷的培育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崇尚和美的风俗，就能严格区分好坏；掌握粮食卖出买进的原则，就能使民众衣食充裕；宣扬武备的威力，就能建立伟大的功绩；广开选拔人才的道路，就能使儒术得到尊崇。纲纪和教化都十分完美，英声飞扬，丰碑矗立，仁爱、神圣的事体都已包纳，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方法相当齐备了。臣下我恭敬地祝愿皇上，太平了更求太平，安定了更求安定。尽管民众心志平静，但还要进一步让他们归服仁德；尽管物资丰富，但还要进一步辛勤积储粮食；尽管军队已经严整，但还要进一步留心军事制度；尽管

书生已经众多，但还要进一步殷切关心文士的培育。让法令更加完善，达到安乐、康泰的美好境界；教化传播、陶冶民风，呈现国运洪福无限蔓延的盛景。世世兴旺、代代辉煌，超越五帝三王，向天下宣布的都是美好的计划，写在简策上的都是治理天下的法则。那么，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子江　徐立群译〕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盖均无贫，和无寡。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易　雨以润之，日以晅之。

诗　庤乃钱镈。

春秋　吴子使札来聘　襄公二十有九年

策　（佚）

殿试策问

[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勤求上理，兢兢业业，夙夜不敢康，二十年于兹矣。仰荷昊苍垂佑，列圣诒庥，海宇乂安，黎民康阜。持盈保泰，广益集思。尔多士拜献先资，对扬伊始，冀聆谠论，式赞大猷。

《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乾》、《坤》言学有圣贤之分，《泰》卦九二，备保泰之道。能陈其义欤？《尧典》、《舜典》，何人所分？"人心道心"，何书所引？《康诰》、《酒诰》，何以疏其职官？《多士》、《多方》，何以解其篇次？《行苇》言射，果祭欤？《臣工》、《噫嘻》，果戒农官欤？《长发》禘欤？祫欤？《出车》王命，殷欤？周欤？周公作颂，何以有康、昭以后之诗？《仪礼》体解、豚解之分，膳酒、散酒之用，能详其说欤？《周礼·乡大夫》乡射五物，能证以《仪礼》欤？《月令》中星，何以与《尧典》异？加"王"于"正"，岂是好古不作之心？谓"一"为"元"，恐非大始正本之意。释《春秋》者，岂容参以臆见欤？

《汉书》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是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

银。唐时有禁断采银之诏,度支岁计有粟布绢绵及钱,而无银。盖银以充贡,不以为赋也。以银为币,始于何时?行于何地?铸银之式,轻重不同,所值亦异。厥后银日贵,钱日贱,民间但以银论价市易。能详其源流迁变欤?《周官》司市,无征而作布。郑注谓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说者谓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然观单穆公所称"子母相权",岂一品欤?论钱法者,若贾谊,若孔颉,若陆贽,能述其梗概欤?

昔在神禹,浚浍距川。亦越成周,详刜遂沟洫之制。沿及后世,河内资漳水之利,关中赖郑国之渠。秦汉以降,代不乏人。我朝定鼎燕京,居高御下。邦畿之内,巨川如滏阳、滹沱、清河、白沟、桑乾、潞河、滦河,支流如滱、洺、徐、白,加之以淀泊水泉,未尝无可兴之水利。乃每当夏秋淫潦,膏腴变为污泽,不重可惜欤?稽之元明,若虞集,若托克托,规画若何?邱浚《大学衍义补》,所讲求者何术?徐贞明《潞水客谈》,胪陈十四利,厥旨若何?时议用之于永平一带,垦田至三万九千余亩。似有成效,而事卒中止,何欤?夫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何以时其蓄泄,俾无旱涝之虞欤?

用人之道,在乎知人善任。顾忠诈相似,贤奸易淆,鉴别不精,薰莸杂进。且人之材性,各有攸宜。廉静之儒,每不胜夫繁剧;方正之士,或不达于事机。善御者所以不废罢驾之马也。然僚功非不勤奋,而病在庸违;试可岂无才能,而恶其圮族。口对甚悉,无取捷给之长;敦厚少文,独许大事之属。骥称其德,又在此不在彼矣。夫智力有大小,用过其量则倾;时地有难易,任违其材则蹶。往往同此一人,而前后殊其巧拙,彼此异其功过。今将陶铸群伦,驱策英俊,用其长而去其短,称其分以尽其能,使人无弃材,官无废事,厥道何由?

夫研经训以求实用,权食货以阜民生,讲疏浚以利农功,登俊乂以熙治绩,皆经邦之要道,立政之宏纲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以敷奏为明试,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好像玉石经过琢磨”这句诗，说的是君子要体察自我修养的功夫啊！

如果是财富平均，就不存在贫穷；国内团结，就不会感到人少。

以地位低下的人尊敬高贵的人，这叫做尊敬贵人；以高贵的人尊敬地位低下的人，这叫做尊敬贤人。

易经 雨露用来润泽万物，太阳用来晒干万物。

诗经 收拾好你们的锹和锄。

春秋 吴国国君派公子札前来鲁国访问。襄公二十九年 〔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谨慎地继承着国家大业，竭力地讲求最美好的治理，小心勤苦，认真负责，白天黑夜也不敢贪图安逸，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仰仗着老天爷的保佑，托诸位圣明祖先留下的鸿福，致使整个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为了保持美好的局面，集中大家的智慧以扩大成绩，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事先谋划好个人的建议前来应试，对答赞颂天子的提问，就从现在开始。希望倾听到你们的高论，来赞助治国的重大方略。

《易》有《连山》、《归藏》、《周易》等三种名称，从哪个朝代开始？八卦从什么时候重迭成六十四卦？《乾》、《坤》两卦中说，学有圣人之学和贤人之学的区别，《泰卦》倒数第二阳爻中，具备着保持安泰的道理，能陈述它的意义吗？《书经》中的《尧典》和《舜典》，是谁区分出来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什么书引用的？《康诰》和《酒诰》中，为什么详列官职？《多士》和《多方》的篇次，为什么划分开来？《行苇》言射，真是祭祀时用的吗？《臣工》、《噫嘻》二诗，真是告诫农官的吗？《长发》一篇，是禘祭用的，还是祫祭用的呢？《出车》中的王命，属于商朝还是周朝呢？《周颂》是周公所作，为什么有周康王、周昭王以后的篇章呢？《仪礼》有“体解”、“豚解”的分别，“膳酒”、“散酒”的用途，能对此详细地加以说明吗？《周礼·乡大夫》乡射五物，能用《仪礼》加以证明吗？《月令》中的中星，为什么和《尧典》所记不一样？在正月之前加

上“王”字，难道说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用心吗？把“一”说成“元”，恐怕不是大始正本的意思。解释《春秋经》的人，难道允许参加主观臆断的意见吗？

《汉书》上说：秦朝统一天下后，钱币定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充作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即龙文、马文、龟文币，不久就作废了，没通行开。这说明全国通行的货币，完全用铜钱，不曾用银。唐代有禁止并断绝采银的命令，管财政的结算帐目有泉布绢绵和钱，但没有银。这是因为银子是用来进贡的，不作赋税征收啊。把银子当货币用，开始于什么时代？通行在哪些地方？银币的铸造方式，轻重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后来银子一天天贵起来，钱币一天天贱起来，民间只用银子论价交易。能详细地说明一下货币的源流变迁情况吗？《周礼·司市》上说，遇到灾荒年头，官府就不征收货物，只铸造发行钱币。郑康成注释说：金铜没有受灾的时候，因为货物贵重，大量铸钱，使民富足。有的人说，铸钱开始为一品，到周景王铸大钱，才有二品。但是单穆公说“子母相权”亦即轻币重币互作调剂，哪能是一品呢？论钱法的人，像贾谊、孔颜、陆贽，能陈述一下他们说法的概况吗？

从前在大禹时代，就注意治水疏导大川。到了周代，详细规定了畎、遂、沟、洫来利用水的制度。到了后世，河内地区就利用漳水，关中地区就仰赖郑国渠。秦汉以来，代代有兴修水利的人。我朝定都燕京，居高临下，辖区内大川如滱阳、滹沱、清河、白沟、桑干、潞河、滦河；支流如滤、洺、徐、白，加上那些淀泊水泉，何曾没水利可兴呢？但是每到夏秋霖雨季节，良田变为沼泽，这不很可惜吗？查一下元明两代，像虞集、托克托等人，规划水利怎么样？邱浚《大学衍义补》，所讲求的是什么？徐贞明《潞水客谈》罗列了十四利，其宗旨怎么样？当时的人们议论，用他的办法，在永平一带，垦田三万九千多亩。似有成效，为什么又中止了呢？水这种东西，积聚多了就有害，分散使用它，就有利；置之不理，任其泛滥，则有害；蓄积加以利用，就有利。怎么能按时加以蓄泄，使人没有旱涝的顾虑呢？

用人的方法，在于知人善任。但忠诚和狡诈有时相似，贤良和奸

邪容易混淆。若鉴别不精,就会出现善人恶人并用的情况。并且人的才能和性情,各有所宜。清廉好静的学人,往往不能胜任那些繁杂剧烈的工作;那些方正之士,有的对事情的要害和发展趋势,不能通达。这就是善驾车的人,不废弃难驾御而不循轨辙的马的原因啊!但是,帝尧流放的共工,不是因为共工不勤奋,而是讨厌共工违命;鲧的治水经过"试可",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厌恶他毁败善类。虎圈啬夫能清楚地说明禽兽数目,但不提升这类巧言善辩者的官职;周勃忠厚没有文才,汉高祖独以重任相托。良马称其德,不称其力,这又重德不重才了。大概人的智慧才能,有大有小,用人超过被用人的限度,就要坏事;时间地点有难有易,用人违背了被用人的才能所宜,就一蹶不振。经常有这种现象:同一个人,而前后工作的巧和拙,相差甚远;同样的任务,而前后完成的功和过,大不相同。现在打算培养有知识的人才,鞭策有能力的人,用他们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分配任务,和他们的智能相称,以求尽量施展他们的才能,借以达到"人无弃才,官无废事"的目的,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它呢?

总之,研究经典的训释,以求切合实用;权衡食货的利弊,以富裕民生;讲究疏导河流,以利农功;提拔有用人才,以提高政绩。这些都是治国的重要措施和行政的宏伟纲领啊!众学子明古通今,用进奏陈述的言论,作为明试考察的功绩。不要泛泛议论,不要隐约其词。皇帝我准备亲自审阅。

李承霖　会试卷八道

李承霖(生卒年不详)　字雨人,江苏省丹徒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后升侍讲学士,外任广西学正。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释琢磨之义,学尤切于治己矣。夫琢以去其累,磨以极其精,义皆类乎自修也。《诗》继切磋而言所如,谓非切于治己乎?从来修治之

途,所以求益也。然当其杂而未纯之时,必先有损而不已之力。损之以抉其瑕疵,而猝以相加者,事不患其太骤也。损之以深其砥砺,而渐以相入者,功不厌其太徐也。审是而《诗》之咏琢磨者,可释矣。如切如磋,是为道学。顾学莫先于穷理,尤莫要于去私。

大凡理之附于心也恒泛,而欲之附于心也恒坚。坚者而缓图之,则自护者深。而沉锢之私,益固结而不可解。我不破其坚,何以攻坚也?而《诗》则先言如琢矣。抑凡心与理相习,未必遽融;而心为欲所蒙,决无不蔽。蔽者而迫治之,则致功已躁;而光明之体,将渐积而不可窥。我不祛其蔽,安能无蔽也?而《诗》则又言如磨矣。间尝取其义而味之。今夫方寸之天之不容或恕也,将欲还其所固有,必当去其所本无。即使减之又减,以至于无可减。然前此之累方释,后此之累难防。毕生在悔吝之中,斯毕生在检束之中也。此其意不曰省,而曰修。今夫纠察之功之无容旁贷也,将欲力全其本体,必当返责乎藐躬。即使存之又存,以至于不待存。然一念恃其精纯,斯一念已形旁杂。父兄之所不能觉,师友之所不及知也。此其责不在人,而在自。

若《诗》之咏如琢如磨者,岂犹有所或恕也乎!修之始,先乎外。琢则外无所格,物之弗良者,立见其决去;心之弗纯者,亦立见其决去也。修之终,及乎内。磨则内无所留,物之未净者,渐发其光华;心之未粹者,亦渐发其光华也。虽柔必强,虽愚必明,在中材且有赖以寡过者,无论贤主之勤修已,抑岂有所旁贷也乎!修以治乎其显,琢则显与为敌。物之累乎己者,自励其刚;心之妨乎己者,亦自励其刚也。修以察乎其隐,磨则隐与为消。物之缘于后者,自除其憾;心之本于初者,亦自除其憾也。施之以猛,济之以宽。彼艺事且有循其节次者,何论宸躬之自克己。吾得而释之曰自修也。至于恂栗威仪,则又表里相符,而学修之明效大验也,岂非盛德至善乎!

琢和磨的意思,是告诫人治学要重自修。工匠制器,先琢之,去掉那累赘无用的东西;再磨之,使器物极端精致光洁,这和人治学的自修,是相类似的。《诗经》在"如切如磋"以后,又说"如琢如磨",这不是更重人治学要自修吗?从来加强自修,目的都是得到好处。但是

当人心"杂而未纯"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损而不已"的力量,来加以督促。促使人去掉阻碍学习的不正确的东西,为什么要急剧严格地这样做呢?因为去掉坏的东西,不愁太急啊 。促使人加深对正确东西的接受,为什么要逐渐深入呢?因为学习不能操之过急啊。明白这一点,就知道《诗》所说"如琢如磨"的用意了。如切如磋,是说求学。但是求学首先要明白道理,更重要的是去掉私心杂念。

大概正确的真理,附着在人的思想中常是浮浅的;而不正确的私欲,附着在人的思想中常是坚固的。坚固的东西,你要是慢慢地对付它,它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很多,而根深蒂固的私心杂念,更牢固不能去掉。我不打破它的坚固,怎么能攻坚呢?而《诗》就先告诉我们用"琢"的方法了。人的思想接受真理,不一定马上融洽无间,而接受坏的、错误的东西,绝对要被它蒙蔽。受害深了,就加紧去整治,但这样下的功夫却显得急躁了,而光明的本体,就渐渐地不能看到了。我不去掉蒙蔽的东西,怎么能不被蒙蔽呢?而《诗》又告诉我用"磨"的方法了。也曾把这个意思,加以深刻领会。思想修养不容许稍加宽恕啊。要想恢复他固有的美德, 一定要去掉他本来没有的坏习气。即使一减再减,以至于无可减,但是,旧的恶习才去掉,而新的恶习又难加以防备,一生在后悔痛恨中过日子,这就是一辈子在检讨约束之中。这个意思不叫"反省",而叫"修治"。思想的纠察工作,责无旁贷啊。要想做一个健全的人, 一定要反躬自责, 作强有力的自我检查和批评,达到去恶存善的目的。即使一存再存,以至于不待存,但是一念觉着他精纯,事实上这一念已不够精纯了。自己的父兄,也觉察不了,连老师和朋友都来不及知道。这个觉察的责任,不在别人,而在自己。

像《诗》中吟咏"如琢如磨"的方式,还能容许对自修有所宽恕吗?修养的开始,先从表面着手。琢发挥作用,就外面无所扞格,那些不好的东西立刻可以去掉, 那些不纯的思想也可以立刻去掉。修养的最后,是由外到内。磨发挥作用,那些藏在内部的东西,也保留不住。物品不干净的, 逐渐发出光华来; 思想不纯正的, 也逐渐纯正发光了。弱者变坚强了,愚鲁的人变聪明了。中等才能的人,通过自修,还有赖以少出过失的,更不用说贤明君主的勤修了,思想修养还可以有

所旁贷吗!用自修来克服明显的错误,琢就可以与它为敌。去掉错误的东西,自己磨砺成刚强的性格;去掉不好的思想,自己磨砺成刚毅坚定的思想。用自修来纠察那些暗藏的积习,可用磨来消灭它。私欲是后天所引起的,磨掉心灵上的坏影响,自除其憾;心灵上先天所具有的倘不正确,也自除其憾了。琢磨齐用,宽猛并施。那些百工技艺之人,尚可以按顺序自修而见成效,更不用说帝王的自修了。所以我可以解释它,叫做"自修"。至于人的谨慎严峻,行为的一丝不苟,这又表里一致,是学和修的显著功能啊。难道还不是"盛德至善"吗!

盖均无贫,和无寡

惟均可以召和,而贫寡无患矣。夫均者,和之本也。彼以贫寡为患者,抑知均与和之效乎?若曰吾言不患贫,不患寡,使果有贫寡可患而强制其患,此亦矫情之论矣。惟自忘其贫而不为攘夺以济其贫,斯有无适相准,天下岂有可患之贫?自忘其寡而不为要结以去其寡,斯性情悉相通,天下岂有可患之寡?丰亨豫大之原,其理固可推而见也。

患贫患寡者,其意中只知有贫耳,只知有寡耳。乃只知有贫,常至于贫,只知有寡,常至于寡者,非贫寡之必不可无,而其所以患贫寡者,已先不均也。且以不均,因而不和也,然则均其至要哉!试论夫均:古者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天泽之义,肇始于王侯。等而下之,或食二百八十八人,或食二百十六人,或食百四十四人。以其所人,资其所出;即以其所出,准其所人。其月要岁会,而数适相符者,其大法小廉而分无敢越者也。若此者何有贫?且夫贫与均之相反也。士庶之家,富与富相埒则均,贫与贫相等则亦均。孰为贫?孰为不贫乎?今特患其不和以致不均耳。均者,国有四封,家有千室。位同则以数之相若者为均,而凡为君者守藉田,凡为臣者食采邑矣。位异则以数之不相若者为均,而上不与下分世禄,下不与上争正供矣。无贫矣。

虽然均则无贫,而吾先以为不患寡者,盖由不均之弊而极言之。始于贫者,必终于寡。而所以致此者,不和故也。由既均之后而推言之,免于贫者,自免于寡。而所以几此者,惟和故也。试论夫和:古者

天子兆民,诸侯万民,指臂之形,无区乎遐迩。等而下之,或率一乡之士,或率一遂之士,或率一县、一都之士。以地而言,各有分土;以人而言,皆属同群。其相生相养,而渐以蕃昌者,其相保相受而联为一体者也。若此者,何有寡?且夫寡与和之不侔也。都邑之中,众与众相亲则和,寡与寡相恤则亦和。众非寡,寡独非众乎?今特患其不均以致不和耳。和者,国有良臣,家有贤佐。在朝则以同寅协恭者为和,而比、闾、族、党,率以官联矣;在军则以干城腹心者为和,而伍、两、卒、旅,计以民数矣。无寡矣。自是而国家安矣。求其审所当患,而以均为务也可。

财物分配平均,可以招致和平。有了和平,就不怕贫困和财用不足了。均,是和平的根本。那些患贫、患寡的人,知道均与和的功效吗?假设"我说不患贫,不患寡",而真有贫寡可患,运用强制的办法,来解除贫寡,那也是违反常情不合情理的说法了。人只要能自忘其贫,而不用暴力掠夺,来解救自己的贫困,这正有贫无贫两相对等。明白了这一点,天下还有什么贫可以患呢?人只要能自忘其寡,不用不正当的手段,以去其寡。这正人性人情完全相通,天下还有什么寡可以患呢?由此"丰享豫大"的道理,也就可以推算出来了。

那些患贫患寡的人,心中只知有贫和寡,而他们却经常地贫,经常地寡。这不是说贫和寡一定不可没有,而他们之所以患贫患寡,是因为他们首先不均,因为不均又招致了不和。看来均是极其重要的了。试对均加以论述:古代天子拥有兵车一万辆,诸侯拥有兵车一千辆。苍天这样赐恩,开端于王侯。按等级排下去,有的享受能养活二百八十八人的俸禄,有的享受能养活二百一十六人的俸禄,有的享受能养活一百四十四人的俸禄。各自用他们所收入的,资助他们所支出的;即根据他们所支出的,作为他们所收入的标准。他们的月终统计或年终总结,而收支之数,正相符合。这正是大臣守法,小臣尽职,各守本分,不敢超越的原因。像这样,哪里还有贫困呢?况且贫和均是相反的呀。士人和平民之家,富的和富的相等,就是均,穷的和穷的相等,也是均。这样谁是贫?谁是不贫呢?如今只是患其不和才导

致不均罢了。均，就是诸侯受封的国，四周都有界限；大夫受封的家，每家都有千室的限制。爵位相同的，就拿数目相等的为均，那么凡是君一级的守持自己的“藉田”，凡是臣一级的，享受分封土地的待遇；爵位不同的，就按数目不相等的为均，这样就地位高的不与地位低的分享“世禄”，地位低的也不向上级争论按规定应缴纳的赋税了。各安本分，也就没有贫困了。

虽然说均则无贫，而我先说不患寡，是由不均之弊而夸张的说法。开始就贫，到最后必定还是寡，为什么呢？因为不和。由既均以后推论下去，免于贫困的人，自然就免于寡，为什么呢？因为有和。试对和加以论述：古时候，天子拥有兆民，诸侯拥有万民，众寡相较，形同指臂，远近皆然。依次推下去，有的率领一乡之士，有的率领一遂之士，有的率领一县、一都之士。从地区上说，各有所分的领土；从人员上说，同属一个集团。他们相生相养、逐渐繁荣昌盛，也就是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联为一体的啊。像这样，怎么还有寡可患呢？况且寡与和并不相等同啊。在一个都邑中，众与众相亲就是和；而寡与寡相关怀，也是和。众不是寡，而寡独非众吗？如今只是患其不均，以致不和罢了。和，国君就有良臣，大夫家有贤佐。在朝廷，就以同心同德敬慎国事构成和，而下面比、闾、族、党，就连在一起了；在军队，则以能作国家城池、能作君主腹心为和，而伍、两、卒、旅，则以民众来计算了。无寡可患了，由此而国家也就和平安定了。看来患贫患寡，没有必要，真正所当患的，应是“不均”，解决不均问题，应为当务之急。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下与上各有所敬，大贤两陈其说焉。夫人第知在下者当贵贵，而不知在上者当尊贤。孟子两释所谓，岂非各有所敬乎？且人之心有所挟者，必其心无所敬者也。然第谓有所挟者之非敬，而不谓无可挟者之当敬，则无以服有挟者之心，而间执其口。惟判之以各异之分，核之以各致之情，且断之以各当之理，而人爵与天爵，乃并著于天壤矣。吾言友不可挟，而证诸孟献、费惠、晋平、唐帝之已事，此皆知其

贤而敬之也。知其贤而敬之,则但见彼之可尊,而不见己之可贵。天下只宜有敬下之君,可不必有敬上之士矣。然而世所云用下敬上者,此岂无所谓哉?

三代而上,德与位合。日宣则有家,亮采则有邦。翕受敷施,贵者皆有贤良之实。考其实而敬之,乃知名士之山林,不得傲君公之廊庙。而万物作睹,所以利见乎大人。三代而下,德与位分。主治者为王侯,辅治者为卿贰。考言询事,贵者亦居贤圣之名。循其名而敬之,乃知蓬庐之歌啸,不能敌朝宁之森严。而百职承流,所以咸归于一统。谓之贵贵,下固当敬上矣。然欲执是说,以见上之可贵,而不复见下之可尊,是正不然。

行举言扬,盛世原无遗贤之事。乃犹是贤也,而或分职任官以驭之,或饔飧牢礼以承之。贤不虚生,敬之者洵称盛典也。故有时畀以钧衡,则以寄托者为敬;有时隆以师保,则以崇奉者为敬。盖无论贤者之贵我,与贤者之不贵我,而谦光可挹,非托虚文矣。辟门吁俊,从古已有求贤之方。乃犹是贤也,而或诏而不拜,或见而不名。贤既非常,敬之者所为折节也。故有时聘币相寻,则以简拔者为敬;有时过庐必式,则以钦服者为敬。盖无论其为既贵之贤,与未贵之贤,而圣度所昭,弥深仰止矣。是果何谓哉?谓之尊贤也。知上之当敬,则畸士不能抗;知下之当敬,则骄主不能矜。上与下各有分据之权,而敬之道并存于千古。知贵之宜贵,则可戢在下之心;知贤之宜尊,则可敛在上之气。下与上各居已成之局,而敬之理岂判为两途?其义一也,而谓友其德者,其可挟也耶?其不可挟也耶?

在下的和在上的,各有所敬,大贤对这两方面都提到了。人只知道在下的应当敬上,贵其所贵;而不知道在上的应当敬下,尊重贤人。孟子所谓"贵贵尊贤",岂不是各有所敬吗?那些心有所挟的人必定是心无所敬的人。但是光说心有所挟的人不敬,而不说心无可挟的人当敬,就不能使心有所挟的人心服,而堵住他的口。只有用名分不同,加以分辨;用情况各异,加以审核;并且用各有所宜的理由,加以判断,然后仁、义、忠、信等的天然爵位和公卿、大夫等的人为爵位,

才能在人世间同样受到尊重。我说:“友不可挟”,而从孟献子、费惠公、晋平公、帝尧等的往事中,得到证明。这些人都是知道在下的人贤良,才敬重他们的呀。知道他们贤,就敬重他们,那就只看到他们的可尊,而看不见自己的可贵。天下只应该有礼贤下士的君主,可不必有尊敬君主的士子了。然而世人所说的“用下敬上”,难道说是无所谓吗?

夏商周以前,才德和职位合在一起。每天能宣明三德,就让他当大夫;每天能宣明六德,就让他当诸侯。综合使用,普遍施布,而身居高位的人,都有贤良的事实存在。根据事实,而敬重他们,才知道名士所居的山林,不能傲视君公所住的庙堂。圣人作而万物睹,因而利见于大人。夏商周而下,才德与职位分开了。主要掌权的人是王侯,而辅佐的人是将相群臣。考察言论,询问事情,高贵的也得到圣贤的美名,根据他的美名而敬重他,才知道蓬庐柴扉的长啸,敌不过朝廷的森严。而百官奉命行事,所以都归于一统。说要尊崇贵人,下面自然应该敬上了。但是,想拿着这种说法,以见在上位的可贵,而不复见在下位的可尊,这恰恰不对。

有善行就推选,有善言就表扬,盛世本来没有遗弃贤人的事情。仍是这些贤人,有的授职任官,以使用他;有的重礼厚禄,以款待他。贤人不虚生,敬贤者真称盛典了。所以有时授以宰辅重任,就以所寄托的人为敬;有时给以师保的官衔,则以所崇奉者为敬。无论贤人的贵我与否,而敬贤者谦光可掬,不是徒托虚文了。开门招纳英杰,从古就有求贤的风气,仍是这些贤人,有的允许诏而不拜,有的允许见而不名。贤者不是一般人,敬贤的人因而为他折节啊。所以有时聘币接连到,就以所简拔的贤人为敬,有时过庐必敬礼,就以所钦佩的贤人为敬。不论他是既贵的贤人还是未贵的贤人,而求贤者的态度昭示于人,令人深深地仰慕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尊贤啊。懂得上之当敬,那奇特之士就不能抗拒;懂得下之当敬,那骄傲的君主就不能自矜。上和下各有分据之权,而敬之道就并存于千古。知道贵者的应该尊崇,就可削弭在下者的野心;知道贤者的应该尊重,就可收敛在上者的骄气。下和上各居已成的定局,而敬之理怎可分为两途呢?

其义是一样的啊。而说"友其德"的,试问是可挟呢?还是不可挟呢?

雨以润之,日以晅之

论方图长物之功,润与晅各得其象矣。夫坎离为天地之中,而方图则象诸雨与日。润之晅之 ,其长物之功,不诚大乎?且一阴一阳之卦,其本末见于初上二爻。而论其阴阳互见之功,则非其中爻不备。盖阴阳之在初上者,固昭体用,而阴阳之在中爻者,尤极生成。卦本阳也,而用为阴;卦本阴也,而用为阳,其为天下所利赖者,不少矣。

何则?"坎"一阳二阴,是为阳卦。阳卦则当主温煦之义,而不当主沾被之名。然卦之中爻为阳,得天之奇数,天一则生水焉。其不曰水而曰雨者,水为人之所需,雨乃天之所降也。且即以重卦而言,其六爻不变者无论矣。初变则为水泽"节",象雨之知时;二变则为水地"比",象雨之及物;三变则为水风"井",象雨之沾濡。推而上之,四变而泽水"困",望雨者切矣;五变而地水"师",待雨者众矣;上变而风水"涣",喜雨者遍矣。泽下尺而生上尺,谓非所以润之乎?云雷以启经纶,雷雨而逢甲坼。自嘉禾瑞木,以及句萌丛杂之区,其为润泽之所经者,皆已浡然而兴也。藉使密云不雨,何以异于恒旸也哉?

"离"一阴二阳,是为阴卦。阴卦则当有涵濡之义,而不必有明照之神。然卦之中爻为阴,得地之偶数,地二则生火焉。其不曰火而曰日者,火由人力所为,日乃神明所耀也。且即以重卦而言,其六爻不变者无论矣。初变则为火山"旅",象日之初升;二变则为火天"大有",象日之久照;三变则为火雷"噬嗑",象日之方中。推而上之,四变而山火"贲",如日之生矣;五变而天火"同人",如日之临矣;上变而雷火"丰",如日之昃矣。居下土而仰容光,谓非所以晅之乎?明则谓之两作,照则及于四方 。自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之类,其为晅妍之所逮者,靡不欣然而慰也。向使明入地中,何以异于幽都也哉?

夫合论二体,水在火上曰"既济",火在水上曰"未济",二卦固不可相无。而坎体中满,满则必溢,所由润也;离象中虚,虚则能明,所由晅也。君子体此,所以无或屯之膏,有作睹之象,皇极建而休征交应

也。

论“方图”长物的功能，润泽与照晒各得其象了。代表北方的坎卦和代表南方的离卦，位居天地的中央，而方图就取象雨和日。能润泽，能照晒，它们长物的功能，不是很大吗？况且一阴一阳之卦，它的本末就表现在最下的初爻和最上的末爻，亦即“初六”或“初九”，“上六”或“上九”。而论其阴阳互见的变化功能，就全在中爻。因为阴阳在初上两爻的，固然能昭示卦的本体和作用，而阴阳在中爻的，尤能极尽演变生成之能事。卦本阳卦，而用为阴；卦本阴卦，而用为阳。它们被天下人所利用、所依赖的地方，真是不少了。

为什么呢？“坎”卦一个阳爻，两个阴爻，是个阳卦。阳卦就应该有温暖的含义，而不应该有沾湿润泽之名。但是卦的中爻为阳，得天的奇数，“天一”就“生水”啊！为什么不叫“水”而叫“雨”呢？因为水是人们所需要的，雨是从天降下来的。现在就拿重卦来说：那六爻不变的就不用说了。初爻由阴变阳成为水泽“节”，象征雨来的是时候；二爻由阳变阴，成为水地“比”，象征雨的施及万物；三爻由阴变阳，成为水风“井”，象征雨的沾濡。再往上推，四爻由阴变阳，成为泽水“困”，说明盼雨的人，很迫切了；五爻由阳变阴，成为地水“师”，说明等雨的人，很多了；上爻由阴变阳，成为风水“涣”，说明喜雨的人，很普遍了。雨水一尺一尺地向下渗透，禾苗一尺一尺地向上生长，这不就是水所滋润的结果吗？春雷震动之时，告诉人们适时种植；果实裂甲的时候，正因雷雨交加。凡五谷草木适宜栽植以及野生植物要发芽的地区，其被润泽所经的地方，都已郁郁葱葱勃然而兴了。倘若密云不雨，那与长期干旱，有什么不同呢？

“离”卦一个阴爻，两个阳爻，是个阴卦。阴卦就该有涵濡的意思，而不必有照明的功能。但是卦的中爻为阴，得地的偶数，“地二”就“生火”啊！为什么不叫“火”而叫“日”呢？因为火是人力所为，日是神明所耀。现在就拿重卦来说：六爻不变的就不谈它了。初爻变，就成火山“旅”，象征旭日初升；二爻变，就成火天“大有”，象征红日普照；三爻变，就成火雷“噬嗑”，象征赤日中天。再往上推，四爻变，就

成山火“贲”,如日之生;五爻变,就成天火“同人”,如日照临;上爻变,就成雷火“丰”,如日偏西。居下土而仰容光,这不就是照晒的功能吗?明则谓之日月的光明两次升起,照则及于四方。自光天之下,到海隅苍生,凡被日光所照到的地方,没有不高兴而自慰的。假使明入地中,和不见天日的幽都,有什么不同呢?

合论坎、离二卦体,水在火上叫“既济”,火在水上叫“未济”,这两卦固然缺一不可。而坎体中满,满则必溢,这是润泽的依据;离象中虚,虚则能明,这是照晒的依据。古代君子体念到这一点,所以没有或“屯”之“膏”,而恩泽一定施及在下,而有“圣人作,万物睹”之象。最高准则既已建立,也就美好的征验一齐相应了。

庤乃钱镈

先时而具农器,慎之至也 。夫钱镈皆农器也,命众人以庤之,岂非慎之至乎?且《豳风·七月》一篇,备言农事。其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未举趾而先于耜,言具之于早也。然具之于农人者,见穡事艰难之意;具之于保介者,见臣僚董劝之心。盖先事而豫谋,上与下有相为计议者矣。因新畬而命众人,将何事哉?夫方春和,时土膏已动。风能启蛰,望阡陌以齐开;雨亦知时,看笠蓑之并至 。尔其沟塍刻镂,原隰龙鳞,他日所谓决渠降雨,荷锸成云者,方于众人是赖也。虽然,不可以无钱,不可以无镈。昔者神农氏始为耒耜,斫木揉木,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耜以起土,耒其柄也,殆钱之属欤?至若农之去草,芟夷薀崇,勿使能殖,爰有取于镈。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非是则恐其弗良,即恐其弗备,镈固与钱等重者乎!

今夫事既至而其器不具者,怠也;事已至而其器始具者,犹疏也。语有云:“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今康年用锡,厥在新畬。维兹钱镈,奚可以弗庤?抑又闻之,田器之名,更仆难数。故《周礼》云:“兴锄利铖”。《尔雅》又云:“斪斸谓之定,斫谓之镈,刚谓之鎡錤”。今所庤独在钱镈,得无略甚?不知钱可以耕,庤钱,而器之耕者统此矣。镈可以耨,庤镈,而器之耨者统此矣。

《考工》所云:"坚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欲之者,盖庳之也。

特是畿内曰甸服,甸师之职,率其属而耕耨王藉。兹所命者,甸徒也。而曰"乃"者,何也?古者上下之间,分严而气和。是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之于公曰"我",吏之于民曰"乃"。略其尊卑贵贱之名,而从乎家人一体之意。情亲而气奋,力聚而事成。凡其攻木攻金以庳之者,不啻保介之身亲其间也。而于是乎始有钱,而于是乎始有镈。说者谓《月令》"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钱镈之庳,已在季冬,何俟于春?然未庳而始庳者,临事之补苴;已庳而益庳者,先几之审慎。正惟其诰诫之频仍,乃愈见臣工之严恪也。自是而嘉禾遂生,自是而五谷时熟,将见贵农重粟,而神仓帝籍之储,于以常裕矣。

农时未到,就准备好农具,这是极其谨慎的呀。锹和锄,都是农具,命众人准备好它们,岂不是极其谨慎吗?在《豳风·七月》篇中,备言农事。其中说:"夏历正月就准备耒耜,二月就动手耕作。"未动手耕作,先准备农具,是说早作准备啊。然而叫农人着手准备,正看出农事的重要和艰难;叫农官恪尽职守,正看出官府劝农之心。这是重视农事,早作准备,上与下相互计议的呀。针对去年才开的以及前两年开的荒地,命令民众作好耕种的准备,要作哪些事情呢?试想:当春暖季节,土润如膏,风能惊蛰,看东阡北陌,人来人往;好雨知时,看披蓑戴笠,勤力劳动。开沟作畦,细心修整,平整得像龙鳞一样,日后所说的"决渠降雨,荷锸成云"的情景,完全依赖着众人啊。但是,不可以没有锹,也不能没有锄。古代神农氏始作耒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以教天下,是取法《益》卦。耜,是用来起土的,耒,是它的柄,恐怕也属于"锹"一类的农具吧。至于农夫去草,割除了,积聚起来,叫它永不发芽,这有赖于锄。南方越国没有锄,但并不是真的没有锄,人是能够造出锄来的。不这样就担心它不好用,同时也就担心农具没准备好,锄与锹看来是同样重要的了。

有这样几种情况:农事既到,而农具还没有准备的,这是怠慢行为;农事既到,而才准备农具的,是疏忽行为。谚语说:"善经营的商人,夏天就准备下皮货,冬天就准备好夏布,旱天就准备好船,水潦未

至，就准备好车。这是早作准备，以待乏时急需”。现在得到天赐丰年，全在新开田。要常保丰收，“锹”和“锄”怎么可以不早备好呢？我又听说：农具的名字，不可胜数。所以《周礼》上说：“兴锄利氓”。《尔雅》上说：“斫斸谓之定，斫谓之镈，剿谓之鐯”。今所准备的只有“锹”和“锄”，岂不是太略了吗？岂不知“锹”可用来耕田，准备好“锹”，而可用于耕田的农具，就包括在内了；“锄”可用来耘除，而农具中可供耘除用的，也都包括在内了。《考工记》所说：“坚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欲”是事先准备，和“庤”同意。

那王畿以内叫“甸服”，“甸师”的职务，率其所属，而耕天子藉田，现在所告诫的也就是甸徒了。为什么称“乃”呢？古时候，上下级之间名分很严，而气氛很和睦。所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对于公称“我”，吏对于民称“乃”。把尊卑贵贱的名义略掉，而表现出一种“家人一体”的亲密意味。情亲而气奋，力聚而事成。凡那些攻木、攻金、做好后储存的农具，凡乎都像农官亲临其间验定的。而于是乎有“锹”，而于是乎有“锄”。有人说《月令》“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表明农具的储备，已在季冬，怎么还等到春天呢？但是，事先未准备，临时现准备的，是临事的补救；已准备而怕不好，反复督促检查的，是防患于未然，工作认真负责。正是只因他频繁的告诫，才越发看出官吏工作的尽职尽责。由此而嘉禾茁壮成长，由此而五谷按时成熟，将见贵农重粟，而神仓帝库的储存，日益充裕了。

吴子使札来聘　襄公二十有九年

记吴之始聘，重其聘也。夫吴虽同姓之长，其不通朝聘久矣。今始使札来聘，所为书以重之乎！昔我周姬姓之国，凡四十人。以昭穆论，惟吴最先。而其不与于征伐会盟也，亦惟吴最久。是故吴未尝与中国交兵也，有之自伐郯始，书伐郯，所以贬之也。吴未尝与中国相聘也，有之自使札来聘始，书使聘，所以褒之也。褒之者何？吴以太伯之后，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始以逊国而成高蹈之踪，继以高蹈而沿荒远之俗。其于诸夏声明之盛、文物之华、音律之谐、舞蹈之美，与夫先

代帝王之德化，列邦得失之攸分，以及一时之贤士大夫孰为偏才，孰为全德，虽能遥望而慨慕之，终无由亲见其事，以传示于国中也。而幸也犹有札在。

札者何？吴子诸樊之季弟，余祭之叔父也。青宫养望，久闻予季之呼；冲主临朝，欲效挞禽之报。迹其生平行事，虽不少概见，然大抵贤豪间人也。吴子若曰：我，太王之昭，宗盟之长。及今不能通上国，余何以见于祖庙？况鲁，望国也。不登太山，不知天下之小；不观鲁籍，不知周室之隆。咨尔札，汝往哉！札拜稽首，臣不敢辞。奉简书，登明堂，辞槐李，越朱方，去南土，渡岷江，问兖州之故俗，临汶水以汤汤。夫敌国宾至，关尹以告，候人为导，司里授馆。其在鲁，有郊劳赠贿之文；其在札，有介绍传命之节。不书，略之也。略之者何？所以见使者之难，而使之者非偶然也。

迄今考其观乐一节，歌则自《二南》以迄《周颂》，各有评论，而于《曹》、《郐》独无讥；舞则自昭代以溯有虞，备极称扬，而以《韶箾》为观止。聘享之后，即行私面，因结契于叔孙；青齐而上，不少交游，更联镳于卫晋。而于是声明之盛、文物之华、音律之谐、舞蹈之美，先代帝王之德化，列邦得失之攸分，以及一时之贤士大夫孰为偏才，孰为全德，皆一一志之于心，以传示于国中矣。斯聘之所系于吴，顾不大哉！其不称公子，以其礼未同于上国，初非褒贬之所在。而或者谓札以让国启衅，故去其氏。夫札之让也，后此二十余年矣。安能逆料而黜之？且屈狐庸犹得称氏，札即有讥，何遽不如狐庸耶？此可见其说之不然矣。

《春秋经》记吴国的初次来聘，是重视其聘。吴国虽是姬姓各国之长，很久就不通朝聘了。如今首次派季札来聘，所以载录以重之吧！从前我周封诸侯国，姬姓的，共四十人。以辈分论，惟吴最先，而不参加征伐会盟，也惟吴最久。吴国未曾和中原各国交兵。有，是从伐郯开始的。特记伐郯，是为了谴责它。吴国未曾聘问中原各国。有，是从派季札来聘开始的。特记使聘，是为了褒扬它。褒扬它什么呢？吴国以太伯的后代，断发文身，裸体为饰，开始太伯因让国而隐遁，后

来因为隐遁而沿袭了荒远地区的风俗。吴国对于中原诸国名声的盛大、文物的光华、音律的和谐、舞蹈的优美，和那些先代帝王的德化，列国得失的分别，以及一时的贤士大夫谁为偏才，谁为全德。虽然能遥望而羡慕他们，终究无由亲见其事，以传示于本国之中。而幸好有了这个季札。

季札是什么人?他是吴子诸樊的幼弟，余祭的叔父啊。受到太子的敬重，常听到呼幼弟的声音；幼主临朝听政，愿意学周公那样辅佐成王。追寻他平生的事迹，虽不多见，然而大致是贤良豪杰一类的人物。吴王说："我是太王的长子，同宗联盟的首领，到现在不能通上国，我有何面目见于祖庙?况且鲁国是有声望的国家。不登太山，觉不出天下的小；不看鲁国的典籍，不知道周室的兴隆。如今札！你去吧！"季札跪拜领命道："臣不敢辞"。捧着出使的简书，登上明堂，辞别了国都槜李，越过了吴地朱方，远离南土，横渡岷江，访问兖州的旧俗，观看汶河的浩浩荡荡。地位相同的邻国使者来到，守关的官吏先行报告，再由候人作向导，后由司里安排馆舍。在鲁国方面，有郊劳赠贿的仪式；在季札方面，有介绍、传命的礼节。经中不载录，这是省略了。为什么省略了呢?这看出使臣的难当，也看出派他出使并非出自偶然。

到现在考察他观乐一节。歌，从《周南》、《召南》到《周颂》，各有评论，而对《曹风》、《郐风》，却未加议论。舞，自周代上溯到虞舞，备极称扬，而以《箾韶》为最佳。季札聘享以后，即行私人会面，因与叔孙穆子，结为至友。在齐国交游很广泛，又与卫晋等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对于中原诸国声望的盛大、文物的光华、音律的和谐、舞蹈的优美、先代帝王的德化、列邦得失的分别，以及一时的贤士大夫谁为偏才，谁为全德，都一一记在心上，以传示于吴国之中了。这次聘问对吴国的关系，岂不是很大吗?经中对他不称公子，因为吴国的礼制和上国不同，这和褒贬无关。而有人说："季札以让国启衅，故去其氏"，殊不知季札的让国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怎么能预先料到而现在就进行贬黜呢?况且屈狐庸尚可以称氏，季札即使有可讥刺的地方，难道说还赶不上屈狐庸吗?可见那种说法是不对的了。

策　第一问

古之时，字体未备，音多于字，义多于音。尝有一字数音，一音数解者。故以音言之，缓读则四声可通；以义言之，旁推则诸经悉合。统而观之，其说乃备。

以我观物，义主观示；物来观我，义取观瞻：声异而字不改也。"多"与"祇"音不相近，而字实相生。盖古篆体，"氏"本作"互"，颇似"夕"字，而多与祇，又皆平韵。故《论语》"多见其不知量也"，朱子云："多与祇同，适也。"多可训祇，则祇亦可训多。合之《复》卦"无祇悔"、《左传》"祇见疏也"，益证其确。《洛诰》之"不蘩"、《国策》之"芒卯"，蘩，训为"勉"。《淮南子》以芒卯为"孟卯"。蘩芒同音，孟又音之转也。故《书》之孟津，史皆作盟津。《论语》"文莫"，古注训"莫"为"勉"，而《释诂》"孟"字亦有"勉"义。然则蘩也、芒也、孟也、盟也、莫与勉也，字母皆同，音亦相叶，互相转注，有明征已。

《释文》以驹为骄，形与声俱近。故许氏谓"马高六尺为骄"，郑氏又谓"马六尺以下为驹也"。"感"字古兼"憾"义，初非别有"憾"字，故《左传》"二憾往矣"、"朝夕释憾"，《石经》皆刻作感，而《说文》更无憾字也。孳之为字也，亩之为"晦"也，美之为"嫩"为"娓"，微之为"尾"也，皆以音转。此如《易经》无祇悔之"祇"，王肃作"禔"，亦以"是"与"氏"同音，而《说文》释"禔"字处，义又通于"祇"耳。今夫说经之难也，汉儒多以己意创改经字。至宋吴棫，又为叶韵之说。不知字不须改，韵不须叶，而义自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陂"、"义"固相协，然"陂"亦作"颇"，义字本有"讹"音，未尝不协也。《菁莪》之诗，"仪"与"阿"协。《东山》之诗，"仪"与"何"协。"人而无仪"，本协下句"为"字。而《尧典》"南讹"，《史记》引之作"南为"。是支歌韵通，祇可为多之证也。"东有启明"，与章字箱字协；"农夫之庆"，与梁字京字协。是阳韵、庚韵、敬韵，皆通。《周礼》表貉，郑读貉为祫。此即蘩、孟同一字母之例。以《毛诗》、《周礼》互参，则蘩与孟同，孟与芒同，更无可疑也。

推而言之,字有以形通者。如"鸿渐于陆",陆可为逵。"言乃雍",雍可为讙。"申劝文王之德",申劝可为田观。《说命》可为《兑命》,化居可为货居,箫可为箾,酌可为勺之类是也。字有以声通者。如无逸为毋逸,又为无佚,吕刑为甫刑,苗民弗用灵为匪用命,驺虞为驺牙,小雅为宵雅,来牟为厘麰,渝平为输平,滹沱为恶池,径遂为径术,莎象为牸象之类是也。他如伏羲为包牺,又为庖牺。包瓜为庖瓜,怨咨为怨资。则又形与声皆近。

虽在三代以上,圣人手定之书,已见六书运用之法。若夫羊斟之名,传凡三见,而《淮南子》乃以羊为人名,斟为斟酌。此后儒异说,无与于六书之本旨矣。又古人韵缓,平上去三声,皆可通协。故《彤弓》之篇,以藏字与贶字享字协;《帝舜》之歌,以熙字与喜、起协;昌黎《原道》篇,亦以当字、祥字、享字并协。此又观瞻、观示,辗转相生之通例也。夫事理名物之原,无一不具于字。雌霓误读,儒者之耻也。皇上修明经术,文治光昭。有志汲古者,尤当致力于小学一书矣。

古代字不完备,音比字多,而义又比音多。往往有一字数音和一音多义的现象。所以就音来说,缓读则四声可通;就义而言,辗转推导则各部经典的字义都彼此吻合。所以必须统一起来看,其说法才完备。

以我观物,这是义主观示;物来观我,这是义取观瞻:声异而字不改啊,亦即"观"有不同的读音,而字并未改。"多"和"祇"音不相近,而字实相生。古篆体"氏"本作"互",颇似"夕"字,而"多"和"祇",都是平韵。所以《论语》"多见其不知量也"。朱子说:"多与祇同,适也"。"多"作"祇"讲,那么"祇"也可作"多"讲。对照《易·复卦》"无祇悔",《左传》"祇见疏也",益证其确。《洛诰》中的"不㜷",《国策》中的"芒卯",㜷训为"勉"。《淮南子》以芒卯为孟卯。㜷芒同音,孟,又音之转。所以《尚书》中的孟津,在史书中皆作盟津。《论语》中的"文莫",古注训莫为勉,而《尔雅·释诂》"孟"字亦有"勉"义。可见㜷、芒、孟、盟、莫、勉,字母皆同,音也相协,互相转注,是非常明显的了。

《经典释文》以驹为骄,形与声都相近。所以许慎说:"马六尺为

骄”，郑玄又说：“马六尺以下为驹”。“感”字古兼“憾”义，初非别有“憾”字。所以《左传》“二憾往矣”，“朝夕释憾”，《石经》皆刻作感，而《说文》无憾字。孳作“字”，亩作“晦”，美作“嫩”也作“娓”，微作“尾”，都是音转形成的。这就好像《易经》无祇悔的“祇”，王肃作“禔”，也因“是”与“氏”同音，而《说文》释“禔”字处，义又与“祇”相通。如今解说经典，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汉儒多以己意，创改经字。到宋代的吴棫，又提出“叶韵”的说法。不知字不需要改，韵也不需要协，而义自通。《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陂”与“义”固相协，然“陂”亦作“颇”，而“义”字本有“讹”音，未尝不协。《菁莪》诗中，“仪”与“阿”协。《东山》诗中，“仪”与“何”协。“人而无仪”，本协下句“为”字。《尧典》的“南讹”，《史记》引作“南为”。这是四支五歌韵通，“祇”可为“多”的证据。“东有启明”，与“章”字“箱”字协，“农夫之庆”，与“梁”字“京”字协，这是阳韵、庚韵、敬韵皆通。《周礼·春官·肆师》“祭表貉”，郑玄读“貉”为“祃”，这就是蘼孟同一字母之例。以《毛诗》、《周礼》互相参考，那么蘼与孟同，孟与芒同，更无可怀疑了。

推而言之，字有以形相通的。如“鸿渐于陆”，陆可为逵。“言乃雍”，雍可为讙。“申劝文王之德”，申劝可为田观。《说命》可为《兑命》，化居可为货居，箫可为箾，酌可为勺之类，就是如此。字还有以声相通的。如：无逸作毋逸，又作无佚，吕刑作甫刑，“苗民弗用灵”作匪用命，驺虞作驺牙，小雅作宵雅，来牟作厘麰，渝平作输平，滹沱作恶池，径遂作径术，莎象作牺象之类就是如此。他如：伏羲作包牺，又作庖牺，包瓜作庖瓜，怨咨作怨资，则又形与声都相近。

即使在三代以上，圣人手定之书，已看出“六书”运用的方法。至于羊斟这个名，《左传》凡三见，而《淮南子》竟然以羊为人名，斟为斟酌。这是后儒不同的说法，与“六书”的本旨无关。又古人韵缓，平上去声，皆可通协，所以《彤弓》诗中，以藏字与贶字享字协；《帝舜》之歌，以熙字与喜字起字协；韩愈《原道》篇中，也以当字、祥字、享字相协，这又是观瞻、观示，辗转相生的通例啊。事理名物的来源，无一不具于文字。雌霓误读，是读书人的耻辱啊。皇上修明经术，文治光芒普照，有志汲古的人，尤其是应该致力于文字学了。

策　第二问

《论语》者，圣门师弟传授之书也。修齐治平之道，皆于是乎在。其书出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汉兴而有《齐》、《鲁》之分。《鲁论》二十篇，龚奋、夏侯胜等传之。《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为二十二篇，王吉、贡禹等传之。张禹兼通《齐》、《鲁论》，视诸家尤善，当时号曰《张侯论》，包氏、周氏为之章句，马融为之训。又有《古论语》，出孔壁中，与《鲁论》不异，惟分卷末《尧曰》篇为二，故为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郑康成参考三本，取《鲁论》为之注。于"传不习乎"云："鲁读传为专"。"未尝无诲"云："鲁读诲为悔"。"崔子"云："鲁读崔为高"。"仍旧贯"云："鲁读仍为仁"。"好行小慧"云："鲁读慧为惠"。"恶果敢而窒者"云："鲁读窒为室"。又如"先生馔"，郑本"馔"作"馂"。"旅于泰山"，郑本"旅"作"胪"。"无适也"，郑本"适"作"敌"。"古之贤人也"，郑本"人"作"仁"。"冕衣裳者"，郑本"冕"作"弁"，云："鲁读弁为绕"。"咏而归"，郑本"归"作"馈"，云："鲁读馈为归"。此则三家师说，各有不同，而古字凡同音同义者，又多得通用故也。

自郑氏表章《鲁论》，而《齐论》遂亡。然如《乡党》篇"必祭"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称"孔子"，则《齐论》间有杂焉者矣，又《鲁论·尧曰》篇，无《不知命》一章，而《齐论》有之，则又后儒窜入也。魏陈群、王肃、周生烈等，皆为《鲁论》义说，何晏又与孙邕等，集诸家训解为《注》十卷。至梁皇侃据卫瓘、孙绰、范宁等十三家之说，为《疏》十卷，世称其援证精博。宋邢昺因皇侃疏，撰《正义》十卷。盖唐人止为《五经疏》，而不及《孝经》、《论语》，至昺，始奉诏成之耳。南宋时，《皇疏》已佚，故朱子未见其书。其撰《集注》，大略本二程之学，而通取注疏及诸家之说，断以己意，大义微言，昭如日星矣。至《或问》，则《集注》既成，复论次取舍之所以然，别为一书。《集注》固义理之荟萃，而《或问》亦与《集注》相表里者也。

夫注书难，注圣人之书尤难。苟推举名物，略於义理，则有以"文莫"为"黾勉"者矣，以"三归"为"三妇"者矣，以太师挚为商纣时人者

矣，以“履”为汤字者矣，以“三嗅”为三嗅其气者矣，以“昼寝”为画寝者矣。辗转支离，袭讹踵谬。矫其弊者，又或守象山之余论，效阳明之良知，非堕于空虚，即泥于故实，视朱注之辞约旨富、义精味长者，相去远矣。我朝文教诞敷，典籍明备，敢不摅诵习所得，为拜献先资欤？

《论语》是圣门师弟子传授的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保存在这里边。该书出于有子、曾子的门人。汉朝以来，有《齐论》、《鲁论》的分别。《鲁论》二十篇，由龚奋、夏侯胜等传下来。《齐论》比《鲁论》多了《问王》、《知道》二篇，共二十二篇，由王吉、贡禹等人传下来。张禹兼通《齐论》、《鲁论》，比诸家更擅长，当时号称《张侯论》。有包氏、周氏替它作的章句，马融为它作的注解。又有《古论语》，是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和《鲁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把卷末《尧曰》篇，分作两篇，所以成了二十一篇。汉武帝时，博士孔安国替它作了《传》。东汉郑康成，参考三本，取《鲁论》为之作《注》。在“传不习乎”下说：“鲁读传为专”。在“吾未尝无诲焉”下说：“鲁读诲为悔”。在“崔子”下说：“鲁读崔为高”。在“仍旧贯”下说：“鲁读仍为仁”。在“好行小惠”下说：“鲁读慧为惠”。在“恶果敢而窒者”下说：“鲁读窒为室”。又如：“先生馔”，郑本“馔”作“饯”。“旅于泰山”，郑本“旅”作“胪”。“无适也”，郑本“适”作“敌”。“古之贤人也”，郑本“人”作“仁”。“冕衣裳者”，郑本“冕”作“弁”，并说鲁读“弁”为“绕”。“咏而归”，郑本“归”作“馈”，并说“鲁读“馈”为“归”。这是三家师说，各有不同，而古字凡同音同义的，又多通用的缘故啊。

自郑氏表章《鲁论》，而《齐论》遂消亡。然而如《乡党》篇“必祭”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称“孔子”，那么《齐论》，也间或有掺杂在《鲁论》当中的了。又《鲁论·尧曰》篇，没有《不知命》一章，而《齐论》却有。这又是后来的学者加进去的呀。三国魏陈群、王肃、周生烈等，都替《鲁论》做了《义说》。何晏又和孙邕等人汇集诸家训解，作《注》十卷，名叫《论语集解》。至南朝梁皇侃根据卫瓘、孙绰、范宁等十三家的解说，作《论语义疏》十卷，世人称赞他援证精博。北宋邢昺，因皇侃《疏》撰《论语正义》十卷。这是因为唐人只作了《五经疏》，而不

及《孝经》、《论语》,到了邢昺,才奉诏编成罢了。南宋时,《皇疏》已失传,所以朱子未见到《皇疏》。朱熹撰《四书集注》,大略依凭程颢、程颐的学说,又通取注疏及诸家的见解,断以己意。博大精深的道理,微妙的言论,像日星一样,昭示于人间了。至于《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是《集注》既成,又论次取舍的原因所在,别为一书。《集注》固然是义理的荟萃,而《或问》也是和《集注》相表里的呀。

注书很难,注圣人的书尤其难。假若推举名物,略于义理,就有把"文莫"解释成"黾勉"的了,把"三归"解作"三妇"的了,把太师挚说成商纣时人的了,把"履"解作商汤的表字的了,把"三嗅"解作"三次嗅其气味"的了,把"昼寝"解作"画寝室墙壁"的了,拐弯抹角,支离破碎,强作解人,以讹传讹。而矫正这些弊端的人,又有的守持陆象山的余论,有的效法王阳明的良知良能。不是堕于空虚,华而不实;就是泥于故实,食古不化。和朱注的"辞约旨富,义精味长"比较,相差太远了。我朝文教广泛播布,典籍详明完备,敢不抒发诵习所得,作为进见帝王而首先做好的个人建议吗?

李承霖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学古者,多闻之本;职币者,充国之端;浚川者,作乂之基;选士者,育才之法。综稽载籍,《书》称念典,《传》纪丰财,《诗》颂翕河,《易》占育德。伊古帝王,秉乾御宇,本明无不照之神,裕敏则有功之治。以考简编,则鸿文可仰也;以权食货,则象齿无讥也;以勤疏导,则鳣鲤胥通也;以进贤良,则羔裘叶吉也。上仪景铄,侯其祎而。用是典章不执而自通,帑藏不征而自裕,陂涤不劳而自顺,贤才不召而自登。所由函夏归仁,熙春泳化,饮和六宇,畅德九垓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侔帱载,治炳登咸,固已经心默契于渊微,而圜法分司于外府;水利式孚于暨讫,而英才悉进于岩廊矣。乃圣德渊冲,不遗葑菲,时切畴咨之念,共钦翕受之宏。进臣等于廷,而策以通经之要,藏富之方,利济所以符,宾兴所以盛。臣占毕庸愚,何知体要?顾念明试次于敷奏,拜献厥有先资。敢不敬述素所诵习者,以效

蠡测管窥之一得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而因详及夫《书》之篇第,《诗》之咏歌,《礼》之纪纲,《传》之体制。此诚考古之要务也。臣谨按《连山》、《归藏》、《周易》,谓之《三易》。后又以交易、变易、不易之说解之。画卦始于伏羲,因而重之,则为六十有四,而占法始详。《乾卦》首言学,或曰圣人,或曰贤人,盖以卦位为别。《泰》之九二,与《论语》恭宽信敏惠之旨,隐然相合,保泰之至意,莫切于此矣。《二典》旧为一篇,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后始分为二篇。人心道心十六字,为千圣传心之统。舜始举以告禹,三代而下,虽无明文,然其理皆相契,所谓后先同揆者也。《康诰》、《酒诰》,周公所述成王之命,疏其职官,以唐叔始封,殷殷诰诫也。《多士》以告殷士,《多方》以告殷民,见周家定天下之难焉。《行苇》为祭毕、射而饮酒之诗。《臣工》、《噫嘻》,以戒农官。《长发》为大祭而作,《出车》为遣戍而歌。其谓文王奉殷王之命者,毛、郑之说也。《周颂》为周公所定,后又益以康王以后之诗焉。《仪礼》有"体解",有"豚解",有"膳酒",有"散酒",其名非一。《周礼·乡大夫》乡射五物,与《仪礼》可相证也。《月令》中星,与《尧典》不合,岂非古今岁差之验欤?《春秋》为圣人手定之书。春者,一岁之始;王者,天下所尊;正者,居正之义。系以元年,所以纪实。读者可想见好古不作之心,大始正本之意也。皇上文治光昭,修明学术。多士观光鼓舞,孰敢不争自濯磨哉?

制策又以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爰论夫两汉以后钱币得失之故,与夫贵贱轻重之衡。此尤物阜民康之所宜审也。臣谨按:古者赋通百物,皆以布泉菽粟之类相交易。自大禹有历山之铸,而其利始兴。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其用遂广。《周官》外府掌赍赐,泉府掌贸易,莫不以钱为敛散,而钱法其自此日盛矣。秦既更法,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皆不为币。汉文之时,铸钱益多。厥后市物,非钱不售。孝武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是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银也。夫银原以充贡,不以为赋。故唐时有禁断采银之诏,度支岁计有粟布绢绵及钱,而无银。自后世用银,民取其便,而钱之值,遂不及银,银日以贵,钱日以贱矣。《周官·司市》"无征而作布",郑氏谓铸泉所以饶

民。泉始一品，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然观单穆公所称“子母相权”，初非一品也。钱之式，以汉五铢、唐开元为最善。及宋，而有“交子”、“钞引”之名，其弊愈多矣。要而言之，钱之用，取乎流通，不取乎壅滞。利溥于民，而权操于国；制行于上，而弊除于下，然后可为至善。昔之论钱法者，若贾谊，若孔颉，若陆贽，其成说可考而知也。圣朝府事交修，权衡至当，法良意美，天下有家给人足之乐矣。

制策又以昔在神禹，浚浍距川，而遂及成周畎、遂、沟、洫之制。臣考水利与田功相表里，故《周礼·匠人》载之极详。沿及后代，漳水之利，以资河内；郑国之渠，以济关中。而郑渠尤著，班固所谓郑白之沃者是也。且夫水之为物，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惟时其蓄泄，自可无旱涝之虞。所以《禹贡》九州，扬之地势尤下，昔为涂泥，今为沃壤。盖以水未平，则为下湿，于田事非宜；水既平，则为沃衍，于田事尤宜。是在因地以制宜者，有所收其利而去其害也。秦汉以降，以治水治田者，代不乏人。元明之时，若虞集，若托克托，其所规画，尤为详备。其著为书者，则邱浚之《大学衍义补》多所指陈，而徐贞明之《潞水客谈》胪陈十四利，原原本本，详哉其言之成效已见，而卒以中止，是大可惜也。诚使有司牧之责者，先事而利导之，则污泽皆可变为膏腴矣。圣天子俯念民依，勤求良法，将见滏阳、滹沱诸水，悉已安澜，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者，莫不因时启闭，以安作息之天矣。

制策又以用人之道，在乎知人善任，而因思鉴别忠贤之法。臣惟人品之难知，不难于别是非，而难于别真伪。伪者而信为真，则小人进而君子退，国家之事，将谁任之？且人之材性，各有攸宜。廉静者，或不胜繁剧；方正者，或不达事机。固不若用人之长，舍人之短，而使偏才薄技，咸得自试于前。犹之罢驾之马，为善御者所不废也。虽然，静言庸违，古之所戒。故啬夫口辨，君子不取。而周勃之厚重少文，汉高许其能安社稷。可知称德不称力，古之人固有说矣。夫智力有大小，用违其量则倾；时地有难易，任非其才则蹶。往往有同此一人，而前后殊其巧拙，彼此异其功过者。是非鉴空衡平，何以集万类之纷纭而不淆其用？甚矣！则哲之明，未可几及。而登崇俊良之道，所宜察于

平时,试于临事也。盛世旁求俊乂,有善必庸,士生斯时,宜何如力学以待用也耶!

若此者:明经以致用,职货以通财,因地以制防,抡才以治国,洋洋乎被润泽而大丰美,洵亘古而立隆也。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方策已陈,而愈勤探索;布泉已裕,而更重源流;川渎已治,而弥念坊庸;桢干已储,而倍思甄拔。监宪之资备焉,利用之义昭焉,距川之法详焉,造士之规立焉。于以奉若三无,乂安九有,跻俗寿宇,纳民福林。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学习古训,是增多见闻的根本;重视财币,是富国的开端;兴修水利,是裕国便民的基础;开科取士,是选拔人才的良法。从典籍上来看,《尚书》称述了古代致力学习的问题;《春秋传》中,记叙了丰富财物的措施;《诗经》中颂扬君主的治理大河,为民祈福;《周易》中指出进德修业,为国育才。那些古代帝王,秉持刚健,统治天下,本着"明无不照"的精神,弘扬了"敏则有功"的治国业绩。若要参考典籍,就有珍贵的文献可遵用;若要料理财政,就有名品进献而无可指摘;若要处置治水情况,就有大小通畅的沟渠;若要选贤用能,就有廉洁的达官显宦,和睦相助。典章制度高大辉煌,如此美善!因此典籍不用看,而自然通晓;库藏不用征收,而自然富裕;灌溉沟渠不劳民,而自然通顺;贤才不召唤,而自来效命。之所以天下的人都归顺向仁德,共同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全国都过和平安定的生活,皇恩浩荡,遍及九重天,全仗着具有上述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德如天高地厚,治绩超过五帝三王。本来已经用心深沉精微,与古训暗合,而货币的流通体制,分由外府掌管。治理河道,全国各地都大见成效,而英才完全被朝廷任用了。但是,圣德深厚谦虚,不遗弃任何细小的东西。经常加重向臣下访问的念头,共同依从综合施用的宏图。宣进臣下我等于朝廷而策问:博通经典的重要性有哪些?富国富民的方法有多少?对河流怎样兴利除弊?进用人才怎样长盛不衰?臣下我是一个死啃书本的庸人,知道什么治国的

大道理?但念及考察一个人的行动是在听取一个人的言论以后,而对君主有所贡献,要首先谋划好个人的建议。臣下我敢不敬述日常所学的知识,以奉献像以蠡测海、以管窥豹般的一得之见吗?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什么朝代,才有《三易》的名称?卦的相重,从什么时候开始?因而进一步问到《诗》的咏歌,《礼》的纪纲,《传》的体制。这真是考古的要务啊。臣下我谨按:《连山》、《归藏》、《周易》,叫做《三易》。以后又用"交易"、"变易"、"不易"等说法,来解释《易》的涵义。画卦是从伏羲开始,八卦相重,成为六十四卦,而占卦的方法才更周详。《乾卦》最先讲说学有圣人贤人的分别,是根据卦位来区分的。《泰卦》九二爻,和《论语》"恭、宽、信、敏、惠"的主旨,暗暗相合,保持安泰的意思,没有比这个更切实的了。尧舜《二典》,旧为一篇,没有《舜典》开头的二十八字,以后才分为两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古来圣人传授的养心之法。舜最先用来告诉禹,夏商周三代而下,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道理是契合的。正如《孟子》上所说:"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即时代先后虽有不同,但道理法则是一样的。《康诰》、《酒诰》二篇,是周公述说成王的命令,严格区分下属职官,因为才封康叔,所以殷切地告诫啊。《多士》篇是用来告诫殷朝士子的,《多方》篇是用来告诫殷朝民众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周代灭殷平定天下,是不容易的。《行苇》这篇诗,是祭祀完毕,习射饮酒时用的。《臣工》、《噫嘻》二诗,是用来告诫农官的。《长发》篇是为大祭而作。《出车》篇是差遣戍卒时用的。说是"文王奉殷王之命而作",这是毛亨、郑玄的说法。《周颂》是周公审定的,其中康王以后的诗篇,是后人加的。《仪礼》中有"体解"、"豚解"、"膳酒"、"散酒"等,名称不一,《周礼·乡大夫》乡射五物,与《仪礼》可相参证。《月令》中星,与《尧典》不合,难道不是古今岁差的明证吗?《春秋》是圣人修订的书。春,表示是一年的开端;王,表示是天下人所尊重的人;正,表示是居正的意思。"元年春王正月"用以纪实。读书的人可想见圣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用心,"大始正本"的用意啊。皇上文治光芒普照,重视学术。士子们观光鼓舞,谁敢不争先恐后地洗濯磨砺自己呢?

制策又因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谈论到两汉以后钱币的得失及其原因和贵贱轻重的利弊权衡。这尤其是富国安民应该注重的要事啊。臣下我谨按,古代赋税都用实物交纳,都用泉布菽粟一类的物品相交易。自从大禹在历山铸钱,人们才开始利用金属,姜太公设立九府圜法,而货币使用日见其广。《周礼》记载,外府掌赍赐,泉府掌贸易,都是以钱为交易媒介,而钱法就从此一天天盛行了。秦既变法,那些珠、玉龟、贝、银、锡等类,都不作货币用。汉文帝时,铸钱更多了,从这以后,买东西非钱不行。汉武帝造白金三品,不久就废止了,没通行开。这就是说,上下通行之货,一律用钱币,不曾用银子啊。银子原来作贡品用,不当作税钱用。所以唐代有"禁断采银"的诏令。财会人员岁终作统计,有粟布绢绵及钱,但是没有银子。后来用银作钱,百姓因为方便,而钱便贬值,赶不上银子了。银子一天天贵起来,钱一天天贱起来。《周礼·司市》中有"无征而作布"的话,郑玄解释说:铸钱使民富饶。泉,即现在所说的钱,开始只一种,周景王时铸大泉,大小并用,才有两种,然而观看单穆公有"子母相权"的话,证明不只一种。钱的式样,以汉朝的五铢、唐代的开元钱为最好。到了宋代,有"交子"、"钞引"等名,它的弊病更多了。总而言之,钱的作用,在流通,不在壅滞;利益普及于人民,权衡操纵于官府;制度推行于上,而弊端消除于下,然后可算最好。以前论钱法的人,像贾谊、孔颜、陆贽等,他们的主张,可经过考查而知道啊。圣朝六府三事都很好,权衡很恰当,法良意美,全国百姓都有家给人足的快乐了。

制策又因神禹治水,浚浍距川,谈到周代施行的甽、遂、沟、洫制度。臣下我查考水利和农功相辅相成,所以《周礼·匠人》记载得很详细。到了后代,漳河水利,资助了河南省;郑国渠,浇灌到关中地区,郑国渠尤为有名。班固所说的"郑白之沃"即指郑国渠和白渠。水对于人来说,聚在一起就有害处;分散利用,就有好处;弃而不顾,泛滥成灾;合理使用,解除旱情。只要蓄泄适时,自可旱涝不用担忧。所以《禹贡》九州中,扬州地势最低下,过去是涝洼地带,现在是肥沃之区。这是因为:水未平,就是涝洼之地,不宜于种植;水既平,就是肥沃之地,很适宜田事。这就在于因地制宜的人,能够收其利而除其害

了。秦汉以来,用治水保证治田的人,代代都有。元明时代,像虞集、托克托等,他们的规划,尤其详备。那些写成著作的人,就有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多所指陈;徐贞明的《潞水客谈》罗列了十四利,原原本本,说得极其详细。成效已见,而终于半途而废,这是很可惜的呀!倘若让具体负责的官员,事先加以指导,疏通河流,则不毛之地,都可变为鱼米之乡了。圣天子关心民众的疾苦,勤求良法,将要看到滏阳河、滹沱河诸水,完全安宁,永不泛滥成灾,而广大田野上将出现"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的万人同耕的动人场面,而对于河水,就根据需要,随时开关,农民安然地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了。

制策又因用人之道,在于知人善任,因而想到鉴别忠贤的方法。臣下我认为,人品的难知,不在于别是非,而在于别真伪。把假的看成真的,加以任用,就出现坏人当道、好人遭殃的局面,国家大事,谁担任呢?况且人的才性不同,而应适合人的特点安排工作。廉洁好静的人,有的不能胜任繁杂剧烈的工作;方正老实的人,有的对事情的机要,不能通达。这就不如用人的长处,舍去人的短处。而叫那些有偏才薄技的人,能发挥其作用。好像难驾御的、不循规蹈矩的马,善御的人也不废弃它。但是,言行不一,是古人所戒绝的。所以虎圈啬夫善于口辩,不为君子所取。周勃厚重少文,不善辞令,但汉高祖器重他,托付安定国家的重任。由此可知,良马不称其力,而称其德,古人本来就有这样的主张。人的智力有大小,任用时若超过了他的限度,就要坏事;时间地点等条件有难易,分配任务时,违反"量材授职"的原则,就要失败。常有这样的事情:同是这个人,而前后的工作,巧拙不一样;同样的工作,而彼此之间功过相反。若不是用人的人知人善任,像镜子一样透明,不存成见;像衡器一样公平,不畸轻畸重,怎么能在广大的人群中,在复杂的事务中,能鉴别贤愚,分清轻重,恰当任用呢?知人之明太重要了,未可轻易办到,而选贤任能的方法,应该平日加以考察,临事加以试验啊。盛世多方面任用有才能的人,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应怎样力学以待国家任用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明经来致用,管好钱币来通财,因地制宜防洪水,选才来治国,盛大地使皇恩润泽天下,而扩大太平盛世的丰美,真

是从古未有的隆盛啊。臣下我祝愿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经书圣典已陈示了,而更勤加探索;钱币已很充足了,而更重视源流;川渎已治理了,而更关心水的蓄泄和防治利用;能胜重任的骨干人才已储存足了,还加倍地想着识拔。以古为鉴、以古为法,这些条件完备了。重视财货以达厚生、利用的目的,意义昭然若揭了;治水的法度,非常详细了;培育选拔人才的规章制度,也树立起来了。用这些来推行治国之道,如无声的音乐,无形的礼仪,无服的丧制,潜移默化,使九州安定,把风俗推向"仁寿之宇",把人民收纳进"幸福之林"。这样我国家亿万年的有道的长远国运,就奠定在这里了。臣下我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不识忌讳,干冒皇上尊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冯桂芬　殿试对策

冯桂芬(1809~1874)　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官至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受当时乾嘉学派的影响,治学谨严,精古文辞,兼通算学。著有《校邠庐抗议》、《显志堂诗文集》、《说文解字段注考正》、《使粤行记》、《两淮盐法志》等书。

臣对:臣闻典学者,通经之要;藏富者,裕国之谟;涤川者,兴利之原;得士者,佐邦之本。综稽往籍,《易》著观文,《礼》详泉布,《诗》有度原之咏,《书》传宅俊之规。自古帝王,握镜临宸,斟元御宇。以征博雅,则虎观崇儒也;以阜财求,则鹿皮登币也;以资灌溉,则雉陇流膏也;以进贤能,则凤喈腾咏也。崇规茂矩,综贯兼赅。用是儒业隆,而简册牖其灵;国用饶,而金贝呈其实;水德恬,而陂池溥其利;仕途辟,而杞梓达其材。所由瑞集璇图,化光玉镜,固万叶而为量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学传精一,政著丰亨,普闿泽于井闾,切旁求于桢干。固已四术式崇,而万民利赖;百川归壑,而三物登庸矣。乃圣怀冲

挹，深维长治久安之计，弥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重经训、均钱币、兴水利、举贤才诸大政。如臣之庸愚，曷足以知体要?顾当拜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而因胪举夫经文之要义，诠解之异同。此诚读书穷理之要务也。臣闻《五经》之在天下，犹之日月行天，江河行地，无时或息。至于经之有五，犹天之有五行，地之有五岳，人之有五伦也。《连山》、《归藏》、《周易》，是谓之《三易》。伏羲、文王相继画八卦、六十四卦。《乾》、《坤》言学，分乎圣贤;《泰卦》九二，备言保泰。《尧典》、《舜典》，本合为一，后儒始分"慎徽"以下为《舜典》。至若《康诰》、《酒诰》职官，可与《周礼》并参。《多士》、《多方》篇次，亦有今古之异。《行苇》为祭射，《臣工》、《噫嘻》为戒农官。《长发》一诗，或为祫，或为禘;《出车》王命，或曰殷，或曰周。以及《仪礼》体解、豚解之分，膳酒、散酒之用，其说当参稽也。中星之法，以岁差而变。尧时中星在虚度，厥后渐差而东，岁有迁改，故与《月令》有异，此即今法所谓恒星东移之度也。鲁史本用周正，自合加王于正，纪年道在体元，原宜谓一为元。圣人好古不作，大始正本，著书之义，夫岂容测以臆见也?夫五经之作，并出于圣人，阅世久远，师承不一，故义例参差，字句互异，是在读者考核之精详矣。皇上学究天人，修明经术，凡在服经之士，孰敢不勉自策励哉!

制策又以秦有天下，币为二等，而遂推究夫古今货币之源流。此又阜财足用之要图也。臣谨按:《管子》曰，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神农一神之字，太皞九棘之名，黄帝之制金刀，帝舜之策马货，皆流芳秘纪，征瑞瑶编，厥制纷如，靡得而记已。盖秦汉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所谓珠玉龟贝金锡之属不为币也。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至唐时有禁断采银之诏，度支岁计有粟布绢绵及钱，而无银。盖银以充贡，不以为赋。近世始以银为币。铸银之式，轻重不同，所直亦异。民间但以银论价市易，遂至银日贵，钱日贱，市侩得以上下其手，富贾或且奇货可居，此其弊也。《周官·司市》"无征而作布"，郑注谓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说者谓钱始盖一

品,周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然观单穆公所谓"子母相权",是固有大小矣。古今论钱法者,若贾谊,若孔颉,若陆贽,皆能详其利弊者也。要之,钱有重轻,铜有贵贱。铜价浮于钱,则盗销之弊起;钱价浮于铜,则盗铸之弊起。二者相反,要皆法之所宜禁。而钱之轻重,铜之贵贱,必斟酌得其平。而唐以上五铢之利,不足言矣。皇上府事交修,权衡轻重,各得其宜,所由国用饶而民用赡也。

制策又以昔在神禹,浚浍距川,亦越成周,详刜遂沟洫之制,而求兴利除弊之道。此又一劳永逸之至计也。臣惟河内资漳水之利,关中赖郑国之渠。古今之言水利者,代不乏人。今畿辅之地,形势广衍,诸川巨浸,汇于津门,堤防疏导,厥功要矣。诸川之大者,天津之南为卫河,北为潞河,滹沱为子牙上游,势均而力敌。永定汇于桑乾,源合而流则分。他如滹、洺、徐、白,加之以淀泊水泉,自有可开之水利。当游衍而节宣之,使无淤积之患,夏秋淫潦,不致膏腴变为污泽,而水利可兴矣。考诸元明,代有修浚。其尤著者,虞集有《京东屯田》诸议。徐贞明于永平一带,行疏浚潴蓄之法,一岁遂得熟田三万九千余亩。北地水利,自昔已然。惟风沙易积,水泉多挟淤泥而下,则疏瀹诚不可缓。至于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密于修防者,往往疏于浚导;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利其淤垫者,往往忘夫浸灌。是又在董厥成者,相宜而利道之,庶几利可永兴而害可去矣。皇上轸念民依,随宜浚治,不曰建永赖之功而溥无疆之利哉!

制策又以用人之道,在乎知人善任,而因思所以祛偏倚之习,清澄叙之原。此又厘工熙绩之首务也。臣惟人之材性,各有攸宜。廉静自守者,或无以治剧理繁;规矩自循者,或无以随机达变。有如僝功勤奋,而病在庸违矣;才能试可,而恶其圮族矣。口对甚悉,而捷给不足取矣;厚重少文,而大事转可属矣。则所求以辨忠诈、精鉴别者,固在彼不在此也。况夫智力有大小,时地有难易。往往同此一人,而前后殊其巧拙,彼此异其功过者,非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强以所不习哉?要之用人之法,非第取其才也。必有孝弟之德,则子谅易直,而回邪之念不生;必有廉介之德,则砥行砺名,而贪竞之心不作。而能量能授官,人地相宜,录其瑜而祛其瑕,取其长而化其短。持躬懔于圭

璧,遇事不患盘错。有猷有为有守,三者克兼,而奇材异能之效,乃特出耳。皇上虚怀延访,人才辈出,职事修明,洵足以追三代、媲唐虞矣。

若此者:穷经以居业,立式以均财,潴水以溉田,抡才以佐治。蒙养之功实焉,节用之源成焉,井受之用宏焉,泰交之庥著焉。洋洋乎洵亘古之上仪,丕天之伟烈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德,天健昭行,本至诚无息之衷,臻累洽重熙之盛。正学已隆,而弥思崇广;泉刀已裕,而更谨权衡;沟渠已导,而益切经营;选造已升,而愈殷采访。于以上咸五,下登三,润色皇猷,缉熙帝载,民俗合于卢牟,邦本固于磐石。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典学是通经的要务,藏富是裕国的良谋,疏浚河流是兴利的根源,得士是辅佐国家的基础。稽考过去的书籍,《周易》彰明要观看天下文明,启发人应重视学习;《周礼》详述泉布,都教人重视理财;《诗》咏"度其隰原",示人重视水利;《书》传"宅俊"的规定,示人选贤任能。自古帝王怀明德而为天子,斟酌初始状态而统治天下。若谈博雅,就有像白虎观那样的尊崇大儒;要丰富财货,鹿皮可用作钱币;论及灌溉,就陇亩流膏;进用贤能,则鸣凤齐唱。崇高完备的规章制度,综合贯穿,全都包纳。因此儒业兴隆,而典籍启发学子的灵性;国用富足,而金贝呈现着它的实效;水利大兴,而陂池发挥它的作用;仕途开辟,而英杰尽他们的才用。之所以瑞兆集聚成璇玑之图,化导之光映照着金玉之镜,国运亨通,数以万年计,仗有上述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传授了惟精惟一的心学,做出了丰大亨通的政绩。对黎民百性,普降恩泽;对优秀人才,殷切旁求。本来已经《诗》、《书》、礼、乐并重,万民享受其利,百川汇海,而具有六德、六行、六艺的人都得到了进用。但是圣怀谦虚自抑,深深地考虑长治久安的计划,殷切地注意"持盈保泰"的思想。把臣下等人,宣进朝廷,而用重经训、均钱币、兴水利、举贤才等大政,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庸碌

愚钝的人，怎么能知道大政的要害所在呢？但是在拜见颂扬开始的时候，敬念用言词向天子全面汇报的古义，敢不勉力叙述平素学习到的东西，用来献上土壤、细流对泰山、大海的帮助吗？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因而列举经文的要义、诠解的异同。这真是读书穷理的要务啊。臣下我听说《五经》在天下，好比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没有停止的时候。经分为五部，好像天有五行，地有五岳，人有五伦。《连山》、《归藏》、《周易》叫做《三易》。伏羲、周文王相继画八卦、六十四卦。《乾》、《坤》言学，分别圣贤；《泰》九二中把保泰的道理，说得很完备。《尧典》、《舜典》本合为一，后儒才把"慎徽五典"以下，称为《舜典》。至于《康诰》、《酒诰》中的职官，可与《周礼》参证。《多士》、《多方》的篇次，也有今文、古文的不同。《行苇》一诗，是祭毕而射来使用的，《臣工》、《噫嘻》是戒农官的。《长发》一诗，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祫，在庙中合祭祖先，有的说是禘，郊祭上天，以始祖陪祭。《出车》诗中的"王命"，有人解作周王，有人解作殷王。《仪礼》中体解、豚解的分别，膳酒、散酒的应用，应当参验稽察而核定它们。"中星"之法，随岁差而变动。尧时中星在虚度，以后逐渐东移，年年有变动，所以和《月令》不同，这就是今法所说恒星东移的度数啊。鲁史本用周朝的历法，自然应该在"正"字上加"王"字，称"王正月"。纪年的原则在于体察初始，原本上就应该把"一"称为"元"。圣人好古而不创作，大始正本是著书之义，哪能容许以臆见来测定？《五经》的著作人，都是圣人，传世久远，学者师承不一。所以义例参差，字句互异，这就在于读者考核的精详了。皇上学究天人，修明经术。凡是读经的人，谁敢不努力地自我策励呢？

制策又以"秦有天下，币为二等"，于是推究到古今货币的源流。这又是丰富财源、充实国用的要图啊。臣下我谨按：《管子》中说：黄金刀币，是民间流通的货币。所以神农有一神之字，太皞有九棘的名称，黄帝铸金刀币，帝舜之策马货，都流芳在秘籍中，表祥瑞在神册上，那些制度繁杂，没法记述了。秦汉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一律用钱。所说的珠、玉、龟、贝、金、锡一类的东西，不作货币用。汉武帝始

造白金三品，不久就废止，没通行开。到了唐代有禁止采银的诏令，从财政统计上看，有粟布绢绵及钱，却没有银子。因为银子是作贡品，不作税钱。到了近代，才把银子当货币用。铸银的规格，轻重不同，价值也不同。民间都拿银子来论价交易，致使银子一天天贵，钱一天天贱，市侩得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富商大贾认为奇货可居，这是它的弊端啊。《周官·司市》中，有"无征而作布"的记载，郑玄注谓"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论者说：铸钱开始时，只有一种。周景王铸大泉，才有二种。但是，从单穆公所说的"子母相权"来看，是本来就有大小二品种。古今论钱法的人，如贾谊、孔颎、陆贽等，都能详细地说明它的利弊的呀。总之，钱有轻重，铜有贵贱，铜价高于钱，盗销的毛病就来了，钱价高于铜，盗铸的毛病就来了。这两样互起反作用，都是钱法所应该禁止的。而钱的轻重、铜的贵贱，必须斟酌使之平衡。唐代以前，五铢钱的好处，不值得讲说了。如今皇上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很好，权衡货币轻重，各得其宜，因此国用充裕而民用丰厚啊。

制策又以"昔在神禹，浚浍距川，到成周详定畎、遂、沟、洫之制"，而求兴利除弊的方法。这又是一劳永逸的好计策啊。臣下我想来，河南省沾了漳水的光，关中一带仰赖郑国渠。古今那些谈水利的，代代都有。现在京城辖区以内，地势宽平，不少大的河流汇集天津，堤防的修筑，河道的疏通，工程是很重要的。就大的河流说，天津以南有卫河，北为潞河，滹沱河是子牙河的上游，上游与下游势均力敌。永定河汇于桑干河，源合而流分。别的像滦、洺、徐、白，加上那些淀泊水泉，自然有水利可供开发。对漫溢的河流应当加以疏通宣泄，使不淤积。夏秋季节雨多水大，不至于变膏腴之地为污泽，就可以大兴水利了。元明两朝，都进行过修浚工作。最著名的，元代的虞集有《京东屯田》等奏议。明代的徐贞明，在永平一带，施行疏浚储蓄的治水方法，一年的工夫，就获得熟田三万九千余亩。北地水利，自古就是这样。只是风沙容易堆积，水泉多挟淤泥而下，疏浚真不可缓。至于治河的官吏，只知道有堤，而不知道有河，对修堤注意了，往往对疏导河流就疏忽了；经营农田的官吏，只知道有田，而不知道有河，利其淤垫

成田，往往忘记了浸灌。这又在于领导这项工程的人，不失时机地加以指导，差不多就利可以永兴，而害可以去掉了。皇上关心民众所感到痛苦的事情，随事所宜，进行浚治，这能不说是建成永久利赖的工程，而普及无穷之利吗？

制策又以“用人之道，在乎知人善任”，因而想到用什么方法去掉偏倚的积习，澄清铨叙官吏的本原。这又是整顿吏治、振兴政事的首要任务啊。臣下我想来，人的个性和才能，各有所宜。廉静自守的人，有的不能担任繁杂剧烈的工作；循规蹈矩的老实人，有的缺乏灵活性，不能随机应变。如共工成功勤奋，而病在违背命令；鲧才能试可，但嫌他残害族人。虎圈嗇夫口对很清楚，但这类巧言善辩的人就不足取；品质厚重略输文采的周勃，大事可以相托。由上例看来，用以“辨忠诈”、“精鉴别”的，本来是在彼不在此啊。何况人的智力有大有小，时地有难易。往往同是这个人，而前后的巧拙相殊，彼此的功过不同。这不正是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要他去做不熟悉的工作吗？总之用人的方针，不只是取他的才能啊。一定要有孝悌的美德，就会慈谅易直，而邪恶的念头不产生；一定要有清廉耿介的美德，用来磨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而贪婪之心不萌发。这样才能量能授官，人地相宜，采纳他的优点，去掉他的缺点，发挥他的特长，补救他的不足。对自己注意品行廉洁，遇事不怕盘根错节。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三者兼有，而奇才异能的效用，就明显地显出来了。皇上虚心访求，人才辈出，职事修明，真可以上追夏商周，和尧舜比美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穷经以对待学业，健全法式以均衡财用，蓄水用以灌田，选才以辅政治。蒙养的功效充实了，节用的根源完备了，安定田亩的作用得到弘扬了，上下一致的关系很明显了。一派兴盛景象，真是亘古未有的太平盛世，比天还大的丰功伟绩呀。臣下我更愿皇上，日新用以进德，天健用以昭明行动。本着“至诚无息”的初衷，达到“累洽重熙”的盛况。圣学已兴隆，而更想着发扬光大；钱币已充裕，而更强化权衡；沟渠已通畅，而经营更紧切；选士已完备，越发殷切寻访。真可以上同五帝，下登三王，润色盛大的谋略，使帝业光明，民俗合乎规模，国家的根基像磐石一样坚固。那我国家亿万年

有道的长远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不懂得忌讳，干冒皇上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张百揆　殿试对策

张百揆(生卒年不详)　字吟舫，绍兴府萧山县(今属浙江)人。道光二十年(1840)探花。后历官广东惠州、潮州及嘉应州知州。

臣对：臣闻宗经所以考道，通币所以宜民，宣滞所以奠川，任贤所以敷政。博稽往牒，《易》著引伸之象，《书》传利用之文，《礼》垂潴蓄之条，《诗》有絷维之咏。崇规茂矩，粲然具赅。伊古帝王，锡极临宸，斟元御宇，莫不本夙夜勤求之意，致天人交应之机。以窥体要，则精义探焉；以谨度支，则财用阜焉；以利委输，则奔流息焉；以广登庸，则奇才聚焉。用是指归得乎讨论，铢两准乎重轻，飞辇便乎往来，英豪人乎荐剡。所由熙春泳化，函夏胪欢，被润泽而大丰美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德精抱蜀，治洽时雍，乘泰运以诚民，握乾符以锡祉。固已理穷河洛，而食货充盈；道顺梯航，而人才蔚起矣。乃圣怀冲挹，弥切勤求，思垂久治之模，不遗迩言之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劝学、阜财、治河、选士诸大端。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本刍荛之一得，以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因而旁求经训。此诚敦崇实学之至意也。臣按《易》有三编，伏羲之《易》，文王因之。然考《连山》、《归藏》，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则重卦不始于文王矣。《乾》二言诚，《坤》二言敬，诚敬圣贤之学也。程《传》于《泰》二言保泰在于包荒，阐发甚备。《二典》本合，晋梅赜始分。人心道心，《荀子·解蔽》篇，语略相似，果有合传心之要欤？《康诰》、《酒诰》职官，正人、外正，皆庶官之长。少正，其副贰也。太史、内史，见《春官》。庶子，即《夏官》诸子。圻父、农父、宏父，即司马、司徒、司空。《多方》

作于灭奄之后，而《多士》曰"昔朕来自奄"，盖篇次误倒耳。《行苇》先言献酬，而后及射，王肃以为燕射，《臣工序》以为助祭，《噫嘻序》以为祈谷，说皆可从。《长发》序云大禘。夫禘以祭天，此诗曰契、曰相土、曰汤，与郊祭之制未协，故朱子疑为祫祭之诗。《出车》王命，指殷说者为长。《执竞》"自彼成康"，《毛传》谓成大功而安之，则非康、昭以后诗矣。豚解谓全胥，体解谓房胥。君物曰膳，膳酒，君尊也；对膳言散，散酒，臣尊也。《周礼》乡射五物，《仪礼》注详言之。《尧典》中星总一月，而《月令》举月初，是以不同。《春秋》加王于正者，著尊王之义。至谓一为元，殆仿《舜典》纪元日，《商书》称元祀，以为编年法欤？皇上讲筵时御，念典惟勤，所由经学昌明，直驾汉唐而益上也。

制策又以秦汉时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银，因欲究其源流迁变之故。臣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钱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不与焉。汉武时患钱不足，更造币以赡用。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绘为皮币。又造银锡白金，作龙马龟贝之形，号白金三品，寻废不行。《通典》载：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以银为币，盖始此时。唐元和二年，有禁断采银之诏。度支岁计有粟帛绢绵及钱而无银。惟诸州土贡，自百两至二十两不等，不为币也。铸银之式，见《金史·食货志》，银每锭五十两，值百贯。后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轻重不同，所直亦异。自此银日贵，钱日贱，民间但以银论价市易矣。《周官·司市》"无征而作布"，郑注谓大铸钱以饶民。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钱而有二品。然观单穆公所称"子母相权"，则泉之二品由来久矣。论钱法者，莫善于贾谊《七福》之疏，厥后若孔颉，若陆贽，皆能指陈利弊、剴切详明者也。我朝内府设宝源、宝泉二局，直省通行鼓铸，洵可垂诸久远矣。

制策又以神禹浚浍距川，成周详刜遂沟洫之制，爰讲求夫畿辅水利。此尤经邦之要道也。臣按畿辅之内，川原绣错，皆足以溉农田。滱阳出磁州，滹沱出繁峙，清河出和顺，白沟出易州，桑乾出朔州。潞河即浊漳，来自潞城；滦河即濡水，发源独石口，皆巨川也。他如滤水旧名呕夷，洺河今在广平，徐河合曹河诸水入长流河，白河合潮河、玉河诸水入海。加以东西二淀，南北二泊，与夫泉深水厚之区，苟经画

得宜,皆可收灌溉之利,不至有泛滥之虞也。讲水利者,代不乏人。元虞集有《京东屯田》诸议。托克托兴水利,西自檀顺,东至迁民镇,规画井然,明邱浚纂人《大学衍义补》,亦治平中一事也。徐贞明《潞水客谈》胪陈十四利,皆能洞悉原委。贞明奉使期年,于永平一带,行疏浚潴蓄之法,一岁得熟田至三万九千余亩。成效彰彰,而勋戚争言不便,事遂中止。夫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是在董厥成者,相其宜而利导之,则利可永兴,而害可永去矣。国家岁丰玉粒,轨顺金堤,耕田凿井之民,不已群沾美利哉!

制策又以用人之道,在乎知人善任。因恐鉴别之不精,以致薰莸之杂进。臣闻知人则哲,自古难之。公孙宏之布被,汲黯谓其诈;王安石之经术,苏洵辨其奸。自来诈托为忠、奸托为贤者,不可胜数。非鉴之甚精,何以别其真伪?况乎人之材性,各有攸宜。廉静之儒,未必能理繁治剧,则如刘晏之钱谷,亦有足多;方正之士,或不能通变达权,则如姚崇之救时,固自可贵。此善御者所以不废罢驾之马也。然偻功非不勤奋,试可岂无材能?究为帝世所斥。盖与其才优于德,不若德胜于才。啬夫口对,徒取憎于多言;周勃少文,独许属以大事。骥称其德,又在此不在彼矣。至于人之智力有大小,用不可过其量;官之时地有难易,任不可违其材。历观前史所载,往往有同此一人,而前后殊其巧拙,彼此异其功过者。人非不可用,过其量则倾,违其才则蹶也。是惟明于知人,较短量长,因材器使,斯陶铸驱策之道得耳。皇上达聪明目,澄叙官方,大小臣工咸思奋庸熙绩,岂不懿欤!

若此者:通经以致用,鼓铸以丰财,治水以利民,辟门以吁俊。腾茂实,蜚英声,振古之上仪,蔑以加于此矣。臣尤伏愿皇上,廑持盈保泰之心,臻累洽重熙之盛。蟫简已披,而犹勤乙览;龙文已铸,而弥谨子权;鲸浪已平,而愈殷申命;凤冈已咏,而益重甲科。猗欤盛哉!德征风动,泽洽露生,于以奉若三无,乂安九有,上固保定之洪业,下开骏发之远祥。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崇尚经典,是为了考究治国的正道;流

通货币，是为了裕国便民；宣泄淤滞，是为了奠定河流，不使泛滥成灾；选贤任能，是为了搞好政务。博稽古代典籍，《周易》中有“引而伸之”的兆象，《尚书》中有“正德、利用、厚生”的记载，《周礼》中有“以潴蓄水”的治水方法，《诗经》中有“絷之维之”的尊重贤人的歌咏。各方面的盛大制度，详明完备。自古以来的帝王，施布最高准则，高居帝位，斟酌初始状态，统治海内，都是本着“夙夜勤求”的精神，导致了“天人交应”的太平契机。要窥察经典纲领，就把精义探究出来了；审查度支情况，财用就丰富了；看货物的积散运输，洪水泛滥的现象就没有了。要招集贤能，就奇才群聚了。因此，经典指归，得到讨论；钱币的轻重，合乎标准；飞刍挽粟，便于往来；英豪得到提拔重用。温暖的春风化雨，沐浴着人们。华夏的千家万户，无不欢乐。使人民蒙受润泽，生活富裕安定。其原因就在这里呀！

敬思皇帝陛下，德才精于守成，治绩使社会祥和，乘着极好的运气，聚合起下民，掌握帝王符瑞，赐福给臣下。本来已经穷尽了《河图》、《洛书》的道理，而食货充足；山川湖海无不顺畅，而人才很兴盛。但是圣怀谦虚自抑，弥切勤求，想留下长治久安的典范，不放弃对切近言论的察访。宣进臣下等人来到朝廷，而以劝学、阜财、治河、选士等项大事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么能够知道这些大政的纲领要旨呢？但是当着对扬王命开始的时候，敬念进见帝王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古义，怎敢不勉力地叙述平素所学习到的东西，本着割草打柴人的一得之见来献上葵花向太阳的一片忠心呢？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三易》名于何代？重卦画于何时？”因而旁求经训。这真是敦崇实学最好的意向啊。臣按《周易》有三种，伏羲所作的《易》，周文王因袭继承下来。但是考查一下《连山》、《归藏》，经卦之数都是八，细分就是六十四，这证明重卦不始于周文王。《乾卦》二爻言诚，《坤卦》二爻言敬。诚敬是圣贤之学。程颐《易传》在《泰卦》二爻中说“保泰在于器度宏大”，阐发得非常完备。尧舜《二典》，本来合而为一，晋代梅赜才一分为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等语，《荀子·解蔽》篇中，语略相似，果真有合于“传心之要”吧？《康诰》、《酒浩》中的职官，“正人”、“外正”，都是庶官之长，“少正”是个副

职。“太史”、“内史”见《周礼·春官》。“庶子”即《周礼·夏官》中所说的“诸子”。圻父、农父、宏父,即《周礼》中所说的“司马”、“司徒”、“司空”。《尚书·多方》是灭奄国以后的作品,而《多士》篇有“昔朕来自奄”的语句,这大概是篇次的误倒。《诗·大雅·行苇》一篇,先说献酬,然后说射。王肃解释成燕射。《诗·周颂·臣工序》以为是助祭,而《噫嘻序》以为是祈谷,说法都可依从。《商颂·长发》一诗,《诗序》以为是禘祭。禘祭是祭天的。此诗提到契,提到相土,提到汤,和郊祭的制度不合,所以朱熹疑为祫祭而作。《出车》篇中的王命,指殷王的说法较好。《执竞》篇中的“自彼成康”,《毛传》解作“成大功而安之”,就不是康王、昭王以后的诗了。豚解是指祭天地时用全猪,体解是指祭祀时用半牲。君主进食曰膳,膳酒是供君主用的酒。散,是对膳而言。散酒是臣下所用的酒。《周礼》乡射五物,《仪礼》注中说得很详细。《尧典》中星总括一月,而《月令》只举月初,所以不同。《春秋》纪时,在正月前加“王”字,是表示尊王的意思。把“一”字改成“元”字,大概是效仿《舜典》纪“元日”和《商书》称“元祀”,以为编年法吧?皇上讲筵时常参加,学习很勤奋,因此经学昌明,直接凌驾汉唐而更上一层啊。

制策又以“秦汉时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银”,因而想探究其源流迁变的缘故。臣下我想来,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为上币,钱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在其中。汉武帝患钱不足,造币以足财用,把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加上图案成为皮币,又造银锡白金,作龙、马、龟的形状,号称白金三品,不久就废止了,没通行开。据《通典》记载:“南朝梁初年,交广地区,全以金银为货币”,以银为币,从此开始。唐朝元和二年,有禁止采银的诏令。财政统计,有粟帛绢绵及钱,但是没有银子。只有诸州土贡,自百两至二十两不等,这不作货币使用。铸银的模式,见《金史·食货志》,银每锭五十两,值百贯。后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合钱二贯,轻重不同,价值也不同。从此以后,银子一天天贵起来,钱一天天贱起来,民间只以银论价,进行交易了。《周官·司市》“无征而作布”,郑玄注说“大铸钱以饶民”。钱起初只有一种,周景王铸大钱,才有两

种。但是，从单穆公所称“子母相权”的话来看，钱有二种，由来很久了。论钱法的书，以贾谊的《七福疏》为最好，以后像孔颎、陆贽，都能指陈利弊，肯切详明呀。我朝内府设宝源、宝泉二局，中央直辖省通行鼓铸，真可以行之久远了。

制策又以“神禹浚浍距川，成周详畎遂沟洫之制”，于是讲求畿辅水利。这尤其是治理国家的要道啊。臣下我考察，京师地区辖境以内，川原交错，都可以灌农田。滏阳河出磁州，滹沱河出繁峙县，清河出和顺，白沟出易州，桑干出朔州。潞河即浊漳，来自潞城；滦河即濡水，发源独石口，都是大川。别的如滱水旧名呕夷，洺河今在广平，徐河汇合曹河诸水入长流河，白河汇合潮河、玉河诸水入海。加以东西二淀，南北二泊，和那些泉深水厚的地区，假设规划经营得当，都可以收到灌溉的好处，不至于有泛滥的顾虑啊。讲水利的人，代代都有。元代的虞集有《京东屯田》诸议，托克托兴水利，西自檀顺，东到迁民镇，规划井然。明邱浚纂入《大学衍义补》，也算是治国平天下中的事情啊。明代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列举了十四利，都能洞悉原委。徐贞明奉使一整年，在永平一带，推行疏浚潴蓄之法，一岁就获得熟田三万九千余亩。成效彰彰，而勋戚争言不便，事遂中止。水这种东西，聚集多了，就有害；分散利用，就有利；放任不管，就泛滥成灾；蓄存利用，就可以灌溉利农。这在主管水利的官吏，适宜地加以因势利导，就利可永兴，害可永除了。国家年年丰收，水利设施也很好，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黎民百姓，不是已经享受到水利带来的幸福了吗？

制策又以“用人之道，在乎知人善任”，因而担心鉴别的不精，导致良莠的并用。臣下我听说，知人是最大的智慧，自古以来就把此事看作难事。公孙宏的俭朴，汲黯说他是诈伪；王安石的经学理论，苏洵辨析称他是奸伪。从来诈伪装作忠，奸伪装为贤，这样的人，不可胜数。若不是鉴别的精细，怎么能辨别出真假来呢？何况人的材性，各有所宜。清廉好静的人，未必能担任繁杂剧烈的工作。如刘晏的掌理钱谷，也值得称赞。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有的不能随机应变，如姚崇的挽救危局，固自可贵。这就是善于驾车的人，不废弃难驾驭的烈马的原因啊。但是共工并不是不勤奋，鲧也经过试可，能说没有才

能吗?而到底受到帝尧的斥责。这就是说,与其才优于德,不若德胜于才。虎圈啻夫巧言善对,徒以多言而受到憎恶;周勃厚重少文,而汉高祖独加赞许以大事相托。良骥不称其力,而称其德,这又是在此不在彼了。至于人的智力有大小,使用时,不能过量;时间地点的条件有难易,安排工作,不能屈才。历观前史所载,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同是这个人,而前后工作的巧拙,相差甚远;彼此工作的功过,差距很大。人并不是不可用,超过他所能承担的工作,就要失败,违反了他所适宜的工作,就要一蹶不振。这只在明于知人,较短量长,因材器使,陶铸驱策的得法而已。皇上虚心纳谏,视听广泛,吏治清明,大小官员都想着尽力搞好工作,岂不是很善很美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通经以致用,铸钱以丰财,治水以利民,开辟途径以延揽人才,政绩辉煌,英声远播,从古以来最好的政治制度,没有再比这更好的了。臣下我更伏愿皇上,加重"持盈保泰"的心志,达到世世代代长治久安的盛世。典籍已经披阅,而还勤于阅览;钱币已经铸造,而更谨于权衡;海不扬波,而越发重视水利;人才辈出,而更重视科举选拔。太好了!尽美尽善了!圣德使天下闻风响应,皇恩像雨露滋润禾苗。奉行治国之道,注重潜移默化,像无声的音乐、无体的礼节、无服的丧制,使九州的人民都安居乐业。对上来说,巩固所谓"天保定尔"的宏图大业;对下来说,开创深谋大智所呈现的长远吉祥。那么我们国家亿万年有道的长远国运,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不懂得忌讳,干冒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乔岳译〕

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约我以礼。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殿试策问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覃熙宙合,仰荷上苍鸿佑,祖考眷贻,深宫劼毖,益亹治安。兹御极之二十有一年,诞敷纶诏,特开恩榜,嘉与天下士,周咨博稽,以裨集思广益之治。尔多士其敬听予询。

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有用者。汉廷治狱,多引经义,其见于各传者,如隽不疑、萧望之辈,不一而足。能述其事、举其辞欤?其以《尚书》、《春秋》博士,补廷尉史,始于何人?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今佚不传。《困学纪闻》所载凡三,此外尚有存者否?《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后之用者,惟宇文泰、苏绰,差为近古。而刘歆、王安石,或以文奸,或以致弊。岂《周官》果出于伪托欤?抑不善用者之过欤?或谓汉法未备,故有取于经。后则事皆有例,援古反以滋疑。然例文过多,胥吏或以舞弊,何以用之克善欤?

民生艰易,赖乎守令;守令廉贪,视乎大吏。虞廷三载考绩,《周官》六计弊治,此允厘之要也。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当若何循名责实,乃有裨于官箴民命欤?今按两汉《循吏传》,则西京所载,无非郡守。班固至谓令若长不闻于时,何也?至若东京,则王涣、刘矩、仇览、童恢,并以令长列于《循吏传》,而鲁恭,刘宽,与夫颍川之四长,先后相望。其故安在?夫

为守令者，其首重者曰廉，其次曰才。然或洁清自好，而政事不免于废弛；或材力有余，而节操不足以共信。果如何而得有守有为者，分布郡县也？

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舜摄位，而四凶服罪；孔子摄相，而少正卯诛。古圣以生道杀人，皆此意也。而《酒诰》之文，有谓为小人附会《六经》者。《韩非》载鲁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有谓为法家托圣言以文峭刻者。果定论欤？善乎！崔寔之言曰："以严致平"，深得达权救弊之理。后儒有称之者，能引伸其说欤？唐太宗论赦为小人之幸，能析其义欤？至若保甲之制，弭患未萌，法至善也。乃行之熙丰，而反以滋其累；用之南赣，而民复称其便。其故何也？吏胥所以察奸，兵弁所以缉盗，乃或者声息相通，反为援引。何术以防之？何法以惩之欤？

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汉之南北军，唐之府兵、矿骑，宋之更调，明之团营，皆陆路之兵也。至海疆用兵，若晋之孙恩、卢循，元之方国珍，皆内寇穷蹙，拥众据险，易就削平。惟明胡宗宪、戚继光，剿平倭寇，战功尤著。其所撰《筹海图编》、《纪效新书》，非空谈韬略者可比。其时若朱纨之《严海禁疏》，郑若曾之《江南经略》，唐顺之之《武编》，不皆有裨于实用欤？当兹八荒在宥，七德有征，决胜机宜，权衡贵当。将卒何以汰其惰窳？侦探何以测其阻深？器械何以极其精良？内奸何以绝其勾结欤？

凡此者：通经致用，有治人而后有治功；课绩考勤，有实心而后有实政。不以万民向化，弛诘奸禁暴之防；庶几九有归怀，奏柔远绥边之绩。多士桥门释褐，学古入官，拜献先资，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用礼法来约束我。

君子依凭不偏不倚的道德标准，远离世间不被人知晓却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

《诗经》上说：周文王勃然一发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用来阻止侵犯莒国的那些敌人，增添周室的福佑，以此报答全天下对周室的向往之心。〔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敬承大业，振兴天下，仰赖着苍天保佑，托祖先的福荫，居身深宫小心谨慎，对治国安邦大事，越发勤奋。当即位二十一年的时候，下达诏书，特开恩榜，很高兴给天下士子以机会，多方面地咨询考察，以扩大“集思广益”的施治效果。你们这些学子，可敬听我的询问！

读书的人，不通经典，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学经典，不在于学一些语句条文，关键要通过对语句的理解，以求应用于实际。汉代人断狱，多引用经义。据史书记载，如隽不疑、萧望之等人，不可胜数。能叙述他们的事情，介绍他们的言论吗？以《尚书》博士和《春秋》博士，补廷尉史，创始于何人？董仲舒的《春秋决事》十六篇，今已失传，《困学纪闻》记载了三事，此外还有存的没有？《周礼》是周公用它实现太平的书。后来用《周礼》的人，只有宇文泰、苏绰，还相差无几，而刘歆与王安石，有的用来文饰奸诈，有的因此而致弊。难道说是《周礼》一书，果真出于伪托吗？还是不善用的人，他们有过失呢？有的人说，汉法未备，所以有取于经书，后来，事皆有例，援引经书反而滋生疑问。但是例文过多，胥吏中有的借以舞弊。怎么样能用得恰到好处呢？

人民生活的难和易，取决于地方官，而太守县令的廉和贪，又在于封疆大吏。帝舜时代三年一次，考核官吏的政绩，《周礼》以六计检查群吏。这是考核百官的重要措施。汉代用六条考察二千石。唐代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代设立考官院，考核京官和地方官。应当怎样循名责实，才有助于官箴和民命呢？今按两汉《循吏传》，西汉所载，都是郡守。班固说“县令和县长不闻于时”，这是什么缘故呢？至于东汉，则王涣、刘矩、仇览、童恢等人，都是县令或县长，而都

列入《循吏传》。而鲁恭、刘宽和"颍川四长",先后涌现出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身为太守县令的人,最重要的是廉洁,其次是才能。但是,有的廉洁自好,而政事不免于废弛;有的才力有余,而节操不足,不能为人共信。怎样才能得到有节操、有能力的人,分布在各郡县呢?

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帝舜代理天子,而"四凶"服罪。孔子摄行相位,而少正卯被诛。古代圣贤出自使人生存的原则而处死某些人,都是这个用意。而《酒诰》的文句,有的说是小人附会《六经》。《韩非子》中记载了鲁哀公"陨霜不杀菽"的问话,有人说是法家借托圣人,用以文饰法家的峭刻,果真是定论吗"崔寔说:"以严致平",这话很好啊,深深合乎通权达变以救弊端的道理,后代儒家有称赞他的,能引申其说吗?唐太宗曾说过:"赦为小人之幸",能分析出其中的深义吗?至于保甲制度,能防患未然,方法是很好的。但是在宋朝熙宁元丰年间推行,反增加了弊端,成了累赘;在明代的赣南地区推行,而群众又称说很方便。这是什么缘故呢?胥吏是用来察奸的,兵弁是用来缉捕盗贼的。但是有的就与对方声息相通,反而成为同伙,用什么方法来防备这种情况?用什么法律来惩罚他们呢?

军队是用来威慑天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用来安定天下的。汉朝的南军、北军,唐朝的府兵、旷骑,宋代的更调,明代的团营,都是陆军。至于海上用兵,像晋朝的孙恩、卢循,元朝的方国珍,都是内寇,走投无路,拥兵据险,容易削平。只有明代胡宗宪、戚继先,剿平倭寇,战功尤其显著。他们著的《筹海图编》、《纪效新书》,不是空谈韬略的人所可比拟的。当时像朱纨的《严海禁疏》,郑若曾的《江南经略》,唐顺之的《武编》,不是都有助于实际应用的吗?现在八方边际都在宽容之列,武功七德,信而有征,决胜机宜,权衡贵当。军队怎么样能淘汰懒惰腐败分子?侦探怎么样能探测出对方老巢的情况?器械怎么样能使其很精良?内奸用什么方法,断绝他们跟敌人的勾结呢?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通经是为了致用,必须先有治事的人,而后才能收到治事之功;课绩便于考勤,要有实心,而后才有实效。不因为万民向化,就放松了诘奸禁暴的防备;达到九州归服,奏上怀柔远

人、绥靖边疆的功绩。众学子在最高学府脱掉蓝衫将换紫袍，学习古代知识，步入仕途，向帝王进见献纳，首先要谋划好个人的建议。不要泛泛空谈，不要含糊其词。皇帝我要亲自阅览啊！

龙启瑞　殿试对策

龙启瑞（生卒年不详）　字辑五，号翰臣，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后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经德堂文内外集》。是朴学有名人物，对文字、音韵，颇有贡献。

臣对：臣闻学古所以人官，安民必先课吏，祛邪斯能善俗，防海乃可靖边。遐稽往籍，《易》著观文，《礼》详分职，《书》重诘奸之治，《诗》陈有截之辞。古帝王锡极临宸，斟元御宇。以勤典学，穷经比于菑畬；以励官常，立政先夫准牧。以除瑕秽，法温肃于春秋；以壮声灵，达梯航于瀛海。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符。用能是彝是训，经术崇焉；有守有为，群工懋焉；无偏无党，王路遵焉；贡卉贡皮，岛夷服焉。所由熙春泳化，函夏翔和，登斯民于上理者，恃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表章群籍，董正庶官，剂宽猛以和民，奉明威以保大。固已巍焕成文，而班联式序；闾阎安堵，而琛赆输忱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体至善之无遗，好迩言之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明经训、肃官常、化邪民、严海禁诸大政。臣之愚昧，奚足以赞高深？顾当对扬方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士不通经，不足致用"，欲勉以有用之学。此敦崇实学之盛心也。臣谨案西汉之世，每有大事，廷臣多援经义以决疑。始元中，有诈称卫太子者，隽不疑引卫蒯聩得罪之文。五凤中，议伐呼韩邪，萧望之引晋士匄不伐齐之说。他如龚胜定傅晏之狱，毋将隆抑董贤之宠，皆征引《春秋》。诚以属辞比事，本圣人之教也。元朔间，张汤为廷尉，以武帝方向文学，乃请《尚书》、《春秋》博士补廷尉史，以平亭疑法，汤之深文，犹能润饰。非上所好使然乎？董仲舒《春

秋决狱》,书佚不传,《困学纪闻》载其三,《白孔六帖》存其二。虽零编断简,而古人经术通于吏事,较然可见。《周礼》六官,唐太宗叹为真圣人之作。后世惟宇文泰、苏绰,朱子称其有意复古,官制甚详。唐之府兵、租庸调、兵法赋法,斟酌极精,其制皆本于绰,盖得《周官》之意。至于国师文新室之奸,荆国致熙丰之弊,则剽窃以济其私,非书之伪也。古多引经,后专用例。夫引经非专门名家,不能通其意;用例则勾稽验核,可以勉而能。然必如宋之韩琦,在中书取五房例,删为纲目。杜衍掌铨事,命诸曹先具科条,吏不为奸。斯为善用例者矣。圣朝重道尊经,事必师古,为士者孰不勉为体用兼备之学哉?

制策又以"民生艰易,赖乎守令",而因重考课,以求循良。此驭吏之要术也。臣按虞廷考绩,《周官》弊吏,尚已。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使以六条案郡国,非六条不得问,故能小大相维,而权不侵。唐之考功,自德义至恪勤,为四善。自近侍至镇防,有二十七最。综其善最,差以九等,而才与德分矣。宋太宗以审官院审京朝官,以考课院考州县官,而中与外又分矣。顾考官在乎法,而注考在乎人。扬清激浊,在大吏犹且能之,况人主乎!从来仕途习尚,恒视上之意向,以为转移。班固言孝宣每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常久任二千石,其有治效者,玺书勉励,用为公卿。故西京循吏,守相为多。范蔚宗言光武观纳风谣,广求民瘼,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故东都循吏,起家多由令长。章、和以后,鲁恭、刘宽辈,流风未绝。由是言之,人主重守相,则三王接踵;重令长,则千室鸣琴。甄拔之所加,才智之所萃也。《周官》六计,皆冠以廉。故簠簋必饬而职业克修者,上也;才华仆遫而节操坚明者,次也;若牛僧孺所谓"贪纵之吏,大抵有才",斯为下矣。然则奖廉洁,惩贪墨,所以全民命而励官箴,断断乎其在此。国家课绩用人,悉秉大公,则吏称其职,有不民安其业者哉!

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爰及夫保甲之制。臣案舜去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治。辟以止辟之谓也。《酒诰》以救商民之淫酗,故曰"予其杀"。苏轼谓《周书》多以杀为戒,故享国久长。而后人或附会镌凿,以失其意。《韩非》载鲁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孔子对以宜杀而不杀。王应麟疑为非圣人之言。崔寔《政

论》谓汉文帝以严致平，仲长统、范蔚宗皆亟称之。而唐王志愔谓严者不必凝网重罚。宋司马光亦谓窒矫一时之枉。则以世轻世重，要在与时宜之而已。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唐太宗所以谓"一岁再赦，善人喑哑也"。保甲为古今良法，而贵在得人。王安石施之鄞县而民安，用之天下而民扰，一人之身，有诅有祝。如是则王守仁之于南赣，非以恩信素行乎？夫守令不得人，则吏胥诘奸而反以纵奸；将领不得人，则弁兵弭盗而反以豢盗。有治人，无治法，两言尽之矣。圣朝恩威并用，道一风同，所由经正民兴，共跻于荡平之域也。

制策又以兵威所以安天下，而进详夫防海之法。臣案自汉立南北军以后，代有更制，而皆于水战弗详。晋之孙恩、卢循，元之方国珍，皆穷寇入洋，非能以风潮为长技。故海患之亟自明始，海防之密亦自明始。胡宗宪之破汪直、徐海也，长于设谋用间，故柘林五岛以平。戚继光之破倭闽浙也，战舰火器，皆极其精，故"戚家军"之名独著。所撰《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皆熟悉情形之言。外如郑若曾《江南经略》，举江防而制湖变。朱纨疏严海禁，重保甲而革渡船。其论皆归实用。善夫唐顺之之言曰："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非古来海防第一义乎？尝泛蛟门，战三沙，身历行间，故《武编》之作，后人不能测其奥。此亦及之后知之谓也。夫重洋之巡哨必勤，故将卒宜汰其惰窳；间谍之赏罚必信，则侦探可测其阻深。试之于风波沙线，以知器械之精良；稽之于口岸往来，以绝内奸之勾结。防则固，战则胜，庶几巩若金汤矣。圣世八荒在宥，七德有征，不已寰海镜清而奏绥怀之盛绩哉！

若此者：宗经以考道，熙绩以厘工，除暴以安良，巡洋以奋武。扬骏烈，畅鸿庥，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德，天健昭行。经学昌明，而衔华益期佩实；官方澄叙，而大法并励小廉。编氓保伍，而比觥挞罚，不废交修；重译款关，而下濑楼船，毋忘克诘。由是经有名家，史多循吏，野无犷俗，伍尽胜兵。上以祇迓蕃厘，下以永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载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学习古代知识,目的是居官治事;要治国安民,必定首先要澄清吏治;去掉歪风邪气,这才能改善风俗;巩固海防,然后才能绥靖边疆。从古代典籍上看,《周易》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周礼》中详述了"设官分职"的制度;《尚书·周官》中有"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的规定;《诗经》陈述"海外整齐划一"的词句。古代帝王施布最高准则,高居帝位,斟酌初始状态,统治天下。用在治学方面,穷经就像开荒一样,勤加耕耘;用在吏治方面,立政先抓牧民之官和平法之官;用在禁暴除恶方面,宽严取法于春季和秋季;用在壮大声威方面,致使海外都前来朝见。这一切,都本着夙夜勤劳、励精图治的实干精神,以达到天人交应的效果。因此,循经遵训,经术便得到崇尚了;有节操,有能力,百官都很称职了;没有偏私,正大光明,都有正道可遵循了;八方进贡,边疆部族都亲附了。之所以全国人民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神州大地一片和平景象,使民众进入最美好的治理状态,全靠的是这些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宏扬群籍,督察纠正群吏,调剂宽猛,用以协和民众,赏罚严明,用以确保大业。本来已经像帝尧一样"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而官爵职位,井然有序;民间安定太平,而远方进贡献礼,已经输送他们的诚心了。但是圣怀谦虚,还注意访问咨询。体念最好的事,不使遗漏,像帝舜一样,好察迩言。宣进臣下等人到朝廷,而用明经训、肃官常、化邪民、严海禁等大政,策问我们。臣下我很愚昧,怎么能够赞助高深呢?但是,当对答颂扬开始的时候,敬念用言词向天子全面汇报的古义,敢不勉述平素所诵习的东西,用来献上"以管窥豹,以蠡测海"的一片忠心吗?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士不通经,不足致用",想以有用的学问,勉励臣等。这是敦崇实学的盛心啊。臣下我谨案,西汉时代,每逢有大事,廷臣多援引经义,用来解决疑难。始元中,有一个诈称卫太子的人,隽不疑引用卫蒯聩得罪的文字。五凤中,议伐呼韩邪,萧望之引用"晋士匄不伐齐"的解说。别的如龚胜审定傅晏的狱讼,毋将隆抑止董贤的受宠,都是征引的《春秋》。真是因为选择字句,排

比史事进行褒贬，本来是圣人所说的“《春秋》之教”啊。汉武帝元朔年间，张汤为廷尉，因武帝正爱好并崇拜文学，于是奏请《尚书》博士、《春秋》博士补廷尉史，以斟酌评定那些有疑难的狱讼案件。张汤利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尚能加以润饰。这不是主上所好，才有这样的结果吗？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一书，久已失传。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保存了三条。《白孔六帖》中，保存了两条。虽然都是零编断简，而古人的“经术通于吏事”，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周礼》六官，唐太宗赞叹为“真圣人之作”。后代只有宇文泰、苏绰，朱子称赞他们有意复古，官制甚详。唐代的租、庸、调，府兵，兵法赋法，斟酌极精，这套制度都本于苏绰，大致获得了《周礼》之意。至于刘歆替王莽文过饰非，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变法致弊，则剽窃《周礼》，用以济私，并不是书是伪托之书。古人大多引经，后世专用条例。引经，不是专门名家，不能通晓经的奥义；用例呢，经过查核验证，可勉励人们发挥才能。但是，一定要像宋代的韩琦，在中书省，取五房例，删为纲目。杜衍掌铨叙，命诸曹先具科条，官吏不得为奸。这才是善于用例的人。圣朝既重道，又尊经，凡事必以古为师，有根有据。身为士子的人，谁不尽力去学“体用兼备”的学问呢？

制策又鉴于“民生艰易，赖乎守令”，因而重视考课，以求循吏良才。这是驾驭官吏的要术啊。臣下我考察，帝舜时代“三载考绩”一次，《周礼》规定以“六计”核定群吏的能否，也就是以“廉”为本的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派遣他们以六条案察郡国，六条以外不得察问，所以能小大相维系，而权不侵凌。唐代考功，自德义，至恪勤，为四善。自近侍至藩镇、防御使，有二十七最，善最加在一起，分作九等，而才与德就分开了。宋太宗时，设审官院，用来审查京官朝官；设考课院，用来考查州官和县官，而中与外又分开了。但考核官员在于法度，而铨叙任官在于人。扬清激浊，大吏尚能办到，何况君主呢？向来仕途习尚，常以皇上的意向为转移。班固说，汉宣帝每拜刺史守相，就亲自召见询问。久任二千石官，那些政绩卓著的，常受到玺书勉励，用为公卿。因此西汉循吏，守相占多数。范蔚宗说，光武帝观纳风谣，广求民瘼，那

些做邦邑长官的人,争着为他们所任之职贡献才能,争强比胜。所以东汉的循吏,起家多由县令县长。章帝、和帝以后,鲁恭、刘宽这批人,流风未绝。通过上述事实,可以这么说:君主重视守相,像王尊、王章、王骏那样的京兆尹就会接连涌现;重视令长,就可以千户人家鸣琴而欢庆。这是甄拔频加的结果,也是才智荟萃的功效啊。《周礼》六计,前面都加上廉字。所以能清廉奉公,修明其职的人,是上等的;才华平常而节操坚定的人,是次等的;像唐牛僧孺听说"贪纵之吏,大抵有才",这样的人,就是下等的了。那么,奖廉洁,惩贪墨,用以全活民命,激励官箴,毫无疑问是在这一方面。国家考核政绩用人,悉秉大公,就吏称其职了,还有民众不安其业的吗?

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因而论及保甲制度。臣下我考察,帝舜除去四凶,而天下人都顺服。孔子杀了少正卯,而鲁国大治。这就叫用刑而达到不再用刑。《酒诰》为了挽救商民的荒淫酗酒,所以说"予其杀"。苏东坡说《周书》多以杀为戒,所以享国久长。而后人有的穿凿附会,失其本意。《韩非子》中记载了鲁哀公关于"陨霜不杀菽"的问话,孔子用"应该杀,而不杀"做了回答,宋代的王应麟,怀疑这不是圣人之言。东汉崔寔在《政论》中说"汉文帝以严厉实现太平",仲长统、范蔚宗,都很称赞他这种说法。而唐王志愔说"严厉,不必凝网重罚"。宋司马光也说"崔寔是矫正一时之枉"。这就是说,同样一种刑法,而有时从轻,有时从重,关键在于"因时制宜"而已。养稂莠的人,害了好的谷子,赦免有罪的人,害了良民。唐太宗所以说"一岁再赦,善人喑哑也"。保甲是古今良法,而贵在得人。王安石在鄞县推行保甲法,而民众得安宁,但在全国推行时,便出现了扰民的后果。对同一个人,有祝颂,也有咒骂。像这样,王守仁在南赣,不是因为恩信素行于南赣人民吗?太守县令若不得人,就出现"胥吏诘奸,而反以纵奸"的现象;将领若不得人,就产生"弁兵弭盗,而反以豢盗"的行为。有治人,无治法,这两句话把问题说绝了。圣朝恩威并用,道德一致而风俗相同,所以就纲领正确,民众兴起,共同进入了王道坦荡平直的境域。

制策又鉴于兵威所以安天下,进而详问防海的方法。臣下我考

察，自汉朝设立南北军以后，兵制代有变更，而都对水战不详。晋代的孙恩、卢循，元代的方国珍，都是穷寇入海，不能以驾驭风潮为长技。所以海患的屡次发生，自明代开始，而有较周密的海防，也自明代开始。胡宗宪攻破汪直、徐海，擅长于设置奇谋和使用离间计，所以柘林五岛因而平定。戚继光破倭寇于东南沿海，战船火器，都很精良，所以战功屡立，“戚家军”声名大震。他们撰写的《筹海图编》、《纪效新书》，都是熟悉情形的言论，绝非纸上谈兵。此外，如郑若曾的《江南经略》，举江防而制湖变；朱纨的《严海禁疏》，重保甲而革渡船。其论议都切合实用。唐顺之讲得很好：“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这不是古来海防的第一要义吗？他曾泛蛟门，战三沙，身历戎行。所以他撰写的《武编》，后人不能测其奥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及之后知”。重洋的巡逻哨卫必定要勤勉，所以将领和士兵，应淘汰那些懒惰低劣分子；对间谍人员的赏罚，一定要守信用，则侦探可以探听出对方老巢的情形；在风涛海域和沙滩沿线进行试验，用以测知器械的精良程度；在口岸上进行稽查，用以杜绝内奸勾结敌人的诡计。防则坚固，战则胜利，差不多就固若金汤了。圣世八方边际都在宽容之列，用武的七德都有验证，不是已经寰海镜清，而出现“绥边疆，怀诸侯”的盛绩了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崇尚经典以考察圣道，加强治绩以整顿百官，除暴以安善良，巡洋以奋威武。弘扬大业，畅通洪福，仁圣之事全有了，帝王之道具备了。臣下我更愿皇上，用“日新”的办法，进修自己的品德；用自强不息的精神，督促自己的行动。经学昌明，而春花更想秋实；吏治澄清，而大臣守法并勉励小臣廉洁；民间施行保甲制度，而奖善惩恶，并举不遗；边远部族，叩关亲附，而对水军船舰，不忘整顿。因此经有名家，史多循吏，民间没有粗恶的习俗，行伍中都是精干的强兵。往上可以迎接天赐的洪福，往下可以永远国富民安，多所庇佑。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有道的长久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不识忌讳，干冒皇上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龚宝莲　殿试对策

龚宝莲(生卒年不详)　字静轩,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学古所以入官,察吏所以熙绩,明刑所以弼教,奋武所以绥边。稽诸载籍,《易》垂多识之文,《礼》载任官之制,《书》纪瘅恶之训,《诗》歌正域之章。茂矩崇规,粲然具备。自古帝王斟元御宇,锡福同民。以瞻体用,则经学昌焉;以昭法守,则吏治修焉;以分良楛,则民俗淳焉;以征丕冒,则海宇安焉。悉本恪恭谨守之衷,以昭锡羡延洪之庆。是故多见多闻,实学也;有为有守,上理也;惟威惟明,善政也;来格来享,盛治也。懿铄哉!所由荃宰凝庥、萝图集瑞者,此耳。

钦惟皇帝陛下,建中立极,寿世诚民,阐孚惠于寰瀛,媲隆施于帱载。固已学敦朴茂,而绩奏循良;治著严明,而教征渐被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廑衢室之畴咨,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崇经、课吏、敕法、辑边诸要道。如臣愚昧,何足以补高深?顾幸当嘉言罔伏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述平昔之所诵习者,以勉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士不通经,不足致用",因讲求夫有用之学。此诚稽古治今之要术也。臣窃惟义理者,经之本;训诂者,经之末。帝王宰世之具,圣贤修道之教,莫备于经,在于善师其意而已。汉承秦后,始求遗经。法律、《诗》、《书》,往往参用。故隽不疑斥成方遂之诈,引卫辄之拒蒯聩;萧望之议呼韩邪之伐,引士匄之不伐齐。凡此皆引经义以治狱者也。至若张汤请以《尚书》、《春秋》博士补廷尉史,则欲援经义以佐其深文而已。董仲舒深于《春秋》,所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今只传其数事。类能推阐微言,引伸大义,非徒以经术饰吏治也。《周礼》六官,盖周公之成法。后世如刘歆之附会以文奸,王安石之纷更以致弊,致使议者以为伪托,固不足论。即魏宇文泰、苏绰之官制、府兵,差为近古,唐制多取则焉。然于圣人治世有《关雎》、

《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者，概乎其未有闻也。国家事皆有例，然义必准诸经。经义失而例文拘，故吏胥得以舞弊。思用之克善，仍不外乎通经。盖援古以滋疑者，蔽于辞也；据理以折衷者，操其要也。孰若皇上缉熙典学，以至德为权衡，损益从宜，以时中为通久也哉！

制策又以"民生艰易，赖乎守令；守令廉贪，视乎大吏"，而详举夫历代考课之法。臣谨案虞廷三考，所正者职；《周官》六计，所尚者廉。自来澄叙官方，未有不显功过为黜陟者。汉制使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唐制分以四善、二十七最。一最四善为上上，善最弗闻为中下，其等凡九。宋制以审官院审京朝官，考课院考州县。其法皆至为详尽。苟循名责实，何患官常之不肃，民治之不醇哉？然有考之之法，无考之之人，简书愈繁，巧饰愈伪。故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之为得也。两汉皆载循吏，西京所列，无非二千石。东京则王涣、刘矩、仇览、童恢，以令长与诸守相并列。且其论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称其德之同，不以所治之广狭为异。所以劝亲民之吏者，何其切欤！夫吏必为、守兼，而后可以称职。顾廉为重，而才为次。簠簋自好，以安静福民而有余，否则遇事见才，适以滋扰而已。今朝廷慎简臣工，甄别流品，所由吏称其职而民安其业也欤！

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而因思夫严肃之规，与夫保甲之制。臣谨案罪疑惟轻，所以广好生之德；刑与众弃，所以明儆恶之权。舜罪四凶，孔子诛少正卯，圣人用怒，使天下知所畏，后世知所惩，又其大者已。夫生道杀人，原非得已。然《酒诰》群饮"予其杀"，所以涤下国旧染之污。更张者遂附会以济其断矣。《春秋》"陨霜不杀菽"，所以纪天时僭豫之应，峭刻者遂援引以证其偏矣。汉文帝以严致平，其论创于崔寔，然文帝之减刑，意固本于宽也。唐太宗谓赦为幸，其议符于仲长统，然太宗之纵囚，不可谓非赦也。岂非立言各有所当，而存心必依于仁乎？且夫禁于已然，不如防于未然，则保甲之制善矣。王安石行之熙丰，而怨诽作；王守仁行之南赣，而寇贼平。是任法且难，况于作威以防弊之人，遂为生弊之人！则枉滥之患亟矣。吏胥所以察奸，而即以教奸；兵弁所以缉盗，而即以养盗。是用人

不可,况于独断以慈行其严,以明济其公,谓非良有司责欤?圣朝保赤推恩,务期辟以止辟。凡在帡幪有不畏而兼感者哉?

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因考兵制而策海防。此诚柔远绥边之要务也。臣案古者寓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后世重内以制外,于是汉有南北军,唐有府兵、矿骑,宋之更调,明之团营,皆所以壮京畿而固根本。外则西、北防边,东、南防海。然海疆天险,古之用兵者,或取海道而已。晋之孙恩、卢循,元之方国珍,内寇穷蹙,拥众远遁,不足道也。明代防倭,始有海患。岛夷习海趋利,履风波若衽席,挟炮舰为干城。顾非有内奸为之接济,则淡水米粮皆不能得,岂可久泊外洋?沙线礁浅皆不能知,岂敢深入内地?况吾将卒果练,侦探果明,器械果精,则方耀武扬威,截之于海外。彼涉险远来,又安足为中国患哉?明胡宗宪、戚继光,剿平倭寇,屡著战功。宗宪以谋,继光以勇。其所著《筹海图编》及《纪效新书》,悉皆考验见闻,铺陈阅历,足为用兵者法。其他如朱纨、郑若曾、唐顺之诸人,或疏陈便宜,或编纂韬略,并裨实用。而方鸣谦谓防海无烦客兵,尤为至论。皇上神筹胜算,远彻瀛堧,行见海隅出日,莫不思同我太平也。

若此者:强识博闻,经济宏矣;念勤简能,考察精矣;锄莠安良,邪慝弭矣;怀德畏威,边陲靖矣。洋洋乎治迈鸿轩,光昭象纬。金声玉振,奄九有以来同;衡正阶平,总八方而为极。上咸五,下登三,仁圣之事赅,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懋德,天健昭行。进修已饬,而弥切甄陶;励翼已勤,而尤殷考校;奸宄已消,而愈严旌别;震叠已著,而益慎防闲。由是庆洽熙春,欢胪函夏,瑶图鼎豫,玉烛咸丰,上迓蕃厘,下绥多祜。猗欤休哉!焕丕天之大律,延亘古之隆仪。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学古可用以入官,察吏可用以宏扬政绩,明刑可用以辅助政教,奋武可用以绥靖边疆。查阅古代典籍,《周易》中有从多方面吸取知识的文句,《周礼》中详载了任用官吏的制度,《尚书》中记载了"彰善瘅恶"的训诫,《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对

商汤用武力平定天下的歌颂。盛大而崇高的规矩典制，明明白白地具备。自古帝王，斟酌初始状态，君临天下，与民同享幸福。从学术上用力，则体用分明，经学昌盛；从职官制度上用力，则百官称职，吏治修明；从区分善恶上用力，则民俗敦厚，纯正朴实；从巩固国防，抵御外患上用力，则海宇安静，天下太平。这一切都是本着小心谨慎、创业守成的初衷，以昭示国运绵长的福庆。所以多见多闻，是切合实用的学问；官吏们有作为有操守，是最佳的治理状态；既威严又明察，属于美好的国政；各部族前来归顺朝拜，属于雄盛的治绩。何等的壮丽辉煌啊！之所以君臣之间凝聚着祥和融洽的气氛，四境之内洋溢着吉庆的征兆，原因全在于此。

敬思皇帝陛下，建立大中之道，确立最高准则，安定社会，与民同乐，施布恩信，遍及全国，厚施福泽，和天地一样博大深厚。本来已经学术敦促浑厚朴实，政绩达到官吏循良，治理显示严明，教化普及遐迩。但是圣怀谦虚，不遗细微。重视衢室的访问咨询，希望迩言的可以察知。宣召臣等到殿廷，而以崇经、课吏、敕法、辑边诸要道，进行策问。但像臣下我这样愚昧，何足以补高深？但是，正万幸处在美好言论没有隐匿的时代，敬念进见帝王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古义，敢不谨述平素所诵习的东西，以勉效管窥蠡测的一得之见吗？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士不通经，不足致用"，因而讲求有用的学问。这真是考古治今的要术啊。臣下我私自想来，义理是经的根本，是主要的；训诂是经的末节，是次要的。帝王主宰天下的措施，圣贤修道的教令宗旨，没有比经书再完备的，学经在于善于领会其精神实质。汉承秦后，始求遗经，法律和《诗》、《书》，往往参用。所以隽不疑引用卫辄拒蒯聩，借以斥责成方遂的欺诈；萧望之讨论征伐呼韩邪，援引晋士匄的不伐齐。这都是"引经治狱"的例子。至于张汤奏请以《尚书》博士、《春秋》博士补廷尉史，那是援经义以辅助他的深文罢了。董仲舒深于《春秋》，他的《春秋决狱》一百三十二事，今只流传数事，都能推阐、引申出微言大义来，不只是借经术粉饰吏治。《周礼》六官，是周公的成法。后世如汉刘歆的附会，用来文饰奸诈；宋王安石的乱改一气，因以致弊。致使议论的人，认为是伪书，这固不足论。

就是魏宇文泰、苏绰的官制、府兵，差不多和古制接近，唐制多取法于此。但是对圣人治世，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这样的主张大都没有听说过。国家事皆有例，然而大义必准之于经，经义失而例文拘，所以胥吏能够钻空子舞弊。要想用得好，仍不外乎通经。因为援引古籍，而发生了疑问的，是被辞句所蒙蔽。根据道理，进行折衷的，是掌握经典的主要精神。哪赶上皇上发扬光大圣学，以最高的道德作权衡，根据现实需要进行损益，把不偏不倚最适中作为永久通行的大道呢？

制策又因"民生艰易，赖乎守令；守令廉贪，视乎大吏"，而详细地列举出历代考查官吏的方法。臣下我谨按：帝舜时的九年三考核，所纠正的，在于尽职与失职；《周礼》的六计，所崇尚的是廉洁。从来整顿吏治，没有不彰明官吏的功过，作为任免、升降标准的。汉制派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郡守。唐制分为四善、二十七最。一最四善是"上上"，善最弗闻是中下，共分九等。宋制设立审官院，用来审察京官和朝官；设立考课院，用来考核州官和县官。其法都非常详尽。倘能循名责实，愁什么官风不正，民俗不淳呢？但是，有考核的办法，缺少去考核的人，法令条文越多，而投机作假的就越严重。所以赶不上"委任达官，各考所统"的办法好啊。两汉正史都记载了循吏。从《循吏传》上看，西汉所列，无非二千石官。东汉是王涣、刘矩、仇览、童恢，以县令县长和诸守相并列。其论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都是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赞美他们品德的共同点，不管他们任职地区的大小。用以劝勉亲民的官吏，是多么深切呀！官吏一定要"有所作为和有所持守兼备"，而后可以称职。但是，廉为重，而才为次。廉正自持，用安静降福于民为佳，不然的话，遇事就想显示自己的才能，只不过是滋事扰民罢了。如今朝廷慎简百官，甄别流品，这就是"官吏称职"，"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所在吧？

制策又鉴于"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因而想到严肃的法规和保甲制度。臣下我谨按："罪疑惟轻"，是为了推广"好生之德"；"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为了表明儆戒恶人效尤。舜加罪给四凶，孔子诛少正卯，圣人用怒，使天下人知道害怕，使后代人知道警戒，不

敢为非作歹。这是有伟大意义的举动啊!“以生道杀人”,原来是不得已。但是《酒诰》中说的聚众酗酒,“予其杀”,这是要洗涤下国旧染的不良风气,而变法的人,遂附会以补救他的独断专行了。《春秋》中“陨霜不杀菽”的记载,用以记叙天时的失常,尖刻的人就援引来为他的偏颇失常作证了。汉文帝以严厉实现太平,这种论调,创始于崔寔。但是汉文帝的减刑,用意还是在于宽。唐太宗说赦是一种侥幸的事情,但是唐太宗让囚犯回去再自动返回来,不可以说不是赦啊。岂不是立言各有所当,而存心必依于仁吗?况且患发而后禁,不如未发而先防,保甲制度就显得太好了。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推行时,就怨诽并作;王守仁在南赣推行,而盗贼绝迹。推行一种法制还这么难,何况是作威以防弊的人,遂即成为生弊的人呢?那就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很厉害了。吏胥本来是察奸的,而即以教奸;兵弁本用以缉盗,而即以养盗。这是用人并不随从人愿,何况独作决断,以慈行其严,以明济其公,能说这不是一个好官员所应当承担的职责吗?圣朝保护百姓,推恩及人,务期“辟以止辟”。凡蒙受皇恩覆盖下的人,有不畏惧又受感动的吗?

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因而考究兵制,谋划海防。这真是怀柔远人、绥靖边疆的要务啊。臣下我考察,古时候寓兵于农,没有事就耕田,有事就战斗。后世重内以制外,于是汉代有南军、北军,唐代有府兵、矿骑,宋代的更调,明代的团营,都是用来壮京城而固根本的。外则西、北防边,东、南防海。但是,海疆天险,古来用兵的人,有的只从海上取道罢了。晋代的孙恩、卢循,元代的方国珍,都是内寇穷蹙,拥众远遁,不值得一提。明代防倭,始有海患。倭寇习惯海上生活,履风波若处衽席,挟炮舰作干城。但是,没有内奸为他们接济,则淡水米粮,都无法得到,怎么能久泊外洋?海域情况,全摸不清,岂敢深入内地?况且我们将帅士兵确实干练,侦探确实精明,器械确实精良,就可以耀武扬威,在海外截击。他们涉险远来,又怎能成为我国的祸患呢?明朝胡宗宪、戚继光,剿平倭寇,屡著战功。胡宗宪以谋见长,戚继光以勇驰名。胡宗宪的《筹海图编》,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都是考验见闻,铺陈阅历,可供用兵的人取法。其他如

朱纨、郑若曾、唐顺之诸人，有的疏陈便宜，有的编纂韬略，都对实用有所裨益。而方鸣谦说："防海无烦客兵"，尤为至论。皇上神筹圣算，统一全天下，马上会看到天涯海角，没有人不想着同我国共享太平啊！

像以上这些问题：强记博闻，经邦济世的学问丰富了；念念不忘勤政，时时简拔贤能，考察工作很精细了；除暴安良，恶人消声匿迹了；怀念优厚的恩遇，惧怕震怒的天威，边疆安静了。真兴盛呀！治绩超过帝鸿、轩辕，光辉如日月五星。盛名远扬，博得九州来朝拜；玉衡正，泰阶平，总括八方而立极。上同五帝之德，下登三王之列，仁圣之事全有了，而帝王之道具备了。臣下我更祝愿皇上，用"日新"的古训，修养品德；像"天行"一样强健，昭明自己的行动。进德修业，已经非常严格了，而更关心培育人才；下属的拥戴辅佐已经很勤恳了，而更重视督察考校；内奸外贼已消灭了，而越发严加识别；威力已播扬了，而更慎重防遏事务。在此基础上，就吉庆融洽，使人如登春台；歌舞升平，欢欣遍于华夏。鸿图壮美盛大，时令雨顺风调。上承多福于天，下赐厚福于民。盛德大业完美崇高极了！完善了至高无上的法令制度，延续了自古以来的典章礼仪。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有道的长久国运，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不懂得忌讳，干冒皇上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胡家玉　殿试对策

胡家玉(？～1886)　字小蘧，新建(今江西南昌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探花。后提督贵州学政。同治间官至左都御史，光绪间补通政使司参议。对内河航运及海防贡献颇大。以海防紧要，请设外洋水师，清廷遂有海军之设。光绪十二年致仕卒。

臣对：臣闻崇经者，致治之资；课绩者，厘工之要；除恶者，安良之本；防边者，保国之谟。载稽往训，《诗》咏就将，《书》称慎简，容保特详于《易·象》，军政备著于《周官》。茂矩隆规，粲然具在。自古帝王斟元

御宇，锡福诚民。以勤念典，则青简时陈也；以励浚明，则素丝著美也；以严纠察，则黎庶胥驯也；以讫声教，则丹徼向化也。用是无怠无荒，见闻广焉；有为有守，吏治修焉；引养引恬，奸邪戢焉；来享来王，边陲固焉。所由熙春泳化，函夏翔仁，被鸿名而扬骏烈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光离照，德协乾符，则古圣以同民，体至仁以育物。固已六经毕贯，而百职具修；三刺无颇，而万邦内附矣。乃圣怀冲挹，葑菲不遗，思崇久治之规，弥切畴咨之念。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敦经、课吏、慎罚、绥边诸大政。如臣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述平昔之所诵习者，以勉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因求有用之学。此诚学古入官之要也。臣按帝王有不易之道，无不易之法，故六经为百世师，在师其意而已。汉承秦烬之后，朝廷每以经义决狱。隽不疑谓卫辄拒父，《春秋》是之。萧望之谓晋士匄侵齐，《春秋》大其不伐丧。其义皆本《公羊》，未必尽合《麟经》之旨。张汤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应劭言其所引二百三十二事，今所传者，《太平御览》载二事，《通典》载一事，其他无闻。夫《春秋》之义，处经则知宜，处变则知权，非智几于圣人，未足以语此。彼托于褒贬之说，遂比于司空城旦书，岂有当欤？六官之职，周公致太平之迹在焉。后世如周宇文氏，以汉魏官繁，令苏绰、卢辨之徒，依经改制，较之刘歆王田之法，王安石泉府之议，自有不同，然亦先王之糟粕而已。国家因时制宜，一切皆有成例，若无取乎引经，然创变非经无以资权衡，疑讼非经无以备考决。惟守今而无弊，稽古而不迂，是为善致用者。圣朝经学昌明，本宪章以垂条教，所由与三王参，为百世则也。

制策又以"民生艰易，赖乎守令；守令廉贪，视乎大吏"，因详求夫弊吏课功之典。臣按有虞三考之法，成周六计之弊，所以饬官箴，重民命，伊古慎之。自是以降，若汉之六条，唐之四善二十七最，宋之三等四课，求贤审官，纲举目备。顾循其名，未必责其实也。司马迁论次循吏，所载皆春秋时国相，如宓子贱、尹铎之治邑，不预焉。班固继

之，载汉郡守，以守、相位埒，犹依迁史成法云尔。东汉则王涣令洛阳，刘矩令雍邱，童恢令不其，至仇览为蒲亭长，亦与诸郡守并列于篇。其言以鲁恭、刘宽与颍川四长，先后相望，皆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盖光武起自田间，首崇卓茂，至与功臣比烈。故其时，令长与守尉并重，以为为国子惠庶民，其道一而已矣。夫猷为操守，在为吏者缺一不可，而兼之为难。顾有事乃可以见才，而无人不当知畏法，未有簠簋不饬而可与言保障者也。故首重曰廉，其次曰才。能吏所至，皆有事功，然显其利于此，而移其害于彼，未若廉吏之为实得矣。皇上吏治澄清，尤严操守，所由大法小廉，履敦信而孚慈惠欤!

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爰重念生道杀人之政。此尤安良敦俗之大防也。臣按舜除四凶，孔子诛少正卯，圣人之道至仁，则其恶不仁也尤甚。至于整齐末俗，刑用重典，《酒诰》群饮之罪，至于执拘以杀，所以惩淫湎之化，岂得已哉?仲尼对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以为天道宜杀不杀，则草木犹犯之，戒人君宜用威严。其说出于法家。非圣人“为政焉用杀”之意。后汉崔寔惩元帝宽政之失，谓文帝除肉刑，其实重之，是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此亦有为而发。惟唐太宗以赦为小人之幸，其论正矣。夫法不在于严，而在于信。有志于为治者，必不肯违道以干誉也。况水懦民狎，火烈民畏，立猛乃所以济宽；稂莠不去，嘉禾不生，驱凶乃所以卫善欤!顾用宽而失之不经，其害小；用严而至于滋扰，其害大。故消患于未著，止恶于未萌，则保甲之稽查宜先，而奸宄自无所容矣。察奸即以纵奸，缉盗即以窝盗，则吏兵之耳目宜慎，而枉滥当有所戒矣。有淑问之明，有至诚之意，则法行而无不畏，所谓辟以止辟者，此也。圣朝保赤推恩，明刑即以弼教，所由跻一世于敦庞，不其懿欤!

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因奋武卫，而及前代海防之成略。臣按历代各有兵制，而陆路之兵，其教演有时，其调遣有法。如汉之南北军，唐之府兵、矿骑，宋之更调，明之团营，皆所以重畿辅，遏奸萌，其尤著也。若夫海疆天险，与西北边形势迥异。当绥靖之日，虽列屯相望，而士卒畏重溟之不测，巡防皆属虚文；迨守备之时，又风汛各殊，而客兵困技勇之莫施，征调全无实用。稽诸前史，内

寇如晋孙恩、卢循，元方国珍，外寇如明之倭患，虽皆就歼除，而当时固已劳于图议矣。明太祖用方鸣谦之策，沿海置所。中叶废弛，复致倭患，东南为之骚扰。今胡宗宪、戚继光诸人之筹画，朱纨、郑若曾、唐顺之诸人之议论，率皆有裨于实用。而《筹海图编》一书，其尤详者。然海中沙险，水道时有更易，非可按图而索也。夫情窥宜汰，侦探宜明，器械宜精，内奸宜绝，四者固昭军实之常经，而决胜之机宜在是矣。国家八荒在宥，七德有征，恩威所被，无远弗届。光天化日之下，皆将效梯航之贡，以输忱悃，又何虑海氛之不靖也哉？

若此者：讲学以育才，兴廉以弊吏，诘奸以善俗，靖外以经邦。蛾术之功勤焉，鹓梁之刺泯焉，雀角之风息焉，鹰扬之烈彰焉。洋洋乎仁圣之事赅，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德，天健昭行。本持盈保泰之心，臻累治重熙之庆。学问深，而更穷经蕴；臣工肃，而弥饬官常。民俗已淳，益重防闲之道；海隅已靖，常修敬戒之威。于以光玉镜，披金绳，上迓蕃厘，下绥多祜，奄九有以来同，奉三无而立极。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崇尚经典，是实现大治的依据；考核治绩，是使用臣僚的要务；除去恶人，是安定善良的根本；防守边疆，是保卫国家的良策。稽考过去的训导，《诗》中咏赞君主好学，天天有成就，月月有长进；《书》称君主要谨慎简选僚属；《周易》中的象辞提到君主应"容保民无疆"；对军政事务，《周礼》中叙述详备。隆盛完备的规章制度，鲜明地存在着。自古帝王都是斟酌初始状态，统御天下，降福安民。要读书，就经典时时陈列着；要鼓励百官尽职尽责，则人人表现出美德；要严行纠察，就黎民百姓很驯顺了；要远播声威教化，极南的边疆也内附了。因此，学业上没有怠慢，没有荒芜，见闻很广了；官吏们有能力，有节操，吏治修明了；对百姓养育安抚，奸邪绝迹了；远方部族进贡来朝见，边陲巩固了。之所以全国人民如登春台，沐浴着德化的阳光，神州大地飘浮着慈爱的祥云，大名广布，大功远扬，全由于以上的办法啊！

敬思皇帝陛下,政治光明像日光普照万物,而品德符合帝王受命于天的祥瑞吉兆。以古圣为准绳来统一人民,体现至仁以化育万物。本来已六经完全贯通,而百官恪尽职守;决定刑罚,询于群臣、群吏、万民,而万邦都已内附了。但圣怀谦虚,任何细小的东西也不遗弃,想着崇尚长治久安的宏规,更加深多方咨询的心念,宣召臣下等人到朝廷,而以敦经、课吏、慎罚、绥边诸大政,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么能够知道事物的主体和要害所在呢?但是正当对扬开始的时候,敬念进见帝王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古义,敢不谨述平素所诵习的东西,以勉效管窥蠡测的一片诚心吗?

跪拜敬读制策有这样的话:"士不通经,不足致用",因而追求有用的学问。这真是"学古入官"最重要的事啊。臣下我考察:帝王有不变的道,没有不变的法,所以"六经为百世师",在于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罢了。汉承秦后,朝廷常常用经义来决定疑狱。隽不疑说:卫辄拒父,《春秋》认为是对的。萧望之强调晋士匄侵齐,《春秋》赞扬他不伐丧。其义皆本《公羊传》,未必完全合乎《麟经》的宗旨。张汤请求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廷尉史。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应劭说他引用了二百三十二事,今天传下来的,《太平御览》载二事,《通典》载一事,别的没听说过。《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用它处理原则性的事务,就知道应该怎么做,用它处理特殊的事务,就知道灵活对待的办法。不是智力和圣人差不多的人,不足以和他说这个道理。那些假借褒贬之说的人,把《春秋》比作司空城旦书,难道说是应该的吗?《周礼》中的六官制度,周公用它实现太平的踪迹存在着。后世如北周宇文氏,认为汉魏官太繁,令苏绰、卢辨等,依经改制,比刘歆王田之法,王安石泉府之议,自有不同,但也是先王的糟粕罢了。国家因时制宜,一切皆有成例,好像用不着引经。但是,创造也好,发展变化也好,没有经,就失去了权衡轻重的依据;疑讼案件,没有经,就缺少解决的参考。只有"守今而无弊,稽古而不迂",这样才是善于致用的。圣朝经学昌明,凭借行之有效的成法,以制定治国安民的条文,由此而与三王并列,成为百世准则啊。

制策又以"民生艰易,赖乎守令;守令廉贪,视乎大吏",因而详细

地探求评定官吏、考核治绩的制度。臣下我考察:帝舜时的九年举行三次考绩,决定任、免、升、降。周代评定官吏的六计,都是用以饬官箴,重民命,自古就很重视。自此以后,像汉代的六条,唐人的四善二十七最,宋代的三等四课,求贤审官,纲举目备。但是,循其名,未必能责其实。司马迁编写《循吏传》,所载均为春秋时国相,像宓子贱、尹铎的治邑,就不收录在内。班固《汉书》所载,以郡守与守相地位差不多,所以依《史记》成法,无大变动。东汉王涣是洛阳令,刘矩是雍邱令,童恢是不其令,仇览是蒲亭长,都和郡守们并列《循吏列传》,并说鲁恭、刘宽,与颍川四长,先后相望,都凭借仁、信、笃、诚,使人不欺。这大概是因为光武帝起自田间,首先推崇卓茂,直至与功臣比勋绩。所以当时县令县长与守尉并重。认为"为国"和"子惠庶民",其重要性是一样的。有所谋划又有所作为并有操守,在官吏身上缺一不可,而兼之为难。但有事才可以显出才干来,而每一个人,都该知道畏法。人世间从未有贪官污吏,而可以和他谈保护一方的啊。所以官吏最重要的是廉洁,其次是才能。有才能的官吏,所到之处,都能建功立业。但是,显其利于此,而移其害于彼,就赶不上廉吏功绩虽不怎么显著,而脚踏实地,忠于职守,造福人民,还是这样好啊。皇上吏治澄清,尤严操守,由此而大臣守法,小臣清廉,行为忠厚信实,慈惠很孚众望了吧?

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严威足以禁暴",于是反复思考"生道杀人"的政事。这更是安善良、厚风俗的预防大计啊!臣下我考察:舜除四凶,孔子诛少正卯。圣人之道至仁,那么他厌恶不仁的人也就更厉害了。至于整齐衰败的习俗,刑用重典,《酒诰》对群饮之罪,至于执拘斩杀,是因为惩戒酗酒滋事的人,是不得已的。仲尼对鲁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认为天道宜杀,不杀则草木犹犯。这是告诫人君要用严威。这种说法,出于法家,不合乎圣人"为政焉用杀"之意。后汉崔寔,鉴于元帝"行政太宽"之失,说文帝废除肉刑,其实是加重刑罚,这是靠严厉实现大治,不是靠宽大实现大治。这也是有特殊原因而说这番话的。只有唐太宗认为"赦为小人之幸",才是正确的。刑法不在于严,而在于信。一个有远见的英明政治家,决不肯违背正道而

沽名钓誉啊。何况“水懦民狎，火烈民畏”，立猛乃所以济宽；稂莠不去，嘉禾不生，驱凶是为了卫善呢！但是用宽，而至于失去常规，宽大无边，其害小；用严，而至于滋扰生事，错杀无辜，其害大。所以消患于未著，止恶于未萌，则保甲的稽查应该先行，而内外恶人也就无所容身了。察奸即以纵奸，缉盗即以窝盗，则吏兵的耳目作用就该小心对待，也应对人数过多引起警戒了。执法官吏，既有断案之明，又有至诚之心，就法行而无不畏惧了，所谓杀犯罪的人，用以制止其他人不再犯罪，就在于此。圣朝保护百姓，施布恩德，宣明刑罚以辅佐教化，由此把整个社会带入淳朴的境地，不是很好吗！

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因奋武卫，而谈到前代海防已有的方略。臣下我考察：历代各有兵制，而陆地士兵，教演有时，调遣有法。如汉代的南、北军，唐代的府兵、矿骑，宋代的更调，明代的团营，都是用来加重京师控制天下的地位，阻遏奸萌，尤其显著。至于海疆天险，和西北边陲，形势大不相同。当绥靖的时候，即使列屯相望，而士兵怕海洋风险难测，巡防皆属虚文；到守备的时候，沿线气候变化各有特点，而客兵困于技勇得不到施展，征调全无实用。稽考前代历史，内寇如东晋孙恩、卢循，元代的方国珍，外寇如明代倭患，虽均被歼除，而当时固已劳于谋议应付了。明太祖用方鸣谦的策略，沿海置所，到中叶废弛，又招来倭患，东南沿海，遭受骚扰。如今胡宗宪、戚继光诸人的筹划，朱纨、郑若曾、唐顺之诸人的议论，全都有助于实用。而《筹海图编》一书，尤其详尽。但是，海中沙险，水道时有更易，不是可以按图而索验的。懈怠兵将应被淘汰，侦探工作应该详明，器械应该精良，内奸应该断绝。这四项固然是昭示军实的常规大法，而决胜的关键对策也在这里了。国家对八方边际都予以宽容，用武的七德都信而有征，恩威延布到最远的地带。光天化日之下，都将梯山航海，前来进贡，献上归附的诚心，又何虑海上妖氛不扫除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讲学以培育人才，兴廉以评定官吏，诘奸以改善风俗，靖外以安定国家。点滴钻研经书的功夫下得多，官吏荒怠政务的讥刺不存在，乱打官司的风气止住了，战场扬威的气概显示出来。真盛大呀！仁圣之事全有了，帝王之道完备了。臣下我更伏愿皇

上，用“日新”的办法，进修自己的品德；用自强不息的精神，督促自己的行动。本着“持盈保泰”的初衷，达到“累洽重熙”的吉庆。学问深邃，而更求经典的深刻含义；臣僚肃正，而越发整饬官风；民俗已淳厚，越发重视防止越过界限的措施；海域已安宁，而常作御侮的准备。政治清明，如玉镜般光辉四射；国力强盛，披全绳控制一切，上迎鸿喜，下赐多福。全天下各地都来朝拜，奉行潜移默化的国政，为民立极。那么，我国家亿万年有道的长远国运，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不懂得忌讳，干冒皇上尊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乔岳译〕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殿试策问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昊苍眷命,列圣丕基,兢兢业业,夙夜不敢康,二十有四年于兹矣。顾臣邻尚少笃棐之忱,士子犹蹈轻浮之习。边圉之地,利未尽开;九府之圜,法未尽善。措施何以当?智虑何以周?斟酌古今,揆度时势,尔多士稽古有素,敷奏以言,必有嘉谟,用裨实政。

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然则欲正君臣,序官职,必自大臣始矣。亲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之贤否,视乎上官之取舍。古者兴廉举孝,敦崇节行,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两汉循吏,大抵郡守、令长,而公卿时出其中。玺书褒勉,增秩赐金,取才之道,意主风化,其尚有合于古欤?郭子仪减乐于杨绾,李师古折谋于杜黄裳,岂武臣疆帅,亦视朝廷为转移欤?抑中外相维,大小相系,自然之势欤?三物教民,何以克收实效?三载考绩,何以力屏具文?取人以身之义,可指陈欤?

士者,民之望,国之桢也。孔门论士,何以首重"行己有耻"?孟子亦言"耻之于人大矣"。然则知耻近勇,人心风俗所系,顾不重欤?三代以下,士风莫盛于汉。其时尊崇节义,敦厉名实,转移之权,奚自而致?清谈而后,绍及唐末,风气迭变。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繄岂乏人欤?宋儒聿兴,迄于明代,格物致知之学,与汉儒之

通经致用，其裨益风化，同欤？异欤？综观古今士风之所尚，质之孔孟之言，将欲挽隤靡，返淳朴，变化而愧厉之，何道之从欤？

自黄帝经土设井，而寓兵于农之法兴，三代因之，无所谓屯田也。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说。汉武通西域后，屯田渠犁。其后日益加多，如芍陂、南阳、合肥、成都、金城，不可枚举。其在西域者，能详考欤？古者播谷劝耕，爰有农官之设。农师、田畯之名，备见经传。西域屯官，名见于史者，能胪举欤？耕种必资灌溉。邓艾穿渠，最资利赖。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能征于古以言之欤？唐代营屯并称，或谓以兵民分，其说然欤？唐时诸道所开之屯，凡九百二十有二，今西域尚有遗迹欤？种植之法，详于农书。前代屯田，有行区田者，其法最善。能详考而言其制欤？

古者赋通百物，皆以布帛菽粟相交易。自大禹有历山之铸，而其利始兴；太公立九府之法，而其用遂广。《周官》外府、泉府所掌，皆以钱为敛散。能详言之欤？秦并天下，币为二等。汉武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是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银也。以银为币，始于何时？行于何地？其式若何？其直若何？采银何以有禁，用银何以称便？能一一缕述之欤？钱式以何代为最善？论钱法者以何人为最详？盖其用取乎流通。利溥于民，而权操于国；制行于上，而弊除于下。必如是而后可为至善也。宋始有"交子"、"钞行"之名；有元一代，率用宝钞；明亦间踵而行之，流弊滋多。其得失究安在欤？

凡此者：以勖官常而实力实心，毋谓恬熙为可恃；以敦士习而防情防伪，毋使幸进以梯荣。出作入息，边陲何以臻康阜之休？足国裕民，泉府何以有流通之利？讲肄所及，载籍所传，尔多士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道德还有不够的地方，不敢不自觉勉励。

认为这山不曾有过粗壮的树木，这哪里是山的本性呢？

学习一些世间的事情，却了解了天命。知道我的，恐怕只是那上天吧！〔金山译〕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继承皇天垂爱所付给的重任和列祖列宗的宏大基业，谨慎小心，日夜不敢安乐懈怠，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只是臣僚还缺乏忠诚辅助的真挚心情，读书人仍沿循着华而不实的习惯。边疆一带，地利没有能够全开发；掌握财币的国库，币制还没有十分完善。解决的办法怎样才合适？谋划上怎样就周到了？可思量思量古代和现今，揣度揣度当前的情形。你们众多贤士，考察研求往古史实，算起来到今天的时间也不短了。那么把言论所及陈奏上来，想必定会提出高明的经国谋略，来补益当前的政务。

像《礼记·礼运》所说的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吏的职位和谐有序，君臣真诚相待，国家就会兴盛起来。既然这样，那么，要做到君臣真诚相待，官职有序，便必须从大臣开始做起了。接近并爱抚民众的官员，没有能再比得上郡守、县令这些地方官的了。郡守、县令的贤良还是不贤良，全看上司的选择去取。古时候有选举孝子和廉洁之士为官的制度，都极重视当选人的节操品行。若每天上报，可能政绩显得不足；若按月统计上报，政绩也就超出规定了。西汉和东汉守法循理的官吏，大都是郡守和县长县令，朝廷中的三公、九卿，还时常出自他们当中。皇帝通过公布诏书对他嘉勉，升官增俸，颁给奖金。用来选取人才的办法，就在于显示道德规范的感化作用。那么这些措施，有跟古代相合的吗？唐朝郭子仪听说杨绾当宰相就减去了声乐，节度使李师古的图谋被宰相杜黄裳挫败，莫不是武将边帅的作风，也随着朝廷的态度而改变吗？还是朝廷跟地方相连、尊卑相随是当然的局势呢？像《周礼·大司徒》上所说的以“三物”，即用“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怎样才能收到实际的功效？每三年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的政绩，当用什么办法极力除去那些徒具形式而没有实际作用的空文？《中庸》上所说的“取人以身”的道理，能够指明陈述吗？

读书人是老百姓效法的榜样，也是国家的支柱。孔子的门下讨论士人，为什么首先注重“立身行事应知道羞耻”呢？孟子也说“羞耻对于人的关系可重大了”。既然如此，那么正是孔子所说的“知道耻辱就接近勇敢”。这跟人心风俗息息相关，难道还不重要吗？夏、商、周三代之后，士大夫的风气没有比汉朝再兴盛的了。那时尊重推崇节操和义行，勉励名誉和功业，改变的灵活对策是从哪里来的呢？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空谈玄理的风气，一直传到唐朝末年，风尚习俗交替变化。但是大寒之年，众木都枯死了，然后才知道松柏只有小小的凋伤；风雨凄凄，公鸡依然守时鸣叫。那么在逆境中决不改变节操的人，历来不是也很多吗？自宋儒兴起直到明代，“格物致知”之学，即“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的学问，跟汉代儒士主张“通经致用”，即“通晓经学，付之于实用”，这两者对风俗教化的补益，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总括观察古代和现今士大夫的风气，将他们所注重推崇的东西跟孔子、孟子的言论相验证，要想把颓靡衰退的士风扭转过来，再回到敦厚质朴，使士子们有所愧悔而振作奋发起来，须用什么办法呢？

自从上古轩辕黄帝划分田野的界限，设置井田，于是给农民一定的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参战的办法接着兴起来了。夏、商、周三代继续这样做，可是还不叫作“屯田”。到汉文帝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到边境地区垦殖荒地，才有“屯田”的说法。汉武帝开通了往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大路以后，便在渠犁屯田。往后去屯田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例如古淮河流域的芍陂，还有南阳、合肥、成都、金城、无法一个个列举。其中在西域屯田的地方，士子们能详细地考证出来吗？在古时候，播种谷物，鼓励农耕，于是设立了主管农业的官员，农师、田畯这些田官的名称都记载在儒家的典籍里。你们能将其中属于西域屯官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吗？耕种田地必须依靠灌溉。三国魏将邓艾伐蜀，屯田两淮，广开漕渠，成了当时最可凭借依靠的好办法。那么在西域的河水可以引来灌溉农田的，你们能就古代史书的记载加以验证并讲述出来吗？在唐代，营和屯经常合称作营屯。有人说，是营还是屯，须要用兵垦还是用民垦来区分。这个说法准确吗？唐代各道所开辟的屯田区，共计九百二十二处。现今在西域还有当

年屯、营的一些遗迹吗?种植的方法,详载于农书,前代屯田,有实行"区田"的,那方法极好,士子们能把它详加论证吗?

古时赋税用各种实物交纳,并用布、帛、豆、米进行物物交换。自从大禹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解除人们的困难,钱币的益处才传播开来。周朝姜尚定立九府圜法,钱币的用途于是就广泛了。《周礼》中的外府和泉府这两类职官都是对钱币进行发放与回笼。这方面的情况,士子们能详述一下吗?秦朝统一天下,把钱币合并为两等。汉武帝元狩四年,又用银锡铸造龙文、马文、龟文币,因而叫作白金三品,可是时间不久便宣布作废,停止流通了。这表明上下通行的钱币全是铜钱,不曾用银。那么银币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又在哪些地方流通?银币的式样如何?币面的价值怎样?为什么朝廷禁止采银?为什么说使用银币很方便?士子们能一项一项详细地讲出来吗?钱币的式样以哪一朝代的最好?钱法以谁论述得最为详尽?钱币的用途在于流通。对老百姓很方便,而制造钱币的大权归国家掌握;由朝廷订立制度,就把民间使用钱币的弊端消除了。必须这样,才可以说是最为完善的。到了宋代,开始有了纸币"交子"和钱庄"钞行"的名称。整整元朝一代,都使用叫做"宝钞"的纸币。明代也有时这样继续流通,相沿而成的弊病于是越来越多。你们说这里边的成败利弊,到底在哪里呢?

所有这些问题:为勉励官规而切实用力,并真心真意,休要说文恬武嬉可以依赖;为端正士风,严防弄虚作假,不得希图侥幸升官去攀援禄位。太阳升起就出门工作,太阳落山就回家休息,边地怎样可达到安乐富庶的美好境地?使国家富强,人民宽裕,储备钱财的府库,该怎样发挥其流通货币的作用?希望士子们就平日讲论肄习所涉及的,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所记载论述的,在答卷中详加论析,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孙毓溍　殿试对策

孙毓溍(生卒年不详)　字梧江,山东济宁人。道光二十四年

(1844)状元。曾协助总督林则徐解决西南民族纠纷。咸丰初,任山西按察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后被疏举操办本省团练,事必躬亲,积劳致疾,就医京邸,卒于寓所。

臣对:臣闻熙绩所以厘工,植品必先崇实,靖远斯能奋武,阜财乃可裕民。载稽往牒,《书》美和衷,《礼》详造士,《诗》歌诞穑,《传》纪通商。古帝王舆盖二仪,卢牟六合。以昭亮采,有守聿懋有猷;以砥廉隅,观器尤须观德;以谋储蓄,养民亦且养兵;以剂方圆,视规兼资视万。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符。用能宣化承流,茝怀笃焉;覃精葆素,令望彰焉;教稼整军,绥徕固焉;制节谨度,美利臻焉。所由治泳熙春,欢胪函夏,洋洋乎上畅垓而下溯埏,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敦明励翼,勖训誉髦,修军实以乂安,广陶镕以普济,固已吏治胥澄而儒风允粹,边防悉备而鼓铸咸兴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廑葑采而听卑,询刍言而察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正官常、祛浇俗、严屯卫、广生财诸大政。臣之愚昧,奚补高深?顾幸际渊思下逮之时,窃附拜献先资之义,敢不敬举生平所诵习者,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大臣法,小臣廉",守令、疆帅皆视朝廷为转移,而欲收效于教民、考绩。此诚致治之盛心也。臣谨按,体元者君,而调元者臣。左禹右皋,斯有明良之庆;左周右召,斯臻康乐之休。正君臣,序官职,始自大臣,彰彰然矣。汉以六条察二千石,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其法:郡课县,州课郡,公卿课群吏。守令贤否,视上官之取舍。故两汉循良辈出,以令仆出为郡守,入为三公;玺书褒勉,赠秩赐金者不可胜计。其时取才专重节行,意主风化,吏治蒸蒸,最为近古。夫中外相维,大小相系,自然之势也。唐中叶强藩跋扈,不秉中朝政令,惟李文饶最为河北畏服。此外如郭子仪减乐于杨绾,李师古折谋于杜黄裳,亦皆见称于时。然李之于杜,固因其畏服之深;若子仪则功冠唐室,其亦身先奉令者,盖尊宰相即以尊朝廷,殆与李愬之迎裴度,同一能知大体欤?由此观之,为大吏者苟能树以清介之型,明其去取之别,居中驭外,以尊率卑,则三物教民,可收实效;三载

考绩，岂涉具文？庶几联一德为股肱，而清和咸理；合外臣为指臂，而诚信交孚。取人以身之道得，国不于以肥欤？皇上澄叙官方，凡在大僚，敢不正身率属，而交赞乎郅隆也哉！

制策又以士为民望，首重有耻，因综古今士风所尚，而欲挽隤靡，以返淳朴。臣窃谓士为四民之首，欲整民风，先端士习。孔门论士，首重"行己有耻"。故孟子"四端"并举，管仲"四维"是称。良以"廉耻"固人心风俗所关也。古者士习之淳漓，恒视朝廷之作养。两汉兴廉举孝，崇实行而薄浮华。故为士者，品望重于乡间，谟猷光于史册，节行之士，史不绝书。洎乎典午，崇尚清谈，则荡轶名教者踵接。李唐时设科目，而驰骋文采者滋多。然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其敦行励品，是以训俗型方者，盖亦指不胜屈焉。自宋迄明，讲学日盛。或以"道问学"为宗，或以"尊德性"为本，其学不无同异。然观明儒韩乐吾教化乡闾，从游者以千数。其对县令曰："凡与侬居者，无讼牒烦公府。"令检之果然。则宋儒之学，其裨益风化，与汉儒通经致用，固有合之两美者矣。夫自厚而薄者，风俗相沿之渐；而由淳而浇者，人生习染之常。是以圣王在上，崇学校以隆教养之规，移郊遂以示愧厉之道。虑其鞶帨之徒绣也，而名不矜；范其跐弛之难羁也，而才不竞。盖使顽廉懦立，以斯返朴还淳，道必由此。我国家崇儒重道，学校如林，士可不敦行砥才，副作人之化哉！

制策又以黄帝经土设井，寓兵于农，而递及前代屯田足边之法。臣按古无所谓屯田也。汉文帝用晁错议，募民耕塞下。武帝通西域，踵行之，屯田渠犁，厥名始肇。其后轮台、车师、乌孙、伊循、伊吾、柳中，则皆西域屯田之处也。宜禾都尉、屯田校尉、戊己校尉、田禾将军，及唐之营田大使，则皆西域所置屯田之官也。至於灌田之水，如龙勒县氐置水入泽灌民田，敦煌郡冥安藉端水入冥泽溉民田，并见《汉书·地理志》。瞿萨旦那城东南有大河，国人用以灌田，见《唐西域记》。唐代营屯并举，有谓兵耕为屯、民耕为营者。然唐襄州营田亦调取邻州之兵，宋边州屯、营，不限兵、民，皆取给用。则营、屯固不尽以兵、民分矣。西域屯田，汉唐最多。其遗迹如吐鲁番之广安城，在元曰火州，在唐曰安乐，汉之柳中城也。又苦峪城断碑，有"大兴屯垦，

荷锸如云”之语，则亦唐代开屯之遗迹。其种植之法，以区田为最善。邓艾因屯田亢旱，曾于寿春行之，收获最丰。法始伊尹，可云尽善矣。我皇上申命疆臣，于新疆大兴屯政，裕边储而培生计，岂不懿哉！

制策又以大禹有历山之铸，太公立九府之法，因及夫历代钱币之设。臣按钱始太昊，尧铸历山，汤铸庄山，相沿不废。至九府圜法设，而外府掌赍赐，内府掌贸易，敛散之法备详。秦以黄金与钱为币，汉制三品，亦废不行。古固皆用钱也。币用金银，始于交广，见韩愈、元稹《奏状》。又张籍诗云：“蛮州市用银”，中唐时中国犹未用银也。汉时朱提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直千。《金史》旧例每铤五十两，直百贯。因民间截凿，改铸“承安宝货”，一两至五两，凡五等，每两折钱二贯，是其式与直不同者。正统中罢银课，杜采办之扰民。洪武时以钱钞易金银，因道路之险远，此采银有禁、用银至便欤？钱法以五铢开元为善。五铢铸迄汉、隋，开元始自武德，故钱最多。论之详者，则《泉谱》、《钱通》，皆邦计所必录也。交子、钞引，创始于宋，元、明踵行，益滋流弊。其中考证得失，惟许衡、刘基，允为至当。十妙、十便之说，固皆无以过之也。

若此者：懋绩以亮工，屏浮以惇俗，积储以经武，裕课以宜民。铺鸿庥，信景铄，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至诚无息，立政有恒。夙夜寅清，而正色益端表率；章逢朴遨，而宅衷弥汰华闻。祥谷铺芬而厉锻刍粻，均安远徼；洪钧跃冶而绠环刀布，利济寰区。由是吏道靖共，士林炳蔚，边陲绥谧，帑藏充盈。上以祗迓蕃厘，下以永膺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振兴政事，用以治理百官；培植优良人品，首先必须崇尚朴实。安定远方，才能显示朝廷威势；厚积财物，就可以使老百姓生活富足。查考古代的典籍，《书经》赞美众官员同心协力，《礼记》细论培育学业有成的士子，《诗经》歌颂后稷种庄稼的好办法，《左传》谈到通商贸易。古代帝王用天为车盖、用地为乘坐的车子，把整个广漠无边的宇宙作为规模。为了显扬臣下辅佐政事的能

力，要求他们既有操守，又富有智谋；为了磨炼读书人的志节，既观察他们的才能，更注意观察他们的品德。谋划储积财富的方法，既养育人民又养护军队；去调节钱币，既能制定准则，同时又会随宜变通。这都是本着日夜勤勉地处理国家大事的诚意诚心，把握天意与人事相互感应的效验，以至能够奉命从事，传布恩德，一片真诚；加深研求，不失准则，美好的声望使人景仰；教民耕种，整顿军备，安抚招致，稳定和睦；强化国家财政制度，丰富的利益就全收到了。于是出现一片明媚如春的大治景象，欢快的歌声回旋在华夏广阔的大地上。如此兴盛祥和充满宇宙的气氛便是靠上述的措施得来的。

敬思皇帝陛下，真诚希望大臣们尽心辅佐，奖勉有名望的英杰才士；整修军械，充实粮饷来安定局势；大量铸造钱币发行，普遍救助老弱。因此官吏的作风和治迹已经更加清正廉明，读书人的风气也的确达到纯美，边疆的防务已经十分完备，铸钱的事务统统兴盛起来了。可是皇上的心意谦退，并急于访求，听取士子们的一般见解，从一些浅近的言论中，察看当前的世情。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朝廷，参加殿试。皇上亲自出面，策问“端正官规”、“除掉浮薄世风”、“加固驻兵防卫”、“扩充增加财富”等国家政务。臣下我既愚钝又不明事理，对皇上的博大精深，哪会有什么补益？只是有幸正逢皇上的深思熟虑宣达到下面的机会，私下依从进见帝王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古义，敢不把平日学习记诵的狭隘见闻写出呈上，以表述自己的短浅认识，献上一点儿忠心吗？

拜读制策，指出“大臣持法守法，克尽臣道；小臣以清廉约束自己，不违背职守”，郡县的长官和边疆将帅全随着朝廷的旨意来决定其一举一动，希望在“教育平民百姓”和“考核官吏成绩上”大见成效。这正是要使国家安定清平的深情至意。臣下我仔细考察，体悟天与人、人与物的原始关系，这是君主的事情。至于调和天与人、人与物原始的关系，必然是臣属们的职责。大舜有禹和皋陶辅佐，才得庆君贤臣忠；周成王时有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方能使国家安康和乐。这样看来，明确君臣的职位，序列官秩的尊卑，统统要从大臣做起，已经是十分明显了。汉朝的制度，刺史颁行天子的六条诏书，

可用来考察郡守；丞相和御史大夫能对郡和王国的长官共同进行审查。具体规定是:郡去考核县,州去考核郡,公卿去考核众百官。太守县令贤良或不贤良,就以上司的取舍为转移了。从而在西汉和东汉,循理守法的官吏一批批地连续出现。还将尚书令、仆射等朝臣派出去当郡守,然后再调回朝廷任太尉、司徒或司空等要职。地方官受到朝廷用加印文书给予褒奖勉励以及加官赐金的都为数不少。那时取才专讲节操品行,重视风气教化,从而官吏的作风政绩纯一宽厚,最接近古代的景象了。至于朝廷内外相连，尊卑相依，则是当然的情势。唐朝中期,拥兵肆虐的藩镇骄横强暴,不接受朝廷发布的政策和法令，独断专行。只有德宗时的大臣李德裕最为河北藩镇所惧怕敬服。除此之外,像郭子仪听说杨绾当宰相而减去声乐,节度使李师古的图谋被宰相杜黄裳所挫败，都让当时的人称赞不置。但李师古对杜黄裳,固然由于他平日就极为敬畏折服;而功盖唐朝的郭子仪肯率先遵奉教令，是因为深知尊重宰相便是尊重朝廷。这大概跟唐德宗时节度使李愬迎接宰相裴度入蔡州军中慰抚将士，同样能认识大局的道理吧! 从这里看,做大臣的若能树立清正耿直的楷模,划清哪些人应该摒弃和哪些人应该保留的界限，虽身居朝廷而能统率着地方官民,位分高的能带领位分低的,那么,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事”教导万民的办法定能收到实际效果;而按规定标准三年考核一次官吏成绩的制度,难道还会成为徒具形式的空文吗?这样或许可以联合大家同心同德,做辅佐朝廷的左膀右臂,从而出现一片清静和谐的大治气象,又可会集一批拱卫王室的地方大臣做助力,诚心诚意,彼此信任。要选取执政的人,选取者自身要有修养。果真这样,国家还能不从而富强壮大起来吗? 皇上清理整饬为官之道，所有任职的大官，还能不端正自身，并率领下属一齐来有助于国家的昌盛和兴隆吗?

制策又鉴于读书人是老百姓效法的榜样，这些人首先要具有对自己或别人的坏处感到耻辱厌恶的心思。于是综合古代和现今士大夫所重视的各个方面,想要扭转颓废奢侈的恶习,再回到质朴上来。臣下我认为,读书的士人从来居于“士农工商”四民的首位。要想整

饬民间的习尚,必须首先端正读书人的风气。孔子的门下讨论士人,首先注重"立身行事知道羞耻"。所以孟子把"四端",即"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观念的开端同时举出。管仲称礼、义、廉、耻,是立国的四纲。确实因为廉洁和对坏行为知道耻辱厌恶,本来就跟人的心地和风气习俗息息相关的啊!古代读书人习俗的淳厚或浇薄,经常要看朝廷对他们培养教育得怎样。西汉和东汉举荐有节操的廉士和孝敬父母的人,都注重实际行动而轻视虚浮不实,从而读书人的品行声望在家乡被人推重,他们的谋略在史册上闪闪发光。有高尚节操德行的读书人,史册上不断出现他们的名字。到了晋朝,讲究重视空说玄理的所谓"清谈",于是超越和抛弃名教的人越来越多。唐朝开科取士,舞文弄墨追求文采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有修养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节操,如同在寒冷的冬天,众木枯死,然后才知道松柏后凋的特点;尽管风雨交加,公鸡依然准时鸣叫。那些修养道德,磨砺品行,又这样端正地方风俗的读书人实在太多了。从宋朝到明朝,公开讲述自己学术、理论观点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有的以"道问学",即"通过学习来培养善性"为主;有的以"尊德性",即"尊崇天赋的善性"为主。他们的学说不是没有差异。然而看看明朝学者韩贞教育感化乡亲们,随从学习的有几千人。韩贞对县令说:"只要是同我相处的人,没有一个人到过公堂打官司的。"县令加以查验,果真这样。那么宋代学者的学说理论对道德规范的帮助,跟汉代学者主张通晓经学为了付之于实用,本来就有两者互相配合、其作用就更可显示出来的效果。关于风俗从敦厚沦为浇薄,是逐渐沿袭下来的;从纯朴变为刻薄,又为世习的常态。因此,在上的有道明君莫不重视学校工作,以充实教育培养的法度;对不见长进的士子,就迁移他们到离国都较远的郊遂那里去学习,来贯彻执行使之有所羞愧而自励的学规,免得他们只会雕饰华丽的辞采,而品行名声不够端谨;纠正他们放荡不羁难以约束及才力不强的弱点。大概想让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能够自立。要达到返回淳朴本真的状态,必须采取这种办法。当今朝廷崇尚儒家,尊重儒家所传的道,到处设立学校,那么学子们可以不砥砺品德,磨练才干,以合乎造就人才的教育目的吗?

制策又从轩辕黄帝划分田野的界限，开设井田，给农民一定的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出征，顺次谈到前代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的办法，即“屯田”，来加强过防力量。臣下我认为古时并没有什么“屯田”。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征集人民到边境地区耕种。汉武帝开辟通往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即所谓西域的道路后，连续这样做。在渠犁依照实行，才开始有了“屯田”的名称。以后轮台、车师、乌孙、伊循、伊吾、柳中，就都是在西域屯田的地方。宜禾都尉、屯田校尉、戊己校尉、田禾将军，加上唐朝的营田大使，便全是设在西域主管屯田的官员。至于灌溉田地的河水，例如龙勒县的氐置水流入泽中灌溉民田，敦煌郡冥安的藉端水流入冥泽灌溉民田，都见于《汉书·地理志》。瞿萨旦那城东南有条大河，当地人用来灌田，载在《大唐西域记》一书里。唐代营屯同时举办，有的人说兵耕的叫做屯、民耕的叫做营。可是唐代襄州营田也调用邻近各州的兵；宋代边境各州的屯、营，没有兵和民的限制，都以满足供应为目的。这样看来，那么营和屯本来就不全是用兵和民来区分的。在西域的屯田，以汉代唐代最多，现存的遗迹例如吐鲁番的广安城，在元代名叫火州，在唐代叫安乐，也就是汉代的柳中城。又如苦峪城的一块断碑上，有“大兴屯垦，荷锸如云”的话，就又是唐代开屯的遗迹了。那种植的方法，要以“区田”最好。三国时魏镇西将军邓艾为了屯田抗旱，曾经在寿春广开漕渠，实行过区田法，收获最丰盈。此法据称以商汤的大臣伊尹开始实行，可以说最见成效。我皇上命令守卫边疆的大臣在新疆大规模地推行屯田措施，用来充裕边疆储备并开发生活门路，这办法确实太好了！

制策又因夏禹在历山铸币以及姜太公设立九府掌管财币流通的制度，进而谈到历代的钱币制度。臣下我认为钱币始自古皇太昊帝伏羲氏，以后唐尧、商汤先后在历山和庄山铸造钱币，递相沿袭，流传不止。到周朝设立九府圜法，由外府掌管赠送赏赐，内府掌管交易，国家对钱币发放和回笼的方法，从此既完备又详尽了。秦朝用黄金和铜钱为货币，汉朝用银、锡铸造龙文、马文、龟文三种货币，后来也作废，不再通行了。古代原来都使用钱币；以金银为钱币，是在交州、

广州开始的，唐朝韩愈和元稹的《奏状》上就有记载。唐代张籍诗中还写道:“蛮州市用银。”说明在中唐时中国还没有使用银币。汉代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他银值千钱。《金史》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值百贯，一贯为一千钱。由于民间有人截凿，就把它改铸为“承天宝货”，从一两到五两，共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于是钱的式样和价值就不只一种了。明英宗正统年间停止征收银税，以禁绝由朝廷派下来的采办人员侵扰百姓。明太祖洪武年间把金银币改为钱钞，出自道路遥远。这恐怕是禁止采银和用钱最为方便的办法吧?就钱币制度来说，要以五铢钱和开元钱为最好。五铢钱的铸造一直延续到汉代和隋代;开元钱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就开始了，所以铸的钱币最多。详细讨论钱币的著作有《泉谱》和《钱通》。这些资料便是为了全面规划财政大计的需要而必须存录的。纸币“交子”和证券“钞引”由宋代首创，元、明两代继续仿照通行，从而产生了不少弊端。其中考证得失的，只有许衡、刘基二人的评论极为恰当。前人有关“十妙、十便”之类的说法，固然都不会有谁能超过他们的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群臣建功立业，弘扬上天交给的任务；除去浮夸，敦厚风俗；广储粮草，整修军备；国库充盈，便利民众。播扬洪福，十分盛美；圣明仁德的事体，圆满周全；帝王普济天下的措施和成效，应有尽有了。臣下我更愿皇上永怀极其真挚诚恳的心意，把立政的方法措施坚持到底。早起晚睡，言行敬谨，持心清正，而态度严肃，进一步树立完美的榜样。读书的士子们谦谨朴素，心悦诚服，更加去浮崇实。奇异吉祥的禾稻散出芳香，从而秣马厉兵，全都协和了遥远的边境；国家大量冶铸钱币，恩泽遍及天下。由此为政之道静肃恭谨，士子们文采华耀，边疆安稳和睦，国库充实富足，上则敬迎洪福，下可永享吉庆。那么我国亿万年兴盛发展的大计就建立在这上面了。臣下我学识浅陋新进身，不知道什么避忌，冒犯皇上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周学浚　殿试对策

周学浚(生卒年不详)　字缦云,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厘工者熙绩之资,植品者作人之要,裕饷者安边之务,理财者足国之经。载稽往籍,六计掌于《周官》,四术崇于《戴记》,九赋定于《禹贡》,三倍筮于羲爻。自古帝王萝图席瑞,松栋凝厘。以肃班联,则翼为效职;以修胶序,则孝秀兴贤;以实军储,则饱腾乐业;以通市易,则平准成书。由是堂廉日赞而庆洽赓飏,郊遂风移而化神鼓舞,疆隅露积而俗懋殷繁,阛阓泉流而利臻解阜。宏纲懿矩,靡不灿陈。所为治炳登咸,宇跻仁寿,上畅垓而下溯埏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亮采勤咨,甄陶在宥,扩井疆于衍沃,权法象于方圜。固已簠簋明忱而圭璋砥行,耰锄遍德而货贝厚生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念葑菲之兼资,询刍荛而下逮。进臣等于廷,而策以饬官常、敦士习、广屯卫、阜财求诸大政。臣赋质庸愚,曷知体要?顾当敷奏以言之日,敬竭涓埃自效之衷,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以比管窥蠡测之一得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而备及夫取人以身之义。此诚澄叙官方之至意也。臣案《书·周官》篇自三公论道,因而六卿分职,九牧阜民,吏治之隆,洵自大臣始。亲民莫如守令,而守令之贤否,视乎上官之取舍。汉制以守课令,下而统于刺史,上而统于御史、丞相,其责仍在大臣也。古者兴廉举孝,敦崇节行,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两汉循吏,不过郡守、令长,而公卿时出其中。当时如钟离意、桓荣、胡广、第五伦、桓虞、鲍昱诸人,或出由令仆,或入为三公。班固书谓孝宣尤重守相,有治效者玺书褒勉,增秩赐金。天下不过数十郡国,而二千石之行能皆获简于帝心。是以吏职修而民情达,取才之道最合于古。唐杨绾为相,质性贞廉。郭子仪在邠州行营,座中声乐减散五分之四。杜黄裳为相,李师古跋扈,惮之,

遣吏寄钱数千缗,使者到门,见其俭素,归告师古,遂折其谋。武臣疆帅,视朝廷为转移。中外相维,大小相系,则大臣者,非诚为百揆之仪型也哉!皇上训饬群工,二三大臣咸整躬率属,赞襄郅治,而国以肥矣。

制策又以"士者民之望,国之桢",而因综论士习之殊,以期挽颓靡而返淳朴。臣案管子有言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者,其原皆生于无耻。故孔门论士,首重"行己有耻"。孟子亦言"耻之于人大矣。"然则知耻近勇,人心风俗所关,非浅鲜也。三代以下,士风莫盛于汉。顾西京之世,自孝武表章六经,而后师儒虽盛,大义未明。光武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世风为之一变。转移之权,实在于此。正始风流,盛于洛下。厥后竞相祖述,习为清谈。善乎《晋书·儒林传序》曰:"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足以抉其弊矣。沿及唐末,士气益靡。独《颜氏家训》教子数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繄其人也。宋儒聿兴,迄于明代,格物致知之学,与汉儒之通经致用,其裨益风化从同。夫变化愧厉之方,莫急于劝学、将廉二事。使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而士风自丕振矣。圣世同伦播化,学校如林,多士济济,敢不修实行以副盛治哉!

制策又以黄帝"经土设井、寓兵于农"之法兴,三代相因,而因及夫后世屯田之制。臣案古无所谓屯田也。汉文帝用晁错议,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说。武帝通西域,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郑吉为都护,徙屯田田于北胥鞬。元凤中因尉屠耆之请,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皆其在西域者。屯田官名,如崔不意为渔泽尉,教民力田效谷,因以名县。农都尉治番和,宜禾都尉治广至,屯田校尉属都护,皆见于史者也。耕种必资灌溉。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班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其彰彰者。唐兴,始置营田,屯以民,与屯田异。宋至祥符,犹营、屯异制。后襄州营田调取邻州兵,而营不独民。后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而屯不独兵矣。唐

时诸道所开之屯，凡九百有奇。在西域者，今苦峪城断碑有“大兴屯垦，荷锸如云”之语，尚其遗迹。区田即代田，汉赵过教于居延，邓艾行于寿春，所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其法最善矣。圣朝开辟新疆，聿修屯政，寓边防于井牧，洵万世永赖之规也。

制策又以古者货通百物，自大禹历山之铸，太公九府之法，而钱始通行，因详论古今钱法。臣案《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而外府掌赍赐，内府掌贸易，以泉散敛，为法綦详。《汉书·食货志》：秦并天下，币为二等。孝武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是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通典》：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唐韩愈《奏状》亦言之。此币用金银之始也。《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后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而《旧唐书》亦有“出内库方圆银”之文。是知式有大小，而直有低昂矣。唐元和三年，诏以为银无益于生人，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明正统八年，从黄福、胡濙等请，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钱式莫善于开元，论钱法莫详于贾谊“七福”。“交子”、“钞引”之名始于宋。有元一代，率用宝钞。明亦间用钞法。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而昏烂倒换，易滋流弊。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耳！国家宝泉、宝源二局，法臻详尽，利普流通，诚汉唐所未有也。

若此者：考询以底绩，乐育以成材，开垦以充储，陶镕以利用，廓帝纮，信景铄，仁圣之事赅，唐虞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圣敬日跻，聪明时宪。笃棐已昭，而犹严黜陟；廉隅已厉，而弥切薰陶；牧养已宏，而愈勤劝相；修和已布，而益谨度支。羹醴之材备焉，章缝之庆均焉，糗粮之峙盈焉，铢两之权协焉。玉衡正，泰阶平，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帝者之上仪。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对百官治理得当，是振兴政事的依靠；敦品励行，则为培育人才的要点；军饷充足，是安定边疆的前提；管理

好财物，则为富国利民的常道。考察研究往昔典籍，古代怎样论定官吏的六项标准，都详细地记载在《周礼·天官·小宰》篇里。儒家以诗、书、礼、乐这“四术”教育士子，极为《礼记》一书所尊崇。各地交纳的九等赋税，在《尚书·禹贡》篇里有明确的规定。“利市三倍”则见于《易经·说卦》篇。自古以来的帝王罗列图籍，布满祥瑞，在高大华美的屋宇内积聚福庆。来对朝廷里的官员加以儆戒，便都能辅政尽职；来对学校进行扩充整顿，优秀的学子们就都能被荐举选拔上来；来充实粮秣等军需物资，便士饱马腾，百姓也安居乐业；来发展贸易，就极力平抑物价，如《史记·平准书》那样。由此朝廷上大臣们日益辅助国政，吉庆和协的气氛中连续飘扬着君臣欢乐的歌声；通过学校奖惩制度而风尚发生神妙的潜移默化，学子们人人欢欣鼓舞。边疆粮棉丰收，习尚勤勉，生活富足；货币在民间充盈畅通，利处达到物资充分交流的程度。盛大的纲领和美好的道德规范，全都光彩绚丽地公布于世。政绩超过五帝三王，整个天下共同进入仁德而长寿的境地，往上顺畅九重天，往下扩展到八方大地的边际，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经常向辅佐政事的大臣商谈国事，培养造就人才，施行仁政；在平坦肥美的土地上开拓良田的疆界，在货币制度上进行称量比较。臣属们已能廉洁自守，修养道德；粮棉普庆丰收，财货充盈，人民都生活富足了。可是皇上心意谦退，连极细微处也不肯放过，想到浅薄鄙陋的人还有一得可取之处可以参取，于是便深入下层访询。特将臣下我等召进朝廷，用整顿官规、笃实学风、扩展屯垦守卫、增加财货等重大政事进行策问。臣下我天赋资质平庸愚昧，对纲要大体知道的太少，但正当向君主陈奏进言的时候，理应献上能力再小也要全都自觉地拿出来的一片忠心，哪敢不尽力陈述往常在诵读学习中的体会，权当短浅狭小的个人的一点儿心得呢？

拜读制策，上面说：“大臣持守法度，克尽臣道，小臣以清廉约束自己，不违背职守，官吏的位置和谐有序，君臣真诚相待”，进而指出《中庸》“取人以身”之道。这真是皇上决心清理整饬为官之道的深远用心啊！臣下考察《书经·周官》篇讲的是周朝设官分职用人的方法，

从太师、太傅、太保这“三师”要辅佐君王研求治国的政令，讲到“六卿”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有具体职掌。从“六卿”又讲到“九牧”，即九州长官管理百姓，表明想要官吏的作风和政绩显赫起来，实在应该从大臣开始。官吏中最接近百姓的，顶数郡守和县令了。而他们贤良不贤良，又以上司的取舍为转移。汉制规定的郡守考核县令，地方官都归部刺史统领，朝廷官都归御史大夫、丞相统领，这就表明责任终归还在大臣那里呀！古代推举有节操的廉士，选举孝悌的君子，崇尚节操品行。这些人做官后，每天上报政绩，会显得不足，但到月终上报政绩，就绰绰有余了。西汉和东汉守法循理的官吏大都是郡守和县令或县长。可是朝廷上的三公九卿这样的高官却常出自郡守县令之中。当时像钟离意、桓荣、胡广、第五伦、桓虞、鲍昱等人，有的为尚书令或仆射，派到地方上任职，调进朝廷就成为三公。班固在他著的《汉书》里写道：汉宣帝最重视太守和国相，有政绩的，用泥封加印文书予以赞扬勉励，加官颁奖。当时天下不过几十个郡国，而郡守们的品行和才能都为皇帝所肯定。因此官吏的职责都得到履行，能及时了解百姓的心情愿望，那时朝廷用人取才的办法最符合上世的情况。杨绾在唐代宗时为宰相，本性正直廉洁，郭子仪在邠州驻地的军营中因而裁减声乐五分之四；唐宪宗时，杜黄裳为相，李师古强暴骄横，但惧怕杜黄裳，派部下送去数千缗钱，他们到了黄家，亲眼看到宰相家的俭素情况，回营告诉了李师古，就把他原来的阴谋摧折了。武将边帅依据朝廷态度来转移，朝廷和地方相连，大小职位都相互制约，那么作大臣的难道不是百官的真正楷模吗？皇上戒勉群臣，二三大臣都本身端庄并带领下属，协助大治，那么国家就兴盛壮大起来了。

制策又鉴于“读书人是老百姓效法的榜样，又是国家的支柱”，从而综合论及读书人风气的差异，希望扭转颓风，再回到朴实淳厚上来。臣下我做考察，齐相管仲说过：“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规范是治理国家的四纲。”四者之中，知耻更为重要。凡是人们中不讲廉耻以至于违背礼法道义的，其根源都在于不知羞耻。所以孔夫子的门下以及历代儒家论及士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立身行事知道羞耻”。

孟子也说:“羞耻对于人,关系可重大了。”既然这样,那么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跟人心风俗息息相关,绝不是轻微的事情。夏、商、周三代以下,读书人的风气以汉朝最为盛美。不过在西汉,从汉武帝显扬“六经”,此后教官、学官虽然很多,可是对要旨还缺少了解。东汉光武帝崇敬节操与义行,勉励名誉和事功,所选用的都是经学广博、德行善美的人,从而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转变的关键确实就在这里。魏晋玄谈析理、放荡不羁的所谓名士风流,盛行于京都洛阳城。从那以后,互相争着仿效,养成崇尚老庄、空讲玄理的清谈习气。《晋书·儒林传序》中描述得很好:“指斥礼仪法度是不足取的世风末俗,而认为放纵不羁、荒诞虚妄是纯洁高尚的名士风流。”这充分揭示出所谓“正始风流”的弊端了。顺着传到唐朝末年,士大夫的风气越发衰弱不振,惟有北齐颜之推在他著的《颜氏家训》一书里教育儿子的几句话,还有跟《诗经·小雅·小宛》一诗作者用意相同的地方。严冷的冬天,众木都枯死了,然后才知道松柏只有小小的凋伤;风雨凄凄,公鸡依然守时鸣叫,就惟有像那样的人啊!宋朝的理学家兴起,直到明朝,“格物致知”之学即“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的学问,跟汉代儒家主张“通经致用”即“通晓经学付之于实用”,这两者对风俗教化的补益相同。至于使人变化、羞愧自勉的好办法,没有再比勉励学问和赞美廉洁这两件事更急切的了。致使人们在生前享有效法古代的荣誉,死后又仰赖留下清正的光泽,而读书人的风气就自然得到极力的振扬了。圣代同一道德标准,播布教化,学校林立,人才众多,哪里敢不修养德行来跟兴盛的时代相符合呢?

制策又因轩辕黄帝划分田野的界限,开凿井田,并给农民一定的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参战的办法接着兴起来了,夏、商、周三代继续这样做,又从而谈到后世“屯田”的制度。臣下我考察上古时还没有“屯田”的说法,到了西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广泛征集农民到边塞附近耕种土地,“屯田”就开始了。汉武帝开通了往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大路以后,而轮台、渠犁都有数百名屯田戍边的士兵。当时郑吉为西域都护,迁到北胥鞬屯田。西汉昭帝元凤中,根据尉屠耆的请求,派司马一人、官兵四十人到伊循屯田,这都是在西域屯田的

地方。屯田官名如崔不意任渔泽尉，教导农民努力耕田，以勤劳得谷，因而立为县名。农都尉治番和，宜禾都尉治广至，屯田校尉隶属都护，这些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在边地耕种田地必须依靠灌溉。西域的河水可以引导灌溉田地的，《汉书·地理志》里指出："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这都是最明显的事例。唐朝兴起以后，才设置营田，都用农民去屯殖荒地，而跟军队在驻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屯田"不同。宋朝直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还屯田以兵，营田以民，营与屯的制度有所不同。以后襄州营田调取邻州士兵，从而营田中不只是农民了。后来营田和屯田不再划分士兵或农民，一律都以满足需用为目的，而屯田的人也不单单是士兵了。唐代各道所开的屯田区共有九百多所，在西域的，像现今苦峪城的一块断碑上有"大兴屯垦，荷锸如云"的话，还是那时的遗迹呢。区田就是代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教民于居延，三国魏邓艾在两淮寿春一带推行，其作物的每亩收成经常超过不作垄沟耕作的缦田十斗以上，那种方法极好。本朝开辟新疆，整顿好屯田措施，在以井田耕作、牧地畜牧的井牧法中，寄托保卫国家安全的边疆防务工作，这的确是永远可以依靠的法规。

制策又鉴于古代交易只是物物交换，自夏禹在历山铸币，姜太公设立九府官员来掌管财币的制度以后，钱币就开始通行，因而详论关于古今钱币的法规。臣下我考察，《周礼·太宰》篇说："国家以九类赋税收聚财物。"汉代郑玄的注解说："财，指钱币、谷物。"又说："赋，指每户成员都要交纳钱币。"而负责国内财货出纳的"外府"主管赏赐，负责王室库藏的"内府"主管买卖交易，都用钱币支付或收取，条例办法都有详明规定。《汉书·食货志》记载着秦朝把天下的钱币合并为两等。汉武帝又造龙文币、马文币、龟文币，叫作"白金三品"，但使用时间不久，就宣布作废，停止流通了。这说明上下通行的一律用钱币。唐杜佑在他著的《通典》中指出：南朝萧梁初年，交州、广州境内全都使用金银作为钱币。唐韩愈在《奏状》中也谈到了这种情况。这便是货币用金银的开端。《金史·食货志》中记载着：按旧例银币每锭五十两，值一百贯。当发现银锭在民间有被截凿的，便改铸银币

名为“承安宝货”，从每锭一两到每锭十两，共分五等，每两合钱二贯。《旧唐书》中也有“出内库方圆银”的记载，说明其式样有大有小，币值也有低有高的了。唐宪宗元和三年发布命令，认为银对于民众并没有什么益处，要把现今所有的采银坑一律填平，禁止开采。明英宗正统年间依从黄福、胡濙等人的奏请，命令江南租税折收金、银、丝绸，远方和近处都认为方便。可是从那以后，米粮仓库的储存量就减少了。钱币的式样没有比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那种再好的了。关于钱币的制度，没有超过汉朝贾谊《七福疏》所论述的了。纸币“交子”和证券“钞引”始自宋朝。元朝一代大都使用宝钞。明朝也有时候采用纸币发行制度。但是宋朝人早已议论到了，认为没有金钱作基础，也不能以一张废纸施行。同时纸币模糊破损和来回倒手，极容易产生相沿而成的各种弊端。希望后来主持财政的官员，注意不要谈这个问题好了。我们国家设有宝泉局和宝源局，所制订的法规，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实行起来利益普遍流通，实为汉唐两代所没有的。

像以上这些问题：考查征询来取得成绩，教育培养来造就人才，开辟荒地来充实储备，铸造钱币来便利使用。扩展帝王治国的纲纪，拓宽兴盛的局面，这真是仁德圣明的事体已十全十美，唐尧虞舜的政治体系应有尽有了。臣下我更希望皇上一天天地达到圣明端肃，跟上天一样聪明。大臣忠诚辅助，都光明显著，可仍须严加考核，有升有降，奖罚公允。读书人的操守虽然经过磨炼，仍应进一步薰染陶冶。垦田养民的事业已很宏大，更辛勤地去勉励百姓。六府三事已经施布，越发周密计划财政开支。这样，充当重要助手的官员应有尽有了，读圣贤书的儒者都感到庆幸了，米面干粮储备充足了，货币的铸造发行协调一致了。北斗星正，太阶星平，天下安谧，广阔昊天的重要原则，帝王的最高榜样，是多么地伟大啊！我国的亿万年政治清明，就以此为转移了。臣下我学识浅陋新进身，不知避忌，冒犯皇上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冯培元　会试卷二道

冯培元(生卒年不详)　字小亭,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探花。后任湖北学政、侍讲学士、光禄寺卿。工画梅,得金农、杭世骏遗意。其幼孤,家贫,母何氏贤明苦节,抚之成立。太平军攻入武昌,遂死之。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以庸德自勉,不见其不足矣。夫不足而不勉,则终安于不足矣。惟不敢不勉焉,其全庸德也为何如!且诣力所臻之境,固贵乎安而行也,而尤贵乎勉而赴。盖不倚不偏者,斯道有一成之矩矱;而愈难愈奋者,吾人无妄用之持循。力所未至而心迫焉,心所未能而愿坚焉。其激励于躬修间者,实兢凛于方寸中尔。如子臣弟友,君子之庸德既有所行矣。

今夫德之所全在能行,而行之惟艰在能勉。必待操持失据,始从后而勉为之企,则其势已隳。惟行之先无所宽,彝伦无虞其攸敉;行之后无所肆,人纪可必其肇修。一息也而毕生统之,斯在己之率由有准也。必待陨越堪虞,始遇事而勉与之防,则其机已窒。惟始则所行不负,身世间别具谟猷;继则所行不亏,名教中自多乐地。平易也而艰难赴之,斯当躬之刻挚已深也。如是则庸德安有不足者,然而行焉者有所勉焉矣。

世尝有谨小慎微之士,廉隅砥砺,非不密致其妥修。究之志与愿违,忠孝有难言之隐;事为情迫,友恭多负疚之忧。此以知时势所穷,虽贤哲不能守乎故辙也。无所不足者瘖寐之思,而或有不足者隐微之憾。事愈难而心愈小,将此身有何驻足之时。世非无整纲饬纪之儒,伦物修明,或虑未安乎天性。究之在家无殊在国,君与亲义可兼赅;同气不异同心,弟与友谊能交笃。此以知肫诚所矢,在吾党要自循其素履也。无乎不足者黾皇之意,而偶有不足者迫切之忱。功弥慊

而力弥精，将毕世安有息肩之地。然后知不敢不勉者，非真有不足也。夫人生践履之功，有循序以求，无躐等而进。乃孜孜于庸德之内，一事一物，深造而冀其克全；至中至庸，默体而求其曲赴。是有所不足者，正其勉焉之心所激而形焉者也。竭蹶不遑之念，返躬其何日宽哉！然后知不敢不勉者，常若有不足也。夫学问无穷之蕴，自满者多所阻，自抑者无所亏。惟兢兢于庸德之中，志愿易荒，勤百倍之功而犹歉；程途难跋，矢兼人之量而非夸。是不敢不勉者，又其不足者之心所并而注焉者也。悚惶无已之修，此理何难共信哉！更观言之有余，君子之自励者益加密矣。

用一般的道德标准来勉励自己，发现不出有什么不够的地方。如果做得不够又不知道勉励自己，就必定对这种不够的状态无动于衷，并安心于这种状态了。只有对这种不足不敢不自加勉励充实，那么对于一般道德的完美体现，才会另有一番景象。而且有一定造诣的人，其学力才力所达到的境界，固然贵在心安履行，但更为可贵的在于能够竭力去做。适得其中而不偏向任何一边，正是中庸之道具有不可变更的规矩和法度；而越遇到困难就越加振奋，说明我们从来不随便遵循。所用的力量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想达到的心情愿望已经非常迫切了。心里想的纵然一时不可能实行，但决心要去做的志向应当极其坚定。而激发鼓励着自己必须亲身实行的，正是心中所敬慎畏惧的呢！如果做儿子的能孝敬，做臣下的能忠诚，做弟弟的能顺从兄长，做朋友的能守信用，那么便可以说才德出众的人都能履行一般道德的要求了。

现在说完美的德行就在于能亲身去做，做起来最艰苦的地方在于能够勉励自己。一定要等到操守失去依傍，才开始想以后努力赶上，但因形势已有变化，不可能了。必须在实行以前严加要求，常理常道就用不着担心被废弃。实行之后仍不放松，那么人们处世的道德规范就必然会更加完美。极短时间的事情可支配统率一生，这就在于自己能遵循一定的标准行事。一定要等到失败并难以收拾的地步，碰到问题才勉强去防避，心机却已经阻塞不通了。必须一开始便

严守一般的道德规范，人生才算另有谋略；然后又能坚持不懈，那就充分说明了在名分的礼教中原来就有许多快乐的境地。平和简易的事情却采用攻坚的办法对付，证明本人已经具有很深和真挚恳切的修养了。像这样，那么一般的道德规范哪里会有不够用的，只是要靠实行的人能够知道在这方面努力就是了。

世上曾经有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的读书人，注意磨练节操，不是不严谨要求自己的品德要高尚完美，但结果志向和愿望相抵触，对尽忠尽孝，在内心深处有难以说出来的情况和原因。事体被实情所迫，在兄友弟恭方面，有对不起弟兄的地方。从这里知道，为现实形势所迫，纵然是有才德的人也难以全守旧法常规。睡梦中所想到的是无所不足，但有不足，就心有遗憾而难以明言了。事情越难处理，心情便越紧迫，放不开胸怀，不知自身可有什么停留的地方。世上不是没有把纲常法度整治得有条有理的儒士，他们能对人的常情和事物的常理详加阐明，可有时对人的先天品性还担心不完全准确。究寻在家跟在国没有两样，对君主和对父母亲人应尽的义务是相同的。对有血统关系的亲属，与对志同道合的人一样，尊敬兄长和对待朋友，情谊能一般深厚。从这里可知诚挚誓言的重要，我辈读书人应该凭自己确定的纯洁无华清白自守的态度行事。没有感到什么不足的，这是既能勉励自己又是十分美好的意思；而偶然有不足的感觉，则是又出现急切的心情了。功夫越充足，用力便越要深密，一生一世哪有放下自己应负责任的地方。到头来便真正明白了“不敢不勉励自己”，不是真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人生一辈子实践的功效，只有顺着次序一步一步追求提高，不能超越等级不按次序向前奔。应在一般道德范围内，对一桩事、一件东西进一步深入研求，以期达到能够完全理解；完全不偏不过，极为平常，又对中庸之德暗里体味个中精义而多方履行。这“有所不够”的感觉恰恰是由“勉力为之”的意志激发而形成的。尽心尽力，迫切追求，没有休闲的念头，什么时候都未曾轻松过。到头来便知道不敢不自勉励的原因在于常常感觉自己做得不够。任何道理和知识内容都非常丰富，而自我满足的人大多停止不前，自知克制的人并不会有什么短少。只有小心谨慎，遵行一

般道德,考虑到志向愿望容易被放弃,于是用了百倍的功夫还感觉不够;道路难以企求,用上比别人加倍的力量并不算夸大。这种自加勉励的情形是与自己感到不满足的心情相合并集中而出现的。惶恐不止的儆戒,这个道理怎么会难以得到更多的人坚信不移呢?进一步体会《中庸》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这句深有余味的名言,读书人中自知勉励修养的德才出众者肯定会越来越多了。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有材而视为无材,失山之性矣。夫未尝有材,牛山岂受过乎?观若彼之濯濯,山之性果如此哉?今而知材质之美,其终不可恃者也,而其初正若有可恃。恃其材之产于地,而生材者无弃材矣;恃其材之钟于天,而降材者能笃材矣。乃始则不自葆其材,继则不自爱其材,终且有以戕贼其材,而材遂可恃而不可恃。噫嘻!岂材之真不可恃乎?何不即尝美者一思之也。

如山木濯濯而人见之,人见既伐之牛山,而慨然于尝美之山也。人见既伐又牧之牛山,而益慨然于所息所润之山也。未尝有材,在牛山其何说之辞?业既窒其生机,等培塿之不留薄植。而即使曲加夫爱护,勉尽夫栽培,而一刻之改观,正莫冀千寻之繁盛。人言可畏,应共惜有基难恃也,则以为未尝滋生焉可也。况复任其蹂躏,等芟夷之必绝本根。而即使禁下乎采樵,防严乎践履,则此时之败露,已莫望昔日之干霄。山木有知,亦自叹极盛难继也,则以为未尝发育焉可也。

审是濯濯之山,人皆以为无材矣。然亦思未伐之初,剥丧者果如是之甚乎?未牧之始,残削者果如是之尽乎?而顾以黄落无存为山悯也,青葱不复为山憎也。作屏攘剔之无从,械朴薪樵之莫采,为山之性咎,为山之性罪也。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且夫地利大可恃矣,纵凋敝之余,而山之性,崔巍其莫改,而不谓山自生之,人自弃之也?幸而葱郁呈其象,在牛山固无所加;不幸而光洁著其形,在牛山亦无所损。盛衰之势,任人自为,特惜其转爱为憎,人之品评无定者,既靳以至美之名,即忘乎至美之实也。持载徒占乎坤厚,而敷荣难必其蒙

生，根柢依然，寓目者其为山谢过也哉！且夫天意尚可挽矣，值凌夷之候，而山之性，灵秀其犹钟，而不谓山自完之，人自坏之也？蔚然长盛之形，材固不忘于夙昔；孑焉靡遗之况，材又无解于今兹。转徙之间，其机顿易，特惜夫有初鲜终，人之弃取不常者，不以材美为可幸，转以材美为可危也。冥漠纵大其陶甄，而菲质自安于废弃。巉岩在望，有心者其为山借鉴也哉！未尝有材，人见山之濯濯，人遂以是诬山之性矣！夫山木其小焉者也。

有可做木材的树却认为没有可做木材的树，那就失去山的本性了。说山上未曾有过大的树木，在齐国东南方的牛山能够接受这种责备吗？看一看像牛山那光秃秃的样子，山的本性果真这样吗？现在明白了，资质的优美到头来是不可靠的，但在当初偏偏像很可靠的样子。靠木材从地里长出，那么地上就没有无用之材了；靠木材由上天来养育，那么降生木材的上天就能看重它们了。可是一开始人们不能亲自保护他们的木材，接着又不知道亲自去爱惜他们的木材，最后却用一些理由来摧残所培植的木材，于是木材从可靠变成不可靠了。哎哟！难道木材就真正不可靠吗？为什么不专就牛山木材曾经盛美的情景去认真地想一想呢？

像今天的牛山上，树木被砍伐净尽，变成那光秃秃的样子，人们都看见了。人们看到了树木已经被砍伐光了的牛山，就更加感叹那座曾经盛美的牛山了。人们看见已经被砍伐了树木又有人上去放牧的牛山，也更加对曾经在上面休息过和常去为树木供水的牛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感到愤慨了。“未曾有过成材的大树！”对这种指责，牛山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已经阻塞了它的生机，跟小土山被除去薄土一样，即便多方面加以爱护，尽力种植栽培树木，可是对原来样子的短时改变，恰恰也不用希望会有千寻大树遍山垂荫。流言蜚语是可怕的，大家都应当重视有了基地却不足以依靠，那么就认为山上的树木仍然未曾生长繁殖起来也就可以了。何况又让树木备受摧残，被连根砍平了呢！到了这种地步，纵然下令禁止上山打柴，严厉防止随意糟蹋园林，可是眼前出现的这种光秃秃的情状，也就休想很快会恢复

当年大树郁郁苍苍直入云霄的气势了。山上的树木如果有知觉，必定慨叹过去那种非常宏大的气象难以继续出现，那就可以认为山上本来可以培育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压根不曾生长过就是了。

仔细察看这座光秃秃的牛山，人们都认为没有木材了。可是应该回顾一下，当初人们都还没到山上砍伐时，树木的衰败伤亡果真这样惨重吗？开始没有什么人上山放牧，能败坏得这样干净吗？今天反而因为树木枯萎凋零来怜悯牛山，因山草和一片片的翠绿色不见了而厌恶牛山。可是到山上却没有地方可以用树木当屏障，作筛选，也采伐不到当柴烧的野草树枝，于是指责牛山的特性，加罪于牛山，难道它真是这样的吗？真是这样的吗？而且地利是极可依仗的了，就在衰败以后，牛山高峻雄伟的特性未曾改变，能不说是山自然地生长，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它放弃了吗？幸运的是当它生满草木，遍山青翠葱郁，对牛山并没有增加什么；不幸当它成了光秃秃的了，对牛山也毫无损失。时势或盛或衰，总归跟人们的行动分不开。可惜的是从喜爱它转变为讨厌它，人们批评的标准没有一定。那原因在于舍不得给它最美好的名声，可忘却了它最美好的实质。草木白白地被博厚的土地承载着，纵然开了花，也难以肯定能够必然会发育成长起来。看看那些被刨作废的草根树根仍然留在那里，看到的人可以向山认错了吧！况且上天的意旨还可以挽回改动的啊！当走下坡路的时候，山的性质依然聚集着秀美之气，能不说是山仅仅在保全自己，人只是在随便破坏它，作践它吗？山上草木郁郁葱葱的茂盛景象，这过去的繁荣，山木怎能忘记呢！可是孤零殆尽的窘迫情况，山木又难以理解当今的处境了。转眼之间，时机立刻变了。只可惜有开头没有收尾，人们对于舍弃还是采取完全不能固定，原因就在于不认为材美是大好事，反而认为材美有危险。自然界即使加大陶冶的力量，但鄙陋的生物对于自己被抛弃不用，却心安理得！峭拔雄峻的山就在眼前，有志进取的人还是去跟山相对照一番，取长补短，接受教训吧！“未曾有过成材的树木！”人们看见光秃秃的牛山，因而就这样歪曲诬枉山的本性了。以上这些，全是就山木来谈的，所以不过仅仅是一桩小事罢了。

冯培元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察吏所以宣猷，作人必先立志，明农斯能讲武，通货乃可阜财。载稽往籍，《易》系泰交，《书》详蒙训，《诗》重彻田之咏，《礼》垂邦布之经。古帝王握镜临宸，锡畴御宇。以分官职，赓喜起于朝廷；以造人才，励修为于庠序；以勤树艺，课种植于边方；以富宝泉，理羡余于府库。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符。用能有猷有守，工绩熙焉；无诈无虞，士风振焉；教耕教战，地利开焉；裕国裕民，宝藏储焉。所由治洽熙春，欢胪函夏，受鸿名而膺多福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澄叙群伦，裁成多士，扩封圻以远卫，权鼓铸以懋迁。固已百职咸供，而三升有庆；千仓有备，而九府胥通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体至善之无遗，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肃官常、端士习、修边屯、均钱币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以仰赞高深？顾当对扬方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敬述素所诵习者，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序职必先大臣，亲民莫如守令"，因又溯源于取人以身之义。此诚力屏具文而克收实效也。臣谨案《礼运》"大臣法"，言尽臣道也；"小臣廉"，言不亏所守也。长官奉法，斯庶司兴廉，故自"讲之以学"至"达之于顺"，以身之肥设喻，而推及家、国、天下，乃是圣贤成己成物之功，《大学》修、齐、治、平之要。史记所载："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犹得此意。汉制：郡国课于刺史，刺史课于御史、丞相，丞相上之天子而取舍以行。至所谓吏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强干，史传乃综其实曰循。循者，良也。有诸己而不循乎人者，贤守令也。彼安静之吏，惛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汉章帝《戒俗吏矫饰诏》犹取之。而宣帝于良二千石玺书褒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即以次用之。取才之道，意主教化，其治最为近古。夫郭子仪之减乐，李师古之折谋，为大臣者清节俭德，犹能使武臣疆帅默受转移。况朝廷庶明励翼，六德、六行、六艺，三物以端其本；日成、月要、岁会，三载以简其能。有不大小相维，中外相系，

臻得人之盛哉?皇上劝赏黜陟,一本至公,事事循名责实,居官者敢不自励乎?

制策又以孔孟立教,最重有耻,爰综观古今士风之所尚。臣案孔孟务笃实,鄙斗筲,故首言"行己有耻",孟子存"几希",恶机械,故极言不可无耻。自来人心风俗返朴还淳,要必敦士习始。汉初犹尚黄老,自董仲舒正谊明道之策进,而上则兴廉举孝,下则经明行修。延及东汉,封卓茂以褒有德,征严光以隆有道,风声所树,奕祀勿衰。前后四百年间,尊崇节义,敦厉名实,士风称极盛焉。晋世尚清谈,乏廉操,而刘实著《崇让论》、裴诡著《崇有论》,迄陶渊明著《归去来辞》,皆所谓耻随流俗者。唐代治经如孔颖达,能文如韩愈,大节如褚遂良、颜真卿诸人,鸡鸣不已,松柏后凋,此非其卓卓者乎!世之轻汉儒者,以为徒事训诂,少得心之功。议宋儒者,以为研精性命,少致用之实。不知汉儒通经足用,裨益风化者良多。故六朝反之而替,唐贞观因之而昌也。宋儒格物致知,有功名教者非浅。故宋季指为"伪学"而政纪以衰,明初奉为"正学"而习俗以茂也。得失之机,昭然具在。是在世之为士者,立品以端其趋向,力学以大其裁成。然后服古清修,温文尔雅,不歧于异端,不汩于功利,砺名砥节,耻不若人,以兼收汉宋儒之益,则诚可为民之望、国之桢矣。圣天子崇尚实学,加意激劝,黼黻其躬,宜更何如圭璧其心乎!

制策又以屯政取法井田,因详考西域水利农官以及前代营屯之法。臣按黄帝经土设井,寓兵于农,三代未之或改。厥后管、商虽变古制,犹师其意而行之。汉兴,文帝募民耕塞下,武帝通西域,屯田渠犁,亦即规仿此意。西域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东流,一出于阗南山下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此其灌溉所利赖也。伊吾宜五谷桑麻,其北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屯田车师、伊吾,以制西域。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或置宜禾都尉,或置伊吾司马,胥与藉田令丞、稻农左长相为表里。此农官之可考者也。唐代诸道,开屯凡九百二十有二,时又有营田之名。营者,隙地置田固屯,以兵不以民也。两汉以后,如芍陂、南阳、合肥、成都、金城,则又屯之以兵。要之,屯于塞上,则就卫所以设防,且耕且守;屯于塞外,则因

地利以制胜,即农即兵。由是区田法行,种植尽善,屯田之设,其利至溥矣。皇上八荒在宥,俾伊犁等处加修屯政,所由共养和平之福也。

制策又以钱法必求尽善,而用银用钞,特参考其利弊。此尤足国裕民之政要也。臣考大禹铸历山,太公立圜法,《周官》外府、泉府所掌,皆以钱为敛散,是其用实与布帛菽粟相济。秦制币二等,黄金重镒为上币,钱重半两为下币,而银不列焉。汉武帝造白金三品,特令王侯朝觐用之,寻废不行。盖通行犹未用银耳。唐宪宗诏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谓无益于民也。《通典》言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韩愈、元稹《奏状》并及之,谓有便于民也。逮金源正大中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其时上下一以银为币,而银遂至偏胜矣。钞法本《周礼》"质剂"意,始于宋置交子务。迄明洪武,造"大明宝钞",以便民用,盖流弊极矣。钱式若汉之五铢,唐之开元通宝,轻重最为得宜。务令制行于上,权子权母之术精;弊除于下,私铸私销之弊绝。斯能与贾谊"七福"之《疏》,刘秩"四美"之《论》,庶可以垂之永久也已。圣朝理大物博,泉流无滞。所以规求至善者,岂汉唐所能及欤?

若此者:书屏以课最,考道以成才,按部以开田,采山以铸币。扬骏烈,畅鸿庥,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忠荩交输,而彰瘅犹思综核;廉隅具饬,而胶庠倍广甄陶。绥丰屡庆,而耕种弥念边陲;府藏常充,而权衡永垂制度。天工人代,道一风同;和众丰财,守物御事。洋洋乎东渐西被,北燮南谐,总八方而为之极。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朝廷考察官吏,是为了施展治国的方略;培养教育人才,首先要让他们树立起志向。勉励振兴农业,就能有效地讲习武事;货币流通起来,才可以厚积资财。研究古代的典籍,《易经》讲到"天地交,泰。"《书经》详述启发训导的问题。《诗经》歌颂垦治田地的措施。《周礼》流传下"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的经文。古代帝王承受天命,心怀明道,身居帝位,颁赐大法,统治天

下。来划分官吏职责,君臣在朝廷上都喜不自胜而相继歌咏;来培育人才,学校的学子则认真砥砺品行;来大面积栽培,就督促边疆都广植作物;来增加货币,国库就只管清点盈余。所有这些,没有不本着日夜尽心探求的实际行动,来掌握天意与人事交相感应的效验。因此官员有谋划,有操守,各种政事都振兴了;不弄虚,不作假,读书人的风气振作起来了;教导农耕和备战,土地的效益开发出来了;国家富庶,人民丰足,钱币储备充盈了。从而盛大的政绩如同明媚的春天暖人心怀,欢乐的歌声传遍全国,拥有最高美名,获得最多福庆。其原因就在这里啊!

敬思皇帝陛下,整饬文武百官,栽培众多贤士。扩大疆土,保卫边远地区;铸造钱币,发展贸易事业。已经是各种职位都履行任务,士子们也都庆贺秀士、选士、俊士的三级升迁;国家储粮充足,千仓万箱有备无患,掌管财币的国库,钱币全都可以交换流通了。可是皇上的心意谦退,还急于访问,体察到最好的办法没有遗漏,盼望浅近的话语也可以详加考虑。于是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朝廷,用整饬官规、端正读书人的风气、搞好戍边屯田事务,以及整齐均衡钱币等大政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钝不明事理,对皇上的精深博大,哪能够有什么补益?只是正逢开始面君奏对的时候,敬思用言词向天子全面汇报的古义,敢不把平日学习记诵的写出呈上,用来献上那从竹管孔里看天和以瓢量海水似的一片忠心吗?

恭敬地阅读制策,上面说:"使百官恪尽职守,必以大臣为先;爱抚亲近民众,没有比得上郡守县令的",从而追溯到《中庸》里所说的"取人以身"的道理。这的确能竭力除去仅有形式却无真正作用的空文,从而可以收到实际的功效了。臣下我考察:《礼记·礼运》篇说的"大臣持法守法",是说"克尽臣道";"小臣廉洁",是说"不亏所守"。上级官员奉行并遵守法律,那么各官署的一般人员便廉洁奉公了。所以《礼运》篇从"讲之以学"一直到"达之于顺"这段话,用"身之肥"作比喻,从而推至家、国和天下,就是《中庸》篇所说的圣贤成己成物之功,就是《礼记·大学》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点。《汉书·宣帝纪》上记载的:"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及职位周到细密,标准

法式齐备，君臣尊卑相处平安，不要出现不循理法的事情。”就跟这意思相吻合。汉朝的制度，直属中央的郡和分封给诸王侯的国要受刺史的考核，刺史受御史大夫、丞相的考核，丞相上报天子以定取舍。至于所说的官吏，有的称“廉”，就是“清廉公平”；有的称“才”，就是“有才干”；有的称“慈惠”，就是“仁爱”；有的称“强干”，就是“精明干练”。史册上便综合其事实，统称之为“循”，即“遵理守法”，也就是“良好”。优点实际存在于自身而不沿袭别人，便被称为良好的郡守、县令。那些沉静稳重的官吏，诚朴而不浮华。他们每天统计上报政绩，往往显得不足，但月终统计上报政绩，就绰绰有余了。东汉章帝《戒俗吏矫饰诏》仍然取用这类官员。西汉宣帝对于政绩好的郡守们用泥封加印文书予以赞扬勉励，加官颁奖，有的升至关内侯；遇到公卿缺额，便按次序擢升任用。任人取才，以教育感化为主，那时的办法，最符合古代的情况。而唐代宗时，杨绾为宰相，元帅郭子仪在邠州驻地军营中就裁减声乐五分之四。唐宪宗时，杜黄裳为宰相，节度使李师古强暴骄横，但惧怕杜黄裳，就把原来的阴谋收起来了。这说明当大臣的节操高洁，品性俭约，尚且能使武臣边帅知过悔改，何况朝廷上群贤勉力辅佐，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来端正他们的根基；通过日成、月要、岁会随时进行考核，每三年选拔一次贤能俊才。这样能不尊卑相连，朝廷跟地方相维系，出现人才辈出的盛况吗？皇上对官员的奖勉升降，完全根据其政绩，大公无私，担任官职的人哪里敢不策励自己呢？

制策又因孔子、孟子树立教化，最注重的是要有知耻之心，从而综括观察古今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崇尚什么。臣下我考察孔子、孟子大力倡导纯厚朴实，轻蔑才识短浅又气量狭窄的人，所以首先讲“立身行事要有知耻之心”。孟子承认“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者”甚微，憎恶巧诈，所以就极力强调不可无耻。从来人的心愿和社会风气习俗，想让它回到原始淳朴的本真状态，应当首先使读书人的风气敦厚笃实起来。汉朝初年依然崇尚黄帝和老子即道家清净无为的治世之术，自从董仲舒把“正谊明道”之《策》呈进给汉武帝，朝廷就规定办法推选廉士和对父母尽孝的人，读书的士子就努力追求经学博洽、德

行善美。直到东汉，光武帝封赏卓茂，来赞扬有德的人，征聘隐士严光，来推重有道的人。美好的风气一树立，世世代代往下传，前后四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崇敬节操和义行，勉励名称与实际相符合，读书人的上进风气极盛。晋朝崇尚空谈玄理，缺乏清廉的节操。但是有刘实著的《崇让论》，裴诡著的《崇有论》，一直到陶渊明著《归去来辞》，都是耻于追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风俗习惯的人。唐代极力钻研经籍，像孔颖达就是代表；善于写文章，像韩愈就是典范；有临难不苟的节操，像褚遂良、颜真卿等人。这就像世上所说的：虽在变乱动荡的时候，君子仍如雄鸡守时而鸣叫，不改其节度；又像大寒之岁，众木都已经枯死，然后知松柏的小小凋伤。这些人不都是其中最高超出众的吗？世上不满意汉代儒者的，认为他们只钻研那分析讲述古代书面语言的训诂之学，缺乏确有心得的功夫；评论宋代儒者的，认为他们只知深入研讨“性命”问题的“理学”，缺乏付之于实用的价值。殊不知汉儒通晓经学，充分施于实践，有益于社会上公认的道德规范者极多。所以三国的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朝”，因不走汉儒穷经致用的道路而衰弱；唐朝太宗贞观年间依仗提倡经学才昌盛起来的。宋儒主张“格物致知”，即“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对于正“名分”的礼教有功不浅。到了宋朝末年，因指理学为伪学，政治法则从而衰退；明朝初年推崇理学是合乎正道的学问，风气习俗才逐渐美好起来了。成败的关键非常清楚明白。这就表明世上的读书人必须积极培养品德来端正发展的方向，努力学习以加大裁成天地万物的功效，然后学古修身，态度温和，举止文雅，不陷入异端学说，不为功利思想所吞噬，磨练名誉和操守，以不如他人那样善美为自己的耻辱，把汉代的儒学和宋代儒学两者的优点兼收并汲取过来，这便真可以成为平民百姓所期望的有用之材和国家社会的支柱了。圣明的皇上推重提倡切实有用之学，特别注意对读书人激发鼓励。身为读书人，不仅要在外观上装点好自己，更应该怎样来洁身自爱，具有像圭璧一般纯洁高尚的心地，用来报效国家和人民呢？

制策又因屯田措施是效法那古代井田制度的，于是详细考察我朝西部地区的水利、农官和前代营田、屯田制度。臣下我考察，轩辕

黄帝划分田野的界限，开设井田，给农民一定的军事训练，平时务农，战时参战，夏、商、周三代一直延续未改。其后齐国管仲、秦国商鞅虽对古制有所改变，但仍然大致效法推行。西汉时，文帝征募农民到边塞附近耕种田地；武帝开辟通往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即所谓西域的道路后，在渠犁屯田，也就是仿效这种办法。西域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向东流，一个出自于阗南山之下向北流，跟葱岭河合流，向东注入蒲昌海，这都是灌溉田地的最好依靠。伊吾生长五谷和桑麻，它北面的柳中，土地很肥沃，所以汉代常在车师、伊吾屯田，用来控制西域。设都护一职，为西域地区最高长官，设戊己校尉，掌管西域屯田事务。有的地方设宜禾都尉，有的地方设伊吾司马，都跟藉田令丞、稻农左长，内外互相配合，共为一体。这是古代主管农事官员可以考证于史书的。唐代行政区划分为十个道，设立屯田区共计九百二十二处。当时又有“营田”，所谓“营”的名称，即在空地上开辟土地，驻兵固守并从事农业生产，只用兵不用农民。两汉以后，例如芍陂、南阳、合肥、成都、金城，就又开始派兵驻扎了。总而言之，军队在边境地区驻扎，便去防卫处所来就地设防，又耕种土地，又守护边疆。军队在要塞之外驻扎，便根据地理形势来取胜，既是农民，又是士兵。从此区田法即在地里按一定距离挖穴开沟、然后把种子播进去的一种耕作方法就推行开了，谷物的种植技术非常完美，屯田的开设，获利最为广大了。皇上施行仁政，德化远方，任物自在，泽及天下，使伊犁等地进一步搞好屯田事务，普天下共同养护和平之福就由此达到了。

制策又鉴于钱币制度必须力求完善，使用银币或流通纸币只应参照比较，考察其优点和弊病。这更是强国富民的施政要领。臣下我考证，夏禹在历山铸币，姜太公创立货币流通制度，《周礼》外府、泉府所掌管的事务都用钱来支付或收回。钱币的用处确实跟民众必需的布匹、丝绸、粮食互相调剂。秦朝分钱币为二等，黄金重二十四两为上币，铜钱重半两为下币，但不用银钱为币。汉武帝铸造龙文币、马文币、龟文币这白金三品，特地命令王侯朝见皇上时用它，但不久就废止了，不再通行了。可以说，那时用银作钱币的办法还没有通行。

唐宪宗颁发诏书,命令五岭以北现采银坑全都禁废,认为采银铸币对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唐杜佑在他所著的《通典》中提到交州、广州一带全用金银制币。唐韩愈、元稹的《奏状》中也谈到了这种情况,说是对人民用来交易很方便。到金哀帝正大年间铸的钱币叫做“承安宝货”,一两到十两共分五等,每两折合铜钱二贯,那时尊卑长幼都使用银币,因而银币就比铜币更受重视了。纸币本于《周礼·天官·小宰》篇的“买卖双方各立字据”。实际上是从宋代设立“交子务”开始的。到了明太祖洪武年间,印制纸币“大明宝钞”,让民间进行交易时使用方便,但在那时差不多已经出现很大的弊端了。钱的式样,像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通宝”,每枚的重量和币值最为合适。务必一方面由政府确立制度,国家铸钱,以重币为母、轻币为子而相互调剂的办法达到精确;一方面从民间消除弊端,把私自铸造及熔化改变银币重量的违法行为完全禁绝,这就差不多可以和西汉贾谊的“七福”之《疏》,唐代刘秩的“四美”之《论》一起永远传下去了。本朝辖区广大,物产丰盈,货币畅通无阻,用来谋求达到最善最美程度的措施,岂是汉唐两代能够赶得上的吗?

像以上这些问题:把政绩最优秀的官员姓名书写在屏风上面用来加强考核,研求应遵行的原则来广育人才,按照地区来开垦荒地,登山采集矿石来铸造钱币。继承发扬盛业,播扬宏大的吉福,仁德圣明的事体完备齐全,帝王的美好政治措施应有尽有了。臣下我更祝愿皇上在当前天下大治的美好景象下,再求大治;社会安定了,更求巩固。臣僚忠诚齐献又彰善瘅恶了,还要加以综合考核;端方不苟的行为品性全能谨严合礼了,还要广设学校,加倍培育人才;多次欢庆大丰收了,还要继续发展农业,更加关注边疆;国库贮藏的财物充盈富足了,还要权衡轻重,使货币制度长久流传下去。上天的职责,由君臣百姓代为承担;道德一致,宇内同风;使黎民和顺,资财丰盈;分工治事,驾御万物。盛大的规模气势,向东传至大海,向西覆盖流沙地区,南方北方也都协调和谐,统领八方边际,确立起最高主宰地位。我们国家永远政治清明的根本大计就建立在这上面了啊!臣下我学问浅陋新进身,不知避忌,冒犯皇上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管谨讱译〕

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殿试策问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缵膺大宝,统御寰区,中外乂安,于兹二十有五载。仰荷昊苍眷佑,列圣垂庥,敕命时几,兢兢业业。深念崇登进以熙治绩,筹积贮以裕仓储,敦教化以正风俗,奋武卫以诘戎兵,期膺上理,延访为殷。尔多士拜献先资,对扬伊始,冀聆谠论,式赞嘉猷。

治天下者,莫重乎进贤用人。《舜典》曰:明试以功,敷奏以言。《皋陶谟》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知人则哲,自古其难,帝世若是其郑重也。乃后世君臣相得,或取决于立谈之顷,若张良之以石投水,王猛以异符同契。何耶?大智若愚,大诈若忠,或外忠而内奸,或始贤而终佞。察其诚伪,辨其邪正,厥道何由?夫君子小人,各从其类。然如诸葛亮、李泌,司马光诸人,卓然名世,必无徇私阿比之习,而其所荐举者,或未必皆贤,或反为其所误。抑又何说?孔子曰:取人以身。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斯则浚其源之论也,试更阐发而详言之。

夫食为民天,《周礼》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其为储蓄甚备。常平仓、义仓、社仓,立法最善。然行之既久,均不能无弊。《元史》

所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即今制所由昉。顾天庾转输，丁胥丛杂，回漕搀和之弊，何以杜之？平粜所以便民，其后或筑富人仓，或置东西市，果可遵欤？管子守国守谷之说，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所言果有当欤？宇文融之益贮九谷，孙成之发仓贱售，皆有可采欤？丰歉因乎岁，久暂因乎时，燥湿因乎地，果何术而使储积无红朽之虞，售易无腾踊之患欤？则转输之法，粜籴之宜，久贮之方，平价之道，非尤宜亟讲欤？

司徒修六礼，明七教，凡以节民性，兴民德也。《坊记》数千百言，皆以坊民而已。故《周礼》有禁暴之官，《王制》严左道之律。我国家化泽涵濡，士大夫读书明理，自不为异论所移。至乡曲蠢愚，或诱于祸福之说，往往有焚香诵经，自罹法网。若概从禁绝，则祈报蜡社，皆将为吏胥需索之端；如虑其滋扰，而不为之坊，又恐奸黠匪徒辗转煽惑，酿成巨案。今将为杜渐防微，清源正本，使愚氓尽知礼义之维，而奇邪不作，其何道之从欤？

古无所谓兵，凡民皆兵也；无所谓将，六卿皆将也。《周官》之制，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出则为伍，两、卒、旅、师、军。至春秋而晋有爰田，楚有两广，古制日紊。嗣后崇卒用徒，车战又废。岂古之制，不宜于后欤？汉则内有南北军，外有郡国兵，厥制奚若？唐之府兵，最为近古，何以改为矿骑？宋收节度之权，改为更调，孰为合宜？明之五军都督府，犹有唐府兵遗意，何以改为十二团营，又改为三大营欤？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其何以副朕整饬戎行、设兵卫民之意乎？

凡厥四端：克知灼见之用，惠民利济之方，安良除莠之谟，经武整军之要，皆立政之大纲，保邦之至道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以敷奏为明试，务收实用，毋摭肤辞。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这个人哪里能隐藏得住呢？这个人哪里能隐藏得住呢？

《诗经》上说：夫妻间感情融洽，好像琴瑟和鸣。兄弟们和睦相处，欢乐得到了极点。你的家庭多美好，你的妻儿真高兴。

一谈到治理国家，却说暂且放弃你所研习的那套理论，听从我的吧！那么，这同您让玉工按照您的办法雕琢玉石，又有什么区别呢？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帝位，统治天下，内外安定，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仰赖上天的眷顾保佑和列祖列宗留下的吉安福庆，奉正天命，时时事事多加小心，兢兢业业。深切思考重视提拔进用来振兴起治理的政绩，筹划积蓄贮藏来使仓库储备充裕，促进教育感化来端正社会风气，奋扬武力守卫来整治军队，希望符合那完美的治理状态，延揽访求特别殷切。你们这些读书人，向君主拜见进献，首先要谋划好自己的建议，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候，希望听到你们正直的言论，对美好的国家大计有所辅助。

治理天下的举措，没有能比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了。《尚书·舜典》中说：严格地考核施政的成绩，全面向天子报告履行职务的情况。《尚书·皋陶谟》中也说：荐举一个人具有美好的德行，必须说明他所做的事情来作为验证。能了解人，这才够得上明智，自古很难做到这等地步，连称得上“帝”这个称号的尧舜时代，都像这样来认真对待啊！可后世君臣相互合拍，有的在当面交谈的顷刻之间，就做出决断。像张良的计策，如同把石块投入水中那样被汉高祖刘邦坚决采纳，王猛同前秦国主苻坚刚一见面，彼此对国家兴亡大事的看法就如同两件凭证物品，却对应得丝毫不差。这是为什么呢？最聪明的人却像很愚笨一样，最奸诈的人却像很忠诚一样。有的表面上显得很忠诚，骨子里却很奸诈；有的在起初阶段很贤良，到最后却迎合献媚。察断一个人是忠诚还是虚伪，辨别一个人是奸邪还是正直，该用什么办法呢？君子和小人，各自归从各自的类属。可是像三国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李泌、北宋的司马光这些人，都非常突出，闻名于世，必定不会存在结党营私的习惯做法，可他们所荐举的人，有的却

未必都是贤良，有的反过来还被他坏了大事，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孔子说：选用人才要凭君主自身的修养。程颐说：在自己这方面能够了解学说，穷尽道理，就能靠这两点察辨别人。这都属于挖掘根源的论断啊！你们试试看，进一步阐述发挥，详尽地讲论它。

吃饭问题是老百姓的首要问题。《周礼》规定，仓人这一官职负责贮藏国家征收的粮食，旅师这一官职负责聚集田野的各种谷物，遗人这一官职负责国家的剩余物资。这种设置对怎样进行储蓄，制度特别完备。后世的常平仓、义仓、社仓，它们所设立的法式最为妥善。可是施行的时间很长以后，都不能不产生弊病。《元史》所记载的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也就是我朝这方面制度的由来。但向皇家仓库运送粮食物品，壮劳力和办事人员混杂众多，大量扣除河道运送的损耗以及搀入劣质东西的弊病，用什么办法来加以杜绝呢？由国家在丰收年收购粮食，在灾荒年抛售粮食，目的是便利百姓。到后来有的修筑富人仓，有的设置京城中的东市和西市两大交易场所，果真可以照此去做吗？春秋管仲保卫国家就要掌握住粮食的主张，战国李悝在丰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四百石中的三百石、在平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三百石中的二百石、在歉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一百石中的五十石的说法，的确具有切合实际的地方吗？唐朝宇文融增加包括小豆、大豆在内的九种谷物的贮藏，唐朝孙成在大旱之年打开信州的官仓贱价卖给百姓。这些做法具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吗？丰收和歉收是根据年景来定的，储存长短是根据时间来定的，发干与发湿是根据地点来定的，果真用什么办法可使粮食储备没有发霉腐烂的忧虑，出售交换没有物价飞涨的祸害呢？这样一来，转运输送的办法，卖出购入的合适对策，长久贮存的方式，平抑物价的途径，不更应急切讲论吗？

古代司徒负责修明成年加冠礼和婚礼等六种礼仪，宣明父子、兄弟、夫妇等七种人伦关系，这都是用来节制老百姓的性情，振兴起老百姓的德行。《礼记·坊记》长达成百上千个字，都是用来防范民众罢了。所以《周礼》设有禁止暴乱的官员，《礼记·王制》也强化处罚歪门邪道的法律。我大清朝教化的恩泽深入人心，士大夫读书明理，

自然不会被违反正道的学说争取过去。至于乡间的愚蠢百姓，有的被信奉与否就会招祸得福的邪说所诱惑，往往有人烧香念经，自行陷入法网。如果一律按禁止断绝去处理，就会连一般的祭神活动，都将成为官府办事人员勒索的机会。如果担心这类举动会对社会增添扰乱的因素，却不针对它做出防范，又恐怕奸恶狡诈的匪徒，到处煽惑，酿成重大的案件。如今打算防微杜渐，正本清源，使愚昧的老百姓全都懂得礼法道义的纲要，诡异欺诈不发生，应该采用什么对策呢？

古代并没有现今所说的兵士，当时只要是百姓，就都是兵士。也没有现今所说的将帅，当时冢宰、司徒等六个朝廷要员，遇有军事行动就都是将帅。《周礼》规定的制度，民众平常就组成五家为一比、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族、五百家为一党、两千五百家为一州、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的地方基层组织，出来打仗就组成五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两、一百人为一卒、五百人为一旅、两千五百人为一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的军事编制单位。到春秋时期，晋国创立把田地税收赏给众人的爰田制度，楚国设置左右二列、每列兵车十五辆的两广军制，古代的兵制就一天比一天紊乱了。后来重视和使用步兵，车战又被废止。这难道是古代的兵制，对后世不适用吗？汉朝在京师设有南军和北军，在地方设有郡国部队。这种兵制又怎么样呢？唐朝以折冲府为单位的府兵制度，最和古代兵制相接近，后来又为什么改成招募组建的矿骑？宋朝收回节度使的兵权，改成中央禁卫军轮换驻守军事要地，哪一种属于合适的制度？明朝统领中、左、右、前、后军的五军都督府，还有唐朝府兵制度遗留下的用意，又为什么改成十二团营，又改成五军、三千、神机这三大营呢？军队可以一百年不动用，但不能一日没有防备。怎样做就会符合皇帝我整顿军事、设置军队、保卫民众的意图呢？

总共这四个问题：对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能了解奸贼的内心和灼然看出贤良内心的具体运用，对百姓施加恩惠致使他们顺利渡过的方法，安定良善、除去奸恶的对策，筹划武备、整顿军队的要领，这都属于确立朝政的大纲，保有国家的最重要的途径。你们这些读书人学习古代的训条，通晓当今的事务，把全面陈奏个人的意见作为朝

廷对你们的严格考核，务必要收到实际有用的效果，不要拾取表面的言辞作敷衍。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萧锦忠　会试卷三道

萧锦忠(生卒年不详)　字史楼，湖南茶陵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他事不详，俟考。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人有无可廋者，重言之而识定矣。夫人之易廋者，以吾未视、未观、未察耳。既递详其法矣，尚何虑其廋乎？且以人心之善匿也，非具至精至密之识，则不能反覆焉，以明其必匿之情。盖我有以测其情，善匿者自不能匿矣；我有以尽其情，善匿者更无可匿矣。从不匿之候，还扣善匿之人，而茫然无策者，卒不能逃吾之定识也。已所以、所由、所安，皆其人之所自呈者也，而视、而观、而察，则虑其廋耳。顾吾且设一廋之想，吾且验夫廋之人。

存刻核之心者，即未然之事，悬揣其必然，是先构一廋之之局，而不足服其隐也。疑人之所不必疑，必将信人之所不必信，若是者，人得以巧伪相乘。挟虚骄之气者，即不似之形，妄断为近似，是先予以廋之之隙，而不足杜其渐也。觌一面而非者为是，必将转一说而是者忽非，若是者，人得以模棱相市。夫惟具藻鉴之神，而适当熟筹之后，揆其终必原其始；烛照数计之际，初不设以成心，识其浅复知其深。往来酬酢之交，无所容其伪志，而犹窃窃然虑其廋也。是必不用吾视，不用吾观，不用吾察而后可；是必既视不复观，既观不复察而后可；是必视非其所以，观非其所由，察非其所安而后可，而岂知有断断不然者乎？且夫无烦转计者，相士之真也，而可以决言者，衡人之智也。

廋必有廋之地，暗昧者乃可凭之以为基。若视继以观，观继以察，而有是心，并无其地矣。无曰至微，露其缄于百体；无曰至隐，发

其覆于寸衷。如辨玉然，其瑕瑜之莫掩者，其毫厘之不爽者也。宇宙虽宽，而若人之藏身不甚隘哉！廋必有廋之术，谲诈者乃可秘之以自封。若视不厌观，观不厌察，而有是情，并无其术矣。窥之者久，既接迹而加详；验之者明，复屡试而不易。如观水然，其泾渭之立辨者，其源流之早分者也。弥缝虽巧，而若人之中怀不愈见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人群中有不能隐藏得住的人，孔子对此而一句话说了两回，识别他也就确定下来了。一个人容易隐藏得住，是因为我对他没加以直接观察，没加以广泛考察，没加以深入体察罢了。已经一步比一步深地了解了识别的方法，还担心什么他能隐藏得住呢？况且由于人心很会隐藏得住，如果不具备最精明、最细密的识别力，就不能倒过来验核，闹明白对方必定要做隐藏的内情。因为我有根据测知对方的内情，善于隐藏的人，自然也就不能隐藏得住了。我有根据把对方的内情摸得一清二楚，善于隐藏的人，更没有任何办法能隐藏得住了。依从无法隐藏的症候，回过头来对照善于隐藏的人，其中很难对他做出准确判断的家伙，到最后也不能逃出我那固定的识别眼光啊！我自身的所作所为，我自身所采取的途径，我自身所心安理得的地方，也都是对方所自行呈现出来的东西。而直接观察、广泛考察、深入体察，只是担心对方要做哪些隐藏罢了。但我暂且做一个对隐藏者的假想，我还要验证一下隐藏得住的人。

存有苛刻验核心思的人，专就还没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一定会是那样，这属于预先构设一个怎样隐藏得住的情状，但不能足够使那隐藏者服气。怀疑人们通常所不一定要怀疑的东西，必定也就相信人们通常所不一定会相信的东西。像这个样子，人们得以奸巧虚假相互利用。挟持本来没有实力却骄傲气很足的人，专就并不相像的表面现象，妄自断定为彼此之间很相像，这属于预先给怎样隐藏得住定一个要钻的空子，但不能足够杜绝住逐渐蔓延的情况。看到一个方面，却把错的当成对的，必定也就转为另一种说法，对的却忽然又成了错的。像这个样子，人们得以模棱两可，相互调换。只有具备品

评鉴别的神髓,又正处在考虑成熟以后,揣摩对方最后的情形必定要推究他那最初的状况;看得透彻和逐项分析的时候,从一开始就不设下固定的看法,了解对方的表面现象又清楚他那深层的东西。在往来酬应的接触过程中,没有什么地方能让对方的假心假意钻了空子,却仍旧私下里犯嘀咕,担心对方要隐藏什么。这样就必定不需要我去直接观察,不需要我去广泛考察,不需要我去深入体察之后,才行得通。这样就必定做完直接观察却不再去做广泛考察,做完广泛考察却不再去做深入体察之后,才行得通。这样就必定直接观察的不是对方的所作所为,广泛考察的不是对方所采取的途径,深入体察的不是对方所心安理得的地方之后,才行得通。可是却哪里晓得事实上存在着绝对不属于这种情状的呢?况且不需要绕弯去估量,这才是考察士子的真实面貌啊!能够作出肯定的结论,这才是衡量人的智慧啊!

隐藏得住一定是存在着隐藏得住的土壤,没有见识的人也可以凭借这块土壤作为隐藏的依托。如果做了直接观察,再跟上广泛考察;做了广泛考察,再跟上深入体察,即便对方存有隐藏的心思,可却没有他的土壤啊!不要说什么细微到极点,照样在各个方面显露出他所包藏的玩艺;不要说隐秘到极点,照样从内心深处揭示出他所掩盖的东西。这就像辨别玉石那种样子,玉上的斑点和玉的光彩是遮掩不住的,一丝一毫也不会出差错。宇宙尽管宽广,可像这种人藏身的地方不就特别狭窄了吗?隐藏得住一定是有隐藏得住的伎俩,狡猾奸诈的人也可以秘不外传来自鸣得意。如果做了直接观察,仍不厌烦广泛考察;做了广泛考察,仍不厌烦深入体察,即便对方存有隐藏巧妙的内情,可却没有他伎俩施展的机会。暗中窥探对方时间很长了,已经接触到他的形迹而进一步深入;验核对方明确无误了,再多次进行察试而不改变。这就像观看河水那种样子,浑浊的泾河同清澈的渭水立刻就辨别出来了,而那源头和支流早就区分开了。设法弥补漏洞尽管很巧妙,可像这种人的内心世界不就更加暴露了吗?这种人哪里能隐藏得住呢?这种人哪里能隐藏得住呢?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引《常棣》之诗，道不遗于卑迩矣。夫和妻子，宜兄弟，诗言至矣。子思引此，殆为卑迩之一证乎！尝谓礼必始于闺闱，而情莫亲于手足。家庭之间，亦循吾职焉耳。顾有时循吾职而警《鸡鸣》者，自有静好之风；联雁序者，不尽啸歌之致。卑迩之中，有道气焉。间尝诵《常棣》数言，而深味其旨矣。

今夫《常棣》之诗，周公为兄弟作也。言兄弟先言妻子，第写其愉快之情也；言妻子复言兄弟，第拟其心志之睦也。此亦卑迩之至矣，乃千载下闻声慨叹，悲其遇，谅其心，以为人情之所欲言者，何其曲而善达也！其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未已也，又咏之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帑。盖天下虽有矫情饰貌之人，苟探其门内之规模，则性真毕露。徯燕昵者必率自然，叶埙篪者非由强致。吾不意妻子兄弟，何以有此至乐之天也！人生虽有赠答交游之雅，苟见夫家人之靖吉，则意气逾亲。雍雍在御者既有德音，秩秩交孚者亦无异志。吾不意妻子兄弟，何以有此太和之象也！且夫宜与乐，亦甚难言矣。义胜者必寡恩，寡恩则忍；情胜者必无节，无节则流。况夫西岐之鼓钟，徽音久寂；南山之乔梓，责问徒殷。而且小腆纪叙，二叔不咸，以视阋墙之衅，不更甚乎！而诗何以言宜言乐如此其恳至也？盖必有不易得其宜，不易得其乐者。而既宜既乐之后，乃可思也。

周公之为此诗也，其有毋忽卑迩之意乎！是则古人感怀之故，原不求谅于后人。破斧缺戕，不幸而遇人伦之变，当时虽鉴其隐，而未尝不作歌以告哀。以此知骨肉之恩，勤为至笃也。寻常雍睦之行，大抵多出于庸众。《角弓》反目，无端而致伦类之讥，人心苟悔其初，究未尝不快然而易返。以此知卑迩之感，发为无穷也。

《礼记·中庸》引用《诗经》中《常棣》这首诗，意思是说明：君子奉行的大道，是不把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由近处开始排除在外

的。夫妻融洽,兄弟和睦,这首诗讲述这一点是讲到极限了。孔子的高徒子思引用这首诗,恐怕是为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由近处开始作个例证吧!我曾认为礼法一定要从夫妻间做起,而情感没有比兄弟们更亲近的了。家庭内部之间,也只是遵循我作为其中一员所应承担的责任罢了,但也存在着时常遵循我应承担的责任,而对《诗经》中《鸡鸣》所陈述的夫妇相成之道日夜引起警惕的地方,自然具有那夫妇安静和好的风范;像飞雁排成行列的兄弟们,也不把长啸歌咏的情致都显露无遗。在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之中,具有君子之道的气质。隔一段时间就曾诵读《常棣》这几句诗,却深深体会出它的主旨了。

如今《常棣》这首诗,是周公姬旦为自己的兄弟们创作的。诗中讲述兄弟却先讲述夫妻,这只是描写那愉快的情绪啊!讲述夫妻却又讲兄弟,这只是模拟那心志的和睦啊!这也属于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讲述到极点了。可千年以后,闻听这音声而令人慨叹,悲悯周公当时的际遇,体谅他的用心,深感人之常情所要言说的东西,是多么的曲折而又善于表达啊!那首诗中说:夫妻间感情融洽,好像琴瑟合鸣。兄弟们和睦相处,欢乐得到了极点。写到这里还没有作罢,又咏唱说:你的家庭多美好,你的妻儿真高兴。这大致是因为,天下尽管存在着掩饰真情、假装外表的人,如果窥探他家庭的格局,那就真实的性情完全显露。把夫妻感情太亲密作为惩戒,必定要随顺自然;使兄弟之间像埙和篪两种乐器合奏那样和谐一致,并不是由强制造成的。我真没想到夫妻兄弟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像《常棣》诗这样最和乐的自然境界啊!人生尽管存在着赠送酬答、交结同游的雅正举动,如果看到家人的祥和吉庆,就意气超过亲情。和谐弹奏琴瑟的夫妻已经具有美好的言词,按排行互相以诚相见的兄弟也没有不同的想法。我真没想到夫妻兄弟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像《常棣》诗这样阴阳协合的气象啊!况且和睦与欢乐,也特别难以讲明白。正义占上风的,一定会缺少恩爱,缺少恩爱,就会忍心。感情占上风的,一定会没有节制;没有节制,就会太随便。况且西周都城所在岐山的迎亲鼓钟,作为淑女匹配君子的标志,它那美妙的音声已经长

时间沉寂；南山南面的乔木和北面的梓树，作为父子的关系的象征，责令催问也只是父亲这一方空自殷切。而且小国国主、商朝的余孽武庚竟要重新恢复他们的王业，管叔和蔡叔又与周公不和，联合武庚要叛乱，拿这来同《常棣》诗中所讲的兄弟在门墙内争斗作比照，不更严重吗？可这首诗为什么讲和睦、讲欢乐像这样地恳切到极点呢？大概因为客观上必定存在着不容易取得家庭和睦，不容易取得妻儿欢乐的反面情况，而一方面和睦、一方面欢乐都实现以后，才可以思念啊！

周公创作这首诗，恐怕具有不要忽视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的意旨吧？这就说明，古人感叹心事的缘故，原本并不向后人求得体谅。圆孔斧头和方孔斧头都因东征平叛而破损残缺，不幸周公遇到了伦理纲常的恶性变化，当时尽管也注意不要公开，但未尝不写诗来表露哀痛。由此可知骨肉间的恩情，经常是最深厚的啊！一般的协调和睦的行为，大致上由普通人多数都做得出来；可像《角弓》一诗所说的兄弟不和，平白却招致骨肉相怨的讥讽。人的内心如果对当初的行为感到悔恨，到头来也未尝不舒畅地转变返归。由此可知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的感慨，抒发起来就没有止境了。

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为不知治道者罕譬之误，同于治玉矣。夫治国家之必本所学，犹玉人之自能治玉也。舍学而从我，其与教之雕琢者有以异乎？从来草野有学术，而后朝廷有治术，未有束缚驰骤而可以奏厥功者也。不谓制锦无权，欲强制为降心之举；而操刀使割，竟下同于艺事之微。学术不立，则治术不彰。一借鉴焉，而王可憬然悟矣。

万镒之璞玉，必使玉人雕琢者何哉？诚以玉人之于玉也，学为雕琢，不待教而能者也。而王之使之也既如此，谓璞玉甚重，则委任不可以不专固也。然天下岂无重于璞玉者乎？宝圭璧不如宝善人。知风

虎云龙，必储名世之器。谓雕琢甚难，则责成不可以不切固也。然天下岂无难于雕琢者乎？求良工何如求国士！知经纶雷雨、必需哲匠之能。则且与王勤思上理，期禹、皋、伊、旦之全模；则且与王俯仰寰区，综礼乐兵刑之巨政。至于治国家，而岂操切者所可奏效乎？然而王固急求盛治也，聆正人之论，则鄙王道为迂疏；高世主之名，则慕霸功为切近。刑名法术之学进，而王一变；纵横捭阖之学进，而王一变；战胜攻取之学进，而王又一变。于是不得不婉为谢也，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然而王且仍执前说也，贵倨者其貌则士前，而非王前；独断者其行则师心，而不师古。从狗马游猎之好，而王喜驰驱；从吹竽鼓瑟之宾，而王喜声乐；从雕龙炙輠之辈，而王又喜游说。于是不得不直以告也，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噫！是玉人我也，是不如向者使玉人之专且切也。

教玉人雕琢玉，何以异是？以吾学之力除纤翳也，与玉人之切磋砥砺，分德艺不分勤惰也。而乃以舍之者夺其气，将迟回怠玩，而勇者亦衰。夫瑕瑜纯疵之界，辨之己则确有可凭，徇夫人则茫无可据。依阿随俗，所不甘也，而能无枘凿之叹哉？以玉人之日事切劘也，与吾学之刮垢磨光，殊精粗不殊久暂也。而乃以教之者阻其功，将左右指挥，而工者亦拙。夫修齐治平之道，顺其意则力可渐施，失其机则中无定主。技艺虽微，亦其理也，而奚有彼此之判哉？吾愿王深思治道，而弗以玉人相例也。

因为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的人，他那特难闹明白的谬误，就和雕琢玉石一个样。治理国家，必定要把政治家所研习的学说作为根本，这就如同玉工自然就能雕琢玉石啊！让政治家舍弃他所研习的学说，而来听从我的吧！这同偏叫他当玉工去雕琢玉石，有什么理由区别开呢？自古以来，民间具有专门学问，然后朝廷才有治国的方法，并不存在着约束对方、放纵自己却可以赢得那功业的人哪！不认为制作锦缎用不着测定重量的器具，却打算强行决定要人家做出降低心志的举动；而操持刀具让他宰割，竟然把他贬低到和最下等的手艺活儿相同的地步。须知专门学问不确立，治国的方法就不明显。

一旦能把这作为借鉴了，而齐王您就能猛可地觉悟了。

价值特别高的还没雕琢过的玉石，一定要让玉工雕琢它，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玉工对于玉石，学的就是进行雕琢，不需要再等传授就很熟练啊！可齐王您指派的玉工既然像这个样子，认为还没雕琢过的玉石特别贵重，委任他也就不能不专一坚定。可是天下难道没有比未经雕琢的玉石更贵重的东西吗？把圭璧这类玉器看成是宝物；不如把贤良的人才看成是宝物。由此很清楚风跟从虎掀起，云跟从龙聚集，就一定要储备当世最著名的人物。认为雕琢的难度特别大，责令成功就不能够不严切坚定啊！可是天下难道没有比雕琢玉器难度更大的事情吗？搜求技艺精湛的工匠，哪里比得上搜求国内才能出众的士子！由此很清楚处理重大事变，一定要仰仗明智才高的能人。将要与齐王您辛勤思索最完美的治理状态，期待着大禹、皋陶、伊尹、姬旦那类人的完整筹划；将要与齐王您控制整个天下，就要综括礼制、音乐、军事、刑法的重大政务。至于治理好国家，又哪里是操持过急的人能够取得效果的呢？然而齐王您原本想要迅速求得隆盛治绩啊，当听到矫正世人的议论，就瞧不起施行仁政那一套，认为纯属迂腐不切实际；看重一世君主的威名，就仰慕霸主的功业，认为这才切实近便。于是强调循名责实和法律作用的学说进献上来，而齐王您就改变一次；主张合纵连横、运用自如的学说进献上来，而齐王您就又改变一次；倡导武力取胜的学说进献上来，而齐王您就再改变一次。于是不得不婉转地进行推辞，说什么暂且放弃你所研习的那套理论，听从我的吧！然而齐王您仍然打算执守以前的看法啊！傲慢无礼的人在外表上看来是士子靠上前来，并不是齐王您靠上前来；独自做决断的人在所作所为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并不是按照古代的法则来行事。随顺斗狗走马、巡游打猎的嗜好，而齐王您喜欢成天打猎；随顺吹竽弹瑟的伴从，而齐王您喜欢歌舞音乐；随顺号称“雕龙奭”的邹奭这群能言善辨滔滔不绝的人，而齐王您又喜欢游说之辞。于是不得不迳直告知，说什么暂且放弃你所研习的那套理论，听从我的吧！哎呀呀！这纯属把我视为玉工啊，这还不如过去使用玉工专一严切啊！

让玉工雕琢玉石,拿什么来与政治家区别开?依据我的学说有力地消除掉细微的政事障碍,同玉工的切磋磨制,能划分为道德与技艺,但分不清勤恳与懒惰。可竟然用让他放弃学说的办法消掉他的气势,势必使他迟疑徘徊,松懈随便,而勇猛的人也变得衰弱。玉的斑点和玉的光采、纯正与毛病的界限,从自己这里辨别清就确实具有依凭,曲从别人那就茫然没有根据。顺从奉承随大流,是政治家所不情愿的,这能没有格格不入的慨叹吗?依据玉工每天从事切割工作,同我的学说是去掉污垢,磨出光华,能区分出精致与粗糙,但区分不出时间长久和短暂来。可竟然让政治家用雕琢玉石的办法来阻止他的功效,势必左右指挥来指挥去,而擅长的人也变得拙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方法,顺从它那意旨就力量可以逐渐发挥出来,丧失它那机缘就心里没有固定的主宰。技艺尽管微小,也是同一个道理,又哪里有什么彼此的明显区别呢?我希望齐王您深思治国的原则与方法,不要拿玉工来做类比啊!

萧锦忠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为政在于得人,藏富所以裕国,除邪斯能善俗,讲武乃可卫民。上稽古训,《书》纪旁求,《礼》详制用,《易》著执民之义,《诗》陈缵武之歌。自古帝王恭己垂裳,抚辰锡极。惠畴亮采,则百揆宅也;酌盈济虚,则四辅充也;型方训俗,则五教敷也;禁暴戢兵,则六军饬也。茂矩隆仪,粲然具备。用是官方叙而慎宪省成,积贮丰而量人为出,治道宏而协和於变,兵戎诘而有勇知方。所为广人才,纾物力,施文德,扬武威,经纬万端,甄陶庶汇,承燕翼而奠鸿基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朗鉴无私,运筹有要,董劝垂为善政,训练著厥常经。固已贤庆升庸而人歌丰屡,俗征孚化而律叶师贞矣。乃圣怀冲挹,深维长治久安之道,益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崇登进、豫积储、敦教化、奋武卫诸大政。臣之愚昧,奚知体要?顾泰山峻极,犹资土壤之微;沧海宏深,尚纳涓流之细。敢不谨竭素所诵习者,借摅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天下者，莫重乎进贤用人，因慎思夫观人之法。此诚求贤审官之至意也。臣谨按《舜典》敷奏明试，言考试必审也。《皋谟》有德载采，言称人者必举事为验也。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古帝王稽之舆论，考之平时，犹必试以事而后任以官，盖知人劳而后任人逸也。乃若立谈之顷，相契有真，如张良以石投水，王猛异符同契，虽一德之可称，固千载而间遇矣。夫忠奸分于片念，贤佞界在几微。浮华夸诈之士，持论多工，是内外不尽相合也；慷慨激切之徒，中道辄废，是始终不必一途也。善夫《论衡》之言曰：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其言与《典》、《谟》之旨相发明，所以察诚伪、考邪正之道，岂外是哉！若夫以爱才之心，为节取之说，如诸葛亮用马谡，节制显违；李泌举窦参，贪婪不职；司马光急去新法，蔡京因缘进用。纵非私比，终昧鉴衡。孔子言取人以身，程子言知言穷理。惟能扩己之学识，斯能观人之贤否耳。圣天子神明广运，灼见无遗，所为大法小廉，官方由此澄叙也。

制策又以食为民天，因求重农积粟之道。臣惟《周礼》仓人掌粟入之藏，旅师掌聚野之粟而用之，遗人掌邦之委积，即后世常平、义、社所由昉。然常平起于耿寿昌，刘般谓弊在豪右为奸。义仓起于长孙平，胡寅谓弊在书吏侵蚀。社仓起于朱子，马端临谓弊在所司非人。非法之不善也。创法之人以实心而行善政，故法兴而利溥；守法之人以良法而济私心，故法敝而害滋。有治人，无治法，斯之谓矣。《元史》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即今制所昉。得其人则转输不劳，而回漕搀和之弊可息也。北齐筑富人仓，唐时置东西市，皆古法之善，得其人则粜籴易平，而贩积红朽之虞可免也。夫齐得管仲守国守谷之说，以通轻重之权。魏得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以定贵贱之准。宇文融益著九谷则仓廪充，孙成发仓贱售则市籴便。盖丰歉燥湿，系乎时地也；储积售易，系乎人谋也。欲求转输粜籴、久贮平价之方，各得其要，亦视所任之各得其人而已。皇上念三农之生谷，式九用以宜民，立法精详，仁恩至优渥矣。

制策又以愚氓易惑于祸福之说，自罹文网，爰思杜渐防微、正本

清源之计。斯又化民成俗之美意也。臣闻苏轼有言曰:圣人于天下所恃为牢固不拔者,在天下之民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也。古之时修礼明教,化民有方;章疑别微,坊民有要。《周礼》禁暴之官,《王制》左道之律,凡以使民迁善远罪而已。夫愚氓之无知,必不能如士大夫之明理。其惑于祸福之说,焚香诵经,民之罪也。其域于蠢愚之识,作奸犯科,非民之罪也。今将严为之禁,则吏胥借以需索;不为之坊,则积久酿成巨案。岂知三代之民,去末反本,背伪归真,非必有爵赏劝于前,刑罚迫于后,其心安于善之可为,而明夫不善之不可为故耳。是故严异言异服之诛,杜其渐也;行保甲社长之法,防其微也。劝农桑,务技业,正其本也;兴学校,明教化,清其源也。夫民不迫于饥寒,不诱于奇邪,州县长吏复以时进其父老,与之讲论,率其绅士,相为劝诫。上之所令,民深信而无所疑;民之所为,上周知而无所蔽。上与民浹洽如是,回心向化,革薄从忠,何难之有哉?圣朝化泽涵濡,仁恩普被,道德一而风俗同,洵前古所未有也。

制策又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因详及前代兵制。臣思古者兵民不分为二途,文武不分为两职。《周官》之制,居为比、闾、族、党、州、乡,出为伍、两、卒、旅、师、军。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教练不厌其多,调发不嫌其少,故人皆习于兵革,而不疲于征战。逮爰田有作,两广成军,晋楚之伯,已綦成周之法矣。车战以陷坚阵,要强敌,卫青、田豫犹恃以成功,宗泽、李纲尚存其遗制。然平川足以奔冲,山险不如徒卒,非仅古制不宜于今也。汉南军掌宫城门内兵,北军掌京城门外兵,民兵散于郡国,有事召以羽檄。建元以后,南北兵制坏焉;元狩以后,郡国兵制坏焉。唐武后变府兵之法,改为矿骑,而以下犯上之患生。宋太祖收藩镇之权,改为更调,而暴戾恣睢之习去。明成祖分步骑为五军,无事足壮国威,有事足御外侮。复设五军、神机、三千大营,于谦请选其精锐,立十团营,后又增十二,兵制于是屡更矣。国家承平化洽,疆宇肃清,揆文即以奋武,有勇且可知方。军政周详,戎行整饬,所为海岛重洋之地,莫不畏威怀德也。

若此者:吁俊以熙工,阜财以利济,惩恶以劝俗,整武以经邦。桢干之才裕焉,仓箱之积盈焉,稂莠之害除焉,弧矢之威著焉,洋洋乎仁

圣之事赅，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本励精图治之诚，臻累洽重熙之盛。臣工已肃，而旌别弥严；食货已充，而峙储更亟；惠懋已彰，而益思康乂；声威已震，而愈切怀柔。于以淳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上畅九垓，下溯八埏，聿迈天庥，诞膺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进行统治在于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库存丰富是用来使国家宽裕，除去邪说这才能使社会风气良好，讲求武备才可以卫护百姓。往上考查古代的训条，《尚书》记载有四方求取俊杰，《礼记》详述安排国家的用度，《易经》宣明控制住百姓的卦义，《诗经》陈颂继续围猎练武的歌咏。自古以来，帝王自身谨慎，无为而治，顺从天象，赐给百姓最高准则。确定好由谁来辅佐政事，也就使百官得到统领了。酌量多余的，补济亏空的，万民的食用也就保证达到最高标准了。效法先王的榜样，安定四方，训导民间，孝敬等五种教化也就广泛播布了。禁止凶暴，止息战争，天子的军队也就得到整顿了。盛大隆重的规制法式，闪现光辉，一样不缺。因此做官应当遵循的常规步入正轨，而谨慎对待已有的法度并思索成功的事例。积蓄贮藏很丰富，而根据收入，决定支出。治理的原则与方法很宏大，而各地协和，百姓递变达到和善。军队得到整治，而具有勇力，知道方向。之所以扩充人才，舒展物力，施布道德教化，奋扬军事威力，筹划大小政事，措置百姓万物，继承祖宗使子孙安定敬顺的谋略，奠定宏大的基业，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像明亮的镜子一样识别人才，没有私念；运筹粮食储运，具有要领；督察勉励，给后世垂示美好的政事；训练军队，显示那固定不变的制度。本来就已经贤才欢庆得到提拔重用，百姓歌咏连年丰收，社会风气同诚信的美德化导相一致，军纪和部队的严正派势相协调了。可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却谦虚自抑，深深思索长治久安的办法，进一步强化守护盛大功业、保持顺畅平安的意念，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重视人才进用、宽裕积蓄储备，促

进教育感化、奋扬武力守卫等重大的政务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里晓得大体与纲要？可是泰山高得插入云霄，还需要微小的土粒来帮助；大海宏阔深厚，还接纳细小的一滴水流，敢不恭谨地讲出自己平素所诵读研习的全部东西，借以抒发葵花向阳的一点儿忠心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治理天下的举措，没有比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了。据此而谨慎地思索观察一个人的方法。这实在是求取贤才、审慎对待官职授付的最深切的用意啊！臣下我恭谨地考查，《尚书·舜典》载述诸侯全面述职，朝廷严格考核政绩，这是说对考核一定要审慎啊！《尚书·皋陶谟》强调具有美德，需要讲明某事某事，这是说荐举人才的人，必定要列举事实作为证明啊！一个人不容易被人了解，了解一个人也不容易。古代的帝王从社会舆论上对一个人加以验核，从他平时的举动进行考察，仍然必定用完成某件工作对他进行测试，然后才把某一官职授付给他。这是因为在了解人上费了功夫，以后在任用人履行职责上就省了力气了。至于像当面交谈的顷刻之间，就君臣相互契合，十分真确，例如张良就像用石块投水一样，每种建议都被汉高祖刘邦坚决采纳；王猛就像两件物品凭证却对应得丝毫不差那样，同前秦国主苻坚不谋而合。这类例证，尽管属于同心同德真值得称赞，可毕竟是千年才偶尔碰上的事啊！忠诚与奸诈，在猛一闪过的念头上才区分得开；贤良与邪佞，界限表现在细微隐蔽的思想状态上。浮华、炫耀和欺诈的那群人，提出意见大多都很精巧，这属于内心和外表不完全一致啊！慷慨、激昂和恳切的那帮家伙，对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动不动就废弃，这属于开始阶段和最后阶段不是同一准则必定要贯彻到底啊！《论衡》的话说得好：用皋陶所讲的宽宏大量又恭敬谨慎等九种美德去检验一个人的行为，用完成某件工作的效果去考察一个人的言论，如果行为同九种美德不符合，言论从完成某件工作的效果上得不到证明，那么这个人不是贤能也就是邪佞了。《论衡》的话，可以同《舜典》、《皋陶谟》的主旨相发明。用来察辨忠诚与虚伪、考定奸邪与正直的方法，哪里还有在这之外的呢？至于凭借喜爱人才的本心，提出用人某一长处的主张，如三

国蜀汉诸葛亮任用马谡，马谡显然违反军令；唐朝李泌荐举窦参，窦参却贪得无厌，败坏职守；北宋司马光要迅速废除掉王安石的新法，蔡京却利用这一机会得到进用。即便这三位名臣并不是在结党营私，毕竟对鉴别评品还不明晰。孔老夫子说：选用人才要凭君主自身的修养。程颐说在自身这方面应能了解学说，穷尽道理。只有能够扩充自己的学识，这才会观察出一个人是贤能还是卑劣来。圣明的我朝天子洞察识别广大深远，观照贤才的内心毫无遗漏，因而政府要员遵守法纪，低级官吏廉洁奉公，做官应当遵循的常规由此得到澄清，步入正轨啊！

制策又认为吃饭问题是老百姓的首要问题，据此探求重视农耕、积蓄粮食的办法。臣下我想来，《周礼》中仓人这一职官，掌管国家所征收的粮食的储藏。旅师这一职官，掌管聚集田野的各种粮食并按规定动用它。遗人这一职官，掌管国家的剩余物资。这也就是后世常平仓、义仓、社仓之所以出现的根源。然而常平仓实际由西汉耿寿昌开始创立，但东汉刘般认为常平仓的弊病在于地方豪强从中做手脚。义仓由隋朝长孙平开始创立，但宋朝胡寅认为义仓的弊病在于计帐人员侵吞剥蚀。社仓由宋朝朱熹开始创立，但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认为社仓的弊病在于主管人员没有获得到真正的人选。这都说明，并不是这些仓储方法不好啊！创立仓储方法的人用实心来推行美好的政务，所以仓储方法兴用而利益广泛；守持仓储方法的人用这好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私意，所以仓储方法衰败而害处增多。有治理的人却没有自动能发挥出作用的治理方法，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元史》记载的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也就是当今我朝制度的由来。获得到合适的人选，转运输送就不特费功夫，而大量扣除河道运送的损耗、搀入劣质东西的弊病，就能够制止住。北齐修筑富人仓，唐朝时设置东市和西市两大交易场所，都属于古代做法中的好举措。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官府抛售粮食和购入粮食就容易平衡，而转贩囤积、发霉腐烂的忧虑就可以免除。春秋齐国获取到管仲保卫国家就要掌握住粮食的说法，来使货币流通的手段得到实现。战国魏国获取到李悝在丰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四百石中的三百石，

在平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三百石中的二百石，在歉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一百石中的五十石的说法，来确定物价贵贱的标准。唐朝宇文融增加包括大豆、小豆在内的九种谷物的贮藏，官府仓库就能充足；唐朝孙成在大旱之年打开信州的官仓贱价出售粮食，市场交易和公家再购入粮食就很便利。因为丰收和歉收、发干和发潮同天时、地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储存积蓄和售出更换，同人的筹划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打算让转运输送、抛售购进、长久贮存、平抑物价的方法，各自都获取到各自的要领，也只是要看所需承担的职责方面，各自获得合适的人选罢了。皇上您深念春、夏、秋三个农时季节生产出粮食，把祭祀等九种使用财物的规定作为准绳来便利百姓，确立的经济制度精确详尽，仁惠的恩德真是最优裕最宽厚了。

制策又鉴于愚昧的百姓容易被那类信奉与否就会招祸得福的邪说所迷惑，自行陷入法网，于是思索防微杜渐、正本清源的对策。这又是化导百姓、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美好意图啊！臣下我听说北宋苏轼说过这样的话：圣人对于天下该作为坚决不能改变的必须凭仗的东西，在于天下的百姓只能与君主共做好事，决不能与君主共干坏事。古代时修明礼法，宣明教化，化导民众具有合适的方法；把一丝一毫的嫌疑也彰示出来，把难以说清的细微问题也区别出来，防范民众具有要领。《周礼》设置的禁绝暴乱的官员，《礼记·王制》规定的对歪门邪道予以惩办的法律，都是用来让百姓往好处学，远离罪罚而已。愚昧百姓的无知，必定比不上士大夫的明白事理。他们被那类信奉与否就招祸得福的邪说所迷惑，烧香念经，这属于百姓的罪过。但他们被自己愚蠢的认识所局限，干下坏事，触犯刑律，这就不是百姓的罪过了。如今打算严厉对它进行禁绝，官府的办事人员就会借此机会敲诈勒索；如果不对它进行防范，时间一长就会酿成重大的案件。可要知道夏商周时代的百姓，抛掉末业，返归本业，背离虚伪，归向本真，并不是一定要在前面有爵位赏赐作激励，在后面有刑律处罚作胁迫啊！而是因为他们内心对好事该去做很习惯，又清楚奸恶勾当不能去干的缘故罢了。因而国家对异端邪说、奇装异服的处罚特别严厉，这是杜绝它蔓延滋长啊！推行保甲、社长的制度，这是防范它的

萌发萌动啊！鼓励从事农耕和植桑养蚕，致力于技艺，这是端正它的根基啊！兴办学校，宣明教化，这是澄清它的本源啊！老百姓不被饥饿寒冷所逼迫，不被诡异欺诈所诱惑，州县的长官再按照固定的时间把当地父老请进来，同他们讲论礼仪；带领当地的绅士，互相进行勉励和警戒。对上面所发布的命令，老百姓特别相信而没有什么怀疑；对老百姓的所作所为，上面完全了解而没有什么蒙蔽。上面与老百姓融洽到这种地步，老百姓回转心意，归向教化，革除浅薄，顺从忠义，还有什么困难吗？圣明的我朝化导的恩泽深入人心，仁德的恩惠普遍延及，道德完全一致而社会风气也都相同，这实在是前代所不曾出现过的呀！

制策中又说：军队可以一百年不动用，但决不能一日没有防备。据此而详细涉及到前代的军事制度。臣下我想来，古代兵士和百姓并不划分为两个方面的人，文官和武将也不划分为两类职务。《周礼》规定的制度：民众平常就组成五家为一比、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族、五百家为一党、两千五百家为一州、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的地方基层组织，出来打仗就组成五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两、一百人为一卒、五百人为一旅、两千五百人为一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的军事编制单位。家家让他们都成为兵士，人人让他们都熟悉军事，教导训练不厌烦人数多，征调派遣不嫌弃次数少，所以每个人都对战争很熟悉，不对征伐作战感到疲惫。等到把田地税收赏给众人的爰田制度创立起来了，左右两列、每列兵车为十五辆的两广编制单位组成军队了，晋国和楚国的称霸，已经把西周的军事制度搞得紊乱了。车战用来攻破坚固的阵列，阻击强大的敌军。西汉的卫青和三国曹魏的田豫，仍然依仗车战成就战功；宋朝的宗泽和李纲，依旧保存下车战所遗留下的战法。但平原足以用战车奔驰冲击，山地险要的处所就比不上步兵了，这并不仅仅是古代的制度对今天已经不适合了。西汉中央部队之一的南军，统辖宫城门内兵，北军统辖京城门外兵，地方部队分散在各个郡国，有军事行动就用插有鸟羽的军事文书去征调。汉武帝建元年间以后，南军和北军的中央兵制就败坏了；元狩年间以后，郡国的地方兵制也败坏了。唐朝武则天改变以折

冲府为单位的府兵制度，改成由招募组成的矿骑，而以下犯上的祸患就产生出来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回藩镇的兵权，改成由禁军轮换驻守边地或军事重地，而节度使残暴任意胡来的习气消除了。明成祖朱棣把步兵和骑兵划分成中、左、右、前、后五军，没有战事足以使国威显得雄壮，发生战事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犯。又设置名称为五军、神机、三千的三大营，兵部尚书于谦在景泰皇帝在位时，请求选择其中的精锐，建立十团营，后来又增加到十二个，兵制到这时已经多次经过变动了。我大清国家太平无事，教化普遍，疆土辖区肃静清明，审度文教也同时来奋扬武功，具有勇力并知道方向，军政周密详明，军队得到整顿。这是海岛重洋那些地带，没有哪国不畏惧我朝兵威、感念我朝仁德的原因啊！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呼吁贤才来振作起百官的职守，扩充财富来使百姓顺利渡过去，惩办奸恶来激励社会风气，整顿军队来治理好国家。栋梁一样的人才很多了，谷仓车厢的积储充足了，混杂的坏人去除了，军事的威力显扬了。真是广大啊！仁德圣明的事体一样不缺，而称得起"帝"、够得上"王"的大道完备了。臣下我更跪拜祝愿皇上，像天运行那样强健不息，每天都在道德修养上提高一步而永无止境，依据励精图治的诚意，达到数代升平昌盛的状态。百官已经肃正，而识别进一步严明；粮食与钱币已经充裕，而如山一样的储备更加急速筹办；百姓顺服并努力照办已经彰显，而进一步思考平安大治；声威已经震扬，而更加注意安抚招徕。用来加厚那盛大明畅的恩德，扩展那盛世的规模气象，往上直通九重天，往下延伸到大地的边际，迎受上天的庇护，承当众多的福庆。我们国家亿万年政治清明的绵长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金鹤清　会试卷三道

金鹤清(生卒年不详)　字翰皋，浙江桐乡人。道光二十五年

(1845)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即所廋而决其必穷,观人之法綦审矣。夫廋者,即以、由、安之匿焉者也。既视、观、察之必详,而又焉廋哉?子故申言以决之。且以人心之难测也,必使在彼无可遁之情,而后在我有不淆之鉴。盖我之察识至微,彼之衷曲亦至微。以微测微,而彼方自蕴于心,我已不啻如见其心焉。则惟辨之必早,辨者一往而参知觉之;先斯掩之不及,掩者每变而无盖藏之地也。

所以、所由、所安,必用吾视、观、察者何哉?亦虑夫人之廋焉而已。夫所谓廋者,必其智早已自穷,而其力乃强为相护。顾廋之纳群污者易见,而廋之容纤慝者难知。幽独中即有愧心,辞气间必无愧色。此其几微所潜伏,非灼见何以烛其私?抑所谓廋者,必其志不甘于自败,而其势乃迫以相欺。顾廋之护短者易窥,而廋之怙私者难测。神明中几不自保,旦昼间必欲自防。此其内念所弥缝,非卓识何以祛其蔽?乃自观人之法既详,而廋之为术有一试焉,而辄穷其隐者;有屡用焉,而莫售其欺者。其始以虚为实,而实者终不可以虚假,则人自跃然,其欲献我;即因其欲自献也,而直抉其无从隐讳之衷,则人之巧为廋者犹后,而我之见其廋者,已早据乎先也,而何廋焉?其继以伪为真,而真者必不容以伪为,则人自歉然,而难安我;即就其不自安也,而洞悉夫深自闭藏之故,则人之习为度者甚浅,而我之破其廋者,已早窥乎深也,而又何廋焉?

此而犹有匿其情以相距者,必其情之真堪自秘者也。顾天下惟情之流露最真耳,我以平情者验人情,而人不能别设一情以相胜,则无情之掩著,一入于不疲之照,而立溃其防。况乘其未及廋而觉之者,我非有心为苛察,人复何事为矫诬?百族虽繁,而一情毕贯,固有反覆焉,而莫外品评者已。此而犹有托乎理以相冒者,必其理之足以自护者也。顾天下惟理之剖析至精耳,我以当理者衡物理,而人不能别出一理以相蒙,则非理之私衷,一触于有主之胸,而立形其败。况

示以无可廋而牖之者，人必相喻以坦怀，我更何劳乎逆亿?明无不烛，而理与为依，固有历验焉，而莫逃藻鉴者已。观人者其知之!

针对所要隐藏起什么的人，断定他必定会原形毕露，孔老夫子所讲的观察一个人的方法，真是极其明晰了。那些要隐藏起什么的人，正是在他所作所为，所采取的途径，所感到心安理得的地方，需要做隐藏的人啊!既然对他进行直接观察、广泛考察、深入体察一定要特别详尽，他又会隐藏到哪里去呢?因而孔老夫子讲明这种情形，并做出决断。而且因为人心很难推测，一定要使对方在他那方面根本就没什么能隐藏得住的内情，然后在我这方面就有不会混淆的鉴别。这大致因为我所做的观察和识别细微到极点，而对方的内心秘密也细微到极点。用细微来推测细微，对方只管自己蕴藏在内心，而我已经无异于好像看到他的内心了。这样一来，只因辨识对方必定会做在前面，辨识的人一到跟前就会全面了解，觉察出他来，在这之前来不及做遮掩，做遮掩的人每次改变面孔却没有隐藏得住的地方。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采取的途径，所感到心安理得的地方，一定要用我来对他做直接观察、广泛考察、深入体察，这是为什么呢?也只因担心这个人要隐藏起什么罢了。通常所说的要隐藏起什么的人，一定是他的计谋已经早就自己走到尽头了，可他那力量竟勉强为此打掩护。但做隐藏而把各种污秽的玩艺儿都收纳进来，就很容易让人看出来，可做隐藏而把细小的邪恶包容进来，就很难让人觉察到。在独自一个人的环境中就有惭愧的心情，在公开场合言词语气之间必定就没有惭愧的神色。这是隐藏者最隐秘的东西所潜伏的地方，不是透彻敏锐的眼光，凭什么能完全看穿他那隐私?或者是通常所讲的要隐藏起什么的人，一定是他的意念不甘心自动就败毁，可他那情势竟逼迫他来欺瞒。但做隐藏而护短，就很容易让人窥探出来，可做隐藏紧紧抱定私意，就很难让人猜测出来。在黑夜神明监视中几乎不能自我保全，在早晨白天之间就必定想自我防范 这是隐藏者内心想法所要千方百计弥补漏洞的地方，不是卓越的见识，靠什么能去除他那烟幕?于是从观察一个人的方法已经很详明来看，做隐藏

所施展的伎俩有一回撞上前来，一下就使他那隐秘的东西底儿朝天；再有多次施展，却使他兜售不出那套欺骗的玩艺儿。他从一开始就把虚妄的弄成确实的，可确实的东西到头来却不能够用虚妄的东西来代替，这下他就自动憋不住，打算向我献奉什么；随即根据他想自动献奉的那一套，迳直抉剔出他那没办法隐讳的内情，这样一来，人群中巧妙进行隐藏的人还是落在了后面，而我看出他所隐藏的那一套，已经早就占据在前面了，这还能隐藏住什么呢？接下来他把虚假的弄成真实的，可真实的必定不会容许虚假的做法，这下他就自己感到很亏歉，却很难使我心安理得；随即针对他自己都不心安理得的那一套，完全闹清他深深地自我锁闭隐藏的缘故，这样一来，人们通常所揣度的东西就太肤浅了，而我看破他所隐藏的那堆玩艺，已经早就窥探到深层了，这又还会隐藏住什么呢？

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隐藏起内情来保持距离的，这一定是他那内情真可以自己隐秘不外露的人。可天下只有内情的流露最真切，我用平正的情志来验核一般的人情，而他人不能另外再造出一种情志征服我，这样一来，本无情志的掩藏就显示出来，一旦进入不疲乏的观照，立刻就使他的防线崩溃，何况趁他还没来得及隐藏就觉察出他来呢！我并非存心对人要苛细观察，人们又为什么事情而对我违反常理呢？各个宗族尽管繁多，但同一个情志却完全贯通，原本就存在着倒过来验证，于是谁都不在品评的范围以外了。在这方面，仍然存在着假托道理来冒充的，这一定是他那番道理足够用来自我守护的人。可天下只有道理的剖析最精辟，我用符合道理的东西衡量事物的一般道理，而他人不能另外再编出一套道理蒙蔽住我，这样一来，不符合道理的私人用意，一旦触及到具有主见的胸臆，立刻就显出他的失败来，何况把没办法隐藏住亮给他看并启示他呢！人们必定要用坦荡的心怀来互相了解，我还费什么劲儿偏要倒过来揣测？明智而无不察照出来，道理与它相互依存，原本就存在着多次的验证，于是什么也逃不出品评鉴别了。去观察一个人是好是坏的人，要了解这些东西！

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明卑迩之有序,《常棣》之诗可证也。夫妻子兄弟之和,足以致室家妻帑之乐。其于卑迩,已无不宜矣。子思引诗言以证道,曰人有慕之终身,而非徒于燕婉形其慕者矣。人有爱之终身,而非徒于昆季明其爱者矣。顾人生爱慕之诚,要裕诸伦类周旋之近。载赓篇什,觉其谊笃,其情谐,而其恩意之旁流,遂为形容所不能尽道之。

卑迩有序,吾得征之《常棣》之诗。今夫道,不于妻子兄弟尽其量,而要于妻子兄弟开其端。溯人于孩提之日,天真未凿,何有于在御之欢?襁褓未离,何有于傧边之雅?纵和平其天性,要与有生以俱来,而道固有先于妻子者矣,而道更有急于兄弟者矣。论人于既壮以还,谁授之有室,浸假而乐倡随?谁赐之宗盟,浸假而联臭味?纵日用尽伦常,要为吾责所难谢,而妻子特道之继起者矣,而兄弟尤道之旁及者矣。何诗则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若仅知有妻子也者。曰兄弟既翕,和乐且耽。诗若仅知有兄弟也者。且继之曰:宜尔室家,乐尔妻帑。诗若仅知有室家妻帑也者。

盖尝观于叔世而慨然矣。家道之乖也,无端而《谷风》致慨,莫赓雁弋之宜;无端而天显罔敦,莫急鸰原之谊。为问一室之中,其犹是歌静好、笃友恭矣乎?舆辐胡为而脱,角弓奚事而翩,即下至幼贱之伦,未免悄然其失所,不宜也,不乐也。迹其嚣陵之象,斯妻子之伤也,而不徒妻子伤之矣;斯兄弟之忧也,而不徒兄弟忧之矣。则尝观于盛世而穆然也。家道之隆也,荇菜河洲,陈钟鼓而与之偕乐;豆笾酾酒,设几席而与之言情。为问门庭之近,其犹有闻交谪、讥失德者乎?风雨而勉同心,埙篪而赓同调,即下逮仆隶之众,亦且快然其相安,宜之也,乐之也。迹其和气之祥,不独妻子之福也,而妻子已被其休矣;不独兄弟之幸也,而兄弟已致其美矣。于斯时也,太和翔洽,而家乘竞纪鸿庥;善气薰蒸,而眉寿兴歌燕喜。孝道隆而颂声作,圣天子所以建彝伦之极也。

宣明如同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的君子之道是有次序的,《诗经》中《常棣》这首诗可作例证。夫妻、兄弟之间的和睦,足以造成家庭妻儿的欢乐。这对于如同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的君子之道来讲,已经没有不适宜的了。孔子的高徒子思引用《诗经》上的话来证明君子之道,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敬慕对方一辈子的,但并非仅仅在夫妻生活上表现出他那敬慕的了。一个人有热爱对方一辈子的,但并非仅仅在兄弟关系上表明他那热爱的了。但一个人平生热爱和敬慕的诚意,总之应在同类的亲密周旋上扩大范围。续写诗篇,觉得那友谊深厚,感情融洽,而恩意的普遍流布,于是就成为言语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了。

如同登高由低处做起、到达远方从近处开始的君子之道是有次序的,我可以从《常棣》这首诗得到证实。如今的君子之道,不在夫妻兄弟关系上把它全部都包容进来,总之是从夫妻兄弟关系上开个头。追溯人们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天真并未开通,哪里有什么夫妻弹奏琴瑟的欢乐?裹身的小被褥还没有离开,哪里有什么陈列食器的雅致?即便温和平正是人的天性,总之是与出生一起带来的,而大道原本就有比夫妻关系更早的东西了,大道更有比兄弟关系更急切的东西了。讲论人们在已经成年之后,由谁授给他家室,逐渐为那夫倡妇随而高兴?由谁赐给他宗族的盟约,逐渐而同一气味相联结?即便日常活动都是伦理纲常,总之要替我责问那些难以谢罪的行为。而夫妻关系,只是大道的接续出现的一种关系,而兄弟关系,更是大道的向旁侧延伸的一种关系。为什么《常棣》这首诗却说:"夫妻间感情融洽,好像琴瑟和鸣?"诗中似乎只知道存在着夫妻关系。又说"兄弟们和睦相处,欢乐达到了极点。"诗中似乎只知道存在着兄弟关系。并且接着说:"你的家庭多美好,你的妻儿真高兴。"诗中似乎只知道存在着家庭和妻儿。

曾经对衰败的时代进行考查而慨叹了。治理家庭的原则与方法不正常,平白就像《诗经·邶风·谷风》所描述的那样,让弃妇对丈夫深致愤慨,而不接续《女曰鸡鸣》中妻子在清晨劝丈夫去射猎大雁的

夫妇和谐光景。平白而对天道显明不高度注意，把兄弟友爱的宗旨根本不放在重要的地位。请问在同一个家庭中，还依旧歌咏夫妻安静和好、加深加厚兄长爱护弟弟、弟弟尊重兄长的亲情吗？木车的轮辐为什么失去而夫妻相互敌视，用角装饰的弓因为什么原因一放松就翻转而兄弟相互疏远呢？即使下至幼小卑贱的这批人，也未免无声无息地失去了他们的固有位所，既不和睦，也不欢乐。跟踪考查那些嚣张凌越的景象，这是夫妻的悲哀啊！又不只是夫妻对此悲哀了。这是兄弟的忧愁啊！又不只是兄弟对此忧愁了。曾经对兴盛的时代进行考察而肃然起敬啊！治理家庭的原则与方法特隆盛，长长短短的荇丝菜和幽闲的河中小洲，鸣奏钟鼓来与她共同欢乐；陈列食器和澄滤好酒，摆设筵席来与兄弟们叙说亲情。请问在一家各房之间，还有听说家里人都责备我、讥讽丧失恩情的吗？风雨凄凄而夫妇勉励同一条心，兄弟像埙与篪音声和谐那样而续上同一个曲调。即使下至奴仆这群一般人，也必将愉快地相互无争共处，既和睦，又欢乐啊！考察那协和之气所带来的吉祥，不单单是夫妻的福分呀，而夫妻已经蒙受那美满了；不单单是兄弟们的幸运呀，而兄弟们已经实现那和美了。在这个时代，阴阳和谐的气氛上下融洽，各家家谱都竞相记载盛大的福庆；和善之气流布升腾，老人们都纷纷歌唱，私下欢喜。孝敬的原则与方式隆盛，而颂扬的歌声兴起，这正是圣明的天子树立起人伦纲常的准则的原因。

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
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即治国以衡治玉，诘齐王以轻重之殊焉。夫治国以贤，与治玉以玉人无异也。乃欲舍所学焉，轻重不悬殊哉？孟子反言以诘齐王曰：王今者抚有全齐，所重者莫若齐矣。而臣谓王所轻者，亦莫若齐。盖一国之重轻，系乎贤才之用舍；而贤才之用舍，系乎君志之从违。不曰所宝惟贤，而曰作威惟辟，遂视秉衡之任，不如拱璧之珍也。噫！何其悖也。

璞玉而万镒，犹必使玉人雕琢之。如此王非爱玉人也，爱璞玉也;非重玉人之能治玉也,重治玉之有待于玉人也。岂不以玉人之所学,其为功于玉者甚伟,有不得舍所学而从我者哉?而臣乃得以治国家之说进矣。盖人情于素所珍惜之物,必且专注焉,而无可离。及举一珍惜之更甚于此者,相提而并论。而先后不觉其转移,则以国家例玉,而玉见为轻者,理也。抑人情于己所爱护之端,必欲成就焉,以彰其美。及遇一爱护之更深于此者,并列乎当前。而缓急顿为之互易,则以治国家例治玉,而治玉见为轻者,又势也。且夫人之有益于治国家者,岂直玉人比哉!其所学之蕴于席珍者既久,不愿为碔砆之哗嚣,而愿为圭璋之特达,故韫辉光以待价,必不肯徇俗而为利器之投。其所学之用为国宝者甚宏,不能辑虞廷之瑞,必将钓渭水之璜,苟隆坛席以升庸,必不至怀瑾而贻匿瑕之诮。则意王于此,必且谓社稷之安,惟夫人是赖;民人之众,惟夫人是依。俾励相我国家,砥砺焉,濯磨焉,如治玉然,可也。而孰意不尔也!夫王非教玉人雕琢玉之王哉?何至于治国家而乃曰:舍所学而从我也。嘻!异矣。

谓王薄视夫人乎?似也。顾儒者不以一身之废置为忧,而独戚然于国家之丛脞者,其代王而致其保护者周也。王乃自有之,而自置之也。连城之宝,则攻错不厌其精详;表海之雄,则制度不求其美备。王应自笑其贵贱之不侔矣。谓王轻视夫人之所学乎?似也。顾贤者不以抱负之展舒为急,而独殷然于国家之治安者,其为王而运其筹画者切也。王乃自任之,而自忘之也。器非璠玙,追琢犹严其付畀;胙以茅土,治忽不纳夫嘉猷。王又何解于是非之倒置矣。王请度之!

特就治理国家来同雕琢玉石作衡量，这是用轻重的区别来诘问齐宣王。靠贤才治理国家,同靠玉工雕琢玉石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可竟然想让政治家舍弃他所研习的学说,轻重不就太悬殊了吗?孟子用掉过来的讲法诘问齐宣王说:齐王您如今统治整个齐国,所看重的没有比得上齐国的了。可臣下我却认为齐王您所看轻的，也没有比得上齐国的了。因为一个国家的重轻,集中在贤才的任用与舍弃上;而贤才的任用与舍弃，又集中君主心志的依从与违背上。不讲当成

宝物的只有贤才,却说施用威权的只有君主,于是就把辅政重臣的任用看成不如大块玉璧那样珍贵了。哎呀呀!这是多么地逆反啊!

未经雕琢的玉石价值特别高,必定仍让玉工雕琢它。这样做,说明齐王并不是喜爱玉工啊,而是喜爱还没雕琢过的玉石啊!并不是看重玉工能够雕琢玉石啊,而是看重雕琢玉石要等玉工去干啊!这难道不是因为玉工所学的本领,对玉石产生作用特别大,存在着无法舍弃他所学的本领而来听从我的吗?可臣下我于是就能够用治理国家的学说进献了。人之常情,大致上对自己一向所珍惜的东西,必定很专一关注,而不能摆脱开。等到列举一个比这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将二者相提并论,一前一后就在不知不觉中由前一个转移到后一个上去了。既然如此,那么,拿国家来和玉石作类比,而玉石显出属于轻微的东西,这是情理所在啊!人之常情或对自己所爱护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必定想完成它,以便显示它的美好。等到遇见一个比这更应爱护的事物,二者并列在眼前,哪个应放在次要位置,哪个应放在首要位置,立刻就替它们互换位置了。既然如此,那么,拿治理国家来和雕琢玉石作类比,而雕琢玉石显出属于轻微的玩艺,又是势所必至啊!况且世人中对治理国家很有帮助的人,哪里仅仅是玉工能够比拟的呢?他所研习的学说就像铺地草垫上放着宝玉,蕴藏已经很久,不愿干似玉的美石自我炫耀之类的勾当,希望形成天子用圭璋作为信物专门聘请到朝廷的礼遇,所以隐藏起光辉,来等待身价,必定不肯随大流而自称才能突出去主动投献。他所研习的学说用作国家宝物的地方特别多,即使不能汇聚起虞舜朝廷上的各种祥瑞,也必将像姜子牙那样在渭水边钓鱼等待征召。如果摆设隆盛的坛台或坐席来请他登临,加以重用,他一定不至于身怀宝玉却留下掩藏瑕疵的讥笑来。既然如此,那么,猜想齐王在这个事实面前,一定会认为国家的安定,只仰赖这等人物;百姓的众多,只依靠这等人物,使他勉力辅助我的国家,磨练节操和德行,洗涤污秽,磨掉缺陷,就像雕琢玉石那样,这是完全可以的。但谁想到却不是这样呢!齐王不是让玉工雕琢玉石的那个国王吗?为什么一谈到治理国家却竟然说:舍弃你所研习的学说,听从我的吧!哎呀呀!这就太奇怪了。

说齐王看不起这等人物吗?还真有点儿像!但儒士不把自己的不被重用当成忧虑,却偏偏对国家的杂乱现象表示担心,因为他们代替齐王而给予保护的措施周密啊! 齐王却自己本来拥有他们而又自己把他们搁置起来。价值特别高的宝物,雕琢镂刻不厌烦它那精巧细致;国土到达海边的大国,国家制度却不追求它那妥善完备。齐王真应自己嘲笑自己看重什么和看轻什么相差得太远了。说齐王轻视这等人物所研习的学说吗?还真有点儿像!但贤士不把自己的抱负伸展开当成急事,却偏偏对国家的政治安定表示非常关切,因为他们为齐王而运筹好谋略特殷切啊!器物不是鲁国的"璠玙"这种美玉,让人雕琢仍旧对按时完成要求得十分严格;得到王室赐给的封国,治乱却不采纳美好的计策。齐王对这种是非颠倒的做法又怎样能解释清楚呢?齐王您请揣摹它吧!

金鹤清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作人者,熙绩之资;足食者,厚生之本;除莠者,安良之法;振旅者,经武之猷。自古帝王握镜临宸,执枢建极。以延宅俊,则衡鉴无偏;以谨盖藏,则仓箱有庆;以严彰瘅,则觥挞交修;以壮声灵,则干城足用。载稽往牒,三物重贤能之典,八政陈食货之畴,五教立亲孙之型,六师致张皇之训。用是圭璋比德,选尽英髦;旆旌歌丰,欢腾乐利;陶钧煦物,化及蠢愚;介胄知方,勤修忠信。崇规茂矩,璨然具陈。所为函夏从风,熙春播恺,受鸿名而膺多福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裁成万类,利济群生,节礼乐以中和,寓怀柔于震叠。固已盈廷奏绩而高廪充储,比户兴仁而折冲制胜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体至善之无遗,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辨贤良、筹积贮、正风俗、缮甲兵诸大政。臣之愚昧,奚足以仰赞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讲习者,以效导涓撮壤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天下者,莫重乎进贤用人,因详求夫诚伪邪正,而推本于知言穷理。此诚图治之大纲也。臣窃观古昔圣王,莫不以知

人善任为先务，而其用之也，有其难其慎之思。故先之以道德，以观其行；申之以猷为，以辨其才；终之以车服，以彰其庸。《尚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言循名而责实也。又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言德裕而事成也。当是时，君臣畴咨于庙堂，贤才汇征于草泽，四海之内，咸镜清而砥平矣。汉唐以来，主臣同符，若汉高祖之于张良，唐太宗之于魏徵，宋艺祖之于赵普，以及苻坚之于王猛，皆是也。举于干戈扰攘之中，进之帷幄运筹之下，卒能开济功业，扫除艰难，致人主于隆盛，受大任而不疑，于斯之时，千载一遇也。虽然，用人之道尤当核其邪正，察其诚伪。古之君子误用小人，史册所载，不可胜数。诸葛亮之节制，能相昭烈治蜀，而不能得之李严、马谡；李泌之学术，能佐肃宗中兴，而不能得之窦参；司马光之中正，能成元祐郅治，而不能得之蔡京。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洵非虚语也。圣天子澄叙官方，旁求俊杰，内而群尹庶司，外而封疆大吏，所以董率庶僚，甄别优绌，有不矢公矢慎，以日臻上理者欤？

制策又以食为民天，而稽诸《周礼》储蓄之宜，与夫久贮之方，平价之道。此尤保赤之盛心也。臣谨案，籴粜散敛之法，始自管子，而实具于《周礼》。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立法綦详。厥后汉耿寿昌有常平仓之设，权衡贵贱，因时济民。其弊也，名存而实亡。隋长孙平有义仓之设，当社出谷，丰收歉散。其弊也，借少而偿多。宋朱子有社仓之设，主守则归于乡，收散则请于郡。其弊也，待用急而典发迟。大抵天下无百年不敝之法，顾用法之人何如耳。苟得其人，无论上熟、中熟、下熟之异敛，和籴、俵籴、兑籴之异名，北齐富人仓、唐东西市之异制，遵而行之，咸有成效。不得其人，虽宇文融之储谷，孙成之发仓，上则官司亏蚀，下则胥吏侵渔，外则驵侩囤积，非徒无以济民生，适足惠奸贪、资中饱而已。天庾转输，丁胥丛杂，又安能事为之制，人为之防乎？惟征收严其稽核，而回漕搀和之弊消；敛放相其时宜，而储积红朽之患息。庶几仓庾丰而民生洽欤！考之元代，京师二十二仓，河西务十四仓，通州十三仓，以及河仓十有七，皆领于京畿都漕运司，挈领提纲，大小相维，立法颇善。我朝损益因时，沿革尽利，所以保惠闾阎者，诚法良而意美矣。

制策又以《周礼》有禁暴之官,《王制》严左道之诛,而思杜渐防微、正本清源之计。臣案《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坊记》一书,皆以坊民,而奇邪有禁、左道有诛者,稂莠除而后嘉禾茂也。《周官》制民之法,党正、闾师闲其邪僻,司谏、司救申其诛让。是时政教休明,风俗醇厚,荒诞支离之说,无或奸其间者。汉承秦制,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以掌教化,游徼巡禁盗贼,以诘奸慝而辅风教,法至善也。古者处士于闲燕,处农于田野,处工于官府,处商于市井,终身不迁异业,又奚暇外慕哉?是故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承平日久,上恬下嬉,焚香诵经,往往而有。为长吏者,始则姑息以悯其愚顽,继且隐忍而酿成事变。严保甲之株连,则蓣酒秧歌皆成例禁;藉兵丁以缉踩,则苗耨发栉殃及胁从。此刑罚所以繁,而奸宄不可胜欤?善乎欧阳修之言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行之以勤,而被物者治;浸之以渐,而入人者深。斯经正民兴,邪慝息矣。国家仁育义正,一道同风,生斯世者,其孰敢自外于陶成哉?

制策又以古者凡民皆兵,六卿皆将,后世兵民始分,而详考夫历代兵制。臣闻弧矢以威天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周制居则比、闾、族、党,出则伍、两、卒、旅。教练勤而调发简,故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至于晋作爰田,楚矜两广,而兵制浸衰矣。汉制有京师兵,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城是也。有郡国兵,率更、践更为工役,过更、谪发为戍边是也。厥后武帝变番上为长屯,光武变长屯为远征,兵制遂坏。魏晋而后,惟宇文氏略仿周制,得大小相维遗意。唐初府兵,统练有法,更代有时。无事归农,有事归将,事解则兵归于府,将归于朝,将不握兵,兵无废事。后乃募士宿卫,更号矿骑,而府兵之制一变。宋收天下精兵,列营京畿,内兵统于枢密,外兵总于三卫。明初设五府四十一卫,永乐更设五军、神机、三千大营。于谦汰老弱,选精锐,分立团营,诚简练节制之师矣。圣世棱威远播,神武懋昭,岂前代之成规所得而比权量力哉!

若此者:知人以立政,贵粟以劭农,设教以防民,诘戎以奋武。汪汪乎丕天之大律,震今铄古,莫之与京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桢干已储,而愈神甄拔;刍荛已峙,而更重输将;郊遂已

移,而倍严旌别;蒐苗已习,而弥励赳桓。八枋之临驭尊焉,万实之收成富焉,六德之渐摩厚焉,五戎之训练精焉。扇巍巍,显翼翼,体尧蹈舜,甄殷陶周。则我国家亿万载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培育人才,是振兴起众多政事的依凭;粮食充足,是使百姓生活宽裕的根本;去除邪恶,是安定良善的方法;回师入国,是讲求武备的谋略。自古以来,帝王握持住清明之道,高居在皇宫,执守住君位,建立起最高准则。用来延揽可以委任官职的贤才,评品鉴别就不存在偏执;用来确保府库真有储备,粮仓车厢就有使农民高兴的物品;用来表彰良善,震慑奸恶,酒罚和鞭打就交相运用;用来使号令威灵雄壮,精锐的将士就足以使用。考察从前的经典,《周礼·地官》所讲的六德、六行、六艺这三物,推重选送贤能的原则;《尚书·洪范》所讲的八项政事,列举了农耕和商贸这两项政事的办法;《礼记·祭义》所讲的孝敬等五种教化,树立了亲和谦逊的榜样;《尚书·康王之诰》中对国家军队发出了要壮大的训示。因此用圭璋做为道德的象征去征召,所选任的就全部是杰出的人才;龟蛇旗变成鸟隼旗而歌咏丰年的吉兆,人们就为得到自己所快乐、所便利的东西而欢腾;措置天地覆育的万物,教化就延伸到愚蠢的百姓;将士知道方向,就经常修明忠诚信义。隆重盛大的规制法式,闪现光辉,全都陈列出来。之所以全华夏普遍响应,在美好的春天播布和乐的景象,担当起盛大的英名,承受众多的福佑,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裁制和成就万物,便利和救助民众,用中正平和来调节礼仪音乐,在让人震动惊恐中寄寓着安抚。本来就已经满朝廷奏报政绩,高大的官仓布满储蓄物品,家家户户兴起仁德来,不动用武力就取得胜利了。可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仍像帝尧那样对询问事体非常关切,体念最好的建议不能有遗漏,希望身边的言论可以供察照,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辨识贤良、筹划积蓄贮存、端正社会风气、修缮武器装备等重大的政务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凭什么足够用来抬起头对高山大海

有所帮助呢?但正值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候,恭敬地追念全面向天子述职的经典古义,敢不勉力陈述自己平常所讲论研习的东西,来献上注入一滴水、添上一把土的那点儿忠心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治理天下的举措,没有比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了。据此详明地求取怎样辨别忠诚虚伪和奸邪正直,而把根源推究到了解学说,穷尽道理。这确实是谋求大治的大纲啊!臣下我私下观察古代的圣明帝王,没有不把知人善任作为头等大事的。但任用一名官员,往往存在着困难又谨慎的想法。所以首先用道德修养来观察他的品行,用献纳谋略、有所作为来辨识他的才能,最后用车马服饰来表彰他的功劳。《尚书·舜典》中说:全面向天子报告履行职务的情况,严格地考核施政的成绩。这是讲按照名位来检验实际啊!《尚书·皋陶谟》中还说:荐举一个人具有美好的德行,必须说明他所做过的事情来作为验证。这是讲美德很多而事情成功啊!在这个特定时代,君臣在朝廷上讨论谁能胜任,贤才在民间按同类人被一批批选拔上去。四海之内,都像镜子那样清明,都像磨刀石那样平坦了。汉朝和唐代以来,君主和大臣特别契合,像汉高祖对于张良,唐太宗对于魏徵,宋太祖对于赵普,以及前秦国主苻坚对于王猛,都属于这种情况。在战争混乱中提拔起用他们,把他们安排到营帐里密商大计的身边,最终能够开创并完成功业,扫除艰难,把君主推到隆盛的状态,授付给重任但不怀疑,在这个阶段,真是上千年才碰上一次啊!尽管如此,使用人才的方法尤其应当验核他们确属奸邪还是确属正直,察辨他们确属忠诚还是确属虚伪。古代君子误用小人,史书上所记载的,多得数不清。三国诸葛亮指挥得力,能够辅佐昭烈帝刘备治理蜀汉,却不能在李严、马谡那里执行下去。唐朝李泌学术超群,能够协助肃宗由衰落而重新走向兴盛,却不能在窦参那里得到贯彻。北宋司马光正直无私,能够实现哲宗元祐时期的完美治理状态,却不能在蔡京那里继承下去。能了解人,这才够得上明智,自古很难做到这般地步,确实不是一句空话啊!圣明的我朝天子澄清并理顺做官应当遵循的常规,向四方求取杰出的人才,朝廷内百官各机构,朝廷外地方首脑各要员,用来督察带领众下属,区分识别

优劣，还有不发誓为公、发誓谨慎对待职守，一天比一天步入最完美的治理状态的吗？

制策又认为吃饭问题是老百姓的首要问题，因而考察《周礼》中有关储备积蓄的合适举措，以及长久贮藏的方法，平抑物价的途径。这更是保护百姓的盛大心怀啊！臣下我恭谨地考查，由官方购进卖出、散发收敛粮食的方法，从管仲开始，但实际都已经详尽显示在《周礼》上。仓人这一职官负责贮藏国家征收的粮食，旅师这一职官负责聚集田野的各种谷物，遗人这一职官负责国家的剩余物资，所定立的制度极为详备。后来西汉耿寿昌又有常平仓的创设，权衡粮价的高低，根据年景救助百姓。常平仓到后来的弊病是，名存而实亡。隋朝长孙平又有义仓的创设，由所在里社拿出谷物，丰年就收进，歉年就散发。义仓到后来的弊病是，借给百姓的数量少，百姓偿还的数量多。南宋朱熹又有社仓的创设，具体事务归乡里去办，收进散发要向州郡报请。社仓到后来的弊病是，等着急用而清点发送却迟缓。一般说来，天下不存在百年而不出漏洞的制度，只是要看施行制度的人选怎么样罢了。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选，无论丰年、平年、歉年采取标准不同的收进办法，还是和籴、俵籴、兑籴这些官府购粮的不同形式名称，也无论北齐富人仓同唐朝东市、西市两大交易市场的不同规定，遵照去施行，都会有成效。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使像唐朝宇文融那样储备小豆、大豆在内的九种谷物，像唐朝孙成那样打开信州的官仓贱价卖给百姓粮食，也往上说就会公家亏损，往下说就会办事人员侵吞夺占，往外说就会奸商囤积居奇，获取暴利，不单单没有什么东西救助百姓的生计，恰恰足以给奸诈贪污的人带来好处，有助于中饱私囊而已。往皇家仓库转运输送粮食，壮劳力和办事人员混杂众多，又哪里能够事事都做出规定，每个人都对他进行防范呢？只有在征收上严格加以清点查验，而大量扣除水路运送的损耗以及搀入劣质东西的弊病才会消除；收进和散发要估量到时机是否适宜，而储积的粮食发霉腐烂的祸害才会止息。这样做，差不多就仓库充裕而百姓的生计也安定了吧？考查元代，京师二十二仓，河西务十四仓，通州十三仓，以及十七处河仓，都由京畿都漕运司管理，提纲挈领，大

小相互维系，它所定立的制度很妥善。我大清朝根据时势进行减损增益，按照好处全都包括进来加以承袭变革，用来保护百姓并给他们带来恩惠的地方，确实是制度完善，意图很好了。

制策又鉴于《周礼》设有禁绝暴乱的官员，《礼记·王制》加强对歪门邪道的惩罚，由此考虑防微杜渐、正本清源的大计。臣下我考察《王制》，司徒修明成年加冠礼和婚礼等六种礼仪，用来节制老百姓的性情；宣明父子、兄弟、夫妇等七种人伦关系，用来振兴起老百姓的德行。《礼记·坊记》这篇经文，都是用来防范老百姓的，而诡异欺诈定有禁令，歪门邪道加以严惩，原因都在于稗草除掉而庄稼茂盛啊！《周礼》管理民众的制度，规定党正、闾师这些官员探查出邪僻的人，司谏、司救这些官员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斥责。在这一阶段，政治教化美好鲜明，风俗纯正厚道，荒诞破碎的邪说，没有哪个能插进当中来的。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在每个乡设有三老、啬夫、游徼这三个基层官员。三老掌管教化，游徼负责巡逻，禁绝盗贼，来惩治奸恶，辅助教化。这种基层管理制度真是好到极点了。古代把读书人安置在悠闲的处所，把农民安置在田野，把工匠安置在公家的作坊，把商人安置在市场街巷，一辈子都不转向不属于自己的职业，又哪里还有功夫去羡慕其他的玩艺呢？所以父兄的教诲，不用严肃就自然告成；子弟所要学习的东西，不用辛劳他就会掌握。太平的时间一长久，上面的官员安享快活，下面的百姓沉溺戏乐，烧香念经，常常出现。身为地方长官的人，开始就无原则地宽容，怜悯他们的愚昧顽固，接下来又克制忍耐，酿成事变。如果强化保甲制都会治罪的规定，用美酒待客、扭秧歌祭神也就都会成为照例禁止的东西。如果借助兵丁去缉察踏平，就会像锄苗梳发一样殃及被胁迫顺从的人。这是刑罚繁多的原因，而内外奸恶也不能镇服住吧？还是北宋欧阳修的话说得好：没有什么能比得过修明根本来镇服住他们。经常行用，而受到的影响得到整治；逐渐渗透，而进入人心的观念深切。这正是固定不变的大道端正了，老百姓就振奋积极，而邪恶也止息住了。我大清国家用仁德抚育，用道义矫正，道德一致而社会风气相同。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又有谁竟敢把自己置于陶冶化成的范围之外呢？

制策又鉴于古代只要是百姓，就全都是兵士，冢宰、司徒等六个朝廷要员，也全都是将帅，后世兵士和百姓才开始分离开，而详尽考察历代的军事制度。臣下我听说武力用来威服天下，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西周制度规定，民众平常就组成五家为一比、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族、五百家为一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出来打仗就组成五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两、一百人为一卒、五百人为一旅的军事编制单位。教导训练经常举行，而调遣征发却很简单。所以用来征战就取胜，用来防守就稳固。等到晋国创设把田地税收赏给众人的爰田制度，楚国夸耀左右两列、每列兵车为十五辆的两广部队编制，古代的军事制度就逐渐衰败了。汉朝兵制，设有京师中央部队，这就是南军负责守卫宫城，北军负责守卫京师。还设有郡国地方部队，这就是用率更、践更这些名目作为服劳役、服兵役的方式，用过更、谪发这些名目作为戍边的方式。后来汉武帝把轮流值宿改为长屯，东汉光武帝又把长屯改为远征，古代兵制于是被破坏了。魏晋以后，只有北周宇文泰大致模仿西周的制度，获得到大小相互维系的遗意。唐朝初期以折冲府为单位的府兵制度，统领和训练具有法式，轮换替代具有固定的时间。没有战事就归入农民行列，发生战事就归属将帅指挥。战事结束就士兵返归所在的折冲府，将帅返归朝廷，将帅不掌握军队，军队也不是无事可做而由朝廷白白供养。后来竟招募勇士，宿守保卫京师，改名矿骑，而府兵制度就整个改变了。宋朝收拢天下精兵，在京师周围地区布列营地。中央正规军由枢密院统辖，地方军队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这三衙总领。明朝初期，设置五军都督府四十一卫，成祖永乐年间改设五军、神机、三千这三大营。后来兵部尚书于谦淘汰老弱残兵，挑选精锐，分立团营，确实属于经过选择训练而指挥得动的军队了。我大清圣明时代兵威远扬，神智勇武大为显示，哪里是前代的陈规所能够比试优劣的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善于了解人来确立起国政，重视粮食储备来激励农业生产，设布教化来防范老百姓，整顿军队来奋扬武功。真广大啊！奉持上天的大法，震撼当今，照耀古代，没有哪个朝代能与之相比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国家已经治理了，进一步谋求治

理；道德修养提高了，再一天比一天提高。栋梁一样的贤才已经储备，但甄别提拔更加神妙；粮草杂物已经堆积如山，但更加重视输送；不顺从教化的人已经由近处责罚到远处，但要加倍强化识别；军事训练已经熟悉，但要进一步激励将士英勇威武。治理群臣的爵禄赏罚等八种方法的驾驭尊崇了，各种作物果实的收成丰富了，智、仁等六种德行的逐渐磨练厚实了，弓箭等五种兵器的训练精熟了，张布那帝舜功业的高大巍峨，显示那商汤的庄严雄伟，体察唐尧，追踪虞舜，铸造殷商，陶冶周朝。我们国家亿万年政治清明的绵长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吴福年　殿试对策

吴福年（生卒年不详）　字竹岩，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探花，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举贤者，任官之本；裕食者，藏富之基；型方者，敦俗之原；经武者，壮猷之要。自古帝王斟元御宇，锡极临宸。以简循良，则经纶助理焉；以图积贮，则乐利蒙庥焉；以广甄陶，则平章奏绩焉；以伸讨伐。则顽梗畏威焉。稽诸往籍，于《易》而笾连茹，于《书》而详播谷，于《传》而严去莠，于《诗》而颂惩荆。茂矩隆仪，粲然具备。用是考行考艺，才俊登也；乃积乃仓，储藏厚也；引恬引养，彝训遵也；有翼有严，精良备也。所由扬骏烈，播洪庥，备五福而协庶征者，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恩隆鼎养，治溥丰绥，勤观省于方陬，系师贞于步伐。固已四门是辟而百室常盈，万姓允怀而六军皆振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廑蓺菲之无遗，冀刍荛之可采，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崇贤俊、实仓储、正民风、修武备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述平昔之所诵习者，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天下者,莫重乎进贤用人,而因讲求吁俊之方,选举之道。此诚澄叙官方之要务也。臣考《舜典》论明试,《皋陶谟》论知人,想见帝世官人郑重,真有进贤如不得已者。乃若张良之未遇也,其言如以水沃石,莫之或受。及遇沛公,如以石投水,莫之或逆。王景略之谒苻坚,一见如旧,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是皆君臣相得,取决于立谈之顷者。岂知人则哲,后世能胜前代乎?盖执慎举以用人,必考察之有素,千载尚之;操特识以拔人,为鉴赏之非常,一时行之。夫君子为盍簪,小人为朋比,人以类从,其说近是。然如诸葛亮、李泌、司马光之贤,其所荐举,或假智术以希荣,或挟经术以误国,何失人若此!所谓大智若愚,大诈若忠,或外忠而内奸,或始贤而终佞,察辨良非易易。其于圣言曰:取人以身。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浚源之论,多昧之耳。要之,识微知著,必当烛之于其先;斯位事建官,不致悔之于其后。持进退之权者辨之,宜早辨也。圣朝灼见克知,道隆黜陟,凡百臣工,孰不谨官常以熙庶绩哉!

制策又以食为民天,因详稽夫历代储蓄之经,转漕之法。此诚足国养民之至计也。臣按《周礼》,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其法甚备。至汉耿寿昌设常平仓,隋长孙平设义仓,朱子有社仓之设,大意谷贱则增价籴之以利农,谷贵则减价粜之以利民,法皆平粜而已。然不得治人,遂难久行。夫粟之出于民,而聚于官也。《元史》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为今制所由昉。顾天庾转输,必假丁胥之手,乃或回漕以弥其阙,或搀和以混其真。是必严杜诸弊,然后仓储得实。平粜斯克便民,有如筑富人仓,置东西市;管子通轻重之权,为守国守谷之说;李悝济缓急之用,为籴三籴二籴一之论;宇文融之益贮九谷,孙成之发仓贱售。有可采焉。盖其始输纳,不受胥役之奸,则谷皆精足,仓贮自必可久。其后粜籴,能通农民之余,则货有酌剂,市价自无不平。而又权乎岁之丰歉,时之久暂,地之燥湿,以为敛散。岂犹虑有储积红朽之虞,售易腾踊之患哉?皇上轸念民依,廑思足食,斯跻仁寿于群生,普丰亨于寰宇矣。

制策又以正俗所以化民,安良必先除莠,因勤思夫摩义渐仁之治。臣考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坊记》一篇,不下

数千百言，凡以坊民之邪慝而已。《周礼》设禁暴之官，《王制》著左道之律，彰善瘅恶，法纪严明。无如乡曲蠢愚，当夫邪说明兴，诱于祸福，敛钱聚众，焚香诵经。若于此概从严禁，恐吏胥因而需索，即祈报蜡社，亦肆诛求。若虑闾阎之滋扰，而稍弛其防，又恐姑息养奸，久而难制，一旦举发，酿成巨案。宽猛皆失，何以为治？惟在明唐虞夏商周之道，述仁义礼智信之言，官府为之表彰宣布，而士大夫读书明理，日以名教遍传于乡里间，崇正术，黜邪说，俾小民耳濡目染，异论无以惑其志，利欲无以动其心，匪徒无以售其奸，党役无以乘其隙。而平日之为民上者，又不可不豫为之防，密为之访，散其党羽，杜其萌芽，将见潜移默率，背伪归真，经正民兴，清源正本，庶草野无奇邪之作，编氓知道路之遵，又安有奸宄滋生而甘自罹于刑辟者欤？圣天子教养兼隆，风同道一，正德、利用、厚生成三事，和亲、康乐、安平为一书，光天之下，有不薰德善良，勉为太平之民哉！

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因切夫整饬戎行、设兵卫民之意。臣考三代以前，寓兵于农。凡民皆兵，无所谓兵也，天下之六军寄于六卿，亦无所谓将也。无事则为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有事则为伍、两、卒、旅、师、军，此成周之制也。沿及春秋，晋作爰田，楚分两广，古制日紊，兵法日增。郑庄公始寝车战，而出徒以取胜。赵武灵王又变车战，而用骑以制敌。嗣从崇卒用徒，车战尽废，非古制之不宜，亦时尚之各异也。汉则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诚得居重驭轻、内外相制之道。唐置府兵，将居于朝，兵居于府，将无握兵之权，兵亦未尝无事而食，其法最为近古。后又改为矿骑，而府兵之名于是废矣。宋惩唐末藩镇之强，因收节度之权，改为更调。明置五军都督府，犹有唐府兵遗意，亦即宋收兵权之法。后改为十二团营，又改为三大营，或置或废，复古殊难。要之克敌在兵，制兵在将，必将将之能得其道，而后将兵之尽得其人矣。我朝文德诞敷，承平奕祀。士尽干城，偃武而不忘武备；人同袍泽，用威而远畅威权。磐石无虞，金汤永固，诚郅治之隆也。

若此者：广登进之阶，以资辅弼；充仓箱之数，以裕盖藏；遏诐张之习，以返敦庞；昭震叠之容，以娴韬略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

安益求安。英才已萃，而犹念招弓；解阜已歌，而尚谋比栉；风俗已端，而弥宏振铎；纠桓已著，而倍切止戈。槐棘之济跄盛矣，稼穑之利赖隆矣，黔黎之淳朴完矣，干羽之声灵著矣。由是焕丕天之大律，延亘古之上仪，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选拔贤才，这是任用官员的根本；粮食充裕，这是库存丰富的基础；效法先王的榜样训导四方，这是使民风厚道的本原；讲求武备，这是扩展宏图的要务。自古以来，帝王斟酌原始状态，统治天下，赐给百姓最高准则，高居统治中心。用来选拔贤良的官员，就筹措大事辅助治理了；用来规划积蓄贮存，那就百姓得到他们所乐意、所便利的东西，蒙受吉福了；用来推行教化，扩大范围，那就辨别明晰，奏报成绩了；用来申张讨伐，那就顽固抗拒的人畏惧威力了。考察从前的典籍，在《周易》中预测拔一根茅草而连带起一片，即贤才连类同进；在《尚书》中详记播种谷物；在《春秋左氏传》中强调务必去除掉坏人；在《诗经》中歌颂楚国被鲁国军队所惩创。盛大隆重的规制法式，闪现光辉，一样不缺。因而考核德行，考核本领，杰出的人才就得到进用；露天堆粮，仓库囤粮，储备贮藏就十分丰厚；长久地安定百姓，长久地养护百姓，人伦纲常就得到遵行；又敬慎，又威严，精兵良将就都不缺少。之所以奋扬盛大的功业，播布宏大的吉福，使长寿、富贵等五福样样具备，又同各种气候征兆相对应，就是赖有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对贤才的恩惠比用鼎煮食物来养护圣贤还要重，治理的业绩比周武王时年年丰收、安定万国还要大，经常对各地进行视察而设布教化，把军队奉行正道拴系在进攻、刺杀技艺的训练上。本来就已经明堂四门大开迎候来宾，百间储藏屋室时时充盈，全天下人真诚感念，中央正规部队全都振奋了。可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仍像帝尧那样对询问事体十分关切，注重一德可取也不让他遗漏掉，希望割草打柴人的言论也可采择，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推崇贤能英杰、充实官仓储备、端正民间风气、修

明军事防卫等重大的政务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里足够用来明了大体与纲要?但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候,恭敬地追念向帝王拜见献纳,首先要筹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陈述自己平生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献上见解极其狭窄肤浅的一点儿忠心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治理天下的举措，没有比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更重要的了。据此讲求呼吁英杰到来的方法和选拔举用的途径。这确实是澄清理顺做官应当遵循的常规的首要事情啊!臣下我考查《尚书·舜典》讲论严格考核施政的成绩,《尚书·皋陶谟》讲论确能了解人,由此可以想见在够得上“帝”这个称号的时代,把官职授付给一个人,十分郑重,真有进用贤能如同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才必须这样做一样。至于像西汉的张良，在他尚未得遇明主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计策就像用水去浇石块，没有谁或许还采纳。等到得遇在沛县起兵、时称沛公的刘邦,就如同把石块投入水中,没有一条计策或许还拒绝不用。王猛去拜见前秦国王苻坚,两人一见如故,谈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就如同两件物品凭证却对应得丝毫不差。这都属于君臣相互遇合，在当面交谈的顷刻之间就做出决断来的。这哪里是确能了解人,才真够得上明智,后世在这一点上会超过前代去呢？因为奉守谨慎选拔的原则来任用一个人，一定要考察他很长时间,非常熟悉,对此历代都加以重视。凭借超常的识别力来提拔一个人,属于鉴别赏识的特殊情况,对此只是一时间来行用。君子致力于德业会合,小人致力于勾结抱团,人按类别各自归属一方。这种说法接近正确。然而像三国蜀汉诸葛亮、唐朝李泌、北宋司马光那样贤明,可他们所荐举的人,有的借助小聪明来希求名声,有的挟持儒家经学来败坏国家,为什么在用人上失误到这种地步呢!人们常说的最聪明的人却像很愚笨一样,最奸诈的人却像很忠诚一样;有的表面上显得很忠诚,骨子是却很奸诈;有的在起初阶段很贤良,到最后却迎合献媚。这说明,察识辨别确实不是特别容易的。这在孔老夫子那里的说法是:选用人才要凭君主自身的修养。程颐也说:在自己这方面能够了解学说,穷尽道理,就能靠这两点辨别人。这种挖掘根源的论

断，大多对它很不清楚罢了。总之，见微行著，一定要在前面洞察出一切；这样一来，安排职责，委任官衔，不致于到后面再悔恨。对进用还是斥退他拿不定主意的人，要辨别他，应当及早作辨别啊！圣明的我朝，很清楚贤才的心地，能了解各司其职的官员们的想法，对降职提职的原则与方法特别重视，只要是百官中的成员，有谁不对做官应当遵循的常规特谨慎，来使各种政事处理得特圆满呢？

制策又认为吃饭问题是老百姓的首要问题，据此而详细考察历代储备粮食的常规，水路转运的方法。这确实是使国家富足、养护百姓的最重要的大计啊！臣下我考查《周礼》，仓人这一职官负责贮藏国家征收的粮食，旅师这一职官负责聚集田野的各种谷物，遗人这一职官负责国家的剩余物资，这种制度特别完备。到西汉耿寿昌创设常平仓，隋朝长孙平创设义仓，南宋朱熹又有社仓的创设，基本意图都在于粮食不值钱就提高价格购入官仓来有利农业生产，粮食值钱就降低价格抛售出去来有利百姓，基本做法都是保持粮食价格稳定而已。但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很难长时间施行。粮食从百姓那里拿出来，聚集到官府。《元史》所记载的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也就是我朝这方面制度的由来。但皇家仓库转运输送，必定要通过服役者和办事人员来办理，有的竟大量扣除水路运送的损耗，来填补亏空，有的掺杂进劣质的东西，来和真正的上等米混在一块。这就必须严密杜绝各种弊病，然后仓库储存才落到实处。保持粮食价格稳定，目的是便利百姓。例如北齐修筑富人仓，唐朝在京师设置东市和西市两大贸易场所；春秋管仲要使货币流通的手段得到实现，提出保卫国家就要掌握住粮食的主张；战国李悝为解决丰年荒年的调济问题，倡行在丰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四百石中的三百石、在平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三百石中的二百石、在歉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一百石中的五十石的说法；唐朝宇文融增加包括大豆、小豆在内的九种谷物的贮藏，唐朝孙成在大旱之年打开信州的官仓贱价卖给农民粮食。这些理论和实际做法，都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因为当起初交纳时，不遭受办事人员和役夫在中间做手脚，谷物都质量好，份量足，入库贮存自然就一定能时间长久。到后来卖出购入，能使农民余粮

转动起来,货物就有调剂,市面上的价格自然没有不稳定的。况且又估量到年景的好坏,贮存时间的长短,地点容易发干还是容易受潮,据此进行敛集和散发,难道还担心会出现储存发霉腐烂的忧愁,售出陈粮换成新粮会物价飞涨的祸害吗?皇上您深切体念百姓的痛苦,勉力思索粮食充足,这真是把百姓带入了仁德长寿的境地,使富裕安乐遍布到全天下了。

制策又鉴于端正社会风气是用来化导百姓,安定良善一定要首先去除掉坏人。据此殷切考虑磨砺道义、逐渐步入仁德的治理办法。臣下我考查,西周司徒负责修明成年加冠礼和婚礼等六种礼仪,来节制老百姓的性情,宣明父子、兄弟、夫妇等七种人伦关系,来振兴起老百姓的德行。《礼记·坊记》这篇经文,不少于成百上千个字,都是用来防范老百姓的邪恶罢了。《周礼》设有禁止暴乱的官员,《礼记·王制》强化对歪门邪道予以严惩的法律,表彰良善,使奸恶畏惧,法纪十分严明。但无奈乡间的百姓太愚蠢,碰上邪说公开宣扬的时候,被信奉与否就会招祸得福所诱惑,集中钱物,聚合众人,烧香念经。如果对这类活动一律按严厉禁绝来处置,恐怕官府办事人员就会趁机进行勒索,即使是祭天祭神这类与农耕有关的例行活动,也会大肆逼交钱物。如果担心在民间蔓延,扰乱社会秩序,而略微放松防备,又恐怕姑息养奸,时间一长,很难控制,一旦造起反来,就酿成重大的案件。宽缓与严厉都没把握住,靠什么形成治理呢?对策只在于宣明尧舜和夏商周的治理原则与方法,转述仁德、道义、礼仪、明智、诚信的说法,由官府向百姓们讲明白,宣传开,而士大夫研读经书,清楚道理,每天用名分礼教在乡村里社内普遍传布,尊崇纯正的儒学,摒弃邪恶的理论,使普通老百姓耳濡目染,叫与正道背离的言论没办法迷惑他们的头脑,求利的欲望没办法打动他们的心思,匪徒没办法兜售奸谋,替官府办杂事的人没办法钻空子。而平常作为百姓上司的人,又不能不事先对邪说的宣扬者进行防范,暗地加以刺探,离散他们的党羽,堵塞住他们的初期活动,这就将会看到潜移默化,背离虚假,归向本真,大道端正,民众振奋,澄清源头,端正根基,差不多民间没有诡异欺诈的现象发生,百姓知道朝着不该有私人偏好、不该作恶的道

路上走了。这还哪里会有内外奸恶滋生而甘愿自行落入杀头之罪的人呢?我朝圣明的天子教化民众和养护民众同时隆盛,社会风气完全相同,道德完全一致。端正德行给下面做出榜样,物尽其用,使百姓生活宽裕,构成了像大禹所说的这三大政事;和睦亲近、康宁欢乐、安定太平,组成了像《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组成《尚书》中的《虞书》的那样一部经典。光天之下,还有不接受道德的感化,行为善良,努力争当太平盛世的百姓一员的吗?

制策又认为军队可以一百年不动用,但决不能一日没有防备。据此对整顿军队、设置兵马、卫护百姓的意图十分关注。臣下我考查,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把士兵寄寓在农民中。只要是百姓,就全都是士兵,不存在后来所说的士兵啊!天下由王室直接掌握的六军,交付给冢宰、司徒等六位朝廷要员指挥,也不存在后来所说的将帅啊!没有军事行动,就组成管理五家的比长、管理二十五家的闾胥、管理一百家的族师、管理五百家的党正、管理两千五百家的州长、管理一万二千五百家的乡大夫的基层行政系统。遇有军事行动,就组成五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两、一百人为一卒、五百人为一旅,两千五百人为一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的军事编制单位。这是西周的军事制度。延续到春秋时期,晋国创设把田地税收赏给众人的爰田制度,楚国分成左右两列、每列兵车为十五辆的两广编制单位,古代的军事制度就一天比一天紊乱了,作战方法也一天比一天增多了。郑庄公开始让车战不占主要地位,出动步兵来取得胜利。战国赵武灵王又改变车战方式,使用骑兵来制服敌军。以后对重视和使用步兵都予以接受,车战就全被废弃了。这并非是古代的军事制度不适宜,也出于时代的崇尚对象各不相同啊!汉朝在郡国设置番号为材官的地方部队,在京师长安设有南军、北军的驻守。这确实符合占据主要地位来驾驭次要方面、京师地区和地方各处相互挟制的原则。唐朝设置以折冲府为单位的府兵制度,将帅平常都在朝廷上,士兵平常都在本人所属的折冲府辖区内。将帅没有掌握军队的权力,军队也未曾在没遇战事时而由国家白白养起来。这种制度最和古代相接近。后来又改为招募组成的矿骑,而府兵的名称到这时就废除了。宋朝

把唐朝末期藩镇势力强大作为教训，据此剥夺节度使拥兵一方的权力，改成由中央禁卫军轮换驻守军事要地。明朝设置统领中、左、右、前、后军的五军都督府，还有唐朝府兵制度遗留下的用意，这也就是宋朝收回兵权的做法。后来又改为十二团营，又改为名称分别为五军、神机、三千的三大营。时而增设，时而废除，恢复古代的军事制度特别困难。总之，战胜敌人在于士兵，管辖士兵在于将帅，一定要朝廷指挥将帅确能获取到有效的方法，然后将帅和士兵就会全都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了。我大清皇朝文教广泛播布，太平无事一代接一代了。将士都是坚强的捍卫者，止息武力却不忘军备；人人都团结得特别紧密，动用兵威就远扬威势。像磐石那样没有任何忧虑，像金城汤池那样永远坚固，确实属于治理到最完美程度的隆盛局面啊！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扩大官员提拔进用的途径，来对辅佐朝政有所用处了。增多仓库车箱的数目，来使国家储备充裕了。遏制住虚诞放肆的恶习，来使民风返归到淳厚朴实了。显示让人震动惊恐的军威，来使将士熟悉作战计谋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国家已经治理了，进一步谋求治理；国家已经安定了，进一步谋求安定。杰出的人才已经聚集，但仍不忘礼聘贤能；粮食堆成山已经得到歌咏，但还要筹划粮仓密集得像梳篦；社会风气已经端正，但还要进一步扩大民风的察访警示；雄壮威武已经显示，但对止息战争更要倍加注意。朝廷重臣要员的威仪盛明了，农业生产的功用增大了，普通百姓的淳厚朴实完美了，文教感化万国的声名威灵显扬了。由此把奉守上天的大法发扬光大，扩展整个古代的最美好的制度，我们国家亿万年政治清明的绵长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殿试策问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缵膺大宝,统御寰区,中外乂安,于兹二十有七载。仰荷昊苍眷佑,列圣垂庥,敕命时几,兢兢业业。深念通经致用之方,化民成俗之本,藏富裕国之模,除暴诘奸之法,期臻上理,延访维殷。尔多士拜献先资,对扬伊始,冀聆谠论,式赞嘉猷。

自秦燔《六经》,微言中绝。汉兴,除挟书之禁,遗籍间出。诸儒说经者,大抵皆孔门苗裔。商瞿受《易》,六传至田何,其间授受姓名,《史记》与《汉书》互异,何欤?子夏之《诗》,四传至大毛公;左氏受《春秋》,八传至张苍。二家相承之渊源,能备举欤?伏生治《书》,后仓说《礼》,俱不详所自出。或谓伏生受《书》于秦李克,信欤?承后氏之学者,能条其流派否?武帝广厉学官,各家皆立博士,至贞观《正义》之行,前代诸家不复兼存,义归划一,说果善欤?自汉以后,师儒莫盛于宋。程、张皆深于《易》,其传《易》弟子,可略陈欤?朱子《诗》、《礼》二经弟子,其入室者何人欤?

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古昔盛时,民生敦庞,怀忠抱悫,乡闾族党,比户可封,然犹以时读法,纠其过恶,异言异服则有讥,无授无节则弗纳。道德一,风俗同,左道乱众之徒,自无由煽诱以售其怪诞之说。自习尚浇漓,异端蜂起,敛财聚众,结党传教,愚民

无知，转相渐染。岂果迫于饥寒而乃甘冒重辟，以冀其幸免欤？抑牧民者教导无方，俾之陷于邪慝欤？何以使桀黠者革面洗心，愚懦者守分循法，而不为其所惑欤？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韩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傥可丕变欤？

积贮者，生人之大命。《周礼》仓人藏粟，旅师聚粟，遗人委积，储蓄甚备。汉耿寿昌筑常平仓，时称便矣。后汉刘般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内实侵刻百姓。其故安在？当境采买，固虞勒派；采自邻封，又添运费。果何以使官民两不受累欤？成周以后，义、社二仓，立法最善，然行之既久，均不能无弊。社仓之法，隋唐行之，不久便废，至朱子而独有成效。能推本其良法美意欤？《元史》所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即今制所由昉。顾天庾转输，丁胥丛杂，搀和之弊，何以杜之？今欲储积无亏，旱涝有备，转输之法，粜籴之宜，久贮之方，平价之道，不尤宜一一讲求欤？

夫安民必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周官》有比闾族党之制，管仲创轨里连乡之法，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其法至为美备。惟是营汛堡墩之设，不能不寄之兵弁；寺院庵观之察，不能不责之吏胥。赏罚不明，则兵或纵盗；稽查不力，则吏或藏奸。有治法，不尤贵有治人欤？至于洋面辽阔，岛澳险僻，匪徒出没靡常，迫之则潜踪伺隙，缓之则肆掠商旅。其何以绝其接济而捣其巢窟也？夫衣食足则礼义生，所以正本澄源者，果遵何道欤？

凡厥四端：研经以裕儒修，训俗以端化本，储粟以充国赋，禁暴以卫民生，皆立政之大纲，经邦之要道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以敷奏为明试，务收实用，毋摭肤辞。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君子尊敬他所尊敬的人，亲近他所亲近的人。

这种人大概还是有的，我没见到过罢了。

孟子说：我哪里喜欢辩论呢？我是不能不这样做啊！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帝位,统治天下,内外安定,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仰赖上天的眷顾保佑和列祖列宗留下的吉安福庆,奉正天命,时时事事多加小心,兢兢业业。深切考虑通晓经典、用到实处的方法,教化民众、形成风气的根本措施,积蓄财富、国家宽裕的宏伟筹划,消除凶暴、整治奸恶的对策,希望达到最完美的治理境地,延揽访求特别殷切。你们这些读书人向君主拜见进献,首先要谋划好自己的建议,正当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开始的时候,希望听到你们正直的言论,对美好的国家大计有所辅助。

自从秦朝焚烧《六经》,精微深远的儒家学说半路断绝。汉朝建立,废除藏书有罪的禁令,幸存下来的典籍交替在世上重新出现。各位儒士解说经典的,大致上都是孔子学派的继承人。商瞿从孔子那里承受《易经》,历经六次递相传授而到汉初田何,这中间传授人和承受人的姓名,《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互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子夏从孔子那里承受并且每篇又作序言的《诗经》,历经四次递相传授而到汉初大毛公毛亨;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承受《春秋》,历经八次递相传授而到汉初张苍。这两个学术流派先后传承的来龙去脉,能够完整列举出来吗?秦朝博士伏生研究《尚书》,西汉后仓讲说《仪礼》,都不清楚他们是从谁那里承受来的。有人说伏生从秦人李克那里承受《尚书》,确实是这样吗?承受后仓礼学的人,能区分列举出各自的流派与否?汉武帝扩大并加重国家最高学府的教育作用,各个学术流派都设立博士官职,到唐太宗贞观年间《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前代的各个学术流派不再并存,义旨归于官方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果真很好吗?从西汉以后,师长和儒士的教育活动没有比宋朝更兴盛的了。程颐、张载都对《易经》深有研究,他们门下传述其《易经》的弟子,能够简要列举出来吗?朱熹解说《诗经》和《仪礼》这两部经书的承传弟子,其中领会老师学说最深刻的是哪个人呢?

社会风气是国家太平安定的根基,而教育感化实属社会风气怎

么样的本原。古代兴盛时期，民众的生活淳厚朴实，心怀忠诚，保持纯正，在各级基层组织内，家家都被教化到可以封赐爵位土地的地步，但仍旧按固定的时间宣读政令法律，纠正他们的过失罪恶，对歪门邪道和奇装异服就进行稽察，没有迁居的证明书和通行证就不予接纳。道德完全一致，社会风气完全相同，用歪门邪道来扰乱百姓的家伙，自然就没有途径煽动引诱，来兜售他们的怪诞说法。自从社会风尚衰败下来，不合正道的邪说像蜂群一样出笼，敛集钱财，聚合徒众，结成团伙，四处传播邪教，愚昧的百姓不懂得道理，你传我，我传他，渐次受到传染。这难道真是被饥饿寒冷所逼迫而甘愿触犯重刑，来求得侥幸生存吗？还是地方长官教导百姓没有好办法致使他们陷入邪恶奸诈呢？通过什么来使凶暴狡诈的人彻底改悔，愚昧怯懦的人安守本分、遵守法律，而不被那些邪说所迷惑呢？孟子说过：固定不变的大道端正了，老百姓就振奋积极。韩愈也说过：宣明先王的大道来引导他们。按这来做，或许能够民风大变吧？

积蓄储藏粮食，这是世人存活的最根本的大事。《周礼》仓人这一职官负责贮存国家征收的粮食，旅师这一职官负责聚集田野的各种粮食，遗人这一职官负责国家的剩余物资，储备制度十分完备。西汉耿寿昌修筑常平仓，当时都称赞便利百姓了。但东汉刘般认为常平仓在表面上具有便利百姓的美名，在内里实际上是侵夺克扣百姓。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在当地采购粮食，固然担心强令指派；从附近州县采购，又增加运输的费用。到底怎样做能使官方和百姓两方面都不受妨碍呢？西周以后，义仓和社仓这两种官督民办的粮仓，设立的方式最妥善，但施行时间很长以后，都不能不出现弊病。社仓这种方式在隋朝和唐朝施行，不久就名存实亡，到南宋朱熹独有成效。能从根本上推究他那妥善的方法和美好的用意吗？《元史》所记载的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也就是当今我朝这方面制度的由来。但皇家仓库转运输送，强壮的役夫和官府办事人员混杂众多，往精细粮食中掺进劣质东西的弊病，用什么来杜绝它呢？如今打算储存积蓄没有亏损，旱灾水灾都有防备，转运输送的办法，售出购入的合适对策，长久贮存的方式，平抑物价的途径，不更应

该一项一项地讲求吗?

安定民众,必定先要止息住盗贼;而止息住盗贼,没有比保甲制度更有效的了。《周礼》设有五家为一比、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族、五百家为一党的基层管理制度,春秋管仲又创立五家为一轨、五十家为一里、二百家为一连、两千家为一乡的地方行政组织,都是用住在一处、相互熟悉的人,发现耳闻目睹、最为切近的坏事,这类制度最为完善严密。只是营地驻防、军事据点的设置,不能不把它们托付给兵士和低级武官;佛教场所、道教地点的稽察,不能不把它们交给官府办事人员去办。赏赐和惩罚不分明,兵丁就有的放跑盗贼;稽察不十分有力,官府办事人员就有的藏匿坏人。有治理的法度,不是更贵有治理的合适人选吗?至于海面辽阔,岛屿港湾险恶偏僻,匪徒出没无常。加紧对付他们,他们就隐藏起来,等待机会;放松他们,他们就大肆抢掠商人和过路人。用什么办法断绝他们的接应救援,捣毁他们的巢穴老窝呢?吃穿等生活物品充足,礼法道义就产生出来。用来正本清源,到底应遵从什么原则和方法呢?

总共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研究经书来使儒士的修养更深厚,训导民间习俗来端正教化的根本,储备粮食来使国家的收入更充裕,禁绝凶暴来卫护百姓的生计。这都是确立朝政的大纲,治理国家的重要途径。你们这些读书人学习古代的训条,通晓当今的事务,把全面陈奏个人的意见作为朝廷对你们的严格考核,务必要收到实际有用的效果,不要拾取表面的言辞作敷衍。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张之万　会试卷二道

张之万(1811~1897)　字子青,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张之洞之兄。道光二十七年(1847)状元。历官礼部侍郎、江苏巡抚、浙闽总督、兵部尚书,且入军机处。曾汇辑前代帝王及垂帘听政之事上奏于朝,被赐名《治平宝鉴》。先后对抗太平军和捻军。内外任职之处,均有政绩。为人胸襟坦白,宽仁容众。擅绘画,颇得名家神髓。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即贤亲以念前王，其贻君子者至矣。夫贤与亲，君子所并重也。乃溯诸前王，君子之贤亲，何非其贤其亲乎！是可绎《烈文》之诗。且文、武之政，列为九经，而尊贤亲亲并著焉，是岂仅一时之治哉！祖宗培养人才，必食报于孙子；后嗣敦睦宗族，皆推本于先人。当夫骏奔在庙，序爵事也于是，序昭穆也于是。听升歌以迪前光，觉丕显丕承之佑启后人者，为至善矣。试即诗言前王不忘者而绎其旨。今夫我周之治，封建独隆。封建者，固统夫异姓、同姓而贤亲并建者也。而前君子以是垂后，即后君子以是承先。

上古未闻佐命之贤尽为列辟者，上古未闻师保之贤分为藩服者。至我周而尚父封齐，鬻熊封楚。牧野下车而后，四友十乱，偕三恪以同尊。其礼贤也至矣，而其意有深焉者也。显于贤示优崇，隆懋赏懋官之典，即隐以贤留奕祀，裕维桢维干之才。君子能勿念欤？且夫《彖》系《文言》，书箴敬胜，君子之称为贤后，有钦承矣。而辅翼赖贤臣，孰非前王之遗耆？微特毕公历相数朝，君奭犹辅成王也。试思《书》诰君牙，胡思旗常于乃祖；《命》传伯冏，胡念侍御于先王。固以为此日之《彤弓》、《湛露》，皆昔日之砺山带河者也。而《棫朴》、《青莪》之化，愈可推矣。迨至歌《江汉》者，犹拜秬鬯之一卣；盟召陵者，上溯典册于赐履。则君子之贤其贤，岂有尽哉！

上古未闻兄弟之亲出为岳牧者，上古未闻旁支之亲犹列子男者。至我周而元公封鲁，泰伯祀吴。大统既集以来，文昭武穆，尽茅土以示宠。其笃亲也至矣，而其意有微焉者也。明以亲列侯封，联九族子姓之爱，即阴以亲卫王室，建百年屏翰之勋。君子顾弗思欤？且夫视膳日三，梦龄与九，君子之孝以事亲，绍礼典矣。而燕享重懿亲，孰非前王之遗泽？微论应韩亦列侯邦，虞虢并有守土也。即若唐叔冲龄，虽剪桐之言不为戏；蔡仲干蛊，虽郭邻之裔亦可封。固以为此日之瓜绵瓞衍，皆当日之《螽斯》、《麟趾》者也。诵《行苇》、《伐木》之诗，有余欢矣。迨至东迁播越，晋、郑犹曰堪依；宗国来朝，滕、薛终难争

长。则君子之亲其亲，讵有已哉?况夫锡以爵土，即联以婚媾，贤也而其情亦亲；颁之宝玉，即铭之鼎钟，亲也而愈重其贤。贤其贤而亲其亲，前王不信君子之型哉!

特就尊敬贤臣、亲近亲属的问题来追念先王，先王留给君子的处理方法是到了极点了。贤臣与亲属，是君子所一起看重的对象，于是追溯先王，君子尊敬贤臣，亲近亲属，哪一个不是他的贤臣、他的亲属呢?这可以从《诗经》中《烈文》这首诗推究出来。况且周文王、周武王的国政，列布成九条根本大法，而尊敬贤臣、亲近亲属又一起显示在那里面。这哪里仅仅是一时间的治国大法呢?祖宗培养出人才，必定要在子孙后代那里派上用场；继承王位者使宗族淳厚和睦，都推寻根源到先人那里。正当在宗庙急速奔走摘祭祀，公卿大夫在这时按爵位高低，各负其责来助祭；王室宗族在这时按父辈在左、子辈在右的次序排列。倾听献上来的《清庙》乐歌，来光大祖先的功德，领悟文王大谋略、武王大功业而保佑启示后人的东西，真是好到极点了。尝试着去就《烈文》这首诗所说的对前王要念念不忘，来寻求这句话的主旨。如今我周朝治理天下，唯独分封诸侯最为隆盛。分封诸侯，原本就把不是姬姓、同属姬姓的人都包括在内而对贤臣、亲属一起来分封啊!前代君子把这项制度留给后世，也就是后世君子用这项制度来承续前代。

在最古老的时代，并未听说过辅佐君王创建国家的贤臣全都被封为诸侯的；在最古老的时代，也没听说过辅佐君王保有国家的贤臣分别被封为诸侯的。到我周朝，尚父姜子牙被封在齐国，颚熊被封在楚国。牧野大战灭亡商朝以后，被文王引为朋友的四个人和协助武王治理的十个贤臣，同本朝以前的三个王朝的后裔一起蒙赐王侯名号，同样地尊贵。这种礼遇贤臣的做法也达到顶峰了，而用意更有深远的地方啊!在明面上对贤臣表示优待推崇，重视个人致力德业就授给他官职、个人致力功业就赏给他物品的制度，这也就等于在暗地里把贤臣留给世世代代，扩充栋梁一样的辅政人才。君子能对前王不追念吗?况且《周易》中对《乾》、《坤》两卦卦辞作解释的《彖传》还缀附

着《文言》这篇说解文字，赤雀叨给文王的天赐神书，写有恭敬胜过懈怠就吉顺的箴言。君子被称为贤明的国王，具有恭敬的继承了。而辅佐卫护依赖贤良的大臣，他们哪一个又不是前王遗留下的老人？不光是毕公姬高接连辅政好几朝，连召公姬奭还佐助周成王啊！想一想《尚书》中周穆王对新任命为大司徒的君牙发布命令，为什么要让他深思他的祖父和父亲被记录在王室太常旗上受到表彰？《冏命》由周穆王委任伯冏担当太仆正，为什么要让他追念先王时侍从官员那是什么样？这固然是认为今天《彤弓》诗所歌咏的天子赏赐有功的诸侯，《湛露》诗所歌咏的天子宴享诸侯，也就都是从前所立下的泰山变成磨刀石那样小，黄河变成衣带那样细，而封国依然世代相传的誓言啊！而《棫朴》诗所歌咏的善于用人，《菁菁者莪》所歌咏的培养人才，进一步就可以推想了。等到咏唱类似《江汉》诗中诗句的晋文公，仍然答拜周襄王赐给他一樽黑黍芬芳酒；在召陵与楚国订立盟约的齐桓公，仍要往上追溯王室典册曾授权给齐国可以征伐的范围。这就说明，君子尊敬他所尊敬的人，哪里有止境呢？

在最古老的时代，并未听说过兄弟关系却被派出去担任一方最高长官的；在最古老的时代，也没听说过旁系亲属还列居子爵、男爵的爵位的。到我周朝，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封在鲁国，文王的伯父泰伯受到吴国的奉祀。统一天下的事业既已完成，属于文王父辈的各个族系和属于武王子辈的各个族系，划分开来，全都封赐国土来显示宠爱。这种加厚亲情的做法也达到顶峰了，而用意更有微妙的地方啊！在明面上把亲属列入诸侯分封，联结起父族、母族、妻族等九族和同姓之间的爱护，这也就等于暗地里靠亲属来护卫王室，建立起长久保护捍卫的功勋。君子却对前王不思念吗？况且周文王每天要察看三次父亲季历的饮食情况，周武王也照此行事，梦见天帝赐给他九十寿龄，君子用孝敬来侍奉亲人，这就继承礼典了。但平常的招待活动看重关系最近的亲属，他们中哪一个又不是前王给留下的恩惠？不要说应国、韩国也列入诸侯国、虞国、虢国都拥有世袭的领地，就像唐叔姬虞年纪还小，即使其兄周成王在玩耍时把桐叶剪成珪形说是要册封他，也不作为玩笑话来对待。蔡仲姬胡治理前人留下的已坏之事，即

使他是因叛乱被囚禁在边远之地郭邻的蔡叔姬度的儿子，也可以再封为诸侯。这固然是认为今天像大瓜小瓜枝蔓不绝所繁衍的子孙，都是当年《螽斯》诗所歌咏的后妃众多子孙，《麟之趾》所歌咏的振奋有为的公子啊！吟诵《行苇》这首歌颂周室忠厚的诗和《伐木》这首描述宴享朋友故旧的诗，就会高兴得过了头了。等到迁都洛邑，一路风尘，周平王对随驾护送的晋国和郑国还说可以依靠。会盟的小国前来鲁国朝拜，滕侯和薛侯到最后也难争出谁先来行礼。这说明，君子亲近他所亲近的人，哪里有终结的时候呢？况且把爵位国土封赐给异姓诸侯，同时就通过婚姻使他和王室联系在一起，这就尊敬他而对他的情意也如同亲属了。颁发给宝玉，同时也就铭刻在钟鼎等礼器上，这就亲近他而更加看重他的贤能了。尊敬他所尊敬的人，亲近他所亲近的人，前王在这方面不的确是后世君子的榜样吗？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力不足者而果有也，圣人当或见之矣。夫力不足者，夫子若不决其为无也，乃曰盖有，而曰未见，非深叹人之不用力于仁哉？且吾于人，固有悬想焉，而冀其或有者，精进之修也。亦有虚拟焉，而不容决其必无者，昏弱之质也。顾昏弱者，未必无人，而昏弱者非以自诿，必有思致其力。而其昏无自而明、其弱无自而强者，亦何能于不用其力之人而见乎此也。

一日用力于仁，我未见力不足者。人亦不用力于仁耳，夫岂有力不足者哉？然而力不足之说，固不用力者所借以自画，思以矫托也。使我必谓其无，在人必有所不服，在我亦若有所难决。盖尝即力不足者悬拟之：彼苍之赋畀维均，同其理不同其气。理具于性，相近而不相远；气赋为质，有清而即有浊也。设也昏庸之甚而力为之限，将有急欲前而终见其却者，盖亦愚而不移者矣。斯人之生禀不齐，有其纯即有其驳。纯之至者，仁若全于不用力之中；驳之至者，仁亦或难全于用力之际也。设也黾勉殷心而力为之阻，将有切欲进而终见其退者，盖亦困而难通者矣。

盖有之矣，有之不将见之哉！见之则实见其艰苦于用力之时，而非徒逊谢；见之则确见其迫切于用力之后，而非甘委靡。如是而曰力不足，则真不足矣。而我试以质之：或有以证诸我之所见，果见耶？未也。必以我之未见，而即指为人之必无，则以我所见之隘，转以没力不足者之真。顾有之自有真也，人犹得借以自画乎？未尝好仁，而曰吾力不足以好；未尝恶不仁，而曰吾力不足以恶。识力有可启之机，乃初非研穷之无益，直见其习焉而不察也，斯道谁自励矣。果孰是明不足以察其几者？殊觉我阅历之久，而未之或遇耳。必以人之所共见，而强谓我之所未见，则以我所见之偏，反以失力不足者之实。顾有之有其实也，人犹可思以矫托乎？游移以为好，而曰吾好之，力已竭；因循以为恶，而曰吾恶之，力已尽。修途有可至之程，乃初非中道之竟废，直见其裹足而不前也，斯人多自弃矣。果孰是健不足以致其决者？殊令我环顾之余，而未之或睹耳。我未之见也，人之不用力于仁，顾得曰力不足哉？

在仁德修养上力量不够用的人确实存在，圣人应是有时候见到过的了。这种力量不够用的人，孔老夫子好像不断定他们不存在，却说大概还是有的，又说没见过，这不正是深深慨叹世人在仁德修养上不使用力量吗？况且我对于世人，原本上具有一种设想，希望力量不够用的人或许存在，这是因为他们还可以在精修上进方面下功夫啊！同时还有一种假设，不容许断定绝对没有力量不够用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天赋就昏昧脆弱啊！但昏昧脆弱的人，不一定就不个别存在，可昏昧脆弱的人不借此自我推脱，就一定想用力量。而他那昏昧没有缘由就变得明智、他那脆弱没有缘由就变得坚强的人，又怎么会超过不用他那力量的人，而在这方面显现出来呢！

只要有那么一天在仁德修养上使用力量，我未曾见到过力量不够用的人。人们也只是在仁德修养上不使用力量罢了，哪里存在着力量不够用的呢？然而力量不够用这种说法，压根上是不使用力量的人，借助它给自己作打算，想用它做个推脱的理由啊！假设我一定说根本就没有力量不够用的人，在世人那里必定会有所不服，在我这里

也好像有难作决断的了。曾经专就力量不够用的人作过设想比拟：上天所赋予授给的全都一样，道理相同而气类不同。道理都存在于性情中，性情相互接近但不相差很远；气类所赋予的成为资质，资质具有清纯也就具有浑浊。假设昏庸到极点而力量受到限制，就会出现特别想往仁德方面走、但最后却见他停止下来的人，这类人也就大概是愚蠢而无法改变的人了。世人天生的禀性不一样，具有纯正也就具有驳杂。纯正到极点的人，仁德好像在不用力量中就完全具备了；驳杂到极点的人，仁德也有的在用力用到头时也难以完全具备啊！假设勤勉心切而力量受到阻遏，就会出现十分想往仁德方面迈进、但最后却见他后退的人，这类人也就大概是困顿住而难以通明的人了。

大概存在着在仁德修养上力量不够用的人，既然这种人存在，不就会见到这种人吗！见到这种人实际上是在他用力很艰苦时见到他，而不是在他只是推脱自己不行时见到他；见到这种人实际上是在他用力很迫切以后见到他，而不是在他甘心不振作时见到他。像这样却说力量不够用，那就真是不够用了。但我尝试着来验核：或许真有根据证实我所见到的这种人，但果真见到了吗？并没有见到。一定要凭借我没见到，就指说这种人一定不存在，就会用我见闻狭隘，反过来掩没了力量不够用的人的真实状况。但这种人存在，他就自然具有他的真实状况，世人还能够借口力量不够用来给自己作打算吗？未曾喜好仁德，却说我力量不够用而去喜好；未曾厌恶不仁德，却说我力量不够用而去厌恶。识别的能力具有可以开启的时机，但起初并非穷究事理、研求微妙之处没有益处，只可看出他习惯于常情却不深入察辨啊！这种仁德的修养道路，有谁自己真去勉励自己了。到底谁是知道力量不够用而去察辨那微妙之处的人呢？特别感到我阅历很长，但却没有遇到过在仁德修养上力量不够用的人。一定要拿世人所共同见到的那种人坚持理由而说我未曾见到过，就会用我见闻片面，反过来湮灭掉力量不够用的人的实际情形。但这种人存在，他就具有他的实际情形，世人还能想用力量不够用来作推脱的借口吗？游移不定却认为这是喜好仁德，而说我喜好仁德，力量就已经没有了；

四平八稳却认为这是厌恶不仁德,而说我厌恶不仁德,力量就已经到头了。修养的道路具有可以达到目标的整个过程,但起初并不是中途就要完全废弃,只可看出他裹足不前啊!这是人们大多自己废弃自己了。到底谁是把那力量不足再振奋起来、去实现他那决计要达到的目标的人呢?这很让我在四面观察以后,却没有见到啊!我尽管没有见到,可世人在仁德修养上不用力量,却能说力量不够用吗?

张之万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典学在于崇经,敷教所以正俗,藏富斯能裕国,禁暴乃可安良。综观往籍,《易》著观文之象,《礼》详读法之条,《诗》传高廪之歌,《书》重诘奸之政。自古帝王莫图席瑞,松栋凝庥。以重淹通,则鸿都示范也;以宏教泽,则象魏悬书也;以储仓庾,则鱼梦占丰也;以禁奇邪,则骏声著烈也。茂矩隆义,粲然具备。用能是训是行,雪澡勤焉;无偏无党,星好同焉;如墉如栉,露积崇焉;相友相助,风移速焉。所由熙春泳化,函夏归仁,合寰宇而跻之于仁寿者,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范围万有,帱载群生,则古圣以同民,体至仁以育物。固已《六经》毕贯而五教在宽,亿秭有余而兆民於变矣。乃圣怀冲挹,深维长治久安之道,愈切持盈保泰之思,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敦经学、广教育、筹积贮、严保甲诸大政。臣之愚昧,奚补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陈素所诵习者,以勉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通经为致用之方,而因考经学之源流。此诚首崇经训之至意也。臣考秦燔《六经》而后,惟《易》一卜筮独存。汉初言《易》,首推田何,而田何实出自商瞿。其间授受相承,如子庸、子弓、子家、子乘辈,皆精于传述者。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顾有谓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者;有谓子夏授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者。其说互有异也。张苍之《左氏》,传自荀、虞;荀、虞而上为铎椒,为吴起,为曾申。渊源盖有自矣。伏生治《书》由口授,《隋经籍志》曰:伏生口传二十八篇,以授同郡张生,惟不详所自出。若夫《礼》,周

公所作也。汉初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为《曲台记》。苍授戴德、戴圣与庆普，而三家之学以立。当文帝时，广游学之路，各家皆立博士，彼时书籍间出，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殆歧说之所由启也。汉以后，师儒之际，于宋为盛，而程、张尤深邃于《易》。朱震《易集传》、《易图》、《丛说》，自谓学宗程子，乃合程、张、郑、王而为一，朱子犹谓其不免舛讹。至若朱子《诗》、《礼》二经，非精于《传》、《说》，其孰克升堂而入室也。皇上稽古右文，儒风丕振，多士观光鼓舞，孰不争自濯磨也哉！

制策又以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因求所为正本清源之计。臣按《礼》称，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古昔盛时，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庶几道一风同矣。而犹设奇邪之禁，严左道之诛，无非冀斯世共归荡平正直之路，如泥之在钧，金之在锻，惟甄者之所为，冶者之所铸焉耳。逮叔世，民惑于谩妄之言，诱于祸福之说，而匪徒遂得乘机鼓动，转相煽惑，习为固然。虽身陷重辟，而犹不自知。夫民非不良也，俗非本偷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故蔑礼背义而俗不长厚也。今将使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嗜欲源灭，廉耻心生，固非文诰科条所能奏功也，则惟司化导于未发，严创惩于已萌。董之以师儒，则贤得民而道得民，人尽生其观感；治之以长吏，则乐防情而礼防伪，世日进于敦庞。革面者且革心焉。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韩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先贤名言，洵治致圭臬矣。皇上道德齐礼为天下先，生斯世者，不已臻康乐和亲之治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而因讲求夫利民之实政。此诚足国裕民之至计也。臣考《周官》之制，仓人掌粟入之藏，遗人掌委积之法，而积贮昉焉。魏李悝之言曰：谷贵则伤民，谷贱则伤农。因视岁之上中下，平其价以便民。厥后耿寿昌师其意，筑常平仓，一时称便。但出入在官，侵渔不免，当买补时，有抑价以累富户者矣。甚或豪右为奸，一有糜烂，即贷于农而责补，以累贫民。此刘般所以有侵刻百姓之说也。义仓起于长孙平，当社立仓，丰敛歉散，法更便矣，而胡寅谓弊在书吏侵蚀。社仓肇于朱子，初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贷民，冬收息，随年敛散。行之十有四年，得息米三千余石。其良法美意，洵

足称矣，而马端临谓弊在所司非人。夫天庾正供，贵在转输。昔人论运之要务，在粮不挂筹，军无借欠，道不守冻，故回漕搀和之弊绝。若夫粜籴务平，则惟善立踊程，严加察核，务使吏胥不得营私，民间无所抑勒，囤积者无红朽之虞，售易者无腾踊之患，庶乎出纳有节，敛散有时，官与民两无所累，而仓庾自此充矣。皇上轸念民依，至深且远，固已家给人足而万姓共乐康平也。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而念衣食足则礼义生。此尤探本之说也。臣闻古者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使之相保相守。无事属之司徒，有事隶于司马。夜则声相闻，昼则目相识。法至善也。管子轨里连乡之法，犹得《周官》遗意。汉制亭有长，乡有三老、啬夫、游徼。唐以百户为里、坊、村，每里各置正一人，于是奸民无漏网之幸，胥役无苛索之烦。盖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动息易知，形踪难掩。而又营汛设其人，墩堡详其制，寺院必有巡，庵观必有察，以杜奸民，以安良善，是在良有司之实力奉行耳。顾弭盗之要，尤在海防。海之风候不齐，则盗之出没靡定。是必遏于远洋而使不常厥居，御于近洋而使不得傍岸。严攻守以绝外来之奸匪，密稽察以靖内地之奸民。锄其暴而诛其奸，务期良莠之不杂；抚其来而散其党，更无虞枝蔓之难图已。夫惩盗于已然，不如弭盗于未然。诚使亲民之吏，于惩创之余，寓董劝之意，民生已厚犹阜利之，诰诫已谆犹茂正之，斯相与观感兴起，渐仁摩义，而邪慝自无也。国家仁育义正，易俗移风，生斯世者，其孰敢自外于生成哉？

若此者：鸿交以积富，蚁慕以成风，蟹输以纳赋，鹰逐以惩奸。廓帝纮，信景铄，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本励精图治之诚，臻累洽重熙之盛。蓬山数典，而讲贯弥殷；蒂屋承休，而化导倍至；朴庾告充，而益勤储峙；草窃敛迹，而更切观惩。于以淳洪鬯之德，大茂世之规，上畅九垓，下溯八埏，聿迓天庥，诞膺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始终常念学习，在于推崇经书；广泛施

布教化，用来端正社会风气；储备富足，这就能使国家宽裕；禁绝暴乱，才会安定良善。综合观览以往的典籍，《易经》显示观察礼教文化的卦象，《周礼》详述宣读政令法律的规定，《诗经》传颂高大仓库的诗篇，《尚书》重视整治奸恶的政事。自古以来，帝王罗列图籍作成垫席，招致各种罕见的祥瑞；殿柱上生出青松，凝聚起各种福庆。用来推崇学识渊博的人，就在鸿都这类国家学府树立典范；用来扩大教化的恩泽，就在宫门门阙上悬挂成文的法令；用来使仓库富有储存，就梦见蝗虫变成鱼预测丰年；用来禁绝奸恶欺诈，就张布声威，显扬威力。盛大隆重的规制法式，闪现光辉，一样不缺。因而能够既训导又执行，加强思想品德修养就很勤勉了；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百姓喜好不同也就相同了；粮食高得像城墙，密得像梳蓖，露天堆积就耸立了；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社会风气的改变就迅速了。之所以在美好的春天歌咏教化，全华夏归向仁德，整个天下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统括所有的事物，覆盖托载一切生灵，效法古代的圣帝明王来规范百姓，体念最深厚的仁德来抚育万物。原本上就已经《六经》完全贯遍，父义、子孝等五种教化旨在宽厚，高大粮仓亿亿座还数不完，众多百姓递变而达到和善了。可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却谦虚自抑，深深思考长治久安的办法，进一步强化守护盛大功业、保持顺畅平安的意念，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促进经学、扩大教育、筹划储备、加强保甲制度等重大的政务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里能对高山大海有所补益？但正值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候，恭敬地追念向帝王拜见献纳，首先要筹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敢不恭谨陈述自己平常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勉力献上一把土、一滴水的微小佐助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通晓经典，形成用到实处的方法，据此而考察经学的发展过程。这确实是首先要尊崇经书训示的最深的用意啊！臣下我考察，秦朝焚烧《六经》以后，只有《易经》这部占卜预测的书籍留存下来。汉朝初期讲授《易经》的，第一个人要数淄川人田何，但田何实际上是出自孔子的高徒商瞿。在这过程当中传授

与承受递接连接，像鲁国人桥子庸、江东人驺子弓、燕国人周子家、东武人孙子乘这些人，都是对传述很精通的人。汉初赵国人毛苌，擅长解说《诗经》，自称是孔子高徒子夏所传授下来的。但有的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历经四次递相传授而到小毛公毛苌的。也有的说子夏传授给鲁国人曾申，历经五次递相传授而到大毛公河间人毛亨的。关于《诗经》传授与承受系统的说法，相互存在着歧异。汉初张苍所研习的《春秋左氏传》，从战国赵国人荀况、虞卿那里传授下来。荀况、虞卿再往上是楚国人铎椒，是卫国人吴起，是鲁国人曾申。这一学派的本源大致上也就具有来历了。秦博士济南人伏生在汉初研习《尚书》，通过口头讲述来传授。《隋书·经籍志》上说，伏生口传二十八篇，拿这二十八篇传授给同郡人张生，但没说明伏生是从哪里承受来的。至于《仪礼》，属于周公姬旦所创作的经典。汉初鲁国人高堂生传授《仪礼》十七篇，到宣帝时，东海人后苍对师说最为通晓，写成《后氏曲台记》。后苍又传授给梁国人戴德、戴圣和沛县人庆普，这三家的礼学被朝廷正式承认。在汉文帝时，扩大各地士子到京师来学习的途径，各个学派都设立博士官职，那时书籍交替在世上重新出现，诸子百家还被大批确立为国家学府的讲授科目，这大概是导致各种不同学说流行的开端啊！汉朝以后，师长和儒士的教育活动得到发展的机遇，要数在宋朝最为兴盛，而程颐、张载更对《易经》具有深入的研究。南宋翰林学士朱震编撰《易集传》、《易图》和《易传丛说》，自称在学术观点上宗奉程颐，于是综合程颐、张载、东汉郑玄、曹魏王弼的说法，成为一个体系。但朱熹仍然指摘他免不掉违背原意和错误的地方。至于朱熹所解说的《诗经》和《仪礼》这两部经典，不是对他《诗集传》和《古礼经传通解》特别精通，又有谁能成为他的高明弟子呢？皇上您考察古代，推崇文教，儒士的风尚得到大振，众多的读书人看到国家的盛况，谁不争相自觉地洗涤和磨练自己呢！

制策又认为社会风气是国家太平安定的根基，而教育感化实属社会风气怎么样的本原，据此谋求能够正本清源的对策。臣下我考察《礼记》中说，天子命令掌管音乐的太师陈奏各地的诗歌，来观察民间的风尚。古代强盛时，修明成年加冠礼和婚礼等六种礼仪来节制

老百姓的性情，宣明父子、兄弟、夫妇等七种人伦关系来振兴起老百姓的德行，差不多就道德完全一致，社会风气完全相同了。但仍然设布奸恶欺诈的禁令，加重对歪门邪道的惩罚，不过是希望这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归向宽广、平坦、正直的帝王所指明的道路，好像泥土在转轮上，铜铁在砧石上，任凭制陶的人去磨制，打造的人去打造罢了。等到到了衰败的时代，老百姓被虚妄欺诈的言论所迷惑，被信奉与否就招祸得福的说法所引诱，而匪徒就得以乘机鼓动，辗转煽惑，让人看得很习惯了，即使本人陷入重刑，仍然不能自我醒悟。老百姓不是不良善啊，民间风尚不是原本就不厚道啊！父兄的教导不施行在前面，子弟的遵从也不恭谨，所以蔑视礼法，违背道义，而民间风尚就不宽容厚道了呀！如今打算洗去冲掉各种脏东西而像镜面那样特清洁，让嗜好与欲望的根源灭绝掉，廉洁和知道羞耻的意识产生出来，固然不是书面命令和做出各项规定所能形成功效的，那就只有在尚未萌发时进行教化和引导，在已经萌动后严加打击和惩办。靠师长和儒士督导百姓，就会凭借贤惠争取到百姓，凭借道德争取到百姓，每个人全都形成实际观看后的感化。靠地方官员治理百姓，就会通过音乐来防止情欲，通过礼法来防止欺诈，世风一天天进入到淳厚朴实的状态。改正小毛病的人，进一步转变了思想。孟子说过，固定不变的大道端正了，百姓们就会振奋积极。唐朝韩愈也说过，宣明先王的大道来引导他们。古代贤人的名言，确实是实现大治的准则。皇上您用仁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整顿百姓，给天下做出了表率，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不已经步入安宁欢乐、和睦亲近的治理状态了吗？

制策又认为积蓄储藏粮食，这是世人存活的最根本的大事，据此而讲求便利民众的实际政务。这确实是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的最重要的大计啊！臣下我考查《周礼》所定立的制度，仓人这一职官掌管国家所征收的粮食的储藏，遗人这一职官掌管国家剩余物资的管理规则，而后世的积蓄储藏，由此开了头。战国时魏国的李悝主张说，粮食价格高，就会损害百姓；粮食价格低，就会损害农业。因而根据年景是丰年、平年还是歉年，稳定粮食价格来便利百姓。后来西汉的耿寿昌取法李悝的意旨，修建常平仓，一时间都称说便利。但售出和

购入粮食都由官府决定，侵占贪污不可避免。当买入粮食补充库存时，出现压低价格来使富户受损害的现象了。甚至地方豪强做手脚，一有粮食发霉腐烂，立刻就借给农民，规定到时间偿还，致使贫困百姓受损害。这是东汉刘般提出常平仓侵夺克扣百姓这种说法的原因。义仓由隋朝长孙平开始创设，在里社所在地建立粮库，丰收年就敛集，歉收年就散发，这种做法就更加便利了，但宋朝的胡寅认为义仓的弊病在于管理帐目的人员侵吞剥蚀。社仓由南宋朱熹创办，开始时向州府申请，获得常平仓拨付的谷米六百石，在夏季借给农民，冬季收取利息，按照年景敛集散发。实行了十四年，获得利息谷米三千多石。这种妥善的做法和美好的用意，实在是值得称赞了，但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认为弊病在于主管人员没有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国家法定征集的粮米库存，需要重视的是搞好转运输送。前人论述运送的重要事项，在于粮食不账目空悬，军队不存在挪借拖欠，路上不等冰冻，所以大量扣除水路运输的损耗和掺入劣质东西的弊病就杜绝了。至于抛售和购进粮食，务必要保持价格稳定，就只有妥善定立价格上升的幅度，严厉加以督察验核，务必让官府办事人员没办法给自己谋取到好处，民间不受到故意压价和强行指派的搅扰，囤积储藏没有发霉腐烂的忧虑，售出陈米换成新米没有物价飞涨的祸害，差不多达到售出和购入具有常规，敛集和散发具有时节，公家与百姓两方面都没有妨碍，而仓库由此就充裕了。皇上您深深体念百姓的疾苦，最深切又最长远，压根就已经家家宽裕、人人富足，天下所有的人都共同为安定太平而高兴了。

制策又鉴于安定民众必须首先止息住盗贼，止息住盗贼又没有比保甲制度更有效的了，进而念及吃穿等生活物品充足，礼法道义就产生出来。这更是探求根本的理论啊！臣下我听说古代五家组成一比，二十五家组成一闾，让各家相互担保，相互守约。没有军事行动就归司徒管辖，遇有军事行动就归司马指挥。在夜里一有声响就彼此听得见，在白天一见面就彼此认识。这种制度好到极点了。春秋管仲创设的五家为一轨、五十家为一里、二百家为一连、两千家为一乡的地方行政组织，还能获取到《周礼》所遗留下的本意。汉代的制度，

每个亭,设有亭长;每个乡,设有掌管教化的三老,掌管赋役的啬夫和掌管治安的游徼。唐朝按百户划分为一里或一坊、一村,每里各自设置一名里正,于是奸恶的百姓不存在逃脱掉法律制裁的侥幸,官府办事人员不存在敲诈勒索的搅扰。这大概是因为通过住在一处、相互熟悉的人,去发现耳闻目睹、最为近切的坏事,动静容易摸清,形迹很难掩藏。并且还营地驻防设置下那些官兵,军事据点确定好具体规则,佛教场所必定安排巡查,道教地点必定布置稽察,用来杜绝奸恶的百姓,安定良善的居民。这一切,都在于称职的主管机构,真用力气按要求去执行罢了。但止息住盗贼的重要方面,更在于海防。海上气候多变,盗贼就出没不定。这就务必把他们阻止在远洋而使其不能长期停留在那里,抵御在近海而使其无法靠近海岸。加强攻守来使外来的奸恶匪盗绝迹,细予稽察来扫清内地作接应的奸恶分子。除掉凶暴的头目,杀死奸诈的成员,务必达到好人和坏人不混杂在一起;安抚那些前来投诚的人,分散掉那些党羽,更不忧虑枝蔓难斩断了。在盗贼形成后再惩治他们,不如在盗贼还没形成前就止息住他们。果真让亲近百姓的官员,在惩治打击之后,蕴含着督察激励的用意,百姓生活已经充裕,仍然让他们增加财富,明令训戒已经接二连三,仍然大力端正他们,这样观看感化共同兴起,逐渐积累仁德,磨练道义,而邪恶自然就会不存在了。我大清国家用仁德化育,用道义纠正,改变民间的风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有谁还把自己放在皇家化生养成以外的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循序渐进积累起广博的学问,向往归附形成良好的风气,畅通无阻献纳国家的贡赋,勇猛进击惩治奸恶的盗匪,扩大帝业的总纲,拓展盛明的局面,仁德圣明的事体一样不缺,而称得起"帝"、够得上"王"的大道完备了。臣下我更跪拜祝愿皇上,像天运行那样强健不息,每天都在道德修养上提高一步而永无止境,依据励精图治的诚意,达到数代升平昌盛的状态。在秘书省列举礼制典故,而讲论贯通进一步殷切;贫寒百姓蒙受吉福,而教化引导更加周全;上等粮仓宣告充裕,而对储备越发勤勉;草野盗贼不见踪影,而对感化感召、惩办奸恶更加关注。用来加厚盛大明畅的恩德,扩展盛

世的规模气象，往上直通九重天，往下延伸到大地的边际，迎受上天的庇护，承当众多的福庆。我们国家亿万年政治清明的绵长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袁绩懋　殿试对策

袁绩懋（？～1858）　字厚庵，直隶宛平（今属北京）人。自幼聪颖，过目成诵。年未二十，即通群经之学，为文宏博壮丽，受到林则徐等人的推重。道光二十七年(1847)榜眼。因其强直不事权贵，后由刑部主事任内返归祖籍阳湖县，主讲暨阳书院，又主讲河南彰德昼锦讲舍。复任福建延建邵道道员，率众对抗太平军，拒守顺昌城，城破被杀。著有《诸经质疑》、《通鉴正误》、《汉碑篆额考异》，均毁于兵，惟其《味梅斋诗草》四卷，尚传于世。

臣对：臣闻鸿编贵于明道，象魏先在饬民，鱼旅斯可占年，鹭堠用以弭盗。稽诸往籍，《诗》歌古训，《易》著省方，《书》垂府事之修，《礼》志刑暴之法。自古圣王庞褫桄被，协气茇敷。以崇经术，则绿字咸披；以厚民风，则苍生克乂；以储国饷，则红粟时充；以禁匪人，则黄图永靖。皆本锡极斟元之意，丕收风同道一之庥。用是多闻多见，竹简富焉；是训是行，蔀屋欢焉；乃积乃仓，谷殖丰焉；义刑义设，莠民化焉。渊乎铄哉！所由朝熙门穆，里汴途欢，合一世而登仁寿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探往古，泽润蒸黎，府库裕乎天储，闾阎形夫风偃。固已名高虎观而训秉鸠司，崇列雉墉而令消鼠窃矣。乃圣怀冲挹，不遗细微，念葑菲而听卑，询刍荛而察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明经、善俗、足民、戢暴诸政。臣功疏蛾术，识陋牛涔，体要未知，臆说奚补？顾际设铎悬鞀之会，益切涓流土壤之忱，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以效拜献之一得乎！

伏读制策有曰：自秦燔《六经》，微言中绝，至汉而后，经学昌明，

因详考夫说经之旨。此诚敦崇实学之盛心也。臣惟经者常也，如常伦之可守；经者径也，如径路之共由。礼、乐、《诗》、《书》，乐正造士之术；《春秋》、《易象》，韩起观鲁之书。论经学之大成，必以圣人立其极；考说经之支派，当于诸儒究其全。商瞿受《易》于孔门，而馯臂、鲁桥，姓名不无互异；田何传《易》于子木，而爻辞、彖象，义理自有同源。至如子夏禀《诗》学之传，而敬仲与毛公，其承于四传者可按也。左氏习《春秋》之训，而曾申至张苍，其承于八传者可溯也。伏生治《书》，晁错曾亲得其口授，究其所出，岂必李克之遗留？后仓说《礼》，戴氏实默识其心传，推其所终，岂止康成之笺释？人自为说，家自为言，故已炳如日星，抑亦浩如烟海矣。汉立博士之官，而前代诸家，不复兼存其说；宋极师儒之盛，而当时硕彦，实能各尽其长。程、张阐《周易》之精，受业者既洞鉴其本末；朱子释《诗》、《礼》之义，入室者亦贯澈其始终。众说至详焉，经学大备矣。皇上绍列圣之薪传，集百王之大统，笙簧六籍，鼓吹众经，所由多士于于，厉纯修于蟫简，而群才济济，扬文治于鸿都也。

制策又以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因深求夫抱悫怀忠之治。臣案《周礼》著禁暴之令，《王制》严左道之诛。异言异服则有讥，无授无节则弗纳。虽当习俗之淳朴，犹必训戒之周详。是以利欲无以动其心，异论无以惑其志，党役无以乘其隙，匪徒无以售其奸。法极隆焉，教至善也。自习尚浇漓，异端蜂起。敛钱聚众，托祸福以惑人；吃菜事魔，工煽诱以传教。始则牧民者视为无害，既化道之无方；继则牧民者惧于严谴，遂隐匿而不报。奸民所由日肆，邪慝所由不靖也。今将严为之制，则藾酒秧歌，皆成例禁；不为之防，则迎猫祭虎，亦起祸端。惟禁游民以杜其渐，行保甲以遏其微。兴农桑，务技业，以清其源；立学校，明教化，以正其本。庶乎饥寒不迫，礼义日生，桀黠者固可洗心，愚懦者亦知守分。此孟子之所以言经正，韩愈之所以言明道也。国家化泽涵濡，仁恩普被，正德、利用、厚生成三事，和亲、康乐、安平为一书。所由荡瑕涤秽于无形，含和吐气而各得也。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人之大命，因讲求藏富裕国之道。臣案积贮之方，《周礼》最备。藏粟、聚粟、委积分其任，仓人、旅师、遗人设其

官。凡所以谋生聚者至深,而所以防流弊者至远也。厥后耿寿昌因谷贵谷贱之不齐,遂立常平仓,为便民便官之良法。然或在上者有肥身之计,斯在下者无实获之方,法所由生,弊所由集。将采买于当境,勒派堪虞;将转籴于邻封,运费又重。至如长孙平立义仓以就谷,而其弊也,吏胥视缓急以行其私。朱子设社仓以便农,而其弊也,社长恣侵渔以逞其欲。盖良法易立,而治人难求。诚使鉴刘般之微言,思朱子之成效,持之以久,行之以公,将见十年之中,必有三年之蓄矣。河西务诸仓,京师、通州诸仓,《元史》所载,今制所昉。顾天庾转输,丁胥丛杂,防维之法稍懈,搀和之弊丛生。今欲储积无亏,旱涝有备,转输得其法,籴粜得其宜,久贮得其方,平价得其道,必如管仲守谷守国,而后可通轻重之权也;必如李悝籴二籴三,而后可定贵贱之准也。宇文融益著九谷则仓廪充,孙成发仓贱售则市籴便。然则法之历久不弊者,惟在人之奉行勿失而已。我皇上念三农之生谷,式九用以宜民,立法至精而仁恩至渥矣。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而因思夫正本澄源,以臻于郅治。此尤御宇之要务也。臣闻稂莠不除,嘉禾不殖。《周官》有比闾族党之文,管子有轨里连乡之法,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其法至备,其用亦至神。顾太平日久,生息日繁。保甲不行,邪慝得秉其隙;宵小不靖,善良实受其欺。营汛堡墩之设,不能不寄之兵弁;寺院庵观之察,不能不责之吏胥。赏罚不明,则兵或纵盗矣;稽查不力,则吏或藏奸矣。汉有亭长、啬夫,盘诘奸宄;唐设里正、坊正,检察非常。他如赵广汉钳箠投书,张京兆赭衣污裾,尹翁归收人会中,韩延寿置立五长,皆弭盗之良方,实治人之可信也。至于洋面辽阔,岛屿险僻,非途径所难通,即风涛所莫测,缓之则肆掠商旅,迫之则潜伏岩阿。是惟绝勾结以去其援,多间谍以穷其穴,勤水师以勒其胜,习火器以破其锋,亦何忧接济之不能绝,巢窟之不可捣乎?虽然,弭盗于已然,不如弭盗于未然。苟使足其衣食而生其廉耻,将见有耻且格,犴狱常清,而率土归仁,鲸波胥靖已。

若此者:研经以蒸髦,训俗以革面,储粟以鼓腹,化暴以归心。上咸五,下登三,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日新进

德，天健昭行。丙编已富，而倍切甄陶；申命已端，而弥殷劝导；丁力已裕，而益慎盖藏；甲令已严，而愈求肃靖。由是荣镜宇宙，经纬乾坤，海晏河清，雨旸时若，绥景祜，迓蕃厘，溯八埏，畅九垓，延亘古之上仪，焕丕天之大烈。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宏伟的著作，最重视宣明大道。公布法令，首要任务在于教导民众。梦见蝗虫变成鱼，龟蛇旗变成鸟隼旗，这就可以预测出是丰年。设置伺察的哨所和专职官员，用来止息盗贼。考查以往的典籍，《诗经》歌咏先王的遗训要效法，《易经》显示先王视察天下设布教化，《尚书》垂示水、火、金、木、土、谷物这六府和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事要修明，《礼记》载述用刑罚禁止凶暴的原则。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洪福照临整个天下，协和之气和煦地扬布四海。用来推崇儒家经学，就天赐神文形成足可观阅的篇章；用来加厚民间风尚，就全天下的百姓得到治理；用来储积国家的费用，就连发霉的谷米都经常多得用不完；用来禁绝行为不正的人，就京师永久安定。这都依据赐给百姓最高准则、斟酌宇宙初始状态的本意，显著收到社会风气完全相同、道德规范完全一致的美好结果。因此多多地听，多多地看，各家的著述就在心中丰富起来了；上面训导，下面奉行，普通百姓人家都欢乐了；既露天堆放，又仓库贮藏，粮食的积聚就充裕了；适宜的刑法，适宜的处置，奸恶的刁民就改邪归正了。深远啊！明亮啊！之所以朝廷上兴盛，大臣家肃穆，乡镇上和乐，路途中欢腾，全社会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地，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大道上探往古，恩泽滋润百姓，公家仓库比大自然的储备还要充裕，民间住户像草随风倒那样顺服。本来就已经名声高过东汉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经书异同的盛举了，训导由握持朝廷所赐鸠杖以示尊敬的老人来推行了，座座粮仓高得和城墙并列了，政令使窃贼消失了。可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不遗弃微不足道的人，体念一德尚且可取而听取卑贱者的意见，询问割草打柴人而察照身边的言论，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

而用通晓经书、使民风良好、使百姓富足、止息凶暴等项政务进行策问。臣下我学力在经过长期积累而有所成就上还差得很远，识见比道路上牛蹄印迹中的积水还浅陋。大体和纲要还不知道，胡乱猜测的说法能有什么补益？但正幸好赶上朝廷宣达政令并要求警觉戒慎的机会，那片奉上一滴水、一把土的忠心越发殷切，敢不勉力陈述平常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献上向君王拜见献纳首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一点儿心得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自从秦朝焚烧《六经》，精微深远的儒家学说半路断绝，直到汉朝以后，经学繁盛大明，据此详细考索解说经书的主旨。这实在是促进和推崇朴实学问的盛大心愿啊！臣下我想来，所谓经，意思是固定不变，就像伦理纲常可以守持；所谓经，意思又是路径，就像路径都从那里通过。礼仪、音乐、《诗经》和《尚书》，这是乐正这一官员培养国家最高学府高材生的四项内容。《春秋》和《易象》，这是晋国大臣韩起在鲁国所观看的典籍。论述经学的总成果，一定按孔老夫子的说法确立起最高准绳；考察解说经书的各个学术流派，应当在各个儒士中探究它的全貌。商瞿从孔子门下承受《易经》，而江东人馯臂、鲁国人桥庇，这些商瞿的弟子，姓名不是不存在彼此间的不同；汉初齐国人田何从商瞿子木那里把《易经》递相传授下来，而说明三百八十六爻意义的爻辞、说明六十四卦意义的《彖传》和说明卦象、爻象的《象传》，义理自然具有同一本源。至于孔子高徒子夏，禀承《诗经》之学的嫡传，而卫敬仲与小毛公毛苌，他们这个学派历经四次递相传授的具体人名可以考查出来。鲁国人左丘明精通《春秋》的解说，而从他的弟子鲁国人曾申到汉初的张苍，他们这个学派历经八次递相传授的具体人名也可以追溯出来。原秦朝博士济南人伏生研究《尚书》，汉初的晁错曾当面得到过他的口头传授，究寻伏生是从谁那里承受来的，哪里非得是战国魏国人李克的遗留呢？汉宣帝时东海人后仓讲说《仪礼》，戴德和戴圣这叔侄二人实际上对后仓的学说精髓默默领会，推究后仓礼学截止的地方，又哪里仅仅是东汉郑玄所作的解释呢？每个人自己形成自己的说法，每一家形成自家的观点，所以就已经像太阳和星辰那样明亮，而又浩如烟海了。

汉朝设立博士这一官职，而前代各个学术流派，不再并存他们的说法；宋朝把师长和儒士的教育活动推到了顶峰，但当时的代表人物，实际上能够各自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程颐、张载阐发《周易》的精妙原理，他们的弟子就已经做到了透彻掌握根本问题和枝节问题。朱熹解释《诗经》和《仪礼》的义旨，他的高徒也把那来龙去脉贯通起来。各种说法详尽到极点了，经学特别完备了。皇上您继承各位圣贤的嫡传，汇集历代帝王统一天下的事业，给《六经》唱赞歌，为每部经典作宣传，导致读书人悠然自得，从久远的典籍中加强道德修养，各种人才多得很，在鸿都学府扬布文治啊！

制策又认为社会风气是国家太平安定的根基，而教育感化实属社会风气怎么样的本原，据此谋求人人保持纯正、心怀忠诚的大治局面。臣下我查核《周礼》宣明禁止暴乱的法令，《王制》强化对歪门邪道的惩罚。对邪恶言论和奇装异服就进行稽察，没有迁居的证明书和通行证就不予接纳。尽管当时正值社会风气淳厚朴实，仍然一定要训导禁戒周密详尽。因而求利的欲望没办法打动人们的心思，违背正道的言论没办法迷惑人们的头脑，替官府办事的人员没办法钻空子，匪徒没办法兜售奸谋。这种制度极其有效，教化也最为美好。自从社会习尚衰败下来，邪说像蜂群一样出笼。敛集钱财，聚合徒众，假借信奉与否就招祸得福来诱惑人们；光吃素菜，事奉魔头，用尽煽动蛊惑的手段来传布邪教教义。开始时地方长官把这看成是没有什么危害的事情，已经就在教化训导上没拿出办法来；接下来地方长官害怕朝廷对自己的严厉处罚，于是隐藏下来不上报。这是奸恶百姓一天比一天放肆、邪恶不能扫清的原因啊！如今打算严厉对它加以禁绝，恐怕用美酒待客、扭秧歌祭神这类活动也都成为照例禁止的东西。不对它进行防范，即便迎猫祭虎这类活动，也会造成祸乱的开端。只有禁绝四处游荡的人，来杜绝住它的蔓延滋长；推行保甲制度，来遏制住它的苗头。振兴农业生产和植桑养蚕，鼓励人们致力技艺，来澄清它的本源；兴办学校，宣明教化，来端正它的根基。这就大致会饥饿寒冷不再逼迫民众，礼法道义一天天产生出来，凶暴狡诈的家伙因而能够彻底改悔，愚昧怯懦的人们也知道安守本分。这是孟

子讲论固定不变的大道要端正的原因，也是韩愈讲论宣明先王大道的原因。我大清国家化导的恩泽深入人心，仁德的恩惠普遍延及。端正德行给下面作出榜样，物尽其用，使民众生活宽裕，构成了像大禹所说的这三大政事；和睦亲近，康宁欢乐，安定太平，组成了像《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组成《尚书》中的《虞书》的那样一部经典。导致在无形中就冲刷洗掉了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蕴含协和，吐出正气而各得其所了。

制策又认为积蓄储藏粮食，这是世人存活的最根本的大事，据此讲求贮存富足使国家宽裕的办法。臣下我考核积蓄储藏的制度，《周礼》中规定得最完备。收藏国家征收到的谷米，聚集田野上的各种谷米，管理国家的剩余物资，都划分开各自的职责，在这三个方面专门设立仓人、旅师，遗人这三种官员。凡属用来谋求世人繁衍积聚的方方面面最为深切，而用来防止相沿下来的弊病的对策也最为长远。此后西汉耿寿昌根据粮价有时高、粮价有时低的不稳定情况，于是创立常平仓，作为便利百姓又便利官府的良好办法。但有的地方官员存有贪污的心计，这样百姓就没有实际得到好处的途径。办法从哪里产生出来，弊病也从哪里汇集起来。准备在当地范围内采购粮食，强令指派就很值得忧虑；打算到附近州县买入粮食，运输费用又很高。至于隋朝长孙平创立义仓，来随地解决粮食问题，但义仓的弊病，是办事人员看情形来捞取个人的好处。南宋朱熹创立社仓，来便利农民，但社仓的弊病，是社长随意侵吞夺占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良好的办法容易创立，可合适的治理人选很难找到。假设真把东汉刘般的指责话语引为鉴戒，又考虑朱熹所取得的效果，长时间不放弃，按公心来施行，将会看到十年当中一定拥有三年的储备了。河西务各个官仓，京师和通州各个官仓，是《元史》所记载的，也是当今这方面制度的由来。但皇家仓库转运输送，强壮役夫和办事人员众多混杂，防备的方法稍有松懈，掺杂进劣质东西的弊病就产生很多。如今打算储存积蓄没有亏损，旱灾水灾都有防备，转运输送获得有力的方法，买进售出粮食获得合适的对策，长久贮存获得恰切的方式，稳定物价获得有效的途径，必定要像春秋齐国管仲那样保卫国家就要掌

握住粮食,然后能使货币流通的手段得到实现啊!必定要像战国魏国李悝那样在平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三百石中的二百石，在丰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四百石中的三百石，然后可以确定下物价贵贱的标准啊!唐朝宇文融增加包括大豆、小豆在内的九种谷物的贮藏,官府仓库就能充足;唐朝孙成在大旱之年打开信州的官仓贱价售出粮食,市场交易和公家再购入粮食就很便利。既然如此,那么,同一做法经历很长时间却不产生弊病的关键，只在主管人员奉行而不出错罢了。我朝当今皇上深念春、夏、秋三个农时季节生产出粮食,把祭祀等九种使用财物的规定作为准绳来便利百姓,确立的经济制度最精详,仁德的恩惠也最优厚了。

制策又鉴于安定民众必须首先止息住盗贼，止息住盗贼又没有比保甲制度更有效的了,据此而思考正本清源,来步入最完美的治理状态。这更是统治天下的重要事情啊!臣下我听说稗草不去掉,好庄稼就长不起来。《周礼》中载有五家为一比、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族、五百家为一党的明文,管仲创设有五家为一轨、五十家为一里、二百家为一连、两千家为一乡的基层组织制度,都是用住在一处、相互熟悉的人，发现耳闻目睹、最为切近的坏事。这种制度最为完备,作用也最为神奇。但太平的时间一长久,人口繁殖一天比一天众多。保甲制度不再施行,邪恶的歹徒就得以钻了空子;盗匪坏人未扫清，善良的百姓实际上就受到他们的欺凌。营地驻防、军事据点的设置,不能不把它们托付给兵士和低级军官;佛教场所、道教地点的稽察,不能不把它们交给官府办事人员去办。赏赐和惩罚不分明,兵丁就有的放跑盗贼了;稽察不十分有力,官府办事人员就有的隐藏起奸徒了。汉朝设有基层官员亭长、啬夫,负责盘察惩治内外奸恶。唐朝设有基层头目里正、坊正,负责监视查问可疑的情况。其他像西汉颍川太守赵广汉设置瓶状举报箱让人往里投放检举的信件，京兆尹张敞让盗窃团伙的头目设酒宴招待同伙,乘醉用赤土抹在同伙衣襟上,然后按此记号一网打尽，东海太守尹翁归在秋冬考核全体官吏的会议上逮捕有罪的官吏和地方豪强，东郡太守韩延寿在每五家设立一名伍长,都是止息住盗贼的有效办法,实属合格的治理人选的可以信

奉的东西。至于海面辽阔，岛屿港湾险恶偏僻，不是道路难以抵达，就是风浪不可预测。对匪徒放松打击，他们就大肆抢掠商人和过路人；对匪徒加紧惩治，他们就在岩洞山脚隐藏躲避起来。这就只有断绝掉内外的勾结，来除去他们的内援；多派人去刺探，来全面掌握他们的活动地点；加紧训练水军，来控制住他们的势头；熟悉火力兵器，来击破他们的锋芒。这样还忧虑什么接应救援不能够断绝，巢穴老窝没办法捣毁呢？尽管如此，在盗贼已经形成之后再去止息住他们，不如在盗贼尚未形成之前就止息住他们。如果真能使他们吃穿充裕，产生出廉洁和感到羞耻的观念，就将看到他们具有羞耻心并且顺服，监狱常常空无一人，而全天下都归向仁德，海上作乱的风波也全扫清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研习经书来进用贤能，化导民俗来使人改正，储存粮食来使百姓饱食无事，感化暴徒来让他们真心归顺。功德往上比和五帝相同，往下比则超过三王，仁德圣明的事体一样不缺，而称得起“帝”、够得上的“王”的大道完备了。臣下我更跪拜祝愿皇上，在道德修养上不断努力，每天都变一个样；像皇天运转那样强健不息，昭示美好的德行。诸子百家的书籍已经宏富，而对培育造就人才倍加关注；申诫和命令已经得到贯彻执行，而对激励化导更加殷切；民力已经充裕，而进一步慎重对待仓库贮存；朝廷颁布的法令已经严密，而越发谋求肃清平定。由此照耀辉映宇宙，安排措置天地，大海不起波浪，黄河河水变得清澈，雨水按时降临，阳光也很充足，赢得上天的大力保佑，迎受众多的吉祥福庆，流布到大地的边际，直通那九重天，扩展整个古代最美好的制度，把奉守上天的大法发扬光大。我们国家亿万年政治清明的绵长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庞钟璐　会试卷二道

庞钟璐(？~1876)　字宝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

探花。历任内阁学士、督办江南团练大臣、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竭其智力对抗太平军,对俄、法两国插手江南战事有所抵制。曾向朝廷呈献所撰《文庙祀典考》,疏陈荒政十事。光绪二年(1876)卒于家。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即贤亲以征前王之至善,所以诒君子者厚矣。夫前王所以新民者,莫先于贤亲,而后之君子亦贤之亲之,不可见前王之德之至善哉!且我周家忠厚开基,而《菁莪》造士,《行苇》施仁,以是为一时之宠遇也,而实则贻孙子之谋。诒以爱才之意,而一德之所孚者深;诒以收族之规,而一体之所推者远。俊乂崇焉,本支固焉,而奕叶遂相绳于弗替焉,夫乃知食旧德者之有由来已。

《诗》何以咏前王之不忘哉?夫前王者,后君子之型也。宅俊为辅弼之资,而四友十臣,尤见得才之盛。所以鹰扬于野,鹭振于庭,当日之应运而兴者,莫不膺心腹干城之任,则尊之者至也。公族为本根之庇,而文昭武穆,尤征锡类之繁。所以采药追封,斫梓作诰,当日之分藩而处者,无不受河山带砺之盟,则待之者厚也。其贤其亲,前王既贤之亲之矣。而吾以观后之君子:匪必歌《棫朴》也,而奉璋执瓒,愿与有德者共之;匪必诵《常华》也,而饫豆傧笾,愿与同气者分之。其所以尊贤而展亲者,问谁为留遗而荷戈无刺,谁为系属而寻斧无伤也?则君子必曰惟我前王!未尝无《衡门》之叹也,而伊人宛在,常怀金玉之音;未尝无《角弓》之嗟也,而式好无尤,弥切埙篪之慕。其所以劝贤而笃亲者,问谁为则效而畀以干旄,谁为禀承而速以肥羜也?则君子亦曰惟我前王!

从来显庸之主,必有异量之恩。《丹书》拜而《洪范》访,八虞询而二虢咨,斯何如际遇也!今即流风罕觏矣,而贤者无失其贤,我有嘉宾,为歌鹿鸣;亲者无失其亲,凡兹公姓,为咏振麟。在当局虽视为分之固然,而赐履首尊王命,锡鬯必告文人,则贤与亲之固结于不自解者,实载昭穆考之精神以俱永,其笃叙为有原矣。从来开创之君,必

有非常之典。遗献著式闾之敬，笃宗昭分物之荣，斯何如德泽也！今即运会稍殊矣，而昔所谓贤亦曰贤，馆可适我诵《缁衣》；昔所谓亲亦曰亲，匮可启我歌赤舄。在旁观虽视为理之当然，而榛苓犹念西方，黍苗犹思南国，则贤与亲之维持于不可废者，实承丰镐京之遗泽以俱长，其推施为有本矣。更征小人之乐利，而前王所以不忘之故，不晓然乎！

特就尊敬贤臣、亲近亲属的问题来考求先王的完美无缺，用来传给君子的东西真是太丰厚了。先王使百姓成为新人的办法，没有比怎样对待贤臣和亲属更占首位的了，而后世的君子，也尊敬他们，亲近他们，这就不能更看出先王德业的完美无缺吗？况且我周室王家，凭借忠厚开创基业，而像《菁菁者莪》诗那样所歌咏的培育人才，像《行苇》诗那样所歌咏的施布仁德，把它们看成是一时间的宠遇，但实际上却留给子孙长远的谋划。把爱惜贤才的意愿传下去，而纯一之德所符合众望的地方深切；把整齐划一宗族的规则传下去，而同属一个祖先所可推及的关系广远。杰出的贤才推崇了，本宗和旁系牢固了，而世世代代就在王朝不可衰落上相互拴系在一起了，这才知道享受先人的余荫是有由来的了。

《诗经》中《烈文》篇为什么歌咏前王要念念不忘呢？前王是后世君子的榜样啊！任用贤才担任要职是辅佐协助国王的凭借，而被文王引为朋友的四个人和协助武王治理的十个贤臣，更能够看出当时获得到贤才的兴盛景象，因而像雄鹰一样在牧野战场上大显威风，像白鹭一样在学宫环绕助祭，当时应合天运，兴起建国，没有谁不担当起心腹和捍卫者的职责。这就说明，尊敬贤臣已经到了极限了。公室宗族是本根的庇护力量，而属于文王父辈的族系和属于武王子辈的族系划分开来，更可证明永久赐给你族类好处真是繁多。因而对父王古公亶父生病而借口去采药不再回来，以便使王位最后能传给文王的泰伯，补封其后代为诸侯；拿木工处理木材制造器具作比喻，来创制专讲为政之道的《梓材》这篇诰命。当时划分辖区而各自存在的同姓诸侯，无不奉受泰山变成磨刀石那样小，黄河变成衣带那样细，也

仍然世代相传的盟约。这就说明，对待亲属是相当优厚了。那些贤臣，那些亲属，前王已经尊敬他们了，亲近他们了。但我来观察后世的君子：不一定歌咏《棫朴》这首赞美文王善于用人的诗歌，但领兵祭祀的权力，愿意和具有仁德的人共同享有；不一定诵读《常棣》这首描述宴享兄弟的诗歌，但饮酒进食这类生活快事，愿意和自家的成员来分享。用来尊敬贤臣而使亲属更亲近的举措，问一问谁是前代遗留下的老臣却扛起戈矛而没有刺击，谁是同族的一员却操起斧头而没有伤疤呢？君子就一定说，只有我那前王啊！贤才不是从来没有《衡门》诗所描写的对国君怯懦胸无大志的慨叹，可那文王好像就在眼前，时常怀念他培育人才像金玉质地优良般的响声；亲属不是从来没《角弓》诗所讽刺的骨肉相怨的嗟叹，可兄弟相互和好，没有怨恨，越发加深对埙与篪合奏特协调的向往。用来勉励贤臣而使亲情更笃厚的举措，问一问谁属于效仿的榜样而把招贤所需要的好办法交给他，谁属于晚辈而用肥嫩的小羊去把同姓叔伯快请来呢？君子就一定说，只有我那前王啊！

从来功业宏大的君主，必定具有度量超常的恩德。周武王从姜子牙那里拜受天赐的《丹书》，向商朝遗臣箕子访询《洪范》，周文王向掌管山泽的八士和自己的弟弟虢仲、虢叔征求意见，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际遇啊！如今播扬盛传的美好风气很少再能遇到了，可贤士还没失去他的贤良，我有上等的宾客，为他们演唱《鹿鸣》这首宴享诗；亲属还没失去亲情，凡是公族同姓的人，为他们歌咏振奋有为好公子这首《麟之趾》诗。这在当事人来说，尽管把这看成名分本该如此。但允许诸侯可以征伐的范围，首先要尊崇王室的命令；赐给一樽黑黍芬芳酒，必定要祭告祖先具有文德的人。这就说明，贤臣与亲属同王室牢固联结而自身都不能解脱开，原因实际上是装放着父辈、子辈、祖先的精灵神明来一起永存，而当初加重理顺先王先公之道就确有本原了。从来开基建国的君主，必定具有特殊的恩典。对前朝的贤臣显示出到他的住所前就俯凭车前横木致敬的礼遇，加强宗族团结就宣明获得王室赏赐物品的殊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德惠啊！如今时运风气逐渐不同了，可从前所称的贤臣仍能称为贤臣，到住处来看我，可以

吟诵《缁衣》这首赞颂爱贤的诗歌;从前所称的亲属仍能称为亲属,亲情有所淡薄,可以启示我歌咏赞美周公赤色靴头真漂亮的《狼跋》诗。这在旁观者说来,尽管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可像《邶风·简兮》所描述的伶官仍然怀念西方的王朝,《小雅·黍苗》所描述的服役者依旧思念召公治理的南国。这就说明,贤臣与亲属对王室相互维系支撑,没办法废弃,原因实际上是承受了丰邑、镐京这两处都城作为周王室的象征所留下的恩泽,都很绵长,而当初推恩施惠就确有根基了。再考求众百姓为他们所高兴的东西而感到高兴,为他们所得到的利益而觉得真是利益,对前王要念念不忘的缘故不就更清楚了吗?

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圣人为不足者拟一境,而仍以未见策之焉。夫力果不足,必实用之而见其不足也。疑其有而叹为未见,正欲策人用力于仁耳。且人未有甘自居于不足者也,而至于求仁,则往往自诿为不足。夫使其果不足也,则在己既有以自知,在人即可以共谅。而无如世之自诿者,初未尝设一足之心,以实试其不足之量,而诿之无可诿者,亦谅之无可谅矣。

力不足者,吾未之见,是可知力之无不足矣,而人犹得自谓不足乎?而人犹得自谓不足而不用力于仁乎?资禀有智愚之别,智者无不足,愚者亦未必果不足也。然必执一格以相绳,则畏葸不前者反得以自托,而我非竟谓限于资禀者,世必无之。材质有强弱之分,强者无不足,弱者亦岂必尽不足也?然非悬一途以为准,则因循坐误者反有以自文,而我非竟谓锢于材质者,世绝无之。盖有之矣,是必自尽夫困勉之功,始则恃其足,以励其志;继则冀其足,以策其修。时时奉一仁以为归,而求其必赴者,卒纡回而莫赴,则诚不足也。是必自殚其黾皇之念,始则惟恐其不足,而迫之使前;继则深愧其不足,而强之使进。时时悬一仁以为的,而志在必成者,竟扞格而无成,则真不足也。

而我未之见也,未见其不足,实未见其用力耳。且夫秉彝有同好

矣，苟致其力于修途，则器重道远之诣，无不可几，岂必让人独至也！乃或则志昧于初基，或则功荒于末路，至欲自诬其禀受之良，以强为解免。不知未用其力而自阻，与实用其力而自阻者，固甚悬也，而何容昧没而杂也？且夫中行正难遇矣，苟尽其力以谋道，则安勉纯杂之分，虽有异致，究亦殊途同归也。乃或则浅尝而辄止，或则中道而苟安，至欲自侪于昏蒙之辈，以巧为藏身。不知有可借之力而不之用，与无可借之力而不之用者，良易辨也，而何弗黾勉以图也？人尚用其力于仁哉！

圣人替在仁德修养上力量不够用的人设想了一种情况，但仍旧用未曾见过这种人来对他们做估量。力量确实不够用的话，必定实际真用了力量，才真看出他力量不够用啊！怀疑这种人或许存在又慨叹不曾见到过，这正是想鼓励人们在仁德修养上使用力量而已。况且人们没有甘愿把自己列入力量不够用的人当中的，但一触及到往仁德上奔，往往就自己借口力量不够用来作推脱。假使的确力量不够用，那在自己来说，就有理由自己明白自己到底怎么样，在他人来说，也就能够一起谅解。可世上寻找借口来为自己作推脱的人，那就拿他们没办法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未曾产生过真有一天在仁德修养上使用力量的心念，来确实试一试那看起来不够用的力量。而寻找借口来给自己作推脱，推脱到最后没办法再能推脱，世上对他们也就谅解来谅解去，到最后也就没理由再能谅解了。

力量不够用的人，我未曾见到过，由此可以知道力量是没有真不够用的了，而人们还能自己说力量不够用吗？人们还能自己说力量不够用而在仁德修养上不用力量吗？天生的禀赋存在着聪明和愚笨的区别，聪明的人没有力量不够用的，愚笨的人也不一定就真的力量不够用啊！然而必定要用同一个框框去衡量，畏缩不前的人反倒有理由自己给自己找到借口，但我并不是最后说受到天生禀赋限制的人，世间一定不存在。才质存在着坚强和脆弱的区别，坚强的人没有力量不够用的，脆弱的人也哪里一定是全都力量不够用呢？然而不摆出一条道路作为目标，走老路白白耽误的人反倒有理由自己给自己作掩

饰,但我并不是最后说受到才质局限的人,世间一定不存在。大概是有力量不够用的人吧?但这种人必定是自己把困顿住却更努力的功夫全使出来,起初依仗力量足够用,来激励自己的志向,接下来希望力量全够用,来鞭策自己的行动。时时奉守那个仁德,作为目的地,力求一定要达到,但到最后走了弯路却没有达到,这才的确是力量不够用啊!这种人必定是自己把勤勉急迫的心念全都用上去,起初只怕力量不够用,而督促它让它往前走,接下来深深惭愧力量不够用,而强拗它让它往上奔。时时树立起那个仁德,作为总目标,而志向定在必定要实现上,到最后却格格不入而没有实现,这才真是力量不够用啊!

孔子所说的我未曾见到过这种人,是说未曾见到过他们力量不够用,实际是未曾见到过他们真用力量罢了。况且执守上天法则,具有对这种美德的共同爱好,如果在仁德修养的道路上花力量,才任重道远,最后抵达也并非没有希望,怎么就非得让别人独自到达呢?有的人竟然思想上对起步的根基认不清,有的人在最后一段路程上把功夫荒废掉,甚至想自己否认自己的良好天赋,来勉强为自己做辩解和逃脱。不明白没使用自己的力量而自己阻止住自己,同确实使用了自己的力量而自己阻止住了自己,本来就相差特别悬殊,怎么能容许暗昧掩没而把两者混杂起来呢?况且按照中庸之道行事的人正难遇见,如果使用全部力量来谋求大道,安逸和勤勉、纯正和驳杂的区分,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到最后也是殊途同归啊!有的人竟然尝试一下就停止,有的人在中途就苟且偷安,甚至想自己把自己列入昏庸蒙昧这类人的行列,来巧妙地给自己藏起身来。不清楚具有可以凭借的力量却不使用,同压根就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却不使用,确实很容易分辨开啊!但却为什么不勤勉地去谋求呢?世人要重视在仁德修养上使用他的力量吧!

庞钟璐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通经所以致用,崇正斯可抑邪,资富在乎厚生,诘奸乃

能禁暴。载稽往籍,《易》著观文之义,《书》详敷教之经,《诗》陈多稼之歌,《礼》重追胥之政。古帝王萝图席瑞,松栋凝厘。以焕离文,则胶庠霞蔚;以勤观省,则黎庶星从;以致丰绥,则囷仓日富;以惩比匪,则闾井风恬。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符。用能有本有原,蝉文阐焉;无偏无党,象魏遵焉;如坻如京,鱼旅庆焉;相保相受,蠹猾除焉。所由治阐金绳,辉腾玉镜,备五赜而协庶征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表章古籍,陶铸群伦,广储积以备时,严简稽以纠慝。固已《六经》共贯而四海同风,百室胥盈而九州向化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体至善之无遗,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明经训、正民风、实仓储、严保甲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以仰赞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平昔之所诵习者,用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诸儒说经者,大抵皆孔门苗裔,因详考夫诸家授受之源流。此诚敦崇实学之至意也。臣案《六经》皆载道之书,自秦始皇焚书而微言中绝。汉惠帝始除挟书之律,武帝始立博士。其时说经者,皆各有师承者也。《史记》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田何;其间授受姓名,备详于《汉书》。汉之言《易》者,皆本田氏。子夏之《诗》,或云授高子行,或云授曾申,四传至大毛公。左氏受《春秋》作《传》,授鲁甲,历八传而至张苍。后得郑兴父子奏上,乃立于学官。《书》今文二十八篇,伏生在秦时受之李克,武帝命晁错从写受焉。后仓事夏侯始昌及东海孟卿,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翼奉、萧望之、匡衡、师丹、伏理、满昌,皆承后氏之学者也。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诸儒互有异同,诏孔颖达等撰定义疏。朱子谓《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又次之,其高下固有定论矣。程、张言《易》,略象数而明义理。朱子《易》、《诗》皆有传注,而《三礼》未及叙正,吴澄本其意作《三礼考注》,是有功经学者也。皇上右文稽古,正学昌明,多士观光鼓舞,敢不为根柢之学哉!

制策又以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因深思夫杜渐防微之道。此尤制治保邦之大要也。臣案《周礼》,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防民,下至比闾族党,各以月吉属民读法。司谏、司救,又纠劝而诛让

之。异言异服,则讥于关梁;无授无节,则内之圜土。盖所以防患于未形,起化于微渺,道德一而风俗同。虽有左道乱众之徒,何能售其怪诞不经之说哉?自后世习尚浇漓,异端蜂起,或敛钱聚众,结党传教,以煽惑乡里。愚民无知,遂受其欺罔,而陷于重辟。是非必尽迫于饥寒也,亦由于教化不先而防维之道失也。夫民莫不自重其生,自私其利。苟在上者导以大中至正之规,开其去故就新之路,则桀黠者自革面而洗心,愚懦者自守分而循法。因势利导,如水之流,如风之偃,耕田凿井,讲让型仁,彼邪说将不辟而息矣。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韩愈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斯二言者,与孔子道德齐礼之说,实相发明。本此以为政,庶几郅治可登而民风丕变欤!圣朝教泽涵濡,风俗醇茂,普天之下,孰不共适荡平之路也哉!

制策又以积贮者生人之大命,因详求夫桌籴之宜,转输之法。此又足国裕民之实政也。臣案《周官》所载,仓人掌粟入之藏,旅师掌聚野之屋粟、闲粟,遗人掌乡里之委积。其为储蓄计者甚详,所以凶荒有备,而旱潦无虞也。厥后管子有守国守谷之说,李悝有籴三籴二籴一之论。至汉耿寿昌立常平仓,减价增价,因时以利民,民咸便之。后汉刘般谓其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则行之不得其人也。夫常平之粟,当境采买固虞勒派,采自邻封又添运费。当官者易滋流弊,不若义、社二仓听民之自为经理也。义仓始于隋长孙平,当社立仓,丰则收之,歉则散之。法非不良,然不得其人,则贷少偿多,其害亦不可胜言矣。社仓之法,与义仓略同。隋唐行之,不久便废,至朱子而独有成效。其法立社长一人,稽其出入,行之三年,民以饶足。有治法不尤贵有治人欤!《元史》所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即今制所由昉。顾天庾转输,丁胥丛杂,不能无回漕搀和之弊。苟非严为稽察,诸弊何以能悉除哉?我皇上廑念民依,酌盈剂虚,无不规求尽善,所由家给而人足欤!

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因深思夫除莠安良之道。臣案保甲之法,始于《周官》比闾族党之制。管子因而变通之,立轨里连乡之名。皆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使奔亡无所匿,奸宄无所容,立法最为周密。顾同一保甲,王安石行之熙丰而民

扰，王守仁行之南赣而民安。非有异术也，亦在行法之有其人耳。夫营汛堡墩之设，所以稽其往来；寺院庵观之察，所以侦其居止。然兵丁之赏罚不明，则缉盗者或反纵盗；官吏之稽查不力，则诘奸者或反藏奸。非在上者随时整饬，何以能收实效哉？至于洋面辽阔，岛澳险僻，匪徒之出没靡常，即当事之稽查不易。是必密察其勾引，严绝其接济，招之以散其党，抚之以诱其来。遏之于远洋，使不得凭险以自安；御之于近地，使不得傍岸以滋扰。审其形势，坚其器械，精其选练，壮其声援，因地制宜，随时制胜，庶几遘薮可以廓清，而舟航得以利济矣。抑又闻之，防盗于已然，不若弭盗于未然。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正本澄源之论也。皇上德威远播，中外乂安，四海之内，咸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已。

若此者：综经以考道，训俗以型方，足食以养民，除残以安善。扬骏烈，迓鸿厖，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本持盈保泰之心，思长治久安之计。青简已搜，而乙夜弥勤探讨；苍生已格，而辰猷倍切渐摩；红粟已储，而酉熟犹谋藏盖；黄图已谧，而申严愈谨防闲。按经校德，稽古论功，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帝者之上仪。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通晓经书，目的是尽其所用；扶持忠正，这才可以抑制住邪僻。积蓄财富在于使民众生活充裕，整治奸恶才能禁止凶暴。考察以往的典籍，《周易》显示观察礼教文化的卦义，《尚书》详记广泛教育感化的常规，《诗经》陈述庄稼繁盛的颂歌，《周礼》注重抵御外敌、捕捉盗贼的军政。古代的帝王罗列图籍作成垫席，招致各种罕见的祥瑞；殿柱上生出青松，凝聚起各种福庆。用来使如日中天的经文大放光辉，各级学校就霞光灿烂了。用来勤勉观察民风，视察各地，老百姓就像星辰喜好风雨那样随从了。用来招致年年丰收，安定万国，粮仓就一天比一天充足了。用来惩治行为不正的人，民间各处就安全稳定了。这都是依据帝王日夜勤勉地谋求大治的实际，来把握住天意和人事彼此应合的征兆。因而能够具有根

基，具有本原，古文经书得到了阐释；没有偏私，没有结党，国家颁布的法令加以遵守；宛如沙堆，宛如高丘，吉梦喜庆大丰收。互相担保，互相承当责任，狡诈害人的家伙被消除掉。之所以治理天下的功德可以在祭天祀地的秘文中向上帝报告，光辉腾耀在象征清明之道的玉镜上，五种风调雨顺的气候现象一样不少，应合各种自然征兆，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突出和显扬古代的典籍，教育和改造各类民众，不断增加储存积蓄来准备应付自然灾害，严密施行检查稽核来惩办奸恶。原本上就已经《六经》连成一体，全国风尚相同，所有仓库全部充裕，整个天下归服顺从了。可是圣明天子的心怀却谦虚自抑，仍像帝尧那样对询问事体非常关切，体念最好的建议不能有遗漏，希望身边的言论可以察照，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而用闹通经书的解释、端正民间习尚、充实仓库储备、强化保甲制度等项重大政务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凭什么足够用来抬起头对高山大海有所帮助呢？但正值对答称扬君主之命刚开始的时候，恭敬地追念全面向天子述职的经典古义，敢不勉力陈述平常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献上葵花向阳的一点儿忠心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各位儒士解说经典的，大致上都是孔子学派的继承人，据此而详尽考索各个学术流派传授与承受的来龙去脉。这的确是促进和推崇朴实学问的最深远的用意啊！臣下我验核《六经》，全属于载述大道的书籍。自从秦始皇焚烧图书，精微深远的儒家学说半路断绝。汉惠帝开始废除藏书有罪的法令，汉武帝开始设立传授经学的博士官。当时解说经典的代表人物，都是各自具有一脉相承的师法的人。《史记》说商瞿从孔子那里承受《易经》，递相传授六代学人而到汉初田何。这一过程中传授者和承受者的姓名，在《汉书》里记载得非常完整和具体。汉代讲说《易经》的人，全都依据田何。孔子高徒子夏的《诗经》专学，有的说最先传授给战国时期的高行子，有的说最先传授给曾申，历经四次递相传授而到汉初大毛公毛亨。鲁国人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承受《春秋》，写成《春秋左氏传》，传授给鲁甲，历经八次递相传授而到汉初张苍。到东汉碰上郑

兴、郑众父子上奏给朝廷，于是在国家最高学府被立为讲授的科目。《尚书》用汉代隶书书写的二十八篇经文，由济南人伏生在秦代时从李克那里承受下来，汉武帝命令晁错跟从伏生抄写承受下来。汉宣帝时东海人后仓师从夏侯始昌以及东海孟卿，讲述《仪礼》好几万字，起书名叫《后氏曲台记》。谏大夫翼奉、前将军萧望之、丞相匡衡、大司空师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满昌，都是承受后仓礼学的人。唐太宗鉴于经书距离孔老夫子太久远了，各个儒士相互存在着相同或歧异的说法，下诏责成孔颖达等人撰写编定《五经正义》。南宋朱熹认为其中《周礼》注得最好，《诗经》和《礼记》在其次，《尚书》和《周易》又在其次。《五经正义》的质量高低，这就固然具有定论了。宋朝程颐、张载讲说《周易》，抛弃卦爻等符号的象征意义和数目变化及占筮方法，揭示出经文含义和原理。朱熹对《周易》、《诗经》都有解说注释，但对《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礼》没来得及编列定正。吴澄根据朱熹的意旨撰写出《三礼考注》，这也是对经学立有功劳的人。皇上您推崇文教，考察古代，纯正的经学昌盛大明，众多的读书人看到国家的盛况，为之鼓舞，敢不从事具有根基的学问吗？

制策又认为社会风气是国家太平安定的根本，而教育感化实属社会风气怎么样的本原，据此而深深思索防微杜渐的对策。这更是筹划治理、保全国家的特别紧要的方面啊！臣下我查验《周礼》，大司徒施用祭祀和刑罚等十二种教化的总规则来防禁百姓，基层一直到五家、二十五家、一百家、五百家逐级组成的比、闾、族、党，分别在农历每月初一召集居民宣读国家的法令。司谏和司救这两个官员，又负责纠察、劝导并斥责教训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对邪恶言论和奇装异服，就在关卡和交通路口上进行盘问稽查。没有迁移的证明书和通行证，就把这些人送到监狱里去。这是用来在祸患还没显露的时候就防止住它，在隐微细小的状态下就兴起教化，道德归向完全一致，社会风气归向完全相同。尽管存在着用歪门邪道惑乱民众的家伙，又怎能兜售出他们那怪诞不正的邪说呢？自从后世社会风气越来越衰败，不合正道的邪说像蜂群一样出笼，有的敛集钱财，聚合徒众，结成团伙，传布邪教，来在乡间煽动诱惑。愚蠢的百姓什么也不懂，

于是受到这帮人的欺骗，陷入了重刑惩办。这并不全是被饥饿寒冷所逼迫啊!也由于教化没做在前面而防治维护的办法出现了差错啊!老百姓没有谁不自己看重自己的性命，自己占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地方官员用最为中和平正的准则去引导他们,为他们敞开背离原状、转向自新的出路,凶暴狡诈的人自然就会彻底改悔,愚昧怯懦的人自然也安守本分,遵守法律。因势利导,就像水往低处流淌,就像风过吹倒野草一样。耕田发生地界纠纷,都互相推让给对方。父兄让舜去凿井要害他,舜却不怨恨,在仁义上做出榜样。都像这样,那些邪说就会不排斥而自行消失了。孟子说过:固定不变的大道端正了,老百姓就振奋积极。韩愈也说过:宣明先王的大道来引导他们。这两人的话，实际上正和孔子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整顿百姓的主张,相互发明。按照这种原则来进行统治，差不多最完美的治理状态就可以跨入,民间风尚也大变了吧?圣明我朝的教化恩泽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淳正旺盛,普天之下,有谁不共同步入宽阔平坦的帝王所铺设的道路呢?

制策又认为积蓄储藏粮食,这是世人存活的最根本的大事,据此详尽谋求售出购入的合适对策，转运输送的有效办法。这又是使国家富足、让百姓宽裕的实际政事啊!臣下我查验《周礼》记载的制度,仓人这一职官掌管国家所征收的粮食的贮藏，旅师这一职官掌管聚集田野上有田不种的人家被罚交的粮食和无业游民被罚交的粮食,遗人这一职官掌管乡里的剩余物资。当时为储存积蓄所做的筹划特别周详,所以战乱饥荒都有准备,旱灾水灾没有忧虑啊!后来春秋时齐国管仲提出了保卫国家就要掌握粮食的主张，战国李悝提出了在丰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四百石中的三百石、在平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三百石中的二百石、在歉年购入农民百亩余粮一百石中的五十石的理论。到西汉,耿寿昌创设常平仓,降低粮价还是提高粮价,根据年景来决定,便利百姓,百姓对这种做法都感到很便利。东汉刘般认为常平仓表面上享有便利百姓的好评价，但内里实际上是侵夺克扣百姓。这说明推行过程中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常平仓的粮食,在当地范围内采购,固然担心强制指派,但从附近州县买入,又增添

了运输的费用。这样一来,官府主管人员容易滋生相沿下来的弊病,不如义仓、社仓允许百姓自行操办主持啊!义仓从隋朝长孙平开始创设,在里社所在地建立粮库,丰收年就聚集,歉收年就散发。这种做法不是不好,但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会借给的数量少,让偿还的数量多,害处也就说不过来了。社仓的设创办法,与义仓大致相同。隋唐推行这种做法,不久就名存实亡,到南宋朱熹却独有成效。具体做法是设立一名社长,验核粮食的出入数量,施行了三年,百姓由此就粮食够用了。这说明,具有治理的方法,不更贵有能够治理的人选吗?《元史》所记载的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就是如今这方面制度的由来。但皇家仓库转运输送,强壮役夫和官府办事人员众多混杂,不能不存在大量扣除水路运送中的损耗以及掺入劣质东西的弊病。如果不严厉进行稽核察验,各种弊病怎么能够全部铲除呢?我皇上深切体念百姓的疾苦,斟酌多余的,补充不足的,无不规划谋求得十分完善。这是家家充裕、人人富足的原因吧?

制策又鉴于安定百姓必须首先止息住盗贼,止息住盗贼又没有比保甲制度更有效的了,据此深思除去坏人、安定良善的办法。臣下我查验,保甲制度起源于《周礼》中五家为一比、二十五家为一闾、一百家为一族、五百家为一党的基层管理制度。春秋齐国管仲依据它而做变通,定立五家为一轨、五十家为一里、二百家为一连、两千家为一乡的基层组织名称。这都属于用住在一处、相互熟悉的人,发现耳闻目睹、最为切近的坏事,致使畏罪潜逃的人没有去处能够隐藏,内外奸恶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所建立的制度最为周密。但同是保甲这种制度,北宋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推行它,却百姓受到搅扰;明朝王守仁在江西南部推行它,却百姓获得安定。这并不是具有奇特的办法,也只是在推行制度上确有合适的人选罢了。营地驻防和军事据点的设置,是用来稽察往来的坏人。佛教场所和道教地点的巡察,是用来探知落脚的坏人。但对兵士的奖赏和惩罚不分明,逮捕盗贼的人有的反而放跑盗贼;对官吏的稽核考查不得力,整治奸徒的人有的反而藏匿起奸徒。不是由地位高的官员随时整顿训戒,靠什么能够收到实际效果呢?至于海面辽阔,岛屿港湾险恶偏僻,匪徒出

没无常，也就是官府执行任务的人稽查有困难的地方。这就必须要秘密察访出匪徒的内地奸细，严密断绝掉匪徒的接应救援力量。通过招降来离散匪徒的党羽，通过安抚来诱导那些投诚的人。在远洋阻遏住匪徒，让他们没办法凭借险要地段保全住自己；在近地防御住匪徒，使他们没办法靠岸进行骚扰。明察客观形势，加强武器威力，搞好军队人员的挑选和训练，壮大声援力量，因地制宜，按时机稳操胜券。这就差不多罪犯逃亡的老巢可以扫清，而商船民船得以顺利渡过了。但又听说：在盗贼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防备他们，不如在盗贼还没形成的时候止息住他们。管仲说过：仓库储存丰实就懂得礼法的分寸等级，吃饭穿衣不发愁就懂得荣誉与耻辱。这是正本清源的论断啊！皇上您仁德威武远远播扬，中外大治安定，四海以内，全都洗涤冲刷掉各种坏人坏事而像镜子那样清明到极点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综括经书来考求大道，训导民俗来给各地作出榜样，使粮食充足来养育百姓，消除凶残来安定良善。奋扬盛大的功业，迎受宏大的吉福，仁德圣明的事体一样不缺，称得上“帝”、够得上“王”的大道完备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像天运行那样强健不息，每天都在道德修养上提高一步而永无止境。依据守护盛大功业、保持顺畅平安的心念，思索长治久安的大计。经书已经搜讨，而夜间更勤奋探索。百姓已经归服，而长远谋划又按时告诫，加倍对磨练百姓的仁德道义予以关注。发霉的粮食已经没办法处理掉也得储存了，而大丰收还要考虑仓库贮藏。京师已经安静，而申明法令进一步谨慎对待防备。验核经典，来同前代比试仁德；考查古代，来同前人较量功业。真广大啊！奉守上天的大法，称得上“帝”的最美好的制度。我们国家亿万年政治清明的绵长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殿试策问

[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洪祚，寅绍丕基，荷穹昊之佑申，缅祖考之彝训，孜孜求治，日昃不遑。恒思任贤去邪之道，典学稽古之谟，立政宜民之方，敦本善俗之则，冀与中外臣庶，致上理于大同。兹值临轩发策之初，虚衷搏采。尔多士其敬听之。

人君之职在于用人。登选之途宽，则贤愚并进；荐剡之路辟，则真伪相淆。知人善任，厥惟艰哉！唐李绛谓：循其名，验以事，所得十七。可取法欤？至如夹袋之储，材馆之录，荐拔既多，能无滥欤？《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贤奸之显然者，固易辨也。其或貌似朴诚而中藏险诈，外示正直而内蓄诐邪，何以洞烛情伪，俾无所售其欺欤？君子、小人，各从其类。若李泌之荐窦参，司马光之举蔡京，又何说也？朕寤寐旁求，命中外大臣各举所知，期得贤能以康庶事，将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程子所云知言穷理则能察人。斯为浚源之论欤？

唐虞授受，不外一中。所以辨危微而致其精一者，本于圣性之自然欤？抑亦有存心养性之圣学欤？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周公之称文王曰克宅厥心，与执中之旨同否？《书·说命》言"逊"、"敏"，而推其效于道积厥躬；《诗·敬之》篇言"就"、"将"，而课其实于缉熙光明。固未有不切于身心而可以言学者也。三代以还，史所载留意经术、好学

右文之君，代有之矣。乃考其行事，或显与古训相违。岂非舍本逐末，所学未得其要欤？朕惟《典》、《谟》奥义、孔孟微言，以之修己治人，若规矩准绳之不可易。欲身体力行，以为正位凝命之本，审端致力，宜何从欤？

道揆法守，制治保邦之要务也。宋朱子有言：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夫纪纲不立而能治安者，未之有也。欲振肃而整齐之，厥道何由？礼乐刑政，号为治具。其所以行之者，命令而已。乃淑世牖民之道，兴利除弊之方，诰诫屡颁而奉行不力。是涣号仅为空言，播告只循故事。何由振颓风而收实效欤？《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今承平日久，法非不大备也。而怠玩从事，奸弊潜滋。或偏废而不举，或积重而难反。若盐、漕、河工诸大端，利弊所在，何以策出万全，俾国计民生两受其益欤？

民风之淳漓，系乎政教。《周书·武成》篇曰：重民五教。君牙之命，亦以敷五典、和民则告其臣。盖开创之君，守成之主，未有不以化民成俗为先务者。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固有之良，尽人同具，而转移化导之权则操之自上。仁让之风何以兴？嚣凌之习何以靖？侈靡相高何以防其渐？奇邪相扇何以破其迷？欲使海内之民还淳返朴，臻道一风同之盛，将何道之从欤？史称韩延寿守颍川，教民略依古礼，不得过法；黄霸班行条教，劝以为善防奸之意，民皆信从。今之守宰，岂遂无其人欤？抑大吏视教化为末务，美绩无由上闻，遂相率而趋于刀笔筐箧欤？

多士通经致用，学古入官，且来自民间，见闻亲切。其推之往古，验之当今，悉心敷陈，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欺。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具备了最高的道德，再三逊让王位，民众简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

五十岁还思慕父母的人,我从大舜那里看到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皇位,承继帝业,蒙受上天的佑护,缅怀祖宗的教诲,孜孜寻求对天下的治理,从早到晚也不停息。总是在考虑任用好人、清除坏人的原则,学习和吸取古代经验的计划,确立政体、方便民众的方法,敦厚根本、改善风俗的措施,希望与中外臣子一道,使天下太平,达到大同的理想境地。现在正值在前殿开始策问的时候,愿意虚心听取意见,博采众长。各位贡士,请你们恭敬地听好。

国君的职责在于用人。选拔的路子放宽了,贤能和蠢材就会同时被任用;推荐的路子打开了,那就会导致真假相互混淆。要做到知人善任,那是多么困难呀!唐朝的李绛说:根据他的名位,用实事进行检验,可以达到十分之七的准确性。这可以效法吗?至于像宋朝吕蒙正和虞允文那样,用随时在身上带着小本、登记备用人才的办法来选拔人;既然他们推荐和选拔的人太多,那还能不滥吗?《尚书》说:"任用好人不要有贰心,清除坏人不要犹豫。"明显的贤能和奸恶,确实是容易分辨的。然而,要是奸恶的人貌似忠厚老实而内心隐藏着险恶和奸诈,外表正直而内心蓄藏着偏颇和邪恶,又应该怎样来洞察真伪,使他们无法达到欺骗的目的呢?君子和小人,各自分属于不同的群体。然而,像李泌举荐窦参,司马光举荐蔡京,又怎么解释呢?皇帝我日夜广泛寻求人才,命令中外大臣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才,希望能得到贤能,以振兴各种政务,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能,朝廷没有侥幸的官位。程颐说:只要能够透过言论看清本质,那就可以看清一个人了。这是不是抓住了关键的论断呢?

唐尧虞舜递相传授的,不外乎一个"中"字。它之所以能够分辨出"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从而达到"精诚专一"的境界,是出自圣人天性的自然呢,还是圣人有存心养性的学说呢?大禹告诉虞舜所说的"保持心的安宁",周公称赞文王所说的"保持平常心",与

保持中道的主旨是否相同?《尚书·说命》说"学习要谦虚"、"务必要时刻努力",从而把最终的成效归结为自己道德的日益积累的结果。《诗经·敬之》这篇诗说"随着日月推移",通过学习,从而收到逐渐积累扩大、以至于大放光明的实效。确实没有不切近于身心而可以谈论学问的。三代以后,史书所记载的留意经学、好学而崇尚文化的君主,每代都有。然而查考他们办事,有的显然与古训相违背。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舍本逐末、学习还没有得到要领呢?皇帝我只是遵照《尚书》中《尧典》和《大禹谟》等经典的深奥含义和孔孟的精微言论,用来培养自身修养和治理别人,就好像规矩和准绳一样不可改变。要想身体力行,把它作为君临天下、凝聚天命的根本,那么,要把握头绪和尽心尽力,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使道德得到遵循、法令得到遵守,是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重要任务。宋朝的朱子说: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确立纪纲。纪纲没有确立而能做到天下太平的事情是没有的。想要提倡和严肃道德,整顿和规范纪纲,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号称政治工具。它们之所以能够推行,全都是通过命令。然而,尽管诰命和警告条令屡次颁布了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措施以及兴利除弊的方法,但下面却奉行不力。因此,朝廷的号令仅仅是空言,朝廷的公告只是徒有其名。用什么办法才能振作颓废的风气,从而收到实效呢?《周易》说:"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长久。"如今,太平代代延续,已经很久了,法令不是不十分完备。然而,下面却消极从事,玩忽职守,导致邪恶和弊病在暗中滋长。或是偏废不举,或是积重难返。而盐政、漕运、治河工程等重大事务的利弊所在,对此怎样才能使政策一经提出,就能完善周密,使国计民生这两方面都得到好处呢?

民风的淳美和浮薄,关系着政教。《尚书·周书·武成》这篇文章说:"要重视对民众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育。"周穆王在任命君牙时,也用普遍传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育、使民众和睦的准则的这条命令来告诫他的臣子。因为无论是开国的皇帝,还是守成的君主,都没有不把教化民众、改

善风俗作为首要任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人们天生所具有的良好因素,所有人都同样具备,而引导和教化的灵活处理方式却是由上面来掌握的。仁爱礼让的风气怎样才能兴起?轻浮侵凌的习气怎样才能杜绝?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奢侈浪费和相互攀比的滋生蔓延?用什么办法才能破除邪恶迷信煽动和蛊惑人心?要想使天下民众还淳返朴,步入道德一致、风俗相同的良好局面,应该采用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呢?史书上称述韩延寿做颍川太守时,教导民众大致依照古代的礼仪,不得违法;黄霸颁布条令教化民众,用做好事、防奸恶的意思来劝导民众,民众都能信服和听从。如今的州县官员,是没有这种人呢,还是由于各省长官把教化看成是不重要的事情,使上面无法知道州县官员的美好政绩,从而迫使州县官员相率转向、只满足于处理好日常公务呢?

各位贡士精通经典而用于实际,学习古代经验而进入官场,而且来自民间,见闻真切。请你们推论古代,验证当今,尽心陈述,不要空泛,不要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陆增祥　会试卷三道

陆增祥(1816~1882)　字魁仲,号星农,江苏太仓人。道光三十年(1850)状元。历任国史、功臣、方略诸馆纂修、起居注协修、广西庆远知府、辰永沅靖道等职。光绪五年(1879),因病请假归乡。其在金石学上颇有造诣,著述甚丰。著有《金石补正》120卷,《札记》4卷,《〈楚辞释疑〉释证》8卷,《篆墨述诂》24卷等。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释诚意之旨,首在戒欺也。夫诚则不欺,欺则不诚,致知者所宜辨也。传者释诚意之谓,所由首戒以自欺乎!且人知昧者之妄,而不知明者之邻于妄也;人知明者之妄,而不知妄者之并将没其明也。有所明而或即于妄,则心之所发者诬;有所妄而不复求明,则心之所知

者亦失。夫乃知无妄之主名,因其明以力祛其妄,亦戒其妄而益浚其明也。诚意必先致知,知之不至,非所谓诚也。夫意之所流露者诚,而意之所虚骄者欺。诚近于拙也,而欺出于巧;诚立于信也,而欺习于诈。世有不巧诈而未即诚者,世未有巧诈而可谓诚者。吾不意巧诈之出于知者也,谁实使之巧诈者?诚主于实也,而欺饰以虚;诚达于真也,而欺作以伪。世无诚而或为虚伪者,世亦无虚伪而可谓诚者。吾不意虚伪之出于知者也,谁则使之虚伪者?夫亦自欺而已。曾谓诚其意者,而可自欺也乎!

邪正之不容或蔽也。其一发而入于邪者,蔽也而蒙于外;其展转而匿于邪者,蔽也而积于内。蒙于外者可自恕,积于内者毋自恕也。自恕则自欺。使世莫知为欺,而我乃惺然自觉其欺,则自欺者谬;使世明知为欺,而我反肆然不以为欺,则自欺者益谬。是非之不可稍诬也。其冥然而溺于非者,诬也而限以天;其灼然而遁于非者,诬也而间以人。限以天者可自诿,间以人者毋自诿也。自诿则自欺。始焉欲售其欺,而不觉自蹈于欺,则自欺者深久焉;日事于欺,而并将自忘其欺,则自欺者愈深。

欺之显为背戾者易除,欺之隐为倚伏者难除。从理偶涉因循,稍间焉意已不切;去私或存苟且,稍留焉意已不纯。夫此因循苟且之心,皆自欺之念所积而成焉者也。诚意者毋然也。一念而犹或虚也,禁之者毋敢纵矣;百念而罔不实也,防之者毋取疏矣。欺之乘于有心者易绝,欺之乘于无心者难绝。几微有未达,稍忽焉意即纵之;纤悉有未除,稍杂焉意即随之。夫此几微纤悉之端,皆自欺之见所潜为滋焉者也。诚意者毋然也。有所欺而革之也,绝其萌者毋怠矣;无所欺而安之也,永其神者亦毋忽矣。此诚意之谓也。

阐释诚意的要旨,首先在于戒除欺哄。真诚则不欺哄,欺哄则不真诚。要想达到对事物有认识的人,应该对此加以辨明。难怪注释经典的人在解释诚意时,首先提出的就是戒除自欺!而且人们知道无知者的讹谬,但却不知道明白者与讹谬相邻;人们知道明白者的讹谬,但却不知道讹谬还将同时隐没明白者的正确认识。有所正确认

识而或接近于讹谬,则心中所产生的认识便会有偏差;有所讹谬而不再去探求正确的认识，则心中已经得到的正确认识也会失去。知道了不虚假的映像决定着正确概念的产生，于是利用心中的正确认识竭力去除心中的讹谬，同时也戒除讹谬的产生并进一步加深正确的认识。诚意必须先得去认识事物,不能达到正确的认识,就不能说是真诚。心灵所自然流露的是真诚,而心灵所盲目自傲的是欺骗。真诚接近于朴拙,而欺哄则出自机巧;真诚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而欺哄却经常使用巧诈。世上有不巧诈而未能接近真诚的，但世上却没有因巧诈而被称之为真诚的。我没有料到巧诈会出自明白者，到底是什么使其变成巧诈的呢？真诚原属于诚实,但欺饰却用虚伪手段;诚实原本能达到纯真，但欺诈却用虚假伎俩。世上没有因真诚而或变成了虚伪的，世上也没有因虚伪而被称之为真诚的。我没有料到虚伪会出自明白者，又到底是什么使其变成虚伪的呢？这也都是自欺而已。所谓诚意,岂能自欺!

邪与正之间的区分，容不得遮掩。那些因一念之差而进入邪道的,同样是遮掩了邪正,但却显现在心外;那些辗转藏下了邪念的,同样是遮掩了邪正,但却沉积在心中。显现在心外的可以自我宽恕,沉积在心中的却不能自我宽恕。自恕就是自欺。使世上不知道这是在欺哄,而我却明明白白觉察到了这是在欺哄,那么,自欺者就是讹谬的;使世上明明知道这是在欺哄,而我却反倒毫无顾忌,不认为这是在欺哄,那么,自欺者就更加讹谬了。是与非之间的界限,不可混淆。那种浑浑噩噩而犯错误的人,同样是混淆了是非,但却是老天所造成的;那种明明白白而犯错误的人,同样是混淆了是非,但却是人为所造成的。老天所造成的可以自我推卸责任，人为所造成的却不可以自我推卸责任。自我推卸责任，从一开始就想要实施欺骗而没有感到自己已经陷入欺骗之中，那么，自欺者就是已经陷得很深又很久了;经常实施欺骗而自己却忘记了这是在欺骗,那么,自欺者就是越陷越深了。

明显的欺骗容易清除,隐藏的欺骗难以清除。想要服从真理,但只要偶尔存有因循之心,稍有间隔,动机就已经是不真切了;想要去

除私心，但只要间或存有苟且之心，稍一耽搁，动机就已经是不纯洁了。这种因循苟且之心，都是自欺的心理所积成的。诚意者却不是这样。稍稍感到有一个意念发虚，他也会控制意念而不敢放纵；尽管所有的意念都没有不实在的，但他也会严加防范而不敢疏忽大意。欺骗在有心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时容易杜绝，欺骗在无心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时却很难杜绝。对隐微之处没闹清楚，哪怕有稍稍疏忽，意念便会放纵它；对细微之处存在未去除的情况，哪怕有一点点杂念，意念便会跟随它。这些隐微和细微的发端，都是自欺的意识偷偷滋生的条件。诚意者却不是这样。有了欺骗便革除它，杜绝它的萌发，一点儿也不放松；没有欺骗便保持纯洁，并且永远警惕，一点儿也不疏忽。这就叫做诚意。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至德无可称，德所以至也。夫泰伯之三让，民无有称之者，夫子称之曰至德，岂以天下为计哉！且自揖让创于唐虞，而后世遂藉为口实。说者谓让之名至美，让之实至难。苟非有廓然大公之怀，对天下万世而无愧者，不足以言让也。乃有以推逊之心，涉隐微之地，而天下万世莫得而赞一辞者，斯其让乃独超千古矣。

今夫古今能让者多矣，而夫子独称泰伯者，何哉？想其意曰：巢、许能辞轩冕，不欲以明扬绍蒲坂之休。而烟霞泉石之区，儒者高其节而不敢服其量，以其无得天下之理也。若伯则青宫贵胄，主器能贤矣。而何为渺尔长征，竟同于山林之逸叟？朱均退列藩封，不欲以畔贰肇武庚之衅。而异代同揆之感，君子惜其遇而不欲重其人，以其无治天下之才也。若伯则端委多材，垂裳可卜矣。而胡为决焉舍去，竟托于采药之高踪？呜呼，其至德矣乎！其让而不名以让也乎！

挟伯仲偕行之说，谓埙篪倡和，同气可以订同心，则孤竹高风，自足与伯也并驾。而不知西山之义士，非所语南国之逋臣也。当日者，仲子寡才，几百年墨胎之绪，数传而城郭俱非。何必非夷、齐贻之患乎？伯也无虑此矣。顾瞻予季明类，较胜于寡兄，与其以父命为辞，临

事而与弟以不忍,何如以他端为解,先事而偕弟以同行也。然而伯之心亦良苦矣。执宠利不居之说,谓荆蛮遁迹,遐壤可以寄遐心,则弃室躬耕,似足为伯也继轨。而不知后裔之云礽,未足媲开先之宗祖也。当日者,阖庐逞志,诸昆弟燕私之地,一旦而甲胄纷争。夫孰非季札阶之厉乎?伯也无虑此矣。环顾宗支神孙,足以集大统,与其惊世骇俗,徒以博貌躬逊位之名,何如匿迹销声,并以泯严君易嗣之悔也。然而伯之心乃愈晦矣。民其得而称之乎?兄终者可以弟及,伯即躬膺大宝,何难以次而递传?此余祭诸君所为取法也。而伯之隐行其让者,并不欲以歧封污其节。择贤者不必立嫡,伯即长依膝下,亦可舍长而他图。此邑考长君所由不立也。而伯之阴寓其让者,并不欲以夺嫡启其嫌。呜呼,斯其为至德也夫!

之所以最高尚的道德没法用语言来赞美,是因为道德的高尚已经达到了极点。泰伯再三逊让王位,民众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而夫子却称赞他有最高尚的道德。这岂能是用"天下"来衡量的呢!王位的禅让创始于唐虞,后世于是将它作为谈论的话题。论说者认为逊让说起来很美,但实际做起来却很难。要是没有胸怀宽广、大公无私、无愧于天下万世的品德,这样的人就没有资格说逊让。然而,真心诚意、不露声色地完成了逊让,而且天下万世无从对他再讲出一句什么话来,这样的人作出的逊让才是独超千古的。

到如今,古今能逊让的人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然而夫子却单单只赞美泰伯。这是为什么呢?推想夫子的意思,可以说:巢父、许由能够推辞王位,是不想使继位的虞舜得以通过像尧选拔贤士隐士那样美名传扬,对二人躲到了有烟霞泉石的风景胜地,儒士们却认为他们原本就不可能得天下,因而只赞扬他们的气节但却不佩服他们的气量。至于泰伯就不同了。他本身就是东宫太子,如果继承王位,一定是位贤明的君王。然而,他又为何悄悄躲到远方,竟然与山林的隐士一样?朱均不愿用背叛来挑起武庚的叛乱,因而退居藩国之列。出自时代不同但评价的标准却一样的感受,君子们也认为他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因而只是惋惜他的境遇而不看重他本身。至于泰伯就

不同了。他本身就是朝服鲜亮,仪表堂堂,多才多能,如果即位,天下肯定可以无为而治。然而,他又为何下决心舍弃王位,竟然以采药为借口而逊让了王位呢?啊,他的道德真是最高尚呵!他逊让王位却又无法让人把这称为逊让!

有人认为泰伯偕同仲虞出走,正如《诗经·小雅·何人斯》所说,是为了兄弟和睦,从而可以同心同德。如果这样说,那孤竹国的伯齐和叔夷的高风亮节自然就可以与泰伯相媲美了。然而,这些人却不知道伯齐和叔夷这两位在西山采薇的义士,怎能与泰伯这位逃到南方建立了吴国的周室臣子相提并论呢?想当年,伯齐和叔夷出走后,因继承王位的老二缺少能力,结果导致孤竹国墨胎氏几百年的江山,往后只传了几代便终结了。这是否是伯齐和叔夷出走所留下的隐患呢?然而,泰伯却没有想到这些。当他看到三弟季历才能出众,胜过兄长,便想到:与其让父亲提出、到头来让位给三弟而闹得不愉快,还不如采用其他办法解脱,提前就与二弟一道出走为好。然而,泰伯的用心也是非常良苦的了。有人说泰伯不应当利用他高贵的地位建立吴国,认为他既然已经逃遁到了荆蛮之国,而远方可以寄托逍遥之心,那么,泰伯就应该放弃王位而躬耕陇亩。好像只有这样,泰伯才能称之为泰伯而继承了前人的事业。然而这些人却不知道后裔的八、九代子孙,不足以和建立基业的祖宗相媲美。想当年,阖庐为了实现自己做吴王的抱负,结果导致在诸位兄弟的宴席上,阖庐指使专诸刺杀了吴王僚。这是不是由于在他们的几代之前,吴王寿梦之子季札多次逊位而造成的呢?然而,泰伯却没有想到这些。当他环顾宗族旁支,看到三弟季历之子足以继承王位,便想到:与其惊世骇俗、白白博得一个谦虚逊位的名声,还不如销声匿迹,而且这样还能消除父亲因改换王位继承人的悔恨。然而这样一来,泰伯的心迹也就更加难以让人理解了。民众又怎能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呢?在王位继承上,哥哥死后弟弟是可以继承的。泰伯当时即使是继承了王位,那再依兄弟排行往下传位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也是泰伯之后,余祭等吴国国君所效法的形式。但泰伯之所以悄悄完成了王位的逊让,就是因为他不想让在周室岐山的封立来玷污自己的名声。在王

位继承上，也可以挑选贤明的人而不必非立嫡长子不可。当时泰伯即使是长久地依偎在父亲膝下，他的父亲也是可以不立他这位长子而另立其他人的。这也是泰伯之后，周文王的长子邑考没有被立为王位继承人的原因。但泰伯之所以在暗中实现了王位的逊让，就是因为他不想让褫夺嫡长子的王位继承权这种事情为以后开了坏头。呵，泰伯之所以具备了最高的道德，也就是因为如此啊！

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于虞帝征终身之慕，慕之极则也。夫慕至于五十，即终身之慕也。古今大孝，孰有如大舜者哉！且圣人为人伦之至，得乎亲者为人；天子居子道之宗，顺乎亲者为子。此烝乂克谐之舜，所为尽其道以底豫也。而要其依依孺子之忱，极数十年而常如一日，溯自登庸之岁，以迄在位之年，而叹事亲之极轨，惟虞帝为弗可及也已。终身慕父母，惟大孝者能之也，而谁实如是其慕者？早岁孩提天性，类能顺庭闱之色笑，曲致其缠绵固结之情。至于后，则真意渐漓。虽日侍盘匜，而肫挚之私，有未达于隐微者矣。永其慕者，未由见矣。壮岁艰难备历，类能奉高堂之意旨，自尽其恳勤莫释之怀。至于后，而丰厚相安。虽日亲骨肉，而悃愊之天，有莫宣于寤寐者矣。一于慕者，不可见矣。昔者孔子尝言之矣，曰舜其至孝矣乎！五十而慕。吾闻其语，如见其人矣。

止孝者，莫如文王。而文之孝守其常；极天下至顺之境。舜之孝际其变，极天下至逆之遭。慕者同，而舜之慕为独苦也。故文王以明发为怀，视膳问安，皆足征向慕之忱于毕世，而不闻于遹追来孝之余，别详岁纪。达孝者，莫如武王。而武之孝在家国变迁之会，舜之孝在家庭变故之秋。慕者同，而舜之慕为较难也。故武王以暮年得国，继志述事，罔弗持企慕之意以毕生，而不闻于文考祗承之外，别载年华。

顽嚚未化之先，怨而慕者，其慕难致；允若既谐之后，爱而慕者，其慕易形。而要之慕，则无弗同也。予不知此五十年中，舜之致其孺

慕者奚若。第见养志常偕颗首，先寡兄而奉羹汤；承欢并有英、皇，率主妇而朝宫寝。而四方玉食，万国冠裳，养之至，尊之至，无非慕之至也。推之介弟分藩，商均绕膝，而统其慕以为慕者，不且若将终身也哉！趋庭奉侍之年，敬而慕者，其慕已挚；入庙告虔之际，哀而慕者，其慕倍长。而要之慕，则无少间也。予不知此五十年后，舜之竭其思慕者何如。第见报本及于握登，镌苕华而上尊号；助祭来夫禹稷，祼郁鬯以荐馨香。而匾献菁茅，包供橘柚，昭其备，昭其洁，无非昭其慕也。推之蛴牛崇祀，虞思受封，而广其慕以为慕者，不且直贯终身也哉！

从虞帝那里来验证终身对父母的思慕，是思慕的最高模式。思慕父母到了五十岁，也就是终身对父母的思慕了。古往今来，要说最大的孝顺，那有谁能比得上大舜呢！圣人是人类伦理中最高尚的人，但是他也必须要有父母后才能成为人；天子是所有儿子中最高贵的儿子，但是他也必须要依顺父母后才能成为儿子。这就是淳厚和睦的虞舜之所以能竭尽孝顺之道、使父亲感到高兴的原因。对他进行查证，可以看到：他那像孩子一样对父母依依不舍的诚心，达到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程度，从他被任用的那年，直到他在位的年头，从而使人感叹：这种奉侍父母的最高境界，除了虞帝之外，人们都不能达到。终身思慕父母，只有具有最大孝心的人才能做到。然而，谁真正能做到这种思慕呢？早年孩子的天性，大都能顺从大人的心意，并使家庭快乐，尽一切可能来达到牢固联结亲人的缠绵情感的目的。但长大以后，这种真实的情感却会渐渐淡薄。即使每天都能照顾父母的生活，但纯真的自我情感，却不能真正达到灵魂的深处。能够永远思慕父母的人，因此也就很难见到了。壮年时期，在经历过所有的艰难后，大多数人能顺从父母的意愿，竭尽自己那勤勤恳恳总也放不下的心怀。然而到后来，由于生活丰厚安定，即便每天都孝顺父母，但最诚实的天性，却再不能日日夜夜常挂在心上了。自始至终能保持对父母思慕的人，因此也就不能见到了。从前孔子曾经谈论到这件事，说：虞舜确实是最孝顺了！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我听到这话，就好像见到了大舜一样了。

要说能做到最孝顺的人,那就没有人能比得上周文王。但是,文王的孝心是在正常条件下保持的,达到了天下最顺利的境况。大舜的孝心却遭遇了变故,达到了天下最倒霉的程度。他们对父母的思慕是相同的,但只是大舜的思慕是痛苦的。所以,文王心怀孝心,是以公开的行动来表白的。关心父母的饮食,向父母问安,在他的一生中都能证明向往思慕的忱心,因而除他虔诚追悼父母之外的事情,并没有听说在其他岁月还有记载。要说能做到可以普遍适用于天下的那种"孝"的人,那就没有人能比得上周武王。武王的孝心是在家国变迁、灭商建周的时候保持的,大舜的孝心是在家庭变故的时候保持的。他们对父母的思慕是相同的,但只是大舜的思慕要难一些。所以,武王在暮年的时候得到了王位,继承祖先遗志,承继祖先事业,一辈子都能保持思慕的情感,因而除他恭敬奉侍文王之外的事情,并没有听说在其他年代还有记载。

在父亲的愚妄无知和母亲的放肆刁蛮没有改变之前,因怨恨父母而思慕父母,这种思慕是很难实现的;在父母变好、家庭和睦之后,因爱心而思慕父母,这种思慕则是很容易显露出的。而对这两种思慕进行分析,那就会发现:它们的内涵却并没有不同。我不知道在这五十年中,大舜所做到的那种像孩子一样的纯真思慕,其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但我们能看到:大舜在照顾老人的情感时常常是与妹妹"颗首"在一起,而"颗首"则是在贤明的哥哥之前,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能使老人开心的还有两位夫人女英和娥皇,她们率领百官的夫人朝拜老人,问寒问暖。而且,大舜还用四方的美味佳肴和万国的华美服装来供养父母。这种奉养父母之最、尊敬父母之最,无非也就是大舜对父母的思慕之最。从大舜分封兄弟,大舜之子"商均"依偎在老人膝下、使老人感到高兴这些事情来看,大舜是能从各个方面来表达他的思慕的。而这种思慕,不正预示着他将终身思慕父母吗!在前去探望和奉侍父母的时候,这种思慕是由敬意而产生的,而这种思慕已经是非常诚挚的了;在进入宗庙祭祀祖宗的时候,这种思慕是由哀伤而产生的,而这种思慕则是相当深远的。然而,对这两种思慕进行分析,那就会发现:它们的性质却并没有一点儿差别。我不知道在这五

十年之后，大舜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表现来竭尽他对父母的思慕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大舜祭祀母亲“握登”，诉说本起，并为母亲加上尊号；前来赞助祭祀的是大禹和后稷，他们用“郁鬯”这种美酒灌地，献上亡灵享用的香气。而且成匣成匣地献上“菁茅”这种名贵茅草，成包成包地供上橘子和柚子。用这样的形式来表明祭品的齐备，表明祭祀的洁净，无非也就是表明了大舜对父母的思慕。从他的祖父“蛴牛”受到极其尊贵的祭祀、他的后代商均被封为“虞国”国君这些事情来看，大舜是能从扩展的角度来表达他的思慕的。而这种思慕，不正是能够贯穿他的一生吗！

陆增祥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崇正乃可黜邪，稽古斯能懋学，励俗在于布政，敷教所以兴民。综稽往籍，《书》详旌别之文，《易》系闲存之德，《礼》法颁乎吉月，《诗》篇重以观风。自古帝王，斟元御宇，锡福诚民。以判彰瘅，则鸿逵协吉也；以严宥密，则燕寝修仪也；以设科条，则虎门莅治也；以端整率，则象译归诚也。茂矩隆规，罔弗粲然备具。用是勿疑勿贰，庶绩熙焉；式金式玉，百度贞焉；有猷有为，万几理焉；无偏无党，亿姓格焉。所由德媲重华，光昭念典，承诒谋而弼丕基者，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继体守文，建中立极，本大孝以绥猷，沛深仁以育物。固已四门是辟而万世垂型，五典胥惇而兆民於变矣。乃圣怀冲挹，犹切畴咨，冀长治而久安，益持盈而保泰。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用贤才、修德业、明治体、正风俗诸大端。臣之愚昧，奚补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陈所见，诵述所闻，以勉效土壤细流之助也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君之职在于用人，而因讲求夫君子、小人之辨。臣案取士之法，莫如登选之途；举人之方，孰若荐剡之路！然或其途稍宽，则醇谨之儒固挟其行谊以进，揣摩之士亦投其好尚而来矣。其路大辟，则公正者流固得以材略而显，狙巧之辈亦得以夤缘而升矣。是非选举之法不得为善，汲引之途不可以开也。程子有言曰：知

言穷理,则能察人。诚能体正本清源之论,斯其清也,如水之可鉴影;其明也,如镜之无遁形;其平也,如衡之能称物。而又询诸廷议,采诸舆论,试诸事功,出诸刚断,将《书》所云"知人则哲,能官人"者,不难再见于今矣。唐李绛之说曰:循其名,验其事,所得十七。信不诬也。至如夹袋之储,材馆之选,荐拔既多,其中不无稍滥也。且夫任贤去邪,《禹谟》所载。其贤、奸显然者,固不难于立剖。而或貌似朴诚、中藏险诈,外示正直、内蓄诐邪,苟非洞悉其情,必不能不售其欺。若第执各从其类之说以为区别,则亦未为尽善。李泌之荐窦参,司马光之举蔡京,其左证也。甚矣知人善任之难,而明察之为亟也。皇上诏求贤俊,取人以身,而器使因材,擢用可无拘成格也已。

制策又曰:唐虞授受不外一中,而进论夫切于身心之学。此诚正位凝命之大本也。臣案《书》纪"危微",人心道心所由判。此千古帝王心学之渊源,无过于执中之理也。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周公之称文王曰"克宅厥心",其意与执中之旨相发明也。且夫古来治法,悉本于心法。齐治均平之略,即格致诚正之学。而学必身体而力行之,非第为讲论已也。是故《说命》之言曰:"惟学逊志,务时敏",而推其效于道积厥躬。《敬之》之诗曰:"日就月将",而课其实于缉熙光明。盖未有不切于身心而可以言学者也。若舍其本而逐其末,则虽好古右文,日事于经术,而考其行事,往往与古训相背戾。惟审其端而致其力,以之修己即以之治人,如规矩准绳之不可易。存之为圣功,发之为王道,虽尧舜亦无逾于是矣。圣天子慎修思永,无怠无荒,戒欺求慊之学不已,底于精纯哉!

制策又以道揆法守为制治保邦之要务,欲修治具以整齐严肃,而因论夫兴利除弊之方。此国计民生之所维系也。臣案宋朱子有言: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纪纲之立,治安之机也。古今治具,不外礼乐刑政数端。而日久怠生,有诰诫屡颁而奉行不力者矣。视涣号为虚文,目播告为故事,颓风无自而振,实效无自而收。是岂法之不善?特奉法者之玩忽耳。且夫弊不剔则利不兴,而弊之滋也,或偏废而不举,或积重而难返。若盐政,若漕务,若河工,所关为最巨也。盐政之修,必酌其至通之理,使商不亏本,国不绌课,民不被累,则私不缉而

自弭,而引亦畅销矣。漕务之修,必持其至平之道,使丁不需索,吏不侵渔,官不贪残,则敛不减而自轻,而困亦日苏矣。河务之修,必立其至明至勤之略,使官不靡费,吏不从杂,夫不抑勒,则工以久而渐固,而帑亦日盈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董生有言曰:琴瑟有不调者,必取而更张之。此类是也。昔日之利,皆今日之弊。弊一日不去,则利一日不复。因循者不求其故,苟且者不究其原。利日消,弊日长,大率在此。诚能相机筹画,实力察核,又何废之不可举,而何重之有难返也哉?方今皇上整理庶务,谕令封疆大吏悉心妥议,有不弊革而利兴哉!

制策又以民风之淳漓系乎政教,而廑求夫转移化导之方。臣案化民成俗者,治天下之先务也。孝弟忠信之心,礼义廉耻之端,虽愚夫愚妇,孰不具此天良!而往往有仁让之风不兴于里党,嚣凌之习不靖于闾阎,侈靡相高因其渐而日炽,奇邪相尚溺于迷而莫知者。则非民之无良,而有司不能化之耳。诚使亲民之官存长厚之心,则民必不至于偷薄;泯矜张之气,则民必不至于浮嚣;敦节俭之风,则民必不至于奢侈;立中正之型,则民必不至于谩妄。而又先之以躬行,劝之以大道,谕之以义,诱之以利,旌扬之以奖其意,鼓舞之以启其机,必无顽梗不率而自外名教者矣。即或有之,亦惟小惩而大诫之,开其自新之路,迪其悔悟之萌,无徒以刑法驱迫为也。刑法驱之,将有日趋于下,而不知所返者矣。盖不探其原,其流无自清耳。昔者韩延寿教民略依古礼,不得过法;黄霸颁行条教,劝以为善防奸之意,而民皆信从。今日之民,犹是昔日之民也。今之守宰,诚能以昔之守宰为法则,亦何至相率于刀笔筐箧也乎!国家渐仁摩义,易俗移风,凡隶帡幪者,敢不争自濯磨也哉!

若此者:凰飞以蔼吉,龙德以正中,象魏以宣猷,鸿钧以甄俗。廓帝纮,信景铄,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本励精图治之诚,臻累洽重熙之盛。四目既明而弥思整饬,单心已靖而益切精深,百事具修而更勤敷布,万方群化而愈重道齐。于以淳洪鬯之德,大茂世之规,上畅九垓,下溯八埏,聿迓天庥,诞膺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

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崇尚正气就可以消除邪恶,研究古代才能丰富学问,改善风俗在于推行政治,普遍实施教化是用来激励民众的。综合查考过去的书籍,《尚书》详细记载着旌别好坏的内容,《周易》列示了防范邪恶、保持诚信的道德,《周礼》规定在正月初一颁布法令,《诗经》的诗篇注重观察风俗。自古以来的帝王,斟酌初始状态,统治天下,赐给百姓幸福,使民众和睦相亲。用来区别奖惩,就能做到仕途通畅;加强内心修养,就能使日常行为符合礼仪规范;设置法令,就能使朝廷保持高度的威信;端正民俗,就能使四方部族前来归服。美好的制度和规章,没有不明明白白、完美具备的。因此任用好人没有贰心,清除坏人不会犹豫,使各种政务得到圆满完成;品质能够如黄金、如美玉一样,使各项制度行到端正;有计谋,有作为,处理好各种国家事务;不偏袒亲信,不拉帮结派,使亿万人民都团结一致。之所以道德可以与古帝虞舜媲美,光辉胜过坚持学习的殷高宗,继承祖先的方针,巩固伟大的基业,靠的就是这些方法。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继承王位,遵守既定的制度,建立中正之道,确立最高准则,本着大孝的原则来安定天下,用最深厚的仁爱来养育万物。确实已经做到了招纳贤才,完美的制度万世都能够作为典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都已经完善,亿万民众的风俗全都已经改变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仍然殷切咨询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够长治久安,更进一步保持持盈保泰的思想。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使用贤明人才、培养道德品质、明确政治体制、端正风俗等大政来策问我们。臣下我十分愚昧,怎能补益高深呢?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小心陈述所看见、所听到的东西,像土壤和细流一样,尽力向高山和大海提供一点儿帮助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国君的职责在于用人,因而想要探讨分辨君子和小人的问题。臣下我认为:录取文士的方法,没有比考试

选拔这条路更好的了；推选人才的办法，没有比举荐这条道更好的了！然而，如果这些道路稍稍放宽，那么，醇厚谨慎的儒士尽管可以凭借他们的德行而得到任用，但那些善于揣摩别人心理的人也会因能投其所好而得到升迁；如果这些道路完全敞开，那么，堂堂正正的这一类人尽管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而得到重用，但投机取巧的这一类人也能凭借关系而被提升。这不是选举的制度不好，也不是荐举的途径不可以开启。程颐说："只要能够透过言论看清本质，那就可以看清一个人了。"这确实是能够体现正本清源的言论。选拔者的清澈，就如同水一样可以照见影子；选拔者的明亮，就如同镜子一样能清楚反映出对象；选拔者的公平，就如同天平一样能称量物体。而且再征询朝廷各位大臣商议的意见，采纳社会舆论，让被选拔的人尝试着去做具体事务，果断地作出决定。那么，《尚书》所说的"能够了解人，那就可以达到明智的境界，就能任用好官员"的情况，在今天就不会难以重现了。唐朝的李绛说：根据他的名位，用实事进行检验，可以达到十分之七的准确性。这确实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假。至于像宋朝吕蒙正和虞允文那样，用随时在身上带着小本、登记备用人才的办法来选拔人；既然他们推荐和选拔的人太多，那其中就肯定会有一些滥竽充数的人了。而且任用好人、清除坏人，《大禹谟》上是有记载的。对于好和坏十分明显的人，确实不难于立刻就能够清楚判明。然而有的人貌似忠厚老实而内心隐藏着险恶和奸诈，外表正直而内心蓄藏着偏颇和邪恶，如果不能洞察他们的真伪，就必然不能使他们不进行欺骗。但如果只是坚持好人和坏人各分属于不同群体的见解，用这个标准来区别好坏，那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李泌举荐窦参，司马光举荐蔡京，就是这方面的佐证。知人善任实在是太难了，而准确的判断是最紧要的。皇上下诏寻求贤能的优秀人才，根据品行来录取他们，而具体使用则依据他们的才能来做决定，在提拔和任用上可以不拘泥于固定的标准了。

制策又说：唐尧虞舜递相传授的，不外乎一个"中"字，因而进一步推论与身心密切相关的学问。这确实是君临天下、凝聚天命的最大的根本所在。臣下我认为：《尚书》记载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

精微的。”人心和道心,就是由此而区别开来的。这是千古以来帝王传心养性学问的渊源，也无非就是保持中正的道理。大禹告诉虞舜所说的“保持心的安宁”,周公称赞文王所说的“保持平常心”,这些意思与保持中正的原理是相互阐明的。自古以来，统治方法都是出自传心养性的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谋略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学说。而学习必须要身体力行，并非只是讲求谈论。所以《尚书·说命》上说:“学习要谦虚”、“务必要时刻努力”,而把最终的成效归结为自己道德的日益积累的结果。《诗经·敬之》这篇诗说:“随着日月推移”,通过学习,逐渐积累扩大,从而收到大放光明的实效。因为还没有不切近于身心而可以谈论学问的。如果舍本逐末,那么,即便是好古而崇尚文化,每天都从事经学学术的研究,然而查考他们办事，却往往会与古训相违背。只有能够把握根本而尽心尽力,用这些根本的东西来培养自身修养和治理别人,就好像规矩和准绳一样不可改变;把它们保存在心里就是圣人的功夫,把它们加以运用就是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政治措施;那么，即便是唐尧和虞舜也超不过这种境界了。圣明的天子谨慎修身,思虑长远,不怠惰,不荒废,戒除自欺、永不满足的学习从不停止,已经达到了精纯的程度!

制策又认为使道德得到遵循、法令得到遵守，是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重要任务,打算修明施政措施来统一人们的行动,因而推论兴利除弊的方法。这是维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臣下我认为:宋朝的朱子说: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确立纪纲。纪纲的确立，是治安的关键。古今的施政措施,不外乎礼仪、音乐、刑法、政令等几个方面。然而,日子久了就会产生怠惰,从而便有诰命和警告条令屡次颁布、但下面却奉行不力的情况了。他们把朝廷的号令视为一纸空文,把朝廷的公告看作是徒有虚名的东西,无从振作颓废的风气,无从收到实际的成效。这哪里是法制不好？只不过是奉行法令的人玩忽职守罢了！不去除弊病,那好事就不能兴办。弊病的滋生,或是偏废不举,或是积重难返。像盐政、像漕运、像治河工程,它们所关系到的东西最为重要。盐政的改革,必须斟酌最通情达理的道理,使商人不亏

本，国家财政收入不减少，民众不受累，那么私盐不用缉拿就会自然消除，而且盐引也能畅销了。漕运事务的改革，必须坚持最公平的原则，使漕丁不勒索，胥吏不侵渔，官员不贪残，那么赋敛不用减少就会自然减轻，而且困难也就会日益克服了。治河事务的改革，必须建立最明确、最勤奋的计划，使官员不浪费，胥吏不丛杂，民夫不强行摊派，那么工程就会保持长久并逐渐坚固，而且国库也会日益充裕了。《周易》说："穷尽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长久。"董仲舒说：如果琴瑟的音不准，那就必须摘下琴弦重新设定。这些话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过去的好处，都是今日的弊端。弊病一天不去除，那好处就一天不能恢复。因循的人不探求这其中的缘故，苟且的人不推究这其中的原由。好处日益减少，弊端日益增长，原因大都在这里。果真能看准时机进行筹划，下力气进行察核，那又有什么停废的事情不能兴办，又有什么深重的积习不能改变的呢？现在皇上整顿各种事务，谕令封疆大吏尽心妥善议定，还有什么弊病不能革除，什么好事不能兴办的呢！

制策又认为民风的淳美和浮薄关系着政教，因而殷勤寻求引导和教化的方法。臣下我认为：教化民众，改善风俗，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孝悌忠信的诚心和礼义廉耻的发端，即便是愚夫愚妇也没有不具备这种天良的！然而，却往往有仁爱礼让的风气在邻里间不能兴起，轻浮侵凌的习气在乡村中不能杜绝，竞相攀比侈靡日益严重，竞相崇尚奇邪迷信而沉溺在迷乱中却不能觉察。这并不是民众不好，而是有关机构不能教化他们。如果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员存有厚道之心，那民众必然不至于轻薄；如果他们能消除傲慢的习气，那民众必然不至于轻浮侵凌；如果他们能敦劝节俭的风气，那民众必然不至于奢侈；如果他们能树立正直的形象，那民众必然不至于虚伪。而且他们又首先亲自实行，用大道理劝导民众，用"义"来劝说民众，用"利"来诱导民众，表扬民众来激励民众的志向，鼓舞民众来开发民众的素质，肯定就不会再有顽固不化、不遵循教化而置身于名教之外的人了。即使偶尔有，也只能是对他们进行轻微的惩罚，而在大的方面对他们进行劝诫，为他们开辟自新的道路，启发他们悔悟的念头，

不要只用刑法强迫他们改过。用刑法强迫他们，将会使他们日益堕落，而不知道回头了。因为不探究源头，那支流也就无法自然澄清了。过去，韩延寿做颍川太守时，教导民众大致依照古代的礼仪，不得违法；黄霸颁布条令教化民众，用做好事、防奸恶的意思来劝导民众，民众都能信服和听从。今天的民众，还是过去的民众。今天的太守和县令，果真能把过去的太守和县令作为自己的楷模，那又怎么会至于大家都只满足于处理好日常公务呢！国家用仁义渐渐来感化民众，移风易俗，凡处于国家庇护下的民众，谁敢不争相发奋磨砺自己呢！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人才像凤凰飞舞，贤士聚集。帝王品德高尚，端正天下。制订法令，宣明治国的谋略。广泛陶冶，改善风俗。帝业更加宏伟，日月越发辉煌，仁爱、神圣的事体都包纳，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政治措施都具备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自强不息，天天有无限的进步；本着励精图治的诚意，达到使太平永远相传的繁荣局面。尽管四方贤能已经被任用，但还要想到整饬；尽管个人修养已经完善，但还要更加使其精深；尽管各种政务都已经圆满完成，但还要更加勤奋地落实；尽管天下都群起接受了教化，但还要愈益重视道德的普及。用来增大深厚的恩德，扩大美好社会的规模，上达九重天，下到八方边际，迎接上天的荫庇，接受无限的幸福。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许其光　会试卷三道

许其光(生卒年不详)　字涞文，广东番禺人。道光三十年(1850)榜眼。咸丰二年(1852)乡试，任湖北考官。同治元年(1862)乡试，以御史任顺天府同考官。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揭自修之要，求诚者宜戒欺矣。夫诚则不欺，欺则非诚。释诚意之谓而首戒自欺，亦勿欺其知而已。且言诚者，非诚之难，而去不诚之难也。吾欲尽吾诚，而不诚之念已有害于吾知；吾欲去不诚，而不诚之端即隐藏于吾意。非知之明有所蔽，实意之发有所亏。欲举吾意以副吾知，非先去吾意之欺不可。经言致知，而继以诚意。夫意也者，不出于诚则出于欺，无中立也。吾得进言诚意之所谓矣。意之未萌，天下有智愚而无贤否。浑然者虚明之本体，灵者自灵，昧者自昧，而诚之名可不立，即欺之术亦未施。意之既发，天下有贤否而无中材。判然者真伪之两途，圣者自圣，狂者自狂，而诚之量苟有亏，即欺之咎无可诿。其欺也，欺在意，而受其欺者在知。受欺在知，而所以自欺者仍在意，则亦惟毋自欺而后可耳。

凡受欺者处于暗，而自欺者处于明。暗而欺，其欺尚可原；明而欺，其欺无可解矣。宇宙间聪明才力，亦若于自欺者，而赋畀甚优。使用其聪明才力以实吾意，而意可葆其真。乃用其聪明才力以济吾欺，而欺将于何底也！毋之，所以策之也。凡受欺者处于拙，而自欺者处于巧。拙而欺，其欺或出于无心；巧而欺，其欺将以为得计矣。古今来性情学术，几若于自欺者，而途径别开。使挟其性情学术以逞吾欺，而欺固百出而不穷。使挟其性情学术以戒吾欺，而欺亦崇朝而尽涤也。毋之，所以反之也。

吾于是为自欺者戒焉。欺之累偶萌，常人以为片念之微瑕，而诚其意者引以为终身之大憾。吾纵吾欺，而欺在一时者犹浅；吾日纵吾欺，而欺在毕世者更深也。人生只此百年，何忍忽明而忽昧！所以无然歆羡，无然畔援，在圣哲犹切闲存之力，而况在儒修！吾于是为毋自欺者策焉。欺之弊既久，常人以为祓除之匪易，而诚其意者不惮其检制之弥劳。吾戒吾欺，而欺尚虑其潜滋；吾稍不戒吾欺，而欺即虞其暗长也。转移只在方寸，尤期勿怠而勿荒。所以无敢戏豫，无敢驰驱，虽上智犹申儆戒之箴，而况在下学！古今来邪正之分，贤奸之辨，

孰非自欺与毋自欺者殊途而异辙哉！是以君子慎之也。

揭示自我修养的关键，追求诚实的人就应该戒除欺骗了。诚实就不会欺骗，欺骗就不是诚实。解释诚意的意思，首先告诫自己不要自欺，也就是不要欺骗自我认识罢了。而且提到诚实这东西，那可以说：要做到诚实并不难，而想要去除不诚却是很难的。自己想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诚实，但不诚的意识已经损害了自己的认知能力；自己想去除不诚，但不诚的发端就隐藏在自己的意识中。不是认识对象的正确性有歪曲，实际上是意识的萌生就不正确。想要使自己的意识完全符合自己的认知，就得非先除去自己的意识中的欺骗不可。经典上说要对事物有了真实的认识后才能有诚意。意识这东西，不是出于诚实就是出于欺骗，没有中立的情形。我能进一步谈论该怎么讲诚意了。当意识还没有萌发时，天下有聪明和愚昧的区别，但没有优秀和低劣的区别。心的本体十分浑沌，灵秀的自然灵秀，愚昧的就自然愚昧，于是诚实这个词可以没有，那欺骗的办法也就还不能施展。意识萌发后，天下有优秀和低劣的区别，但没有中等才能。真伪的两个方面清清楚楚，圣明的自然圣明，痴呆的自然痴呆，于是诚实的程度如果不够，那就会产生欺骗，而且这种过错是无法推卸的。这种欺骗，是在意识中的欺骗，而受它欺骗的却在认识上。受欺骗在认识上，但能够自己欺骗自己的还是在自己意识中。由此可见，也只有不要自欺，然后才能办好事情。

所有受欺骗的都处在不知道的境地，而自欺的却都处在知道的境地。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而受欺骗，这种欺骗还是可以原谅的；处在知道的情况下而自欺，这种自欺就无可救药了。宇宙之间的聪明才力，也顺从于自欺，而它的资质却十分优良。假使用这种聪明才力来充实自己的意识，那意识就能够保持它的真实。然而假使用这种聪明才力来帮助自己的欺骗，那欺骗哪还能有止境呀！不要去自欺，就是用来勉励大家的。所有受欺骗的人都处于笨拙的境地，而自欺的人都处于机巧的境地。因笨拙而被欺骗，这种欺骗或许是出于无心；因机巧而自欺，这种欺骗就将自以为如愿了。古往今来的性情学

术,几乎会顺从自欺,而它的途径却不同。如果利用这种性情学术来施展自己的欺骗,那欺骗确实就会以各种面目出现,而且没有穷尽了。假使利用这种性情学术来戒除自己的欺骗,欺骗也就会在一天之内被全部清除干净了。不要去自欺,就是用来供大家反省的。

我在这里为自欺的人提出警告。当欺骗的过失偶然萌发时,普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念头的小小瑕疵,但诚意的人却把它当作终身最大的遗憾。如果自己放纵自己欺骗,那在一个时期内,欺骗的程度还不会太深;如果自己每天都放纵自己欺骗,那在人生一世中,欺骗的程度就会变得相当深了。人生就只有这么百来年,又怎么忍心时而聪明、时而愚昧呢!《诗经·皇矣》所说的"不要贪婪"、"不要飞扬跋扈",这对于圣哲来说,都还要尽力保持诚意以杜绝邪恶才能做到,更何况对于我们这种儒士呢!我在这里为不自欺的人进行勉励。欺骗的弊病已经是很久了,一般人认为要清除它不容易,但诚意的人却不怕辛劳,竭力去控制它。自己告戒自己要警惕自欺,但欺骗还是有暗中滋生的危险;自己稍稍不警惕自欺,而欺骗立即就会有暗中增长的危险。由于这种转移只是在方寸之间,所以我尤其期望大家不要怠惰,不要荒废。《诗经·板》所说的"不敢当儿戏"、"不敢放纵",这即便是对于智力特别突出的人来说,还得用儆戒的箴言来提醒自己,更何况对于我们这种学问低劣的人呢!古往今来,邪恶与正义的区分,贤能与奸佞的划分,有哪一个不是由于自欺与不自欺的人因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导致的方向差异呢!所以,君子要谨慎呵!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有隐行其让者,得圣人表微而显矣。夫让为美德,而泰伯之让,独有隐焉者。观于民无得称,宜夫子叹为至德哉!且自古圣帝贤王、名臣良佐,莫不有令名鸿号,垂示无穷,凡以彰德也。独《虞书》言群后德让:一时在廷诸臣,让于稷、契,让于夔、龙,让于朱虎、熊罴,让于殳、斨暨伯与,雍容揄扬,著于后世。读其书者,俯仰千古,称为美谈焉。而夫子所论泰伯则异是。泰伯者,太王之冢子,王季之长昆也。

使其青宫嗣统,端委周原,上承高山,天作之基;下慰万国,云霓之望,显于西土,光于四方。将不再传而大勋集矣。而乃有托而逃,贸然不返,迹类于矫情避世之所为者。迄今三江震泽间,其遗踪尚可问乎?夫子曰:是让也,是三以天下让也。於戏德至矣!如徒以其让而论,彼宋有兹父,曹有子臧;上而临渊洗耳,则有巢、由。即句吴后裔如季子者,彬彬儒雅,非所称让不失礼者乎!然非让之难,让而民无得称之难也。且亦思泰伯之让,果何心哉?

谓皇天重神器之归,而王气既钟,遂假手以传予季让也,而泰伯之心不特此也。大小国共球毕集,隶幅员者久戴声灵。以累朝臣子之身,而孰意绥我思成,不获睹烈祖三宗之盛,则其他尚忍言乎?正惟泰伯不忍言,而论泰伯者亦无从而仿佛矣。谓鸣凤兆西岐之瑞,而三分将启,爰举国以授文孙让也,而泰伯之心又不独此也。六七王遗泽长留,咏汤孙者犹思鞗鼓;纵后世戎衣有著,而第使安予僻陋,即以答天王明圣之恩,则其他又何计乎?正惟泰伯不自计,而慕泰伯者亦空余其想像矣。

夫然有前乎泰伯而让者,其让可以思。舜曰德弗嗣,禹曰德罔克。帝王膺大宝,亦尝谦逊以弗遑。舜禹不必以让名,犹泰伯不必以让显也。迹虽殊者心不异。故自有此让,而窜迹要荒,抱器者同兹行遁。亦自有此让,而文身异俗,鼓琴者类此佯狂。夫然有后乎泰伯而让者,其让可以证。兄之让遵父命,弟之让重天伦。孤竹有逸民,犹觉遗徽之未远。夷齐让,原不必以采薇显;泰伯让,自不妨以采药行也。迹既同者心亦合。故自有此让,而天心须暇,麾旄必待盟津。亦自有此让,而商俗腥闻,《周礼》独行吴会。德至矣,弗可及矣。

有悄悄地完成了王位逊让的,其事迹得到圣人的挖掘表彰,从而著名于世。逊让是美德,而泰伯的逊让却唯独具有悄悄完成的地方。从民众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的角度看,也怪不得夫子要赞叹泰伯的道德是最为高尚了。自古圣帝贤王、名臣良佐,都有美名或大号,让名声永远流传。这都是用来彰显美德的。唯独《尚书·虞书》说虞舜的诸侯相互谦让:当时在朝廷的各位大臣,大禹把尊位让给稷和

契,伯夷又让给夔和龙,伯益又让给朱虎和熊罴,垂又让给殳、斨和伯与。他们的雍容大度和赞美对方,流传后世。读到这本书的人,仰慕他们的不朽,都把这件事情称为美谈。然而夫子评论泰伯则与其不同。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季历的长兄。假如他以太子的身份继承了王位,在周朝的发祥地周原登极,那么,他上承高山,上天便会为他铺垫事业的根基;下慰万国,各地像大旱遇到云彩那样对他充满希望,将在西方显威,光照四方,用不着再传到周文王便能建立起丰功伟绩了。然而他却找借口出逃,不明不白,一去不返了。其情形就类似于那些掩饰真情、脱离社会而隐居的人。至今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以及太湖一带,哪还能寻觅到他的遗迹呢!夫子说:这种逊让,是再三以天下逊让。呵,他的道德高尚得无与伦比了!如果仅就逊让而论,那宋国有兹父,曹国有子臧;再往上说,临渊洗耳、不愿接受禅让的,则有巢父和许由。即便是吴国的后裔,如季札,也是彬彬儒雅,不正是人们所讲的逊让而不失礼义吗?然而,逊让并非难事,难就难在逊让王位而民众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这件事情上。而且也应该想一想:泰伯的逊让,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如果认为上天重视王位的归宿,而王气既然转到了周文王身上,于是便借泰伯之手把王位传给文王的父亲季历而逊让,但泰伯的动机并不只是这些。大国、小国都聚集在商朝的天球宝器之下,归属商朝的诸侯长久拥戴商朝,从自身是商朝历代臣子的角度周密考虑,没想到要由我致使天下安定,而商朝烈祖商汤以及太甲等祖宗统治天下的盛况已经不能再见到了。既然如此,那还能忍心提其他事情吗?正因为泰伯不忍心提其他事情,所以评论泰伯的人也就无从揣测他的动机了。如果认为凤凰在岐山顶上鸣叫,预示了周国的祥瑞,而天下将会一分为三而周享其二,于是周太王便把整个国家都交给了孙子姬昌而由此逊让,但泰伯的动机并不只是这些。商朝有六七位贤明君王的恩泽还长留在人间,正如《诗经·商颂·那》赞颂的那样,颂扬商王太甲的人还思念着祭祀祖宗的鞉鼓响起;虽然周国已做好了进攻商朝的准备,但只要我满足于荒远偏僻的国土,就能报答天王的明圣之恩了。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考虑其他事情呢?正因为泰伯不为

自身考虑,所以敬慕泰伯的人只是凭空在作想象罢了。

然而在泰伯以前就有的逊让举动，可以让人深思。虞舜在继承王位时曾说自己的道德不足以嗣位，大禹在继承王位时曾说自己的道德不能胜任。帝王在继承王位时也都曾用谦逊来表示惶恐。虞舜和大禹不必用逊让来名垂千古，犹如泰伯不必用逊让来张扬名声一样。他们的事情虽然不同,但动机却都是一样。所以,自从有了这种逊让,泰伯便出逃到荒凉的地区,而同样有王位继承权的二弟也与他同行逃遁;也是自从有了这种逊让,泰伯便纹身遵守了远方不同的风俗习惯，击鼓弹琴，类似佯狂。也有在泰伯以后的逊让举动，这类举动便可证明:哥哥让位给弟弟是遵循父亲的命令,而弟弟逊让则是注重天伦。孤竹国有了在改朝换代时不事周朝的人，使人感到他们遗留的美德还离我们并不远。伯齐和叔夷的逊让，原本不必用在西山采薇来张扬;泰伯的逊让,自然不妨用采药为借口来远行。他们的事迹既然相同,那动机自然也是一样了。所以自从有了这种逊让,上天有心让人等待时机,攻灭商朝,必须等待后来周武王在盟津与八百诸侯会盟；也是自从有了这种逊让，才驱逐了污秽的商朝风俗，使《周礼》上所说的礼仪独立在吴越地区流行起来了。泰伯道德的高尚已是登峰造极,无人可以达到。

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古圣纯乎慕,孝思无穷矣。盖五十而慕,则纯乎慕矣。孟子于大舜见之,又何疑乎怨慕哉？且以孝治天下者,千古帝王之治法也。而千古帝王之心法,亦莫不衷诸孝,以为大本大原。吾人处千载后，而尚论情深。论治功,可考于《诗》、《书》;论庸行,仅传其轶事。独《虞书》一册,言舜孝者綦详。说者谓有鳏在下,非此无以达升闻。而不知大圣人以己心常系于亲心，其心遂独隆于千古。吾言大孝终身慕父母。夫大孝者,孰如大舜哉！自古神灵应运,每当英俊之年。轩辕蚤岁而徇齐,伯翳弱龄而掌火。所惜者,舜生侧陋,故三十而后征庸耳。鸣琴而子舍承欢,知不徒以片念斋夔,酿门内太和之景象。从来圣哲

挺生,必有神明之寿。三皇继世者数万载,神农服教者三百年。所难者,舜享期颐,而瞽瞍亦臻上寿耳。被纻而寝门视膳,又不徒以九州玉食,娱吾亲暮齿之晨昏。以予观之,即谓舜五十而慕也可。

斯陶斯咏之情,圣与凡初无二理。而惟克谐烝乂者,其情以历久而弥真。想当日者,顽嚚一时,允若又一时。幸而亲心底豫,舜之慕益切于庭除;不幸而井廪多忧,舜之慕无忘于夙夜也。盖其慕不以常变殊矣。于裹于毛之性,爱与憎同感亲恩。而惟大孝尊亲者,其性贯毕生而罔懈。想当日者,陶渔一境,垂裳又一境。始而饭糗茹草,舜之慕无间于焦劳;继而藻火山龙,舜之慕弥廑于黼座也。盖其慕不以穷达改矣。

且人于大舜,其窥之或未精。而子于大舜,其见之有独至。过诸冯而怀旧迹,发祥之胜地依然。纵当年岱岳时巡,跸路或疏于定省;而所谓慕者,不徒在盘匜之亲奉,而尤在寤寐之弗谖也。迄于今,苍梧邈矣。而穷蝉末裔,堪稽世泽之绵;有庫就封,犹托仁人之爱,况其在鞠育之勤哉!且人于大舜,所闻者或诬而难信。而子于大舜,所见者实信而有征。望蒲坂而溯神功,浚哲之芳徽未渺。纵他日宗尧祖瑁,严君未列于馨香;而深于慕者,不忍言坛墠之追崇,愿常侍高堂之色笑也。迨其后,有妫昌矣。而徊思八伯,歌风如戴;亿万年之天子,试听九成《韶》乐。恍亲百十载之精神,又何有耄期之倦哉!知此者,可晓然于怨慕之说矣。

古代圣人对父母的思慕是纯真的,所以他们的孝心是无穷无尽的。五十岁时对父母思慕,那这种思慕就是纯真的思慕了。孟子既然从大舜那里看到了这种思慕,那他为什么又怀疑这是带有怨恨的思慕呢?依据"孝"的原则来治理天下,是千古以来帝王的统治方法。而且千古以来帝王的传心养性的方法也都是以"孝"为核心的,把它作为最大的根本、最大的本原。我们处在千年之后,谈论起大舜来,还感到十分深情。如果谈论他的政治功绩,那可以从《诗经》、《尚书》中钩考出来;然而要谈到他的日常行为,却只有轶事流传。唯独在一册《虞书》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大舜的事情。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大

舜当时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穷光棍,如果不是因为人推荐,那他是无法声名远扬的。然而他们不知道大圣人把自己的心常常联系着父母的心,因而这种心可以特别辉煌地照耀千古。所以我说:最大的孝顺就是终身思慕父母。要说最大的孝顺,谁能比得上大舜呢!自古以来,神圣的人承受天命的时候都是在年轻有为的年龄。轩辕幼年时期便很聪明,伯翳在刚成年的时候就担任了"掌火"的职务。可惜的是,大舜生在卑微之中,所以三十岁以后才被任用。他在偏房弹琴,以迎合父母、博取他们的欢心,知道不能只凭一点恭敬小心就可以酿成家庭的和睦景象。从来圣人哲人降生人世,必定会有像神仙一样的寿命。三皇时期的王位相传长达数万年,神农教化天下则有三百年。为难的是,大舜享有百年的生命,而其父瞽瞍也达到了高寿。身穿粗陋的服装,在里门照看父母的膳食,又不光是用九州的精美食品来使父母在晚年生活中感到快乐。因此,凭我自己的看法,要说大舜在五十岁时思慕父母,那也是可以的。

因欢喜而陶醉、因陶醉而歌唱的情感,圣人与凡人在起初是没有不同的。然而只有和睦淳厚这种情感会时间越久而越真实。想想当日,一时间父亲愚妄无知、母亲放肆刁蛮;在另一个时段,他们却又因受到感动而变好。在庆幸父母心眼变好的时候,在家中的大舜对父母的思慕更加殷切;不幸在水井和仓库遭到亲人陷害的时候,大舜对父母的思慕也是日夜不忘。这是因为他对父母的思慕是不会因正常和突变而不同的。出于依恋父母的天性,爱与憎都同是对父母的感恩。然而只有具有最大的孝顺而且尊敬父母的人,这种性情才能贯穿一生,永不松懈。想想当日,制作陶器和打渔是一种境地,统治天下又是一种境地。开始吃着粗劣食物的时候,大舜对父母的思慕没有被艰辛的生活所扰乱;后来旗帜和服饰上有了水藻、火焰、山、龙的图纹,坐在王位上的大舜对父母的思慕就越发小心恭敬了。这是因为他对父母的思慕是不会因贫穷和显达而改变的。

人们对于大舜的观察,或许还不仔细。然而,孟老夫子对于大舜的看法,却有独到之处。路过大舜的出生地"诸冯"时怀念旧迹,这发祥的胜地依然如旧。纵然当年大舜不时前往泰山巡视,在路上或许

会疏于早晚向父母问安;但是所谓思慕,不只是在生活上对父母的照顾,而尤其要在心中念念不忘。到今天,埋葬在苍梧的大舜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大舜的五世祖"穷蝉"的后代,却能绵绵不断地继承祖先的恩泽。大舜的弟弟"象"被封在"有庳",还依托着仁爱者的爱心,更何况还有养育的辛劳呢!人们对于大舜,所听到的东西或许是出于诽谤,因而不可信。然而孟子对于大舜,所看见的东西却是真实而有依据的。远望大舜崛起的"蒲坂"而追溯他神圣的功劳,聪明智慧的光辉还没有黯淡。纵然他日在宗奉唐尧和祭祀颛顼时,大舜的父亲还不能有受后代同时祭祀的资格;但是深情思慕父母的人,却是不忍心提到父母是否能在祭坛上受到后代的追念和尊崇,而只是希望自己能永远侍奉父母并让他们感到高兴。到后来,大舜及其后代便昌盛起来了。回想当时的八位首领带头歌唱,以表示对大舜的拥戴;而大舜这位亿万年的天子,试着倾听了《韶乐》多次演奏。他那百十年间思慕父母的精神,哪又有什么因年老而出现的疲倦呢!知道这个原因的人,就可以明白孟子所谓带有怨恨的思慕那种说法了。

许其光　覆试卷一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道贯行藏,异于游说之士矣。夫得志与不得志,境遇之适然耳。共由者此道,独行者亦此道,道岂以行藏异哉!且千古圣贤之志,皆致君泽民之志也。顾有时堂廉交泰,而闾阎遂播为讴吟;有时一室啸歌,而韦布自安其怀抱。盖穷通之遇,不足撄杰士之心,其得也听之,其不得也听之。要自有无人而不自得者。广居、正位、大道,统言之,皆道也。是道也,非即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哉!然道之行不行,视其志之得不得。如以析圭担爵为斯人庆,遭际之隆犹后也。同胞同与之怀,无日不廑于寤寐。一旦而乘时得柄,则抚兹苍赤,将何以劳来匡直而使之共乐?夫升平如以陋巷箪瓢为贤者惜,遭逢之困犹浅也。先觉先知之学,原非有慕于纷华。吾身而藏器待时,则不出户庭,要必

有诚正修齐而始克自全其庸德。盖得志与民由之，即由此广居、正位、大道也。不得志独行其道，亦行此广居、正位、大道也。吾因之有慨矣。

今天下齐秦楚魏之民，其困于兵争也，非一日矣。征缮密而怨咨兴，法网严而谤蔫起。幸也而与民更始也，君相整躬率物，而颛愚胥受其裁成。遵王路者，何难追正直平康之化！古先王孝悌忠信之道，其坏于横议者，非一朝矣。诡谲胜而肫诚薄，揣摩熟而天性漓。幸也而守道不阿也，儒者抱德潜修，而砥砺罔愆其素履。钦品望者，犹见为先民矩矱之遗。

吾于是知得志未足喜，即不得志亦未足忧也。居高而服冕乘轩，一窥其素所蕴蓄者，犹是捭阖纵横之习。转不若涧槃遮轴，尚留雅韵于人间。此无他，道在则然耳。荣辱非关势分，而出处自有经权。故进可以沛郁黍之膏，亦退可以饮衡门之水。吾于是知得志固任其劳，即不得志亦非安于逸也。遇巷而承流宣化，必抒其夙所抱负者，以辟朝秦暮楚之流。即当其匡坐鼓琴，岂遂忘情于饥溺！此无他，道在则然耳。用舍听之彼苍，而学问修其在我。故出而非萦情于好爵，亦处而非藏拙于山林。彼仪衍者，徒有害于民而畔夫道耳。进观富贵、贫贱、威武之境，而大丈夫之真不始见哉！

把原则始终贯穿在从政和闲居的生涯中，是与游说人士不一样的。得志与不得志，是由境遇所造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是这个原则；个人独自履行的，也是这个原则。原则怎能因从政和闲居而不同呢！千古以来，圣贤的志向都是要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并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志向。尽管他们有时会飞黄腾达，从而受到天下民众的普遍赞颂；尽管他们有时只能独处一室，用长啸和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他们对于贫贱的生活，心中却仍然能保持平衡。因为穷困和亨通的境遇是不足以扰乱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得志，听凭它；不得志，也听凭它。总之，自然就存在着没有身处其中而不怡然自得的。保持天下最好的个人修养，确立天下最好的伦理道德，实行天下最好的政治主张，笼统地说，都是原则。这种原则，不就是天

下古往今来所共同遵守的原则吗！然而，原则能不能得到推行，还得要看推行这种原则的人能不能得志。如果这人一有了官爵便去为他庆贺，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他说不定在以后还会有更辉煌的前程。而且，关心和爱护人民的情感是每天都应该时刻挂在心头的。如果他一旦有运气而获得了最高的权力，那么，在他抚育天下苍生的时候，又凭什么来劝勉民众、匡扶国家、使天下共同达到幸福欢乐的境界呢？在太平盛世，如果为贤明的人过着清贫的生活而感到痛惜，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痛苦的经历还只是在表面上。先知先觉的学问，原本就不是向往荣华富贵的。自己要想学好本领以等待机会，那就不走出家门，总之必须要做到保持诚意、端正态度、培养修养、安定家庭，才能全面养成自己的好品德。因为得志而引导天下民众，就是通过这样而保持天下最好的个人修养、确立天下最好的伦理道德、实行天下最好的政治主张的；不得志而独自履行自己的原则，也是通过这样而保持天下最好的个人修养、确立天下最好的伦理道德、实行天下最好的政治主张的。我因此有了感慨。

如今天下齐地、秦地、楚地、魏地的民众，被战争困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用于军事的赋税征收十分沉重，引起了民众的怨恨；法网严酷，导致了怨言四起。幸运的是，与民众重新开始。君主和丞相以身作则，无论是善良的人还是愚昧的人，都接受整顿化成。遵循帝王正道的人，要想达到民风纯正、社会安定的局面，那又有什么难的呢！古代先王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遭到肆意议论的人的破坏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诡诈占了上风，真诚居于下风；善于揣摩，天性变得浮薄。幸运的是，坚持原则而不去迎合。儒生怀抱道德，潜心修养，磨砺自己，使自己不违背纯朴的品行。从有崇高威望的人的身上，也还能看到古代先民流传下来的美好典范。

我于是明白了：得志，用不着高兴；即使不得志，也用不着忧伤。有人身居高位，戴着高贵的礼帽，乘坐着高级马车，但一看他们的气质，却还是纵横家那种捭阖纵横的习气。他们反而不如山林中的隐士，还把优雅的韵味留在了人间。他们这种习气不是其它原因造成的，而是他们的做人原则所造成的。荣誉和耻辱与权势无关，但无论

是从政还是闲居,自然都有不变的目的和可以变通的手段。所以,从政可以建立《诗经·下泉》所吟咏的郇伯治理四国的功劳,而引退也可以达到《诗经·衡门》所吟咏的那种隐居的境界。我于是明白了:得志固然勤于职守,但即使是不得志,也并不是安心地过舒服日子。身在民间,仍秉承命令而传播道德教化,必然会施展自己平日的抱负,以斥退那些朝秦暮楚的人。即使就在被围困的时候仍然弹琴,又怎能忘记饥寒交迫中的百姓呢!他们这种意识不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而是他们的做人原则所造成的。被人任用或不被人任用,都听凭上天的安排,但研究学问却在于我自己。所以,从政并不是对官爵念念不忘,闲居也并不是隐居山林而什么事情也不干。那些像纵横家张仪和公孙衍的人,只会是危害民众,违背道德。只有进一步观看孟子所说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而大丈夫的真正含义不就显现出来了吗!

许其光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自古继体之君,简贤以崇德,稽古以传心;一道德以同民,广教化以训俗。而所为朝乾夕惕者,要皆本于继志述事之一心。载稽往籍,《书》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言举贤而不肖者自化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言法天而圣学自崇也。《诗》称"讦谟定命,远犹辰告",言法度立而禁令行也。《礼》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言教泽深而民风振也。举错得其公,学问得其粹,纪纲得其肃,风俗得其醇,所由是彝是训、不愆不忘、承燕翼而笃丕基者,此耳。

钦惟皇帝陛下,景命维新,典章由旧,奉三无以出治,合九有而同风。固已法严黜陟而学懋缉熙,教重敬敷而俗征丕变矣。乃圣怀冲挹,深维长治久安之道,弥切集思广益之衷。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任贤才、勤典学、崇道揆、化奇邪诸大政。臣知识庸愚,不谙体要。顾当言路广开之会,幸值褐衣登进之年,何敢摭拾肤词,因仍旧习,致有愧拜献先资之义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君之职在于用人,因念君子、小人各从其类,而

期得贤能以康庶事。此诚旁求之盛心也。臣恭绎礼部誊黄宣宗成皇帝诏曰:“至于观人之法,鉴空衡平,妍媸轻重自见。”煌煌圣训,日月同昭,实万世不易之至理。盖鉴所以辨妍媸,衡所以权轻重,本其大公无私之念,则人之贤否自莫逃于烛照之中。故知人则哲,实本于尧德之钦明;辟门达聪,实本于舜德之浚哲。此所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而贤否不患其或淆,登进不虑其或滥也。唐李绛谓:循其名,验以事,所得十七。即皋陶云“载采采”之遗意。至于夹袋之储,材馆之录,拔十得五,犹昔人之所取。若夫贤、奸之辨,或貌似朴诚而中藏险诈,或外示正直而内蓄诐邪。如李泌荐窦参,司马光举蔡京,皆以君子之心堕小人之术。欲洞烛其情伪,必先自立于无私。善夫程子之言曰:“知言穷理,则能察人。”此正本探源之论,与“视所以、观所由、察所安”,同为观人良法矣。皇上命中外大臣各举所知,荐剡之途开,则贤俊之升庸自广。凡兹大小臣工,孰敢不矢慎矢勤,以效宣化承流之职哉!

制策又以唐虞授受不外一中,而欲身体力行,以为正位凝命之本。此又敦崇圣学之至意也。臣惟务学之道,以清心寡欲为先。在昔唐虞之隆,犹相儆曰: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宣宗成皇帝御极之始,即严声色货利之诫,诚有见于尧舜以来,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必有以致其精一之衷,而后克成执中之治也。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周公之称文王曰“克宅厥心”,一则以臣戒其君,一则以子述其父。君臣父子之际,于学问深浅尤知之最慎,故言之亲切而有味。《书·说命》言“逊敏”,而推其效于道积厥躬,犹《鲁论》言时习而效在说乐也;《诗·敬之》篇言“就将”,而课其实于缉熙光明,即《大学》言明德而要在至善也。孟子言尧舜性之;汤武修身体道,以复其性。然帝王之为学虽殊,而指归则一,要皆切于身心而已。三代而下,虽有留意经述、稽古右文之君,而或慕文学之名,喜词章之习,则考其行事,有与古训相违者矣。皇上天亶聪明,单心宥密,考《典》、《谟》之奥义,契孔孟之微言。盖本家法为心法,即以心法为治法也。规矩准绳之道,不昭然若揭哉!

制策又以道揆法守乃制治保邦之要务,而深念夫淑世牖民之道、

兴利除弊之方，尤殷殷于盐、漕、河工诸大政。臣闻法制禁令者，致治之具，而非清浊之源。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诚以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正则无不正矣。若未端夫本原，徒殷勤于诰诫，则奉行者将视为具文，而怠玩从事，奸弊潜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欲除其积弊，惟在经理之得人。如盐务、漕粮、河工三大端，则尤其繁剧者。夫盐课之滞销，由于私枭之充斥；而商力之疲敝，由于浮费之过多。今充商有费，退商有费；年节有费，供应有费。陋规急于国赋，杂款繁于正供。苟非节縻费，轻成本，严透漏之诛，讲缉私之法，而欲商力不疲，帑项不欠，必不可得也。漕粮为天庾正供，丁胥丛杂，搀和、回漕诸弊，在所必除，而尤在汰其浮费，则可以抒丁力而裕国储。东南两河工务，岁费不赀。要在相度情形而预为修防之计，则费少而力完；事后而筹之，则费多而功倍矣。方今圣天子励精图治，凡内外诸政，纲举目张，于以兢兢业业，上绍诒谋而下垂法守。所谓变通尽利、鼓舞尽神者，固宜庶绩咸熙也。

制策又以民风之淳漓系乎政教，而因举昔之教民者望诸守宰。此又转移风俗之大权也。臣考《周书·武成》篇曰："重民五教。"君牙之命亦以敷五典、和民则告其臣。盖自虞廷敷教在宽一语，早有以开其先古者。比长、闾胥皆有教民之责，故木铎有徇，鞭挞有罚，修五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此古昔盛时所由教隆于上、俗美于下，而经正民兴、邪慝自无也。史称韩延寿守颍川，教民略依古礼，不得过法；黄霸班行条教，劝以为善防奸之意，民皆信从。夫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孝弟忠信之行，礼义廉耻之维，盖天命之所赋，而非由外铄者。苟尽其道以导之，则民自兴于仁让，而嚣凌之气自泯，侈靡之俗自除。是在亲民之吏洁己爱民，不徒效簿书奔走之长，而尽其父母斯民之责耳。臣伏惟宣宗成皇帝深仁厚泽，沦浃民间，三十年有如一日，久已熙春泳化，函夏蒙庥。含生负气之伦，罔不食德饮和，欢忻而歌祝！皇上缵承大宝，帱载群生，固宜吏治肃清而民俗益征於变也。

若此者：旌别维严而贤路辟焉，德心克广而经术崇焉，立纲陈纪而朝野之经制昭焉，道德齐礼而闾阎之礼让蔼焉。古所称觀耿光、扬

大烈者,其规模不外此矣。臣尤伏愿皇上,治隆舜慕,泽洽尧封,本武周达孝之怀,迈文景承平之化。翘材已进,弥结念于干旌;学问已崇,益勤披夫典籍。宏纲已立,而更切兴利除弊之思;民俗已醇,而犹廑读法悬书之典。于以斟元阐绎,锡类推恩,祗迓蕃厘,永绥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自古以来的继承王位的国君,都用选拔贤能来崇尚道德,用研究古代来传心养性,用统一道德来整齐民众,用推广教化来改变风俗。之所以能终日勤奋谨慎,总之都是来源于继承先辈志向、承继先辈事业的一颗心。查考古籍,《尚书》所谓"表彰善良,使邪恶人畏惧,树立好的风气",是说选举贤能而不肖者自然也就受染化了。《周易》所谓"天行刚健,君子因而自强不息",是说效法上天而君王的学问自然也就精深了。《诗经》称"以大的谋略制定政令,以长远的计划及时告知臣民",是说只要建立了法度而禁令也就生效了。《礼记》称"教化民众而养成好的风俗,必须通过学习",是说只要教育深入而民风也就能振作了。任人能够公平,学问能够精粹,纪纲能够严肃,风俗能够醇美,由此就能遵守永恒的规则,不违背、不忘却,继承祖先的既定方针而巩固宏大的基业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承膺天命而登上王位,但仍然遵循祖先的旧制,奉行"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这"三无"来亮出治理的措施,总合九州而使天下风俗相同。本来对百官进行升降的法令已经十分严明,学问已经精深而大放光明,教化已经普及深入,风俗已经完全改变了。但圣上却心怀谦虚,念念不忘长治久安的办法,集思广益的念头更加迫切,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任用贤才、勤奋学习、尊崇法制、消除奇邪迷信等大政来策问我们。臣下我十分无知,不熟悉国家的大政方针。然而正值这广开言路的机会,臣下我有幸遇到了从普通百姓而登上进士的年头,又怎敢拾取肤浅的言词,沿袭旧的习气,以致于有愧《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国君的职责在于用人，因而想到君子和小人各自分属于不同的群体，从而期望能够得到贤能以振兴国家的各种政务。这确实是广泛征求人才的一片盛情。臣下我恭敬地寻绎礼部誊黄所抄录的宣宗成皇帝诏书："至于观察人的方法，只要自己的心像镜子一样不先入为主，像天平一样公平合理，那么品行的美与丑，能力的轻与重，自然也就看清了。"圣明伟大的教导，与日月同一样光明，确实是万世不变的最高真理。因为镜子是用来辨别美与丑的，天平是用来衡量轻与重的，只要能够本着大公无私之心，人的好坏就在明察秋毫之中，自然也就不能逃过了。所以，能了解人而做到明智，实际上是出自唐尧个人素质中的谨慎和明察；打开明堂的四门以引进人才，做到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实际上是出自虞舜个人素质中的深刻观察能力。这就是任用好人没有贰心，去除坏人不会犹豫，从而不害怕好坏混淆，不担心选拔太滥的原因。唐朝李绛说：根据他的名位，用实事进行检验，可以达到十分之七的准确性。这就是过去皋陶所说的"用事例反复考察"的意思。至于像宋朝吕蒙正和虞允文那样，用随时在身上带着小本、登记备用人才的方法，从十人中选拔出五个人，过去人们还是采用过的。至于好与坏的分辨，有的人貌似忠厚老实而内心隐藏着险恶和奸诈，外表正直而内心蓄藏着偏颇和邪恶。如李泌举荐窦参，司马光举荐蔡京，都是由于君子之心而堕入了小人的圈套。想要洞察真伪，必须得自己首先没有私心。程颐说："只要能够透过言论看清本质，那就可以看清一个人了。"这说得是多么好呀！这种正本清源的论断，与《论语》所说的"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审察他习惯于什么"，同是观察人的好办法。皇上命令中外大臣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推荐的路途打开了，贤能俊杰的选拔提升也就自然广泛了。凡是今天的大小臣子，谁敢不竭尽谨慎和勤奋，以尽到宣扬教化和奉命行事的职责呢！

制策又认为唐尧虞舜相互传授的，不外乎一个"中"字，因而想要身体力行，把它作为君临天下、凝聚天命的根本。这又是敦劝和崇尚圣学的至诚心意。臣下我认为：致力学问的原则，首先是清心寡欲。在过去，唐尧虞舜的政治是那样隆盛，但他们却仍然相互告诫说："不

要违背百姓，以顺从自己的意愿。”宣宗成皇帝在即位之初，便严厉告诫：不要贪图声色钱财，这确实是看到了自唐尧虞舜以来，所谓“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的情况。必须想法达到精诚专一的内心境界，然后才能实现保持中正的政治。大禹告诉虞舜所说的“保持心的安宁”，周公称赞文王所说的“保持平常心”，一是用臣子的身份来告诫自己的君主，一是用儿子的身份来叙述父亲的事情。君主和臣子、父亲和儿子之间，对于学问的深浅，了解是最为深切的，所以说起来亲切而且有趣味。《尚书·说命》说“学习要谦虚”、“务必要时刻努力”，从而把最终的成效归结为自己道德的日益积累的结果，与《鲁论语》所说的“学习而随时复习，就会使人感到高兴和快乐”则是一样的。《诗经·敬之》这篇诗说“随着日月推移”，从而收到积累扩大、以至于大放光明的实效，就是《大学》所说的彰明君主美德而关键在于达到最善。孟子说唐尧和虞舜的仁义，是由于本性；商汤王和周武王提高自身修养，体验道德，以恢复其天性。然而，帝王做学问尽管不同，但最终的目标却是一样的，总而言之，都是切合自己的身心而已。夏商周三代以后，虽然有留意经学、好学而崇尚文化的君主，但有的仰慕文学的名声，喜欢词章的精熟，这样一来，查考他们办事，显然就有与古训相违背的东西了。皇上天资聪明，用心慎密，考查《尧典》和《大禹谟》等经典的深奥含义，契合孔孟的精微言论。因为本着家法来作为传心养性的方法，就是用传心养性的方法来作为政治方法。作为规矩和准绳的道理，不就是昭然若揭了吗！

制策又认为使道德得到遵循，法令得到遵守，是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重要任务，因而深深考虑着改良社会、开启民智的措施以及兴利除弊的方法，尤其殷切挂念着盐务、漕运、治河工程等大政。臣下我听说：法制和禁令是实施政治的工具，而不是能够清除浊流的源头。孟子说：“只有善良还不足以实施政治，只有法令还不能自然施行。”因为政治的根本确实在于端正心术以建立纪纲，端正君主之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只要根本一端正，就没有不端正的。假若没有端正本原，只是不断发布诰令训诫，那么奉行的人就将把它们看成是空文，因而消极行事，玩忽职守，

使奸弊暗中滋生,这些祸患就将有说不完的了。想要除去这些积弊,只有任命好经管的人员。像盐务、漕粮、治河工程这三大方面,则是尤其繁重的。国家定额卖出的盐滞销,是由于私贩太多的缘故;而商人力量的疲敝,则是由于各方面要钱过多的缘故。如今,充当商人要交钱,不当商人了也要交钱;过年过节要交钱,供应也要交钱。陋规比国家的赋税还催得急,杂款比国家的正常收入项目还要多。如果不减轻浪费,降低成本,严厉惩处走私,讲求缉私的办法,而要想商人的力量不疲惫,国家的收入不拖欠,那必然是不可能的。漕粮是地方输送到京城粮库的物资。丁夫和经办人员繁杂,而挽和、回漕等弊端,必须要根除,而尤其要取消那些过多的花费,这样才能减轻丁夫的负担,使国家的储蓄充裕。东南两条河的工程事务,每年花费多得很。关键是要摸清情形而预先做好维修防范的计划,这样就能够做到花费少,而且有力量完成;在事后筹划治河,那就会花费多,而且会多费一倍的力气。如今,圣明的天子励精图治,所有内外的各种政务,都做到了纲举目张;在此基础上,兢兢业业,对上继承祖先留下的方针,对下垂示法制,那么所谓经过变通而获得最大的利益,通过振作人心而使大家精神振奋,确实就应该各种事情都兴盛了。

制策又认为民风的淳美和浮薄,关系着政教,因而想要举出过去教化民众的人,以寄希望于太守和县令。这又是移风易俗的大计划。臣下我查考:《尚书·周书·武成》这篇文章说:"要重视对民众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育。"周穆王在任命君牙时,也用普遍传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常的教育、使民众和睦的准则的这条命令来告诫他的臣子。因为自从虞舜时代说出施行教化在于宽和这一句话后,早就开辟了源头。周朝的"比长"、"闾胥"都有教育民众的责任,所以古代有道人摇着木铃到处宣讲教化,祭祀时违反礼仪便有处罚,制订"五礼"来约束民众的性情,倡明"七教"来振兴民众的道德。这就是古代繁盛的时候之所以能做到上面教化兴隆而下面风俗醇美,纲领正确而民众振作,邪恶自然消亡的原因。史书上称赞韩延寿做颍川太守时,教导民众大致依照古代的礼仪,不得违法;黄霸颁布条令教化民众,用做好事、防奸恶的意思来劝导民众,

民众都能信服和听从。民众的天性是爱好美德的。因为孝悌、忠信的行为，礼义、廉耻的纲常，都是天命所赋予的，而不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假如能够讲明道理以开导他们，那民众就自然会讲究仁爱礼让，而轻浮侵凌的习气也自然就会泯灭，奢侈浪费的风气也自然就会消除了。这关键在于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吏要清廉爱民，不要只是发挥处理日常公务的长处，而要竭尽自己像父母爱护儿女一样地爱护民众的责任。臣下我想来：宣宗成皇帝深厚的仁爱和恩泽，沐浴民间，三十年如一日，早就已经是春风化育万物，华夏承蒙荫庇了。有生命、有情感的人类，谁不饱享恩德、承受和气、欢欣鼓舞而歌颂祝福呢！皇上继承王位，统治天下苍生，确实就应该吏治肃清，民俗日益变得醇美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甄别严格而选拔贤能的道路通畅，道德之心更加广阔而经术得到尊崇，纲纪得到确立而朝野的制度更加明确，用道德引导又用礼法整顿而民间浮现出仁爱礼让。古代所称颂的显扬圣德的光辉，发扬伟大的功业，其规模不外也就如此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政治与虞舜一样兴隆，恩泽与唐尧一样深重，本着周武王、周公那种孝顺能够通行天下的胸怀，超越汉文帝、景帝世代相承的太平局面。尽管杰出的人才已经被选用，但还要进一步考虑招纳贤能；尽管学问已经崇高，但还要更加勤奋地翻阅典籍；尽管宏大的纪纲已经确立，但还要进一步做好兴利除弊的谋划；尽管民俗已经醇美，但还要进一步像古代读法悬书那样向民众宣讲法制。用来斟酌初始状态，加以阐扬，把恩泽和善美广泛施与众人，恭敬迎接上天的赐福，永远保佑民众幸福欢乐。那么，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谢增　会试卷三道

谢增（生卒年不详）　字梦渔，江苏仪征人。道光三十年（1850）

探花。咸丰元年(1851)恩科乡试,任顺天府同考官。咸丰六年会试,以御史任同考官。咸丰十一年乡试,以吏科给事中任顺天府同考官。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释诚意之旨,戒其自欺而已。夫以意欺知,是自欺之尤者也。毋之,而诚意之旨不已明乎!且论学于致知之后,不患无定识,而患无定力,患无定力以副乎定识。盖识不精则惑我者,物也;力不果则惑我者,即我也。以我惑我,不啻以我愚我。于是乎明者昧,真者妄。始焉我为我愚,而甘受其蒙;继焉我与我敌,而互争其胜。而欲一私不杂也,其势不能。然则经所为诚其意者,果何谓也哉?知之象静,而意之象动。其动与静合者,理之权足以制欲;其动与静违者,欲之权可以夺理也。则当究其违焉者果何意也。知之境虚,而意之境实。其虚与实符者,天之数勿间以人;其虚与实反者,人之数已汩乎天也。则当究其反焉者又何意也。是欺也,是自欺也。且夫欲诚意者,亦孰不自谓无欺哉!

乃无何而欺之无端而起者,方且潜为滋;欺之应念而生者,方且隐为伏。欺之藏于深不可测者,方且工其术;欺之迫于猝不及持者,方且逞其私。如是则诚难。乃忽焉而欺之中于自恕者,谁为峻其防?欺之昵于自便者,谁为弥其隙?欺之乘于自暇自逸者,谁为察其真?欺之流于自暴自弃者,谁为绝其本?如是则诚又难。且也吾虑吾欺而预防焉,而防于前或且护于后。一念以为是,一念以为非。将人之欺我,而有时而止者;我之欺我,而并无时或止也。而奚以摘其伏?而奚以发其奸?况乎吾戒吾欺而力矫焉,而矫于暂或反蹈于常。始焉则甚智,终焉则甚昏。将以我欺人,而犹畏人知者;以我欺我,而转不畏人知也。而何以防其微?而何以杜其渐?

诚意者其毋之,是在乎逆以制之。以意与知之背而驰也,欺在方寸,有不堪问者矣;欺在清夜,更有不堪问者矣,不知其责无贷也。但使禁于未然,勿懈其防,持于将然,勿摇其宰;斯顺以受其欺,不如逆以遏其欺;欺之源窒,而诚之天可复已。是在乎刚以克之。以意与知

之歧而出也，欺以苟且，有不可解者矣；欺以矫诬，更有不可解者矣，不知其功宜反求也。但使以己律己，勿留其憾，以性治性，勿乱其真；斯柔以任其欺，不如刚以抉其欺；欺之根绝，而诚之功益纯已。试验之好恶可矣。

解释诚意的主旨，无非就是戒除自欺罢了。用意识欺骗认知，是自欺中最严重的。不要去自欺，诚意的主旨不已经很明确了吗！而且从有了知识以后去讲论学问，人们不怕没有明确的认识，而是怕没有相应的能力，怕没有相应的能力来符合明确的认识。因为认识不足，那能够迷惑自己的只是事物；能力不强，那能够迷惑自己的就是自我了。用自我来迷惑自己，无疑是用自我来愚弄自己。于是聪明的人变得愚昧，诚实的人变得虚妄。开始时自己被自我所愚弄，而甘心受它的蒙蔽；接着又自己与自我为敌，而相互争强斗胜。从而想要心中一私不杂，势必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经典让人做到诚意，到底又该怎样解释呢？认知的特征是静，而意念的特征是动。对于这种动与静的结合，“天理”的灵活处断是足以控制“欲望”的。把这种动与静对立起来，那“欲望”的灵活处断是可以迫使“天理”发生改变的。既然如此，那就应当根究这其中的“对立”究竟是什么意念。认知的境界是虚的，而意念的境界是实的。这种虚与实的相符，是上天的规定，人是不能参与的。这种虚与实的相反，是人的规定，已经违背了上天。既然如此，那应当根究这其中的“相反”又是什么意念。这些意念就是欺骗，就是自欺。想要做到诚意的人，又有谁不自认为自己是诚实无欺的呢！

然而就在刹那之间，那种无缘无故而产生的欺骗，正在暗中滋生；那种随着意念而产生的欺骗，正在暗中潜伏。那种藏在深不可测之处的欺骗，正在强化它的手段；那种使人猝不及防的欺骗，正在施展它的自私。要是像这样的话，那要做到诚实就太难了。然而就在忽然之间，那种由于自己宽容自己而产生的欺骗，谁来为它严密设防？那种由于不严格要求自己而产生的欺骗，谁来为它弥补缝隙？那种利用贪图安逸而产生的欺骗，谁来为它查验真假？那种由于自暴自

弃而产生的欺骗，谁来为它断绝根本？要是像这样的话，那要做到诚实就更难了。而且尽管自己由于担心自欺而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也会出现在前面防范而在后面护短。在某一个念头中认为它是对的，而在另一个念头中又认为它是错的。别人欺骗自己，还有停止的时候；而自己欺骗自己，却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样一来，又怎能挖出潜伏的欺骗？又怎能中止欺骗的危害呢？况且尽管自己由于想要戒除自欺而尽力去纠正它，但也会出现在短期内纠正而长期重犯。一开始是非常明智的，到后来却十分昏庸。自己去欺骗别人，还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欺骗自己，却反而不怕别人知道。这样一来，又怎能防止欺骗的萌芽？又怎能杜绝恶性发展呢？

诚意的人不去自欺，杜绝欺骗的关键是反过来对付它。因为意念与认知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心中自欺，是不堪自问的；在清夜独处的时候自欺，更是不堪自问的了，纯属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只要做到防范于未然，不放松防范，始终保持警惕，不动摇自己的意志；与其这样顺着受自欺，还不如反着去遏制自欺。那么，欺骗的源头就会被堵住，而诚实的天性就可以恢复了。杜绝欺骗的关键是用刚强的意志去克服它。因为意念与认知是不同途径而发生的，所以用马马虎虎的态度来对待欺骗，是不可救药的；用东拉西扯的态度来对待欺骗，就更是不可救药的了，纯属不知道杜绝欺骗的功夫应当反过来寻求。只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留遗憾，用性情来医治性情，不扰乱它的纯真；与其这样柔弱地听任自欺，还不如刚强地以挖出自欺。那么，欺骗被根绝，而诚实的功夫就更加精纯了。试着检验一下好恶所在，也就可以了。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有泯让之迹者，圣人特表其微焉。夫让德无称，泰伯之德几隐矣。夫子以至德归之，非表微之论乎！从来家国天下之间，至难处也。非圣人无以立其极，亦非圣人无以识其心。有德足服天下，而犹率天下以事人者，故子于文王则以至德钦其量；有德足统天下，而先让天

下以自晦者,故子于泰伯则以至德表其微。今夫基绪有相承之理,必审其机;伦常有当尽之修,在通其变。夫子曰:吾观殷周授受之际,不禁有感于泰伯也。

端委具克君之度,使当日青宫侍养,未尝兴遁迹之思,安见神器不归于冢嗣?乃沈几观变,早知王气所钟,而采药为辞,并不受让贤之誉,则其德为极隆。明类称继体之贤,使当年宝箓递传,未豫存立孙之念,安见众望不属于长君?乃应天顺人,默识亲心所眷,而偕行有侣,并不居让弟之名,则其德为弥粹。惟然而泰伯之德为已至矣。其以天下让也,其三以天下让也,果谁知之而谁称之者?

巢、许之让以迹,泰伯之让以心。盖深念神灵既出,不必循世及之常,故不以矫激高清洁之风,而惟以将顺慰行权之意。让于迹者,民得称之;让于心者,民不得而称之也。此岂姬宗之史册所可稽?夷、齐之让也显,泰伯之让也隐。盖深虑伦序稍乖,每易启纷争之患,故不以直辞蹈违亲之咎,而先以远逊弭废立之嫌。让在显者,民得称之;让在隐者,民不得而称之也。又岂岐阳之臣工所能喻?谓亶父有翦商之志,而伯因以让,明忠义之忱,非也。祖宗基业甚重,自有继绪而兴者。天下非吾所敢私,天下即为吾所可让,舍贵介而甘石隐。当时无以著其誉,后世转可白其心。而揖让阴行隐德,自有难窥之蕴。谓后嗣兆兴周之机,而伯因以让,全明哲之智,非也。国家责任攸隆,自有应运而起者。不必弃天下而弗顾,不妨让天下而弗居,违西土而就南邦。小民不能道其详,尚论转可识其隐。而彝伦善处潜德,要无不发之光。无得而称,泰伯之德,洵不可及已。

有不彰显自己逊让王位的事迹的,圣人便会特意挖掘、表彰其已被埋没的事迹。逊让王位的美德如果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那泰伯的美德就几乎被埋没了。夫子用“最高尚的道德”这个名词来称赞他,不就是在表彰他那已被埋没的事迹吗!家庭、侯国、天下之间,历来都是最难对待的。除了圣人,没人能够为他树立起最高典范;除了圣人,没人能够知道他的心。周文王富有德行,足以使天下服从自己,然而他却率领天下民众去做商朝的臣子。因此,夫子便用“最高

尚的道德”来赞扬文王的气量。泰伯富有德行，足以统治天下，然而他却首先让出天下来做自我隐遁。因此，夫子便用“最高尚的道德”来表彰他那已被埋没的事迹。如今，尽管王位有父死子继而相承不变的道理，但也必须审视那机缘；尽管应当尽力整顿伦理纲常，但也要适当加以变通。因此夫子说：我在观察殷商与周朝交替的时候，不禁对泰伯产生了许多感叹。

朝服整洁，仪表堂堂，泰伯具有国君的气度。假使当时他被奉养在太子宫，从来就没有滋生过退避的念头，那怎能见得王位就不会归他这位嫡长子呢？然而他深谋远虑，观察世道变化，很早便知道了王气将凝聚在何处，于是以采药为借口出走，不愿接受让贤的荣誉。可以说，他的道德非常高尚。明白是非，知道善恶，泰伯堪称最佳王位继承人。假使当年王位继承按顺序走，古公亶父没有立孙子姬昌的念头，又怎能见得众人不拥戴他这位嫡长子呢？然而，他遵循天的意志，顺从人的愿望，在觉察到父亲心中眷念孙子后，便偕同二弟虞仲出走，不愿领受将王位让给三弟季历的名声。可以说，泰伯的道德更为纯粹。既然如此，那泰伯的道德是最高尚的了。他让出天下，而且再三让出天下，有谁知道他呢？又有谁来赞美他呢？

不愿从唐尧那里接受王位的巢父和许由让出天下是有形迹可寻，而泰伯让出天下却是在心底。这是因为他深深考虑到神明的人物已经出现，那就不必再遵循父死子继的传统的常规，用不着故意激扬清高之风，而是为了顺从父亲对王位做特殊处理的意志并给父亲以安慰。让出天下有形迹可寻的，民众能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而让出天下是在心底的，民众就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这难道是能从姬姓周朝的史书中查找到的吗？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伯夷、叔齐兄弟逊让王位，是显而易见的；而泰伯逊让王位，却并非显而易见。这是因为泰伯充分考虑到如果王位继承的次序稍有不当，那就会引起王位纷争的祸患，所以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让位，以免忤逆父亲而受到责怪，而是首先出走到远方，以消除废立的嫌隙。逊让王位显而易见的，民众能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而逊让王位并非显而易见的，民众就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他。这又难道是居住在

岐山之南的周朝臣子能够理解的吗？有人说，古公亶父当时有翦灭商朝的志向，而泰伯深明大义，忠于商朝，反对灭商，所以才有逊让。这是错误的。祖宗的基业非常重要，自然会有继承王位而振兴基业的人。泰伯不敢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物，也就可以把天下让出，放弃高贵的王位而甘心隐遁。当时无法彰显他的声誉，但后世却能说清他的心迹。然而，通过逊让在暗中不露声色地行善，其中的深奥处自然也难以窥测。有人说：由于后代显露了振兴周国的征兆，所以泰伯才让出了天下，使自己的明智得以保持。这是不对的。国家的责任重大，自然会有应运而起的人。因此，不必放弃天下而不管，不妨让出天下而不居王位，离开西方而去南方建国。老百姓尽管不能说清其中的详细情况，但追论却能转而让人们知道泰伯那被埋没的美德。而且天、地、人的常道就善于处理不为人知的美德，美德总之必将发出光芒。泰伯的美德以致人们简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赞美，实在是人们所不能达到的了。

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

稽慕亲之午，大孝惟有虞极盛焉。夫五十而慕，即终身之慕也。微大舜不及此，能不叹为仅见哉！且古未有年逾强仕，数膺在躬，犹肫然尽孺子慕者也。有之，自大舜始。人第见九州合玉，万寿称觞，以为遭际之隆，莫与京矣。而不知其性真，其情挚，其阅历无穷，其眷恋靡极，虽履帝位之尊，不改孩提之素。考至性之显懿，隆铄千载，下叹观止焉。大孝终身慕父母。夫人孰无亲，即人孰无慕。而一时之慕，人所易见也；终身之慕，人所难见也。予乃思夫五十而慕者。

天家奉养之仪，未可例诸氓庶。尝有暮年受命登皇位，而逮事所生，方幸春晖之永驻矣。然或尊号未加，致间夫父子家人之礼者，则孺慕非由于外铄也。帝王纯笃之性，不可以拟恒情。尝有冲幼嗣基隆孝治，而时勤温清，其欣爱日之方长矣。然或瞻依甫切，倏抱夫衔恤靡至之哀者，则永慕难凭诸际遇也。然则年至五十，未见其能慕也。予益悠然于大舜矣。且夫舜自三十在位之后，绵琴怡志，非复耕稼瘁神，

则情好既易间其慕;璿玉升华,非复篮铡示俭,则富厚又易纷其慕。即使孝思不匮,保无因物有迁。然而龙旗朝侍,犹是恪恭子职之年;燕寝承欢,仍守烝乂格亲之志。以言乎慕,予于大舜见之矣。

谓景星见房,卿云歌旦,以为慕之感召,固也。乃四岳交推,早播克谐令誉;五年巡狩,不疏问视常仪。祇载之忱如见耳。夫握登早背,未免风木衔悲矣。而顽与嚚,二老承颜,且倍结缠绵于天性。想当日有鼻纳税,体亲志而恩洽弟昆;颗手归安,奉亲养而欢联手足。庶几赤子之心不失也。盖至西母钦帝者之德。玉玦呈祥,《南风》赓孝子之诗;朱弦解愠,五十载笃谨匪懈。予于蒲坂登庸之日,仿佛遇之。谓乌集于庭,鸠鸣于野,以为慕之格被,固也。乃衣服鸟龙,惟恃真诚以解免;尊雕虎蜼,莫非纯孝所涵濡。锡类之德共见耳。夫均子鬓龄,亦解欢娱绕膝矣。矧英与皇,深宫侍奉,更同洁瀡溉于高堂。即后日伯禹告功,干蛊而聿隆郊配;姬文来孝,鸣鸡而入侍寝门。何如黄姚之遇独隆也?盖至备物尽色养之诚。珠虾入馔,盛德封孝让之国;玉帛来朝,五十载兴寐不遑。予于栗夔允若之余,低徊念之。子可无疑舜之怨矣。

查考思慕父母的时间,那可以看到只有虞舜是最孝顺的了。五十岁而仍思慕父母,就是终身对父母的思慕。除了大舜,没人能做到这样。能不感叹这是人们唯一所看到的事情吗!古代还没有年过四十、担任着好几种官职,却仍然能纯真得像孩子一样、尽情追着父母的人,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从大舜开始的。人们只看见九州统一、百姓为祝福他万寿无疆而频频举杯,便以为在命运兴隆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与大舜相比了;然而却不知道他的性情纯真,感情诚挚,尽管有无穷的阅历,但对父母的眷恋却没有终极;虽然登上了帝王的宝座,却不改孩子的纯真。探讨他那纯厚性情所表现出的高尚美德,可以说是照耀千古,后代只能叹为观止。最大的孝顺就是终身思慕父母。谁人没有父母,也就是谁人无不思慕父母。然而在某一时期思慕父母,是人们容易看到的;而终身思慕父母,却是人们难以看到的。我于是思考五十岁仍思慕父母的大舜。

皇家奉养父母的礼仪,不能与普通民众相同。曾经有人在晚年

承膺天命而登上皇位。到这时,他奉侍父母,庆幸父母在晚年还能春晖常在。然而在他还没有当上帝王之前,却只能在私下用父子和家人礼仪来对待父母。这样,他那思慕父母的孝心就不是由于外部的特殊原因而显出美德来的。帝王纯朴真诚的性情,不可以用一般的情感来比照。曾经有人在幼年继承帝位、用"孝"的原则来更好地治理天下。他时常向父母问寒问暖,庆幸爱戴父母的日子还相当的长久。然而就在他非常尊敬和亲爱父母的时候,忽然间他的父母却不幸双双死去。这样,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也就难以再思慕父母了。既然如此,那么这类人即便是年龄到了五十岁,也未必就能看到他们能思慕父母的孝心。我更加对虞舜肃然起敬了。况且,虞舜自从三十岁在位之后,便穿着粗陋的衣服,弹着琴,心情安闲,不再有种庄稼时的劳神费力了。这样一来,他这种爱好便容易干扰他那思慕父母的孝心。虞舜自从三十岁在位之后,在祭祀时便可以用美丽的玉石来做祭祀器具,不再用"簋"和"铡"这些普通的祭祀器具来表示俭朴了。这样一来,他这种富厚又容易扰乱他那思慕父母的孝心。即使是他的孝心不绝,也不能保证会因事情变化而发生改变。然而打着龙旗去朝拜父亲,他却还是恭敬地承担着儿子对父母的责任;在后宫嫔妃的欢笑中,他却仍然保持着真诚孝顺父母的心志。因此说到思慕父母的孝心,我是从大舜身上看到了。

有人说当时在房宿这片天区中出现了象征吉祥的"景星",围绕"卿云"的降现而作歌咏赞旦复旦,认为这是由于虞舜思慕父母的孝心所感召的。的确是这样。四方的首领交相推荐,他能与父母和睦相处的美好名声早就传播开来;即便是在五年一次的巡视期间,他也不忘问候和探视父母的常规礼仪。他恭敬的诚心就如同我们亲眼看到一样。生母"握登"早死,他不免伤心难过。然而,面对愚妄无知的父亲与刁蛮放肆的继母这两位老人,他的天性却更多了一倍的缠绵。想想当时,他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封在名叫"有庫"的地方,但派官吏替他管理政务,缴纳贡税,从而做到了体谅父母的心意,并给予兄弟很多的恩情;他把妹妹"颗手"接回娘家,从而做到了侍奉双亲,并让妹妹感到了快乐。差不多能始终保持赤子之心,甚至使西王母都

对他的品德感到钦佩。美丽的玉玦呈现吉祥，他所作的《南风》唱起了孝子的诗篇；拨动朱红的琴弦，解除心中的烦恼，他五十年的纯厚小心从不松懈。我仿佛从这里看到了虞舜在蒲坂受到重用的情形。有人说当时出现了乌鸦集中到庭院、斑鸠鸣叫在田野这种吉祥的景象，认为这是由于他那思慕父母的孝心所带来的。确实是这样。他能穿上绘有鸟龙的帝王服装，只是凭借真诚才得以免除灾难；他能使用"虎彝"和"蜼彝"这样的高贵器具，完全是纯粹的孝心所造成的。他常赐给族类的品德是大家所共同看到的。他的儿子"商均"尽管年纪幼小，但也懂得在老人的膝下讨老人的喜欢。至于他的妻子女英与娥皇，在深宫中侍奉老人，更是把米淘得光滑滑。到后来，大禹大功告成，由于能纠正父亲的过错，从而享受了郊外祭祀上帝时附带受到人们祭祀的隆重待遇；周文王姬昌到宗庙祭祀祖先，鸡叫时分便进入寝门恭候。为什么独有黄帝的姚姓子孙的命运这样好呢？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在所有方面都能竭尽孝顺父母的诚心这种境界。治好洪水而食物丰美，虞舜仁德盛大而册封孝敬又推让高位的大禹之国；八方诸侯前来谒见，他五十年一直忙碌。我低头徘徊，追忆着虞舜恭恭敬敬、战战兢兢去见父亲，使父亲受到感动，从而变好后的情形。孟老夫子便可以不用对虞舜的怨恨感到怀疑了。

谢增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任贤者辅治之资，建极者绥猷之本，立政者经邦之要，化民者成俗之原。综稽往籍，《易》系汇征之象，《诗》歌夙夜之功，《礼》详教训之宜，《书》著修和之义。自古帝王，斟元御宇，握镜临宸。以登俊良，则才征凤翔也；以崇德性，则术切蛾勤也；以布谟猷，则法垂象魏也；以谋保乂，则民乐鸠安也。茂矩隆仪，粲然大备。用是兴贤兴能，孔壬远焉；制心制事，恭己懋焉；之纲之纪，令甲昭焉；引养引恬，由庚协焉。所由熙春泳化，函夏归仁，受鸿名而光骏业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咸中懋绩，丰裕凝禧，涣汗布其经纶，蒙养敦其教化。固已礼罗选士而性府调元，智烛宣猷而情田敷德矣。乃圣怀冲

挹,弥切畴咨,撮土壤以崇山,导涓流而益海。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取人、修己、行政、教民诸大端。如臣愚昧,曷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本刍荛之一得,以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君之职在于知人,而因虑夫登进宽则贤愚杂,荐剡广则真伪淆。此诚求贤审官之至意也。臣惟陟明黜幽,虞廷以之严仕进;克知灼见,周室以之拔人才。故必以循名为汲引之端,而后茅茹可以并进;尤必以验事为综核之法,而后薰莸不致相淆。使徒尚夫夹袋之储,恐虚声市于月旦;使第恃乎才馆之录,恐积习蹈乎雷同。往往外似朴诚而中藏险诈,外示正直而内蓄诐邪。如公孙宏之布被而汲黯识其伪,王安石之经术而苏洵辨其奸。况寄耳目于臣寮,则夤缘而干进者有之;倚腹心于左右,则粉饰而梯荣者有之。非鉴之甚精,何以别其真伪?非察之至密,何以识其贤愚?乌可以李泌之举窦参,貌取其品;司马光之荐蔡京,节取其长,遂谓用人之途宜宽,任官之法宜广哉!夫惟奉《虞书》任贤去邪之经,知人则哲,斯甄叙有方矣;体程子知言穷理之论,取人以身,斯鉴衡不爽矣。盖燕石虽美,原不容冒和璧之珍;鱼目虽明,亦不容混隋珠之宝。譬之相马,以德而不以才;方诸好龙,以真而不以似。精采择,则士行可知;严考察,则官箴以肃。毋遗葑菲,毋杂莠稂,庶几野无遗贤而群英萃集,亦朝无幸位而百职咸修矣。皇上侧席求贤,辟门吁俊,大小臣工皆思奋庸熙绩,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唐虞授受不外一中,而因辨夫圣性之至纯,圣学之大备。臣考人心、道心之传,必推本于精一;知性、养性之学,亦惟重乎闲存。故平阳启宇,耄期不倦夫宸修;蒲坂嗣基,时几必敕夫天命。安止而祗承时懋,不虚拜夫昌言;建中而圣敬日跻,匪徒扬其伟烈。析精微于羲画,默契天心;衍理数于箕畴,用端皇极。推之逊志时敏,躬修宜慎于始终;缉熙光明,就将无荒于日月。自来蒿宫修省,枫陛灵承,未有不旒纩葆其聪明、圭璋淑其心性者也。盖执中之学,其要在于存诚,其功在于居敬。存诚而后,中之体有以立;居敬而后,中之用有以行。后世哲后膺期,上承道统,贤臣佐命,交赞皇图。如唐太宗

《帝范》之篇，本末兼赅，端主极于离向；范祖禹《帝学》之籍，内外具备，体健行于乾元。皆足以垂黼扆之箴规，发《典》、《谟》之蕴奥也。是在服《诗》、《书》之彝训，而宝若球图；奉孔孟之微言，而崇如圭臬。博观《大学衍义》，亦可以为率循；旁采古史名言，亦可以为炯鉴。内以裕格致诚正之要，道备中和；外以宏修齐治平之功，世跻仁寿。将见屏游观之乐，而懿德清明；尽存养之修，而圣功懋著矣。我皇上鸿猷云焕，骏德日新，千古之心法、治法，可一以贯之也已。

制策又以道揆法守为制治保邦之要，因知为政之本在正心术而立纪纲。臣按立经陈纪，贾谊之策治安也；纲举网疏，刘颂之言政体也。顾当经纶草昧之时，在于显庸而创制；处黼黻承平之日，在于废举而坠修。惟上有励精之主正己型民，而律度昭其范；下有辅治之臣同寅赞化，而柱石任其司。礼乐刑政，治具也，而施之必有本务；条教号令，虚文也，而行之必有实功。夫法积久而弊生，政因时而制定。所贵体穷变通久之论，为振兴调剂之方。如治河所以济运也，苟宣防失宜，虽帑金糜而无益；转漕所以裕储也，苟督催不力，恐仓廪虚而难充。推之盐政之运输，亦关度支之供给。枭贩充斥，更足以占正引之销；蠹胥贪婪，亦足以耗商本之用。亦宜于整饬之际，寓通变之权也。总之有治法，尤贵有治人。得人而经理之，则弊去而利可兴；不得人以经理之，则法变而弊愈出。故为政者，首在乎得人也。我国家纪纲毕举，政治聿修，海隅苍生莫不鼓腹而歌太平矣。

制策又以民风之淳漓系乎政教，而因思所以齐民善俗之要。此尤致治之大端也。臣按《武成》之策，首重五教之颁；《君牙》之篇，亦重五典之则。良以降衷自天，民性本善，渐染成习，民志乃迁。礼义廉耻之维，积久或违乎轨物；孝弟忠信之本，末俗或敝其彝常。或侈靡相高，而锦绣纂组之华，动违古制；或奇邪相扇，而粟米钱刀之利，蛊惑人心。甚至耰锄示德，而仁让之风不存；匕箸兴戎，而嚣凌之气日炽。欲使人识廉隅，家知礼教，还淳返朴，激浊扬清，譬之埏埴之器，泥在钧者视甄者之所为也；拟以陶铸之工，金在熔者视冶者之所为也。惟上能端模楷之型，斯下自有桴鼓之应已。故韩延寿之为守也，教民以礼，而民无过法；黄霸之治郡也，劝民为善，而民不为奸。盖风

俗之淳浇，视守宰之训导；牧令之臧否，视大吏之劝惩。举直错枉，洵一时盛事也。皇上整齐民俗，澄叙官方，庶几草偃风行，吏治蒸蒸而日上矣。

若此者：登崇以夹辅，宥密以单心，渐被以沦肌，道齐以革面。酌允铄，肴乐胥，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贤才已举而丙鉴尤精，性德已醇而寅承倍懔，科条已肃而宸诰时颁，风俗已敦而申诫尤切。干旌之典茂焉，几杖之箴严焉，方策之政修焉，鞮鞻之教溥焉。于以上畅九垓，下溯八埏，聿迈天庥，诞膺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任用贤能是辅佐政治的依靠，建立最高准则是安定天下大谋略的根本，确立政法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教化民众是培养美好风俗的本原。综合考察古籍，《周易》列示了一起进用贤能的卦象，《诗经》歌颂了夙夜勤奋的功劳，《周礼》详细记载了教化和训导的事情，《尚书》彰明了保持祥和的意义。自古以来的帝王，斟酌初始状态，统治天下，心怀明镜登临宝座。用来选拔优秀人才就能够做到人才济济，崇尚道德修养就能够做到长期积累而有成就，颁布法令就能够做到法令肃穆庄严，谋划治安就能够做到民众安乐团结。美好的制度和隆重的仪礼，明明白白，完全具备。因此任用贤能，就能够排除奸恶；修养内心，指导行动，就能够恭敬勤奋；树立纲纪，就能够使法制深入人心；长期养育百姓，长期安抚百姓，就能够使万物都协调。之所以达到春风化育万物，华夏归依仁德，享有伟大的名声，光大宏伟的事业，就是因为有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公平适当，功绩卓著，富裕国家，凝结祥和，颁布伟大的号令以发布治国的方略，以童蒙之态培养中正之德，敦劝对民众的教化。确实已经做到了礼贤下士，选拔人才，内心协调阴阳，明察秋毫，在世人性情中施布道德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更加殷切地咨询意见，堆积土壤以增加大山的高度，引导细流而增加大海的广阔。特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选用人才、培养自身道

德修养、实施政治、教育民众等大问题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足以知道国家的大政纲要？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小心陈述平时所学到的东西，依据村野小人的一点儿心得，像葵花向阳一样献上微小的诚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君主的职责在于了解人，因而担心选用的标准放宽就会好坏混杂，推荐的途径太多就会真伪混淆。这确实是寻求贤能、审察官员的深切考虑。臣下我认为：提升贤能的官员，罢免昏庸的官员，虞舜朝廷就是凭借这个来严格选拔官员的；能有真知灼见，周朝就是凭借这个来选拔人才的。所以，必须要把名位本分作为选拔的开端，然后同类人才能同时得到任用；尤其一定要把检验实际工作作为综合考核的方法，然后香草和臭草才不致于相互混淆。假使只是崇尚宋朝吕蒙正那种选拔人才的办法，那么，恐怕在品评人物时就会看重虚假的名声；假使只是依靠宋朝虞允文那种选拔人才的办法，那么，恐怕积习就会陷于雷同。奸恶的人往往貌似忠厚老实而内心隐藏着险恶和奸诈，外表正直而内心蓄藏着偏颇和邪恶。例如，公孙宏铺盖布被以示俭朴，但汲黯却看出了他的虚假；王安石的经术高明，但苏洵却能够辨析他的奸诈。况且，如果把甄别人才的权力交给臣下，那么，就会有利用关系攀附而晋升的人；如果选拔人才倚仗左右心腹，那么，就会有靠伪装自己而爬上来得到荣华富贵的人。除了非常精确的鉴别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分辨人才的真伪呢？除了最细致的考察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看清人才的好坏呢？怎能用李泌举荐窦参，从外貌看中他的人品；司马光举荐蔡京，片面看中他的长处；便认为任用人才的途径应该放宽，任命官员的办法应该更多呢？只有奉行《虞书》任用贤能和除去坏人的原则，明智地去了解人，这样，甄别和任用人才就有办法了；体悟程颐透过言论看清本质的论断，要想选拔贤能，首先自身就得端正，这样，鉴别人才就不会失误了。因为燕石尽管美丽，但根本就不可能冒充和氏璧那样的珍宝；鱼目尽管明亮，也不可能混充隋珠那样的宝贝。用相马来比喻，就是依据品德而不依据才能；用叶公好龙来比喻，就是依

据真实而不依据相似。精密挑选，就能够知道士人的品行；严格考察，就能够整肃做官的原则。不遗漏有一点才能和品德的人，不混杂危害禾苗的杂草，那么，就能够做到野无遗贤，群英萃集，朝廷中也就不会有侥幸蒙混的位置，而各种政务也都能够圆满完成了。皇上诚恳地寻求贤能，打开大门召唤杰出人才，大小臣子都想要振奋精神，作出良好的成绩，这难道不美好吗！

制策又认为唐尧虞舜递相传授不外乎一个“中”字，因而想要辨明圣人天性最纯粹的东西和圣人学问最完备的东西。臣下我查考：“人心”、“道心”的传授，必须从精诚和专一来推究它们的本原；“知性”、“养性”的学问，也只有保持诚心以杜绝邪恶。因此，唐尧在平阳开创国家，到年老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虞舜在蒲坂继承王位，戒惧天命而不敢有一时一刻的松懈。大禹心境安宁而恭敬的态度不断强化，真正接受了皋陶的精当意见。商汤王建立了中正之道，而圣明诚敬天天升华，不光是张扬他的丰功伟绩。周文王从八卦中剖析精微，制作卦辞，与上天之心暗相吻合；周武王在《洪范》中推衍理数，用来端正帝王统治的法则。由此推导到心怀谦逊，时时努力，那自身修养就应该自始至终小心谨慎；要逐渐积累而达到光明的境地，那就应该长期保持勤奋。从来三代君主修身反省，汉代帝王传心养性，就没有不用谨慎来保养他们的聪明，用高洁来清洗他们的心性的。因为保持中正的学问，关键是在“存诚”上，而它的功效则在“居敬”上。“存诚”以后，中正的根本原则才能确立；“居敬”以后，中正的具体方法才能施行。后世明智的帝王承膺天命，承继前代的“道统”；贤明的臣子辅佐天子，交相赞助帝王实施统治的宏图。例如，唐太宗的《帝范》篇章，本末同时具备，在天下树立了君主的准则；范祖禹的《帝学》这本书籍，内外具备，仿效上天而自强不息。它们都能够垂示君主施政应该遵守的原则，阐发了《尧典》、《大禹谟》等经典深奥的含义。因此，服从《诗经》、《尚书》的基本训条，而把它们当作天球和《河图》这一类的古代帝王的宝器来珍重；奉行孔孟的美好言论，而把它们作为典范来尊崇。广博地观看《大学衍义》，也可以把它作为法式；到处搜集古史名言，也可以把它作为明镜。在心中，可以用它们来提高格物致

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道德充满中正平和；在心外，可以用它们来强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效，使社会繁荣昌盛。这样，就将看到摒弃游玩观赏的享乐，美好的道德就会更加清明；竭尽内心修养的功夫，圣明的功勋就会格外卓著了。我皇上宏伟的计划无比光明，高尚的道德日新月异；千古以来的传心养性方法和统治方法，可以完全贯穿起来了。

制策又认为使道德得到遵循、法令得到遵守，是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重要任务，从而知道实施政治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以确立纪纲。臣下我认为：确立方针、实施法纪，是贾谊上奏疏在谈论治安时提出的；确立大纲、网开一面，是刘颂在谈论政体时提出的。然而在治理乱世的时候，能够显示功绩而创立制度；但处在历代锦绣太平相承的日子里，在于把荒废坠落的成规振兴起来。只要上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为民众树立典型，法律和制度才能发挥出它的规范作用；下面有辅佐政治的臣子，并能够共同兢兢业业地赞助教化，充分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礼仪、音乐、刑法、政令是政治工具，但施行起来必须得有具体的任务；法规和号令是空洞的条文，但实施起来就必须有实际的功效。制度实施的日子久了就会产生弊病，政令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来制定。重要的是，要体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论断来制订出振兴和调整的计划。例如，治河是用来帮助漕运的，假如整治和防范的措施不当，那么，即便是花费国库的金钱也不会有收益；转运漕粮是用来增加国家储备的，假如督催不力，那么，仓库空虚了恐怕也就难以补充了。再进一步推导到盐政的运输上，它也是关系到国家财政的需要。贩卖私盐的盐贩数量增多，就会更进一步挤占“正引”的销售；腐败官吏的贪婪，也会影响商业资本的使用。这些也应该在整饬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整顿。总之，有了治理的办法后，尤其重要的是还要有具体实施的人。有了得力的人去经营，那就能够去除弊病而获得利益；没有得力的人去经营，那法令就会变形而弊病也就更多地产生出来。所以，要实施政治，首先就得要有得力的人。我们国家纪纲完全得以树立，政治完全得以修明，即便是远在天涯海角的民

众也都挺起肚子、歌颂太平了。

制策又认为民风的淳美和浮薄关系着政教，因而想要把握能够整齐民众、改善风俗的关键。这尤其是搞好政治的重大问题。臣下我认为：《尚书·武成》这篇文章，首先注重“五教”的颁行；《尚书·君牙》这篇文章，也重视“五典”的奉用。这确实是因为人的性情来自上天，民众的性情原本是善良的；只是由于渐渐受到坏习气的影响而养成习惯，民众的性情才发生了改变。坏风气长期积累，也许就会使礼义廉耻这些纪纲偏离准则；而衰败没落的风气，或许就会破坏孝悌忠信这些根本伦理。有些人相互攀比奢侈，而衣物、器物的华美，常常违反了古代的制度；有些人用迷信奇邪相互煽动，而粟米钱财的利益，蛊惑了人心。甚至父子之间借把锄头都得感恩戴德，仁爱礼让的风气不再存在了；亲戚之间动辄发生争斗，嚣张侵凌的风气日益猖獗。要想使人们懂得品行端正，家家知道礼仪教化，返回淳朴的境界，去除坏习气而发扬好风气，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制作陶器，泥土放在转轮上，是由制作者决定做成什么东西的。就好像制作金属制品，金属放在模范中，是由制作者决定做成什么东西的。只要上面能树立楷模的式样，那下面自然立刻就会有回应。所以，韩延寿做太守，用礼仪教育民众，因而民众就没有犯法的；黄霸治理州郡，劝导民众做好事、做好人，因而民众就不干坏事、不做坏人。因为风俗的淳朴与浮薄，取决于太守和县令的训示和教导；地方官员的贤能与低劣，取决于各省长官的鼓励和惩处。把正直的人安排在邪恶人的上面，确实是一时的大好事呵！皇上整齐民俗，整顿官方，差不多已雷厉风行，吏治蒸蒸日上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选拔贤能以辅佐政治，宽和宁静以修养内心，逐渐扩大教化以深入人心，用道德作引导又用礼法来整顿而使人彻底改正。筹措业绩辉煌和社会安乐，仁爱、神圣的事体都已包纳，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措施全都具备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天下太平了更要寻求太平，天下平安了更要寻求平安。尽管优秀人才已经被选拔，但还要进一步精选考核；尽管道德已经醇美，但还要更进一步加强修养；尽管法令已经严明，但还要随时制订

和颁布法规;尽管风俗已经淳厚,但还要更加迫切地教育民众。选拔人才的规章完善了,道德修养的理论严密了,政策的制订修明了,对民众的教化普及了。用来上达九重天,下到八方边际,迎接上天的荫庇,接受众多的福分。那么,我们国家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倩描　王大奇译〕

清文宗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柴也愚,参也鲁。

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殿试策问

[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抚绥寰宇,仰荷昊穹洪贶,祖考诒谋,兢业敕几,日慎一日。勉思检身治心之要,还淳反朴之原,诘戎讲武之猷,足食裕民之制,冀与中外臣庶,臻郅治之盛轨,致上理于大同。延揽人才,特开恩榜。兹值临轩发策之始,虚中博采,爰举胪询,尔多士其敬听之。

圣学之要,在于主敬存诚。《易·文言》于《乾》九三言诚,《坤》六二言敬。程子曰:诚则无不敬。未致于诚,则必敬而后诚。而以《乾》、《坤》分为圣贤之学。昔圣微言,曩哲粹语,其绌绎而切陈之。朱子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大学》、《中庸》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其义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盖云备矣。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厥旨安在?朕披览前编,服膺圣学,近命儒臣重缮《朱子全书》,用备观省。何以审端用力,辨危微而致精一欤?

夫物力之盛衰,系乎民俗之奢俭,而欲民生之厚,尤在上之人有以开其源而节其流。《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节俭之道,非帝王之要务欤?汉文帝以敦朴为天下先,景帝令二千石修职,以伤农事、害女红为戒,遂成富庶之业。唐

太宗戒盈崇俭,亦致四海丰盈。将上行而下自效欤?抑转移之道亦在于承流宣化者欤?夫士大夫者,庶民之所则效也。乃习俗相沿,渐成侈靡;衣服舆马,竞为美观;冠昏宾祭,动多逾制。果何由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欤?陆贽有言: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裁制之术,厥道何由?

古者文德诞敷,不忘武备,诘戎振旅,所以辅化安民也。边防之策,汉唐最详。贾谊、晁错、陆贽之论,昭然具在。至宋则有乡兵、蕃兵,明则有边兵。其制若何?夫兵以训练为先,孙子所谓练士,吴子所谓治军,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所言手法足法,明王骥所论练兵之法,其目凡五。能备举欤?自来太平日久,武臣边帅往往故事奉行,不能尽心简阅,役使兵丁,摊扣粮饷,流弊孔多。朕屡降明诏,严饬武备,鼓励戎行。直省督抚提镇,宜何如随时操演,加意稽察,选精锐,汰老羸,简器械,协伍两,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乎?

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周礼》旅师有春颁秋敛之法,廪人掌九谷以待匪颁,遗人掌委积以待施惠,其为储蓄甚备。管仲权有余不足而轻重敛散之,李悝视岁之上中下而贵贱籴粜之。其法亦有合于古与欤?厥后耿寿昌之常平仓,长孙平之义仓,朱子之社仓,规制不一,而行之既久,均不能无弊。何欤?京仓为天庾正供,《元史》所载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即今制所由昉。自伯颜建海运之议,岁输三百余万石,史称其便。明初海陆兼运,其后运河成而海运罢。然昔人往往力陈其利,能详举其说欤?出纳之经,盖藏之道,转运之方,果何由而尽善欤?

凡兹四事:慎修以端宸极,崇俭以维世风,肄武以饬边防,储粟以赡民食。敷施凝绩,莫切于斯。尔多士讲求有素,蕴蓄自深。其各摅见闻,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高柴愚笨,曾参迟钝。

楚国没有可以看作珍宝的东西，只是把善良作为珍宝。

《诗经》上说：白天去割茅草，夜晚把绳缠绞。急忙去修房屋，回头又要种百谷。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了帝位大业，安抚治理国家。仰承上天浩荡的恩惠和祖先传下的宏图谋略，兢兢业业，居安思危，日慎一日。经常思考躬检自身、端正心念的要旨，使民风淳厚返朴归真的办法，用兵习武的计谋，足食富民的制度，希望与朝廷内外的臣民百姓都致力于天下大治的宏图伟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境地奋进。为了引用人才，专门开设恩榜。值此皇帝我来到殿廷发布诏令之始，虚怀若谷，博采众长，向你们分条询问，你们这些贡士们都仔细听好。

圣贤学说的要领在于恭敬保持真诚，《周易·文言》在《乾卦》倒数第三阳爻处讲真诚，在《坤卦》倒数第二阴爻处讲恭敬。宋人程颐说：有了真诚之后就不会再有不恭敬的行为。如果没达到真诚的境界则应该先学会恭敬，然后才能做到真诚。所以按《乾卦》、《坤卦》分为圣人之学和贤人之学。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以往哲人的精粹语录，都条理分析一下然后陈述之。朱熹说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恭敬之意。从中正平和、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到圣贤神明的教化功效，关键不外乎真诚之意。养性修身之法和治理天下之法一以贯之的东西，《大学》、《中庸》二书实际上已经全部包括了，能申明其含义吗？真德秀著《大学衍义》时，把诚意正心分为两个方面：一曰崇尚恭敬谨慎，一曰戒绝安逸贪欲，这就更完备了。明人邱浚又补充了《审几微》一节，其目的何在？皇上我翻检阅读以上各书，内心信奉圣贤学说，近来已令朝中儒臣重新抄写了《朱子全书》以备反复阅读。怎样才能看出起始处然后用力，分辨人心危险、道心隐微而达到精纯专一呢？

物力的丰盛和缺乏取决于民间习俗的奢侈和节俭，而想让百姓

生活富余，关键在于朝中理财之人能有开辟财源和节省开支的办法。《周易》上说:用制度来约束,就能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尚书》上说:认真保持节俭的品德,只想保住长久之治。节俭之道,难道不是帝王所要特别重视的吗？汉文帝以敦厚淳朴之风为百姓作出样板,景帝让二千石俸禄的官员自查政绩,以影响农夫耕种和女工纺织之事为戒,由此创下了富庶大业。唐太宗惩戒豪华崇尚俭朴,也导致了天下财物丰盛充足。这是帝王倡行之后臣民百姓自然效法呢，还是改变不良习性在于承奉朝廷意旨去进行教化的人呢？士大夫是庶民百姓仿效的样板，却有些不良习俗相继沿续，慢慢形成奢侈之风;衣服车马,为精美好看而互相攀比;成年、婚嫁、迎客、祭祀之礼,常常违章逾制。怎样才能移风易俗，使天下臣民都回心转意遵守道德规范呢？陆贽说过：财物的生产由年景丰歉决定，财物的使用由人决定。这方面的处断方法,其途径何在呢？

古人讲文修德广布天下,不忘武装防备,注意训练军队是要达到辅助教化安定民众的目的。边防守备的策略,汉唐两朝最为详备,贾谊、晁错、陆贽的言论,明明白白载于史书。到宋朝却有乡兵、蕃兵,明朝则有边兵,这些兵制怎么样呢？士兵应以训练为首要任务,孙武所说的训练士卒,吴起所说的整治军队,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所说的手法足法,明朝王骥所论述的练兵之法有五项,能全列举出来吗？因为太平日久,军将边帅往往只是敷衍应付,不能认真地训练检查,甚至役使兵丁做私事,克扣士兵粮饷,流弊很多。皇上我屡屡发布诏令,严令整顿武器装备,鼓舞奖励士卒。各省的总督、巡抚和军事将领,应当怎样经常操练,认真检查,挑选精锐,淘汰老弱,验核装备器械,调整军队编制,以达到一个士兵能有一个士兵的作用呢？

国家以民众为根本,民众以食为第一。《周礼》旅师有春天安排秋天收征之法,廪人掌管粮食以准备在分别颁赐的时候使用,遗人掌管储存以准备在歉收时救济民众，作为储备积蓄之制是很完备的。管仲针对年景丰收与歉收的不同情况决定征收的多少以及征收还是救济，李悝视年景收获的上中下三种情况来决定粮食贵买贱卖以平抑粮价,他们的做法也有符合古人之意的地方吗?后来耿寿昌的常平

仓,长孙平的义仓,朱熹的社仓,规格方式不同,但推行时间一长都不能不产生弊端,这是为什么呢?京师仓廪作为朝廷府库的主要来源,《元史》上记载的河西务十四仓,京师二十二仓,通州十三仓,正是当今仓廪之制的前身。自从伯颜建议兴办海运,每年往京师输送粮食三百余万石,《元史》称其极为便利。明朝初年海运陆运同时进行,后来运河疏通便把海运停了。然而以往人们只是讲这些做法的好处,现在能详细地列举一下吗?有关财政收支的原则,保存的办法,转运输送的方式,到底怎样做才是最好的呢?

以上这四个问题:注重修养以肃正王道,崇尚节俭以维系世风,练兵习武以整顿边防,储存粮食以保证民众生活,在施布政教、成就功业上要数这些最重要了。你们这些文人学士讲述考究都有深厚基础,思虑谋划也很深入。请你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见闻,不要空泛也不要遮掩,皇上我准备亲自审阅。

章鋆　殿试对策

章鋆(生卒年不详)　字配芝,一字吟谷,号采南,鄞县(今属浙江)人。咸丰二年(1852)状元。咸丰、同治年间先后三次主持乡试,一次主持会试,在福建、广东任学政,后官至国子监祭酒。其一生致力教育,在教导后学、培育英才方面很有作为和名气。工于史学,善写诗文。撰有《闽儒学则》、《治平宝鉴》和《望云山馆诗文稿》。

臣对:臣闻敬修所以建极,训俭所以型方,奋武所以防边,藏富所以裕国。综稽往籍,《诗》歌基命之功,《礼》重教中之治,《易》筮行师之利,《书》详纳秸之经。崇规茂矩,粲然具陈。自古帝王锡极临轩,斟元御宇,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念,致天人交应之机。以懔几康则宸修懋焉,以昭制节则世道淳焉,以精简阅则师律贞焉,以广蓄储则民生厚焉。用是执中勉乎兢业,谨度洽乎敦厖,敔忾奋乎赳桓,阜财征乎丰乐。所由法昭圜矩,泽溥垓埏,迓鸿庥而光骏业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玑衡齐政,玉烛调时,则古圣以同民,体至仁以育

物。固已一德聿修而万邦式化，六军皆振而亿秭兴歌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思垂久治之模，不遗迩言之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慎修、崇俭、肄武、储粟诸大政。如臣愚昧，曷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本刍荛之一得，以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圣学之要，在于主敬存诚，而因求审端用力，以辨危微而致精一。此诚存心养性之极则也。臣谨按，《易·文言》于《乾》九三言诚，《坤》六二言敬。程子阐明其义，谓诚者天之道，实理自然无妄，故诚则无不敬，而以《乾》为圣人之学。人道莫如敬，主一无适，则心自存，故必敬而后诚，而以《坤》为贤人之学。自汉以来，诸儒罕窥此奥。厥后朱子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和位育，极之神圣功化，枢纽不外乎诚。究之求慊戒欺，何莫非诚？不显笃恭，何莫非敬？《大学》、《中庸》二书，心法治法实括其全。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立为二目，曰崇敬畏，戒逸欲，亦云大备。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诚以用功于事为之著，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尤易为力。夫《大学》、《中庸》皆以"慎独"为言，朱子章句于《大学》"慎独"曰"审其几"，《中庸》"慎独"曰"几则已动"。是独乃人心念虑初萌之端，善恶诚伪由分之始，甚微而隐。审其几以实，为善而去恶，则意自诚。先儒谓一"几"字是吃紧为人处，审端用力必始于此，斯所以由敬而诚之要也。皇上服膺圣学，近命儒臣重缮《朱子全书》，用备观省，穷理以致知，返躬以实践，盖统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传而一贯之矣。

制策又以节俭之道为帝王要务，而因讲求夫议道自己、使天下移风易俗之故。臣惟节之一言，诚圣人制用丰财之法。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绌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而致天下之富。汉唐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陆贽有言："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裁制之术在乎征敛有其艺，储蓄有其具，费用有其经。人君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捐珠玉，樊貂锦，远优佞，废苑囿，戒缮修，却贡献，次及大臣，次及百职，莫敢不率矣。夫贵之所尚，贱之所慕。乃往往衣冠舆马竞为美观，冠婚宾祭动多逾制，固习俗之渐染，亦教化之不先也。

窃谓国奢示俭，此君子之行，士大夫之责。汉许劭为功曹，同郡袁绍车徒甚盛，入郡界乃以单骑归。魏毛玠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皆以廉节自励，虽贵臣舆服不敢过度。唐杨绾为相，崇俭朴而人心自化，郭子仪、黎干等音乐、骀从皆为减损。此则禁郑人之汰侈，奚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国，盖转移之道亦在承流宣化者矣。皇上崇俭黜奢，复刊简明规条，颁示中外，不已家喻而户晓乎？

制策又以文德诞敷，不忘武备，而欲严饬戎行，尽心简阅。此尤诘兵禁暴之要务也。臣考三代之隆，即民为兵，因农隙以讲武。春秋时已离兵民为二。汉初南北军内外相维，武帝时番上变为长屯，光武时长屯变为远征，兵法以坏。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后一变为矿骑，再变为方镇之兵，而强藩遂不可制。宋之兵制有三：选于户籍或应募训练以防守曰乡兵，又有蕃兵，塞上部落固结以为藩离；其余则曰禁军、曰厢军。明之边兵，即汉募民实塞旧制。有事则命将镇之，既撤则军归卫、将归第焉。夫兵不练，则冗而不可用使。非平日汰其老弱，厚其粮饷，重其赏罚，而欲藉以张虚数，此司马公所谓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也。故《孙子》曰："法令孰行，士卒孰练，吾以知胜负"。《吴子》有《治兵》、《励士》诸篇，《李卫公问对》有言"手法"、"足法"，明王骥练兵之法有练胆、练技、练阵、练地、练时诸目，皆可谓深切而著明者已。皇上屡谕直省，随时操演，加意稽察，何难一兵收一兵之用哉！

制策又以食为民天，而筹及出纳之经、盖藏之道、转运之方。臣思议积储者，管、贾而外，莫善于李悝之平粜，大饥发大熟所敛，中饥发中熟所敛，有合于古。后常平、义、社诸仓，皆师其意而略变之。久则弊生者，创始之人以实心行良法，继起之人以良法济私心也。京仓为天庾正供，自古运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河漕视陆运费省什庾四，海运视陆运费省什七八，视河运费省什五六。秦创海运，唐偶行之，元始用以足国。明初用而旋罢，成化中邱浚请与河运并行，万一漕渠失利，此不来而彼来，乃思患豫防之计。隆庆末王宗沐亦谓海运有十二利，因具疏三说以进曰：天下大势一，都燕专势二，目前急势

三。盖以佐河运之缺,计无便于此者。况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东南之力几竭。运费增则民力困,运费减则民力纾,亦通其变,使民不倦之道也。至于出纳盖藏不能无弊,得人而整饬之,弊当渐除耳。皇上慎重仓储,兼资海运,粮艘畅行,足征有备无患之实效也。

若此者:端本以善则,敦俗以还淳,振旅以诘戎,赡民以积粟。扇巍巍,显翼翼,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劼毖已殷而愈严屋漏,浮华已黜而更守茅茨,操防已肃而犹念边陲,储峙已供而弥筹饥廪。斋栗之容著焉,撙节之礼明焉,干城之材蔚焉,转漕之利通焉。由是蔼洽熙春,欢腓函夏,以迓蕃禧,而庆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注重修养才能树立最高准则,强调节俭才能引导四方,勤奋练武才能守卫边防,储藏财物才能富裕国家。泛览以往的典籍,《诗经》歌颂始顺天命的功效,《礼记》注重教导人们消费要适度的作用,《周易》测算出征作战的时机,《尚书》记载献纳粮食的规定,高尚完善的种种规矩礼仪,明明白白的都讲到了。自古以来的帝王颁赐最高准则,高居宝座,斟酌初始状态,安抚海内,都是不分昼夜地寻究思考,以求达到顺应天时迎合民心的盛世。只有居安思危才能使帝王修养扩充,只有明令制度才能世道民风淳朴,只有勤于训练才能使军队纪律严明,只有多储粮物才能使民众生活安定。执守中正而努力兢兢业业,强化制度而风气淳厚朴实,同仇敌忾而军队威武雄壮,增加财富而民众丰盈快乐,所谓遵循礼制法度,皇恩普泽天地,迎来大福大贵并光大祖传基业,正是这样啊。

敬思皇帝陛下,用天文仪器般的深远精确来整肃政令,用玉台明烛般的透彻洞察来调节时令,效法古代圣贤的作为来教化民众,躬行至仁至圣的行为来恩养万物,已经是严格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各地接受教化,军队士气振作而亿万百姓大唱颂歌了。但皇上谦虚大度,虚怀若谷,认真深刻地筹划咨询,思考长治久安的办法,不嫌弃身边人的言论。宣召臣下等人到朝廷,策问注重修养、崇尚节俭、练兵习武、

储存粮食等重大政务。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么能懂得其中的要领呢？但正当对答开始的时候，想到事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能不勉力进言经常阅读的一些内容，把刍草样的浅见识作为依据，以求献上葵花向阳的忠心呢？

臣下我拜读圣上策试试题所说的，圣贤学说的要旨在于恭敬保持真诚，因而寻求看出起始处然后用力的办法，分辨人心危险、道心隐微而达到精纯专一。这正是保持淳朴心境修身养性的根本之所在。臣下我认为，《周易·文言》在《乾卦》倒数第三阳爻处讲真诚，在《坤卦》倒数第二阴爻处讲恭敬。程颐解释说明了其含义，说真诚是天然的原则，其道理当然不错。所以做到了真诚就不会有不恭敬，因此便把《乾卦》所讲的作为圣人的学说；真正入门之后便知道最主要的莫过于恭敬了，坚持专一便都能适应，淳朴之心自然保持不变，所以一定要先懂得恭敬然后才能做到真诚，因此便把《坤卦》所讲的作为贤人的学说。自汉代以来的儒生很少有人看出其间的深奥之义。后来朱熹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恭敬之意；从中正平和、天地定位、万物化育到圣贤神明的教化功效，关键不外乎真诚之意。说到自身满足和惩戒欺诈，哪一点不是真诚呢？盛明显赫老实谦恭，哪一点不是恭敬呢？《大学》、《中庸》两部书，把养性修身之法和治理天下之法都讲到了。真德秀撰《大学衍义》时把诚意和正心分为两部分，叫做崇尚恭敬谨慎，戒绝安逸贪欲，这便很完备了。明人邱浚又补加了《审几微》一节，实际是认为与其到事情很明显了才采取措施，不如在刚出现征兆的时候就觉察到更为有效。《大学》、《中庸》都讲过“慎独”之类的话，朱熹在《大学章句》讲“慎独”之处说要觉察细小的苗头，在《中庸章句》讲“慎独”之处说“几”就是已经出现的迹象。所以“独”正是人的内心深处某种念头刚刚出现，善良与丑恶、真诚与虚伪刚刚开始区分的时刻，非常细微而隐蔽。审察细微的苗头要靠真实，致力善良而去除邪恶，这样其意念自然就真诚了。先辈儒生说一个“几”字正是为人处事最要紧的地方，审察起始处而后用力，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入手，这也是由恭敬进展到真诚境界的关键。皇上内心信奉圣贤学说，近来已令朝中儒臣

重新抄写了《朱子全书》,以备反复阅读。深究道理以达到知识充实,再回过头去亲自实践,这样便是把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精神真正领会了,并使之延续贯穿起来了。

策试试题又把节俭之道作为帝王的急要之务,所以讲求从自身做起而议论其中的道理,和能使天下臣民移风易俗崇尚节俭的办法。臣下我认为一个"节"字,正是圣贤之人管理财物能有盈余的办法。汉朝和唐朝建立之初国家财用经常短缺,汉文帝和唐太宗能做到有节制地使用财物,所以公室和民间费用都有节余而使全国都富庶了。汉朝和唐朝兴盛时期国家财物经常很充余,汉武帝和唐玄宗都不注意节俭,所以公室和民间费用都用光了,而使全国都贫穷了。陆贽说过:"财物的产生由年景丰歉决定,财物的使用由人决定"。这就是说管理财物的办法在于征敛应有一定的极限,储蓄应有可靠的仓廪,使用应有严格的规定。君主又能自行注意节俭并为天下臣民作出榜样,放弃珠玉宝器,限制貂锦衣被,疏远奸佞小人,减少花池园林,压缩宫室营建,制止进贡特产,影响到百官大臣再影响到百姓,谁能不这样做呢。高贵之人所追求的,正是贫贱之人所羡慕的。往往促使人们的衣帽车马为精美好看而互相攀比,成年、婚嫁、迎客、祭祀之礼,常常违反章制。这虽然是传统习俗的长期影响所致,同时也是事先教化不够的缘故。我个人认为国内风气奢靡的时候向百姓展示节俭,这是君子的行为,是官员士大夫的职责。汉代的许劭在地方上当掌管考察记录的功曹,同乡袁绍的车马华美随从众多,许劭回乡时只是单骑独行而已。曹魏时毛玠在东曹任官,按九品中正之制选拔官员时以节俭行为给人们作出榜样。于是人们都以清廉节俭相互勉励,纵然是贵人高官的车马衣服也不敢过分奢侈豪华了。唐朝时杨绾为宰相,崇尚节俭朴实,结果使人们的习性自然向这方面转化了。郭子仪、黎干等人主动压减一些场合的乐队规模和骑马侍从的人数。这样一来,禁止郑国人那样的浪费奢侈习俗不必要用三年时间,变更洛邑一带那样的傲慢吹嘘习气也不必用三十六年的努力了。修炼自身,推及与家人,展示给全国民众,改变不良习俗的办法也就在于承奉朝廷旨意去教化的官员了。皇上崇尚节俭禁止奢侈,再刊布

简单明了的规章条款,颁布展示给朝廷内外的臣民百姓,不已经达到家喻户晓了吗?

策试试题又讲以文明道德普济天下而又不忘武装防备,并准备严格整饬军队,认真检阅操练。这也是整顿军队禁除动乱的重要措施。臣下我考察,夏商周兴盛时期,全民皆兵,在农忙的间隙练兵习武。到春秋时代已经把兵与民分为两种不同的编制了。西汉初年南军与北军屯驻京师,内外互相配合互相牵制,汉武帝时把定期的番上执勤变为长期驻扎,东汉光武帝时又把在一地长期驻扎改为长途征战,兵制便混乱了。唐朝设置的府兵最符合三代时期兵民合一的古制,后来先是府兵变为募兵制下的宿卫矿骑,又进而变为方镇将帅的私兵,中央便无法制约强大的方镇将帅了。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种:按户口征派或招募而来经过训练用以防守的称为乡兵,还有蕃兵,即塞上边地游牧部族集结防卫守边的军队;另外两种是京师附近的禁军和地方上的厢兵。明朝的边兵就是西汉时候募民实边开荒屯守的旧制,有作战任务就临时派将帅去统领,任务完成后则士兵回原来的卫所,将帅也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兵不经常操练,就会数量多而不起作用。如果不能经常性地淘汰老弱,增加粮饷,严格执行赏罚制度,却只是不断扩大军队的数量,这正是当年司马光所说的对民众有世代祸害,而对国家没有分毫的益处。所以《孙子兵法》上说过:"知道其法令怎样实行,士兵怎样训练,我就可以断定其胜负成败了。"《吴子》中有《治兵》、《励士》等兵法文章,《李卫公问对》中谈到"手法"、"足法"等训练方法,明朝王骥的练兵之法有练胆量、练技艺、练阵容、练习适应各种地形、练习适应各种气候等名目,都可以说是既深刻独到而又非常明确的。皇上屡屡下令各省,随时操练演习,认真进行考核检查。这样一来,让每个士卒都起到应的作用还有什么困难呢?

策试试题又讲民以食为天,并考虑到财政收支的制度,储存粮物的原则,转运粮物的方法。臣下我认为,讨论屯积储存粮物方法的人,管仲、贾谊之外,要数李悝的平粜之法了,大灾之年发放大丰之年所收入的粮食,一般灾荒发入一般年景所收入的粮食,确有符合古人之意的地方。后来的常平仓、义仓等制度,都是模仿了李悝的做法并作了一

些调整。实行时间长了出现弊端的原因，在于创立制度的人是真心为民实行这种好办法，接下来的人则是用这种好办法来谋私利。京师仓廪作为朝廷赋税的主要聚集处，自古以来运输方式有三种：即陆路运输、漕河运输、海路运输。漕河运输比陆路运输的费用省十分之三四，海路运输比陆路运输的费用省十分之七八，比漕河运输的费用省十分之五六。秦朝时候就开始有海运了，唐朝偶而使用，元朝开始把海运作为满足国家所需的主要运输方式。明朝初年使用海运但不久就停了，成化年间邱浚建议海运与漕运并行，万一漕河运输不能奏效，漕运不来海运来，这正是想到意外情况所作的预防办法。隆庆末年王宗沐也说海运有十二个方面的好处，并就此问题上疏讲了三个实行海运的迫切原因：一是天下发展的大势所需，二是京师所特有的局势所需，三是当前的紧急情况所需。总的看来弥补漕河运输不足的办法没有比海运更方便的了。况且近年以来百姓家往往因有壮丁而贫困，壮丁因有漕运之役而贫困，东南地区的民力几乎用尽了。运费增加了则民间财力更缺乏，运费降低了则民间财力可宽松。所以实行海运也是作些变通而防止百姓贫困的办法。至于说财物的收支储存总免不了有些弊端，只要是让合适的人去整顿，弊端就会渐渐革除了。皇上认真对待仓廪储存，兼顾海路运输，粮船畅通无阻，一定能收到有备无患的效果。

像以上这些问题：为端正根本而完善规则，为净化风俗而返朴还淳，为振作军旅而讲求武备，为赈济百姓而储备粮食。兴旺强盛，显赫雄伟，仁义圣明的行为完善了，帝王的治国之道具备了。臣下我更祝愿皇上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已经做到谨慎小心却能更加独处慎修，已经禁止奢侈浮华却能继续简朴起居，已经整饬军队纪律却能时刻关心边防，已经准备粮物却能随时筹划赈济。恭敬谨慎的神情常见了，约束克制的礼节明确了，有卫边护国才能的将帅增多了，漕粮转运的需求保障了。由此和蔼融洽如同明媚的春天，整个华夏一片欢腾，迎来人丁兴旺的喜悦和普天同庆的欢乐，我们大清帝国的江山万年永存就有保障了。臣下我是刚参加科考的新科贡士，不知道什么是忌讳，甚至于冒犯皇上的尊严，实在是胆战心惊不知死所。臣下我恭谨地特作如上回答。〔贾秀军译〕

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君子义以为质。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殿试策问

[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履位以来,三载于兹矣。仰荷昊苍眷佑,列圣垂庥,敕命时几,兢兢业业。恒思重道崇儒之治,诘戎禁暴之模,地舆险易之形,泉府流通之法,冀与中外臣工,致上理于大同,登斯民于仁寿。兹当临轩策访之时,虚衷博采,尔多士其敬听之。

周制立学,天子辟雍,或取字义,或象物形,诸家之说可胪陈欤?有文王之辟雍,有武王之辟雍,或为宫,或为西雍,何以称焉?辟池之名,见于何书?或以辟雍为乐名,其说何本?清庙、太庙、明堂、太学、辟雍,殊事异名,果一地欤?神道清静,祭于斯,朝于斯,射于斯,飨于斯,毋乃杂欤?四代之学,方隅奚若?壅水四周,广袤奚若?水或为旋,桥若为制,皆有据欤?夫虞廷有教胄之训,《周官》重成均之职,化民成俗,实基于此。朕躬临辟雍,讲学典礼,非徒侈三雍之上仪,修汉唐之故事也。亦惟期与多士研求格致诚正之功,以臻修齐治平之效耳。

我国家以骑射威天下,八旗绿营星罗棋布,有事则扫除,无事则镇抚,兵力不可谓不厚矣。而蚁屯蜂聚、弄兵潢池者尚稽荡灭,则不练之过也。兵法之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生聚教训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能言其大略欤?其著有明效者,当以有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为切于实用。所称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

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者，能阐其义欤？夫足兵必先足食。国家岁有常供，征发频仍则度支不给，开矿行钞亦补救之急务。必如之何而利可兴，弊可弭，征兵千里，士饱马腾也？

今江南之金陵、姑苏、维扬、皖水，皆《禹贡》扬州之域。稽之天文，在斗牛女分野星纪之次。自两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宋元明之建置沿革，可扬榷而陈之欤？左太冲《吴都赋》所称包括於越，跨蹑蛮荆，嵌崟乎数州之间，灌注乎天下之半者，能推阐言之欤？其间人民殷阜，良莠不齐；物产丰盈，转输攸赖。而防江、防河、防淮、防海，洪波沿袤何以扼其要，港汊纷歧何以杜其奸，平时何以绥靖，临事何以折冲？古今异时，山川异势，水陆异宜，攻守异形，防剿异用，非讲求于平日，其何以投鞭断流，使江左江右亿万苍生得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也？

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是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银。唐时有禁断采银之诏，度支岁计有粟布绢绵及钱而无银，惟诸州土贡，自百两至二十两不等，不为币也。以银为币，始于何时，行于何地？铸银之式，轻重不同，所直亦异。厥后银日贵，钱日贱，民间但以银论价市易。能详其源流迁变欤？论钱法者，若贾谊，若孔觊，若陆贽，能述其梗概欤？我朝府事交修，户工二部设宝源宝泉两局，近复因臣工奏请铸大钱，以剂食货之用。果何如而权衡轻重，各得其宜，俾国用饶而民用赡乎？

夫兴人才以讲学，奋武卫以诘奸，审地利以设防，阜民财以裕国，皆经邦之要道，立政之宏模也。多士学古入官，通知时事，以敷奏为明试，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事件完全消失才好。

正人君子认为仁义是最根本的。

孟子主张性善论，讲述时总是说尧舜。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位以来，至今已经三年了。仰承上天的保佑和列祖列宗的遗泽，只管谨慎对待天命，注意细微苗头，兢兢业业。经常考虑重视道德崇尚儒学的措施，讲求武备禁除暴虐的方式、山川地理险峻平夷的情况，货币式样及其流通的方法，希望能与朝廷内外的臣民一起走向理想的大同世界，使亿万百姓都和睦安康。在此临朝策试访求贤才的时候，皇帝我虚心地博采众人之议，你们这些贡士们都仔细听好。

周代建立学校的制度，天子所设立的最高学府叫辟雍，“辟雍”之名有的说是按字义取之，有的说是按象形取之，各家的说法请罗列一下。还有所谓周文王创设的辟雍，有所谓周武王创设的辟雍，有的称为宫，有的称为西雍，这是怎样来命名的？“辟池”之名在什么书上有记载？还有人说辟雍是乐曲之名，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所谓清庙、明堂、太学、辟雍这四者真的是一个地方而只是用途和名称不同吗？神灵的性格喜欢清静，在此祭祀、朝拜、比射箭、设供奉，不是太吵杂了吗？先秦时期虞、夏、商、周四代的学校，其所在方位怎样？池水环绕四周，长宽各多少？水的流经路线，桥梁的设计布局，都有规定吗？唐虞时代有教育子弟的训令，《周礼》对掌管大学的大司乐之职很重视，教化民众形成良好的风俗，主要是因为有了这些做法。皇帝我曾亲自到类似古代辟雍的太学去，讲述圣贤学说并主持礼仪，并不只是为了夸耀辟雍、明堂和灵台这三雍宫的礼仪，仿照汉唐时代的传统做法，也是希望与文人学士们一起研究探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

我们大清王朝以擅长骑马射箭威震天下，八旗兵绿营兵在各地星罗棋布，有意外之事时能扫平排除，没意外之事时则镇守安抚，兵力不能说不雄厚。而一些像弱小的蚂蚁、蜜蜂一样聚集在一起，在沿

海河湖兴兵作乱的人还没有彻底消灭，则是士兵训练太少所造成的。最古老的兵法，应该数孙武的《孙子兵法》、吴起的《吴子》和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对其所讲的生息积聚、教导训练的方法，权术计谋运用的手段，能大体上讲讲吗？在兵法方面最有实用价值的，当数明朝将领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一书，本书所讲的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帅，能阐述一下其含义吗？想让兵力充足必须先让民众吃穿有余，朝廷每年都有固定的赋税收入，征收越来越繁但各种开支却不够用。开采银矿发行纸币也是补救开支的急务。到底该怎么办才能真正做到兴利除弊，士兵千里征战而粮草充足，士气高昂战马奔腾呢？

现在江南的金陵、姑苏、维扬、皖水，都在《禹贡》所记的扬州的区域内。按天文星象来看，处在二十八宿中斗宿、牛宿和须女宿的方位上。从两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到宋元明，这一带政区设置的沿革变化，能评论叙述一下吗？晋人左思《吴都赋》所说的吴都包括东南吴越地区，地跨各个部族，矗立在几个州府之间，影响到南方大半个中国。对此能分析阐述一下吗？这一带百姓很富庶，但人情风俗好坏不一；物产很丰盛，但转运至关重要。至于布防长江、黄河、淮河、沿海，对波涛四处延布的地区，该怎样控制住要害处所，对河湖的交叉地带怎样才能绝其隐患，没事时怎样防范保护，有事时怎样及时治服？过去与现在时代不同，山川地势也有变化，水上和陆地适用的方法不同，进攻与防守要根据不同情形来定，防卫和围剿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不在平常无意外之事的时候做些研究，怎么能有当年苻坚大军那样投鞭断流的气势，使长江两岸的亿万百姓脱离水深火热而安居乐业呢？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货币分为黄金和铜钱两种，而珠玉、龟贝、银锡等不作为货币。西汉孝武帝开始铸造三种白银货币，很快就废止不再流通，说明这个时期所通行的货币一直都是铜钱，不曾使用白银。唐朝时候有禁止开矿银的诏令，中央每年的财政收入有粮食、麻布、绢帛、丝绵以及铜钱而没有白银，只是各州的土贡中有白银百两至二十两不等，但不是货币。白银作为货币始于什么时候，流通在哪

些地区?银铸币的样式不一,轻重不同,价值各异。后来白银越来越贵,铜钱越来越贱,民间只用白银来论价交易。能详细叙述一下其源流和演变过程吗?论述钱币制度的人,如汉代贾谊、北齐孔觊、唐朝陆贽,能叙述一下他们学说的梗概吗?我们大清王朝六府三事交相修明,户部和工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共同掌管钱币的铸造发行,近来又根据有些大臣的奏请铸造大额铜钱以补充国家财政费用。到底怎样才能设计出大小合适的钱币,使国家和民众都感到方便,使国家财用充足而且百姓生活有保障呢?

通过培养人才来讲求学问,通过奋扬武卫来究治奸恶,为了布置防卫而审视地势之宜,为了富裕国家而让百姓积累财富,这都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办法,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你们这些贡士们博学圣贤之书,进入仕途,了解目前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应当利用策试之际奏明自己的见解主张,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审阅。

孙如仅　会试卷三道

孙如仅(生卒年不详)　字亦何,号松坪,济宁(今属山东)人。咸丰三年(1953)状元。,咸丰五年出任陕甘学政,后任内阁学士。咸丰、同治年间三次被点为会试同考官。同治元年(1862)任云南学政,未到任又改任江苏学政。病故于江苏学政任上。主考则致力于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不趋奉权贵,为时人所称颂。著有《曲徙粗议十六策》,后来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常观看此书,并用此中计策。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论圣治者述圣言,无讼一说可会也。夫讼至于无,必有神所使者矣。夫子由听讼转计之,传者即由无讼深会之。以谓理苟观乎其通,一事可例万事也;治苟握乎其要,一人可役万人也。自古平天下者,治具亦多端矣,而沿流溯源,即刑狱之清已,有必之于已而操术为甚

神者。苟非大圣人裕明德之学，储新民之功，又乌识洗心革面，此中自有微权耶？盖自谈治法者，不原于学术，但挟礼乐刑政作笼络亿姓之谋，是未克问心，曷能问世也？夫子故特即无讼而一溯从来焉。抑自狃小康者，无裨于大同，但恃摘伏发奸为折服两造之计。纵真能用刑，终异无刑也。夫子故特由听讼而进求上理焉。慨然曰：今将移风易俗，化天下于敦庞纯固，非讯鞫之所可奏功也。而回心向道，相率而入于荡平正直，又非芸芸众生之所自主也。则且为听讼者告曰：有讼不如无讼；则且为求无讼者告曰：能听不若能使。

吾窃尝返躬自问矣。听恃乎明，吾之明亦或犹人。顾用其明以为听，而讼者自在；况因其明而愈讼，而听者转穷也。则明不足恃也。听恃乎断，吾之断亦或犹人。顾用其断以为听，将以听弭讼；恐固其断而愈讼，反以听召讼也。则断胡可恃也。盖以言教者无功，必也其以身教乎？禁已然者无济，必也其禁未然乎？则使无讼者乎！

且夫天理之不容泯也，脱令忿戾日寻，第以审听杜其弊，直道亦几于息矣。而不然也，讼之起也，必有所自来；即讼之消也，必有所自止。夫亦视使焉者何如耳。圣天子深宫起化，岂求自诸众庶！而理足以相洽者，道足以相感。迨至科条勿犯，宥何致待三言？囹圄悉空，网并不留一面。人以为太平征有象，吾以为转运在无形也。斯道果可，必也黄农、虞夏之隆庶几再现乎！且夫人心之不容诬也，脱令争斗不已，第以听询成其谳，懿德亦几于亡矣。而不然也，讼之生也，必有所由召；即讼之息也，必有所由清。夫亦视使焉者何如耳。圣天子宸衷出治，亦非专为止辟。而心足以相通者，势足以相及。迨至雀鼠悉靖，里成仁厚之风；豺虎莫投，世鲜顽梗之俗。人以为治化播海隅，吾以为驱使在密勿也。斯道诚可，必也文武、成康之盛庶几复睹乎！吁！观于子言，可以知本矣。

谈论圣贤之治的人讲述圣贤的言论，其中“无讼”一句话是可以认真领会的。诉讼争端的消失，一定是某种绝妙的办法促成的。孔夫子从审理诉讼转而深入思考，后来注解孔夫子言论的人也由消弭诉讼来深刻领会孔夫子的意思。认为如果把世间道理真正弄通了，一

件事就可以作为一万件事的样板;如果治理国家能抓住真正的要害,一个人便可以统辖亿万民众。自古以来治理天下者,治理的方法多种多样,而由分支追溯源头,则是审理诉讼公正清明,并且能从有诉讼转变到没有诉讼,这必定具有所使用的方法是很巧妙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圣贤之人丰富了宣明本身道德的学问,积聚了更新民众思想面貌的功夫,又怎么能让人们彻底改变呢?这里面自然有那微妙的办法吧?所有那些谈论治世之道的人,不从道德学术上找根源,只是利用礼仪乐舞制度、刑法和行政手段作为笼络统治百姓民众的办法,这些不能扪心自问的办法,又怎能拿来使用呢?孔夫子因此专门从消弭诉讼的方法讲起,来追溯原由。那些贪图满足于小康之治的人,对建立理想的大同政治是无用的,只是依靠判明隐情揭发奸贼作为平息争讼双方的办法,即使能真正公正地使用刑法,也毕竟与不用刑法的办法不同。孔夫子因此专门从消弭诉讼入手追求最佳的治理。感叹道:现在想移风易俗,使世间风俗趋向淳朴厚道,并不是依靠刑法制裁能奏效的。而让民心向道德转化,一步步地都进入坦荡正直的王道,又不是芸芸众生自己所能把握得了的。所以只是对审理诉讼的人说:有诉讼不如消弭了诉讼;并且又对寻求消弭诉讼之法的人说:能审理诉讼不如能掌握消弭诉讼的办法。

我曾经用亲身体验来问自己。审理诉讼依靠明智,我明智可能不比别人强一些,但用明智来审理诉讼,诉讼争端仍然存在,况且由于自己能明智裁断使得越来越多的诉讼者来找你审理,审理者也就变得没办法了。可见明智是不可靠的。审理诉讼依靠善断,我的善断可能不比别人强一些,但用善断来审理诉讼,并想用审理诉讼来平息诉讼,恐怕会由于自己善断而使得越来越多的诉讼者找你审断,反而导致了更多的诉讼。善断又怎么可靠呢?这是因为说教是不顶用的,那么就必须用自身的行为来身教吧?对犯罪的人予以禁止并不管事,那么就必须对尚未犯罪的人予以禁止吧?这就表明最好是要做到消弭诉讼吧!

况且人的道德本能是不能丢掉的,如果凶狠残暴天天出现,只用审理诉讼的方法来纠正这些行为,也会使道德接近消失了。不过,诉

讼争端的产生，必定有其特定的原因；诉讼争端的消弭，也必是有其能够消弭的基础，这就要看掌管审断的人怎么处理了。天子深居宫中进行仁义道德的自然感化，并不需要从臣民百姓中去作寻求，而自然本性完全可以使皇帝与臣民百姓相通，皇帝的仁义道德也就完全可以使臣民百姓感受到。做到臣民百姓都不犯法，减免处罚哪里还至于像《周礼》那样规定有三类呢？监狱都空闲起来了，国家也不必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了。众人都认为达到太平盛世有迹象可以追寻，我却认为这些变化是在无形之中完成的。这些果真都能实现的话，那么黄帝、神农、虞舜、夏朝那样的盛世必定很快就再次出现了吧！况且民心是不能欺骗的，如果争斗诉讼不停息，只用审讯方式作出判决，美好的道德也就接近于消亡了。不过，诉讼争端的产生，必定有产生的起因；诉讼争端的平息，也必定有能够平息的条件，这就要看掌管审断的人怎么处理了。天子在位由衷地想达到天下大治，也并不是专门为了制止刑杀，皇帝与臣民百姓能想到一起，局势就足以随之形成。做到了乱打官司的祸害全被清除，里巷会形成仁义忠厚的风俗；没有罪大恶极的人再受严厉的惩罚了，世上就没有顽固抗拒的习惯了。众人都认为仁政教化已经普及到沿海边陲，我却认为引导全在于朝廷。这些果真都能实现的话，那么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盛世必定很快就可以再次看到了吧！啊！看到孔夫子所讲的这句话，就知道最根本的是什么了。

君子义以为质

为制事者探原于义，质在而体立矣。夫恃义固无以善事，然失义先无以宰事。君子以为质，体不已立乎？且事会既著于天下，其共见者也，共见不容有轻见。事机方辨于吾心，其独见者也，独见先贵有确见。见为纷能，实见为犁然，而事宜无所昧。见为当然，即见为必然，而事权无所摇。审之定焉，守之贞焉，斯操之为有原焉。何则？事莫不有义焉，见事即见义；义莫不因事也，见义乃见事。然其于义，必何如而后可哉？吾思君子。

暗昧者忘义矣，游移者违义矣，君子则揆度不爽焉。义界两歧，折衷得一是。义虞伪托，持守有真操。义在而事与主衡，实义在而事与为附也，则基先植也。适莫者背义矣，模棱者败义矣，君子则裁制有常焉。义立定则，至简御至繁。义无旁挠，有别尤其有执。义存而事得所主，亦义在而事得所范也，则本先端也。盖以为质也。制器而质不厚，则雕琢难施。何者?器始于质，反是必见其弊也。夫事何独不始于质哉!审义虽裕，先几或蹈于非几，以为质则外莫能夺，而吉凶祸福悉忘也。辨义虽明，初念或败于转念，以为质则中有所宰，而忠孝廉耻常存也。无论为经为权为常为变，皆此卓然不移者为之基址焉，殆亦如制器之始于质而已矣。植物而质不培，则枝叶何附。何者?物固于质，反是必见其萎也。夫事岂独不固于质哉!义有分著，是非或恐其互淆，以为质则审于万变，随机而弗敢泥也。义必合观，彼此或恐其不入，以为质则贞于不变，屡易而弗能离也。无论为巨为细为险为夷，总此屹乎不拔者为之蟠结焉，殆亦如植物之固于质而已矣。

且夫毗阴毗阳，恃气质者偏，偏则不足以度事；独断独行，恃才质者妄，妄则反至于偾事。盖非义即非质也。君子衷之于义，坚确有定守，实化裁有精心。所以权衡既正，遇艰险而神色无惊；主宰先端，创非常而胸怀不乱。且夫义开大纲，畏事者力靡，靡则根柢胡由植?义在小节，轻事者志怠，怠者宰制胡由精?盖质忘即义亡也。君子奉以为质，机宜无敢建，即本实不敢拔。所以有开必先，百度之纲维已豫；有基勿坏，万几之经纬已昭。此制事之体也，而用可推也。

特为订立制度掌管政事的人探求仁义问题，那么有了仁义这个根本，主体就可以确立起来了。只是依靠仁义固然难以把事情处理得很好，然而先失去仁义肯定无法处理好事情。君子以仁义为根本，这样主体不就确立了吗?并且事情聚在一起时明摆在众人面前，人们都可以看到，都看到了就容不得随意对待。事情机密时才在自己心中思忖，自己单独看得到，自己看得到就要求有准确的见解。对事情能看出复杂性，实际上也就是能分辨清事情而事情的机宜就不暗昧了。对事情能看出理应如此，也就是能看出必定如此了，而事情的机

衡就不可动摇。审查准确了，信念坚定了，这样的行为才是有基础的。为什么呢?任何事情没有不含有仁义在内的,见到事情也就接触到仁义了;仁义没有不依存于事情之中的,看到仁义也就知道事情了。那么对于仁义,到底应当怎样做才算正确呢?我常想到仁人君子。

秉性不好的人忘却仁义,性情多疑的人背离仁义,正人君子却认真揣摩不曾违背仁义。仁义之人能把忘却和背离的两种情况都分清楚了，由此也就清楚知道真正的仁义了。仁义之人分辨了对仁义的篡改伪托，坚持仁义行为也就把握住根本了。仁义存在则处理事情与所坚守的原则相一致，其实也就是仁义存在的时候事情和作为都统一于仁义了，是仁义这个根本早就确立了。莫所适从的人背离仁义,模棱两可的人败坏仁义,仁人君子却判断是非有固定原则。仁义有固定的原则，用最简单的道理来指导复杂的事情。对仁义没有什么歪曲的理解,存在区别却更有抱定的原则,仁义存在则处理事情就有固定标准了,仁义在那里而事情就得以统领了,所以仁义这个根本原则应首先纯正。这都是以仁义为根本。制造器皿时原料质地不纯厚,就难以进行雕刻修饰,为什么呢?器皿质地差了,反过来就肯定会看到它窳败。处理事情怎么会例外地不依赖于主事者的仁义本质呢！分析仁义的内容虽然很充分，开始时的行为可能会陷入不是时候,但以为仁义是个根本的原则,是其它东西所取代不了的,结果吉凶祸福就都消失了。辨别仁义的各种含义虽然很明确，开始的好念头被变化了的念头所改变，但以为仁义是个根本的原则而有其自身的主见，结果忠孝廉耻的观念总会存在。无论是作为固定做法作为权宜之计作为常制作为变制,都应以仁义作为明确坚定的基本原则,大概也如同制造器皿取决于原料质地的道理了。种植树木而不培植好树干,那树枝树叶就无处生长了。为什么呢?树木之类关键要树干粗壮，不然的话整个树就衰萎了。处理事情怎么能例外地不依赖于当事者的仁义本质呢!仁义的含义有主有次,有时可能会因此混淆是非,但以为仁义是个根本原则,就会认清各种变化的,所以总是随机而变却不敢有所拘泥。仁义的含义必须从整体上认识，各种具体事物可能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认为仁义是个根本原则,就会纯正不变

的，无论怎么改变也不会偏离仁义。无论是大事是小事是危险还是平常，总是把仁义作为岿然不动的原则来维系，大概也如同种植树木应当培植结实的树干的道理了。

况且人性既接近阳又接近阴，依仗阴阳气质者往往偏激，偏激就不能处理好事情；独断独行，依仗这种才质的人往往狂妄，狂妄则常常把事情弄糟。这说明没有仁义就失去了根本。仁人君子对仁义忠心不渝，意志坚定并且有主见，实际上也就是具体分析处理事情有独到之处。所以说根本原则把握准了，遇到艰险也会神色不变；内心主见固定住了，干番大事业也会胸怀不乱。并且仁义确立了总的原则，害怕干事的人就勇气不足，勇力不足而仁义这个根本怎么去维系呢？仁义体现在细微之处，办事不认真的人往往精神不振作，精神不振作主持事情怎么能办好呢？这说明忘却了根本也就失去了仁义。君子把仁义奉为根本，不敢随意采用变通办法，实际上也就是对最根本的东西不敢轻易改动。所以既有开启，就要迎头而上，各种制度的维持就已经从容不迫了；规定的基本原则不能更改破坏，处理各种政事的规范就已经很明白了。这是处理事情的主体所在，至于具体施用可由此去推论。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记大贤之道储君，正学术即正治术也。夫性善之说不明，学术坏治术亦坏。孟子道之，而复称尧舜以实之，岂第有益于世子哉！且尧舜者，千古之事功所由懋，实千古之性功所由开。春秋有孔子祖述之，而渊源不坠；战国有孟子称引之，而统绪堪寻。学术正焉，治术亦正焉。此觉世牖民之任，邹峄所以继洙泗也。滕文公为世子，而殷然见士，其好善也，由于性也。独是性善之说不明于天下也久矣，言杞柳而性失，言湍水而性失，言食色而性愈失。簧鼓众志，全诬性命之常；陷溺群伦，谁知性情之正。其亦幸而未生于尧舜之世，而不至见罪于尧舜也；其亦不幸而不生于尧舜之世，而不获见正于尧舜也。而滕世子者尚能折节礼贤，而不为所诱惑，岂非庸流中之矫矫者乎？宜

孟子之乐与言也。

夫孟子荷先圣之传,际流极之衰,方将以人孝出悌者挽风俗之浇漓,方将以仁育义正者登世运于平康。旁求之已及,虽先觉其奚辞?道性善所以迎其机也,称尧舜所以正其趋也。不道性善,无以见尧舜之尽人可能也;不称尧舜,无以见性善之实而可据也。皇降无私,赋畀大人,依能赤子,其端蒙养而培君德者,大抵不外乎此。故记者檃括其词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今将访二帝之懿徽,不亦远而难稽乎?然而人心道心,十六字之薪传如昨也。夫自学术之失也,为我有人,兼爱有人,称杨称墨,孰克自葆其性始?惟衷之以尧舜,俾知文思此善,文明此善,圣哲之性,初非别有神奇。良知此性,良能此性,颛愚之善,亦非独形缺陷。其自外于尧舜者,皆其自外于秉彝者也。而一切邪说淫词,无从置喙已,世子尚亦自勉哉!今将寻中天之隆轨,则亦渺不复睹耳。然而放勋重华,亿万年之功业常新也。夫自治术之漓也,纵横有人,捭阖有人,称衍称仪,早已尽泪其性真。惟正之以尧舜,俾知时雍风动,本具性量之中,能独善即能兼善,岂难再见于晚近?学校井田,犹存善政之规。尽己性兼尽人性,何难上媲于唐虞。其有负于尧舜者,皆其有负于生初者也。而一切权谋杂霸,无由置辨已,世子胡犹致疑哉!

记载下圣贤向君位继承人进行说教,准确理解了圣贤之学也就可以端正治理天下的办法了。性善论的真正含义不清楚,把圣贤之学曲解了,治理天下的办法也不妥了。孟子讲述了这个问题,又引证尧舜的行为来充实说明,这哪里只是对太子有帮助呢!尧舜这两位贤王,是弘扬了流传千古的宏图伟业的人,实际也是开启了千古不变的道德理性的人。春秋时期孔子宗奉并继承他们,使其渊源不断;战国时期孟子对此作了发挥引证,使其统系能分辨清楚。准确理解了圣贤学说,治理天下的办法也就正确了。这其中唤醒世人开启茅塞的重任,是孟子继孔子之后完成的。滕文公身为太子,恭敬地会见孟子这样的士人,他崇尚善良,是源于自己的秉性。唯独性善说的含义不被天下人理解已有很长时间了。讲人应当像柳枝那样曲顺柔和就背

离了人的秉性，讲人应当像激流那样勇往直前就背离了人的秉性，讲人应当有食色欲望就更背离了人的秉性。凭借花言巧语煽惑人们的心志，却把人的正常性情给破坏了；陷入到普通人中，谁也不清楚人的正常性情应当是怎样的了。这些人幸运的是没有出生在尧舜的时代，所以不致于被尧舜所制裁；这些人不幸的是没有出生在尧舜的时代，所以没有得到尧舜的教正。滕国的太子尚且能够放下架子礼贤士人，而不被那些背离人的秉性的行为所诱惑，这难道不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吗？孟子是应该乐于与其谈话的。

孟子肩负着传布孔子学说的重任，生逢世风堕落最厉害之际，才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主张来挽救风俗的败坏，用仁德养育和正义矫正的主张试图把世间风气升华到圣贤时代的样子。各个方面都探求过了，即使自己最先觉悟又有什么可以辞让的？讲性善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的，引述尧舜是为了矫正世间风气的趋向。不讲人性本来是善的，就不能说明尧舜的行为是人人能做的；不引述尧舜的作为，就不能说明性善学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天赋予人们善良本性时是没有私心偏爱的，给了圣人贵人，也同样给了普通众人，正确地进行启蒙教育继而培养君主的道德情操，大概不外乎依靠这些。所以记述的人整理概括孟子的话说：孟子主张性善论，讲述时总是说尧舜。

现在寻找尧舜的美德，不是太遥远太难查寻了吗？然而关于人心道心的十六字圣王之道却像是昨天刚说过的。自从先贤学说的真谛失传以来，有人主张“为我”，有人主张“兼爱”，或追寻杨朱或崇尚墨子，谁还能坚定地保持其原有的善良本性呢？只有倾心于尧舜，才懂得尧用文雅深思来体现善良本性，舜用文采鲜明来体现善良本性，圣贤哲人的善良本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用善良的天知认识这种本性，用善良的本能体会这种本性，愚昧人的善良本性也不会单独成为缺点。那些与尧舜的作为不同的人，也都是些与遵守人伦纲常的人不同的人。一切非礼说教淫滥词语，没有插嘴的地方了，太子还要不断告诫自己吧！现在寻找尧舜时代兴盛繁荣的遗迹，也虚无漂渺找不到了。然而尧舜二位贤王，他们的流芳亿万年的丰功伟业

却总清新。自从治理天下的办法衰败下去,有人讲合纵连横,有人讲或开或合,有的赞同公孙衍,有的推崇张仪,早已完全搞乱了其纯真的本性。只有用尧舜的作为来纠正,使人们知道当时社会和睦、天下闻风响应的盛况,原本是具存于尧舜的本性和度量之中的,在任何情况下能独善自身也就能同时对他人和善,大同盛世再次出现于当今还有什么不可能呢?学校设置和井田规划之中,仍然保留一些当年治理天下的好办法,准确把握住自己的本性也就把握住了整个社会的人性,这样与唐虞时代相媲美有什么不可能呢?那些与尧舜相背离的行为,都是与自己最初的善性相背离的。而一切权术、计谋、仁政中夹杂霸道等,都是不用再去辨别的了,太子何必还对此产生疑问呢!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建学所以明伦,整军在于经武,设险斯能守国,阜财乃可足民。上稽往籍,《易》言讲习之功,《诗》美干城之选,《礼》载广轮之数,《书》详食货之经。自古帝王锡极临宸,斟元御宇,以与人文则鸿都向化也,以扬士气则虎幄宣威也,以安边圉则驿路销尘也,以裕国储则蚨飞适用也。用是学礼学乐四术崇焉,止伐止齐七德备焉,无党无偏九围式焉,职金职币百货充焉。茂矩隆规,罔不粲然具备。所由庞褫桄被,酽化芑敷,廓帝纮而恢皇纲者,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懋昭文德,丕振武功,因地势以制宜,厚民生以利用。固已教孚观听而律叶师贞,德载坤舆而财臻丰裕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念葑菲而听卑,询刍荛而察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兴学校、诘兵戎、度舆图、通泉布诸大政。臣之愚昧,奚足以仰赞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勉述平素之所诵习者,用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虞廷有教胄之训,周官重成均之职,而因念化民成俗,实基于学。此诚重道崇儒之至意也。臣谨按,成周立学,天子曰辟雍。《王制》郑注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此以义言者也。《灵台》诗传曰:水旋如璧,以节观者。此以形言者也。至于"於

乐辟雍”则为文王之学,“镐京辟雍”则为武王之学。《思齐》“雍雍在宫”,笺云:辟雍,宫。《振鹭》“于彼西雍”,注以雍为泽。习射泽宫,其地即辟池。苏氏引庄周之说,辟雍又为文王乐名。蔡邕《月令论》曰:取其宗庙之清貌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曰太庙,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曰太学,取其周水圆如璧曰辟雍。合朝飨射学与祭皆在一堂,其于神道清静之义,毋亦未之思欤?周立四学,陈氏《礼书》谓辟雍即成均,其位居中,左为东序,右为瞽宗,虞庠在国之西郊。其说视陆氏《礼象》、许氏《通考》为优。辟雍之水四周于外,广二十四丈,聚集其中者,穆然见辟雍海流之意焉。皇上躬临讲学,加惠士林,自格致以及治平,其理一贯之矣。

制策又以为政之道在于足兵足食,而因筹训练之法、储积之方。此诚慎重周详之至意也。臣谨按,《孙子》十三篇,由《始计》以至《用间》;《吴子》六篇,由《图国》以至《励士》;《司马法》五篇,由《仁本》以至《用众》,所云生聚教训之法,权谋运用之方,后世言兵者咸祖焉。而其精于训练、切于实用者,莫如戚氏之书:一练伍法,贵贱相维,十二人为一队,长短相救,亿万众为一心;二练胆气,功过必稽,明赏罚则化怯为勇,节制有定,遵纪律则转弱为强;三练耳目,进退分合,惟以旗鼓为衡,高下疾徐,必以号令为准;四练手足,艺精则力壮,以实而不以文,将勇则兵强,有传而后有习;五练营阵,营则兼车骑之长,合步兵而列队,阵则遵鸳鸯之式,选牌长以折冲;六练将,正一心则爱国保民,死生可置之度外,通三略则运筹决策,胜负早定于掌中。《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详哉言之矣。至于行师之要,尤以筹饷为先。开矿本权时之计,欲浸蚀悉除,则煎炼之数必核。非经理得人,则蠹吏奸商相为欺伪;非稽查得实,则银苗沙穴难以搜寻。取天地自有之财,助军国必须之用,则矿地之采访宜慎也。行钞亦济世之谋,私造禁以明刑,缗烂许其更换。恐胥吏之有克扣,则收放之需索必惩;虑商贾之难通行,则出纳之持平必准。化无用为有用,本至公为至平,则钞法之流通必远也。皇上训饬戎行,兵精饷足,从此肤公立奏,爪士凯旋,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江南之金陵、姑苏、维扬、皖水皆属《禹贡》扬州之域,因

而询其形势之险要。此尤轸念东南之德意也。臣考扬州分野，在斗牛女星纪之次。自两汉迄三国，久传长江天堑，六朝相承，立国江表。隋进兵钟山而战功成，唐设镇广陵而国赋裕。行密袭东吴之号，李昇开南唐之基。迨至宋之曹彬、元之伯颜，皆以善取东南称名将。明祖起兵濠泗，定鼎金陵，实由将相得人，非独资乎地利也。顾论江南之地形，亦关天下之大势。左太冲《吴都赋》所称：包括跨蹑之区，嵌崟灌注之势，诚得东南之大概矣。人文财赋甲于天下，虽良莠间有不齐，而忠义多知自励。以顺讨逆，以仁诛暴，以众击寡，金陵之地四面受敌。扼其咽喉，拊其肩背，绝其饷道，断其救援，散其党与，遏其奔窜，防江则瓜步其要也，防河则滁凤其要也，防淮则维扬其要也，防海则圌山关、鹅鼻嘴其要也。识兵机必知地理，斯攻守防剿悉得其宜矣。皇上救民伐罪，江左江右亿万群生，何难出水火而登衽席哉！

制策又以财货之用，必使权衡轻重，各得其宜，然后国用饶而民用赡。臣谨稽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银不为币。汉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是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未尝用银。唐宪宗有禁断采银之诏，其时岁计所入，有粟布绢绵及钱而无银。惟诸州土贡有银，然仍不以为币。唐季之行银币始于交广之地，至宋景祐年诏诸路岁输缗钱，闽广易之以银，此以银代钱之始。迄于金元，银日贵而钱日贱，盖由民之输于官者皆用银，故银积重也。古之论钱法者，汉文帝除盗铸之禁，贾谊上书切谏。北齐孔觊请铸五铢，使诸州市铜。唐陆贽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请广开采，严铜禁。其言皆有益于钱法。周景王铸大钱以便民，蜀刘巴铸大钱以富国，诚以鼓铸之工费易于稽核，市易之价值便于流行。利国利民，古人自有成效。或疑私铸难禁，不知官收铜器，铜少则价贵，私铸者无所利而自止矣。我朝户工二部，设宝源宝泉两局，藉以剂食货之用，诚美法也。

若此者：讲学以崇儒，诘戎以奋武，披图以度地，开源以节流。畅九垓，溯八埏，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人才已振更乐育夫胶庠，纪律已明益讲求夫武备，地舆已拓弥巩固夫苞桑，钱币已充复流通夫泉布。由是校序兴其贤能，干戈扬其威武，山川握其图籍，府库裕其货财。上以祇迓蕃禧，下以永绥

多祜。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学校是为了讲明伦理道德,整饬军纪是为了加强武备,在天险之处设关驻防才能保卫国家,使天下财物丰裕了就能使百姓富庶。查阅上古的典籍,《周易》叙述讲解践行的功夫,《诗经》赞扬防卫将领的选拔,《礼记》记载国土面积的数目,《尚书》详论财政经济的原则。自古以来的帝王颁布最高准则,高居宝座,斟酌初始状态,安抚海内,通过强调伦理使学校注重教化,通过弘扬士气以使军队显示威风,通过安定边塞以使驿道烽台不再起尘烟,通过增加储备以使货币流通而发挥其作用。因此懂得了礼乐则诗、书、礼、乐四种经术便受到尊重了,刺杀动作和前进步调一致了则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种德行便具备了,不结帮派不偏执则天下九州的人心便归顺了,管理好币制则各种物品就充足了。完善高尚的种种礼仪规矩,莫不昭然备具了。施布盛大的吉福,实现广泛深入的教化,弘大帝业并整饬皇朝纲纪,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敬思皇帝陛下,弘扬广大道德,致力振奋武功,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采取适宜措施,丰富百姓的生产生活然后用来物尽其用。已经教化使人们信服,军纪使部队端正,仁德施布到各地,财富达到了丰盛富裕。但皇上谦虚大度,虚怀若谷,认真深刻地筹划咨询,像采集野菜般不厌其烦地听取臣下的一孔浅见,像翻检刍草般仔细寻找哪怕一点可取之处。把臣下等人召进朝廷,策问有关兴办学校、整饬军队、考察地势、流通钱币等重大政务。臣下我愚昧至极,哪有能力对皇上谈论这些高深的问题?但由于正当对答开始的时候,想到事先要谋划好个人建议的经典古义,怎么能不进言经常阅读的一些内容,以求献上葵花向阳的忠心呢?

臣下我拜读策试试题中说,虞朝有教育子弟的训令,《周礼》对掌官大学的大司乐之职很重视,因此考虑教化民众养成良好风俗实际上是靠兴办学校。这真是重视道德崇尚儒学的意思啊。臣下我认为,

周代设立学校制度,周天子最高学府叫“辟雍”,《礼记·王制》郑注解释说:辟即明亮;雍即和谐;所以辟雍的意思就是使天下明亮和谐。这是按字义来解释的说法。《诗·灵台》毛传解释说:水流环绕成玉壁的形状,用来挡住观听的人。这是按字形来解释的说法。至于《灵台》诗所讲的“於乐辟雍”是周文王办的学校,《文王有声》诗所讲的“镐京辟雍”是周武王办的学校。《诗经·思齐》有“雍雍在宫”之句,郑笺解释说:辟雍指宫而言。《振鹭》诗有“于彼西雍”之句,郑注认为雍就是湖泊。在湖泊之畔的宫室里练习射箭,这种地方也就是“辟池”。苏氏引用庄周的说法,认为辟雍又是周文王时候乐曲的名称。蔡邕在《月令论》中阐述说:依据宗庙清洁的外观称之为清庙,依据宗庙正室供奉的祖先牌位称为太庙,依据宗庙正堂的布置称之为明堂,依据宗庙设有诗、书、礼、乐四门学问称之为太学,依据宗庙四周水池环如玉璧称之为辟雍。这是把朝拜、供奉、习射、读书和祭祀都集中在一处进行了,他对神灵喜好清静的问题,可能当时没有考虑吧?周朝设立诗、书、礼、乐四门学问,宋人陈祥道在《礼书》中说辟雍也称为成均,位置处在中间,左边为夏朝以来名为东序的学校,右边为商代以来名为瞽宗的学校,更早的虞代的学校在国都的西郊。这个说法比宋人陆佃的《礼象》、许氏的《通考》更合理些。辟雍的四围有水环流,宽二十四丈,聚集在里面的人可以肃穆地看出辟雍环海流动的意思。皇上亲自到太学去讲求学问,鼓励读书的士人,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其间的道理贯穿起来了。

策试试题又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军队和足够的粮食,所以谋划训练军队的办法、储存粮食的方式。这的确是处事慎重考虑周到的想法。臣下我认为,孙武的《孙子》十三篇,从《始计》到《用间》;吴起的《吴子》六篇,从《图国》到《励士》;司马穰苴的《司马法》五篇,从《仁本》到《用众》,所讲的生息积聚教导训练的方法,权术计谋运用的手段,后代讲兵法的人都引为典范。但兵法书中对训练之法讲的独到并且切于实用的,都不如明人戚继光的书:一是训练队伍,不分高低贵贱相互配合,十二个人为一队,长短武器相互照应,使所有士卒都一心一意;二是训练士兵的胆量,对成绩和失误必定严格

检查，赏罚明确就触使胆小者变勇士，规章制度一定严格执行，遵守纪律才能使弱小转变为强大；三是训练耳目的反应能力，前进后退分散集合，只按旗鼓的指挥来行动，高攀下潜快跑慢走，必须按号令的要求来变化；四是训练手脚的动作速度，技术精湛才显得力量强大，要讲求实效不要耍花架子，将帅勇敢才能带出强壮的士兵，有训练教导并且要不断重复练习；五是训练扎营布阵的方法，扎营时要发挥战车和骑兵的优势，并与步兵配合列队，布阵时要按鸳鸯阵法部署，选派得力将士迎击敌人；六是训练将帅，对国家忠心不贰才能爱国保护民众，把生死置之度外，精通三韬六略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战争的胜负早在掌握之中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书对以上这六条讲得都很具体了。至于行军出征的关键，当以筹集粮草军饷最为重要。开采矿银本来是解决财政之需的权宜之计，想消除开采过程中私吞藏匿等弊病，则必须严格控制和核实开采冶炼的数目。经办管理此事的官员如果选用不当，贪官污吏和奸商就会欺骗掺假；如果勘探不准确，在沙滩山地上就难以挖到银矿。取用天地间自然存在的财富，补充军队和国家应急的用项，银矿的开采应当慎重对待。发行纸币也是发展经济的措施，用严刑峻法禁止私造，纸币损坏时允许更换新钱。防止官吏从中克扣，所以规定发行和回收时如有索贿则予以严惩；担心商人使用中难以保值，所以规定必须严格地控制纸币的数量以与流通货物价值持平。把无用之物变为有用之物，本着为国家财政着想的目的并能做到公平合理，那么纸币的流通使用就长久了。皇上训令整饬军队，使士卒精锐粮饷充足，从此捷报频传，将士凯旋，不是很好的吗！

策试试题又鉴于江南的金陵、姑苏、维扬和皖水都属于《尚书·禹贡》所说的九州之一的扬州范围，所以询问其地势险要的情况。这真是皇上关心东南地区的恩德啊。臣下我考察扬州的天文星象位置，处在二十八宿中斗宿、牛宿和须女宿的方位上。从两汉到三国时期，一直把长江称作天堑，六朝时候沿用这种看法，所以在金陵建都。隋朝初年攻克了南京附近的钟山完成了统一大业，唐朝在广陵设镇安抚从而使国家财政有了保障。唐末杨行密袭用吴王封号在扬

州站稳脚跟建立了吴国，李昇则在金陵建立了南唐政权。等到北宋初年的曹彬、元朝的伯颜、都是因为能够攻克东南地区而成为名将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濠州一带起兵，在金陵建都，主要是由于所用将相得力，并非完全依赖江南的地利。说到江南的地理形势，也可以说关系到天下大势，如晋人左思《吴都赋》所说吴都地跨数州，挺立其间而影响各地，便把东南地理的形势基本概括了。此地人才和财税居全国首位，虽然如同庄稼一样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忠勇仁义的人大多能奋发上进。用忠顺讨伐叛逆，用仁义声讨残暴，用众多的力量来打击少数反抗者，就能使金陵四面受敌。扼制住通往金陵的咽喉要道，在其四周进行监控，断绝其粮饷的运输线路，再截断其救援部队的通道，把各地的党羽打散，同时要防止其突围奔逃，在长江沿线防守最关键的地方是瓜步山，在黄河沿线防守最关键的地方是滁凤，在淮河沿线驻防最关键的地方是扬州，在沿海驻防最关键的地方是圌山关、鹅鼻嘴。部署军事行动必须懂得地理，这样才能使进攻驻守防卫围剿都达到最佳效果。皇上拯救民众征伐叛逆，长江两岸亿万百姓，怎么能不脱离水深火热而安居乐业呢！

策试试题又认为财富货物的使用必须掌握轻币重币，各方面都有收效，这样才能使国家财物富饶而且百姓富足。臣下我仔细考查，秦始皇统一之后，货币分为黄金和铜线两种，白银不作货币。汉代开始铸造三种白银货币，很快就废止不再流通。说明这个时期通行的货币一直是铜钱，不曾使用白银。唐宪宗有禁止开矿采银的诏令，中央每年的财税收入，有粮食、麻布、绢帛、丝绵以及铜线而没有白银。只是各州府的土贡中有白银，但仍然不作为货币流通。唐朝后期通行银币开始于交州两广地区，到北宋景祐年间下令各路每年以铜钱缴税，福建两广代之以白银，这是用白银代替铜钱的开始。到金朝和元朝，白银越来越贵重而铜钱越来越降价，这全都是由于百姓向官府纳税都纳银的缘故，所以使白银越来越贵重了。古时候讨论钱币制度的人，汉文帝取消了禁止盗铸的诏令，贾谊上书极力劝止。北齐时孔觊建议铸造五铢钱，让各州收买铜。唐朝陆贽说：钱币数量的多少应由官府来控制，应该加大开采铜矿的范围，并严格禁止私采私卖。

这些言论都对制定钱币制度有利。周景王铸造大钱来便利百姓使用,蜀国刘巴铸造大钱使国家财力加强了,这是由于大钱的铸造加工的费用便于核算,市场交易中使用大钱也便于计算。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利,古人这些做法都已收到成效。有人担心私自铸钱的现象难以禁止,却不懂得官府收买铜器之后,铜少了其价格便昂贵了,私自铸钱没利可图自然就不铸了。我大清王朝的户部和工部,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借以达到调整补充财政的目的,确实是好办法。

像以上这些问题:通过兴办学校以达到崇尚儒学的目的,通过整饬军队以达到振扬武力的目的,通过查核舆地之图以达到熟知地势的目的,通过开辟财源以达到使费用小于收入的目的。上至九重云天,下至四面八方,仁义圣贤的事体具备了,帝王的治国之道完善了。臣下我更衷心祝愿皇上像运行的天体一样自强不息,每天都提高道德而永无止境。人才已经成长起来却更乐于办学育人,纪律已经严明却愈加注重讲求武备,国土已经开拓治理却更加重视巩固加强,币制已经健全却仍然关注钱币流通。这样一来则学校培养了贤能人才,士卒弘扬了帝国的威风,山河之状尽在图籍之中,府库存有丰盈的财物。往上去敬迎天赐的吉福,往下使百姓得到普天同庆的欢乐,我们大清帝国的江山万代永存就有保障了。臣下我是刚参加科考的新进贡士,不懂什么是忌讳,甚至会冒犯皇上的尊严,实在是胆战心惊不知死所。臣下我恭谨地特作如上回答。〔贾秀军译〕

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告诸往而知来者。

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莫如为仁。

殿试策问

[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承宝命,抚御兆民,六载于兹矣。仰荷昊穹眷佑,列圣贻庥,兢业救几,日慎一日。每维继统传心之旨,厚生务本之原,理财致用之经,讲武诘戎之略,攸关治忽,宜切究图。兹当金榜抡才,临轩授简,国桢鳞集,爰访嘉谟。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伊古心法治法,传自唐虞。《典》、《谟》所载,皆帝德之隆轨,王谟之懿迹。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三代以下,见知闻知,端在讲学。所以奉执中之训,握建极之原,蕲至于咸五登三之盛者,舍学无由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曾子传《大学》;子思述《中庸》。而《论语》之末简,《孟子》之终篇,皆述统绪之传,以诏来世。宋范祖禹撰《帝学》,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大旨若何?元苏天爵之《治世龟鉴》,明张九韶之《理学类编》,有相发明、足资省览者。可胪举欤?

民为邦本,食则民天。尝观《周礼》之设官,《豳风》之矢咏,以逮《雅》、《颂》所陈《大田》、《良耜》诸篇,妇孺若躬列于旁,宫壶若亲见其事。其风何淳,俗何美也!岂非爱土物而心臧,习勤劳则思善之故欤?积储者,生民之大命也。自汉而后,莫不讲求其法。或云岁有四秋,或云人给二鬴,地利不患不尽,人力不患不勤,而一值眚灾,则鸿嗷满野。周制荒政外,若前史所记发廪弛征,输粟贷种,酌而行之,不在良

有司欤?社仓义仓,欲使筹储借于先,善敛发于后,厥道何从?

古者金有三品,铜为赤金,钟鼎刀剑,皆铜铸也。汉以后用以铸器者渐少,岂铜之多已不如昔欤?汉贾谊言收铜不令作兵器,唐刘秩请禁铜以给钱之用。夫因铜乏而筹铜,除开采外,只有收铜禁铜二策。而或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不胜诛责。然则欲裕铜而不至扰民,果遵何道欤?前代多就矿设冶,往往运钱而不运铜。其法亦可议行欤?顷因滇运稽迟,设局买铜,果何术而能使铜源日裕,无误鼓铸也?

《六韬》有"水战篇",苍兕舟楫,著于盟津之誓,岂水战即始于周欤?汉有"伏波"、"楼船"、"下濑"、"戈船"各将军之号,然仅用之南粤东夷耳。后汉岑彭装战船以破蜀,晋王浚作大船连船以伐吴,唐李靖帅战舰破萧铣,遂屡以舟师奏绩。明舟制尤详,江海各异。载于史志者,盍约言之?夫舟师可进可止。其以舟师进者,何代为优?以舟师守者,何地为要?兹当江淮未靖,现饬粤省艇船剿截。进守之宜,果如何而后能应机制胜欤?

凡此者:崇圣学以端主极,敦本业以劝农功,整圜法以阜民财,饬武备以彰国宪,皆国家思艰之切务,古今御世之鸿模。尔多士学古入官,其有旧闻及所心得,悉著于篇。毋隐毋泛,朕将亲遴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告诉过去的事便知道未来的事。

圣人之道生发养育世间万物,与上天一样高大。

不如倡行仁义。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皇位,安抚治理亿万臣民,至今已经六年了。承蒙上天的保佑,列祖列宗的遗译,皇帝我兢兢业

业,慎重对待天命和危险苗头,日慎一日。只管考虑继承道统和传授心法的要旨,富庶民众重视根本的道理,整理财政节俭实用的办法,讲求武备整饬军队的方略。这直接关系到治乱兴衰,应当认真探讨谋划。值此科考选拔人才之际,皇帝我亲自到此颁布殿试试题,在众多的国家栋梁之中,寻访治国良谋。你们这些贡士们仔细听皇帝我所提出的问题。

古时候的治心方法和治国方法,传自于唐虞时代。《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所记载的,都是帝王美德的宏伟准则,帝王智谋的美好事迹。前代的圣贤与后来的圣贤,其行为的原则是一致的。三代以后,所见所闻的知识都主要依靠学问的讲授。所以说奉行执持中正的教诲,把握建立最高准则的本原,希望达到与三王五帝时代那样的兴盛局面,除了学习没有其它办法。孔子删定《诗经》、《尚书》,制定《礼经》、《乐经》,修改《春秋》;曾子传述《大学》;子思讲述《中庸》。而《论语》的最后一节、《孟子》的最末一章,都是叙述道统的传授源流用以明示后人。宋朝时范祖禹撰写《帝学》,真德秀编著《大学衍义》,其主要思想是什么?元时苏天爵的《治世龟鉴》,明朝张九韶的《理学类编》,其中有互相阐发、值得阅读的见解,可以列举一些吗?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食为民众的头等大事。曾看《周礼》的官职设置,《诗经》中《豳风·七月》的按月咏唱,以及《雅》、《颂》所述《大田》、《良耜》等篇,耕作的妇女儿童就像亲身站在两边,后妃就像亲眼看见农事。这时的世风多么淳朴,风俗多么美好!这难道不正是由于乐于耕桑而内心美好,习惯勤劳而向往善良吗?屯积储存粮食,是百姓生命之所系。自汉代以来,各个时代没有不讲有关办法的。有的说一年有四季,每月每人供应十二斗八升粮食,不怕土地不尽力开垦,不怕农民不勤快,但一旦遇上灾荒,却遍地都是哭泣的饥民。除了周代的救荒制度,像史书所记载的开仓济民缓征赋税,运粮赈灾贷给籽种,根据具体情况而选择实行,不是要靠有关主管部门吗?社仓义仓这类赈灾设施,想先安排好征借储存,以备日后散发给灾民,具体办法该怎样呢?

古时候"金"分为黄金、白银和铜三种,铜称为赤金,祭祀用的钟

鼎和打仗用的刀剑,都是铜铸的。汉代以后用铜来铸造器皿的少了,难道是铜不如过去多了吗?汉代贾谊说官方收铜是为了不让私人造兵器,唐代刘秩建议禁止民间买卖铜以保证官府铸币所用。由于缺少铜,筹集铜的办法除了开矿采铜也只有收铜和禁止买卖两种方法了,但到时候有关命令一颁布,主管部门急于完成任务,百姓由此遭到难忍的逼交催交。那么想使铜的供应充足而又不至于给百姓带来麻烦,到底该遵守什么原则呢?前此各朝大都在有铜矿的地方开采冶炼,往往就地铸成钱运往中央而不直接运铜,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吗?最近由于产铜最多的云南一带运输不畅,便设置机构来收买铜,到底有什么办法能使铜的供应越来越充足,不误铸钱之用呢?

兵书《六韬》有《水战篇》,设有"苍兕"之职掌管战船,记载在周武王伐纣时会合诸侯八百人于孟津的誓词中。这是水战始于周朝吗?汉代有伏波将军、楼船将军、下濑将军、戈船将军,但其所辖战船只在南海和江南使用过。东汉的岑彭设计战船用来进攻川蜀,西晋王浚造大船和布置船队用来讨伐东吴,唐朝李靖带领战舰攻克江陵的萧铣,这就常见有用船队打胜仗的事情了。明朝战船制度很详细,长江和沿海各不相同。记载在史书中的有关内容,可以大致讲讲吗?战船水军可以进攻可以驻守,用战船水军进攻的,哪个朝代最成功?用战船水军防守的,哪个地方最重要?值此江淮一带尚未平静,现在已下令广东的战船予以进剿堵截。进攻防守的策略,到底怎样设计然后才能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崇尚儒学以便端正君主的准则,敦促农桑以便尽力垦耕,整顿币制以便丰裕财政,讲求武备以便弘扬国威,都是国家居安思危的关键任务,古今治理天下的宏伟规划。你们这些贡士博学古代圣贤学说并将进入仕途,有关古代事实和你们个人的见解,全都写在答卷上。不要隐藏也不要空泛,皇上我准备亲自挑选。

翁同和　会试卷三道

翁同和(1830~1904)　字叔平,号松禅,一号瓶庵居士。常熟

(今属江苏)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始则主持科举考试,出任陕甘学政。同治继位后任帝师,在私德院讲读。光绪时为刑部待郎,又为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任要职乃不为名利所诱,对国家之衰败、太后之奢侈痛心疾首,上疏力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极力主战,痛斥投降求和。戊戌变法时是帝党领袖,荐康有为,对促使光绪帝下决心变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革职,回原籍闲居,靠卖书画、朝珠度日,6年后病死。其善诗文,工书法,著有《翁文恭日记》、《瓶庐诗文稿》等。

告诸往而知来者

知不囿于所告,贤者之善悟也。盖往者可告,来者不可尽知。因论境而及《诗》,赐之善悟也,夫子故深许之。且名理之日,出以饷人者,惟此往与来之相寻于无尽耳。其上者质由天禀,明无不照,早洞彻夫前古后今之原,故其量足以断往开来,而不以万殊变也。其次者智以学充,积焉既深,自渐臻夫触类旁通之境,故其诣亦足以彰往察来,而不以一端域也。吾以赐为可与言《诗》,诚以赐今者第论境耳。吾之告亦第论境耳,而赐忽有悟于《诗》,赐之知殆进矣乎。

言必资夫告。理有定则,告焉以示其归;理无尽藏,告焉以引其绪。告以启夫言之机,任小叩小鸣,大叩大鸣,而皆有浅深高下之故。言必待夫知。理在言中,知可以穷其奥;理在言外,知可通其凡。知以承夫告之旨,任闻一知一,闻二知二,而各有会悟感触之几。然而有已告,亦有未告也;有已知,即有未知也。所已告者往也,所未告者皆来者也。所已知者往也,所未知者即来者也。前往则后来,有进境无止境也。彼往则此来,有化机无滞机也。然告之不难,而知之特难,何也?盖非天资之所禀,慧足以过人,断不能以易尽之聪明,特神其领悟;又非学力之所几,真积造于有得,更不能以无端之逆臆,遽测夫精微。

两间名物象数之繁,何莫非往者之过而趋,何莫非来者之接而起,善学者贵得其通耳。一事具一理,往与来可分观也;万事共一理,往与来可互证也。往者不一往,来者亦不一来。本此意以论《诗》,则

即诗言诗，而一诗可作全《诗》观矣；不即诗言诗，而非诗皆可作是《诗》观矣。吾道危微精一之统，何莫非往者之立其准，何莫非来者之绍其传，善学者贵提其宗耳。旋往旋来，往与来环而相生也。即往即来，往与来对而相待也。今所谓往即前所谓来，今所谓来又后所谓往。本此意以论《诗》，则于赐所已言者，言《诗》而知不自《诗》起矣。于赐所未言者，言《诗》而知又不自《诗》止矣。赐而无囿于知也，则虽相契于无言可也。

理解问题不局限于被告知的范围，有才能的人善于领悟。过去的事情可以被告知，未来的事情不可能都知道。由论说具体问题而联系到《诗经》，子贡善于领悟，孔夫子因此深为赞许。到能把道理弄明白的时候，能够提供给人们的，也只是这些关于过去和未来相互连接中所产生的无穷无尽的知识。最上等的人的天资是上天赋予的，像阳光一样没有照射不到的地方，早就看清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道理，所以他们的能力完全可以判明过去的是非并开创未来，而不会因事情复杂而没有主见。次一等的人的智力是靠学习得来的，慢慢地由浅入深地积累，自然会逐渐达到触类旁通的境界，所以他们的见解也完全可以说明古代并推测未来，而不会被某一狭小的圈子限定住。我认为子贡可以与之谈论《诗经》了，确实是因为现在子贡讲的是具体问题；我告诉他也只是具体问题，而子贡骤然间由此领悟了《诗经》的含义，子贡的能力或许更进一步了。

言论要靠传授，道理有了定论就应该传授与人，给人指明那旨归。道理不必保守隐藏，传授与人，让人们了解形成过程。通过传授去启发言论的主动性，任从小的启发引起小的反响，大的启发引起大的反响，这是理解程度有高低深浅的缘故。言论需要知识，道理存在于言论之中，通过知识可以弄懂一切深奥的道理；道理又存在于言论之外，知识可以把所有的方面都贯通起来。知识是听到一便知道一，听到二便知道二，这是人们各有各的体会感觉的缘故。然而有已经告知的，也有未曾告知的，这就有的知道，有的还不知道。所谓已经告知的是过去的事情，所谓未曾告知的都是未来的事情。过去的已

经过去而未来正在来临,只有进取的方向而没有停止的标志;这些事情已经过去而那些事情正在发生，只有变化的机缘而没有停滞的机缘。然而告诉别人并不难,理解却很难。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天资如果不是天生的过高，智慧足以超过常人，肯定不能用容易用尽的聪明,达到极为神妙的领悟;学力如果不是达到了应有的程度,积累的智慧不是达到了独有所得,就更不可能用没有根据的随意猜测,很准确地掌握精粹细微的道理。

天地之间名物象数那样繁多，哪一种不是过去的东西而应上前询问的,哪一种不是未来的东西而应接着提出的?善于学习的人最可贵的是能把过去和未来打通。一件事情有一个特有的道理，过去和未来可以分开观察;所有的事情又有一个共同的道理,过去和未来又可以互相印证。过去的事情并不是过去一次，未来的事情也并非来临一次。用这个原则来讨论《诗经》,就诗论诗,由一首诗可以观察整部《诗经》;不就诗论诗,即使不是诗,也都可以把它当作《诗经》的诗来看待。我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道统,有什么不是过去的事情确立起准绳，又有什么不是未来的事情承接传授?善于学习的人最可贵的是能够抓住根本。事情随时在过去又随时在来临,过去与未来循环出现;事情很快过去了又很快来临了,过去与未来相对分开。今天的所谓过去也就是以前的所谓未来，今天的所谓未来又是以后的谓过去。用这个原则来讨论《诗经》,由子贡已经讲过的意思可知,他谈论《诗经》而所理解的内容又不源于《诗经》;由子贡所未讲出来的意思推测,他谈论《诗经》而所理解的内容又不限于《诗经》。子贡没有受已有的理解的限制,那么在无言之中与孔老夫子思想契合也是可以的了。

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圣道无外,物与天皆在道中矣。盖物生于天,惟道有以发育之,则其峻不极于天乎?道之大而无外如此。且盈天下皆物也，顾物之生,天为之;天之所以生物,道为之。物日处于天之中,实日处于道之

中。天能出于物之外,不能出于道之外。则无在非物,无在非天,即无在非道。此其义,可于俯察仰观间得之。大哉,圣人之道!

夫圣人者,尽物之性,而与天参者也。道起于最初,两仪四象灿著者,皆后起之端。道本有运于无极之先,而莫可指名者也。道无能名,则凡可以区类求者,皆不足以尽道矣。道行于不息,典谟爻象共见者,多偏举之词。道固有充于太虚之表,而莫能际限者也。道无所际,则凡可以测量得者,举不足以尽道矣。洋洋乎其殆动无方,静无体,而体物不遗者乎?物之蒙也,性保于太和,惟道有以正物之命。其发也,道为之充周也。物之壮也,理期于大顺,惟道有以类物之情。其育也,道为之根极也。极纷纭蕃变之数,圣人悉为之节宣畅茂,而不使一失其所,道之发育万物有如此。其殆迩不遗,远不御,而配天立极者乎?造物者天,而天每不能自达,惟道能先天以立心,道之峻与天同其体也。成物者天,而天亦时有所穷,惟道能代天以宣化,道之峻与天同其用也。极清虚沕穆之境,圣人独与之裁成辅相,而不使或越其围,道之峻极于天又如此。

且夫觉世牖民之责,其开物而成务者,皆天所笃生耳。天生物而天有权,天得圣人而天转无权。言天则万物皆同此天也,言道则物与天皆同此道也。闻道以言物,其势涣,有道以宰之,斯无涣之非萃矣;离道以言天,其理虚,有道以弥之,斯无虚之非实矣。天者,物之所以始资;道者,物之所以曲成。道与天,不两化哉!且夫别声被色之伦,其群分而类聚者,亦物中之一耳。天生人于物之中,天特生圣人于人之中。物在斯道在,即物即道也;道在斯天在,即道即天也。分言之,则万物各具一天,凡见天之处,皆见道之处矣;合言之,则万物同具一天,有无物之处,必无无道之处矣。物者,天之所以大生;道者,天之所以不已。道与天,不一而神哉!道之大而无外如此。

圣人掌握的“道”无例外地包含一切,万事万物及其主宰者“天”都包含在“道”之中。万事万物是由上天派生的,只有“道”可以形成养育万物,它那高大还不到达天边吗?“道”的广大是没有什么可以在它范围之外的。然而满天下所有都是具体的事物,追究事物的生成,

是上天的作用;上天之所以生成万物,是"道"的作用。万事万物每时每刻处在天地之中,实际是每时每刻处在"道"之中。上天能超出具体事物之外,不能超出"道"之外。无所不在的无非是事物,无所不在的无非是上天,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无非是"道"。这层意思可以在上下观察之中领悟到。真是神圣伟大啊,圣人讲的"道"!

圣人是认清了万物本性而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人。"道"形成于万事万物之前,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都是后来派生的。"道"本来是运行在形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即"无极"之前的,而且是没有确切名称的。"道"不能像一般事物那样有名称,凡是可以分类寻找的,都不能用来概括"道"的含义。"道"在永无停息地发挥作用,《尚书》中《尧典》和《大禹谟》,《周易》中爻辞和象辞,这些人们都看到过的,多是有所侧重的说法。"道"当然是存在于茫茫天地间的,但不能规定其规模。"道"不能像一般事物那样有边际,凡是可以测量出范围的,罗列出来并不能概括"道"的特征。"道"那样广大,近似于运动起来没有规则,静止下来没有形体,对任何具体事物不是都体察得毫无遗漏吗?万物刚刚形成的时候,其本性是由阴阳会和的元气决定的,只有"道"有着调整万物本性的使命。万物的产生,是"道"为它们充实周全。到万物壮大的时候,其原理是要达到十分顺畅,只有"道"有着把万物之情进行归类探究的本领。万物的发育,是"道"为它们充当根基和极限。穷尽纷纭变化的过程,圣人让每个环节都顺畅兴盛,不让一个环节出毛病。"道"产生养育万物的过程就是这样。它恐怕是近处不遗漏,而远处不统领,配合上天确立准则的吧?造就万物的是上天,但上天常不能单独起作用,只有"道"能在上天的前面先为万物确立其本性,"道"的高大与上天共同为主体。形成万物的是上天,但上天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道"能代表上天疏通教化,"道"的高大与上天共同起作用。极尽清静空旷深奥细腻的境界,圣人唯独辅助天地裁制成就万事万物,使万事万物不超出既定的规范,"道"与上天一样高大又体现在这个地方。

况且肩负为世人觉醒开启茅塞的职责,发现万物的规律而成就事业的人都是上天特意造就的。上天生成万事万物而上天有特定的

标准，上天造就了圣人而上天就变得没有自己的标准了。论及上天则认为万事万物都与上天相同，论及“道”则认为万事万物都与“道”相同。略知一点“道”就去谈论事物，其内容杂乱；用“道”来规范，就没有杂乱的毛病而全都荟萃了。离开“道”去谈论上天，其理论虚玄，用“道”来弥补，就没有虚玄的毛病而全都充实了。万物之所以始生是因为有天，万物之所以长成是因为有“道”，“道”与上天不是两相分离的吗！况且声音、颜色各不相同的众物，所谓物以群分、人以类聚，都算万物中之一类。上天把人安置于万物之中，上天又故意把圣人安置在众人之中。万物存在则其中的“道”就存在，也就是说事物就是“道”；“道”存在则上天就存在，也就是说“道”就是上天。分开来讲，则万物各有自身的领域，凡是能看到天的地方，都是能看到“道”的地方。合起来讲，则万事万物共同拥有一个上天，有不存在事物的地方，一定没有不存在“道”的地方。有上天则万物就可以茁壮成长，有“道”则上天就可以永恒存在，“道”与上天不是合一而神圣的吗？“道”的高大而无所不包就像这样。

莫如为仁

人不为仁，因其耻而引之焉。夫人惟不为仁为可耻耳，耻不仁而犹不为仁可乎？孟子引之使进于仁曰：吾人以藐然之身，并三才而贵万物，亦惟仁而已矣！仁也者，圣人安之，贤人复之，下此则舍而失之。必有以愧厉其心，而后可驱之致之。驱之为何？曰耻，耻为人役，耻其不仁也。何以知不仁之可耻？以其心之本有仁也。心本有仁，何以不仁？以其不为也。不为则其志日昏，以耻提之，久安之心于以一动，动则思迁，人之情也。不为则其力日弛，以耻迫之，将衰之气有以复振，振则思奋，亦其势也。

如是而不为仁，舍其固有之良而妄欲有为，皆作伪也。漓其所受之中而纷于所为，皆歧趋也。愧其所为之见弃于人，不愧其所为之见绝于天，是再辱也。恶其所为之侪于凡庸，不恶其所为之远于圣贤，是终废也。试问事之切于身者，孰如仁？理之具于心者，孰如仁？足乎

内而皆备者，孰如仁?得于天而至贵者，孰如仁?智者知此者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智不本于仁，智流于凿。吾人末路之纷纭，恒以私智滋其扰。则寓精明于浑厚，欲为智先为仁。礼者体此者也，长人所以体仁，嘉会足以合礼。礼不本于仁，礼失之伪。天下志行之不端，每以似礼失之谄。 则辨品节于德性，欲为礼先为仁。义者宜此者也，仁者天下之表，义者天下之制。义不本于仁，义近于偏。自来贤豪之失足，恒以假义误其趋。则本利用以崇德，欲为义先为仁。

且也仁为天德之全，耻即天心之见。以其见端，复其全体，事之便莫便于此。仁为未发之性，耻即已发之情。由其所发，溯其所存，机之捷莫捷于此。为仁则爵之弃者修，为仁则宅之旷者归。为仁则智生，为仁则礼复，为仁则义行。如是而犹不为仁，必其不知耻者也，必其甘为人役者也。夫君子之道，协吉于悔；庸人之过，复善于迁。终履者祥，克念者圣。人亦何乐而不为仁?人又何惮而不为仁乎?

人不按仁义行事，是一种耻辱，所以由此引发了议论。人只是不按仁义行事才算耻辱呢，那认识到这种耻辱而仍然不按仁义办事就可以了吗?孟子讲了这种情况并向仁义境界引导说:我们人以藐小的身躯，集天地人的优势于一身，并且在世界万物中最为高贵，也只是靠有仁义啊!所谓仁义，圣人习以为常遵行，贤人随时注意实行，圣贤以下的人则常丢弃仁义。必须让其内心切实感到羞愧然后才促使其按仁义办事。如何去促使呢?是强调耻辱，因被人役使而感到耻辱，从而为自己不行仁义而感到耻辱。怎么能感到不仁义是可耻的呢?是因为其内心本来存在仁义。内心本来存在仁义，为什么不按仁义办事呢?是因为他不愿这样做。不这样做则其志向越来越困惑，用耻辱来提醒，使其习已为常的心情为之一惊，吃惊必然要变化，这是人之常情。不这样做则其气力越来越松弛，用耻辱来驱使，使其似乎衰颓的气力再次振作起来，振作必然要奋发，这是必然趋势。

像这样还是不行仁义，丢弃原有的仁义良知而想为所欲为，都不是真诚的。渐渐地疏离天赋的中正标准而随波逐流，都是走上了歧途。为自己的行为被人们所唾弃而羞愧，却不为自己的行为被上天

所禁绝而羞愧，是更进一步的耻辱。为自己的行为与平凡庸俗之人相同而恼羞，却不为自己的行为照圣贤差得很远而恼羞，是彻底变坏了。试问在与自身关系最为要紧的事情中，哪个比得上仁义呢？在心灵最需要的道德精神中，哪个比得上仁义呢？自身生就的各种完备的本能中，哪个比得上仁义呢？上天赋予的各种高尚的习性中，哪个比得上仁义呢？聪明的人懂得这一点，在智与仁的关系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聪明不以仁义为基础，聪明就会流为凿空。我们在最终所出现的一些纠纷混乱，总是由个人的小聪明引起的麻烦。应当把精明容纳在纯朴厚道之中，想发挥聪明先实行仁义。讲礼的人体悟这一点，为人君长用来体现力行仁义，美德聚集都能合乎礼仪。礼仪不以仁义为基础，礼仪就流向虚伪。天下人的志向行为中的不良倾向，常常是貌似礼仪而实际是虚伪献媚所导致的。应当在礼仪规范中来识别人的品质，想奉行礼仪先实行仁义。讲义的人适合这一点，仁义是天下人的道德标准，义气是天下人的行为标准。义气不以仁义为基础，义气就会走向偏激。自古以来的贤良豪杰之所以失足，多是被错误的义气引入了歧途。应该以物尽其用来崇尚道德，想讲义气先实行仁义。

况且仁义是人类天生的道德的主体，耻辱是人类心灵固有的天良的发现，利用其耻辱的发现归复完善的道德本性，事情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当的了。仁义是人类自身蕴含的本性，耻辱是人类表现出来的情绪，由其所表现出来的耻辱感中找回其原有的仁义本性，机缘再也没有比这更快捷的了。行仁义能使抛弃天爵的人重新修养好自己，行仁义能使内心中正没着落的人把它收回来，行仁义能产生智慧，行仁义能恢复礼仪，行仁义能讲究义气。懂得这些却仍不行仁义，一定是不知耻辱的人，一定是甘心情愿被人驱使的人。君子为人处事的原则，有所悔悟就与吉庆融为一体；平凡人有失误，由于改正而得以完善。终生实行仁义的人平安吉祥，克制私心杂念的人如同圣贤。行仁义如此美好，人们何乐而不为？人们又有何顾虑而不为呢？

覆试卷一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有全量，惟大人能急先务焉。夫明明德，《大学》之所先也。备举其目，亦明明德之条理有如是耳。且自功名之士出，三代下始有学术治术之分。古人无是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则明明德于天下而已矣。明明德，古人之全功，明明德于天下，古人之大业。欲明明德于天下，古人之宏愿。欲天下之景铄于明，必先使一国近光于明。国者，天下之会，则治国要焉。欲一国丕变于明，必先使一家祓濯于明。家者，国之式，则齐家要焉。欲一家蒸乂于明，必先使一身纯熙于明。身者，家之主，则修身要焉。

夫天下而国而家，身以外之事，明明德之效也。至于修身，身以内之事，明明德于天下之枢也。然而身不自修也，身丽于形，心运于神，形常役于神。先正其心，心不倚则明。然而心不遽正也，心藏于静，意萌于动，静每淆于动。先诚其意，意无妄则明。然而意不易诚也，意杂于伪，知鉴其真，伪或误为真。先致其知，知不蔽则明。而致知之学，则在格物。明德者，天之所赋，物者理之，散于事而皆备于吾德之中。内之身心意知皆物也，外之天下国家亦物也。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人君格物之学也。吾之致知，事事不遗于天下；吾之格物，必事事实验之天下。格物之说歧而圣学昧，后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可不必更释格物致知之义。

向天下昭示完美的德性包括各方面的内容，只有帝王才能最先抓住其中的关键。所谓昭示完美的德性，在《大学》中是最首要的。经中列举了八项完整的步骤，也说明了昭示完美的德性的条理就是这样的。自从有了讲求功名的士人，三代以后开始有做学问的学术与

治理天下的权术的区分。三代以前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当时上天保佑着众人并为众人树立起统治者，树立起指导者，也只是要求向天下昭示完美的德性而已。昭示完美的德性是古人的全部职责，向天下昭示完美的德性是古人的宏伟事业，想向天下昭示完美的德性是古人的最大心愿。想让天下一片光明趋于完美，必须先让一"国"接近光明趋于完美。所谓"国"，是天下的中心聚集之处，所以治理"国"是重要的。想让一"国"的陋习明显改变趋于完美，必须先使君王家庭经过庄重整肃趋于完美。家庭是"国"的法式，所以全家德性完美一致是重要的。想让君王家庭所有成员的德性都趋于完美，必须先使君王自身纯洁，光明磊落趋于完美。君王本人是家庭的主宰，所以自身的修养是重要的。

从天下到"国"再到家庭，自身以外的事情，是昭示完美的德性的效验；再扩展到自身的修养，自身修养之事，是向天下昭示完美的德性关键所在。然而自身不加强修养，躯体附着于外形，心灵的活动靠精神，形体就常受精神的支配。先要端正内心，内心不偏颇才能完美。然而内心并非能迅速端正，内心活动隐藏于静态之中，意念产生于动态之中，静态常与动态相混杂。先要使意念真诚，意念不狂妄才能完美。然而意念并不容易真诚，意念掺杂虚假，知识能鉴别意念是否真诚，虚假或许会被误认为真诚，首先要充实知识，知识不搞错才能完美。而充实知识的办法则是研究具体事物。所谓完美的德性，是上天赋与的，具体事物都体现它，散布于具体事物之中并且存在于我的品德之中。自身内部的身躯、心灵、意念和知识都是具体事物，自身外部的天下、"国"和家庭也是具体事物。讲明修身之法，识别治国人才，审察国家体制，体察风土民情，是君王研究具体事物的学问。我去充实知识，不能对一件件具体事物在天下有所遗漏；我去研究具体事物，必须通过一件件具体事物在天下予以验证。对怎样研究具体事物的解释不准确导致了圣贤学说含义的不明确，后来想昭示完美德性于天下的人，似乎没必要再重新解释"格物致知"的本义了。

〔贾秀军译〕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色难有事。

今夫天。

焉能使予不遇哉?

殿试策问

[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诞膺洪祚,荷上苍之申佑,承列圣之诒谋,劼毖深宫,日慎一日。勉思传心典学之谟,课吏训诚之治,励品崇儒之要,诘戎讲武之经。冀与中外臣工,致上理于大同,登斯民于衽席。兹当临轩发策,博采周谘,尔多士其敬听之。

圣学之原,在于存诚主敬。唐虞传心,尚矣。所谓"危微"者何辨?"精一"者何解?"执中"者何在?禹曰安止几康,汤曰圣敬日跻,而即继之曰丕应徯志,曰式于九围。能申明其义欤?文王克厥宅心,武王不泄不忘,其道本无异同。见诸《诗》、《书》者孰切?成康以后,历汉唐宋迄于元明,英君谊辟,岂无一言一行与唐虞三代相符合!能指其实欤?朱子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心法即治法之原也,昔圣微言,曩哲粹语,有可与经传相发明者,其绌绎而细陈之。

唐虞官人首言载采,成周分职重戒惟勤,"八法"、"八成","六叙"、"六计",载在《周官》。能晰言之欤?汉史言:综核名实,吏称其职。然上求实效而下务虚名,徒以拘守绳墨为慎,以奉行条律为勤,岂董正治官之本意欤?夫询在事,考在言,而克知三有宅,灼见三有

俊，则皆课之于心。意者事与言固必矢以一诚，而后足称忠荩欤？汉扬雄著二十五《官箴》，马融著《忠经》，宋真德秀著《政经》，其言亦有可采者欤？朕权衡黜陟，一秉至公。上以诚待下，则下当以诚事上。内外大小臣工，岂徒以奉令承教遂为无忝厥职欤？

士也者，民之坊也。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列士林者，非以砥厉廉隅为本务乎？古者宾兴贤能，郑注谓兴贤若今举孝廉，兴能若今举茂才。汉法取士犹为近古，故其时吏有循良之目，民鲜偷薄之风。至唐乃有明经、进士等科，禄利之途既开，徼幸之心斯起。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岂容走吏冒进窃取功名！言之何笃切欤？夫为士尚有亏儒行，他日服官，其能恪守官箴乎？察行既起别居之谣，考文又蹈虚车之诮。果何术而能使士行克敦，人才蔚起乎？

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整军经武，所以保大定功也。三代以后，兵民初分。汉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屯。唐初设府兵，一变而为矿骑，再变而为方镇。宋兵有禁、厢、蕃、乡之目，元立五卫，明设京兵边兵。其制孰为尽善？至于训练之法，汉有都肄，唐有讲武，宋有大阅。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为切于实用。所称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者，能阐其义欤？夫一兵必期得一兵之用。其何以选精锐，汰老弱，简器械，申纪律，使三军之士皆足以备干城之选而迅奏肤功哉？

凡兹四事：迪德以端宸极，课绩以励官箴，植品以正儒修，整师以肃戎政。经邦要道，莫切于斯。尔多士拜献先资，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表情忧愁是有心事。

如今的上天。

怎么能让我不得到重用呢？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了帝位大业，接受了齐天洪福，仰承上天的保佑，承蒙列祖列宗的智谋，在宫中谨慎处事，日慎一日。用心思考心法传授和坚持学习的谋略，监督官吏诚实为政的办法，奖励美德崇尚儒风的关键，整饬武备讲习兵法的原则。希望与朝廷内外的臣民，一起把治理带入大同的最高境界，百姓安居乐业。在此发布制策试题，博采众议广泛咨询。你们这些贡士们都仔细听好。

圣贤学说的原则在于保持真诚注重恭敬，唐帝虞帝传授心法，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所谓“危微”应当怎样分辨？“精一”作何解释？“执中”的含义何在？大禹说不要轻举妄动，要居安思危，成汤说圣明恭敬日益增多，接着又讲要使天下响应，安静承受天命，使天下九州有规章。能讲清楚其含义吗？周文王克制自己内心欲望，周武王不放纵不忘乎所以，他们的原则本来没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在《诗经》、《尚书》中见到的有关记载，要数哪个更深切呢？从周成王，周康王以后，历经汉朝、唐朝、宋朝，一直到元朝、明朝，其间的英明君主，哪能没有一言一行正与唐虞三代相符合的呢！能指出那实迹来吗？朱熹认为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恭敬之意；从中正平和、天地定位、万物化育，一直到圣贤神明的教化功效，关键不外乎真诚之意。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把诚意和正心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明朝人邱浚又补充了《审几微》一节。修身养性之法是治理天下之法的本原，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以往哲人的精粹语录，有可以与圣贤经典及后人传注相互印证发挥的，对此分条缕析并详细讲述一下。

唐虞时期任命官吏首先讲究实际业绩，西周时期分官设职重视戒律强调勤奋。所谓“八法”、“八成”、“六叙”、“六计”，载于《周礼》之中，能说明一下吗？汉代史书说：把名与实结合起来审核，才能使官吏真正称职。但上面讲求实效而下面追求虚名，只是以严格遵守已往成规为谨慎，以忠实执行朝廷条例为勤政，这难道是纠正失误整饬吏

治的根本内容吗?询查依据事实,考核依据言论,真正能了解担任司法、行政、民事三类官职的人,确实能看出在这三类官职上能供职的人,这说明考核都侧重于内心,想来行为与言论必须以真诚为标准,而后才能忠于职守吧?西汉人扬雄著有二十五篇《官箴》,东汉人马融著有《忠经》,宋人真德秀著有《政经》,他们的言论有可以采纳的吗?皇上我掌握官员的升贬,用心极为公正。上面以真诚对待下面,下面也应当以真诚事奉上面。朝廷内外大小官吏,难道只是以奉行政令施行教化作为无愧于所任官职的标准吗?

士人是民众的榜样。董仲舒说:摆正了仁义便不谋求私利,明白了原则便不计较功效。列入士人之林者,不是应当以严格磨练端庄的品行为其根本任务吗?古时候曾经"宾兴贤能",汉代人郑众注说所谓"兴贤"相当于今天的举孝廉,"兴能"相当于今天的举茂才。汉代选士任官之法接近古代之意,所以那时候官吏有守法善良的名声,民众没有苟且浅薄的风气。到唐朝有了明经、进士等科举名目,通向利禄的道路开通了,侥幸获胜的念头也便出现了。宋太宗说科举取士若干等级的设置是为了优待士人,岂容打杂人员窃取科举功名!为什么说得这么诚挚深刻呢?作为士人尚且不能完全按儒学教诲去做,将来当官的时候他们能遵守为官的守则吗?审察其行为已经有了类似于当年魏晋孝廉父母在而分家析居的不孝传言,考察其文才又落入了北宋周敦颐装饰空车摆样子那样的讥诮。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使士人的行为敦厚、人才蓬勃出现呢?

军队用来威慑天下,实际上也就是用来安定天下。整顿军队讲求武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大业和国家安定。三代以后,兵与民开始分开,汉代在郡国设有材官地方兵,京师长安有南北军驻守。唐朝初年设府兵,首先由府兵演变为召募性质的矿骑,继而演变成军阀割据的藩镇兵。宋朝兵制有禁军、厢军、蕃兵和乡兵等名目,元朝设有前后左中右五个卫,明朝设有驻守京师的京兵和守卫边地的边兵。这些制度哪个是最好的?至于训练的方法,汉代有总阅演习武备的都肄制,唐朝有讲习兵法的讲武制,宋朝有定期检阅的大阅制。明人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是符合实际用途的。书中所说的一练伍法,二练

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领，能解释一下其含义吗?有一个士兵必然希望能得到一个士兵的用处。该怎样挑选精锐，淘汰老弱，检验装备，严明纪律，使全军士卒都能够有卫边护国的才干而且早传捷报呢?

总共这四个问题：宏扬道德以肃正皇权，考课政绩以整肃吏治，树立品级以促进修养，整饬军队以严肃军政。治理国家的措施没有比这更要紧的了。你们这些贡士们请献上事先所谋划好的个人建议，不要空泛也不要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孙家鼐　殿试对策

孙家鼐(1827～1909)　字燮臣，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咸丰九年(1859)状元。累官至工部、礼部尚书，文渊阁、武英殿大学士。其思想趋向新潮，参与戊戌变法，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办报馆，并亲自组建书局，创设京师大学堂；还兴办实业，创办纱厂、面粉厂、洋灰厂。生性谨慎，行为拘谨无过失，办事公正，声誉颇高。

臣对：臣闻建极者敛福之原，知人者安民之本，学古者入官之要，整军者制胜之资。载稽往籍，《易》占进德，《书》纪奋庸，《礼》重上贤，《诗》歌振旅。古帝王握镜临宸，执枢斟化。以勤念典则逊敏昭也，以励赞襄则明良会也，以宏乐育则陶淑周也，以诘戎兵则承平奏也。莫不本宵旰勤劳之实，以握天人交应之符。用是无怠无荒，圣功裕焉；若时若采，庶绩熙焉；灼知灼见，英才奋焉；有严有翼，军政修焉。渊乎铄哉!所由萝图席瑞，松栋延禧，颂咸登而跻仁寿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昭圜矩，治肃堂帝，性雅化以作新，播威声于挞伐。固已三无敬奉而一德交孚，八恺偕升而六师允饬矣。乃圣怀冲挹，蓂菲无遗，深惟久治之规，弥切迩言之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修己、用人、举贤、肄武诸大端。臣之愚昧，何足以赞高深?顾念泰山峻极不辞土壤之微，沧海渊深尚纳涓流之细，敢不勉就平日所诵习者，以效先资之拜献乎!

伏读制策有曰:圣学之原在于存诚主敬,因备及夫唐虞三代心法之传。此诚继天立极之隆轨也。臣案尧舜传心,皆言允执,而危微精一,命禹加详。盖以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危殆而不安;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微妙而难见。必察之以精,守之以一,而后执中之治以成。然精一之功,统于诚敬。尧之文思安安,而冠以钦明,钦即敬也。舜之浚哲文明,而归于允塞,塞即诚也。文命敷四海而祇承于帝,早括《禹谟》;帝命式九围而圣敬日跻,足赅《汤颂》。四诗首及文王,实贯以缉熙敬止;九畴访于武王,莫要于皇极居中。以至成曰敬之,康曰敬忌。虽安勉不同,考之《诗》、《书》,若合符节。三代而下,若汉光武之通《尚书》,唐太宗之撰《帝范》,宋理宗之制《道统赞》,元仁宗、明孝宗之留心《大学衍义》,尤为好古。朱子以《大学》始终不外乎敬,《中庸》枢纽不外乎诚。真德秀《大学衍义》以诚、正为二目,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存养之功,完天理之本体;省察之力,遏人欲于将萌。所以发明圣学者至矣。皇上宥密殚心,时几敕命,所以醇洪畅之德而丰茂世之规也。

制策又以权衡黜陟一秉至公,因详求夫询事考言之法。此诚董正治官之至意也。臣案唐虞官人,成周分职,其世虽异,其道则同。八法治官府,即《虞书》之六府允治也。八成经邦治,即《虞书》之百工允厘也。六叙正群吏,六计弊群吏,即《虞书》之百揆时叙、三德日宣也。古来圣主贤臣千载一遇,朝廷正而百官正,岂以苛察为明哉!亦相待以诚而已。自后世务为文法,以拘守绳墨为慎,以奉行条律为勤。若汉宣帝好尚刑名,综核名实,虽一时吏治之盛,如黄霸治颍川,龚遂治渤海,赵广汉治京兆,尹翁归治扶风,皆能名称其职;然而群邪未去,卒至诛戮。韩、杨、赵、盖诸贤择术不审,功过相半,吕祖谦论之详矣。汉扬雄二十五《官箴》偕《法言》并著,马融十八章《忠经》仿《孝经》而成。宋真德秀采集经史为《政经》一卷,与《心经》表里。以雄之仕新莽、融之诬李固,视德秀人品悬殊,然其言皆有可采。要之,元首股肱联为一体,上以诚待下,下当以诚事上,非可徒求之奉令承教间也。皇上恭己垂裳,抚辰凝绩,大小臣工孰不谨官常以襄郅治哉!

制策又以士者民之坊,当以砥厉廉隅为本务,而因综论夫取士之

法，以期拔擢真才。臣案，《周礼》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宾兴之，乡大夫考其德行道艺而献贤能之书，由此论定后官，俊乂升焉。盖教之于未用之先，始用之于既教之后，是以人才盛而吏治隆也。至汉文帝始举孝廉，武帝始举茂才，其后又定辟召之法，与科举并行，犹有乡举里选遗意。唐之取士，其科有六，惟明经、进士二科独盛。利禄之途既开，徼幸之心斯起，不逮两汉远甚。宋初设制举科，真宗增为六科，仁宗增为十科。后司马光请立十科，朱子请立七科，皆建议未行。宋之得人以进士为最，其由策论、诗赋登第为名臣者，不可胜数。善夫宋太宗之言曰：科举所以待士，非可容走吏冒进窃取功名也。夫儒行有亏，未有能官箴恪守者。自选举变而为辟召，辟召变而为诗赋，别居之谣、虚车之诮，积习相沿，议者遂欲复成周之法。不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诚使道德一而学校修，黜陟明而官方叙，即谓科举之法与成周比隆可也。圣世辟门吁俊，稽古右文，运大钧而开元模，固已教思广被矣。

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实所以安天下，而因论夫整军经武、保大定功之制。臣案古者寓兵于农，三代以后兵民初分。汉置材官于郡国，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犹有井田遗意。唐分天下为十道，始置府兵。无事则督以力耕，不烦召募，与汉制同，最为近古。其后改为召募，名曰矿骑，而府兵之法坏。其后京师徒有虚额，强兵悍将分布天下而方镇之势成。宋惩藩镇之失，制兵之目有四：宿卫曰禁兵，州镇曰厢兵，内属部落曰蕃兵，士民应募曰乡兵。无事而食，其费甚巨。元立五卫，以总宿卫。明立京兵以卫京城，边兵以卫各边。其后军政不修，兵皆不振。此历代兵制，所以不及两汉也。然兵制盛衰，视乎训练之勤惰。若汉之都肄、唐之讲武、宋之近郊大阅，立法之密同，玩法之弊亦同。惟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练伍、练胆、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将诸法，行之无弊。诚使命将得人，精锐选而老弱汰，器械简而纪律申，有使臂使指之形，有同泽同袍之志。师中协吉，元老壮猷，于以展鹰扬之才，奋虎贲之勇，何难迅奏肤公哉！圣朝文德诞敷，武功震叠，天威雷奋，露布风驰，洵绥怀盛绩也。

若此者：本身以作其则，考绩以亮其功，劝学以储其才，教战以娴

其律。仁圣之事既赅,而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本励精图治之诚,臻锡羡延洪之庆。性量已纯而更深兢业,官常已懋而更示激扬,胶庠已盛而更树风声,韬略已颁而更精简阅。于以迓鸿庥,扬骏烈,星辉云灿,赓复旦之光华;镜清砥平,巩无疆之宝祚。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聚集福运的基础,知人善任是安抚民众的根本,学习古制是入官任职的关键,整顿军队是克敌制胜的依凭。考察以往的经书,《周易》测算君子进德的吉兆,《尚书》纪录勤勉供职的事功,《礼记》重视礼贤下士之举,《诗经》歌颂威武凯旋的军旅。上古时候的帝王临朝称制能心如明镜,处理政事能抓住关键。通过经常考虑学习使谦逊聪敏的品德更为突出,通过奖励辅佑之功使明君贤臣融为一体,通过宏扬礼乐教育使贤惠善良更为完美,通过整顿军队则各地奏报太平。没有不用昼夜辛劳的行为,以求把握顺应天意民心的良机的。用这些方法,不松懈不荒废则治功越来越显赫,惩戒又办事则政绩越来越兴盛,有真知有灼见则英才越来越奋发,有紧凑有缓和则军政越来越整肃。常此以往神圣光明,张列图籍而囊括起祥瑞,殿柱生出青松而延布吉福,臣民一起歌功颂德而步入仁德长寿的境地,就是靠这样做啊!

敬思皇帝陛下,申饬天地规矩,治理整肃朝廷百官,弘扬崇尚教化并培育新人,在整治讨伐中扩大朝廷的声威,已经是敬奉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而那纯正的德性万人信服了,像传说中高阳氏的八位才子式的人才全部入仕任官而且军队将士整饬一新了。但皇上谦逊大度并虚怀若谷,纤细无遗,深入思谋长治久安的办法,极为重视审听身边人的言论,把臣下我等召进朝廷,策问修身、用人、举贤、练兵等大事。臣下我很愚昧,怎么有能力提供高深的见解?但想到泰山那样高峻无比尚且不弃微微尘土,沧海那样渊深无底尚能容纳涓涓细流,怎么能不努力把平时所诵习的东西,当作事先谋划好的个人建议敬献给皇上呢?

跪拜敬读制策试题中说：圣贤学说的原则在于保持真诚注重恭敬，因而讲到了唐虞三代整治内心之法的传授。这真是承继天意建立准则的最重要的途径。臣下我认为，尧舜的传授心法都是讲执守中正，而人心危险，道心隐微，要精纯专一，让禹进一步解释了。因为人心生在个人的躯体中，危险而不安分；道心产生于性命的正气之中，细小微妙难以发现。必须精纯观察，坚守专一，然后执中的治理才能形成。然而精纯专一的功夫包括在真诚恭敬之中。尧文雅大度，前面要添上“钦明”，钦也就是恭敬的意思；舜聪慧文明，被总结为“允塞”，塞也就是真诚的意思。大禹恭敬承奉帝舜而广泛施布文德教化，早被收录在《尚书·大禹谟》之中；商汤规范天下九州而且越来越贴近圣明恭敬的境界，足以概括在《诗经·汤颂》之中。《诗经》中的风、大雅、小雅和颂四者首先讲到周文王，实际贯穿着学问大放光明的意思；周武王寻访九种治理之法，最重要的莫过于将最高准则放在中心位置。至于周成王讲恭敬介入，周康王讲恭敬有所避讳，虽然就安分和努力而言有所不同，但对照《诗经》、《尚书》的意思，符合若节。三代以后，像东汉光武帝通检《尚书》，唐太宗编撰《帝范》，宋理宗编制《道统赞》，元仁宗、明孝宗用心读《大学衍义》，最为崇尚上古圣贤。朱熹认为《大学》自始至终所言不外乎恭敬，《中庸》一书的核心不外乎讲求真诚。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把诚意、正心分为两部分，明朝邱浚又补充了《审几微》一节。存诚养性的功夫，可以使天理的本体更加完善；省悟内心体察事物的功力，能够把欲望遏制在萌芽状态。发明圣贤学说真是达到极点了。皇上思考周密殚心极虑，慎重对待苗头和天命，这正是弘扬纯正美德并且发展太平盛世的规则。

制策试题又认为掌握官吏的升贬完全出自公心，所以详细寻问查访官吏行为考察官吏言论的办法。这完全是厘正规范整顿吏治的迫切意愿。臣下我认为，唐虞时代任人做官，西周时期分设官职，其时代虽然不同，其原则却相同。用《周礼》所记管理百官的八种办法来约束官府，也就是《尚书·虞书》所记述的木、火、土、金、水和谷物收藏相互配合之法。用《周礼》所记述的官府处理政务的八种成规来规范地方政治，也就是《尚书·虞书》所记述的所有官吏得到厘正的

办法。用《周礼》所记述的官府六种等级秩序来约束所有的官吏，用《周礼》所记述的六条标准来评判所有官吏，也就是《尚书·虞书》所讲的百官定时述职和每天都要宣明宽厚又严肃等三种美德。自古以来圣明君主与忠良贤臣的默契配合千载难有一遇，朝廷中的风气正了百官的风气必然也就正了，何必用严格的考核检查作为高明办法呢！主要是应当以诚相待而已。自三代以后特别重视成文法规，以严格遵守法规墨守成规为谨慎，以只懂得执行条律照章办事为勤奋。像汉宣帝那样喜好用严峻法制来整顿吏治，把名位与实际综合起来考察，虽然在当时吏治情况很好，如黄霸治理颍川郡、龚遂治理渤海郡、赵广汉治理京兆、尹翁归治理扶风郡，每个人非常称职；然而官吏中的大批奸邪并未消除掉，这些人最终还是被杀害了。韩、杨、赵和盖宽饶几位贤明之人因选择信奉治术时不够慎重，结果是功过相半，吕祖谦对此已有过详细论述。汉人扬雄的二十五篇《官箴》与《法言》一起都很著名，马融十八章《忠经》是仿照《孝经》编定，而宋朝的真德秀收集圣贤经典和史书中的内容编成《政经》一卷，与《心经》并行互为表里。根据扬雄事奉王莽政权、马融诬陷李固的行为，其人品比真德秀相差很悬殊，但他们的言论却都有可以采纳的。总之，君主与大臣联成了一个整体，皇上以真诚对待臣下，臣下也应当以真诚侍奉皇上，不能只是要求官吏们处在执行政令传播教化的水平上。皇上您自己态度谦恭仪表整肃，顺应天象聚合治绩，大小官吏谁能不遵守为官准则并极力辅佐皇帝达到天下大治呢！

策试试题又认为士人是民众的样板，应当以严格磨练端庄的品行为其根本任务，并进而论述选拔士人的方法，以求能提升真正的人才。臣下我认为，《周礼》大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民众并荐举贤才，乡大夫通过考察这些“贤才”的人品行为和道德才华而向上司提供贤才的充分资料，通过这些程序才可以决定谁可以任官，优秀人物得到擢升。这都是在没有使用提升之前已经进行教化，在进行教化之后才开始使用，所以能使人才兴旺而且吏治良好。到汉文帝开始举孝廉，汉武帝开始举茂才，后来又规定了征辟察举之法，与分科选拔士人的方式并行，仍然有古代乡间推举邻里评选的传统。唐

朝科举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经、明书(字)和明算共六科,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兴旺。通向功名利禄的道路既然已经开通,侥幸取胜获利的念头自然也就出现了,这些都与两汉的做法不同而且相差甚远了。北宋初年开设皇帝亲自主试的科举制,真宗时增加为六种科目,仁宗时增加到十科,后来司马光建议设立十科,朱熹建议设立七科,都只是建议而未被采纳实施。宋代选拔人才以进士科最多,由进士科所考策论、诗赋而成为一代名臣的,不可胜数。的确如同宋太宗所说的:科举取士,决不允许那些庸俗的打杂人员窃取功名。士人入官前在身体力行儒学道德方面有欠缺,不可能在任官之后严格遵行为官守则。自从民间选举变为征辟察举、征辟察举又变为以诗赋为内容的科举考试,父母在而分家单住的民谣,装饰空车摆样子的讥讽,伤风败俗积习相沿。议论政事的人因此想恢复西周时代的乡举里选之法。但他们不懂得选得人才的关键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关键在于掌握实际情况。如果能使学问道德统一于儒家学说,并且各类学校教育都正规完善,官吏升贬标准公正严明而且官吏队伍纪律井然,即使仍用科举取士之法,其吏治也可以与西周时代一样兴旺。当今开辟各种选才招贤的途径,借鉴古代方式,推崇文教,采用强有力的培育造就手段,的确已经做到了道德教化广泛实施。

策试试题又认为军队用来威慑天下,实际上也就是用来安定天下,因而讨论有关整饬军队、讲求武备、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定的问题。臣下我认为,上古时代实行全民皆兵的寓兵于农之法,三代以后兵与民开始分开。汉在郡国设置名为材官的地方兵,京师长安有南军北军来守卫,这些兵制还有些井田制时代的传统。唐朝把全国按山川地势划分为十道,在各道设置府兵,平日无战事时府兵兵士照常耕作务农,不被召集训练所烦扰,与汉代的制度相同,最符合古代立制的意图。后来唐改为募兵之制,名为矿骑兵,府兵制度便不再实行了。从此以后京师长安只有士卒编制的虚数,而强兵悍将分布在全国各地,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了。宋代汲取了藩镇割据的教训,把军队分为四种名目:守卫驻防京师的曰禁兵,驻守地方州府的曰厢兵,边远民族归附者在原地屯守的曰蕃兵,招募而来的士卒曰乡兵。由

于事实上全是招募之制所以平日无事时也坐食军饷，军费开支很大。元朝设立前后左中右五个卫来统辖士兵，明朝用京兵守卫京城，用边兵守卫各地边防。后来由于军队管理不好，士气都不振作。这就是历代兵制都不如两汉时代的原因。但兵制的盛衰取决于训练的勤奋与懒惰，像汉代的总阅演习武备的都肄制，唐代讲习兵法的讲武制，宋朝定期阅兵的近郊大阅制，设立之严密都是相同的，但后来虚应制度的弊端也是相同的。只有明朝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一书，所讲的训练队伍、训练胆气、训练耳目、训练手脚灵便、训练营阵、训练将领等各种方法实行起来没有弊端。如果任命的将帅的确有才能，精选骨干士卒并且淘汰老弱兵丁，精简军械装备并且严肃军纪，指挥军队如同头脑指挥胳膊指挥手指一样灵活自如，将士间有同样的感受皇恩患难与共的志向，士卒们步调一致共同奋战，将帅们忠心耿耿指挥有方，用来各自施展威风无敌的鹰扬之才干，振奋起冲锋陷阵的虎贲之气魄，怎么能不迅速捷报频传呢！我大清王朝文教普及天下，武德震慑之威使敌丧胆，国威像天空雷电一样震荡，大捷布告像原野劲风一样迅猛，确实是要安定四方，走向天下大治啊。

像以上这些问题：修养自身并以身作则，考核政绩以表彰事功，劝谕学习以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以熟悉战术，圣明仁德的事体都包纳了，帝王的治国之道也完备了。臣下我诚心祝愿皇上如天运行，自强不息，道德修养与日俱增，依靠励精图治的诚意，达到福寿昌盛的喜庆。品性度量已经纯正却更加推崇兢业精神，为官准则已经振作却更加注重激励表扬，各级学校已经健全却更加注重树立新风，战略战术已经颁布却更加注重精心检阅。由此迎来齐天洪福，弘扬盛大基业，星光增辉彩云灿烂，承接帝舜《卿云歌》所咏赞的光华；像镜面一样清明，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巩固福寿无疆的国运，我们大清帝国的江山万年永存就有保障了。臣下我是刚参加科考的新科贡士，不知道什么是忌讳，甚至于冒犯皇上的尊严，实在是胆战心惊不知死所。臣下我恭谨地特作如上回答。〔贾秀军译〕

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庚申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大学之道。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定于一。

殿试策问

[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覃熙宙合，仰荷昊穹眷佑，列圣贻庥，兢业敕几，日慎一日。兹御极之十年，诞敷纶诏，特开恩榜，嘉与宇内士周谘博稽。每思建极首贵执中，学古必先证史，察吏兴廉之要，理财制用之经，治忽攸关，究图宜切。尔多士其敬听朕询。

执中一言，尧以咨舜，三代哲王，相传不易。意治法心法，皆必期于无过不及欤？孔子之言"时中"，则曰君子中庸，加以"庸"字，其旨安在？《乾》之德曰中正，正非由中而生者乎？天之命曰中和，和非由中而发者乎？修六礼以节性，而《周官》言礼曰教之中，则执其中而礼皆隆礼也；明五刑以弼教，而虞廷言刑曰协于中，则执其中而刑皆祥刑也。《汤诰》之"降衷"，孔氏以衷为善，朱子云衷只是中。其与受中以生，有以异乎？《洪范》之"皇极"，汉儒训极为大中，朱子又以为中之极。能详其说欤？前贤又言执中之矩不外主敬，主敬之本不外存诚，则诚与敬固即中之所以为执者欤？

汉司马迁作《史记》，变编年之例，历代史书相仍不改。或谓本纪、世家皆有所本，惟列传则创自迁。能约举其说欤？迁书之前，亦有名《史记》者，见于何篇？公侯传国始称世家，孔子独列世家，何义？刘知几谓《史记》周以上多阔略，秦汉以下始条贯。其信然欤？《史记》网

罗放失,综其终始,又能于叙事中寓论断。能举其一二否?班固作《汉书》,太初前者,皆因《史记》旧文,而加以删改。然束于成格,而不能变化。岂迁为一家言,固为官书,体例固不同欤?然有较迁为精审者,亦有较迁为繁冗者,其优劣能晰言之欤?观迁书者喜其错落,观固书者赏其整严,二书果足为史氏之杰欤?

安民莫先于察吏,察吏莫重于兴廉。虞廷三载考绩,其详未闻。夏严贪墨之罚,商制殉货之刑,皆所以尚廉也。迄于成周,小宰弊群吏,六事以廉为本。奖廉之意,不更深欤?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尚有合于此意。能详言之欤?当时廉吏固不乏人,能历举之欤?唐考课有"四善",宋令诸路转运使察所部官能否为三等,其目若何?斯时吏亦有以廉闻者欤?夫吏之贪廉,民生之休戚所系也。比岁筹饷孔急,吾民已重困矣。在位者宜如何激发天良,奉公洁己欤?今欲扬清激浊,澄叙官方,俾吏治蒸蒸日上也,其何道之从?

《周礼》一书,理财者綦详。自是以后,若管仲之于齐,李悝之于魏,商鞅之于秦,皆能致其国于富强。然去三代之治,盖远矣。能言其故欤?汉武帝行平准之法,史称其不加赋而用足,然欤?秦汉而下,善理财者莫如刘晏,其法若何?王安石锐意富国而内外骚然,其失安在?自汉迄唐,赋税外惟资盐利,至宋而茶利始溥。宋赵开更茶马之法,岁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其后复大变酒法,榷酤所入,几与盐等。可得而考欤?夫开源节流,理财之善经。若变通有无,与时上下,则亦有非常法所可拘者。果何如而上下交足欤?

凡此者:用中以端主极,考古以观人文,课绩以饬官方,丰财以储国用,皆经邦之要道,立政之宏规也。多士服习有年,对扬伊始,其各陈谠论,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义理之学中所讲的原则与方法。

老农扶杖锄草,子路拱手站立。

天下定于一尊。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帝位大业,顺应了古往今来的趋势,使宇宙一片融洽,上承苍天的保佑和列祖列宗传下的美好智谋,兢兢业业,慎重对待天命和危险的苗头,日慎一日。值此继位十年之际,广泛发布选拔贤才的诏令,专门开设恩科考试,并乐于向全国的名人学士广泛咨询全面查询。皇帝我经常想:建立最高准则首先要做到不偏不倚,学习古制必须要懂得借鉴历史,检察官吏是提倡廉洁的关键,管理财政是保证供应的前提,这些事情都与天下治乱密切相关,应当认真思考谋划。你们这些贡士们要仔细听好皇帝我的有关询问。

坚持不偏不倚这句话,尧曾经以之来教导舜,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帝王依次相传,始终不变。想来治理天下的方法和治理内心的方法,都必须做到既不过分又不欠缺才可以吧?孔子讲到"时中"时,则说君子应遵守中庸之道,特别加上了"庸"字,其目的是什么?《乾卦》的卦德称之为中和公正,公正不是从中和而生发的吗?上天的法则称之为中正和平,和平不是从中正而生发的吗?修明冠、婚、丧、祭、相见和乡饮酒所谓六礼用来调节人的性情,而《周礼》讲礼仪,便强调教化时要使人们做到适中,这说明只要坚持不偏不倚,而所有的礼仪都是隆重的礼仪了。设立墨、劓、刖、宫和大辟五种刑法是为了辅助教化,唐虞时代讲刑罚,便强调刑罚要适中,这说明只要坚持不偏不倚,而所有的刑罚都是能带来益处的刑罚了。《尚书·汤诰》中的"降衷"一语,孔安国认为衷即是善良,朱熹说衷仅仅是执中,这与世人先天就秉受中正之质而降生下来的说法有不同之处吗?《洪范》中讲的"皇极",汉代儒生把"极"解释为最重要的执中,朱熹又认为是执中的根本,能详细解释一下他们的说法吗?这些圣贤们又讲执中的原则不外乎坚持恭敬,恭敬的根本不外乎保持真诚,那么真诚与恭敬也就是不偏不倚必须要坚持的原由吗?

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改变了编年史的体例,此后历代正史沿用不变。有人说本纪、世家都有所参考,只是列传为司马迁所创,能简要地分析一下这种说法吗?司马迁之前也有叫做《史记》的,见于哪本书哪一篇?王公诸侯的封国世代相传才称之为世家,孔子不曾封侯却特意列入世家部分,这是什么含义?刘知几说《史记》记事对西周以前的部分大都笼统简略,秦汉以下开始清晰连贯,真是这样吗?《史记》对史实广泛搜集采用,叙事能首尾完整,并且能在叙述史实中加进自己的论述,能列举一两个例证吗?班固写《汉书》,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内容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并加以删节改写,但受固定体例的限制而不能有所改变。这难道是由于司马迁讲的是一家之言,班固写的是官修史书,体例就必然不同吗?然而班固的《汉书》有比司马迁精详审密的地方,也有比司马迁繁杂冗赘的地方,对两书的优点缺点能具体讲一下吗?读司马迁《史记》的人喜欢其错落有致,读班固《汉书》的人欣赏其完整严谨,这两部书真的可以作为史书的杰作吗?

安抚民众最先应该做的莫过于检察官吏,检察官吏最先要做的莫过于倡导廉洁。在虞舜时代每三年考察一次官吏的政绩,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夏朝时候严厉处罚贪污受贿,商朝时候严厉制裁贪财行为,都是为了倡导廉洁。直到西周时期,小宰负责用六条标准评判百官,以倡廉为本,这时奖励廉洁的意思不是更深刻了吗?西汉时候令刺史用六条诏书考察二千石俸禄以上官员,仍然有合乎这个意思的内容,能详细讲一下吗?当时的廉洁官吏当然不会没有,能列举一下吗?唐朝时候考核官吏有"四善",宋朝时候让各路的转运使考核所属官员是否称职分为三等,其名目是什么?当时的官吏也有以廉洁闻名的吗?官吏的贪婪与廉洁,直接关系到民众的休戚存亡。近年以来筹集粮饷很紧迫,我朝民众已经很贫困负担很重了。掌管此事的各级官员应当如何激发自己的良心,一心为公洁身自好呢?如今想倡导清洁之风扫除污浊之气,使官吏队伍清明干练,使吏治越来越好,该用什么方法呢?

《周礼》一书中,理财的内容编写得很详细。从此之后,像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都能使其国富庶强盛。然而都照三

代时候的天下之治相差很远了,能讲一下其中的原因吗?汉武帝推行平衡物价的平准法,史书称用这种方法能做到不增加民众的赋税负担而使国家财政充足,真是这样吗?北宋王安石锐意要使国家富强,可却朝廷内外搅动不安,他的失误又表现在哪里呢?秦汉以后善于理财的莫过于唐代刘晏了,他的办法怎么样?从汉代到唐代,赋税收入之外主要依靠盐利来增加财政收入,到宋期时期茶叶之利开始增多,宋人赵开改革了茶马互易之法,每年从中获息达一百七十余万贯。后来又对酒法进行彻底变革,榷酒专卖的收入几乎与榷盐的收入相等,能对这些情况考察分析一下吗?开辟财源节约开支是管理财政的最好的办法,像变更疏通物品的有无、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方法,也有特别的专门办法可以灵活处置。到底怎么做才能使国家和民众都富足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采用执中的原则来肃正皇帝的权威,考索古史来观察人文教化的情况,考课官吏来整顿吏治,开辟财源来满足国家开支,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途径,管理政事的宏大计划。你们这些士人读书多年,正值对答刚开始的时候,要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不要空泛也不要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钟骏声　会试卷三道

钟骏声(生卒年不详)　字雨辰,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咸丰十年(1860)状元。在咸丰、同治年间多次任乡试、会试主考官,曾出任四川学政,官至侍读学士。据传清初浙江一带有浙江状元"始于史,终于钟"之说,史即顺治乙未科状元史大成,钟即钟骏声。自钟骏声中状元之后直到清末废科举凡十九科,浙江迄未出过状元,钟氏确属终清之世浙江的最后一位状元。

大学之道

揭大学之要,其道不容忽也。夫为学者当以大学为归,而大学自

有其道也。曾子所为首述圣训与?意谓吾夫子以大成之圣,荷大统之传,爰为万世之大人示之准曰:人孰不从事于学哉!而达其用,尤必立其体也。图于继,不如审于初也。动作间有至理,不挈其纲领则淆也。日用外无持循,不纳于范围无裨也。精而当焉,曲而赅焉。

今之人有以尽其功,实前之人有以昭其则尔。今夫趋向易歧也,衷于学则不惑,功能无尽也,握其道则易从,人亦勉为大学而已矣。其学大者其志大,而卑琐之见勿参焉。教有颁,司徒是属;法有读,党正攸司。由王子以逮群伦,无不受裁于轨度。则放之可弥六合,实敛之不外寸衷,而有专营者无旁骛。其学大者其任大,而狭隘之规勿尚焉。业以敬,三年乐群;志以端,九年取友。由髫龄以及壮岁,遂克渐底于纯全。知圣贤初非异人,亦庸愚可敦实践,而有切务者无泛求。所谓道也,人亦勉为大学而已矣。盖尝见艺之成也,高曾有良规,承其后者无不绍弓冶之箕裘,奉行勿替,为其道可守也。矧先王本大学之经,而垂为大典。又尝见路之由也,周行先示我,游其地者无不范驰驱于进退,履蹈无违,为其道可循也。况吾人即大学之实,而懔厥大闲。然则失其道,大学无从入也;而得其道,大学可驯致也。

且夫学校之衰,其流失不可问矣。道由迩以及远,驰逐胜则士少成材;道由粗以及精,清净高则儒无真品。生人同此行习,而喜新厌故,惑于奇邪,昧昧者谁其正哉!然而道固可识也。期时敏必期时习,尚其考东序之钟;无所倚亦无所偏,尚其听西雍之鼓。指归其有属也,条原不紊,而矩蒦能逾,盍亦本斯道为大纲大纪也夫!且夫学术之隆,其造就必有自矣。道不惟其异惟其同,胶庠之经,必原于教胄。道不惟其奇惟其正,门户之见,不启于俗流。择执审于匡居,而内圣外王,由兹推广,彬彬者何其盛哉!然而道亦无殊也。雍有璜其式之,尚克表儒林之望;泮有璧其登之,尚克陈保傅之箴。典型其可循也,益受无疆,而师承罔懈,盍亦奉斯道为大经大本也夫!何也?道各有在也,人亦勉为大学而已矣。

揭示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其中所讲的道理不能忽视。读书人应当把义理之学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而义理之学有其独特的道理。

曾参是首先讲述圣贤的训诫教导吧？想来是说孔夫子是以大成至圣之师的身份,肩负着传授帝王学说的重大使命,于是便向历代帝王明示准则说:人会有谁不去认真地读书啊!想得到施用的成效,必须先确立主体。从后来的理论中去探求,不如仔细研究最早的学说。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体现着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不能自觉抓住道德原则作为纲领就会把是非混淆。日常事物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必须坚持的东西，不把它们纳入道德标准范围内也是没好处的。这些见解都是精辟而准确,婉转而详备的。

现在人们有办法获得很大的成功，其实是得益于先前的圣贤之人阐明了道德准则。现在人们的各种趋向的选择容易走上歧途，认真地学习圣贤经典就不会迷惑,应当做的事情无穷无尽,把握住基本的道德原则便容易着手去做，人们应当努力按义理之学所讲的道理去做啊。学问大的人其志向也大，对那些卑微短浅的见解不要把它们掺合进来。教化的实行,是司徒的职责;法令的讲述,是乡间党正应该做的事情。从王室太子到平民子弟，没有谁能不受道德规范和法令制度的约束。推广开来可以造福于天下，具体言之不外乎心中的道德准则在起作用，专心奉行道德准则便不会有别的追求。学问大的人其责任也大,对那些狭隘浅薄的教条不要崇尚。在校内敬业,三年便与同学打成一片;端正志向,九年便取信于朋友。从幼年直到壮年，逐渐能使自己的品德行为达到绝对纯正。我们知道古代的圣贤最初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也像常人一样可以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并且专心于最重要的传授道德的使命而没有别的追求。所谓道理,也就是人们应当努力按照义理之学中所讲的去做罢了。曾经见到有的人技艺有很高的成就，这是因为他们的数代祖辈创立了适用的规范,后来的继承者便在诸如良弓制造等技艺上继承父业,完全照搬不作改变，因为父辈讲的技艺是适用的。况且上古的帝王依据义理之学所讲的道理，为后世创立了光辉的典范!又曾见到道路已经畅通,周朝的大道先做了示范，在此地旅行的人没有谁不按规则进退驱驰的,人和车马都不违背它,因为大道可以遵循。况且我们接触到了义理之学的实质内容，仍然很注意防范大的疏漏。然而悖离了道德观

念，讲义理之学就入不了门；具备了道德观念，对义理之学所讲的内容便可以逐渐掌握了。

况且学校教育的衰落，其损失是不问自明的。圣人的道理是由近及远发展的，争胜心太强急功近利则士人便很少有成才的；圣人的道理是由朴素到高深发展起来的，自命清高就没有真正的儒学之士。如今的人大都有相同的行为习惯，而喜新厌旧的毛病，往往被某些奇特的不正道的东西所迷惑引诱，对这类糊里糊涂搞不清的人，该由谁去矫正呢？然而圣人的道理肯定是可以被认识的，这要靠人的勤勉修德并靠不断地学习，去听一下贵族学校东序的钟乐。这要靠人的不偏不倚，去听一下太学西雍的鼓乐。旨归是有系属的，源流是不紊乱的，规矩也是不能逾越违背的，何必不把义理之学所讲的道理奉为最重要的纲纪呢！并且学术的发展进步，造诣成就肯定是有来源的。圣人的道理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通的，古时太学胶庠中讲授的经典，必定都是以圣贤相传的学说为本的。圣人的道理不是奇特的而是正派的，由门户相传产生的偏见，并不一定是从没见识的人中形成的。奉行一派学说时要审慎地选择正统的学派，内心信奉圣贤学说并且能身体力行，再从自身推广开来，既有文采又有道德的人不就很多了吗！然而圣人的道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学校有玉璜等礼仪照着去做，就有可能成为儒林学士的一流人物；泮池中有圆如璧的流水特去观望，就有可能陈述出太保太傅的箴言。对奉行道德规范的人物应当去模仿学习，受益将是无穷的。加之师承教诲永不间断，何必不把义理之学所讲的道理奉为最重要的原则经典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人的道理在每时每处都存在着，人们也就努力去按义理之学所讲的道理去做吧！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托业以示意者，适以起贤者之敬也。夫植杖而芸，丈人已微示其意于子路矣。而子路乃拱立焉，殆相与于无相与哉！且吾党从夫子游，追随杖履，使得立身朝右，将扶杖者观德化之成，垂拱者致升平之

盛，岂不甚幸！乃田间踯躅服畴者，仍安作息之常；而道左徘徊致敬者，特著肃恭之度。衷怀其不侔矣，何相遇若甚疏者而相需转甚深也。

丈人告子路以不知夫子，意子路于此既不能追陪函丈，循正立拱手之文，而徒于古处衣冠，订泉石山林之雅，则亦肃然请退耳。然而丈人不顾也，盖已植杖而芸矣。使其慕杖朝之宠遇，岂不与五更三老，礼眷攸隆！而丈人不愿也。纵足违心急，劳劳者方徒倚中田，而吾率吾真，则南亩徂耕，遑复曳杖而容与？使其安杖履之优游，岂仍与牧竖樵夫，辛劬罔懈！而丈人不恤也。纵日暮途穷，皇皇者方低徊陇畔，而吾行吾素，则西畴有事，讵犹策杖而盘桓？其芸也，丈人若无意于子路矣，岂子路犹有意于丈人哉？盖垂暮之襟怀虽逸，课晴问雨，仍廑稼穑之艰难，况子路又素不相洽也。则业托耰锄而心殷穗荽，农功弗惰，遑知局外之苦衷。而少年之意气未平，剑佩雄冠，时或矜情之流露，况丈人又漠然寡情也。乃言无可答而容且弥恭，淑慎尔仪，宛若中心之诚服。

盖丈人植杖而芸之际，正子路拱手而立之时。道范其莫亲矣，嗟辙迹之周流，悲悯谁赓同调？为子路者，其或迟回以相待也。拱立何为乎？忆夙昔琴书乐道，久安侍立之常，今而趋步偶违也，将焦劳其莫释矣。乃前途渺渺，孰与指迷？而闻片语之讥弹，偏若心藏而心写。芸者自安淡漠，拱者愈著矜壮，而罄折无嫌，殆亦以畎亩有高贤，不妨作无聊之晤对。望尘其莫及矣，慨轮蹄之憔悴，风尘孰订知音！为子路者，仍或跋履以遄征也。拱立何为乎？念今兹陇畔周旋，不过立谈之顷，而遽讽刺过甚也，将抑郁其莫伸矣。乃世路悠悠，徒遭倨傲，而睹高年之道貌，偏肃其手容与足容。芸者自适其常，拱者忽改其度，而鼎铭如奉，一若以山林多逸叟，胡弗修弟子之仪容？然则拱者自拱，芸者自芸也，而孰意大人仍不忘情于子路也？

借做某件事情来表达某种含义，能使贤人对其产生一种敬仰。扶着手杖去锄草，老农已经巧妙地把自己的意思向子路表达了。而子路拱手站在一旁，恐怕是在不相识中却相识吧？况且我们有幸跟随

孔夫子周游列国，紧跟着孔夫子的车杖和足迹，得以站在孔夫子的身旁，而扶杖耕作的老农像是在观察孔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垂拱而立的子路像是在开创太平盛世，岂不是最惬意的事情吗！这样一来在田间从容耕作的老农，一直安心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方式；在路边徘徊垂立施礼的子路，更加显示出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与老农内心所想的不一致，但为什么二人相遇后似乎非常隔阂而二人转而又相互依存特别深呢？

老农告诉子路不知道什么孔夫子，意思是暗示子路你在这时候不能陪侍在老师的身旁，却拘谨地在此很有礼貌地拱手站着，只不过是穿戴得衣冠古朴，摆出一副山林隐士的文雅清高的样子，也该悄悄地走开了。然而老农并不这样说，只是不再理睬子路而扶着手杖去锄草了。如果这位老农向往那些可以拄杖朝见的人得到的恩宠和礼遇，岂不是与古代天子以父兄之礼恩养的三老五更那样，并且得到的礼遇更加优厚吧！然而老农却对此没兴趣。虽然子路是在脚步忙乱心中焦急的情况下来到的，一路奔波的他正站立在田地里，如果老农依从自己的天性，只管耕作，哪还顾上拄杖与子路接触？假使老农安心拄杖优游，哪里还像牧童樵夫那样辛劳不懈？可老农根本不考虑这些。即使子路日暮途穷，焦急的他正在陇畔徘徊，而老农如果我行我素，就会继续耕作，哪里还会拿着手杖在田间盘桓呢？就田间耕作而言，老农似乎是看不上子路，但子路就看得上老农吗？垂暮之年的老人的心胸虽然超脱，仍然关心风霜雨雪，只知道稼穑的艰辛，况且与子路又天生的不融洽。老农以耕种为己业而且心里只想着农耕的艰辛，只懂得农耕劳作不能懒惰，怎么知道除农耕之外的苦衷呢。而子路青年人的锐气尚未被磨下去，佩剑戴鸡冠，不时流露傲慢的神态，况且老农又反应冷漠没有激情，所以子路无话可说而只是作出一副非常恭敬的样子，文雅谦逊，好像心中对老农非常敬佩。

老农扶着手杖锄草的时候，正是子路垂手拱立的时候。讲究礼仪规范相互间便没有亲近的情感。慨叹老师周游列国，悲悯谁与儒门还有共同的言语？作为子路来说，他可能是迟疑了一下然后才回过头对老农以礼相待的。为什么要拱手而立呢？想当初习惯于在琴棋

书画敬业乐道的气氛中侍奉在孔夫子身边，如今一时迷路找不到孔夫子了，焦急疲劳的情绪难以消除，前途渺渺，谁能来指点迷津呢？却在问路时听到了几句讥讽指责的话语，偏偏又只能藏在心里记在心里。锄草的老农自己一直表情安然淡漠，拱手而立的子路愈加显得谦逊，而且像磬折一样弯着腰让人毫不怀疑其真诚。这恐怕是认为田野间也有高人贤人，不妨与之作些无济于事的闲谈阔论。望尘莫及了，慨叹老师游说的车马劳顿，风尘仆仆到哪里去找知音！作为子路来说，稍后仍然要起程去快速追赶孔夫子。他为什么还拱手而立呢？想到如今在田边寻找孔夫子时与老农只不过站着说了几句话，却很快招来过分的讽刺，压抑郁闷的心情又无处发泄；人世间道路悠悠漫漫，无故遭到这种傲慢的指责，但看到老农的神情和相貌，却又不自觉地在举手投足时显得拘谨严肃了。锄草的老农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拱手而立的子路却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事方式，但孔夫子的教诲却如铭文一样奉行，只管认为山林中有很多超脱潇洒的老人，为什么不对他们尽弟子之礼呢？然而拱手站立者自管拱手站立，锄草者自管锄草，但谁会想到老农其实还不忘情于子路呢？

定于一

于不易定者而言定，非一无以定也。夫天下之不定，不一故也；欲求其定，非一何以定乎？孟子以为今者七雄并立，天下纷然矣，忽盟忽战，情不一也；为纵为横，说不一也；东帝西帝，名不一也。抑知古今来创一代之模，启一元之运，所以位属一尊，而权操一统者，夫固以至一之经，驭不一之势。而后万国输诚，无不仰一王之首出也。

王以天下定，问夫天下，大矣。兰盾鞈革，齐兵最强；击筑拊缶，燕民綦众。楚方五千里绕其南，秦方三千里临其西，宋、卫、中山各据其胜，而三晋以河山之险，为天下之屏障焉。正不独实沈之望、有莘之墟，为天下一大都会也。然则天下既不一矣，天下岂易言定哉！继伯者二百年，溯椒实之繁，固尝以一而驭众，然而其始亦不一也。曲沃与翼，本支也，析为二矣。夏墟虽启，而戎索攸分，则不能取一家而

定之,何论天下?主盟者十余世,缅桐封之旧。又尝以一而制纷然,而其后又不一也。魏与韩、赵,强宗也,峙为三矣。土居新田,而都非故绛,则不能取一国而定之,遑问天下?然则天下岂易定哉?将谓定于富,而鸿沟、酸枣之产,不足为饶沃也;将谓定于强,而晋阳、上党之甲,未必无劲敌也。将谓定于形势,而此疆彼界,至参差也;将谓定于谋臣,而暮楚朝秦,多更易也。甚矣,其不一也,则何怪其难定也!

夫天下亦定于一耳。从累代战争不息之余,而封域依然,版章如故,久共安于世守。乌望其定也?然而岩邑可削,不祀者忽诸矣;名城可坠,启宇者日狡矣。登高而望九州之险,犹得曰表里山河,必无害乎?贞之下则元起也,否之极则泰来也。明其定于一,而按图数贡,何夸百二于崤函;计里开疆,何侈八九于云梦?彼小侯画守弹丸之隘,而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且犹固其土疆。安必其定也?然而国启西封,翦鹑首者锡策矣;谋荒东略,伏龙尾者成军矣。抚众而筹百年之计,岂不曰盛衰倚伏,至无常乎?乱极则必治也,分久则必合也。知其定于一,而拓地数千,不数临淄之万户;提封十二,何畏泗上之诸侯。夫惟圣天子握乾阐珍,遐迩向风,中外禔福。夫亦体上天好生之德,而遂以成永清大定之庥也。

针对不容易安定的情形而讲所谓安定,不统一就无法实现安定。天下之所以不安定,就是不统一造成的;想寻求安定,不统一怎么能安定呢?孟子认为当今七雄并立,天下非常混乱,忽而友善结盟忽而反目开战,情况不一致;有人讲合纵有人讲连横,学说不一致;东边齐国称帝西边秦国也称帝,名号不一致。可知从古至今凡是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模式,开启一个新纪元的皇运,用来使皇位归于一人,从而有权指挥一统天下,实际是凭借实现统一的最高法则去驾驭当时尚未统一的局面。然后众多的诸侯国能表示忠心臣服,无一不是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帝王已经出现的缘故。

梁襄王为了安定天下,来向孟子询问,这太重大了。武器库里装满了刀剑、盾牌和皮革制的甲胄,齐国的军队最为强大;敲击着古筑歌唱抱着酒坛痛饮,燕国这样的人极多。楚国地方五千里环绕在南

方，秦国地方三千里坐落在西方，宋国、卫国和中山国各自占据着有利的地势，而三晋地区由于黄河和太行山的险要，构成天下最大的屏障。这正好应合了晋国的实沈之星的星宿，晋侯曾登临观师的有莘氏之墟，成了全国一个很大的都会。然而天下既然尚未统一，天下怎么轻易谈得上安定呢！此后诸侯称霸达二百年，追溯一下那些像花椒籽一样繁多的诸侯，虽然最后要服从于一个君王，然而在开始时并不服从一个人。曲沃和翼邑本来都是晋国的支系，后来分裂为两个侯国。夏朝国都虽然由启来统治，却如《诗经》所说的"疆以戎索"即有许多戎狄地区的制度施行于其中，尚不能按夏朝一种制度作为统一标准，况且整个天下呢？晋国作为主持会盟的盟主维持了十几代，共同缅怀周成王削桐叶为珪而封立叔虞的旧情，也曾用统一的会盟来制止战乱，但不久又统一不起来了。魏国与韩国、赵国都是由晋国分化而成的强国，三国互相对峙。一直占据着新田作为中心，而其都城已不在原来的绛邑了，在这三个诸侯国中都不能由其中一个来统辖，况且是天下各侯国呢？那么天下是容易安定统一的吗？如果说安定统一取决于富庶，那么鸿沟渠和酸枣台的生产收获，算不上富饶肥沃；如果说取决于强大，那么晋阳和上党的盔甲，未必就是天下无敌的；如果说取决于地理形势，那么彼此的疆域和边界极为犬牙交错；如果说取决于谋臣韬略，那么谋臣们朝秦暮楚并不始终为某一君王效力。不统一也真是太严重了，难怪天下难以安定呢？

天下也有安定统一的结局，在历代战乱不断的同时，天下总的疆域却依然如故，版图没有变化，国人习惯于世代承袭，怎么能盼望天下安定统一呢？然而依山而建的城郭能够被削平，不奉祀祖先的人忽然间继起了；著名的大都城可能落入他人之手，开拓疆域的人手段越来越狡猾了。站在高处俯瞰天下九州的险峻地势，人们总会说里里外外的山川，一定不能再被践踏了。占卜总是得下卦那就预示着上卦就快出现了，走背运到了极点的时候好运气也就要来了。既然天下终归要统一，按版图来统计贡赋，何必像秦国那样夸耀自己占有二万人足以抵挡百万人的崤山函谷关；计算好里程开拓辖境，何必像楚国那样炫示所谓占天下财富十之八九的云梦湖泽？那些小侯国在坚

守弹丸一样小的关隘，而地方仅五百里、地方仅四百里的小侯国也要固守其疆土，怎么能天下必会安定下来呢？然而秦国兴起于西部边陲的一个侯国，占据着号称鹑首即七宿之首的西部地区并在此颁布策令；谋划开拓东方之地，在号称龙尾即七宿之末下面的东方六国建立了联合抗秦的军队；为安定民众而谋划百年永久之计，这岂不是说天下的兴盛与衰亡、消长与进退最不固定吗？大乱必然大治，分久必然聚合。既然天下终归要统一，那么开拓疆土数千里受封临淄的齐国万户侯并不算强大，在泗上受封的十二诸侯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真正的圣明天子，把握自然规律开辟富贵之源，内地边塞民心顺服，朝廷内外共享幸福，这既体现出上天爱怜民众的恩德，也由此形成了永远清明、万分安定统一的美好局面。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明德所以新民，观治必先尚象，考吏斯能任职，解愠乃可阜财。综稽往籍，《诗》咏缉熙，《易》言多识，《礼》重大计之典，《书》详底慎之文。古帝王禔康万宇，陶化二仪。以懔危微，敕精神于黼扆；以昭鉴戒，深稽考于简编；以励廉能，勉猷为于察采；以平赋税，普乐利于井闾。莫不本旰食宵衣之意，以握顺天应人之符。用能建极绥猷，乾枢运焉；称先则古，观察周焉；慎宪省成，咸熙颂焉；裒多益寡，兑悦深焉。所由治洽幷幪，祥征仁寿，迓蕃禧而膺多祜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昌明正学，纲领群言，精澄叙于官方，裕度支于圜府。固已单心在宥而三鉴常昭，庶尹惟和而九功载颂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思久道之有成，察微言于在迩。进臣等于廷，而策以绍心法、考史编、肃官常、慎财赋诸大政。臣之愚昧，奚足仰赞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谨就素所诵习者，以抒蠡测之忱、管窥之见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法心法皆必期于无过不及，而因求三代哲王相传不易之理。诚圣学之首务也。臣谨案蔡沈《书传》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故尧曰钦明，舜曰睿哲，禹曰祗承，汤

曰日跻,文曰小心,武曰执竞,惟精惟一,悉本允执厥中之旨。孔子言时中,以中庸并列。盖中则必庸,庸乃中之实理,此以德行言也。以性情言则曰中和,和亦由中发也。以事为言则曰中正,正亦由中见也。司徒节性,爰修六礼,而《周官》特阐其旨曰:教之中,则礼皆隆礼矣。司寇弼教,爰明五刑,而虞廷先揭其要曰:协于中,则刑皆祥刑矣。《汤诰》为言性之始,其言"降衷"也,孔氏以衷为善,朱子云衷只是中。《洪范》为经世之书,其陈"皇极"也,汉儒训极为大中,朱子又以为中之极。要之人性之善,以中善也;皇极之建,以中建也。然执中之矩,要于主敬;主敬之本,归于存诚。朱子谓格致诚正以及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此中所为执欤?皇上体尧蹈舜,甄殷陶周,固统古今治法心法而一以贯之矣。

制策又以历代史书皆有所本,固详究夫史家之得失。臣惟史有二体,曰纪传,曰编年。纪传始《尚书》,编年始《春秋》。其载一人善恶之实,纪传为详;其载一代治忽之端,编年为详。自司马氏变编年体例,序帝王则有纪,贯岁月则有表,道政事则有书,序公侯则有世家,志士庶则有列传。或谓列传则创自迁,而纪帝王本《诗》、《书》,纪列国本《左氏》,纪兼并本《战国策》。然公侯传国始称世家,司马氏独列孔子于世家,则千古特识也。刘知几谓《史记》周以上多阔略,秦汉以下始条贯。盖远而难稽,不若近而易考。夫《史记》网罗散失,综其始终,又能于叙事中加以论断。而班固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崇势力而羞贫贱。然固作《汉书》,太初前者皆因《史记》旧文,微加删改,无所变化。虽官书自有体例,不若迁之不拘成格,而优劣自在也。厥后陆澄注班书,多引《史记》,搜辑异说,合为一编,惜今不传。倪思作《班马异同》,评加考证,尤为精密。盖固书有较迁为精审者,亦有较迁为繁冗者。故观迁书者,喜其错落;观固书者,喜其整严。褚少孙之补《史记》,范蔚宗之《后汉书》,皆远不逮二书也。圣代典策大备,纂修诸臣敬谨以将事,不已昭衮钺于千秋哉!

制策又以安民莫先于察吏,察吏必重于兴廉,因进思激浊扬清之用。臣惟《皋陶谟》曰:知人则哲。圣如勋华,犹兢兢于重允厘,戒丛脞,此三载考绩所由黜陟也。《尚书大传》曰:积善至于明五福,以类

升，故陟之；积不善至于幽六极，以类降，故黜之。必三载者，天道三年一周也。《大戴礼》曰：官有九用，用有九征。荀悦《申鉴》曰：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其即敷纳明试之意乎！夏严贪墨之罚，商制殉货之刑，皆以尚廉也。《周礼》六计弊吏，善能敬正法辨，皆统以廉。郑氏注六事，以廉为本。汉《孝武传》曰兴廉，《黄霸传》曰察廉，《四子讲德论》曰以励贞廉，悉本《周官》遗意。夫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若韩延寿断狱为天下最，尹翁归治盗为三辅最者，代不乏人。唐考课核以四善，区以二十七最。宋则分以三等。盖吏之贪廉，治乱所系也。宋真德秀疏言：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元稹《刺同州》诗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盖诚知所务矣。国家轸念民依，勤求吏治，中外诸臣孰敢不争自濯磨也哉！

制策又以丰财所以储国用，而财用之足，尤在有以开其源而节其流。臣惟天下无不变之法，法立则令行。然法之善，不徒在立法之人，而在行法之人。《周礼》一书，制纂详矣。自是管仲富齐，李悝富魏，商鞅富秦，虽去古浸远，而皆能有裨于国。汉武帝行平准法，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故史称其不加赋而用足。然安石锐意富国，亦曾藉口于是，而竟致天下骚然。则经理之善，不能不推刘晏也。自汉迄唐，朝廷经费，盐利居十之八，两淮盐尤足当天下之半。至宋赵开更茶马之法，长引短引与盐同科，岁收息至一百七十余万缗。而其后更大变酒法榷酤，自元太宗始，则变通有无，与时上下，亦有非常法可拘者。夫宋朱子有言，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纪纲之立，治治术首重理财。而日久弊生，无治人则治法亦坏。颛顸者不顾大计，贪妄者适便私图，民受其害而国仍未得其利。事变之起，大半由此，不可不豫筹也。盛朝安民和众，节用爱人，固裕不竭之泉源，著生财之大道矣。

若此者：正位以凝命，稽古以右文，量能以任官，足用以维国。恢元纬，握珍枢，仁圣之事赅，治平之要备矣。臣尤伏愿皇上，立政有恒，廑思保泰，懋丕天之大律，恢帝者之上仪。勘毖已彰而犹勤斋祓，典章已备而愈切研求，笃棐已昭而倍严董正，修和已布而益谨度支。

于以奄九有而来同,综八方而为极。斟元寿世,锡福诚民,上绍峣巍,下昭渊懿。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宣明帝王道德用来革新民众思想,观察治世应当先看重卦象,考核各级官吏才能使其称职,消除无端抱怨才能增加财富。综合考索以往的经书,《诗经》歌颂学问大放光明,《周易》强调对前人言行的多方面记识,《周礼》重视考核官吏的规则,《尚书》详细记述严肃认真对待财赋的内容。上古时候的帝王给所属民众带来幸福安康,陶冶教化天地之间的万物。把注重细小危机和时刻警惕的内容书写在御座后面的屏风上,以借鉴历代得失和深入思考其教训为目的来阅读古代史书,用奖赏廉洁干练之才和鼓励有谋略有作为的办法来统辖百官,以均平赋税负担和共同祥和富庶为目的来治理百姓,没有不本着废寝忘食的精神,以求把握顺应天地民心的命运的征兆。因此能够树立最高准则计划周全而把握治理天下的关键,效法古贤借鉴历史而观察了解充分周密,谨慎对待已有法度而政事振兴颂声四起,抑制富豪赈助贫困而能真正满足民众内心喜悦。所谓官民融洽万象和睦,祥和吉兆证明仁义长寿,迎来人丁兴旺的喜悦和普天同庆的欢乐,就是靠这样做啊。

敬思皇帝陛下,倡导弘扬儒家学说,规范采纳民众言论,使官吏队伍廉洁有序,使国家府库钱币充足富裕。固然已经做到了尽心学问,宽容大度却更加重视以古、以人、以镜为鉴不断反省自己,各级官吏都致力维护安定祥和而且六府三事都得到了民众载歌载舞的赞颂。但皇上谦虚大度虚怀若谷,认真深入地筹划咨询,思谋长久坚持运用的成功之道,认真听取当今的各种浅陋之见,把臣下我等召进朝廷,策问有关继承古代圣贤治理内心的方法,考察古代史书的编写情况,治理整顿官吏制度,认真安排财政收支等重大政务。臣下我很愚昧,怎么有能力向皇上提供高深的见解呢?但正当对答刚开始的时候,想到用言论汇报的义务,怎么敢不依据平常所诵读学习的内容,来表达一下关注天下大事的诚心,并略陈管窥之见呢!

拜读策试试题中讲到，治理天下的方法和治理内心的方法都必须保持在不过分也不欠缺的程度上，由此寻求三代时期英明君王代代相传不变的道理。这的确是圣贤学说的重要内容。臣下我考查，宋朝蔡沈的《书集传》中说过，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办法以体现自然规律的“道”为根本，二帝三王所遵循的“道”又以心地如何为根本。所以尧讲英明，舜讲聪慧，禹讲恭敬承奉，汤讲天天提高，周文王讲小心谨慎，周武王讲执守强盛，讲的都是精一，都是依据的不偏不倚的原则。孔子讲立身行事合乎时宜的“时中”之说，并与中庸之道并列。这是因为执中必定要中庸，中庸是执中的真正含义，这是从品质德行方面而言。从人的性情方面讲则应该讲中正平和，平和也是从执中生发的。从为人做事的方面讲则应该讲适中公正，公正也是通过执中来体现的。司徒之职主管调节规范人的性情，又修明冠、婚、丧、祭、相见和乡饮酒等六礼，而《周礼》专门阐明其宗旨说：教化执中，一切礼仪就都是隆重的礼仪了。司寇之职主要帮助教化民众，并申明墨、劓、刖、宫和大辟五种刑罚，而唐虞首先指出其要旨说：在要求适度的基础上使用刑罚，所有的刑罚便都是能带来益处的刑罚了。《汤诰》是最早讲人的性情的，其中讲“降衷”，孔安国以“衷”释为善良，朱熹说“衷”只是中。《洪范》是治理天下经邦济世的书，其中讲述“皇极”，汉代儒生解释“极”为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的大中之道，朱熹又认为是执中的典型。从根本上讲人性的善良，是适中的善良；帝王统治准则的建立，应该是建立在适中的原则上。然而所谓执中的规则，总之在于保持恭敬。保持恭敬的根本，归之于保存真诚。朱熹讲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一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过程始终离不开恭敬；从中正平和、天地定位，万物化育一直到圣贤神明的教化功效，其中的关键不外乎真诚。这些正是所谓执中应当坚持的内容吧？皇帝陛下效仿尧帝追随舜帝，分析殷商借鉴西周，的确是把由古至今的治理天下之法和治理内心之法贯穿起来了。

制策试题又讲历代史书的编写都有所依据，故而详细考究历代史家的得失。臣下我知道史书有两种体裁，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纪传体始于《尚书》，编年体始于《春秋》。记载一个人的善良与丑恶的事

实，纪传体比较详细方便；记载一个朝代的治乱兴衰的情况，编年体比较详细方便。从司马迁开始变更了编年史的体例，排列帝王顺序和事迹设有“本纪”，连贯岁月时间设有“表”，叙述政典律令设有“书”，排列公侯统系设有“世家”，记录士庶臣民的言行事迹则设有“列传”。有人说列传是司马迁创立的，而记录帝王事迹依据《诗经》和《尚书》，记录列国兴衰依据《春秋左传》，记录列国兼并战争依据《战国策》。然而公侯封地世袭相传才称之为“世家”，司马迁偏偏把当时不曾封侯的孔子破例列入世家部分，则是体现了司马迁古今少有的特别见识。刘知几说《史记》的内容对周代以前大都笼统简略，秦汉以后才开始清晰连贯。这是由于时代久远难以考索，不如后来的事件容易考索清楚的缘故。《史记》对史实广泛搜集采用，叙事首尾完整，并且能在叙述史实中加进自己的论述。班固讥笑司马迁先讲黄老之术而后才讲六经，收录奸雄之辈而不记那些超脱世俗洁身自好的处士，推崇权势之人而羞辱贫贱之人。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事都沿用《史记》中的原文，只是稍微作些删节修改，没有大的变化。虽然此时正史编撰自有其体例，不像司马迁编《史记》的时候没固定体例的限制，即使这样两书究竟哪个为优，哪个为劣，还是客观摆在那里的。后来陆澄注释班固的《汉书》，引证了很多《史记》中的记载，把两书记载不同的内容集在一起编为一书，可惜如今已经失传。倪思写的《班马异同》对两书所记事实予以详细考证，非常严谨细致。班固的《汉书》有比司马迁的《史记》严谨仔细的地方，也有比司马迁繁乱冗杂的地方。所以读司马迁《史记》的人喜欢其错落有致，读班固《汉书》的人欣赏其完整严谨。褚少孙补修《史记》，范晔著《后汉书》，都远不如原来这两部书的水平。当今大清王朝各种典籍极为完备，编撰史书的大臣恭敬谨慎地从事编写，还愁不能把褒贬传之于千千秋万代吗！

制策试题又认为安抚民众最先应该做的莫过于检察官吏，检察官吏最先要做的莫过于倡导廉洁，所以进一步思考扫除污浊之风激扬清新之气的方法。臣下我知道《尚书·皋陶谟》中说：了解别人的人才聪慧。圣明得像唐尧虞舜那样的人，尚须认真地注意切实治理

政事,杜绝繁杂琐碎。这是三年一考核官吏政绩以决定升降的原因。《尚书大传》中说:积德行善使所辖民众都达到了长寿、富庶、康宁、好德和善始善终所谓“五福”,便可以按惯例高升,所以就升官;不积德不行善致使所辖民众陷于短命、疾病、忧患、贫穷、险恶、弱小所谓“六极”状况,便要按惯例降职,所以就罢官。之所以必须要三年为期限,是因为天道的循环三年一个周期。《大戴礼》中说官吏应当有卜算、说写等九种能力,每种能力又分为九种不同表现。荀悦《申鉴》中说:对官吏应当是有举动便考察其实效,有言论便考察其作用,活动时考察其行踪,独处时考察其操守。这就是全面汇报公开考核的意思吧!夏朝时候严厉处罚贪污受贿,商朝时候严厉制裁贪财好利行为,都是为了倡导廉洁。《周礼》上讲用六条标准评定官吏,善良、贤能、恭敬、正直、守法、明断等行为,都在前面用廉洁作统率。郑玄注释这六项事体,说是以廉洁为基本要求。《汉书·武帝纪》讲倡导廉洁,《黄霸传》讲检察不廉洁的行为,王褒的《四子讲德论》说要奖励贞正廉洁,都是依据《周礼》的意思而来的。汉代令刺史以六条诏书检察二千石以上官员的作为,象韩延寿审案断狱的能力为全国第一,尹翁归惩治盗贼在长安附近最为突出,各个朝代都有不少这样的官员。唐朝考核官吏有德义有闻等四个标准,并具体分为二十七个最高等次。宋朝时候则分为上中下三等。官吏的贪婪或廉洁,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宋人真德秀曾在奏疏中说:在朝任职的官员应当把送礼者登门视为耻辱,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应当把携带行贿的东西入京钻营视为羞耻。元稹的《刺同州诗》中说:贪图财利既上愧于朝廷的希望,又愧对辖区内的百姓。这都是知道该怎么去做的人。国家时刻想到民众的疾苦,经常整顿吏治,朝廷内外的官员有谁敢不努力洗刷污浊磨练意志呢!

制策试题又认为丰裕财政收入可以储存起来作军国之用,而财政需求的充足主要在于开辟财源节省开支。臣下我认为天下没有不变的法令,法令颁布了就要坚决执行。然而法令的可行不只是决定于立法的人,而更取决于执行法令的人。《周礼》一书对理财之制编录得很详细。此后管仲使齐国富强,李悝使魏国富强,商鞅使秦国富

强，虽然距离周代以前的古制越来越远，却都能使其国家财政有益处。汉武帝推行平抑物价的平准法，官库太仓中的粮食多得霉烂而不能食用，皇宫内的铜钱多年存放不用而串钱的绳子烂掉而不能数清，所以史称汉武帝时不增加民众的赋税负担而国家财政却充足了。然而宋代王安石一心要使国家财政富裕，也曾讲要不增加民众的赋税负担而使财政充足，却导致了天下人的不安和反对。对财政管理成功者，不能不首推唐朝的刘晏。从汉朝到唐朝，朝廷所用经费的十分之八来自于食盐专卖所得的利息，两淮地区的盐利更占全国盐利的半数。到宋朝赵开改变传统的茶马直接互易的办法，茶商交钱给官府后由官府发给的买茶的凭证无论长期的或短期的都与盐一并收税，每年收钱达一百七十余万贯。后来又大幅度变更酒法实行专卖制，这从元太宗开始，由此表明疏通物品的有无，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方法，也有特别的专门办法可以灵活处置。宋朝朱熹说过，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制订典章制度。典章制度订立后，治理中的关键首先是理财。时间长了弊端就出现了，没有治理财政的人才结果治理财政的办法也变坏了，糊涂官吏不懂得大政方针，贪官污吏趁机图谋私利，结果是民众深受其害而国家并没得到好处。民间暴动之类的事大都是由此引起的，不可不预先考虑到啊。我大清王朝安抚百姓和睦民众，节省费用爱惜人力，当然会不断丰富用之不尽的财源，创造增加财赋的途径啊。

像以上这些问题：端正帝位以凝聚起天命，考索核查古代史书以丰富发展天下文章，根据才能大小来任命各级官吏，开辟财源富足国用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上天的大道法则，把握治乱兴衰的关键，仁义圣贤的事体全都包纳了，治国平天下的纲领也具备了。臣下我衷心祝愿皇上，订立制度并持之以恒，殷切思谋以确保太平，弘扬上天的大道法则，维护帝王的权威尊严。谨慎小心已经很习惯却更加经常地预防灾祸，典章制度已经很完备却更加认真地研究探求，官员忠诚辅政已经很明确却更加严格地管理纠正，修明六府三事的办法已经公布却更加严格地控制开支。这样就可以统辖天下九州使臣民全都归从，笼络四面八方为朝廷树立权威。斟酌初始状态，使社会

成员长寿，赐给百姓幸福，使民众一片和睦，上足以顶天，下可以立地，我们大清帝国的江山万代永存就有保障了。臣下我是刚参加科考的新进贡士，不懂什么是忌讳，甚至会冒犯皇上的尊严，实在是胆战心惊不知死所。臣下我恭谨地特作如上回答。〔贾秀军译〕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殿试策问

[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抚临寰宇，渥荷上穹洪贶，仰承列圣贻谋，肆予冲人，勤求治道，上思以副两宫之训迪，下思以复四海之承平，惟几惟康，罔敢暇逸。深念典学传心之道，用人行政之经，理学各有源流，卒伍期于训练，攸关治忽，宜切讲求。当此临轩发策之初，悉心谘访，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帝王授受心法，以尧舜执中之言为始，而太公言黄帝颛顼之道皆在《丹书》，因述敬胜义胜之旨。是则《虞书》之辨人心道心者，固亦有所本欤？孔子于《易·坤卦·文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说者谓为发明《丹书》之旨，能阐其理蕴欤？宋项安世谓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王之翼翼，为百圣相传之心法。审端致力，宜何从欤？三代以后如汉文帝、唐太宗，诚令主也。其修己治人之术，亦有合于古圣之心传欤？夫必切于身心，而后可以言学。章句训诂，抑末也。将欲求修齐治平之本，其道安在？

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自古帝王之图治，未有不以用人为急务者。顾循资格，则奇材不见；凭保举，则实行难征。宋儒司马光言孔门以四科取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而欲乞朝廷设十科以举士。其法

果尽善欤?所区分名类,固足以尽人材而无遗贤欤?荀子言:有治人,无治法。其谓政必待人而行欤?朱子言为治之本,在正心术,以立纪纲。此诚正本清源之论也。方今盗贼未平,东南尤甚。将安民于衽席而出诸水火之中,发号施令何者为先?除暴胜残何者为切?董仲舒云:为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易之,乃可理也。将何术而施行悉当欤?

汉儒之学见《儒林传》者,师弟渊源具有可征。至宋儒则研精心性,不必皆有师传。然周子闻道最早,而朱子谓是陆诜所授。程子之学得自《六经》,而其始实受业于周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而从李侗游为最久。溯厥师承,莫不各有所自。能详述之欤?濂洛关闽,其学皆出于一源,惟象山陆氏谓伊川之言与孔孟不类,又以朱子之教人为支离,后遂分为两途。明薛瑄以程朱为道学正派,而王守仁则专宗陆氏。能辨其得失欤?学成所以致用,宋儒惟尧夫邵氏绝意仕进,其余或仕中朝,或领剧邑,而陆九龄之居乡御寇,王守仁之屡平寇乱,则又文武兼备者。岂宗派有殊,而体用遂有异欤?

诘戎之道,教戒为先。振旅茇舍,成周之制尚已。至汉时,京师州郡皆立教试之法;唐代三时劝农,一时讲武,其治皆近于古。明王骥论练兵之法有五,戚继光论练法有六,能详举其法而阐论之欤?夫兵欲用其力,当结其心;欲振其威,当齐以礼。必先娴坐作进退之节,而后可收克敌致果之功。我朝以弧矢威天下,八旗绿营之兵布列中外,固斟酌唐之府兵、宋之蕃兵厢兵而定其制。乃数年以来,潢池窃发,尚未荡平。或将帅未得其人,抑教练有未精欤?

凡厥四端:稽古以懋修,遴贤以佐治,传薪以维道,讲武以经邦,内圣外王之事于兹备矣。尔多士研求有素,其各陈谠论,毋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这就叫做只有仁人才做得到确能喜爱人,又能憎恶人。

孔子说:谁能走出屋外不经过房门呢?什么事不遵从这种仁道呢?把百姓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的人,百姓也会把他的欢乐当成

自己的欢乐;把百姓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的人,百姓也会把他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欢乐以天下人为转移,忧愁也以天下人为转移。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祖宗开创的盛大基业,安抚统领整个天下,深厚地蒙受到皇天赐给的大福分,恭谨地承用我朝各位圣明先帝留下的谋略,现今我作为年幼的天子,勤勉地谋求治国的大道,往上思索确能符合两位皇太后的训导启迪,往下思索确能恢复四海的太平局面,只想危险的苗头,只想安康的结果,不敢安逸享乐。深深考虑到致力圣学和传授心治大法的准绳,任用官员和推行政务的法则,理学各派具有自身的来源与分支,军队需要得到训练,这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应当紧切地加以讲论研求。正值这首次驾临殿廷、公布策问的时候,用尽心力来咨询访问,你们这些读书人要恭敬地聆听皇帝我的命令。

圣帝明王传付和承受的心治大法,把唐尧虞舜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句话作为创始的标志,可姜太公宣称黄帝至颛顼的大道全都载录在《丹书》上,随后阐述虔敬胜过懈怠就吉利,道义胜过私欲就顺畅的义旨。这表明《尚书·虞书》中辨明人心和道心特征的说法,原本上也有它所依据的东西吧?孔子在《易经·坤卦·文言》里说:靠虔敬来使内心正直,靠道义来使行为表现很方正。解释经书的人认为这是在阐发彰明《丹书》的义旨,你们能阐明其中的道理和义蕴吗?宋朝的项安世认为唐尧的警戒谨慎,虞舜的忧危恐惧,夏禹的勤勉不懈,商汤的时刻担忧,周文王的格外小心,正构成了历代圣人递相传授的心治大法。要是审察入手处,下气力去遵用,应当依从五位圣人中的哪一位呢?夏商周三代以后像汉文帝和唐太宗,的确是杰出的君主啊!他们修养好自身与治理世人的举措,也有符合古代圣人递相传授的心治大法的地方吗?必定要对身心的修养特用力,然后才可以讲论圣人的学问。给经书划分章节,做出字词解释,不过是最低等的罢了。打算探求到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

的根本所在,具体的途径究竟在哪里呢?

作为众人君主的人,在求取贤才上特费力而在获取到人才以后就很省力了。自古以来圣帝明王谋求天下大治,没有不把任用官员作为头等大事的。然而依照资历品级来办理,奇特的人才就显露不出来;光靠荐举担保,实际的品行就很难得到证实。宋朝的儒士司马光强调孔子学派通过德行、言辞、政事、文化知识这四种类型来选用士子,汉朝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到人才。倘若一味挑毛病却看不到长处,朝廷上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选;如果依据特长来授官任职,世上就没有能够舍弃掉的读书人,于是打算乞请朝廷设立十种科目来选用读书人。他这办法果真就特别好吗?他所区分出的名目类别,原本上就足以网罗到一切人才而没有被遗弃的贤士了吗?荀子说:世上存在着真会治理的人,并没有肯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度。这种说法是在强调政务必定需要合适的人去推行开吧?朱熹说:施行治理的根本在于端正心术,用来确立起朝廷的纲纪法度。这的确属于端正根本和澄清源头的论断啊!如今盗贼还没有平定,东南方更为严重。打算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稳得就像坐在席垫上那样,朝廷发号施令该把什么放在首位呢?去除凶暴和战胜残忍,又数什么最为紧切呢?董仲舒说:施行政务却贯彻不下去,对严重的情况必须要加以改正,进行变革,才会实现治理啊!既然如此,应当采用什么对策而施行起来又完全妥当呢?

汉代儒士的经学在《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看得到的,师长与弟子的传授关系很详明地有那可以考察出来的系统。到了宋朝儒士那里,就重点研求并讲透人的心念与本性问题,不一定都有哪个门派的师长传授。然而周敦颐闻知大道时间最早,可朱熹却说这也是陆讫传授给他的。程颢、程颐的学说从《六经》中摸索出来,但在起始阶段实际上也是从周敦颐那里承受学业的。朱熹汇集起各个学者的主要成就,但跟随李侗研习却时间最长。追寻他们的传授与承接的关系,无不各自具有本身的来源。你们能详尽地论述一番吗?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朱熹,他们的学说全都出自同一个本源,只有陆九渊认为程颐的说法与孔子、孟子并不相像,又认为朱熹教诲世人的东

西纯属支离破碎,于是到后来就分化成两个发展方向。明朝的薛瑄把二程与朱熹看成是道学的正宗派别,但王守仁却完全宗奉陆九渊。你们能分辨一下他们的得失吗?学问形成,目的是达到运用,宋朝的儒士只有邵雍断绝了做官高升的想法,其余的人有的在朝廷上供职,有的在政事繁多的州郡担任最高长官,而陆九龄又在故乡抵御盗贼的骚扰,王守仁多次平定盗贼和叛逆的藩王,这又属于文武兼备的人了。这难道是宗派存在着区别而主体与施用就出现差异了吗?

整顿好军队的措施要数训练和戒饬占居第一位。收兵回国和野战宿营,周朝在这方面的制度是由来已久的了。到汉朝时,京师与州郡全都定立起了训练和检阅的办法。唐代在春季、夏季和秋季鼓励农耕,到冬季讲求武备。汉唐治军都和古代很接近。明朝的王骥论述练兵的方法有五种,戚继光论述训练的方式有六类,你们能详尽列举他们的方式方法并予以阐发论证吗?对士兵打算使用出他们的力量,应当取得他们内心的拥护;打算振扬起他们的威势,应当用军礼统一起他们的行动。一定要首先熟悉坐定起立和前进后退的动作规范,然后就可以收到战胜敌人和勇猛杀敌的功效了。我朝凭借强大的武力威震天下,八旗兵和绿营兵分布陈列在京师和全国各地,原本上就是斟酌唐朝以折冲府为单位编成的军队和宋朝边区各部族组成的军队以及各州地方军队而定下的制度。可是好几年以来,盘踞在山营水寨的反贼找机会冒出来捣乱,尚未扫荡平定。这或许是因为将帅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呢?还是教导训练存在着不精详的地方呢?

总共以上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考察古代用来大力修养好身心,择取贤才用来辅佐朝廷的治理,传续学说用来维护好儒道,讲求武备用来筹划好国家,内心圣明而外部仁德的事体在这些方面上都表现出来了。你们这些读书人研求很有一番积累了,各自陈述直截了当的意见,不要有什么隐瞒。

徐郙　会试卷三道

徐郙(生卒年不详)　字颂阁,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同治元年

(1862)状元。光绪时曾奉敕对元人王恽所撰《承华事略》补图，为张鉴《西夏纪事本末》作序。历官礼部左侍郎、安徽督学使者等。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爱因恶见，仁之至也。夫仁人未有不爱人者，惟有所爱，斯不能无所恶也，非仁人而能若此哉？且仁人之用心，本有爱无恶者也。顾无所不爱者，仁人之心；而有必当恶者，仁人之用。因所爱而去所恶者，仁人之权；即所恶以成所爱者，仁人之术。始则恶与爱相别，继则恶与爱相济，终且见爱不见恶，而仁人之用心深矣，而世之称仁人者乃有据矣。媚嫉之人，其见迸于仁人若此，夫仁人非爱人者哉！然而仁人若不专于爱也，必有所恶方可别所爱也。然而仁人若仍专于爱也，恐忽所恶必且缓所爱也。夫爱人之仁人，而顾恶人若此哉！

天地好生之德，何人不可曲全？而郊遂之移，偏若无容稍待，仁人非故为刻核也。佥壬滥膺厚禄，君子每为之寒心。不辨所恶，又何以坚所爱也？仁人则有默寓其爱者矣。帝王不忍之心，何人不深保护？而寄棘之摈，偏若无敢姑宽，仁人非漫有区别也。朝右争树党援，正士即因而引退。不知所恶，势必将失所爱也，仁人则有善全其爱者矣。则将即所爱以观仁人，而仁人不遽恃其能也。斧钺严威，所以慑权奸，非所以资教育？乃自小人罢斥，即为豪杰奋志之秋。人以恶济爱之穷，仁人以恶妙爱之术也。则将即所恶以概仁人，而仁人犹未尽其能也。彰瘅巨典，可以惩宵小，即可以保善良。从知奇士奋兴，多在朝政清明之会。人以恶通爱之变，仁人以恶尽爱之心也。

何也？能爱即因能恶见也。古所称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其此之谓欤？此必有知之明者也，于所恶戒优容之弊，邪佞去而汲引弥宏，即于所爱昭委任之专，登进宽而朝纲自饬。爱恶之妙用，两而化亦一而神。人第谓刑威所及，仁人之立法綦严，岂知宽大为怀，仁人之用心更苦也，其所能固有独擅者矣。此必有断之决者也，有所爱斯有所恶，和平之内仍寓精明，全所恶即全所爱，刚果之中仍归浑厚。爱恶之权衡，两相反实两相济。人第谓嫉恶维严，仁人无事乎姑息，

岂知求才倍切，仁人自大其含容也，其所能有可确指者矣。惟其能爱，是以能恶也，非仁人而能若此哉？

喜爱什么通过憎恶什么而表现出来，这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啊！仁人从来没有不喜爱世人的，只因具有所喜爱的对象，这也就不能没有所憎恶的对象啊！不是仁人的话，能够做到这样吗？而且仁人的用心原本是只有喜爱而没有憎恶的呀！然而没有所不喜爱的对象，这属于仁人的心愿；而具有必定应当憎恶的对象，又属于仁人的施用。依据所喜爱的对象来去除掉所憎恶的对象，这属于仁人的权衡；依据所憎恶的对象来成全所喜爱的对象，这属于仁人的对策。开始时把憎恶与喜爱什么先区分出来，接着又把憎恶与喜爱什么配合起来，到最后使人只受到喜爱而不被憎恶，说明仁人的用心太深远了，而世上把他称为仁人也就具有根据了。好嫉妒的家伙被仁人摒弃到遥远流放的地步，这还不表明仁人喜爱世人吗？然而仁人如果不完全投注在喜爱的对象上，必定要有憎恶的对象才能够同喜爱的对象区别开来啊！然而仁人如果仍旧完全投注在喜爱的对象上，就唯恐忽略了憎恶的对象并且必定会慢待了喜爱的对象。喜爱世人的仁人，憎恶某些人也就像这个样吧！

天地喜好化生的大德，能有什么人不可以委曲地成全他们呢？而把那些不服从礼教的人转拨到郊区野外的学校去，偏偏就像稍微迟缓一下都绝不容许的样子，这并不是仁人故意做出苛刻的对待来呀！奸恶的小人胡乱就捞取到丰厚的俸禄，君子常常对这种情形感到寒心。不区辨出所憎恶的对象，又通过什么稳固住所喜爱的对象呢？仁人就有那默默地寄寓着他所喜爱的意向性的东西了。圣帝明王的不忍那样做的心念，能有什么人不深切地加以保护呢？而把大罪人摒弃到东部或西部等最荒远的地带，偏偏就像决不敢姑息宽恕的样子，这并不是圣人笼统地有些区别啊！朝廷上掌权的人竞相结成党派势力，纯正的人士就随后辞职离去。闹不清所憎恶的对象，势必就会丧失掉所喜爱的人。仁人就有那善于成全他所喜爱的人的做法了。于是特就喜爱的对象来观察仁人，而仁人却不一下子就仗持他那确能做

到的东西啊！惩治法办的威严，用来震慑权奸，并不是用来辅助教导培育吗？从小人被罢免斥退，也就成为豪杰奋扬大志的岁月。人们通过憎恶来补救喜爱达不到的地方，也正是仁人拿憎恶来使喜爱变得灵妙的方法啊！于是特就憎恶的对象来衡量仁人，而仁人仍然没有用尽他那确能做到的东西啊！表彰良善又震慑邪恶的盛大法典，可以惩办奸诈的歹徒，就可以保护善良的人们。由此就清楚奇异的人才振奋兴起，大多在朝政清明的阶段。人们通过憎恶来实现喜爱的转变，也正是仁人拿憎恶来尽到喜爱的用心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能喜爱什么也就通过它能把憎恶什么显现出来啊！古代所讲的只有仁人才做得到确能喜爱人，又能憎恶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这必须是具有圣明的洞察力的人，在所憎恶的对象上警戒那姑息纵容的弊害，去除掉奸邪献媚的家伙，而选取提携越来越广泛；在所喜爱的对象上彰明那委任的绝对不变，提拔进用很宽广，而朝廷纲纪自行就得到了整顿。喜爱什么和憎恶什么的巧妙施用，既形成两个方面而能化导，又融为一体而显出神妙来。世人只是说刑罚威慑所达到的地方，表明仁人设立法度极其严厉，可却哪里明白宽大为怀，仁人的用心更为良苦呢？他那确能做到的东西原本上就有独自掌握运用的了。这还必须是具有决断力的人，有所喜爱的对象，这才会有憎恶的对象，在温和平静的里面同时蕴含着精明；对所憎恶的对象毫不留情，也就等于对喜爱的对象毫无保留，在刚毅果断当中同时也归向浑厚。喜爱什么和憎恶什么的权衡，既两方面构成对立，实际上又两方面相互补充。世人只是说痛恨邪恶只管严厉，表明仁人对姑息纵容决不理睬，可却哪里明白求取贤才加倍地迫切，仁人自行就扩展他那包含容纳的器度呢？他那确能做到的东西就有可以具体指明的了。只因他能够喜爱，所以也就能够憎恶，不是仁人的话，能够做到这样吗？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即户以喻道，而人之不由者异矣。夫人而不由道，必能不由户而

后可也。观户之不得不由，人不当憬然悟哉！且一身之矩与一心之矩，皆矩之不可逾者也。矩属诸身，而跬步之间共遵其辙，岂矩属诸心，而隐微之际可轶其防？均此不可逾者，而从违判焉，迎距分焉。此不惟吾所不解，即人亦莫能自解矣。今夫为亿兆人峻其闲，而由之无分小大；为千百世严其范，而由之无别古今者，岂独一户也哉！

即以户论：户之为地也无多，由之则安，不由则危，由之则通，不由则塞，树以的而智愚胥莫能越，已隐动以贤关圣域之思。户之于人也至便，由之则顺，不由则逆，由之则一，不由则歧，正其趋而进退胥莫能违，更显示以义路礼门之准。是则即户可见道也，即由户可悟道也。人既不能离乎户，即不能离乎道矣。而今之不由道者何心？岂以趋步之时，范围至密，道则无方无体，守乎故迹而转病拘墟，辟以新机而愈形变化，似不妨别开一径，见矩矱之从心。岂以周旋之地，绳墨至严，道则有经有权，泥乎其中而转嫌执滞，超乎其外而愈觉神奇，更不妨别设一途，表转移之妙用。

虽然，道而莫由，必能不由户而后可也。而能不由户者谁哉？而竟莫由道者何哉？假令敛纵恣之怀，而即户以悟准绳，即出以端趣向，将循途守辙，何不可入室而升堂！而惜也由户则明，由道则昧也。举动自有常经，而课诸心性之间偏疏检束；进退自有常度，而叩诸神明之地独懈防维。是有形之范，虽庸众莫能违；无形之范，虽豪杰亦将越也。周行我示而动辄多乖，吾能无窃然讶之？假令逞跅弛之习，而户并不立之限，出更莫定其趋，将趾高气扬，愈不难偭规而错矩！而幸也责以道则茫然，语以户则惺然也。知纳身有轨物，则视听言动何可稍忽持循？知举足有检闲，则弟友子臣何敢稍宽责备！是至显之则，既予人以不能易；至微之则，亦示人以不可离也。事非难能而当前即是，吾能无殷然望之？

特就房门来喻示仁道，而世人中却不遵从的人可就显得太奇怪了。作为人却不遵从仁道，必定就准像不经过房门，然后可以走出来似的。观察房门不得不经过，作为人还不应该马上醒悟吗？况且自身行动的准则和内心活动的准则，都是不可逾越的固定准则啊！准则既

然体现在自身行动上,而在半步一步之间都要遵循那路径,而准则也体现在内心活动上,又哪能在萌芽状态时可以放松那防备呢?这都属于不可逾越的东西,应该依从什么和违逆什么也就鲜明地区别出来了,迎受什么和抵御什么也就完全划分出来了。这不只是我摆脱不了的事体,就是任何人也无法能够自己摆脱掉的了。如今为亿万人加强那防止邪恶的训戒,而遵从仁道就根本没有大事、小事的区分;又为千百代强化那归就的法度,而遵从仁道就根本没有古代和当今的差别,哪里仅仅是一扇房门呢?

就拿房门来说,房门占去的空间并不大,但经过它就安全,不经过它就危险;经过它就畅通,不经过它就阻塞。树立起目标而聪明人和愚笨人全都无法超越出去,已经暗暗地引起了对贤良关城和圣明地带的向往。房门对于世人最为便利,经过它就顺利,不经过它就被顶回来;经过它就行动一致,不经过它就各走各的,端正那趋向而前进或后退全都无法违背,转而显示出正义路途和礼法大门的归宿。这就表明专就房门可以看出那仁道来呀!专就经过房门可以体悟出仁道来呀!作为人,既然没办法脱离开房门,也就没办法脱离开仁道了。可如今却不遵从仁道的人,究竟是什么用心呢?恐怕是因为具体行动时,各种限制十分严密,仁道却没有边际也没有主体,循守旧路数却转而造成孤处一隅的狭隘弊病,辟设出新的机缘却更加显示出变化来,似乎不妨再另外开辟出一条蹊径,看到准则法度支配好心念。又恐怕是因为在应对的范围内,各种规定十分严格,仁道却既有不可改变的原则又有灵活处理的方式,完全陷在里面却转而形成固执僵化的拖累,超脱出来就越发感到神妙奇异,进而不妨再另外开设出一条途径,彰显出转移的巧妙施用。

尽管是这样,放着仁道却不遵从,必定就准像不经过房门然后可以走出来似的。然而能不经过房门走出来的会有谁呢?终竟也不遵从仁道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假设收敛起放纵恣肆的欲念,特就房门去体悟那准绳,特就出屋后去端正那趋向,也就会循守路途辙迹,怎能不抵达仁道的最高境界呢?但只可惜很清楚要经过房门但却不懂得要遵从仁道啊!一举一动本来具有固定的规范,可在心念与人性之间

做好自我勉励却偏偏对检核约束不当一回事儿。进前退下本来具有固定的标准，可在自我认识的范围内进行反问却唯独对防止事宜很松懈。这表明看得见的约束条规，即使是平庸的众百姓也不能违反，而看不见的约束事项，即使是豪杰也有可能超越出去。走完全程我来观视，而一动就有很多违背的表现，我能够不私下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吗？假设盛行起放纵废弛的习气，而房门全都不安设门槛，出屋后转而确定不下行进的方向，也就会趾高气扬，更对违反和改变既定的法则不感到畏难了。万幸有人用仁道来责问他，他却一无所知；拿房门来开导他，他却似懂非懂。懂得自己一参予进来就具有奉为准绳的东西，从观看、闻听到说话、行动，哪能稍微忽略那持守遵循的规矩呢？懂得一抬脚就有应该自觉约束和自行防止的东西，对弟子、友人、儿子、臣僚哪敢稍微放宽那责备呢？这表明达到显著状态的法则，已经拿绝对不可改变的要求授付给人们了；处于最隐微状态的法则，又用绝对不能片刻脱离开的要求喻示给人们了。事情并不是难以做到，而当前就都明摆在那里，我能够不殷切地对此抱以期望吗？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忧乐同民，以天下为量者也。夫以民之忧乐为忧乐，而应之者亦如之。其忧乐也，谓非以天下为量哉！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吾心之忧乐犹与天下歧，而天下之忧乐未与吾心合也。合天下之忧乐于吾心者，君以其心通万姓之心，心与心相浹；民以其心答一人之心，心与心相酬。而上之心见焉，而下之心孚焉。乃叹心乎民者，未有不统天下之心为心也。臣言与民同乐，夫乐与忧相反，而忧与乐相因，夫亦心乎天下之心而已。

天不言利而其利溥，君不言恩而其恩周。民岂必以乐告哉？乃廊庙之精神，息息与民相感召。莫乐于年书大有，耕凿以享太平，而劳农劝民，孰贻其惠也！莫乐于野息催科，优游以歌卒岁，而轻徭薄赋，孰沛其恩也！迨至茅檐兴孔迩之歌，蒂屋切媚兹之愿，君所乐者，民亦

乐矣，而乐之同民者大而公。施之博则立达推诸人，救之急则饥溺归诸己。民岂必以忧示哉？乃朝廷之经画，在在与民相周旋。莫忧于饥馑频仍，鸿之嗷也可悯，而蠲租减税，为恤困穷也。莫忧于流离相弃，鹿之铤也堪虞，而推食解衣，为谋安集也。迨至鼙鼓效趋公之谊，戈矛兴敌忾之思，君所扰者，民亦忧矣，而忧之同民者周且至。

是则乐民乐，忧民忧，若相关也；乐其乐，忧其忧，如相报也。不自为乐，而乐必以天下；不自为忧，而忧必以天下。有相通，无相间也。必待乐与忧之显著，而始窃窃焉思给其求，此其量亦隘而不广，同民者不若是也。高拱在宫庭，而当世之欣戚悲愉，恍以意告。登民于衽席，一举念必策安全；拯民于疮痍，一清问必廑疾苦。天下虽大，以一己之忧乐絜之，好风好雨达其情，咎暑咎寒弭其憾。量之广者忧乐，非为一己之私，而民隐已通于无间。惟其以天下为任也，而境内不待言矣。如谓乐与忧之同然，而必皇皇焉思责其报，此其意亦伪而不诚，同民者不如是也。絜矩在好恶，而斯人之安危利害，各以类从。为民阜财求，开衣食之源于不竭；为民弭灾害，除水火之厄于不知。天下之民虽纷，以一己之忧乐联之，钟鼓羽旄有喜色，缺斨破斧无贰心。意之诚者忧乐，勿狃一成之见，而民志已喻于无言。惟其以天下为量也，而疆域不必分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忧愁与欢乐同老百姓相一致，这属于把整个天下作为自己的度量的人啊！把老百姓的忧愁与欢乐当成是自己的忧愁与欢乐，而老百姓做出的回应也和它一个样。这样的忧愁与欢乐，能说不是把整个天下作为自己的度量吗？况且在天下人忧愁以前就已经先忧愁了，在天下人欢乐以后才感到欢乐，这种在我内心形成的忧愁与欢乐可能还会与天下人有出入，而天下人的忧愁与欢乐未必就与我内心的感受全一致啊！把天下人的忧愁与欢乐聚合在我的心中，君主用他那颗心去沟通万民的那颗心，心与心就相互融汇在一起；老百姓用他们那颗心去报答君主一个人的那颗心，心与心就彼此酬谢。而上面人的那颗心显现出来了，下面人的那颗心就应合了。于是感叹把心念投注在老百姓身上的人，就没有不统领起天下的心念而把它作为自己

心念的呀!臣下我讲论与老百姓的欢乐相一致,欢乐与忧愁尽管彼此对立,但忧愁与欢乐又相互承顺,这也就是把天下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罢了。

皇天并不宣称自己对人间有什么好处,可它给人间带来的好处却非常广泛;君主并不声明自己对百姓施布什么恩惠,可他那恩惠却施布到每个人。老百姓哪里一定要拿自己多欢乐来禀报呢?正是皇室的精气神明,息息与民众相互感召。没有什么能比每年都记载下万物大丰收,耕田凿井来享受太平更使人感到欢乐的了,而在农耕上辛勤劳作,激励民众,这是谁送给他们的恩惠呢!没有什么能比乡野上停止了催交赋税的喊叫声,优闲自在地歌咏又渡过了一年好时光更使人感到欢乐的了,而减轻徭役,少收赋税,这又是谁广泛施布的恩德呢!等到民间兴起了父母就在身边的歌谣,里巷涌生了强烈地喜爱这位天子的愿望,君主所感到欢乐的事情,老百姓也为它感到欢乐了,而与老百姓的欢乐相一致的东西,既广大又公平。施布得普遍,就把自己站得住和自己事事行得通推及到别人;救助得急切,就把别人挨饿受淹放到自己头上来仔细想。老百姓哪里一定要拿自己多忧愁来告知呢?正是朝廷的筹谋策划,处处与民众相互围着转。没有什么能比饥荒接连出现,如同鸿雁的哀叫声真值得怜悯而更使人感到忧愁的了,而免除或减轻租税,为的是体恤困乏而走投无路的人们啊!没有什么能比四处逃亡丢下亲人,最终起来造反太值得担心而更使人感到忧愁的了,而把食物让给别人吃,把衣服解下来让给别人穿,为的是谋求安抚并聚集起众百姓啊!等到外敌入侵时全都献出那为国家赴难的正义感,面对战争兴起那同仇敌忾的意念,君主所感到忧愁的事情,老百姓也为它感到忧愁了,而与老百姓的忧愁相一致的东西,既周全又极深。

这就表明为民众的欢乐而感到欢乐,为民众的忧愁而感到忧愁,就像彼此连结在一起啊!为君主的欢乐而感到欢乐,为君主的忧愁而感到忧愁,就像相互报答啊!不把自己的欢乐当成欢乐,而欢乐必定以天下人为转移;不把自己的忧愁当成忧愁,而忧愁必定以天下人为转移。这就只会有彼此的沟通,而没有彼此的阻隔啊!一定要等到天

下人的欢乐与忧愁非常明显了,才去私下里琢磨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这表明他那度量也太狭窄而不广大了,与老百姓保持一致的人决不是像这个样子啊!高高地稳坐在宫廷上,而当世的欣喜欢愉和悲哀愁苦,恍然就从心里意识到它们。把百姓带入到安宁的境地,有一个想法产生出来必定就考虑怎样去成全保护他们。把民众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有一个清晰详明的询问必定就关注他们的疾苦。天下尽管广大,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忧愁与欢乐把它统领起来,对百姓的不同喜好能够了解出那倾向,对持续高温和持续严寒的反常现象消除它们的谴告。度量广大的君主,忧愁和欢乐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私欲,而民众的痛苦已经沟通到毫无阻隔的地步。只因他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而辖境以内的景象就不需要再言说了。如果认为自己的欢乐与忧愁就同民众一个样,可却一定要迫不及待地想让百姓做出回报来,这表明他那动机也纯属虚伪而不诚实了,与老百姓保持一致的人决不是像这个样子啊!准则法度表现在理应喜好什么和憎恶什么上,而当今世人的安危利害,各自依照类属来安排。为民众扩充财富的需求,就把衣食的来源开拓到永不枯竭的地步;为百姓止息住灾害,就把水灾旱灾的劫厄消除在让人简直感觉不出来的程度。天下的民众尽管纷杂,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忧愁与欢乐把它联结起来,使百姓听到君主鸣钟击鼓的奏乐声和看到君主仪仗的华美都眉开眼笑,随同出征打得特惨烈也没有叛离的心思。动机真诚的君主,忧愁和欢乐并不局限于一成不变的看法,而民众的心志已经喻示到不用再说的状态了。只因他把整个天下作为自己的度量,而疆域就不用必须去划分了。然而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了!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执中者建极之基,选士者绥猷之本,修道者崇儒之要,振旅者经武之谟。综观往牒,《诗》咏缉熙,《书》歌喜起,《易》重闲存之训,《传》详蒐阅之文。自古帝王,握镜临宸,膺图御宇,以勤位育则精一宏昭,以饬纪纲则俊髦灼见,以端学术则辨析维精,以壮声灵则

筹防尤密。悉本夙夜勤求之念,以握天人交应之符。用是玉金式度,帝学宏焉;舟楫程功,名材萃焉;苞符阐秘,至理昭焉;旄钺巡师,军威振焉。所由弥纶宙合,蒸被垓埏,迓蕃禧而膺多祜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斟元肇治,执契平衡,配道义以中和,寓怀柔于震叠。固已心传丕绍而翼赞咸孚,性理胥融而肤功迭奏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体至善之无遗,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阐心法、简人材、辨儒修、讲武事诸大政。如臣椿昧,何足以仰赞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素所肄习者,以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授受心法,以尧舜执中之言为始,而因进求夫修己治人之术。此诚致治之先务也。臣谨案《禹谟》执中之言,尧舜相为授受,上以继黄帝颛顼,下以开千圣百王。是故太公为武王陈《丹书》,言黄帝颛顼之道皆在于斯,因述敬胜义胜之旨,则虞廷之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固已有所仿矣。夫皇古之治,胥本于道。道以性为符,性又以心为宰;中者道之的,敬者中之衡。主敬存诚,心所为於穆不已也;立中生正,道所为化育靡穷也。迨孔子合内圣外王之学,一以贯之,赞《易》而至《坤卦·文言》,探《丹书》之精蕴,曰敬以直内,则体以密而常贞,曰义以方外,则用以周而胥达。继之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大抵审端致力,敬义兼资,修己治人,直方尤要。而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之翼翼,罔不居宅中焉。汉文慈惠恭俭,比迹成康,迄今读其诏令,犹想见抑然自下之意,诚令主也。若唐太宗,则驾驭之略有余,修齐之德不足,圣王心法去之远矣。至于章句训诂之流,更何足论哉!皇上御极之初,首崇典学,不难探敬义之源,以绍唐虞之盛也。

制策又以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因于发号施令之端,求除暴胜残之术。此诚行政之大纲也。臣窃观古昔帝王,莫不以知人善任为先务,而其用之也,有其难其慎之思。盖专循资格,则闲冗卑弃,而奇材转虑不彰;徒凭保举,则冕笏不澄,而实行每虞难核。是以循虚器者,非应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机。此登明选公所由难也。宋儒司马光言,孔门以四科取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

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因即原本此意，乞朝廷设十科以举士。曰行义纯固，曰节操方正，曰知勇过人，曰公正聪明，曰经术精通，曰学问赅博，曰文章典丽，曰善听讼狱，曰善治财赋，曰练习法令。盖宽其格以求士，则野无遗贤；核其实于当官，则朝无幸位。不然而滥竽充位，觀俱贻讥，虽治具毕张，徒为故事之奉行而已。有治人，无治法，荀子之言深可味也。若由治人治法而溯其本原，则朱子所谓正心术以立纪纲者，尤为切要矣。董子曰：为政不行，甚者必改而更易之。夫更，非纷更之谓也。有恪恭震动之意，而人心为之一新；有骏肃严厉之风，而积弊为之一变。由是而发号施令，除暴胜残，可收其实效焉。皇上轸念民依，勤求治理，将见贤才日进，而海宇感庆乂安矣。

制策又以心性之学盛于宋儒，因即溯其源流，以求体用兼赅之效。此阐明圣教之盛心也。臣惟汉儒之学见《儒林传》者，渊源具有可征。古无道学之名，判《儒林》与《道学》，《宋史》之创例，所以推崇宋儒，别于汉儒之经术也。周子师事陆诜，闻道最早。二程同受业于周子，明道所著《定性书》，阐圣学之秘，与《太极图说》相表里。杨时以师礼见明道，相得甚欢，后事伊川愈恭。一传而罗从彦之潜思力行，再传而李侗之充养完粹，又再传而朱子出，遂集诸子之大成。濂洛关闽，其源一也。惟象山陆氏谓伊川之言与孔孟不类，又以朱子教人为支离，而后世遂有朱陆异同之辨。明薛瑄以程朱为道学正派，而王守仁则专宗陆氏，由是理学之中又分朱陆两途。究之象山鹅湖义利之辨，朱子未尝不为心折。若以学成致用而论，陆氏固尝居乡御寇，王守仁江右粤西战功尤著。而程子、朱子致君泽民，其展布亦章章可考，未有空谈心性而无所表见者，亦足征体用之一源已。皇上聪明天亶，特简儒臣讲求正学，理学之隆固超越千古矣。

制策又以诘戎之道，教戒为先，而因求教练之法。此安民和人之要图也。臣谨考成周之制，中春蒐而振旅，中夏苗而茇舍，中秋狝而治兵，中冬狩而大阅，四时教战，三年大校，养天下奇杰之气于礼义之中，法诚尚矣。汉制秋后郊礼毕，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此京师教试法也。郡国材官骑士，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此

州郡教试法也。唐府兵之制，三时劝农，一时讲武，其训练之法犹为近古。夫兵贵乎精，当先训练。明王骥论练法有五：练胆、练技、练阵、练地、练时。有此五练，而行之以信，恤之以仁，庶几人人思奋矣。戚继光《练兵实纪》所称：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亦可为法之善者。盖欲用其力，当结其心；欲振其威，当齐以礼。必先娴坐作进退之节，而后可收克敌致果之功，又何患潢池窃发欤？圣世棱威远播，神武聿昭，岂前代之成规所得而相提并论哉！

若此者：稽古以懋修，求贤以辅治，传道以立教，肄武以卫邦，汪汪乎丕天之大律，震古铄今，莫之与京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本钦明睿哲之谟，臻文武圣神之盛。知仁已裕而犹毖就将，桢干已储而更殷简拔，问学已道而益懋性功，战守已娴而弥严肄习。审保泰持盈之术，贞励精图治之思，扇巍巍，显翼翼，体尧蹈舜，甄殷陶周。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属于建立起最高行为准则的根基；选取人才，属于用大道教化安定住百姓的本原；修明道德学问，属于推崇儒家学说的纲要；整顿军队，属于筹划武备的谋略。综合考察古代的经典，《诗经》中咏赞圣学达到大放光明，《书经》中歌颂大臣喜悦而君主兴起，《易经》中重视防止邪僻又保持真诚的训导，《左传》中详述演练和检阅的内容。自古圣帝明王握持金镜高居帝位，膺受天赐神图统领天下，专去在天地保持正常状态和万物化育上下气力，精粹和专一就得到普遍的昭示；专去强化朝廷纲纪，优秀突出的人才就看得一清二楚；专去端正学术，区辨剖析就只有精详；专去壮大声名灵威，筹划部署和防备抵御就特别周密。这一切全都出自从早到晚勤勉求取的心念，用来把握住皇天和人间彼此感应的征象。由此像金玉那样树立起君主器度才德的典范，帝王的学问就宏阔了；对像过河的船只与船桨那样协助政事的大臣提出应建立的功绩，著名的贤才就都聚集在朝廷上了；对《春秋元命苞》和

《感精符》这类图籍阐明其中的奥秘,最高的事理就全明晰了;运用封赏与惩罚的大权去视察部队,军威就振扬起来了。达到那筹措宇宙和上下四方,兴盛的气象延布到九重天和大地的八方边际,迎受众多的福庆,承受皇天的各种佑护,靠的就是这些措施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斟酌元气的形态重新开创大治的局面,抓住吉凶的依据来衡量人才,用中正协和来配备道义,把安抚感召寄寓在威慑当中。原本上已经在心治大法的传授上全面加以承续而辅佐治理的臣僚也全都符合要求了,人性与天理融为一体而盛大的战功也轮番奏报上来了。可圣明的心怀却自我贬抑,更加关注征询访问,体悟最美好的意见应当没有任何的遗漏,希望浅近的言论能够察知。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特用阐明心治大法、选取人才,辨明儒士的品德修养,讲求武备等重大的政务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一窍不通的人,哪里足够用来往上协助皇上高远深邃的谋划呢?然而正当开始对答称扬圣命的时候,恭谨地想到用言辞全面稟奏的古义,敢不努力陈述平常所研习的东西,来献上那一把土和细小水流般的一点点儿辅助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圣帝明王传付和承受的心治大法,正把唐尧虞舜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句话作为创始的标志,据此来进一步探求修养好自身与治理好百姓的办法。这确实是实现大治的头等大事啊!臣下我恭谨地验核《尚书·大禹谟》中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句话,唐尧虞舜构成一个传付而另一个承受的关系,往上用来接续黄帝和颛顼,往下用来开启历代圣帝明王。因此姜太公特为周武王陈奏《丹书》,宣称黄帝至颛顼的大道全都载录在这上面,随后阐述虔敬胜过懈怠就吉利、道义胜过私欲就顺畅的义旨,这表明虞舜君臣察辨人心只是危险而道心只是隐微,原本上已经早有效仿的东西了。三皇远古时代的治理,全都依凭那大道。大道把人的本性作为标志,人性又把心念作为主宰。不偏不倚是大道的靶心,恭敬是不偏不倚的秤杆。把恭敬作为主导,保持住虔诚,心念就由此深远而不止息;确立起不偏不倚来,形成公正,大道就由此化生养育而无穷无尽。到了孔子那里,汇合起内心圣明而外部仁德的学问,连贯成一个

整体，解说《易经》而到《坤卦·文言》部分时，探究《丹书》的精深义蕴，强调靠虔诚来使内心正直，主体也就由此变得缜密而永远纯正了；强调靠道义来使行为方正，施用也就由此变得周详而全都通达了。接下来又讲正直、方正、广大，即使不熟悉某些事务，处理起来也没有不顺利的了，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也不疑虑了。大体情况是，审查入手处，下气力去遵用，虔敬和道义互相配合，修养好自身，治理好百姓，正直和方正更显得紧要。而唐尧的警戒谨慎，虞舜的忧危恐惧，夏禹的勤勉不懈，商汤的时刻担忧，周文王的格外小心，无不处在不偏不倚的位置上啊！汉文帝仁慈恩惠，恭敬节俭，和周成王与周康王差不多，直至今天阅读他所发布的诏令，仍然可以想象并看出他那自我贬抑而甘愿在人之下的意念，确实属于杰出的君主啊！像唐太宗就显得驾驭天下的雄才大略用不完，而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的德行却很不够了，圣明帝王的心治大法在他身上就偏离得太遥远了。至于给经书划分章节、做出字词解释的那类君主，还哪里值得一提呢？皇上在登上帝位的起始阶段，就首先推崇致力学问，也就不难探求那虔敬和道义的本源，承接起唐尧虞舜的大治景象了。

皇上的制策又鉴于作为众人君主的人，在求取贤才上特费力而在获取到人才以后就很省力了，据此而在向天下发号施令的起点上谋求去除凶暴、战胜残忍的对策。这确实属于推行开政务的大纲领啊！臣下我私下观察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谁不把知人善任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的。但在选用上，也存在着很难办、要慎重的想法。这是因为完全依照资历品级来行事，闲散多余的官员就自卑自弃，而奇特的人才转而忧虑自己怎么也显露不出来。光靠荐举担保，可荐举担保的意见并非完全不夹杂私意，而实际的品行又常常担心事先难以验核。因此光按虚名被荐举的人，并不是能够应对事物的真材料；要弄空泛言论的人，并不是能够实现治理的好部件。这正是进用明晰和选取公正很难办到的原因啊！北宋儒臣司马光强调，孔子学派通过德行、言辞、政事、文化知识这四种类型来选用士子，汉朝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到人才。倘若一味挑毛病却看不到长处，朝廷上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选；如果依据特长来授官任职，世上就没有能够舍弃掉的

读书人。随后就依据这种认识，乞奏朝廷设立十种科目来选用读书人。一是叫做品行道义纯正坚定，二是叫做节操方正，三是叫做智谋和勇力超过众人，四是叫做公正又听得准来看得明，五是叫做儒家学问很精通，六是叫做各种学问很全面又广博，七是叫做文章典雅清丽，八是叫做擅长审理案件，九是叫做擅长处理财政和税务，十是叫做熟悉法令。这是出自拓宽那标准规定来求取人才，民间就不存在被遗漏掉的贤士；对现任官员验核他的实际表现，朝廷就没有被捞走的职位。否则的话，跟着瞎胡混的人占据了官位，败坏公事而留下笑柄，即使治国的各项规章全都摆列在那里，也只是按惯例走走过场罢了。世上存在着真会治理的人，并没有肯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度，荀子这句话值得让人深深体味啊！如果从治理的人和治理的法度追溯到它们的本原，朱熹所讲的端正心术，用来确立起朝廷的纲纪，就更显得紧切重要了。董仲舒说：施行政务却贯彻不下去，对严重的情况必须要加以改正，进行变革。所谓变革，并不是说乱变一通啊！君主具有虔诚恭敬和震击撼动的意向，而人心为它焕然一新；朝廷具有疾速威严和严明凌厉的风气，而积弊为它彻底改变。由此而向天下发号施令，去除凶暴和战胜残忍，就可以收到实际的效果了。皇上深切关心民众的疾苦，勤勉地谋求治理，眼看着就会贤才一天比一天得到进用，而天下都感念并欢庆大治安平了。

皇上的制策又认为人心和人性的学问在宋代儒士那里变得盛兴起来，据此而特就他们的源头与分支的追溯，来求得主体与施用同时具备的效应。这是阐明圣人教化的盛大用心啊！臣下我想来，汉代儒士的经学在《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看得到的，传授系统可以详明地考察出来。古代并没有道学这个名称，把《儒林传》和《道学传》明显地划分开而并立，这是《宋史》首创的义例；目的在于推崇宋代的儒士，并同汉代儒士的经术区别开来。北宋周敦颐拜从陆诜为师长加以事奉，闻知大道时间最早。程颢程颐兄弟一起从周敦颐那里承受到学业，其中程颢所编著的《定性书》，阐发圣人学问的奥秘，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互为表里。杨时用对待师长的大礼去拜见程颢，彼此谈得很投机，非常欢洽，后来事奉程颐，越发恭敬了。经过头一批传授，而

弟子罗从彦形成了默默思索、大力践行的特点;经过第二批传授,弟子李侗又形成了充实和涵养全面又精粹的特点;经过第三批传授,朱熹挺立出来,于是汇集起各个学者的主要成就。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和朱熹,他们的学说全都出自同一个本源啊!只有陆九渊认为程颐的说法与孔子、孟子并不相像,又认为朱熹教诲世人的东西纯属支离破碎,于是到后世就产生了朱熹和陆九渊不同之处的分辨。明朝的薛瑄把二程与朱熹看成是道学的正宗派别,但王守仁却完全宗奉陆九渊,由此在理学内部又分化成两个发展方向。验核陆九渊在鹅湖寺讨论会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的辨析,朱熹也未曾不被它所内心折服。如果拿学问形成而目的在于达到运用来做讲论的话,陆九龄固然曾在故乡抵御盗贼的骚扰,王守仁在江西和广西时,战功更为突出。而程颢程颐和朱熹使君主向尧舜看齐,给百姓带来好处,他们的施展播布也非常明显地可以考察出来,不存在那些空泛地谈论人心和人性却没有具体的彰明显现的东西,这也就足以证明主体和施用是本源相同的了。皇上耳聪目明的秉性由皇天来赋予,特意挑选儒臣讲求纯正的学问,理学的隆盛固然已经远远超过从前的任何时代了。

皇上的制策又鉴于整顿好军队的措施,要数训练和戒饬占居第一位,据此谋求教导和训练的方法。这可真是安定民众致使世人和睦的重要考虑啊!臣下我恭谨地考察周代的制度,每年春季二月举行捕杀没怀孕的那些动物的打猎活动和收兵回入都城的仪式,夏季五月举行捕杀幼驹没生下来的那些动物的打猎活动和野战宿营训练,秋季八月举行捕杀那些该捕杀的动物的打猎活动和武器装备的整治,冬季十一月举行捕杀各种动物的打猎活动和大规模的检阅,四季都在农闲时教导作战,每隔三年进行大比武,在礼节和正义中培养全天下的奇士英杰具有的志气,这种制度的确由来已久了。汉朝的制度规定,在秋后郊外祭祖大礼结束后,集合禁卫军五营的士兵演练八卦六十四阵的进退动作,这是京师教练和检阅的方法。各郡和诸侯王国的材官、骑兵这些兵种,在八月由太守、郡都尉、县令县长、县丞县尉集中起来进行联合比武,排定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名次,这是州郡教练和检阅的方法。唐朝以折冲府为单位编成的部队的制度规

定，春季、夏季和秋季鼓励农业生产，冬季讲求武事，它那训练的方法仍然和古代很相近。军队贵在精强，应当把训练放在首位。明朝的王骥论述训练的方法共有五种，即训练胆量勇气，训练刺杀技艺，训练阵式变化，训练地形利用，训练气候适应。设布下这五种训练项目，又用诚信带动起士兵，用仁爱去体恤士兵，差不多就人人都想奋勇作战了。明朝戚继光《练兵实纪》所讲到的有：一要训练队列配合，二要训练胆量勇气，三要训练听辨观察，四要训练刺杀技艺，五要训练扎营布阵，六要训练将领，这也够得上有效的训练方法。一般说来，对士兵打算使用出他们的力量，应当取得他们内心的拥护；打算振扬起他们的威势，应当用军礼统一起他们的行动。一定要首先熟悉坐定起立和前进后退的动作规范，然后就可以收到战胜敌人和勇猛杀敌的功效了，这还忧虑什么盘踞在山菅水寨的反贼突然出来捣乱呢？我们圣明的大清朝威势远远播扬，神圣武功普遍昭示，又哪里是以往朝代的成规能有资格来相提并论的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考察古代，用来大力修养好身心；求取贤才，用来辅助朝廷的治理；传续道学，用来确立起社会的教化；练习武事，用来保卫好国家。万分雄盛地承顺皇天的重大法则，震撼古代，照耀今世，没有谁能与我朝等量齐观了。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已经实现了大治，再进一步谋求大治；已经提高道德水准了，再天天加以提高。依仗恭谨明察和机智巧妙的谋略，步入有文有武又圣明神妙的鼎盛状态。智慧与仁德已经宽广了，但仍对圣学的日积月累保持谨慎的态度；国家栋梁已经储备起来了，但更关注选拔任用；研求儒学已经达到明了大道的地步了，但更在心性修养的功夫上予以扩展；进击防守已经熟练了，但越发强化训练演习。审慎对待处于强盛阶段更要多加小心来保住太平的策略，端正那励精图治的心念，播扬盛大的德政，显示京师的威严，揣摩唐尧，继承虞舜，限定住商朝，改造周代。我们国家永远政治清明的长远国运，也就建立在这四方面政事的基础之上了。臣下我属于学问浅陋和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忌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郑曼明译]

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

殿试策问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诞膺宝祚,默荷上苍垂佑,仰承列圣贻谋,业业兢兢,勤求治理。上思副两宫之教育,下期措四海于乂安,宵旰图维,罔敢暇逸。深念典学传心之要,求贤佐治之方,去奢崇俭之规,察吏安民之术。经邦要道,莫重于斯。今当临轩发策,博访周咨。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而《尧典》以钦始,《益稷》以钦终。其与执中之理,可互相发明欤?《尚书》而外,诸经之旨,何者可以相通?《大学》一篇分列八条目,当以何者贯乎始终?《中庸》一书分列三达德,当以何者为之枢纽?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何以略治、平不言?明邱浚补之,为目凡十有二。其立意颇可贯通欤?昔人谓帝王之学异于儒生,所以不同者安在?将空语精微而不求诸实事欤?抑博观约取而得其要领欤?如汉之董仲舒、匡衡,宋之程颐、胡安国、朱熹,皆宿儒硕学、多所阐发者也。何者为审端致力之首欤?

得贤才而治天下者,帝王之要道也。古者用人之权秉于天子,若尚书之有选部,始于何时?以选部为吏部,起于何代?唐制有试法,有集法。既察其身言,复察其书判,此试法也。裴光庭何以作《循资格》以矫之?集之于十月,选毕于三月,此集法也。陆贽何以立《计阙例》以救之?然则二者固皆不能无弊欤?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汉分

四科，宋立六科，司马光又乞设十科，至详且备已。然人才遂可尽取而无遗欤？且所取者，果综核名实而无矫伪欤？今将使魁奇倜傥之士不轶乎范围，恂谨廉洁之儒不拘于绳尺，其道何由？

《书》曰：慎乃俭德。诚以俭，德之共也。尧不以土阶为陋，而舜怵戒于涂槉，禹卑宫，文王卑服，尚已。嗣是衣弋绨，罢露台，集书囊为帷，往迹流传。盛德不犹可溯欤？古人臣励《羔羊》素丝之操。如赵抃守成都，一琴一鹤；程炳令盐城，一马一仆。其高节清标，非臣下所当矜式欤？夫缕簟朱纮，玉缨琼弁，自昔所讥；乃积习相沿，敝化奢丽，以致不能养廉。《蟋蟀》、《山枢》，民风近古；今则服食器用，务为美观，闾阎不免逾礼。将以黜华崇实之意训迪臣民，何由而使风气日臻朴茂欤？

与吾民相亲者，守令也。汉史《循吏传》纪守、相甚备，而令长则阙如，其故何欤？夫天下郡邑至众也，郡守之贤否，监司且难人人悉。县数倍于郡，令数倍于守，如何而后能督察之欤？县令贤明，则赋敛均，徭役平，诉讼简，吾民得遂其所安。顾由儒术者多迂而弛事，由杂流者或奸而弄法，其余蠹政厉民不可枚举。欲整齐而磨厉之，何道之从？大吏者，所以纠察守令、为天子进贤退不肖者也。乃或所荐剡者，以才能出众为先，而留意教化者遭沉滞。所称赏者，以赋税先登为最，而劳心抚字者受谴诃。其何以惩贪墨之风而养循良之气欤？

夫稽古以懋纯修，遴才以襄郅治，戒奢以端民习，课绩以饬官方，皆宰世之宏模，绥猷之极则也。多士对扬伊始，其各陈谠论，毋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十分畏服民心，这就叫知道根本。

他养育民众有恩惠，他役使民众有限度。

于是开始开仓放粮来赈济缺粮的人，召来乐官大师，说：为我演奏使君主和臣下都感到快乐的音乐。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幼年继承皇位，默默膺承上天的保佑，秉承列祖列宗留下来的规划，兢兢业业，勤奋谋求国家的治理。对上想要对得起两宫太后的教育，对下期望能使四海太平安康，因而宵衣旰食图谋国家的稳定，不敢怠惰和贪图安逸。深深挂念着学习和传心养性的要诀，寻求贤能及辅佐政治的方法，去除奢侈和崇尚俭朴的手段，考察官吏和安定民众的办法。治理国家的重大方针，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今天在这前殿提出策问，要广博访问，周密咨询。各位贡士，请恭敬听好皇帝我的命令。

二帝三王的传心养性之法不外乎一个“中”字，而《尧典》以“敬”开始，《益稷》以“敬”终结。“敬”与“保持中道”的道理，可以互相发挥和阐明吗？《尚书》之外，各经典的主旨，哪些可以与此相互贯通？《大学》一篇分列八个条目，应当用什么来为它们贯穿始终？《中庸》一书分列有三种“达德”，应当用哪一种来作它们的枢纽？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为什么忽略“治国”、“平天下”不谈？明朝邱浚为他作了补充，设有十二个条目。其立意是不是可以十分贯穿融通？从前的人说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是空谈精微而不求诸实事好呢？还是博观约取而得其要领好呢？再如汉朝的董仲舒、匡衡，宋朝的程颐、胡安国、朱熹，都是有声望、博学、提出了许多见解的人，他们所强调的抓准入手处，下大力量去实行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得到贤才而治理天下，是帝王的重要原则。古代用人的权力执掌在天子手中，至于尚书设有选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把选部改为吏部，是从哪一代开始的？唐代的制度有试法、有集法。既观察其外貌和语言能力，又观察其书法和办案能力，这就是试法。裴光庭为什么要作《循资格》来矫正它？在十月集聚，在三月选定，这就是集法。陆贽为什么要创立《计阙例》来补救它？既然如此，那这两者难道就确实没有弊病吗？在有十家人的聚落中必然会有忠信的人，所以汉朝分设四科，宋朝建立六科，司马光又请求设立十科，这可以说是

非常详尽而完备了。然而，人才难道果真能够完全被选出而没有遗漏吗？而且被选拔出的人果真就能是综核名实而没有虚假吗？如今要让豪迈洒脱的人士不违反纪律，老实廉洁的儒生不死守条规，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尚书》说："要谨慎对待你那俭朴的美德。"确实是因为俭朴和道德是共同体。唐尧不认为土阶是简陋的，虞舜保持警惕、不肯用油漆的器物。大禹不为自己卑陋的宫殿感到羞愧，而周文王不肯穿着豪华的服装。这些都是久远的事情了。在这之后，穿着黑粗布衣服、停止修建露台、收集奏章囊袋制作帷帐，这些往事都流传至今。他那美德不是仍然还能追溯吗？古代的臣子用《诗经·羔羊》中贵族用素丝做衣服的操行来激励自己。如赵抃知成都府，只有一张琴、一只鹤；程灿做盐城县令，只有一匹马、一个仆人。他们的高节清标，难道不是臣子所应效法的吗？享用精美的食具、红色的冠带、玉制的缨饰、豪华的帽子，从古以来就是被人们所讥讽的；然而由于积习相沿，世风崇尚奢侈华丽，以致不能养成清廉的风气。《诗经》的《蟋蟀》、《山有枢》所赞咏的民风，非常质朴；可如今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讲究美味和美观，导致民间不免超越了礼仪规定。皇帝我想用消除奢华崇尚朴实的意旨来训导臣民，用什么办法能使风气一天天地达到朴实醇美呢？

与我民众最接近的，是太守和县令。汉代史书的《循吏传》记载太守、国相的事情十分详尽，但却没有记载县令和县长，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的郡县非常多，郡守的好坏，监司尚且难以对于每一个人都了解；县的数量比郡多几倍，县令的数量也比太守多几倍。怎样才能在他们上任后督察他们呢？如果县令的人选得当，那么，就能做到赋税平均、徭役均衡、诉讼减少，我民众就能过上安定的生活了。然而由科举做官的多半迂腐而不会办事，由非科举做官的有些却奸滑而玩弄法令，其余破坏政治、坑害民众的不可枚举。皇帝我打算整顿、磨砺他们，应该从什么途径入手？各省长官是用来纠察太守和县令、为天子选拔贤能、清退小人的。然而他们举荐人的标准，首先是才能出众，而注重教化民众的人却遭到冷落；他们奖赏人的标准，是

以最先完成赋税征收为优秀，而费尽心力安抚民众的人却受到呵责。这样又怎能惩治贪污之风而养成奉公守法的风气呢？

考察古代以培养美好纯正的德性，选拔人才以辅佐天下大治，戒除奢侈以端正民俗，考察政绩以整顿吏治，都是统治社会的宏伟计划、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各位贡士开始对答，请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不要有什么隐瞒。

翁曾源　殿试对策

翁曾源(1833～1893？)　字仲渊，江苏常熟人。内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孙。工诗文，但患有癫痫病，不能正常参加科举考试，以祖父恩荫授举人。同治二年（1863）成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治十一年(1872)，因病告假还乡。擅长书画，尤在花卉画上有较高造诣。

臣对：臣闻自古圣哲之君，绥靖寰区，丕扬谟烈，非恃长驾远驭之略焉，是盖有致治之本也。《易》曰“蒙以养正”，言缉熙所以光明也。《礼》曰“三年大比”，又曰“三物宾兴”，言论秀所以书升也。《书》曰“恭俭惟德”，《诗》曰“岂弟君子”，言修身必当寡欲、从政必当爱民也。夫典学不可不勤，进贤不可不广，检身不可不约，察吏不可不严。此四者，治天下之要务也。然而敬怠之几、邪正之辩、奢俭之原、贪廉之别，必慎之于几微，而求之于实事。则唐虞三代之隆，可复见于今日也。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天亶，宵旰勤劳，心学固已懋修，贤才固已登进，冗费固已裁汰，吏治固已澄清，典章法度靡不毕举矣。乃圣德谦冲，不遗浅近，孜孜求治，以公听并观为急务。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为学之道，遴才之方，敦俗之宜，考绩之要。臣学识庸陋，奚足以承大对？然幸值广开言路之时，恭绎叠次谕旨，勖励多士各抒所见，又何敢摭拾浮辞以蹈积习乎！

伏读制策有曰：二帝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而因进求夫发明贯通之旨，博审夫精微要领之功。臣谨案：二帝三王之心法，即二帝三王

之治法也。然论道统者,必推本于"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十六言。盖圣贤传心之要,不外乎中;执中之矩,不外乎敬。尧曰钦明,舜曰温恭,汤曰日跻,文曰敬止,无非主敬以协于中。《典》以钦始,《谟》以钦终,实与执中之理互相发明。《尚书》而外,如《易》之言闲存,《诗》之言於穆,亦惟于危、微之界,谨其几而已。《大学》八条目,始终不逾乎敬;《中庸》三达德,枢纽不出乎诚。宋真德秀作《大学衍义》,略治、平不言;明邱浚补之。一则举其体,一则阐其用也。夫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儒生之学,明其道而已;帝王之学,将以见诸用人行政。不虑学问之不广,而虑心术之未纯;不虑视听之难周,而虑外物之易诱。如汉之董仲舒、匡衡,宋之程颐、胡安国、朱熹,其所敷陈皆以格君心为先。诚能体以清明之德,勖以敬畏之功,所谓道德日新,万邦惟怀,端本澄源,莫要于是。我皇上冲龄践阼,首重传心。固将以兼体用、合内外者,于典学端圣学之基。由是日就月将,懋德建中,本诚正以致治平,不难也。

制策又以得贤才而治天下者,帝王之要道,爰考历代试士设科之典,思有以综核名实。臣惟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廷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于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其法虽有愧于德行之举,犹可得才能之士也。后世以铨选署官,而专校其资格;以科目取士,而专主于词章。于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唐制既察其身言,复察其书判,此试法也。裴光庭作《循资格》以矫之。集之于十月,选毕于三月,此集法也。陆贽立《计阙例》以救之。可见二者不能无弊。至于汉分四科,宋立六科,司马光又乞设十科,乃设科之法,非育才之本也。夫魁奇倜傥之士,易轶乎范围;恂谨廉洁之儒,率拘于绳尺。三代之时,犹难才德兼备,况今日乎!是在驭之有方,化其所偏而已。圣朝以制义取士,凡贤才俊乂、通儒硕彦,靡不出乎其中。兹者恩榜特开,固期识拔真才以济时艰,又岂在区区文艺之末哉!

制策又以崇实黜华,可使风气日臻朴茂,欲以去奢示俭之意,训迪臣民。臣惟《书》曰"慎乃俭德",诚以俭者政教之本原、风俗之枢机

也。尧不以土阶为陋，而舜怵戒于涂粱，以及禹卑宫，文王卑服，莫不忘一身之奉，以专意于安民养民。汉文帝衣弋绨，罢露台，集上书囊为殿帷，此皆人君俭德之可法者。故人君以身示教，故其时公卿大夫咸励节俭之操。是以《羔羊》之诗，美之后世。若赵抃守成都，一琴一鹤；程炳令盐城，一马一仆。其清标高洁，亦无愧于古人。岂非臣下所当矜式者乎！夫雕文刻缕，致伤农事；锦绣纂组，遂害女红。饥寒并至，民易为非。则崇俭其要也。乃积习相沿，敝化奢丽，以致不能养廉。即《蟋蟀》、《山枢》之风，亦邈不复睹。服食器用务为美观，舆马衣裘竞相骄侈，何风俗之不古若欤！臣窃谓世运之升降，风俗实为之。所以维持风俗者，在乎政教耳。政教既得，则风俗渐厚，民气自纯。既有节而不伤财，亦有度而不逾礼。庶几可挽一时之敝俗也已。圣朝俭德，超越千古。近因度支久绌，裁繁冗之费，移汰侈之风。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所由节用爱人，道德一而风俗同也。

制策又以守令之职与民相亲，乃求课绩之方，以立敷教之本，斯可惩贪墨而励循良。臣以为大吏、监司皆无亲民之责，其亲民者守、令是也。然县令必督之以郡守者，秩稍尊则事权较重，地相近则耳目易周。故郡守得其人，则属县皆治矣。汉宣帝诏曰："政平讼理，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可谓得其本矣。夫郡守之贤否，监司且难备悉；况县令数倍于守，其考察更为不易。盖吏治之清浊，关系民生之休戚；而属员之贤否，尤视大吏之贪廉。故大吏者，小吏之表率也。有守者，有为之根本也。是在察之得其人耳。县令贤明，则赋敛均而民得守其业，徭役平而民得舒其困，诉讼简而民得平其情。乃由儒术者多迂而弛事，由杂流者或奸而弄法，遂致蠹政厉民，不可枚举。非整齐而磨厉之，何以安天下之民也？大吏苟能举所当举，劾所当劾，则留意教化者不至遭沉滞，而劳心抚字者不至受谴诃。《记》曰："大臣法，小臣廉。"是知考察之方不可不责之大吏也。皇上屡颁训诫，整饬官方，本励精图治之思，矫疲玩因循之习。大吏果能尽心考察，举劾得当，斯吏治兴而民生亦遂矣。

夫以严恭建皇极，以选举广贤路，以朴素端民习，以勤慎核官联。举而措之，何政之不修，何功之不举哉！臣尤伏愿皇上，行之以

实,守之以恒,毋谓大旨已明而稍疏观省,毋谓人才已盛而偶懈旁求,毋谓国用已充而萌豫大丰亨之志,毋谓官箴已肃而启逢迎躁进之途。《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体此意以为治,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自古圣明睿哲的君王安定天下,弘扬功业,并不倚仗长驾远驭的谋略。这是因为他们有治理天下、使其达到太平的基本原则。《周易》说:"用童蒙之态来养育中正之气",说的是要靠勤奋学习来使心中充满光明。《周礼》说:"三年进行大考核",又说"用乡学的三种教法来教育万民,而对优秀人才,则以宾客之礼相待,并举荐给天子",说的是选拔贤才而逐级上报。《尚书》说:"恭敬和节俭是美德",《诗经》说:"平易而快乐的君子",说的是修身一定要寡欲、从政一定要爱民。学习不可不勤奋,选拔贤能不可不广泛,要求自己不可不苛刻,考察官吏不可不严格。这四个原则是治理天下的重要事情。然而,恭敬与怠慢的觉察、邪气与正气的分辨、奢侈与俭朴的根源、贪污与廉洁的区别,一定要细致地体察那隐微状态,并且要以实事为依据。这样,唐尧和虞舜以及三代的隆盛,又可以在今天再见到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天资聪明,日夜勤劳,尽管"心学"已经精深,尽管贤才已被提升,尽管冗费已经裁减,尽管吏治已经澄清,典章法度都十分完善了。然而圣上品德谦虚,不忘记任何一种浅近的意见,孜孜不倦地谋求国家的治理,把公听并观作为最紧要的事情。于是将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有关治学的准则、选拔人才的方法、敦劝风俗的事宜、考核政绩等重要问题来策试我们。臣下我学识平庸浅陋,哪能回答如此重大的问题?然而臣下我正好有幸遇到了广开言路的时候,恭敬地理解多次颁布的圣旨,都是鼓励各位贡士各抒所见,因此,臣下我又怎敢拾取浮华的言辞,重蹈旧有的恶习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二帝三王的传心养性方法不外乎一个"中"字,因而进一步探求那阐明贯通的主旨,广博审视那精微要领的

功夫。臣下我细致地查考:二帝三王的传心养性方法,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然而谈论道统的,必然会从根本上推导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上。因为圣贤传心养性的关键不外乎"中道",保持中道的规矩不外乎"诚敬"。唐尧所说的诚敬和明察,虞舜所说的温顺和恭敬、商汤王所说的诚敬天天升华、周文王所说的事事都要做到诚敬,无非都是用"主敬"的方法来协和"中道"。《尧典》以"敬"开始,《陶皋谟》以"敬"终结。确实是与"保持中道"的道理互相发挥和阐明的。《尚书》之外,如《周易》所说的防范邪恶、存其诚信,《诗经》所说的像皇天一样深远肃穆,也只是在危、微的边界防范谨慎而已。《大学》的八个条目,始终不超过"敬"的范围;《中庸》三种最高道德的核心,就是"诚"。宋朝的真德秀作《大学衍义》,省略"治国"、"平天下"不谈。明朝的邱浚增补了这部分内容。二人一个是列举主体,一个是阐述它的功用。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一样。儒生的学问,只是弄明白书上的道理而已;而帝王的学问,将要用在用人和行政上。不害怕学问不广博,而是害怕心术还不纯正;不害怕所见所闻难以周全,而是害怕容易被外物引诱。如汉朝的董仲舒、匡衡,宋朝的程颐、胡安国、朱熹,他们的论述都是把纠正君主之心放在首位的。确实能用清明的德行来体察自己,用敬畏的功夫来勉励自己,所谓君主的道德天天向上,各地全都感念,端正根本和澄清本源,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我皇上幼年登上皇位,首先注重的就是传心养性。肯定将会主体与施用相兼、内外相合,通过坚持学习奠定圣上学问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圣上天天有成就,月月有进步,树立大德,建立中道,本着诚正的原则来实现治国、平天下,肯定是不难的。

制策又认为得到贤才而治理天下是帝王的重要原则,于是考查历代考试士人、设立科举的制度,想要综核名实。臣下我认为,古代用人,把德行放在首要位置,把才能放在次要位置。虞舜时代考察官员,也有九德;周代向天子推荐人才,要考察他的德行;而对于才干则不屑一顾。两汉以来,刺史、太守、国相有专门的征召、荐举的权力;魏晋以后,九品中正握有评定人物的权力。这种办法虽然举荐并非

是根据人的德行，但仍然可以得到有才能的人士。后世用铨选来任命官员，专门考核他们的资格；用科举来选取士人，则专由文章来决定。于是选拔贤人与能人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唐朝的制度是既观察其外貌和语言能力，又观察其书法和办案能力，这就是试法。裴光庭作《循资格》来矫正了它。在十月集聚，在三月选定，这就是集法。陆贽创立《计阙例》来补救了它。可见两者不能说没有弊病。至于汉朝分设四科、宋朝分立六科，司马光请求分设十科，这只是设立考试科目的办法，而不是培育人才的根本问题。豪迈洒脱的人士容易违反纪律，老实廉洁的儒生大都死守条规。三代的时候要想才德兼备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今日呢！这只是在于如何想办法去驾驭他们，改变他们偏执的一面罢了。圣朝用八股文来选取士人，有才有德的人才、精通学问的大儒，都是从这中间选拔出来的。如今又特设这次恩科，原本就是期望发现和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来挽救时下的艰难的，又哪里在于那微不足道的、玩弄辞藻的末节之事呢！

制策又认为崇尚朴实、废除奢华可以使风气日益达到淳朴美好，想用去除奢侈、提倡节俭的意思训导和启迪臣民。臣下我认为，《尚书》说："谨慎对待你那俭朴的美德。"这确实是因为节俭是政教的本原、风俗的关键。唐尧不认为土阶是简陋的，虞舜保持警惕、不肯用油漆的器物，以及大禹不为自己卑陋的宫殿感到羞愧，而周文王不肯穿着豪华的服装，他们都忘了自身享受，而专心专意地安抚民众、抚养民众。汉文帝穿着黑粗布衣服、停止修建露台、收集奏章囊袋制作帷帐，这些都是君主俭朴的品德可以让后世效法的。由于君主以身作则来教育他人，所以当时的公卿大夫都能保持节俭的情操。因此《羔羊》的诗篇一直受到后世的赞美。再如赵抃知成都府，只有一张琴、一只鹤；程炅做盐城县令，只有一匹马、一个仆人。他们的高洁清标，也无愧于古人。这难道不是臣子所应当效法的吗！雕刻纹彩，伤害了农业活动；绣刺锦衣华服，伤害了妇女的针线活路；当饥饿和寒冷同时降临时，民众也就为非作歹了。由此可见，崇尚节俭，这是最重要的。然而由于积习相沿，世风崇尚奢侈华丽，以致不能养成清廉的风气。《诗经》的《蟋蟀》、《山有枢》的风貌也遥远飘渺，不能再见到

了。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讲究，车马和衣服竞相骄侈。为什么风俗这么不如古代呢？臣下我私下认为，世道气运的兴衰，实际上是由社会风气造成的。维持风俗，就在于政教了。有了政教，风俗也就渐渐会淳厚起来，民众的心灵也就会自然而然地纯净起来。不仅有了节制，不浪费财物，而且也有了限度，不超越礼仪。这样，就可以挽救一时的坏风俗了。圣朝俭朴的德行超越了千古。近来由于财政收入长期不足，所以裁减繁冗的费用，改变过分的奢靡风气，而皇上带头实行节俭，为天下作出了表率。在此基础上，就能实现节省用度，爱护他人，道德一致，风俗相同。

制策又认为太守、县令的职位与民众最接近，于是寻求考核他们政绩的方法，以树立布行教化的根本，这样就可以惩罚贪污而激励守法的官员。臣下我认为各省长官和监司都没有直接管理民众的责任，而直接管理民众的是太守、县令。然而之所以必须让郡守来督察县令，是因为郡守的级别较高，从而有较大的权力，他们与县令的地方相近，从而所见所闻容易周详。因此，如果郡守人选得当，那他的属县也就都能治理好了。汉宣帝的诏令说："政事处理得当，诉讼审理公平，能与我共同享有这个局面的，只有优秀的太守！"这段话可以说是说到了根本。连郡守的好坏，监司也难以完全了解；更何况县令比太守多好几倍，对他们的考察就更不容易了。吏治的好坏，关系到民众的安乐和痛苦；而下属官员的好坏，尤其取决于各省长官是贪婪还是廉洁。高级官员是下级官员的表率。他们有操守，就是他们有所作为的根本。这就在于督察他们具有合适的人选。如果县令贤明，那么赋税征收就会均衡合理，而民众就能安心从事劳动生产；徭役征发就会合理而公平，而民众就能减轻困苦；诉讼断案就会简明，而民众就能心平气和。然而，由科举做官的多半迂腐而不会办事，由非科举做官的有些却奸滑而玩弄法令，以致破坏政治、坑害民众的事情不可枚举。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整顿和磨练，那怎么能安顿天下的民众呢！高级官员假如能推举应该被推举的人，弹劾应该被弹劾的人，那么，注重教化民众的人就不至于遭到冷落，而费尽心力安抚民众的人就不至于受到呵责。《礼记》说："只要大臣守法，小臣就会廉洁。"由

此可知，考核督察的要诀是不可不严格要求高级官员的。皇上屡次颁布训诫，整饬官员，本着励精图治的精神，矫正疲沓拖拉和因循守旧的习气。高级官员如果真能尽心考核督察，推举和弹劾得当，那么吏治就会清明，而民众的生活也就能幸福了。

用严肃恭敬来建立帝王统治的准则，用选举来广开贤路，用朴素来端正民众习俗，用勤奋和谨慎来考核分工协作的官吏，如果这些措施能得到施行，那还有什么政治不能完善，还有什么功勋不能建立呢！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实实在在地施行这些办法，并长期坚持下去，切不可认为大政方针已经明确而稍稍放松学习，切不可认为人才已经很多而偶尔松懈对人才的选拔，切不可认为国家的用度已经充裕而滋生丰亨豫大的念头，切不可认为对官员的规范已经十分严厉而开启逢迎躁进的途径。《尚书》说："要兢兢业业，天天处理繁忙的政务。"《诗经》说："要诚敬呵要诚敬，因为天道的善恶太分明。"体会这个意思并用在政治上，那么，我国亿万年美好的长久国运，就从此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子江　徐立群译〕

清穆宗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必得其寿。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殿试策问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懋膺大宝,四载于兹。仰荷昊穹笃祜,列圣诒谟,上承训迪于两宫,下肇升平于四海,惟思宵旰勤孜,以求治臻上理。兹当临轩策士,式殷前席,用集嘉猷。

《虞书》守执中之训,为道统所自开。帝德王道,时代虽殊,其同条共贯者安在?《汤诰》言降衷恒性,专言理也。《洪范》言天阴骘下民,而五行庶征,理兼乎数。其说之同异若何?董仲舒汉之大儒,朱子既以正谊、明道二语编入《小学》,而于《天人三策》犹有未满之辞,其意何指?王通著《中说》,学者拟之《论语》,而后人斥为僭妄,所指何条?唐臣韩愈推原性道,拔起于贞元、元和之间,然其议论之未尽纯者何在?宋之大儒濂洛关闽,专以发明心性之奥,至其得力之处,教人之术,能揭其大要欤?元儒首倡者何人,继起者何氏,其纯驳优劣能详言之欤?明代《理学录》孰为居首?其余诸子出处成就又各不同,可一一悉数欤?

守令为亲民之官,安民必先察吏。保障茧丝,自古辨之矣。《史记》列传特标《循吏》,后史因之。其间又有或称《良吏》、或称《良政》者,能枚举欤?龚黄召杜尚已,此外有蒲鞭示辱者,有生鱼悬庭者,有麦秀两歧者,有民歌五袴者,有虫不犯境者,有处膏不润者,有提耳训

告者。可历指其人欤？他如尹思贞之刺青州，薛大鼎之转沧州，包拯之知端州，王觌之知苏州，杨仲昌之令孝义，李君奭之令醴泉，刘挚之令南宫。其治绩可得闻欤？或谓汉委寄守令，不从中驭，居官者得行法外之意，是以吏治为唐宋所不逮。然欤，否欤？

安民之法，莫先于弭盗；弭盗之法，莫善于保甲。说者谓保甲之制，权舆于《周官》，然欤？保甲之名，创自何人？汉之亭长、啬夫，唐之里正、坊正，推其名，实与周制里宰、鄙长、鄙师不相远，其实充其任者何人？且同一保甲之法，王安石行之而民扰，王守仁行之而民安。岂法之有效有不效欤？抑有治人，无治法欤？弭盗之方载诸简策者，如韩延寿之治颍川，尹翁归之守扶风，其法能备举欤？他如村置楼鼓，缝衣为志，相机制变，存乎其人，可引伸其说欤？欧阳修有御盗四事，说者谓其中有探本之论，其要安在？

整军经武，国之大经。古者寓兵于农。师之取象，地中有水，所谓藏至险于大顺也。管仲相齐，参其国，伍其鄙，国则为军，鄙则为农。说者谓兵民之分自此始，然欤？设兵之善莫如唐，驭将之善莫如宋。所谓善者安在，能详其说欤？明邱浚谓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能引伸其意欤？于谦创团操之议，王骥定练兵之制，可备陈欤？今将整饬营伍，鼓励戎行，必使汰其老弱，黜其骄悍，惩其惰窳，简其精锐，以汰卒之粮加精卒之饷，庶兵归实用，饷不虚糜，果何道之从？

凡兹四端：稽古以懋修途，考课以厘政绩，除莠以清里闬，诘戎以靖边陲，皆经国之远猷，立政之要务也。多士力学有年，其各陈说论，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你孝顺父母，关爱孩子，百姓也就对你忠诚了。你提拔贤才，教育能力差的人，百姓也就彼此勉励了。

必定会获享到长寿。

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多得吃不完啊!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龄,盛大地承继起帝位,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幸运地蒙受到皇天的深切佑护和我朝各位圣明先帝留下的谋略,往上从两位皇太后那里承奉训导启迪,往下在四海开创太平的局面,只管去想从早到晚勤勉不懈,用来谋求治理达到那最美好的状态。如今正值驾临殿廷,策问读书人,殷切地表示倾听,以便汇集起美好的谋划意见。

《尚书·虞书》中恪守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一训条,构成了大道统系开始出现的起点。称帝天下的德业和称王天下的大道,时代尽管不同,但它们事理相通、脉络连贯的东西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汤诰》中言说皇天赐给世人善良的心地,帝王要顺从这种固定的天性,这是专门在讲论道理啊!《洪范》又言说皇天默默地使天底下的百姓安宁,而所列示的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各方面的征兆,又是在道理中包含着定数。这两种说法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到底怎么样呢?董仲舒是汉朝的大儒,朱熹已经把他"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两句话编入了《小学》这本书中,但对他那篇《天人三策》仍然显出了不满意的评语,评语的意旨是指什么讲的呢?王通著成《中说》这部书,学习的人把它比拟成《论语》,可后人却把它指斥为超越等级名分又虚妄,这是指哪些问题来说的呢?唐朝的臣僚韩愈推求并考论人性和儒道,在德宗贞元和宪宗元和年间挺立崛起,然而他那议论还不完全纯正的地方又表现在哪里呢?宋朝的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和朱熹,专门来阐发宣明人心和人性的奥妙,至于他们最得力的地方和教诲世人的方法,你们能揭示出那概要来吗?元代的儒学,第一个来加以倡导的是哪个人,接着挺立出来的又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学说中纯正和驳杂、优良与粗劣的部分,能够详尽地评述一番吗?明代《理学录》这类书籍中,谁是位居第一的人?其他各位学者的事迹和成就又各不相同,能够一一地全部列举出来吗?

太守县令属于最接近百姓的官员。安定住民众，一定要首先察准官吏。是保障一方还是专收赋税，自从古代就做过区辨了。《史记》在列传部分特意标定名称为《循吏传》，后来的正史继续采用它。在此过程中也有的改称为《良吏传》，还有的改称为《良政传》，能够一一列举是哪些正史吗？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这些好官，那是流传很久的了。此外还有用蒲草制成的鞭子来抽打下属表示羞辱的官员，还有把下属送来的生鱼悬挂在庭室中表示不要再送的官员，还有辖区内麦苗长出两支穗的官员，还有使老百姓歌咏自己如今也有了五条衣裤的官员，还有稻心虫根本就不蔓延到他那辖区的官员，还有处在油水中却一点儿也不沾的官员，还有提起对方的耳朵进行训导告诫的官员。能够逐一地指明是哪些具体的人物吗？其他像尹思贞出任青州刺史，薛大鼎转任沧州刺史，包拯出任端州知州，王觌出任苏州知州，杨仲昌担任孝义县令，李君奭担任醴泉县令，刘摯担任南宫县令。他们的治绩可以让人听一听吗？有的人认为汉朝把地方政务全权交付给太守县令做处理，不受朝廷的约束，身在官位的人得以实行法律规定以外的想做的事情，因而官吏施治的情况是唐朝和宋朝比不上的。这种看法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

安定住民众的办法，没有能比消弭盗贼更占首位的了；而消弭盗贼的办法，又没有能比保甲制度更为有效的了。议论政事的人认为保甲制度是从《周礼》开始的，这种说法正确吗？保甲这个名称，是由哪个人创立的呢？汉朝的亭长、啬夫和唐朝的里正、坊正这类地方基层组织的官吏，推寻它们的名称，实际上与周代官制中的里宰、鄙长、鄙师这类基层官吏并不是相差很大，汉唐时实际充任这类职务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而且同一种保甲制度，王安石在宋代推行起来，百姓就受到搅扰；王守仁在明代推行起来，民众就安定住了。这难道是制度本身存在着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情况吗？或者是说明世上具有真会治理的人，却没有肯定能把国家自动就治理好的法度呢？消弭盗贼的方法记载在史书上的，像汉朝韩延寿治理颍川郡，尹翁归担任右扶风的代理太守，他们采取的方法能够完整地列举出来吗？其他像在村里设置楼台和楼上挂面鼓，雇人给盗贼缝制衣服暗中缀上记号，这

都表明审察时机制定出应变的措施，完全掌握在那些合适的人选手里，能够引伸一下这方面的说法吗?欧阳修提出了防御盗贼的四项事宜，议论政事的人认为其中具有探求到根本的论断，它那要领究竟在哪里呢?

整顿军队，筹划武备，这是国家的重大法则。古代把士兵寄寓在农民当中。军队的选取卦象，是地中有水，所谓把那极其艰险的地形蕴藏在非常顺利的行动当中啊!管仲担任齐国的国相，把国都城郊以内的地带划分成三个辖区，把国都城郊以外的地带划分成五等政区，三个辖区就构成军队，五等政区就都是农民。议论政事的人认为军队和普通百姓的区分，正从这里开始形成。这种说法正确吗?设置军队的有效措施，哪个朝代也比不上唐朝；驾驭将领的有效措施，哪个朝代也比不上宋朝。所谓有效的地方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能够对这类说法详述一番吗? 明朝的邱浚认为宋朝的中央主力部队禁军赶不上汉朝由本人出钱雇人代替服役而组成的部队，汉朝由本人出钱雇人代替服役而组成的部队，又赶不上唐朝以折冲府为单位编成的部队，能够引伸一下这种看法的意旨吗?于谦首次提出了团营会操的动议，王骥定下了练兵的制度，能够对此完整地陈述一番吗? 如今打算整顿各支部队，鼓励从事作战的人员，一定要使他们淘汰掉那些年老和软弱的人，斥除那些骄纵凶悍的人，惩办那些懒惰败坏的人，挑选出精锐来，用裁减士卒剩下的那部分衣粮来提高精锐士兵的军饷，希望军队能归向实际的用途，军饷不白白地消耗掉，到底该采用什么措施来达到目的呢?

总共以上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考察古代，用来扩展那修养好身心的途径；考核督促，用来区定出政绩；铲除掉捣乱的家伙，用来使民间变得清静；整顿好军队，用来稳定住边疆地带。这都属于治理好国家的长远谋划，定立起朝政的切要事务啊!你们这些读书人大力从事学问，已经具有很长时间了，各自陈述那直截了当的意见，不要有什么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于建章　殿试对策

于建章(生卒年不详)　字殿侯,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同治四年(1865)榜眼,便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古帝王治天下之法,一曰崇圣学,一曰奖贤良,一曰诘奸慝,一曰修武备。四者至急之务,而经久之规也。治得其要,则不待喻晓而德化渐披,不必考课而政绩咸熙,不烦刑禁而比户可封,不事兵威而声灵遐播矣。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天亶,宵旰时勤,心学固已懋修,官方固已澄叙,民俗固已敦厚,军实固已精详,茂矩宏规,粲然大备矣。乃圣德谦冲,不遗浅近,励精图治,以好问察迩为急务。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广证薪传、博稽循吏、变移浇俗、整饬戎行诸大端。如臣庸陋,奚足仰赞高深?然思泰山不让夫土壤,河海不择夫细流,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以备刍荛之采乎!

伏读制策有曰:执中为道统所自开,因进求帝德王道同条共贯之旨,博稽诸儒纯驳优劣之分。臣谨案执中一训,为尧舜相传心法,见于《禹谟》。汤之建中,文王之宅心,武王之警敬胜,帝德王道,时代虽殊,旨实条贯。《汤诰》言降衷恒性,只专言理;《洪范》言天阴骘下民,而五行庶征,理兼乎数。一溯其原,一究其应,天人之际,理可互参。惟董仲舒对汉武帝之言,能发其蕴,而说本设诚正心,义主正谊明道。朱子特取其语,编入《小学》,独于《天人三策》犹有未满之辞,则以流于灾异与所谓质朴谓性、人欲谓情,未免择焉不精耳。若隋王通《中说》,学者拟之《论语》,而其言李德林请见与问礼于关子明,按之时代,全不相符,宜后人斥为僭妄也。唐臣韩愈推原性道,拔起于贞元、元和之间,但以博言爱,不及格致,又分性为三品,其论亦未尽纯。迨宋诸儒,濂洛关闽皆能发明心性之奥,而得力之处,教人之术,不外窒欲以存理,主敬以存心。元则吴澄、许衡起而卫正祛邪,金履祥、姚枢、许谦诸人为之羽翼,虽有纯驳优劣,而圣脉实赖以不坠。明

一代理学，开于曹端，而学识之深纯无庇，以薛瑄、陈选、胡居仁为最，罗钦顺、蔡清次之。吴与弼严邪正之辨，而偏于狷介。陈献章学先主静，王守仁学致良知，源皆出于陆九渊，与朱子稍异，其归则一。其余罗、章、吕、邵，殆不胜枚数已。皇上至德日新，昌明正学，凡在党庠者皆得所持循，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守令为亲民之官，安民必先察吏，爰考历代循良治绩，欲以风示臣工。臣惟茧丝保障，尹铎辨之。《史记》列传始标《循吏》，班范因之，《晋》、《宋》及《梁》皆称《良吏》，《南齐》则称《良政》。汉之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一时最著。此外蒲鞭示辱有若刘宽，生鱼悬庭有若羊续，麦秀两歧有若张堪，民歌五绔有若廉范，虫不犯境有若鲁恭，处膏不润有若杨震、范丹，提耳训告有若秦彭、许荆、刘矩、仇览诸人，殆难仆数。他如尹思贞刺青州有善政，境蚕一岁四熟。薛大鼎转沧州，浚无棣河，德歌滂被。包拯知端州，贡数外不持一砚。王规知苏州，发奸摘伏，一郡肃然，民有"吏行水上、人在镜中"之歌。明皇时杨仲昌令孝义，鸾降庭树，太守萧恕表其政。宣宗时李君奭令醴泉，百姓祷祠祈留。嘉祐中刘挚令南宫，请裁县赋，民称活我。此其治绩，具载史册。要之汉重郡守之责，不从中驭，以察令委之守，故吏治最近古，唐宋所不逮也。圣朝用人行政，破除常格，所由大法小廉，而吏治蒸蒸日上矣。

制策又以安民莫先于弭盗，弭盗莫善于保甲，欲即历代良法而推求其本。臣考保甲之制，权舆《周官》；王安石变民兵为保甲，而名始创。汉因秦法，置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以能帅众为善者任之。唐以百户为里，邑居为坊，田野为村，皆置正。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充，次为坊正，其村正以白丁充，俱免其课役，实与周制里宰、鄙长、鄙师等。宋熙丰保甲之法，始任以捕盗贼，继命以习武事，更责以督催科，民不胜扰，皆安石祖《周官》而误者。惟王守仁抚南赣时，令在城者十家为甲，在乡者村自为保，使每甲自纠，盗无所容，立法易简而可行。他如韩延寿治颍川，置正、五长，闾里有非常，吏辄闻，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尹翁归守扶风，迹奸邪罪，县有名籍，用类推迹，盗无脱者。若李崇刺兖州，村置

楼鼓;虞诩长朝歌,缝衣为志。相机制变,则又存乎其人。而莫善于欧阳修御盗四事:一、州郡置兵为备;二、选捕盗之官;三、明赏罚之法;四、用良吏以抚平民。说者以为实得探本之论,洵不诬也。国家团练之法,准古通今,因地制宜,以清盗源,无过乎此矣。

制策又以整军经武,国之大经,考究历代兵制,以酌整饬鼓励之规。此尤有备无患之至虑。臣惟古者因井田,制军赋,寓兵于农。师取地中有水之象,藏至险于大顺也。迨管仲相齐,参其国,制轨里连乡帅;伍其鄙,制邑卒乡县属。国为军,鄙为农,兵不秉耒耜,农不识干戈,兵民自此分,兵制自此坏。唐府兵得《周官》遗意,上中下有差,统练有法,更代有时,总以折冲,无事力耕足食,有事勘契发兵,此设兵之善也。宋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外兵本于枢密,无握兵之重,内兵总于三衙,无发兵之柄,此驭将之善也。明邱浚谓宋之禁军分营就粮,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兵不常聚,仓卒无以防外,中尉出讨,王旅无以重内,不如唐之府兵。诚不易之论。于谦创团操之议,改京兵为十团营;王骥定练兵之制,其目凡五:练胆、练技、练阵、练地、练时,皆训练之要道也。皇上今欲整饬营伍,鼓励戎行,汰老弱,黜骄悍,惩惰窳,简精锐,以汰卒之粮加精卒之饷,则兵归实用,而饷何致虚糜哉!

夫慎德为求治之本,察吏为安民之原,除奸为弭盗之方,讲武为靖边之略。本原先裕,方略远周,则习屏浮华而士端其志,政去贪酷而吏尽其心,国无宵小而民安其居,额非空悬而兵资其卫。长治久安之策,岂外是欤?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毋谓圣德已修而稍疏勤慥,毋谓官联已治而或懈考厘,毋谓民俗已敦而忘制治保邦之念,毋谓军实已简而怠思患豫防之心。有初有终,可大可久,于以宏丕天之律,丰茂世之规,将见迈蕃禧而熙鸿号,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圣帝明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一是叫做尊崇圣人的学说,二是叫做奖励贤能忠良的臣僚,三是叫做纠察邪

恶干坏事的刁民，四是叫做修明武力防备。这四个方面属于最为急迫的政务和谋求长治久安的规制啊!治国抓住了那关键所在,不需要透彻地开导而仁德的教化就普遍施布到各个地区了，不一定要进行考核督促而政绩就全都建立起来了，不用再颁布刑法禁令而百姓每家每户就都会受到特殊的表彰了，不用再致力于军队的威慑震服而声名灵威就播扬到最远的区域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耳聪目明的秉性由皇天来赋予,从早到晚只管操劳国政,关于心治大法的学问原本上已经大力修明了,为官之道原本上已经得到澄清并理顺了，民间习俗原本上已经很淳朴浑厚了,军政事务原本上已经很精审详明了,所有的宏大雄盛的规章制度都非常明晰地完全确立起来了。但仍圣明的德行特谦逊，不遗弃浅近的言论,励精图治,把当年虞舜那种喜好询问、察辩身边言论的做法当成急切要做的事情。于是特将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广泛印证心治大法的递相传授、多方面考察奉公守法的官吏、改变浅薄败坏的习俗、整顿好军队这些重大政事来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平庸浅陋的人,哪里足以往上协助皇上那高远深邃的谋划呢?然而想到泰山不遗弃那些小土块,黄河大海不择取那些细小的水流,敢不努力陈述自己平生所诵读研习的东西，来供皇上对割草打柴人的言论做采择吗?

跪拜敬读制策中有这样的话：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构成了大道统系开始出现的起点，据此进而探求称帝天下的德业和称王天下的大道在事理相通、脉络连贯上的义旨,广泛考索众位儒士纯正和驳杂、优良与粗劣的区别。臣下我恭谨地验核那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句训条,构成了唐尧和虞舜递相传授的心治大法,在《尚书·大禹谟》中可以看到。商汤的给天下建立起中正的准则,周文王的放在心上,周武王的对恭敬胜过懈怠就吉利的保持警戒,这类称帝天下的德业和称王天下的大道，时代尽管不同，但义旨实际上是相通连贯的。《尚书·汤诰》中言说皇天赐给世人善良的心地，帝王要顺从这种固定的天性,这是专门在讲论道理;《尚书·洪范》又言说皇天默默地使天底下的百姓安宁，而所列示的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在各方面的

征兆，又是在道理中包含着定数。《汤诰》的说法属于追溯那本原，《洪范》的说法属于究明那应象，皇天和人间的关系，在原理上可以彼此参证。只有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一整套说法，能够阐发出《汤诰》和《洪范》的义蕴，而他的说法又是建立在布设虔诚、端正心念的基础之上的，义旨在于强调使那适宜的准则很纯正，宣明那大道。朱熹特地择取他这两句话，编入了《小学》这本书中，唯独对《天人三策》仍然显出了不满意的评语，是因为策词陷入了奇异天象的谴告中以及所谓质朴就叫做人性，人的欲望就称作人情，还没避免掉择抉不精审的毛病罢了。至于隋朝王通的《中说》，学习的人把这部著述比拟成《论语》，但书中说什么隋初的名臣李德林请求拜见王通，王通向北魏的关子明询问礼制，验核他们的生活时代，完全不相符合，难怪后人把它指斥为超越等级又虚妄了呀！唐朝的臣僚韩愈推求并考论人性与儒道，在德宗贞元、宪宗元和年间挺立崛起，但却凭仗范围广泛来讲论仁爱，没涉及到穷尽事理和充实知识，又把人性划分为三个等级，他那论调也没达到完全纯正的境地。等到到了宋朝各位儒士那里，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和朱熹都能阐发宣明人心和人性的奥妙，而他们最得力的地方和教诲世人的方法，不外乎是控制欲望来守持住天理，把虔诚作为主导来守持住心念。元朝时吴澄、许衡挺立出来，卫护儒学正道，去除各种邪说，金履祥、姚枢、许谦等人作为他二人的辅助力量。尽管这些人存在着纯正与驳杂、优良与粗劣的地方，但圣学的命脉实际上正靠他们才没坠落下去。明朝的整个时期的理学，从曹端那里开始，而学识精深纯正并没有偏护一边的毛病，要数薛瑄、陈选、胡居仁占第一位，罗钦顺、蔡清位居第二。吴与弼严格地辨明邪僻与纯正的界限，但却显得太激切耿介。陈献章的学说把沉静作主导放在最前面，王守仁的学说是体悟到皇天赋予给世人的善良的意识，他们两人的渊源都出自宋朝的陆九渊，与朱熹稍有不同，但旨归都是同一个。其他像罗洪先、章懋、吕柟、邵继祖，几乎多得数不过来了。皇上的最高仁德一天比一天在提高，倡导并宣明纯正的儒学，凡是在各级学校中苦读的士子，全都掌握住了应该执持和遵从的东西，这还不是特美好了吗？

皇上的制策又鉴于太守县令属于最接近百姓的官员，安定住民众，一定要首先察准官吏，于是考查历代遵纪守法的地方官吏的治绩，打算来讽喻训示当今的大小官员。臣下我想来，地方官是保障一方还是专收赋税，春秋时晋国的尹铎已经做过区辨了。《史记》在列传部分最先标定名称为《循吏传》，班固和范晔继续采用它。《晋书》、《宋书》以及《梁书》，又都改称《良吏传》，《南齐书》则改称《良政传》。汉朝的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这四位太守，在当时最为突出。此外特用蒲草制成的鞭子抽打下属表示羞辱的，有像东汉南阳太守刘宽那样的人。把下属送来的生鱼悬挂在庭室中表示不要再送的，有像东汉南阳太守羊续那样的人。辖区内麦苗长出两支穗的，有像东汉渔阳太守张堪那样的人。老百姓歌咏自己如今也有了五条衣裤的，有像东汉蜀郡太守廉范那样的人。稻心虫根本就不蔓延到他那辖区的，有像东汉中牟县令鲁恭那样的人。处在油水中却一点儿也不沾的，有像东汉荆州刺史杨震以及曾在太尉府供职的范丹那样的人。提起对方的耳朵进行训导告诫的，有像东汉山阳太守秦彭、桂阳太守许荆、雍丘县令刘矩、蒲亭亭长仇览那样的人。这类人差不多难以一一数过来。其他像唐朝的尹思贞出任青州刺史，施布美好的政事，辖区内的蚕茧在一年内成熟了四次。唐朝的薛大鼎转任沧州刺史，疏通无棣河，这种德政被老百姓歌咏为恩泽广泛的施布。北宋的包拯出任端州知州，该州出产的端砚除去进献给朝廷的数目以外，离职时没带一方砚台回来。北宋的王觌出任苏州知州，揭露打击隐蔽的坏人坏事，全郡都规规矩矩，老百姓编出了“吏行水上、人在镜中”的歌谣。唐玄宗时杨仲昌担任孝义县令，鸾凤落在了县衙庭院的树木上，太守萧恕向朝廷禀报他的政绩。唐宣宗时李君奭担任醴泉县令，百姓到庙中祷告，祈求老天爷能让他不调走。北宋仁宗嘉祐年间，刘挚担任南宫县令，奏请减轻本县的赋税，老百姓口称让我们活下来了。这些人物的治绩，详尽地记载在史书上。总之汉朝看重郡守的职责，不受朝廷的约束，把考察县令的事情交给太守去办理，所以官吏施治的情况最和古代相近似，唐朝和宋朝是比不上的。我们圣明的大清朝任用官吏和推行政务，破除常规，由此而大官奉守法纪，小官廉洁，

而官吏施治的情况更蒸蒸日上了。

皇上的制策又鉴于安定住民众，没有能比消弭盗贼更占首位的了；而消弭盗贼又没有能比保甲制度更为有效的了，打算依据历代的有效措施来推求那根本所在。臣下我考察保甲制度是从《周礼》开始的，北宋王安石把民兵变为保甲，保甲这一名称就首次创造出来了。汉朝沿用秦朝的制度，由每里百户人家的十个里组建成一个亭，亭设亭长；由十个亭组建成一个乡，乡设主管教化的三老，主管善恶与赋役的啬夫，主管治安的游徼，都是选择能够领导众人、专做好事的人来充任。唐朝把一百户人家组建成一个里，把城镇居民点组建成一个坊，把田野上的居民组建成一个村，全都设置正。各个里正，由县里的主管部门选取享有勋官称号的六品以下的人来充任，其次是坊正，每个村的村正选取普通百姓来充任，全都免除他们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实际上同周代官制中的里宰、鄰长、鄙师这类基层官吏完全一样。宋朝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推行的保甲制度，开始时规定他们要抓捕盗贼，接下来命令他们熟悉武事，转过来又责成他们督促赋税的赶快交纳，老百姓经受不了这些折腾，全都是王安石效仿《周礼》而做错了的事情。只有明朝的王守仁在镇抚江西南部地区时，命令居住在城里的百姓每十家组成一甲，生活在乡间的百姓每个村自行加以保卫，让每甲自行相互纠察，盗贼根本就没有容身的地方，设立制度简单易晓，可以实行开来。其他像西汉的韩延寿治理颍川郡，设置乡正、里正和五家为一伍的伍长，居民区发生了异常的情况，官府就迅速得到消息，官府没有案发后再追捕的劳苦，百姓们也没有受到酷刑责问的忧虑。西汉尹翁归担任右扶风的代理太守，逐项了解清楚犯有前科的奸恶歹徒的罪名，下属各县都设有档案材料，按照案件的类属来推究犯罪的人，盗贼就没有一个逃脱掉的。再如北魏的李崇出任兖州刺史，每个村都设置一座楼台，楼台上悬挂一面鼓；东汉的虞诩担任朝歌县长，雇人给盗贼缝制衣服暗中缀上记号。这又表明审察时机制定好应变的措施，完全掌握在那些合适的人选手里。但谁也没有能比北宋欧阳修防御盗贼的四项事宜更为有效的了。这就是：第一，州郡要设置军队构成防备；第二，选任抓捕盗贼的官员；第

三，彰明赏赐和惩罚的规定；第四，任用贤良的地方官去安抚平民百姓。议论政事的人认为这四条确实够得上探求到了根本的论断，的确并不是瞎吹一气啊！我们国家举办团练的方法，效仿古代，结合当代，因地制宜，用来肃清盗贼的源头，没有再能超过它的了。

皇上的制策又鉴于整顿军队，筹划武备属于国家的重大法则，考察探究历代的军事制度，用来酌定整顿与鼓励的规则。这更是有备无患的最长远的考虑啊！臣下我想来，古代根据井田制度，制定军队的人员和物资的提供数量，把士兵寄寓在农民当中。军队选取地中有水的卦象，正是把极其艰险的地形蕴藏在非常顺利的行动中啊！到了春秋时管仲担任齐国的国相，把国都城郊以内的地带划分成三个辖区，制定出五户人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帅的编制来；同时把国都城郊以外的地带划分成五等政区，制定出三十户人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的系统来。三个辖区就构成军队，五等政区就都是农民。士兵不操农具干活，农民不懂得兵器使用，士兵和农民从此分离开来，军事制度从此就败坏了。唐朝以折冲府为单位编成的部队，获取到《周礼》所遗留下的用意，上中下具有差别，统一训练具有法度，轮流替代具有固定的时间，通过折冲府来加以统领，平安无事时就大力从事农耕，使衣食充裕，发生战事时就勘合调动的证件发兵出征。这是它设置军队的有效的地方啊！宋朝聚集起天下的勇猛部队，在京师周围地区列布军营。地方部队归枢密院指挥，将领没有掌握部队的威逼态势；中央主力部队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辖，将领没有发兵的权力。这是它驾驭将领的有效的地方啊！明朝的邱浚认为宋朝的中央主力部队禁军划分成军营到产粮区去驻扎，就比不上汉朝由本人出钱雇人服役而组成的部队了。汉朝由本人出钱雇人服役而组成的部队，士兵们并不是经常聚合在一起，突然发生战事就没力量防御外部的入侵，而统领京师禁卫军的中尉出外讨伐，中央主力部队就没办法使京师威震天下的地位得到加强，由此也就比不上唐朝以折冲府为单位编成的部队了。这的确属于无法改变的定论啊！明朝的于谦首次提出团营会操的动议，把京师的驻军改成了十团

营。明朝的王骥又定下了练兵的制度,具体的项目总共有五种,即训练胆量勇气,训练刺杀技艺,训练阵式变化,训练地形利用,训练气候适应,全都是训练的重要原则与方法啊!皇上如今打算整顿好各支部队,鼓励从事作战的人员,淘汰掉年老和软弱的人,斥除骄纵凶悍的人,惩办懒惰败坏的人,挑选出精锐来,用裁减士卒剩下的那部分衣粮来提高精锐士兵的军饷,这样一来,部队就归向了实际的用途,而军饷又哪里致于白白地消耗掉呢?

慎重对待德业,这是谋求大治的根基;察辨官吏,这是安定住民众的本原;铲除奸邪,这是消弭盗贼的方法;讲求武备,这是稳定住边疆的谋略。根基和本原首先奠立得特宽厚,方法和谋略又深远周密,社会风尚就会摒弃浮华的那套玩艺,而读书人也端正了自己的心志;政事就会去除掉贪婪残酷的行径,而官吏也竭尽那忠心了;国家就会没有歹恶的家伙,而老百姓也安居乐业了;士兵的人数就会不是虚报在那里,而军队也发挥出保卫国家的作用了。长治久安的对策,哪里还有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呢?臣下我跪拜更祝愿皇上像皇天运行那样永不止息,每天都有提高而永无止境。不要认为圣明的德行已经得到修明而在小心谨慎上稍有疏忽,不要认为各机构协同施政已经很融洽而对考核审正偶有懈怠,不要认为民间习俗已经淳厚质朴而忘掉了预先定出治理措施和保住国家的意念,不要认为军事装备已经验核而放松了时刻想到祸乱加以预防的心思。既有起始阶段的努力,又有最终的一贯保持,既做到盛大,又做到长久,用来弘扬那种专去承奉皇天的重大法则,扩展那致使社会昌盛的规制,将会看到迎受皇天降给的众多福庆、振扬我朝盛大美名的景象了,而我们国家永远政治清明的长久国运,也就建立在这四方面政事的基础之上了。臣下我属于学问浅陋和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忌讳,抵触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郑晏明译]

清穆宗同治七年(1868)戊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殿试策问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诞膺昊眷,寅绍丕基。荷列圣之贻谋,承两宫之训迪,兢兢业业,夙夜不敢康。深惟典学传心之要,去奢崇俭之方,练兵讲武之经,弼教明刑之用,冀与中外臣民,致上理于大同,臻郅隆之盛轨。兹值临轩发策,虚衷博采、广集嘉谟。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危微精一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尧曰执中,舜曰用中,汤曰建中,与《中庸》致中和之义有合否?朱子谓《大学》之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始终不外乎敬;《中庸》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心法治法,一以贯之,二书实括其全。能申明其义欤?《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以及《大宝》、《丹扆》之箴,其言亦有可采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仅及修齐,何为略治平而不言?邱浚《大学衍义补》,政典极为详备。抑尚有提挈大纲者在欤?《洪范》皇极,汉儒训为大中,宋儒又以为不然。其义何欤?

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然非徒务乎其名也。《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左氏》云:俭,德之共也。俭以德名者,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也。尧之土阶,舜之土簋,禹之菲食,文之卑服,尚已。汉文帝衣绨履革,屏雕文之饰,惜中人之产,治犹近古焉。厥后令辟,焚翟裘,毁筒布,却珠贡,非不节俭可风,

然究不能跻一世于敦庞、以追踪隆古者。岂徒俭不足以示国欤？抑务其名而不求其实之过欤？今欲使天下黜华崇实，易俗移风，何道以致之？

武备之要，训练为先。蒐苗狝狩，四时教战，成周之制备已。汉有京师教试之法，有州郡教试之法，能详悉言之欤？唐设府兵，三时劝农，一时讲武，人思自奋，悉为精锐。果何由而得此？宋初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为禁兵，亲御近郊阅武，京师之兵称为强盛，而州郡率皆疲弱，意在惩前代藩镇之弊。其制果尽善欤？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为谈兵家所称善。其六练之法，能备详之欤？国家整军经武，兵制修明。近复练兵近畿，用备藩卫。其何以慎简军实，俾各营悉成劲旅也？

上古无司刑之官，虞命皋陶制刑，为五刑所由昉。《周官》五刑之属各五百，而《吕刑》言五刑之属三千。所增减者安在？楚之《仆区》，郑之《刑书》，晋之刑鼎，作于春秋时。而论者谓李悝《法经》六篇，为后世律例所自始。其果然欤？汉初约法三章，厥后萧何定律令，于李悝《法经》凡益若干篇。叔孙通复益者，何律？唐之律、令、格、式，宋之《刑统》，元之《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之《大明律令》，其轻重繁简之数，可约举欤？朕欲本钦恤之心，行明允之法，司宪者宜如何持平协中，以臻刑期无刑之郅治也？

凡兹四端：懋修以建极，节用以阜财，训卒以诘戎，明罚以敕法。经邦体国，莫要于斯。尔多士其详明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学说。

君子没有不这样而很早便能获得天下赞誉的。

从我的角度来观看夫子，夫子比尧舜贤明多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在年龄幼小的时候，承蒙上天的眷爱，继承了宏大的基业。领受列位先帝留下的策略，接受两宫太后的教导，兢兢业业，日夜不敢安乐。只管去深深考虑着学习和传心养性的诀窍，除去奢侈和崇尚节俭的办法，训练军队和整顿军备的计划，帮助教化和倡明刑法的运用，希望同中外臣民一起使国家得到最好的治理，实现大同的理想，达到最兴盛的境界。如今，在这前殿发布策问，虚心地博采大家的意见，广泛地征集美好的计划。各位贡士，请恭敬地听好皇帝我的命令。

“危微精一”的主旨，开启了帝王的道统。唐尧说“保持中道”，虞舜说“运用中道”，商汤王说“建立中道”，它们是否符合《中庸》所说的“达到中和”的意思呢？朱子认为《大学》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要义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的圣明神妙的功效教化，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传心养性和治理国家的方法，是被同一道理所贯穿的，这两本书实际上已概括了它的全部。你们能说明其中的意义吗？《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以及《大宝箴》、《丹扆六箴》，它们的言论也有可以采用的吗？真德秀《大学衍义》仅仅谈到“修身”和“齐家”的道理，为什么省略“治国”和“平天下”而不谈呢？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在政治制度上说得极其详细周密。它其中是不是还有提挈大纲的东西呢？《洪范》中的“皇极”，汉代儒生解释为“大中”，宋代的儒生又不以为然。这是什么道理呢？

自古以来，探求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来给天下臣民作出榜样的。然而，他们是不是只是在追求名声呢？《尚书》说：“要小心地保持你那俭朴的品德，时刻想到天下长久的计划。”《左传》说：“节俭是道德的一个方面。”节俭之所以被称作美德，是因为首先要有清心寡欲的功夫，然后才能保持节俭，符合礼法。尧用泥修筑台阶，舜用泥制成“簋”这种食器，大禹菲薄对待自己的饮食，文

王穿上粗劣的衣服，这些都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汉文帝身穿粗绨做的衣服，脚着粗皮缝的鞋子，宫廷除去雕刻彩绘的装饰，修露台痛惜要费去相当于一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治理国家倒还接近古代帝王。从那以后，贤明的帝王烧掉翟裘，毁去筒布，退还珠宝一类贡品，他们的节俭不是不能成为风范，然而他们终究不能使他们的时代达到醇厚高尚的境地，以赶上隆盛的古代。这难道仅仅是节俭不足以训示国人，还是他们只追求节俭的名声、却不去寻求节俭的实效而造成的过错呢？如今想使天下除去奢华和崇尚节俭，移风易俗，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整顿军备的重要任务，首先是训练军队。通过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些打猎活动，一年四季都训练作战，早在周代这种制度就已经完备了。汉朝有京城教试的制度，有州郡教试的制度，你们能详细谈谈吗？唐朝设置府兵，一年三季督劝农耕，一季进行军事训练；人人都想要自强奋发，全都成了精锐。它是怎样做到这样的？宋朝初年收编天下强劲的军队，驻扎在京城及附近地区，成为禁军，皇帝还亲自到近郊检阅，京师的军队号称强盛，可是州郡的军队都疲惫衰弱，这样做的意图是改革前代藩镇拥兵自重、威胁朝廷的弊病。这种制度果真很好吗？明朝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是军事理论家们所称赞的。它的六种训练方法，能齐全详尽地讲出来吗？我朝整顿军队，谋划武备，制度完善。近来又在京城及附近地区训练军队，准备用来防卫京师。怎样进行周密的军器训练，使各营成为强劲的军队呢？

上古时代没有专管刑法的官员，虞舜命令皋陶制定刑法，这就是五刑的开始。《周礼》所记载的五刑附属条文各有五百条，可是《吕刑》却说五刑的附属条文有三千条。它在什么地方作了增加和减少？楚国的《仆区》、郑国的《刑书》、晋国的刑鼎，是春秋时制订的，但议论者却说李悝的《法经》六篇是后代法律条例的开始。这是真的吗？汉朝初年订立了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制定了法律条令，对李悝所作的《法经》又增加了若干篇。叔孙通又增添的是什么法律？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刑统》，元朝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令》，它们的轻重繁简的情况，可以简略地列举说明吗？皇帝

我想本着谨慎体恤的心念来实施公正平允的法律，执掌法律的官吏应该怎样才能保持公平合理、不偏不倚，从而达到用刑而期望不再用刑的那种美好的政治境界呢？

总之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努力加强自身修养以建立最高准则，节约用度以使财物丰富，训练士兵以整顿军备，明确惩罚以强化法令制度。治理天下和管理国家，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各位贡士，请详细而清楚地把你们的见解写进答卷里。不要泛泛而谈，不要隐瞒观点，皇帝我将亲自阅览。

洪钧　会试卷三道

洪钧（1839－1893）　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状元。同治九年，出任湖北学政。光绪元年(1875)，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其后历任陕西乡试主考、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职。曾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其在史学上颇有造诣。曾利用西方史料来补证《元史》，著有《元史释文证补》30 卷。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有在于人与言者，皆达天之学也。夫大人体天命以出治，圣人阐天命而为言，君子交致其畏焉，谓非达天之学乎？今夫尽君师之职，以上承於穆，则其人足以亮天功，其言足以彰天德。乃若会归在皇极，而君威即等于天威。亦钦佩在陈编，而师道并严于天道。外有以遵荡平之路，内有以绍典学之心，而宪章奉之，亦彝训懔之矣。君子之所畏，既征诸天命矣。今夫降衷之理难见也，上帝之载无声也。而有大人出焉，以王位示德元之准；而有圣人出焉，以修道垂立教之言。

谓大人惟名爵之崇，则首出何以称各正？谓圣言第词章之事，则心传何以论惟精？惟确见为天命所归，而在下者宜尊王，亦居今者当

稽古也，则兢业良有由也。谓威福者大人之政柄，而命讨何以本维皇？谓《诗》、《书》者圣人之绪余，而问学何以通德性？惟推暨其畏天之念，而仰声灵之赫濯，亦懔典籍之提撕也，则劼毖不容懈也。而君子已竦然也。大学之道在明新，非畏则景行奚切？大中之业在位育，非畏则谨独何功？戒慎于不睹之中，而作睹有大君，戒慎又从而切也，夫何为而戒慎也者！而君子又皇然也。阐圣功者，谟诰服其教，而畏由慕生；著圣学者，苞符绍其绪，而畏由敬出。恐惧于不闻之地，而尊闻在圣训，恐惧又引而深也，夫何为而恐惧也者！

第恪循乎堂帘之分，则所以视大人者犹疏；第浮慕乎盘带之铭，则所以体圣言者犹泛。夫君子之畏，固畏以心，非以迹也。经世与教世之端，精之皆皇降所凭，亦密之皆鉴观所及。而谓寅畏，可毋深乎？占乾爻之五位，如觐当阳；对尔室之一编，如临师保。寤寐中之纠虔，乃真纠虔也。王道而是训是行，圣谟而为坊为表。君子直以是为敬天之休尔。必对扬而始怵其神，则大人之警我也有限；必诵习而始惺其念，则圣言之戒我也无多。夫君子之畏，又畏以常，非以暂也。治术与学术所昭，在在有帝谓之通，即息息有明威之察。而谓抑畏，可偶疏乎？未尝瞻黼扆也，而如见羹墙；未尝效书绅也，而如闻绍命。旦明中之乾惕，乃真乾惕也。三重而可以寡过，片语而可以终身。君子直以是为承天之事尔。此达天之学也，而畏之事全矣。

敬畏大人和圣人的学说，都是通天的学问。因为大人依据天命来实施统治，圣人阐述天命而建立学说，所以君子对他们都感到敬畏，这难道不能说是通天的学问吗？如今，只要有人能够尽到君主和老师的职责，并由此向上而承膺天命，那么，这人就足以辅佐上天的功业，这人的学说就足以彰明上天的道德。至于说会聚归从在君主的最高准则之下，那君主的威严就等于上天的威严；同样，钦敬佩服的对象集中在经典学问上，那师道也就与天道一样庄严了。对外有能够遵循的荡平帝王之路，在内有能够继承经典学说之心，而奉行宪章制度，也就等同于遵循基本准则了。君子的敬畏，是要由天命来验证的。如今，上天赋予人类善良本性的道理很难见到，而上帝的行为

也没有声响。然而,只要有大人产生,那就可以用王权来显现上天的准则;只要有圣人产生,那就可以用美好的道德来垂示建立思想体系的学说。

如果说大人只是名声和爵位的尊贵,但为什么他们一出现便能够各自确立名分?如果说圣人的学说只是文字功夫,但为什么他们传心养性的论断就那么精纯呢?只因明确见到了天命的归结,那在人间就应该尊崇帝王;同样,生活在今天的人也应当研究古代。这样,兢兢业业就确实有依据了。如果说惩罚与赏赐只是大人的权柄,但为什么奉命讨伐却在于上天呢?如果说《诗经》、《尚书》等经典只是圣人学说的残剩物,但为什么阅读它们又可以开通德性呢?只要具备了敬畏上天的念头,那就可以体仰王权的庄严神圣;同样,也就可以秉承典籍的提挈了。这样,小心谨慎就不容松懈。而君子已经感到了震惊。大学的目的就在于引导人们发扬自身所固有的光明德性、改掉已有的缺点和毛病,如果没有敬畏,那又怎能迫切地向高尚的道德看齐呢?万分中正的事业就在于使天地正位、养育万物,如果没有敬畏,那又怎能具备在独处时所形成的良好的个人修养呢?尽管人们保持戒惧谨慎是别人无法见到的,然而使人和万物都能看得见,君主却能够做到。因此,保持戒惧谨慎又从而更加急切了。该怎样去保持戒惧谨慎啊!而君子又感到不安了。建立神圣功勋的人,是凭借命令来实施他们的政教的,因而人们对他们的敬畏是由仰慕而产生的;宣扬神圣学说的人,是凭借典籍来传授他们的思想的,因而人们对他们的敬畏是由尊敬而产生的。尽管人们心中的恐惧是别人不知道的,然而自己却能够知道圣人的教诲。因此,心中的恐惧又进一步加深了,该怎样去感到恐惧啊!

如果只是严格遵守等级的区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观看大人,大人就仍然显得疏远;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敬慕圣人的典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体会圣人的学说,圣人的学说就仍然是空泛的。君子的敬畏,确实是在心中的敬畏,而不是在表面上的。经营天下和教化天下这两个方面,要说精微,那它们都是上天所赋予的;同样,要说它们细密,那它们都是经验教训的借鉴。因而,能说敬畏可以不深吗?对

端坐在宝座上的大人，就如同拜见太阳一样；对房中圣人的经典，就如同面对师保。躺在床上的深沉反思，才是真正的反思。遵循国君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政治原则，把圣人的教诲作为自己的典范和准绳。君子只是把这作为尊敬上天的美德。如果只是为了殿廷对答才聚精会神，那大人对我的鞭策也就十分有限了；如果是为了诵读学习而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那圣人的箴言对我的提醒也就无须太多了。君子的敬畏，又是永恒的敬畏，而不是暂时的敬畏。统治方法与学术思想所昭示的，到处都与天命相通，也就是上天时时刻刻有对善恶的监察。因而，能说敬畏可以偶然疏忽吗？未尝瞻仰帝王的宝座，但能够思慕大人；未尝把圣人的思想记在腰带上，但能够遵循圣人的教诲。个人独处时也不宽容自己，才是真正的不宽容自己。保持礼仪、制度、考文这“三重”，就可以减少过失；圣人的言论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可以使人终身受益。君子只是把这作为承膺天命的事情。这就是通天的学问，而且敬畏的事情也就十全十美了。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明君子之致誉，未有不由道者也。夫非尽道，则无以致誉。君子之蚤有誉于天下，道为之也。不可绎《诗》言而决之哉！且王者显庸创制，而歌功者塞宇下，颂德者满寰中。猗欤休哉！夫果操何道以致此？及进窥其出治之原，而一人建极，明堂有递密之功；斯四海从风，令闻有自然之应。有其事必有其效，亦有其实，乃有其我。虽欲易一道，而无由也。《振鹭》之诗，言有誉者如此。吾乃探古今之治理，验遐迩之人情，而恍然有会于君子也。

圣主不矜要结，而衢谣壤击偏欲即难名之盛德，以曲致揄扬。则以誉为君子所易有，非也。无间之声称，悉本乎有形之政典；而帝王代嬗，终不能别用其良谟。世主好事声华，而扬厉铺张每难强无识之愚氓，而同深赞叹。则以誉为君子所难有，亦非也。誉情之诅祝，胥根乎主极之纯疵；而黼黻皇猷，要不能别矜其治术。向亦不知君子之誉，何由而蚤有也，乃观于其道，而本身以征民者如此，考建而质俟者

又如此，然后知君子之蚤有誉于天下也，罔不由此。藉曰不如此也，则是宫廷之声教，未讫于南朔东西，可知也。灌虞小补之为，以制浇俗则有余，以播仁声则不足，而顾欲海隅日出之乡，蚤殷其舞蹈也，未有也。藉曰不如此也，则是宵旰之精神，未浹于百年之世，又可知也。苟且补苴之术，可以强慑夫人心，不能广收夫物望，而顾欲逖听风声之众，蚤起其讴歌也，未有也。

然则修道之君子，当知所从矣。媚兹本朝野之忱，不如此而声施已寂；颂美亦臣民所乐，不如此而爱戴终虚。闻望亦有何奇？乃独视廊庙之经纶，而不容强致。从可知风同道一，未有积不厚而流光者也。艺东都之黍，誉播郇膏；怀南国之棠，誉与召茇。下邑之讴思，犹必待渐浹既深而后，况圣天子之抚有天下者哉！然则至道之君子，宜识所先矣。岂无史官之扬诩？不如此而远近殊称。岂无煦妪之恩施？不如此而亲疏异议。颂祷岂容溢美？惟默体宸衷之张弛，而非可幸邀。从可知德盛化神，未有无所感而即应者也。民劳毡尾，誉孔迩于条枚；德洽骀虞，誉仁恩于葭茁。侯服之馨闻，犹必俟教化既行而后，况圣天子之照临天下者哉！

这句话说明君子获得声誉，没有不遵循道德标准的。如果不能完全符合道德标准，那就无法获得声誉。君子很早便获得了天下的赞誉，是由于道德造就的。通过对《诗经》所说的进行分析，不就能得出判断了吗！帝王建立功勋、创立制度，而歌功颂德的人遍布天下，充满寰宇。这是多么美好呀！他们到底是运用什么方法而达到这种境界的呢？等进一步观看他们统治天下的根本，就可以发现：一人确立起最高准则，而在明堂就产生越发周密的功效；于是全天下便闻风响应，美好的名声自然就传播开来。有了特殊的事情必然会有特别的效果，同样，有与事情相符的真实才会有与真实相符的自我。即便是想要改用一种方法，那也是无法实现的。《诗经·振鹭》这篇诗，就是这样谈论有声誉的人的。我于是探索古往今来的政治原理，检验远近的人情，从而恍然大悟，对君子有了理解。

圣明的君主不崇尚笼络和收买人心，而街头巷尾却传唱太平之

歌，偏偏要专就无法称述的那种盛大德业而设法表达出内心的赞美来。于是有人便认为声誉很容易就能够被君子得到，但这是错误的。哪怕是一点点名声，都完全取决于能够看得见的治国措施；而且帝王改换，最终也不能采用这种好办法之外的其它谋略。君主喜欢美好的名声而大肆宣扬自己，然而却很难强迫没有见识的百姓一起发出深深的赞叹。于是有人便认为声誉很难被君子得到，但这也是错误的。舆论的诅咒和赞誉，完全取决于君主道德的好坏；而且改善帝王的治国计划，总之也不能崇尚这种治国办法之外的其它办法。我过去也不知道君子为什么很早就能够获得声誉，于是便观察他们的做法，看到他们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获得民众的信任是这样，用三代古帝王的标准、立于天地的标准、鬼神评判的标准、理论永恒的标准而加以比照也是这样，然后就明白了君子之所以可以在天下很早就能够获得声誉，没有不是出自这一原由的。假如说并非这样，那就可以知道官廷的声威和教化还没有覆盖南北东西。谨慎小修小补的举措，用来改变浮薄的风俗是绰绰有余的，但用来传播仁爱的声誉却是很不够的；因而，想要让最边远的地区早早地跳起欢庆圣君教化的舞蹈，也是不可能的。假如说并非这样，那就又可以知道励精图治的精神还没有渗透百年时代。随意修补的手段，可以强行威慑人心，但不能广泛赢得大家的肯定；从而想要远方凝听良好风气的民众早早放声讴歌，也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那么，具备美好道德的君子就应当知道该怎么办了。爱戴君主原本是朝野发自内心的忠诚，如果不是这样，那应该被传扬的名声就会陷入沉寂；颂扬美德也是臣民所引以为乐的，如果不是这样，那爱戴终究也只是虚假的。要想有声望又有什么奇特的举动呢？这只能取决于朝廷治理国家的谋划，而不容强行招致。从而可以知道：风俗相同、道德同一的局面，从来没有不达到积累丰厚的程度就能够光芒万丈的。正如《诗经·下泉》所咏颂的那样：郇伯种植东都的黍苗，而他的恩泽便使声名远扬；正如《诗经·甘棠》所咏颂的那样：人民把对召伯的怀念寄托在南国的棠梨树上，召伯曾在棠梨树下停留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民间城镇的赞颂和怀念还必须等待恩泽

逐渐深入后才能产生,更何况圣明的天子还抚有天下呢！既然如此,那么,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就应该了解首先应当怎么做了。哪能没有史官的宣扬呢？如果不是这样,那远处和近处的人们就会有不同的说法。哪能没有抚养爱护的恩德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关系亲近和疏远的人们就会有相反的意见。歌颂和祈祷怎能容忍过分的赞扬？这只能默默地体会君主内心道德的兴衰,而不是能够侥幸求取的。从而可以知道:道德隆盛而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从来没有无所感受就能够有迅即响应的。正如《诗经·汝坟》所咏颂的那样:人民受周文王指派、为商纣王砍伐树木,尽管十分劳累,但人民在砍树中还赞誉父母特近的恩德;正如《诗经·驺虞》所咏颂的那样:连"驺虞"这种野兽、以及芦苇这种野草,也都享受到了周文王的恩德。离王城一千里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地区醇美风俗的传播,还必须等待教化后才能实现,更何况圣明天子统治天下呢！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以圣拟圣,而知其功为独远矣。夫夫子与尧舜,皆圣人也。圣之实则一,圣之用则不一。贤于尧舜,予岂阿所好哉！意谓吾夫子绍列圣之传,而道统必原于尧舜。论者谓其道同,其功同也。顾道与权合,则行道以治世;道与权分,则明道以教世。治世者,数世被其功;教世者,万世被其功。道无殊,而功实有殊。何遽谓古今人不相远也？不然,论在上之圣人,则以尧舜为宗;论在下之圣人,则以夫子为极。夫子之与尧舜,岂容轩轾于其间哉！而以予观之,删《书》而断自唐虞,放勋、重华实足开泗水闻知之绪,夫子固继尧舜而代兴者也。所异者,二帝已遥,而大义将湮,必待振于杏坛之事业。好古而深其祖述,平阳、蒲坂遂以启尼山心学之源,夫子又奉尧舜为景行者也。所异者,两朝迭嬗,而微言垂示,终借资于木铎之声灵。

然则夫子不过尧舜,而玉振金声之盛,不必其有亏;尧舜不过夫子,而危微精一之传,且虞其中绝。是尧舜得夫子,而益彰也。然则前即无尧舜,而洪荒待辟,禹、稷尚可任其忧;后苟无夫子,而世道将穷,

皋、夔不能救其敝。是夫子视尧舜,而尤重也。然则谓尧舜不贤于夫子,可也。处隆古则创造宜宏,处叔季则修明尤亟。异代有同源之契,而作君直等于作师。然则谓夫子不贤于尧舜,不可也。得位而致治平则易,穷居而承绝学则难。事功亦时势所分,而后圣遂超乎先圣。

必于性量之渊深而强为优绌,则易夫子为尧舜,岂有加于平成之绩?易尧舜为夫子,岂不克任纂述之勤?以是为贤之远也,非也。抱残守阙之功,较敷教明伦而尤伟。而拯下民于昏垫,臣邻之庶绩,可昭信史于来兹;弟子之一辞,莫赞帝王之全量。黜参以韦布之微权,而稽盛轨于中天,其有此运量也哉!必于性功之安勉而故示低昂,则尧舜之文思文明,何异于时中之体?夫子之一褒一贬,何殊于命讨之谟?以是为贤之远也,非也。觉世牖民之烈,较亮工熙载而尤宏。而授受陈《二典》之书,徒慨想夫星云焕瑞;删定卒《六经》之业,直俨偕夫日月争光。一线之渊源,遂以贻千秋之法守。为问大犹于帝世,其有此垂昭也哉!

用圣人来比拟圣人,便会知道夫子的功绩是独特而伟大的。夫子与唐尧、虞舜,都是圣人。圣人的实体是相同的,但圣人的功用却不一样。说夫子比唐尧、虞舜还贤明,我怎能有所偏袒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夫子继承了各位圣人的传统,但对"道统"却必定要推导到唐尧、虞舜那里。论说这个问题的人认为他们的思想主张相同、他们的功绩也相同。然而,思想主张与权力结合,就会推行思想主张来治理天下;思想主张与权力分开,就会宣传思想主张来教育天下。治理天下的人,他们的功德能够覆盖几代;教育天下的人,他们的功德却能够覆盖万代。思想主张没有不同,但功绩实际上却有差别,怎么能匆忙下结论说古人和今人相距不远呢?不然,要说在前面的圣人,则把唐尧、虞舜作为祖宗;要说在后面的圣人,则把夫子作为顶峰。夫子与唐尧、虞舜,怎能容忍在他们之间区分轻重高下呢!然而,凭我的看法,夫子删定《尚书》而把唐尧、虞舜作为断限,唐尧、虞舜确实能够开启夫子在泗水讲学的开端,夫子确实也是能够继承唐尧、虞舜并取代他们而兴起的人。所不同的是,两位帝王已经遥远,而且伟大的

思想将要被埋没，必须有待于夫子在杏坛聚徒讲学才能得到振兴。夫子喜好古代而且深入承继二帝的事业，在平阳登基的唐尧、在蒲坂登基的虞舜于是开启了孔子思想主张的源头，夫子又尊奉唐尧、虞舜为高尚的楷模。所不同的是，两朝交替变换，而精微的言论垂示后代，最终也借助于思想学说的宣扬。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夫子超不过唐尧、虞舜，但他那玉振金声集大成的隆盛学说肯定不会有亏损；如果唐尧、虞舜超不过夫子，那"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只有精诚专一，才能真诚地保持中道"这个心法传授就会有中途断绝的危险。由此可见，唐尧、虞舜是由于有了夫子才更加彰显的。既然如此，那么，从前假使没有唐尧、虞舜而远古的洪荒还有待于开辟，那大禹和后稷还可以解决这个困难；但后来假如没有夫子而世道又将要没落，即使皋陶和夔也是不能改变这个弊病的。由此可见，夫子比起唐尧、虞舜来就尤其重要了。既然如此，那就可以说唐尧、虞舜没有夫子贤明。如果处在兴隆的古代，那么创造就应该宏大；如果处于没落的时代，那么讲求道德就尤其急迫。不同的时代却有相同源头的契合，因而当国君就完全等于当老师。既然如此，那就不能说夫子没有唐尧、虞舜贤明。得到王位而要实现"治国"和"平天下"是容易的，身处困境而继承断绝的学说却是困难的。事业和功绩也是由于时势而有所区分的，后来的圣人于是超过了前面的圣人。

如果必须要在性情度量的深度上强行区别优劣，那么，把夫子换成唐尧、虞舜，难道他会比唐尧、虞舜使地平天成的功绩还要辉煌吗？把唐尧、虞舜换成夫子，难道他们不能胜任著书立说的辛勤吗？由此可见，认为贤明有很大的差异也是不对的。保守残缺学说的功劳比普及教育、倡明伦理而更显伟大。但是从洪水包围和饥饿中拯救出了人间的民众，帝王身边臣子的众多功绩，能够向将来昭示真实的历史；但弟子的一句话，却不能有助于夫子对帝王的全部器量的揭示。把柳下惠的法官权力多次予以罢去，却能从唐尧、虞舜时代找到了最高准则，他有这等器量吗？如果必须要在性情功夫的宁静和勤奋上来故意显示高低，那么，唐尧、虞舜的经天纬地、道德纯粹、光照四

方，与夫子的立身处世符合时宜、不偏不倚又有什么差异呢！夫子的一褒一贬，与唐尧、虞舜本着天命进行讨伐的计划又有什么不同呢！由此可见，认为贤明有很大的差异也是不对的。让时代觉醒、启发民众智慧的功勋，比辅助天工、奋扬事业还要伟大。心法的传授载录在《尧典》和《舜典》这两部书中，人们只能凭空想象当时的星云焕瑞的景象；到夫子删定古籍而最终成就了《六经》的事业时，就完全能够与日月争光了。一条线一样细的渊源，于是得以成为流传千秋的法则。询问重大法则仍然好像跟帝王世纪一样，夫子就有这样的光明流传后世呵！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治天下之道，非以长驾远驭为能；平天下之经，非以苟且补苴为事。盖基之宵旰者有其本，而措之庙堂者有其具也。自古贤圣帝王致治之法，史不绝书。而求其要端，则不过懋修之实，节用之规，振旅之方，慎刑之意。其兢兢于夙夜者，将以勉主德于至纯，贻大猷于累世，而使天下力学崇俭，以驯至于兵刑不试之休也。至于敬怠之几，华朴之分，张弛之宜，宽严之用，尤必察之以圣知，而行之以实心。则唐虞三代之隆风，不难再见于今日也。

钦惟皇帝陛下，冲龄践阼，圣德亶聪。宥密固已单心，冗费固已悉汰，军威固已丕振，国典固已持平，法度典章秩然具备矣。乃圣怀冲挹，犹切咨询，欲公听以达聪，思迩言之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典学、戒奢、诘戎、敕法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以备顾问？而不揣固陋，窃欲以壤流之细，仰补高深。兹复恭奉谕旨，勖多士以毋泛毋隐。若惟摭拾浮辞，实已负惭夙夜。

伏读制策有曰：精一危微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而欲求审端致力之方，以心法为治法。此诚正位凝命之大本也。臣谨案执中一语，肇自陶唐。其后舜曰用中，汤曰建中，无非于人心道心之界，慎其闲存而究，则位天地、育万物之功，皆不外乎此。中庸之致中和，圣神之学即帝王之功也。朱子《或问》谓《大学》自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

始终不外乎敬;《中庸》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诚敬立,而天人感应可知也。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约三皇五帝以迄宋代之君,为《帝学》八卷。真德秀著《心经》,又著《政经》。唐张蕴古献《大宝箴》,李德裕进《丹扆六箴》,皆足以为启沃资而备观省之用。宋真德秀作《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尧典》、《皋陶谟》、《伊训》之书,《思齐》之诗,《家人》之卦,子思子、孟子、董仲舒、扬雄之说,分为四大纲,意在正本清源,揭明为学致治之要,故于治平之略阙如。明邱浚补之。一则举其体,一则阐其用也。《洪范》皇极,汉儒训为大中。朱子谓:皇者,君也;极者,至极之义。如《礼》所谓民极、《诗》所谓四方之极是也。其说较汉儒为优矣。皇上以圣哲之资,荷艰大之业,亲师重道,逊志时敏,更审夫存诚之学、居敬之功,宫府内外皆以一中为临驭,岂不懿欤!

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而欲以去奢示俭之意,训迪臣民。臣惟《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左氏》曰:"俭,德之共也。"俭而以德名者,非谓徒务乎其名也。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故自其末言之,则所以裕财而足国;而自其本言之,则必有不敢纵欲、不敢厉民之意,而后去声色,戒游畋,黜华崇实,息息以撙节为心。尧不以土阶为陋,而化致时雍;舜不以土簋为嫌,而俗征风动。禹之卑宫,文之卑服,亦皆以身率下,不令而从。其后如汉之文帝衣绨履革,屏雕文之饰,惜中人之产。其时民安物阜,汉治称极盛焉。后之令辟,非不焚翟裘、毁筒布、却珠贡,思以节俭之风昭示臣下,而终不能跻一世于敦庞,以追踪隆古,则务其名而不求其实之过也。然则使天下回心向道,相与戒侈靡而事朴诚,亦视上之表率而已。圣朝俭德,超越千古,近又裁繁冗之费,慎度支之经,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凡在臣工百姓,孰不敦《羔羊》之节、《蟋蟀》之风哉!

制策又以文德诞敷,不忘武备,整军经武,所以辅化安民,因详询夫训练之方、营伍之制。此尤保邦之微意也。臣考成周之法: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寓兵于农,分四时以教战,法至善已。汉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之制。其京师都试之法,则以秋后郊礼毕,会五营士。其州

郡教试之法，则以八月会都试，课殿最。其后兵制浸失，而都试之法遂罢。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因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每月番上以供宿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无坐食也；籍藏将府，伍散田亩，无列屯也；有事则将之以出，事已则将之而归，无久戍也。三代以降，兵最强而制近古者，莫唐之府兵若也。宋惩唐末藩镇之弊，思强干而弱枝，乃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为禁兵。而州郡率皆疲弱，曾不足以制盗贼，卒至兵不可用。而募勇以充伍籍，国威不振，职是之由。夫兵以训练为先。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为谈兵家所称善。其论练士之法，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苟如其法而奉行之，何患兵之不精哉！我朝武功之盛，凌铄往代。八旗绿营，星罗棋布。近年增兵近畿，以固邦本，更勤其操演，精其简阅，洵安内攘外之大猷也。

制策又以刑罚之设，所以除莠安良，因询累朝损益之经，求持平协中之道。臣惟上古无司刑之官。唐命皋陶制刑，为五刑所由昉。《周官》之制，属各五百，而《吕刑》言五刑之属三千，盖墨罚、劓罚各以千计，而重刑则递减而上，所谓世轻世重也。春秋之时，楚作《仆区》，郑作《刑书》，晋铸刑鼎；而李悝《法经》六篇，又为后世律例所自始。汉萧何定律令，于李悝《法经》益以《事律》、《擅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又益为《傍章》十八篇，名《汉律》。唐有律、令、格、式。太宗、元宗之世，上务仁恕，故用法平允；后以残酷为治，而法纲遂繁。宋之《刑统》仍周之旧，而矫其太严，大概酌于唐之律、令、格、式，随时损益。元初循用《金律》，世祖简除烦苛，更为《至元新格》；英宗时又立《大元通制》。皆以仁厚为本，而其失则在缓弛。明定律令，篇目皆准于唐时，矫元之失，用法过峻，刑狱因以滋繁。我国家深仁厚泽，仍前之律，而去其严刻，繁简得中，法尽善已。

夫主极虽端而宜防其怠，侈心虽去而必杜其萌，兵制虽精而更忧其敝，刑章虽慎而或虑其繁。臣之至愚，尤伏愿皇上勤览《诗》、《书》，广延规谏，廑时艰而力求整顿，守成宪而量为变通。皋陶之《谟》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言敬畏之心为诸事之枢也。体此意以懋勉宸修，而更以朴素端民俗，以纪律肃戎行，以明允行国典，君德纯而

庶事咸理。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并不是只凭能够长驾远驭就算有才能,使天下太平的原则并不是只凭苟且修补就能完事。因为日夜勤于学习有它的根本,在朝廷实施计划有它的依据。自古以来,圣贤帝王实现治理天下的办法,史书上从未停止过书写记载。然而,探求它的重要内涵,只不过是完善自我修养的实际,节约费用的原则,整顿军队的办法,谨慎用刑的用意。他们白天黑夜兢兢业业,是为了勉励自己把君主的道德修养提高到最纯美的境界,给世世代代留下伟大的谋略,使天下臣民努力学习,崇尚节俭,渐渐达到军队和刑法都派不上用场的美好境界。至于敬重和怠慢的界限,奢华和朴素的区分,紧张和松弛的适用,宽大和严苛的运用,尤其必须用神圣的智慧作出判断,用真诚的态度加以实行。那么,唐尧和虞舜以及三代时期兴盛的风气在今天就不难再见到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幼小年龄便登上皇位,圣明的天赋格外聪慧。宽仁宁静尽管已经竭尽全力,多余的花费尽管已经全部裁减,军队的威力尽管已经大大振奋,国家的刑法尽管已经公正平允,法令制度井然有序并全部具备了。可是陛下还是虚怀若谷,殷切向臣下咨询;想公开听取意见,以达到耳聪目明,想就近听取建议而细加审察。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勤奋学习、戒除奢侈、整饬军事、整顿法令这些大政方针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哪能配作为顾问?但臣下我却不揣鄙陋,想用泥土和溪流的细小,为高山和大海添补高深。现在又恭敬地接受了陛下的谕旨,勉励我们各位贡士不要泛泛而谈,不要隐瞒观点。如果只拾取浮泛的言论来回答陛下,那就实在是辜负自己昼夜不息的勤奋学习了。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精一危微"的要旨,开辟了帝王的道统,因而想要探求把握本原、尽心尽力的方法,把传心养性的方法拿来作为统治的方法。这确实是端正君位、凝聚天命的重要根本。臣下我小心查考:保持中道这句话,最早是陶唐氏帝尧说出来的。后来,

虞舜所说的运用中道，商汤王所说的建立中道，无非都是说：如果能够在人心和道心之间，小心地做到断绝邪恶、保持诚意，那么，使天地正位、养育万物的功效，都不外乎这个道理。中正平常而达到“中和”的状态，表明“圣神”的学问就是帝王的功夫。朱子的《或问》说：《大学》一书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不外乎一个“敬”字。《中庸》一书的“圣神功化”，关键不外乎一个“诚”字。真诚和敬重得到确立，就会知道天人感应了。唐太宗写作《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开始，到《阅武》、《崇文》结束。宋代的范祖禹总括三皇五帝直到宋代君王，写成《帝学》八卷。真德秀写作了《心经》，又写作了《政经》。唐代的张蕴古进献《大宝箴》，李德裕又进献《丹扆六箴》。这些都能够启迪智慧，提供借鉴。宋代真德秀写作《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摘取《大学》中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字，拿《尧典》、《皋陶谟》、《伊训》这些《尚书》的篇目以及《思齐》这篇诗歌、《家人》的卦爻，子思、孟子、董仲舒、扬雄等人的学说加以证明，分为四大纲目，意图在于正本清源，揭示进行学习和达到天下大治的要点，所以对于如何“治国”、“平天下”就加以省略不谈了。明代邱浚补充了本书。他们二人一个是发挥它的原则，一个是阐明它的施用。《洪范》中的“皇极”，汉代儒者解释为“大中”。朱子说：皇，是君王；极，是到了极点的意思。比如《周礼》所说的“民极”、《诗经》所说的四方的“极点”，就是这样的。这种说法，比汉代儒者说得更好。皇上凭着圣贤哲人的资质，肩负艰难伟大的事业；亲近老师、敬重道德，谦虚好学、时刻鞭策自己；如果更能进一步理解保持真诚的学说，保存敬重的功夫，用一个“中”字来驾驭朝廷内外，那不就更美好了吗！

制策又认为自古寻求完美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树立榜样的，因而想要用除去奢华、提倡节俭的意图来教育和启迪臣民。臣下我认为：《尚书》说：“要小心地保持你那俭朴的品德，时刻想到天下长久的计划。”《左传》说：“节俭是道德的一个方面。”节俭之所以被称作美德，是因为首先要有清心寡欲的功夫，然后才能保持节俭，符合礼法。因此，从它的后一个方面来说，就可以用来使财物富裕，使国库充足；而从它的前一个方面来说，首先必须

得让君主不敢放纵欲望,不敢有危害老百姓的想法,然后才能戒除歌舞和女色,取消游玩和打猎,废弃奢华,崇尚朴实,时时刻刻心里都想着节省。尧帝不认为泥土修筑的台阶是简陋的,因而能够移风易俗,使社会风气美好;舜帝不嫌弃用泥制成"簋"这种食器,因而能够使老百姓的风俗习惯验证了闻风响应。大禹居住在简陋的宫室,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也都是以自身来作臣下的表率,因而不需下达命令,臣民就能服从。后来,如汉代文帝身穿粗绨衣服、脚登粗皮缝的鞋子,除去宫廷雕刻彩绘的装饰,修筑露台痛惜要费去相当于一户中等人家的产业。那个时候,百姓平安,物产丰富,汉代对天下的治理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了。后来贤明的帝王不是不能烧掉翟裘、毁去筒布、退还珠宝一类贡品,用节俭的风范昭示臣民,然而他们最终不能使他们的那个时代达到醇厚高尚的境地,以赶上兴盛的古代。由此可见,这是他们只追求节俭的名声、而不去谋求节俭实效的过错。然而,要使天下臣民回心转意,向往道德,相互鼓励戒除奢侈和浪费,奉行简朴和诚挚,也是要看上面的表率作用的。我圣朝节俭的德行超越了千古,近来又裁减了繁复多余的花费,谨慎地制订了财政支出的原则,遵循唐尧时代的节俭,沿袭虞舜时代的简朴。所有臣子和百姓,有谁不发奋追求《诗经·羔羊》中那种节俭正直的节操、《诗经·蟋蟀》中的那种终年勤劳的风气呢!

制策又认为在文治已经完善的情况下,不能忘掉军备,整顿军队和讲求军事才能够辅佐教化,安定百姓,因而详细询问训练方法、军队制度。这尤其是保卫国家的精细考虑。臣下我查考周朝的制度:通过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打猎活动,把士兵寄托在农耕之中,分四季来训练作战,方法是最好的。汉代有"都试"、"都肄"、"都讲"、"貙刘"的制度。京城"都试"的方法,是在秋天后郊外祭天的典礼结束后,聚合五营士卒。州郡"教试"的方法,是在八月聚集,训练考核,分出优劣。后来,军事制度渐渐变形,"都试"的方法于是就停止了。府兵的制度,从西魏北周开始创立,到隋朝便完善了,而唐代承袭了下来。把关中分为十二道,每个月轮番到京师担任一次宿卫。三季务农,一季进行军事训练,没有闲着吃饭的;兵籍收藏在将府,兵士散布

在田野，没有驻防的军营；有了事变将领就率领兵士出来作战，事变平息后将领就率领他们回去，无长久驻扎在外的。三代以后，军队最强大而制度又接近古代的，没有比唐代的府兵制更好的了。宋代革除唐代藩镇的弊病，想加强中央兵力而削弱地方兵力，就收编了天下强劲的军队，扎营在京城四周，把他们变为了禁军。而州郡的军队大都疲惫衰弱，连盗贼也没有力量去制服，最终以至于这些军队不可使用。而招募勇猛的人充当士兵，宋代国威不能振奋，主要是这个原因。军队首先是要训练。明朝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是被军事理论家们称赞为最好的。它所论述训练士兵的方法，一是训练队列，二是训练胆气，三是训练耳目，四是训练手足，五是训练结营布阵，六是训练将领。假若按照它的方法来奉行实施，哪还愁军队不精锐呢！我朝武功的兴盛，超过了过去的朝代，八旗兵和绿营兵，星罗棋布。近年来在京城四周增加军队，以巩固国家的重地，更进一步让他们勤奋操练，精细挑选，确实是安内攘外的重大谋略。

制策又鉴于刑罚的设置，是用来清除坏人保护善良的，因而询问历代增添减少刑法的大致情况，以寻求保持公平、符合不偏不倚的原则。臣下我想来：上古没有专门掌管刑法的官员。唐尧命令皋陶制订刑法，是五刑的开始。《周礼》所记载的制度，五刑的附属条文各有五百条，可是《吕刑》却说五刑的附属条文有三千条，原因是墨刑和劓刑各有千条，而重刑则依次递减。这就是所谓根据时世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春秋时代，楚国制订了《仆区》，郑国制订了《刑书》，晋国铸造了刑鼎；而李悝《法经》六篇，又是后代法律条令的开始。汉朝萧何定立了法令，在李悝的《法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事律》、《擅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又增添《傍章》十八篇，取名叫《汉律》。唐朝有律、令、格、式。太宗、玄宗的时代，皇上追求仁恕，所以使用刑法公平得当；以后用残酷的办法来治理天下，而法律条令也就繁杂了。宋朝的《刑统》，沿袭后周的旧制，而矫正其中过于严酷的内容，大致斟酌唐朝的律、令、格、式，根据进势的需要来减少和增添。元朝初年，沿用《金律》，元世祖精简删除了那些烦琐严苛的条文，更名为《至元新格》。英宗时又订立《大元通制》。尽管它们全都用仁爱厚道作为根

本出发点，但它们的缺点却在于过分宽松。明朝制定法令，篇目都以唐代为标准，纠正了元朝的缺点，但用法过于严峻，犯罪的也因此越来越多。我国的仁爱恩泽十分深厚，沿袭前朝法律，却去掉了它们严酷刻薄的内容，繁简得当，法律已经尽善尽美了。

君主的行为尽管端正，但也应该防备怠惰；奢侈的念头尽管已经去除，但也必须杜绝它的萌生；军事制度尽管已经精当，但还要提防它产生弊病；刑法制度尽管已经简要，但也要考虑它或许会变得繁杂。臣下我尽管非常愚昧，但尤其恭敬地希望皇上：勤奋阅读《诗》、《书》等经典，广泛引进规劝意见。关注时世的艰难，努力谋求整顿。遵守既定的法令制度，但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加以变通。《皋陶谟》上说："兢兢业业，天天处理好繁重的政务"，说的就是敬畏之心是处理各种事务的关键。体会这个意思，去努力提高自己作为帝王的修养，而更进一步用朴素的风气来端正民众的风俗，用纪律来整肃军队，用公正平允来施行国家法典，做到君王的道德纯净，国家的各种政务全都得以完成。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倩描　王大奇译〕

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殿试策问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抚临寰宇，默荷上穹垂佑，列圣贻谋，兢业救几，日慎一日。承两宫之训迪，期四海之乂安。深惟诚意正心之要，通经致用之方，何以崇实而黜华，何以兴贤而致治？集思广益，冀于实政有裨。兹当临轩发策之时，悉心咨访。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人心道心之训，肇自虞廷。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书》所谓享天心，肩一心，盖彻上下之义也。心之用，主乎敬。《尧典》一篇，始终皆曰钦，即至于元首股肱，赓歌喜起，而犹勖以钦。此传心之功效也。禹之祗台，汤之圣敬，文之小心，武之执竞，足相证明。后世如唐太宗之《帝范》，范祖禹之《帝学》，其言有可采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仅于修身齐家而止，何以不言治平？而明邱浚补之，能约举其要欤？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宫，则云《九经》。《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经》也。其刻石国子学，则并《孝经》、《论语》、《尔雅》而言。其增益，果在何时？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能分析其义欤？至于义疏之外，先儒之说有

足羽翼经传者。能略言其目欤?

《书》曰:慎乃俭德。《传》曰:俭,德之共。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节俭为天下先者。帝尧茅茨不翦,帝舜甑盆无膻,大禹卑宫,文王卑服,尚已。嗣后惟汉文帝躬行俭德,遂成富庶之业,享世长久。他如晋武帝、隋文帝,亦称克俭,而行政或未尽合宜。其故安在?国俭国奢,由于上之所示。《山枢》、《蟋蟀》之风,最为近古。今则服食器用竞为美观,士庶多逾礼之嫌,闾阎鲜盖藏之实。果何由力戒浮华,而使风气日臻朴茂欤?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廷载采,亦有九德。周礼宾兴,惟以三物。法至善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行之果能无弊欤?至隋始以科目取士。唐制设科虽多,而明经、进士,尤为得人。宋时司马光分路取人之说,主均额以息奔竞;欧阳修但务择人之论,主核实以免缪滥。二者孰是?至光欲以十科取士,朱子又欲分年试士。其目安在?苏轼之议经义试士,刘敞之议贤良方正,亦有可采欤?

夫建中以立极,稽古以右文,崇俭以化民,任贤以立政,皆致治之宏模,绥猷之极则。尔多士服习有年,对扬伊始,其各陈谠论,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有子说:所守的约言符合"义",所说的话便能实现。严肃庄重符合"礼",就能避免耻辱。依靠着不失去自己可亲的人,也就可以受尊敬了。

别人花一分工夫能学到的,自己就用一百倍的工夫去学;别人花十分工夫能学到的,自己就用一千倍的工夫去学。果真能够使用这种方法了。

自己是天下品行高尚的人,才能与天下品行高尚的人做朋友。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了宏大的基业，安抚天下，默默承膺上天降下的保佑、列位先帝遗留下来的政治谋划，兢兢业业，严肃对待天命，注意萌生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加谨慎。承蒙两宫太后的教导启迪，期望天下太平无事，因而迫切地想要把握“诚意”和“正心”的关键，通晓经书并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方法，以及怎样做才能崇尚朴实、除去奢华，怎样做才能任用贤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理？集思广益，希望对于现实的政治有所补益。现在想利用在这前殿发布策问的机会，尽心咨询。各位贡士，请恭敬地听好皇帝我的命令。

“人心”和“道心”的训导，是从虞舜朝廷开始的。帝王所用来和天下相见的，是一颗心。《尚书》所说的符合天心，与民众同心，原本就是贯通上下的意思。心的作用，在于恭敬。《尧典》一篇，从头到尾都说钦敬，即便是在元首和辅佐大臣一起高兴地歌唱的时候，还是用钦敬来加以勉励。这就是传心养性的功效。大禹所说的恭敬地修养好自己，商汤王所说的圣明恭敬天天升华，周文王的小心谨慎，周武王的自强不息，足够作为证据。后代如唐太宗的《帝范》，范祖禹的《帝学》，它们的言论有值得采纳的吗？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仅仅停留在“修身”和“齐家”上，为什么不谈“治国”和“平天下”呢？明朝邱浚为《大学衍义》作了补充。能大概列举它的要点吗？

从汉朝以来，儒者代代相传，只说《五经》。可是唐朝在学宫所建立的课程，却叫做《九经》。《九经》是把《三礼》和《三传》分开来学习，所以叫作《九经》。那刻在国子学的石碑上的，则是加上《孝经》、《论语》、《尔雅》一起来说的。这样的增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唐太宗下诏命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向天下颁布。又因为儒学有多种门派，注释繁杂，所以下诏命令孔颖达等儒者撰写成了《五经义疏》。能分析它的含义吗？至于在义疏之外的那些前代的儒者们的学说，还有足以辅佐经传的。能大略谈谈它的要目吗？

《尚书》说:“小心保持你那俭朴的品德。”《左传》说:“俭朴,是道德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用节俭率先为天下作出表率的。尧帝的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舜帝的陶盆没有盛过肉,大禹居住在简陋的宫室,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这些都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后来只有汉文帝亲身实行节俭美德,于是建成了富庶的帝业,世世代代长久相传。其他如晋武帝、隋文帝,也能够称得上节俭,可是在行政上有的措施却并不太合理。这原因是什么呢?国家节俭或国家奢华,都是由上面来体现的。《诗经·山有枢》、《诗经·蟋蟀》所颂扬的风气,最接近古代。而今天大家都在吃穿用的方面竞相追求享受,读书人和百姓都有很多逾越礼节的嫌疑,民间实际很少有什么储藏。究竟用什么办法可以有力地戒除奢华,从而使社会风气日益达到朴素美好呢?

古代用人,品德是首要条件,才能是次要的。虞舜朝廷考核人才,也有“九德”的标准。《周礼》所记载的荐举人才,用的只是乡学的三种教法。这些办法是很好的。两汉以来,刺史、太守、国相专门拥有召用下属的权力;魏晋以后的朝代,九品中正官掌管着选取人才的大权。这些制度实行起来果然能没有弊病吗?到了隋朝,开始用科举制度选取士人。唐朝设置的科目尽管多,但“明经”和“进士”科录取的人才特别多。在宋朝的时候,司马光的分路用取人才的建议,主张各路平均规定数额来录取士人,以平息奔走钻营;欧阳修的只追求严格选择人才的言论,却主张切实考核,以免取用人才荒谬失实。这两种主张,哪种好呢?至于司马光想用十种科目录取士人,朱子又想分年考试士人,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苏轼对用经书的要义来考试士人的议论,刘敞关于“贤良方正”的议论,是不是也有可采纳的东西呢?

建立中正之道来确立政治准则,研究古代来崇尚文化,推崇节俭来教化百姓,任用贤能来实施政治,都是实现治理天下的宏伟规划、安抚天下的重要法则。各位贡士从事学习多年,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请各自陈述自己正直的言论,不要泛泛而谈,也不要隐瞒观点。皇帝我将亲自阅览。

梁耀枢　殿试对策

梁耀枢(1832～1888)　字斗南,号叔简,广东顺德人。同治十年(1871)状元。同治十二年乡试,出任顺天府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恩科乡试,出任湖南考官。光绪二年,任湖北学政。光绪八年,充南书房行走,任日讲起居注官。次年任侍讲、侍读。后升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光绪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次年出任山东学政。其后历任少詹事、詹事。

臣对:臣闻显德者,缉熙之学;通经者,致用之原;崇实者,化俗之方;任贤者,立政之要。自古帝王斟元御宇,锡福诚民。以懋皇猷,则书陈丹陛焉;以端经术,则瑞应青藜焉;以节国用,则化洽素丝焉;以励官常,则贤招白屋焉。稽诸往籍,于《礼》而征俨若,于《书》而证旧闻;《诗》遵无斁之风,《易》著汇征之吉。隆仪茂矩,粲然具陈。用是惟几惟康,懔保泰也;或源或委,皆启蒙也;克勤克俭,贵有恒也;兴贤兴能,同拔萃也。所由卢牟六合,经纬万端,膺五福而协庶征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治光离照,德协乾符,则古圣以同民,体至仁以育物。固已九畴攸叙而四海同文,二篇占享而八俊备选矣。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思至善之无遗,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明圣学、崇经畲、黜奢华、简贤俊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谨述素所诵习者,以效管窥之见、蠡测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人心道心之训,肇自虞廷,而因进求夫昔圣微言、往哲粹语。此诚正位凝命之要旨也。臣谨案《书》云:"克享天心"、"永肩一心",盖彻上下之义。而心之用,一主乎敬。故《尧典》一篇始终皆曰钦,即至元首股肱,赓歌喜起,而犹兢兢然以钦相勖。盖非本基命宥密之意,懔自强不息之神,则必不能以天下之大,操之一心,而洁齐以相见也。所以禹之祇台,汤之圣敬,文之小心,武之执竞,《诗》、《书》所载,条贯咸周,神圣相承,符契若合。不诚互相发明欤?唐太宗

作《帝范》十二篇,始《君体》、《建亲》,终《阅武》、《崇文》。宋范祖禹约三皇五帝以迄宋代之君,为《帝学》八卷。其言皆深切著明,足资法戒。真德秀作《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尧典》、《皋陶谟》、《伊训》之书,《思齐》之诗,《家人》之卦,子思子、孟子、董仲舒、扬雄之说,分为四纲,意在正本清源,揭明为学致治之要,而治平之略缺焉。明邱浚以《正朝廷》、《成功化》等目补之,为百六十卷。一则举其体,一则阐其用也。诚能慎修思永,主敬存诚,情欲无介乎仪容,燕私不形于动静,体以清明之德,勖以戒慎之功。所谓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其在斯乎?皇上聪明时宪,首重传心,允堪超越百王而媲美唐虞之盛已。

制策又以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因名数之各殊,遂思源流之可考。此诚昌明经学之至意也。臣惟经之为言序也,有如四序攸分;经之为言常也,故与五常相配。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九经》者何?《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经》也。其刻石国子学,则并《孝经》、《论语》、《尔雅》而言。至若或云《六经》,或云《七经》,或以《五经》、《五纬》为《十经》,或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纵增益之不同,均参稽之攸赖也已。夫研穷罔懈者,学士之功也;而参订无讹者,儒臣之力也。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诸儒选定《五经义疏》,令学者习之。文教聿兴,懿欤盛已!至于义疏之外,先儒之说有足羽翼经传者,此濂、洛、关、闽之学于经义多所发明也。要之,穷经当求实用,非惟是循诵习传而已。必将举古人之精言奥旨,喻之于心,体之于身,居则修身齐家,出则长民辅世。斯为学有本原欤!圣朝经术修明,超轶前代。博考乎典章之盛,深悉乎文学之源,大义微言,洵乎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矣。岂不懿哉!

制策又以力戒浮华,思以崇俭黜奢,而使风气日臻乎朴茂。臣考《书》曰:"慎乃俭德。"《传》曰:"俭,德之共也。"盖必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帝尧茅茨不剪,帝舜甑盆无膴,大禹卑宫,文王卑服。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节俭为天下先者。然当物力丰盈之会,易致人情侈泰之萌。不有以节制之,则糜费堪虞;不有以辨别之,

则冒滥无等。三代而下，如汉文帝躬行节俭，遂成富庶之业，享世长久，汉治称极盛焉。他如晋武帝、隋文帝，亦称克俭之主，而行政或未尽合宜。非务其名而不求其实之过欤！夫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圣主所以谨防维也；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圣人所以善补救也。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诚能深探其本，自贵者始，杜奢华之渐，端表率之型，冠婚宾祭酌其经，衣服饮食辨其制。上苟以奢丽相尚，而欲使民之胥安质朴，其势必不能。上惟以廉俭相高，而犹有民之过事纷华，其意且不适。行见移风易俗，何至服食器用竞为美观，士庶多逾礼之嫌，闾阎鲜盖藏之实也！皇上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屏纤丽而弗珍，却贡献而弗纳。在位诸臣，莫不懔《羔羊》素丝之节；彼小民，有不节俭以自守哉？

制策又以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而因讲求夫历代选举之法。臣惟虞廷载采，亦有九德；周礼宾兴，惟以三物。意至美、法至良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日久相沿，其立法皆不能无弊。隋始以科目取士。唐制设科虽多，而明经、进士，尤为得人。如狄仁杰、徐有功以明经举，白居易、颜真卿以进士举。得人之盛，可略睹矣。司马光分路取人之说，主均额以息奔竞；欧阳修但务择人之论，主核实以免谬滥。然光欲以十科取士，如一曰"行谊纯固"，二曰"节操方正"，三曰"智勇过人"，其设科可约举也。朱子欲分年试士，如《易》、《书》、《诗》为一科，子、午年试之；《周礼》、《仪礼》、《二戴》为一科，卯年试之；《春秋三传》为一科，酉年试之；其年序可详稽也。彼苏轼之议经义试士，刘敞之议贤良方正，指陈所及，不诚各有所见也哉？朝廷求贤若渴，登明选公。夫是以《棫朴》兴歌而《菁莪》志美也。

若此者：建中以立极，稽古以右文，崇俭以化民，举贤以辅治。握乾符，阐坤珍，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本励精图治之思，臻累洽重熙之盛。勘毖已严，而更惩荒怠；精微已会，而弥切研求；侈奢已戒，而愈著俭勤；英俊已储，而犹思延揽。于以扬骏业，保鸿名，敷帝者之上仪，懋丕天之大律，熙春泳化，函夏翔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

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显扬德行,是逐渐积累而达到光明的学问;通晓经典,是运用于实际的本原;崇尚朴实,是改变风俗的方法;任用贤能,是实施政治的要领。自古以来,帝王斟酌初始状态,统治天下,赐给民众幸福,使民众欢乐祥和。扩展盛明的谋略,就能够做到博览群书;端正经术,就能够做到祥瑞与典籍应合;减省国家费用,就能够做到使人们艰苦朴素;选拔官员,就能够做到不漏掉任何贤才。考察从前的经典文献,从《礼记》中求取到尊严的态度,从《尚书》中验明旧闻;《诗经》遵循着淳朴的风尚,《周易》记载着网罗所有贤能的吉祥征兆。隆盛的法度、美好的原则,明明白白,全都具备。因此居安思危,就能够做到小心保持着国家的平安;探寻学问的原委,就能够做到都明白贯通;保持勤俭,就能够做到长期坚持;选拔贤能,就能够做到标准一致。他们之所以能够经营天下,治理万物,承膺"五福"而应验各种征兆,就是由于具有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政治光辉灿烂,道德符合天意。学习古代圣人,安定民众,本着最大的仁爱,养育万物。确实已经达到了《尚书·洪范》所规定的九种政治标准,四海之内同一文化,像《易经·损卦》所说的那样极其简朴了,像"八俊"那样的人才全部得到选用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更加急迫地咨询,想要让最好的意见不被遗漏,希望就近考察言论。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张扬圣学、崇尚经典、废除奢华、选拔贤能等大政方针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那能知道国家的大政?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哪敢不小心陈述平素所记诵和学习的东西,来奉献管窥蠡测般的忠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人心"和"道心"的训导,是从虞舜朝廷开始的,因而进一步想要探求以往圣人的精微言辞、从前哲人的精粹论断。这确实是端正君位、凝聚天命的要旨。臣下我小心查考:《尚书》说:"能够符合天心"、"永远与民众同心",原本就是贯通上下的意

思。心的作用，在于恭敬。所以，《尧典》一篇从头到尾都讲的是钦敬。即便是在元首和辅佐大臣一起高兴地歌唱的时候，还是小心谨慎地用钦敬来加以勉励。因为，如果不本着上天所告诉的宽仁宁静的意思，不遵从自强不息的精神，那就必定不能在心中装下广大的天下，不能用严肃纯正的姿态与天下相见。所以，大禹所说的恭敬地修养好自己，商汤王所说的圣明恭敬天天升华，周文王的小心谨慎，周武王的自强不息，《诗》、《书》所记载的，都是条条贯通、十分周密的；各代帝王互相继承，十分吻合。这难道不是互相阐明和发扬吗？唐太宗写作《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开始，到《阅武》、《崇文》结束。宋代的范祖禹总括三皇五帝直到宋代君王，写成《帝学》八卷。它们的言论都深切透彻，能够借助来作为所应坚持的原则。宋代的真德秀写作《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摘取《大学》中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字，拿《尧典》、《皋陶谟》、《伊训》这些《尚书》中的篇目以及《思齐》这篇诗歌、《家人》的卦爻，子思、孟子、董仲舒、扬雄等人的学说加以证明，分为四大纲目，意图在于正本清源，揭示进行学习和达到天下大治的要点，因而对于如何“治国”、“平天下”就加以省略不谈了。明朝的邱浚用《正朝廷》、《成功化》等篇目对《大学衍义》加以补充，撰写为一百六十卷。他们二人一个是列举了其原则，一个是阐明了其作用。如果能谨慎研究学习，想到长远治理天下，保持恭敬，保存真诚，情欲不在仪容上显露出来，私意不在动静上表现出来，遵守清纯明净的道德，用小心谨慎的功夫来勉励自己。那么，所谓传心养性的方法和统治的方法完全相互贯通，不就从这里体现出来了吗？皇上耳聪目明，效法上天而建立政教，首先就注重传心养性。确实堪称超过了许多帝王，能够与唐尧和虞舜的盛世媲美。

制策又认为汉朝以来，儒者相互传习，只谈《五经》，因而从书名和篇目的数量各不相同这一点上着手，想要考查它们的源流。这确实是发扬光大经学的诚挚愿望。臣下我认为：经书是有序的言论，就像四季一样分明；经书是永恒的言论，所以与“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相配合。唐朝时在学宫中宣讲经书，于是就称为《九经》。《九经》是什么？因为《三礼》、《三传》分开学习，所以叫作《九经》。那

刻在国子学石碑上的，则是总合《孝经》、《论语》、《尔雅》而言的。至于有的说是《六经》，有的说是《七经》，或者把《五经》、《五纬》称为《十经》，或者把《六经》、《六纬》称为《十二经》。纵然增加的名目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参考研究所必须依赖的东西。永远不松懈地进行研究，是学者们的功夫；而参考订正、使经书没有错误，却是儒臣的努力。唐太宗下诏命令颜师古考定《五经》，向天下颁布。又因为儒学有多种门派，解释繁杂，于是下诏命令孔颖达等位儒臣选定《五经义疏》，让学者学习。文化教育的兴盛，那时真是完美极了！至于义疏之外，前辈儒者的学说有能够辅助经传的，这就是两宋时期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对经书含义的阐明和发扬。总之，研究经书应当追求实用，并非只是停留在单纯的诵读和学习上面。一定要把古人精粹的言论和深刻的主旨，明白在心里，体现在身上；居住在家里就应培养自身修养与和睦家庭，出来做官就应抚养百姓，对社会作出贡献。这才叫学习有本原呀！圣朝的经术十分完美，超过了前代。广博地考察典章的兴盛状况，深入地了解文章之学的本源。重大的意义和精微的言论，确实就像日月照耀天空、江河流经大地一样。这难道不美好壮观吗！

制策又因为下力气戒除浮华，想要崇尚节俭，除去奢侈，从而使社会风气一天天朴实美好起来。臣下我查考：《尚书》说："小心保持你那俭朴的品德。"《左传》说："俭朴，是道德的一个方面。"因为必须得有清心寡欲的功夫，然后才会有节省开支、符合礼法的事情。尧帝对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舜帝的陶盆里没有肉味；大禹居住简陋的宫室，文王穿着粗劣的衣服。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用自己的节俭来给天下作出表率的。然而，当物力丰富充盈的时候，便容易导致人情萌生奢侈安逸的念头。不想法来节制开支，那浪费就会使人忧虑；不想法来辨别等级，那就会造成假冒滥用而没有等级的差别了。三代以下，如汉文帝带头实行节俭，于是成就了富庶的帝业，世世代代长久相传，汉朝治理天下可以称为最兴盛的了。其他如晋武帝、隋文帝，尽管也算得上能够节俭的君主，可是在行政上有的措施却并不太合理。这难道不是他们只追求节俭的名声、而不谋求真正的节俭的

过错吗！在丰收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匮乏，在安逸的时候就应注意节俭，这是圣明的君主用来小心预防的要诀；国家富足了就应该提倡节俭，国家贫穷时就应该提倡礼仪，这是圣人用来善于补救的办法。汉景帝的诏书说："从事雕刻纹彩，伤害了农业活动；绣刺锦衣华服，伤害了妇女的针线活路。"如果能够深入探究节俭的本原，应从高贵的人开始，杜绝奢华的萌芽，树立表率的示范作用，那么冠礼、婚礼、宴请宾客、祭祀就能够做到遵守规范，衣服和饮食上也就能够区分出等级制度来了。如果皇上崇尚奢侈华丽，而又想让百姓全都能够质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皇上崇尚廉洁简朴，而百姓还想要过于奢华，那他们就必然会感到不安。这样，马上就能够见到移风易俗了。哪至于穿的、吃的、用的都要竞相追求享受，读书人和百姓都有很多超越礼仪的嫌疑，民间实际很少有什么储藏呢！皇上您学习唐虞、十分节俭，继承虞舜、十分俭朴；除去纤巧华丽的东西而不去珍视它们，退掉贡献的物品而不接受它们。在位的各位臣子，没有不遵守《诗经·羔羊》中官员穿着素丝衣服的那种节俭品德的，而那些小民难道还能不保持节俭吗？

制策又认为古代用人，品德是首要的，才能是次要的，因而想要探讨历代选举人才的制度。臣下我想来，虞舜朝廷考核人才，也有"九德"的标准；《周礼》所记载的荐举人才，用的只是乡学的三种教法。用意极好，制度也极完善。两汉以来，刺史、太守、国相专门拥有召用下属的权力；魏晋以后的朝代，九品中正官掌管着选取人才的大权。这些制度，沿用的日子久了，那它们的规定不可能没有弊病。到了隋朝，开始用科举制度选取士人。唐朝设置的科目尽管多，但"明经"和"进士"科录取的人才特别多。如狄仁杰、徐有功是凭借"明经"科而被选拔的，白居易、颜真卿是凭借"进士"科而被选拔的。这两科选拔人才的盛况，由此可大略看到了。司马光的分路录取人才的建议，主张各路平均规定数额来录取士人，以平息奔走钻营；欧阳修的只追求严格选择人才的言论，却主张切实考核，以免取用人才荒谬失实。然而，司马光却想用十种科目录取士人。例如，一叫"行谊纯固"，二叫"节操方正"，三叫"智勇过人"，他设置的科目大约可以列举出来

了。朱子想分年考试读书人。例如,《周易》、《尚书》、《诗经》为一科,子年、午年考试;《周礼》、《仪礼》、《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为一科,卯年考试;《春秋三传》为一科,酉年考试,他的年代顺序可以详细考查出来了。那时,苏轼对用经书的要义来考试士人的议论,刘敞关于"贤良方正"的议论,他们所论述到的事情,不是确实各有所见地吗?朝廷求贤若渴,选举十分公平。因此可以达到《诗经·棫朴》所歌颂的、《诗经·菁菁者莪》所赞美的那种境界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建立中正之道来确立政治准则,研究古代来崇尚文化,推崇节俭来教化百姓,任用贤能来辅佐政治。把握天命,阐扬大地祥瑞,仁爱、神圣的事体全已包括,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措施都已具备了。臣下我尤其希望皇上:效法上天,自强不息,道德修养天天向上没有止境,本着励精图治的想法,步入太平局面永远相传的盛世。尽管个人修养已经十分完美,但还要更进一步防止放纵懈怠;尽管学问已经十分精微,但还要更加迫切研究和探求;尽管奢侈已经戒绝,但还要越发努力提倡勤俭;尽管英才俊士已经储备,但还要进一步思考延揽人才。在此基础上,光大伟大的帝业,保持美好的名声;树立帝王的崇高的典范,彰显与天一样威严的法则;春风化育万物,华夏一派祥和。那么,我们国家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子江　徐立群译〕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君子坦荡荡。

自诚明,谓之性。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殿试策问

[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蒙庥昊绎,寅绍丕基,荷列圣之贻谋,秉两宫之垂训,敕命时几,于兹十有三载。亲政以来,益深兢业,期合天下黎元,迪吉康而跻仁寿。兹当临轩策问,用集多士,式赞嘉猷。

执中一言,尧以咨舜,实为传心所自始。逮舜以授禹,复以危微精一,推广执中之传。其义安在?君子之中庸,以德行言之也;位育之中和,以性情言之也。而《易·象》之《乾》谓为中正,与中庸、中和,义各不同。能详言之欤?至若礼教之中,著于《周官》;刑协于中,载于《禹谟》。其即帝王授受之中,由体而达用欤?《汤诰》言降衷,孔氏训衷为善,朱子则云衷只是中。《洪范》言皇极,汉儒训极为大中,朱子以极为在中之准的。其说有异同欤?《大学》始终一敬,《中庸》枢纽一诚。说者谓存诚即所以主敬,主敬乃所以执中。审端致力之方,其在斯欤?

考绩始自唐虞,询事考言察于平时,而三载、九载之典尤备。夏有遒人木铎之徇,商有三风十愆之儆。其激励臣工之意,何深切欤?夫民生困而不恤,案牍积而不厘,朝廷安用此吏为!《周官》六计以廉为本,或训廉为察。其义孰优?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奏举殿最。能缕析欤?唐初考课掌于吏部,又命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外官,叙

以四善，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宋命清望之官典其事，其辨察官吏能否为三等。或谓因唐之四善而分之，法岂详于唐欤？

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尝读《豳风》及《大田》、《良耜》诸篇，稼穑之艰难，廑于宵旰。此世运所由称盛也。汉时力田之科与孝弟并称。文帝时亲耕藉田，以劝天下；武帝世复为代田，教民耕种，田多垦辟。其事能详考欤？唐贞观初，太宗锐意于治，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逮贞元朝，宰相李泌请于中和节，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糅稆之种。其于农政有无稗益？岁或不登，若前史所纪发廪弛征、输粟贷种诸政，酌而行之，以何为便？社仓、义仓利弊相兼，果何由而积储有备，敛散有方，俾小民咸沾实惠欤？

读史之要，首辨方舆。粤自黄帝画野分州，方制万里，何以《帝王世纪》谓九州颛帝所建？《舜典》肇十有二州，所增建者何州？《禹贡》之九州，《职方氏》之九州，其同异若何？秦并六国，郡县天下。或谓三十六郡，或谓四十郡。何说为允？汉分天下为十三部，而不常所治。晋复一统之规，分州十九，几于秦汉之境。唐都关内，绍汉法周，分天下为十道；明皇增饰旧章，分十五道。宋分天下为十五路，至天圣而为十八路，至元丰而为二十三路。元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为百八十五路。其疆域形势分合沿革之故，能详之欤？士有志于用世，举凡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若舆图不讲，何所藉手欤？

凡厥四端：典学以求治，察吏以兴廉，裕食以养民，辩方以经国，皆宰世之宏谟、绥猷之极致也。尔多士对扬伊始，其各陈谠论，毋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君子胸怀磊落坦荡。

由“诚”达到“明”，就叫做“性”。

孟子说：只要国君做到了“仁”，那就没有谁不仁；国君做到了“义”，那就没有谁不义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承蒙上天保佑，继承盛大的帝业，接受列祖列宗留下的方略，秉承两宫太后的训导，时时遵从天命，谨慎对待苗头，到如今已有十三年了。自从亲政以来，越发兢兢业业，期望能聚合天下百姓，使天下富裕康泰，步入仁德长寿的境地。现今正值殿前提问策试，召集各位贡士，希望你们能献上好的计谋。

“保持中道”这一句话，是唐尧用来告知虞舜的，实际上是传心养性的开端。等到虞舜向大禹传位时，又用“人心危险，道心精微，精纯专一”来推广了“保持中道”的传心养性内容。其意义是什么？君子的“中庸”，是从品德行为方面来说的；使天地正位、养育万物的“中和”，则是从性情方面来说的。而《易·象》的《乾》则叫作“中正”，与“中庸”、“中和”的含义各有不同。你们能详尽地说明吗？至于如礼教要符合的“中”，写在《周官》上；让刑罚符合中道的“中”，记载在《大禹谟》上。这就是帝王心传授受的“中”，是不是已由“寂然不动”的“体”达到了“感而遂通”的“用”了呢？《汤诰》上说的“降衷”，孔安国把“衷”解释为“善”，朱子则说“衷”只是“中”。《洪范》上说的“皇极”，汉朝儒士把“极”解释为“大中”，朱子把“极”作为在“中”的标准。他们的学说有什么异同？《大学》至始至终主张一个“敬”字，《中庸》的关键是一个“诚”字。论说的人认为“存诚”就是为了“主敬”，“主敬”则是为了“保持中道”。辨明入手处和大力去实行的要点，是不是在这里呢？

考核政绩开始于唐尧和虞舜时期，平时用询事考言的方法来观察官吏，而三年、九年的考核制度尤为完备。夏代用“遒人”摇动木铃、召集民众而宣布政令，商代有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和“十过”的儆戒。这种激励官员的用意，是多么深切呀！如果民众生活困苦而官吏却不加抚恤，案牍积压而官吏却不去办理，那朝廷还用这种官吏干什么呢！《周官》的六计以廉为根本，而有人把“廉”解释为考察。哪种解释的含义最好？汉朝用诏令规定的六条考核标准来考察太守，

年终向朝廷报告最差的和最好的。你们能对此进行细致的分析吗？唐朝初年，考察官员是由吏部负责的，又命令京官中最有名望的两个人分别考校京城之外的官员；把考察的优秀标准分为“四善”，具体定为“二十七最”，划为九等。宋朝命令有名望的高级官员来主持这件事情。他们辨察官吏的能否，是分为三等。有人说这是沿袭唐朝的“四善”而划分的。这种办法难道比唐朝还详细吗？

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吃饭是民众的头等大事，皇帝我曾经读过《豳风》及《大田》、《良耜》等诗篇，知道稼穑的艰难，因而起早贪黑，小心处理政事。这是世运兴盛的原因。汉朝选拔官员，力田科与孝悌科的地位相等。汉文帝时亲自耕种藉田，以鼓励天下人勤奋耕作；汉武帝时又推行代田法，教民众耕种，因此当时的田地被开垦出了许多。这事能不能详加考察？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治理国家的心情十分迫切，因而颁布条令，宣布官府应授田给百姓而不授给的、应督劝农桑而不督劝的将受到惩罚。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李泌请求在中和节时让百官进献农书，让司农献上优良的粮食品种。这对农政有没有益处呢？如果年成歉收，像从前史书所记载的诸如发放官仓的存粮、放缓征税、运送粮食救灾、借贷种子等措施，要是斟酌利弊而施行，哪一种措施好一些呢？社仓、义仓各有利弊，究竟应采取什么办法而使粮食有储备，粮食的征收和发放有好方法，使百姓都能得到实惠呢？

阅读史书的关键，首先是要辨明地理方位。自从黄帝划分出各州的界限，区域范围长宽各有万里，但为什么《帝王世纪》却说九州是颛顼所建立的呢？《舜典》开始有了十二州。它所增建的是哪些州？《禹贡》的九州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它们的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秦国兼并六国，在天下实行郡县制。有人说秦朝是三十六郡，有人说是四十郡。哪种说法更确切？汉朝分天下为十三部，但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晋朝恢复一统的规模，把天下分为十九州，与秦汉的国境面积相差不多。唐朝定都关内，继承汉朝制度，效法周朝制度，分天下为十道；唐明皇增加和修改了旧的制度，分天下为十五道。宋朝分天下为十五路，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分为十八路，到宋神宗

元丰年间分为二十三路。元朝设立了中书省一个、行中书省十一个，分为一百八十五路。它们的疆域形势分合、沿革的轨迹，能不能弄清楚呢？各位贡士有被世所用的志向，凡属河渠、边防、食货、兵制，都是你们应该掌握的事情。如若不研究地理，又怎能下手呢？

总共上面所提到的四个问题：勤奋学习以探求国家的治理，考察官吏以倡导廉洁，增加粮食以养育民众，辨明地理以筹划国家大政，都是管理社会的宏大计划、安抚万民的极致。请各位贡士开始对答，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不要隐瞒什么。

陆润庠　会试卷三道

陆润庠(1841～1915)　字云洒，号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累官至参预政务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职。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任弼德院院长。辛亥革命后，仍留在清宫当溥仪的师傅。曾主持修撰《德宗景皇帝实录》(稿本)。

子曰：君子坦荡荡

状君子之心体，无往不见其有余也。夫坦本乎心，荡荡则坦之至也。此其所以为君子欤！且古之君子朝乾夕惕，固孜孜焉，惟日不足者也。而不知君子之心体，实常处于有余。以有余者裕于中，心与天游，性分内自征平易；以有余者著于外，心随地适，气体间倍觉宽舒。圣人盱衡品类，即德容之广搏，验履道之安贞，盖有心仪之而不忘者已。今夫品概所昭，于气象验之；气象所发，于心性基之。夫子曰：吾先即是以窥君子。

君子束躬有素，时时存戒惧之心，而德业之精纯与性情之和易，又复从容涵养，悠然自畅其襟怀。是君子有戒惧之心，君子实有恬愉之趣也，初非故作达观也。君子应物有心，在在切悚惶之念，而事机之裁制与义理之贯通，又复措置精详，廓然自昭其器宇。是君子有悚惶之念，君子实有溥博之规也，抑岂强为镇静也！无以拟之，拟之以

坦荡荡云尔。则谓君子之处境独宽,非也。时逢其泰,俯仰固甚优游;运际其穷,瘖痱亦多恬适。恢恢之景象,君子有之,君子未必自喻也;而隐微所蕴,莫罄形容。则谓君子之遇事独顺,亦非也。艰巨未投,渊默自昭暇豫;危疑猝至,因应亦见周详。浩浩之天机,君子具之,君子并不自居也;而方寸所呈,胥征根柢。

于以见其学之纯焉。险阻艰难之境,岂其有心退避?力求乎正路之可由。乃同此程途而独昭其顺,同此践履而独守其常。乐地自在当前,有识者能自择耳。夫旦明屋漏,君子固寅畏维深矣。而心以无所役而平,愈谨严愈形舒泰;量以有所容而大,愈敛摄愈觉恢宏。荡荡乎器识之渊深,无非坦焉者所形而著也。其斯为履顺之君子哉!且以见其养之粹也。进退宽绰之途,岂必有所流连?常得夫周行之我示。乃非不历险而视履为祥,非不知难而返躬无歉。与道何难大适?深造者能自得耳。夫错节盘根,君子亦忧虞倍至焉。而知命达天之诣,加以阅历而弥深;逆来顺应之胸,处以安恬而益畅。荡荡乎衷怀之浩落,又其坦焉者所进而上也。其斯为居易之君子哉!其坦也,其荡荡也,无往不见其有余也。小人反是。

描摹君子的心体,无论到哪里都会看到它是有余的。"坦"是发自内心的,"荡荡"则是"坦"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能是君子的原因呵!古代的君子从早到晚保持警惕,确实是勤勉不倦,每天都感到自己不足。但人们不知道,其实君子的心体常常是处于有余的状态中的。把这种有余藏在心中,那心就会与天同游,在天性中就能自我验证平易;把这种有余放到心外,那心就会与地相随,在"气"与"体"之间倍觉宽舒。圣人观察和衡量品类,依据器量的广博来检验履行正道的操守,因为原本就存在着心中奉为准绳而不会忘记的东西。如今,品质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气象上作察验;气象上产生出来的东西,则发自心性。夫子说:我首先就是通过这个来观察君子的。

君子平时不放任自己,时时存有戒惧之心,而德行和事业的精纯与性情的和易,又会进一步从容涵养,悠然自得地敞开自己的胸怀。

因此，君子有戒惧之心，其实就是君子有恬愉的情趣，完全不是他们故作达观。君子有适应事物变化之心，处处保持着危机感，而处理事情的决断与“义理”的贯通，又会使他们的措施更加精详，恢廓地昭示自己的器度。因此，君子有危机感，其实就是君子有广博的规划，哪能说是强为镇静呢！我无法比拟这种境界，只能将它比拟为“坦荡荡”。要是说就只有君子的处境才优越，那是不对的。在遇到运气好的时候，他们的举止确实是悠闲自得的；而运气不好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安然入睡。恢恢的景象，君子是有的，但君子未必自己就知道；而隐微所蕴藏的东西，是不完全在外表上显现出来的。要是说就只有君子遇事顺心，那也是不对的。在没有遇到艰难的时候，他们的深沉不语自然透露出了悠闲安逸；在危险和恐惧突然降临的时候，从他们的随机应变中也可以看到慎密周详。浩浩天机，君子是具有的，但君子却并不认为自己就具有天机；而方寸中所呈现的东西，是全都能找到根底的。

我们用来去看他们学问的精纯。面临艰难险阻的境地，他们不是有心退避，而是力求找到一条正道来通过。尽管路途相同，但只有他们能显示出顺畅；尽管同样是身体力行，但只有他们能保持常道。乐土就在面前，只是有见识的人能够自己作出选择罢了。在平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君子确实感到十分戒惧。然而，由于他们的心无所牵挂而保持平静，所以他们越是谨严就越是表现出舒坦；由于他们的气量有所包容而显得广大，所以他们越是收敛就越是感觉恢宏。多么宽广呵！他们度量和见识的渊博，无非是凭借“坦”而形成、扩大的。这就是适应顺境的君子。我们再去看他们修养的精粹。进退宽绰的道路，他们不必流连，而是常在周代大道中找到启示自己的地方。尽管他们身历险境，但却把亲身经过看作吉祥；尽管他们知道艰难，但从自身方面却没有感到抱歉的。这与大道非常适应又有什么难处呢？只是有深造的人能够自己去获得它罢了。面临盘根错节的局面，君子也感到十分担忧。然而，他们知天达命的造诣，加上阅历就会日益精深；他们心中逆来顺受的心理准备，放在安逸恬静的心境中就会日益顺畅。多么广大呵！他们胸中的浩荡，又会凭借“坦”而更

加广阔。这就是安于平易的君子呵！他们的“坦”、他们的“荡荡”，不管到哪里都能看到有余。而小人却相反。

自诚明，谓之性

合言诚明，知性之原于天也。夫明由诚生，圣人之道，即天道也。天命之性，不可知所谓乎！且天生圣人，具粹然之质，而并具灼然之心。此德量所由充也，而实性量所由广。有独全之性体，故一私不扰者，即无一物之或遗；有独辟之性灵，故万变不淆者，由于万理之咸备。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而维皇降衷之说，可由此信已。诚为天道，至于不思不勉，从容而中，则明之至也。

夫圣人之德，果何自而明哉？是盖有浑然罔间者，先贞诸赋秉之初。而静与神凝，昭质既征无伪；动与理察，念虑自觉常惺。一为之溯其本原，而所得皆归实理。则天机所露，无非天赋所呈焉。是又有毅然不摇者，常保于践形而后。而中有所主，植体备夫虚灵；外无所乘，烛理形其昭晰。一为之叩所从出，而实获具在生初。则天亶之聪，悉本天心之固焉。自诚而明，此其量为何如量哉！吾盖恍然于天命之性矣。论懿德之所同，性固尽人而各足。乃蔽于私欲，而一者渐纷扰夫外缘，而纯者转驳。即欲冥心静悟，而昏瞀转滋者，其中藏先扰也，而性亦漓矣。论秉彝之所畀，性岂一人所独私？乃绝其本无，而虚者不昧还其固有，而慊者无欺。不待索隐钩深，而神明早浚者，其德修本实也，而性自存矣。然则自诚明者，非性之谓而谁之谓哉？

复性为帝王运量之宏。克见灼知，明察不能无其用；而文武圣神之诣，广运必归诸德心；则惟诚之裕其原也。明者诚所形，非必恃照临之赫；诚者明所出，要先树建极之基。圣道之隆也，宸衷自端其主宰；而重华复旦，胥根元首之良。岂非性之所弥纶者大哉！养性为儒者立身之本。析疑辨惑，灵明尤贵浚其源；而视听言动之防，克复必原于仁德；则惟诚之守其初也。诚为明之体，无蔽要始于无私；明为诚之用，不惑先征其不杂。圣德之粹也，当躬克底于浑全；而耳顺心从，克协时中之轨。谓非性之所周浹者深哉！若夫由明而诚，则不能

全乎天理者，必有藉于人力矣。性与教之所分，其即天与人之所判乎！

把“诚”、“明”连在一起说，就可以知道“性”是出自上天了。“明”由“诚”产生，圣人之道，就是天道。提到上天赋予的“性”，怎能不知道它所说的是什么呢！上天降生圣人，他们便具有纯粹的气质，而且具有透彻的心灵。这虽然好像是道德在“器量”上的增加，但实际上是由情性在“器量”上的扩大而造成的。他们有独特而完善的“性体”，因而他们心中没有杂念，也就是能够不遗漏任何外在的物体；他们有独特而敞开的“性灵”，所以即便是有万种变化也不会混淆，这出自他们心中万种天理都完全具备。他们寂然不动，但一有天人感应便能够相通，我们由此完全可以相信上天赋予人类善良本性的说法。“诚”是天道，当它达到不去想不去干、从容而保持“中道”的程度时，那就达到“明”的最高境界了。

圣人的道德到底是怎么明晰的呢？原来，他们那种浑然无间的“性体”，先天就被赋予秉性的开初。而“静”与“神”凝结在一起，显示质性便证明真诚；“动”与“理”深入察辨，思虑便自行感到总是清醒的。一旦要追溯它们的本原，所获得的东西就都能归结到真实的天理上。这样，天机的显露，无非就是天赋的呈现。这又具有毅然而不动摇的东西，常常保持在行动的后面。而心中有自己的主见，培植主体而完全贯注着虚灵；不受外来事物的干扰，洞悉天理就显现出是明晰的。一旦要探求它们的起源，实际的收获早在降生以前就有基础了。可见，天性的聪明，完全是出自天心的当然。自“诚”而“明”，这种器量是什么器量呵！我于是对上天赋予人性的说法恍然大悟了。提到美德的相同方面，“性”原本是能够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的。然而，在受到私欲蒙蔽后，单纯的东西便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纯的东西也就变杂了。即便是想要冥心静悟，但却反越加混混噩噩。中心的根本已经首先受到了干扰，因而“性”也就变得虚假了。提到道德的天赋，“性”哪是一人所独有的？然而，断绝它的杂念，虚假的东西就不会掩盖它原本就固有的东西，因而自感满意就没有欺骗。用不着等待苦

苦探索寻求，而精神早就有了理解，在道德修养上本来就充实，因而“性”自然也就存在了。既然如此，那自“诚”而“明”不是说的“性”，又是说的什么呢？

恢复“性”，是帝王统治的最大动力。具有真知灼见，而明察秋毫就不能不用到它；而要达到文武圣神的境界，广大深远就必然要归结到德心上；因此，只有“诚”才能扩大它的根本。“明”是在“诚”上显现的，不必要倚仗统治天下的权威。“诚”是“明”的本原，要首先树立“大中之道”的根基。圣道兴隆，帝王心中能够自我把握；而虞舜获得《卿云歌》所咏唱的瑞应，完全是出于这位元首的英明。“性”所包罗的实在是太大了！涵养“性”，是儒者的立身之本。要想析疑辨惑，而探寻真理尤其贵在理清它的源头；而在视听言谈举止的防范上，克己复礼就必然要出自仁德；因此，只有“诚”才能守住它的根本。“诚”是“明”的根本原则，要想心无蒙蔽就要从无私开始。“明”是“诚”的具体方法，要想不疑惑就要首先求得它的不杂。圣德纯粹，圣贤对自身能够达到十全十美；晚年耳顺又想什么便做好什么，就能符合时时保持“中道”的原则。“性”所涉及的实在是太深了！假若由“明”而“诚”，那就不能保全天理，必然要借助人力了。“性”与“教”的区分，不就是天与人的区别吗！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仁义有相感之理，当本身以作则矣。夫仁也义也，固上与下共焉者也。君然而莫不皆然，为君者可不本身以作则哉！今夫一人首出，而百官万民胥受治焉。此岂煦仁孑义之为所可要结哉！惟朝廷克全其慈爱，而后百族播和风；惟庙堂自善其设施，而后群伦遵王道。肫然者，其情也；肃然者，其政也。夫固有起化在深宫，而敦劝即在臣庶者尔。日者孟子有见于此，而欲以仁义导时君也。曰：世风之升降，悉关主德之纯疵。为人君者，其可不知治国之要在仁与义哉！

恺悌慈祥之德，上有此恩谊，岂下无此性情？特仁德未彰，将和蔼之休风有不能使之溥遍者。谓真诚所积，君先无以示之型也，则兴

仁无自也。荡平正直之规，上具此经猷，岂下昧此条教？特义声未播，将严明之法度有不能责以奉行者。谓正路所由，君先无以立之准也，则慕义无从也。而有如君之仁乎！休戚相关之意，君只自率其性真，乃忠爱所流，严酷不闻于官吏；恩施所及，梗顽默化于闾阎。仁泽之覃敷，举世咸生其观感，盖莫不仁也有然。而有如君之义乎！大公无我之情，君只自循其矩度，乃范围既树，万物无所角才能？法律已精，四方不自为风气？义理之昭著，境内悉荷其裁成。盖莫不义也有然。

然则仁与义不以朝野殊也。虽有浇风，不闻蒙乐利之休弗生爱戴；虽有敝俗，不闻诵宫廷之诏弗矢敬恭。故仁不必薄赋蠲租，义不必悬书读法也。圣天子法宫高拱，身心自乐，夫渐摩而百尔之观型与群黎之兴起，已若有翕然从风者。夫乡闾好善者流，爱人有悱恻之容，立品有刚方之概，闻风者犹且相观而善，同怀感化之诚，况君子之整躬率物哉！然则仁与义不以远近殊也。兴孔迩之歌，则知怀保惠鲜，上多善政；急公廷之鼓，则知发号施令，朝有嘉谟。而仁正非噢咻市惠，义正非矫激沽名也。圣天子黼座修仪，宵旰自神，其育正而官方之澄叙与风俗之敦庞，早若有靡然向化者。夫闭户读书之士，诵懿训而明恩意，对陈编而奉准绳，来学者犹且乐与为徒，冀获观摩之益，矧君子之正本清源哉！

“仁”与“义”具有相互感应的原理，应当以身作则。“仁”与“义”确实是上下所共有的。只要国君具备了仁义，那天下的人也都会具备仁义。作为国君，怎能不以身作则呢！如今一人高高在上，而百官万民都受他统治。这又哪里是小仁小义能团结起人们的呢！朝廷能使出全部慈爱，然后天下的民众才能播扬和风。朝廷能自我完善其措施，然后百姓才能遵守王道。人情真诚，政令严肃。教化的本原出自皇宫，而互相勉励在于群臣和百姓。从前孟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想用仁义去劝导当时的国君。他说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国君道德的纯洁与不纯洁。作为国君，怎能不知道治国的关键在于“仁”与“义”呢！

只要上面在恩谊上具有和蔼慈祥的品德，那下面又怎能不具有

这种性情呢？只是仁德还没有彰显，于是和蔼的美好风气还不能普遍吹拂。在这时可以说，在真诚蕴积上，如果国君首先不能以身作则地去示范，那就会兴行仁德没来源了。只要上面在考虑问题时具有公平正直的王道，那下面又怎能闹不懂这种教导呢？只是“义”的声教还没有传播开来，于是严明的法度还不能强迫奉行的人遵守。在这时可以说，在正路的遵循上，如果国君首先不能建立起准则，那就会使追慕“义”的人无所适从。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国君的“仁”呢！国君只消本着休戚相关的情义，自然而然地加以施行，于是在忠心和爱心所流布的地方，官吏便不会再凶恶残暴；在恩情所沐浴的地方，民间的刁民就会默默地改恶从善。“仁”的恩泽广泛深入人心，普天之下就都会产生出同样的观感。因此，国君有“仁”，那天下也就都会有“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国君的“义”呢！国君只消本着大公无私的原则，在施政时加以遵循，于是准则既然已经树立，那万物还能没有比试才能的机会？法律既然已经精审，那四方还能不自然而然地形成好的风气？“义”的道理昭著，那国境之内便都会根据它来承受裁制成就。因此，国君有“义”，那天下也都会有“义”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既然如此，那么，“仁”与“义”不分朝野上下，都是相同的。世上虽然有浮薄的世风，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在享受了天子赐给的幸福后不产生爱戴之情的；世上虽然有落后的风俗，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在诵读宫廷的诏令时不恭敬虔诚的。所以，“仁”不必靠减轻赋税和免除田租，“义”不必靠公布法令和诵读法令。圣明天子高高在上，身心自乐，而通过潜移默化，百官的仿效、百姓的振奋，都会快得像疾风吹动一样。乡村中的好人，爱他人有强烈的爱心，自己做人有端正的品行；而听说了他们事迹的人，尚且能学习他们做好事，共同怀有感化向善的诚意；更何况君子以身作则带动天下呢！既然如此，那么，“仁”与“义”是不会因远近不同而不同的。高唱《诗经·汝坟》中的“父母近在”之歌，就知道心怀小民、把恩惠给予鳏寡贫困的人，天子会有许多的善政；朝夕勤于政事，就知道发号施令，朝廷会有完美的计划。然而，树立“仁”不是用好言好语来买爱戴，树立“义”不是

靠虚情假意来买名声。圣明的天子法度严肃，日夜操劳，专去养育万物，使天地正位，而吏治得以澄清并兴行起淳厚的社会风尚，早就好像大风吹倒茅草一样。闭户读书的人，只要是诵读美好的训示而能明了天子恩情、看着前人的著作而能遵循做人原则的，那么前来向他学习的人尚且乐意与他做朋友，期望能在观摩之中学到好的东西，更何况国君的正本清源呢！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建极所以绥猷，察吏在乎课最，养民斯能裕国，辨俗尤在审方。综稽往籍，《易》著闲邪之训，《书》垂考绩之文，《诗》赓多稼之章，《礼》载建邦之政。自古帝王，斟元御宇，锡福诚民。以敕几康，懔缉熙于宵旰；以明宅俊，整纲纪于班联；以课农桑，庆丰盈于仓廪；以安疆宇，考沿革于版图。茂矩隆仪，罔不粲然大备。用是惟精惟一，帝学宏焉；兴贤兴能，官方饬焉；纳禾纳稽，田赋登焉；为广为轮，地舆廓焉。所由熙春泳化，函夏归仁，迓蕃厘而膺多祜者，恃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球图阐瑞，玑镜凝庥，则古圣以同民，体至仁以育物。固已一中允执而庶尹克谐，万宝告成而九围是式矣。乃圣怀冲挹，弥切咨询，冀长治而久安，益持盈而保泰。进臣等于廷，而策以绍薪传、明吏治、修农政、度舆图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补高深？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拜献先资之义，敢不谨述素所诵习者，本刍荛之一得，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执中一言，为传心所自始，而因推极于存诚主敬之功。此诚致治之本原也。臣谨案：荀子引《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盖本于黄帝学道之书。所谓危者，犹慎独义；所谓微者，犹至诚意。《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为帝王心法之本。《论语》亦述"允执其中"之文。"中"之义所包甚广。如君子之中庸以德行言，位育之中和以性情言。《易》曰"中正"，《易》以二五为中，故《乾》之三四爻曰刚而不中。推之礼教中，刑协中，无不本授受之中，以由体而达用也。《汤诰》言降衷，《孔传》训衷为善，朱子云衷只是中。其实中

与衷通,故折中亦作折衷。朱子之言是也。《洪范》言皇极,汉儒训为大中。皇者,大也;极者,中也。北辰称为北极,天之中。屋之栋称极,亦据屋之中言之。朱子以极为在中之准的,于汉儒训极为中者义无不合。《大学》始终一敬,《中庸》枢纽一诚。论者谓存诚所以主敬,主敬所以执中。不知曰慎、曰允,诚之说也;曰祗、曰钦,敬之说也。其义皆自《典》、《谟》发之。然则诚者中而无私,敬者中以守约。审端致力之方,非与执中之旨相贯通欤!皇上严恭寅畏,典学是崇,不难探诚、敬之原,以绍唐虞之盛已。

制策又以考绩始自唐虞,询事考言察于平时,因于进用人才之道,深切讲求。此诚行政之纲纪也。臣谨案:唐虞之才为盛,而咨四岳,咨十有二牧,咨二十有二人。知人则哲,其慎其难。至夏而木铎徇于路,至商而风愆儆于位。遒人为宣令之官,木铎所以振文教。《左传》引之,称为《夏书》。桓舞于宫,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墨子》引之,称为《先王之书》。皆所以激励臣工也。《周官》六计,以廉为本。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郑注不释廉字。廉之义,为廉隅,为廉洁。其训为廉察者,正字作覢,廉借字也。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尝奉诏条,举州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兒宽以负租,课殿当免,民恐失之,输租不绝,课更以最。此殿最之别也。唐制,吏部属有考功郎中、员外郎、主事掌考课,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四善者,曰德义有闻,曰清慎明著,曰公平可称,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最以上兼有四善为上上,以九等定优劣。其流外官则分四等,勋卫则分三等。盖不尽限以九等矣。宋代辨察官吏能否,以清望之官典其事,即本唐之四善而分之,皆考绩之法也。皇上励精图治,澄叙官方,将见贤才登进,而治理蒸蒸日上矣。

制策又以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因廑念夫稼穑之艰难,以求物阜民康之盛。此重农贵粟之仁心也。臣谨案:汉时力田之科与孝弟并称。文帝二年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率亲耕,以给宗庙粢盛。"至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以平都令光为丞,教民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

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唐贞观初,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太宗锐意于治,即位之初,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贞元三年,宰相李泌请以二月朔为中和节,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乃著令与上巳九日为三令节,中外皆赐缗钱燕会。此农政之最善者也。至前史所纪,发廪、弛征、输粟、贷种诸事,皆筹荒政者所当议及。汉时司农属官有郡国诸仓长丞,即为社仓、义仓所由昉。若汲黯之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尤其因时制宜者也。积储有备,敛散有方,其可不先事图之欤?皇上轸念民瘼,恫瘝在抱,海宇晏安,有不力穑而比户可封哉!

制策又以读史之要,首辩方舆,因论夫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握要于舆图。此体国经野之钜典也。臣谨案:黄帝画野分州,皇甫谧兼纪异闻,以九州为颛顼所建。《舜典》之十二州分置者,为营、并、幽。《禹贡》之九州与《职方》之九州,夏、周疆域不同。若《尔雅》之九州,与《书》、《礼》又不同,则为殷制矣。《风俗通》云:周制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秦变古法,置三十六郡以监县。厥后取百越之地,增置四郡,遂为四十郡。汉分天下为十三部,晋分十九州,唐分十五道,宋为十五路,后增为二十三路。元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为百八十五路。要而言之,三代以上,郡县之制,寄于封建;三代以下,封建已废,遂成郡县。汉之侯国,虽封建而无其利;唐之藩镇,非封建而受其害。则不如郡县之为得矣。若夫南北朝,伪立州郡,夸耀邻封,疆圉紊乱,适足为读史者所嗤耳。皇上天威远播,寇乱削平,夫是以寰海镜清,罔弗遵循王路也!

若此者:建中以立极,分职以宣猷,足食以阜财,宅中以图大。扇巍巍,显翼翼,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探临宸锡极之原,臻累洽重熙之盛。知仁已裕而更矢寅承,笃棐已昭而犹严黜陟,田畴已治而愈谨盖藏,疆域已明而弥殷稽考。于以膺景福,保鸿名,合万国而来同,综八方而为极,体尧蹈舜,甄殷陶周。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建立最高准则是用来安定天下的,考察官吏在于分出优劣,养育百姓才能使国家富裕,辨别民俗尤其在于熟知地理。综合考察过去的典籍,《周易》彰明杜绝邪恶的训示,《尚书》留下了考核官吏的篇章,《诗经》有赞美农耕的诗篇,《周礼》记载着建国的政令。自古以来,帝王斟酌初始状态,统治天下,赐福给民众,使民众和洽欢乐。用来谨慎对待居安思危的问题,就能使自己不分昼夜地坚持学习;甄别优秀官员,就能在分工协作上使朝廷的纪纲得到整肃;督劝农桑,就能使粮食丰收、堆满粮仓;安定疆域,就能明了版图的沿革情况。良好的制度、隆重的礼仪,没有不粲然具备的。在此基础上,精微专一,帝王的学问就能广博了;选贤举能,吏治就能得到整顿了;交纳稻谷和秸秆,就能完成田赋的征收;划分政区,就能使疆域明晰。之所以春风化育万物,华夏归依仁德,幸福无疆,洪福齐天,倚仗的都是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天下充满了福瑞,山河凝聚着美好。您效法古代圣王,使民众行动一致;您包容最大的仁义,化育万物。确实已经真诚地保持了中和之道,而朝廷百官也能和谐团结,所有珍贵的物品都已具备,而且九州也都归服了。然而圣上却十分谦虚,更加迫切地咨询国家大计,期望能长治久安,进一步守住祖宗基业,永保天下平安。于是将臣下等人召上朝廷,用继承心法、清明吏治、整顿农政、辨明地理等大政来策试我们。臣下我愚昧无知,怎能对陛下高深的问题有所补益?但是,在这对答开始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着《礼记·表记》所说的侍奉君主必须先向君主提出个人意见的教诲,又怎敢不小心陈述平时所学到的东西,依据村野小人的一点心得,像葵花向阳一样,向陛下献上一片微小的诚心呢!

拜读制策,制策说:"保持中道"这句话是传心养性的开端,从而将它推广到"存诚主敬"功用的高度。这确实是达到天下大治的本原。臣下我恭敬地查考:荀子引用《道经》说:"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这原本是从黄帝学道的书上得来的。所谓"危",相当于"慎独"的意思;所谓"微",相当于"至诚"的意思。《大禹谟》中所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这是帝王传心养性方法的根本。《论语》也论述

了“真诚地保持中道”的含义。“中”的意思包括很广。如君子的“中庸”是从德行方面来说的，而使天地正位、养育万物的“中和”，则是从性情方面来说的。《周易》说“中正”，是因为《周易》以二五为中，故《乾》之三四爻说“刚而不中”。推广到礼教要符合“中”、刑罚要符合“中”，都是原本出自帝王递相授受的“中”，由“寂然不动”的“体”达到了“感而遂通”的“用”。《汤诰》上说的“降衷”，孔安国把“衷”解释为“善”，朱子则说“衷”只是“中”。其实“中”与“衷”相通，故“折中”也写作“折衷”。朱子的话是正确的。《洪范》上说的“皇极”，汉朝儒士把“极”解释为“大中”。“皇”就是大，“极”就是中。北辰称为北极，是天的中央。房屋的栋梁叫作极，也是根据房屋的中央来说的。朱子把“极”作为在“中”的标准，与汉朝儒士把“极”解释为“中”的意思完全是一致的。《大学》自始至终主张一个“敬”字，《中庸》的关键是一个“诚”字。论说的人认为“存诚”就是为了“主敬”，“主敬”则是为了“保持中道”，却不知道说“慎”、说“允”，就是说“诚”；说“祇”、说“钦”，就是说“敬”。这些含义都是从《尚书》的《尧典》、《皋陶谟》、《大禹谟》上阐发出来的。既然如此，那“诚”就是“中而无私”，“敬”就是“中以守约”。明辨入手处并大力去实行的要点，这难道不是与“保持中道”的意旨是相互贯通的吗？皇上恭敬虔诚，崇尚学习，因此不难探寻“诚”、“敬”的本原，以继承唐尧和虞舜的隆盛了。

制策又认为考察官吏是从唐尧和虞舜时期开始的，当时咨询事务和考察言行是在平时进行的，从而对进用人才的方法，深切讲求。这确实是行政的纲纪。臣下我恭敬地查考：唐尧和虞舜的人才是很多的，但他们仍向四方首领咨询，还咨询了十二牧，咨询了二十二个朝廷重臣。能鉴别人才就称得上明智，可见鉴别人是很难的，应当小心。到了夏代，朝廷用木铃沿路宣讲政令；到了商代，朝廷用“三风、十过”来儆戒百官。遒人是宣布政令的官员，木铃是用来振兴文教的。《左传》引用这些内容，称为《夏书》。在官中跳神，被定为巫风；如果是君子犯禁，要拿出两束丝赎罪。《墨子》引用这些内容，称为《先王之书》。这都是用来激励臣子的。《周官》的六计，把廉作为根本。一叫“廉善”，二叫“廉能”，三叫“廉敬”，四叫“廉正”，五叫“廉法”，六

叫“廉辨”。郑玄的注释没有解释“廉”字。“廉”的意思是“廉隅”、“廉洁”。其解释为“廉察”的,正字写作“覢”,是“廉”的假借字。汉武帝元封五年,首次设置郡刺史。郡刺史经常承奉诏令,对各个州按六条问事,在六条之外的便不予查问。兄宽因为拖欠租赋,考核被定为最下等,应当免官;民众担心失去他,不断地交纳租税,于是考核结果又被改为最上等。这就是最下等和最上等的区别。唐朝的制度,吏部的属官有考功郎中、员外郎、主事,掌管对官员的考核,另外由皇帝从京官位望高的人中选定两人,一人复查对京官的考核,一人复查对外官的考核。所谓“四善”,一是“道德高尚”,二是“非常清慎”,三是“公平值得称道”,四是“谨慎勤劳、从不松懈”。在“四善”总要求之外,有具体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兼有“四善”的为上上,按九等来评定优劣。其流外官则分为四等,勋卫则分三等。不完全用九等来限定。宋代辨察官吏的能干与否,用有名望的高级官员来掌管。这是本着唐朝的“四善”来划分的,都是考查官员的办法。皇上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将会见到贤才被提拔,而国家的治理将蒸蒸日上了。

制策又鉴于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从而一心挂念着种植庄稼的艰难,以谋求物质丰富、人民安康的盛世。这是重视农耕、珍视粮食的仁爱之心。臣下我恭敬地查考:汉朝时,力田科与孝悌科的地位相等。汉文帝二年的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开出藉田,朕要率先亲自耕种,以供给宗庙,用来作祭祀。”到了汉武帝末年,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发明“代田”。一亩用沟畦分为三部分,每年轮番耕种,因此叫做“代田”。任命平都令光为丞,教民众用换工的方式来人力拉犁。大致拉犁的人多,每天可耕田三十亩;拉犁的人少,每天可耕田十三亩。所以当时的田地被开垦出了许多。唐朝贞观初年,对官府应授田给百姓而不授给的、应督劝农桑而不督劝的将受到惩罚。唐太宗治理国家的心情十分迫切,在即位之初,便免去关内道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两年的租税,免除天下的徭役一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宰相李泌请求把二月初一作为中和节,让百官进献农书,以表示要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于是明令规定把它与上巳九日作为三令节,对朝廷内外都赐给缗钱举办宴会。

这是农政最好的举措。至于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开仓放粮、放缓征税、运送粮食救灾、借贷种子等事务，都是筹办荒政的人所应当考虑到的。汉朝时，司农属官有郡国诸仓长丞，这就是社仓、义仓兴利的开端。像汲黯持节发放河内仓库的粮食来赈济贫民，是最能称得上因时制宜的了。积存储蓄有准备，聚集散发有方法，难道不能事先计划好吗？皇上关怀民众的疾苦，就好像怀抱着痛苦一样。四海安乐，难道会有不努力耕种而比屋可封的事情吗？

制策又认为阅读史书的关键是首先要辩识地理方位，从而论述了掌握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的要点都在地图上。这是体国经野的重大典制。臣下我恭敬地查考：黄帝画分州界，皇甫谧附带纪述了奇异的见闻，以为九州是颛顼所建立的。《舜典》的十二州分建的三州是营、并、幽州。《禹贡》的九州与《周礼·职方氏》的九州，是夏朝和周朝的疆域不同。像《尔雅》的九州，与《尚书》、《周礼》又不同，则是殷朝的制度。《风俗通》说："周朝的制度是方圆千里分为百县，每县有四郡。"秦朝改变古代制度，设置了三十六郡，以监察县。其后，秦朝攻取了百越的地方，又增置了四郡，于是增为四十郡。汉朝把天下分为十三部，晋朝分为十九州，唐朝分为十五道，宋朝分为十五路，其后增为二十三路。元朝设立了一个中书省、十一个行中书省，共一百八十五路。总而言之，三代以上，郡县制是依托在分封制里的；三代以后，因分封制已经被废除，于是演变成了郡县制。汉朝的侯国，虽是分封制，然而却没有分封制的好处；唐朝的藩镇，不是分封制，然而却遭受了分封制的危害。由此可见，还不如郡县好呢。至于南北朝，因虚设州郡，向邻国夸耀，致使疆域紊乱，这正好是被读史的人所耻笑的。皇上的天威播撒远方，贼寇作乱已被削平，因此四海清平，没有不遵循王道的！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建立"中正之道"以确立最高准则，划分职掌以宣布朝政，使粮食丰足以增加国家财富，定都中央以谋求疆域广大。播扬盛大的德业，显示威严，仁圣之事兼有，帝王之道具备。臣下我恭敬地祝愿皇上，太平之上更求太平，道德焕然一新又求天天更新；探寻统治天下的真谛，达到太平相承、光明相继的盛世。智与仁

都已充裕而更加勤奋上进，吏治澄清而仍然严加黜陟，农业已经丰收而愈加注意收藏粮食，疆域已经明确而越发留意考查。在此基础上，承膺洪福，永保美名，使万国融洽而来朝拜，总揽八方而成为至尊，沿袭唐尧和虞舜，仿效殷朝和周朝。那么，我国亿万年文明昌盛的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子江　徐立群译〕

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惟义所在。

殿试策问

[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诞膺大宝,渥荷上穹垂佑,列圣诒谋,夕惕朝乾,勤求治理。上思副两宫之训迪,下期措四海之乂安,宵旰图维,罔敢暇逸。深维典学传心之要,去奢崇俭之源,知人图治之方,屯田劝稼之政。经邦盛轨,莫切于斯。兹值临轩发策,虚衷博采,广集嘉谟,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尚书》为传心要典。二帝三王以来,凡曰钦、曰恭、曰慎、曰克艰、曰孜孜、曰兢兢,君臣交儆之言,与《洪范》之言敬,《中庸》之言诚,能推阐其义欤?人君敬天以勤民事,人臣敬事以亮天功。诚、敬相通之旨,可发明其蕴欤?《丹扆》、《大宝》之箴,《皇极经世》之论,典矣懋矣。真德秀《大学衍义》,何以略治平不言?明邱浚补之,为目凡十有二。能胪举而贯通之欤?昔人谓帝王之学异于儒生。所不同者若何?《易·象》:山下出泉,谓圣功基于养正。所以养正者安在?夫逊志时敏,尤资念典。果何由而审端致力欤?

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然考其心迹,诚伪判焉。茅茨土阶、菲食恶衣之世,由来尚已。汉文帝衣绨履革,蒲席韦带,屏雕文之饰,惜中人之产。其视初元、建平之代罢齐三服官,易帷幛,去锦绣者,何如也?厥后令辟,亦知克己,焚翟裘,毁筒布,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又其甚者,一冠三载,一衣屡浣,俭矣。然或盛衰

殊迹,始终异辙。岂徒俭不足以示国欤?抑务名不求实欤?仰思《禹谟》克俭之训,永怀《商书》慎俭之言,将以黜华崇实,训迪臣民。果何由而使风气日臻朴茂欤?

《诗》云:无竞维人。《易》云: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知人之道,非君天下者所首重欤?古所传观人之法,若《大戴礼·文王官人》篇,以至陆贽、司马光、苏轼之论,亦有可采者欤?皋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舜典》曰:明试以功,敷奏以言。进贤用人如此其难也。乃古之君臣相得,或决于立谈之间。何耶?大智若愚,大诈若忠,或外忠而内奸,或始贤而终佞。烛照数计,其道何由?君子小人,各从其类。然诸葛亮之所用,李泌之所举,司马光之所取,或未必贤。抑又何说?孔子曰:取人以身。知言穷理,将何以浚其源欤?

自黄帝经土设井,而寓兵于农之法兴。三代因之,无所谓屯田也。汉文帝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说。汉武帝通西域后,屯田渠犁。其后日益加多,如芍陂、南阳、合肥、成都、金城,不可枚举。其在西域者,能详考欤?古者播谷劝耕,爰有农官之设。农师、田畯之名,备见经传。西域屯田官名见于史者,能胪举欤?耕种必资灌溉。邓艾穿渠,最资利赖。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能征于古以言之欤?唐代营、屯并称,或谓以兵民分。其说然欤?唐时诸道所开之屯,凡九百二十有二。今西域尚有遗迹欤?

凡此四端:养正以育德,崇俭以阜民,任贤以官人,营田以裕国,皆经世之良图,致治之要务也。多士力学有年,对扬伊始,其各陈谠论,毋泛毋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康诰》说:能够宣明美德。《大甲》说:常常注视着上天的明命。

施行在政治中,这也是从政。

只服从“义”。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在幼小的年龄继承了王位，承蒙上天保佑，祖宗留下的谋略，整天小心谨慎，勤奋谋求治理。对上想要对得起两宫太后的教导，对下期望能够使四海太平，日夜发奋图强，不敢贪图安逸。只管深深挂念着学习和传心养性的诀窍，除去奢侈和崇尚节俭的根本、知人图治的方法，屯田和鼓励农耕的措施。治理国家的重大方针，没有比这些更急切的了。现在正好利用在前殿发布策问的机会，虚心广泛地听取意见，多方面征集完美的计划。各位贡士，请你们恭敬地听好皇帝我的命令。

《尚书》是传心养性的重要典籍。二帝三王以来，他们所说的钦敬、恭敬、谨慎、能付出艰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这些君主和臣子相互勉励的言论，与《洪范》所说的“敬”、《中庸》所说的“诚”，你们能推导和阐发它们的意义吗？君主要尊崇上天来努力治理民事，臣子要小心从事来辅助上天职责。“诚”和“敬”相通的主旨，你们可以阐发它们的深奥含义吗？《丹扆》、《大宝》的箴言，《皇极经世书》的言论，作为原则都是完美的。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为什么省略了“治国”和“平天下”而不谈呢？明朝的邱浚增补《大学衍义》，共有十二个条目。能列举而贯通它们吗？过去的人认为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周易·象辞》说：山下出泉水，是说天子的功夫要扎根在培养正气上。怎么才能培养正气呢？保持谦虚、时刻努力修德，尤其要靠长期的学习。到底怎样才能把握入手处而尽心尽力呢？

自古以来，探求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来给天下臣民作出榜样的。然而考察他们的心迹，真伪就清楚了。尧帝对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用泥修筑台阶，大禹菲薄对待自己的饮食，文王穿粗劣的衣服，这样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汉文帝身穿粗绨做的衣服、脚着粗皮缝的鞋子、铺着蒲草席子、系着粗糙的皮带，宫廷除去雕刻彩绘的装饰，修露台痛惜费去相当于一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他的这些事迹与汉元帝初元时期、汉哀帝建平时期撤销“齐三服官”，改

换帷幛、撤去锦绣的事迹相比，怎么样呢？从那以后，贤明的帝王也知道自我克制，他们烧掉翟裘，毁去筒布，认为萧何对汉高祖所说的宫殿必须壮丽的话不是正确的言论。还有更为突出的是，一顶帽子要戴三年，一件衣服换洗若干次，非常节俭。然而，他们的盛衰却有时完全不同，开头和后来却完全相反。难道只是节俭还不足以训示国人呢，还是他们只追求节俭的名声、而不去谋求节俭的实效呢？皇帝我追思《大禹谟》保持节俭的训示，永远牢记《商书》谨慎对待节俭的言论，想要用除去奢华和崇尚节俭来教育臣民。到底怎么办才能使风气日益达到醇美的境地呢？

《诗经》说：最强盛全靠人。《周易》说：圣人养育贤人，推及到万民。了解人的办法，难道不是统治天下的人应该首先重视的吗？古代传下来的观察人的方法，如《大戴礼·文王官人》篇，以至陆贽、司马光、苏轼的言论，是不是也有可以采用的地方呢？皋陶说：检验了言论后，如果那人有德行，那就可以进行深一步的考察了。《尚书·舜典》说：公开考察政绩，普遍述职。可见选拔贤能、任用人才是如此艰难。然而，古代君主与臣子相互投合，有的就是在站着交谈的时候便达成了共识。这是什么原因呢？最有智慧的人表面上往往很愚笨，最狡诈的人表面上往往很忠诚。有些人是外表忠诚而内心狡诈，有些人是开始贤明而后来却变得奸佞。要做到明察秋毫，得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呢？君子和小人各自从属自己的群体。然而诸葛亮所使用的人，李泌所举荐的人，司马光所录用的人，有的却未必是贤能。这又怎么解释呢？孔子说：选取贤人，首先自己得纯正。要透过言论而认识本质，应该怎样来理清它的源头呢？

自从黄帝规划土地而设立井田后，兵农合一的办法就得到了实行。三代沿袭这项制度，没有说到屯田的事情。汉文帝召募民众在边塞耕种，便开始有了屯田的说法。汉武帝通西域后，在渠犁实行屯田。在这以后，屯田日益增多。例如芍陂、南阳、合肥、成都、金城等地的屯田，不可枚举。那些在西域的屯田，你们能进行详细考察吗？古时候为了鼓励播谷耕种，于是设立了农官。“农师”、“田畯”这些官名，在经传中可以完整地看到。在史书中所出现的西域屯田的官名，

你们能一一列举吗？耕种必须要依靠灌溉。邓艾开掘的水渠，对农耕最为有利。西域的河水能够引导来灌溉农田的，你们能从古代找出依据来谈谈吗？唐代的营田和屯田并称，有人说这是按兵、民不同而分开的。这种说法正确吗？唐朝时候，诸道所开辟的屯田，共有九百二十二处。如今，在西域还有那些屯田的遗迹吗？

总共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培养正气来养育道德，崇尚节俭来富裕人民，选用贤能来任命官员，实行营田来富裕国家，都是经营天下的美好计划、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各位贡士勤奋学习了许多年，在这开始对答的时候，请你们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不要空泛，不要隐瞒。

曹鸿勋　殿试对策

曹鸿勋（1848～1910）　字竹铭，山东潍县（今潍坊）人。光绪二年（1876）状元。光绪七年任湖南学政。其后历任上书房行走、江南乡试副主考、云南永昌知府、云南府知府、云南迤东道、贵州布政使、代理贵州巡抚、湖南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光绪三十三年，被调回朝廷，协助开办资政院事务。宣统二年（1910）九月病逝。

臣对：臣闻懋修者出治之原，崇俭者化民之本，官人者保邦之要，营田者裕国之方。自古帝王，锡极临宸，斟元御宇。以严乾惕，则主德称隆也；以戒浮华，则民风丕变也；以察官吏，则朝政日修也；以富积储，则边陲永靖也。综稽往籍，于《易》而言存诚，于《书》而训慎俭；《礼》详设官之典，《诗》咏多稼之篇。茂矩隆仪，粲然具备。用是敬天修己，帝学昭焉；崇实黜华，皇猷焕焉；量能授职，髦士登焉；寓兵于农，军威振焉。所由卢牟六合，经纬万端，膺五福而协庶征者，此也。

钦惟皇帝陛下，典学方新，求治尤密，将本缉熙之业，复敦朴之风，收乐育之功，成绥丰之效。于斯之时，辅导攸隆，谋猷备举，乃圣怀冲挹，弥切畴咨，思至善之无遗，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以绍薪传、务节俭、简贤才、裕边储诸大政。如臣愚昧，奚足以知体要？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

者,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

伏读制策有曰:逊志时敏,尤资念典,因首举帝王诚敬之学,而进求夫审端致力之由。臣案《尚书》所记二帝三王以来,君臣交儆之词曰钦、曰恭、曰慎、曰克艰、曰孜孜、曰兢兢,皆一意诚敬,后先同揆。《洪范》言敬,《汉书》志、传引《今文》并作"羞"。"敬",古字省文,与羞形近。《说文》训肃也。《中庸》言诚,《释诂》云信也。推之《易·乾卦》:闲邪,存其诚。是治之于内也。贾谊《书》:接遇肃正,谓之敬。是治之于外也。诚、敬相通之旨,求诸故训,昭然若揭矣。唐武德末,张蕴古献《大宝箴》,后李德裕献《丹扆六箴》。宋邵雍《皇极经世》之论,言君道、臣道十二。真德秀进《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旨在正本清源,故略治平不言。明邱浚补之,为百六十卷,目十有二,向称典赡。凡厥群言,足资治理,昔宋程颢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意谓心性事功,其源流不无殊致。然实事求是,其理一也。《易·蒙卦·彖辞》有言:"蒙以养正,圣功也",虞翻说二志应五变得正,而忘其蒙。若明以人事蒙养之道,内则后妃,外则师傅,圣功之大原,基于斯已。皇上天亶聪明,勤思上理,固已统千古帝王之学,一以贯之矣。

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因详求其心迹以判诚伪。此诚敦本务实之至意也。臣案土阶茅茨,《墨子》犹称;菲食恶衣,《鲁论》所著。中古之朝,已崇俭德。《汉书·东方朔传》言:文帝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苇带剑,筵蒲为席。史赞帝惜中人之产,罢露台之役,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迨孝景承流,犹传雕文伤农之诏。及百余年后,初元、建平之世,再罢齐三服官,美意犹存,而治化不逮。至若晋武帝焚雉裘而仁以御物,梁萧恢毁筒布而百姓仰德。魏太武帝不峻京邑城隍,鄱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而知财为军国之本,无所轻费。梁武帝一冠三载,唐文宗一衣三浣。恭俭之主,史不绝书。然或舍重取轻,或衅成所忽,或赏罚无章,或仁而少断。若以盛衰殊迹、始终异辙为其心迹,诚伪之分则又非俭之弊矣。夫《禹谟》有勤俭之文,《商书》垂永怀之训。自古圣王俱昭节省,皆后世所当显从者也。皇上轸念民依,崇俭黜奢。凡大小臣工,谁不以侈靡为戒也乎?

制策又以知人之道,为君天下者所首重,因详究取人之法,而深

念夫知言穷理之原。臣案《诗》言"无竞维人",《易》言"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知遴才之宜慎也。《大戴礼·官人篇》记文王以七属观人,言观信、观知、观勇者甚详。唐臣陆贽有言:录长取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宋臣司马光有言:求之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考之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苏轼则云: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盖得人难,知人尤不易也。夫人才之盛,莫如唐虞。乃《皋陶谟》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舜典》曰:"明试以功,敷奏以言。"举贤任能,其难其慎若此,洵可为后世用人者法已。虽史书所载,如蜀先主之于诸葛亮,唐太宗之于房、杜,宋艺祖之于赵普,决于立谈,用之终身,卒以致治。然未可遂执为常格也。大抵观人之法,不外乎邪正两途。大智若愚,大诈若忠,或外忠而内奸,或始贤而终佞。烛照数计,莫可究诘。则《中庸》取人以身之旨,得其要领矣。至夙具人伦之鉴,而一时区别或疏,若诸葛亮之于李严、马谡,李泌之于窦参,司马光之于蔡京,智者千虑亦所不免也。皇上旁求俊彦,恩榜特开,行见官方澄叙,彬彬乎三代之盛矣!

制策又以黄帝经土设井,寓兵于农之法兴,因念西域边政,以详求夫营屯水利之制。臣案三代田制,无所谓营屯也。尝观旧史,自汉文帝用晁错议,募民耕塞下,始有屯田之说。汉武帝通西域后,屯田渠犁,始有屯田之名。其后轮台、车师、乌孙、伊循、伊吾、柳中,皆西域屯田之处。宜禾都尉、屯田校尉、田禾将军,唐之营田大使,皆西域屯田之官。至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汉书·地理志》:龙勒县氐置水入泽灌民田,敦煌郡冥安县藉端水入冥泽溉民田。《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城东南有大河,国人用以灌田。夫农官之设,沿自周制,穿渠之利,昉于邓艾,有由来矣。或谓营、屯之名别以兵、民。两汉以后,芍陂、南阳、合肥、金城皆屯之以兵,唐制营、屯并置。然当时襄州营田,亦调取邻州之兵。宋之边州屯营,又不限兵、民。法随时变,故制亦难定。唐时诸道所开屯田,凡九百二十有二。其西域遗迹,若苦峪城断碑有"大兴屯垦"之语;及吐鲁番之广安城,在唐曰安乐,皆其地也。皇上俯念黎元,勤修边政。新疆一带,永荷生成,泽周于无外矣。

若此者:安人修己,允执而绍一中;寡欲清心,维贞而谨百度;达

聪明目,登俊而慎三升;凿齿雕题,来廷而通四译。治光玉镜,道握金绳,仁圣之事赅,帝王之道备矣。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日进无疆。书勤乙览,而立学远稽三代之隆;民恤庚呼,而惜财必课九年之蓄;猷襄午陛,而辅政特重一德之臣;耒荷丁男,而挽粟常念六军之士。由是德业进于光明,恭俭垂为法守,贤良皆资励翼,遐迩悉乐怀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加强个人美好的道德修养是统治天下的基础,崇尚节俭是教化民众的根本,任用官员是保有国家的关键,实行营田是富裕国家的手段。自古以来的帝王,颁赐最高准则,登临王位,斟酌初始状态,统治天下。用来日夜谨小慎微,就能够使君主的德行格外盛明;戒除浮华,就能够使民风变得醇美;考察官吏,就能够使朝政日益完善;增加积储,就能够使边陲永远安定。综合查考古籍,在《周易》中谈到了心存真诚,在《尚书》中有小心对待节俭的训示;《周礼》详细记载了设立官职的制度,《诗经》咏颂了赞美农耕的诗歌。美好规矩、完善的制度,明明白白,全都具备。因此去尊敬上天、严格要求自己,就能够使帝王的学问得以昭显;崇尚朴实、废黜奢华,就能够使国家政治辉煌灿烂;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就能够使杰出的人才得到选拔;实行兵农合一,就能够使军威得到振奋。之所以经营天下,使各个方面都得到治理,承膺五种福分而且能够应合各种征兆,靠的就是这些措施。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的学习刚刚开始,谋求治理却尤其细密。将要本着学问大放光明的德业,恢复敦厚朴实的风尚;将要收到养育人才的功效,达到丰收富足的目的。在这个时候,尽管辅导格外精细,计划全都施行,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更加迫切地进行咨询,不愿遗漏最好的意见,希望能够对浅近的言论有所考察。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继承心法传统、追求节俭、选拔贤能、增加边境地区的粮食储备等大政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能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然而在这开始对答的时候,臣下我恭敬地牢记《尚

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教诲,又怎敢不竭力陈述平时所诵读研习的东西,用来奉献出像土壤和细流那样的一点帮助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保持谦虚、时刻努力修德,尤其要靠长期的学习,因而首先便举出了帝王诚敬的学问,而且进一步想要谋求把握住入手处而去大力实行的办法。臣下我查考:《尚书》所记载的二帝三王以来君主和臣子相互勉励的言词,叫做钦敬、叫做恭敬、叫做谨慎、叫做能付出艰辛、叫做孜孜不倦、叫做兢兢业业,都是诚敬这一个意思,先后都是同一个标准。《洪范》所说的"敬",《汉书》的志、传引用《今文尚书》都写作"羞"。"敬"是古字的简写,与"羞"字形相近。《说文》把它解释为"肃"。《中庸》所说的"诚",《尔雅·释诂》说是"信"。《周易·乾卦》说:"防范邪恶,存其诚信。"由此推导,这是用在内心场合的整饬。贾谊的《新书》说:"接人待物保持肃正,就叫做'敬'。"这是用在外面的场合。"诚"、"敬"相通的主旨,从古训上去考求,已经十分明白了。唐朝武德年间的后期,张蕴古进献了《大宝箴》,后来李德裕又进献了《丹扆六箴》。宋朝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言论,谈到做君主的原则和做臣子的原则,共有十二条。真德秀进献了《大学衍义》四十三卷,主旨在正本清源上,所以省略了"治国"和"平天下"而没有谈。明朝的邱浚增补《大学衍义》,写成一百六十卷,条目有十二部分,一向被人们称赞为丰富而具体。以上这些言论,足以帮助治理国家。从前,宋朝的程颢说: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一样。意在强调:在心性和事功上,他们的源流确实不同。然而从实事求是来说,他们的道理却是一样的。《周易·蒙卦·彖辞》说:"以童蒙之态,养中正之德,是神圣的功夫。"虞翻说这两条应合"五变"而得正,但却忘掉了其中的"蒙"。如果明白了人事中的蒙养方法,那么就能够知道:这在里面就是后妃的抚育,这在外面就是师傅的教诲。帝王功夫的广大本原,就出自这里。皇上天资聪明,念念不忘要把国家治理得最好,确实已经包容了千古帝王的学问,把它们前后贯穿起来了。

制策又认为自古以来探求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来给天下臣民作出榜样的,因而要详细考求他们的心迹以区别真伪。这确实是注重根本、讲求实际的最好愿望。臣下我查考:尧帝

用泥修筑台阶、对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在《墨子》中还赞颂不停。大禹菲薄对待自己的饮食,周文王穿粗劣的衣服,这是《鲁论》中所昭示的。在中古时代,已经崇尚俭德。《汉书·东方朔传》说:汉文帝身穿粗绨做的衣服,脚着粗皮缝的鞋子,用粗糙的皮带系佩剑,用蒲草作席子;史书上称赞汉文帝爱惜中等人家的产业,取消了修建露台的工程,因此天下殷实富裕,十分讲究礼义。到汉景帝时继承了这个传统,还颁布了禁止雕刻纹彩伤害农业的诏令。等到百余年之后,在汉元帝初元时期、汉哀帝建平时期,又再次撤销"齐三服官"。他们尽管还存有美好的意愿,但政治和教化达不到从前的局面了。至于晋武帝焚毁雉裘,用仁爱来驾驭万物。梁朝的萧恢毁弃筒布,而百姓都仰慕他的德行。魏太武帝不修建京城的城池,认为萧何对汉高祖所说的宫殿必须壮丽的话不是正确的言论,十分鄙夷,而知道财物是军务与国政的根本,不胡乱花费。梁武帝的一顶帽子戴了三年,唐文宗的一件衣服换洗了多次。谦恭节俭的君主,史书的记载有许多。然而,他们或是舍弃重要的而采用无关紧要的,或是忽然遇到了内部的反叛,或是奖惩没有规章,或是仁爱而不果断。如果用兴盛和衰落的局面不同,开头和后来的行为相反来观察他们的心迹,那么,尽管真伪能够分清,但这并不是节俭所造成的过错。《大禹谟》记载有勤俭的文字,《商书》垂示了永远应该牢记的训示。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都提倡节省,这都是后世所应完全遵守的。皇上挂念着民众的苦痛,崇尚节俭,废黜奢侈。所有大小臣子,有谁不对侈靡严加防范呢?

制策又认为了解人的办法是统治天下的人应该首先重视的,因而想要详细探讨选拔人才的方法,从而深深牢记透过言论而认识本质的原理。臣下我查考:《诗经》说:"最强盛全靠人了。"《周易》说:"圣人养育贤人,推及到万民。"由此可知选拔人才应当谨慎。《大戴礼·官人篇》记载周文王用七种类型来观察人,讲到"观察诚信"、"观察智慧"、"观察勇气"这些内容十分详细。唐朝的臣子陆贽说:"既选用长处也选取短处,那天下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人;既责备短处又舍弃长处,那天下就没有能够任用的人。"宋朝的臣子司马光说:"如果用诋毁和赞誉做标准来选拔人,那就会使自己所爱的人、自己所恨的人

或别人所爱的人、别人所恨的人竟相得到进用，从而善与恶也就混淆了；如果根据功劳簿提拔人，那么，奸巧诈伪就会意外产生出来，从而真与伪也就相互混淆了。”苏轼则说：“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实。”因为尽管得到人才是困难的，但了解人却尤其不容易。历史上没有比唐尧虞舜时期的人才更兴盛的了。但是《皋陶谟》却说：“检验了言论后，如果那人有德行，那就可以进行深一步的考察了。”《舜典》却说：“公开考察政绩，普遍述职。”推举贤人、任用能人，是这样的艰难、这样的谨慎。这确实可以被后世用人的人所效法。尽管史书所记载的，如蜀国先主对于诸葛亮，唐太宗对于房玄龄、杜如晦，宋太祖对于赵普，都是在站着交谈的时候便达成了共识，并且终身任用，最终使天下得到了治理。然而，还不能因此便作为常规来执行。大致上，观察人的办法，不外乎邪与正这两条途径。最有智慧的人表面上往往很愚笨，最狡诈的人表面上往往很忠诚。有些人是外表忠诚而内心狡诈，有些人是开始贤明而后来却变得奸佞。即便是明察秋毫，也无法弄清。由此可见，《中庸》要选取贤能而自身首先得端正的主旨，真是把握了选取人才的要领。至于历来对人就具有很好的鉴别能力，但在个别时候却出现了分辨的疏漏，如诸葛亮对于李严、马谡，李泌对于窦参，司马光对于蔡京，那可以说是智者千虑，谁也免不了的。皇上广泛征求杰出人才，特意举行了恩科考试，将会看到吏治澄清，文质彬彬将达到三代那种兴盛的局面！

制策又认为自从黄帝规划土地而设立井田后，兵农合一的办法就得到了实行，因而挂念西域的边防管理，想要详细考求营田和屯田以及水利的制度。臣下我查考：三代的土地制度，没有说到营田和屯田。臣下我曾经观看过去的历史，看到自从汉文帝采用晁错的建议，招募民众在边塞耕种后，才开始有屯田的说法。汉武帝通西域后，在渠犁屯田，才开始有了屯田的名称。在这之后，轮台、车师、乌孙、伊循、伊吾、柳中，都是西域屯田的地方。宜禾都尉、屯田校尉、田禾将军，唐朝的营田大使，都是西域屯田的官员。至于西域的水流可以引导来灌溉农田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龙勒县的氐置水流入湖泊灌溉百姓的农田，敦煌郡冥安县的籍端水流入冥泽灌溉百姓的农

田。《大唐西域记》称：瞿萨旦那城东南有大河，那个国家的人用来灌溉农田。农官的设立，是从周朝的制度沿袭下来的；开凿水渠的便利，是从邓艾开始的。这些都是有来由的。有人认为营田和屯田的名称是用来区别兵、民田地的。两汉以后，芍陂、南阳、合肥、金城都用军队屯田，唐朝的制度是营田和屯田同时设置。然而，当时襄州的营田，也抽调邻近州郡的军队耕种。宋朝边境州郡的屯田和营田，又不限兵、民。法规随着时势而变化，所以制度也很难确定。唐朝时候诸道所开辟的屯田，共有九百二十二处。唐朝在西域的遗迹，如苦峪城的断碑上有"大兴屯垦"的字句，以及吐鲁番的广安城在唐朝时候叫安乐，这些都是唐朝西域营田和屯田的地方。皇上挂念下面的黎民，不断加强对边疆的管理。新疆一带，永远蒙受抚育，恩泽遍及无比广大的地区了。

像上面所对答的问题：安定人民，提高自己的修养，真诚地保持和继承着中正之道；清心寡欲，维护纯正的风气而节约各项开支；耳聪目明，选拔杰出人才而小心任用；那些在牙齿和额头上雕刻着花纹的边远部族，通过四方的语言翻译而主动来到朝廷。政治像玉镜一样清明，牢牢地把握住最基本的准则；仁爱、神圣的事体都已包括，帝王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的措施都已具备了。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就像上天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每天在道德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勤奋阅读经典，建立思想体系要远远地研究三代的隆盛状况；抚恤求救告贷的民众，爱惜财物必须要在三十年内储备九年的积蓄；在朝廷制订好计划，辅佐政治特别要倚重同心同德的臣子；要让那些耕种的成年男子搞好农业，在运送粮食时常常想到六军的将士。在此基础上，道德学业达到光明的境界，谦恭节俭垂示天下而成为人人遵守的制度；德才兼备的人才都尽心尽力地辅佐政治，远近的各族民众都对皇上的关怀感恩戴德。那么，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此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倩描　王大奇译〕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

言而世为天下则。

见贤焉,然后用之。

殿试策问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诞膺宝祚,仰荷昊穹垂佑,列圣诒谋,惟日孜孜,于今三载。上思副两宫之至教,下期措四海于久安,夙夜不敢康,兢兢业业。深惟传心念典之源,建官考绩之政,兴利重农之道,训俗型方之规,广益集思,冀有裨于实政。兹当临轩发策,博访周咨,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虞书》执中之训,为道统所开;精一之传,为学术所始。《仲虺》言建中,《洪范》言建极,与执中有无殊旨?其与惟精惟一,能有合欤?夫稽古好文,帝王切要之图也。历观往代,或会诸儒讲《五经》同异,或聚宏文馆书二十万卷,讲论至夜分乃罢,或日进《太平御览》三卷。其勤若是!乃有谓以半部《论语》致太平者,有谓治道不出《大学》一书者,果可以为定论欤?三代以下,儒者以董仲舒为首。正谊、明道二语,不涉于功利。而《天人三策》,后人犹有微辞。王通著《中说》,学者拟之《论语》,后人斥为僭妄。然则舍濂、洛、关、闽之学,皆不足为进德之阶欤?

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然则欲正君臣,序官职,其必自大臣始欤?亲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之贤否,视乎上官之取舍。两汉兴廉举孝,敦崇节行。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所传循吏,郡守为多,而公卿亦出其中。其时玺书褒勉,增秩赐金,载在史

册,传为美谈。果可以风厉庶僚,而使之事无废弛而政无操切欤?夫循名责实,则人不旷官;朝考夕稽,则吏皆勤职。如汉以六条察郡国,唐以四善、二十七最,宋以七事,明以三等考察吏治。其因时详略,可得其大旨欤?今欲使大吏勤慎,而僚属咸知奉公,吏胥不敢弄法,其何道之由?

古者帝王劭农,故以田事为急。农田之外,复有屯田。昔人所论,以何说为长?汉之屯以兵,唐之屯以民,宋之屯或民或兵。其因时制宜之义安在?有谓塞上宜屯田,腹里宜垦荒者。然则屯与垦,顾可分不可合欤?说者又谓西北之地,砂石硗确则忧在土,雨泽稀少则忧在旱,霖潦暴涨则忧又在水。夫湖薮陂泽,水所由潴也;沟洫浍遂,水所由泄也。乃或甫挑浚而仍然坍塞,已培筑而复就倾颓。其何术而能一劳永逸欤?且何以因利乘便,使国不费而民不扰欤?

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兴化善俗,致治之本也。唐虞敷教,俾民亲逊。《周礼》以三物教民,以八刑纠民,风化维持,久而弗替。其详可悉陈欤?汉置三老、孝弟常员,征拜美俗使者。唐赐孝义、高年粟帛,遣使观览风俗,用以劝民厉俗。果能行之有裨欤?国家承平日久,芸生日众。若多设科条,则易滋扰累;即广颁文告,或徒饰观听。将欲训迪而丕变之,其道奚由?昔吕氏《乡约》,袁氏《世范》,或牧令以化一邑,或缙绅以教一乡。其言至为浅近,能备举其说欤?今欲使四海之内,狱讼衰息,邪慝不兴,里党辑睦,耆孺和乐,其操何术以收劳来匡直、辅翼振德之效,而致时雍之化欤?

凡此四端:逊敏以懋德,考察以任贤,经画以兴氓,渐摩以善俗,皆制治之远猷,保民之本务。多士对扬伊始,其各陈谠论,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修养好自己来安定百姓,修养好自己来安定百姓。

言论一出,就世代成为天下的准则。

看清了他的贤明之处,然后使用他。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在幼小的年龄继承了王位,承蒙上天保佑,祖宗留下的谋略,整天孜孜不倦,到今天已经是三年了。对上想要对得起两宫太后的美好教导,对下期望能够使四海长治久安,因而日夜不敢安逸,兢兢业业。只管深深考虑着传心养性、勤奋学习的本源,建立官制、考察政绩的办法,兴办有利的事业、重视农业的手段,规范风俗、给四方作出表率的规矩,因而集思广益,希望能够实实在在有益于政治。如今正值来到前殿发布策问,广泛访问,周密咨询。各位贡士,请你们恭敬地听好皇帝我的命令。

《虞书》"保持中道"的训示,是道统的开创;"精诚专一"的传授,是学术的开始。《尚书·仲虺》说"建立中道",《尚书·洪范》说"建立最高准则",这与"保持中道"的主旨有没有差异?它们与"精诚专一"能否吻合?研究古代、崇尚文化,是帝王最紧要的方针。依次观看过去的朝代,有的帝王会同诸位儒士讲论《五经》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有的帝王聚集了宏文馆的书籍二十万卷,讲论到半夜才停止,有的帝王每天阅读《太平御览》三卷。他们是这样的勤奋!然而,有人说用半部《论语》就可以达到太平局面,有人说统治原则不超出《大学》这一本书,这些话是不是可以作为定论呢?三代以后,儒者以董仲舒为首。董仲舒"端正思想"、"明确道义"这两句话不涉及功利,但是对于《天人三策》,后人还是有含蓄的批评的。王通著有《中说》,学者把它比作《论语》,后人指责说这是僭越和狂妄。既然如此,那么除了濂学、洛学、关学、闽学之外,其他学说都不能作为提高道德修养的阶梯了吗?

大臣守法,小臣就会廉洁;官位与职务相互处于有序状态,君主与臣子相互有正确的名分,是国家的幸福。既然如此,那么想要确立君主与臣子的关系,理顺官位与职务的关系,是不是必须得从大臣开始呢?直接管理民众的官员,没有比得过太守和县令的。太守和县令

的好坏,取决于上级官员的取舍。两汉时期提倡廉洁和孝顺,崇尚节气和道德。政绩有的按日统计则显不足,但按月统计却绰绰有余了;史书所记载的优秀官吏,太守最多,而且公卿也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当时皇帝用玺书进行褒奖和勉励,提高他们的官阶,赐给他们黄金,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史册中,传为美谈。这样果真可以激励官员,从而使政事不会废弛、处理问题不会操之过急吗?循名责实,那就能够使人人不渎职;朝考夕稽,那就能够让官吏都勤于职守。像汉朝用"六条"来监察郡国,唐朝用"四善"、"二十七最",宋朝用"七事",明朝用"三等"来考察吏治。各朝依据时代不同而或详或略,是否能够知道它们的主旨呢?如今想要让高级官员勤奋谨慎,而让他们的下属官员都知道为国家办事,让下面的小官吏不敢玩弄法律,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呢?

古时候,帝王鼓励农耕,所以把农业看作是最急迫的事情。在农田之外,还有屯田。过去人们的议论,哪种说法是最好的?汉朝用军队屯田,唐朝用百姓屯田,宋朝的屯田或用百姓、或用军队。它们因时制宜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有人认为边境地区适宜屯田,内地适宜垦荒。既然如此,那么屯田与垦荒,难道是可以分开而不可以合并的吗?提出建议的人又认为西北地区,由于砂石太多,于是便担心土地受到侵蚀;由于雨水稀少,于是便担心干旱,而一旦大雨洪水暴涨,那又要担心水患。湖泊、水洼、水库,是用来蓄水的;大沟小沟,是用来排水的。然而,有些工程刚刚竣工,却又坍塌堵塞得像以前那样了;已经修筑好了堤坝,然而又再次倾塌。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这些工程一劳永逸呢?而且怎样才能因利乘便,使国家不花费巨额资金、使民众不服繁重的劳役呢?

民众的生活一富裕,就因外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而进行教化、改善风俗,是达到天下太平的根本。唐尧虞舜进行教育,使民众亲近而和顺;《周礼》上记载:用六德、六行、六艺教化民众,用八种刑法纠察民众。因此周朝的风化维持了很久而没有改变。能够详细陈述它们的内容吗?汉朝设置了"三老"、"孝弟"等常设官员,征召任命了"美俗使者";唐朝赐给孝顺有道德的人、高龄的老年人粟米和丝

帛,派遣使者观览风俗。用这些措施来劝导民众,激励风俗。实施起来果真能够有所补益吗?国家太平代代相传的日子久了,芸芸众生日益增多。假若多设法律禁令,那就容易滋生出搅扰的麻烦;而广泛颁布文告,有时只是成了表面文章。想要教育引导而完全改变民风,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目的呢?从前吕氏的《乡约》、袁氏的《世范》,一个是地方官用来教化一个郡县,一个是士大夫用来教化一个乡村。它们的说法十分浅近,能详细地陈述它们的说法吗?如今想要使四海之内,犯罪和诉讼衰减平息,邪恶不出现,乡里和睦相处,老人和孩子和平安乐,那应当使用什么手段来收到劝勉民众、匡扶国家以及辅佐政治、振兴道德的功效,从而使风俗变得十分美好呢?

总共以上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通过保持谦虚、勤奋学习来提高道德修养,通过考察来任用贤能,通过地区规划来振兴农耕,通过用仁义感化民众来改善风俗,都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计划、保护民众的根本任务。各位贡士开始对答,请你们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不要空泛,不要隐瞒。皇帝我将要亲自阅览。

王仁堪　殿试对策

王仁堪(1848~1893)　字可庄,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三年(1877)状元。历任山西学政、镇江知府、苏州知府等职。其为人正直。曾与曹鸿勋一道联名上疏弹劾对俄使臣崇厚丧权辱国,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又上书反对修建颐和园。其在镇江知府任上,则兴修水利,兴办教育,颇有政绩。光绪十九年七月,调任苏州知府,因积劳成疾而病逝。

臣对:臣闻刘勰有言: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汉策杜钦以王者之法,晋策郤诜以择人之术,唐策张九龄以重谷之经,宋策苏轼以治化之本,类能援证往事,指陈时政。顾政治之原出于君心,君心之正肇于典学。罗从彦曰:人君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诚以帝王所恃以经世宰物者,不外夫缉熙之业,宅俊之方,厚生正德之道。而

其理皆曩哲已言之理，其事皆前代已行之事。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是在加之意而已。然则逊志时敏之功，可不豫哉？

钦惟皇帝陛下，冲龄育德，好学尊师，本心法为治法，兢兢然上下交儆。为庶民筹富、教之全者，固已抉经之心，以古为鉴矣。乃圣怀冲挹，犹察迩言，举勤学、课吏、重农、训俗诸大端，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诚愚陋，不足以承大对。然窃思制科之设，导之使言时政之得失，而非以试其词章。况当言路广开之时，谕以各陈谠论，毋泛毋隐，其何敢摭拾涂饰，以应故事耶？

伏读制策有曰：《虞书》执中之训，为道统所由开。因究帝王切要之图，与历代讲学之旨。此诚稽古好文之至意也。臣惟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其为博也，不若其精；其为勤也，不若其专。昔尧舜禹一中相传，开千古学术之本，而《汤诰》曰建中，《洪范》曰建极。盖中之一字，敛之为圣功，推之即为皇极。经传所纪，其勤且专也若是。后世之人君，未尝不知学也，未尝不欲媲隆三代也。若史载汉章帝之会诸儒于白虎观，唐太宗之置宏文殿，宋太宗之进《太平御览》，亦可谓勤且博矣。然而讲唐虞于细旃之上，谈周孔于坐论之间，不精不专，终未之有得也。赵普曰半部《论语》可以佐太平，范祖幹曰《大学》一书可以赅治道，岂虚语哉！虽然精矣，尤患其不纯也；专矣，尤患其不正也。三代以下之儒，若董仲舒，若王通，皆以阐道为己任者。而《天人三策》语及灾异，《中说》之拟《论语》，尤涉僭妄。则欲明道统，崇经术，正进德修业之阶，审建中立极之道，其惟濂、洛、关、闽诸儒，为能得人道之正轨乎！皇上典学伊始，至精至专，则虽谓帝王之学无异于儒生可也。

制策又以大法小廉，必先考绩。此则澄叙官方之要也。臣惟国家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耳。内而宰相部寺台垣，外而督抚藩臬监司太守，以及州县之有司，丝联绳贯，递相维系。选举之重，选此亲民者也；考察之严，察此病民者也。使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则虽恪奉成宪，矫厉清节，而守法与变法害相因，廉吏与贪吏罪相等矣。今欲达民之隐，莫若得守令；欲重守令，莫若师《周官》尚廉之意，行汉代久任之法。使大臣不敢以喜怒为迁调，小臣不敢视职位为传舍。史

称汉宣帝时,二千石治理效,玺书褒勉,增秩赐金。或位至关内侯,不易其位;公卿缺,以次补之。良法美意,诚可效而可则也。若夫计吏之法,汉以六条,唐以四善、二十七最,宋以七事,明以三等,因时详略,备在史策。然必精选铨曹以清其始,慎择督抚以厉其终,使庶司百执事咸无善事长官之虑,神明自暇,手足自宽,将毕智竭虑以效力国家矣。朱子曰:安民系乎守令,而本源则在朝廷。此之谓也。

制策又以帝王劭农,因及屯垦沟洫之宜。此又贵粟重农之意也。臣惟东南之农政,莫大于屯垦;西北之农政,莫亟于沟洫。按经传无所谓屯田也,屯始于汉。若晁错、赵充国之议,皆为西北备边之计。至唐迄宋,或兵或民,屯始兴于腹地。夫今日东南之宜屯,犹汉之西北之宜屯也。海疆萑苻之薮,往往弥望千里,地沃衍而无居人。使能寓屯于垦,寓兵于农。宽劝募之途,严争籍之禁,均授田输粟之例,籍亚旅为卒伍,变斥卤为膏腴,则东南万世之利也。魏了翁曰:无责屯田之虚名,先究垦田之实利。诚不刊之论矣。至若沟洫之制,无地不宜,而西北为尤亟。西北地势平衍,旱无所潴,潦无所泄,加以河流飘劲而浑浊,若沁、汾,若滹沱,若永定,皆与黄河无异。故堤堰则易决,沟渠则易淤。东南多水而得水利,西北少水而受水害,势使然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古人之为沟防也,伏秋水涨,以疏泄为灌输,河无泛流,野无熯土,则善用其决矣。春冬水消,以挑浚为粪治,土薄可使厚,水浅可使深,则善用其淤矣。《考工记》曰: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明乎此,则西北之水利可以兴,而国计民生永赖之矣。古人所谓善富天下者,因之于天地也。

制策又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因进思兴化善俗之道。此尤政治之本也。臣惟欲清风俗之原,莫若正四民之统。夫士者,率民之教者也;农者,率民之养者也。自庠序衰而士习坏,富商大贾之徒遂以操天下之利权而轻重之。于是习奢侈,尚贪诈,本务日轻,而逐末之势日重。今使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虽三物之教,八刑之纠,行《周官》之法也如故;三老、孝弟常员之设,美俗使者之征,孝义、高年之赐,观览风俗之使,踵汉唐之制也如故。而民俗之不克丕变者,岂斯民不古若哉?积势为之也。故欲淑人心,必先清流品,明定制,别冠

婚、宾祭之等，详宫室、衣服之度，使锥刀竞逐者不得显然厕身于士大夫之列，则天下之士咸知所以自重，不至为寡廉鲜耻之行，而服田力穑之氓，亦咸知国家之本务在此不在彼焉。则庶乎浇漓可以革，礼让可以兴。九两系以师儒，九职首重农圃，即此旨也。若吕氏《乡约》，袁氏《世范》，语意浅近，便于日用行习，然不过化一邑，教一乡。而圣朝训俗型方，所以致经正民兴之效，固自有其大者、远者焉。

夫君心之敬肆，其几甚微。而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则人才之进退，民务之废兴，风俗之纯驳，咸由此而判焉。危微之机，可不儆惧乎！臣伏愿皇上，宥密单心，始终惟一。读经则思帝王制治之意，不徒以记诵占哔为功；读史则观历代得失之由，不徒以殚洽见闻为务。澄其源而流自洁，握其本而末自随。主极既端，举凡兴贤任能、体国经野、化民成俗之道，可一以贯之焉。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刘勰说过：对策就是应承皇帝的命令而陈述政治见解。汉朝用帝王的法则来策问杜钦，晋朝用挑选人的办法来策问郤诜，唐朝用注重粮食的方针来策问张九龄，宋朝用政治和教化的根本来策问苏轼，他们大多能够援引、应证往事，指明和陈述现时政治。然而，政治的本原出自君主的内心，而君主内心的端正又是从学习开始的。罗从彦说："君主阅读经典就要学习其中的思想，阅读历史就要学习其中的事迹。"这确实是因为：帝王所倚仗来治理社会、统治万物的，不外是日积月累而达到光辉的学业，任用杰出人才的方法，使人民生活富裕和端正德行的原则。而这些道理都是从前的哲人已经讲过的道理，这些事情都是前代已经实行过的事情。尊崇这些已经听过的道理，实行这些已经知道的事情，就在于要用心罢了。既然如此，那么保持谦虚、勤奋学习的功夫难道能不予以扩展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在幼小的年龄就已经培育了德行，喜欢学习，尊敬老师，根据传心养性的方法来制订统治方法，使上下

都保持着兢兢业业的精神。为百姓筹划全面富裕和美好教化，原本就已经把握了经典的原则，吸取了古代的经验教训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还想就近考察臣子的言论，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举出勤奋学习、考察官吏、重视农业、整顿风俗等大问题来策问我们。臣下我确实愚昧浅薄，不能回答这样的大问题。然而臣下我私下认为：制科的设立是引导臣子谈论政治的得失的，而不是用来考试他们作文章的。更何况在这言路广开的时候，圣上已经告谕我们要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不要空泛，不要隐瞒，臣下我怎敢拾取粉饰的言论，用来敷衍应付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虞书》"保持中道"的训示，是道统的开创。因而想要探求帝王最紧要的原则和历代讲学的主旨。这确实是研究古代喜爱文化的美好意图。臣下我认为：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一样。它是广博的，而不如儒生的精细；它是勤奋的，而不如儒生的专一。从前唐尧、虞舜、大禹的一个"中"字相传，开创了千古学术的本原；而《汤诰》说建立中道，《洪范》说建立中最高准则。因为"中"这一个字，收敛起来就能够成为圣明的修养，推广开来就能够成为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经传所记载的古代圣王，都是这样勤奋而且专一的。至于后代的君主，未尝不知道学习，未尝不想与三代媲美。例如史书上记载汉章帝召集诸位儒士在白虎观聚会，唐太宗设置宏文殿，宋太宗阅读《太平御览》，也可以说是勤奋而广博了。然而坐在细毡子上谈论唐尧和虞舜，在座谈之间谈论周公和孔子，是既不精细也不专一的，最终也没有收获。赵普说半部《论语》可以辅佐太平局面，范祖幹说《大学》一书可以概括统治原则，这哪里是什么夸张的话语！即便如此，儒生的学问尽管精细，但尤其害怕它们不纯正；儒生的学问尽管专一，但尤其害怕它们不正确。三代以后的儒家，如董仲舒，如王通，都是把阐明道德作为自己责任的人。然而《天人三策》谈到灾害和异常反应，《中说》比拟《论语》，显得尤其僭越和狂妄。因此，想要阐明道统，崇尚经术，端正提高道德和学问的途径，明确建立中正之道的和确立最高准则的方法，那不就只有靠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的诸位儒家，才能够进入道德的正轨吗！皇上尽管刚刚开始学

习,但已经非常精细、非常专一了,所以,即便是说帝王的学问与儒生没有差异也是可以的。

制策又认为要做到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就必须首先进行政绩考核。这是澄清吏治的关键。臣下我认为:国家设立官位、区分职守,不过都是为了人民。在朝廷内,有宰相、以及"部"、"寺"、"台"等机构;在朝廷外,有总督、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等监司、太守,以及州县的有关机构。他们丝联绳贯,相互维系。选举的重要,就在于要选举这里面爱护民众的人;考察的严厉,就在于要监察这里面危害民众的人。假使官吏不把民众的事情当成事情,心中不想到民心,那么,即便他们小心奉行既定的法令制度,假装激励清廉的节操,但无论是遵守法令还是改变法令,祸害也都是相互一样的,廉洁的官吏与贪污的官吏的罪过也都是相等的。如今,要想通达民众的隐情,没有比任用好太守和县令更好的了;要想提高太守和县令的地位,没有比效法《周官》崇尚廉洁的思想、推行汉代久任的办法更好的了。使大臣不敢凭借个人的喜怒来作为升迁官员的依据,使小臣不敢把职位看成是过往的旅店。史书称汉宣帝的时候,太守的治理有成效,皇帝便会用玺书进行褒奖和勉励,提高他们的官阶,赐给他们黄金;有的太守爵位甚至达到了关内侯,但也不变换他太守的职务;如果公卿有缺,那就依次增补。这种良法美意,确实是可以效法、可以作为准则的。至于考核官吏的办法,汉朝用"六条",唐朝用"四善"、"二十七最",宋朝用"七事",明朝用"三等",因时势不同而有详有略,这在史书中有详细的记录。然而,必须要精选主管官吏任免的"铨曹"官员,以便在一开始就能够任命好官吏;必须要小心选择总督和巡抚,以便最终严格约束好官吏。致使各部门的所有办事官吏都没有好好侍奉长官的担心,精神自然就会舒畅,手足自然就会宽松,就会竭尽全部精力来为国家效力了。朱子说:安定民众在于太守和县令,而本源却在朝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制策又认为帝王应当鼓励农耕,因而涉及到了屯田垦荒和水利沟渠的事宜。这又是珍惜粮食、重视农业的思想。臣下我认为:东南地区的农业措施没有比屯垦更大的了,西北地区的农业措施没有比

沟渠更急迫的了。臣下我查考:经传中没有屯田的说法,屯田是从汉代开始的。如晁错、赵充国的建议,都是西北地区边疆防务的计划。到了唐朝和宋朝,有时用军队、有时用民众进行屯田,屯田这才开始从内地兴起。如今东南地区应该进行屯田,就好像汉朝西北地区应该进行屯田一样。海疆长满芦苇的滩涂,往往千里望不到边,土地肥沃但却没有人居住。假使能够把屯田包括在垦荒中,把军队包括在农民中。拓宽劝导招募的途径,严厉禁止争抢户籍,按条例平均授予田土并交纳粮食,按军队的制度把垦荒的民众编成准军事化的组织,把盐碱滩涂变成肥美的土地。那么,这就是东南地区万代的利益了。魏了翁说:"不要求取屯田的虚名,首先要讲究垦田的实利。"这确实是不可磨灭的言论。至于沟渠的制度,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的,而且以西北最为急迫。西北地势平坦,干旱的时候没有地方蓄水,在涨水的时候洪水没有地方排泄,再加上河流湍急而浑浊,如沁河、汾河,如滹沱河,如永定河,都与黄河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堤堰容易决口,沟渠容易淤积。东南地区尽管多水,但却能够享受水的好处;西北地区尽管少水,但却要遭受水的侵害。这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回答说:古人兴建水利沟渠,在夏秋水涨的时候,通过排泄洪水来灌溉田地,使河流不涨溢,使田野没有干旱的田土,这是善于利用水流。在春冬水消的时候,通过挑浚沟渠的淤泥来作为肥料,土地贫瘠的可以让它变肥沃,水浅的沟渠可以让它变深,这是善于利用淤积。《考工记》说:"善于开挖沟渠的人,借助水流冲刷而保持沟渠通畅;善于维护堤防的人,靠提取水中沉积的淤泥而增加堤防的厚度。"懂得了这一点,那西北的水利就可以兴办起来,而国计民生也就永远有了依靠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善于使天下富裕的人,利用的是自然条件。

制策又说:民众的生活一富裕,就因外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而进一步想到了兴起教化、改善风俗的办法。这尤其是政治的根本。臣下我认为:要想澄清风俗的源头,没有什么能够比得过端正"士"、"农"、"工"、"商"这四种民众的固有关系的了。"士",是教育全体民众的人;"农",是养育全体民众的人。自从学校衰落、"士"的习气败

坏后，富商大贾这类人物便得以操纵了天下的利权，而且影响着社会风气。于是人们习惯于奢侈，崇尚贪婪和欺诈，农业的地位日益降低，而追逐工商业的势头却越来越厉害。如今，假使不想到农业而提高工商业的地位，那么即便是用六德、六行、六艺教化民众，用八种刑法纠察民众，完全遵行《周官》的办法。设置了“三老”、“孝弟”等常设官员，征召任命“美俗使者”，赏赐孝顺有道德的人和高龄的老年人，派遣使者观览风俗，完全沿袭汉朝和唐朝的制度。然而却民俗不能大变，这哪里是百姓不如古代呢！而是长久积累的习气所造成的。因此，想要纯洁人心，必须首先辨清品级，明确定制，区别冠礼、婚礼、宾礼、祭礼的等级，详定宫室、衣服的规格，使竞相追逐小利的人不能堂堂皇皇地跻身于士大夫的行列。这样，天下的士人就都能知道如何自重，不至于作出寡廉鲜耻的举动；而耕田种庄稼的农民，也就都能知道国家的根本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了。于是浮薄的风气就可以革除，礼让的风气就可以兴起了。所谓九种君民和协的方式要依靠教师和儒士，九种职业首先以农耕为重，就是这个意思。像吕大忠的《乡约》、袁采的《世范》，语言和意思都很浅近，便于在日常生活中推行，但它们却只不过能够教化一个郡县，或教化一个乡村。而我们圣明朝代改变风俗，给四方作出表率，用来收到风气端正、民众振奋的成效，确实自然有比它们还大、还深远的东西。

君主之心的“敬”与“不敬”，征兆是十分细微的。而端正一人之心就能够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就能够端正百官，端正百官就能够端正万民。这样，人才的进退，民众事务的废兴，风俗的好坏，都能够由此而判明了。“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这个关键，难道能不小心注意吗！臣下我恭敬地祝愿皇上，用心慎密，始终专一。阅读经典就要思考帝王治理天下的原则，不要只是把死记硬背当成是功夫；阅读史书就要观看历代得失的原因，不要只是把增长见闻当成是任务。澄清了源头而水流自然就会清洁，把握了根本而末梢自然就会跟随。君主的最高准则既然端正，那么，所有提拔贤人和任用能人，经营国家与规划土地，教化民众养成好风俗的办法，就可以用一个原则贯穿起来了。这

样，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倩描　王大奇译〕

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殿试策问

[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仰邀天眷,寅绍丕基,于今六载。秉列圣之诒谋,荷两宫之教育,所期府事修和,纪纲整肃,俾治化蒸蒸日上。延集嘉猷,用熙庶绩,临轩策问,其敬听之。

《虞书》首执中之训,为道统所自开。帝德王道,时代虽殊,其同条共贯者安在?《汤诰》言降衷、恒性,专言理也;《洪范》言阴骘下民而五行庶征,理兼乎数。其说异同若何?董仲舒,汉之大儒。朱子既以正谊、明道二语编入《小学》,而于《天人三策》犹有未满之词。其意安在?隋王通著《中说》,学者拟之《论语》。而后人以为妄,所指何条?唐臣韩愈推原性、道,其议论未尽纯者安在?宋之大儒,濂洛关闽,举能发明心性之奥,其得力所在,能揭其大要欤?元儒首倡者何人,继起者何人,明代理学孰为居首,可一一悉数欤?

亲民者莫如守,而与民最亲者莫如令。汉史《循吏传》纪守相甚悉,而令长则缺而不书。其故何欤?天下至广,郡邑至多。郡守之贤否且不能人人而察,而县数倍于郡,令数倍于守。其廉而才,其贪而庸,不可枚举。能详陈其说欤?《虞书》九德曰廉,《周官》六计亦曰廉。其同异若何?才之不逮,止于怠事;廉之弗尚,必将虐民。督之以

才，而各有所短长；督之以廉，而实裨于风俗。其正本清源之道安在？国家求贤取士，非徒为登进之阶。多士学古人官，宜何如束身自爱，以副贡举之盛典也？

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非徒务其名也。《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左氏传》云：俭，德之共也。检以德名者，有清心寡欲之功，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也。三代令辟，俭德尚已。两汉恭俭之君，见诸典册者，能悉数之欤？唐张蕴古进《大宝箴》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太宗纳之。宋太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为意，使天下何仰哉？明太祖曰：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能一一述其行事欤？

整军经武，国之大经。古者寓兵于农。《大易·师》之取象为地中有水，所谓藏至险于大顺也。管仲相齐，参其国而伍其鄙，在国则为军，在鄙则为农。说者谓兵民之分自此始。然欤？设兵之善莫若唐，驭将之善莫若宋。所谓善者安在？能详其说欤？唐之府兵，宋之禁军，各有制度。说者谓禁军之制不如府兵。能引伸其意欤？明则京师宿重兵约三十万，畿内约三十万，嗣后或废或置，其弊至于各营已虚而岁饷如故。正德中，群盗起，调边兵征之而后定。能一一胪举其故欤？

凡若此者：典学以绍心传，察吏以康亿兆，崇俭以厚风俗，诘戎以保乂安，皆致治之良规，经世之要务。多士其述所闻以对，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我与颜回整日交谈，颜回却从不提出异议，显得愚笨；但退出课堂后私下对颜回进行观察，他却也完全能够发挥。颜回也并不愚笨。

关怀远方人就能使四方归顺他，安抚诸侯就能使天下敬畏他。

又向上进一步讲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不知道他们的行为难道能行吗？所以就要考察古人生活的时代。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在幼小的年龄，得到了上天的眷顾，继承了宏大的基业，到如今已有六年了。秉承列位圣祖遗留下来的谋划，承蒙两宫太后的教导，所期望的是六府三事得到圆满完成，法纪纲常整齐严肃，使治理教化蒸蒸日上。为了广泛征集美好的谋划，用来促使国家各项政务的完善，因此来到前殿发布策问。请你们恭敬地听好。

《虞书》首先提出“保持中道”的教导，是“道统”的开始。帝王的品德道术，时代尽管不同，但它们共同的条理和系统是在哪里？《尚书·汤诰》说降善和常性，是专门说义理；《尚书·洪范》说上天默默庇佑和安定百姓而“五行”显示各种征兆，是义理兼用术数。这些说法不同和相同点是怎样的？董仲舒是汉朝的大儒家。朱子既然把“端正思想”、“明确道义”这两句话编进了《小学》，可是对于《天人三策》还有不满意的言辞。他的用意在什么地方？隋朝王通写作《中说》，学者把它比拟为《论语》。后人认为狂妄，所指的是哪条？唐朝的臣子韩愈推导“性”和“道”的本原，他的议论不够纯粹的地方在哪里？宋朝“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学派的大儒，能发现阐明心性的奥秘，他们得力的地方在哪里？能揭示它们主要的东西吗？元朝的儒家中，首先倡明理学的是什么人？接着崛起的是什么人？明代理学是谁居于首位？可以一一全都列举出来吗？

亲近百姓的没有能比得过太守的，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能比得过县令的。汉代史书《循吏传》记载太守和国相的事情很详尽，可是对县令和县长却缺漏而没有书写。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非常广阔，郡邑非常多。太守的好坏尚且不可能人人都考察到，而县的数量比郡还要多数倍，县令的数量比太守还要多数倍。他们清廉有才，他们贪污而平庸，不可能枚举。能详细地陈述其论说吗？《虞书》的“九德”

说到廉洁,《周礼》的"六计"也说到廉洁。它们的相同和不同点怎么样?才能不够,只不过是办事懈怠;不讲究廉洁,就一定会危害百姓。用才能来要求官吏,他们只是各有短处和长处;用廉洁来要求官吏,实际上是有益于风俗。这正本清源的道理在哪里?国家寻求贤能录取士人,不仅仅是提供登进的阶梯。各位贡士学习古人,进入仕途,应如何约束自身,讲究自爱,以符合贡举这项盛大制度呢?

自古以来寻求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来为天下作出榜样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名声。《尚书》说:"要小心地保持你那俭朴的品德,时刻想到天下长久的计划。"《春秋左传》说:"节俭是道德的一个方面。"节俭之所以被称作美德,是因为首先要有清心寡欲的功夫,然后才能保持节俭,符合礼法。三代的帝王,他们俭朴的德行已经很久远了。两汉谨慎俭朴的君王,在史书上可以看到的,你们能全部列举吗?唐朝的张蕴古进献《大宝箴》说:"在里面把皇宫修得十分壮观,但您居住的只不过是能满足您居住的那一点面积;在面前摆满山珍海味,但您吃掉的也只不过是您能吃下的那一点东西。"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宋太祖说:"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但不能用天下来侍奉一个人。假如只想着如何奉养自己,那让天下又有什么仰仗呢?"明太祖说:"只有俭朴能够修养性情,只有奢侈能够迷乱人心。如果处在上面能够节俭,那就可以引导风俗;如果处在上面而生活奢侈,那必然就会导致危害民众。"能一一陈述他们的事迹吗?

整顿军队,讲求战备,是国家的大事情。古代的士兵和农民是合而为一的。《周易·师卦》求取的卦象是"地中有水",就是人们所说的把最凶险的东西隐藏在最恭顺的东西中。管仲在齐国作相国,把国都城郊以内分成三个大区,把国都城郊以外分为五个区,在国都城郊以内的人就是士兵,在国都城郊以外的人就是农民。论说的人认为兵与民的分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这样吗?设置军事制度没有比唐朝更好的了,驾驭将帅没有比宋朝更好的了。所说的好,好在哪里?能详细说明吗?唐朝的府兵,宋朝的禁军,各有各的制度。但议论的人认为禁军制度不如府兵,能引申说明其意义吗?明朝在京

城驻扎的重兵大约有三十万,在京郊地区驻扎的大约有三十万,以后有时废除有时设置,其弊病发展到各营已空虚了而每年军饷照旧发放。正德年间,群盗兴起,于是调遣边防军征讨,然后才平定下来。能一一列举其原因吗?

像以上这样的问题:通过学习来接续传心养性,通过考察官吏来使亿兆百姓平安康泰,通过崇尚俭朴来使风俗淳厚,通过整治军队来保证天下太平,都是治理好天下的良好法则,统治天下的重要任务。请各位贡士陈述你们的见闻来对答,皇帝我将亲自阅览。

黄思永　会试卷三道

黄思永(生卒年不详)　字慎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光绪六年(1880)状元。光绪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其后累迁至侍读学士。光绪二十三年,上书请求发行“昭信股票”,开清廷借用民间钱款之先。后因上书请求变法而被逮捕下狱。光绪二十六年,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方才获释。后因创立“首善工厂”,官复原职。其思想进步,主张变法图强,并擅长书画。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
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大贤神于受教,圣人述之而有幸词焉。盖惟足发者,可以不违,而未省则难遽信也。如愚而不愚,子故欣然述之。且夫以先觉觉后觉者,其先后在两人也。而不谓一人之觉,其先后亦如出两人者。盖自其先观之觉藏于虚,一一了然于心,初不必形之于外;而自其后观之觉征诸实,一一形之于外,始信其了然于心。则觉如不觉者,几渊乎莫测矣。而以先觉觉之者,亦无事深求矣。今夫颜子,非愚者也。愚则无可与言,言固难期其发也。而夫子曰:吾所不能释然者,与之终日言耳。

难罄者,言中之旨。况自朝至暮,岂无疑义之相参?而何以倩盼

起予,商也通礼;切磋喻境,赐也悟《诗》。同堂多颖异之人,回若自甘于不敏。难窥者,默会之言。既自信不疑,何若深情之共揭! 而何以"善劳"言志,进质无闻;"用舍"相期,旁参不事。晤对非冥情之候,回几自等于颛蒙。此而谓之愚,回几不能自辨矣。然此而谓之不愚,人又何以信回也? 而孰知回退矣,明明不违之回也;回足以发矣,又明明非不违之回矣。陋巷无人,而亦步亦趋,乃大畅其尊闻之志。则空山俯仰,始露其真。箪瓢自乐,而在前往后,竟曲体乎善诱之心。则尔室优游,可觇其概。藉非于其私也省之,吾不几失回哉!

且夫问答之顷,其足以阐发精微者亦浅矣。所谓发者,发人所共见,并发人所不见者也。私则闭藏未见之地焉,于人所不见者而亦发之。将发于静存,而时物契行生之妙;发于动察,而鸢鱼参飞跃之机。有触胥通,而无微不至。何其不违于前者永朝永夕,藏之惟恐不深;而发于后者无体无方,亦充之而惟恐不尽乎! 始惟见其藏也,而惜其智之甚短;继而知善用其短者,正善用其长者也。吾非回之与,而谁与哉! 且夫晤语之间,其足以发明义理者亦仅矣。所谓发者,发言所已及,并发言所未及者也。省则敛抑弗及之时焉,于言所未及者而亦发之。将发于克复,而视听有必严;发于礼文,而博约有必尽。万缘俱静,而庶理皆融。何其以不违蓄发之机,若无若虚,敛之似形不足;而以发成不违之妙,至精至大,亦推之而自见有余乎! 始惟见其敛也,而疑其识之甚浅;今而知回居其浅,更无复有深者矣。世安得尽如回而与言哉!

大贤人接受教育十分高明,所以圣人回头来对他说出了表扬的话。因为只有完全能够发挥的人可以对老师的话不提出异议,但不对他进行观察也就难以使人相信。颜回显得愚笨但却不愚笨,夫子因此欣然说出了这句话。况且由先领悟的人来启发后领悟的人,在领悟的先后上是表现在两个人身上的。然而,不能说一个人自己的领悟,在领悟的先后上还是像出自两人一样。因为从他前面来看的那种领悟是藏在思想中,——在心中明确起来,完全不必在外面显露出来;而从他后面来看的那种领悟是通过实践得到验证,——在外面

显露出来,才能让人相信他在心中是十分清楚的。由此可见,已经领悟但却像没有领悟的人,他的渊深几乎是不能测量的。而由先领悟来启发他领悟的人,也不会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要求。现在看来,颜回不是愚笨的人。如果他是愚笨的,那么夫子就跟他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即便是谈了也难以期望他能有所发挥。而夫子说:我心中所不能放下的是,与他整日交谈罢了。

难以说尽的,是话中的主旨。况且从早到晚,中间哪能没有疑义?为什么在谈到《诗经·硕人》"巧兮倩兮,美目盼兮"的时候,卜商也通晓礼制,能阐发我的意思?而在谈到安贫乐道的时候,端木赐也领悟《诗经》,能用《诗经·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作比喻?同学中有许多特别聪颖的人,但颜回却像自己甘心愚笨一样。难以窥见的东西,是心中已经默默领悟了老师的言论。既然自己深信不疑,那还不如让大家共同来揭示出深奥的情理呢!不然,颜回为什么要用愿不夸耀好处、不表白功劳来谈论自己的志向呢?但永远上进的品质默默无闻。夫子拿"用我就做工作,不用就退隐下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来期望颜回,在一旁听课却不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还不是深思熟虑的时候,颜回几乎自己把自己摆到了愚昧的地步。这时要说他愚笨,颜回几乎是不能自我辨白的。然而这时要说他不愚笨,人们又凭什么能相信呢?而谁知颜回回去后,明明是不提出异议的颜回;夫子又说颜回完全能够发挥,又明明不是不提出异议的颜回了。颜回居住在陋巷过着清贫生活的时候,他也步步紧跟,于是大大地弘扬了夫子的志向。这样,越看越感到老师高深,颜回的举动才开始显露了他的真实面目。尽管只有一篮子食物、一瓢水,但颜回也能自得其乐,而且不论是在前还是往后,他自始至终都能委婉地体会夫子循循善诱的心。这样,就能看出他在夫子门下学习时的梗概了。假如不是夫子在私下对颜回进行观察,那我们不就几乎失去颜回了吗!

在问答的时候,如果有能够完全阐明精微的人,那也是很肤浅的。所谓"发",就是不仅要阐发人们所共同看到的东西,而且还要阐发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个人独处,就是在封闭隐藏、别人不能看见

的地方，也能够阐发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东西。在冥思苦想中阐发，就能够精妙地把世上万物有序排列并融汇起来；在受到外物影响中阐发，就能够把握住万物各得其所的玄机。有了感触就能够全部相通，而且无微不至。颜回是那样地在前面从早到晚不违背老师，珍藏教诲惟恐不深；又是那样地在后面毫无定见地加以发挥，也是充实教诲惟恐有遗漏啊！开初，因为只看到了他的深藏不露，从而叹惜他的智慧太短浅；接着，却明白了他善于运用自己的短处，正是他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我要是不赞许颜回，又能够赞许谁呢！在交谈之间，如果有完全能够阐明义理的人，那也是很狭隘的。所谓“发”，就是不仅要阐发话语中已经涉及到的东西，而且还要阐发出话语中还没有涉及到的东西。进行省察，就是归纳还没涉及到的事情的时候，也能够阐发他在话语中还没涉及到的东西。要阐发“克己复礼”的思想，那言行举止就必须得严谨；要阐发“礼”的内容，那广博和简约就必须得达到极致；万般原因都是静止的，但各种道理却都相互融合的。颜回是那样地凭借不违背而等待阐发的机会，若无若虚，收敛还像形体不足一般；又是那样地通过阐发形成了不违背的神妙，无比精深又无比广大，这也是无论怎么推导也是自见有余的呵！开初，由于只看见了颜回的自我掩饰，从而便怀疑他的见识十分肤浅。如今，却明白了颜回即便是处在这种肤浅的地步，但却没有比他更高深的人了。世上的人怎么能够完全都像颜回而使夫子与他交谈呢！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终言柔怀之效，于归与畏征极致焉。夫远人不来，奚以动四方？诸侯不服，遑言驭天下？归之畏之，柔怀之效，固有可决耳。且王者无市恩之心，而望恩者瞻如云日；无作威之见，而慑威者懔若雷霆。果操何道哉？恩溥于无外，身受在宾旅，遐荒共仰仁风；威寓于无形，翼戴在屏藩，薄海咸知义分。一时重译来庭，梯航集焉；六宇率服，车书奉焉。斯恩威之所被者广也，试更言柔远人、怀诸侯之效。

取途固行旅之常，而有所趋，亦或有所避。惟一感天家之德意，

其出乎望外者,道路将播为美谈。菑蓬不兴行野之嗟,杨柳罔识征途之苦,远人所以系四方观听也。封建本酬庸之典,而重其势,即易启其心。惟摄以共主之声灵,其国于寰中者,藩服不自为风气!入觐荷龙光之锡,尊王申牛耳之盟,诸侯所以为天下表率也。是知动四方者,不自四方始矣。河山之隔绝,人情忍轻去其乡?而首善树风声,行李悉资其困乏。白驹永縶,而《黄鸟》无歌,不啻先路导之也。归往而无阻也,曰惟柔远人则然。且知驭天下者,不于天下起矣。习俗之梗顽,国法不能平其气。而协和征牧伯,弓矢弗靳以恩荣。欢洽《裳华》,斯威扬冕藻,不啻干城寄之也。畏服而无间也,曰惟怀诸侯则然。

其在开创之朝,边陲甫靖,商旅尚有戒心;正朔初颁,荒裔不无跋扈。非特四方多褱足,天下萌贰心,即远人与诸侯,岂易倾忱而向化乎?有柔怀之经在,其流寓担簦蹑屐,受廛幸隶编氓;其君长赐毂秉鞭,专征命为连帅。招徕无所事,驾驭无所矜。吾见趋附者愿瞻上国之光,反侧者胥守敷天之义也。仰惟穆考,禁宽关市,就养至自海滨;旅遏密崇,质成受夫与国。公不有成宪之可遵哉!其在守文之代,驿传供帐,历久视为具文;属国冠裳,越时生其玩易。方且失远人之心,解诸侯之体,而况四方与天下,尤难感格而控制乎!自柔怀之政行,中外不分畛域,异族亦厕诸泽宫;大小使相系维,列辟共匡夫王室。声教无不通,觊觎无不息。吾知《葛藟》之咏可勿慨于河濒,蔓草之图可不忧夫岩邑也。率时昭考,殷墟绥集,朝鲜且入版图;坰野会同,区宇旋征臣附。公尚念前型而取法哉!至是而九经之效全矣!

•

这句话归结了关怀远方人和安抚诸侯的成效,在四方归顺和天下敬畏上验证了它们最高的境界。远方人不来,怎么能够震动四方?诸侯不服,怎能说驾驭天下?让四方归顺、让天下敬畏,关怀远方人和安抚诸侯的成效,确实可以判明了。而且,帝王尽管没有售卖恩惠的心思,但企望恩惠的人却敬仰得像瞻仰云日一样;尽管没有摆弄威严的意思,但被威严震慑的人却害怕得像害怕雷霆一样。这到底是采取的什么手段呢?恩情撒播在遥远的地区,在旅途的宾客能有亲身的感受,边远广大的地区共同仰慕仁爱的风气;威严寄托在无形之

中,四方诸侯能有衷心的拥戴,远到海边的地区都知道道义的原则。一时间,经过几重翻译来到朝廷,登山和航海来到的人聚集到了一起;天地四方都服从,共同奉行相同的国家制度和文字。这种恩情和威严的覆盖是十分广阔的。我试着再说一说关怀远方人和安抚诸侯的成效。

取道上路尽管是出远门的人的常规,但他们有前往的,也或许就有不去的。只要完全让他们感受到君王的美好意愿,那些喜出望外的人,就将会把这些事情在道路上传播为美谈。像《诗经·我行其野》所描述的那种走在荒野上采摘"蓄"和"蓫"这些野菜充饥的嗟叹不会发出,《诗经·采薇》所描述的路边依依杨柳不会再看到战士在征途上的痛苦。这是远方人用来维系四方舆论的原由。分封诸侯原本是酬赏功劳的制度,但增强了他们的势力就容易诱发他们的野心。只要用一个共同君主的声威来震慑住他们,那些封国在寰宇中的人,不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服从天子的风气了吗!入觐天子,承膺恩宠和荣光的赏赐;尊奉君王,申明让君王执掌牛耳的盟誓。这是诸侯用来作为天下表率的原由。由此可知,震动四方并不是从四方开始的。河山隔绝,人之常情怎忍心轻易离开家乡?然而,朝廷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使者往来,朝廷都能够予以资助,解决他们旅途的艰辛和物资的缺乏。像《诗经·白驹》所说的永远拴住白马来留住客人,没人再咏唱怨恨所到邦国的《黄鸟》诗,这就事先开辟了道路。来往畅通无阻,这才能叫做关怀远方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驾驭天下,不是从天下开始的。习俗顽固不化,国法是不能平服这种习气的,但用融洽的手段征召四方诸侯,赐给彤弓和箭并不吝啬恩宠和荣誉,欢乐和《诗经·裳裳者华》所歌咏的那样融为一体。这样,天子树立起了威信,诸侯无疑也就成了天子的捍卫者。诸侯同时敬畏和服从天子,这才能叫做安抚诸侯。

在那些开创国家的朝代,边陲刚刚安定,商旅还有戒心;改朝换代的新历法刚刚颁布,边远地区的诸侯不是没有跋扈之心。不仅四方大多裹足不前,天下萌生贰心,即便远方人与诸侯,难道那么容易就效忠朝廷、向往教化吗?然而只要有关怀远方人和安抚诸侯的方

针存在，那些寄居在他乡的民众就会以非常急迫的行动接受朝廷的安排，有幸成为隶属国家的编民；那些远方的诸侯就会接受朝廷的分封，有权自行征讨而被任命为一方统帅。招徕民众而不役使他们，驾驭天下而不自负，我们就将看到前来依附的人都愿意瞻仰上国的光辉，反复无常的人都会遵守“普天之下都是天子臣民”这个原则。瞻仰伟大的周文王，他放宽物资交流和税收的禁令，抚养了远到海滨的民众；他用武力制服了密国和崇国，并在芮国和虞国争夺土地时为他们评定是非，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他们。这样，国君不是有现成的制度可以遵循吗？然而在遵守既定制度的朝代，驿站运送和供设帷帐的制度，时间一久便被视为一纸空文；属国的上层人物，时间一久便滋生出轻慢之心。这样将会丧失远方人的人心，使诸侯解体；更何况四方与天下是尤其难以感化和控制的呢！自从关怀远方人和安抚诸侯的政策实行后，在中外不分地域的不同，其他族的人也都能够跻身于“泽宫”，得到教育和选拔；使大大小小的封国相互维系，众多的诸侯共同匡扶王室。声威和教化没有不通达的，非分的妄想没有不打消的。于是我们知道：《诗经·葛藟》中那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感叹不再会在河边发出了，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兄弟之争也不会再发生了。周武王树立榜样，对殷朝废墟上的余烬还加以安抚聚集，而且朝鲜并入了周朝的版图；在牧野会合各路诸侯，全天下都跟从征讨，立即俯首称臣。国君还应记着从前的规范而用来作为法则了呵！到这里，《中庸》所说的治理国家的九种原则的功效就完全具备了！

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以论古进吾善，当即世以求知焉。夫尚论至古人，善之量又于此进矣，而正非颂诗、读书已也，知人者是以贵论世耳。且儒者何不幸而生古人后哉？顾我不见古人，而古人若与以可见；我据以见古人，而古人仍不可以遽见。盖可见者迹，著作亦传信之端；不遽见者心，简册抱难言之隐。固有共此一途，时势异而得失迥殊者，则上下盱衡之

识,不可少也。善士极之天下,皆并吾世而生者耳。友之以为未足,将旷世相感。所谓尚论非耶?于是又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古人之事实,即昭著于尘寰,而或传之有同异,言之多附会。以视同吾世者之历历可证,大相悬矣。而高瞻远瞩之儒,又不惜抗心以探讨。古人之仪型,即永垂为法守,而或情随境易,事随地迁。以视当吾世者之一一相符,必有间矣。而远绍旁搜之侣,又必欲翘首以追维。此尚论者以为古人之世往矣,有其诗、其书在,吾颂之、读之,未始不可想见其为人。虽然,其若不知何!必谓载籍之流传无关体要,何以颂"弁冕"而怀孝子,读"雎雉"而识忠臣?往往片语单词,即载曩哲之精神以俱出,是其人如相晤于执卷时也。而谓咫闻之墨守足揭心源,何以《诗》如"风首",解且多歧?《书》若《武成》,策难尽信?往往拘文牵义,将并立言之本旨而失真,是其人当进求诸陈编外也。

是以论其世也,大抵遭遇当万难之会,恒有不敢居功,独甘任过之苦衷。纵文字有灵,此情有不能直达者矣。夫古人纵心孤往,原无暇求谅于来兹,而尚论者从诵习之余,排众议而独摅卓识。知世需勘乱,缺斫破斧非夷伤;世赖仔肩,抱器陈畴非幸免。而一日之行权济变,并不得为后人藉口之端。时代非遥,曷弗设身以想哉?抑凡事机处疑似之交,只此成败听天,是非听人之一念。苟形迹是拘,初志有未能共喻者矣。夫古人内问无惭,亦庸或待白于异代?自尚论者于涉猎之下,破群疑而特表公评。知世际凌夷,谯谏主文非怨谤;世逢隆盛,赓歌颂拜非阿谀。而前圣之经济文章,更不得为伪学欺人之具。流风如昨,何勿平心以审哉?是非尚友而何!

用讲论古代来增进自己的善良,也就是在今世去求知。向上进一步讲论古人,善良的器量又在此有了增长,而不是只诵读诗、阅读书而已,了解古人的人所以就要重视古人的生活时代。而且儒者为什么要替自己生在古人之后而感到不幸呢?尽管我看不见古人,但古人好像也能够看见;我想活生生地看到古人,但古人却仍然不能直接看到。因为可以看见的是古人的事迹,著作也是传递真实情况的一个方面;不能直接看见的是古人的心,简册中也包含了难言之隐。固

然有这样的一条共同路径,但由于时势的差异,得失却会有明显的不同。由此可见,上下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是不可少的。有人认为:找遍天下,高明的人士只不过都是与自己同时代出生的人罢了。把他们作为朋友还以为不够,便想隔着时代与古人相互感通。所谓向上进一步讲论到古人,还不对吗?于是,他们便又志向远大地夸耀说:“古人,古人!”

古人的事实,即便是昭著于天下,然而有时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有同异,在讲述的过程中会有不少的附会,与我们同时代人的事迹能够历历可证的情况相比,悬殊就十分大了。因而,高瞻远瞩的儒者,又不惜尽心进行探讨。古人的典范,即便是永远流传作为应该遵守的原则,然而有时事情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事情随着地区的不同而发生了变迁,与我们同时代人的典范能够一一相符的情况相比,必然就会有差异了。因而远远承接古人、到处搜寻古人事迹的同伴,又必然会想翘首仰望来紧跟古人。这是因为向上进一步讲论古人的人认为古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有古人的诗、古人的书在,我们诵读诗、阅读书,未尝不能想见古人的为人呢!即便如此,但对那些无法知道的事情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认定古籍的流传无关主体纲要,但为什么在吟颂《诗经·小弁》中“飞翔的乌鸦”的诗句时就会怀念孝子,阅读《尚书·高宗肜日》中“雄野鸡在鼎耳上鸣叫”的文句时就会认识忠臣呢?往往只言片语,就能够承载过去哲人的精神,并同时表现出来。这就如同在读书的时候与古人相互交谈。然而,要是认为死啃书本就完全能够揭示古人心理的本原,那为什么像《诗经·国风》的第一首诗,解释起来有那么多的分歧呢?像《尚书》的《武成》,在简策的文字上使人难以尽信呢?往往拘泥文字、拘泥意思,那就会使古人建立学说体系的精神本原失真。这就需要在古籍之外来进一步探求古人。

因此考察古人言论之外的生活时代,一般是他们在遭遇到万难的时候,常常会有不敢居功骄傲、而是独自甘心承受过错的苦衷。纵然文字有神通,但这种心情却有不能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古人下决心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原本就没有工夫考虑求得将来的谅解;因

而向上进一步讲论古人的人在诵读和学习之余，就应该力排众议而独自阐发自己的卓越见识。要知道:在时代需要平定动乱时,采用铁腕手段并不是过错;在时代要依靠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时,带走国家宝器、向新朝君主陈述治国大法,并不是幸免于难。然而个别时候为应付事变而采用的变通手段，完全不能成为后人一种攻击的借口。古人的时代并不遥远，为什么不能设身处地来想象呢！或者事机处在捉摸不定的时候,成败只能是听天由命,是非听凭个人的一时决断。假如只拘泥于表面现象,那么,他们最初的志向就会有大家还不能共同理解的东西。古人扪心自问不感到惭愧，又何须想要等到后世再给以澄清;向上进一步讲论古人的人在涉猎他们的事迹之后,自然就应该打破众人的疑问,特地要发表出公正的评判。要知道:在时代处在由盛转衰时,以委婉规劝为主的文章并不是抱怨诽谤;在时代处在繁荣昌盛时,作歌唱和、赞美传颂并不是阿谀奉承。然而，前代圣人治理国家救济民众的文章，更不能成为伪学欺骗人的工具。古人流传的好风气还是像在昨天一样，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来审视呢？这不是与古人交朋友,那还会是什么呢？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合天者帝，通德者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懋修为本者。《易》曰“蒙以养正”,《书》曰“念终始典于学”,凡以圣功端万化之原也。故致治必求当理,而理境之所以克明,则圣功之精于体道可知也。察吏在乎安良,而良吏之所以克庸,则圣功之深于爱民可知也。崇俭方能裕国,而国用之所以克充,则圣功之严于寡欲可知也。讲武斯可宣威,而威声之所以克振,则圣功之强于修德可知也。操之有本,斯推之咸宜。唐虞三代之隆,亦不过是也。

钦惟皇帝陛下，冲龄践阼,典学方勤,裕文武之资,炳登咸之治。固已理学无不明，吏治无不善，浮费无不节，戎政无不修矣。乃圣怀冲挹,犹切咨询,思久道之有成,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析理、课吏、戒奢、整旅诸大政。如臣之愚昧,何足以知体要？顾当

对扬伊始之时，敬念敷奏以言之义，敢不谨述所诵习者，本刍荛之一得，以效葵藿之微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虞书》首执中之训，为道统所自开，因推帝德王道同条共贯之旨，以及诸儒之纯驳。此修德凝道之本也。臣案危微精一，尧舜传心之学。《汤诰》降衷恒性，始专以理言性；《洪范》五行庶征，则理兼乎数。曾巩谓《洪范》和同天人、使之无间者，此也。汉儒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二语，朱子编入《小学》；而《天人策》流于灾异，不无瑕疵。即其言性为生质，情为人欲，语亦未纯。隋王通《中说》，郑獬以李德林、关子明与通生不同时，讥其说之妄。晁氏亦谓薛道衡见于长安，时代不符；至以房、杜为门人，益可证其诬。唐韩愈推原性道，足挽狂澜。然分性为三品，又以孟子、荀卿并列，致为方孝孺所讥。宋之理学，濂溪开伊洛之先，二程《遗书》多与《西铭》相表里。朱子出，而心性之奥，益昭示于来兹。其得力所在，不外乎主敬、存诚也。元儒许衡、吴澄倡于前，金履祥、姚枢诸人继于后。有明一代，若薛瑄、胡居仁实为纯粹以精；至如王守仁之良知，虽谓渊源于陆氏，而一有偏倚，即易入歧途。是以高、顾诸人承其后，皆不免于訾议云。皇上念典方新，崇儒重道，所由推阐性理之学，而日以昌明也。

制策又以亲民莫如守，最亲莫如令，因以循良之绩，推及于考察之方。此诚简贤辅治之大纲也。臣惟有课吏之良法者，可以收良吏之实效。西汉循吏，多纪守相，而令长缺如者，其时郡县之制初定，治具悉赖乎郡守。迨至东京，则王涣、刘矩、仇览、童恢皆为之列传；而鲁恭、刘宽，以及颍川四长，贤令长之卓卓表见者，后先相望矣。夫天下至广，郡邑至多，郡守之贤否已有难于遍察之势；而县数倍于郡，令数倍于守。欲得而周知之，惟汉代考察之法最为精密。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如田宅逾制、牟利侵渔诸禁是也；而又以察令之权，委之于守。故两汉吏治最为近古，以其得内外相制、大小相维之义也。《虞书》九德曰廉，《周官》六计亦曰廉。或以廉察为训，不取廉隅、廉洁之意。夫才之不逮，止于怠事；廉之弗尚，必将虐民。是故督之以才而各有所短长，不如督之以廉而有裨于风俗。吏治所以正本清原者，在此。国家澄叙官方，首崇廉介。宜乎登仕版者，咸知束身自爱也。

制策又曰：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因进求历代尚俭之治。此又崇实黜华之要也。臣谨案《书》曰："慎乃俭德，惟怀永图。"盖惟俭，斯能永。《左氏传》云："俭，德之共也。"俭以德名者，诚以制节谨度，必本之清心寡欲。三代令辟，禹之卑宫，文之卑服，与土阶茅茨，后先媲美。汉文帝之衣弋绨，罢露台，俭素可风。光武身衣大练，色不重采。至明帝，犹复仰承先志。他若晋武帝之焚雉裘、梁萧恢之毁简布，亦俭约可师。唐张蕴古进《大宝箴》六百余言，所谓"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可谓言近指远，宜乎太宗嘉纳之也。元宗初政，亦尝罢织锦坊；宪宗用帛，必籍其数。厥后宋太祖戒衣饰之侈，尝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此二语亦本之于《大宝箴》。仁宗虑烧羊之沿为制，戒蛤蜊之费于用，实一代仁俭之主也。明太祖营缮宫室，去雕琢之奇丽，乘舆服御，咸令以铜代金。尝云"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是以止潞州之参贡，辍金华之香米，皆可为法矣。圣朝俭德，实体唐而踵虞，是以化行海内，炳焉与三代同风也。

制策又以整军经武，国之大经，因以详求夫兵制。臣惟古者寓兵于农，比闾族党，即伍两卒旅；蒐苗狝狩，讲步伐击刺。《易》之《师卦》取象于地中有水，所谓藏至险于大顺者，就兵农合一之势言之也。管仲相齐，行轨里连乡之法，尚不失守望相助之意。至参其国而伍其鄙，在国为军，在鄙为农，虽即古者六乡六遂之遗，而兵民渐分矣。两汉以后，兵制屡更。惟唐时府兵之制最为近古，惜乎行之未久，而募壮士，增矿骑，又纷更矣。宋有禁兵、厢兵、蕃兵、乡兵诸目。其禁军之制，收天下之精锐，列营京甸；征调屯守，悉自京师移之，而未若府兵之善者。府兵则可聚可散，禁军则愈久愈怠也。然无必胜之兵，有必胜之将。宋惟得驭将之法，故韩、岳诸人，虽当积弱之势，犹奋起而无敌也。明时京师宿重兵三十万，畿内约三十万。说者谓得强干弱枝之意，而日久废弛。虽曾改三大营为十团营，而名不副实，其弊至于各营已虚而岁饷如故，则并老弱之数亦不足。正德中，群盗既起，至调边兵征之而后定。则京师重兵不足恃，可知矣。圣世武备聿修，德威远播。夫是以干戈永靖，而中外咸乂安也。

夫辨理欲以励宸修，严考核以清仕路，戒奢靡以维风俗，精训练以饬戎行，举而措之，尚何政之不修哉！臣尤伏愿皇上，博览《诗》、《书》，广延规谏。《皋陶之谟》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诚能本此意以懋修，而道积厥躬，则举凡大法小廉、黜奢示俭、迩安远肃之规，皆可一以贯之，不劳而理。盖源清则流无不洁，体立而用有以行。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符合上天的人就是"帝"，贯通道德的人就是"王"。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美好的个人修养作为根本的。《周易》说："用童蒙之态来培养中正之气。"《尚书》说："始终不忘从学习中吸收经验教训。"它们都认为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是端正万物化育的本原，所以要治理好天下就必须寻求正当的道理。而能够明白道理的境界，那就可以知道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已经能够精纯地把握规律了。考察官吏在于安抚善良，而优秀的官吏能够建立功勋，那就可以知道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已经能够深深地爱抚民众了。崇尚节俭才能使国家富裕，而国家的用度能够充裕，那就可以知道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已经达到严格的清心寡欲的程度了。讲求军事才能宣扬国威，而威名能够远扬，那就可以知道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能够强化恩德感召了。只要能够把握根本，那推行起来就都是合适的。唐尧虞舜三代的兴隆，也不过是这样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在幼小的年龄登上皇位，学习勤奋，提高文治武功的资质，显耀超越五帝三王的治理。确实已经是理学全都明白，吏治全都完美，浮费全都裁减，军政全都整顿了。然而圣上却心怀谦虚，仍然殷切咨询，考虑长久坚持大道而形成教化，期望能够觉察出浅近之言。于是把臣下等人召到朝廷，用辨析道理、考核官吏、戒除奢侈、整顿军旅等大政来策问我们。像臣下我这样愚昧，怎能够知晓国家的大政呢？然而在这开始对答的时候，恭敬地推绎《尚书·尧典》所说的让大家都陈述政务的意思，臣下我怎敢不小心陈述所诵读和学习到的东西，本着那割草打柴人的一点心得，来奉

献出葵花向阳一样的微小忠心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虞书》首先提出“保持中道”的教导，是“道统”的开始，因而推究帝王道德的共同条理和系统的主旨，以及各位儒士正确和错误的地方。这是品德修养和凝聚大道的根本。臣下我查考：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只有精诚专一，才能真诚地保持“中道”，是唐尧虞舜传心养性的学问。《尚书·汤诰》所说的降善和常性，开始专门用义理来谈论性情；《尚书·洪范》说上天默默庇佑和安定百姓而“五行”显示各种征兆，则是义理兼用术数。曾巩认为《洪范》使天与人和睦同心，使两者亲密无间，就是说的这个。汉朝儒家董仲舒“端正思想不谋求利益”，“明确道义不计较功效”这两句话，朱子把它们编进了《小学》，而《天人三策》停留在灾害变异上，是有瑕疵的。即便是他讲论“性”是人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说得也还不纯正。隋朝王通的《中说》，郑獬认为李德林、关子明与王通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于是讥讽王通学说的狂妄。晁氏也认为在长安见到薛道衡，与时代不符；至于把房玄龄和杜如晦作为门人，更加可以证实它的诬妄。唐朝的韩愈推导“性”和“道”的本原，能够力挽狂澜。然而，他把“性”分为三品，又把孟子和荀卿并列起来，以致被方孝孺所讥讽。宋朝的理学，周敦颐开创了伊洛的先声，程颢程颐的《遗书》很多是与张载的《西铭》相互为表里的。朱子出现后，而心性的深奥更加展示给了后来的人。他得力的地方不外乎“主敬”、“存诚”。元朝的儒士许衡、吴澄倡明理学在前，金履祥、姚枢等人继承在后。明朝一代，如薛瑄、胡居仁的学问确实是到了精纯的地步；至于如王守仁的“良知”，虽说是渊源于陆九渊，但一有偏差，就容易走入歧途。因此，高攀龙、顾宪成等人在后面继承他，都不免有被诋毁的议论。皇上刚刚开始学习，尊崇儒学，重视道统，由此推究阐明性理的学问，就会一天天地兴盛而光明。

制策又认为亲近百姓的没有能比得过太守的，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能比得过县令的，因而就优秀官员的功绩出发，推导到了考察官吏的方法。这确实是选拔贤能辅佐政治的要点。臣下我认为：有考核官吏的好办法，可以收到产生优秀官吏的实效。西汉的优秀官吏，记

载最多的是太守和国相,而县令和县长缺少记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郡县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的实施全都是依靠太守。等到了东汉,王涣、刘矩、仇览、童恢就都被列入了传记;而鲁恭、刘宽,以及颍川四长,这类贤明县令和县长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天下非常广阔,郡邑非常多。太守的好坏已经有难于人人都考察到的势头,而县的数量比郡还要多数倍,县令的数量比太守还要多数倍。要想周详地了解官吏,只有汉代考察的办法最为精密。汉朝用"六条"来考察太守,如田土和房宅超过规定、牟取利益侵占掠夺等禁令就是其中的内容;而又把考察县令的权力,交给太守。所以两汉的吏治最接近古代,就是因为两汉把握住了内外互相制约、大小互相维系的原则。《虞书》的"九德"说到廉洁,《周礼》的"六计"也说到廉洁。但有人把它解释为廉察,不采用廉隅、廉洁的意思。才能不够,只不过是办事懈怠;不讲究廉洁,就一定会危害百姓。因此,用才能来要求官吏,他们只是各有短处和长处;还不如用廉洁来要求官吏,从而有益于风俗。在吏治上要做到正本清源,关键就在这里。国家整顿吏治,首先推崇廉洁耿介。难怪做官的人,都知道约束自身、讲究自爱了。

制策又说:自古以来寻求治理天下的君主,没有不亲身实行节俭来为天下作出榜样的,因而进一步寻求历代崇尚节俭的措施。这又是崇尚朴实、废除奢侈的关键。臣下我小心查考:《尚书》说:"要小心地保持你那俭朴的品德,时刻想到天下长久的计划。"因为只有节俭,才能长久。《春秋左传》说:"节俭是道德的一个方面。"节俭之所以被称作美德,确实是因为保持节俭,符合礼法,必须出自清心寡欲。三代的帝王,大禹不愿修建豪华宫殿,周文王不肯穿着豪华的服装,与唐尧的泥土台、茅草房屋,后先媲美。汉文帝穿着黑色的粗丝衣服、取消露台的修建,他的朴素可以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东汉光武帝身穿宽大的素色衣服,没有其它的色彩。到了汉明帝,仍然还继承着先辈的志向。其他像晋武帝焚烧掉雉裘,梁朝的萧恢毁掉筒布,他们的俭朴也是值得学习的。唐朝的张蕴古进献《大宝箴》六百余字,他所说的"在里面把皇宫修得十分壮观,但您居住的只不过是能满足您居住的那一点面积;在面前摆满山珍海味,但您吃掉的也只不

过是您能吃下的那一点东西”,可以说是言近旨远。难怪唐太宗愉快地采纳了他的意见。唐玄宗刚刚登上皇位的时候,也曾经取缔了织锦坊;唐宪宗用绸缎,必须得登记下数量。后来,宋太祖戒除衣饰的奢侈时,曾经说:“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但不能用天下来侍奉一个人。”这两句话也是依据《大宝箴》讲出来的。宋仁宗担心烧羊沿袭下去成为定制,告戒蛤蜊对国家费用会造成耗费,确实是一代仁爱节俭的君主。明太祖修建宫殿,去掉奇丽的雕琢,乘坐的车辆和使用的东西都下令用铜来代替金。他曾经说:“只有俭朴能够修养性情,只有奢侈能够迷乱人心。如果处在上面能够节俭,那就可以引导风俗;如果处在上面而生活奢侈,那必然就会导致危害民众。”因此,停止潞州进贡人参,中止金华进贡香米,都可以作为榜样了。我们圣明的朝代有节俭的美德,确实是遵循唐尧而紧跟虞舜,因此教化风行海内,光明辉煌与三代是同样的风气。

制策又认为整顿军队,讲求战备,是国家的大事情,因而想要详细探求军事制度。臣下我认为:古代的士兵和农民是合而为一的,“比”、“闾”、“族”、“党”这些乡村组织,就是“伍”、“两”、“卒”、“旅”的军事编制;通过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打猎活动,来练习步伐和击刺。《周易》的《师卦》从“地中有水”抽取卦象,人们所说的把最凶险的东西隐藏在最恭顺的东西中,是就兵农合一的形势来说的。管仲在齐国作相国,实行“轨里连乡”的办法,还没有失去维护地方治安的意思。至于把国都城郊以内分成三个大区、把国都城郊以外分为五个区,在国都城郊以内的人就是士兵,在国都城郊以外的人就是农民,虽说这是古代“六乡六遂”的遗留制度,但兵和民就渐渐分离了。两汉以后,军事制度屡次变更,只有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最接近古代,但可惜的是,它没有能够长久推行下去。而召募壮士、增加“矿骑”,又更加混乱了。宋朝有禁兵、厢兵、蕃兵、乡兵等名目。宋朝禁军的制度是:收编天下的精锐,驻扎在京师及附近地区;征调和屯守,都从京师移动。但它不如府兵制度好。府兵是既可以聚集也可以分散,但禁军则是愈久愈怠惰。然而没有必胜的士兵,却要有必胜的将帅。宋朝只因得到了驾驭将帅的办法,所以韩世忠、岳飞等人,尽管面对着积

弱的形势,但仍然能够奋起而且所向无敌。明朝时候,京城驻扎的重兵大约有三十万,京郊地区驻扎的大约有三十万。评论的人认为这是把握了强干弱枝的原则,然而日子一久便废弛了。虽然曾经把三大营改为十团营,但却名不副实,其弊病发展到各营已空虚了而每年军饷照旧发放。这样一来,就是把老弱的数量加到一起也不够用了。正德年间,群盗兴起,于是调遣边防军征讨,然后才平定下来。由此可见,京师的重兵是不能够完全依靠的了。我们圣明的时代军备得到了完善的整顿,道德和声威远远传播。因此战争永远得以平息,中外全都平安无事。

辨明天理和人欲以激励皇上的修养,严格考核以澄清吏治,戒除奢侈浪费以维持风俗,精心训练以整饬军队,把这些举措加以实施,还有什么政务不能完成呢!臣下我尤其恭敬地祝愿皇上,博览《诗》、《书》等经典,广泛听取规劝。《皋陶谟》说:"兢兢业业,天天处理好繁重的政务。"如果能够本着这个意思来完善个人修养,而道德在自己身上就将积累增多。这样,所有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废除奢侈、提倡节俭、近处安定、远方肃静的规划,就都能够用一个原则贯穿起来,不需要操劳就能够实现治理了。因为源头清澈,那水流自然就没有不清洁的;根本原则得到确立,那具体方法就能够得以实行。宣明自身的道德,帮助人们革除旧有的缺点,达到最美好的境界。这样,我国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这里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倩描　王大奇译〕

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殿试策问

[光绪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冲龄,仰邀天眷,寅绍丕基,于今九载。承列圣之诒谋,秉慈闱之懿训,惟日孜孜,冀臻上理。探念典学传心之要,求通经致用之方;著顺轨于宣防,奏咸熙于庶绩。尔多士对扬伊始,尚摅谠论,用赞嘉猷。

治法肇于唐虞。《尧典》、《舜典》,何人所分?人心、道心,何书所引?《汤诰》始言性,《说命》始言学。真德秀谓开万世性学、圣学之源。能畅其说欤?《易·文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或谓与《丹书》敬胜、义胜之说相发明。能推阐其蕴欤?汉高帝诏陆贾著《新语》,虽云修仁义,法先圣,而所陈不过秦汉间事。岂为学止于此欤?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所好,惟尧舜周孔之道。果于数圣传授微旨有所得否?其他若《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以及《大宝》、《丹扆》诸箴,其言有可采欤?后世人主,或好黄老,或尚艺文,治不古若,殆由是欤?

经学导源于汉,尚已。《易》上下《经》、《十翼》,本为十二篇。何人始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尚书》,伏生所传者二十八篇。孔安国传,晋梅赜始奏于朝。果可信欤?逸《诗》散见诸书。或谓孔子删《诗》,有删其篇者,有删其句者。尚详征之。《春秋》三家之义,孰长?杜氏注《左》,果优于服注否?《礼记》为汉儒所综集,《中庸》为子思作,《缁衣》为公孙尼子作。程子独谓《儒行》、《经解》非圣言,确否?

《周官》晚出,是否后人伪托?《仪礼》注家甚少,贾疏据何家为定本?《三礼》之学不讲久矣,能言其所心得欤?

四渎之水,河最难治。禹疏九河,故道自汉时已不能尽考,惟许商上书言徒骇、胡苏、鬲津所在。后世地志,转一一胪列其名。果可据欤?魏晋南北朝,河之利害无闻,《唐书》所载,亦仅薛平、萧仿两事。岂以《隋》、《唐书》不志河渠,故多缺欤?贾让之三策,王景之八渠,盍考其说?宋人论河之说,如欧阳修、苏辙、任伯雨诸论,果皆允否?潘季驯所云以堤束水、以水刷沙,其于治河之法,果不易欤?夫治河兼欲利漕,是以古今议论纷如。河运、海运孰便?南流、北流孰宜?其详究之。

《周官》六计,以廉为本。或训廉为察,其义孰优?汉法: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奏事举殿最。而董仲舒对策谓:累日取贵,积久致官。汉亦用年劳之法欤?魏明帝作都官考课法,杜恕以为文具,晋杜预亦谓不若去密就简。其说然欤?唐叙以四善,分以二十七最,差以九等。宋因唐之四善,分为三等。详略得失,其缕析之。宋初考课,特命清望之官同任其事,不但委之有司。其法果可行否?《汉书》言:综核名实,故吏称其职。然或上求实效,下循虚名。将操何道,而使之皆实心以敷政乎?悃愊安静者大抵便民,而缓急或不足恃;强健明决者易于集事,而恣睢或至殃民。将何以资器使?举劾之权,不能不寄之大吏,而不无借以遂其私者。何以委任而责成欤?

夫心法为宰化之枢,经术为作人之本,固堤防而民居敉定,严考课而吏治澄清,皆经世之要图,保邦之大计也。多士学古入官,讲求实用。其各以素所诵习者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了解那种内容的人对于治理天下而言,不就如同把天下放到手心这里观看一样了吗?

文采条理详密明辨,完全能够不同于一般。

它记载的事情则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它的文字则是史官的惯用笔法。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龄，承蒙上天保佑，继承盛大基业，到今天已经有九年了。接受了列祖列宗留下的宏图，秉承皇太后的教导，每天都孜孜不倦，期望达到天下大治。因而探索坚持学习和传心养性的要旨，谋求通经致用的方法以及防止河水泛滥、使河水顺着河道流淌，并让各项事业全都得到振兴。各位贡士开始对答，还希望你们陈述正直的言论，为朝廷的美好规划提供帮助。

统治法规起源于唐尧和虞舜。《尧典》和《舜典》，是谁分开的？“人心”和“道心”，是什么书引用的？《汤诰》开始谈“性”，《说命》开始论“学”。真德秀说这就开创了万世“性学”和“圣学”的源头。能清楚地阐述这种说法吗？《易经·文言》说：“用恭敬来使内心正直，用义来与外界交往。”有人说这与《丹书》的“敬胜”和“义胜”学说相互阐明。能不能推导和阐明它的底蕴呢？汉高帝诏令陆贾写作《新语》，虽说是遵循仁义，效法先圣，然而所陈述的不过是秦朝及汉朝之间的事情。难道做学问就只能到这种程度吗？唐太宗对侍臣说：皇帝我所喜好的，只是唐尧、虞舜、周公、孔子的大道。他果真对这几位圣人所传授的精微要旨有所获取吗？其他如《帝范》、《帝学》、《心经》、《政经》以及《大宝》、《丹扆》等规戒的说法到底有没有值得采纳的呢？后世的君主，有的喜好黄老学说，有的崇尚文学写作，而他们治理天下不如古代，是不是由此造成的呢？

经学发源于汉朝，已经是十分久远了。《易经》的《上经》、《下经》、《十翼》，原本是十二篇，是谁最早把《彖》、《象》、《文言》掺杂编入《卦》中的？《尚书》由伏生传下来的有二十八篇。而由孔安国做解说的《尚书》，到晋朝时，才由梅赜上奏给朝廷。它果真可信吗？《诗经》散失的诗句散见在各种书中。有人说孔子删定《诗经》时，有些是整篇删去，有些是整句删去。还希望你们能详细加以考查。《春秋》三家

的义旨,到底是哪一家的好?杜预注释《左传》,果真就比服虔注释的更好吗?《礼记》是汉朝儒生汇编的,《中庸》是子思写的,《缁衣》是公孙尼子写的,唯独程子说《儒行》、《经解》并不是圣人的原话。这是否正确?《周官》出现较晚,它是否是后人伪造的?《仪礼》的注家很少,贾公彦的注疏是根据哪一家而作为定本的?《三礼》的学说已经很久不讲论了,能够说一说你们学习它的心得吗?

江、河、济、淮这四条河流中,黄河最难治。大禹疏通九河,其故道从汉朝时已经不能详尽查考了,只有许商在上书时说到了徒骇、胡苏、鬲津所在的地方。后世的地理书进行转述,一一列举了它们的名字。这真能作为依据吗?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听说黄河的危害,《唐书》所记载的,也只有薛平、萧仿这两件事。是不是由于《隋书》、《唐书》不记载河渠的事情,因此有许多缺漏呢?为什么不考察贾让的三策、王景的八渠等主张呢?宋人议论黄河的主张,如欧阳修、苏辙、任伯雨等各自的议论,果真都十分合理吗?潘季驯所说的用堤坝来约束水流、用水流来冲刷泥沙的办法,在治理黄河的所有办法中,果真是不可替代的吗?因为在治理黄河的同时,还要方便漕运,所以古往今来,议论纷纷。河运与海运,哪一个更方便?南流与北流,哪一个更适宜?请详细加以研究。

《周官》的六计,把"廉"作为根本,而有人把"廉"解释为"察"。哪一种意义更好?汉朝制度规定:刺史用六条来考察太守,年终时向上汇报,定出劣等和优等。而董仲舒的对策说:日子一长就能高升,时间一久就能升官。汉朝也是用了根据年资升迁的办法吗?魏明帝制定都官考课法,杜恕认为这只是一纸空文,晋朝的杜预也说不如去繁就简为好。这种说法对吗?唐朝考核官员按四种良好的品行,即"四善";又按具体职责的不同分出二十七种优等,把级差定为九等。宋朝因袭唐朝的四善,分为三等。对于它们的详略得失,请一一作出分析。宋朝初年对官员的考核,特意任命有名望的高级官员共同负责,不是只委托有关机构办理。这种办法果真是否可行?《汉书》说:综核名实,因此官吏都能称职。然而或许上面要求实效,但下面却只看重虚名。应该采取什么办法,使官吏都能真心实意地施政呢?质朴老实

的官吏大都能安定民众,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却或许不能倚仗;强健果断的官吏容易办好事情,然而他们的暴戾恣睢又或许会使民众遭殃。应该怎样使用和发挥他们的特长呢?举荐和弹劾的权力,不能不交给高级官员,但他们中间又不无借助这一权力来谋求私利的人。应该怎样来任用他们并要求他们施政有成效呢?

心法是主宰化导的核心,经术是培育人才的根本,加固堤防而民众居住安全,严加考核而吏治澄清,这些都是治理社会的重要法度和稳定国家的大计。各位贡士学习古训而进入仕途,讲求实用。请你们各自把平素所学到的东西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不要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陈冕　会试卷三道

陈冕(1858~1893)　字冠生,顺天宛平(今北京大兴)人。光绪九年(1883)状元。光绪十五年恩科乡试,以修撰任湖南考官。十九年暴病而死,时年35岁。其富有才识,然命乖时蹇,终生未迁一官。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知所不易知,治天下无难矣。夫禘本有天下者之事,知其说,则理达而情通矣。于治天下何有?且圣人以孝治天下,其爱存悫著者,敢谓合神人而一以贯之哉!顾冥漠有无穷之契,馨香直溯乎渊源。斯寰区皆锡类之征,观感遂通于呼吸。千古之孝子,即千古之圣人。一微会焉,愈叹解人之难索已。禘之说何以不知哉?诚以禘也者,固有天下者之事也,谁则知之!学士篇章涉猎,因议礼而聚讼偏多。说之纷,实知之浅也。我先王显庸创制,非实有尽孝尽仁之念,不足以测渊深。故经生之穿凿皆诬,而合漠通微,必神圣而始明其意。后人符命侈陈,信荒渺而明湮滥及。知愈诞,斯说愈歧也。古圣王返始穷原,非实有必诚必敬之思,不足以通幽隐。故胚胎比之灵承有自,而极天蟠地,惟明德而始达其馨。大哉禘乎!知其说者谁乎?吾乃穆然于天

下矣。

清庙骏奔,何关教化? 而生灵所托,皆祖宗之呵护所存。故事神即可临民,而长发征祥,遂卜式围之兆。神灵对越,何与观瞻? 而爱敬所推,即黎庶之性情所属。故庙中无殊境内,而省方设教,端在盥荐之初。微矣哉! 其说也,知之者其理无不明乎?大矣哉! 其说也,知之者其诚无不格乎?

且夫禘始于虞,而虞之天下何如也? 继世胄于轩辕,则宗彝告庙;绍前庥于颛顼,则藻火明虔。帝德精微,天下固窥寻无自耳。然而至诚可感,底豫既定人伦;来格非虚,德让遍征群后。在当日寅清典礼,岂谓仪隆五载,即可风动四方。而禋宗类帝所不能详者,惟知其说可以推行尽利也。今即古风已渺矣,而一念夔夔斋栗,孝思无穷,则六合非遥,不如在堂阶内乎? 且夫禘备于周,而周之天下何如也? 以高辛为始祖,而灌献输诚;以后稷为郊神,而埠坛同列。王心精一,天下固拟议无从耳。然而右飨懔《我将》,震叠旋赓《时迈》;相予昭肆祀,《载见》继咏求章。在当时於穆凝神,岂谓斋肃深宫,即可仪刑有辟。而《官礼》、《雎麟》所不能悉者,惟知其说可以包举靡遗也。今虽盛典久虚矣,而一思穆穆在天,精灵不隔,则八纮虽远,殆不啻咫尺间乎!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

若能知道不容易知道的事情,那治理天下也就不难了。"禘"这种祭礼原本是拥有天下的帝王的事情。若是知道了它的内容,那就能做到理达而情通了。这对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 况且圣人以孝治理天下,其富于爱心、以诚恳谨慎而著名者,可以说是神人相通、一以贯之的! 无边无际的幽冥之中有无穷的相合,祭品的馨香能直达祖先那里。这个世界全都是"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验证,感化作用就通向一切生物。千古的孝子,就是千古的圣人。只要稍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便会更加感叹:通晓事理的人太难寻找了! 孔子为什么说他不知道禘礼的内容呢? 这确实是因为他认为禘礼是拥有天下的帝王的事情,谁又犯得着去了解它呢! 学士们涉猎篇章文句,因讨论礼仪而产生了许多争议。议论纷纷,其实是知道得太少。我们的先王

开创功业，创立制度，要是没有真诚的尽孝尽仁的思想，那是不能揣测其高深的。所以，那些专门研究经典的学士的穿凿附会都是骗人的。而要与幽冥世界相合，互相感通，就必须得达到神圣的境界后才能明白其意思。后人胡言乱语符命，伸张荒诞虚渺的东西而随便就往祭礼上套。了解得越是荒诞，而那些荒诞的学说却反而越争论分歧越大。古代圣王返始穷原，如果不确实具备必诚必敬的思想，那就不足以与幽冥世界相通。因此，神灵的感应是有先决条件的。上达天、下到地，只有完美的德性才能将淳美馨香远远传送到祖先那里。盛大呀！禘礼。能知道其内容的，有谁呀？我不由对天地肃然起敬了。

《诗经·清庙》所说的忙于宗庙的祭祀，又与天下教化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天下所寄养的生灵，都是由于祖宗的呵护而存在的。因此，祭祀神明便可以统治民众。而正如《诗经·长发》所说：祖宗长远地显示祥瑞，子孙才会有统治九州的好兆头。与神灵相沟通，又与引导民众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只要爱敬的观念被推广，便能感化和凝聚百姓之心。因此在宗庙之中与所统辖的国境没有差异。而《周易·观卦》所说的视察四方、以神道设教，其发端就在“盥”与“荐”这两种祭祀举动的开始之时。精微呀！知道了禘礼内容的人，没有不精通道理的；伟大呀！知道了禘礼内容的人，其诚心没有不感动上天的。

禘礼始于虞舜，而虞舜的天下怎么样？他继承轩辕高贵的传统，于是在宗庙用“宗彝”这种圣洁的酒器祭祀轩辕；他发扬颛顼从前的美德，于是用“藻火”这种神圣的图像表示虔诚。虞帝的德行十分精微，天下确实无从窥探出来了。然而他的至诚之心确实令人感动。他使想暗害他的父亲和兄弟改恶从善，与他和睦相处。上天保佑他也并非虚假，谦逊的道德使各国诸侯都听从于他的征召，前来拜谒。他当时所举行的祭祀典礼只是清洁而恭敬，哪里是认为仪式隆重而五年一视察天下便四方闻风响应！而他烧柴升烟以祭祀上天和祖宗的仪式，我们已经不能了解了。但只要知道它的理论，就可以推行并且得到最大的好处。如今，尽管古风已经飘渺茫然，但我们一想到大舜的庄严肃穆，孝思无穷无尽，就感到苍天的尽头并不远，不就如在房间内吗？况且禘礼在周代臻于完备，而周代的天下又怎么样呢？周代

以高辛为始祖，于是便用酌酒浇地的“灌”和奉献供品的“献”这两种祭祀仪式表达诚心；周代以后稷为郊祭之神，于是便在七庙之外，又同时修建了埠场和祭坛，以祭祀后稷。周王之心已经达到精粹淳一的境界，天下确实已经再也不能设计出比这更好的祭祀仪式了。然而祭享文王请他保佑而对《我将》诗所述保持警惕，灭商以后又迅即接续上《时迈》诗。帮我陈列好祭品，《载见》诗继而又咏赞诸侯求取王室的典章。在当时庄严肃穆，凝聚起神气，哪里是认为在深宫斋戒端庄，就能给百官树立起榜样！而《周礼》、《关雎》和《麟之趾》诗，我们尽管不能完全明了，但只要知道它的理论，就能包举无遗。如今，尽管古代的盛典已经很久不能讲求了，但我们一想到祖先远在天庭上，精灵并不间隔，就感到大地的极限虽然遥远，不也就像在咫尺之内吗？正如孔子所说：了解禘礼内容的人，对于治理天下而言，就如同把天下放到了自己的手心里观看一样。

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终言至圣之智德，更见其能别矣。夫文理密察，智德也，至圣能之。以云有别，奚不足哉！且一人作哲，而天下仰神灵焉。此岂寻常智量哉！其识见超天下之表，而物莫能淆；其心思入天下之中，而物莫能蔽。灿然有章也，厘然各当也；浑然无间，亦皎然常明也。非天下之大智，孰能与于斯？有容、有执、有敬，未足尽至圣也。更即其有别者观之：操驭世之大权，天下例有如神之颂。而特恐天人未贯，简陋贻讥；经画未明，纷更是尚；甚且节目疏阔，遇事而不致精详。则智之所存者隘也。首庶物而作睹，至圣讵矜坐照之神？而即此盛德光辉，积中发外；显庸创制，缕析条分；亦且思虑周详，揆几而不疲屡照。则智之所运者宏也。

不见其文乎？萃群言之精，浑融方寸；包众艺之有，不名一长。蕴之为文思，发之为文明也，而四表同钦光被已。不见其理乎？端绪不纷，有经而有纬；纪纲不紊，彻始而彻终。物理罔弗明，伦理罔弗叙也，而四海咸颂清和已。至若无罅可指，无隙可乘，则至圣之密也。密

以基命,夙夜不敢康;密以洗心,退藏无或懈。非必秘密不显也,而神以静而愈凝已。又若无微弗著,无隐弗彰,则至圣之察也。察乎上下,化无不成;察乎往来,数莫能遁。非必伺察为明也,而识以精而毕贯已。以云有别,奚不足哉!

主术之多疏也,好词章而文多粉饰,谈性命而理涉虚无,严法网而密近纷繁,尚苛求而察邻逆亿。私意自矜,鉴别其奚当哉! 至圣则本于公焉。文章综百代,元后实大儒之宗;理道备一身,圣德见多材之妙。况乎慎密自矢,大度不忘小心;省察维严,一事不辞百虑。任物情之蕃变,别以智而不事推求。其得于天者粹也,如鉴取影,如水取形,以是为智德之固有而已矣。至诣之难兼也,非理而文近浮华,非文而理虞固窒,非察而密形汶暗,非密而察患粗疏。偏端自囿,区别其能周哉! 至圣则有其全焉。成章者经纶毕贯,有文而理自可该;不紊者华实相宣,有理而文无不焕。况乎明察不爽,宥密且自单心;缜密为怀,好察不遗在迩。任物态之纷乘,别以智而不形亏歉。其备于躬者纯也,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以是为智德之各足而已矣。非至圣,其孰能之?

这句话归结了大圣人的智慧和德行,更表现出了它能不同于一般。文采条理详密明辨,都是智慧和德行的体现,大圣人才能够具备。说这不同于一般,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况且,一个人成为了圣哲,那天下就都会仰慕他的神圣。这难道是寻常的智慧吗! 他的见识超出了世界的表层,外在事物没有能混淆的;他的思想深入到了世界的内部,外在事物没有能遮蔽的。明明白白、有条有理,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浑然一体,也常常皎洁明亮。如果不是天下的最大智慧,谁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呢? 有宽容、有执着、有诚敬,还不能完全达到大圣人的境界。再从他那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来观察他:掌握着驾驭天下的大权,天下照例会对他有像神明一样的赞颂。然而,只恐怕天与人还没有沟通,简单鄙陋会给后人留下讥讽;规划还没有明确,却喜欢乱变乱改;甚至在重要问题上考虑不周密,遇到事情的时候而达不到精详的程度。这就表明智慧的存在是十分狭隘的了。天生圣人

而万物瞩目，大圣人哪能凭借那种端坐不动便能够查照神机而自负呢？而是借用这种盛德的光辉，在内心中积聚、在外面发挥出来；建立功业、创立制度，都是有条有理、细致规划；而且思虑也很周详，辨明事机变化而且毫不厌倦地经常查照。这就表明智慧的运用是十分宏大的了。

难道看不到大圣人的文采吗？它荟萃各种言论的精华，在心中融为一体；包罗众多才艺的长处，不拘泥于任何一项专长。蕴藏在心中就是美好的道德，发挥出来就是完美的制度，从而天下都同时被他的光辉照耀。难道看不到大圣人的条理吗？它头绪不纷乱，经纬分明；纪纲不紊乱，彻始彻终；事物的道理没有不明晰的，伦理没有不井井有条的，从而使四海都一齐称颂国家欣欣向荣。至于达到了无懈可击和无隙可乘的地步，那就是大圣人的详密。用详密来承膺天命，日夜不敢松懈安逸；用详密来洗刷心灵，即便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毫不放松　这并非是必定要隐藏自己的详密而不显露，而是精神要宁静才能更加集中。至于又达到了没有什么细微的东西不能够让它放大出来、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不能够让它显现出来的境地，那就是大圣人的明辨。能够明辨上层和下层人物，教化就没有不能成功的；能够明辨古往今来，气数就没有能够消遁的。这并非是必定要靠找机会明辨来达到明察秋毫，而是见识要精才能贯穿始终。因此说这不同于一般，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君主的措施有许多的疏漏，喜好词章而文采却有许多的粉饰，谈论“性命”而道理却十分空洞，严密法网而严密得却近似纷繁，崇尚苛求而观察旁人事先就凭空猜想别人欺诈。对个人的想法很自负，鉴别哪能恰当呢！大圣人则本着公心。文章综合百代，天子实际上是大儒的宗主；理道具备在一个人的身上，圣明的德行呈现出了多种才能的精妙。更何况自己立志慎密，大度不忘小心；反省自己、洞察别人都十分严格，即便是一件事情，也不辞辛劳、反复考虑。不管外在情况有多么复杂的变化，他都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加以判别而不去一步步地推求。他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东西，是十分精粹的；就像镜子能照见影像，就像清水能照见形像一样，把这作为智慧和德行所完全固有

的。最高的造诣是很难同时具备的，然而要是没有条理，那文采就会近似浮华；要是没有文采，那条理就会陷于僵死；要是没有明辨，那详密就会显得昏暗；要是没有详密，那明辨就会陷于粗疏。偏重某一个方面而自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区别又怎能周全呢！大圣人则十分全面。形成系统，纵横都能够贯通，有文采而条理自然就能够具备；有条不紊，名实相符，有条理而文采就没有不光彩照人的。更何况明察秋毫而没有差错，用心十分严谨；心中装着缜密，即便是对于自己身边最近的人和事都要进行仔细观察。不管外在形态是怎样的杂乱，都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加以判别而不会表现出缺陷。他具备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是十分纯粹的；想要把它澄清，它也不会清澈；想要把它混淆，它也不会浑浊，把这作为智慧和德行各方面所都具备的。要不是大圣人，谁又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

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溯《春秋》之旧事与文，均无关王迹也。夫桓、文之事岂尽善？史之文岂足凭？《春秋》始作，亦与晋楚等耳，于王迹奚关哉！且自周京不振，权逮侯邦；柱下已衰，书存宗国。此已有心人所深慨矣。然使考其迹，无非善政；纪其实，不尚浮词。后之人抚古流连，犹可藉一二端之留贻，作千百年之矩矱。乃会盟搂伐，只便私图；纪月编年，徒循成例。则霸功是尚而故事相将，夫又何足重轻耶？鲁之《春秋》，其始何以与晋楚同哉？吾盖慨然于其事其文矣。

生不逢丕显丕承之世，而惟以富强之霸业夸耀寰区。其名虽隆，其德实丑也。所以列邦来告，亦自知僭妄之非，而托于一代英雄，秉笔者竟侈陈之以为快。素不察书方书策之由，而惟以征聘之虚文辉煌简毕。其词虽富，其绪实繁也。所以盟府空存，并不关起居之注，而但凭四方赴告，抱简者已裒辑之以成书。其事若何？则齐桓、晋文也。九合而争息兵车，一战而威行曹卫。此事之大者，不无可采也。然拜胙已形骄色，请隧更肆贪心。侯度不修，何以继鱼藻裳华之盛？其文若何？则史也。因贿而任情颠倒，挟私而藉快恩仇。此史之秽者，犹

不至此也。然操笔既愧董狐,考古又惭苏籀。繁言无当,转不如辖轩太史之陈。

假使明良际遇,西京陈《王会》之图,则桓、文翊赞天家,史臣铺扬大烈。千载下闻风兴慕,岂复生感喟之思?而无如盛会难逢也。四十年雄长中原,不务德而勤远略;十九年备尝险阻,不由正而逞谲谋。似此功烈之卑,直笔何妨痛斥!而大书特书者,方且以霸图可慕,为当代留信史之名。则事既不足称,文又何必论也?车攻马同,于今不作;闷宫泮水,杳矣难追。《春秋》虽存,夫何关周宗之兴替哉!然使兵燹凋残,东国少遗书之考,则桓、文以无征而不信,史册亦绝笔而不传。百世后望古兴怀,何以作纂修之证?而犹幸旧迹未湮也。读《木瓜》而思仲父,知召陵之纪录非虚;过渭阳而忆秦甥,知践土之功勋可赏。当其声称丕著,殊俗难必流传;而记动记言者,犹得以据事直书,为他日备征文之目。则事固不必尽美,文要不可不存也。《卢令》、《蟋蟀》,如听歌谣。"夏五"、"郭公",足资参订。《春秋》无恙,岂仅供一代之称扬哉!我孔子得而正之矣。

追溯《春秋》的旧事与文字,都与天子的事迹无关。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哪能是最好的?史书的文字怎能完全作为凭证?《春秋》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只不过与晋国、楚国的史书相等,与天子的事迹哪有什么关系呵!况且,自从周朝中央朝廷不能振作后,它的权力只能相当于诸侯国了;史官制度已经衰败,书籍都转存到了诸侯国。这已经是有心人所深深感慨的了。然而,假使考察当时的事迹,那可以说都是好的政治举措;史书记载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崇尚虚浮的词藻。后来人追溯古代而依恋不舍,还可以凭借保留下来的一两件事情,来作为千百年不变的规矩。然而,在霸主举行会盟、拉拢一方诸侯去讨伐另一方诸侯后,史书记载就只是为了个人的目的了;因而纪月编年,也只不过是遵循现成的体例。这样一来,就只是崇尚霸业和功业,故事接着故事,又怎么能够评判历史呢?鲁国的《春秋》,在它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只是与晋国、楚国的史书相同呢?我于是对它记载的事情和文字不由发出了慨叹。

出生时没有遇上天人交应的时代，当时只是用富强的霸业来夸耀天下。霸主的名声虽然大，但他们的道德其实是很丑恶的。所以各个邦国来报告时，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僭妄的错误，从而就依托于一代英雄。编写史书的人竟然把夸张地记述这些事情当成快乐。从来就不考察为天子写方版、写简策的原由，而只用征召诸侯和诸侯之间往来的空洞文字，十分堂皇地写进史书。文词虽然丰富，但头绪实际上却很繁杂。所以负责保存文件的机构只是一个空架子，并不涉及天子日常生活的记载，只凭借四方来的讣告，编写史书的人就已经编辑成书了。《春秋》记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九次会盟而平息了战争，一次战役而威震曹国和卫国。这是事情中的大事件，不是不能记载的。然而，齐桓公在拜谢天子赐给的宗庙祭祀用肉时就已经表现出了骄傲的神色，晋文公在请求死后能用隧道下葬时贪心增长得更加厉害。诸侯没有诸侯的修养，怎么能够继承《诗经·鱼藻》和《棠棠者华》中所描述的那种西周时的繁盛局面呢？《春秋》的文字是什么？就是史官的惯用笔法。因为受贿而随意颠倒是非，怀着私心而借以报恩和发泄仇恨。这种史官污秽的行为，《春秋》还不至于这样。然而，它行文既有愧于董狐，考古又愧对苏籀；语言繁杂不当，反不如采风使者和太史的当面陈奏。

假如贤明的君主和优秀的臣子恰好相逢在一起，在西周的镐京展现出了一派《逸周书·王会》所描述的周公在洛邑大会诸侯的景象；齐桓公和晋文公能够辅佐周天子，史官能够宣扬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在千年以后，人们闻风都会感到羡慕，哪还能再萌生出喟然长叹的念头呢？然而，无奈这种盛会是很难遇到的。齐桓公在四十年中称雄中原、成为霸主，但他却不追求道德修养而勤于向远方进行征伐；晋文公在流亡的十九年尝尽了艰难险阻，但他不走正道却玩弄狡诈的伎俩。像这种建立功勋的卑劣，即便是直笔痛斥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撰写的人却大书特书，正以为称霸天下的宏图值得羡慕，要为当时留下一部可信历史的名称。但是记载的事情既然不足以称道，那又何必再论说它的文字呢？《诗经·车攻》中所描述的那种车马整齐、军力强盛的景象，在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诗经·闷宫》和《泮

水》中所描述的那种文质彬彬的景象，已经渺茫难以追缅了。《春秋》虽然存在，那又与周朝的兴衰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假如经过战火摧残破坏，东周缺少遗留下来的书籍供人们参考，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会因为没有记载而使人们不相信他们的存在，史册也会由于没有人写而得不到流传。在漫长的年代之后，人们遥望古代而兴起感想的时候，又用什么来作为纂修历史的证据呢？于是庆幸旧迹还没有被湮没。读《诗经·木瓜》时就会想起管仲，知道齐国和楚国在召陵会盟的纪录不是假的；路过渭阳，就会回忆起晋文公那秦国的外甥，知道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功勋也有值得奖赏的地方。当齐桓公、晋文公声名显赫时，他们的事迹在边远地区肯定是难以流传的；而记录行为和记录谈话的史官，却仍然还可以根据事实真实记录，为他日预备好引用文字的条目。由此可见，事情固然不必尽善尽美，但文字概要却不能不保存。《诗经·卢令》和《蟋蟀》，就像让人听歌谣一样。《春秋》中的"夏五"和"郭公"这些缺残的文字，完全能够帮助人们参订史料。《春秋》没有问题，哪能只是供一个时代来称颂赞扬呢！我们的孔子因此而修正了它。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汉廷射策，萧望之以儒宗显，兒宽以经学称。平当以明《禹贡》，任使行河；召信臣以有方略，终为循吏。稽古匡时，固先务之急也。自后世性理之学、训故之文、河渠之书、铨叙之法，皆淆杂而失其真。承大对者欲科别其条，茂明其说，亦綦难矣。管子曰：先王之书，心之敬执。庄子曰：六经，先王之陈迹。荀子曰：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晏子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帝者抱蜀于上，儒者讲德于下。斯王道正而百川理，天工亮而庶绩熙，一以贯之矣。

钦惟皇帝陛下，亲师重道，明目达聪。近年以来，中外大小臣工，剴切陈言者，累牍而进。固已嘉言孔彰，政治厘然毕举矣。犹复临轩试士，备切咨询，举懋学、传经、宣防、察吏诸大端，策臣等于廷，而冀收壤流之一助。臣庸才占毕，讵识谟猷？顾自幼学以来，凡典籍所纪

绥猷之本、稽古之功，与夫安民知人之要，亦稍留意于其间。遭兹言路广开，敢不竟其辞指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法肇于唐虞，因欲考帝王学术之真。诚性功之首务也。臣案《尧典》、《舜典》之分，始伪孔安国传，"曰若"以下二十八字，姚方兴称得之大舜头。《书》固难尽信哉！《禹谟》危、微二语，据《荀子》引《道经》，而小异其词。《汤诰》言恒性，不见于《史记》之真古文。《兑命》典学一语，据《文王世子》及《学记》，伪迹显然。后儒乃谓为言心、言性、言学之原，盖未深考尔。《易》之《坤卦》，阳息在二，乾为直、为敬，坤为方、为义。《丹书》者，古策府遗典，曰敬、曰义。其知《易》乎？故王应麟谓孔子训《丹书》于《文言》也。三代以下，汉之高祖、唐之太宗，皆以武拨乱，以仁胜残。陆贾所陈《新语》，今所传非原书。然王充、李善所引，固皆儒家言。胡宏、真德秀乃谓所言不过秦汉事，过已。太宗学优于高祖，所作《帝范》，犹见仪刑。宋范祖禹侍哲宗经筵，论人主今日之学，系天下他日治乱。史称其开陈治道，虽贾谊、陆贽不能过。观所进《帝学》，简明剴切，惜哲宗不尽用之。《心经》、《政经》，则不免依托。至《大宝》、《丹扆》诸箴，其言固多精要可采者。皇上冲龄讲学，蒙养克端，征信于古，尤赖左右之陈善闭邪也。

制策又以经学导源于汉，因备考夫条流。臣案言《易》者以《十翼》释《经》，始费直；以《彖》、《象》合《经》，高贵乡公谓始康成。朱子《本义》用吕祖谦古本，明永乐修《大全》割附《程传》，篇第又淆。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迁、固云二十九篇，其一篇，百篇序也。今非惟伪古文不足信，今文亦唐卫包所改定者。《九夏》、《新宫》，其词已佚；《狸首》犹见《考工记》、《射义》、《大戴记》中。《论语》、《左传》、《孟子》、《国语》、周秦诸子、《史》、《汉》诸书间存章句，皆逸《诗》也。左氏身为国史，依《经》作《传》；公羊高受学子夏，谷梁赤后于二家。三家于《春秋》，互有短长，而左氏、公羊为信。注《左传》者，贾逵、服虔先于杜预。贾、服书既散佚，杜且不当深规，而孔颖达伸杜以攻贾、服，则更惑矣。马融、卢植传戴圣《礼记》四十九篇。康成谓：《中庸》，子思作。刘瓛谓：《缁衣》，公孙尼子作。如《王制》则汉博士作，《月令》采《吕氏春秋》，不独《儒行》、《经解》为可疑也。《周官》多春秋后窜改，

亦非周公本书。《仪礼》则王肃、沈重之注不存，贾公彦作疏，第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疏为本尔。朝廷文教蔚兴，承学之士得以研精六籍，可不实事求是哉！

制策又以四渎之水，河最难治，因欲求九河故道，以追禹绩之隆。臣案齐桓公填阙八河自广，周定王时河东徙，故道遂失。汉王横谓九河沦海，然许商上书，言徒骇、胡苏、鬲津，在成平、东光、鬲县界中，徒骇最北，鬲津最南。《尔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所在，则知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北，简、絜、钩盘在东光南。后世地志所列，据此可证。河自汉末逮唐初，出东昌东、济南西，顺轨几千年，故鲜议及者。《唐书》治河，仅薛平、萧仿，而决溢屡书。景福中，徙武定、厌次，为千乘改流之始。不志河渠，史之缺略也。宋代商胡决口，贾昌朝主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欧阳修独以顺水治堤无大利大害。苏轼尝缴进其说，苏辙则请罢回河之役，任伯雨则请宽立堤限，皆为国惜劳费也。明潘季驯刷沙之法，本汉张戎，其说则《考工记》善沟善防之意。治河古称贾让三策，而近人多谓难行。王景八渠功效，远已。今言河者必及运。有海运，何烦河运？必借黄济运，久之河病而运亦病，岂长策哉？且河入济渎已二十九年，利津海口淤狭，决近畿辅。此时归故道，水不能逆其性；筑遥堤，民不忍弃其居。计不获已，惟仍浚海口以治下游，修旧堤以防盛涨而已。我皇上轸念民瘼，近简员往察河势，固山东之民所同企望者也。

制策又以六计弊吏，始于《周官》，而因求激浊扬清之道。臣案郑康成言六计，以廉为本，王安石训廉为察，不如贾公彦疏"洁不滥浊"之说足风有位。汉之六条问事，见汉官典职，亦惩牟利通货，犹有《周官》遗意。董仲舒谓累日取贵，积久致官，贤、不肖浑淆。其意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举贤能，而病选吏者以富赀，不但为年劳之弊也。魏杜恕议考课之制，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文具无益。晋杜预为黜陟之课，委任达官，稍去密而就简。唐代考课掌于吏部。宋因唐法分四善为三等，又命清望之官，如王沔、谢泌者典之，盖重其事矣。夫循吏莫著于汉，莫多于宣帝时，非综核名实之效哉！今之察计，法美意良。然内而长官囿于积习，京察已等具文；外而疆臣狃于偏私，计典亦成故

事。致使人才进退,不本公忠,不采舆论。彰瘅之风声不树,举人不必能其官。我皇上超擢贤能,严惩贪墨,将欲澄叙官方。中外大臣尚当以实心行实政,上辅日月之明。为治不在多言,大法则小廉也。

抑臣观《宋史·道学》之传,特取别夫《儒林》;《汉书·沟洫》之功,不以参于《循吏》。流派未可以偏废,智能固各有专长也。伏愿皇上,烛照万理,斟酌群言,于兼听并纳之中,考设官分职之意。师傅因论道而尊,必求正学也;侍从本经术以进,必取端人也。水工之官,必规久远,勿惜小费也;铨曹之政,务使清通,勿抑真才也。如此则谠言益进,万几咸理,人奏所能,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在汉代朝廷的策试中,萧望之凭借儒学宗师的地位而显贵,兒宽凭借经学的功底而著称,平当因通晓《禹贡》而担任特使巡行黄河,召信臣因有方法和谋略而最终成为了优秀的官吏。稽考古训而匡教当时,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在后世所出现的"性理"学说、解释典故的文字、记载河渠的书籍、升降官员的办法,统统都是混杂而失真的。接受重大对策的人想要辨析其条目,阐明其学说,也实在是太难了。管子说:先王的书,就是保持心的恭敬。庄子说:六部经书,都是先王的陈迹。荀子说:疏导泛滥的水流,加固蓄水的设施,按时加以排放和关闭。晏子说:选举贤人来治理国家,任命能人来管理民众。帝王在上面抱持祠器做监控,儒士在下面宣讲道德。这样就能使王道纯正,百川得到治理,辅助天工而事业振兴,用一个原则把它们贯穿起来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敬重老师、重视道德;看得明、听得清。近年以来,中外大小臣于,切实中肯地陈述意见的,一个接着一个。本来就美好的言论已经张扬,政治已经完美了。但陛下还是再一次到前殿来策试贡士,十分殷切地进行咨询,举出学问的提高、经学的传授、整修水利、考察官吏等大问题,在朝廷上策试臣下等人,而期望收到一粒尘土和一滴水点对高山和大海的补益。臣下我十分平庸,只会背诵经书,怎能懂得宏图大计?然而,自幼年读书以来,凡典

籍所记载的治理天下的原则、研究古代的经验，以及安抚民众、识别人才的办法，臣下我也稍稍有一些注意。遇到这广开言路的时候，怎敢不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说出来呢！

恭敬地阅读制策，制策说：统治法规起源于唐尧和虞舜，从而想要考察帝王学术的真谛。这确实是研究“性理”学说的首要事情。臣下我细致查考，《尧典》、《舜典》的分离，是从伪造的孔安国做解说的《尚书》开始的；从“曰若稽古”以下的二十八个字，姚方兴声称是他从大舫舟上得来的。《尚书》确实是难以完全相信的呵！《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两句话，据《荀子》所引的《道经》而来，只是词句稍稍有不同。《汤诰》所说的“恒性”，在《史记》的真古文上看不到。《兑命》“典学”这一句话，据《文王世子》及《学记》看，伪造的痕迹显而易见。后来的儒生却说这是论述“心”、论述“性”、论述“学”的本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考察罢了。《周易》的《坤卦》当阳气在倒数第二阴爻上滋生时，乾为“直”、为“敬”，坤为“方”、为“义”。《丹书》是古策府遗留下来的典籍；它也说“敬”、说“义”。它难道知道《周易》吗？所以，王应麟说孔子在《文言》中解释《丹书》。三代以下，汉朝的高祖、唐朝的太宗，都是用武力平定纷乱、用仁慈战胜凶残的。陆贾所陈述的《新语》，现今所流传的并不是原书。然而王充、李善所引用的，确实都是儒家的言论。胡宏、真德秀却说《新语》所说的不过是秦朝和汉朝的事情，这太过分了。唐太宗的学问比汉高祖要好，他所作的《帝范》，如今还能见到规范。宋朝范祖禹为宋哲宗讲解经书，论说君主今日的学问，关系到天下他日的治乱兴衰。历史上称他开创讲述政治的方法，即便是贾谊、陆贽，也不能超过他。观看他所进呈的《帝学》，简明而忠恳切实，但可惜宋哲宗不能完全采用它。《心经》和《政经》，则不免有依托其他的书籍的地方。至于《大宝》和《丹扆》等箴言，它们的言论确实有许多精要可取的地方。皇上幼年就讲学，能够蒙昧而自养正道，考核证实古代的事情，尤其要依赖身边的人陈述好的、不讲坏的。

制策又认为经学发源于汉朝，因而想要详细考察它的分支演变。臣下我查考，说《周易》的人用《十翼》来解释《经》，是从费直开始

的;把《彖》和《象》合并到《经》中，高贵乡公说是从郑康成开始的。朱子《本义》用的是吕祖谦的古本,明朝永乐年间编修《大全》时把它割附到《程传》上,篇目次第又混乱了。伏生的《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司马迁、班固说有二十九篇,其中一篇是《百篇序》。如今不但《伪古文尚书》不可信,《今文尚书》也是唐朝卫包所改定的。《九夏》和《新宫》的词句已经佚失;《狸首》还可以在《考工记》、《射义》、《大戴记》中看到。《论语》、《左传》、《孟子》、《国语》、周秦诸子、《史记》、《汉书》等书中所保存的游离章句,都是《诗经》散失的诗篇。左丘明身为国史编撰者,依据《春秋经》作《传》;公羊高的学问是子夏传授的,谷梁赤比这两家还晚一些;三家对《春秋》的解说,各有短长,而左氏、公羊为可信。注释《左传》的人,贾逵、服虔在杜预之前。贾逵和服虔的书既然已经散佚,杜预尚且不能完整阅读,而孔颖达拔高杜预来攻击贾逵和服虔,就更令人不解了。马融、卢植为戴圣的《礼记》四十九篇作了解说。郑康成说:《中庸》是子思写的。刘瑒说:《缁衣》是公孙尼子写的。再如《王制》是汉朝的博士所作,《月令》则是采自《吕氏春秋》。不只是《儒行》、《经解》是可疑的,连《周官》多半也是春秋以后窜改的,并不是周公的原书。《仪礼》一书,因为王肃和沈重的注解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贾公彦写的注疏,只是依据北齐的黄庆、隋朝的李孟悆的注疏作为原本罢了。朝廷的文化教育蔚然兴起，研究学问的人得以深入钻研六经,能不实事求是吗!

制策又认为江、河、济、淮这四条河流中,黄河最难治,因而想要寻求九河的故道,以追寻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臣下我查考,齐桓公填平了八条河来自我扩张国土,到周定王时,黄河东移,故道于是消失了。汉朝的王横说九河已经是沧海桑田、无法寻觅了,然而,许商上书却说徒骇、胡苏、鬲津,在成平、东光、鬲县境内;徒骇最北,鬲津最南。《尔雅》上九河的次序，自北而南。既然知道了以上三河的所在,那就能知道太史、马颊、覆釜这三河在东光北,简河、絜河、钩盘这三河在东光南。后世地理书上的列举,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黄河自汉朝末年到唐朝初年,由东昌东、济南西入海,安然流淌将近千年,所以很少有提到它的。《唐书》记载治河,仅仅提到薛平、萧仿,而黄

河决口泛滥却屡屡有记载。景福年间，黄河在武定、厌次改道，这是千乘改流的开始。不立《河渠志》，是史书的缺略。宋代黄河在商胡决口，贾昌朝主张让黄河回到故道，李仲昌请求开凿六塔河，只有欧阳修认为顺流修建河堤没有大利大害。苏轼曾经将欧阳修的意见重新誊写后再次上奏皇帝，苏辙则请求中止把黄河引回故道的工程，任伯雨则请求宽立堤坝以扩大黄河河床，他们都是为国家爱惜劳动力和费用。明朝潘季驯的冲刷黄河泥沙的办法，是遵循汉朝张戎的办法。其指导思想就是《考工记》的善于疏浚、善于防治的意思。古代称赞贾让的三策是治理黄河的好方法，然而近代的人却多说难以施行。王景八渠的功效，已经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如今提到治理黄河的人必定要说到漕运。既然有了海运，那又何必要劳烦河运呢？河运必定要借用黄河水来提高运河的运输能力，长久下去，黄河出了问题，运河也就会出问题，这哪是长远的方法呢？况且黄河入济河已经二十九年了，利津的海口已经淤塞狭窄，黄河决口泛滥已经快要接近畿辅了。在这个时候想要让黄河水回归故道，但河水却不能违背它从高到低的本性；修筑长长的大堤，但民众又不忍心放弃自己的家园。实在不能不想办法治河，只能是仍旧疏浚黄河出海口以治理下游，维修旧堤以防河水猛涨罢了。我皇上挂念民众的痛苦，最近派出人员前往视察黄河的形势，这确实是山东的民众共同盼望的事情。

制策又认为用“六计”来考核官吏是从《周官》开始的，因而想寻求激浊扬清的方法。臣下我查考，郑康成说“六计”以“廉”为根本，王安石把“廉”解释为“察”，不如贾公彦把它解释为“洁不滥浊”的说法更能讽劝做官的人。汉朝刺史用“六条”来监察州郡，从汉官的典制书中可以看到，目的也是惩处经商牟利的官员，还保留有《周官》的意思。董仲舒说：日子一长就能高升，时间一久就能升官，贤能与不贤能就混淆了。他的用意是想让列侯、郡守、二千石举荐贤能，但又担心被选举的人凭借财富买官，这样一来，那就不只是按年劳升迁的弊病了。魏国的杜恕评论考核官员的制度，认为如果用人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那么，即便有制度摆在那里也是没有用的。晋朝的社预制订对官吏升降的考核标准，委任高级官员执掌，稍稍删繁就

简。唐代对官吏的考核由吏部掌管，宋朝因袭唐朝的方法把“四善”分为三等，又任命有声望的高级官员，如王沔、谢泌之类的人执掌。这是因为要加重这种事情的分量。优秀官员没有比汉朝更能引人注目的，也没有比汉宣帝时期更多的。这难道不是综核名实的效果吗！如今考核的办法，可以说是法美意良，然而在朝廷内，长官局限于旧习惯，京察制度已经等于一纸空文；在朝廷外，各省长官的偏见和偏袒成风，考核制度也失去了作用。致使提拔人才和黜退不肖时，不能本着公心和忠心，不能采用舆论。彰善瘅恶的风气不能树立，那他们推举的人必然就不能做好官。我皇上破格提拔贤能，严厉惩处贪污，想要整顿好吏治。朝廷内外的大臣还应当用真心实意来办好实事，以辅助皇上的辉煌政治。治理天下不在于话多，大臣守法，小官自然就廉洁了。

不过臣下我观看《宋史》，《道学传》特意与《儒林传》区别开来；《汉书》的《沟洫志》的功效，不混同于《循吏传》。经学流派不可以偏废，人的智能确实是各有专长。臣下我恭敬地祝愿皇上，洞照万种事理，斟酌众人的言论，在兼听并纳之中，考察设官分职的用意。太师太傅因论说道理而受到尊敬，所以必定要求他们有纯正的学问；侍从官是凭借经学学问而受到提升，所以必定要选取正人君子。对于掌管水利的官员，一定要让他们从长远考虑，不要吝惜小的费用；对于掌管官吏升降的政务，务必要使它清廉通达，不要压抑真正有才能的人。这样就会越来越多地听到正直的言论，所有政务都能得到圆满的处理，人人都会奉献出自己的才能，而我们国家亿万年美好长久的历史，就从此奠基了。臣下我属于学识肤浅、刚要被进用的人，不懂得忌讳，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倩描　王大奇译〕

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中庸不可能也。

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殿试策问

[光绪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于今十有二年矣。仰赖皇太后教育之勤,庶政协和,四方安谧。朕朝夕典学,惟日孜孜。求之于经史,以探治乱之原;求之于军旅,以资控驭之略;求之于地形,以知险易之要;求之于圜法,以准轻重之宜。尔多士自田间来,学于古训,究心当世,兹当临轩发策,其敬听朕言。

帝王诚正之学,格致为先。若《帝范》,若《群书治要》,若《帝学》,能言其精义欤?《贞观政要》、《太平御览》撰者何人?魏征《谏录》、《续录》,果有裨于治欤?此外若《政府奏议》,若《尽言集》,若《历代名臣奏议》,孰为优劣欤?真德秀《大学衍义》,何以缺治平,果有待于邱浚之补欤?夏良胜《中庸衍义》,与德秀书同体例欤?司马光《资治通鉴》,为治忽之渊林。能举其要旨欤?为《释文》,为《音注》,为《释文辨误》,为《地理通释》者何人?为《外纪》者又何人?李焘、刘时举等所续,足继原书之精博欤?

用兵之法,贵乎因地制宜,舟师其尤要也。《左氏传》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实为水军之始。其后楚获吴舟艘艎,则又舟名之最著者。或

谓公输般之钩拒，乃战舟之始。然欤？汉时命朱买臣治楼船，元鼎五年，又诏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往讨吕嘉。其时有伏波将军、楼船将军之号，其船曰戈船，曰下濑，曰横海。命名之义，果何所在？其习水战，当在何地？晋武帝时，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舫，能受士卒几何人？其飞云舟、仓隼船，相去若干步，见于何书？隋文帝命杨素造战舰，其舰何名，其高何若？唐时击萧铣，所用战舰，能举其数欤？宋时福、兴、泉、漳，各有鈒鱼船可修整以备海道。奏陈者何人，当在何年？绍兴时，有飞虎战舰，旁设四轮。其制如何？铁可以为船，晋唐以前见于何书？又有皮船，始于何人？明戚继光亦用之，一船可乘几人，能详之欤？

在昔虞廷致治，振旅三苗；周道方兴，劳师獯鬻。边防之事，自古为昭。但齐称攘狄，《左氏》兼美乎和戎；汉重犁庭，扬雄反抑为中策。凡斯张弛，何说为长？且七雄竞爽，资骑牧以绥边；西夏一隅，拒辽金而掎角。地居四战，何道之从？又如汉开西域，力facing乌孙；唐启安西，威扬大食。是则葱岭以西，雷翥以北，握其天险，务得中权。肄业及之，讵无胜算欤？又若汉得卫青、霍去病，而奠漠南。唐用李靖、李勣，而破突厥。元有旭烈兀诸人，而收印度。明资戚继光诸将，而靖倭氛。得人者昌，能言其效欤？

钱法始于太皞，或谓之金，或谓之货，或谓之泉，或谓之布，或谓之刀。能各举其所自欤？周制以商通货，以贾通物。其九府圜法，厥制若何？后患钱轻，更铸大钱，始于何年？汉时初铸荚钱，后以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奚若，其年代尚可考欤？后又有三铢、五铢，是否同时？魏晋以后，亦有铸四铢钱者。唐时改五铢钱，每钱一千，计重若何？其钱监设于何地？其罢江淮七监，何人所言？宋时置监铸铁钱，当在何处？其铜钱一，当铁钱几何？元丰间毕仲衍进《中书备对》，言诸路铜铁钱监所增数，果多于宋初欤？自银币行而钱法一坏，自交子、钞引行而钱法再坏。元明以来，率蹈此弊。岂鼓铸之不善欤？抑产于山者，有时而竭欤？子母相权之法，不可不亟讲也。

夫稽古者，出政之本也；讲武者，备豫之方也；设险者，立国之基也；范金者，理财之要也。尔多士条举以陈，勿猥勿并。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子张问怎样才能到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即便是到了落后异族地区也行得通;说话欺诈没有信义,行为刻薄轻浮,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立着,好像看见'忠诚老实忠厚严肃'这几个字就在面前,在车上,也好像见到它刻在前面的横木上。这才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了自己的大带子上。

不偏不倚十分适度的这种境界,是难于彻底实现的。

吸取别人的优点来成就自己的善行,这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因而君子最高尚的品行是同别人一起行善。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承受天命,继承盛大的帝业,到现在十二年了。依靠皇太后的辛勤教导和养育,国家政治和谐,天下安定。皇帝我日夜勤苦学习学问,孜孜不倦。从经书史籍中去寻求国家治乱的根本,从军事上去寻求指挥军队的方略;从地理形势图中去了解地形险要、平易的大概,从货币方面去研究钱币流通之法。你们这些士子们来自民间,对圣贤古训多所研习,又关心当代天下大政。现今正值在殿前发出策问,你们要恭敬听好皇帝我的问题。

帝王诚意正心的学问,首当格物致知,那么,像《帝范》、《群书治要》、《帝学》这些著作,能述说它们的精确要义吗?《贞观政要》、《太平御览》是谁撰述的?唐代魏徵的《谏录》、《续录》果真对治国有所裨益吗?此外,像《政府奏议》、《尽言集》、《历代名臣奏议》这些著作,哪些优秀,哪些低劣?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一书为什么缺少"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果真是待邱浚补充才完备吗?夏良胜的《中庸衍义》,与《大学衍义》体例相同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探求国家治乱的渊

薮，能列举它的要旨吗？撰述《通鉴释文》、《通鉴释文辨误》、《通鉴地理通释》的是哪些人？撰述《通鉴外纪》的又是谁？李焘、刘时举等人所续写的著作，能完全继承《通鉴》精深广博的精神吗？

用兵作战的方法，首先在于根据各地情况，制定适宜办法，其中水师是尤其重要的。《左传》记载，楚王建立水师征伐吴国，实际是水军建立的开始。后来楚国得到吴国的舟船即所谓艅艎，这又是水军船只中名称最显著的。有人认为公输般制造钩拒是战船的开始，是这样吗？西汉时，朝廷派朱买臣督造楼船。汉武帝元鼎五年，又下诏粤人及江淮以南的楼船前往南越征讨吕嘉，那时有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的名号，战船叫戈船、下濑、横海，这样命名的意义是什么？水师训练战法，应在哪个地方？西晋武帝时王浚修造战船，于是建造了两船并连的大船，这大船能容纳多少士卒？建造的飞云舟、仓隼船相距若干步，这见于什么书？等隋文帝命令杨素建造战舰，战舰叫什么名称，有多高？唐初攻打萧铣所用的战舰，能列举出它的数量吗？宋代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分别有鈌鱼船，可以修整用来防备海防，向朝廷奏陈建议的是谁？又在哪一年？南宋绍兴年间，有飞虎战舰，旁边设有四轮，它的制作样式如何呢？铁可以用来造船，在唐以前，能从什么书中看到？又有皮制的船，是谁开始建造的？明代的戚继光也使用过，一只船可以乘载几个人，能详细讲述吗？

在上古，虞舜之时，天下大治，这时仍有兴兵征伐三苗地区的事。周代国家日益兴盛，又兴师征伐獯鬻部族。国家边防大事，自古以来是很明显的。而春秋时期齐国宣称抗击狄族的侵犯，可《左传》却赞美与夷狄结盟友好的举措。西汉时，汉军扫荡匈奴，扬威北方，扬雄反而把这贬低为处理华夷关系的中策。这些灵活处置的方式，哪种说法较优？而战国时，七国争战，各国依靠蒙骜、李牧这类将领来安抚边疆。宋时，西夏占据西北一隅，抗拒辽、金，形成倚角之势。西夏地处四战之地，又是靠什么对策得以生存？又比如：汉朝开拓西域，震慑乌孙国；唐代设安西都护，扬威西方大食国。这就表明葱岭以西、雷翥海以北，务必控制此地的险要地区，务须获取到居中驭外的处置办法。那些继任者们，在处理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时，难道没有稳

操胜券的谋划吗?又比如:汉代因任用卫青、霍去病,而安定了漠南。唐朝任用李靖、李勣,因而打败了突厥。元代又有旭烈兀等人收降了印度,明朝借重戚继光各位将领而荡平了倭寇。任用人适当,则国家昌盛,能够论说其中的效验吗?

钱币制造之法,开始于太皞之时,有的叫做金,有的称为货,有的叫泉,有的称布,有的称刀。能分别列举它们的来历吗?周代的制度,让商人们流通货物,当时朝廷钱币流通的制度是怎样规定的?后来考虑到币值太轻,另外铸造大钱,这是从哪年开始的?西汉时,开始铸的是荚钱,后来因为这种钱越多,钱的面值越轻,于是新铸四铢钱,钱上的文字是什么?它的年代可考吗?后来又有三铢、五铢钱,是否是同时流通的钱币呢?魏晋以后,也有铸造的四铢钱,唐代改为铸造五铢钱,每一千钱,重量是多少?那时的铸钱机构设在什么地方?废除江淮七监是谁提出的建议?宋代设置钱监铸造铁钱,究竟在什么地方?铜钱一枚相当于铁钱多少?北宋元丰年间,毕仲衍向朝廷进奏《中书备对》,所陈述的宋代各路铜钱、铁钱钱监所增数目,真的比宋初多吗?自从银币流行以来,钱币流通之法第一次受到损坏。纸币交子、钞引的流通,钱币之法再次受到了破坏。元明以来,都又陷入了这种弊政,难道是钱币冶铸的不完善吗?还是因钱币的原料出产于大山,有时原料枯竭而造成的呢?货币大钱和小钱相互调剂的方法,不能不立即研究。

探求上古圣贤之事,是制定国政的根本。讲求武备,是防止国家产生不测的大法。在边防上设置险要地带进行防守,是巩固国防的基础。货币的铸造流通,是处理国家财政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些士子把以上逐条列举陈奏,不要繁琐,不要含混,皇帝我要亲自阅览。

赵以炯　殿试对策

赵以炯(生卒年不详)　字仲莹,贵州贵阳人。光绪十二年(1886)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政治甚繁也，实由庙堂握其纲；寰区甚遥也，实由宫廷提其要。人君建极，绥猷将胥，天下之臣庶，相与进于乂安。而欲智取术驭也，其道无由。是以神圣代兴之朝，天人交应，遐迩悉怀。而求其要端，则不外缉熙以新其德，讲论以探其源，而复继以思患豫防之规，怀远保邦之略，厚生利用之模。其难其慎，无怠无荒，合本末以交修，统始终而毕贯。用是主极端，军威振，边患息，国用充，于以扬骏业而迓鸿厖。此诚为一代之隆规，而百王之大法也。

钦惟皇帝陛下，尊师重道，饬纪整纲，必先天下而课其功，乃后天下而收其效。将兢兢业业，亦何政之不修，何事之不理哉！乃圣怀冲挹，咨询犹殷，举讲学、经武、防边、制用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如臣庸陋，何足以承大对？特以士之为士者，夙负齐家治国之志，将以施之于政，以究其得失也。兹复恭奉谕旨，勉以毋猥毋并。若仅涂饰浮辞，能无负惭于夙夜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诚正之学，格致为先，因深究夫审端致力之方。此诚内圣外王之极则也。臣惟唐虞以来，言执中尚矣。三代而降，若唐太宗《帝范》十二篇，始《君体》，终《崇文》，范祖禹《帝学》八卷，起三皇，迄宋代。与魏徵之《群书治要》，具有精意，足备省观。《贞观政要》，吴兢所作。《太平御览》，宋太宗诏史馆所修。至真德秀进《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拳拳于诚意正心之要，而治平之略阙焉。邱浚以《正朝廷》、《成功化》十二条补之，体明而用亦备。夏良胜之《中庸衍义》，所为沿其体例而作也。司马光《资治通鉴》一编，最为精博。其要旨，不出察治乱，知兴衰，诚史家之纲领。后经史炤撰《释文》三十卷，胡三省撰《音注》九十七卷，《释文辨误》十二卷，王应麟撰《地理通释》十四卷，刘恕撰《外纪》十卷，李焘、刘时举复为续编，而原书益昭美备矣。至若补阙拾遗，则魏征之《谏录》、《续录》，范仲淹之《政府奏议》，刘安世之《尽言集》，黄淮、杨士奇等所编之《历代名臣奏议》，类皆君臣交儆之辞。其有裨于治，岂浅鲜哉！皇上几余念典，圣学方新，古训具陈，尤赖左右之朝夕纳诲也。

制策又以用兵之道，贵乎因地制宜，而舟师尤为要务。此又安内

攘外之良规也。臣考古无水战之法。春秋时,楚子始为舟师以伐吴,其后遂有舾艎之获。然其制,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实自公输般而创。汉时武帝,命朱买臣治楼船,以攻东越。更作昆明池,习水战,以讨昆明。元鼎五年,又诏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往征吕嘉。其时有伏波、楼船、横海、下濑各将军之号。至命名之义,如置戈船,下以御蛟龙,故称戈船之类是也。嗣后晋王浚作大船连舫,制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隋杨素造五牙大舰,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唐李靖击萧铣,作战船二十余艘。宋时福、兴、泉、漳,各有刽鱼船。咸平四年,何承矩建议修整,以备海道。绍兴中,王彦恢复制飞虎战舰,旁设四轮,日行千里。此历代舟师之大要也。至如铁可为船,见于《淮南子》。皮船之制,创于元宪宗。而戚继光用之,一船可乘一人,两船合缝,可乘三人,此战舟之尤异者。要之,出奇制胜,止在为将者驾驭之得法耳。圣朝威德照宣,陆詟水栗,近复慎重海防,不已有备无患也哉!

制策又以边防之事,自古为昭,因详究夫地形险易之宜。此更定功保大之良模也。臣案虞廷致治,犹振旅于三苗;周道方兴,且劳师于獯鬻。自来有文事者,不忘武备,则兵之不可一日而去也。独是古今异势,强弱异形,水陆异宜,防剿异用,筹边令策,莫若因时。秦用蒙骜,赵用李牧,西夏以一隅而拒辽金,皆聚劲卒精兵,独当一面,深得乎可战可守之方者也。至如汉武帝遣使通西域,置酒泉郡,而康居、乌孙、大夏之属,络绎来附。唐太宗讨平高昌,置安西都护,而新罗、大食诸国,咸奉朝贡。凡在葱岭以西,雷翥以北,无不据其天险,操纵自如。然而行军之要,贵地利尤贵人和;经武之谟,在将兵尤在将将。历代以来,如汉之奠漠南,则卫青、霍去病之力。唐之破突厥,则李靖、李勣之功。元之收印度,则奏绩于旭烈兀诸人。明之靖倭氛,则成功于戚继光诸将。得人者昌,不诚然欤?究之拓地开疆,幅员日广,诚极一时兵威之盛。然不如唐李大亮之言曰:中国有根本,四夷如枝叶。欲怀远者,必先安近。则尤得居中驭外之权也。国家舆图日扩,罔有内外,悉主悉臣,安有不怀德畏威也哉!

制策又以钱法始于太皞,而子母相权之法,不可不讲。此更开源节流之要道也。臣考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为棘币,始谓之金。有熊氏

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至成周太公，立九府圜法，以商通货，以贾通物，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斯固钱之滥觞也。厥后景王患钱轻，更铸大钱，文曰宝货。汉初铸荚钱，文帝时为钱益多而轻，更铸四铢钱，文曰半两。武帝复行三铢、五铢钱。魏晋以后沿用之。唐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置监于洛、并、幽、益、桂等州。洎韩洄判度支，以江淮七监，铸钱工用过费，悉请罢之。宋开宝中，令雅州置监，铸铁钱，与铜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迨元丰间，毕仲衍进《中书备对》，言诸路铜钱增九监，而所铸增三百余万贯。铁钱增六监，而所铸增六十余万贯。盖比宋初至景德，已大不同矣。至于银币，始行于交、广。而交子、钞引，自宋以迄元、明，率蹈此弊。钱法之坏，由来久矣。岂铜源之果竭欤？圣朝府事交修，权衡货布，所以尽美尽善者，非汉唐所能及矣。

夫治益求治，王之本；新又日新，圣之基。寸念疏密，而国之强弱，民之贫富，皆于是关焉。故德业虽懋，器械虽坚，疆域虽清，财用虽足，律以居安思危之意。臣之至愚，尤伏愿我皇上，法天之健，行地之贞，上追尧舜之隆，下迈汤武之盛。《书》曰钦哉，《诗》云敬止。诚使即前言往行，以验诸躬行，而复因时以酌其权宜，随地以明其法度。由是几康敕而本源清，律令明而德威播，捍卫严而边陲靖，斟酌善而帑藏盈。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国家大政是十分纷繁复杂的，而实际上由中央朝廷掌握其大纲；国家领土是十分辽阔的，而实际上由宫廷抓住其扼要部分。君主建立治国的最高法则，管理安抚众将士，而天下的臣子会一起进入安宁大治的境地。如果想凭借智力和巧诈之术统治驾驭天下，这种治国之道是没有根基的。因此，神明圣德代代兴盛的王朝，上天与人间交相呼应，远近的人民都来归附。如果寻求其中的根本奥妙之处，那么不外乎坚持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德行，讲论学术以探求治国的本源，再加上居安思危、谋划边防的谋略，安民保国的大计，使人民生活充裕、物尽其用的政策。懂得其中的艰难，知道

慎重对待，不敢懈怠，不能荒废。综合根本和末节交互修明，始终贯彻如一。由此君主的准则得到端正，军队的威势得到振扬，边防的祸患能够平息，国家财用变得充足。因而国家的宏图伟业得以宏扬，迎来上天降赐的美好命运。这确实是一代隆盛王朝的模式，历代圣贤之王的大法。

敬思皇帝陛下，尊崇师长推重儒家学说，整饬国家纲纪，一定要在天下人前面勤恳用功，在天下人之后收取实效。只管兢兢业业，而国家的什么大政，什么事情会得不到治理呢！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圣上仍怀谦虚之心，殷切地询问治国之道。列举了讲求道学、经略武备、防止边患、处理财用各项国家大政。宣召臣下等到宫廷而进行策问。像臣下我这样庸碌浅陋，有什么资格来回答陛下的策问？只是作为一个士子，平素抱有齐家治国的志向，希望将自己所学用到国家行政上，并探究其中的得失。在这里又受到皇帝陛下谕旨中不要空泛、不要繁琐的勉励。如果臣下我只写下浮华的言辞，就会辜负多年来夙夜所怀有的志向的。

臣下我伏首恭敬地读到制策上有这样的话：帝王诚意正心之学，首推格物致知，于是深入地研究抓住入手处、极力学习的办法。这真正是内心圣明、治国仁德的极高法则。臣下我认为，唐尧虞舜以来，谈论圣贤帝王内心做到不偏不倚的“中”，已很久远了。夏、商、周三代以来，像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篇，开始于《君体》篇，结束于《崇文》篇。范祖禹的《帝学》八卷，起自三皇时期一直写到宋代。这些与唐魏徵撰述的《群书治要》都有十分精当的意义，足备观览。《贞观政要》一书是吴兢所作，《太平御览》一书是宋太宗诏命史馆所撰。至于真德秀进献朝廷的《大学衍义》四十三卷，致力于诚意正心的要义，而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邱浚以《正朝廷》、《成功化》十二条进行了补充。根本理论显明，实用策略完备。夏良胜所撰《中庸衍义》一书沿用了《大学衍义补》的体例撰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书最为精确广博、其书的要旨不外乎用于察看社会的治乱，知晓历史的兴衰，真正是史家的纲领性著作。后来史炤撰述《通鉴释文》三十卷，胡三省撰述《通鉴音注》九十七卷、《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王应麟撰述《通鉴

地理通释》十四卷。刘恕撰写《通鉴外纪》十卷。李焘、刘时举又撰著了续编。而《资治通鉴》本书更显明,更优雅完备了。至于对国政补阙拾遗之类的著作,则有魏徵的《谏录》、《续录》,范仲淹的《政府奏议》,刘安世的《尽言集》,黄淮、杨士奇等编写的《历代名臣奏议》。这类著作都是君臣相互儆戒的言辞,对国家治理很有裨益,哪里是作用挺小又浮在表面呢!皇上在处理政务之余还不忘学习,学问日日进步。古先贤圣的训导详尽陈奏,尤其要依靠左右之人朝夕的进言。

皇上的制策又认为用兵作战之道,最重要的在于因地制宜,而水师尤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又是安定天下、攘除外患的良好法式。臣下我考订,上古没有水战的方法。春秋时期,楚王开始建水师征伐吴国,后来又获得艨艟这种船只。然而用船只作战,对退却的船只用钩拖住,对进攻的船只用拒抵挡,确实创自公输般。西汉武帝任命朱买臣建造楼船,来攻打东越。后来又建造昆明池来习练水战,准备征讨昆明部族。武帝元鼎五年,又下诏命粤人及江淮以南的"楼船"水师去征讨南越吕嘉,那时有伏波、楼船、横海,下濑各种将军的名号。至于命名的意义,如设置"戈船"是用来抵御水中蛟龙的,因此称戈船。以后西晋王浚制造两船并连在一起的大船。制作样式为:一百二十步见方大小,能容纳二千余人。隋代杨素建造五牙大舰,高百余尺,容纳二千余人。隋代杨素建造五牙大舰,高百余尺,容纳战士八百人。唐时李靖攻打萧铣制作战船二十余艘。宋代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都有劸鱼船。咸平四年,何承矩建议修整来防御海上通道。南宋绍兴年间,王彦恢又制造飞虎战舰,舰旁装有四轮,每日行驶千里。这是历代舟师的大体情况。至于铁可以造船,见于《淮南子》一书。皮船的制造开创于元宪宗时,而戚继光使用它,一船可乘载一人,两只船合缝起来,可乘载三人。这是战船中十分奇异的。概括地讲,作战出奇制胜只在于将帅驾驭军队得法而已。我大清威德广布,陆上水中都威震敌胆,近来又慎重海防。这不也是有备无患了吗?

制策上又认为边防大事,自古以来就很重要,因而详细研究地理形势的险易。这更是安定边防、保卫国家的良好模式。臣下我考订:虞舜时天下大治,还扬威于三苗地区,周朝正在兴盛之时,也劳师远

征獯鬻部族。自古以来，国家文治，却又不能忘记武备，那么军队建设是一天也不能松懈的。只是过去今天形势不同，强弱不同，水陆的形势存在差异，防卫剿除的手段也有了变化。谋划巩固边防的策略没有不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的。秦国任用蒙骜，赵国任用李牧，西夏凭借西北一隅抗拒辽金，都是聚集强劲有力的士卒，独当一面，这是深得可战可守之法的范例。至于汉武帝派遣使者开通西域，设置酒泉郡，而康居、乌孙、大夏这些国家相继归附。唐太宗讨平高昌，设置安西都护，而新罗、大食诸国都奉献朝贡。大凡葱岭以西，雷翥海以北之地都控制了险要，来往自如。然而用兵作战的根本，看重地利，但尤其看重人和；经略武备的大法，在于统兵，但更在于驭将。历朝历代，像汉代安定漠南，是卫青、霍去病的力量。唐朝攻破突厥，则是李靖、李勣的功劳。元朝收降印度，则是旭烈兀等人的功业；明代平定倭寇，则是戚继光等人的业绩。得人者昌，果真不是这样吗？探究拓地开疆国土日益广阔，诚然是一时的兵威强盛造成的。然而又不如唐代李大亮所讲的：中原地区是根本重地，四方部族犹如枝叶。想使远方的人归附，必须先安定腹地。这句话尤其得到了居于中心驾驭四方的处置办法。国家版图日益扩展，没有内外之别，我朝廷完全统御让他们臣服，怎么有不心怀皇上恩德又畏惧天威的呢！

制策上又认为钱币制作之法创始于太皞之时，而大钱小钱相互调剂的方法，不能不注意。这更是开源节流的要义。臣下我考订：伏羲氏时聚集天下的铜，制造了棘币，开始称作“金”，有熊氏叫做“货”，陶唐氏称作“泉”。到周代时，姜太公设立了朝廷钱币制度，依靠行商流通货物，凭借坐贾买卖物品。把金看成宝物，把刀当做财富，泉流行天下，布四处流布。这本来是钱币的滥觞。后来周景王因为钱币太轻，另外铸大钱，其上刻文叫“宝货”。汉初，铸荚钱，汉文帝时，因为钱越来越多而钱却越来越轻，又铸四铢钱，钱上刻文叫“半两”。汉武帝又推行三铢、五铢钱。魏晋以后，继续沿用。唐朝兴起后，废除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钱重六斤四两，寻找到钱币大小轻重的适当标准。当时在洛州、并州、幽州、益州、桂州设置铸钱机关钱监，等到韩洄主管度支这一财政部门，因为江淮地区七个钱监

铸钱费用过于浪费，请求全部罢除这里的钱监。宋代开宝年间，命令在雅州设置钱监，铸造铁钱，与铜钱一同流行，铜钱一钱相当于铁钱十钱。到元丰年间，毕仲衍进奏《中书备对》，言说地方各路铜钱增加了九个钱监，所铸铜钱每年增加了三百余万贯，铁钱增加了六个钱监，而所铸铁钱每年增加了六十余万贯。这与宋初至景德这一期间相比，已大不相同了。银币方面，开始在广州、交州流通；纸币交子、钞引，从宋到元明都有滥行的弊政。钱法的毁坏由来已久，岂是由于产铜之源枯竭造成的？我大清圣朝对六府三事处理适当，货币流通得法，达到尽善尽美的措施决不是汉唐所能赶上的了。

天下大治，而更加勤奋治国以求得更完善的地步，是作为圣贤帝王的根本。道德日日更新，是圣明的根基。君主心意的疏漏与缜密，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危亡和百姓的贫穷富足。因此，帝王的恩德功业即使很雄盛，军队的器械很锋利，国家十分安宁，财用充足，也应当居安思危。臣下我十分愚昧，希望我皇帝陛下，效法上天的刚健，大地的贞正，追求尧舜时期那样兴盛的局面，超越商汤、周武王盛大的伟业，像《尚书》、《诗经》所歌咏的，要恭敬，要恭敬到极点！如果真以古先帝王言行为榜样，验核自己的身体力行，而再加上因时代不同再斟酌权变的治国方略，按地域的不同来审明法度。由此就会居安思危，澄清本源，法令严明，德威广播，军队严整，边防安宁，财政政策适当，国库财物充实。那么我大清国家亿万年有道的长久统治，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了。臣下我是愚昧无知、刚要被选用之人，不知忌讳，冒犯天威，禁不住恐慌颤抖以至跌倒。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孙文阁译〕

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

殿试策问

[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膺天眷,寅绍丕基,荷列圣之诒谋,承慈闱之懿训,兢兢业业,十有五年矣。思欲登群生于衽席,筹九府之丰盈,绥八表于安全,阜四民之货殖。兹当临轩发策,尔多士其敬听朕命。

《洪范》八政,食货为先。平世三登,丰穰偶歉。故《王制》有余三之政,儒家详缓二之文。《救荒活民书》撰者何人,补者谁氏?《救荒本草》、《拯荒事略》、《救荒事宜》、《救荒策会》、《煮粥参议》、《野菜谱》、《野菜博录》诸书,孰详孰略,能援其最要之说,举其易辨之条欤?三国当涂,北朝拓跋,移粟不劳于江左,洊饥未害于偏灾。稽古者,岂宜无所考见欤?元明以后,每恃南粮。踵河运者虞海道之难,崇海运者虑河漕之缓,或谓宜于兼用。通知时事者,讵能拘成法欤?

自昔行师,端需理饷。汉时全盛,犹收孔仅之功;唐室中兴,实用杨炎之策。必欲远师平准,无凋耗之虞;近足度支,有饱腾之便。通材硕学,岂无成法欤?或谓九牧贡金,明征《禹贡》;铁官列郡,亦著《汉书》。中古以还,代传天凿,权其利害,可得言欤?又如七雄并峙,铁冶纪于史迁;三国争衡,食货缺于陈寿。述其邦计,能悉源流欤?又如建炎南宋,利擅于榷场;中统元初,用资于宝钞。熟知古事,讵无藉于博

闻欤?

自古大一统之世,必为亿万年之图。西逾葱岭,汉通凿空之官;北界金山,唐设北庭之府。轮台屯戍,外辑乌孙;金满建城,远收伊列。凡兹经略,能略言欤?苏定方之讨沙钵罗,速不台之穷默尔奇,此其功烈,近在何时?吐蕃《会盟之碑》,刻于何代?《筹海图编》之绩,著自何年?又如蒙冲楼橹,肇起《汉书》;翼轸毕箕,权舆孙武。兵家水战,能举其要义欤?《诸蕃记》、《西使记》,沿革多可考欤?《武备志》、《火器图》遗法,尚可用欤?

古礼先蚕是享,献茧登功,所以通羡余、重国计也。《尔雅》蚕类不一,不皆饲桑。《太平御览》引《永嘉郡记》亦同。能区别其地利物宜欤?《淮南子》谓:王法禁原蚕,以其残桑。然乡贡八蚕之绵,何害于一岁再登欤?《御览》引谢承书,称范充为桂阳太守,教民植桑养蚕。《宋史》称张咏令崇阳,教民拔茶植桑。得无纺织之兴,亦资循吏欤?《御览》引《吴录》,称南阳郡一岁蚕八绩。《隋书》称江湖之南,一年蚕四五熟。岂非锦绣纂组,反助女红欤?《蚕书》及《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何代何人所撰?良法美意,今尚可行欤?

夫振给补助,仁政之经也;阜通消息,强国之资也;安攘训练,边圉之图也;纺绩织纴,生民之本也。多士博览古今,讲求实用,其各以素所蕴蓄者,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使用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乐舞就用舜时的《韶》舞。

得到贤臣,在于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在于遵循至高无上的大道。

孟子说:您如果不允许互换产品和交流成果,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那么农民的粮食会积余在家里,妇女会把布帛积存在家里。您如果让他们交换,那么木匠、车工就都能在您那里生活。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依靠上天的眷顾，继承盛大基业，承蒙列圣列祖留传的治国良谋，又受到宫闱中仁慈的皇太后教导，兢兢业业，已经十五年了。总想把民众带入极其安宁的境地，谋划国家财政的充裕，安抚天下各地，增加百姓财富。现在来到殿前，发出策问，你们这些士子们要恭敬地听好皇帝我提出的问题。

《尚书·洪范》中有八政，以财政上的食货为首。安定的时代，接连三年丰收，但偶尔也有歉收之年。因此《礼记·王制》中记有九年的收成要富余三年粮食这样的大政。儒家学说中，对于古时收取布帛、粮食、征调赋税赋役，君子采用其中一种而缓办另外两种的理论有详尽的阐述。那么，《救荒活民书》撰述者是谁？补撰的又是谁？《救荒本草》、《拯荒事略》、《救荒事宜》、《救荒策会》、《煮粥参议》、《野菜谱》、《野菜博录》等书，哪个详细，哪个简略。能援引其中精要的大义，列举其中容易实施的条目吗？三国时期的曹魏，北朝时期的拓跋魏，在国内调集粮食，没有依靠江东地区，再次发生饥荒也没受到某地灾害的多大影响。探求古代经验的人，怎么能无所考见呢？元明以后常常依靠南粮北运。主张河运的人，是思虑到海道运输艰难；主张海运的人，是思虑到河道运输速度缓慢。有人认为应当二者兼用。通晓天下大事的人，怎能拘泥于成法呢？

自古以来，用兵作战、确实需要处理好粮饷供应。西汉全盛时期，还采纳了商人孔仅提出的征收商人车税的建议而收到实效。唐代的中兴，实际上是运用了杨炎的财政政策。必定要往远处仿效平准法，使国家没有财用短缺枯竭的忧患；在近处国家财用充足，军队粮食足用。学识渊博的士子们，难道没有完善的方法吗？有人认为，天下九州贡献金宝，在《禹贡》中有明显的印证。在全国的州郡中设立铁官，在《汉书》中也有记载。中古以来，一代一代不断设立铁官，官府掌握开采冶炼。可以权衡其中的利弊，进行评说吗？又如战国七雄时期，铁冶方面的情况，史学家司马迁有所记载。三国鼎立时期的

财政经济情况、陈寿的《三国志》缺乏记载。叙述国家财政大计，能详尽说明其演变的源流吗？又比如：南宋建炎时期，通过榷场谋得垄断的财利，元初中统年间，国家财用凭借的是纸币宝钞的流通。熟知古事的士子们，能不凭借广博的知识来论述吗？

自古以来，大一统的盛世，必定谋划亿万年长治久安的大计。疆域向西越过了葱岭、是由于汉朝派遣了张骞那样开辟西域通道的官员。北部疆域以金山为界，是因唐朝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汉代在轮台屯兵戍守，因而和睦了西方的乌孙国。建立金满城，使唐朝收附了遥远的伊列各国。大凡这些经国方略，能简要论说吗？苏定方征讨沙钵罗可汗，速不台追击默尔奇，这些功勋伟业产生在什么时间？与吐蕃的《会盟碑》是什么年代刻写的？《筹海图编》一书是什么年代著述的？又如：蒙冲楼橹这些战船，《汉书》就有记载。运用翼、轸、毕、箕这些星宿进行星占，运用于战争，发自孙武。兵家的水战之法，能列举其中的要义吗？《诸蕃记》、《西使记》中的行政区划沿革，大多可以考订吗？《武备志》、《火器图》中存留的制造武器的法式还可以使用吗？

上古的礼仪，先用蚕祭享，献蚕茧来表示丰收。这是因蚕桑业是国家互通有无、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而表示重视。《尔雅》上记载的蚕类，不只一种，不都是喂桑叶。《太平御览》上所援引的《永嘉郡记》中的记载，也是这样的。能够区别其中各类蚕生长所需环境及所需喂养的东西吗？《淮南子》上记载说，朝廷法令，禁止养育夏秋之际第二次孵化的原蚕，因为它会毁坏桑树。地方上贡献八辈蚕的棉丝，为什么会对蚕一年两熟产生危害？《太平御览》援引了谢承的著作，说范充担任桂阳太守时，教导百姓种桑养蚕。《宋史》上讲，张咏为崇阳令，让百姓拔除茶树种植桑树，这表明兴起纺织业，恐怕也要依靠奉公守法的官吏吧？《太平御览》引用的《吴录》一书声称南郡一年内蚕能收获八次。《隋书》上讲，江湖以南，一年蚕可有四、五熟，这莫非是锦绣绶带等高贵的丝织品，反而对妇女的纺织业形成帮助吗？《蚕书》、《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是什么年代、什么人撰写的？书中的良好方法、美好的意图，现今还可以实行吗？

周济百姓，补助黎民，是仁政的常规。财富流通是国家富强的资

助。安定内部,攘除边患,训练士卒是加强边防的良谋。发展桑蚕,繁荣纺织业,是使百姓生活富足的根本。你们这些士子们博览古今图书,讲求实用的治国方略,那么各自以自己平素所积学识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不要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张建勋　殿试对策

张建勋(生卒年不详)　字季端,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光绪十五年(1889)状元,例授翰森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食者,民之天也。而用以经之,武以卫之,蚕绩以佃之,凡以体元元,光鸿化也。故史《平准书》曰:虚仓廒而贷之粟,弛山泽而同其利。桓宽《盐铁论》曰: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管子》曰:厚和构四国,以顺貌德。《荀子》曰: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之四者,古先哲王,咸斟酌而损益之。勤恤民隐,均节财用,无一夫之不耕,一妇之不织。修之内者纪纲粲然,外而月龆日域,靡不宾服。橐弓说剑,阴阳以和,朴皇质而雕唐文,此其权舆也。

钦惟皇帝陛下,亲裁大政,首重耕桑,众和财丰,疆圉无事,更新百度,蒸蒸向风,而渊默雷声,弛张不形,既执大同,调泰鸿矣。乃圣怀冲挹,蕲得直言,以辅郅治,置铎悬鞉,犹惧其壅。进臣等于廷,策以救荒、理财、柔远、课蚕诸政,且责其毋泛毋隐。昔刘勰有言:对策者,应诏陈政也。臣虽椯昧,于政术善否,民生休戚,亦尝切究。深维欲陈而未有路,今尚匿而不献耶?

伏读制策有曰:《洪范》八政,食货为先,平世三登,丰穰偶歉,而因求振荒转漕之法。臣案荒政十二,仅见大司徒一职,古无颛书也。宋董煟始撰《救荒活民书》,明朱熊补之。若元欧阳元《拯荒事略》,明朱棣《救荒本草》,周孔、张陛《救荒事宜》,陈龙正《救荒策会》,陈继儒《煮粥参议》,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皆与《活民书》表里。煟书最核,而熊失之迂。山录差博,而磐失之略。《事宜》则张密周疏,

《策会》、《事略》，则陈严欧诞。得失虽殊，便民一也。当涂通漕于陈颍，拓跋转般于济梁。元运主海，明运主河。二者交讥，莫衷一是。今岁或不登，非不振恤也。然有司玩民瘼，又为文告所拘，展转相持，泽不下逮。且官无宿储，仰给他州，道里既悬，不以时达。诚如《周礼》司救，以王命施惠，则文告不能拘矣。遗人、仓人，掌委积及粟入之藏以颁之，则自太仓及县都乡里，所在充牣，不仰给他州矣。自元以后，海外多故，专恃海运惧蹈元之覆辙。河运又漕渠易梗，岁岁劳费，亦非策之得也。诚于畿辅兴水利，务仓储，常有十年之蓄，不颛俟南漕，又何断断河海二运耶？皇上轸念民艰，凡行省偏灾，皆发帑截漕以振之，则民生厚矣。

制策又曰：自昔行师，端需理饷，而因求榷税置冶之法。臣案汉武事外域，故孔仅铸作器。唐德敝诸镇，故杨炎改税法，又请出内库，归左藏。议者称之。《禹贡》扬、荆二州，皆贡金。豫贡锴，梁贡银镂，亦金属也。《班志》铁官者四十郡，《迁传》铁冶者五家，后世开采所祖也。建炎榷场，中统宝钞，并损下益上权制，非经制也。陈寿《三国》有书无志，故《食货》阙如。然《后汉》、《晋》二书，犹存百一。夫仅言利，析秋豪。又举所得者，属少府。人主有私藏，仅导之也。炎之两税，虽非敦本抑末之道，而左藏之归，则宫中经费，皆掌之有司，中官不得持其柄，犹周司会之遗也。盖内帑既盈，而无式法以限之，人主之侈心必生。内盈则外虚，民气必剥，又无以为非常之备。炎之识，或不及此，然过仅远矣。冶铸之利，今尤尚之。然中国际数千年开采之后，地力既竭，非荒洲远岛比也。贫民采之，足以资生。官司采之，不足以偿费。况鸠无藉之民，穴绝远之地，有利则聚而为奸，无利则散而为盗。其害又胜言耶？皇上躬行节俭，利用本于正德，上下交足，初无事山海之藏也。

制策又以大一统之世，必为亿万年之图，而因求防边诘戎之法。臣案古者守在四夷，不勤远略。自汉张骞通葱岭以西，西北诸边遂常为中国蠹。唐长安二年，于西突厥置北庭都护府。永徽三年，于处月诸部置金满州，汉轮台地也。苏定方讨沙钵罗，在唐高宗时。速不台穷默尔奇，在元太祖时。吐蕃碑，开元中李佺刻。《筹海图编》，嘉靖中

胡宗宪著。宋赵汝括《诸蕃记》,元刘郁《西使记》,记载翔实,并史家之支流。舟师始汉之蒙冲楼橹,朱买臣创之。而孙武《火攻篇》所云翼轸毕箕,则占风之验也。《武备志》、《火器图》,率迂诞不经,无当行阵。昔李大亮曰:中国如本根,四裔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裔,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范祖禹曰:得之既以为功,失之必以为耻。故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综李、范之论,后之虚内事外,其可已矣。兵械利钝,胜负所关。故晁错以器械不利,为将不省兵之祸。今亦尚制器矣,然工之良窳,藏之周疏,将不习也。制造多则朽坏易,朽坏易则改作烦。掷无艺之费,餍非族之欲,耗已以资敌,是自敝也。皇上义征不憓,远无弗宾,其于戎器,戒不虞之谊,诚得之矣。

制策又以古礼先蚕是享,献茧登功,而因求树桑养蚕之法。臣案《尔雅》蚕属曰蟓、蜚、由、蚖,其食有樗、棘、栾、萧,不独桑也。《御览》引《永嘉郡记》,有八辈蚕,则以出之先后名之。又引《吴录》,称南阳郡一岁蚕八绩。《隋书》称江淮之南,一岁蚕四五熟,与《记》并同,然《淮南子》云:王法禁原蚕,以其残桑。再登且不可,况四五熟、八辈耶?不知蚕桑并喜温,而永嘉、南阳及江淮南,皆南维地,无嫌于一岁数登。故《吴都赋》亦云:乡贡八蚕之绵安。殆道其常耳。谢承书:范冉为桂阳太守,教民植桑养蚕。宋张咏令崇阳,亦拔茶植桑。此岂俗吏所能为耶?宋秦湛《蚕书》附陈旉《农书》后,互相补苴。元初《农桑辑要》及鲁明《农桑衣食撮要》,一辨物产,一明时令也。夫妇嫔化治丝枲,为太宰九职之一。而张栻曰:诵服之无斁之章,知周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知周所以衰。盖蚕桑亦国本也。今锦绣纂组,为害女红,从事蚕绩者鲜。安得闾师任女事,鄘长稽女功,使之社而赋事,烝而献功,以补农之不足耶?皇上大昕之朝,卜三宫而使之。蚕政既兴,孰不率而展功绪欤?

若此者:敦本善俗,兴事劝功,权三十年之通以制用,绥数万里之遐以树威,则古昔,斟时宜,夐乎莫尚已。臣尤伏愿皇上,几余典学,本经术为治术。准之《礼》,以剂丰荒之平;参之《易》,以明制度之节;体之《记》,以章怀柔之效;稽之《国语》,以宗劳逸之原。而又无荒无怠,始终惟一。以三代为必可复,而不屑为末世苟且权宜之策。将以

方轩迈嵘,比舜陵妫。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吃上饭是民众的头等大事,而必须对财用加以筹划,用武力来捍卫,以桑蚕业来补充,目的都是用来体察百姓疾苦,光大朝廷教化的。因此,《史记·平准书》写道:拿出国库的粮食借给百姓,开放山泽与百姓同享财利。桓宽的《盐铁论》上讲:盐铁官营和平抑物价,是用来疏通积压的财物、调节市场上的供求平衡的。《管子》也说:宽厚仁和能和睦天下四方,以和顺体现自己宽厚的德行。《荀子》上讲:功业可覆盖天下,建成万世的制度。用礼乐来成就功业,贵贱区分出等级。上古先哲圣王对这四个方面都斟酌思虑,自有取舍。辛勤地体恤百姓,平均财物,没有一个农夫不耕作,一个妇人不纺织。他们加强内政,朝廷纲纪随之也会十分清明,而在外部月亮所出、日光所照之处无不归附。武器不再使用,阴阳和顺,使三皇的制度本质更加质朴,使唐尧的教化更加显明,这是治国的首要任务。

敬思皇帝陛下,亲自裁决国家大政,十分重视农业、纺织业,百姓和乐,财用丰足,疆域平安,百业更新,国家和美,天下闻风仰慕。而像深渊一起沉默,或如雷霆万钧,政策的张弛宽严含而不露,使天地安康合而为一,达到万物和顺的境界了。但皇帝陛下又心怀谦逊,希望求得正直言论,辅助国家大治,像古圣贤悬置铎鞉之类的铜铃皮鼓来鼓励上书一样广开言路,恐怕言路不通。于是宣召臣下等人到宫廷,策问我等救民救灾、疏理财用、抚柔远方、劝课农桑各项国政,并且责令不要空泛,不要隐讳。过去刘勰有这样的话:对策是响应诏命陈述国家大政得失的,臣下我虽然愚昧无知,对治国之术的好坏、与民众生活相戚相关的事情也曾深入探究,内心也想陈述,而没有机会,现今能隐匿而不言吗?

跪拜恭敬地读到皇帝陛下制策上说:《尚书·洪范》篇中有八项政事,而把食货放在首位。平安的时代,接连三年丰收,偶尔也会有歉收之年,于是探求振济荒灾、漕运粮食的办法。臣下我考订,国政

中荒政十二项,仅见于《周礼·大司徒》,古代没有专书记述。到宋代董煟撰写《救荒活民书》,明代朱熊进行了增补。元代欧阳玄著《拯荒事略》,明代朱橚著《救荒本草》,周孔、张陛都写有《救荒事宜》一书。陈龙正撰写《救荒策会》,陈继儒撰写《煮粥参议》,王磐撰写《野菜谱》,鲍山撰写《野菜博录》,都和董煟《救荒治民书》相补充。董煟的书最精审,而朱熊的书显得迂阔,而鲍山的《野菜博录》又太广泛,王磐的《野菜谱》又太简略。《救荒事宜》张陛的显得繁杂,周孔的又太疏漏。《救荒策会》过于严整,《拯荒事略》则有荒诞之处。各书优劣短长不同,但便利百姓这一点是一致的。三国时的曹魏把漕河开掘到陈州、颍州,而北朝拓跋魏,则在梁山济水间运输粮食。元代的运输主张以海运为主,而明朝则主张以运河运输为主。持这两种主张的人互相讥讽,莫衷一是。现今有时年成歉收,不是国家不赈济安抚。但是有关官员把百姓的疾苦当儿戏,又拘泥于公文,互相推诿责任,使朝廷恩泽不能下达到百姓。况且官府没有旧有的储蓄,仰仗其他州县供给,道路又远,不能按时到达。真是像《周礼》中司救所讲,按照王命施恩,那就不能拘泥于文告。遗人、仓人这些官吏,掌管积存的粮食,把这些下发给百姓,那么从京城的太仓,以至于州县乡里,所在之处都会有粮食,也就不仰仗其他州县了。自元以后,海外多有事故,专门依靠海运,恐怕会重蹈元代海运丢失的覆辙。河运方面,漕渠又容易阻塞,年年花费人力财物,也不是良策。如果在京畿之地兴修水利,积极从事粮食储备,平素积存十年的粮食,不专靠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又哪里会一个劲儿地争论海运,漕运二事?皇上十分体恤百姓的艰难,凡是一个行省发生小灾,都调发国家钱粮,截留运京的漕粮救济百姓,这样百姓生活就丰厚无忧了。

制策上又说:自古兴兵出师,确需疏理军饷,因而寻求税收和设置铁冶机构的方法。臣下我考订,汉武帝对外部进行战争,所以孔仅以官府铸造铁器。唐代藩镇割据,所以杨炎定立两税法,又请求把宫内库归朝廷左藏库管辖,议论的人都称赞此事。《尚书·禹贡》上说:扬、荆二州,都贡献给朝廷铜,豫州贡献错石,梁州贡献银和坚硬的铁,也都是金属。《汉书·食货志》记载汉代设立的铁冶机构遍布四

十个郡,而司马迁的《史记·贷殖列传》所载铁冶行业共有五家,是后世开采铁矿炼铁的始祖。南宋建炎年间,设立榷杨,元代中统时发行宝钞,这都是损害社会以利官府,不是正常的制度。陈寿著《三国志》没有志这一体裁,所以缺少经济方面的食货志。然而《后汉书》、《晋书》中还存有当时的史料的少部分。孔仅上书谈论财利,把秋毫之利都收归朝廷,又指出朝廷所收得的财物归少府所有。君主私藏财物,是孔仅引导产生的。杨炎的两税法,虽然不是敦促农业抑制商业的治国之道,而把宫中财物归入左藏库,宫中的各项经费掌握于有关官员之手,宦官不能掌管,还算是《周礼》司会中的良好遗风。宫内财物丰盈,如果没有法令限制,那么君主奢侈之心必定滋长。宫内充盈,朝廷财政就会空虚,民气必然消沉,而没有办法来防备突然事变,杨炎的见识或许没有达到这一地步,但超过孔仅很多了。铁冶的财利,现在还在重视,但中国经历了数千年开采以后,地力已经枯竭,不是荒凉的土地,遥远的岛屿所能比的。如果让贫苦百姓采掘还可以资助生计,官府采掘,那么连劳力费用也不足抵偿。况且那里聚集着没有户籍的百姓,他们穴藏在远离闹市的深山。如果这里有财利,那么这些人就聚集为非做歹。如果无利可图,那么就四处流散去做盗贼。对于国家的祸害是不能用言语述说的。皇上躬行节俭,从自己端正的德行出发,力求物尽其用,上下生活丰足,从一开始就不从事那探掘山海宝藏之事了。

制策上又认为在大一统的盛世,必定要制订国家亿万年长治久安之策,因而寻求防卫边患、整顿军队的策略。臣下我考订:古代时,靠四境部族替中原做守卫,不从事远征。从西汉张骞开通西域通道,葱岭以西,西北诸边的各部,常常成为中国边患。唐朝在长安二年,在西突厥地区设置北庭都护府。永徽三年,在处月诸部,设置金满州,这是汉时的轮台故地。苏定方讨沙钵罗可汗是在唐高宗时,速不台追击默尔奇,是在元太祖时。吐蕃《会盟碑》是唐朝开元年间李佺刻写,《筹海图编》是明朝嘉靖中胡宪宗所著。宋朝赵汝括的《诸蕃记》,元代刘郁的《西使记》,记载翔实,可以算作史学家的支派。水师开始于西汉的蒙冲楼橹,是朱买臣创建的。而孙武在《孙子·火攻

篇》所讲的翼、轸、毕、箕星宿是占验风向的。《武备志》、《火器图》都迂阔、荒诞不经，不能运用于军阵之间。过去李大亮讲，中原地带犹如一棵树的树干，四夷犹如树的枝叶，耗费中原的人力财物从事的征讨四夷活动，就像拔树根去增益它的树叶一样。范祖禹讲：得到四夷的国土，必定认为是功业；没得到，必定认为是耻辱，因此也就产生了征伐的劳顿，馈饷的烦费，百姓不堪忍受。综合李、范的论述，后人以虚耗国内财力从事征讨的活动也就可以停止了。兵器器械的利纯，关系到战争胜败。因此晁错认为，军队的器械不锋利，是做大将的不知战争，因而是危险的。现在重视军队兵器的制作了，然而工匠的优劣，兵器收藏的周到或疏漏，将领们是不知道的。制造的兵器多，那么兵器容易朽坏，朽坏的，改造起来十分烦杂。无穷无尽地浪费钱财，满足外族的欲望，耗费自己以资助敌人，这是自己困扰自己。皇上正义之师征讨不顺从的部族，遥远的地方都来归附，那么整顿军备，以防不测之事，则是理所当然的。

制策中又鉴于古礼先用蚕祭享，奉上蚕茧来庆祝丰收之功。因而寻问植桑养蚕的大法。臣下我考订：《尔雅》蚕属上讲：蜾、雔、由、蚖，这些蚕类，吃的是樗、棘、栾、萧等植物的叶子，不只是桑叶。《太平御览》引用的《永嘉郡记》有八辈蚕，这是以出生的先后顺序命名的。又援引《吴录》，说是南阳郡一年蚕绩收获八次。《隋书》说江淮以南，一年蚕四五次收获，与《永嘉郡记》相同。然而《淮南子》上说，朝廷法令禁止夏秋之际第二次孵化的原蚕，是因为它会毁坏桑树。两次丰收还不行，何况四五熟、繁殖八次呢？不了解蚕、桑都是喜温之物，而永嘉、南阳及江淮以南之地，都属南方，数次收获是很正常的。因此《吴都赋》上讲，地方上贡纳八辈蚕的丝棉。这大概是讲的常例。谢承所记载的，范充做桂阳太守，教导百姓种桑养蚕。而宋朝张咏做崇阳令，让百姓拔茶树种桑树，这不是庸俗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宋代秦湛《蚕书》附在陈旉《农书》之后，互为补充。元初《农桑辑要》及鲁明的《农桑衣食撮要》，一是辨明各地物产，一是阐明时气节令的。周代命妇嫔妃通过整治丝缕，织成布帛而实行教化，是太宰的职责之一，而张栻说，咏诵《诗经·周南·葛覃》中从事纺织的篇章会了解

周朝为什么兴盛，咏诵《诗经·大雅·瞻卬》中妇女停止纺织的篇章会了解周朝为什么衰落。桑蚕业，也是国家的根本。现在锦绣这些高级丝织品，成为纺织女工的一大祸患，从事桑蚕业的人少了。怎么能够像周代那样让闾师管理丝织业，让郑长考查纺织业的功效，在里社聚会时献上成绩，在祭祀时报告功绩，来补充农业的不足呢？皇上在季春三月初一的大典上，让嫔妃举行养蚕仪式，提倡养蚕业，有谁又不去在这方面大展功业呢？

像以上这些问题：敦促农业，宏扬教化，大搞生产，劝民立业。以三十年为单元规划国家财政，安定数万里国土，树立国威，效法古代，斟酌当今，达到最高的无人企及的完美境界了。臣下我希望陛下在处理政务之余，学习经术，把它作为治国方略。以《周礼》为标准，调剂丰、歉之年的财用。参照《周易》，审明国家经济。以《礼记》为榜样，宣导怀柔政策。从《国语》中，去探究劳逸均衡的本原，而又不加懈怠，终始如一，坚信夏、商、周兴盛的三代一定会来到，而不屑实施末世苟且权宜、得过且过的策略。那么就追此黄帝太皞，和贤德的虞舜相比拟，超过了治水的大禹的功业。我大清国家亿万年长治久安的国运，就奠基在这里了。臣下我学识浅薄，是刚被进用之人，不识忌讳，冒犯了天威，禁不住恐慌颤抖以至跌到。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孙文阁译〕

清德宗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霸者之民，骣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殿试策问

[光绪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于今十有六载。仰荷昊苍眷佑之隆，慈圣教育之笃，临政以来，夙夜兢兢，不敢暇逸，惟冀勤求治理，以绥我亿兆民。兹当临轩吁俊，用集嘉谟，尔多士其敬听之。

帝王心法治法，相为表里。典谟训诰，言之详矣。《大学》、《中庸》，道法悉备。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发明圣学渊源，治道根柢。自序谓：《大学》一书，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大旨安在？其于格致、诚正、修齐之要，推阐无遗，独不及治平。明邱浚《大学衍义补》，辑古今大经大法，实治平之道，先之以《审几微》。能述其义否？所补治平之要，厥目有几？夏良胜《中庸衍义》，颇采邱浚之说，纲领条目，粲然具备。其于当时事局，多所匡益。能胪举之欤？

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所宜究心。金上京会宁府，《通志》谓在宁古塔城西南。其说何本，果无误欤？《唐志》涑州在何地，后改为独奏州，其义何属？唐之率宾府，所领何州，在今何地？金有苏冥水，《明一统志》有恤品河，其两地欤？《辽史·营卫志》五国部族，其故城有谓在乌苏里江口、松花江两岸者，有谓在宁古塔东者，孰是？黑龙江源发何处，辽之胪朐河、元之斡难河，是一是二，能详考之否？

天生庶物，以养万民，而国之大用，即于斯出。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茶马之法，亦始于唐。宋有茶马司专官，元明因之。宋之三说法、贴射法，何法为便？明之茶马司、批验茶引所，设于何地？远番重茶，以资其生。茶市之通，济及海外。能极言其利弊欤？

自古极盛之朝，莫不以边防为重。《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论者以为得中策。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

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多士稽古有年，先资拜献，其各陈谠论，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子贡说：老师有关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听得到，老师有关天性、天道方面的言论我们听不到。子路听到一些教诲，还没有能够去做，这时又怕听到其它方面的教诲。

知道治理人们的办法，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办法了。治理天下国家的准则，有九个方面。

称霸者统治下的百姓，欢喜愉快；圣明帝王统治下的百姓，和乐舒畅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帝业，至今已十六年了。上靠

苍天保佑，再加上慈爱圣明的皇太后辛勤教诲，亲政以来，日夜兢兢业业，不敢贪图安逸，只希求勤奋治理国政，以安抚我亿万百姓。现在正值亲临大殿，选拔贤能，以便汇集治国良策，你们这些士子们好好听着。

帝王修身养性的心法和治理国家的大法互为表里。《尚书》中重要篇章对此论说得很详尽了。《大学》、《中庸》关于帝王修身治国之道，讲述得也很完善。宋代真德秀撰写《大学衍义》，阐述发挥圣贤之学的渊源，治国之道的根本。此书自序说，这本书是统治天下的君王们的律令格式。那么它的大旨在哪里呢？其书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大纲，阐述讲解得没有遗漏，唯独不涉及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明代邱浚撰写的《大学衍义补》收集了古今治国的大法，充实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方式，首先列示《审几微》。能论述其大义吗？所增补的治国平天下的要义，是分几个方面阐述的？夏良胜的《中庸衍义》，采用邱浚的许多学说，其书的大纲细目，明显完备，对于当时的社会时局，多有帮助。能列举出来吗？

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应当加以注意。金代上京会宁府，《通志》上讲，在宁古塔城的西南。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真的没有错误吗？《新唐书·地理志》中的涑州在现在什么地区？后来改做独奏州，有什么含义？唐代的率宾府，所统领的是哪些州，现在在哪些地区？金代有苏冥水，《明一统志》上记载有恤品河，这是两个地方吗？《辽史·营卫志》中，五国部族的故城，有的说在乌苏里江口，松花江两岸，有的认为在宁古塔城东，哪一种正确呢？黑龙江发源在什么地方？辽时的胪朐河，元代的斡难河，是一条河还是两条河，能详细考订吗？

上天生出万物，用来恤养天下亿万百姓，而国家的财用，也从中产出。征收茶税，开始于唐代。那么最初征收商人的税钱，在什么时候？单独征收茶税，又在什么时候？设置管理茶业税收的茶官，又在什么时间？征茶税的办法，后来又是怎样增减变化的？茶马交易的方法也是开始于唐代。宋代设有茶马司这专门的官府机构管理，元、明沿袭下来。宋代的一分支现钱，一分支香药象齿，一分支茶货以纳边防粮草的三说法，和让商人贴纳利息官买官卖茶叶的贴射法，哪种更便

利?明代的茶马司、批验茶引所,设在什么地方?远方的少数部族看重茶叶交易,凭茶叶来调剂生活,茶市的开通,使贸易达到海外,能详尽述说其中的利弊吗?

自古以来,强盛的朝廷没有不重视边防的。《诗经》上说,征伐猃狁,达到了太原地带。论说边防之策的人说这种征伐之策仅是边防策略中的中策。汉武帝在北部修筑朔方城,在西部派士卒戍守乌垒,一时匈奴震恐,而中原的百姓也因此耗尽了人力财物。东汉光武帝拒绝给西域派都护的请求,迁徙幽州、并州之地的边民到塞下,虽然没有困扰中原百姓,来征讨边疆的各个部族,但这又未免显出了中央的软弱。防卫边防的策略,究竟哪种最好呢?唐时设置安西、北庭四镇,对其控制得法吗?古代的边防只在陆地上,现今又兼有海防。冥冥大海有万里海疆,处处可通达,究竟在什么地方设立防守,才能收到巩固边防威震敌胆的功效呢?

帝王从事学习,来增加治国经验;巩固国家根本,来维护国家疆域;梳理国家财政,来增加国家收入;设置险要关卡,来加强边防。这都是治理国家的良策。你们这些士子们研究圣贤之学许多年了。拜见君主首先要把自己的谋划敬献上来,请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不要有所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吴鲁　殿试对策

吴鲁(生卒年不详)　字肃堂,福建晋江人。光绪十六年(1890)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古帝王之御宇也,必先典学以慎修,辨方以正位,阜财以裕国,设险以绥边。是故执中出治,伊耆上仪也;覲岳封山,姒氏隆轨也;厚生正德,安邑崇规也。通道来宾,镐京茂矩也。三代而后,贤君令辟,史不绝书。而求其保民之本务,制治之远猷,亦莫不提要斟元,于《书》懔传心之训;宅中图大,于《诗》歌正域之章;利用懋迁,于《礼》重均财之掌;畏威怀德,于《传》详固圉之文。凡夫模笑二仪,甄

陶万类,著之简编而为治法,布之区宇而为嘉猷者,胥是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道昭彝宪,治协玑衡,固已一中建而圣学崇,九宇宏而邦本固,六府修而国用足,万邦正而海宇安也已。乃者亲裁大政,弥切畴咨,期执两以用中,得抱一以为式。进臣等于廷,而策以懔危微、固防卫、权食货、示怀柔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以承大对而备咨询?顾当对扬伊始之时,正值特开恩榜之日,勖多士以各陈谠论,其何敢仍故习,摭浮辞乎?

伏读制策有曰:帝王心法治法,相为表里,而因求昔圣微言,往哲绪论。此诚正位凝命之大原也。臣谨案蔡沈《书传》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大学》始终一敬,主敬者,此心也。《中庸》枢纽一诚,存诚者,亦此心也。宋真德秀作《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尧典》、《皋陶谟》、《伊训》之书,《思齐》之诗,《家人》之卦,子思、孟子、董仲舒、扬雄之说,发明圣学渊源,治道根柢。自序谓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其于格致、诚正、修齐之旨,分为四大纲,意在以本贯末,故略治平而不言。明邱浚补之,先之以《审几微》,为目十有二,而后经世大法,粲然可观,诚羽翼真氏之书也。夏良胜《中庸衍义》,颇采邱氏之说,而于崇神仙、好符瑞、改祖制、抑善类数端,周详反覆,所以匡益乎当时事局者实多。君人者诚能辨治忽于几先,析理欲于性始,以三代为必可至,以万事为必可康。勿逐经生之末法,而上规其本;勿事讲幄之虚文,而务崇诸实。庶政无不举,而道无不章已。皇上昌明正学,纲领群言,则监成宪而罔愆,学古训而有获矣。

制策又以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因详求历代之建置沿革。此又体国经野之至意也。臣谨案东三省中,惟吉林所辖地最广。自混同江以西,上抵三姓,南接宁古塔,万山环叠,雄障东陲。黑龙江地势,左枕龙江,右环兴岭,与奉天、吉林为唇齿,屹然称重镇焉。金上京会宁府,《通志》本《明一统志》之说,误为在宁古塔城西南。案会宁府,即今阿勒楚喀城,实在宁古塔城西北。《唐志》涑州,在靺鞨黑水府之地,其后以得专达,不辖于府,乃改为独奏州。唐之率宾府,在率宾国地,所领有华、益、建三州。金有苏冥水,在建州东南,即今绥芬河,

《明一统志》作恤品河。谓为两水者，非也。《辽史·营卫志》五国部族，其故城分居五地，自三姓至乌苏里江、松花江，有城基九处，即五国故城。黑龙江发源蒙古喀尔喀部垦特山，山之东南，二水分流，合为克鲁伦河。辽之胪朐，即今之克鲁伦河。元之斡难，即今之敖嫩河。其发源于垦特山者，流分为二。其相会而成者，则合胪朐、斡难而为一也。皇上威棱远播，疆宇宏开，所由镜清砥平，而中外咸庆义安已。

制策又以天生庶物，以养万民，而国之大用，即于斯出。臣谨案，《禹贡》任九州土地所宜，与《周礼》列祭祀宾客之物，皆不及茶。大抵茶之为用，贵于唐，故茶税之征，亦起于唐。德宗建中元年，纳户部侍郎赵赞之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其一，以为常平本钱。贞元九年，张滂奏以三等定估，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茶官之设自此始。穆宗时，王播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天下病之。茶马之法，亦起于唐，自回纥入贡，而以马易茶之法立。赵宋设茶马司，以赵开综其事。江陵、淮南，为场置吏以榷之。元明茶课，大率沿宋时之旧制为多。宋初行三说法，第茶为三等。太祖谓上等之说，取利太深，下等又灭裂无取，惟中等之说，可以经久。天圣中，李谘请罢三说，行贴射法，绝虚估之弊，而烦费顿省。明之茶马司，设于秦、洮、河、雅诸州。批验所设于应天、宜兴、杭州等处。远番重茶，以资其生。成化中，令巡茶御史招番易马。今则茶市之通，济及海外。治人治法，盖视前代为尤善已。皇上丰财和众，节用爱人，固已裕不竭之源，而著生财之道矣。

制策又以自古极盛之朝，莫不以边防为重，因详求历代设守之方，以收陆聋水栗之效。臣惟周宣王时，猃狁内侵，命尹吉甫帅师伐之。《诗》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汉严尤谓为得中策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以中土初定，不遑远略，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然群羌并辑，防边之道未为失也。唐设安西、北庭四镇，以都护统之。后陷于吐蕃，遂有废四镇之议。然兵有控制，宜崔融之力持也。夫古者防惟在陆，今则防兼在海。通商以来，藩篱洞开。东北海以朝鲜为屏蔽，山东之登，、青、莱三郡，突出海外，与奉天

之旅顺隔海相对,海面不及二百里。宜以重兵扼守,为畿辅之翼卫。江苏之吴淞,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台湾,广东之虎门,皆宜严兵固守。其由海入江之路,则归重于福山、狼山。练海师者,诚能广搜将才,置诸麾下,认真操练,将海疆万里,固于金汤。兵法曰:战器不如战地,战地不如战人。自古用兵,未有不以得人为先也。皇上三曾秉武,八表抗棱,则耀参伐于金枢,振雕戈于玉海矣。

夫进德修业,治之原也;分土建邦,治之要也;任地作贡,治之经也;奋武安边,治之务也。千圣百王之道,恒必由之。况皇上亲政之初,纪纲治忽所由关,即亿兆观瞻所由系。诚能兢兢业业,日进无疆,锡极以诚民,披图以度地,理财以足用,柔远以睦邻,本持盈保泰之心,致累洽重熙之治。于以恢帝者之上仪,扬丕天之大律,明德新民,而止于至善。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的帝王统御天下,一定首先学习学问来慎重修身,区分地理形势来端正尊位,增加财富来丰裕国家,设置要塞来安定边疆。因此,不偏不倚地治理国家,是尧时的最高法则;参拜泰山,祀封太岳,是舜时的盛大治国模式;厚待天下苍生,端正品德,是大禹时所推崇的治国良策;开通道路,招附远方的人归服,是西周强盛时的原则。夏、商、周三代以后,圣明贤良的君主和美好的帝王,史不绝书。但对探究安定百姓的治国之道,治理国家的宏伟谋略来说,无不采择精要,调和心性本原,对《尚书》传付修养心性的训示保持高度警惕;居于中心,谋划治理四方,像《诗经》所咏唱《玄鸟》中匡正国家的篇章那样;重视财货加强贸易,对《周礼》就重视平均财赋的政务;畏惧天威,怀有仁德之心,对《左传》讲述的巩固边防的章节就详加注意。凡是协调阴阳之道,调理天下万物,写到史书上就成为后世效法的治国良策,推行到国家的各个地方就成为治国良谋,都是靠的以上措施啊!

敬思皇帝陛下,大道显扬常规准则,治理和天象保持一致。已经有了中正的共同模式,圣人学问得到崇扬,九州宏大而国家安定,六

府三事修明而国用充足，万国端正而海内平安了。近来皇帝陛下又亲自裁决国政，殷切地询访治国之道。采用不偏不倚的恰当的尺度，抱持住纯一作为法式。宣召臣下等到殿廷，策问帝王修心养性、巩固边防、权衡国家财政、显现国家怀柔等诸项大政方针。臣下我这样愚昧，不足承受皇帝陛下的垂询，可又想到现在正当开始对答策问之际，又适值特恩开科的日期，又勉励我们这些士子们各自陈述正直的学说，臣下我怎敢沿袭旧习，以浮华的言辞来应对呢？

伏首恭敬地读到策问上说：帝王修身养性的心法和治理国家的策略是互为表里的，因而探求往昔先贤圣王的微妙之言，往昔圣哲的发端之论。这真正是匡正大位、凝聚天命的本原，臣下我考订：蔡沈所著的《尚书集传》说：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策略，来源于他们的崇高的道德，而他们崇高的道德又发自他们的内心。贯穿《大学》一书的是一个“敬”字，保持“敬”的是心。《中庸》一书的关键在于一个“诚”字，存留诚的，也是心。宋代真德秀撰述的《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取《大学》中属于经文的二百零五个字，从《尚书》的《尧典》、《皋陶谟》、《伊训》和《诗经》的《思齐》篇、《周易》的《家人》卦，以及子思、孟子、董仲舒、扬雄的论述中去探求圣贤学说的渊源和治理国家的根本。自序中说：这是君临天下的君王的律令格式。于是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要旨，分为四大纲目，意图在于以根本去统贯末节，所以略去了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明代邱浚增补此书，把《审几微》放在首位，并列出十二条纲目，这样一来，治国平天下的济世良法明显可观了。对真德秀的原书确有补益。夏良胜的《中庸衍义》多处采用邱浚的论点，对尊崇神仙之道、喜好符命祥瑞、又改变祖宗制度、抑制善类数项，加以详细反复的论述，对当时社会时局确有补益。统治天下的君主，果真能够做到在事理的兴替征兆出现之前就能辨别处理，在性情人欲之中分析天理，认为盛大的夏、商、周三代的时代一定可以到来，天下万事一定得以康宁，不追逐那些儒生死套经书的粗俗做法，而去规正根本，不去讲求书房内的浮华的虚文，而力求务实，那么国政就会得到治理，大道就会得到彰明了。皇上提倡正直的学问，总领天下言论，借鉴完整的法令而无过失，学习古代

圣贤的训示而有收获了。

制策又鉴于东北三省是国家根本重地，因而详尽访求历代的行政建置的沿革情况。这又是注重国体经营疆土的根本策略。臣下我考订：东北三省中，吉林省所管辖的土地最为广阔，自混同江以西，上达三姓；南边接连宁古塔，万山环绕，层层叠叠，是东部边陲的屏障。黑龙江的地势，左靠黑龙江，右边是兴安岭环绕，它与奉天、吉林成为唇齿相依之势。屹立于东北，是边防重镇。金代的上京会宁府，《通志》依据《明一统志》的说法，误认为在宁古塔城西南。按，会宁府即现今阿勒楚喀城，实际在宁古塔城的西北。《新唐书·地理志》中的涑州，在靺鞨黑水府境内，后来此地奏章可专门上达朝廷，于是改成独奏州。唐代的率宾府在率宾国的地盘上，所统领的有华州、益州、建州三州。金代有苏冥河水，在建州东南，就是现在的绥芬河。《明一统志》写作恤品河。认为是两条河，是错的。《辽史·营卫志》五国部族的故城分布在五个地区，从三姓到乌苏里江、松花江，有九处城基遗址，就是五国故城。黑龙江发源于蒙古的喀尔喀部垦特山，此山东南麓，两条河水分流，汇合成克鲁伦河。辽时的胪朐河，就是现在的克鲁伦河。元代的斡难河，就是现在的敖嫩河。其河发源于垦特山，流程中分为二条，再汇合成一条河，又是胪朐河与斡难河合而为一了。皇上威名远扬，我朝疆域宏大，各地清明如镜，如砥石般平直，中外交相庆贺。

制策又认为，上天生出万物，而养育天下亿万苍生，而国家的财用，也从其中产出。臣下我考订：《尚书·禹贡》按照天下九州土地出产的实际情况让各地交纳贡赋，它与《周礼》上列举的祭祀、招待宾客的物产，都没谈到茶叶。茶做有用的物品，大体上到唐朝才被看重。因此，征收茶税，也从唐代开始。唐德宗建中元年，朝廷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征收茶、漆、竹、木材税，税率为十分之一，把这作为朝廷赈济灾荒的常平仓的本钱。贞元九年，张滂上奏建议，把茶分成三等定价，自此一年得税钱四十万缗。后来王涯兼管盐铁度支二机构的长官，设置了榷茶使，让令狐楚代理盐铁使兼榷茶使。茶官的设置，是从此开始的。唐穆宗时，王播增收茶税，税率大概一百钱中又

增加了五十钱,天下百姓因此困扰。茶马法也是起源于唐朝。自从回纥入朝进贡，用马匹交换茶叶，茶马法就出现了。宋代设置了茶马司,让赵开统领这方面的事情,江陵、淮南开设交换场所,设置官吏征税。元明两代的茶税,大体上沿用了宋代的旧制。宋初,实行茶叶贸易的三说法。把茶分成三个等级。宋太祖认为上等取民财物太过,下等又不可取,只有中等之说可长久实施。仁宗天圣年间,李咨上书请求罢除三说法,而实行商人贴纳利息官买官卖的贴射法,杜绝对茶虚估价钱的弊政,而烦杂的费用一时得以减少。明代的茶马司,设在秦州、洮州、河州、雅州。批验所设在应天、宜兴、杭州等地。边远的少数部族很看重茶叶,凭茶来调剂生活。明代成化年间,朝廷命巡茶御史招揽边疆的少数部族，用马交换茶叶。现今茶叶的贸易甚至到了海外。在管理人员和管理制度上，远远胜过前代了。皇上丰富国家财物,和睦天下百姓,节约国家财政,爱护天下黎民,本来已经拓宽了不枯竭的财源,而推广了生财之道了。

制策上又认为自古在极盛时期没有不以加强边防为要务的，因而详尽访求历代防守边疆的策略,以收巩固边疆、威震敌胆的效果。臣下我考订：周宣王时，北部猃狁族内侵，于是宣命尹吉甫率师征伐。《诗经》上说:征伐猃狁,到了太原地带。汉代时严尤评价说这征伐是守卫边防的中策。汉武帝在北部修筑朔方城,西边设乌垒戍守,一时匈奴震恐,而中原也因此耗费财力。东汉光武帝时,因中原刚刚平定,无暇图谋边疆,因而拒绝了西域部族设都护的请求,并且迁徙幽州、并州的百姓到边塞脚下,虽然没有困扰中原去致力四夷,可又未免示弱,但西北众多羌族部落安然无事,因而也不算失策。唐朝设置安西、北庭四镇,以都护统领。后来西域被吐蕃攻占,于是朝廷有了罢废四镇的建议。然而当时军队控制着这一地区，难怪崔融极力坚持了。古代边防只在陆地上，现在又加上了海防。与外国通商以来,门户大开,东北海域以朝鲜为屏障,山东的登州、青州、莱州三郡突出在大海之外,与奉天的旅顺隔海相对,海面上相距不到二百里,应当重兵扼守，成为畿辅之地的拱卫力量。江苏的吴淞、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与台湾、广东的虎门都应有兵士坚守。由海域进入长

江的道路上,福山、狼山是守卫的要地。操练海军的人如真正能做到广泛收罗将才到麾下,认真地操练,那么万里海疆,将会固若金汤。兵法讲道,凭借武器作战不如凭借地利作战,依凭地利作战不如靠人和作战。自古用兵作战没有不以得人心为首要任务的。皇上扬威天下,宣扬武力,使天河的参星、伐星耀眼夺目,军队的威武遍及大海了。

提高德性,勤修学业,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本原;分封土地,建立藩邦,是治国的要道;按地利实际制定贡赋,是治国的良谋;宣扬武力,安定边疆,是治国的要务。历代圣贤帝王的治国之道,都是如此。况且皇上刚刚亲政,朝廷纲纪的废替兴盛,也就是亿万百姓在观看的目标。如果陛下真正能够兢兢业业,每日精进不已,施布最高准则以和谐百姓,披览国家形势以治理天下,调理国家财务使财物充足,怀柔远方的部族来亲善睦邻。本着保持国家安定兴盛的心意,力求达到功绩相连、累世升平的大治局面。以此来宏扬作为帝王的最高礼仪,宣扬上天的最美妙的模式,完美道德,使百姓更新,而达到最完美的地步,那么我大清国家亿万年的长治久安,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是学识浅陋、刚要被进用之人,不知忌讳,冒犯了天威,禁不住恐慌颤抖以至跌倒。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孙文阁译〕

清德宗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

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殿试策问

[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纂承大宝,今十八年。仰诵列朝圣训,亲奉皇太后明教,期与薄海内外,极养治之道,一以爱民为心,以钦若天命。每于边圉之要,朝觐之仪,仓庾之储,兵屯之制,咸据旧以鉴新,将执中而立极,嘉与宇内之士,共臻上理。尔多士其进谋诵志,以沃朕心。

西藏屏蔽川滇,为古吐蕃地。何时始通朝贡?地分四部,由中国入藏,有三路,幅员广狭奚若?试详言之。元置吐蕃宣慰司及碉门等处宣抚司,复置乌斯藏郡县,以八思巴领之。其沿革若何?唐时吐蕃,建牙何地?阿耨达当今何山,其相近大山有几?雅鲁藏布江为藏中巨川,而澜沧江、潞江之属,亦发源藏境。能究其原委欤?由藏至天竺,程途远近何如?中隔部落几许?亦考边备者所宜知也。

五礼之目,宾居其一。《周礼》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其别有八。而朝之别,又居其四。其说若何?《书》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与《礼记·王制》不同。而《秋官》行人六服,与《周语》五服又相牴牾。其说果可通欤?《郊特牲》旅币无方一节,盖诸侯朝天子庭实之礼。于他书有可证否?朝位宾主之间,儒者讲说不一。何以辨之?古诸侯朝天子礼,自《周官》外,存于今者,尚有遗篇欤?自秦罢侯置守,无复古仪。

杜氏《通典》,分为四条。其目若何?于义当否?可详说之。

《周官》仓人主藏九谷,廪人主藏九谷之数,赙赐稍食,即今京通仓之制所昉也。后世有治粟内史、搜粟都尉、仓部郎等官,专司其事。其官名沿革,时代先后,尚可考也。明初置京通仓,以户部司员经理之。其以尚书、侍郎专督仓场,始于何年,所属更有何官,与今制若何,能悉数之欤?前代良法,积久弊生。偷漏之私,烂蒸之患,欲彻底清厘,果有尽善之策欤?

三代之盛,寓兵于农,因井田以供军实。自秦以来,法久坏矣。汉文帝募民耕塞下,于是始有屯田之法,盖犹具兵农合一遗意。历代相沿,大端莫易,而汉时行于西域者,为较详。车师、渠犁、乌孙、伊循等名,今为何地?校尉、都护等官,置于何时?傅介子、常惠、郑吉诸人所屯者,为当时何地?赵充国《屯田》一疏,经画周详,所陈便宜十二事,能举其要否?自时厥后,六朝唐宋言屯田者,皆沿汉法。或以民屯,或以兵屯。能援古证今,究极利弊而详陈之欤?

此皆御世之要图,经国之大业也。朕嘉先圣之道,修古帝王之行,事凡以求于生民有济。汉武有言:君者心也,民犹肢体。夫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其言也典,其致也博,策之谓也。多士勤学洽闻,能宣究其意者,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君子矜持而不争斗,合群但不搞宗派。孔子说:君子不因为这个人一番话而提拔他,不因他是坏人就废弃他说的好话。

这种礼制,通行到诸侯大夫直至士人和平民百姓。

一块井田,共九百亩地。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八户人家各拥有一百亩私田,共同负责耕种这一百亩公田。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天子大位,至今十八年了。每日恭敬诵读我大清列朝祖宗的训示,又亲身受到皇太后的教诲,期望能够在海内外,达到最高的养身治国的境界,完全以爱民为己任,以迎承上天之命。皇帝我常对边防守卫的要务,各地朝觐的礼仪,国家粮仓储备的大政,军队驻扎制度,留心注意。以史为鉴,启示今天,寻求到适中的原则,树立起治国安民的最高法则,高兴地与天下的士子们共同步入最美好的治理状态。你们这些士子要进献治国之谋,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志,给皇帝我提出恰当的建议。

西藏是川滇的屏障,是古吐蕃地。它什么时侯开始向中原朝廷朝贡?西藏地区分为四部,由中原地区进藏有三条路,幅员广狭状况如何,请详尽论述。元朝设置吐蕃宣慰司及碉门等处宣抚司,又设置乌斯藏郡县,让八思巴统管。沿革情况怎样呢?唐代时吐蕃在什么地区建官署?阿耨达是现在什么山,临近的大山有哪些?雅鲁藏布江是西藏大河,而澜沧江,潞江等河也发源于西藏境内,能讲明它们的详细情况吗?由西藏至天竺印度,路途的远近情况怎样,中间有哪些部落相隔?这些也是考察边防武备的人应了解的。

吉、凶、军、宾、嘉的五礼中,宾礼是其中一部分。《周礼》大宗伯,通过宾礼亲近招抚邦国。它有八项内容,而在朝见上的礼仪又占了四项。这种说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尚书》上讲,君主五年巡狩一次,各地诸侯藩王进行四次朝觐,与《礼记·王制》也不相同。而《周礼·秋官》行人有六种臣服制度,与《国语·周语》所讲五种臣服的制度相矛盾。这里面有一致的说法吗?《礼记·郊特牲》旅币无方一节中,是诸侯朝觐天子时在朝堂所陈列的贡品的礼仪。在其它书中有证据吗?在朝堂上宾主所在的位置,儒士讲说不一,怎样分辨呢?古代诸侯朝觐天子的礼仪,除《周礼》外,还遗留其它篇章吗?从秦时罢除诸侯设置郡守,再没有恢复上古的礼仪。杜佑的《通典》分成四个条目,都是什么样的条目呢?条目的含义恰当吗?可详细论说。

《周礼》中,仓人主管粮食的储藏、廪人主管仓储粮食的数目,赈济百姓粮食,按月发给官员官俸。这是现在京通仓制度的源头。后代又有治粟内史、搜粟都尉、仓部郎等官员,专门管理这些事情。这些

官名的沿革及设置时代的先后还可以查考。明初,设置京通仓,让户部司官员经管,而让尚书、侍郎专门监督仓场,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他们所管辖的有哪些官员?与今天制度相比怎样?能完全列举出来吗?前代良好的方法,经历时间长久了,也会产生弊病,国库粮食被偷窃和烂蒸的祸患,要彻底清除,真有完善的对策吗?

强盛的夏商周三代,寓兵于农,凭井田制供应军需。从秦朝以来,井田制废坏很久了。汉文帝招募百姓去塞下耕种,于是就有了屯田。屯田还残留兵农合一的样子,历代递相沿袭,大体制度没变。而汉代在西域地区实行的比较周详。车师、渠犁、乌孙、伊循等地名,现今是什么地方?校尉、都护等官是在什么时间设置的?傅介子、常惠、郑吉等人所屯田的地方在当时的什么地区?赵充国的《屯田疏》,谋划得详细完备,奏疏中陈列的有利国家的十二项事情,能举出其中的主要内容吗?自那以后,六朝唐宋谈论屯田,都沿用汉代的方法。有的是民屯,有的是军屯,能够援引古书的记载证论现在,推究它的利弊吗?请详细陈述。

以上这些都是统领天下的主要策略,治理国家的大事。皇帝我赞美仰慕先贤圣哲的大道,力求像上古圣贤帝王那样去统治国家,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对百姓有好处。汉武帝有句话说:君主是腹心,百姓像肢体。扩大帝王仁爱之心,增加智慧,没有比策问访求治国之道更好的。研究事理,没有比对策更好的。对策的言论很典范,能收到广博的功效。你们这些众多的士子勤苦学习,见识广博,是能够大力推究这些治国之道的人。不要空泛,不要隐匿,都尽情言说。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刘福姚　殿试对策

刘福姚(生卒年不详)　字伯崇,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光绪十八年(1892)状元,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臣对:臣闻《管子》之言: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

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其道。务德以怀之，陈礼以经之，财储而国富，农勉而战戢，莫不守始治纪，牧领海内。故近悦远来，家给人足。《传》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易》曰嘉会足以合礼。《记》曰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诗》曰彻田为粮。四者至急之务，经久之规，治国者当留意也。

钦惟皇帝陛下，持纽三曾，经纬六合，陶天下为一家，运大钧于万品。斯时民物滋丰，疆圉无事，固已执饬大象，翔洽泰鸿矣。乃圣怀冲挹，咨访犹殷，思久道之化成，冀迩言之可察。进臣等于廷，而策之以绥远、正仪、储粟、屯田诸大政。臣之愚昧，何足仰补高深？顾当登明选公之日，必尽献可替否之义。复恭奉谕旨，勖多士以毋泛毋隐。其何敢摭拾涂饰，虚应故事耶？

伏读制策有曰：西藏屏蔽川滇，为古吐蕃地，而因考其郡县职官之沿革，山川道里之周详。此诚柔远之先务也。臣谨案：吐蕃为西戎之一，自周及隋，未通中国。唐贞观八年，遣使入贡，为通朝贡之始。地分四部，前藏最狭，后藏最广，阿里界乎其中。中国入藏大道有三：由陕西西宁府南行，为北路。由四川打箭炉西行，为中路。由云南丽江府北行，为南路。南北二路，尤为商旅所经。元宪宗时，始置吐蕃宣慰司，于碉门等处置六宣抚司。世祖时，置乌斯藏郡县，以僧八思巴领之。明洪武时，复置指挥、宣慰、招讨等司。此职官沿革之略也。阿耨达即冈底斯山，相近大山凡四。雅鲁藏布江，源出达穆楚克喀巴布山。澜沧江有二源：一币楚河，一鄂穆楚河。潞江源出喇萨北，有泽名布喀。经云南丽江府、永昌府，流至缅甸而入海。天竺东方大城，即汉身毒国。元曰忻都，今曰印度。由藏至天竺，约二千里。中隔部落三：曰布鲁克巴，曰哲孟雄，曰廓尔喀。惟廓尔喀仅足自保，余俱弱矣。皇上八表抗棱，万方慕义，西蕃回首内向，庶几永作屏翰也已。

制策又以五礼之目，宾居其一，而因详求朝觐之礼。此诚帝者之上仪也。臣谨案：《周礼》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宾之别也有八，而朝居其一。朝之别也有四。四朝者，周制，天子有四朝：曰外朝，曰中朝，曰内朝，曰询事之朝，此四朝之别也。《书》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与

《礼记·王制》不同。其不同者,一唐虞时制,一周制耳。《周礼》九服,见于《职方》。《秋官·行人》六服,说者谓指王巡狩而言。《周语》以甸、侯、宾、要、荒为五服,其说相去太远,未可强通也。《郊特牲》旅币无方一节,惟《觐礼》侯氏奉玉帛以升之文,可以为证,然《仪》文略有不同。朝位宾主之间,先儒讲说不一。熊氏谓朝无近法,享则有之。其说为优。古诸侯朝天子礼,《周官》外惟《明堂位》一篇,最足依据。此外则《逸周书》之《王会篇》,为最著。他若杜佑《通典》,采掇亦颇精审。《通典》又言:秦罢侯置守,无复古仪。所分四目,如《诸侯遣使来聘》,以三代下无其礼者,特未知礼可因时制宜耳。皇上垂衣黻服,坊表群伦,典则所昭,洵足式臣工而安远近已。

制策又以《周官》仓人、廪人,为今京通仓所由昉,而因进求美善之规。此诚裕国之至计也。臣谨案:《周礼》仓人主粟入之藏,廪人主藏谷之数。《地官》所载,制度昭然。下及后世,秦有治粟内史,汉有治粟都尉,武帝时复置搜粟都尉。魏有大农,晋有大司农。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梁置葵库、获库、箬库诸丞,隶司农。其物仓廪储谷所需,设官以掌。隋有司农寺卿,唐因之,又有太仓令、诸仓监、监仓御史。五季有三司使,宋以他官分领京仓。辽有司农寺,元有京畿都漕运使。官名沿革,时代先后,略可考。明永乐都北京,置京通仓,以户部司员经理之。宣德五年,始命李昶为户部尚书,督其事。《明史·职官志》不具载。考《食货志》,攒运有郎中,监仓有主事,即今之坐粮厅及仓场监督也。夫前代良法美意,行之日久,遂有偷漏及烂蒸之弊。说者谓偷漏之私,由于封锁之不固。烂蒸之患,由于晾晒之不勤。苟非在事臣工随时稽察,则典守者肆行偷漏,复恐亏绌其数。即以糠秕、水谷杂糅之,而烂蒸之患益甚。《明志》所称:粮长搀沙水于米中,往往蒸湿浥烂,至不可食。而仓场额外科取,岁至十四万。设任用得人,不惮发其覆而摘其奸,何难洗仓场积弊乎?皇上廑念仓储,勤求整饬,庶几如崇如墉,咸欣有备无患也已。

制策又以三代之盛,寓兵于农,而因讲求夫屯田之法。此诚靖边之大防也。臣谨案屯田之法,为备边要策,足食良谟。汉文帝用晁错策,募民耕塞下。其后屯田西域者,傅介子田于伊循城,常惠将三校

屯于乌孙赤谷，郑吉屯田渠犁及车师。即今之辟展、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孝武时，西域始通中国，置中垒校尉领护之。元帝时，置戊己校尉。校尉之置官，始于此。宣帝时，遣司马护南道鄯善以西诸国。神爵三年，单于日逐王来降，郑吉迎之。使吉并护此道，号日都护。据《西域列传》，谓都护之名，始于郑吉是也。赵充国《屯田》一疏，经画周详。而综其大旨，要归于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威德并行，兵农相辅。可谓老成谋国，动中机宜。自汉以后，六朝唐宋略有变革。北齐于州刺史稽华，修城左右屯边地。周赡又于河内置怀茂等屯，止河南转输之劳。唐郭子仪屯田河中，韩重华屯田振武。凡此皆为备边省费之计。今推广行之，固边疆之利也。皇上威震殊俗，海宇乂安，寓边防于井牧，洵万世以永赖者矣。

若此者：固封守，饬礼法，实仓储，备耕战，兼才尚权，右计左数，仁圣事赅，帝王道备，巍乎其莫尚矣。臣之至愚，尤伏愿皇上，通万方之略，得致一之嫩，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蛮夷已附，而益事羁縻；槃敦已饬，而犹殷考订；仓庾已充，而更严察核；边陲已靖，而力务耕耘。于以体尧蹈舜，甄殷陶周，德泽满于天下，灵光施于四海，会归有中，御衡不迷。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管子》中有这样的话：大凡辖有国土统治百姓的君主必须致力于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必须看护好国家的粮仓。国家财用充裕，那么远方的百姓会归附而来，土地开垦了，百姓才会留下居住生活。仓库富足，百姓才会知晓礼节；衣食丰足，百姓才会有荣辱之心。君主使用的衣服器物合乎法度，那么六亲才会和睦团结，礼义廉耻这四维得以伸张，那么国家法令才会推行得开。上古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按照正道做。增强修养，以德行安抚百姓。设置礼仪，以此来治理国家。财用储备丰足而国家就富强，农民努力耕作而战争就止息。没有一个先贤圣王不坚守自己的圣贤之心，整饬朝廷纲纪，统治天下的。因此，国内百姓欢欣，远方部族归附，家给人足。《春秋左氏传》上讲：以合乎礼义的行为招抚背离的百

姓，以君王的德行来感召远方部族。《易经》上讲：美善的聚合，才会合乎礼义。《礼记》上说：朝廷命令百官恭谨地看守好粮仓府库，命令司徒巡视各地的钱粮聚集之处，务必使钱粮得到很妥善的保管。而《诗经》上则讲：开垦田地多打粮。这四个方面都是紧要的事务，都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法，治理国家的人是应当悉心注意的。

敬思皇帝陛下，抓住大纲，措置上下四方，治理得四海如同一个家庭那样和谐。对天下万物也悉心调理，合乎自然。此时百姓丰足，万物滋润，疆域平安无事，业已掌握治国大道，融洽万事万物了。而现今圣上仍怀谦逊之心，积极询访治国方略，希望坚持长久，形成教化，对浅近的言辞也详加体察。宣召臣下等人到殿廷，而策问安抚边疆、匡正礼仪、储备粮食、屯垦田地的大政。臣下我愚昧无知，怎能对陛下高深的学问有所补益？只是正当国家公正选拔士人的日子，必须尽到对朝政提出可行与否的做法的为臣之义，再加上恭敬地看到陛下又勉励我等应对不要空泛，不要隐匿自己的思想。在这里又怎敢拾人牙慧、粉饰一番、虚应故事呢？

跪拜敬读制策上有这样的话：西藏像屏障那样围护川、滇，是古代吐蕃地，因而考察西藏的郡县、职官的沿革轨迹，山川、疆域、各个通道的详细情况。这确实是安抚边远之地的要务。臣下我恭勤地考订：吐蕃是古代西戎之一，从周到隋末，没有和中原交往、唐代贞观八年，吐蕃派使臣入朝，这是与中原交往、给中央进贡的开始。它的地域分为四部分。前藏地区最狭小，后藏地区最宽广，阿里则界于两者之间。从中原进入西藏的大路有三条：从陕西行省的西宁府南行入藏为北路，从四川打箭炉西行入藏为中路，由云南丽江府北行入藏为南路。南北二路尤其是商旅们行走的道路。元宪宗时，开始设置吐番宣慰司，在碉门等地设置六宣抚司，元世祖时设置了乌斯藏地区的郡县，让僧人八思巴统领。明朝洪武年间，又设置了指挥、宣慰、招讨等司。这是职官沿革的梗概。阿耨达就是冈底斯山，相近的大山共有四座。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达穆楚克喀巴布山。澜沧江有两个源头：一是帀楚河，一是鄂穆楚河。潞江发源于拉萨北边的布喀泽，流经云南丽江府、永昌府，流入缅甸入海。天竺东方的一座大城，就是汉代的

身毒国。元时叫忻都,今天叫印度。由西藏至天竺,大约二千里。中间有三个部落相隔,叫布鲁克巴、哲孟雄、廓尔喀。只有廓尔喀仅足自保,其余的都很弱小了。皇上威风传播天下,万方仰慕德义,西部蕃属已经归附,大概永远是我朝廷的屏障了。

制策上又鉴于吉、凶、军、宾、嘉五礼中,宾礼居于一个方面,因此详尽访求朝觐之礼。这正是统治天下的君王的最高礼仪。臣下我考订:《周礼》大宗伯通过宾礼来使邦国亲附。宾礼的类别有八项,而朝见的宾礼是其中一项。朝见的宾礼又有四类。四朝按周代制度,天子有四朝,叫外朝、中朝、内朝、询事之朝,这是四朝的类别。《尚书》上又说:帝王五年巡狩一回天下,其它四年,诸侯每年入朝朝觐,与《礼记·王制》的记载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一是唐尧虞舜时的制度,一是周代的制度。《周礼》中关于侯、甸、采等九服制度,见于《周礼》的《职方氏》,而《秋官·行人》的侯、甸、男等六服制,研究者认为是指周天子巡狩而言的。与《国语·周语》所讲的甸、侯,宾、要,荒五种臣服的制度相差太远。不能强求二者一致。《礼记·郊特牲》旅币无方一节,只有《仪礼》侯氏奉持玉帛来献上一文可以引证,然而《仪礼》中文字稍有不同。朝廷中觐见时的宾主的位置,过去儒士讲说不一。熊先生讲的朝觐之礼没有紧紧接近天子的,享献等祭祀之礼则有。这种说法较好。古代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周礼》外只有《礼记·明堂位》一篇最能当作依据。此外,则有《逸周书》中的《王会篇》最著名。其他的像在杜佑《通典》中选材也很精审。《通典》又说:秦代罢除诸侯,设置郡守,不再恢复古仪,所分的四个纲目,如《诸侯遣使来聘》认为夏、商、周三代以下没有这种礼节。这只是不知礼制可以随时势而变化。皇上德业恢宏,无为而治,给天下作出榜样。典章制度所昭示的模式,确实是大臣们仿效的典范,足以使天下安定和平。

制策又鉴于《周礼》仓人、廪人,是现今国家京通仓的源头,因而进一步访求尽善尽美的法则。这真是富裕国家的大计。臣下我考订:《周礼》中仓人这一官员掌管谷物入库,廪人这一官员主管储藏谷物的数目。《周礼·地官》记载的制度,非常明白。到了后世,秦代有治粟内史来管理粮食方面的事务。汉代有治粟都尉,汉武帝时又设置

搜粟都尉。魏时有大农,晋代有大司农,晋哀帝时省去大司农并入都水部门,晋孝武帝时又设置了大司农。南朝梁时设置茭库、荻库、箬库诸丞,隶属司农管辖,朝廷中的财物及粮食储备,需要管理的,设置官员来主管。隋代有司农寺卿这一官员。唐代沿袭下来,又设有太仓令、诸仓监、监仓御史等官。五代设有三司使官员,宋代让别的官员兼管京师的仓库。辽时有司农寺。元代设有京畿都漕运使。官名的沿革,设置时代的先后,大体可考。明朝永乐年间,建都北京,设置京通仓,让户部司官员经管,宣德五年开始任命李昶为户部尚书,督察此事。《明史·职官志》对此无明确记载。考察《明史·食货志》则有:协助粮食运输的官员有郎中,监督粮仓事务的则有户部主事,也就是现今坐粮厅及仓场监督。前代的美好的法则,施行的日子长久了,于是就产生了偷漏、烂蒸的弊病。谈论的人认为,偷漏粮食是由于粮仓封闭不牢,烂蒸是由于晾晒不勤造成的。假如那些管理的官员不随时监察,那么守仓的小吏就会肆意偷漏,又恐怕日后出亏空数目,于是用糠粃、水谷胡乱放置其中,而烂蒸之患更加严重。《明史·食货志》记载:粮长往谷米中搀和沙水,往往蒸腾潮湿腐烂,乃至不可食用。而仓场每年额外收取的数量达十四万之多。假如任用官吏得当,不怕揭露其中的奸邪之事,那怎么会难于清除仓场中的积弊呢?皇上十分关心国家的粮食储备,大力整顿,差不多国库粮食如山,有备无患了。

制策又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强盛,寓兵于农是得力措施,因而访求屯垦土地的办法。这的确是安定边疆的大谋略。臣下我考订:屯田法是边防的重要策略,是军队粮食充足的好方法。汉文帝采用晁错建议,招募百姓到塞下耕田。后来在西域屯田的人有:傅介子在伊循城屯田,常惠在乌孙赤谷率领兵士屯田,郑吉在渠犁及车师屯田。也就是今天的辟展、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汉武帝时,西域才与中原交往,于是设置中垒校尉领护西域。汉元帝时,设置戊己校尉。校尉职官的设置,从此时开始。汉宣帝时派司马护佑天山南道鄯善以西诸国。神爵三年,匈奴单于日逐王来投降,郑吉去迎接,于是朝廷让郑吉一并护领此道,号称日都护。据《汉书·西域列传》记载,都护之名

开始于郑吉。赵充国的《屯田疏》，谋划完备详细，而概括其要旨，可归纳为国内不费财物，对外又有守卫边防的武备力量，威德并行，兵农相辅。可以说是老成持重，为国谋划，一动就切中机宜。自汉以后，六朝、唐、宋略有变化。北齐时，于州刺史稽华在边防上修筑左右城塞屯田。周赡又在河内郡设置怀茂等屯。解决了河套地区粮食运输的烦恼。唐代郭子仪在河中郡屯田，韩重华在振武郡屯田。这些都是防备边患、减省财物的大计。今天推广这些经验，可收到巩固边疆的效果。皇上威名震动少数部族地区，天下平安，安定边防的策略寓于屯田之中，确实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了。

像以上这些问题：边防巩固，礼仪得以整饬，国家粮仓充实，耕战有准备。任用有才之士，崇尚权变之术，仁慈圣明的事体都包括了，帝国的治国之道都具备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臣下我十分愚昧，希望陛下通晓治理国家的各种方略，掌握君王纯一的心性修养的妙法。采纳儒家、墨家的长处，选取名家，法家的治国要点。边疆少数部族已经归附，更加进行羁縻安抚。礼仪规范已经整饬，还要进行考订；粮仓已满，而更严加检察审核。边防已经安定，更力求从事农业加强国力。以尧、舜为榜样，陶冶夏、商、周三代。使恩泽遍布天下，功德灵光分布四海。使各地聚合归附有那最为适中的准绳，统御国家不会迷乱。那么我们国家亿万年的长治久安，就奠基于此了。臣下我是学识短浅、新被进用之人，不知忌讳，冒犯天威，禁不住恐慌颤抖以至跌倒。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孙文阁译〕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

庆以地。

殿试策问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仰昊苍眷佑,兢兢业业,今二十年。恭逢皇太后六旬万寿,上维《鲁颂》寿母之诗,俯思《大雅》作人之化,特开庆榜,策试多士。又尝恭读康熙戊戌科圣祖仁皇帝《策问》:"天子以乂安海宇为孝。是以夙兴夜寐,勤求至理;政事之余,留意经术"。圣训煌煌,为万世法。兹举河渠之要,经籍之储,选举之方,盐铁之利,揆时度势,酌古衡今,尔多士其扬榷陈之。

治水肇于《禹贡》,畿辅之地,实惟冀州。水利与农事相表里。后汉张堪为渔阳守,开田劝民。魏刘靖开车箱渠。能备述欤?至营督亢渠,引卢沟水资灌溉。能各举其人欤?唐朱滔、卢晖,宋何承矩,浚渠引水。能指其地否?元郭守敬、虞集,议开河行漕,其言可采否?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可否见之施行?能详陈利弊欤?

汉世藏书,中秘最善。刘向所校,仅名《别录》。至其子歆,始总群书而奏《七略》,传注所引,秩然可征。班志艺文,与刘《略》出入者何篇?魏晋以后,郑默《中经》、荀勖《新簿》,体例若何?梁华林园,兼五部

以并录;隋修文殿,分三品以收藏。唐承砥柱之厄,始付写官。宋籍建业之余,尽送史馆。此皆册府遗文,可资掌录。明《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今不存者见于何目?能备举以资考证欤?

选举为人才所自出。翰林以备顾问,六曹以观政事,县令以司赏罚,三者皆要职也。翰林始重于唐,其时学士出入待从,参谋议,知制诰。能详其品秩欤?宋儒馆有四,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其选用之制若何?六曹昉自《周官》,秦汉隋唐互有沿革。能陈其异同欤?晋制,不经宰县,不得人为台郎。而后世或缙绅耻居其位,或科甲无不宰邑。岂轻重各因其时欤?抑增重激劝,或得或失欤?

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论者谓其尽取民利,而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与管子异矣。其时所置盐官二十八郡,铁官四十郡,能指其地欤?终汉之世,屡罢屡复,其年代皆可考欤?唐贞元中,检校盐铁之利,其议发于何人?若第五琦、刘晏、裴休之论,固无足采欤?请引采盐,而商擅利权;禁民贸铁,而官多侵蚀。其流弊能指述欤?

凡此皆御世之隆谟,经国之盛业也。夫朕以藐躬,加于臣庶之上,受祖宗付托之重,惟思恪遵慈训,周知民隐,旁求俊乂,孜孜为治,以跻斯世于仁寿之域。尔多士各抒谠论,毋泛毋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居住在达巷党的人们称赞道:孔子真伟大啊!

孔子说:道并不远离人们,如果有谁施用道却远离了人们,那他就根本不能够施用道。《诗经·伐柯》有这样的诗句:制斧柄,制斧柄,规格近在你手中。倘若握着旧斧柄制作新斧柄,斜着去看它们,也就不知道新斧柄的规格可以参考近在手中的旧斧柄。因此君子根据人的共性去治理人,只要他能够改正过失就不必再去苛求。忠正宽恕是离道不远的。

赏给土地。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祖宗伟大的基业,仰仗苍天的眷爱佑护,兢兢业业地治理天下,迄今已经二十年了。现在恭逢皇太后六十寿诞,上念《诗经·鲁颂·闷宫》祝母长寿之诗,下思《诗经·大雅·棫朴》造就人才的化导,为此特开恩科策试众士。皇帝我又曾恭敬拜读康熙四十三年戊戌科圣祖仁皇帝的《策问》,其中说:"天子以安定四海为孝。所以我起早贪黑,勤于追求最佳的治理;政事之余,留意经典著作的研究。"圣祖仁皇帝的这一遗训辉煌灿烂,是后代万世效法的榜样。现在列举水利的要领、经籍的收藏、选拔人才的方法、盐铁的利益等方面问题,希望你们这些读书人审时度势,考察历史,衡量当今,加以阐扬而做陈述。

治水的记载始于《尚书·禹贡》。现在京畿之地实际上位于《禹贡》九州中的冀州之内,水利与农事是互为表里的。东汉张堪担任渔阳太守时,垦辟上地,鼓励民众耕种。三国曹魏时的刘靖,也曾修建车箱渠。这二人的事迹可以完备地叙述吗?至于修建督亢渠,引卢沟水帮助灌溉。你们能够举出这两项水利工程的领导者吗?唐朝朱滔、卢晖,宋朝何承矩,疏浚水渠引流浇田。你们能够指出水渠流经之地吗?元朝郭守敬、虞集,讨论开凿运河作为漕运水道,他们的见解我们今天是否可以采用呢?明朝汪应蛟建议修筑闸坝,申用懋建议考察地理辨别水源。他们的建议可否施行于今日?你们能够详细地陈述其利弊吗?

汉代的藏书,以宫廷藏书为最佳。刘向把所校宫廷藏书逐一评论,汇为《别录》一书,但是未能体现出比较系统的图书分类。到了他儿子刘歆,才开始在《别录》的基础上把这些图书分为六大类而摘录要点编成《七略》一书进呈,古籍传注对其内容的引用,到今天仍可以清晰地考察出原书的面貌来。班固撰写的《汉书·艺文志》,与刘歆《七略》互为出入的图书有哪几种?魏晋以后,曹魏秘书郎郑默所编《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勖所编《中经新簿》,它们的体例如何?梁朝把

官苑华林园的藏书分为五类予以著录。隋炀帝时把三十七万卷宫廷藏书筛选整理为标准本，藏在洛阳修文殿，并把五十部副本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分别藏在长安、洛阳的宫省官府之中。唐朝承受到运书的船只在底柱撞沉的厄运，才开始组织人员抄写校勘图书。宋朝得到了南唐建业都城的藏书的剩余部分，全部送入史馆之中。这些图书都是宫廷藏书的遗存，可以有助于登载取用。明朝《永乐大典》所收之书如今不见存世的，可以在什么书目上看到？你们能够全部列举出来以便有助于考证吗？

人才选拔制度是关系到人才能否脱颖而出的途径。翰林的职责是随时为君主提供顾问，六部的职责是处理政务，县令的职责是掌管民间赏罚，这三种职务都是重要的职务。翰林被重视是从唐朝开始的，当时翰林学士跟在皇帝的身边活动，参与谋划，负责起草诏令。你们能够详细地叙述唐朝翰林院的等级区分吗？宋朝掌管藏书、校书、修史的机构是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这些馆阁专职职官的地位清贵而接近皇帝，非名流不得任职。当时的选拔任用制度如何呢？六部的设立源于《周礼》，秦汉隋唐对其制度各有沿袭与变革。你们能够陈述历代的异同吗？晋朝的制度规定，未曾担任县令者不得升入省台任职当郎官，可是后代士人却把担任县令看成是耻辱，但有时却进士们没有不去出任县令的。这难道是各朝对县令的重视程度各因当时的情况不同而造成的吗？或者是在加重县令的地位、激励人们愿意当的措施上各有得失呢？

盐铁利润的征收，始于管子的盐铁专卖政策。评论者认为这是尽取民利的做法，可是这一制度实行了数千年最终仍不能废止。至于汉武帝采用孔仅、桑弘羊的盐铁官营办法，与管子的盐铁专卖政策不同。当时在二十八个郡设置盐官，在四十个郡设置铁官。你们能够指出这些盐铁官署的所在地吗？在整个汉朝，盐铁官署屡次裁撤又屡次恢复，具体的年代你们都能考察出来吗？唐朝贞元年间，查核天下盐铁经营情况，这一建议是谁提出的？像第五琦、刘晏、裴休的见解，果然不足以采用吗？实行私人申请食盐经营权的批文制度，则将导致盐商独获暴利；禁止民间经营铁业，则将导致官吏侵吞铁业利益者众

多。这两方面的流弊你们能够指出来吗?

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属于治理天下的重要谋略和管理国家的重大事项。皇帝我凭着自己这渺小的身躯,位居在天下臣民的上面,肩负着祖宗托付的重任,一心恪守皇太后的慈训,尽量周全地体察民间的疾苦,广求俊杰贤士,孜孜不倦地治理天下,以期使当代进入仁德而长寿的盛明境地。你们这些士人们应该各抒直言,不要泛泛而谈,也不要有所隐讳。

张謇　殿试对策

张謇(1853~1926)　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次年丁忧。因见朝政日非,遂立志从事实业,创办纺纱、垦牧、轮船、冶铁等企业,以及一系列的文化教育设施。二十七年撰《变法平议》,二十九年为张之洞等起草《拟请立宪》等奏稿,逐渐成为立宪派的领袖之一。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不久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晚年仍致力实业。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行世。

臣对:臣闻善言天者,尊斗极;善言治者,定统宗。民生国计之利弊,不可节节喻也;学术人才之兴替,非必屑屑究也。要在道法而已。孔子之道,集群圣而开百王,其世所诵法大义微言,后千六百余年而复集成于朱子。宋臣真德秀尝本朱子之意,辑为《大学衍义》,自帝王治学,至于格致、诚正、修齐得失之鉴,炳然赅备。是则三代两汉以来,所为力沟洫、宏文章、兴贤能、裕食货者,必折衷于朱子之言,而后是非可观也;必权衡以朱子之意,而后会通可得也。

钦惟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勤又新之德,而又开通言路,振饬纪纲。凡所谓《大学》之明训,前古之事迹,固已切究而施行矣。而圣怀冲挹,犹孜孜焉,举河渠、经籍、选举、盐铁诸大端,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何足以承大对?然臣尝诵习朱子之言矣。朱子之言之具于其书,与为德秀所称引者,无一而非人君为治之法,人臣责难之资

也。其敢不竭献纳之忱乎?

伏读制策有曰:治水肇于《禹贡》,畿辅之地,实惟冀州,而因求水利与农事相表里之故。此诚今日之先务也。臣惟禹所治河,自雍经冀,冀当下流,故施功最先,非直以为帝都而已。自汉时,河改由千乘入海,而冀州之故道堙。今畿辅之水,永定、子牙、南北运河、清河其九大者。东南水多而收水之利,西北水少而受水之害,岂必地势使然?亦人事之未至也。汉郡渔阳,当今密云,而张堪之为守,营稻田八千余顷。继是而往,魏刘靖开车箱渠,修戾陵堰。后魏裴延俊、齐稽华辈,亦先后营督亢渠,引卢沟水,以资灌溉。迹虽陵谷,而事皆较然。宋何承矩廓唐朱潭、卢晖之旧,于雄、莫、霸州,平、永、顺、安诸军,筑堤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既巩边圉,亦利民焉。元世郭守敬、虞集,并讲求水利。郭之所议,今之通惠河也。虞议,则至正中脱脱尝行之。而明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其所规画与郭、虞相发明,当时固行之而皆利矣。夫天下之水,随在有利害,必害去而利乃兴,而天津则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也。朱子曰:治水先从低处下手。又曰:汉人之策,留地与水,不与争。然则朝廷所欲疏瀹而利导之者,其必先于津沽岔口加之意已。

制策又以汉世藏书,中秘最善,而因考证自汉至明册府遗文可资掌录者。臣惟成周外史典坟、藏史简册,虽经秦而煨烬,而兰台、东观秘籍填委,固道术之奥而得失之林也。刘向校书,条篇奏《录》。子歆《七略》疏而不滥。而班志艺文,《书》、《礼》、《小学》、《儒》、《兵》、《诗赋》诸篇,时有出入。虽不尽无当,而总扬雄三书为一序,郑樵嗤其踬焉。魏晋代兴,采撷残阙,则有郑默《中经》、荀勖《新簿》,编分四部,总括群书。而梁之《华林园目录》,五部并列;隋之修文殿副本,三品分藏,盛矣。逮唐之初,砥柱一厄;迄宋开宝,建业再征。由是而写本易为摹印,史馆益便其蒐罗。明《永乐大典》散失,所存犹二万余卷。其中佚文秘典世无传本、见于《文渊阁书目》者,今皆裒辑成编矣。朱子云:不求于博,何以考证其约?又谓:古今者时,得失者事,传之者书,读之者人,而能有以贯古今之得失者仁也。皇上留心典籍,以为政本,岂与夫词臣学子务泛览为淹通哉!

制策又以选举为人材所自出，因考累朝翰林、六曹、县令之轻重。臣惟今世所称清班美授者，翰林之官也。翰林之置，始唐开元。学士只取文学之人，自诸曹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延觐之际，各超本班。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无定秩，无定员。宋凡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各置直官，与其选者为修撰、校理、校勘、检讨，非名流不预焉。迨用为恩除，而参谋议、纳谏诤、知制诰之本意失矣。且不精其选而苟焉以试，除官亦朱子所谓"上以科目词艺为得人，下以规绳课试为尽职"而已。六曹昉自《周官》。秦不分曹而置尚书四人。汉有五曹，后更为六。隋唐因之，置侍郎、郎中、员外郎，分掌曹事，沿以至今，固天下庶政之纂籥也。官多而事棼，又不如朱子所论"三参政兼六曹，而长官自择其僚"之为当矣。县令为最亲民之官。晋制，不经宰县，不得为台郎。后魏之季，用人猥杂，而缙绅士流耻居其位。宋初或以京朝官为之，积久更弊，乃议所以增重激劝之法。至庆元，朝重邑令，而科甲咸宰邑焉。朱子曰：监司不如郡，郡不如县，以其仁爱之心无所隔而易及民也。真治天下之本也。国家设官求贤，傥宜咨访于无事之时，参量于始用之日乎!

制策又以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而因切究其流弊。臣惟盐铁之弊，若准诸古而穷其阴夺民利之术，虽管子不免为圣王之罪人。而沿之今，而犹为取诸山泽之藏，则孔、桑且可从计臣之末减。汉武帝所以人孔、桑之说，而置河东、太原等盐官二十八郡，置左冯翊、右扶风、颍川等铁官四十郡者，方张边功，急军旅之费也。利窦一启，更无可塞。虽始元、地节之议减，初元、永元之议罢，而永光、永平旋踵即复焉。唐贞元初，刘彤请检校海内盐铁，而第五琦、刘晏、裴休继之，当时军镇赖以赡给。晏所为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与朱子论广西盐法随其所向则价自平者有合，愈于琦、休之为议矣。夫受引盐者商，而文私居奇者即商也；禁贸铁者官，而侵蚀贿纵者即官也。流弊不胜穷，况征有出于盐铁之外者耶?

皇上轸恤民艰，其必从朱子罢去冗费、悉除无名之赋之说始。且夫民生至重也，学术至博也，人才至难也，国计至剧也。朱子谓四海之广，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而《壬午》、《戊申封事》则要之于

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推之至谏诤师保，而归本于人主之心。其言尤恳切详尽焉。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留心于《大学衍义》，而益致力于朱子之《全书》，以求握乎明理之原，而止于至善之极。将见川浍治而农政修，图书集而法训备，广选造之路而壹乎内外轻重之畸，权征榷之方而必祛旦夕补苴之计。斯治日进于古，而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善于研究天文的人，重视北斗星与北极星；善于谈论治国的人，能确定下纲领和指导方针。民生国计方面的利弊，不可能一一阐明；学术、人才的兴废，也不必去细细穷究。总之在于大道治法而已。孔子之道，汇集了许多圣人的思想精髓而启发了历代帝王，那些被世代诵读仿效的包含深奥意义的精微语言，经过一千六百多年而又集成于朱熹。宋朝的臣子真德秀，曾经根据朱熹的思想编成《大学衍义》一书，所述自帝王研究圣人学问，直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方面的历史借鉴，非常明晰而又十分周全。这表明夏、商、周、西汉、东汉以来，那些致力于农田水利、弘扬典籍、举用贤能、发展经济的措施，必以朱熹的话语作为准则，然后能明白事物的是非；必以朱熹的思想作为权衡利弊的依据，然后能洞察事物的综合规律。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拥有超凡的天资，勤于日日更新的品德修养，而又能开通臣民进言的渠道，振刷整饬制度。举凡《大学》中的道理，前代的事迹，原已切实地全部掌握并且参照施行了。但是圣明的胸怀仍然谦虚自抑，孜孜不倦于进取，列举出兴修水利、图书收藏整理，人才选拔、盐铁经营体制等重要问题，将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进行策问。臣下我愚钝不堪，哪里能够承受如此重要的策问？然而臣下我曾经读过朱熹的言论。朱熹著作之中以及被真德秀所引用的言论，无一不是君主治国时应该效法的东西，也是臣子向君主提出不同看法时的理论依据。所以臣下我怎敢不竭尽那奉献忠言以供皇上采纳的一片诚意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关于本次策试的诏令，其中说：治水的记载最先见于《尚书·禹贡》，现在京畿地区实际上位于《禹贡》九州中的冀州之内，于是寻求水利与农事互为表里的缘故。这确实是今天的当务之急。臣下我想来：大禹所治黄河，自雍州经过冀州，而冀州地处下游，所以应当最先施工，而并非仅仅由于这里是京都所在而已。自汉代开始，黄河改由千乘县入海，而冀州境内的黄河故道就堵塞了。现在北京周围的水系，是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清河等九条主要河流。东南地区水多而受水之利，西北地区水少而受水之害，这难道必定是地势的缘故所造成的吗？实际上，还有人事未尽的因素在内。汉代的渔阳郡在今天的密云县，而张堪作为太守，营建稻田八千余顷。从此以后，又有曹魏时的刘靖开通车箱渠，修建戾陵堰。北魏裴延俊、北齐稽华等人，也先后营建督亢渠，引卢沟水以助灌溉。这些古代水利设施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历史记载保留下来的事迹却是显而易见的。宋代何承矩扩大了唐代朱滔、卢晖所修水渠的规模，在雄州、莫州、霸州、平戎军、永定军、顺安军、安肃军等地，筑堤六百里，设置斗门，引白洋淀水流，这一工程既巩固了边防，又有利于民众。元代郭守敬、虞集，都讲求水利。郭守敬所提议的，就是今天的通惠河。虞集所提议的，后来由脱脱于元顺帝至正年间付诸实施。而明代汪应蛟建议筑坝立闸，申用懋建议考察地理，辨别源流，他们的规划与郭守敬、虞集的建议相得益彰，当时也确都付诸实施，并且获取到益处了。天下之水，各因其地形而互有利弊，必须除弊然后方能兴利，而天津则是古代渤海迎接黄河之处，属于百川倾汇的地方。朱熹说："治水要先从低处入手。"又说："汉代人的办法，是腾出地方来安置水流，不与水流争夺地盘。"既然如此，那么，我朝廷打算疏通水道而向获利方面引导水流，就首先必须对津沽岔口一带给予充分的重视。

本次策试诏令中，又根据汉代的藏书以宫廷所藏为最佳，从而考证汉代至明代宫廷所遗藏书可以有助于登载取用的一些问题。臣下我想来，周代掌管向畿外发布王令、四方地志、三皇五帝书籍的外史所掌管的古籍，周代王宫藏书室史官所掌管的图书，虽然经历了秦始

皇的焚书政策而几乎失传,但是汉代的兰台、东观的秘藏图书仍然成堆,这些图书确实是思想文化的宝库和历史借鉴的渊薮。刘向在皇家图书馆校理图书之时,曾经逐一评论并记录各书情况,汇辑成《别录》进奏。他儿子刘歆编纂的《七略》,简明而不杂滥。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书》、《礼》、《小学》、《儒家》、《兵书》、《诗赋》等类所收录的篇章,有不少是与《七略》相出入的。虽然不能视为完全失当,但是其中像《七略》未曾记载的扬雄《太玄》、《法言》、《乐箴》这三种书籍,《汉书·艺文志》错误地统称为"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所以宋代郑樵《通志·校仇略·偏次不明论》就讥笑《汉书·艺文志》在识别书目方面不免功夫低劣。魏晋递相兴起后,曾经采撷已经失传的古籍而编成书目的,有曹魏时期的秘书郎郑默编纂的《中经》、西晋时期的秘书监荀勖编纂的《中经新簿》,都按甲乙丙丁即后世经史子集四分法囊括图书。而梁朝的《华林园目录》,又按五大类囊括图书。隋炀帝时期修文殿标准本图书的五十部副本,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各自收藏在长安、洛阳的宫省、官府之中,真不愧为典籍整理保存的一大盛事!到了唐朝初年,不幸遇到了运书的船只在底柱撞沉的厄运。至宋朝初年的开宝期间,从南唐的都城建业再次大规模地收集图书,自此而写本图书也被雕版印刷的图书取代了,更便于宫廷藏书处和修史部门的搜集。明朝的《永乐大典》散失了,今天所存还有二万余卷,其中世无传本但是见于《文渊阁书目》的古籍,现在都已裒辑成编了。朱熹说:"不求知识的广博,如何能够考证一些具体问题?"又说:"对于古今而言的是时势,对于历史借鉴而言的是历史事实,传述它们的是图书,读这些书的是世人,能够根据图书去贯通古今得失的,是仁这一指导思想。"皇上重视图书,把它视为治国之本,自然不会像那些词臣、学生那样仅仅把博览群书作为自我渊博的手段的。

本次策试诏令中,又因选拔制度是人才脱颖而出的途径,所以考察历代翰林、六部、县令地位的轻重变化。臣下我想来,现在世人所称"清班美授"者,是指翰林院的官职。翰林学士院的设置,始于唐朝开元年间。翰林学士一职只选取擅长文学之人,自各部尚书以至校书郎都可以参加翰林学士的选拔。朝见时翰林学士的排列顺序在本

班列之前，皇帝举行内宴时翰林学士的排列顺序仅在宰相之下、又在一品官员之上。翰林学士没有固定的品级规定，也没有定额的编制。宋朝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都设有直官，入选者各任集贤院修撰、史馆修撰、集贤院校理、秘阁校理、史馆检讨、馆阁校勘等职，非名流不得任职。但到翰林由皇帝特恩授予之后，原先参与谋划、接受谏诤、草拟诏令的职责就不复存在了，况且选拔不精而考试马虎，授官也如朱熹所说："上面以科目词艺考试作为选拔最佳人才的方法，下面以应付循规蹈矩的考试作为尽职的表现"罢了。六部的设置，源于《周礼》。秦朝不分部而设尚书四人。汉朝有五曹，后增为六曹。隋朝、唐朝沿用这种制度，设侍郎、郎中、员外郎，分掌曹事。后代沿用至今。这种六部制度确实是关系到天下各种政务的工具。但是由于它官多而事杂，所以又不如朱熹所主张的"由三位参知政事兼管六曹，而由长官自择其僚属"更为恰当。县令是最接近民众的官职。晋朝的制度规定，未曾担任县令者不得升入省台任职当郎官。北魏末期，由于用人随便、杂滥，所以士大夫们以担任县令为耻辱。宋朝初年，开始另以京朝官出任知县，但是由于时间长而积弊更深，所以朝廷便议论如何提高知县地位以激励人们任职的办法。到了南宋宁宗庆元年间，朝廷重视知县一职，所以进士们都去担任知县。朱熹说："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等监司不如知府，知府不如知县，因为知县的仁爱之心将不受地理、职务等因素的阻隔而容易施予给民众。"这番话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啊！国家设官求贤，也许对知县的人选应该咨询于国家平安之时，斟酌考核于始用之日吧？

本次策试诏令中，又以盐铁税利润的征收政策始于管子，并且施行了千百年而不能废止，从而切实地探究其流弊。臣下我想来，盐铁官营之弊，如果以古代先例为准则，而极尽其暗中夺取民利的手段，即使就管子而言，也不免是圣人的罪人。可是这种制度沿用至今，仍然征收山林湖泽天然物产的税利，那么汉朝孔仅、桑弘羊将可以在财政大臣那里除去姓名了。汉武帝采纳孔仅、桑弘羊盐铁官营的建议，而在河东郡、太原郡等二十八个郡中设置盐官，在左冯翊、右扶风、颍川郡等四十个郡中设置铁官，这是因为当时正在跟匈奴打仗，急需兵

饷的缘故。这种财政利益的口子一旦开启，就再也无法堵塞了。西汉昭帝始元年间、西汉宣帝地节年间都曾议论过削减盐铁官营的利润，西汉元帝初元、东汉和帝永元年间还曾议论过废止盐铁官营制度，但是在西汉元帝永光、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都迅速恢复了这种制度。唐朝德宗贞元初年，刘彤请求调查天下盐铁的情况，而第五琦、刘晏、裴休继续主张并实施盐铁官营制度，致使当时军队赖以得到充分的粮饷供应。刘晏的做法是，在食盐的产地利用原先的官署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盐商，随便他们贩往何处。这种做法跟朱熹所论广西任凭盐商往任何地方贩盐从而使盐价自然趋于稳定的方法有所吻合，比第五琦、裴休的方法更为恰当。但是那些从政府获得贩盐许可证的是盐商，而囤积居奇的也是这些盐商；禁止私人经营铁业的是铁官，而贪污受贿纵容违法的还是这些铁官。这种流弊没有终止之日，况且在盐铁官营以外还有别的苛捐杂税呢？

皇上深切顾念与怜悯民众生活的艰难，必定要从朱熹关于罢废太多的支出、全部去除不正当赋税的主张着手。况且民众的生计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人才的获得是极其困难的，国家的财政收支是极其繁杂的。朱熹说过：天下之大，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才能够驾驭全局并整齐划一它们。而朱熹《壬午封事》和《戊申封事》则强调格物致知，用来通晓事物的变化，由此而推及到直言规劝、教养万民方面，但都归结于君主的心地。这些见解尤其恳切详尽。臣下我跪拜希望皇上在日理万机之余，留心于真德秀《大学衍义》，而更加致力于研究《朱子全书》，以求掌握天理的本原而达到最完美的境界。那么就将导致水利兴修，从而使农事得到修明；图书聚集，从而使前人的经验教训得以完整地保存；人才选拔的途径拓宽，从而使人们对中央、地方官职的畸形价值取向得以纠正；对征敛、榷卖制度的利弊正确权衡，从而使终日疲于修补制度漏洞的局面得以彻底消除。国家的治理一天天地比古代良好，而我们大清永远繁荣昌盛的国运，就建立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之上了。臣下我没有学问而且刚成贡士，不懂得该如何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尊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刘锡昂译〕

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壬寅恩科

会试试题

管子内政寄军令论

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论

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论

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亦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义

殿试策问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以藐藐之躬,临亿兆之上,揽艰难之时局,廑怵惕于宫廷。回銮以来,勤求治理,思以答昊苍之默佑,绍列圣之诒谋。恭秉慈谟,旁求俊乂,临轩发策,用集嘉猷。

设官分职,为《周官》致治之本原。周制,公、孤兼冢宰,统百官,任至重矣。自汉而后,制度屡更。试陈得失。古者六官以外,无卿名。汉置九卿,渐更古制。唐宋以降,建设滋繁。朱子深讥之,谓徒多劳扰。能言其裁并之便利欤?三代无谏官之职,然《左传》、《国语》所载,询采綦宏。谏官专设,肇于何时?宋王安石谓非先王以贵治贱之意。然欤?唐初设翰林,其制奚若?开元中,始有学士之名。沿及后代,选用益重。职司所在,考之古制若何?藩镇弊唐,而李纲谓宋之边患,由无藩镇。时势不同,理或然欤?

明刑弼教,为经世大政。虞舜象刑,《周官》三典。汉董仲舒作《春秋决狱》。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创造删除,果能合刑罚之中欤?唐律因隋之旧,高宗诏撰《律疏》。试举其要旨。张斐注律,表上之,谓非至精不能极其理。而宋神

宗设律学，司马光谓为士者果能知道，自与法律暗合。折衷群言，宜遵何说?方今东西各国，法学皆设专科。能旁采译书，以备参考欤?

生财之道，《大学》所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与《周官》之月要岁会，异同何若?汉之桑、孔，唐之刘晏，皆以理财著闻，而议者辄非之。欲益上而不损下，厥道奚由?宋置三司使，始于何时?未置以前，州郡之弊若何?太宗略变官制，名异实同。十道财赋，较之乾德时所人，有赢欤?

立国之道，先富而后可强。开源节流，其术安在?环球交通，法令繁密。柔远之道，寓于通商，而实富强之本也。两国交涉，若者为公法，若者为私法，试为区别。使节往来，梯航四集，辖治之权，或属于人，或属于地。试实指其事，分析言之。商律一门，尤为当务之急。能言其要领欤?厘订税则，内关财政，外系邦交，而于国民生计，至为切要。其利弊能悉陈之欤?工商盛衰，事属相反，顾考之各国，有不尽然。其理安在?将欲振兴工商之业，应以何者为先?

凡此四端，皆经国之大猷，保邦之要务也。多士学于古训，通知时事。其胪列见闻，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依靠自己微弱的身躯，君临于亿万人民之上，撑持着艰难纷乱的时局，在宫中时刻恐惧谨慎。自从庚子乱后回京以来，勤苦地寻求国家的治理，希望报答苍天默默的保佑，继承各位先帝留存的韬略。因此小心地秉承皇太后的教导，四处寻找贤才，驾临殿前向你们发布试题，来搜集精妙的治国建议。

设立官位，分别职守，是《周礼》实现国家大治的根本所在。周代制度用三公及其副手兼任王朝的冢宰，来统辖百官，责任十分重大。从汉代以后，制度多次发生变化。请你们试着说说其中的得失。古时候在六官以外，没有专称卿士的。汉代设置了九卿，便渐渐改变了古代的制度。唐宋以后，官员的设置就增添得更繁冗了。朱熹先生对此曾做过严厉的批评，说它只不过白白地增加国家的负担罢了。你们能谈谈裁并冗官的好处吗?夏、商、周三代本来没有谏官的职位，但从《左传》、《国语》中的记载来看，君主征求、采纳谏议的事例很多。那

么谏官的专门设置,到底发端于何时?宋代王安石认为谏官的设立不能体现先王规定的用高职统辖低职的原则。他说的对吗?唐代初期设立翰林官,这种制度是怎样的呢?开元年间,才开始有学士的名称。沿续到后代,学士的选拔任用就更重要了。学士职责的所在,考察古代的制度,应是怎样的呢?明明是藩镇之乱削弱了唐朝统治,而李纲却说宋朝边疆的忧患,是因为没有藩镇的设置所造成的。是不是时势不同,他讲的道理也对呢?

明白地规定好刑罚来帮助对人民的教育,是治国的重要政策。所以虞舜有象刑,《周礼》有三类刑典。汉代董仲舒撰作了《春秋决狱》。陈宠收集校订法律条令,凡是超出《甫刑》范围的就废弃不用。应劭删节酌定法律条令,编成《汉仪》。他们所做的创制、删除工作,果真能符合刑罚的恰当原则吗?唐朝法律因袭隋朝的旧规定,高宗下诏撰写《律疏》。请你们试着举出它的主要内容。张斐注释法律后,撰表上报朝廷,说如果不是十分精通法学的人,就不能彻底理解它的道理。而宋神宗设立律学,司马光则认为凡是读书人,如果真的明白治国的道理,自然会与法律的精神暗暗相合。那么综合各种观点,应当采用什么说法呢?今天东西方各国,在法学方面都设立了专门学科。能不能四处采集各种法学译著,以供参考之用呢?

创造财富的办法,《大学》十分重视。《王制》用三十年必有九年余粮的办法来筹划财政。这与《周礼》所讲的"月要"、"岁会"制度,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呢?汉代的桑弘羊、孔仅,唐代的刘晏,都以善于管理财政而著称,但议论者却往往否定他们。如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又不降低广大人民的个人收入,应该使用什么办法呢?宋代设置三司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没有设置以前,州郡工作的弊病有哪些呢?宋太宗稍微改变了这方面的某些官制,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那么这时十道的财税收入,比乾德年间所收入的,有所增加了吗?

治国的原则,在于首先富足而后才会强大。增收节支,有哪些方法呢?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各种有关法律规定又复杂又严格。怀柔外国的办法,寄寓在互相通商之中,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那么两国之间处理外事,哪些该依公法,哪些该依私法,请你

们试作区分。各国使节来来往往,航船四面汇集。对他们的管理惩办职权,有的归属外国人,有的归属地方。请你们试着举出实例,并做些分析。商法一门科学,更是当务之急。你们能讲出它的主要原则吗?整理制定税法,对内关系到财政,对外关系到外交,而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更是极其重要。它的各种利弊,能全部列举出来吗?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互相矛盾。而考察各国,情况并不相同。其中有什么道理呢?如要振兴工业商业,应该优先发展哪个呢?

总共这四方面的问题,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谋略,保卫国家的首要任务。诸位学人学习过古代的训诫,又精通了解当前的形势。请一一陈述你们的所见所闻,详细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读。

王寿彭　会试卷五道

王寿彭(1874~1929)　字次筏,山东潍县(今潍坊)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状元,例授翰林院编修。他事不详,俟考。

管子内政寄军令论

能变《周礼》之法,而善用其意者,管子也。《周礼》之法,寓兵于农,无召募之费,有御侮之功,善已。管子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其制曰轨,曰里,曰连,曰乡。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此盖变通《周礼》之法,而隐行其意。原与鲁作三军,晋作州兵,楚分二广,事不师古、变更任意者不同。虽谓管子善用《周礼》,可也。

或曰《周礼》者,万世不易之法也。管子号天下才,使其一遵伍两卒旅之法,而不少变易,则《周礼》可以至今存,而兵农不至区为两事。而乃作内政于国,以寄兵;作鄙制于外,以寓农。是败坏周制者,管子实作俑焉。不知立法贵因乎时,读书当论其世。周公制礼之日,意在足兵。足兵者,惟立于不败。管子相齐之日,意在强兵。强兵者,务求其必胜。内政以寄军令,则饷馈不烦,征发可恃。政之所及,兵即

储焉。所谓师古之意,而不泥古之法也。管子诚识时之豪杰矣,乌得以其变《周礼》少之?

且夫管子而后,兵政益不古若矣。汉之郡国兵,唐之府兵,其制犹稍近古。外此者,悉出于召募。当其始也,乌合之众,糜饷百万。一遇强敌,而将不选练,士不娴习,望风溃败,动误国家之大事。一旦议为裁汰,则山林啸聚,变为盗贼,尤为噬脐之隐患。盖自井田废坏以来,民自民,兵自兵,无论先王兵民合一之制,不可复见。偶与过临淄之地,访夷吾之遗迹,当年轨里连乡之旧,父老犹有传闻者,辄为之低徊流连。以为处今之世,苟得用管仲之法,俾令行禁止,将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不犹是《周礼》遗意哉!乃时异势殊,及今为之,而已觉其难。盖管子之风,为已古矣。

总之,《周礼》一书,法良意美。王莽伪托,安石误会,惟管子变通用之,故能相齐,以大得志于诸侯。虽然,孔子议去兵,孟子言得道多助。苟以民心为兵,则井田虽不可复,而敌王所忾,固觉无民非兵也。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

能够改变《周礼》所言的具体制度,却仍是深刻运用它的基本原则的人,是管子啊。按照《周礼》的制度,军人全由农民兼充,不必花费专门的招募费用,却具备抵御侵略的作用,确实不错。管子担任齐国国相后,借推行行政改革来进行了军事改革。他的新创制度规定,各基层行政组织依次为轨、里、连、乡。军事组织依次为:五人为伍,轨长负责;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负责;二百人为卒,连长负责;二千人为旅,乡良人负责。这基本上是变通了《周礼》的制度,而暗中仍遵行着原意,本来就与鲁国实行三军制度,晋国实行州兵制度,楚国实行二广制度,毫不继承旧制而任意变革的例子不一样。所以若说管子灵活运用了《周礼》,也是可以的呀。

有人说《周礼》所规定的,乃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制度。管子号称天下奇才,如果他完全遵守伍两卒旅的旧制,而一点也不改变,那《周礼》之制就可以至今流存,而兵、农也不至于区别为两种职业了。但

他却在国都城郊以内推行行政改革,来壮大军队;在国都城郊以外另立制度,来发展农业。所以败坏完美的周制的行为,管子实在是开了先例。说这话的人其实是不懂制定制度应该根据时代要求,读书应该研究作者生活的时代状况。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是想完备军队。完备军队,只是立足于在防御时不被击败。管子担任齐国国相的时候,是想强化军队。强化军队,乃是为了在进攻时一定取胜。以推行行政改革来寄寓着军事改革,就使军费不必再向百姓频繁征收而军人的征发也有了保证。行政所能达到的地方,军队就得到了储备。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学习传统的基本原则而不拘泥传统的具体制度的做法呀。管子确实是认清了时势的英雄人物啊!怎能因为他改变了《周礼》就贬低他呢?

况且在管子之后,军事制度就更不像古代了。汉代的郡国兵,唐代的府兵,这些制度还略微近似于古制。此外的各代,军队全部来自召募。这些召募兵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纯为一群乌合之众,白白浪费着数以百万计的军费。而一碰上强硬的敌军,由于将领和士兵都对战事十分陌生,结果便是望风大败,经常贻误国家的大事。但一旦被议定为裁汰的对象,就又聚集于山林之中,成了强盗,更是无可奈何的隐患。因为自从井田制废坏以来,百姓是百姓,军队是军队,再不讲古代君主兵民合一的制度,再也见不到这种制度。臣下我曾与人一同到过临淄一带地方,访求管子的遗迹,对从前轨里连乡的旧制,当地老人仍有传说它的,使人为此而徘徊不已,感慨万千。深感处在当今的时势之中,如能实行管仲的方法,使军队令行禁止,在乡里中整顿好民间武装,在郊外整顿好正规部队。夜战时互相听得见声音,可以没有差错;昼战时互相看得见模样,可以认得出来。这不就是《周礼》遗留下来的原则吗?但时代变了,情况也不同了,今天若再推行,已经觉得很难了。因为管子时的社会风气,都已远远过去了呀。

总之,《周礼》一书,制度和意图原本都很不错。王莽只不过是冒用伪托它,王安石只不过是牵强附会它,只有管子灵活运用了它,所以能辅助齐国,在诸侯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虽然如此,孔子提倡裁军,孟子宣扬得道多助。果真以民心为军队,即使井田制不能恢

复,而百姓均以君王愤恨的人为敌,就仍会感到没有一个百姓不是军人了。管子的办法,仍然没能免除称霸诸侯的性质。

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论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吾读汉文帝《赐南粤王书》,而益恍然于忠信笃敬之果可恃也。夫自古衅隙之开,半由于猜疑。相猜则怨生,相疑则恨起。偶通聘使,则曰是侦我也;令纳职贡,则曰是挟我也。一字之激,一语之亢,兵端偶启而财殚力痛,或至数十年而不能苏者,比比然也。若以汉文处之,则其患必不至此。

南粤王赵佗,自高后时,已僭号为帝矣。文帝即位之初,正南粤王翘首待命之日。向使文帝念赵佗寇边之前愆,绝两国尺书之通问,吾意赵佗必曰:吾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是与汉不共戴天也。而攻掠益不能堪。即不然,遣陆贾奉书以往,而数语存问,即赫然责以帝号之当去,佗必不服。即服矣,恐亦未必遽称臣佗,推诚以报我也。乃文帝赐书,不肯遽责其非,务先申之以礼,曰谨问南粤王,曰道路辽远,壅蔽朴愚。何其辞之卑也!又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煌煌数言,如天之覆物,雨露与雷霆并施。佗虽蛮夷,其敢不去帝号而北面哉?

且夫交际之间,亦綦难矣。使臣应对失体,犹可曰才不逮也。若赐书一下,则彼国之君臣,将于此觇中国天子气象之何如。故小嫌可以不念,而公理在所必争。弃小嫌所以示大度也,争公理所以保全局也。一纸书胜十万师,文帝之谓矣。且文帝此书,不惟可以孚赵佗,正所以承父志。汉与南粤通使,自高帝已然。今观赵佗报书曰:老夫有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使文帝不有此书,岂非自背其先人乎?曾仁如文帝,而肯出此。

噫!至诚动物,理有固然。异日《遗匈奴书》曰: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匈奴虽骄,而终文帝之世,不至大为边患。诚动之也,独佗也欤哉!

孔子说:说话讲究信用,行动注重尊敬,即使是落后部族的国家

也会顺服。臣下我读了汉文帝《赐南粤王书》之后，就更加恍然明白讲究信用、注重尊敬这个信条确实可以依赖了。自古边境冲突的发端，有一半是出自互相猜疑。互相猜疑就会造成怨恨。偶然互派一次使者，就说是来侦探我国的；让它交纳贡物，就说是来威胁我国的。因为一个字、一句话的过激，便偶然地挑起了战争，导致耗费大量财力、人力，有的甚至几十年后还恢复不了，这样的事例处处可见。如果用汉文帝的态度来处理，其灾难肯定不会达到这种程度。

南粤王赵佗，在汉高后时就已经僭越称帝了。文帝刚即位的时候，南粤王正在翘首等待朝廷的命令。假如文帝怀恨赵佗以前侵略边疆的罪过，而断绝了两国之间的信使来往，臣下我估计赵佗一定会说：我父母的坟墓都已被破坏削平了，兄弟宗族也都被杀死了，这是与汉朝不共戴天的仇恨啊。结果汉朝受他的侵掠就会更不能承受。即使不这样，而派陆贾带着信件去出使，只问候几句便严厉地责备他应当免去帝号，赵佗也一定不会服气。即使服气，恐怕也不会马上就自称臣佗，用诚心来对待我国的。而文帝赐信，却不肯马上责备他的过错，而一定先礼貌地致意，说恭敬地问候您南粤王，说道路十分遥远，我闭塞愚昧，对您的情况不了解。他的言辞是多么谦卑呀。又说得到您的土地，不足以称为广大；得到您的财产，不足以称为富足。几句光明磊落的话，就像天空覆盖万物，雨露与雷霆一同降施下来。赵佗虽处蛮夷之国，他敢不免去帝号而北面称臣吗？

况且外交上的事，本来就很难应付。使臣言谈举止失当，还可说是才能不够。如果皇帝的赐信一旦颁下，那对方国家的君臣，将从它来窥视中国天子的气象怎样。因而小的嫌隙可以不必记挂，而国家的大义却是必须维护的。放弃小的嫌隙是为了表示心胸的宽广，维护国家的大义是为了保障全局。一封信胜过十万兵，说的就是文帝呀。而且文帝这封信，不仅可以降服赵佗，还是继承父志的行为。汉与南粤互通使节，从高帝时就已开始。现在看赵佗的回信说：老夫有方圆几千几万里的土地，一百多万的军队。然而却向汉朝臣服，为什么呢？这是不敢背叛汉天子父亲的缘故。如果文帝没有这样一封信，岂不是他自己背叛自己的父亲了吗？只有像文帝具有曾参那样的仁

德的君主,才肯这么做。

啊!极度的诚心可以感动万物,道理本来就如此。后来的《遗匈奴书》说:在和亲之后,汉朝决不首先背弃盟约。匈奴虽然狂傲,而在文帝在位的全部时间里,没有形成严重的边患。这是诚心感动了它,不只赵佗一人呀!

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论

赏罚者,人主之大权也。赏罚明,而后邪正分,纲纪理。君不施小惠,民不怀觖望,治国之道类然。若当积衰积弱之势,欲使朝野上下,清明严肃,则赏罚两端,尤宜严定章程焉。善哉!武侯之对法正也。曰: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夫武侯之心,岂不知罪疑惟轻,则法宜从宽;功疑惟重,则爵宜从厚!而必曰威之、限之,何也?不示以威,则恩穷而终罹于法;不予以限,则爵及亦不见其荣也。

盖尝观后世而慨然矣。承累朝宽大之遗,野不闻追呼,朝不限资格,赈粟免租,视为故事,科目选举,广其径途。深仁厚泽,固已浃肌沦髓矣。而论其世者,辄慨然于百度之废弛,仕途之芜杂。欲举其政,改弦而更张之,无他,法令严而后德意伸,名器重而后士心励。唐臣赵冬曦曰:律明人信,法一主尊。朱文公之言曰:将新庶政,宜恤名器。皆与武侯之言相发明也。其真识治体哉!

而论者或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武侯治蜀,威以法,限以爵,毋乃察察为明,而为蜀民之不幸欤?是大不然。凡人有可欢可喜之事,必其得之甚难,而后愈觉其可贵。日施以恩,人分以爵,是取膏粱腻沃之子,日啖以肉也,久且有厌心矣。恩无滥予,是善用恩者也。爵不妄加,是善用爵者也。而岂徒立威予限,以效酷吏之所为哉?

子产治郑,王猛治秦,其治法之严,与武侯先后若合符节,时势同也。吾愿后世为政者,毋枉法以市恩,毋逾限而拜爵。

赏和罚,是君主的重要权力。赏罚明白,而后才能分清邪正,整顿好纲纪。君主不随便施加小小的恩惠,百姓就不会心怀不满,治国

的道理与此相同。如果正当长期衰弱的国势,而想让朝野上下,清正严明秩序井然,那赏罚这两项就更应严格地制订出规定来。诸葛武侯对法正做的回答实在好啊!他说:用法律来威慑他,法律执行后他就会知道皇恩的难得;用官爵来限制他,官爵提升后他就会懂得荣誉的珍贵。武侯的心中难道不明白罪行只怕原本很轻,所以执法应当从宽;功劳只怕原来很大,所以赏爵应当从厚吗?而他却一定要说威慑他、限制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不表示威慑,那么皇恩一旦穷尽他就会因不满足而最终落入法网;不进行限制,那么官爵来了他就不会觉出它的荣耀来。

臣下我曾观看后世的历史而感慨不已。像那种继承历代政治宽大的遗风的国家,民间听不到逼交赋税的声音,朝廷中不依资格而赏官,发放救济,豁免租税,被看作例行公事,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扩大那途径。国家深厚的恩泽,早就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了。但人们一谈论当时的国家局势,都是感叹各种制度的废弃松懈,当官人的良莠不齐。要想振兴政务,重新打开局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法令严格了,而后恩德的意义就会展现出来;官爵重视了,而后人才的精神就会振作起来。唐朝大臣赵冬曦曾说:法律明允了,人们就有了准则来依靠;法律统一了,君主也就有了权威。朱熹曾说:要更新政治,就应爱惜官爵的分量。这些都和武侯的话互相印证。他们真是明白治国的办法啊。

但有的议论者会说:水太清了就会没有鱼存在,人太严明了就会没有部众跟随。武侯治理蜀国,用法律来威慑,用官爵来限制,恐怕他这样地什么都不放过,对蜀国人民来说却是不幸吧?这种说法其实很不正确。凡是人们遇上的值得高兴的事物,一定是得来很不容易的,而后才会特别觉得可贵。每天都施加恩典,每人都得到高官,这就如同让那些吃惯美食的富贵子弟再天天吃肉呀,时间一长就会感到厌倦的。恩典不去过多施与,是善于运用恩典的人。官爵不去任意加封,是善于运用官爵的人。这怎会是仅仅立威予限,来仿效酷吏那套做法的举措呢?

子产治理郑国,王猛治理前秦,虽然一个在武侯之前,一个在武

侯之后，但他们的治理法规的严明程度却都与武侯相同，因为时代局势相同呀。臣下我希望后世的治国者，不要违反法规来售卖私恩，也不要超出规定来封赐官爵。

泰西最重游学、斯密氏为英大儒、所论游学之损、亦最挚切、应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以期有益无损策

居今日而谈学问，与昔时不同。昔时只知中学，今则宜兼通西学。昔人谓下帷诵读，闭户自精，今则尤重游学。盖自海禁大开，中外一家，非游学不足扩见闻，非游学不足开风气，中国于是有派学生出洋之事。顾三十年来，学生之领凭回华者，诚不乏人。而考其所学，不过语言文字之末。问以西俗，竟言茶会、跳舞之观。求其博涉贯通、洞晓大体者，百不获一二焉。

近来各省，皆派学生赴东洋学堂。京官及外省人员，请咨赴日本及各国游历者，接踵联翩。此固足以变从前拘墟之习已。特气质不同，志趣各别，风俗移人，贤者不免诚恐无益有损，如英儒斯密氏之所论也。夫欲求其益，当先防其弊。惟固其质性，而后见异思迁之弊可以除；惟限以年例，而后半途辄止之弊可以祛。

尝反覆思之，而得数策焉。一曰选材。夫人惟中无所主，闻荒渺怪诞之说，乃误信而受其惑，是宜严为考选。凡出洋游学者，必其先通中学而后可。盖中学通，则心有所主，不至逐末而忘本矣。此固质性之一端也。一曰节费。夫出洋游学，例给薪津，然过廉则应用不敷，过丰又适以教奢。惟严定章程，除寒士出洋留学，酌予船费修脯外，内外官员之子弟，资斧皆令其自备。如此则人无希冀之心，其往者必其坚苦好学者也。此又固质性之一端也。一曰考业。西国学堂章程，或三年卒业，或五年卒业，各随天姿之钝敏，学问之浅深，以为区别。为山而亏一篑，西人笑我矣。是宜照会各国：凡华人游学者，必所学卒业，方准给凭回国。再由外务部考取，然后擢用。所谓限年例者，此其一。一曰出身。中国科目一途，趋者如蚁之慕膻。一言及学堂游历等事，辄为裹足者。科目有一定之出身，而出洋数年，优者或奖以职衔

否则仅充一教习，非所以示宠荣也。惟妥议定章，凡学成而有益者，即予以何等出身，与科目等，则人皆鼓舞矣。所谓限年例者，又其一。

行此四策，则凡游学者，必非失业远飏者也，必非浮薄性成者也。先游东洋，渐及英、法、德、美各国，遥望海上，风云生色矣。迨冠盖归来，父老慰藉。凡彼国之中，风俗之美恶，人心之情伪，机器何由而创造，商务如何而振兴，不惟能言于口，抑且洞晓于心。吾知精翻译，则有益于阅书；善测绘，则有益于用兵。而况情谊既洽，交涉便易，且有益于天下大局哉！更何损之有？

处在当今时代来谈论学问，与以前不同。以前只要懂得中国学术就行，当今则应该同时精通西方学术。以前人们只说放下帘帷便可读书，关上家门也能精通，今天则更加重视出国留学。因为自从海禁彻底开放以来，中国便与世界联为一体，不留学就不能扩大见闻知识，不留学就不能开启新风气，于是中国便有了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事情。但三十年来，领取毕业证回国的学生确实不少，而考察他们留学的收获，只不过是些语言文字的末节。询问西方的风俗，都争着讲述茶会、跳舞等的观感。要找出能广泛涉猎、精通西学的要义的人来，一百人中也没一两个人。

近来各省都派遣学生去日本的学校。在京的官吏和地方省份的人员，请求批准去日本及其它各国参观的，也是一个接一个。这固然足以改变以前保守陈旧的风气，但是中国与外国根本气质不同，爱好兴趣也存在差异，外国的风俗会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有识之士都不免十分担心这会无益而有害，就像英国学者斯密所说的那样。要想得到它的好处，应当先防备它的害处。所以只有固定住留学人员的品性，而后见异思迁的害处就可避免；只有限定留学人员的学历，而后半途而废的弊病才可消除。

臣下我曾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而想出了几条办法来。一条是选拔合适人才。一个人如果心中还没有树立正确观念，那他一听到奇谈怪论，就会误信而受到欺骗，因此应当对出国的人严格进行考察挑选。凡是要出国留学的人，一定要首先精通了中国学术才行。因为中

国学术精通了,心中就会树立起正确观念,不至于去追求末节而忘记了根本。这是固定他们品性的一个办法。一条是节约经费。出国留学,按规定该给补贴,但过少会让人不够使用,过多又正好诱导他奢侈。只有严格制定章程,除家境困难者出国留学可以适当给予船费、学费之外,中央、地方官员们的子弟所需的经费都要让他们自备。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有投机的想法,去留学的一定将是那些刻苦好学的人。这又是固定他们的品性的一个办法。一条是考查学业。按照西方国家学校章程的规定,学生们有的三年毕业,有的五年毕业,各自根据天资的迟钝聪敏、学问深浅来区别。像堆山一样而功亏一篑,会让西方人笑话我们。所以应当通知各国:凡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把所学学业完成,才可以发给文凭回国。然后再经外务部考试之后录用。所谓限定学历,这是一个办法。一条是出身。中国的科举考试这条路,走的人多得就像蚂蚁向往羊肉一样;而一说到读学堂、出国留学等事,便都停步不前。原因就是科举考试后会有一定的出身,而出国几年,优秀的还可能会奖给某个职衔,否则只不过担任一名教师而已,体现不了国家的优惠政策。所以只有妥善议定有关规定,凡学业完成而有用的人才,就赐予相应等级的出身,和科举考试类似,这样大家就会都受到鼓舞了。所谓限定学历,这又是一个办法。

实行了这四个办法,那所有的留学生就一定不会是因为失业而流浪异国的人,就一定不会是生性轻浮浅薄的人了。先留学日本,再慢慢地到英、法、德、美各国去,遥望海外,感觉风云都生色不少。等到学成归来,亲人都感到快慰。对于那些国家的所有情况,如风俗的好坏,人心的真假,机器根据什么原理而制造,商业怎样才能振兴,不仅能一一说出,并且心中十分明白。我们懂得精确翻译,就对阅读外文书籍有用;善于测绘,就对指挥战争有用。更何况在友情融洽之后,外交就会容易处理,还对世界局势也有好处呀!又会有什么害处呢?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义

人主以一身理万几,权百币,御群伦,而能使丛脞不形,度支常

裕，臣庶咸怀其德者，果遵何道？亦曰本心以行政而已。是故《典》曰慎徽，《谟》言成允，《易》重不伤不害。群经所载，治道大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治天下有余，治一国更无不足。孔子欲为万世明治道也，乃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教天下之道千乘者。盖春秋之时，列国竞争，侯度不谨，上怠下慢，虽令不从。徭役兴则繁费无等，刑罚重则怨谮纷腾，治道浸浸乎衰微矣。诚本敬信节爱之道以道之，则敬以直内，而兢业自惕；信以孚众，而要约不烦。以礼为节，而节非吝啬也；以德为爱，而爱非姑息也。本至美之意，行至良之法，国庶几其有豸乎！

且夫敬信节爱，阙一不可，乃连类及之，又若互相为用者。何也？盖主敬即以存诚，曰明曰旦，安容妄念之偶参？信所以为敬之辅。体信因以达顺，实心实政，悉缘几康之用敕。敬所以为信之本。而且节以制度，公家汰一浮费，即闾阎免一诛求。非节不能行其爱也。爱克厥威，居心不忍刻苛，即处身不敢奢侈。惟爱乃愈见其节也。

四者相因，如环无端，先务为急。道国者如之何其不知？有圣王作，握乾符，阐坤珍，运大钧乎皇极，纳群生而在宥。郊社奉祀，典礼维肃，何其敬也！乐天事小，约信不渝，何其信也！一台榭之观，惜及中人之产，则用无不节。一水旱之灾，赈以百万之帑，则人无不爱。吾知圣敬日跻，允德咸孚，无禁不止，胡令不行？遐迩人心，固结莫解，则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慎斯道也以往，虽以之治天下，可也。

君主依靠自己一人去处理所有政务，安排各种收支，管理全部官民，而能使琐碎事务无不得到妥善处理，财政收入一直充足，官民都感怀皇恩的浩荡，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答案是只要凭着自己的本心来处理政务就行了。所以《尧典》提倡恭谨地搞好伦理纲常的教化，《大禹谟》宣扬礼教让人信服，《周易》注重不伤害万物。各种经典所记载的治国原则已很完备了，对此神妙地加以领悟掌握，存留在君主心中，用来治理天下已绰绰有余，治理一个国家更不会不够用。孔子想为后世阐明永恒的治国原则，于是就总结出敬慎对待政务、诚信无欺、节约费用、博爱众人的信条来教导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君。因为在春秋时代，各国互相竞争，制度不再严格，上面懒散，下面荒废，即

使有命令也不执行。徭役大兴，使钱财花费无数，刑罚沉重，使人民怨声载道，治国的原则渐渐都废弃不用了。如果真能用敬信节爱的信条来引导治国者们，那他们就会用敬慎来端正自己的内心，兢兢业业，自我警醒；用诚信来取得大众的信服，行政简明而不烦琐。用礼制来推行节约，使节约不会变为吝啬；用德政来博爱众人，使博爱众人不会变为姑息纵容。凭着最美好的愿望来实施最得力的措施，那国家差不多就有解决的效验了呀！

并且敬信节爱四条，缺一不可，所以要依次举出，而且这四条仿佛还互相辅助着，这是什么道理呢？以敬慎为主就是要保持诚信。每到黎明，怎能允许再夹杂某些私心杂念呢？诚信又是敬慎的辅助。表现出诚信来才能通达顺畅。有实在的诚心，有实效的政治，这全都要依赖严肃对待居安思危的问题，敬慎是诚信的落脚点。此外又要根据制度来励行节约，国家去除一项浪费，民间就会减少一次苛征。没有节约也不能推行爱人的准则。爱人能克制施政的威猛，心中不忍对人民苛刻征敛，行动上就不敢再挥霍奢侈。只有爱人才能更推动节约的实行。

这四条互相联系，就像圆环没有接头一样，都是当务之急。治国者有什么理由能对此不知道呢？圣明的君主在位，掌握皇天的刚健精神，阐扬大地的祥瑞，用最高准则陶冶民众，宽厚地包容天下万物。在祭祀天地、祖先的时候，典礼极为庄严隆重，是怎样地恭敬啊！欢喜地接受天命统辖百姓，说话立约绝不失信，是怎样地诚信啊！想到一座露台，就因为它价值一户中等产业人家的财产而不愿再建，这样就没有哪方面的花销会不励行节约了。遇到一次水旱灾害，就坚决地用百万财政经费来救济，这样就没有一人会感受不到国家的恩典了。我由此知道，君主圣明敬慎的修养日日进步，诚实的品德会人人信服，没有什么禁事会不销声匿迹，有什么命令会不执行？民心不分远近，都团结一致，不能破坏，这样国家想要建立亿万年长久的巩固统治，就有基础了。谨慎遵循这些原则去实施吧！即使用来统治全天下，也是可以的。〔温玉春译〕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

会试试题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公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殿试策问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大宝,今三十年。仰承列圣之诒谋,恪秉慈闱之懿训,宵旰忧勤,无时不以民事艰难为念。本年恭值皇太后七旬万寿,庆榜特开,冀求时彦,集思广益,以沃朕心。尔多士其扬榷陈之。

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虽深居九重,而虑周亿兆。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无殊,而循良之绩,今不如古。粉饰欺蔽之习,何以杜之?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闻见。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犹有《周官》遗意。其法

尚可行否?

三代之制,寓兵于农。自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岂因时而变,各得其宜欤?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三者各随其地之所宜。盍析言之?唐初置府兵,中叶府兵制坏,专用征兵。能详陈其得失利弊欤?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最为深切著明。能以今日情势,互证之欤?兵强于学,学兴于教。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师人长技,可不深究其原欤?

《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注云:式谓用财之节度。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能引申其旨欤?节流不外省冗费,裁冗官。施行之序,能筹其轻重缓急欤?开源之法,以农工商该之。今特设专部,悉心区画。整齐利导之方,能缕陈欤?

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果人能自树立欤?抑师道立而善人多欤?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何道之从?

凡此皆体国之宏纲、济时之要政也。多士博览古今,通经致用,其各直言无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自从即位以来,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上承各位先帝遗留的治国谋略,恭敬遵守皇太后的教导,日夜操劳,忧国忧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百姓生计的艰难。今年很光荣地赶上皇太后七十岁的生日,所以特开恩科皇榜,希望寻觅到当今优秀的人才,集思广益,以帮助皇帝我开扩思想。你们各位学人,请大胆陈述各自

的看法。

作为百姓之君的原则，应当具备像父母养育子女一样的心念，虽然深居宫廷，却总在考虑着怎样周全外面的百姓。对民间百姓的疾苦，只有当地郡县长官了解得最清楚。汉朝用六条之法来直接监察太守，而监察县令的大权则交在郡守手中。这与今天的管理原则没有差别。但优秀的官吏政绩，今天却不如古代。那么粉饰太平、欺骗隐匿的恶习，怎样才能杜绝呢？世界形势不断在发展变化，急需各类人才来负责各方面的事务。学校、警察、外交、经济等诸项事业，都不是不学无术的人所能管理的。要把这又杂又重的事业交给某人负责，一定要先扩大他的知识面。培养的责任，就在各地长官身上了，但各省开设学校培训吏员的计划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上面诚心地要求，下面却虚伪地应付。所以应该谋划出好的办法来振奋鼓励他们。汉制县邑里的县丞县尉，大多以本地人来担任，这还有《周礼》的一些遗意。这种办法现在还行得通吗？

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规定，军人全部由农民兼充。自从井田制度废弃后，就专门使用征兵了。这是否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各自都得到了合理的应用了呢？汉高祖设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军队，经常在秋后进行操练考试。这三者都根据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进行。何不逐条讲讲它们的情况呢？唐初设立府兵，中期后府兵制废坏，于是就专用征兵。能否仔细谈谈它们的利弊得失呢。宋朝韩琦倡议养兵，苏轼主张定军制、练军实，都是非常深刻又明白的看法。能否结合今天的情况，和它们互相说明一下呢？军事力量强大来自学校，学校的发达源于教育。环球各国，大多用尚武精神来立国。对懂得军事的将领的选用，遍及到知识阶层；体育运动的规定，从孩童就开始实行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能不深入研究它们的根本吗？

《周礼》中的太宰，用“九式”的办法来平衡、节约财政经费。注释说：“式”指财政经费的使用额度。职内官掌管国家的财政收入，职岁官掌管国家的财政支出。这与现今各国的预算、决算制度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苏轼关于管理财政的对策，强调国家的经费开支，有很

多都是取消它很容易还没什么害处，保留它很难还没什么好处的。曾巩关于经费使用的议论，强调多余的支出一定要找出它是怎么多余的而根本杜绝它，该省下的支出一定要找出它该省下的理由而绝对批准它。这些都是简明扼要的观点，能否具体陈述出它们的含义呢?节省开支无非是压缩多余的经费,裁并多余的官吏。执行起来要有次序,能谋划一下主次先后吗?增加收入的途径,就在农、工、商三方面中。现在国家都专门设立了主管部门,来全心筹划安排。关于整顿引导的方法能否逐条讲一讲呢?

读书人风气的邪正，全看教育是否得当了。古代由司徒负责宣传提倡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的程序作为选任官员的办法。西汉时注重通晓经书的人士,又设立孝廉、贤良等科目。当时贾谊、董仲舒这类人物,在渊博方面号称第一。东汉时读书人十分推崇节义,但有的议论者感觉他们评议朝政、互相标榜很不好。这能算最后的定评吗?唐初文学最为昌盛,到中期以后,以至于那些谋求进士被录取者竟有了求知己和温卷的名目。其中有什么兴衰演变的缘故，请试着探究一下它的根由。宋代著名的儒士层出不穷，各有自己的师承流派。但他们无不尊崇廉耻,强调气节,这种风气普遍传播,到明代还没衰落。这是人们自我修养树立了美德呢?还是由于名师立下了美德原则而使好人多起来了呢?现在想让全国上下,异端邪说不得猖獗,正派的学术日益兴旺,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以上这些都是治国的主要内容、挽救时代的重要政策。诸位学人博览古今经史著作,懂得经典教义,又明白如何运用于现实。请各自坦率讲出自己的观点,不要有所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读。

刘春霖　会试卷五道

刘春霖(1871～1941)　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光绪三十年(1904)状元。其于1914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时,应袁之邀担任总统府内史。凡在民国政府任职十余年,目睹府院相争的幕幕丑剧,遂愤然弃政隐居。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夫立国之初，每鉴前代得失，以定一朝之制。时势所迫，出于不得不然，非能使子孙世守，以维万世之安也。嗣世之主，昧于时变，因循荒怠，不思所以持之，欲无中于祸败，岂可得哉？

吾尝综观前史，历代内外轻重之际，得失之故，有由然也。夫天子建国，居中驭外，大抵据形胜以临天下，而操纵进退，自相维系。是以四方顺轨而下无觊觎。使非集权于中枢，久之必有拥兵坐大而睥睨奸命，适召天下数世之患。然使国家不寄阃于四方，则朝廷又孤立无援，势必至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此千古以来，祸机倚伏，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昔周有天下，诸侯裂土，握强兵而拥列城者，星罗环拱。降及衰周，天子守府，然而绵延五百余年，从无权奸篡夺之祸，惧诸侯也。然自春秋以降，至于战国，诸侯放恣，益不知有周室。天子徒拥空名于上，而卒灭于秦。唐有天下，行府兵之制，沿边置节度府，天下劲旅，布处四方。突厥、吐蕃之寇，天宝、灵武之乱，皆资外兵扶翼而不遽亡。即以仇士良之威暴，而昭义一表，乃震惧不敢复肆。其制可谓善矣。然自安史之后，藩镇外擅，更为乖逆，至合纵以抗天子，飙驰云扰，终唐之世，其祸不解。凡此皆外重内轻，其失至于负嵎怙强，朝廷不能制也。

秦始皇惩周末之弊，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关中，自以为万世有天下矣。然外无信臣精卒以制其内，赵高一薰腐之余，遂得以把持大柄，玩孺子于股掌之上，天下熟视而不敢校。及陈胜、吴广之徒起，奋梃大呼，天下弗能御也。魏文帝侵削诸侯，有同幽絷，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其势固莫能为乱也。然再传而后，微弱益甚，司马氏父子遂攘其臂而夺之。此又外轻内重，其失由于国无外援，故左右敢为乱逆而不顾也。

且非独周、唐、秦、魏然也。汉惩秦弊，广建亲藩，不旋踵而反者九起，其后复有七国之变。武帝离裂大国，以弱枝叶，未几王莽崛起，公移汉祚。宋惩唐季五代之乱，杯酒而释兵权，务用文臣，以柔其国，卒有靖康之祸。明惩宋室之孱弱，大封支庶，而靖难之师猝起而莫救。若此者，皆所谓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而不可解也。

虽然，立国之初，固不能逆睹后日之害，而预防之也。防一害，必更有一害以中之，出于所防之外。惟嗣主深虑，知化规天下大势之所趋，因时制变以持之，使害未形而势已转，庶天下可久安长治，而无倾覆之忧。不然，使周无夷王之下堂，幽王之东迁，秦无二世之昏虐，魏无齐王之幼暗，唐无代宗、德宗之姑息，则其祸乱，亦未必遽至于是也。贾生有言：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如因四朝之乱弱，而归咎其祖宗立国初制之不善，则天下岂有无弊之法哉？

一个国家的灾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善于管理国家的君主，会去仔细研判国家局势发展的大趋势，审时度势，随时采取措施来纠正、消除各种偏差的苗头，不至于让它酿成大祸而不能挽救。每在立国之初，总要借鉴前代的得失，来制定本朝的基本制度。这实在是被眼前形势所逼迫，出于不得已才如此的，并不是为了能让子孙世代守持不失，以维持万世的安宁。继承皇位的后代君主，往往对现今的隐患不闻不见，因循守旧，荒废懒散，不考虑如何持守先王制度，想要不落得失败命运，怎么可能呢？

臣下我曾经综合考察过去的历史，感到历代对中央与地方的轻重关系的处理，其间的成败得失，是有一定缘由的。天子建立国家，居于中央而统辖地方，一般都是占据着有利地形而君临四方，然后才可以自如管理，互相制约，互相辅依。从而使四方官民服从命令，而不会产生叛乱之心。假如不集中权力于中央的话，时间长了一定会有人拥兵自重，而图谋夺取天下，结果导致国家多少年的灾难。但假

如国家不在地方上安置辅助力量，那中央又会陷入孤立，缺乏外援，势必导致奸臣在朝内专权横行而对地方没有什么顾忌。千古以来，这其中都隐藏着祸乱的根源，一定都是这样，不只是一个朝代。

从前周朝拥有天下，诸侯裂土而分封，手握重兵而占有众多城邑的受封者星罗棋布，环绕保卫着王庭。后来周朝衰落，天子只持守根据地，然而绵延了五百多年，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权奸篡位的灾祸，这是因为权奸惧怕诸侯的原因。然而自春秋以后，直到战国，诸侯放纵肆意，丝毫不知还有周王室存在。天子只不过在上面空有虚名而已，最后终于被秦国吞灭。唐朝拥有天下，施行府兵制度，沿着边疆设置了许多节度府，全国的精锐部队分布于各处。突厥、吐蕃的侵略，天宝、灵武年间的叛乱，都依靠地方各支部队的扶持帮助得以平定，没有立即灭亡。即使像仇士良那样凶暴，而昭义节度使一篇表章，就让他惊慌失措而不敢再放肆。这种体制可算很完备了。但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地方，更加嚣张背逆，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肆意横行，直至唐朝灭亡，它们的祸乱还未能消除。这些都是外重内轻的例子，其弊端是地方势力割据自大，使中央无法驾驭。

秦始皇借鉴周代末期的弊病，毁坏重要城邑，诛杀地方豪强，收罗天下的武器，集中到关内，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拥有天下了。然而由于地方上没有可靠大臣和强大军队来制约朝廷内部，结果使赵高这个受过腐刑的人得以把持中央大权，玩弄小皇帝于股掌之上，天下都看到了却不敢出面纠正。等到陈胜、吴广这类人起来，举起木杆大声一呼，天下就再也无法控制了。魏文帝侵削诸王权力，就像把他们关押起来一样，设置了许多监管官吏来监视他们，这种情势当然再也不会发生叛乱了。然而几代之后，诸王力量更加弱小，司马氏父子于是出手篡夺了政权。这又是外轻内重的例子，其弊端是由于中央朝廷没有地方的支援，所以君主左右的大臣才敢胡作非为而没有任何畏惧。

而且，不仅仅周、唐、秦、魏是这样。汉朝借鉴秦朝的教训，大力设置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结果没多久就发生了九次叛乱，后来又有一场七国之乱。武帝因此分割强大的同姓诸侯国，以削弱地方。结果不

久王莽又起来,公然篡夺了汉朝政权。宋代借鉴唐末五代的战乱,杯酒而解除大将兵权,只用文臣,以使国家柔化,结果发生了靖康之祸。明朝借鉴宋朝国家文弱的教训,大封子弟,结果靖难军队突然发动而无人能够抵挡。像这些例子,都是所谓屡次借鉴前代教训,而趋就另一极端的单方面好处的做法。结果两种灾祸交替接连出现,无法从中解脱。

即使这样,在立国之初,还是不能预料后日的灾难而先做防备的。防备了一种灾难,一定又会遇上另一种灾难,这种灾难超出防备之外。只有后世君主深思熟虑,懂得研判天下发展的大趋势,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改变治国之策,使灾难还没形成而情势便已转变,这样天下大概就能达到长治久安,而没有灭亡的担忧了。否则,假如周朝没有夷王的流放,幽王的东迁,秦朝没有二世的昏庸残虐,魏国没有齐王的幼小糊涂,唐朝没有代宗、德宗的放纵姑息,那它们的灾难恐怕就不会马上达到这种程度。贾谊曾说过:君子在治理国家的时侯,会对照远古的事例,并在现实中进行验证,再参考日常人情,总结出盛衰的道理,审察好自己权势所适应的范围,而后取舍合理,随时变化,这样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了。如果因袭了那四朝的暴乱或衰弱,反过来却归罪于其祖宗在立国之初没有创设出完善的制度,岂不大错特错了吗?难道天下还真存在着没有任何弊病的制度吗?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公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吾尝读贾谊《新书》,观其上书文帝,请试以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当挟五饵三表之说,系单于之颈而致其命。其所谓三表,则曰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至所谓五饵,不过娱其耳、目、口、腹,以丧其心志而已。呜呼!若三表者,尚不失圣王柔远之旨。至若五饵,则未尝不怪其计之陋也。

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强国芘民之道。善治国者,不能

必敌之可胜，而能为必不可胜。使强邻黠敌闻风夺气，凛然而不敢犯，则天下安矣。若导人于淫靡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谓穿窬之智也，岂王者自强之大计乎？及吾读《汉书·贾谊传》，则于五饵三表之说，削而不书，犹复深讥其疏，以垂戒后世。于是乃叹班氏之书，其去取为至精，而其识为至远也。

或曰：昔秦穆公患戎臣由余之贤，遗戎王以女乐二八，以间疏其君臣，卒得由余而霸西戎。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戒之曰：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执是以观谊之说，未尝不效。然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于靡弱。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于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

或曰：后世文明之国，有以奇技淫巧之物，输入异国，以陷溺其心思，而汩没其志气者。汉何不可施之于匈奴乎？曰：此正文明进化之机也。好其物，则必艳其术；艳其术，则必学其学。夫使举国群趋于文明之学，适足以增其国力而已矣。汉代之文明，匈奴所不及也。使由爱好汉物，而因以渐求文章、礼乐、伦常之盛，则魏孝文帝之业，不难遽见于西汉之世也，岂足以敝其国哉？故吾谓御侮之道，惟当力求所以强国芘民之术，使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自能令单于远遁，而边尘不惊。若贾生之说，虽时或有效，何足取哉？此班氏所以为良史欤！

臣下我曾读过贾谊的《新书》，见他上书给文帝，请求试用典属国的官吏去控制匈奴，应当施行五饵三表的计策，一定会拴住单于的脖子让他来归顺。他所谓的三表，即是让单于羡慕汉人的容仪，爱好汉人的技术，把这些当作仁道；以讲究信誉为重要操行，把这当作固有的道德。让单于有明确的爱慕目标，已经答应的肯定能做到，这样即使十死之中只有一生，他也一定会来归顺。至于他所谓的五饵，不过是满足单于的耳、目、口、腹的需要，以使他失去清醒头脑而已。唉！

像三表,还不失圣明君主安抚远夷的原则。至于五饵,就没有人不责怪这种计策的粗俗了。

天子治理中国,控制各蛮夷国家,自会有一定的强国护民之术。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不能保证一定会战胜敌人,却能保证一定不被敌人所战胜。使强悍狡猾的敌国邻邦闻风丧胆,慑于中国的威严而不敢进犯,那样天下就可以安宁了。如果引诱别人去做荒淫奢靡的事情,以趁他疲弱的时候攻占他,这是所谓钻洞小偷的本事呀。哪里是身为君王的求得自强的战略呢?后来臣下我读到《汉书·贾谊传》,见它对于五饵三表的计策删节而不收录,并且还严厉批评了它的粗俗,以给后世人们留下借鉴。于是臣下我非常感慨班氏的史书,它的取舍特别精细,而它的见识也特别深远。

有人说:从前秦穆公担忧戎族有贤臣由余,于是就赠给戎王两组女乐,以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最终得到了由余而称霸了西戎。单于喜好汉地的丝绸美食,中行说告诫他说:现在单于改变风俗而爱好汉物,可是汉物不过只占十分之二,而匈奴却全都归汉所有了。由此来看贾谊的计策,未尝没有效果。但臣下我认为秦穆公的霸业,更主要依靠的是巩固加强国内力量。国势昌盛之后,外交策略就没有运用不当的。并且当时天下各国都很推崇欺诈、强权,而秦国又夹居在戎狄部族中间,如果施行它的狡黠计划,来偶尔牟取暴利,是可以的。而像匈奴对于汉朝来说,臣下我私自认为,它虽然爱好汉朝的东西,也不至于马上走向衰落。为什么呢?匈奴地处北方边疆,性情刚猛凶残,出于天然生成,哪里只是它的风俗造成的呢?假设汉朝不去仔细考虑怎样来抵御侵略的措施,而专干拿出自己的好东西来软化、腐蚀别国的勾当,臣下我只怕财产都用光了,边境的侵扰仍然如故。

有人说:后代文明进步的国家,就有把奇技淫巧的东西送到外国,来引诱它们的心思,消磨它们的斗志的。汉朝为什么不可以施用在匈奴身上呢?回答说:因为这正是文明进化的途径啊!喜爱他国的东西,必定会羡慕他国的技术;羡慕他国的技术,必定会学他国的科学。让落后国家全都来学习文明国家的科学,正好帮助自己增强了国家力量。汉朝的文明程度是匈奴赶不上的。如果匈奴由爱好汉朝

的东西，而进一步趋向于追求文采、礼乐、伦理道德的进步，那北魏孝文帝的事业，就不难立刻在西汉时代见到了。又怎能削弱他们国家呢？所以臣下我认为，抵御侵略的措施只有极力寻求强国护民的途径，使国家能够安定得像一块巨石，昌盛得像一团烈火，自然会让单于远远地逃走，而边疆再也不会有惊扰了。至于贾谊的计策，即使偶尔奏效，又怎么值得采纳呢？这不正是班氏成为优秀史学家的原因吗？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天下之患，莫甚于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国家当疲玩不振之秋，内忧外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朝野方酣嬉而为偷惰之谋，不有以震厉之，则弛者不可复张，而天下终于不救。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于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如猛烈之药，虽非所以养生，然遇沈痼之疾，则固非此不能起也。

诸葛武侯承刘璋之后，王荆公当北宋之衰，皆所谓处积弱积弛之余，非用申商之术，莫能治也。然武侯用之，功润一方，吏民衔感；荆公用之，毒乱天下，而诟病至今者，何哉？武侯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荆公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曰终于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然则后之治国者，必先有武侯之心，而后可以行申商之术。苟徒窃其似，而无恻怛之诚以贯之，必流为残忍刻薄而无疑。

王荆公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深见天下蔽于积习，非执法坚定，必为群议所挠，而又虑申商之学，不足以服朝野之心，乃讳言其名，而阴托《周礼》以为说。然则荆公非误会《周礼》，乃附会《周礼》耳。其所以附会《周礼》者，非真有取于古，逆知在廷诸臣，必将斥为申商之术，非先王之法，而因托为先王之政，以闲执其口。卒之攻者自攻，而讳

无可讳，乃专务以意气相遒，以博一日之胜。同己者进，异己者斥，使小人揣摩迎合，得行乎其间，而新法乃适以毒乱天下，为世大诟。

嗟乎！行政非人，虽有良法美意，亦足以为害。故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也。夫武侯与荆公，其所用之术，无以远过，然其成败功罪，悬绝若此。匪独其心术不同，亦其所遭遇使然也。武侯则匡辅之者，多俊才；荆公则排击之者，多君子。然此固不特荆公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欤？

治国所出的问题中，没有比不考虑当前的形势而只想博得宽大的虚名更为严重的了。国家正处在疲弱衰落的时候，内有忧，外有患，其形势十分危险，几乎随时都会灭亡，而官民上下却仍沉迷于嬉戏玩乐之中，只想着怎么来偷安偷懒，如果不采取手段震慑、警醒他们一下，那么颓废的人就不会再振作起来，而国家就会终归于无可救药。虽然申不害、商鞅之术不为儒家所称道拥护，但遭遇到这种时局，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善于治国的人，一定不敢再因循守旧，瞻前顾后，而给国家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的。这就像烈性药物一样，虽然不具备养生的效用，但是遇上那种深重的疾病，不用它就根本不能治愈。

诸葛亮继承的是刘璋留下的烂摊子，王安石接手的是北宋的衰弱政局，都是所谓身处长期疲弊局势的后面，不用申不害、商鞅之术，是无法挽救的。但是诸葛亮运用了它，功勋赐福一方，官民都心怀感念；而王安石运用了它，却毒害扰乱了全国，至今还受人指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诸葛亮并没有申不害、商鞅的狠心而只是运用了他们的政策，而王安石却是实际应用了申不害、商鞅的政策而对其名讳莫如深的缘故。怎么知道是这种情况呢？史书上记载，诸葛亮敞开诚心，遵守公平原则。凡是忠于国家、立有功劳的人，即使是仇家也一定赏赐他；凡是违法乱纪、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亲属也一定惩治他。又有记载说，当时全国官民，无不对他又怕又敬。他的刑法虽然严厉，却没有怨恨者，这是因为他用心公平而劝戒明白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后世的治国者，一定要先具备诸葛亮的用心，而后才能实行申不害、商鞅之术。如果只采取他的

表面做法，而没有贯穿他的爱惜怜悯的诚心，无疑一定会沦落为残忍刻薄的。

王安石慷慨激昂，有矫治不良世风的志向，深刻地认识到国家为积习所压抑，不坚定地执法，一定会受到天下人的阻挠。但他又担心申不害、商鞅的学说无法征服官民的内心，于是就隐去它的名目，而假托《周礼》来作解释。既然如此，那么王安石不是误解了《周礼》，而是故意附会《周礼》的。他之所以去附会《周礼》，不是真的从古代吸取了什么，而是如不这样，料知朝中的大臣们一定会斥责他的政策是申不害、商鞅之术，不是先王的法度，所以他才首先假称是先王的政策，来封住他们的嘴。但是即便如此，最终攻击者还是攻击不断，他想遮掩也遮掩不住，结果只好专门凭着意气来作对待，以夺取一时的胜利。同意自己的就提拔，攻击自己的就斥退，使一些小人迎合他的口味，得以掌握大权，结果新法也只被用来毒害、扰乱天下，从而遭到了全国的严厉批评。

啊！如果没有贤德的人来执行政令，即使有好的政策和意图，也只会导致祸害。所以程颐先生说：要首先领会了《关雎》、《麟之趾》诗的教化之意，而后才能推行《周礼》的制度。诸葛亮和王安石，他们所施行的政策，并无太大差别，但他们的功过、成败，却差别如此之大。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主观心意不同，也是由于他们的环境不同而造成的。辅佐诸葛亮的人，大多都是优秀人才；而接连攻击王安石的人，却大多都是德高望重的君子。这实在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宋朝的不幸吧？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环地球而国者，以数十计。其盛衰存亡之数，不一端，而大原必起于教育。故学堂者，东西各国之所同重也。学堂之设，大旨有三：曰陶铸国民，曰造就人才，曰振兴实业。三者不可偏废，而立学者必自度其国家之性质，以为缓急之端。

今中国因积弱之弊，欲以学战，与列强竞存，则必以陶铸国民为第一要义。何者?国民之资格不成，则国不可立。虽有人才可以为我用，亦可为人用。虽有实业可以为我有，亦可为人有。所谓国民者有善良之德，有忠爱之心，有自养之技能，有必需之知识，知此身与国家之关系，对国家之义务。以一身为国家所公有，而不敢自私；以一身为国家所独有，而不敢媚外。凡为国家之敌者，虽有圣哲，亦必竭其才力，以与之抗，至于粉身绝脰而不悔，终不肯以毛发利益让之于人。以此资格，教成全国之民，虽有强邻悍族，亦将敛步夺气而不敢犯。然后人才可兴，实业可振也。

中国以重文轻武之故，民气靡弱偷惰。谋私利不谋公益，无善良之德；视国事不干己事，无忠爱之心。专事分利，无自养之技能；未习溥通，无必需之知识。稍有解外国语言而习其事者，则相与服属外人，而为之伥。于此而欲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不亦难乎?方今欲建学校，以图富强，非鼓其特立之精神，不足以挽回积习。日本与我同处亚东，其弊亦大致相类。今一变而跻于列强之次者，亦以重尚武之精神也。

夫今日人才销乏，可谓极矣。政治废弛，法律繁乱，财政竭蹶，外交失误，则设专门以储才，固当务之急矣。然窃谓即有人才，而庶政亦不能善。何也?一人修之，百人挠之，其势必不能胜。古之立国，惟恃有二三豪杰。今之立国，则恃有全国之国民。不然，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以与文明诸大国争衡，虽有英雄，岂能措其手哉?至于农工之业，拘守故辙；商矿之利，见夺外人。以中国人力之勤，物产之博，苟分设各学，致富之道尤可跷足而待。然兴一事，必招洋股；创一利，适资他族。皆其民无特立之质，故利未兴而害乘之矣。

由是以观，则知必养成完备之国民，然后人才为我国之人才，非

他国之人才;实业为我国之实业,非异国之实业。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尝以独立自尊一语,为教育最大纲领,其即此意也欤?

全世界的国家,数目有几十个。各国盛衰存亡的定数虽然各自不同,但根本却一定源于教育。因此东西方各国无不重视学堂。学堂的设立,主要有三个目的: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培养造就优秀人才,振兴实业。这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但设立学堂的人又必须考虑到自己国家的性质和状况,因时制宜,适当有所侧重。

现今中国因袭了以前积弱的弊病,想要学成战斗精神,来和列强竞争生存,就必须得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首要任务。为什么呢?如果民众毫不具备"国民"的资格,那么国家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即使有了人才,可以被我们使用,也就可以被别人使用。即使有了实业,可以被我们所拥有,也就可以被别人所拥有。所谓国民应该具备善良的品德,具备忠君爱国的观念,具备养活自己的职业技术,具备必需的日常知识,也就是要明白自身与国家的关系,对国家的义务。懂得自己应为国家的公有财产,而不敢自私自利;也懂得自己又应为国家的私有财产,而不敢媚外求荣。凡是与我国为敌的国家,即使它有圣贤相辅,也一定竭尽全部才智气力来和它对抗,即便粉身碎骨也全不后悔,绝不把一丝一毫的国家利益白白让给别人。如果用这种标准来教育成功全国民众,即使有了凶悍的邻邦外国,它也会收敛气焰而不敢进犯。然后才可以培养人才,振兴实业。

中国因为一向重文轻武的缘故,民风萎靡懦弱、苟且怠惰。因而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由此缺乏善良的品德;认为国家的事务与自己无关,由此缺乏忠君爱国的观念。专门做争权夺利的事情,由此缺乏养活自己的职业技术;对事物不广泛予以涉猎,由此缺乏必需的知识。稍有几个能听懂外语并熟悉外事的人,也都一块去为外国人服务,帮他们干坏事。处在这种状况下而想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不太难了吗?现今正要设立学校,以求国家富强,如不鼓舞人们树立自立的精神,是无法挽回衰败的传统习惯的。日本和我国同处东亚地区,它原先的弊病也大体相似,而现在一变而跻身于列强

行列，原因就是重视尚武精神。

今天中国人才匮乏，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政治荒废松懈，法律条文杂乱，财政拮据困难，外交失败错误，所以设立专门学校来培训人才，当然是当务之急了。但臣下个人认为即使有了完备的人才，政治也不会必定改善。为什么呢？一个人奋发图强，却有一百个人阻挠破坏，这种情势自然不能走向成功了。古代治理国家，可以只依靠二三个突出人才。而今天治理国家，则要依靠全国所有国民。否则，民众愚昧无知，即使有百万之众，也等于零。依靠他们来和各文明强国争雄，即使有个别英雄，他又怎能着手应付呢？至于农业、工业的生产，只是拘守原来的模式；商业、矿业的利润，只是被外国人侵夺而去。凭着中国劳动力的充裕，物产的丰富，如果去分别设立各科学校，致富的门径还可以马上得到。但是每开办一桩事业，一定招募洋股；每创设一件好事，正好帮助了外国。这都是我国国民缺乏独立自主的品格，所以好事还没办成而害处已乘虚而入了。

从这来看，就可以明白一定要首先培养成完备的国民，然后人才会是我国的人才，而不是外国的人才；实业才会是我国的实业，而不是外国的实业。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曾经把“独立自尊”一条来作为教育的最大纲领，他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吧？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自古帝王之治，圣贤之道，不外一中。中者，举天下万世所宜视为标准者也。然芸芸之众，率茶然不能自立；而豪杰奇逸之士，则又不免矫持太过，而不能以大中为归。即中矣，而卒不能历久不渝，贯始终而如一，则物欲为之累也。惟君子能祛物欲之累，介然有以自持。此其所以难能而可贵欤？夫子答子路之问强，而复进之于君子。有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信哉！其能强也。

且吾尝见天下之变，所以挠吾中立者多矣。凡夫祸乱之萌，必先挟一近是之词，以为煽惑人心之计。一二见微之士，或能逆知其妄，耿耿自立，而不陷其樊。设于此而复有巨诈雄奸，别树一帜，以相抵

抗，其所以攻击彼党而发其逆谋者，适与己见若合符节，则不觉沛然从之，而无复疑。及乎势焰已成，徒党已众，而阴谋渐露，其狂悖乃更有甚焉。至此虽觉悟，愤悔而已。失身其中，噬脐无及。自古以来忠义慷慨之士，不能卒守中立者，往往如此也。

君子则不然。其识足以鉴别天下之是非，灼然如黑白之不可乱；其力足以撑拄狂澜之横决，屹然如砥柱之不可摇。当举世昏昧之秋，尝倡为非常之说，以冀弭百世之患。迨吾谋不用，而卒归于败，然后天下服其先觉，纷纷并起，窃其绪论，横议放言。而奇邪诡辩之徒，思乘时以售其奸，乃托君子之言，以保国救时，悚动天下。而君子于此，反退然中处，若无以异于常人。及其邪说一败，为世大僇，而君子不与其祸。

时势迁流相激，世变万端。君子以一身卓立其中，凝然若出于无事。天下方惊骇怪叹，以为神奇。而岂知其素所树立者，固如是哉！夫惟有定识，以烛于几先；有定力，以持于局外。然后甘言好词，不足以诱之；群疑众谤，不足以动之；权谋诡术，不足以误之；祸福利害，不足以乱之。而要其本原，在能取物欲之私而胜之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自古以来，帝王的治国策略、圣贤的思想内核都离不开一条“中正”的原则。中正的原则是普天之下的人们永远都应该把它视为标准的东西。但是在事实上，普通大众却往往蔫蔫地不能独立自主；而英雄豪杰、突出人物又不免过分刚强傲慢，都不能把中正原则作为归宿。即使做到中正了，又还是不能经久不变，始终坚持，这都是被物欲牵累的缘故。只有那些君子，才能消除物欲的牵累，一身正气，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不正是他们之所以难能可贵的地方吗？孔子回答了子路询问的什么是强盛的问题后，又向他介绍了君子的做法。其中一句说：确立中正而没有偏倚，强盛就强在这上面啊！确实呀！君子在这上面是能强盛的。

我曾经观察天下的变乱，其中会破坏我那确立中正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每逢祸乱酝酿的时候，坏人总会首先鼓吹一套听似有理的说法，用来煽动、蛊惑人心。这时一两个能够看出苗头的人士，也许

能够料知他们的欺诈，从而保持清醒和独立，不落入他们的圈套。但假如这时又有十分厉害的奸诈之徒出面，另立旗号，来反对前面的坏人。而他用来攻击坏人并揭露他们的阴谋的论调，又正好和自己的观点完全符合，于是便不知不觉痛快地跟他干了，再没什么怀疑的。不料等到他的势力形成，党徒已经很多的时候，阴谋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他那猖狂、反动比以前的更为厉害。至此虽然明白过来，也只能愤恨后悔而已。因为自己已经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后悔也晚了。自古以来，忠义慷慨的人士，不能最终坚持自己的中正原则，往往是这样。

君子却不是这样。他的见识足以让自己鉴别清楚天下的是非正误，明白得像不会混淆黑白一样；他的力量又足以让自己挽回横冲的狂涛，岿然不动就像不可动摇的砥柱一样。还在所有人都对时局昏然不知的时候，他就常常提出不一般的说法，希望能消除将要祸及百年的灾难。等到因为自己的谋划不被信用，而事情最终归于失败之后，天下人这才都佩服起他的先见之明来，于是纷纷起来，剽窃他的观点，大肆鼓吹。其中一些狡猾诡辩的人，想趁机兜售自己的奸谋，于是就假借君子的言辞，用保国家、救时局的旗号来鼓动天下。这时的君子，反而隐退，以中正自处，像和普通人一样。结果等到这些邪说又走向失败，遭到世人的大举声讨时，君子却一点也没受到牵连。

时代的发展趋势互相冲突，世间的变化也并不固定。君子一人卓然独立于其间，安定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天下人见此才大为叹服，觉得他简直是神人。又怎知他在平常所培养的人格原本就是这样的啊！只有拥有固定的见识，能在事先就清楚地看出苗头；拥有恒定的力量，能坚持居于局外。然后才能做到甜言蜜语无法引诱他，冷嘲热讽无法动摇他，阴谋诡计无法陷害他，福利祸害无法干扰他。而究其根本，就在于他能找出自己物欲的私心而克制住它。所以说能够克制自己就叫“强”。〔温玉春译〕

清代进士科殿试策题辑存

(已人前编者不录)

1.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策曰:帝王君临天下,莫不欲国祚长久,传之无穷。乃三统代兴,五行递王,初皆显奕,后渐式微。岂天之降命然欤,抑人事所致也?朕承上帝之宠灵,席祖宗之休烈,入主中夏,奄有多方,而海澨山陬,尚阻声教。今欲早成混一,衽席生民,巩固鸿图,克垂永久,以亿万年敬天之休,遵何道而可欤?内外臣工,朕所与共理天下者也。朕居深宫之中,邪正真伪不能悉辨,是非功罪不能尽明,全凭章奏,以为进退赏罚。每闻前代朝臣,分门别户,植党营私,蒙蔽把持,招权纳贿,朋类则顿生羽翼,异己则立坠深渊。更有同年同资,师生亲故,互相援助,排挤孤踪,浮议乱真,冤诬莫控,朝纲大坏,国祚遂倾,深可鉴戒。今恐在朝各官,因仍敝习,不能力改前非,所关治乱,甚非细故。必如何而后可尽革其弊,俾朕得日闻正言,行正事,以综核名实,修明法纪欤?在外各官,贪酷不公者甚众,临民听讼,惟贿是图,善恶不分,曲直颠倒,吏治既坏,民心日离,奸狡计行,善良被陷,斯亦向来有司之痼疾也。必如何而后能使官方清肃,风俗还淳,以致太平欤?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语曰有治人,无治法。又曰帝王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夫以四海之广,人民之众,应有奇伟非常、才全德备之大贤,能佐朕平治天下,以延运祚于无疆者。必如何而后可致之欤?诸士心悼前车,身逢鼎运,得失之源,治乱之故,筹之熟矣。其悉心以对,毋猥毋泛,毋畏毋隐,明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帝王统领天下,没有谁不希望国运长久,传续得永无尽头的。可分别代表黑统、白统、赤统的王朝却轮番兴起,各自占据木行、火行、土行、金行、水行的天子又递相称王天下,在起始阶

段全都显赫兴盛，到后来就逐渐衰败了。这难道是皇天降赐统治权才造成的这种情形吗?或者是由人事招来的结果呢?皇帝我承受到天帝的宠信和佑助，总揽起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入主中原，拥有天下各地，而海角山弯处仍然在阻塞声威教化。如今想及早形成天下统一的局面，使众百姓安宁下来，巩固那宏大的蓝图，能够垂示千秋万代，用来绵延那亿万年敬奉皇天的美好国运，遵用什么原则与方法就能达到目的呢?朝廷和各个郡县的官员，都是皇帝我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啊!皇帝我置身在深宫中，对奸邪纯正和真伪很难完全辨别清楚，是非与功劳罪过也无法全部辨明，全凭奏章来决定进用贬退和封赏惩罚。时常听说明代的朝廷官员分成派别，结党营私，蒙蔽天子，把持朝政，攫取权势，收受贿赂，属于本派就立即翅膀硬起来，与己方对立的人马上就坠入深渊。更有同科考中进士、同年被提拔的人以及师生和亲属故旧，互相连结救助，排挤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士，空发议论而搅乱真情，遭诬陷受冤屈没有地方去控告，朝廷纲纪彻底毁坏，国家命运于是断绝，这一切是深深需要作为鉴戒的。如今唯恐身在朝廷的大小官员沿袭衰败的习气，不能大力改正以前的错误，这可关系到治理与动乱，绝对不是小事情啊!必须应该怎么办而后就可以彻底革除那些弊端，致使皇帝我每天得以听到纯正的言论，施行纯正的事体，去综合验定名位与实绩的对应关系，修明法度纲纪呢?在地方上的各级官员，贪婪残酷而不奉公守法的人特别多，管理民众和审断官司，只贪求贿赂，善恶不加区分，理屈和理正完全弄颠倒，施治的原则与方法既已毁坏，民心一天比一天丧失掉，奸猾狡诈的主意得逞，善良的人遭诬陷，这也是向来各级官府的顽固病态啊!必须应该怎么办而后就能使为官之道得到澄清与肃正，社会风尚返回到淳厚的状态，去实现天下太平呢?打算定立下天下的大业，就必须统一起天下的人心。官吏谨慎而百姓质朴，这是满洲的治理方式。如今怎样去施行政事，而后就能使满族汉族的官员及民众同心合志呢?常言说世上存在着真能把一切治理好的人，却没有真能把一切治理好的法度。又说帝王在求取贤才上很辛劳，可在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以后就安逸了。凭借四海这样地广大，人民这样地众多，应该有那奇特伟

大、异乎寻常、才能全面又品德完善的大贤士，能够辅佐皇帝我平定和治理天下，把国家命运绵延到永无尽头的地步去。必须该怎么办而后就能把他们招来呢？你们这些考生对明朝灭亡的教训在心中感到很可悲，本身正赶上国家鼎盛的时运，对得失的根源和治乱的缘由已经筹谋得特精熟了。要用尽心力做出对答，不要冗杂，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畏惧，不要有什么隐讳，明晰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 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策曰：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得人为急务。朕深维真才希觏，知人实难。如以言貌取人，虑有内外不符、妍媸互异者。如以荐举进用，虑有朋党援引、真赝混淆者。如以博学能文而遽信其存心行事，又每有下笔千言，侈谈尧舜，而中藏奸佞，莅官污秽者。必如何而后真才可得欤？近闻见任官员伯叔昆弟、宗族人等，以及废绅劣衿，大为民害。往往压夺田宅，估攫货财，凌暴良善，抗逋国课。有司畏惧而不问，小民饮恨而代偿，以致贵者日富，贫者日苦，明季弊习，迄今犹存。必如何而后可痛革欤？今当混一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兵必需饷，饷出于民。将欲减赋以惠民，又虑军兴莫继；将欲取盈以足饷，又恐民困难苏。必如何而后能两善欤？尔多士家修廷献，正在今日，务各出己见，逐条献策。勿用四六，不限长短，毋得预诵套词，拘泥旧式，重负朕意。朕寤寐真才，不啻饥渴，多士宜深体恪遵，明切敷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帝王治理天下，没有谁不把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作为头等大事的。皇帝我深切地想来，真才很少能看到，了解人实际上很困难。如果按照言论和外貌来选取官员，就会担心有内心外表不一致、相貌堂堂却胸无谋略而相貌丑陋却富有才华的人。如果通过荐举来进用官员，就会担心有同党援引、真假混淆的现象。如果单凭学问渊博擅写文章就一下子相信他的内心修养和行事错不了，可又常有下笔千言、高谈唐尧虞舜但却心中隐藏奸恶巧佞、一当官就贪赃

枉法的人。必须该怎么办而后真才就能获取到了呢？近来听说现任官员的伯父叔父、兄长弟弟和本宗族的人，以及土豪劣绅，严重地构成了民众的祸害。他们往往侵占逼夺田地和住宅，通过典当攫取物品和财产，欺凌虐待良善的人，拒不交纳或故意拖欠国家的法定赋税。主管部门畏惧现任官员的权势而不敢查办，普通百姓吞下怨恨来代替他们交税。以致有权势的人家一天比一天富足，贫穷的人家一天比一天愁苦，明朝末期的弊病与恶习，到现今依然存在。必须该怎么办而后就能彻底铲除掉它们呢？如今正值天下统一的起始阶段，还处在用兵的时候，军队必定需要军饷，而军饷又出自百姓手中。打算减轻赋税来给百姓带来恩惠，可又担心军队一动用起来却供应不上军饷；打算足额征税来使军饷满够用，可又唯恐民众的困乏情况难以缓解。必须该怎么办而后就能两方面都处理得挺妥善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在家中研习学问，到朝廷上来献呈建议，正在今天啊！务必要各抒己见，逐条献上计策。不要使用四六句，也不限定长短，不准把预先诵读的那堆套话写上来和拘泥从前的答卷格式，进一步辜负皇帝我的希望。皇帝我在睡梦中都在求取真才，和又饿又渴没有什么两样。你们这些读书人应当深切加以体会，严格予以遵守，明晰恰切地做出对答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 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

〔三月二十五日，策试满洲蒙古贡士〕制策曰：朕闻至治之世，讦讼无人，刑罚不用。是岂民之自然息争与？抑抚道各官贤良之所致与？抑亲民之府州县等官各得其人与？尔积学诸士，必有灼知，务抒所见。朕将亲览焉。

〔三月二十五日，策试汉军及汉贡士〕制策曰：朕承鸿业，定鼎九年矣。亲政以来，日益兢惕。念治天下之道，莫大乎用人听言。人有真邪正，言有真是非，往往混淆难辨。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移，将遵何道与？开创之始，凡官制、赋役、礼乐、兵刑、营建、风纪，规模粗设，未协至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其制可得详闻与？或因或革，或盛或衰，意者不在制度文为，而别有在与？用正人，闻正言，行正道，朕日切于

怀,未得其要。尔诸士幼学壮行,宜各出所见,实陈方略。其文务以汉廷贾、董诸臣为式,毋沿对偶冗长故习。朕将亲览焉。

(策试满洲蒙古贡士)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在治理最美好的时代,根本就没人去打官司,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这难道是民众自然就停止争斗了吗?或者是由安抚引导的官员很贤良所造成的呢?或者是因为直接管理百姓的府州县各级官员分别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呢?你们这些学问深厚的考生,一定具有透彻了解的地方,务必抒发出本人的见解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策试汉军及汉贡士)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宏大的帝业,确立起国家统治已经九年了。亲自处理朝政以来,日益戒惧警惕。想到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什么能比任用官员和听取言论更为重要的了。人有纯真、邪恶、正直三类,言论有真切、正确、错误三类,但常常混淆在一起,难以辨明。如今想立即就能辨明而不疑惑,固定而不改变,应该遵用什么原则与方法呢?国家创建初期,举凡官制、赋税徭役、礼仪乐舞、军队刑罚、土木工程,风尚纲纪,都是基本框架大致设立起来了,但与最高道法还不切合。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以来,它们的制度可以详尽地让人听一听吗?有的直接沿用,有的加以变革,但仍有的兴盛起来,有的衰败下去,想来这并不在于制度典章,另外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吗?任用纯正的人,多听纯正的言论,实行纯正的道法,皇帝我对此每天都在内心里深切予以关注,但没获取到要领所在。你们这些考生在幼年时就研习学问,到成年后就去践行它们,应该各自亮出本人的见解来,切实陈述那方略。答卷务必要拿西汉贾谊、董仲舒各位臣僚作为典范,不要沿承四六骈偶和废话连篇那类旧有的习气。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 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满洲蒙古贡士〕制策曰:朕惟平治天下,莫要于综理政事。政事之本,在六部各有专司。如得贤才,则僚采奋庸,庶务修举,而万民康济矣。今欲痛改夙弊犹未尽除,铨法混淆,赋税逋

欠，士习日颓，武备不实，刑狱沉滞，而虚糜未省。此其法未尽善欤？抑奉行者犹未得补偏救弊之要欤？尔等其抒衷尽言，毋剿袭，毋缘饰。朕将亲览焉。

〔三月十五日，策试汉军及汉贡士〕制策曰：朕惟古治之隆，政教彰明于上，六府孔修，黎民於变，四岳九官十二牧协恭和衷，股肱良而庶事康，猗欤盛哉！朕今夙夜图治，与大小臣工讲学议政，冀登上理，而纪纲犹有未振，法度犹有未张。赋税考成，非不屡加申饬，而官吏之耗蠹尚滋；盗贼剿抚，未尽合乎机宜，而小民之安枕无日。其故何欤？揆厥所由，良以凡百有位偏私难化，瞻顾情面者多，实心担当者少。兹欲重新整顿，大破积习，俾各兴事慎宪，共矢公忠，何道而可？从来有治人，无治法，岂非人存则政举，而用人为理财之本，知人尤安民之要欤？尔诸士怀家修而际廷献，其详切敷陈，以真学问为真经济，毋事浮袭。朕将采择而施行焉。

（策试满洲蒙古贡士）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平定和治理天下，没有什么能比全面料理好政事更为紧要的了。政事的根本，在于吏部等六大政府机构各有本部门的职守。如果获取到了贤才，群臣就会勤勉地供职，一切政务得到修明和推行，而天下民众就安康了。如今打算大力扭转积弊可仍旧没有彻底铲除，选用官员的制度混乱不清，赋税拖欠收不上来，读书人的风气一天比一天衰颓，武力防备不充实，案件审理积压严重，而白白耗费朝廷资财的事情还没减省下来。这都是因为国家法度还没特完善造成的吗？或者是贯彻执行的人仍旧没抓住弥补偏失和救助弊病的要领呢？你们这些考生要抒发内心的想法，说出想说的一切话，不要剽窃别人的话语作为自己的说法，也不要添枝加叶做修饰。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策试汉军及汉贡士）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古代的隆盛治理，政令和教化在上面显示得特明晰，木火土金水和谷物这六种物资的储存大力得到充实，黎民百姓随同教化而彻底转变，四方诸侯的首领、中央九大要员和十二州的长官同心协力，敬慎和睦，辅政大臣贤良而各种政事顺利，真是太兴盛了呀！如今皇帝我从早到晚谋求大

治，与大小臣僚讲求学问，议论朝政，希望步入最美好的治理状态。然而国家纲纪还有没振扬起来的地方，法度还有没张布开的地方。赋税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对此并非不是多次加以申明戒饬了，可官吏的贪污和耗费还在滋长。对盗贼进行围剿和招抚，还没做得完全符合机宜，而平民百姓要想安宁下来就没有那一天。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探究那原因所在，实在是因为所有在位的文武百官自私自利很难转变，考虑情面上过得去的人太多，真心担起责任的人太少。如今打算重新进行整顿，彻底破除积习，使官员各自处理好政事，慎重对待法规条例，共同发誓要做到公正忠诚，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就能达到目的呢？从来就有能把一切治理好的人，而没有能把一切治理好的法度。这难道还不是胜任的人确在那里而政事就推行开了吗？任用人正是料理财政的根本，了解人更是安定住民众的关键吗？你们这些考生怀有在家中修明的学问，又正值在殿廷上做献呈，要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把真学问视为真能经邦济民的东西，不要在虚浮和拾人唾余那一套上用力气。皇帝我准备加以择取并施行它。

5. 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策曰：朕惟唐虞三代，民风朴茂，海宇乂安，人无偏陂之心，俗跻雍熙之盛，率性而遍德，训行而近光，涵濡于道德仁义之中，驯致刑措不用，何治之隆也！朕孜孜求治，夙夜不遑，十有五年于兹矣。乃休养多方，而闾阎未宁干止；训迪日久，而群黎未睹维新。表章经术之令虽殷，而博通经学者尚寡；明慎用刑之念虽切，而自干法网者犹多。岂人心之尽不古若与？抑奉行者未得其实也？今欲使兆庶遂生乐业，咸得其所，庶几衣食足而礼义兴；人心协正，风俗还淳，敦尚经学而修明性道；君子怀刑，小人亦耻犯法，俾隆古之上理，再见于今日。何道而可？尔诸士其各抒夙抱，详切敷陈，勿得剿袭浮泛。朕将采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百姓的风尚质朴浑厚，整个天下治理安定，人们没有不正不平的念头，民间进

入了和睦欢悦的盛况，发挥出善良的本性，表现出各种品德，顺从并奉行最高的行为准则，接近天子的光采，在道德仁义中接受化导，逐渐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治理得是多么地隆盛啊！皇帝我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想方设法让民众休养生息，可民间还没消停下收租讨债来。训导启迪已经时间很长了，可黎民百姓还没看到焕然一新的国政。标揭显扬经典学说的诏令虽然多次颁发，可全面通晓经学的人还很少。严明慎重地对待刑罚施用的心意尽管很深切，可自动去触犯法网的人依旧很多。这难道是因为人心全都不像古代那个样了吗？还是贯彻执行的官员并没取得那实效呢？如今打算让亿万百姓实现生存的美好愿望，对自己的本业感到很快乐，全都获取到既定的位置，差不多吃饭穿衣很富裕，礼仪正义兴行起来。人心纯正又团结一致，社会风尚返回到淳厚的状态，崇尚经学，修明人的本性和行为规范。君子想到遭刑罚太可耻，平民也把触犯法律看成是羞耻事，使隆盛古代的那种最美好的治理状态在今日重新显现出来。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以上的目的呢？你们这些考生要各自抒发出平常所蕴积的东西，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不要剽窃别人的说法，也不要虚浮空泛。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用择从。

6. 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

〔九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策曰：古帝王平治天下，必政教修明，然后海宇宁谧。顾宣猷熙绩，端藉臣邻，故以庶政分任庶官，俾六府孔修，百工时叙。郅隆之理，朕甚慕焉。朕承天眷命，抚御万方，十有六年于兹。所期共襄政治者，内则责之六卿，外则责之督抚，简任既慎，倚毗殊殷。乃近见内外诸臣，或怀私自便，或持己乖方，或推诿以即安，或迂疏而寡效，以致庶务未修，民生未遂。语云：大臣不法，则小臣不廉。兹欲使正己率属，实心任事，何道而可？至于守令各官，亲民最切，抚字催科，皆其专责。何以兼尽无扰，以称循良？教化为朝廷首务，刑法乃民命攸关。朕嘉惠斯民，念深怀保。欲端风俗，则广励之事何先？欲致祥刑，则明允之道奚若？尔诸士经术夙娴，思展蕴

抱久矣。行将登尔于朝，分职授政，其各抒所学，著之于篇，毋拘毋袭，直言无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古代帝王平定和治理天下，必定要使政治教化得到修明，然后四海以内才会安宁。但宣导治国规划，振兴起各种政绩，实在要借助身边的大臣，所以就拿各种政务分别交给各类官员去负责，致使木火土金水和谷物这六种物资的储存得到充实，众多官吏按时完成任务。对这种最为隆盛的治理状态，皇帝我特别仰慕啊！皇帝我承蒙皇天把统治权牢固地授付下来，统领天下各地，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所期望共同辅助政务治理的人，在朝廷上就责成吏部等六部大臣去办，在地方上就责成总督巡抚去办，在选拔任用上既已慎重，在倚靠和天子联手上更特别殷切。但近来发现朝廷和地方上的众臣僚，有的怀揣私心，自己怎么有利就怎么来；有的全按个人的意志办，违背常规；有的遇事推卸责任，来归向自我保全；有的迂腐粗疏，很少能取得成效。以至于各种政务没得到修明，民众的生活没实现愿望。常言说：大臣不奉公守法，小官就不廉洁。如今打算让大臣们端正自己，给下属作出表率，真心实意地承担起责任来，采用什么办法就能做到呢？至于太守县令各级官员，直接管理百姓最和他们相接近，加以慰抚养育和征收赋税，都是这些官员的专项职责。凭仗什么就能使两方面做得都妥善而不产生搅扰百姓的情况，称得上是遵循法度的贤良地方官呢？教化属于朝廷的头等大事，刑法是关系到百姓性命的东西。皇帝我对当今的民众施布恩惠，深深想到要保护好他们。打算端正民间的风尚，而推广激励的事体要数哪一种占据首位呢？打算做到审慎地施用刑罚，而严明公正的做法又该怎么样呢？你们这些考生一向对经术特熟悉，渴望施展出胸中蕴积的谋略已经时间很长了。眼看着就要把你们安排到朝廷上，划分职位，授给政事，要各自抒发出本人所研习的东西，明晰地写在答卷上，不要拘谨，也不要剽窃别人的说法当成自己的意见，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7. 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

〔三月二十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古帝王抚育群生，莫不以兴行振德为首务。以故俗尚醇茂，贤才众多，吏有廉善之风，民无匪彝之习。其时刑措不用，登于上理，何其盛也！朕荷上天眷佑之隆，承祖宗付托之重，励精求治，三年于兹矣。每思更化善俗，俾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乃治效犹未即臻，岂广厉之道有未尽欤？今欲诞敷教化，使天下蒸蒸，振兴为善，其道何由？至于考绩课吏，所以澄叙官方。何以使贤否不淆，激扬咸当欤？明罚敕法，所以大畏民志。何以使庶狱平允，从欲以治欤？尔多士其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古代帝王抚育众百姓，没有谁不把倡导美好行为和振扬品德作为头等大事的。因此社会风气就看重淳正浑厚，贤才众多，官吏形成廉洁和办好政事的风尚，民众没有不符合常规的恶习。当时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步入了最美好的治理状态，这是多么地隆盛啊！皇帝我承奉到皇天顾念和佑助的盛大心意，肩负起祖宗托付的重任，励精图治，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总去思考对朝政进行变更，让社会风尚变美好，使官吏胜任自己的职务，百姓们安心自己的本业，可治理的效果还没迅速达到，这难道是推广和激励的做法还有很不够的地方吗？如今想广泛地施布教化，使天下蒸蒸日上，振扬品德又倡行美好的行为，争当良善人，具体的途径又该从哪里入手呢？至于考核政绩，督察官吏，目的是澄清并端正为官之道。采取什么措施就能使贤能的人和庸劣的人不混淆在一起，去除邪恶和表彰贤良全都特恰当呢？宣明刑罚，强调法律，目的是使百姓心中感到特畏惧。通过什么办法就能使大小案件审断得公正恰当，顺应民意来达到治理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要各自抒发自己的看法，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8. 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抚御四方，莫不以安民兴贤为首务。朕缵承祖宗鸿绪，孜孜图治，民生休戚，

日廑于怀，而治未臻于郅隆，其故何欤？今欲家给人足，以成丰亨乐利之休，何道而可？兴贤育才，原以为民。今既崇经学以正人心，重制科以端始进，乃士风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果陶淑之未善欤？抑风俗人心习于浮伪，徒徇名而失实欤？必如何而能返《棫朴》作人之盛，以几时雍之化也？我国家揆文奋武，礼乐之彦，韬钤之臣，兼收并重。何以简用得人，使才称其职，庙堂著亮采之功，封疆有干城之效欤？在外地方大吏，惟督抚是赖；牧民之官，守令最亲。必表正而后景直，欲使大法小廉，遵功令而修职业，以争自濯磨，将何术之从欤？漕粮数百万，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藉以充裕，俾国收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于中，其各抒夙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帝王承受到皇天赋予的统治权，统领驾驭天下四方，没有谁不把安定民众和起用贤士作为头等大事的。皇帝我继承祖宗的盛大统系，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对百姓生计的喜乐与忧虑每天都在心中放不下，可治理还没达到最隆盛的状态，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今想使家家富裕，人人充足，形成盛大亨通和百姓感到欢乐与有利的局面，通过什么途径就能实现呢？起用贤士，培育人才，原本是用来替民众着想的。如今既已崇尚经学去端正人心，重视皇帝亲自主持科目考试来把好入仕关，可读书人的风气还没接近古代，以致官吏施治的方式不清正，民众的生活还没实现美好的愿望。这果真是陶冶化导还没做得很完善吗？或者是社会风气与人们的思想沉溺在浮华虚伪当中，光去追求名声而丢掉实际了呢？必须该怎么样就能返归到《诗经·棫朴》诗所咏叹的造就人才的那种盛况，接近社会一片和睦的那种化导效果呢？我们国家部署文治，奋扬武功，对精通礼仪乐舞的英才和富有军事谋略的臣民，同时延揽又对等看重。采取什么办法就能在选拔任用上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使才干胜任那职务，在朝廷上显现出辅助政事的功绩，在边区上取得捍卫国家的成效呢？在京师以外的地方重要长官，只去信赖总督和巡抚；直接管理百姓的官员，顶数太守县令与百姓最接近了。测量仪器

必须先放正,然后那投影才笔直。想使地方大员奉公守法,下面的小官很廉洁,遵守官员的规则条例,修明本身的职守,竟相去自觉磨砺净化自己,应该依从什么方法去做呢?每年由水路运到京师的粮食多达数百万石,都从东南地区足数征收调取,由黄河、运河辗转运送过来。采用什么方法就能使河道的开挖疏浚恰如其分,京师粮仓借此而充足宽裕,使国家收到好处而百姓不遭受损害呢?客观上一定有那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你们这些读书人立志研求学问已经时间很长了,应当在胸中怀有真知灼见,要各自抒发出本人平素所蕴积的东西,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9. 清圣祖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承乾立极,绥理万邦,莫不以厚风俗、正人心为久安长治之本。其时化理敦庞,民生朴茂,海内群黎咸享丰亨豫大之休,洵府事修和之成效也。朕荷天眷佑,嗣缵弘基,夙夜孜孜,期登上理,十有五年于兹矣。乃风俗未尽丕变,人心未尽还淳,闾阎之盖藏未裕,军兴之输挽犹繁。岂振兴爱养之未得其道欤?何郅隆之难复也?夫俗尚浇漓,人多狙诈,君子长者之行不少概见,而告讦时闻,未能率迪于仁让。其故何欤?且忠孝者,人生之大节也。知之明,则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则不昧于顺逆。乃人心不古,奸宄潜滋,所关世道良非细故。岂亲亲长长之谊,素未讲究欤?抑司教者之训饬未备也?经国之道,不讳言财。况今戡定方殷,军需孔亟,议生议节,亦既筹画多方矣,而度支未见充盈,施行尚鲜实效。何道而使上有裨于经费,下无妨于休养欤?尔多士读书怀古,留心经济久矣。其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承奉皇天,确立起最高准则,安抚治理天下各地,没有谁不把社会风尚变淳厚和端正人心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的。当时的教化和治理特盛大厚重,民众的生活朴实兴旺,全天下的黎民百姓全都获享到盛大亨通又安乐富庶的吉福。这确实是六府与三事既修明又和谐的成效啊!皇帝我承受到皇

天的顾念与佑助，继承宏大的基业，从早到晚勤勉不懈，期望步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然而社会风尚还没全部彻底转变过来，人心还没完全返回到淳厚的境地，民间的粮食储存还不宽裕，用兵的粮草供应仍旧频繁。这难道是因为振扬美德和爱护养育百姓还没获取到最恰切的办法吗？为什么古代那种极为隆盛的景象就难恢复呢？社会风气崇尚浅薄衰败那一套，人们大多奸猾狡诈，君子长者的行为很少能大致看得到，而诬告和攻击却经常听得到，没能把仁厚谦让作为行为的准绳。其中的原因可是什么呢？而且忠诚孝敬是人活在世上的重要表现。对此了解得特清楚，就不会被邪恶所迷惑；对此持守得特坚定，就不会被叛逆所蒙蔽。可是人心竟不是古代那样了，当内奸、做外贼的想法却暗中滋生了。这关系到世道如何，决不是小事情。这难道是对亲近亲属和尊重长辈的道理一向没进行讲求探究吗？或者是主管教化的官员进行训导戒饬还不完整透彻呢？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并不忌讳谈论财利。况且当今平定叛乱的任务正十分紧切，军用物资特别需要及时供应上，讨论生财和讨论节用，也已经多方加以筹划了，可国家财政还没看到很充盈，施行中还很少见有实效。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致使上面能对经费很有补益，对下面又不妨害到休养生息呢？你们这些考生研读书籍，追寻古代，留心经邦济民的谋略已经时间很长了。要各自抒发出本人的见解，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0.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古帝王统御天下，建极绥猷，莫不简贤任能，乂宁兆庶，官方澄叙，府事修和，农务兴而野无旷土，国计裕而泉货流通，豫大丰亨，洵郅隆之上理也。朕荷天眷命，嗣缵鸿图，宵旰靡宁，孜孜求治。每思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否，安全嚣咻，端藉循良。故于监司守令之任，务加遴选，乃龚、黄之绩未闻，而贪黩之风如故。或吏道杂而多端，激扬之法未善欤？或大法小廉，表率未得其人欤？国家藏富于民，必使人无游惰，然后田野辟而生聚蕃。比年以来，劝农垦荒之令屡下，乃地利未尽，污莱尚多。抑有司

奉行弗力耶?将督课者,循名而未责其实也?自昔九府圜法,所以便民利用,鼓铸之设,其来旧矣。迩以铜不足用,铸造未敷,有以开采议者,有以禁民耗铜议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别有良策欤?尔多士留心经济,其详切敷陈,勿泛勿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古代的帝王统领天下,建立起最高准则,设布好教化的方式方法,没有谁不去选拔贤才,任用能人,治理并安定住亿万百姓,澄清并端正为官之道,修明并协调好六府三事,农耕事务兴行而原野上没有荒芜的田地,国家财政充裕而货币流通起来,盛大享通又安乐富庶,确实属于最为隆盛的第一等治理啊!皇帝我承蒙皇天把统治权牢固地授付下来,继承祖宗的宏大蓝图,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常常想到民众生计的喜乐或忧愁正与官吏施治贤良与庸劣密切相关,保全安抚百姓,确实要靠奉公守法的贤良地方官。所以就对省级长官和太守县令的委任,务必严加遴选,可像西汉太守龚胜、黄霸那样的治绩却没听说谁有过,而贪污敛财的风气却还跟以前一个样。这或许是因为任命官吏的途径太多太杂乱,而激浊扬清的办法还不特完善吧?或许是地方大员奉公守法而小官就廉洁,偏偏在大官应当做出表率上而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吧?国家把财富分散在百姓那里,一定要让世人中没有四处游荡的懒汉,然后田野才能得到垦辟,人口繁衍和财物积聚才能变雄厚。近年以来,鼓励农耕和垦荒的诏令多次下达,可土地的效益还没完全发挥出来,荒芜的田地仍然很多。这或许是主管部门贯彻执行不得力吧?或许是进行督察考核的人光按名义走走形式而没验定那实际吧?自古以来,由中央九个专职机构掌管并调节钱币的制度,目的是方便百姓,使物尽其用。钱币铸造部门的设立,也是由来已久的了。近来鉴于铜不够用,铸币满足不了需要,有人建议开采铜矿,也有人建议禁止百姓消耗铜。采用实行这两种建议果真可以永久有利吗?或者在它们以外,另有高明的对策吗?你们这些读书人留心经邦济民的谋略,要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1. 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壬戌科

〔九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治定功成,尤加意乎人心风俗之所尚,以图万世治安之本。维时礼教明于上,仁让兴于下,俗重敦庞,人多谨悫,国计丰裕而比屋盈宁,四方清晏而川岳效顺。朕综览前史,心实慕之。兹仰荷上天眷佑,祖宗鸿庥,耆定武功,削平逆乱,亟思覃敷德教,厘正典章,庶几海宇化成,茂臻上理。顾令甲屡颁而奉行不力,末作之纤靡未息,闾阎之嗜欲犹滋。岂闲情节性、坊表斯民之方,尚有未备者欤?夫惇厚以立德,节俭以足用,厉俗之良规也。而民心日偷,浇漓益甚。何以使孝友之行笃于门内,奢淫之习绝于里闬欤?从来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恭敬廉让,则德化易成。何以整齐其心志,移易其好尚,俾有所持循欤?抑慎辨等威,纳诸轨物,使贵贱少长,无相凌竞,果何道之从欤?图治之要,首重天储,兼御民患。比年河决为灾,修筑鲜效,堤防方报竣工,洪流旋复他溃。岂信河势之危险欤,抑人事未尽善也?岁漕数百万粟,转输于黄、运两河,所系綦重。或疏浚下流,或固筑堤岸,前人之成法具在。岂在昔则有明效,而今不可踵行欤?使实意讨究,修浚得宜,上不梗运道,下不病民生,必有策以处此。尔多士胸蕴经术,将以善世泽民,其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治理确定下来、功业告成以后,更对人心和社会风气所看重的东西予以高度的注意,以便谋求千秋万代永远治理安宁的根本所在。当时礼仪教化在上面予以宣明,仁德谦让在下面得到兴行,社会风尚看重浑厚朴实,人们大都恭谨诚恳,国家财政充裕而百姓家家富足,天下四方清平安宁而山峦河流献出顺畅的兆应。皇帝我综合观阅前代的史书,心里确实仰慕这种局面。如今往上承受到皇天的顾念与佑助以及列祖列宗赐给的大福,形成了武功,消平了叛乱,急切地思索要广泛地施布仁德教化,修订端正法规条例,差不多实现四海以内教化形成,盛大地进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但法规条例多次颁布而贯彻执行却不得力,不务正

业者的奢靡行径尚未止息，民间的贪求财利仍在滋长。这难道是因为杜绝欲望和节制情性、对当今民众严加防范的举措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吗？倡导淳厚来确立起德性，励行节俭来使吃穿不愁，这是促进社会风尚的有效办法啊！然而民众的思想却一天比一天瞎胡混，浅薄衰败得越发厉害。通过什么途径就能使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的行为在家庭中扎下根，叫奢侈淫靡的风气在里巷内灭绝呢？有史以来，使上面安宁和治理民众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比礼仪更为有效的了。人们懂得恭敬廉洁又谦让，仁德的化导就容易形成。采取什么方法就能统一起人们的心志，扭转人们所喜好和追逐的烂玩艺，使他们具有执持和遵从的东西呢？再者审慎地区分清等级威仪，把人们纳入准则规范当中，使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长辈和晚辈之间，不彼此侵凌争斗，究竟该依从什么做法呢？谋求大治的关键，首先要重视京师的国库储备，同时抵御民众的灾患。近年黄河决口，造成灾害，修造营筑很少收到功效，堤坝防护刚刚奏报竣工，洪水紧跟着又在别处泛滥。这难道真是黄河的水势本来就很危险吗？或者是人工努力还没完全做好呢？每年由水路运到京师的粮食多达数百万石，都从黄河、运河这两条河流辗转运送过来，它们关系到的国家事体极其重要。或者在下游疏浚河道，或者加固增高堤岸，前人的成法都明摆在那里。难道它们在古代就有明显的功效而今天就不能继续施行了吗？假如真心实意去做研核探究，营筑和疏浚恰如其分，在上游不堵塞运粮的通道，在下游不给百姓的生计带来危害，客观上一定有那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你们这些读书人胸中蕴积着经术，眼看着就要亲身去使当今社会变美好，给百姓带来益处，要各自抒发出本人的见解，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2. 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科

〔三月二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膺图御宇，惠育黎元，必吏治澄清而后民生安遂，用致运际郅隆，天人交应，理数符会，毕协休征，至于海隅日出，罔不率俾，乐利阜成，弥宇宙焉。朕荷天眷命，缵嗣丕基，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每念民生之休戚，由于吏

治之贪廉。激扬之典数举，其清操卓越者时行拔擢。凡司民牧，其果蒸蒸丕变与？夫兴事省成，因名责实，课吏之良规也。请托之习未除，则情面难破；喜怒之私未化，则毁誉易徇。何以使殿最惟明，黜陟允当与？抑正己率属，大法则小廉也，崇奖洁清，以风厉有位，尚有可讲求者与？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弘之者人。物必有理，而理以数显，数以理神。天人相与之际，穷理极数，厥有奥旨。可得而详之与？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极先天之数，而尽天地万物之变化，该帝王圣贤之事业，殊途一致。其旨安在？古昔盛时，声教遐讫，重译来宾，献琛贡赆，贸迁利用，实裨民生。迩者鲸鲵静息，海波不扬，梯航所至，商贩通行，远致外方物产，以阜吾民。其间果有利而无弊，可悉指与？夫兴利必要其成，立法务规其久。何以区画尽善，万世利赖，可永行与？尔多士究心经术经济，其于官方廉善、理数精微、柔远裕民之道，蓄之有素矣。其各抒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承受天赐的神图，统领天下，养育黎民百姓，必定要使官吏施政的原则与方法得到澄清，然后民众的生活才会安定如愿，去实现时运正赶在最隆盛的阶段上，天上与人间彼此感应，事理同定数交会又吻合，同各种吉祥的兆应完全一致，直至天涯海角凡是太阳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无不归顺服从，使人们感到欢乐又有利，富足又安宁，聚合起宇宙啊！皇帝我承蒙皇天把统治权牢固地授付下来，继承盛大的基业，从早到晚勤勉不懈，辛勤地谋求治理。总是想到百姓生计的喜乐与忧愁，来自官吏施政上的贪婪与廉洁。激浊扬清的法典多次予以强调，对清廉的节操表现得特突出的人经常进行提升。所有直接管理民众的地方官果真都蒸蒸日上，彻底发生变化了吗？振兴起政事，省察已有事例，依照名位验核实绩，这是督促官吏的好办法啊！拿私事来嘱托的习气不革除，看情面帮助办就难以破除。个人喜欢谁或恼恨谁不转变，诋毁或赞誉谁就容易出自私心。通过什么办法就能使政绩考核定为上等或下等特严明，决定提升或罢免特恰当呢？再者端正自己，给下属作出表率，大官奉公守法而小官就廉洁啊！表彰奖励廉洁清正的人以便去激励在

位的所有官员,在这方面还有可以进一步讲求的事情吗?大道的本原出自皇天,而弘扬大道的主体是人。事物必定有那原理,而原理通过定数来显现,定数凭借原理更显得神妙。在皇天与人间相互发生联系的时候,穷尽那原理又极尽那定数,其中必定有那深奥的义旨。能够详尽地把它阐发出来吗?善于讲论皇天事体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上确有验证。极尽先天的定数,而穷尽天地万物的变化,总括起帝王圣贤的事业,途径不相同,而目的却一样。其中的要旨又在哪里呢?古代兴盛时,声威教化播扬到最遥远的地方,少数部族经过一道又一道的语言翻译前来归服,进献本地的上好特产,展开贸易活动,使物尽其用,实际上对民众的生计很有好处。近来搅乱的海上巨寇消停止息下来,战事不再发生了,登山航海所能到达的地方,商贩畅行无阻,从很远处把异域的物产带回来,用来使我国百姓物质丰富。其间果真就只有好处而没有弊害吗?可以具体地指出来吗?兴行有利事必定要验核那成效,定立法度必定要考虑它能长久遵用。该怎样去筹划区定得尽善尽美,使千秋万代依赖它并获得益处,可以永远行用呢?你们这些读书人把心力投注在经典学问和经邦济民上,对于为官之道的廉洁和良好做法,事物原理与定数的精粹微妙之处,怀柔远方和使民众富裕的途径,蕴藏在胸中已经很有功底了。要各自抒发出本人的见解,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3. 清圣祖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抚御方夏,文德聿修,武功克诘,是以遐方率服,庶绩咸熙,川岳效灵,永奏平成之治,甚盛轨也。朕诞膺眷命,式缵丕基,夙夜孜孜,勤求化理。念归怙冒之中,则怀柔远人,所以抚绥安全,俾其永沾德化者,何道而可?至于疆圉敉宁,兵农和辑,慎固封守,王政所先。其广储备,勤训练,以为久安长治至计,抑何术之从也?比年河工修浚,渐底安澜,何以使堤防永固,漕挽迅通,虽有霪潦巨浸,恒无泛滥之虞,运道民生,咸有攸赖?其熟筹之。尔多士离经辨志,学古经术,所有涵养德性,兴起事功,必讲贯淹通,始可措诸实用。汉唐之笺疏,宋儒之训诂,繁简得

失,义蕴精微,可得而悉指欤?薄海内外,凡声教暨讫之地,既同人官,盱衡世务,讲求素矣。各抒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统领华夏,全都文德教化得到修明,武功能够整治好,所以遥远方国一律归服,各种政绩全都兴起,河流山岳献出吉兆,永久形成地平天成的治绩,真是特别盛大的典范啊!皇帝我承蒙皇天牢固地把统治权授付下来,继承宏大的基业,从早到晚勤勉不懈,辛勤地谋求教化与治理。考虑到全都归入皇朝的覆盖范围以内,就要怀柔远方地带的人们,而用来慰抚安定住他们并使他们永远蒙受到仁德教化的办法,该采用哪些就会达到目的呢?至于整个疆域一片安宁,军队与农民和睦聚集,慎重对待并巩固边区防卫,这是称王天下的国政的头等大事。要扩充那物资储备,经常进行训练,作为长治久安的最高明的计虑,又该依从什么办法呢?近年河道工程的营筑疏浚,逐渐达到了河水不再泛滥的地步,再通过什么办法能使堤坝防护永远坚固,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既迅速又畅通,即使出现连降的大雨和洪水,总也没有决口泛滥的忧虑,运道和民众的生计都有依赖呢?要对此精熟地做出筹划来。你们这些读书人分析经典原文的章节,确定自己的志向,研习古代和经典的治国方法,所有涉及到的修养好德性,兴起事功等内容,必定要讲论得上下连贯,左右融通,这才能够推广到实际施用中去。汉朝和唐朝对经典的笺注疏解,两宋儒士所作的解说,在繁简得失和义理精微上,能够详尽地予以指明吗?四海内外凡是声威教化所达到的地方,都是前来应试进入仕途,而对权衡时世要务,都已讲论研求得很有功底了。要各自抒发出本人的见解,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4. 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甲戌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统御寰区,莫不以国计民生为首务。其时人才蔚起,吏治澄清,府事修和,群黎康阜,蒸蒸然跻斯世于熙皞,何风之隆也!朕临御以来,孜孜图治,轸恤民隐,时切痌瘝。自三逆荡平之后,休养生息,虑无不周,频年蠲复,

不啻数千百万，而被恩之地，灾沴旋告，闾阎尚无起色。其故何与？黄、运两河，所关綦重。今虽修筑奏绩，已底安澜，何道而俾永固无虞，万世利赖与？学校，贤才所由出也。比来膺斯职者，因循陋习，丛弊营私，以致教育乖方，士习凌竞。兹欲厘剔振兴，以广《棫朴》作人之化，何术之从与？至于生民休戚，视庶司贤否；表率承宣，端在大吏。必内外臣工精白乃心，奉公洁己，而后吏饬民安，茂登上理。其激扬惩劝之方，果安在与？尔多士蕴怀康济久矣，其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统领天下，没有谁不把国计民生作为头等大事的。当时人才雄盛地涌现，官吏施治的原则与方法得到澄清，六府和三事既予修明又彼此协调，众百姓安宁富庶，万分兴盛地把当时的社会带入了欢悦幸福的境地。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勤勉不懈地谋求大治，深切体恤百姓的疾苦，总是忧念民众的病痛。自从吴三桂等三个叛乱的藩王被荡平以后，让百姓休养生息，计虑没有不想到的方面。连年免征赋税，几乎达到了数千百万两，然而蒙受到恩惠的地区，灾殃紧跟着就奏报上来，民间还没有起色，其中的原因可是什么呢？黄河与运河，关系到的国家事体极其重要。如今尽管开挖营筑禀报成功，已经达到了河水不再泛滥的地步，但采用什么办法就能使它们永久坚固，不再让人忧虑，千秋万代都有依赖并获得益处呢？学校是贤才得以产生出来的地方，近来担任教官的人沿袭鄙陋的习气，制造出许多弊端来谋取私利，以致教育违背常规，学生们的风气变得目无尊长又偷机钻营。如今打算厘正革除和振刷兴起，扩展《诗经·棫朴》诗所咏赞的造就人才的那种化导局面，究竟该依从哪些做法呢？至于百姓的喜乐与忧愁，正以各级官府的供职人员贤良与庸劣为转移；做出表率和承奉宣导朝廷的意旨，的确在地方大员那里。必定要内外臣僚使自己的心地变得纯净清白，把公家放在首位，叫自己廉洁，然后才会整顿好下属，百姓得到安宁，盛大地进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有关激浊扬清和鼓励惩戒的办法，到底在哪里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胸怀安抚救助百姓的谋略已经时间很

长了,要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5. 清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

〔七月十四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期柔远能迩,察吏安民,俾世臻清晏之休,人享耕凿之利,庶薄海内外,无一物不得其所。顷因边隅不靖,恭行天讨。兹巨憝既殄,西北塞外悉已荡平。朕中外一视,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其何以抚循绥集,使窜匿者不致于仳离,向风者得遂其食息欤?外氛既涤,内治宜修。绥辑地方,子爱百姓,惟司牧者是赖。倘使贪墨不除,则民生何由休养!朕澄清吏治,于黩贿败检之人素所深悉。近复严加诫谕,法在必惩。但恐积习相沿,未尽悛改。今欲使大法小廉,人怀恐惧羞恶之心,共励羔羊素丝之节,其何道之从也?至于黄、运两河,为运道所系。比年以来,水潦频仍,时有冲决。已支百余万金钱,兴工修筑,尚未底绩。何道而疏浚得宜,悉免泛溢之患,堤防孔固,永无溃决之虞,使国计民生均有攸济欤?尔多士淹通经术,留心当世之务,蕴于中者素矣。其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必定要做到安抚住远方,优待好近处,督察官吏,安定民众,使整个社会步入清平安宁的美好境地,人人获享到耕田凿井的益处,差不多一直到四海内外,没有一种生物得不到它那既定的位置的。近来由于边境地带不安宁,恭敬地代替皇天去讨伐。如今罪魁祸首已经被消灭,西北塞外全部荡平了。但皇帝我对中原和异域同样做看待,念及异域的民众也都是我的纯真的儿子,在覆盖孕育和化生成就上,本来就与中原没有什么区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慰抚安集,使逃窜隐藏起来的人不致于夫妻离散,前来投诚的人得以有吃有穿呢?外部的祸乱既已扫灭,内部的治理就应修明。安抚住地方,像爱护儿子那样去爱护百姓,完全要依靠地方官。假使贪污敛财的现象不铲除,民众的生计通过什么能得到休养生息呢?皇帝我澄清官吏的施政情况,对贪污受贿、败坏自身修养的人一向深为了解。近来又严切加以告诫训示,按

法规必定予以惩办。只担心积习递相沿承,尚未全部悔改。如今想使地方大员奉公守法,小官廉洁,每个人都有畏惧和感到羞耻丑恶的心念,共同用羔羊皮袄缝缀五条白丝线的那种节俭的操守来自我激励,究竟该依从什么办法呢?至于黄河与运河,是关系到往京师运粮的主要的水上通道。近年以来,水灾接连发生,经常有决口泛滥的情况。已经支出了一百多万两金银,兴工修筑,尚未最后成功。采取什么办法就能疏浚恰如其分,完全免除掉河水泛滥的灾患,堤坝防护十分坚固,永远没有被冲垮的忧虑,使国计民生都有受益的地方呢?你们这些读书人通晓经典的治国方法,留心当代的事务,在心中蕴积的谋略已经很有功底了。要各自抒发出本人的见解,详明恰切地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6. 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郅隆之世,上下熙皞,职业修明,乐利丰亨,茂登上理,何其盛也!朕临御以来,孳孳图治,夙夜不遑,惟期吏治肃清,民生康豫,薄海内外共登于仁寿之域,而治效罕臻,殷忧弥切,厚生正德,未能尽如朕志之所期。其故何欤?如休养多方,而膏泽或未能下究;省巡时举,而疾苦或壅于上闻。奖廉惩墨,而胥吏尚多奸顽;贵粟重农,而闾阎未登丰裕。岂积习之骤难除欤?抑有司奉行之不力也?兹欲令大法小廉,民安物阜,渐几于淳庞之治,何道而可?至淮、黄两河,民生运道所系。朕几经阅视,指授机宜,而河工诸臣怠窳玩愒,以致工程稽缓,底绩难期。何道而令河务大小臣工实心经理,浚筑合宜,平成早奏,俾粮艘无误,民居永奠,以释朕宵旰之忧欤?尔多士蕴怀久矣,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在最为隆盛的时代,上下一片欢悦和睦,本职工作得到修明,人们感到高兴和有利,盛大又亨通,进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这是多么地兴盛啊!皇帝我登上帝位以来,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只希望官吏施治的情况得到肃正和澄清,民众的生活安定富裕,四海内外共同步入仁德长寿的

境地，然而治理的成效很少能达到，焦灼忧虑就更加深切，使民众生活宽裕，端正品德，都没能完全做到皇帝我立志所期望的那样。其中的原因可是什么呢？像让民众休养生息，方法想得很多，但恩泽却没能遍及到下面去。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可民间的疾苦却反映不上来。奖励廉洁的官员，惩治贪污的官员，可官吏和办事人员仍有很多人奸诈顽劣。看重粮食，重视农业生产，可民间还没进入富裕的状态。这难道是因为积习很难一下子就去除掉吗？或者是主管部门贯彻执行不得力呢？如今打算使地方大员奉公守法，小官廉洁，民众安定，物质丰富，逐渐接近淳厚盛大的治理景象，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呢？至于淮河与黄河，是关系到民众生计和往京师运送粮食的主要的水上通道。皇帝我几次经过实地考察，当面指点并授付机宜，可负责河道工程的各个臣僚却懈怠败坏，荒废时日，致使工程拖延放慢，完工很难期待到。采用什么方法就能使主持河务的大小官员真心实意去操办，疏浚与筑堤都恰如其分，地平天成的功绩早日奏报上来，使运粮船只不耽搁，百姓居住地永远安稳不动，用来消除皇帝我从早到晚放不下的忧虑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胸中蕴积谋略已经时间很长了，要把它们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7. 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抚御寰区，孳孳图治，期臻久道化成之效。所以澄叙官方，渐摩民俗，勤求康阜，荡涤烦苛者，无不单心区画，而犹虑吏治之纯杂不齐，习俗之浇朴不一，民生难尽底于盈宁，庶狱难尽归于平允。四十余年以来，宵衣旰食，未尝一日释诸怀也。夫作吏之道，在洁己爱民，操履不饬，则行检俱隳。其或市名立异，自以综核为能，则民益滋累。兹欲使大吏以及有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俾小民安食息之常，而无狱市之扰，宜何道之从欤？沃土民逸，瘠土民劳，闾阎之恒情也。为长吏者，非时申教诫，则无以警偷惰而息奢靡。今欲转移习俗，效《豳风》之勤而各修其业，法《唐风》之俭而克终于礼，将何以倡率之？积贮者，天下之大命。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故虽水旱偶侵，其民恒足自给。今者蠲赈屡颁，而民

间委积或寡。岂其习于华侈而不知撙节欤?抑有司视为具文,而不知所以劝导之也?兹欲比屋蓄储,而丰歉有备,何施而可?至于刑以弼教,古圣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朕于小大之狱,必平必慎,每念民命至重,务委曲以求其生。乃四方奏谳,或未协中,而听狱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滥伤民命者,何其惨而不德也!斥残刻而进慈良,俾狱无冤民,而治几刑措,必有道以处此。大抵吏尚廉平,则刑无憯虐;民知勤俭,则家有盖藏。表帅董劝,责在司牧。尔多士讲明于吏治民生者素矣,其悉意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安抚驾驭整个天下,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期望实现那长久施用大道而教化形成的功效。因而用来澄清端正为官之道,磨砺陶冶社会风气,辛勤索求安康富庶,扫荡涤除烦琐苛细事务的一切举措,无不竭尽心力做出筹划部署,但仍担心官吏施治的情况在纯正与驳杂上还不统一,社会风气的浅薄与质朴还不一致,民众的生活难以全部达到富足,各种案件审理难以桩桩归入公正恰当。四十多年以来,早早就起身,太阳偏西才吃饭,未曾有一天在胸中放下来啊!为官之道在于使自己廉洁,爱护百姓,对节操品行不严格自律,行为和修养就全都毁败了。有的人骗取名声,故意标新立异,自己把综合查验作为能耐,可百姓却越发加重了负担。如今想使地方大员以及各个官署都用清正纯洁来支配自己,温和地对待下面,使平民百姓安稳地保持吃饭睡觉等日常活动,没有花钱打官司之类的搅扰,应当依从什么办法去做呢?生活在土地肥沃地区的百姓就安逸,生活在土地贫瘠地区的百姓就劳苦,这也是民间的常情啊!身为地方官的人,除去经常申明教诲与诫饬,就没办法使人对懒惰瞎胡混引起警戒来并止息住奢侈淫靡的行径。如今打算扭转社会风气,效仿《诗经·豳风·七月》所歌咏的那种勤劳劲儿而各自修明本业,取法《诗经·唐风·蟋蟀》所反映的那种节俭劲儿而最终归结到礼制上,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去倡导引领呢?储备下粮食,这是全天下的生命线。古代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必定要有多出够一年吃的积蓄。因而即使水灾旱灾突然袭来,百姓总能自家够吃够用。如今免交赋税

和进行救济的诏令多次颁发，可民间的粮食储存却有的很少。这难道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奢侈浪费而不懂得节约造成的吗？或者是主管部门把诏令看成一纸空文而不知道去劝导呢？如今打算家家户户储备下粮食，无论丰收年或歉收年都有防备，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呢?至于刑罚用来辅助教化,属于古代圣明帝王不得已而使用的东西啊!皇帝我对于大小案件,必定要公平处断,慎重对待,常常想到百姓的性命极其重大，务必设法谋求给罪犯一条生路。可是天下各地奏报上来的复审意见，有的还不符合适中的要求，而审理案件的官吏，竟至有那任意动用酷刑,胡乱伤害百姓性命的人,这是多么地惨烈而不仁德呀!摒弃残酷苛刻的家伙,进用仁慈善良的官员,使断案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而治理接近那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的地步,客观上一定有那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大致上说来,官吏看重廉洁公平,刑罚就不存在残忍暴虐的现象；百姓懂得勤俭节约，家中就有粮食储存。做出表率,掌理督劝,责任正在地方官身上。你们这些读书人讲论阐明官吏施治和民众生计的事体已经很有功底了，要亮出全部的想法来做出对答,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8. 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

〔三月二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君临海宇,垂五十年。每念致治之道,以任贤能、安民生为急务。所为奖进公忠、振兴名节、转移风化、教育人材者,不啻鼓舞之殷而牖导之切矣。顾循名责实,大小臣工果能精白乃心,而士习民风举皆蒸蒸丕变否欤?从来人臣之于国家,谊均休戚,所谓腹心股肱联为一体者也。倘或营己怀私,背公植党,则臣职谓何?夫不欺之谓忠,无伪之谓诚。古名臣忠与诚合,然后能守正不阿,独立不倚。今欲戒欺去伪,以共勉于一德一心之谊,岂无其道欤?夫名节者,为臣之表准也。诚能以名节自励,则持己有清介廉洁之修,临事自有劲挺激昂之气。立身服官,悉始基于此。其何以使在位者咸以礼法为防检,以名教为矩范欤?至于氓之蚩蚩,皆吾赤子,乃或迫于饥寒,或失于训诫,转而为盗,非其本心。为有司者,能曲体民隐,经画其生计,勤施以礼教,使其民皆有乐生向义之

念，则良善既安而莠顽可格。此非民牧之切务欤？国家养士，期于实用，文辞非所重也。昔之儒臣，淹通博洽，有援据经传以议礼，旁引《春秋》以断狱者。今之专一经者多矣，其能尽抒所学，以施诸政事否欤？欲令士皆穷理达务，以收明体达用之效，何道而可？大抵朝廷有竭忠矢节之臣，则民俗日淳而士气益奋；学校多通经稽古之彦，则致身有本而奉职无愆。尔多士讲明于学术治理者久矣，其悉陈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统领天下快五十年了，总是思考实现大治的办法，把任用贤能、安稳住民众生活作为最紧切的政务。用来奖励提拔为公尽忠的人，振扬兴行起名分节操，转变社会风尚，培养造就人才的一切举措，不止是鼓舞巨大又诱导深切了。但依照名义去验核实际，大小臣僚果真能使自己的心地变得纯净清白而读书人的习气和民间风尚全都蒸蒸日上地发生巨变了吗？有史以来，臣僚对于国家，在应尽的责任上同自己的喜乐与忧愁没什么两样，正是世上所讲的腹心与股肱连结成同一副身躯啊！如果有人为自己打小算盘，怀有私心，背弃公家，拉帮结派，那么臣僚的职责还叫做什么呢？不欺诈，这就叫做忠正；没有虚假的玩艺，这就叫做诚实。古代的著名大臣把忠正与诚实结合在一起，然后能守持纯正，不阿谀逢迎，昂然自立，不攀援依附。如今打算警戒欺诈，铲除虚伪的玩艺，共同在一德一心的大义上做勉励，难道没有那具体的方法吗？名分节操，这是当臣僚的标志与准绳啊！确实能在名分节操上自我勉励，在个人修养上就有清正耿介又廉洁的美德，遇到事情时自然就闪跃出劲挺激昂的英气来。为人处世和做官供职，都从这一点上开始并奠定下基础啊！采取什么措施就能使身在官位的人都把礼法作为约束自己和防范邪恶的东西，都把名分节操作为准绳呢？至于老实憨厚的众百姓都是皇帝我的纯真无邪的儿子，可竟有人被饥寒所困扰，有人没受到训诲告诫，转而成为盗贼，这并非出自他们的本心。充任各级官府的官员的人，确能多方体恤百姓的疾苦，筹划安排他们的生计，经常施布礼仪教化，使本辖区的民众都有高兴生存和归向正义的意念，良善的人也就

安宁下来了,顽劣的人也能纠正了。这还不是地方官的切要政务吗?国家培养士子,目的在于实际有用,会写文章并不是看重的对象啊!古代的儒臣懂得多又掌握得全面,有人依据并征引经书传记来议论礼制,广泛引用《春秋经》来对案件做出审断。如今对某部经典特精通的人有很多了,他们是否确能完全发挥出自己所研习的学问而运用在政事上吗?打算让读书人个个彻底明了事理,懂得具体政务,以便收到深明主体又推广到施用上去的功效,采取什么办法就能做到呢?大致上讲来,朝廷拥有竭尽忠诚和暂守节操的臣僚,民间风尚就会一天比一天淳厚而读书人的气势也越发昂奋;学校中涌现出许多通晓经典又能考察古代的英才,出来做官就有根基并能恪尽职守不出差错。你们这些读书人对学术和治理加以讲论阐明已经时间很长了,要把它们全部在答卷上陈述出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9. 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壬辰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临莅天下五十余年,永惟所以仰答上天眷佑之厚,下惬四海望治之心,夙夜孜孜,久而弥惕。盖大业戒于鲜终,而远虑谨于防微。故日与内外诸臣动色咨儆,欲其以公正者居心,以恪慎者守职,庶几贤路有所鼓舞而日开,士习有所观型而益励,然犹未能一德同风,以臻斯道者。其故何欤?唐虞之世,皋陶陈谟曰:同寅协恭。夫协同者,岂其朋党比周之谓欤?无亦寅畏恭敬,则精白无私,故能偏党不生,和衷共济欤?《记》曰:大臣法,小臣廉。然则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吏不廉,则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则小臣不廉。今内而卿贰,外而督抚,皆朕所倚为心膂股肱,望其率属阜民者也。其何以使廉法相承,永底盛治欤?夫荐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国家需人惟亟,故常命九卿廷推,督抚保举,期得人材,以裨实用。其或借此以援私交,徇请托,将何以称朕寤寐求贤之心欤?然则古大臣以人事君之义,何道之操也?《书》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故士不学,则无以居官;学不正,则无以致用。夫《六经》、《四书》,濂洛关闽,学之正者也。历稽往代,莫不崇尚经术,兴数百年太平之基。今士行犹未尽修,士业犹未尽醇,其将何以养育陶成,绍休

圣绪欤？夫国家有诚正之臣，则百僚师师而官方互饬；学校有端粹之品，则多士济济而贤俊并登。尔多士皆养成于庠序，出而宣力国家者也。其各抒所蕴，以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统领天下已经五十多年了，一直在思索往上报答皇天的深切顾念和佑助，往下满足四海渴望大治的心愿的举措，从早到晚勤勉不懈，时间越长就越加警惕。这是因为大业要在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上引起警戒来，长远的谋虑要在防止坏苗头出现上保持谨慎态度啊！因而每天都与内外众臣僚态度严肃地做询问做训戒，希望他们把公正的原则装在心中，用忠诚谨慎的态度履行好岗位职责，差不多使贤才受重用的道路对人有所鼓舞而日益拓宽开来，使读书人的习尚有所观瞻效法的对象而越发激励本人上进。然而仍旧未能道德一致而风尚相同，步入这一道法的最高境界当中。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在唐尧虞舜时期，皋陶进献谋略说：共同虔敬又联合恭谨。这里所讲的联合与共同，难道是说拉帮结派、相互勾结吗？不也正是在强调敬畏恭敬就会纯净清白而没有私心，所以就能避免偏颇抱团而大家一条心共同渡过江河吗？《礼记》上说：大臣奉公守法，小官就廉洁。既然如此，那么大臣正是小官的表率啊！官吏不廉洁，民众的生活就不安康；大臣不奉公守法，小官就不廉洁。如今在朝廷上从公卿到副职，在地方上从总督到巡抚，都是皇帝我倚为心腹肩背和大腿胳臂并希望他们给下属做出表率又使百姓富裕的人啊！通过什么办法就能使廉洁和奉公守法递相承奉而永远达到盛明的治理呢？推荐贤才就受到优厚的封赏，压制贤才就受到公开的斩杀，这是古代的做法呀！国家需要合适的人选非常迫切，所以就经常命令九卿在朝廷上合议推举，让总督巡抚担保荐举，期望获取到人才，有助于实际用处。但有人却借此引荐自己的朋友，接受私下的嘱托帮他故意说好话，这可凭什么能符合皇帝我睡梦中都在渴求贤才的心愿呢？既然如此，那么大臣用进献人才来事奉君主的原则，该用什么方法执持住呢？《尚书》中讲：研习古训，进入官员的行列，拿古代的法度来议定当今的政事。所以读书人不学习，就没有资本当官员；

学习不纯正，就没有根基去实际施用。《六经》和《四书》以及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和朱熹这四家的学说，是纯正的学问啊！依次考察以往的各个朝代，没有哪个朝代不崇尚经术，兴起数百年的太平基业的。如今读书人的品行还没有完全修养好，读书人的学业还没有完全变淳正，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去培养化育和陶冶造就，继承并发扬光大圣人学说的统系呢？国家拥有忠诚正直的大臣，文武百官就相互学习而对为官之道也彼此戒饬了；学校拥有端正纯粹的教官，人才就众多而贤士英杰也同时被任用了。你们这些读书人都是在各级学校中培养造就出来的马上要为国家效力的人，要各自抒发出本人所蕴积的谋略，明晰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0. 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

〔十月初九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治天下之要务，莫先于敬持其心。心者，所以饬官方、励人材而消衅蘖之本也。朕自御极以来，翼翼兢兢，五十余年如一日。至于大小臣工，亦无不以国尔忘家、以人事君之义，相为告戒焉。边疆虽靖，尤加意于武备之修。凡以立国之道，德威不可偏废。古帝王所以深根固本，杜渐防微，是朕之所夙夜而不敢康者也。《书》曰儆戒无虞，又曰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今国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朕惟唐虞成周之隆，君臣所以动色咨儆者，岂过虑欤？夫亦察于天命人心之理，而无荒无怠，期以长凝上天之眷，而永底烝民之生也。其何以使中外臣僚，悉喻朕意欤？夫《洪范》进人，有猷有为，归于有守。《周官》弊吏，则善能法之类，必首于廉。然则廉隅者，士行之先也，服官之本也。督抚者，州县之帅；部院大臣者，百僚群吏之表。故李膺按部，而贪墨为之解官；杨绾登朝，而勋旧为之彻乐。今吏道未尽澄清，官邪未尽振肃。其亦倡率之道，有所未至欤？《易》曰：拔茅茹，以其汇。《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内而部院卿贰，外而督抚提镇，朕所寄腹心耳目也。有荐举，朕必虚心而采用焉。然课其成效，往往不能悉副任使者，何也？夫无至公之心，则知交姻娅各徇其所私；无至明之识，则劣品庸流各阿其所好。古大臣荐贤不使人知，而补牍必争、夹袋必满者，其风岂

远欤?《立政》之篇,致意于庶言、庶狱、庶慎,而终以克诘戎兵。古者简阅车徒,一年而四举焉。朕鉴于前代,慎选将,勤恤兵,甄微劳,酬壮烈,留神戎事,用树国威。然自禁旅之所在营伍,尽能核军实而肃行阵欤?夫练习不素,则技勇之艺疏;节制不严,则骄惰之兵众。其何以振纪宣威,使国家长收卫民之用也?要之,洁清自励,则援引必公,而小大莫非法廉之选;忧危共惕,则防维必至,而内外永享宁谧之休。朕之所以敕臣工者,即其所以望多士者也。尔多士其悉抒所学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治理天下的要务没有什么能比恭敬地持守住那颗心更占首位的了。那颗心是整顿为官之道和激励人才并消除一切不好的思想苗头的根本啊!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小心翼翼,兢兢业业,五十余年如一日。至于大小臣僚,也无不凭借为国忘家、拿进献人才去事奉君主的准则相互告诫。边疆一带尽管安宁下来了,但更对修明武备予以高度的注意。这是因为确立起国家的法则,在于恩德与威势不可以偏重或废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古代帝王用来加深根基、巩固根本和杜绝恶性发展、防止危险苗头的举措,这也正是皇帝我从早到晚决不敢享乐而不去理睬的东西啊!《尚书》中讲:警戒那无形的事情。又说:在发生动乱以前就制订好治理的措施,在显出危险以前就要保护好国家。如今国家太平的年月太长了,文官安逸,武官享乐。皇帝我由此想到唐尧虞舜和成周在隆盛时君臣之间态度严肃地彼此提醒做告诫,这难道是太过虑了吗?其实也只是要察识那天命和人心的原理,既不安逸又不懈怠,期望能使皇天的眷顾长久固定住,永远使民众的生活达到安宁啊!通过什么途径就能使朝廷和地方上的众臣僚全都明白皇帝我的用意呢?《尚书·洪范》中讲进用人才,既要有谋略又要有作为,但归结到要有守执的最高行为准则。《周礼》中讲考核官吏,在政绩受人称赞、政令能推行开、奉守法度等六项标准上,必定要在前面都加上廉洁。这表明廉洁是读书人品行的头一条和当官供职的根本所在啊!总督和巡抚是各个州县的表率,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是百官群吏的榜样。所以

东汉的李膺充任司隶校尉,贪污敛财的家伙就由此吓得从官署溜走;唐朝的杨绾被任命为宰相,功勋卓著的老臣就由此而减损音乐的规格。如今官吏施政的情况还没完全澄清,官吏的邪僻行径还没完全振刷肃正。这也是因为带头树立榜样的做法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吗?《易经》上说:按种类拔茜草。《尚书》中讲:被荐举的人确能胜任那官职,这正表明你这荐举人确能尽到责任;被荐举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选,这正表明你这荐举人失职。在朝廷上由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到副职,在地方上由总督巡抚到提督和总兵官,都是皇帝我极为信任的人啊!谁有荐举,皇帝我必定虚心听取并采纳而予以任用。然而验核这些人的成效,往往不能完全胜任所授予的职务,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具备最公正的心念,好朋友和各类亲戚就会各自请他给本人说好话当官;不具备洞察一切的识别力,低劣平庸的那帮人就会分别投其所好做逢迎来骗取信任。古代的大臣荐举贤才不让别人知道,北宋赵普接连进呈荐举贤才的奏章而被太祖撕碎可仍把它缀补好继续进呈,北宋吕蒙正总在衣袋中装上记录本而在上面记满贤才。这种作风难道离今天就遥远了吗?《尚书》中的《立政》篇,对各种建议,各种案件和各种应慎重对待的事情十分重视,而最后强调整顿好军队。古代检阅战车和士兵,一年中要进行四次。皇帝我借鉴前代,慎重地选用将领,辛勤地体恤士兵,对立有很小功劳的人也不漏掉,对建有重大功劳的人重加封赏,留神军政事务,用来树立起国家的威势。然而从中央主力军所在的基层战斗单位,全部都能验定武器装备又肃正阵列吗?训练不经常进行,在技巧勇猛方面的武艺就会生疏;指挥管理不严格,骄横懈惰的士兵就会众多。应该凭借什么去振扬起纲纪和宣明那威势,使国家长久收到卫护民众的用处呢?总而言之,用纯洁清白自己勉励自己,在引荐上必定会公正,而大小职务没有不是廉洁守法的人选。忧虑危险而共同保持警惕,防卫就必定会特别周密,而内外永远获享到安宁的吉福。皇帝我用来告诫臣僚的事情,也就是皇帝我用来期待你们这些读书人的事情。你们这些读书人要抒发出所研习的全部东西来做出对答,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1. 清圣祖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诞膺图历,仰承天眷,寰宇乂安五十余年。惟是夙夜祗惧,宵旰不遑,冀庶绩咸熙,进斯民于仁寿之域,而犹念大业戒于鲜终,日与内外诸臣动色咨儆,欲其以惕厉者居心,廉平者尽职,庶多士无奇邪之学,而疆宇有磐石之安,故敕几图治,未尝一日释诸怀也。夫自古帝王,必谨小慎微,克终厥德,乃能底于久安长治之庥。《书》曰儆戒无虞,又曰无怠无荒。是以永保天命,懋登上理。今者承平日久,朝野内外保无有习于恬嬉以疏略,而渐几从胜者乎?夫兢业所以保泰,晏安或致隳功。其相与维持警戒,益求致治保邦之道,宜若何以副朕意欤?《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周官》六计弊吏,皆冠以廉。则廉固居官所首重矣。然廉非缘饰之具,综核或近于烦苛,胶滞亦邻于偏执,非所以表率庶司,锡福兆民也。兹欲大小臣工奉公洁己,无矫情干誉之弊,养和平惇大之风,其道何由?儒者著书立说,荟萃群言,务期阐明大道,折衷于至当。古来圣贤经传,纯粹以精,先儒论著,疏通易晓,即不立注解,其义自明。而或逞其臆见,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或假以立名,或用以阿世,使圣贤精意反因之而滋晦。其何以芟刈繁杂,昌明正学欤?至揖文奋武,国家并重,故有百年不用之兵,无一日可弛之备。古者蒐苗狝狩,皆以讲武,而克诘戎兵,即在庶狱庶慎之后。今虽六宇荡平,戈甲永息,而训练之方,可遂忽焉不讲欤?夫纪律不明,则无以申赏罚;休养不至,则无以协众心。其必绥辑有方,恩威并著,然后将士多干城之寄,中外享敉宁之福欤?夫上下交儆,斯百尔砥洁清之操,儒生识道义之宗,文教覃敷,国威永振。凡皆治益求治,安益图安,所以保泰持盈者,无以逾此。多士留心经济久矣,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承受到天赐的神图和历数,往上承蒙皇天眷念,整个天下得到治理并已安宁五十多年了。只因如此,白天黑夜总保持恭敬戒惧,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希望各种政绩都兴起,把当今的百姓带入到仁德长寿的境地。但仍考虑到大业要在很少有人能坚

持到最后上引起警戒来，每天都与内外众臣僚态度严肃地做询问做训戒，希望他们把警惕戒惧的意念装在心中，用廉洁公平去恪尽职守，差不多达到读书人没有邪僻的学问，而疆域有那磐石般的安稳状态。所以就谨慎地按照皇天的命令行事，时时处处保持警惕，专去谋求大治，未曾有一天在心中放下来啊！自古帝王必定要谨小慎微，把自己的德行坚持到最后，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美好局面。《尚书》中讲：警戒那无形的事情。又说：不要懈怠，不要享乐。所以就能永远保住皇天赐予的统治权，盛大地进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如今太平的年月太长了，朝野内外保证没有习惯于安逸享乐而粗疏简略，逐渐陷入繁杂混乱中的人吗？兢兢业业是用来保住太平，安逸享乐却招来功业毁败。共同保持警惕，进一步搜求实现大治和保有国家的谋略，到底应该怎样去办，以便符合皇帝我的心愿呢？《礼记》上说，大臣奉公守法，小官就廉洁。《周礼》用六条考核标准来判定官吏的政绩，每条标准前面都强调廉洁，这就表明廉洁原本上正是当官供职所应最先重视的方面了。然而廉洁决不是装样子给人看的手段，综合验定有时又接近于烦琐苛细，死守规矩也和偏执差不多，都不是用来给下属做出表率和把吉福赐给百姓的好办法啊！如今想使大小官员奉守公家利益，让自己廉洁，没有故作姿态去骗取名声的毛病，养成平和宽厚的风范，具体的办法该从哪里做起呢？儒士写成著作，创立学说，把各种讲法荟萃到一起，务必要去阐明那重大的法则，在最为恰当上做出择定来。自古以来圣贤的经典和解说著作，纯粹又精深；前代名儒的论著，在疏解贯通上让人一看就明白。即使不罗列注解，那义旨也自然就显示出来了。可有人却卖弄那主观臆测的看法，每个人径自写成书籍，每家径自构成说法，有的借此来树立名声，有的用它来迎合世俗，致使圣贤的精深义旨反而由此更加隐晦不明。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去删除繁冗驳杂的那套玩艺，倡明纯正的学问呢？至于筹划文治事宜，奋扬武力，国家对这两方面同等重视。所以拥有上百年不动用的军队，也没有一天可以松弛的防备。古代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些围猎活动都是用来讲习武备的。而整顿好军队，正排在各种案件审理和各种需要慎重对待的事务后面。如今尽管上下四方已经

荡平，兵器永远收起不用了，但军队训练的方式方法，可以接下来就忽略而不去讲求了吗？纪律不严明，就没办法申明奖赏和惩罚；休养生息不达到极限，就没办法聚合起百姓的心念来。必定要安抚睦集具有恰切的方法，恩德与威势显现得同样明晰，然后将士们大多就能完成捍卫国家的重任，中外获享到安宁的吉福吧？上面和下面互相提醒做告诫，当今的文武百官就磨砺那廉洁清正的节操，儒生懂得道义的宗奉对象，文德教化就广泛地施布开，国家威势永远得到振扬。这都是已经大治了还要进一步去谋求大治，已经安宁了还要进一步去谋求安宁，用来保持太平、守护盛业的举措，没有再能超出这些方面去的了。你们这些读书人留心经邦济民的事情已经时间很长了，要把它们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2. 清圣祖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科

〔四月初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临御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乂安海宇为孝，是以夜寐夙兴，勤求治理。政事之余，留意经术，期为天下广文教；承平之后，不忘边备，思为万世奠苞桑也。粤稽《周礼》造士，六行以孝为首；其察吏也，六计以廉为先。汉人承之，亦用孝廉选举郡国之士，未有内行不修而律身克谨者也。朕日以孝廉奖励天下，而敦笃彝伦、树立名节者，概不多见。亦有欺世盗名，自托于孝廉，而实行不孚，往往见讥于乡党，贻笑于清议。其诚伪之间，可不辨欤？夫卿大夫立身行己，有风励士庶之责。今乃诵说《礼经》，而考其实行，反不若村农田竖之诚笃者。其故何欤？《易》之《泰卦》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言治乱虽有常数，然人事既修，则可以勿忧而受其福也。今天下安宁已久，朕每怀积玩之惧，业业兢兢，与中外臣邻动色相戒。古君臣所以永保天命而固结人心者，岂无其要欤？持盈保泰，宜何道之遵也？广励士习者，以通经为要务。近代诠释群经，至朱子无可议。朕潜心玩味，见其皆切于躬行日用，绝无华言浮说，以汩乱乎其间。夫虚文多则本意晦，枝辞盛则实理微。欲使士通一经则明一经之义，而收一经之用者，其术安在？古者内有民间之储，外有边境之备。自汉有屯田塞下之议，及后赵充

国、诸葛亮率用以济师，著有成绩。今欲推广其法而行之，使疆内无转运之艰，行间获饱腾之利，其何以兴良法而课实效欤？夫人皆知孝行之为先，则臣节必砥，此即经学之本也。人皆知泰运之难持，则绸缪必周，此即安边之要也。诸士于经术世务，素所宜讲，其何以助上宣德化而成治功，悉心陈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统领天下快六十年了。往上想到列祖列宗托付的重任，很清楚天子正是把治理并安定住天下作为自己孝行的，因而很晚才睡觉，早早就起身，辛勤地谋求大治。在政事处理完以后，留意经典的治国方法，希望为全天下扩充那文德教化。在长期太平以后，不忘记边境的防卫，思考替千秋万代奠定下牢不可破的根基。考察《周礼》培养造就士子，六种行为规范中把孝顺列为第一种。考核官吏，六条标准中把廉洁放在每条标准的最前面。汉朝人沿用这两类做法，也用孝廉的科目选拔举用郡国的士子，没有内在品行不修明而约束自己能谨慎的人啊！皇帝我每天都用孝顺廉洁来鼓励天下人，可在人伦纲常上用心尽力而树立起名分节操的人，却总体上很少见。也有欺世盗名而自行依托在孝顺廉洁名义下可实际行为却不符合的人，往往被同乡人所讥讽，在评议的人那里留下笑柄。对这真诚与虚伪到底怎么样，能够不予辨别吗？卿大夫为人处世和在自己行为上，负有激励读书人以及平民百姓的责任。如今诵读讲说《礼经》，然而考察他的实际行为，反而比不上村农田夫中真诚笃实的人，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易经》中的《泰卦》说：不用忧虑自己的诚信谁都知道，在禄位上就有吉福。这是说治理与动乱尽管存在着定数，可是人事既已修明，就可以不用去忧虑而蒙受到那吉福了。如今天下安宁已经时间很长了，皇帝我总对荒废时日愈益严重的现象心怀恐惧，因而兢兢业业，与中外的左右大臣态度严肃地互作告诫。古代君臣用来永远保住皇天赋予的统治权和牢固联结起人心的举措，哪里没有那要领呢？守护住盛业和保持住太平，应当遵从什么途径呢？大范围激励读书人风尚的东西，要数通晓经典够得上是要务了。近代解释各部经典，到南宋朱熹没有可以指出的毛病了。皇帝我沉下心来

进行体悟琢磨，发现他的解释全都切中那亲身践行和日常活动，一点儿也没有华丽的言辞和虚浮的说法混杂在里面。虚飘的文字多，经典的本义就变得隐晦不明；多余的言辞占去很大篇幅，实际的道理就被掩盖住了。想叫读书人通晓一部经典就深明这部经典的义旨，收到这部经典的功用，具体办法到底在哪里呢？古代在内地拥有民间的粮食储存，在外部拥有边境上的物资储备。自从汉初提出在塞下屯田的动议，到后来的汉宣帝的赵充国，三国时蜀汉的诸葛亮施行它，用来满足军队的粮草供应，明显地具有成绩。如今打算推广他们的做法并实行它，使内地不再有转运的艰辛，军队中获享到士饱马腾的好处，该怎样去兴行起良好的对策并验定那实效呢？世人都知道孝顺的行为占据第一位，臣僚的节操就必定会去磨砺，这也正是经典学问的根本所在啊！世人都知道太平的时运很难保持住，预先做好准备就必定会特别周全，这也正是安定住边疆的关键所在啊！你们这些考生对经术和当前的事务，一向是应该加以讲求的，究竟该怎样协助上面宣播仁德的教化并成就治理的功绩，对此要用尽心力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3. 清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自御极以来，仰承上天眷佑之弘，祖功宗德福庇之厚，惟期海宇乂安，蒸民康阜，共乐升平之福。兢兢业业，宵旰不遑，六十余年如一日，而犹虑人心诚伪不一，凡在臣工欲其消朋党而去偏私，无怀二心以邀虚誉。至于进贤为国，无时不以公尔忘私、以人事君之义，相告诫焉。若屯田以资兵食，必无虚冒，方克有济。胜兵尤易骄矜，必能持重，始为万全。凡以防微杜渐，庶几内外晏安，以臻平治，此朕之夙夜所志也。夫粹然无私之为公，凛然不欺之为忠。为人臣者，必能公忠自矢，表里如一，乃不愧心膂股肱一体之义。倘或缘饰于外，则实行不孚，甚至背公植党，起于心术之隐微，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今欲戒欺妄而去私伪，果何以精白乃忱，靖共尔位欤？《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弗任。古大臣荐贤不使人知，义如是其重也。国家需人惟亟，屡申保举

之法。内而九卿，外而督抚提镇，简任既深。当其荐举之初，佥曰才能，未几而以庸劣纠矣。抑何前后刺谬欤?心之不公，识之不明，而援引私交，徇情请托，其弊滋甚。何由而推贤让能，为朝廷收任使之实效欤?国家幅员广大，一统车书，青海流沙之远，莫不涵濡德化。养兵以备边，即屯田以贮粟。兵食皆足，古之良法美意，无以逾此。其有效力人员，愿种边地者，酌量议叙，所以奖成劳而兴屯利也。然或冒滥册籍，虚报请叙，亦复不少，则所以核实而澄清之者，岂无其要欤?抑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骄兵有戒，古志之矣。今王师西讨，藏地克平，为将者无狃于战胜而志盈，无忽于凯旋而意逸，何道而使士卒敛戢而无骄悍之心，持重而养敌忾之威欤?夫人臣皆知公忠之义，则臣节必砥而荐举无私，是即用人之本也。边屯而皆有实效之绩，则垦种无虚而士马饱腾，此即练兵之要也。多士于忠君爱国之道，经济世务之宜，讲求有素矣。其悉陈之，无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往上承受到皇天的盛大眷念与佑助和列祖列宗功德的深厚庇护与赐福，只期望全天下实现大治和安宁，众百姓安康又富裕，共同为太平的吉福感到特欢乐。因而兢兢业业，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六十余年如一日，但仍忧虑人心在诚实与虚伪上不统一，对所有的臣僚想叫他们消除拉帮结派的现象，去除掉偏私，不另有企图去骗取虚假的名誉。至于进用贤才，为国家着想，无时无刻不用公家第一和忘记个人得失、拿进献人才去事奉君主的大义来相互告诫。至于通过屯田来补助军粮，必须不存在报假数冒领的现象，才能收到实效。获胜的军队最容易骄纵放肆，必须能够镇抚住，才会万无一失。这都出自防止坏苗头，杜绝住恶化态势，差不多达到内外安宁，进入太平的治理状态，正是皇帝我日夜追求的目标啊！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想法，这才够得上公家第一；站在那里令人生畏地决不欺诈，这才够得上忠正。作为人家臣僚的人，必定能自己发誓要公事第一，要忠正，表里如一，这才在心腹肩背和大腿胳臂连结成同一副身躯的君臣大义面前不感到惭愧。如果有人在外表上装样子给人看，实际的行为就不会相符，甚至背弃公家，培植

私人势力，从那心术的不可告人的地方萌生出来，危害就有讲不完的了。如今打算让人对欺诈虚妄引起警戒，去除掉个人的企图和虚伪行径，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就能使臣僚把自己的心念变得纯净清白，恭敬地履行好职责呢?《尚书》中讲：被荐举的人确能胜任那官职，这正表明你这荐举人确能尽到责任；被荐举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选，这正表明你这荐举人失职。古代的大臣荐举贤才不让别人知道，意义竟是这样的重大呀!国家需要人才特迫切，多次申明担保荐举的制度规定。朝廷上的九卿，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和提督、总兵官，选取任用既已深切，可在他们最初荐举某个人的时候，都说具有才能，但没过多久就因平庸低劣被纠察了。为什么前后这样地对不上号呢？用心既不是为国家着想，识别力又不明晰，竟然引荐自己的朋友，接受私下的嘱托故意帮他说好话，由此造成的弊害就越发严重了。通过什么途径就能自觉把职位让给贤能的人，为朝廷收到任用驱使的实效呢?国家幅员广大，各种制度和文字都统一了，青海和流沙那样遥远的地区，也无不接受仁德教化的薰陶滋润。供养军队来保卫边境，利用屯田来储存粮草，军队和军饷都充足，古代的高明做法和美好意图没有能超出以上所讲的去了。对效力的人员愿意耕种边区土地的人，斟酌情况议定封赏，目的是奖励取得的劳绩而兴行起屯田的益处啊!然而有的地方却编造超出实数的花名册，虚报那奏请封赏的人数，这种情况也不少，那么用来核实加以澄清的办法难道就没有那关键所在吗?再者说来，军队是不得已而动用的力量。对骄纵的军队要引起警戒，古书上已经记下这一条了。如今天子的大军对西部进行讨伐，西藏地区已经平定下来，担任将领的人应当不陷入获胜便思想骄傲当中去，不对凯旋便意志松懈丧失掉警惕，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使士兵收起武器却不产生骄横凶悍的念头，继续镇抚住而养护那同仇敌忾的威力呢?臣僚都明了公家第一和忠正的义旨，臣僚的节操也就必定会加以磨砺而荐举便不存在出自私心的事情了，这也正是任用官员的根本所在啊!边境防卫和屯田都有看到实效的业绩，垦荒耕种就没有虚浮的东西，战士和马匹就十分雄盛，这也正是训练军队的关键所在啊!你们这些读书人对于效忠君主、热爱国家的原则和筹划措置当

今事务的恰切做法已经讲论研求得很有功底了，要详尽地陈述它们，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4.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癸卯恩科

〔十月二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致治之道，必君臣一德，贤材奋兴，孝悌申于党庠，仁厚洽乎海宇，然后一道同风，克跻郅隆之治。朕荷天庥，丕承大统，仰惟圣祖仁皇帝抚御寰区六十余年，本至诚以御下，颁圣谕以教民，故能使俊乂盈廷，民风淳厚。朕旰食宵衣，惟恐一事未理，不克丕绍前烈，尚赖股肱耳目之司，匡所不逮。《周易·泰卦》言，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谓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此朝廷之泰也。朕推心置腹，以至诚待下，大小臣工宜精白一心，昌言无隐。今果能以嘉谋入告，无愧责难之义欤？抑或有依违瞻顾，不克以至诚报上者欤？《周礼》大司徒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至州长、党正、族师，各以岁月考校。故其时人知奋励，克崇实学。今三载宾兴，犹行古之道也。朕加意作人，特开恩科，何以使道艺兼修，德行无忝欤？抑司造士之责者，宜仿古岁月考校之制，俾文行并茂欤？百行莫先于孝，六计必主于廉。今欲使家有孝子，国有廉吏，所以倡导鼓舞之者，其道安在？至帝王之治，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今欲比户可封，何道臻此？放勋由克明峻德，以至黎民於变时雍。周公、召公布王化于二南，意风化始于君，成于臣，渐仁摩义，非一手足之烈欤？夫君明臣良，联为一体，必能旁招俊乂，连茹汇征，贤才自然振兴也。敦崇孝行，砥砺廉隅，风俗自然醇朴也。尔多士积学有年，必有以抒夙抱而佐朕之新政者。其悉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实现大治的原则与方法，必定要君臣同心同德，贤才奋起兴盛，孝顺父母和兄弟友爱要在各级地方学校中得到申明，仁德厚道遍及到整个天下，然后道德一致又风尚相同，能够进入最为隆盛的治理状态。皇帝我承受到皇天的佑助，继承盛大的帝室统系，恭敬地想到圣祖仁皇帝统领天下六十多年，依凭真诚

至极来驾驭臣下,颁布圣明的谕旨来教导百姓,因而能使英才豪杰布满朝廷,民间风尚淳厚。皇帝我早早就起身,很晚才吃饭,唯恐有一桩政事得不到妥善的处理,不能够继承发扬前代的宏伟功业,还有赖责任重大又倍受信任的政府各部门官员匡扶皇帝我还没考虑到的事情。《周易·泰卦》中说:天地交合而万物顺畅,上下交合而志向相同。这是在强调君主要推布真诚去对待下面,下面要竭尽真诚来事奉君主,这正属于朝廷的顺通状态啊!皇帝我推心置腹,用真诚至极来对待下面,大小臣僚就应当把那心念变得纯净清白,献上美好的言论,不存在隐讳之处。现今果真能用高明的谋略进前奏禀,在对君主进行责备诘难的大义面前不感到惭愧吗?或者还有说或不说考虑来又考虑去,不能用真诚至极来报答君主的人呢?《周礼》规定大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方面的事体教导众百姓,并且用欢送的礼仪向王室做推荐。乡大夫每隔三年就进行全面的测试,考核人们的德行与道法技艺怎么样,表彰贤能的人士。直至州长、党正、族师这些基层官员,分别按规定的时间进行考核验查。所以在当时每个人都知道奋勉,看重实际的学问。如今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进士科考试,仍旧是在实行古代的做法啊!皇帝我对造就人才更予以高度关注,特地开设本年的进士恩科考试,而通过什么就能使读书人道德和技艺同时得到修明,德行没有让自己感到惭愧的地方呢?或者是负责造就人才的部门应当效仿古代按年份月份进行考核的制度,使他们的文才与品行都特别突出吗?一切行为没有能比孝顺更占首位的了,周代考核官吏的六条标准必定要把廉洁作为主导的方面。如今想使每家都有孝子,国家拥有廉洁的官吏,在这上面进行倡导鼓舞的方式方法到底都在哪里呢?至于帝王的治理,要从士大夫的封邑和各个封国开始做起,扩展到整个天下去。如今打算家家户户都有资格受到特殊的表彰,通过什么途径就能达到呢?唐尧由于能够彰明那高达天边的德行,以至于黎民百姓随同教化而转变,全都和睦相处。周公和召公在周南和召南辖区内施布帝王的教化,想来社会风尚的化导要从君主做起,到臣僚那里形成,在仁德与道义上不断磨砺,并不光是同胞兄弟建成的功业吧?君主圣明,大臣贤良,联结成一体,必定就能广泛地

招揽到优秀人才，像连成片的茜草按类属那样进行采摘，贤才自然就会振扬兴起呀！崇尚孝顺的行为，激励廉洁的举动，社会风气自然就会变得淳厚质朴呀！你们这些读书人积累学问已经时间很长了，必定有那抒发出平素蕴积的谋略而能协助皇帝我的崭新国政的地方。要详尽地做出对答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5. 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甲辰科

〔十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至治之世，君臣一心一德，郡县大法小廉，士尚躬行，农勤力作，用能盈廷师济，吏治澄清，教化洽而休养备，何风之盛也！朕抚临区宇，夕惕朝乾，冀内外臣工共襄治理，以成郅隆之运，意甚殷矣。孔子曰：臣事君以忠。人臣必有公正无私之学，乃克尽忠诚不二之心。朕推心置腹以待群下，每延见廷臣，必谆谆诰诫。凡厥有位，果能公尔忘私，矢精白于隐微之地欤？其何以交相儆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也？《洪范》称有猷有为有守。吏治以操守为本，而非谋虑施设，无以济之。朕慎简大吏，下逮守令，皆务得人，诚欲其兴事慎宪，有裨地方，匪直洁己自好而已。夫生事苦其纷更，而避事必至隳废；操切患其滋扰，而优容又至养奸。何道而成明作惇大之治欤？《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其不帅教者，有郊遂之移，寄棘之屏；而论其秀者，则升之司徒、司马，而人材出焉。夫士为四民之首，必敦尚学行，以倡风化。今或务华鲜实，甚者嚣陵狙诈，岂渐摩化导有未至耶？抑崇德绌恶，所当劝惩互用欤？古者劝农有官，力田与孝弟同科，盖农务若斯之重也。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以蕃滋，而地亩止有此数，非讲求农政，竭人力以尽地利，何以家给而户足耶？朕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多方劝课，俾惰农尽力于作劳，旷土悉成为膏壤，何道而可？夫朝臣绝党援之私，则外吏从风，政多循绩；士子励廉隅之节，则小民务本，俗化敦庞。尔多士积学有素，其悉心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在那治理最美好的时代，君臣同心同德，郡县中大官奉公守法，小官廉洁，读书人看重亲身去实行，农民

在用力耕种上特辛勤，因而能够满朝廷上人才济济又相互激励，官吏施治的情况得到澄清，教化遍及到各个角落，休养生息得非常充分，这种世风又是多么地隆盛啊！皇帝我安抚统领整个天下，夜晚在警惕，清晨在戒惧，希望朝廷和地方上的众臣僚共同辅助治理，以便形成最为隆盛的时运，这种意愿真是太殷切了。孔子说过：臣僚要用忠诚来事奉君主。作为人家的臣僚，必定要有公正无私的学问，才能竭尽那忠诚不二的心念。皇帝我推心置腹地来对待下面的众臣僚，每次召见朝廷大臣，必定反复地进行训示与告诫。所有在位的官员果真能够把公家放在前面，忘记个人得失，在那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发誓要纯净清白吗？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来互相告诫做劝勉，共同遵从那宽广平坦又端正笔直的帝王大道呢？《尚书·洪范》中强调有所谋划，有所作为，又有恪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官吏施治本来要把节操作为根本，可除去谋虑和制定出措施，就没办法实现它。皇帝我审慎地选任地方大官，往下直至太守县令，都务必要获取到胜任的人选，这实在是希望他们振兴起政事，慎重对待法规条例，给地方上带来好处，并不仅仅是使自身廉洁而个人爱惜自己就算到头了。做起事来往往为繁杂多变而感到劳苦，可避免干事必定会发展到政务荒废和毁败。处理得太紧急，常常忧虑它造成搅扰；可姑息纵容，又会发展到养护奸恶。采取什么措施就能形成勉力从政和宽厚盛大的治理局面呢？《礼记·王制》中规定乐正官崇尚四项专业，定立相应的四种教育内容和方式，依从先王的《诗》、《书》、礼仪、乐舞来造就士子。其中不服从教导的人，既有打发到郊区和郊外去的责罚，又有发配到东方或西方极远地带的惩处。同时挑选其中的优秀者，选送到司徒、司马那里去，而人才就培养出来了。读书人是四类平民的第一类人，必定要看重学业和品行，来给社会风尚的化导做出榜样来。可如今有的人却在浮华上用气力，很少务实，严重者竟嚣张地做鼓噪，不把上级当回事，耍弄奸诈的手段来欺骗。这种现象难道是因为用道德仁义不断进行化导还存在着做得不够的地方吗？或者是表彰品德好的人和斥退邪恶的家伙应该交互使用激励与惩罚的手段呢？古代鼓励农耕设有专职的官员，致力农耕和孝敬友爱作同等对待，对农耕的重视达到

了这样的程度啊！我们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在日益增多扩大，可田地却只有那天然固定的数目。除去讲求农业政务，把人力全部投进去而使土地效益全部发挥出来，还凭什么能让家家充裕，人人富足呢？皇帝我希望地方大官督促率领各级官府和部门想方设法鼓励农业生产，使懒惰的农民也全都在辛勤耕作上拿出全部力气来，使荒芜的土地全部变成肥沃的良田，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呢？朝廷的臣僚断绝了拉帮结派的个人用意，地方上的官吏就会普遍效法，政务就取得多方面的良好成绩。读书人激励自己的廉洁的节操，普通百姓就会在农耕本业上下力量，民间风尚的化导就会变得敦厚朴实。你们这些读书人积累学问已经很有功底了，要用尽心力做出对答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6. 清世宗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荷上天列祖眷佑之隆，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临御以来，勤求治理。日与群臣训诫咨儆，切加勉勖，惟期笃元首股肱之谊，育胶庠塾序之材，吏治实底于澄清，民生共登于殷阜，朝乾夕惕，旰食宵衣，此念无一刻释于怀也。人君奉天出治，而赞化端赖臣邻；人臣体国奉公，而分猷必资群力。惟君臣联为一体，故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而明良之庆以成；僚采联为一体，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而协恭之美以著。朕推诚布公，实视百尔臣工为一体，而诸臣之事君者，果能尽一德一心之道，而无惭于幽独欤？又何以使同朝共事者绝党比之私，化畛域之见，以臻师师济济之盛欤？国家所以重士者，以士之能自重也。故必端其所习，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资其表率。乃或嚣凌诈伪，干犯名教，习于曲学而不循正道，务为浮薄而不敦实行。士不自重，而里巷小民从而轻之，且相率藉口而仿效之。士习未端，安望民风之归于厚乎？今欲使读书之人，争自濯磨，澡身浴德，悉为端人正士，以树四民之坊表，必何道而可？守令为亲民之官，百姓之休戚系焉。古之称循吏者，必以惠群黎、端风化为要务。故里社之树艺，咸载史书；物类之感孚，皆征治化。以至诚恻怛之实心，尽父母斯民之实政，刚柔相济，教养兼施，斯不愧循

良矣。朕欲百姓乂安，风俗淳美，果何道而使司牧皆得其人，以收实效欤？抑大法小廉，必端本于大吏之倡率欤？若夫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劳民劝相，以尽地力，自古重之。盖本业勤则衣食之源裕，俯仰足则礼义之化兴。正民之德，必先厚民之生，良有以也。海宇承平日久，休养多年，户口愈繁，生齿愈众，而地不加广，自非人尽上农，何以使仓廪足而妇子宁欤？然则欲使野无不垦之土，国无游手之民，不事末利而专务恒产，为民牧者必如何劝勉鼓励，而后见丰亨豫大之休也？夫朝宁有喜起之风，则万邦黎献观感奋兴，而野多俊乂矣；长吏树抚循之绩，则寰宇苍生养恬耕凿，而户乐丰盈矣。尔多士留心经济，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往上承受到皇天和列祖列宗的盛大眷念与佑助，肩负起圣祖仁皇帝托付的重任，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一直辛勤地谋求治理。每日里与群臣相互训示告诫和询问提醒，严切地加以勉励，只希望恪守那元首与辅政大臣连为一体的要义，培养好各级学校中的人才，官吏施治的情况确实达到澄清的程度，百姓的生活共同步入殷实富足的境地，为此清晨在戒惧，夜间在警惕，很晚才吃饭，早早就起身，那一心念没有片刻在心中放下过啊！君主承奉皇天的旨意亮出治理的措施，而辅佐化育确实要依靠身边的大臣。臣僚体念国家，把公事放在首位，而分别落实治国的谋略必定要借助众人的力量。只因君臣联为一体，所以就把公事放在首位，忘记个人得失，把国家放在首位，忘记自家如何，而君主圣明和大臣贤良的吉庆局面才能够形成。只因众臣僚联为一体，所以良好的事情就彼此鼓励，过失就相互规正，而恭敬协和的美好风气就显示出来。皇帝我推诚布公，确实把文武百官看成是与天子连成一体的人物，但事奉君主的众位臣僚果真能够完全奉守同心同德的原则，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时并不感到有什么惭愧的吗？又凭什么能使同朝共事的人断绝拉帮结派的个人用心，消除彼此之间的成见，形成那济济一堂又相互学习的盛况呢？国家看重读书人，是因为读书人能够自己看重自己啊！所以必定要端正所研习的学说，而后同乡人把他看成是效仿的典范，社会风尚

借助他树立起表率来。可有的人竟然嚣张地做鼓噪，不把上级当回事，奸诈又虚伪，违犯人伦纲常，研习那邪僻的学说而不遵循正道，极力去要弄浮华浅薄的那套玩艺而不致力实际的行为。读书人自己不看重自己，而里巷的普通民众由此便看不起他，而且递相拿他当借口去加以仿效。读书人的习气没端正，怎能指望民间风尚归入淳厚呢？如今想让读书人争相自觉地磨砺净化自己，洗涤身上的污点，修养好品德，全部成为正人君子，树立起四类平民中的榜样，必定要通过什么办法就能达到呢？太守县令属于最接近百姓的官员，百姓的喜乐与忧虑就拴系在他们的身上。古代号称奉公守法的地方官，必定把对黎民施布恩惠、端正社会风气作为要务。所以里社的种植情形，全被载录在史书上，而各类吉祥物相应做出的感应，都在证明治理教化的美好。凭真诚至极又怜悯同情的实心，完全处理好身为百姓父母的实政，刚强与柔和的手段彼此补充，教化与养育交相施用，这才无愧于奉公守法的地方官了。皇帝我希望百姓得到治理和安宁，民间风尚变得淳厚美好，到底采用什么办法就能使地方官都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收到那实效呢？或者是大官奉公守法而小官就廉洁，必定要从大官作出表率上来端正那根本呢？至于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吃上饭是民众的第一件大事，激励民众勤劳，察看土地情况，使土地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自古以来就重视这一问题。在务农本业上勤勉，衣食的来源就宽广；供养全家老小很富裕，礼仪正义的化导就兴行。要端正百姓的品德，首先必须使民众的生活宽裕，这确实是有原由的呀！如今天下太平的年月太长久了，休养生息了许多年，户口愈益繁盛，人口愈益众多，可土地却不会再扩大，要不是每个人都重视农业生产，凭什么能使粮仓装满粮而妻子儿女获安宁呢？既然如此，那么要想使原野上没有不被开垦出来的田地，国家中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群，不从事工商等活动，专门在田产上下力气，身为地方官的人必定要怎样劝勉鼓励，而后呈现出盛大亨通又安乐富庶的美好景象呢？朝廷上形成大臣效忠、天子振兴的风范，天下各地的黎民百姓就在看到后特受感染，昂奋兴起，而民间就会涌现出众多的优秀人才了。地方官建立起安抚百姓的功绩，全天下的民众就养护安定，致力耕田凿井，而家家

便为丰厚富足而高兴了。你们这些读书人留心经邦济民的谋略，要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7. 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

〔四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绍缵洪基，抚临区宇，勤求治理，旰食宵衣，罔敢暇逸。深惟郅隆之世，朝宁有喜起之风，臣邻矢公忠之谊，司民社者树懋绩，列庠序者砥纯修。朕与中外诸臣谆复诰诫，庶几黾勉恪恭，各殚厥心，臻兹盛轨。《易》曰天地交泰。言明良之庆也。《书》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言师济之美也。盖堂陛孚于一德，而后谟明弼谐，克赞其猷；僚采合为一心，而后抚辰凝绩，共收其效。朕推心置腹，一本至诚，冀百尔臣工抒诚启沃，以襄治化。而在廷诸臣，果能精白乃心，夙夜献替，无愧笃棐之义欤？抑群策群力，固将翕受敷施，何以俾同朝共事之臣，和衷交勉，以跻赓歌扬拜之盛欤？人臣职内职外，皆朕股肱耳目之寄。必也忠以居心，公以莅事，然后能与君为一体。苟党援互结，而怀溺情阿比之私；文貌相承，而挟矫诈沽名之术。何以称靖共匪懈，无忝厥职也？今欲使内外诸臣，相勉于古大臣公忠体国之谊，钦乃攸司无载尔伪，励匪躬之节而凛勿欺之忱，果何道之从欤？至于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万姓之休戚系焉。而初登仕籍之人，未尝试之以事，何由知其胜任与否而用舍之欤？天下州县繁多，有一官即需一人铨补，既不容以稍缓，而又欲酌繁简之宜，使人称其官，才符于职。其道安在？夫课吏者，督抚之责也。务为姑息，必长废弛玩愒之风；稍涉苛求，又非为国家爱惜人才之道。何以励其操守，作其志气，策其不逮，宥其过愆，使群吏承风率教，鼓舞奋勉，以奏循良之绩欤？国家造士之典至渥，所期于士者至厚，非专以文词相尚也。必崇实学，敦实行，处则为经明行修之彦，出则为通方致远之材，始克副长育造就之至意。乃海内之士，或驰骛于声华，或缘饰于巧伪，而乔野朴鲁之质，又拘迂固陋而无适于用。将欲使之洗涤积习，相与进德而修业，其何以渐摩陶淑，因材造就，以储誉髦之选欤？夫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斯庶官有所表率，而各殚厥职矣；内外官僚，克勤克慎，斯群材莫不奋励，而各端其习矣。尔多士留

心经济有素,其各抒所蕴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基业,安抚统领整个天下,勤勉地谋求治理,很晚才吃饭,早早就起身,不敢安逸享乐。深切地想来,在那最为隆盛的大治时代,朝廷上形成大臣效忠、天子振兴的风范,左右大臣誓守公家第一和忠诚的准则,管理民众的地方官建树起卓越的政绩,各级学校的教官砥砺学生的纯正品德的修养。皇帝我与中外众臣僚反复训示与告诫,希望奋勉恭谨,各自用尽一切心力,步入这雄盛的轨道内。《易经》上说:天地交合就顺畅。这是在讲圣明天子和贤良大臣的吉庆场景啊!《尚书》中说:能把职位自动让给贤能的人,文武百官就和谐了。这是在讲济济一堂又相互学习的美好局面啊!朝廷上都符合那纯一的德性,而后天子的谋略就英明,辅政大臣就和谐,确能辅助那治国的宏大规划。众百官连成一条心,而后就能顺从那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取得各种政绩,共同收到那功效。皇帝我推心置腹,完全依照真诚至极来行事,希望文武百官抒发内心的想法,进行启迪,用来协助治理和教化。而身在朝廷上的众位臣僚果真能把自己的心念变得纯净清白,从早到晚提出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在忠诚辅助的古训面前不感到惭愧吗?或者是群策群力,固然应综合任用而广泛施布,怎样做就能使同朝共事的臣僚心往一处想而相互勉励,步入君主接下来歌咏而大臣又跪拜高声嘱告的盛况呢?臣僚在朝廷上或在地方上供职,都是皇帝我高度信任的人。必定要把忠诚装在心中,用公家第一去处理政事,然后能与君主联为一体。如果彼此拉帮结派,怀有满门心思去投靠的个人用意;通过文章和外表递相承用,挟带着故作欺诈捞取名声的鬼点子。那还凭什么能符合恭敬地履行好职责而决不懈怠的要求,对自己的职位不感到白白占据呢?如今想使朝廷和地方上的众臣僚在古代大臣用公家第一和忠诚去体念国家的训条上彼此勉励,恭敬地办好份内的事情,不挟带虚伪,磨砺不顾自身只忠君的节操,严肃保持决不欺诈的心念,到底该依从什么途径去做呢?至于太守县令是最接近百姓的官员,一个人的贤良或庸劣,拴系着民众的喜乐与忧愁。而刚被列入百官花名册的人,未曾

拿政事对他进行过测试，应该通过什么来了解他是否胜任而决定任用或舍弃呢？天下州县众多，有一个官职就需要有一个人去充任，既不容许拖延片刻，又想斟酌政务繁简的客观需要，使委派的人胜任那官位，才干切合那职务，具体的做法又在哪里呢？督察官吏，这是总督和巡抚的责任。一切都去姑息，必定会助长废弛政事和荒废时日的习气；稍略陷入苛求，又不是国家爱惜人才的做法。该怎样去激励他们的节操，振作起他们的志气，鞭策他们做得还不够的地方，宽恕他们的过失，致使众官吏承奉朝廷旨意，带头推行教化，鼓舞奋勉，建成奉公守法的地方官的业绩呢？国家造就士子的规定特别优厚，对士子的期望也极其深厚，并不是专用文章辞赋来让他们互比高低啊！一定要崇尚实际的学问，促进实际的行为，在民间就成为通晓经典、品行高尚的杰出人物，出来做官就成为熟悉施政方法、实现远大目标的贤才，这才符合长期培育造就的最终意图。可是四海以内的士子，有的光在虚浮的名声上奔波忙碌，有的专在奸巧虚伪上装样子骗人，而质性朴野粗鲁的人又拘谨迂腐，顽固浅陋，不适合任用。打算让他们涤除积习，共同在道德上提高又修明学业，该怎样去逐渐磨砺陶冶，根据才质加以造就，用来储备众多英才贤士的日后选用呢？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这也就使普通官员有那看齐的典范了，各自恪尽本人的职守了。朝廷和地方上的众官员确能勤勉确能谨慎，这也就使各种人才无不奋勉了，各自端正本人的习尚了。你们这些读书人留心经邦济民的谋略已经很有功底了，要各自抒发出胸中所蕴积的东西，做出对答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8. 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科

〔三月二十九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荷上天列祖眷佑之隆，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临御万方，十有一年于兹。兢兢业业，宵旰励精。凡所以致治之道，无不期其备举。至奖励忠勤，振兴髦士，奋武卫而厚民风，尤未尝一日少弛于怀也。至治之世，大小臣工类以纯诚自矢，亦以精白望人。盖惟戴君为元首，故其视同官也一如肢体，痛痒之相关，化朋党比周之习为劝善规过之风。夫是以协恭和衷，共成

致主泽民之业也。朕推诚以遇臣工,时以公忠体国切加勖勉,深冀内外诸臣共臻斯路。而服官受糈者,果克以忘私祛伪,自励而交励耶?若犹未也,则图所以殚厥心者宜何如?业先四民之谓士,必思所以有异于齐民之实,而后立心制行,始不沦于污下。故孟子曰尚志,《记》曰士先志,即宋陆九渊讲喻义喻利,亦谓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之不立,为士之基已隳,纵记问广洽,文藻华赡,正昔人所讥为虽有文采而不可近者也。然则士可不自植其本欤?而师儒之教,又可弗急其先务欤?夫治世不弛武备,凡以制治保邦于永久也。今直省营制,非不勾稽有册,简阅有规,校练有期,侵冒有禁矣。然保无有习为具文,未能实力举行者乎?其何以副朕固圉卫民之意?夫士不练,不可以程勇;器不精,不可以言备。然则弧矢戈矛之用,与夫坐作进退疏数之节,司戎政者可勿时时加意欤?移风易俗,吏治之最也。导民以爱敬,则忠顺可移;驯民以敬恭,则诟谇不作。诱掖有术,不难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朕治天下,恒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切务。故擢孝廉方正,崇忠孝节义,旌义门,奖还金,举凡裨补风化之事,靡不激劝嘉与,以树风声。兹遐迩民俗,其悉淳欤?大小臣工,何以赞朕振兴民行之政也耶?大抵察采矢公诚,则有以倡械朴菁莪之化;胶庠敦礼教,则有以储股肱耳目之才。军政修明,则生民安堵;风俗淳厚,则众志成城。所谓清和咸理,成万年有道之长者,此也。尔多士其悉抒所蕴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往上承受到皇天和列祖列宗的盛大眷念与佑助,肩负起圣祖仁皇帝托付的重任,统领整个天下,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一直兢兢业业,从早到晚励精图治。只要是能够实现大治的原则与方法,无不希望把它们全面推行开。至于奖励忠诚勤勉的官员,振兴起优秀的人才,奋扬武力防备,使民间风尚变淳厚,更未曾有一天在心中稍略放下过啊!在治理最为美好的时代,大小臣僚都用一片忠诚来自我发誓这样做,也用纯净清白去期待别人。只因他拥戴君主为元首,所以他也把共事的同僚看成是同一副身躯上的四肢一般,痛痒相关,将拉帮结派、相互勾结的恶习转变成勉励良善、规正

过失的风尚。所以就恭敬和谐，团结一心，共同建成那使君主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给百姓带来好处的功业啊！皇帝我亮出赤诚来对待臣僚，总拿要以公家第一和忠诚去体念国家的训条来殷切地加以勉励，深深希望朝廷和地方上的众臣僚一起踏入这条道路。而当官供职领取国家俸禄的人，果真都能用忘记个人得失、去除虚伪来自我勉励和彼此勉励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么用来考虑竭尽这种心念的举动，又该怎样呢？职业在四类平民中占第一位，这就叫做读书人。一定要思求确与普通百姓迥然不同的实际表现，而后定立起心志，把握好行为，这才不至于沦落到卑污下贱的圈子里去。所以孟子强调要注重志向，《礼记》上也说读书人要把志向放在首位，这也就是南宋陆九渊所讲的要弄清道义所在和弄清私利所在，其实也在强调所弄清的东西是由他所习惯的东西决定的，所习惯的东西又是由他的志向决定的。志向定立不起来，作为读书人的根基就已经毁坏了，即便记住和懂得的事情特别多，文采华丽丰富，这也正是古人所讥斥的尽管富有文采可却不能接近的那种人啊！既然如此，那么读书人能不自觉地培植他那根基吗？而师长与儒士的教诲，又能不把它作为首先该做好的事情去迅速地做好吗？在大治的时代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这都是为了制定出治理措施而永久保持国家啊！ 如今中央直辖省份的军队编制，并不是不验定核查建有花名册，检阅立有规则，训练定有日期，冒领军饷设有禁令了。然而能保证没有习惯上把这一切都看成一纸空文、未能真用力去贯彻执行的人吗？这样做可凭什么会符合皇帝我巩固疆域、卫护民众的心愿呢？士兵不训练，就没办法衡量出勇力来；武器不精良，就没办法讲论防卫。既然如此，那么弓箭戈矛的使用以及坐下站起、前进后退、人多人少的规范动作和战法，在主持军政的将帅那里可以不去时时予以高度注意吗？移风易俗，这是官吏施治的最重要的任务啊！用仁爱恭敬去教化民众，忠诚与顺服就可以跟着形成；拿敬重恭谨去训导民众，相互责骂的现象就可以不冒出来。诱导鼓励具有恰切的办法，不难把中等人引入到君子的行列中。皇帝我治理天下，总把端正人心、使社会风尚变淳厚作为最切要的事情。所以就提拔孝敬廉洁、端方纯正的人，推崇忠诚孝敬和节烈正义

的人，表彰忠义的人家，奖励拾金不昧的行为，只要属于对社会风尚的化导很有补益的事情，无不赞赏，加以激励，用来确立起声名教化。如今远方与近处的民间风尚全都淳厚了吗？大小臣僚该怎样协助皇帝我振兴起百姓品行的政事呢？大致上说来，众臣僚发誓要公家第一和忠诚，就有办法倡行《诗经》所歌咏的培养造就士子的那种化导；各级学校加强礼仪教育，就有办法储备下大可信用的人才。军政得到修明，老百姓就非常安宁；社会风尚变淳厚，就会众志成城。世上所讲的清正平和，一切都得到治理，构成那永远政治清明的长久国运，就在这上面啊！你们这些读书人要抒发出自己所蕴积的全部谋略，来做对答，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9.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治法莫尚于唐虞，尧舜相传之心法，惟在允执厥中。当时致治之盛，至于黎民於变时雍，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休哉，何风之隆欤！朕缵承祖宗丕基，受世宗宪皇帝付托之重，践阼之初，孜孜求治。虽当重熙累洽之余，而措施无一日可懈。风俗非旦夕可淳，士习何以端，民生何以厚，不能无望于贤才之助。兹际元年首科，朕特临轩策问，冀尔多士启予不逮。夫用中敷治，列圣相传，然中无定体，随时而用，因事而施。宜用仁，则仁即中，仁非宽也；宜用义，则义即中，义非严也。或用仁而失于宽，用义而失之严，则非中矣。何道而使之适协于中耶？《诗》称不竞不绿，《书》称无偏无党。果何道之从耶？政治行于上，风俗成于下，若桴鼓之相应，表影之相从。然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其后各有流弊，惟唐虞淳厚，后世莫能议焉。其悉由于允恭温恭之德，致之然耶？抑五典五礼之惇庸，五服五刑之命讨，亦与有助耶？朕欲令四海民俗，咸归淳厚，其何道而可？国家三年一大比士，宜乎得人。然所取者，明于章句，未必心解而神悟也；习于辞华，未必坐言而起行也。朕欲令士敦实学，明体达用，以励相我国家，何以教之于平素，何以识拔于临时？科举之外，有更宜讲求者欤？意者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凡厥庶民，既富方谷，足民即所以训士欤？《书》称土物爱厥心臧，又有谓沃土之民不

材者，何欤？夫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于唐虞之盛治。务使执中之传，不为空言；用中之道，见于实事。多士学有所得，则扬对先资，实在今日。其直言之，勿泛勿隐，朕将亲采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施治大法没有能比唐尧虞舜更高明的了。唐尧虞舜递相传授的心治大法，只在于恰切地执持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当时实现大治的盛况，达到了黎民百姓随同教化来转变，个个和睦相处，民间没有被遗漏掉的贤才，各个邦国都安宁无事，真是太美好了，世风是多么地隆盛啊！皇帝我继承列祖列宗的盛大基业，肩负起世宗宪皇帝托付的重任，刚刚登上帝位，就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尽管处在国家接连兴盛太平以后，但筹划部署没有一天是可以懈怠的。社会风尚并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变淳厚，读书人的风气该怎样去端正，民众的生活该怎样叫它们富裕，不能不对贤才的辅助寄以厚望。现今正值乾隆元年第一次开科取士，皇帝我特意亲临殿廷进行策问，期望你们这些读书人启发我还没顾及到的问题。运用最为适中的尺度施行治理，各个朝代的圣明帝王都以此递相传授，然而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并没有固定的起主宰作用的东西，要随同时势加以运用，依据事情来施布。应当施用仁德，仁德也就成为那个最为适中的尺度了，然而仁德并不等于特宽大。应当施用正义，正义也就成为那个最为适中的尺度了，然而正义并不等于特严厉。有的施用仁德却在宽大上过了头，有的施用正义却在严厉上过了头，这就都成不了那个最为适中的尺度了。应该通过什么方法致使它们恰恰就与那最为适中的尺度相切合呢？《诗经》上讲：不竞进也不急躁。《尚书》中说：不偏向一头，不拉帮结派。到底该依从什么途径去做呢？政治在上面推行开，风尚就在下面跟着形成。这就如同鼓棰与鼓声彼此相应，标竿与影象彼此随从。然而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到后来各自都产生了相沿而成的弊端，只有唐尧虞舜时期最淳厚，后世挑不出什么来做非议。这完全是由

他们诚信恭敬与温和恭敬的德行造成那样的吗？或者是五种人伦纲常的淳厚和五等礼仪的推行，五等服饰制度的颁赐和五种刑罚的诛讨也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呢？皇帝我想让全天下的民间风尚都归向淳厚，采取什么措施就能实现呢？国家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进士考试，应该能获取到人才。然而所录取的人对经文的章节字义很明白，但未必就对其中的义旨能心领神会啊！对华丽的文辞很在行，但未必就能坐在那里讲一通而站起来去实行啊！皇帝我想让读书人在实学上用气力，通晓主体又明了施用，以便辅助我们的国家，该怎样在平常予以教诲，又该怎样在特别需要的时候进行识拔呢？在科举以外，还有另外该讲求的事体吗？揣想起来，够吃够用以后，礼仪正义就兴行起来了。所有的那些百姓已经粮食充足了，而使民众富足也就是用来训导读书人吧？《尚书》中讲，土地物产喜爱生出心善的人，还有人说土地肥沃地区的百姓没有什么才能。这又是为什么呢？百姓是国家的根基，本应爱护他们。既然要爱护他们，就一定要思考养育他们的办法；既然要养育他们，就一定要先去谋求使他们富足的办法。皇帝我渴望爱护、养育百姓并使他们富足，把这作为教化的根本，致使读书人都可以任用，每户人家都可以受到特殊的表彰，步入唐尧虞舜那样的隆盛治理状态。务必要让执持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的心法传授不成为一句空话，施用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的办法在实际政事上显现出来。你们这些读书人在学习上确有收获，而对答称扬天子的命令首先要献上自己的言论，实际就在今日。要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加以采纳择用。

30. 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丁巳恩科

〔五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致治之隆，唐虞为盛。而《虞书》言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又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盖持盈保泰，若斯之难也。皋陶之陈谟曰：在知人，在安民。夫天工人代，非黜陟公明，何以能咸熙庶绩！至敷奏以言，则又曰：乃言底可绩。言不可见诸施行，则无稽之言耳。若夫安民之本，则曰：食哉惟

时。言民事莫重于农,敦本计也。朕缵承大统,仰继祖宗重熙累洽之运,惟以主敬存诚,孜孜自勉,以求保泰之道,宵衣旰食,不敢诿责臣工。然帝王建治于上,尤赖百职事辅治于下。敬修可愿,至诚感神者,为君之诚敬也。君臣交相咨儆,始可以迓庥和而绵泰运。大小臣工,何以精白寅恭,以恪襄至治欤?古称任官惟贤,位事惟能。以人事君者,大臣之职也。乃或阿其所好而藉以市恩,或猎取虚名而不孚舆论,为国荐贤之谓何?良由私意汩于中,而偏见淆于外也。何以使膺荐举之任者,皆举能其官,而无用匪其人之失欤?言路开,则见闻广。但言必衷于理,事必举其当。若摭拾浮谈,有心迎合,或以迂疏悠谬之论,喋喋敷陈。所谓稽于众者,果若是欤?夫有益于民生国计,是曰嘉谟。即纠缪绳愆,亦称谠论。有志建白者,何以无负恳款设铎之至意欤?我国家休养生息,民物滋繁,宜其户庆盈宁,蓄积饶裕,乃犹时廑匮乏之虞,其咎安在?将人多趋利,逐末者众,而耕作者寡欤?食用奢靡,未能以礼以时,而不知撙节欤?其所以勤劝课而警游惰,可不讲欤?夫都俞交儆,则可以持泰运于无疆;俊乂在官,则可以饬官方于有位。谟明弼直,则堂陛交;务本力田,则闾阎裕。久安长治之道,无逾于此。多士其各抒所见,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实现大治的隆盛景象,要数唐尧虞舜占第一。可《尚书·虞书》中却强调谨慎地对待皇天的命令,时时处处要提高警惕。又说兢兢业业,每天要处理好头绪繁多的政务。这表明守护住已有的功业,保住太平真真像这样地艰难啊!皋陶进献治国的谋略又说:在于确能了解任用人,在于安定住民众。皇天的事务由人代替去完成,除去罢免与提升官员特公正严明以外,还能靠什么使各种政绩都振扬起来呢?至于用言辞做出全面的禀报,又强调言辞能取得实际的成绩。这是在讲不能够在施行上表现出来,那就纯属毫无根据的言辞啊!至于安定住民众的根本所在,又说粮食生产必须顺应农时。这是在讲民事没有哪一件能比农耕更为重要的了,要促进那根本大计啊!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帝室统系,恭敬地承接起列祖列宗接连兴盛太平的美好时运,只拿虔敬为主和保持至诚来

勤恳地做自我勉励，用来谋求保住太平的办法，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不敢把责任推到众臣僚的头上。然而帝王在上面确立起治理规模，更有赖文武百官在下面辅助治理。恭敬地修明希望实现的事体，至诚感动那神灵，这属于君主的至诚与恭敬的实际表现啊！君臣互相做询问做告诫，才可以迎来那美好和谐的福庆，绵延那太平的国运啊！而大小臣僚应该怎样去使自己的心念变得纯净清白又虔敬恭谨，竭力去辅助那最美好的治理呢？古代强调任用官员只讲求谁贤明，安排职务只讲求谁能干。用进献人才来事奉君主，这正是大臣的职责啊！可有人竟对大臣投其所好，借此来换取到对自己的推荐，还有的大臣通过荐举来猎取虚浮的名声而被推荐的人却不被社会舆论所认同。这样做，为国家荐举贤才还叫什么事了呢？这实在是因为私意在心中作怪而偏见就在外面显出来了。采取什么对策就能使担负着荐举责任的人都能够荐举出胜任官职的人员，而不出现任用的并不是合适的人选的过失呢？进献言论的道路敞开了，了解的情况就广泛。但言论必须切中那道理，事项必须列举那恰当的部分。如果拾取浮泛的说法，有心去迎合，或者拿迂腐粗疏、不着边际的论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做陈述，古人所讲的向众人进行考索，果真就像这个样吗？对国计民生有补益，这才叫做美好的谋略。即便是纠正错误，规正过失，也称得上是正直的言论。有志向朝廷提出建议的人，应怎样不辜负国家多方面主动征求意见的最深切的意图呢？我们国家休养生息，人口和万物越来越繁多，难怪家家庆幸富足安宁，积蓄充裕，可仍经常搅起匮乏的忧虑，错误出在哪里呢？是因为人们大多去追逐财利，从事工商活动的人多而种田的人少吗？或者是饮食用项奢侈淫靡，未能按礼仪和时节办而不知道节约吗？用来频繁激励督促和警戒游荡懒惰的措施能够不讲论吗？君臣和谐地相互做告诫，就可以把太平的国运保持到永无尽头的地步。贤士英才都担任官职，就可以对所有的官员整顿好为官之道。天子的谋划特英明，辅政大臣团结一致，朝廷就一片和睦。从事根本，大力种田，民间就富裕。长治久安的做法没有能超出以上范围去的了。你们这些读书人要各自抒发出本人的见解，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1.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

〔四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帝王统御寰区，代天子民，敕明旦，凛对越，广咨询，切饥溺，朝夕乾惕，不遑宁处者，亦惟思措天下于治安，登斯民于衽席。缅想唐虞之世，吁咈一堂，时几互儆，其时黎民於变，府事修和，猗欤盛矣！朕以凉德，缵承丕基，孜孜图治，四年于兹。勤恤民隐，疴瘝在抱。蠲复遍于各省，而闾阎尚觉艰难；赏赉时及八旗，而京师未见富庶。论者谓泉布之贵，病在禁铜。今铜禁开矣，而钱价转昂。又谓物料之贵，病在税重。今关税薄矣，而物价未减。用是日夜思维，不能稍释。惟恐言路或有壅塞，而利弊不知，乃咨询倍切。而假公济私者多，实心忠爱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陈时务者少。岂折槛牵衣之流，不可见于今日耶？元为善长，宅心岂可不宽！而尚宽大，则诸弊丛生，民生转受其累。恐其流也，稍事整饬，而观望者又以为上心在严，遂莫不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而民受其困矣。夫以今日之风，行今日之政，不过补偏救弊，权宜设施。思欲家给人足，讲让兴廉，成比户可封之俗，将何术之从欤？又如河工一事，动如聚讼；新开运口，论者纷纷。彼身当其事者稍自担承，众即以为固执而措置失宜；若一无厘正，又以为因循而不足与为。是责人则易，而自处之则又难也。生民休戚，视庶司贤否；而承宣表率，则大吏之责也。乃今之课吏者，不过稽其案牍，察其考成。其有爱民若子如召父、杜母者，果得与旌扬之典耶？凡此数事，皆朕时廑于怀而未得其要领者。尔多士起自草茅，入对明廷，既无顾忌之嫌，宜尽敷陈之义。若能仿《治安六策》、《贤良三对》，深达天人之理、性命之原、治乱安危之机者，亦不拘体制，详切陈之。朕将进而亲询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帝王统领整个天下，代替皇天像对待儿子那样抚育黎民百姓，督促自己拂晓必须起身，敬畏地对待那答谢天地神灵的事宜，广泛地做询问，高度关切挨饿和落水的受难人，从早到晚戒惧警惕，根本顾不上休息，也只是因为考虑着要把全天下措置到治理安定的状态，把当今的民众带入特别安宁的境地。缅怀

追想唐尧虞舜时期,君主在朝廷上和睦地讨论政事,用时时处处要保持警惕来互相做告诫,当时黎民百姓随同教化而发生大转变,六府和三事得到修明又彼此和协,真是太隆盛了呀!皇帝我凭借浅薄的德性,继承盛大的基业,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总去体恤民众的疾苦,百姓的病痛更装在心中。免除赋税和徭役遍及到各个省份,可民间还感到艰难困苦;赏赐经常施布到八旗那里,可京师还没看到富庶的景象。议论政事的人认为钱币币值太高,毛病出在禁止采铜,如今采铜的禁令已经解除了,可钱价转而更昂贵。他们又认为物品太贵,毛病出在商税太重,如今关税已经减轻了,可物价却没降下来。因此日夜加以考虑,不能稍略放宽心。唯恐进献言论的道路会被堵住而天下的利弊了解不到,于是询问就更加殷切。可假公济私的人却很多,而真心忠君爱国的人却很少;敷衍塞责穷对付的人有很多,而直截了当陈奏当前事务的人却很少。难道像西汉碰断殿前栏干来进谏的朱云、像三国曹魏拉住天子衣角做规劝的辛毗那样的人物,在当今就不能再涌现出来了吗?《易经》的"元"字正是良善的主宰,心胸容纳的东西哪里能够不宽广呢?可是一味崇尚宽大,各种弊端就成堆地产生出来,老百姓转而反受拖累。恐怕它恶化下去,稍微加强整顿,而看风使舵的人又以为皇上的意向重在严厉,于是没有谁不把苛酷当成能察辨,把严刻当成严明,而百姓却遭受这类做法的困扰了。官员们依从今日的风气推行今日的政事,不过是补偏救弊,灵活做些处理和部署罢了。皇帝我希望能够家家宽裕,人人富足,讲究礼让,兴行廉洁,形成每户人家都有资格受到特殊表彰的社会风尚,究竟该依从什么方式方法去做呢?再如黄河兴修这桩大事,一采取行动就像合伙打官司一般争来争去。新开运粮的河口,议论的人就众说纷纭。那些具体负责的人稍一做出个人的决定,众人就认为他太固执而措置不恰当;如果没做出任何厘正,又认为他因循守旧而不足以干成大事。这纯属责怪别人很容易,但自身去办理则又难办了。众百姓的喜乐与忧愁,完全以各级地方官府贤良或庸劣为转移。而承奉宣导朝廷的旨意,给下属做出表率来,又是地方大员的责任啊!可如今督察官吏的做法,不过是验核一下他们报上来的公

文簿册，察看一下考核的评语罢了。真有爱民如子像西汉召信臣、东汉杜诗那样被当地人称为召父杜母的地方官，果真都被列入了表彰的范围里了吗？总共以上这些事体，都是皇帝我总在心中做思考却还没有获取到其中要领的事体。你们这些读书人来自民间，到殿廷上来做对答，既然不存在顾忌的东西，就应把那全面陈述的义旨贯彻到底。如果能够效仿西汉贾谊的《治安六策》和董仲舒的《贤良三对》，深深通晓皇天与人间的道理、本性与命运的本原，治乱与安危的机宜，也不必拘泥答卷的格式要求，详明恰切地陈述它们。皇帝我准备进一步召见，当面再做询问。

32. 清高宗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

〔四月初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德弗类，托于士民君公之上，凛对越之小心，思安危之至计。兹尔多士，释褐观光，宜有以陈古今之通变，直指当世之切务。是以详延于廷，谘以政要，丐以启告。朕匪惟觇多士之所学，亦以匡朕不逮，思益下民耳。盖君之于民，其犹舟之于水耶！舟不能离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离民而成其治。是以古圣先王，恫瘝怀保，然惟日不足者，非蕲民之怀惠而已也，实有见于君民一体之故。今君与民，诚一体欤？德之不修，政之不宣，贤才之不进，民隐之不闻，有一于此，其能成治道者，未之或闻也。将欲补四者之阙，又何术之从欤？夫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从，天下虽乱，识者知其有治之几焉。天下不必乱也，君庸而臣谄，上令而下违，天下虽治，识者知其有乱之几焉。其盈虚消息之机，多士亦尝筹之素，而欲有辰告乎？务民之本，莫要于轻徭薄赋，重农积谷。我国家从无力役之征，斯固无徭之可轻矣。而赋犹有未尽合古者乎？赋之外曰耗羡，此固古之所无也，抑亦古尝有之，不著之于官，则虽有若无，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间无耗羡，雍正年间有耗羡。无耗羡之时，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乐输，或按亩而派捐，业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所为诸弊一切扫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谋生者，反无以糊其口。农民散处田间，其富

厚尚难于骤见。而游民喧阗城市，贫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亦犹燕赵无铸，非无铸也，夫人而能为铸也。而议者犹訾征耗羡为加赋，而不知昔之公项，皆出于此而有余。今则日见其不足，且动正帑矣。是以徒被加赋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复耗羡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间，其必不出此，而于农民之果有无利弊，必知之详矣。又如常平之设遍天下，而卒不闻百姓无鲜饱之嗟。或者禾栖亩而给银，稼登场而责谷，是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矣。将欲改弦易辙，而天时不可必，其何恃以无恐耶？凡此数者，皆朕日夜踌躇而未得其要领者。多士其毋以朕为不足告，而阔之隐之、其尚以朕为可告，而敷之陈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讳。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德性赶不上别人，可却位居在读书人和黎民百姓以及大臣们的上面，在敬畏地对待那答谢天地神灵的事宜上格外加小心，思索国家安危的最有效的计策。如今你们这些读书人脱下平民服装，到京师观看朝廷的盛明景象，应当确有依据地来陈述古今一贯的变化，直接指明当代的紧要事务。所以就把你们全部招揽到殿廷，用施政要务进行询问，求取到启发与告诫。皇帝我不仅仅要察看你们这些读书人所学习的东西怎么样，也要用来匡扶皇帝我还没顾及到的事情，只考虑对下面的百姓更有益罢了。君主对于民众来说，就像船只对于水吧？船只不能离开水而发挥出它的功用，君主也不能离开民众而形成他那大治。所以古代的圣帝明王关心民众的疾苦，内心不安总像每天都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这不光是希望百姓感念恩惠就算到头了呀！实际上正出自对君民属于同一副身躯确有深刻理解的缘故啊！如今君主与民众确实成为同一副身躯了吗？德业得不到修明，政事得不到宣示，贤才得不到进用，民众的疾苦得不到了解，出现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却能构成他那治国大道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呀！如今打算弥补这四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又该依从什么办法去做呢？天下不一定要呈现出大治的景象啊！只要君主英明又大臣贤良，上面发布命令而下面就听从，天下即使很乱，但具有眼光的人

仍然知道他有实现大治的好兆头啊！天下不一定要呈现出大乱的情景，只要君主昏庸又大臣献媚，上面发布命令而下面就违抗，天下即使显得治理还不错，但具有眼光的人仍然知道他有陷入大乱的坏兆头啊！其中充盈与虚弱、消歇与滋生的奥秘所在，你们这些读书人也曾长时间地予以筹谋了，而有想要适时告诫的吗？为民众操劳的根本性的事情，没有什么能比减轻赋税徭役、重视农耕积蓄粮食更为紧要的了。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力役的调发，这本来也就不存在减轻徭役的问题了。但赋税仍有和古代不完全吻合的地方吗？法定赋税以外，其他增收的部分叫做耗羡。这压根就是古代从来没有过的呢，还是古代曾经有过但不由官府办理，于是虽曾有过却像没有过，而到今天又考察不出来了呢？况且在圣祖仁皇帝康熙年间就没有耗羡，到世宗宪皇帝雍正年间才有耗羡。在没有耗羡的时候，只要是州县官员赴任，他那亲戚和随从人员靠这位官员来养活的，不低于数百人。而顶头上司的苛刻索要，京官的强行要求援助，又不在这一范围内。但一遇到公事需要款项，有的就用自愿缴纳的名义强迫百姓缴纳，有的按田地占有的亩数摊派捐税，于是靠田地为生的百姓就遭受到危害了。从雍正年间起，把耗羡归入公家，地方官所造成的各种弊害就全部扫除了。可四处游荡的那批专靠给官吏打杂来谋生的人，反而没门路有口饭吃了。农民分散在田间，他们中特富裕的人还很难一下子就看到，可四处游荡的那批人在城市中喧闹不已，贫乏立刻就显示出来了。世上的顺口溜说：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也就如同燕赵地区没有短柄锄，并不是世上没有它，人们是能够制造出短柄锄的啊！可议论政事的人仍把征收耗羡贬斥为增收赋税，但却不清楚以前的公家用项，都出自这里面并且有剩余啊！可现今却日益显现出不够用来了，而且要动用国库的储备款了。所以白白地蒙受到增收赋税的恶名，而公家与私人交相遭受困乏就算完事了。这说明天下的事体压根就不能够做到特清晰吗？或者是讲这种话的人，完全出自想恢复耗羡的官员们的口中呢？你们这些读书人来自民间，必定不会抱持这种主张，而对农民到底存在不存在弊害也一定了解得最清楚了。再如常平仓的设立遍及全天下，可最后也没听说百姓没有

挨饿的叹息了。有的地方禾苗在田地上长出来就借给银钱，庄稼刚上场就催交债款，这表明农民并没得到好处，首先就蒙受到害处了。打算彻底改变做法，可农时绝对不可以违背，应该怎样办就有仗持的东西而不存在恐惧了呢？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皇帝我日夜思来想去而没获取到其中要领的问题。你们这些读书人不要把皇帝我看成是不值得去告诫的人，从而隐藏在心里不说。还要把皇帝我看成是可以告诫的人，全面地做出陈述来。讲明自己的全部想法，不要有什么隐讳。

33. 清高宗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

〔四月二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国家设科取士，每三年而宾兴之。复明试于廷，以觇所志。朕既不逮，立政无方，常思进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试贡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乃多士之对扬者，华藻是饰，骨鲠无闻。岂朕求之不诚欤？抑司其事者，抑不以进欤？不然，岂时无阙政，民无隐情耶？则多士以起自田间、未谙政务为辞耳。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爰以多士所素服习敬业者询之，必有以导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三选、四科、五问、十条，乃周汉以下取士之别。为取为弃，为同为异，为得为失，可得而详言欤？其铨除也，代复不同。魏晋而下，率循资格，有四科九班之别，五保七流之异。其体例亦能条对论列否耶？将欲得贤材，舍学校无别途；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多士宜有以奋发敷陈，启迪朕蔽。其有深悉时政得失、直言极谏者，听。

皇帝的策问说：国家设立科目，选取士子，每隔三年就由各地推荐到礼部来应试，然后又在殿廷上举行公开的考试，用来察看应试者的志向品性。皇帝我既然有很多事情想不到，定立国政缺少办法，就总想能使那些美好的建议进献上来，协助皇帝我的美好治理。接连策试那些通过了礼部考试的读书人，也已经不在没有文采上感到惭

愧了，并且广泛详尽地进行征询了。可是应试的读书人对答称扬天子命令的答卷内容，却光是雕琢华丽的文辞，忠正的规谏意见却没听到过。这难道是皇帝我在搜求上还不真诚吗？或者是主考官员不把那类答卷进呈呢？否则的话，难道是当今竟不存在尚欠完美的政务，民间没有憋在心里的怨恨吗？其实这正表明应试的读书人恰恰在拿来自民间、不懂政务做推辞罢了。须知政事与学问并不是两条道上的东西，考察古代与了解当今正目的一致。于是这次就用你们这些读书人一向努力研习而在学业上特用力的事体做询问，必定会有理据来开导皇帝我的了。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这些合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又是在哪些朝代划分出来的，收藏它们的是哪些人，又是在什么地方重新传世的，献给朝廷是什么时候，传授它们的又有几个学派，拿它们来选取士子的又有几个朝代，能够对以上问题逐项区分清楚并按顺序指明吗？设立三类选拔或四种科目，五道策问或十条经义对答，这是从周代汉朝以后选取士子的不同方式。其中哪些属于录取或淘汰的依据，哪些属于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哪些属于正确或错误的东西，能够详尽地讲论一番吗？在铨选授官上，各个朝代也不相同。从曹魏晋代以后，一律按照资历品级办理，存在着四个类属与九等考核标准的区别，五人做担保与七个品阶的差异。对这些制度规定也能逐条对答出来并评论一番吗？打算获取到贤才，舍弃学校培育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打算成为贤良的臣僚，舍弃经典的彻底钻研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行。你们这些读书人应当确有理据地奋发做陈述，启发皇帝我还闹不清的地方。如果有那深深了解时政的得失而直言极谏的东西，准许随便讲出来。

34. 清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

〔四月二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制治在审其时宜，论治必征诸实用。《书》曰明试以功，又曰乃言底可绩。士先资其言，必度可施之行事，为济时之良画。斯足以应天下之务，而国家收其实效。朕临御十有三年，宵旰兢兢，期与四海臣民共臻荡平正直之休。而朝堂卿尹，未见其能公忠体国，夙夜匪懈也；僚采未见其能震动恪

共,服勤趋事也。封疆大吏,未见其能正己率属,移风易俗也;守吏未见其能砥节奉公,劳心抚字也。将整饬之未得其道,激扬之未尽其方与?吏治之未及于古,其故安在?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衣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力,地不能无遗利。果游惰矙之,追呼扰之欤?抑荒莱不翦,耒耜不勤,司牧者漫不知省,而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具文从事欤?迩年米价之贵遍天下,朕多方筹画。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欲停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禁富民之射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停,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至水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山东被灾较重,前后截漕拨帑,费既不赀,且命大臣台谏往莅其事。而流移捐瘠,何以劳来而安集之?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先事之绸缪,既无及矣,独不思所以善其后欤?乘时雨之沾溉,招流亡,贷耔种,给牛具,播种而耰之,以待有秋。非要务欤?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与?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而又加以埽坝林立,水势不能直达,淤沙日停,河心日垫,不得已而加堤以御之。近闻淤沙之离两岸者,或仅三四尺、五六尺。偶值盛涨,必有决溢之患。河病而漕亦病,果何道而能刷沙,以畅其流与?将复用河兵,操舟制器,日从事其中,可岁月奏效与?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长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与?多士修之于家,宜有明治体,知治要,以期自见于当世者。而事词章而略经术,急进取而竞声华,论文体则尚浮辞而乖实义,于圣贤道德之实,未有能体之于心,修之于行事者。将教化之未明与?抑积习之难返与?其博思所以端风尚而正人心者,切言之无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制定好治国措施在于审辨出适合时

势需要的东西，讲论治国的办法必定要把真有效用作为依据。《尚书》中说：用功绩来做明晰的验定。还说：你那言论要归结到确能取得成功上。读书人拜见君主首先要进献自己的意见，必定要考虑可以在政事上付诸实施，成为救助时世的美好谋划。这样就足够用来应对天下的事务，而国家收到那实际的效果。皇帝我登上帝位已经十三年了，从早到晚兢兢业业，期望与四海臣民一起步入广阔平坦又端正笔直的美好境地。然而朝廷上的公卿大臣，还没看出他们能用公家第一和忠诚去体念国家，从早到晚总不懈怠啊！文武百官也没看出他们能心受震动，严肃恭敬，辛勤供职，主动承担起任务啊！封疆大吏还没看出他们能端正自己，给下属作出表率来，转变民间风尚啊！太守县令也没看出他们能磨砺节操，奉公守法，在抚育百姓上费尽心力啊！这是因为整顿还没获取到那有效的途径，激浊扬清还没完全运用好那方法吗？官吏施治的情况比不上古代，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农耕蚕桑，这是称王天下的国政的根本。我朝各位圣明的先帝接连使天下兴盛太平，休养生息，繁殖人口，思考使百姓衣食富足的办法，也已经多次申明鼓励农业生产的命令了，可人们还做不到使出全部的力气来，土地还达不到发挥出全部的效益来。这果真是因为游荡懒惰的人败坏了农耕，催交赋税搅扰了百姓吗？或者是荒芜的土地得不到整治，农活人们不愿去干，而地方官却任凭它去而不知道加以省察，地方大员也只把公文簿册和准时交差作为急事，谁做到了就把它写在考核表上，拿来评定政绩属于上等或下等，一律都在一纸空文上用劲儿呢？近年米价昂贵遍及到整个天下，皇帝我对此多方做筹划。赋税已经免除了，可米价上涨还跟从前一个样。开仓放粮了，可市面上的物价仍然很高。这难道都因主管部门贯彻执行不妥善而造成的吗？有人还主张停止官方采购来缓解那粮价上涨的局面，严厉惩办囤积粮食等着卖高价的商户来使粮食流通起来，禁止富有的人家牟取暴利，用来使粮食更多地投放出来。这些主张果真切合事态的实情吗？官方采购停下来，各地的粮仓出不了几年就会禀告匮乏，出现紧急情况又凭什么去应对呢？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粮食，贫困的百姓就会仰起脑袋等着官仓救济。假设一粒粮食都

没有,主管部门能够干坐在那里而不进行补救吗?产出的粮食只有这固定的数目,积聚到官方手中必定就在百姓那里形成亏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然而积聚在官方手中的弊害和散布在百姓那里的好处,应当周密地做考虑。但不彻底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凭什么能使官方和百姓两方面都有利呢?至于水灾旱灾等局部灾害,皇帝我不吝惜国库的储备款目,广泛地进行救济,可是实惠并没落到下面百姓的头上,其中的弊病又在哪里呢?山东一带受灾较严重,先后把应运到京师的粮食转作救济用,还拨发国库的银两,费用已经不计其数了,又命令大臣和监察官以及谏官前去主持救灾,可仍百姓流亡,尸抛荒野,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安抚招徕并聚集稳定住这些人呢?古代救荒的政务切合目前事体而可以行用的又有几项呢?事先该做出的准备,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但唯独就不应去思考善后的对策吗?趁春雨对土地的滋润,招集流亡的人,借给他们种子,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耕牛与农具,播种再加强田间管理,等待秋天大丰收,这还不是紧要的事务吗?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对实际用处很有帮助而可以进前禀告的主意吗?治理黄河,由水路转运粮食,用来向京师提供官饷军饷。但黄河由河南省流入徐州地带,水势迅猛湍急,大漩涡四处撞去,人工修成的堤岸处处都很危险,再加上闸门堤坝到处都是,水势不能直接宣泄下来,淤积的河沙一天比一天堆集起来,河心一天比一天增高,不得已再加高堤岸防御它。近来听说淤积的河沙距离两岸有的仅仅三四尺或五六尺,偶然碰上水势猛涨,一定会有决口泛滥的祸患。黄河出问题,由水路往京师运粮食也会跟着出问题。到底采取什么办法就能把河沙冲走,来使水流通畅呢?打算再动用河兵,驾驶船只,使用器具,每天在河中挖沙疏浚,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吗?除去加高加宽堤岸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好办法能一劳永逸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在家中研习学问,应当怀有深明治国的主体和了解治国的关键,以求在当代显现出自己的谋略。可却在辞赋文章上用力气,轻视经典的修身治国理论,对捞取官位急得很,在名声上争来争去。讲论文章体式就看重华丽的词藻而违背实际的义理,对于圣贤道德的实体没有能在内心深加体悟而在行事上加以修明的地方。这是因为教化还没宣明

吗?或者是积习难以扭转过来呢?要广泛思索那些端正风尚和肃正人心的谋略，恰切地陈述出来，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5. 清高宗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

〔五月初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抚御鸿图，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嘉与海内臣民，懋登上理。深惟政治之易弛，风俗之易奢，士或荒于经术，备或懈于边陲。保泰持盈，其道曷以?夫图政本于立心，非大公无以明其体；亮工斯以熙绩，非纯勤无以励其用。朕奉三无私，以治天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康宁。群工之靖共匪懈者安在?偏私之习，怠忽之端，何以防其渐?蠲租赐复，无追呼矣；深耕易耨，无荒莱矣。而衣食之谋，盖藏之计，恒鳃鳃焉廑不急之虞。乃环顾闾阎，小民服尚鲜华，市陈技巧，百用所需，胥过其节，则侈靡之俗蠹之也。返朴还淳，将非空言所能喻，因而为之法制禁令，不几滋之扰欤?孰为之启迪而倡导之也?胶庠之士，乐化育而咏作人，经术昌明，无过今日。第考之于古，议大政，断大狱，决大疑，辄引经而折其衷，此穷经之实用也。今欲矫口耳之虚文，以致实用，其要安在?幅员所暨，渐被无垠，若海疆，若朔漠，若蛮陬绝徼，曷尝不列斥堠，置戍守!而将嬉卒玩，其申警于未然，绸缪于先事者何若?《书》曰有备无患。安可以烽燧久销，而视备边为文具也?凡此皆关于制治保邦之要。久安长治之道，莫切于此。多士其以素所蕴者，剀切陈之，毋拘毋讳，朕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驾驭宏大的治国蓝图，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希望与四海之内的臣民盛大地步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深深地想来，政治很容易废弛，社会风尚很容易变奢华，读书人有的会在经典的修身治国理论上不用力，军事防卫有时会在边疆地区很松懈。保住太平局面和守护住盛大功业，那具体途径该从哪里做起呢?谋划国政是从确立起心念出发的，除去大公无私就没办法明了那主体；显赫地代替皇天完成任务，这正在于振扬起各种政绩，除去一味辛勤就没办法激励那施用。皇帝我奉守日、月、星毫无私意、

普照天下的原则去治理天下，从早晨一直到太阳偏西都顾不上休息片刻。而众臣僚恭敬地履行好职责，总不懈怠，又该表现在哪里呢？偏私的习气和懈怠的苗头，该用什么办法去防止它们恶性发展下去呢？免除租税又准许不服劳役，没有催交赋税的事情了；深翻土地又加强田间管理，没有荒芜的田地了。然而衣食的谋划，粮食储存的计虑，总是恐惧地为世上对它们不重视而一再地忧虑。于是环视民间，普通百姓在穿着上崇尚鲜亮华美，市面上陈列着各种精巧的奢侈用品，各种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都超过了制度规定，这都是奢华淫靡的社会风气在侵蚀着人们啊！返回到质朴淳厚上来，并不是光用话语就能晓喻的，因而针对这种现象制定出法律禁令来，这不接近对百姓的搅扰吧？应该由谁来对世人进行启迪，予以倡行化导呢？各级学校中的士子，为受到的培育而感到高兴，咏赞国家造就人才，经典的修身治国理论兴盛显赫，没有能超过当今去的了。但考察古代，议论朝廷的大政，审断重大的案件，裁断重大的疑难事，一上来就引用经典的说法来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理，这才是彻底通晓经典的实际用处呢！如今想矫正说一说、听一听的虚浮的文章，归入到实际用处上去，关键的做法究竟在哪里呢？国家疆域所延及到的地方，渐渐在达到无边无际的程度，像东南海疆，像北部沙漠，像南方最边远的地带，何尝不列布军事据点和设置戍守部队呢！可将领却享乐，士兵却松懈。在没发生事变以前就申明警戒，在事先就做好准备，到底该怎么办呢？《尚书》中讲：有防备才没有祸患。怎么可以烽火台上传递消息的烟火常久泯灭，而把边境防卫视为一纸空文呢？以上这些事体都关系到在动乱发生前就制订好治理措施，在危亡出现前就保住国家的紧要之处。长治久安的做法没有比它们更为紧切的了。你们这些读书人用自己平素所蕴积的谋略，切中事理地做出陈述来，不要拘束，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6. 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

〔四月二十六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缵承鸿业，勤思上理。缅惟自古帝王，上畏天命，下凛民岩，秉道以揆几，穷理以制事，凡所

以建用皇极，为表正万邦之本也。朕宵衣旰食，于天人感应之际，理道制治之原，整躬以率物，劝学以兴贤，念兹在兹，未得其要。兹当临轩发策，仁尔谠言。《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书》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天人合一之理，前圣盖昭著言之。顾天日在人之中，而人不知，故先儒曰：天即理也。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夫元亨利贞，仁义礼智，皆配四时言之。在天之天，虚而难索；在人之天，近而可求。然在人之天，即在天之天，无二理也，无二道也。人无一日不在理、道中，本无理、道之可名。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已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和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朕敕几毖治，盖无日不奉天以乾乾。《五经》、《四子书》而下，濂洛关闽之学，亦尝深究其源流，而微窥其得失矣。其粹言可以几道者，可得切陈欤？古言孟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上之所视向，下之所效法从之。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朕临御十有九年于此，勤勤求治，罔敢暇逸。而民风未尽淳，俗尚或即于偷者，其咎安在？夫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虚张治具，粉饰文为，非所以为治也。条教号令悬诸象魏者，求治之迹，而非致治之原也。所与朕共理天下者，内而公孤卿士，外而牧民长伯，皆俨然临于民上。而或者视自治、治人为二事，毋乃阂于理而暗于事欤？深宫燕闲之地，朕弗敢康。所赖以辅予治理、左右有民者，其省身克己之道何若？夫实心实政，夫人能言之，然必返瘖寐而无惭，而后对大廷而不愧。朕念此至切矣，多士来自田间，且分治人之责，宜有敷陈，用觇素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制义，即古者经疑、经义之意也。文章本乎《六经》，解经即所以载道。《易》曰修辞立其诚，《书》曰辞尚体要。文之有体，不綦重欤？朕于场屋之文，屡谕以清真雅正，俾知所宗尚久矣。乃者或逞为汗漫之词，徒工绮丽，甚至以汉唐词赋阑入其中。律以大雅之言，甚无当也。文之浮薄，关于心术，王通论之详矣。今欲一本先民，别裁伪体，岂惟文治廓清，抑亦所以明经术而端士习也。陆机云，固无取乎冗长。韩愈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皆圣人

辞达之义也。司衡之去取，其可不黜华崇实以加之厘正欤?《记》曰：官先事，士先志。士也者，养之于庠序之中，登之于庙廊之上，以备驰驱之用而收任使之效者也。民俗之厚薄，视乎士风之淳漓。士习之不端，由于士志之不立。荣进素定，干禄之学，圣人弗许。志一不立，而寡廉鲜耻，卑污之行随之。居家或不免武断之习，应试或尚怀干进之私。浮薄流传，竞相仿效，士习将何由而正乎!国家百余年，养士之典极隆。迩者复命各省学臣，举行选拔，于其来也，行廷试之典，慎遴选之方，分途擢用。所望于士之鼓舞奋兴，至深且渥矣。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其贡入成均者，宜何如其陶淑而乐育之，无俾虚縻廪饩欤?师儒之官，教化所出。乡国学中，皆于下第内采其遗珠，畀以秉铎。将内则陈敬宗、李时勉，外则胡瑗之苏湖教法具在，或亦有用以端饬士习者欤?凡此数端，内而天德，外而王道。文章者，性道之华；学校者，风化之本。载籍所传，讲肄所及，尔多士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帝业，总去思求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遥想自古帝王往上畏惧皇天的命令，往下对民心不齐引起高度的警惕，秉持大道去揣摩隐微的情态，穷尽事理去规划好政事，都是用来确立起并施用帝王的最高行为准则，作为端正天下各地的根本啊!皇帝我早早就起身，很晚才吃饭，对于皇天与人间交相感应的关系，治国大道和施治措施的本原，修养好自身来给万事万物做出表率，激励研习学问来兴用贤才，想的只是这些，要做到的也只是这些，但还没获取到那关键所在。如今正值亲临殿廷颁布策问，期待着你们这些应试者的正直言论。《易经》上说：走在天象的前面而天不违背他，走在天象的后面就顺从天时行事。《尚书》中讲：只有皇天听得最清又看得最明，圣帝明王只管去效法皇天，臣僚只管去承奉帝王的命令，百姓只管去顺从治理。对皇天与人间交合而为一体的道理，古代圣人差不多已经非常明确地做过论说了。但皇天每日都在世人心中，可世人却不晓得这一点，所以前代的名儒就指出：皇天也就是事理啊!西汉的董仲舒认为善于讲论皇天事体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上确有证验。又说大道的最高本原出自皇天，皇天不改变，大道也就不

改变。对起始、亨通、和美、纯正以及仁德、正义、礼法、明智，都配属春夏秋冬来做讲论。在天上的那个天，虚渺而难求索到；在世人心中的那个天，切近而容易求取到。然而在世人心中的那个天，也就是在天上的那个天，并不存在着两套事理，也不存在着两种大道啊！世人没有一日不处在事理和大道当中，原本上就不能用什么名称把事理和大道给叫出来。自从宋代各位名儒降现到世上，于是就产生了道学这一专称。然而当时对尊崇德性和通过勤学掌握大道，已经讥刺他们把二者硬行分成两条途径了，可那些标榜对经典义旨做出专项概括的人以及随声附和的人，就把这借作树立起名声的资本了，但大道却更加昏暗不明了。如今想使古代圣人贤人的精微论述和重大义旨明晰得如同太阳与星辰，研习学问的人应当在哪里狠下功夫呢？皇帝我谨慎地对待天命，时时处处保持警惕，在治理上高度戒惧，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奉从皇天而忧虑加小心。从《五经》、《四书》以下，到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和朱熹的学说，也曾深究他们的本源和流变，稍略窥探出各自的得失所在了。他们精粹的论说确能接近那大道的地方，你们可以恰切地做出陈述来吗？古人讲，水杯是圆形的，水就跟着成圆形；水杯是方形的，水就跟着成方形。上面的人所看重关注的东西，下面的人就跟在后边加以效法它。所以强调端正好朝廷，用来去端正百官；端正好百官，用来去端正天下的百姓。皇帝我登上帝位到现在已经十九年了，十分勤勉地谋求大治，不敢安逸享乐。然而民间风尚还没完全变得淳厚，百姓看重的对象有的还归入浇薄，其中的过错究竟在哪里呢？施布政事不在于说来说去，只看大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虚飘地张布开治理的设施，拿文采那一套做涂抹掩饰，并不是施行治理的举措啊！法规条例和政令公布在宫殿前面的门柱上，这只是谋求大治的表面做法，而不是实现大治的本原所在啊！共同与皇帝我治理天下的人，在朝廷上的公卿大臣，在地方上的各级长官，全都威严地置身在百姓的上面，可却有人把修养好自身、治理好别人看成是两码事，这恐怕是对道理还隔着一层又对政事仍很昏昧吧？在深宫平常闲居的地方，皇帝我决不敢享乐。那么赖以辅助皇帝我施治而身边有所管辖的百姓的那些官员们，在反省自身、

克制本人的做法上到底该怎么样呢?用实心去处理好实政,人人都会这样讲,然而一定要返归到睡去醒来都不感到羞惭的状态,然后在殿廷上做对答也毫无愧色。皇帝我考虑这一条已经深切到极点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来自民间,眼看着就要承担起治理百姓的责任,应当具有做出陈述的东西,以便皇帝我察看你们平常所蕴积的本事。国家设立科目,选取士子,最重视八股文,这也正是古代解释经典疑难和经文大义的那种用意啊!文章从《六经》衍化出来,解说经典也就是用来载述大道。《易经》上说:锤炼好文辞,表达出那种至诚来。《尚书》中讲:文辞看重体式要义。文辞具有体式,不也太重要了吗?皇帝我对于考场上写成的文章,多次用清爽真切、典雅纯正做训示了,使应试者明了那宗奉崇尚的对象已经时间很长了。可近来却有人肆意编造那笼统浮泛的词句,只在绮丽上显水平,甚至把汉唐的词赋硬行塞到里面去。拿宏大雅正的作品来做衡量,简直太不符合了。文章的浮华浅薄,关系到心术,隋朝的王通对此已经做过详尽的论说了。如今打算完全以古人为典范,区别裁定恶劣的文体,这哪里仅仅是澄清文治呢?也是用来宣明经典的修身治国理论并且端正读书人的习尚啊!晋朝的陆机强调:原本上就不必去追求冗长。唐朝的韩愈也讲:统括起《六经》的义旨来写成文章。这都是孔老夫子文辞要明晰晓畅的大义所在啊!主考官决定录取与否,能够不斥退浮华、崇尚朴实而去加以厘正吗?《礼记》上说:官员要把供好职放在第一位,读书人要把志向放在第一位。读书人是在各级学校中予以培养,再选拔到朝廷上,专供分派任务去完成并且收到任用委派的实效的人啊!民间风气的淳厚与浅薄,正以读书人习尚的纯正与衰败为转移。读书人的习尚不端正,来自读书人的志向没树立起来。荣耀和高官显爵,这是皇天早就定好了的。捞取到一官半职的那套学问,圣人是不赞许的。志向一不树立起来,就会寡廉鲜耻,而卑劣污浊的行径就跟在后面产生。在家乡有的人就免除不掉欺压良民的恶习,应试时有的人就还心怀捞取到一官半职的想法。浮华浅薄的这套玩艺四处蔓延,竞相加以效仿,读书人的习尚可会从哪里得到端正呢?国家一百多年以来,培育读书人的制度规定极为隆盛。近来又命令各省主管教育的长官全

面进行选拔，在他们来到京师之前，就行用殿试那样的规制，审慎地对待遴选的方法，划分门类加以提拔任用。期望读书人鼓舞奋起的举措，真是深切到极点又优厚到顶端了。太学这一国家最高学府是关系到贤士能否造就出来的地方。被选送到国家最高学府的人，应当怎样接受陶冶化导和培养教育，不让自己白白浪费消耗国家提供的生活用品呢?担任教官的人，是教化取得成效的源头所在。各级学校中都在未被录取的举人中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教官。在国家最高学府里，像明朝的南京国子祭酒陈敬宗、国子监祭酒李时勉那样的人，在地方学校中，像北宋胡瑗的苏湖州学教育方法都明摆在那里。仿照他们去做，也有用来端正读书人习尚的地方吧?总共以上几个方面的事体，在内心便是皇天授付的德性，在外部即为称王天下的大道，文章是德性与大道的鲜明体现，学校是风尚化导的本源所在。凡属经典中所传述和讲习中所涉及到的这些方面的东西，你们这些读书人要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7. 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

〔五月初十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缵承大统，临御万邦，宵旰忧劳，勤求民隐。惟恐一夫失所，有负上天为民立君之意。是以二十二年以来，兢兢业业，罔自暇逸，亟欲登斯民于衽席之安，措天下于荡平之路。此固宫廷寤寐所堪自信，亦薄海所共见闻者。顾臣邻尚少笃棐之忱，士子犹多嚣凌之习。四方之风俗，未尽淳庞；两河之疏筑，尚烦区画。皆朕所念兹在兹者。多士对扬休命，何以副朕之虚怀采纳乎?《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盖庶官所治之事，皆天事。必夙夜匪懈，无旷废之职，斯可以凝庶绩而熙帝载也。朕日理万几，不遑暇食，所冀公孤卿尹，下逮庶司百职，各矢靖共之义。君臣交勉，上下志同，以臻郅隆之治。今朝庙之地，未必尽矢寅恭；曹署之间，或至相安逸豫。敬尔在公之义谓何?夫纪纲不肃，何以振颓靡；率作不勤，何以戒丛脞。砥砺官方之道，将何从与?士也者，四民之首，如表臬焉。表正则影正，斯其所系非浅尠也。朕屡降明诏，谆谆以勤励纯修、

精研实学为务。乃今者读书敦品之士虽多，而标榜声华、追逐时好者，尚未尽绝。其故何与？夫心术不正，则聪明才智，适以助其诐淫邪遁之资。虽文彩可观，而本根已拔。曷足重乎？自科目设而流弊渐滋，然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有曰，非科举累人，人自累科举。盖梯媒幸进，原非设科本意，未可因流弊而追咎立法之不善也。将欲拔本塞源，使华士诎而真儒出，其何道而可？制治之原本，莫重于人心，转移则由乎风俗。《礼》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古之化民成俗，如此其至也。是以风俗醇厚，民生乐业，奸宄不生，讼狱衰息，为不善者唯恐人知。休哉，何风之隆也！我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教养倍至，令行法立，纲举目张。其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者，亦綦备矣。然而民心未底于淳，民习未归于厚，武断乡曲，讦告长官，甚至顽梗不驯，罔顾大义，恩已厚而不知感，法已极而不知畏。何教之不先，率之不谨欤？程子云：教人者，善养其心；治民者，导之敬让。必如何而革薄从忠，以臻道一风同之盛也？国家岁漕东南四百万粟，以供天庾，必取道于黄、运两河。而滨河州县，民生安危系焉，则宣防底绩，其首务也。朕昼夜廑念，忧之至深，筹之至熟。兹者亲莅河干，自维扬上溯徐、邳，畴咨荒度。凡河臣思虑所未及，经理所未善者，朕详悉指示，并分命大臣督率缮治。或增筑堤堰，或疏导淤沙，或开浚支渠，或添建涵洞。近江者引之入江，近海者纳之归海。俾烝民早离陷危一日，则朕乃稍释殷忧一日也。然堤防虽设，而修守者或不能因时趋事；物料虽齐，而抢护者或未必咸归实用。大吏或安于因循，漫不省视；汛弁或狃于旧习，竞相侵渔。近虽竭力整饬，渐知法守，然何以使疏瀹各合机宜，堤防悉皆巩固，上以裕节宣之方略，下以尽董筑之实心欤？凡此数事，皆班朝莅官之要道，兴行育材之讦谟，型方训俗之良规，运道民生之至计。多士学古入官，讲求有素。其剴切详明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帝室统系，统领天下各地，从早到晚忧虑操劳，总去思索百姓的痛苦，唯恐有一个人失去了他那既定的位置，辜负了皇天特为人间百姓树立起君主的意旨。所以二十

二年以来，兢兢业业，不敢自行安逸享乐，迫切地希望把当代的百姓带入到万分安宁的境地，把整个天下引领到广阔平坦的道路上。这固然是皇帝我在宫廷中睡去醒来都足可自信而远至天涯海角的人也都见到或听说的事情。然而身边的大臣还缺少忠诚辅助的心念，读书人仍然存在着很多嚣张地做鼓噪、不把上面当回事的恶习。四方各地的社会风尚还没完全变得淳厚质朴，黄河与运河的疏浚营筑还需要认真地做筹划。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皇帝我集中去思索又集中要解决的问题啊！你们这些读书人对答称扬天子的美好命令，该拿什么来切合皇帝我虚心等着采纳的愿望呢？《尚书》中讲，不要使众官员的职守荒废掉，皇天的任务要由世人代替去完成。这是因为众官员所处理的事务，都是皇天要做的事务啊！必须从早到晚不懈怠，不荒废自己的职守，这才能够取得各种政绩和振扬起帝王的事业啊！皇帝我每天处理繁重的政务，根本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只希望公卿大臣直至文武百官各自誓必要奉持恭敬地履行好本人职责的古训，君臣彼此勉励，上下志向相同，用来进入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可如今朝廷上的各个部门，未必就全都誓必做到虔敬恭谨了；各个机构之间，有的竟至彼此相安无事，逍遥自在。这样一来，恭敬地履行好本人职责和心念都在公家那里的古训又叫什么了呢？朝廷纲纪不肃正，凭什么能振刷颓靡的风气呢？在承奉君命办好政事上不勤勉，凭什么能对繁杂苛细的现象引起警戒呢？激励为官之道的做法，究竟该依从哪些呢？读书人是四类平民的第一类人，就像标竿啊！标竿竖得正，影象就跟着显得正。这表明读书人所关系到的国家事体决非浅显微小啊！皇帝我多次颁布明晰的诏令，反复嘱告读书人要把经常激励自己修养好纯正的品德、精详地研核实际有用的学问作为下大力气的事情。可现今研读经书、加强品德修养的士子尽管很多，但标榜虚浮的名声、追逐世俗所喜好的玩艺的人，还没有一个都不剩。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心术不纯正，聪明才智恰恰就会成为助长邪僻淫靡又伪装掩饰的那类行径的资本。尽管文彩可观，但根基已经被拨歪了，哪里值得让人看重呢？自从科目设立以后，相沿而成的弊害逐渐变得严重了。然而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过这样的话：并不是科举制

度给人造成了害处，而是人自己给科举制度带来了弊病。这是因为把科举当成阶梯和媒介，侥幸得到朝廷进用，本来并不是设立科目的用意所在，不能依据相沿而成的弊害去责怪制度定立得很糟糕啊！如今打算把坏根子铲除掉，堵塞住源头，使浮华的读书人退到一边去而真正的儒士涌现出来，采取什么办法就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制定好施治措施的最根本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比人心更为重要的了，而转变人心又取决于社会风尚好起来。《礼记》中说，司徒官修明六种礼仪来节制百姓的情性，宣明七个方面的教化来兴行起百姓的美德，整顿好八项政令来防止过度享受的行为，统一起道德而使社会风尚相同。古代化导民众、形成社会风尚，就像这样地周密啊！因而社会风尚淳厚，百姓安居乐业，内奸外贼不产生，打官司的现象减少止息，干坏事的人唯恐被别人知道。真是太美好了呀！社会风尚是多么地隆盛啊！我们国家保持太平已经一百多年了，教化养育达到了顶点，政令颁行，制度定立，纲举目张。用来把民众纳入行为规范中的措施也极其完备了。然而民心还没达到纯正的地步，民间习尚还没归入厚道的范围，在乡间欺压良善，攻击诬告地方长官，甚至硬行抗拒，竟不服从，根本不去考虑君民之间的准则，朝廷恩德已经很深厚了，却不知道去感念，刑法已经定到极限了，却不知道该畏惧。为什么教化还这样地没做在前面，督导还这样地松弛呢？北宋的程颐说：教诲别人的人，要善于培养他们的思想；治理民众的人，要引导他们能恭敬谦让。必定要怎样做，以便革除浇薄恶习，归向忠正，达到道德一致又风尚相同的盛况呢？国家每年要从东南地区经由水路转运四百万石粮食到京师，用来满足国家仓库的需要，必须取道黄河、运河这两条河流。而靠近这两条河流的州县，民众的安危与这两条河流紧密相关。这样一来，疏通河道与防止水灾就成为头等大事了。皇帝我日夜惦念，忧虑特深，筹划得极为周全。现今又亲身到河边，从扬州往上一直走到徐州、邳县，进行询问和实地测量。凡属主持修河事务的臣僚还没想到的问题，安排得还不妥当的事情，皇帝我详尽地当面做出指示，并且分别命令大臣督察并指挥修缮整治事宜。或者增筑堤堰，或者疏导淤积的泥沙，或者开挖支渠，或者增建涵洞。靠近长江的地

方就把水流引入到长江中去，靠近大海的地方就把水流疏导到大海中去。使百姓提前摆脱危险一日，皇帝我就把深重的忧虑提前一日稍略放下来。然而堤岸防护虽然设布开来了，但修筑守护的人有的却不能根据时机赶紧办好该办的事情。物料尽管很齐备了，但负责抢险维修的人有的却未必就全让它们归入到实际用项中去。地方大员有的在按老样子办事上心安理得，任凭它去而不进行视察；防汛的士兵有的在旧恶习上很习惯，争相侵吞百姓的资财。近来虽然竭力进行整顿，逐渐知道法规和职守了，然而采取什么办法能使疏浚各自切合机宜，堤岸防护全都坚固，往上来使宣导调节的方略更充分，往下尽到负责营筑的实际用心呢？总共以上这几种事体，都属于置身朝廷班列、担任官职的切要准则，振扬品行、培育人才的重大谋略，给各地做出榜样、训导社会风尚的良好规则，解决好运粮水道和民众生活的最紧切的计虑。你们这些读书人研习古代，进入官员的行列，讲论研求已有深厚的功底，要恰中事理并详明地来做出对答，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8. 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

〔五月初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祗承帝命，实怀永图，审听高居，惟勤至化。自缵膺鸿绪以来，早夜孜孜者二十五年矣。比虽遐陬款化，戎服敉宁，风雨和甘，阴阳式协，顾日中之戒宜凛，载舟之喻宜思。公卿大夫，与朕共襄治理者也。食德服畴之侣，宜何如启佑而安辑之？尔多士利用宾王，当此三道，伫延谠论，以沃朕心。帝王心法、治法之要，莫备于经。其源流分合，厥论详矣。若夫《易》著六象，《书》标七观，《诗》兼三训，《礼经》垂三种，《春秋》明五例，能约举其条目欤？儒生夙昔诵习，果何以究乎性情政治之本，得失同异之归，以黼黻盛明，羽翼传注欤？《记》所云入其国而教可知者，又何道之从？科目所以求才，而文艺之淳漓，人品心术见焉。磨勘之申严也，将以蒸蒸日进于雅驯，以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乃应试之文，犹不免夫支离疵谬。岂习尚之异趋欤？抑学臣之董率于平日者，有未至也？根之深者其实遂，辞尚体要，陈言务去之谓何？士贵自振拔耳，岂古今人果不相

及欤?朕轸念民依,惟足食是廑。常平、社仓之制,何尝不设法举行!顾积贮久,则有司以浥烂为虞;出纳频,而胥吏得因缘丛弊。于是乃藉其称贷之名,隐其缺额之实,安望蓄积多而备先具乎?京师设厂平粜,岁且周矣,而谷价未见平减,意者囤积之不免欤?市价擅奇赢,何以除之?泉流表其不匮,懋迁通其有无。岂竟无长策欤?古者屯田之法,筹饷兼以防边,此非论于今日幅员无外者也!汉唐屯营,其地安在?调戍之役,何缘而昉?或佃或守,且战且屯,史策所传,当究厥理。方今平定西陲,扩地二万余里,辟展以西,耕屯相望。兹叶尔羌诸城,甘澍应时,农功大起。天贶既渥,将使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古法或有宜于今者,可兼采欤?之数者,士习民莫之本,边防食货之原。朕一日二日,冀以保泰持盈。尔多士修絜博习,其必有以明其指略也。各悉对著于篇,勿猥勿并,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承奉天帝的命令,确实心怀长远的谋划,审慎地听取各地的反映,高高坐在朝廷上,只去为那最美好的教化而操劳。自从继承并担负起盛大的帝室统系以来,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已经有二十五年了。近来尽管最遥远的地区也前来归服,军事行动止息下来了,风调雨顺,阴阳和谐,但太阳运行到天空正中还会往西偏斜的戒条应当引起高度的警惕,老百姓像水可以托起船只的比喻更应当深思。公卿大夫是辅佐皇帝我共同进行治理的人啊!依靠祖上德业拥有田产而从事农耕的那批人,应该怎样去启发佑护并安抚聚集起他们来呢?你们这些读书人才尽其用,被选送到天子面前,正值按规定写出各类答卷的时候,十分殷切地在访求你们的正直言论,用来启迪皇帝我的想法。帝王的心治大法和施治大法的纲要,没有能比经典中载述得更为完备的了。本源与流变,分划与聚合,经典中也论述得相当详尽了。至于《易经》彰明六爻的爻象,《尚书》标揭可供借鉴的七个方面的事体,《诗经》同时有三个学派的解说,《礼经》还传下来三种,《春秋经》阐明五种义例,你们能够约略列举出具体的条目吗?儒生从早到晚诵读研习经典,到底该怎样去究明性情和政治的本原,得失与异同的旨归,来给盛明的学术增添光采,辅助古

代的注解呢?《礼记》中所讲的进入他的国境而教化程度就可以观察出来,又该依从什么方法呢?设立科目考试,目的在于求取到人才,而文采技艺的淳正与浅薄,人品和心术也可以从中看出来。对试卷进行复查再审阅,是想叫读书人蒸蒸日上,进入典雅纯正的境界,以求达到古代创立起本人学说的那类人的水平。可应试的文章仍然免除不掉支离破碎、谬误横生的弊病。这难道是习尚不对头造成的吗?或者是各省主管教育的长官在平时督导上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呢?根须扎得深的植物,它那果实就结得好。文辞应看重体式要义,前人已经讲烂了的话语务必要摒弃,这在那类应试文章面前可该叫做什么呢?读书人贵在自行振扬挺立出来,难道古代人和当代人真就无法相比吗?皇帝我深切地关注百姓的隐痛,只管去反复考虑他们能吃得饱。常平仓和社仓的制度,何尝不设法去推行开呢?但储存的时间过长,主管部门就把粮食霉烂变质作为忧愁事了。拨出收进得太频繁,而办事人员便得以乘机制造出许多的弊病来。于是就假借足数借贷给百姓的名义,隐瞒那缺额的实情。这哪里还能指望储存多而事先就做好准备了呢?京师设立购粮站来平抑粮价,全年做得差不多很周全了,但粮价并未看到平稳或降下来,想来囤积粮食等着卖高价的商户还存在吧?市价被某些人控制住高低的现象,该用什么办法去除掉呢?钱币流通是表明它不匮乏,贸易活动是沟通有无,难道竟没有高明的对策吗?古代在边区屯田的制度,用来筹集军饷又同时防守边境,这并不是在今日疆域都归我大清统辖的时代需要讲论的呀!但汉朝和唐朝的屯田与营田,具体地点又在哪里呢?轮番派人去戍守的这种兵役,由于什么原因而最先出现的呢?或者从事农耕,或者进行防守;一边作战,一边屯田,是史书上所记载的事情,应当究明那道理所在。如今平定了西部边疆,扩展领土两万多里,在新开辟和拓展地区的西部,屯田耕种的据点一处连一处。现今叶尔羌等城邑,甘甜的雨水准时降下来,农业生产大规模兴起。皇天的恩赐既已深厚了,就应当让田地没有发挥不出来的效益,让人们没有不全使出来的力气。古代的做法或许有适合今天的地方,能够对它同时采用吗?以上这些事体,都属于读书人的习尚和众百姓的疾苦的根基所在,边境防卫和

粮食货币的本原所在。皇帝我每天处理好繁重的政务，希望由此来保持住太平局面，守护住盛大的功业。你们这些读书人修养自己的纯洁品行，广博地研习古今的学问，必定能确有理据地阐明那义旨和方略啊！要各自详尽地做出对答来，写在答卷上，不要繁杂凌乱，也不要笼统混在一起讲，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9. 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祇荷天、祖鸿庥，光缵丕绪，地大物博，际盛思艰，上理勤求，永怀考赞。深惟心源治迹，道在交修；物力民庸，功蕲攸济。尔多士资言成信，亮所稔闻，尚殚矢陈，用酬延伫。圣学之传，首崇心性，《虞书》十六字尚矣。《大学》言心不言性，而朱子序《大学》，言性独详。《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朱子序《中庸》，言心独详。将非交引互发，义即偏而不举欤？性者，心之神明；心者，性之郛郭。是言性足以统心，而道心与人心何以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何以歧？张载曰：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然自孟子以性善辟百氏之说，而性恶三品，后儒犹事纷呶。岂子舆力挽狂澜，意严矫枉，虽尼山相近相远之训，不可以语中人以下欤？史有二体，纪传法《尚书》，编年法《春秋》。朱子本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旧，大书分注，约为《纲目》，囊括一千三百余年史事，为编年正轨，足便览观。厥后薛应旂有《续通鉴》，商辂有《宋元续纲目》，能不失二书初指否？明《通鉴纂要》，本出自官辑，与顾锡畴、王世贞、陈仁锡辈取备兔园册子不同，而隶事详略，亦未完善。已命馆臣厘次分进，几暇手批评骘。凡前史义例未安，必往复刊定，勒为《辑览》一编，嘉惠来许。有志三长之学者，夙习《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诸家之言，能研核折衷而切指其利病否？粟粜盖昉乎古质剂致民遗意，考其委积所在，若乡里门关、郊里野鄙、县都，厥用曷分？后此三仓，建置相仍，在官在民，孰为便利？唐之和籴，宋之寄籴、赍籴等名，一切权宜取济，而法随人弊。其戾于前规者安在？国家升平康阜，旸雨应时。第一隅歉获偶闻，动需挹注。常平社谷所贮，既命所司以时贷拨，近复出太仓以平市值，截漕艘以支给赈。且采运奉天、豫东羡粟，以广灌输。擘画不遗余

计，然自帑困充牣，而或大贾居奇，驵牙登垄，因缘蠹耗，检举难周。矧事由补救一时，非可援为经制，则所谓求裕民足食之本，策果奚先？沟洫所以备水旱、时蓄泄也。大禹决川距海，必兼浚畎距川，未闻以坟壤涂泥异制。暨《周官》遂人则捐膏腴，匠人则治沟洫，且多于赋，意至深远。近世言水，猥详于南而略于北。讵不以南居泽国，北处中原，又积涝鲜逢欤？不知水无所妨，旱无所潴，高原之患，势均泽国。前者中州山左，工已递兴。比因畿辅秋霖余潦，滨河下隰之区节宣未畅，屡遣大臣莅事疏导，庶几消悯遏而利耕氓。顾沧、津犹可泄尾闾，而淀、沽或难回釜底。捍田弃地，何道之从？夫溯邹峄之圣涯，披唐虞之治境、四酺赢而野多秉穗，百川涤而田不污莱，隆郅之图，跂予昕夕久矣。尔其诵言所学，胪著于篇，毋泛毋隐。朕亲裁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承受到皇天和祖宗的盛大福佑，继承并光大一脉相传的帝室统系，国家地大物博，正处在鼎盛阶段但更考虑到守业的艰难，总去谋求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永远牢记考察古代圣帝明王的做法，协助天地化育。深切地想来，心性本源和治理的外部迹象，二者统一的办法在于交相修明；物力和民众的劳作，二者结合成一体的功绩应达到彼此补充。你们这些读书人拜见天子要借助言论证明自己确有才干，明晰地讲出平素所闻知的东西，还要竭尽心力誓必做好陈奏，用来报答朝廷的延揽与厚望。圣帝明王大学问的递相传授，首先重视心性，《尚书·虞书》中那十六字格言由来已久了。但《礼记·大学》篇讲论心念却不讲论本性，而南宋朱熹给《大学》做注写序，却偏偏讲论本性特详明。《礼记·中庸》篇讲论本性却不讲论心念，而南宋朱熹给《中庸》做注写序，却偏偏讲论心念特详明。这莫非是交相引证彼此阐发，义旨侧重一方面就不再全都列举了吗？本性是心念的主宰，心念是本性的外围。这表明讲论本性就足以把心念统括在里面，但道心和人心又为什么做出区分来呢？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又为什么不一样呢？北宋张载强调：气质之性，君子对它有不作为本性来看待的。然而自从孟子用世人本性天生就良善来驳斥其他各个学派的说法，而世人本性天生就邪恶的观点以及世人

本性存在三个品级的主张，在后世名儒那里仍然争论不休。这难道是撰写《大学》的孔子弟子曾参力挽狂澜，意在严肃矫正偏差的东西，即使孔老夫子关于人性本来相接近而习染使它拉开距离的训条，也不可以对中等以下的人做讲论吗？史书有两种主要体裁，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取法《尚书》而来，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效仿《春秋经》而来。南宋朱熹依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文，用大字书写事件，下面又用小字叙述详情，提炼浓缩成《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囊括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成为编年体的标准编撰形式，非常便于观阅。此后明朝的薛应旂撰有《续通鉴》，商辂撰有《宋元续纲目》，它们做到了不违背司马光和朱熹那两部著作最初的编撰宗旨吗？明朝李东阳的《通鉴纂要》这部书，本来出自官方的辑录，与明朝顾锡畴、王世贞、陈仁锡那批人撰写同类书籍只供遇到疑难来查找一下并不同，但编排史事的详略处理还不完善。已经命令馆阁臣僚厘定编次，分段进呈，在闲暇时皇帝我亲笔做批点做评判。凡属前史在义例上并不妥当的地方，必定翻来覆去进行刊定，勒成《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给后来人留下有益的读物。有志在史才、史学、史识这史家三大特长的专门学问上下力气的人，一向研习围绕《资治通鉴纲目》而出现的南宋尹起莘的《发明》、刘友益的《书法》、元朝汪克宽的《考异》、王幼学的《集览》等各家的说法，能否对它们研核并做出恰当的归纳总结而确切地指出各自的优缺点呢？由官方购进借出粮食大致上是起始于古代用买卖契约付给百姓所遗留下来的那种用意，考察周朝储存粮食的处所，像乡里门关、郊外原野居民区、方圆十里的县和由四县组成的都，它们是根据什么这样划定的呢？后世这三个处所的粮仓，仍然递相设立，把粮食聚集在官方手中或散布在百姓那里，要数哪种做法更为方便有利呢？唐朝的议价征购粮食，宋朝的在内地州县收购粮食寄存和预付钱物到秋后让交粮食，所有这类名目都是灵活做出适当的处置来解决问题，但制度却随人产生弊害。其中和原来的规定相违逆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我们国家一片太平，安康富庶，天气和雨水都按时节到来。但只要听说有一个地方偶然歉收，动辄便需要国家救济。各地常平仓和社仓储存的粮食已经命令主管部门按时

借贷拨付,近来又拿出国家粮仓的储备去稳定市面上的粮价,截流住运粮到京师的船只,改作赈济用。而且调拨奉天省与河南东部的余粮,用来扩大救济面。在筹划部署上什么对策都想到了,然而本来仓库储存是充足的,但有些大商人故意囤积等着卖高价,买卖中间人到田地里去私购粮食,内外勾结侵吞消耗,检举揭发很难每个人都给抖出来。况且朝廷采取上述措施是为补救一时间的紧急情况,不能够引作常规定制。这样一来,人们所讲的谋求那致使百姓富裕、粮食充足的根本所在,到底该把什么对策放在首位呢?兴修水利,目的在于防备水灾旱灾,按时蓄水或排水。大禹当年疏导众多的河流,使河水都流入大海里去,同时必定疏通田间沟渠,使田里的水都流到河里去,并没听说过依照高块地或泥洼地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啊!等到《周礼》却规定,遂人官负责对肥沃的田地征收赋税,匠人专管水利设施,而且比遂人征收赋税还重要。这种规定,用意极为深远。近世讲论水利工程,错误地对南方讲论得很详尽却对北方讲论得很简略。这还不是由于南方处于水乡,北方处于中原又很少遇上涝灾吗?但却不清楚水灾没有堤坝防护,旱灾没有蓄水处,高原地区的祸患同水乡一个样。前些时候河南省与山东省已经递次开工整治黄河,近来因为京师周围地区秋季大雨接连不断,靠近黄河支流的低洼地带调节宣泄水流不顺畅,多次派遣大臣前去负责,进行疏导,希望能消除水流受阻而泛滥的祸患,对耕田的百姓有好处。但沧州、天津一带还可以让河水流到大海里去,而东淀、西淀和各个沽口有的就难以回到中心部位去了。捍卫田地还是放弃田地,该依从哪种做法呢?追溯孔子和孟子学说的本原,进入唐尧虞舜那样的大治境地,盛粮的器具装得满满的,而田野里长出许多茂盛的谷物,各条河流得到整治,而土地不再荒芜,实现最隆盛的治理的谋划,皇帝我踮起脚尖从早到晚来期待已经时间很长了。你们这些应试者要陈述自己所学习的东西,逐条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要亲自进行裁定和择取。

40. 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1766)丙戌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缵绍丕基，诞抚万国，祇慎夙夜，懋敕几康，三十一年于兹。未敢少懈，必世昌期，幸符熙洽。仰荷上帝之鸿庥，列圣垂裕之嘉祉，方内乂宁，土宇遐扩，士民乐业，岁复屡丰。朕履盛思谦，勤咨上理，缅惟经学为出政之原，史册为鉴观之本，察吏治以底绩，疏选法以程材。将以监古宜今，胥归实效，励官造士，共勉永图。兹当临轩发策，延揽维殷，伫献嘉言，以佐予休治。《六经》之旨，千古范围，约举数端，以覘诵习。《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著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穷经致用，先务贯通。《彖传》、《象辞》，何以《乾卦》独立于爻下？《二典》、《三谟》，何以《左氏》引以为《夏书》？《王风》、《鲁颂》，编《诗》何以独异？《左传》、《公》、《谷》，经文何以互殊？以《礼记》为曲礼，易《周官》为《周礼》，始于何人何代？能确凿言之欤？史以垂彰瘅，而体例不必尽同。《循吏》、《儒林》，始于《史记》；《文苑》、《独行》，始于《后汉书》。《忠义》始于《晋书》，《道学》始于《宋史》。其分门各当否？《梁书》有《止足传》，《隋书》有《诚节传》，《唐书》有《卓行传》。同异果何如也？凡人之贤否，事之得失，俱见于传，复作论赞，疑若赘设，沿而不废，毋亦拘于体例耶？兹命廷臣重修国史，期于据事直书，永昭惩劝。有可以援古证今、裨益编摩者欤？《记》曰：大臣法，小臣廉。言乎上与下之相承也。《周官》以六计弊群吏，善能而下，皆冠以廉。汉法六条，察吏者五，良规具在。可备列而踵行欤？朕澄叙官方，加意整饬，期庶司百职共底廉平，而任封疆者或以姑息为心，绾铜墨者或未清白率职，吏治之不醇，民生其曷攸赖！夫大吏者，群有司之圭臬也。欲使群吏皆守法奉公，固在大吏之公正明察，足以董率而甄核之矣。顾侵渔之弊未尽除，黩墨之风未尽息。何以杜其源，遏其流，俾人思濯磨，洁己自爱欤？古者三物宾兴，书升论秀，士皆得乘时利见。自九品官人三途并用，时势较异。或以猥杂为讥，或以壅滞为患。唐之铨法，有十数年不得亲政者。选途之积，自昔而然。朕念士之列贤书者，需次稽时，或少壮策名，淹及皓首，特令甄选，广其途而登用之，俾无积薪之虞。既为疏通，继此果无虑其复壅欤？且及锋而用，为举人计，即为民社计也。膺兹选者，何以奋勉供职，以毋

负拔擢之意欤?夫崇经术,昭法戒,饬官常,励儒修,皆惟其实,不惟其文也。多士习圣贤之业,明治理之要,其悉意敷陈,以无负循名责实之义。毋剿毋泛,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基业,安抚天下各地,从早到晚恭敬谨慎,勉力在居安思危上保持警惕,到现在已经三十一年了。从来不敢稍略懈怠一下,必定要使社会进入昌盛的时代,万幸符合兴盛欢悦的要求。往上承受到天帝的盛大佑助和各位圣明先帝留下的洪福,辖区以内得到治理和安宁,国土扩展到远方,读书人和众百姓安居乐业,年景又接连大丰收。皇帝我步入鼎盛阶段,越发想到应当谦逊,总去访求形成最美好的治理状态的方法。遥想起来,经典学问是推出国政的本原,史册是借鉴的根源,督察官吏的施政情况去建成功绩,梳理清选任的制度来衡量好人才。准备借鉴古代,适应当代,全都归结到实际效果上去,激励官员,造就士子,共同在谋求国运长久上做努力。现在正值皇帝我亲临殿廷,颁布策问,延揽特别殷切,期待着你们献上美好的建议,以便协助皇帝我进行美好的治理。《六经》的义旨,任何时代都超越不出去,约略举出几个问题,用来察看你们诵读研习的情况。《易经》流行三种命名的涵义,《尚书》分为六种文章体裁,《诗经》有三种传本,《春秋经》标揭五类起始状态,《礼记》中有很多后世儒士增入的篇目,《周礼》把主持土木工程的中央政府部门及其官属散入到其他篇章中去。这些说法能够逐项列举出来吗?彻底弄明白经典,是要拿去应用,这就首先应在融会贯通上下气力。《易经》中的《彖传》、《象辞》,为什么在《乾卦》中单独列在六爻的后面呢?《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为什么《左传》引用它们时认为是《夏书》的组成部分呢?《诗经》中的《王风》和《鲁颂》部分,在编排时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来编呢?《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在所列具的《春秋经》经文上为什么存在着不同的字句呢?把《礼记》看成是讲述细微礼仪的著作,把《周官》改称为《周礼》,是从哪个人、哪个时期开始的呢?你们能确凿地讲论一番吗?史书是用来垂示那彰善瘅恶的事情的,而编撰体例不一定要完

全相同。《循吏传》与《儒林传》,由《史记》所创立;而《文苑传》与《独行传》,又由《后汉书》所创立。《忠义传》首见于《晋书》,《道学传》首见于《宋史》。它们在门类的划分上各自都很恰当吗?《梁书》立有《止足传》,《隋书》立有《诚节传》,《唐书》立有《卓行传》,它们之间相同与不同的地方到底是怎样的呢?凡属人物的贤良与庸劣,事件的得与失,都在本人的传记中显现出来了,但又在同篇中撰写论赞,看起来属于画蛇添足的东西,但各史却都沿用而不去除,这恐怕也是被编撰体例限制住了吧?如今命朝廷大臣重新修撰我朝的正史,希望达到根据事实照样写下来,永远彰明惩戒和劝勉。你们有可以援古证今而对编撰会有补益的想法吗?《礼记》上说,大官奉公守法,小官就廉洁。这是在讲上面与下面之间递相承奉啊!《周礼》用六条标准去判定众官吏的政绩,从施政美好赢得赞誉、政令能推行开以下各条,全都在前面加上一个"廉"字。汉朝制度规定,用六条诏令考核官吏,其中察辨太守官的就有五条。这些有效的制度都还明摆在那里,你们可以完整地列举出来并认为应接着实行吗?皇帝我澄清并纠正为官之道,格外用心去整顿,期望文武百官共同做到廉洁公平,可担任地方大员的人有的却只把姑息纵容作为心念,佩带官印的地方官有的还没清正廉洁地履行好职责。官吏施治不纯正,民众的生活还有什么依赖的呢?大官是众官员的榜样啊!想让众官员一律奉公守法,固然在于大官公正明察,足以领导并甄别验定他们啊!然而侵吞公款的弊病还没彻底革除,贪污受贿的风气还没完全止息下来。应该怎样去堵塞住源头,遏制住流衍,使每个官员都考虑磨砺洗涤自己,使自己廉洁并爱惜自己呢?在古代,乡间通过考察六德、六行和六艺,用隆重的礼仪来向王室做推荐,王室有关部门又逐级写出推荐书往上报,挑选优秀的人才,因而读书人都得以顺应时机,有利地显现出来。自从魏晋九品中正制出现,荐举、征召、科目考试三种途径同时施用,时势就和古代截然不同了。有的把冗滥杂乱作为讥刺的对象,有的把该提升却提升不了作为忧患事。唐朝选用的制度,竟有十多年还亲自主持不了政事的人。选用的途径造成人员大量积压,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皇帝我顾念读书人有被载入贤士的书籍中的人,可却需要

按顺序升职，耽误了时间。有的年轻时就被登上了花名册，但一直延误到白了头。于是特意命令进行甄别选拔，扩大那途径来进用他们，致使不再存有柴草一层一层往上堆的忧虑。已经进行疏通了，在这以后果真就不用去忧虑还会重新积压起来了吗？而且趁最锐利的时候加以使用，为举用人才做考虑，也就是为民众和国家做考虑啊！置身在这次选用行列中的人，应该怎样去奋勉地供职，以便不辜负朝廷提拔的用意呢？崇尚经典的修身治国理论，昭示史书载述的惩戒，整顿好官员的各自职守，激励儒士的品行修养，全都只看实际，不看那表面的花架子啊！你们这些读书人研习圣贤的本业，深明治理的要领，要用尽心思做出陈述来，以便不违背依照名义去验核实际的义旨。不要沿用别人的话语，也不要空泛，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1. 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勤求上理，夙兴夜寐，曰笃不忘。三十四年以来，兢兢如一日，凡以敬迓天庥，乂安万姓，期于无一夫不获其所。朕安益求安，嘉与尔多士共商至道。其何以剀切指陈，以资拜献？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仲舒三策，天人之际，言之详矣。顾其学本《春秋》，而往往流入阴阳术数。即其弟子，亦有议其非是者。何欤？《易》称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感应之微，奚假推测？况人君代天子民，与庶官百姓不同。果洗心藏密之地，真有吉凶同患之情，或者默契天心，诚无不格。夫以实不以文，理本不爽古，所谓阳感天不旋日者，其说何如？可推阐源流，亲切言之，以究昭事之实欤？古者君咨臣儆，著美唐虞，明试以功，不废考绩。至《周官》以六计弊群吏，其法加详。顾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以明黜陟。而冢宰岁终则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会，既诏以废置矣。而大计诛赏，又以三年。其疏密之故，可得陈欤？自汉以六条察二千石，嗣后代有损益，而原本《周官》，无二义也。可略举欤？朕为民择官，期公尔忘私，以襄庶政。乃察吏非不严，而贪墨未息；锄恶非不力，而纵逸尚闻。甚且上下弥缝，就轻避重。将立法未尽善欤？抑习惯性成，此风不能骤革欤？今欲大法小廉，肃清纲纪，将何道之从？以言取人，或谓非

古，然虞廷敷纳，车服由之。虽司马三升，最详德行，而《诗》、《书》、礼、乐，教分四时，文与行未尝不并重也。言者心之声，言著于文，又其精者，非惟载道，且以征心。言不师古，惧其背道，乃或裁割古文，采掇糟粕，陈言务去之谓何！朕万几之暇，懋勤典学，尤期海内弦诵之士，共励精勤，以光文治。钦选《四书文》，颁行已久，而或失之雷同剿说，或失之怪僻艰深。其弊安在？将教之者非欤，抑取之未善耶？夫以帖括为时文，其说已误，而以词赋取实学，其本已离。不得已而专试策论，又多浮词摭拾之患。今由科举以及朝考，三者皆用之矣，而未收得人之效，何欤？将欲一洗陋习，归于清真雅正，多士其以心得者著于篇。风俗者，教化所蒸也。我国家重熙累洽，承平百余年之久。朕轸念群黎，尤加培养，然而持盈之惧时切者，盖今为治之道，较古为难，故化民亦难。古者王畿千里，诸侯各治其国，大不过百里，总千八百国，仅数千里止耳。今版图式廓，西至二万余里，此地大物博之难也。侯国予夺自专，今自督抚及牧令，惟所措置，即民间日用，咸待周知，此家喻户晓之难也。将欲一道同风，何施而可？比者匪徒邪教，尚未悉除。悬赏格，叙超擢，则不肖者邀功，反累良善；无能者避过，坐失渠魁。除莠养禾，何以兼得？夫五礼六乐，司徒所以导民，先儒所谓大务。将使俗返敦庞，邪慝不作，要言至德，必可述焉。凡此数者：亮天工以熙庶绩，黜浮靡以导淳风。多士学古入官，讲求有素矣。其悉心以对，毋蹈故常，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起盛大的基业，总去谋求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早早就起身，很晚才睡觉，可以说笃实而简直忘不掉。三十四年以来，兢兢业业如一日，这都是因为要去恭敬地迎受皇天的福佑，治理好并安定住百姓，期望没有一个人不获取到他那既定的位置。皇帝我在天下已经安宁的情况下，进一步去谋求安宁，很高兴与你们这些读书人共同商讨最高明的治国大道。你们该用什么来做切中事理的指明与陈述，拜见天子首先献上那言论呢？善于讲论皇天事体的人，必定要在人事上做出验证来。西汉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策问的三篇答卷，对皇天和人事的关系讲论得相当详尽了。但他那

学问依据《春秋经》,却常常陷入阴阳术数里面去。即使是他的弟子,也有指出他所讲的东西并不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易经》上说:用神妙来预测出未来,用智慧来铭记住过去。皇天与人事交相感召应合的微妙之处,哪里还需要借助那推测呢?况且君主代替皇天像对待儿子那样去统领民众,与众官员和众百姓截然不同。确实在任何人都看不到的地方洗涤自己的心念,真有那吉凶共同承当的感情,或者就会默默地与皇天的心意相契合了,至诚就没有不遍及的了。凭借真实而不靠花架子,治理本原而不与古代的做法相违背,所谓阳刚劲儿感动皇天就快得很,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你们能够推导阐发那源头与流变,平和切近地讲论一番,去究明那显示事象的实情吗?在古代,君主主动做询问,大臣提出告诫来,这在唐尧虞舜时期表现得最美好,但仍拿功绩做出明晰的判定,不废弃政绩的考核。到了《周礼》时,用六条标准去验定众官员的政绩,具体方法变得更详细了。但周朝制度是在六年中,王畿以外每隔五百里组成的五个政区要轮流朝见一次,再过六年天子到各地去视察,用来宣明废黜或晋升。而冢宰官到年终便命令百官各自总结本人的治绩,接受他们的报告书,随后便宣布免职或任职的新决定了。而全面考核政绩,进行惩治或封赏,又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其中粗略和严密的原因,你们能陈述一番吗?自从汉朝用六条诏令考核郡太守,此后各个朝代各有减损或增益的地方,但都出自《周礼》,并没有另外的义旨啊!你们能大略地列举出来吗?皇帝我为百姓来择任官员,期望他们把公家放在首位,忘记个人的得失,去协助处理好各种政务。但督察官吏不是不严格,可贪污受贿的风气还没止息下来;铲除奸恶的家伙不是不严厉,可纵情享乐的现象仍然听得到。甚至上下打掩护,专拣轻微的说,避开严重的不讲。这是由于设立法度还没特完善吗?或者是习惯使人形成常性,这种歪风不能够猛然一下子就革除掉呢?如今想让大官奉公守法,小官变廉洁,肃正清整朝廷纲纪,该依从什么办法去做呢?通过言论选取人才,有人认为这并不是古代的做法,但虞舜时期凭借言论予以广泛的接纳,车马服饰也依此赏赐。周代选取士子尽管到司马那里要经过三级推荐,对德行最为重视,可《诗经》、《尚书》、礼仪、

乐舞的教育仍按四季分别进行，这表明文采与品行未曾不同等看重啊！言语是内心思想的直接反映，把言语写成文章，又是更精粹的东西了。不仅仅用来载述大道，也用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言论不取法古代，担心它会违背大道，可有的人竟去裁剪割裂古文，拾取那没用的部分，这在一切老掉牙的话语务必要摒弃的撰文准则上可又叫什么了呢？皇帝我在处理繁忙政务的空隙里，勤勉地致力学问，更期望海内诵读经书的士子们共同在精详勤勉上自我做激励，用来弘扬文治事业。皇帝我亲自选编的《四书文》这部书已经颁行很长时间了，而有人写起八股文来却出现千篇一律和剽窃前人说法的弊病，或产生怪僻艰深的不良倾向。造成这些弊病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或许是教导的人做得不对吗？还是本人择取不对头呢？把八股文看成是应景一时的文章，这种说法已经是错误的了，而用律诗辞赋择取具有实学的人，也脱离开了那根本。不得已专门测试策论，又多数存在着空话连篇、拾取前人观点的毛病。如今由会试、殿试一直到被录取者在引见之前由天子再考一次的三种考试方式都采用了，但却没能收到获取到贤才的效果，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今想把浅陋的习气彻底洗除掉，归到清爽真切、典雅纯正的标准上来，你们这些读书人要把自己确有心得的看法写在答卷上。社会习尚属于教化蒸蒸日上的标志啊！我们国家接连繁荣昌盛，太平长达一百多年了。皇帝我深切顾念黎民百姓，特意加以培育养护，然而对守护住盛大功业的忧惧心情却总是那样地深切，原因是出自当今施理的方法比起古代要困难，所以教化民众也困难啊！古代王室直辖区域方圆仅一千里，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封国，封国大的也超不过方圆一百里去，总计一千八百个封国，仅仅面积共为几千里也就到头了。如今国家版图大范围扩展，西部就广至两万多里，这正是地大物博而治理起来就困难啊！古代诸侯封国对谁予以赏赐或惩罚都自己说了算，可如今从总督巡抚到太守县令，一切任从他们筹划部署，即使民间的日常活动规则也都要使人们全知道，这正是做到家喻户晓很困难啊！打算统一起道德，使社会风尚相同，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呢？近来匪徒和邪教还没全部铲除掉，公布赏赐的命令，按功劳破格予以任用，但并不贤能的人冒领

功赏，反而祸害到善良的人，没有才干的人躲避罪过，眼看着让罪魁祸首逃掉。既除掉坏人又保护好人，该怎么办就同时收到两方面的效果呢？五种礼仪和六类乐舞，是周代司徒官用来化导民众的有效手段，是前代名儒所强调的重要政务。想使民间风尚返归到质朴淳厚的状态，邪恶的行径不出现，这方面的切要论断和最高德业必定能叙述一番的了。总共以上这几种事体：辅助皇天的事务来振兴起各种政绩，摒弃浮华低靡的习气来引导淳正的风尚。你们这些读书人研习古代，进入仕途，讲论研求已经很有功底了，要用尽心力来做出对答，不要沿袭老生常谈那一套，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2. 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恩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懋缵鸿图，勤求郅治，畴咨宵旰，弗懈益虔。仰荷天、祖贻庥，际一百二十余年升平之会，持盈思永，采纳弥殷。贡士等登选在廷，行将入政，资言成信，古训所先，尚矢嘉谟，用裨听览。昔《虞书》以十六字衍万世心法之传，厥指不外执中。曰精曰一，执中之诣力也。逮尼山道隆祖述，子思子作《中庸》，特揭时中之义，以明一脉相承。而于大舜之用中，推溯问察隐扬，执两端之运量。其即精一之谓欤？顾中即天命之性，致中即尽性之事。《左氏》言受中以生，而《汤诰》言恒性曰降衷。衷与中，二欤，一欤？子舆氏又申执中无权之说，异学之分涂何在？隋儒王通有《中说》十卷，其粹远过荀、扬，学者转以僭经訾之。何欤？嗣是言心性，莫若宋五子。周子《太极图说》，以中与正并举。程子言忠恕犹中庸，不可偏举。能缕析其底蕴欤？考绩之典，肇自唐虞，至周而法尤备。汉时群吏受计，如韩延寿为断狱最，陈立为劝农最之类。唐代因之，定有四善二十七最诸条，善最相权，复差九等。宋以六事考监司，四善三最考守令，科等参错不一。求其详要兼举，惟周制为近。三载一考，统其成也，析之则岁会、月要、日成，考核致为精审。今庶僚莅事，未满半载即不入考，而移取注语于旧任。彼岁会即未之及，独不有月要、日成可核欤？又如摄事他曹者，设不改归，一任举察，将上官以迁代苟容，下属以兼权贷责。可欤，不可欤？食为民天，积贮所宜亟讲。《王制》以

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尚矣。自汉耿寿昌、隋长孙平、宋朱子三仓之法立，历代悉仿行之。若宋沿唐和籴之令，又增博籴、俵籴、兑籴等名，抑配无度。岂贮籴利民本意哉?国家重农嘉惠，常平、社仓并行。屡谕大吏饬属，助宣德意。将使吏不为奸，民沾实惠，果何术之操也?昨岁以东省麦收倍稔，命抚臣采运京师平粜，今夏尚有余积。近复降旨，再宽海丰、利津关禁之限，务期商贩流通。于推广裕民之道，更何以进筹善策欤?古称寓兵于农，井田之制邈已，若屯田犹略仿其遗意。自汉募耕塞下，洎魏晋唐宋，或以兵，或以民，或兵民兼用。其条法赅备，莫如赵充国便宜十二事，要领安在?魏邓艾虑田良水少，建议大开河渠，军储以赡，非得屯政先务欤?方今新疆式扩，屯垦日开。从来广漠之区，泉渠沃衍，所收自给岁支糈饷而外，赢粮数且不赀，成效显著。他如直省屯卫旧租，取佐漕丁运费。节经厘正，故籍脱漏尚多。欲使除隐占，资协济，其道何由?夫心法为宰化之原，考察实程材之准，豫贮籴以足民食，广屯田以益边储，皆经国之要图也。贡士等其诵言所闻，各抒夙抱，毋泛毋隐。朕亲甄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勉力继承起宏大的治国蓝图,总去谋求最为隆盛的治理状态,从早到晚进行访求询问,从不懈怠而越发虔诚。往上蒙受到皇天与祖宗赐给的福佑，逢遇到一百二十多年天下太平的时运，保住那盛大的功业，思索国运长久，采纳言论就更加殷切了。你们这些已经通过了礼部考试的士子被选拔宣召到殿廷上，眼看着就要进入官员的行列了,凭仗本人的建议而证明自己确有才干,这是古训放在首位加以强调的事情,还要誓必亮出高明的谋划来,以便对皇帝我的观览听取大有补益。从前《尚书·虞书》用十六字格言衍生出后世任何朝代的帝王在心治大法上的递相传授，它那主旨不外乎执持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又说要精粹,要专一,这正是执持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应该下力气的地方啊! 到了孔老夫子在大道上宗奉并继承唐尧虞舜,而孔子的嫡孙子思又创作《中庸》,特意标揭那只管做到最为适中的义旨,用来彰明同祖父一脉相承,而对虞舜施用那最为适中的尺度,又推溯到他喜好询问并察辨身边人的言论,把

不好的言论扣压住,将美好的言论播扬开,从两种极端的言论中把握住那最为适中的东西,这种推溯也就是在讲精粹和专一吧?但最为适中也就是皇天赋予给世人的本性,达到最为适中也就属于把那本性完全发挥出来的事情啊!《春秋左氏传》中讲世人禀受到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下来,《尚书·汤诰》中讲论世人的常性又说皇天把善良的本性在人出生时就赐给了他们。这两部经典所使用的"衷"与"中"这样的字眼,讲的是两个意思还是同一个意思呢?孔子的弟子曾参又申明以下的说法:执持住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并不存在着灵活做出处置的问题。与纯正经学相对立的学说,它与纯正经学分道扬镳的地方又在哪里呢?隋朝的名儒王通撰有《中说》十卷,其精粹程度远远超过了战国的荀况和西汉的扬雄,但研习经学的人反倒用凌驾在经典之上来斥责王通这部著作,这又是为什么呢?此后讲论心性,没有能超过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和朱熹这五个名儒去的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把最为适中和端正连在一起予以强调,程颐又声明忠正和体谅别人同最为适中又绝对改变不了是意义一样的,不能够光强调它们中的一个方面。你们能逐条分析那底蕴所在吗?考核官吏政绩的制度,从唐尧虞舜时开始创立,到周朝时,这一制度更加完备了。汉朝时众官吏接受考核,像东郡太守韩延寿在案件最少上数第一,天水太守陈立在鼓励农业生产上数第一之类。唐朝沿用这种做法,定立有四大方面做得好和二十七项政务最突出的具体规定,而且占上几个方面与够上多少项彼此结合做权衡,又分成九个等级。宋朝用六项施政状况来考核省级官员,又用四个方面做得好和三类政务最突出来考核太守县令,具体事项和等级交错在一起,并不统一。探求那细目与纲要同时张布开的考核制度,只有周朝的制度大体够得上。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这是看官吏的总成绩啊!分散开来就每年年终有总结报告,每月月底有主要汇报,每天结束时有事项禀告,考核得极其精审。如今众官员上任供职,未满半年就不在考核的范围以内,只是从他原来供职的部门调取评语看一看。对他每年年终的总结报告还没提出要求来,偏偏就不该有那每月月底的主要汇报和每天结束时的事项禀告吗?再如在其他部门代理职务,

假如不再调回到原来的部门去，完全按通常的考核制度走，所在部门的长官就因为他是借调来的而加以姑息纵容，他本人作为下属就拿自己是代替履行职务来推卸责任。这样下去行不行呢？吃上饭是百姓的头等大事，储备好粮食应当急切地加以讲求。《礼记·王制》按三十年一单元来总体筹划国家的财政，这是由来已久的了。从西汉耿寿昌、隋朝长孙平、南宋朱熹创立起常平仓、义仓、社仓的制度以来，各个朝代都加以效仿施行。但像宋朝沿用唐朝议价征购粮食的政令，又增加了用货物折钱收购粮食，在内地州县收购粮食寄存、兑换粮食用项等名目手段，强行摊派没有限度，这难道是储存粮食便利百姓的本意吗？我们国家重视农业生产，给民众带来好处，常平仓和社仓同时在各地设立。多次命令地方大员要管理好下属，帮助朝廷宣明仁德的意旨。想使官吏不干出奸恶的勾当，百姓蒙受到实际的恩惠，到底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来进行呢？去年鉴于东部省份麦收增收一倍，命令巡抚们采购并运到京师，平抑粮价，到今年夏初还有剩余的部分。最近又颁降圣旨，再度放宽海丰、利津等处关卡禁令的限制，务必期望商贩流通起货物来。在扩大真使百姓富裕的做法上，另外应当凭借什么进一步筹划出高明的对策来呢？古代号称把军队寄寓在农民当中，井田制度已经很遥远了，但像屯田仍旧大致上效仿它那遗留下来的用意。自从汉代召募人们到边塞下面从事耕种，一直到曹魏晋朝和唐朝宋朝，有的用士兵去屯田，有的用百姓去屯田，有的兼用士兵和百姓去屯田。其中制度定得最完整全面的，哪个也比不上西汉赵充国请求灵活处理的十二宗事项，它那要领表现在哪里呢？曹魏的邓艾担心土地肥沃却水不够用，建议大规模开凿河渠，结果军粮储备由此充足，这还不是抓住了屯田政务首先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吗？如今新疆辖区得到拓展，屯驻垦荒一天比一天兴起。在广阔的沙漠地区，从来就泉水和沟渠密布，绿洲成片，所收获的粮食除去能自我满足每年官俸军饷的支出以外，剩下的粮食还不计其数，成效十分显著。其他像由中央直辖的省份在屯田上收得的租税，要调拨一部分来补剂水路向京师运粮的民工们的运费。多次经过厘定验正，但原来的户口数仍然漏掉了许多。想使占田却隐瞒不报来逃税

的现象消除掉，有助于国家经费的相互调剂，应当通过什么途径去做起呢？心治大法是主宰教化的本原，考核政绩实属衡量人才的准绳，使粮食储存充裕来让百姓够吃够用，扩大屯田来增加边境储备，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谋划啊！你们这些已经通过了礼部考试的士子要讲出所闻知的东西，各自抒发出平素所蕴积的谋略，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要亲自进行甄别和择取。

43. 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祇绍丕绪，期臻大猷，御宇三十七年于今。际重熙累洽之庥，殚图易思艰之责，每怀延纳，肤末不遗。矧尔多士，引对阙廷，入官伊始，尚因发策，共效敷言。自古帝王求治，莫先乎勤政。孜孜赞赞，《典》、《谟》陈训綦详。《大易》首系乾元，必以行健法天，握其枢要。于《下经》则次《咸》、《恒》二卦，《咸》曰速，《恒》曰久，而惟其能速，是以能久。固即申明健行不息、天人协一之至义与？《乾》之三爻曰乾惕，《泰》之三爻曰艰贞。《象辞》何以若合符节，所为开泰保泰之原，本有同条共贯者与？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其云尊闻行知，高明光大，一归之于强勉。《易》与《春秋》，又有歧指与？大一曰万几，宵旰不遑暇逸，而畴咨交儆，佐治是所兼资。何道而使广益集思，胥尽弼违之谊也？历代诸史，向敕馆臣校刊，嘉惠海内。近以《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或一人而两传，或一地而数名，至于释义对音，动成乖舛。因命重加厘正，务极精详。其余胪事系时，悉仍其旧。顾《金史》多本刘祁《归潜志》，《元史》多本虞集《学古录》。今以史文相核，率有矛盾，何耶？《同文韵统》所叶三合切音，至为吻合与？所云华严字母，折衷何若？昔称七音为均，均者韵也。考其真于译音而通其用于韵学，讵有外于谐声辨字之本者与？直省积贮，所以备歉，而经理端在丰年。襄制三十年之通，与夫耕九余三，耕三余一，无论矣。如常平、社仓，至今承用不改，第任法任人，奉行匪易。或饬购补乘时，虽谷贱无虑伤农，而市值之加增不免；或听因循展限，即那移利于悬价，而廪储之虚旷谁筹。将使措置适宜，策果安在？乃者新疆乌噜木齐等处，屯收充羡，督臣议请建

仓，捐贮本色，省转输，足边计，利更溥于腹地。举行实惟其会，何道而使敛散及时，勾稽尽善乎？文章载道之具也，溯尼山在兹之统，及门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而文学一科，独列游、夏。何也？厥后师授分歧，宗派各别，所作丽于经史子集者，数难更仆。渊源正变，能缕述与？沿及谈艺之家，若陆机《文赋》，状作者之用心；刘勰《文心雕龙》，区七十二体之式，所言不越八代文格，于《原道》、《征圣》之目，洵有当否？近代茅坤，裒唐宋为八家之选，存古文法度。本朝储欣，益以李翱、孙樵，搜罗较备。曾令儒臣订定《唐宋文醇》，付梓以行。于《文粹》、《文鉴》，或不至大相径庭乎？夫治道期于励精，史书贵乎传信，广屯仓以充军实，观人文以验化成。尔多士讲明有年，其悉意正辞，条具以对。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起盛大的帝室统系，期望实现宏大长远的治国谋略，到现在已经统领天下三十七年了。正遇上接连太平兴盛的美好时运，要竭尽那容易事却把它看作艰难事去做的责任，常常想延揽贤才和采纳建议，连最浅显细小的看法也不遗漏掉。何况你们这些读书人被引见到殿廷上做对答，眼看就要进入官员的行列，还要按照颁发的策问，共同效法通过文辞向天子做汇报的古训。自古帝王谋求大治，没有什么能比辛勤地操劳政务更占首位的了。要十分勤勉，要努力辅助，《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陈说这类训条极其详尽。《易经》一开头就列示《乾卦》，必定要用运行刚健效法皇天去把握住那关键所在啊！在《下经》部分就首先排列下《咸卦》与《恒卦》，《咸卦》卦义是强调迅速，《恒卦》卦义是强调长久，但只因它能迅速，所以也就能长久。这原本上就是在申明刚健运行永不止息、天上和人间融为一体的最高的义旨吗？《乾卦》的倒数第三阳爻的爻辞强调整日忧惧，到夜间还在警惕着；《泰卦》的倒数第三阳爻的爻辞强调身处艰难境遇要持守纯正。分别解释这两条爻辞的《象辞》为什么那样地与它们密切吻合呢？用来开辟亨通局面和保持住亨通局面的本原，压根就有事理相通、脉络连贯的地方吗？汉朝的董仲舒，经学理论最纯正。他讲尊崇所听到的古训，实行自己已经明了的事

情，高远明亮又显赫盛大，这完全都归结到努力勤勉上。由此来看，《易经》与《春秋经》又有不同的义旨吗。君主整日处理繁重的政务，从早到晚顾不上安逸享乐，而不断向大臣们做询问，互相提醒告诫，大臣辅佐治理这也是君主同时需要依赖的。通过什么途径就能集思广益，全部尽到那规正君主过失的责任呢？历代正史，过去已经命令馆阁臣僚校正刊定，给天下读书人提供了便利。近来鉴于《辽史》、《金史》、《元史》这三部正史中的人名、地名与官名，多数被后来修史的儒士给弄混了，有的同一个人物却给他立了两篇传记，有的同一个地方却用了很多的名称，至于解释字义，对上读音，一搞就成为错误的东西。因而命令重新加以厘正，务必达到极为精确详明。其余胪列事件和排定时间，全都保持原来的面貌。但《金史》大部分内容都取自金朝人刘祁的《归潜志》，《元史》大部分内容都取自元朝人虞集的《学古录》。如今拿史文同刘、虞原书做验核，很多地方记载却不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同文韵统》这部韵书用三个字母拼读而成的字音，与那实际读音极为吻合吗？上面所讲的由印度传来的字母，在斟酌确定上到底怎么样呢？古代把七类声母称为“均”，“均”也就是声韵啊！考求它们比译音更切合实际读音，在音韵学上普遍加以运用，哪里还有能超出一半为声母、另一半为韵母及声调的辨定字音的根本方法以外的呢？由中央直辖省份的粮食储存，目的是防备荒歉年景，但筹办好它们却恰恰在丰收年里。古代以三十年为一单元来总体筹划国家财政，以及耕种九年要有足够多出三年用的粮食，耕种三年要有足够多出一年用的粮食，这就不必再讲论了。但像常平仓和社仓，至今仍然沿用而未做改变，但按制度办和委派专人干，贯彻执行起来却不容易。或命令抓住时机购进补充，即使粮价低不用考虑会损伤农民，但市面上价钱提高的情况也避免不了。或听任照老样子办理放宽期限，粮食就被奸商挪移而等着价钱上涨牟利，可仓库储备空虚却由谁去筹办呢？想使安排部署恰到好处，具体对策到底在哪里呢？近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屯田收获充足而有剩余，封疆大吏建议并奏请建立粮仓，捐税也不收银两而改成储存粮食实物，省去转运输送，满足边境防务的费用，好处比内地还要多。全面推行开实际上只在

于那时机，采取什么办法就能使购进粮食和借出粮食不失时机并且销帐立帐都做得特别好呢?文章是载述大道的工具啊!追溯孔老夫子只在道德的那个统系,深得师说而通晓六艺的弟子共有七十二个人，但文章学问这一专项，只列举了子游和子夏两位弟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此后师说传授各走各的路,派别也划分出来了,所写的文章缀附在经典、史书、理论著述和文集中的,数量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渊源和正体变体,你们能逐条叙述一番吗?扩及到讲论文章写法的人,像西晋陆机的《文赋》,就强调表现出作者的用意来。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区辨出七十二种文章体裁,所讲论的东西也超不出汉代至隋代的文章格式去,在书内《原道》和《征圣》这两篇中,确实有与题目相切合的论断吗?明朝的茅坤,汇集唐代韩愈和宋朝欧阳修等八位大作家的典范作品编成选集，保存古文的写作原则与方法。我朝的储欣,又增入唐代的李翱与孙樵,搜罗得较为完备了。皇帝我曾命令儒臣在储欣选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编成《唐宋文醇》,排成书版印行。对于《唐文粹》和《宋文鉴》来说,或许不至于大相径庭吧?治国大道期望在励精图治上做得好,史书贵在传述真实的事情,扩展屯田和仓储用来满足军需用品的需要，观看人间的文采用来验核教化的形成。你们这些读书人讲论阐明以上的问题已经时间很长了，要用尽心力、言辞纯正地逐项做出对答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4. 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凝承景贶,式于九围,夙夜钦虔,单心无逸,缉熙光明,以厘庶绩。仰荷上天祖宗眷佑,宅中临驭,今四十年矣。栗栗危惧,恒思久于其道者安在,益廑保泰,弥仁嘉谟,矧髦士观光,尤征谠论。其敬聆咨问,赞我大猷。董仲舒言:以一贯三为王。谓王者父天母地,中立人极,呼吸感通为至近也。《洪范》以五事配五行，以庶征配五事，寓训至深。刘向、刘歆之流，揣测阴阳,穿凿事应。班固《五行志》,马端临《祥异考》,皆沿其说。未免支离附会,不足与言钦崇之学。《月令》称,政事不以其时,则有某某之应,又小异《洪范》之说。其书源出吕不韦,未足深据。而《周礼》布政,多

顺四时。是固圣人之典也，又何以称焉？《书》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格天之学也。夫应天以实不以文，古帝王昭事之忱，必有超于术数推测之外者。其陈厥指归，以明其要。伊古言心始《禹谟》，言性始《汤诰》，言学始《说命》，儒者类能言之。非独词章训诂，无益实用，即研究理气之精微，辨别心性之存发，亦未切躬修。然则《大学》由格致以治平，《中庸》本中和以位育，必有更进乎儒生所谈者。能略指其枢要欤？《六经》言中，言一，言敬，言仁义，虽意指各殊，实则同条共贯也。可约略言之欤？宋儒程子、朱子，所以启沃其君者，至为纯密，堪与经训相为表里。而范祖禹《帝学》一书，指陈实事；真德秀《大学衍义》，参证史书。其亦有可以互相发明者欤？今将衍往圣之心传，粹然一出于正，其道安在？《洪范》八政，食居其首。储蓄素具，以待不时，有备无患之道也。常平、社仓二法，迄今并行，成规具在，多士谅闻之熟矣。惟是常平之法，恒待谷贵出粜，抑其价而使之减。乃宋张咏，于年荒米少之时，则大增市价，恣其多售，而运贩云集，其价转平，民食以裕。将出奇而偶中乎？抑深筹乎盈虚消长之势，而欲取姑与，可操胜得乎？朱子行社仓法，世号良规。其春借秋敛，加息以偿，疑与熙宁之青苗约略相似，而利病迥殊。其得失之故，能一一指陈欤？朕蠲漕截粮、为民足食计者，至周且裕。有经理常平、社仓之责者，宜何如共体朕意，实力奉行，使德泽下究欤？朕表章经籍，用光文治，搜罗遗典，咸集石渠，特简儒臣，俾司编纂，亦既具有条理矣。顾四库之藏，浩如渊海，必权衡有定，去取乃精。昔董仲舒请罢黜百家，专崇孔氏。陶宏景则一事不知，引为深耻。今将广收博采，而传注时多曲说，稗官不免诬词，异学混儒墨之谈，伪体滥齐梁之艳，于人心世教，未见有裨。如但墨守经师，胥钞语录，刊除新异，屏斥雕华，则九流之派未疏，七略之名不备。抱残守阙，亦难语该通。至于忠臣孝子，或拙文辞；宵小佥壬，间工著述。文行相左，彰瘅安从？他如《略》、《艺》编摩以后，晁、陈著录以前，门目各殊，规条歧出，此增彼损，甲合乙分。不有折衷，孰为善例？多士下帷有日，宜以知人论世为先务。其各区陈醇驳，以征稽古之功。夫本敬天以勤民，念典学以积道，养民而功惟叙，观文而化以成，斯黼扆出治之源，宜草茅家修所裕也。尔多士其诵言夙昔所

学,胪著于篇,毋隐毋泛。朕将亲遴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凝聚并承受到皇天赐给的大福,在九州树立起典范,从早到晚保持恭敬虔诚的态度,竭尽心力,不去安逸享乐,致力圣帝明王的大学问,达到大放光明的地步,用来整顿好各种政事。往上承受到皇天和祖宗的眷念与佑助,占据在天下的正中部位统领驾驭全国各地,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整日里战战兢兢,忧虑戒惧,总去思索在那治国大道上长久坚持下去的计策究竟在哪里,越发对守住盛大的功业而勤勉不怠,进一步期望得到美好的建议,何况你们这些优秀的士子来到京师观看国家的盛况,更要向你们征求正直的言论了。你们要恭敬地聆听所询问的事体,辅助皇帝我那宏大长远的治国谋划。西汉董仲舒讲:用一竖把三横连结起来,就组成一个"王"字。这是说称王天下的人要把皇天当成父亲,把大地视为母亲,在天地中间确立起世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呼一吸都与天地感召融通,构成最紧密的联系啊!《尚书·洪范》用态度、言语、观察、闻听、思考这五个方面的事情去配属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又用各种好坏征兆去配属以上五个方面的事情的正反表现,其中寄寓的训导极为深切。而西汉刘向、刘歆这类人,却揣测阴阳变化,把它们硬行说成是对人事做出的回应。东汉班固的《汉书·五行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祥异考》,都承用刘向、刘歆的说法。这不免支离破碎,穿凿附会,没多大资格置身在讲论顺从并崇尚皇天的学问的行列中。《礼记·月令》说,政事不按天时进行,就会产生某种不祥的天象回应,又与《尚书·洪范》的说法略有不同。这篇经文出自秦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不足以把它做为确切的依据。但《周礼》施布政事,大多顺应春夏秋冬四季。这部书压根就是圣人的经典啊!它又凭什么来那样讲的呢?《尚书》中强调:顺从并崇尚皇天的法则,永远保住皇天赋予的统治天下的权力。这正是感通皇天的学问啊!应合皇天要凭仗实绩而不靠摆出花架子那一套,古代圣帝明王显赫地事奉皇天的那片诚心,必定具有超出术数推测小圈子以外去的东西。你们要陈述那旨归所在,用来彰明那关键的地方。自古以来,讲论心治大

法是从《尚书》中的《大禹谟》开始的，讲论人性是从《尚书》中的《汤诰》开始的，讲论致力学问是从《尚书》中的《说命》开始的，儒士对此都能指出来。不单单是辞赋文章和经文字义解说对实际用场没有什么补益，即便是研究天理和气质的精妙隐微之处，辨别心念和本性的留存与涌发，也对修养好自身没有什么关系特密切的地方。然而《礼记·大学》强调由穷尽事物、充实知识去达到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礼记·中庸》又强调依据中正平和去使天地保持既定的上下位序和化生养育万物。这里面一定具有比儒生所谈论的更深一层的东西，你们能约略指出那关键所在来吗？《六经》讲论最为适中的那个尺度，讲论专一，讲论虔敬，讲论仁德正义，尽管在义旨上各自不同，实际上却是事理相通、脉络连贯的呀！你们能约略讲述一番吗？宋朝的名儒程颐和朱熹，用来启发自己君主的理论学说极为纯正周密，可以同经典和古人的解说相互补充。可北宋范祖禹《帝学》这部著作，指陈实事；而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又参取引证史书。它们也有可以相互发明的地方吗？如今要延续古代圣帝明王的心治大法的传授，完全纯粹地出自那纯正，具体做法又在哪里呢？《尚书·洪范》所列示的八项政务，农业生产占据第一位。粮食储存在平时都备好，用来对付欠收年和饥荒，这是先有准备就没忧患的对策啊！常平仓和社仓这两种储粮制度，到现今同时在推行，成规明摆在那里，想来你们这些读书人已经早就听说了。但常平仓的运作方式，总要等到粮价昂贵时就大量抛出粮食，平抑粮价并使它降下来。可宋朝的张咏，偏偏在年景荒歉、粮米缺少的时候，大幅度提高市面上的粮价，任凭人们多多出售，而倒卖粮食的商贩大量地聚集在一起，粮价反而变得适当了，百姓的吃用由此倒宽裕了。这纯属想出超常的解决办法却侥幸碰上了吗？或者是深切地筹计充盈与空虚、消歇与滋长的发展态势，而想获取就暂且先付予，可以操持住那必胜的结局呢？朱熹推行社仓制度，世上把它称为美好的规制。这种规制在春季借出粮食，到秋天收回粮食，加上利息做偿还，看上去同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制订的青苗法大体上很近似，但有利民众或危害民众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其中得与失的原由，你们能一一指出来并做番陈述吗？皇帝我免

除田赋，把运往京师的粮食转成救济粮而专为百姓够吃够用来做考虑的举措，极为周到又特优厚。担负着筹办常平仓和社仓的责任的人，应当怎样共同去体会皇帝我的用意，真心实力地贯彻执行，使仁德的恩泽施布到下面所有老百姓的头上呢?皇帝我突出地显扬经典，用来弘扬文治，搜罗遗佚的图籍，全部汇集到宫廷藏书处了，特意挑选儒学精深的臣僚，命令他们主持编辑纂定，也已经具有头绪了。但经史子集四大类别的图书的收藏，浩如烟海，一定要权衡立有标准，去取才会精详。从前西汉董仲舒奏请罢斥各个学说派别，专门尊崇孔子的理论。但南朝梁代的陶宏景却对儒士有一宗事不懂得，便把这看成是深深的耻辱。如今准备广泛收集，多方面择取，但解释经典的书籍经常会有许多歪曲的解说，野史笔记免除不掉失实的记载，与正统学说相对立的学派混淆儒家与墨家的理论，不纯正的诗文体裁弥漫着南朝齐代梁代的华艳风气，对于人心和社会的教化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死死抱定经学名师，照抄语录，去除标新立异的说法，摒弃雕琢的华丽文辞，历史上的各个学派就区分不出来了，七大部类的图书总称也不完整了。抱残守缺，也难再讲论什么统括与贯通。至于忠臣孝子，有的就写不好文章；而邪恶奸猾的小人，偶或也精通著述。文章与品行并不一致，而彰善瘅恶又该依从什么呢?其他像刘歆的《七略》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编成以后，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群书以前，门类各自划分得并不相同，体例制定得各式各样，或增立这个门类，或去除那个门类，有的把某些门类合在一起，有的把某些门类又划分开来。对此不做出斟酌确定，有哪个能形成最精善的义例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跟随师长学习已经时间很长了，应当把了解那个人物、讲论他所处的时代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要各自区分并评论前人著述的纯正与驳杂之处，用来证明考察古代的功效。把敬奉皇天作为根本来替民众事务做操劳，想到致力学问来积累起道法，养育百姓而功绩只管建成，观看文治而教化由此形成，这都属于坐在殿廷上亮出治国方略的本源所在，应当是民间读书人在家中研习而充分掌握的事体啊!你们这些读书人要讲出平素所学到的东西，逐项写在答卷上，不要有

什么隐瞒，也不要空泛。皇帝我准备亲自决定录取谁。

45. 清宣宗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鸿图，抚绥寰宇，勤孜宵旰，兢业不遑。仰承苍昊垂庥，边陲底定，疆圉乂安，惟益慎俭思艰，期无一夫不获。兹当临轩策士，式殷延访，用集嘉谟。选士兴贤，治之大要。古者选举献贡，以德行道艺教之，然后予以明扬。何时改为设科较艺？汉代惟贤良得人为最，制犹近古。至九品官人法立，而古意浸失，损难贻讥。何欤？唐制科之外，择人者尚有四事，较汉魏为益详。宋之三科，以直言、经学、吏理为目。其后增以三科为六科，又增以四科为十科。条目若何，得人以何者为盛？夫专引知识，则嫌于私；止循资序，未必皆才。司马之言善矣，又何以建十科之议，而不果于行？盖代有贤才，才皆资世。用里选，则才由里选而出；用科目，则才由科目而出。此所重之势则然。士人砥行立名，宜如何端志洁身，以应旁求之典？考课之法，代有不同。上古之课臣以实政，既选天下之贤，专莅一职，而不置可否于其间。又设为考绩黜陟，以课其官。官之长，各自课其属，故法简易行。汉迄明之课臣也以名，事无大小，一听于法，虽豪杰不能自主。较之以资，取之以望，是以名励天下而准之以法也。然得其人，则考察必当，非其人，则举劾失宜，甚且有借以伸恩怨者。岂任法非公，抑任人不易！两得之道，将何所从？今谓善最不同，等差攸别，何以儒馆之才亦胜钱谷，谏诤侍从之职亦任刑狱边防？将通才之易得，或求备之无妨。夫贤否彰明，则政治毕举。儒者学古入官，何以备敷言试功之典欤？训练士卒，莫详于振旅莅舍、治兵大阅之文。周制所以卓越前古者，合在于是。西汉京师州郡，皆立教试法。其后何以州郡不行？唐三时劝农，一时讲武，犹古制也。何以自昭义步兵后，至宋代均未有州郡训练之条？盖练卒道在怀以恩义，一以号令，庶几临敌能得其力；练将道在待以诚信，运以机权，庶几任使克尽其心。然或始则法密而人知儆，继则法玩而势易怯者，何故？今校阅之时，果能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养奇杰之气于礼义之中，使娴夫坐作进退之节，安之而不慑，则统驭有方，止齐有序，虽决

胜于万里之外可也。岂第行乎一州一郡而已!明刑所以弼教,《易》言刑者五卦。《噬嗑》言明罚而不言折狱,《中孚》言议狱缓死而不言赦过宥罪。《贲》与《旅》何以一则无敢折狱,一则不留狱,可分晰欤?刑狱起于讼,而《讼》何以不言刑?皋陶,刑官也,而教民祗德;伯夷,礼官也,而折民惟刑。此何说也?自《虞书》有金作赎刑,《周官》乃有钧金之人。议者疑非圣人之法,抑有解欤?《虞书》之五刑与《周官》之五刑,秦之五刑与后世之五刑,同乎,异乎?《春秋》书肆大眚,其义例若何?汉有任出之诏,魏有权行之议,宋有贴放之名,可一一举其词欤?乐有律,而刑亦有律,于义云何?狱者,生人之大命,荡涤瑕垢,以彰至治,岂非为政之急务欤?夫明试以达贤能,考察以黜政绩,教练以简军旅,钦恤以重民生,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多士稽古有年,其各陈谠论,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继承起宏大长远的治国蓝图,安抚天下各地,从早到晚勤勉辛劳,兢兢业业,根本顾不上休息。往上承蒙皇天降示福佑,边疆实现稳定,全国得到治理,一片安宁。由此只是更加在节俭上谨慎予以对待,想到艰难,期望没有一个人不获取到既定的位置。如今正值亲临殿廷策问士子,延揽访求越发殷切,用来汇集起美好的谋略。选取士子和兴用贤才,这是治国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古代选拔荐举,向王室进献保送优秀人才,都先用德行和道法技艺教诲他们,然后予以提拔重用。到什么时候改成了设立科目、比试文章高低呢?汉代顶数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获取到人才最多,这一制度还很接近古代。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定立起来,而古代的用意就逐渐消失了,当时就留下了识别官员有三大难处而此制却对朝政构成了八种损害的讥刺。这是为什么呢?唐朝在天子主持的考试科目以外,择取官员还有四个方面要看的事项,比汉代与曹魏显得更加详密了。宋朝设置的三种科目,用直言、经学、吏理作为名称。后来又增加了三种科目,变成了六种科目,接着又增加了四种科目,变成了十种科目。具体名称都是什么呢?获取到人才要数哪一科目最多呢?专门向朝廷引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在出自个人目的上就会产生嫌疑;而

光依照资历顺序办，未必都是胜任的人才。北宋司马光讲论这个问题已经很恰切了，但他为什么又提出用十种科目选取人才的建议却没真正被实行呢？每个朝代客观上都有贤才，贤才都依靠世上来选用。采取由居住地推荐的制度，贤才就由这种制度涌现出来；采取科目考试的制度，贤才就由这种制度涌现出来。这是由所看重的倾向造成那类情形的。读书人磨砺自己的品行，树立起美名，应当怎样去端正志向，净化自身，应合朝廷广泛搜求的明文规定呢？考核官吏的制度，各个朝代都不一样。上古时期用实际政事去考核大臣，既已选拔出天下最贤能的人，就专门让他担任某个方面的职务，而不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看他胜任不胜任。又设立考核政绩决定罢免或晋升的制度，用来督察众官员。每个系统的长官，各自督察本人的下属，所以制度简明，容易施行。从汉朝一直到明朝，用名次来督察众臣僚，事无大小，完全按制度规定走，即使是英雄豪杰也不能自行会怎么样。用资历来做验核，用声望来做择取，这是特用名次激励天下又拿制度规定来做准绳啊！然而获取到主持考核的合适人选，考核必定就恰当；不是合适的人选，举报弹劾就不公正，甚至有借此来报答私恩或发泄私怨的人。这表明哪里只是光靠法度很难公平，连任用官员也不容易啊！两方面都收到效果的做法，到底该依从什么呢？如今强调几个大的方面做得好，多少项政务最突出，具体规定并不同，在等级上也有区别，但通过什么办法致使熟悉经典会写文章的人才也能胜任钱粮事宜，谏诤侍从的官员也能承担起案件审断和边防任务来呢？眼看着才能全面的人容易获取到，求全责备也没有多大的妨害。贤能与庸劣区分得特清楚，政治就会全都振兴起来。儒士研习古代，进入官员行列，该怎样去完全适应那凭借言辞向天子做汇报又根据功绩进行验定的制度要求呢？训练士兵，没有能比凯旋入城、野外宿营、整顿好武器装备、进行大检阅的成文规定更为详尽的了。周朝的制度在古代最突出又占第一，应该说就体现在这里。西汉在京师和各州各郡都设立训练与比试的制度，到后来为什么各州各郡就不实行了呢？唐朝在春季夏季和秋季鼓励农业生产，在冬季讲求武备，这还属于古代的制度啊！为什么从昭义镇组建起步兵以后一直到宋朝，

都没有各州各郡训练本地士兵的规定了呢？训练士兵的办法在于用恩德正义去感召他们，用军令去统一起他们的行动来，差不多在与敌人交锋时能够使他们奋勇做拼杀。训练将领的办法在于用真诚信实去对待他们，拿灵活处置去运作并调动起他们来，差不多在任用调遣中使他们能竭尽心力。然而有的在开始阶段制度很严密，人们知道小心地对待，接下来就制度废弛，碰到敌情时就容易怯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今在训练检阅的时候，果真能够彰明贵贱，辨清等级序列，新兵顺从老兵，懂得军容仪式，在礼制正义当中培养出英雄豪杰的气概，使将士们熟悉坐下站起和前进后退的动作规范，安稳而不畏缩，也就统领驾驭具有办法，停顿下来整齐队列步伐具有次序了，即使在万里以外决战获胜也能做到的了，哪里仅仅是在一州一郡势不可挡就算到头了呢？宣明刑罚，目的在于辅助教化。《易经》中讲到刑罚的地方有五卦。《噬嗑卦》强调宣明刑罚，但不讲审断案件。《中孚卦》强调复审案件，减缓死罪，但不讲赦免过失，宽恕罪过。《贲卦》与《旅卦》为什么一来说君子不敢审断案件，二来说不能拖延案件审理。你们能对它们做一番明晰的分辨吗？刑罚和断案由百姓们打官司而兴起，可《讼卦》为什么就不讲刑罚呢？虞舜时的皋陶是司法官，可他要教导百姓在品德上保持谨慎的态度。而伯夷是主持礼仪的官员，可他却只按刑法来判定百姓的案情。这又是一种什么理论呢？自从《尚书》中的《虞书》有犯下过错可以出钱赎罪的规定，《周礼》就有了原告与被告缴纳三十斤铜做保证金的制度。议论政事的人怀疑这不是圣人的制度，你们对此也有解说吗？《尚书·虞书》中的五种刑罚和《周礼》中的五种刑罚，秦朝的五种刑罚和后代的五种刑罚，相同还是不同呢？《春秋经》中记载说：赦免罪犯。用这种字眼做记载的义例又是怎样的呢？汉代颁布过取保出狱而待审的诏令，曹魏出现过依据案情灵活处置的动议，宋朝立有犯罪情理可悯、罪名可疑而从轻处治的“贴放”这一司法名词。你们能够一一列举出它们的具体内容吗？音乐具有律吕，而刑罚也有律条，这在涵义上都讲的是什么呢？审案定罪是决定世人性命的大事，荡涤这方面乌七八糟的东西，用来彰明最为美好的治理，难道还不是施布国政的最紧切的事情吗？通过公

正的测试来使贤能的人步入仕途，通过考核来振扬起各种政绩，通过教阅训练来整顿好军队，通过慎重使用刑罚来重视百姓的性命，这都是在动乱产生以前就制定好治理措施，在危亡显现以前就保住国家的切要谋划啊！你们这些读书人考察古代的状况已经时间很长了，要各自陈奏上正直的言论，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6.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寅绍丕基，俯临寰宇，仰荷昊穹垂佑，列圣诒谋，夙夜孜孜，于今二十有一年矣。惟是时事多艰，人才孔亟，期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单心图治，上无负慈闱之训迪，下克措四海于乂安，若涉渊冰，实深祗惧。兹当临轩策问，用集多士，冀获嘉谟。兵所以威天下，亦所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训练，则无以制胜。汉法曰都肄，唐法曰讲武，宋法曰大阅，果不失蒐苗狝狩遗意欤？孙子练士，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至于究极精微，谙求韬略，若《淮南子·兵略训》，杜牧《战论》，苏轼《训兵旅策》，见诸施行，果能确有成效否？国用必有会计。禹巡狩会诸侯之计，其说何征？《周礼》小宰，岁终令群吏致事。郑注：若今上计。司会逆群吏之治，听其会计。有引伸郑注受而钩考，可知得失多少，见于何书？汉初专命一人领郡国上计，膺选何人？武帝遣使诣京师，上计簿，帝都方岳，试悉数之。光武遣吏上计，但言属郡，不言远方。唐初犹上计，废于何时；宋时天下财赋，皆上三司，后选吏专磨文帐，议始何人；《会计录》前后凡几，明代《会计》何人编录，自洪武以来通为一书者何人。能计述欤？自古求治之主，每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然核其心迹，诚伪不同。尧之土阶，舜之土簋，禹之恶衣，文之卑服，尚已。汉文帝衣绨履革，蒲席韦带，屏雕文之饰，成富庶之业，享世久长，治犹近古。后世人君焚翟裘，毁筒布，却珠贡，甚至一冠三载，一衣屡浣，非不慎乃俭德，而究不能广声教于寰区，希治功于隆古。岂徒俭不足以为政欤？抑岂务其名而未求其实欤？夫国奢则示之俭，国俭则示之礼。今欲崇本抑末，易俗移风，士庶无逾制之嫌，闾阎有藏富之实，果何道以致之？民

生以农事为本，农事以水利为先。周命遂人，齐立水官，秦治泾水，汉穿渭渠，经画详至，史册可征。自后或修芍陂、茹陂，或开利民温润，或决三辅，或引滹沱。其经时久暂，因革异宜，试为条例。虞集请兴北方农田，自辽海以迄青齐，因何不行？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可设农师佃种，其法若何？徐有贞所陈潞河等处水利，左光斗请复天津屯田，申用懋请疏滦河诸水，言皆切要。能详举之欤？凡此皆宰世之宏纲，济时之实政也。朕以藐躬，膺祖宗付托之重，宵旰忧勤，惟思仰慰慈怀，抚绥兆姓，天人合应，景运常新。尔多士来自田间，夙怀忠谠，其各直言无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基业，统领整个天下，往上承蒙皇天赐给福佑，各位圣明的先帝又给留下了长远宏大的谋略，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只因时事艰难之处很多，急切需要人才，期望与四海以内的贤才能人誓必要奋力自强，用尽心思去谋求大治，往上不辜负慈祥的皇太后的训导启迪，往下能把全国措置到大治安宁的境地，为此而真像渡过深水和薄冰去一般，确实在深深地忧惧。现今正值亲临殿廷主持策问，通过汇集起众多的读书人，期待着获取到美好的谋略。军队是用来威震天下的力量，实际上也就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力量，然而除去勤加训练，就没办法绝对获胜。汉朝的训练制度叫做比试演练，唐朝的训练制度叫做讲习武备，宋朝的训练制度叫做大规模检阅。它们果真没失去周朝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种四季通过围猎活动来练兵的遗意吗？春秋时孙武训练士兵，战国时吴起整治部队，唐朝李靖对唐太宗询问兵法所作的对答，其中所详述的手臂动作和步伐变化；明朝的王骥和戚继光所论述的练兵方法，具体项目有五条，有六条。你们能完整地列举出来吗？至于彻底究明那精妙隐微之处，胸有成竹地探求那计策谋略，像《淮南子·兵略训》，唐朝杜牧的《战论》，北宋苏轼的《训兵旅策》，把它们实际予以施行，果真能够确有成效吗？国家财政必定要有收支总核算。大禹视察天下各地，对诸侯计功行赏，这种说法从哪里能得到证明？《周礼》规定，小宰官在每年年终要让众官吏汇报政事。东汉郑玄的

注解说：如同现今的地方官向朝廷报送政务统计表。司会官验核众官吏的施治情况，接受他的报表。有人引伸郑玄关于接受报表进行逐项审核的注解，说是由此可以了解到收入与支出的多少，这在哪部书上可以看到？汉朝初期专门委派一个人主管郡国报送政务统计表的工作，被选派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又是谁呢？汉武帝让各地派遣专人到京师，报呈政事统计表，繁华城市和高山大河的出产都在询问中让他们逐一讲出来。东汉光武帝让各地派遣专职官吏报呈政务统计表，只询问所属郡县，不询问远方。唐朝初期仍然实行各地向朝廷报送政务统计表的制度，又是在什么时候废止的呢？宋朝时天下的财赋都上交给由盐铁、度支、户部组成的三司，后来选派官吏专门审核帐目簿册，这一建议是由谁最先提出来的呢？《会计录》前后总共有几部？明代的《会计录》，又是由哪些人编录的？把明太祖洪武年间以后汇编成一部书的人又是谁？你们能统一叙述一番吗？自古谋求大治的君主，常常在亲身励行节俭上给天下做出榜样来，但考察他们的心迹，真假并不相同。唐尧的土筑殿阶，虞舜的泥制食器，大禹的粗布衫，周文王的普通衣服，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汉文帝身穿黑色的厚缯服，脚穿粗皮靴，坐的是草垫，扎的是牛皮带，去除雕龙绣凤的装饰品，成就了天下富庶的功业，在位时间长久，治理仍接近古代。后世的君主有的烧掉羽毛制成的皮衣，毁掉精细的绢帛，退还进贡的珠玉，甚至一顶帽子戴三年，一件服装洗后再穿好多次。这并不是不慎重地对待那节俭的美德，可到最后却不能把声威教化扩展到整个天下去，治理的功绩很少能比得上隆盛的古代。这难道是光去节俭并不足以推行开政务吗？或者是只去求取那美名而未去求取那实效呢？国内物资充足，就拿节俭亮给世人看；国内物资贫乏，就拿礼仪亮给世人看。如今想崇尚农业生产，抑制工商活动，扭转改变社会风尚，读书人和普通百姓没有超越等级规定的嫌疑，民间拥有储藏丰厚的实际，到底该采取哪些措施就能达到呢？民众生存要把农业生产作为根本，农业生产要把水利放在首位。周朝任命遂人一职，齐国设立主管水利的官员，秦国治理泾水，汉朝开凿渭渠，在筹划和兴修上非常详尽周密，史书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后有的修建芍陂、茹陂，有的开

凿利民渠进行灌溉,有的疏通京师地区的水道,有的引来滹沱河水。这些工程在工期上有长短,在技术处理的沿用与变革上有各自的恰切做法,你们试为逐项列举。元朝的虞集奏请兴起北方的农田,从辽海地带一直到青州、齐州境内,但因为什么却没实行呢?元朝的托克托建议在京师地区靠近河水土地肥沃的地方,可以设置农师,招人耕种,具体办法又是怎样的呢?明朝的徐有贞所陈奏的潞河等处水利,左光斗请求恢复天津的屯田,申用懋请求疏浚滦河等河流,讲论得都切中要害。你们能详细地给列举出来吗?以上这些问题,都属于主宰时世的宏大纲领,救助社会的实际政务啊!皇帝我凭借渺小的身躯,肩负起列祖列宗托付的重任,从早到晚忧惧又勤奋,只考虑往上能使慈祥的皇太后放宽心,安抚住亿万黎民百姓,天上与人间融为一体,彼此回应,使盛大的国运总焕然一新。你们这些读书人来自民间,一向怀有忠诚正直的心念,要各自直截了当地讲出本人的看法来,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7.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

〔四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仰承天眷,寅绍丕基,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荷列圣之诒谋,慈闱之训教,夙夜兢兢,不敢康逸,思与海内贤士,酌古剂今,共图上理。兹当临轩发策,冀得嘉谟,以裨实政。尔多士各抒己见,启沃朕心。天工人代,俊乂所以贵旁求也。汉代得人最盛,以策科显如贾谊、董仲舒者,更有何人?汉唐经师,授受相承,以科第进者几人?宋之儒修,上感星精,下立人纪,或以保举,或有科目,流光史策,最为人材渊薮。试分别言之。明代取士以制艺,贤才之及于古昔者,岂无其人!其流别同异,可一视欤?人才出则国运昌,不可不亟讲求也。至于将帅之才,艺术之事,古或以之命科,或随时录用。孰为妥善,曷昌言之?古之帝王,有征而无战。《司马兵法》,动静繁简之数若何?军礼为五礼之一,今之存者,见于何书?《阴符》、《六韬》、穰苴、尉缭、孙、吴之书,孰为近道?唐太宗、李靖论兵之语,有裨实用否?《左氏》兵法,《通鉴》兵法,有裒集之者否?《武备志》、《金汤十二筹》、《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孰为精审?《寰宇志》、《郡国利病

书》、《筹海图编》，所言险要，孰为精妥？岩防、江防之制，屯田、转运之法，攻守战伐之器，侦探间诱之变，风雨冥晦之夕，悬岩绝壑之境，果何以悉合机宜欤？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干羽之所以绥有苗也。风不鸣条，雨不破块，知中国有圣人也。白雉何以贡于越裳，箛矢何以贡于肃慎，白环何以贡于西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非有以慑之而戢其敢心欤？冒顿之子，复请和亲，何以书于《纲目》？遣兵出塞，尽境而止，何以称为盛德？陈汤击郅支，何以不讥其矫制？登燕然而刻石，何以等诮于金微？诸葛亮何以屯汉中，而自请贬官？李、郭宣力效忠，何以纪人援之回纥？孰得孰失，盍析陈焉。《周礼》一书，半论理财，岁终则会货贿之出入，善政可得闻欤？两汉时，武帝创均输之法，以布帛为租。果施行而无弊欤？唐之财赋，归于左藏，综核之计甚详。何以假取听之豪将，帑藏主以中官？刘晏理财，亚于管、萧，其立法有上下交得者，试详述之。苏轼《策别》，有或去或存之议。曾巩《议经费》，有或杜或从之谋。何其指陈国计，纤悉靡遗欤？夫理财之政，不外开源、节流两端。乃或广利源而成效难期，裁浮费而卒归无补。二者果何道之从，俾实有济于国用欤？凡此皆宰世之宏纲，经邦之要务也。朕以藐躬，膺祖宗付托之重，宵旰忧勤，辟门吁俊。尔多士各殚见闻，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往上承受到皇天的眷念，恭敬地继承起盛大的基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仰仗各位圣明先帝留下的谋划和慈详的皇太后的训诲教导，从早到晚兢兢业业，不敢安逸享乐，总想与四海以内的贤士斟酌古代，筹划当今，共同谋求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现在正值亲临殿廷颁布策问，希望获取到美好的谋略，用来补益实际的政务。你们这些读书人要各抒己见，启发皇帝我的想法。皇天的事务要由世人代替完成好，这是英杰贤才贵在广泛搜求的原因啊！汉朝获取到人才显得最雄盛，通过贤良方正科的对策而当上大官的像贾谊、董仲舒那样的人，还有谁呢？汉朝和唐朝的经师，在学说上递相传授与承接，而通过科目考试而得到进用的人一共有几个呢？宋朝的名儒，往上感召起星宿的精灵，往下确立起人伦关系的准则，有

的凭借担保荐举进入朝廷,有的在科目考试中被录取,在史书上光辉闪耀,最为人才产生出来的策源地了。你们分别试予讲论一番。明代用写八股文来选取士子,贤才能比得上古人的,哪里没有那具体的人呢!它们在类别上相同或不同的地方,能够同样做看待吗?人才涌现出来,国运就昌盛,不能不急切地去做讲论研求啊!至于能当将帅的人和擅长某一技艺的人,古代或者用这些方面来设立考试科目,或者依据时势需要加以录用。这两种做法要数哪一种更妥善呢?你们为什么不发表一下看法呢?古代的帝王,有征讨却没有实际上的两军交战便获胜。《司马兵法》在行动和静止时的礼节规定上繁多与简略的情况怎么样?军礼属于五种礼仪之一,现今仍保留下来的内容,在哪本书中可以看到?《阴符经》、《六韬》和司马穰苴、尉缭、孙武、吴起的兵书,要数哪一部接近那大道呢?唐太宗和李靖讨论用兵的话语,对实际用场确有帮助吗?《春秋左氏传》中的兵法和《资治通鉴》中的兵法,有对它们进行摘录汇编的人吗?《武备志》、《金汤十二筹》、《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要数哪一部最精审呢?《寰宇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筹海图编》中所讲到的险要地带,要数哪一部讲得精确稳妥呢?陆地防卫和江面防卫的制度,屯田和转运粮草的规定,进击防守和征战讨伐的武器装备,侦察刺探和离间诱降的灵活策略,刮风下雨和天色昏黑的夜战打法,悬崖绝壁的地形利用,到底怎样做就都切合那战机需要了呢?只有仁德才会感动皇天,没有任何遥远的地带而不到达的,通过演奏文德乐舞正是安定住三苗的举措啊!风吹过来轻柔得连柳条都不发出声响,雨降下来均细得连土壤都不出现裂缝儿,由此就知道中原有圣人啊!雪白的野山鸡为什么会从越裳国进贡来呢?名贵的弓箭为什么会从肃慎国进贡来呢?白玉环为什么会从西王母国进贡来呢?没有哪个方国敢不前来归顺,没有哪个部族敢不前来臣服,这还不是确有办法威慑住并使它们收敛住那侵扰的野心吗?匈奴冒顿单于的儿子,再度请求结成婚姻关系,为什么被《资治通鉴纲目》予以载述呢?派遣军队挺进到塞外,到达原有的辖境边上就停止下来,为什么被称为仁德盛大呢?西汉的陈汤痛击匈奴郅支单于,为什么不讥斥他假称圣旨呢?东汉窦宪登上燕然山,镌刻碑文来颂扬击败匈奴

的功绩，为什么被讥诮为正与西汉在金微山大破匈奴的卫青一个样呢?蜀汉诸葛亮为什么屯驻汉中而自行请求贬降本人的官爵呢?唐朝的李光弼、郭子仪贡献力量，竭尽忠诚，为什么又记载进入中原来援助的回纥军呢?以上这些史事哪桩属于正确又哪桩属于过失，你们为什么不剖析陈述一番呢?《周礼》这部经书，有一半内容在讲论掌理财政。每年年终就审核钱币财物的支出与收入情况，这种美好的朝政可以让人听一听吗?西汉和东汉时，由汉武帝创立了政府直接控制物资运销的制度，把布帛作为租税。在施行中果真就没有弊病吗?唐朝的财赋收入归入中央左藏库，逐项验核的制度非常详密。但为什么支付领取都由势力强大的藩镇将帅怎么说就怎么办呢？国库钱物都由宦官来掌管支配呢?唐朝刘晏掌理国家财政，比不上春秋齐国的管仲和西汉的萧何，但他在制度建立上却有上下都感到便利的地方，你们对此试加详述。北宋苏轼在所奏呈的五种策略的《策别》部分中，提出了去除一部分费用特容易而对国家并没损害、保存一部分费用特困难而对国家并没益处的主张；曾巩在《议经费》的奏折中，提出了杜绝不必要的费用支出、节约该节约的费用支出的建议。他们为什么指明并陈说国家财政竟连最细微的地方也没有遗漏掉的呢？掌理国家财政，超不出开辟收入的来源和减少支出的渠道这两个方面去，但有的却扩展财利的来源而成效很难指望迅速就收到，裁减不必要的支出费用而最终却归入没有什么实际的补益。在以上两个方面，到底该依从什么对策就能使国家财政真渡过难关去呢？以上这些问题，都属于主宰时世的宏大纲领和治理国家的切要事务。皇帝我凭借渺小的身躯，肩负起列祖列宗托付的重任，从早到晚忧惧又勤奋，敞开四面的大门来呼唤贤才英杰全到来。你们这些读书人要各自讲出本人所耳闻目睹的全部事情来，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杨寄林　辑译〕

◉ 附 录 ◉

唐至清进士科前三名暨会元一览表

【说明】 进士科作为我国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主体，从隋唐到清末一直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即使是在五代十国那样的大分裂、大混战时期，后梁以迄后周，哪怕出于“虚应故事”，也基本上都年年举行。元顺帝尽管中途停罢两科(至元二年丙子科、五年己卯科)，依然要重开贡举，甚至在岌岌可危、出走塞外的前二年(1366)，仍旧“廷试进士”。更何况辽金递相效法中原，踵事增华，而以得人为盛!得人的需求和入仕的要求撞击在一起，致使跻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行列特别是摘取第一名的桂冠，成为历代应试者角逐的目标。

不言而喻，封建王朝曾经举行过多少次进士科考试，哪怕每次仅仅录取一名或两名，也就该产生多少名事实上的状元或状元、榜眼；若在三名以上，则应鼎甲俱全。但因年代久远，文献散佚或语焉不详，迄今若仅据正续《文献通考》所载历代“登科总目”，只有明清历科状元与会元(会试第一名)的姓名完整地保存下来，宋元状元也幸而无一缺漏，宋朝省元大体具备；唐五代科次亦历历可辨，辽金榜次与状元则存其崖略；十国中南汉、南唐、后蜀以其为僭伪政权，概付阙如。此外则所遗相关科次、诸朝状元特别是二、三名以及会元乃至所载讹误或与他书歧异之处，亟有必要加以补充和究诘，谱列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前三名暨会元一览表来。这是因为：

历代进士科前三名暨会元，既在应试前就创造出了许多佳话，又在应试中撰写出了堪称典范的程文，更在入仕或归隐后，

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脚步，充当了各色各样的社会角色，导演了异彩纷呈的人生活剧，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业绩，取得了辉前映后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遗产。在他们当中，既有文天祥那样的民族英雄，又有张之洞那样的中枢重臣；既有王维那样的文坛巨子，又有赵翼那样的史学大师；既有陈亮那样的思想斗士，又有杨慎那样的渊博学者；既有王引之那样的语言文字学名家，又有吴其浚那样的植物学巨匠；既有翁同和那样的帝王师，又有张謇那样的实业家，既有柳公权那样的书法妙手，又有洪钧那样的风流才子……由此构筑起了状元群、鼎甲群的群体形象，积淀起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层面，不仅构成了华夏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而且对开掘家族文化，彰显乡邦先贤，探究地方人才历史优势和区域文化分布规律，乃至开发旅游资源，更具有现实意义。试读清汪薇题福建使院诗："尔无文字休言命，我有儿孙要读书"，究会令人作何感想?

有鉴于斯，兹以正续《文献通考》所载历代"登科总目"为基础，本着尽可能"求全、求歧、求确"的原则，续加搜采、梳理和印证，凡得状元608名，榜眼331名，探花316名，会元297名，制成本表。凡人名之下标示籍贯，不详者则付阙，兼注明"三元"等情况。资料来源主要为：清徐松《登科记考》、宋王溥《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宋韩思《五代登科记》、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宋洪迈《容斋随笔》、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唐代墓志汇编》、《唐人轶事汇编》；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宋吴自牧《梦粱录》、《宋史》、元刘壎《隐居通议》、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宋人轶事汇编》；《辽史》、《契丹国志》、《全辽文》；《金史》、《大金国志》、《金文最》、金李俊民《庄靖集》；《元统元年进士录》、《元史》、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明实录》、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明谈迁《国榷》、明朱国桢《皇明史概》、《明史》、清

夏燮《明通鉴》;《清实录》、《清秘述闻》、《清史列传》、《清代碑传全集》、清李元度《皇朝先正事略》、《清史稿》等。同时还参核了部分重要的工具书（《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清代碑传文通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囿于时间仓促，难免仍存疏漏甚或讹谬之处，他日续有所得，再行补订。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高祖	武德五年 壬午科	622	**孙伏伽** 武城（今属山东）人	**李义琛** 陇西（今属甘肃）人	**李义琰** 陇西（今属甘肃）人	
唐太宗	贞观元年 丁亥科	627	**敬　播** 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西北）人	**上官仪** 陕县（今属河南）人，后徙居江都（今江苏扬州）。	**张越石**	
	贞观二十年 丙午科	646	**张昌龄** 南宫（今属河北）人	**田　备**	**郝连梵**	
唐高宗	咸亨元年 庚午科	670	**宋守节**			
	上元二年 乙亥科	675	**郑　益**			
	开耀二年 壬午科	682	**许　且**			
武则天	垂拱元年 乙酉科	685	**吴师道** 《谈荟》卷二作吴道古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武则天	垂拱三年丁亥科	687	**陈伯玉** 射洪(今属四川)人			
唐中宗	神龙二年丙午科	706	**姚仲豫** 长溪(今福建霞浦)人			
唐睿宗	景云三年壬子科	712	**常无名** 温县(今属河南)人			
唐玄宗	开元二年甲寅科	714	**李　昂** 赵郡(今河北赵县)人			
	开元三年乙卯科	715	**李　诚** 顿邱(今河南浚县)人			
	开元四年丙辰科	716	**范崇凯** 内江(今属四川)人			
	开元十二年甲子科	724	**杜　绾**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			
	开元十四年丙寅科	726	**严　迪**			
	开元十五年丁卯科	727	**李　嶷**			
	开元十六年戊辰科	728	**虞　咸**			
	开元十七年己巳科	729	**王正卿**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玄宗	开元十九年辛未科	731	**王维** 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后徙家蒲州(今山西永济)。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科	733	**徐徵** 《谈荟》谓为上年状元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科	734	**李琚** 顿邱(今河南浚县)人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科	735	**贾至** 洛阳(今属河南)人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科	738	**崔曙** 宋州(今河南商丘)人			
	天宝元年壬午科	742	**王阅**			
	天宝二年癸未科	743	**刘单** 岐山(今属陕西)人			
	天宝三年甲申科	744	**赵岳**	**岑参** 祖籍南阳(今属河南),后徙江陵(今属湖北)。		
	天宝五年丙戌科	746	**羊袭吉**			
	天宝六年丁亥科	747	**杨护**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玄宗	天宝七年 戊子科	748	**杨誉**			
	天宝十年 辛卯科	751	**李巨卿**			
	天宝十二年 癸巳科	753	**杨儇**			
	天宝十三年 甲午科	754	**杨绚** 《谈荟》卷二作杨肱			
	天宝十四年 乙未科	755	**常衮**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			
	天宝十五年 丙申科	756	**卢庚**			
唐代宗	宝应二年 癸卯科	763	**洪源**			
	广德二年 甲辰科	764	**杨栖梧**			
	永泰元年 乙巳科	765	**萧遘**			
	大历四年 己酉科	769	**齐映** 高阳（今属河北）人			
	大历五年 庚戌科	770	**李搏**			
	大历六年 辛亥科	771	**王溆**		**章八元** 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县）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代宗	大历七年 壬子科	772	**张式** 南阳(今属河南)人			
	大历九年 甲寅科	774	**杨凭** 弘农(今河南灵宝)人			
	大历十年 乙卯科	775	**丁泽**	**王建** 颍川(治今河南许昌)人		
	大历十二年 丁巳科	777	**黎逢**			
	大历十三年 戊午科	778	**杨凝** 弘农(今河南灵宝)人，杨凭弟。			
	大历十四年 己未科	779	**王储**	**周渭** 淮阴(今江苏淮安)人		
唐德宗	建中元年 庚申科	780	**魏弘简** 巨鹿(今属河北)人			
	建中二年 辛酉科	781	**崔元翰** 博陵(治今河北定县)人。为京兆解头、及第状元、宏词敕头、直言极谏敕头，后被视为“四元”。	**崔敖** 崔元翰弟	**崔备** 许州(今河南许昌)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德宗	建中四年 癸亥科	783	**薛　展**			
	兴元元年 甲子科	784		**马　异** 睦州(今浙江建德)人		
	贞元元年 乙丑科	785	**郑全济**			
	贞元二年 丙寅科	786	**张正甫** 南阳(今属河南)人			
	贞元三年 丁卯科	787	**牛锡庶**			
	贞元五年 己巳科	789	**卢　顼**	**杨巨源** 蒲州(今山西永济)人		
	贞元七年 辛未科	791	**尹　枢** 阆州(今四川阆中)人			
	贞元八年 壬申科	792	**贾　棱** 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人	**陈　羽** 江东(今芜湖、南京长江以东)人	**欧阳詹** 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贞元九年 癸酉科	793	**苑　论** 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			
	贞元十年 甲戌科	794	**陈　讽**	**范传正** 顺阳(今河南邓县境西)人	**李逢吉** 陇西(今属甘肃)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德宗	贞元十二年 丙子科	796	**李程** 陇西(今属甘肃)人			
	贞元十三年 丁丑科	797	**郑臣源**			
	贞元十四年 戊寅科	798	**李随**			
	贞元十五年 己卯科	799	**封孟绅**			
	贞元十六年 庚辰科	800	**陈权**	**吴丹** 常州(今属江苏)人	**郑俞**	
	贞元十七年 辛巳科	801	**班肃** 东川(治今四川三台)人			
	贞元十八年 壬午科	802	**徐晦** 莆田(今属福建)人			
唐宪宗	元和元年 丙戌科	806	**武翊黄** 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府送为解头,及第为状元,宏词为敕头,时称"武三头"。			
	元和二年 丁亥科	807	**王源中** 琅琊(今山东临沂)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宪宗	元和三年 戊子科	808	**柳公权** 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			
	元和四年 己丑科	809	**韦　瓘** 桂州(今广西桂林)人			
	元和五年 庚寅科	810	**李顾行**	**李仍叔** 宗室渤海王李奉慈五世孙	**陈彦博**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元和七年 壬辰科	812	**李固言** 赵郡(今河北赵县)人			
	元和八年 癸巳科	813	**尹　极** 阆州(今四川阆中)人，尹枢弟。			
	元和九年 甲午科	814	**张又新** 陆泽(今河北深县)人。京兆解头，及第状元，博学宏词第一，时称“张三头”。			
	元和十一年 丙申科	816	**郑　澣** 清漳(治今河北肥乡县东)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宪宗	元和十三年戊戌科	818	**独孤樟** 清漳(治今河北肥乡县东)人			
	元和十四年己亥科	819	**韦谌**			
	元和十五年庚子科	820	**卢储** 朗州(今湖南常德)人			
唐穆宗	长庆三年癸卯科	823	**郑冠**			
	长庆四年甲辰科	824	**李群** 合肥(今属安徽)人			
唐敬宗	宝历元年乙巳科	825	**柳璟** 河东(治今山西永济)人			
	宝历二年丙午科	826	**裴俅** 济源(今属河南)人	**张知实**		
唐文宗	大和元年丁未科	827	**李郃**			
	大和二年戊申科	828	**韦筹**			
	大和四年庚戌科	830	**宋祁** 福州(今属福建)人	**杨发** 冯翊(今陕西大荔)人		
	大和五年辛亥科	831	**杜陟**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文宗	大和六年 壬子科	832	李珪			
	大和七年 癸丑科	833	**李余** 成都(今属四川)人			
	大和八年 甲寅科	834	**陈宽**			
	大和九年 乙卯科	835	**郑确** 《谈荟》卷二作郑璀			
	开成元年 丙辰科	836		**陈上美**		
	开成二年 丁巳科	837	**李肱** 谯(今安徽亳县)人	**张棠** 又作张堂	**沈黄中**	
	开成三年 戊午科	838	**裴思谦** 闻喜(今属山西)人			
	开成四年 己未科	839	**裴□**			
	开成五年 庚申科	840	**李从实**			
唐武宗	会昌元年 辛酉科	841	**崔峴**		**薛逢** 蒲州(治今山西永济)人	
	会昌二年 壬戌科	842	**郑颢** 河清(今河南孟县)人	**张潜** 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县东北)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武宗	会昌三年 癸亥科	843	卢肇 宜春(今属江西)人	丁棱	黄颇 宜春(今属江西)人	
	会昌四年 甲子科	844	郑言	项斯 江东(今芜湖、南京长江河段以东地区)人		
	会昌五年 乙丑科	845	易重 上高(今属江西)人			
	会昌六年 丙寅科	846	狄慎思			
唐宣宗	大中元年 丁卯科	847	顾标			
	大中二年 戊辰科	848	卢深			
	大中三年 己巳科	849	于珪 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人			
	大中四年 庚午科	850	张温琪			
	大中五年 辛未科	851	李郜			
	大中七年 癸酉科	853	于璟 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人。又作于瑰,为于珪弟。			
	大中八年 甲戌科	854	颜标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宣宗	大中十年丙子科	856	**崔铏** 博陵（治今河北定县）人			
	大中十二年戊寅科	858	**李亿**			
	大中十三年己卯科	859	**孔纬** 曲阜（今属山东）人，为孔子后裔。			
	大中十四年庚辰科	860	**刘蒙**			
唐懿宗	咸通二年辛巳科	861	**裴延鲁** 闻喜（今属山西）人			
	咸通三年壬午科	862	**薛迈**			
	咸通四年癸未科	863			**柳告** 河东（治今山西永济）人，为柳宗元之子。	
	咸通七年丙戌科	866	**韩衮** 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为韩愈次孙。			
	咸通八年丁亥科	867	**郑洪业**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懿宗	咸通九年戊子科	868	**赵峻** 福州(今属福建)人			
	咸通十年己丑科	869	**归仁绍** 吴郡(今江苏苏州)人			
	咸通十二年辛卯科	871	**李筠**			
	咸通十三年壬辰科	872	**郑昌图** 南阳(治今河南邓县)人			
	咸通十四年癸巳科	873	**孔緟** 曲阜(今属山东)人，孔纬弟。			
	咸通十五年甲午科	874	**归仁泽** 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归仁绍弟。			
唐僖宗	乾符二年乙未科	875	**郑合敬** 荥泽(治今河南郑州西北)人			
	乾符三年丙申科	876	**孔绒** 曲阜(今属山东)人，孔纬弟。			
	乾符五年戊戌科	878	**孙偓** 武邑(今河北武强)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僖宗	广明元年 庚子科	880	**郑　薳**			
	中和三年 癸卯科	883	**崔昭纬** 清河(今属河北)人			
	中和五年 乙巳科	885	**许祐孙**			
	光启二年 丙午科	886	**陆　扆** 祖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后徙家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西)。			
	光启四年 戊申科	888	**郑贻矩**			
唐昭宗	龙纪元年 乙酉科	889	**李　瀚** 《谈荟》卷二作张曙			
	大顺元年 庚戌科	890	**杨赞禹**			
	大顺二年 辛亥科	891	**崔昭矩** 清河(今属河北)人,崔昭纬弟。《谈荟》卷二作杜荀鹤,误。			
	景福元年 壬子科	892	**归　黯** 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归仁泽子。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昭宗	景福二年 癸丑科	893	**崔胶**			
	乾宁元年 甲寅科	894	**苏检** 吴郡(今江苏苏州)人			
	乾宁二年 乙卯科	895	**赵观文** 桂州(今广西桂林)人	**程晏**	**崔赏**	
	乾宁三年 丙辰科	896	**崔谔** 莆田(今属福建)人			
	乾宁四年 丁巳科	897	**杨赞图** 杨赞禹弟			
	乾宁五年 戊午科	898	**羊绍素**	**殷文圭** 青阳(今属安徽)人	**刘咸**	
	光化二年 己未科	899	**卢文焕**	**柳璨** 河东(治今山西永济)人		
	光化三年 庚申科	900	**裴格**			
	光化四年 辛酉科	901	**归佾** 苏州(今属江苏)人			
唐哀帝	天祐二年 乙丑科	905	**归係** 苏州(今属江苏)人,归佾弟。		**杨凝式** 华阴(今属陕西)人	
	天祐三年 丙寅科	906	**裴说**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唐哀帝	天祐四年 丁卯科	907	崔　脩			
后梁太祖	开平二年 戊辰科	908	崔　邈			
后梁末帝	贞明中		陈　逖 泉州(今属福建)人			
后唐庄宗	同光二年 甲申科	924	崔光表 祖籍清河(今属河北)，后家齐州(今山东济南)。			
	同光三年 乙酉科	925	王　彻 莘县(今属山东)人	桑维翰 洛阳(今属河南)人	符　蒙 昭庆(今河北隆尧东)人	
后唐明宗	天成元年 丙戌科	926	王归朴 简州(今四川简阳)人			
	天成二年 丁亥科	927	黄仁颖 泉州(今属福建)人			
	天成三年 戊子科	928	郭　峻			
	长兴元年 庚寅科	930	李　飞	樊　吉	夏侯珙	
	长兴三年 壬辰科	932	卢　华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后晋出帝	开运二年 乙巳科	945	**寇湘** 下邽(今陕西渭南)人			
后汉高祖	乾祐元年 戊申科	948	**王溥** 祁县(今属山西)人			
	乾祐二年 己酉科	949			**鞠恒** 高密(今山东东平县)人	
	乾祐三年 庚戌科	950	**王朴** 东平(今属山东)人			
后周太祖	广顺二年 壬子科	952	**窦载** 安次(今属河北)人			
后周世宗	显德二年 乙卯科	955	**李覃**	**何昉**	**杨徽之** 浦城(今属陕西)人	
	显德三年 丙辰科	956			**贾黄中** 南皮(今属河北)人	
	显德四年 丁巳科	957			**李度** 洛阳(今属河南)人	
	显德五年 戊午科	958	**刘坦**	**战贻庆**	**李颂**	
南汉高祖	乾亨四年 庚辰科	920	**简文会** 咸宁(今广州西北)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南汉高祖	白龙元年 乙酉科	925	**梁嵩** 桂平(今属广西)人			
南唐元宗	保大十年 壬子科	952	**王克贞** 庐陵(治今江西吉安)人			
	保大中		**伍乔** 庐江(今属安徽)人	**张洎** 南谯(今属安徽)人	**宋贞观**	
南唐后主	宋乾德二年	964	**王崇古**			
	宋乾德中		**乐史** 宜黄(今属江西)人			
	宋乾德中		**卢郢** 金陵(今江苏南京)人			
	宋开宝中		**邱旭** 宣城(今属安徽)人			
	宋开宝中		**邓及**	**罗颖** 南昌(今属江西)人		
	宋开宝五年	972	**杨遂**	**张观**	**曾颉**	
	宋开宝八年	975	**张确**			
后蜀后主	广政中		**王归** 简州(治今四川简阳)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太祖	建隆元年庚申科	960	**杨砺** 鄠县(今陕西户县)人	**同立舜**		
	建隆二年辛酉科	961	**张去华** 襄邑(今河南睢县)人			
	建隆三年壬戌科	962	**马适** 湖口(今属江西)人			
	建隆四年癸亥科	963	**苏德祥** 高密(今属山东)人			
	乾德二年甲子科	964	**李景阳**			
	乾德三年乙丑科	965	**刘察**			
	乾德四年丙寅科	966	**李肃** 阳武(今河南原阳)人	**毕士安** 本云中(今山西大同)人，后到郑州(今属河南)求师，遂为郑州人。		
	乾德五年丁卯科	967	**刘蒙叟** 宁陵(今属河南)人			
	乾德六年戊辰科	968	**柴成务** 济阴(今山东荷泽)人			
	开宝二年己巳科	969	**安德裕** 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人	**王猷可**	**董循**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太祖	开宝三年庚午科	970	张拱	王诜	张茂直 瑕丘（今山东兖州）人	
	开宝四年辛未科	971	刘寅	卫价	刘琼	
	开宝五年壬申科	972	安守亮 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人，安德裕子。			
	开宝六年癸酉科	973	宋准 雍丘（今河南杞县）人	贾源	范翔	
	开宝八年乙亥科	975	王嗣宗 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人	陈识		王式 曲江（治今广东韶关）人
宋太宗	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科	977	吕蒙正 洛阳（今属河南）人	李至 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王相 金华（今属浙江）人	
	太平兴国三年戊寅科	978	胡旦 渤海（治今山东滨县）人	田锡 洪雅（今属四川）人	赵昌言 孝义（今属山西）人	赵昌言
	太平兴国五年庚辰科	980	苏易简 盐泉（今四川绵阳）人			
	太平兴国八年癸未科	983	王世则 长沙（今属湖南）人；一说永福（今属广西）人。			王禹偁 钜野（今山东巨野）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太宗	雍熙二年 乙酉科	985	**梁颢** 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	**张惟明**	**洪湛** 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统类》作裴湛,误。	**陈充** 成都(今属四川)人
	端拱元年 戊子科	988	**程宿** 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人。《谈荟》卷二作叶齐,建阳(今属福建)人。	**王扶** 成安(今属河北)人	**陈尧佐** 阆中(今属四川)人	**程宿**
	端拱二年 己丑科	989	**陈尧叟** 阆中(今属四川)人,陈尧佐兄。	**曾会** 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姚揆**	**陈尧叟**
	淳化三年 壬辰科	992	**孙何** 汝阳(今河南汝南)人	**朱台符** 眉山(今属四川)人	**路振** 祁阳(今属湖南)人	**孙何** 系三元及第者
宋真宗	咸平元年 戊戌科	998	**孙仅** 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孙何弟。	**黄宗旦** 惠安(今属福建)人	**朱严**	**孙仅**
	咸平二年 己亥科	999	**孙暨** 开封(今属河南)人;一说汝州(治今河南临汝)人。	**高辅尧** 峡石(今宁夏青铜峡)人	**钱易**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孙暨**
	咸平三年 庚子科	1000	**陈尧咨** 阆中(今属四川)人,陈尧叟弟。	**周起** 邹平(今属山东)人	**胡用**	**李庶几**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 真宗	咸平五年壬寅科	1002	**王曾** 益都(今属山东)人	**陈知微** 高邮(今属江苏)人	**李天锡**	**王曾** 系三元及第者
	景德二年乙巳科	1005	**李迪** 鄄城(今属山东)人	**夏侯麟**	**李谘** 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刘滋** 崇安(今属福建)人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科	1008	**姚晔** 商水(今属河南)人	**祖士衡** 上蔡(今属河南)人	**郑向** 陈留(今河南开封)人	**郑向**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科	1009	**梁固** 须城(今山东东平)人,梁颢子。	**宋程**	**麻温其** 临淄(今属山东人).《辑稿·选举二》作麻温舒。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科	1011	**张师德** 襄邑(今河南睢县)人,张去华子。	**丁度** 祥符(治今河南开封)人。《醴陵县志》谓其为醴陵(今属湖南)人。	**陈宽**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科	1012	**徐奭** 瓯宁(今福建建瓯)人	**明镐** 安丘(今属山东)人	**徐杲**	
	大中祥符七年甲寅科	1014	**张观** 绛县(今属山西)人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科	1015	**蔡齐** 胶水(今山东平度)人	**王举正** 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高俅**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真宗	天禧三年 己未科	1019	王整 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人	程戡 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常禹锡	程戡
宋仁宗	天圣二年 甲子科	1024	宋郊 安陆(今属湖北)人,后改名宋庠。	叶清臣 长洲(治今江苏苏州)人	郑戬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吴感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天圣五年 丁卯科	1027	王尧臣 虞城(今属河南)人	韩琦 安阳(今属河南)人	赵概 虞城(今属河南)人	吴育 浦城(今属福建)人
	天圣八年 庚午科	1030	王拱辰 咸平(今河南通许)人	刘沆 永新(今属江西)人	孙抃 眉山(今属四川)人	欧阳修 庐陵(治今江西吉安)人
	景祐元年 甲戌科	1034	张唐卿 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人	杨察 合肥(今属安徽)人	徐绶	黄庠 分宁(治今江西修水)人
	宝元元年 戊寅科	1038	吕溱 扬州(今属江苏)人	李绚 依政(治今四川邛崃)人	祖无择 上蔡(今属河南)人	范镇 华阳(今四川成都)人
	庆历二年 壬午科	1042	杨寘 合肥(今属安徽)人	王珪 华阳(今四川成都)人	韩绛 雍丘(今河南杞县)	杨寘 系三元及第者
	庆历六年 丙戌科	1046	贾黯 穰县(今河南邓县)人;一说南阳(今属河南)人。	刘敞 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谢仲弓	裴煜 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皇祐元年 己丑科	1049	冯京 江夏(今湖北武昌)人	沈遘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辑稿》作沈达,误。	钱公辅 武进(今属江苏)人	冯京 系三元及第者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仁宗	皇祐五年 癸巳科	1053	**郑獬** 安陆(今属湖北)人	**杨绘** 绵竹(今属四川)人	**滕甫**	**徐无党** 永康(今属浙江)人
	嘉祐二年 丁酉科	1057	**章衡** 浦城(今属福建)人。《通考·选举五》与《梦粱录·状元表》均作张衡,误。	**窦卞** 冤句(今山东曹县)人	**罗恺**	**李实** 河南(治今河南洛阳)人
	嘉祐四年 己亥科	1059	**刘辉** 铅山(今属江西)人	**胡宗愈** 晋陵(治今江苏常州)人	**安焘** 开封(今属河南)人	**刘挚** 东光(今属河北)人
	嘉祐六年 辛丑科	1061	**王俊民** 掖县(今属山东)人	**陈瓘** 莆田(今属福建)人	**王陟臣** 虞城(今属河南)人	**江衍** 兰陵(治今山东枣庄)人
	嘉祐八年 癸卯科	1063	**许将**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陈轩** 建阳(今属福建)人	**左仲通**	**孔武仲** 新喻(今江西新余)人
宋英宗	治平二年 乙巳科	1065	**彭汝砺** 鄱阳(今江西波阳)人	**薛向** 万泉(今山西万荣县)人	**贾昌朝** 获鹿(今属河北)人	**舒亶** 慈溪(今属浙江)人
	治平四年 丁未科	1067	**许安世** 襄邑(今河南睢县)人	**何洵直**	**郭仪** 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人	**许安世**
宋神宗	熙宁三年 庚戌科	1070	**叶祖洽** 邵武(今属福建)人	**陆佃**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程尧佐**	**陆佃**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神宗	熙宁六年 癸丑科	1073	**余中** 宜兴(今属江苏)人。《梦梁录》作俞中,误。《辑稿》作余忠,亦不确。	**朱服** 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邵刚** 宜兴(今属江苏)人	**邵刚**
	熙宁九年 丙辰科	1076	**徐铎** 莆田(今属福建)人;一说邵武(今属福建)人。《梦梁录》作徐绎,误。	**王任** 成都(今属四川)人	**陈师锡** 浦城(今属福建)人	**张嵲** 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
	元丰二年 己未科	1079	**时彦** 开封(今属河南)人	**陈瓘** 沙县(今属福建)人		**先浚明**
	元丰五年 壬戌科	1082	**黄裳** 延平(今福建南平)人	**刘案**	**张驯**	**刘概** 无为(今属安徽)人
	元丰八年 乙丑科	1085	**焦蹈** 无为(今属安徽)人;一说合肥(今属安徽)人。	**刘逵** 随县(今属湖北)人	**徐处仁** 谷熟(今河南商丘县)人	**焦蹈**
宋哲宗	元祐三年 戊辰科	1088	**李常宁** 廉延(今河南延津)人;一说开封(今属河南)人。	**吕益柔** 《统类》卷二十七载第二名为刘寿。	**龚夬** 瀛州(治今河北河间)人。《辑稿》作龚史,误。《统类》载第三名为章援。	**章援** 浦城(今属福建)人,徙苏江(今属江苏),居长兴(今属浙江)。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哲宗	元祐六年 辛未科	1091	**马涓** 保宁(今四川理县)人。《辑稿》与《统类》均作冯涓。	**朱绂** 仙游(今属福建)人	**张庭坚** 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县)人	**邹起**
	绍圣元年 甲戌科	1094	**毕渐** 潜江(今属湖北)人。《谈荟》作毕诚,误。	**赵谂**	**岑穰**	**刘范**
	绍圣四年 丁丑科	1097	**何昌言** 临江(今属江西)人	**方天若** 莆田(今属福建)人	**胡安国** 崇安(今属福建)人	**汪革** 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宋徽宗	元符三年 庚辰科	1100	**李釜** 淮水(今江苏北部)人;一说大名(今属河北)人。《通考》作李鉴。	**范致明** 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张邦昌** 东光(今属河北)人	**李釜**
	崇宁二年 癸未科	1103	**霍端友** 武进(今属江苏)人;一说宜兴(今属江苏)人。	**蔡佃** 仙游(今属福建)人	**宇文粹中** 华阳(今四川成都)人	**李阶** 光泽(今属福建)人
	崇宁五年 丙戌科	1106	**蔡薿** 开封(今属河南)人。或作蔡嶷。	**唐绍**	**杨郁胜**	**吴倜** 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宋徽宗	大观三年 己丑科	1109	**贾安宅** 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杨浑**	**唐重** 彭山(今属四川)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徽宗	政和二年壬辰科	1112	**莫俦**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	**程洵武**	**万俟离** 阳武(今河南原阳)人	
	政和五年乙未科	1115	**何栗** 仙井监(治今四川仁寿)人	**潘良贵** 金华(今属浙江)人	**郭孝友** 吉安龙泉(今江西遂川县)人	
	政和八年戊戌科	1118	**王昂** 成都(今属四川)人;一说江都(今江苏扬州)人。	**赵楷** 徽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后封郓王。	**周天衢**	
	宣和三年辛丑科	1121	**何渙** 永康(今属浙江)人	**宋齐愈** 蜀人(今四川)	**范宗羽**	
	宣和六年甲辰科	1124	**沈晦**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周执羔** 弋阳(今属四川)人	**王翼**	**杨椿** 眉山(今属四川)人
宋高宗	建炎二年戊申科	1128	**李易** 江都(今江苏扬州)人			
	绍兴二年壬子科	1132	**张九成**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凌景夏** 余杭(今属浙江)人		
	绍兴五年乙卯科	1135	**汪应辰** 玉山(今属江西)人,初名汪洋。	**黄中** 邵武(今属福建)人		**樊光远**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绍兴八年戊午科	1138	**黄公度** 莆田(今属福建)人	**黄贡** 仁春(今属四川)人	**林格** 或谓陈敏修(福州人)	**黄公度**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高宗	绍兴十二年壬戌科	1142	**陈诚之**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秦熺**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许用** 《要录》卷一四五载第三名为杨邦弼	**何溥**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绍兴十五年乙丑科	1145	**刘章** 龙游(今浙江衢县东北)人	**王刚中** 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	**许必胜** 金坛(今属江苏)人	**林机** 长乐(今广东五华)人
	绍兴十八年戊辰科	1148	**王佐**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董德元** 永丰(今属江西)人	**陈孺** 临川(今江西抚州)人	**徐履** 瑞安(今属浙江)人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科	1151	**赵逵** 磐石(今四川资中)人。《谈荟》作赵造,误。			**郑闻** 开封(今属河南)人
宋宗	绍兴二十四年甲戌科	1154	**张孝祥** 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	**曹冠** 东阳(今属浙江)人	**秦塤**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秦塤**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科	1157	**王十朋** 乐清(今属浙江)人	**阎安中** 晋原(治今四川崇庆)人	**梁介** 双流(今属四川)人	**张宋卿** 博罗(今属广东)人
	绍兴三十年庚辰科	1160	**梁克家** 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许克昌** 襄邑(今河南睢县)人		**刘朔** 莆田(今属福建)人
宋孝宗	隆兴元年癸未科	1163	**木待问**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黄洽** 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丘崈** 江阴(今属江苏)人	**木待问**
	乾道二年丙戌科	1166	**萧国梁** 永福(今福建永泰)人;一说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赵汝愚** 余干(今属江西)人	**赵烨** 开封(今属河南)人	**何澹** 龙泉(今属浙江)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孝宗	乾道五年己丑科	1169	郑侨 永福(今福建永泰)人;一说莆田(今属福建)人。	石起宗 同安(今安徽桐城)人	汪义端 黟县(今属安徽)人	方恬 歙县(今属安徽)人
	乾道八年壬辰科	1172	黄定 永福(今福建永泰)人	黄艾 莆田(今属福建)人	刘卞	蔡幼学 瑞安(今属浙江)人
	淳熙二年乙未科	1175	詹骙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罗点 崇仁(今属江西)人	邓驯	章颖 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县西南)人
	淳熙五年戊戌科	1178	姚颖 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叶适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李寅仲 广汉(今四川射洪)人	黄涣 光泽(今属福建)人
	淳熙八年辛丑科	1181	黄由 长洲(治今江苏苏州)人	王爽	张伯源	俞烈
	淳熙十一年甲辰科	1184	卫泾 昆山(今属江苏)人	陈稼 温州(今属浙江)人	王公迈	邵康 金华(今属浙江)人
	淳熙十四年丁未科	1187	王容 湘乡(今属湖南)人;一说湘阴(今属湖北)人。	陈元	王居安 黄岩(今属浙江)人	汤琦 浏阳(今属湖南)人
宋光宗	绍熙元年庚戌科	1190	余复 宁德(今属福建)人	曾渐 南城(今河南孟津西南)人	王介 金华(今属浙江)人	钱易直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光宗	绍熙四年 癸丑科	1193	**陈亮** 永康(今属浙江)人	**朱质** 义乌(今属浙江)人	**黄中** 平阳(今湖南桂阳)人	**徐邦宪** 义乌(今属浙江)人
宋宁宗	庆元二年 丙辰科	1196	**邹应龙** 泰宁(今属福建)人	**莫子纯**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夏明承** 金华(今属浙江)人	**莫子纯**
	庆元五年 己未科	1199	**曾从龙** 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许奕** 简州(治今四川简阳)人	**魏了翁** 蒲江(今属四川)人	**苏大璋** 古田(今属福建)人
	嘉泰二年 壬戌科	1202	**傅行简** 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乔哲**	**谢汲古**	**傅行简**
	开禧元年 乙丑科	1205	**毛自知** 西安(今浙江衢县)人	**赵甲**	**求淳** 天台(今属浙江)人	**林执善**
	嘉定元年 戊辰科	1208	**郑自诚** 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后改名性之。《宋历科状元录》作郑自成,不确。	**孙德舆** 福清(今属福建)人	**黄桂** 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宋倚** 《文献通考》作朱停
	嘉定四年 辛未科	1211	**赵建大**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或作赵建夫,或作赵建太,俱误。	**姚瑶** 顺昌(今属福建)人	**孙望之**	**周端朝**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嘉定七年 甲戌科	1214	**袁甫** 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汪介**	**李方子** 邵武(今属福建)人	**姚宏中** 海阳(今广东潮安)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宁宗	嘉定十年 丁丑科	1217	**吴潜** 宁国(今属安徽)人	**孙挟**	**费西之**	**陈塤** 鄞县(今浙江宁波)人
	嘉定十三年 庚辰科	1220	**刘渭** 金华(今属浙江)人	**董洪**	**任友龙**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邱大发**
	嘉定十六年 癸未科	1223	**蒋重珍** 无锡(今属江苏)人	**蔡仲龙** 丽水(今属浙江)人	**赵发** 江阴(今属江苏)人	**王胄** 晋江(今福建泉州)人
宋理宗	宝庆二年 丙戌科	1226	**王会龙** 临海(今属浙江)人			**王会龙**
	绍定二年 己丑科	1229	**黄朴** 福州(今属福建)人			**陈松年**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绍定五年 壬辰科	1232	**徐元杰** 上饶(今属江西)人			**叶大有** 仙游(今属福建)人
	端平二年 乙未科	1235	**吴叔告** 莆田(今属福建)人。《谈荟》卷二作吴叔诰。			**杨茂子**
	嘉熙二年 戊戌科	1238	**周坦**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一说平阳(今湖南桂阳)人。《梦梁录》作周垣,误。	**邵泽**		**缪烈** 福安(今属福建)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理宗	淳祐元年辛丑科	1241	**徐俨夫** 平阳(今湖南桂阳)人			**刘自**
	淳祐四年甲辰科	1244	**留梦炎** 衢州(今浙江衢县)人			**徐霖** 西安(今浙江衢县)人
	淳祐七年丁未科	1247	**张渊微** 新城(今江西黎川)人。《梦梁录》作张渊徽。			**马廷鸾** 乐平(今属江西)人
	淳祐十年庚戌科	1250	**方逢辰** 淳安(今属浙江)人			**陈应雷**
	宝祐元年癸丑科	1253	**姚勉** 高安(今属江西)人;一说新昌(今江西宜丰)人。			**丁应奎** 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人
	宝祐四年丙辰科	1256	**文天祥** 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陈赏** 怀安(今福建福州西北)人	**杨起莘** 通城(今属湖北)人	**彭方迥** 吉水(今属江西)人
	开庆元年己未科	1259	**周震炎** 当涂(今属安徽)人			**李雷奋**
	景定三年壬戌科	1262	**方山京** 慈溪(今浙江宁波)人;一说余姚(今属浙江)人。			**李珏** 吉水(今属江西)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宋度宗	咸淳元年乙丑科	1265	**阮登炳** 其先由闽(今福建福州)徙吴(今江苏苏州);一说平江(今湖南桂阳)人。			**阮登炳**
	咸淳四年戊辰科	1268	**陈文龙** 兴化(今福建莆田)人			**胡跃龙**
	咸淳七年辛未科	1271	**张镇孙**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	**杜文甫** 临海(今属浙江)人	**陈　钺** 当涂(今属安徽)人	**刘梦荐**
	咸淳十年甲戌科	1274	**王龙泽** 义乌(今属浙江)人	**路万里**	**胡幼黄** 永新(今属江西)人	**李大同** 嘉鱼(今属湖北)人
辽圣宗	统和六年戊子科	988	**高　举**			
	统和七年己丑科	989	**高　正**			
	统和八年庚寅科	990	**郑云从**			
	统和九年辛卯科	991	**石用中**			
	统和十一年癸巳科	993	**王熙载**			
	统和十二年甲午科	994	**吕德懋**			
	统和十三年乙未科	995	**王用极**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辽 圣 宗	统和十四年丙申科	996	**张俭** 南京宛平(今北京)人			
	统和十五年丁酉科	997	**陈鼎**			
	统和十六年戊戌科	998	**杨又立** 又作杨又玄			
	统和十七年己亥科	999	**初锡**			
	统和十八年庚子科	1000	**南承保**			
	统和二十年壬寅科	1002	**邢祥**			
	统和二十二年甲辰科	1004	**李可封**			
	统和二十四年丙午科	1006	**杨佶** 南京(今北京)人			
	统和二十六年戊申科	1008	**史克忠**			
	统和二十七年己酉科	1009	**刘二宜**			
	统和二十九年辛亥科	1011	**高承颜**			
	开泰元年壬子科	1012	**史简**			
	开泰二年癸丑科	1013	**鲜于昭茂**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辽圣宗	开泰三年甲寅科	1014	张用行			
	开泰五年丙辰科	1016	孙杰			
	开泰七年戊午科	1018	张克恭			
	开泰九年庚申科	1020	张仲举			
	太平二年壬戌科	1022	张渐			
	太平四年甲子科	1024	李炯			
	太平五年乙丑科	1025	张昱			
	太平八年戊辰科	1028	张宥			
	太平九年己巳科	1029	张人纪	赵睦		
辽兴宗	景福元年辛未科	1031	刘贞			
	重熙元年壬申科	1032	刘师贞			
	重熙五年丙子科	1036	冯立	赵徽 南京(今北京)人		
	重熙七年戊寅科	1038	邢彭年			
	重熙十一壬午科	1042	王寔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辽兴宗	重熙十五年丙戌科	1046	王棠 涿州新城(今属河北)人			王棠 系三元及第者
辽道宗	清宁元年乙未科	1055	张孝杰 建州永霸(今辽宁朝阳)人			
	清宁五年己亥科	1059	梁援			
	清宁八年壬寅科	1062	王鼎			
	咸雍二年丙午科	1066	张臻			
	咸雍六年庚戌科	1070	赵廷睦			
	咸雍十年甲寅科	1074	刘霄			
	太康五年己未科	1079	刘瓘			
	太康九年癸亥科	1083	李君裕			
	大安二年丙寅科	1086	张毅			
	大安六年庚午科	1090	文充			
	大安八年壬申科	1092	寇尊文			
	寿昌元年乙亥科	1095	陈衡甫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辽道宗	寿昌六年 庚辰科	1100	**康秉俭**			
天祚帝	乾统三年 癸未科	1103	**马恭回**			
	乾统七年 丁亥科	1107	**李　石** 后更名安弼			
	乾统九年 己丑科	1109	**刘　桢**			
	天庆二年 壬辰科	1112	**韩　昉** 燕京(今北京)人			
	天庆八年 戊戌科	1118	**王　翥**			
北辽	建福元年 壬寅科	1122	**李宝信**			
	德兴元年 壬寅科	1122	**李　球**			
金太宗	天会四年 丙午科	1126	**许　必**			
	天会七年 己酉科	1129	**孙九鼎** 忻州(今山西忻县)人			
	天会十年 壬子科	1132	**胡　砺** 武安(今属河北)人			
金熙宗	天眷二年 己未科	1139	**石　琚** 定州(今河北定县)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海陵王	天德三年 辛未科	1151	**杨建中** **王彦潜**		**郑子聃** 后为正隆时状元	
	贞元二年 甲戌科	1154	**吕忠翰**			
	正隆二年 丁丑科	1157	**郑子聃** 大定府(治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人			
	正隆五年 庚辰科	1160	**常大荣**			
金世宗	大定三年 癸未科	1163	**孟宗献** 开封(今属河南)人			**孟宗献** 乡、府、省、御试皆第一,时号孟四元。
	大定初		**任忠杰**			
	大定十三年 癸巳科	1173	**徒单镒** 上京路(治今黑龙江阿城)速速保子猛安人			
	大定中		**赵承元**			
	大定十九年 己亥科	1179	**张行简** 日照(今属山东)人			
金章宗	明昌二年 辛亥科	1191	**王　泽**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金章宗	明昌五年甲寅科	1194	**杨云翼** 乐平(今山西昔阳)人			
	承安二年丁巳科	1197	**纳兰胡鲁剌** 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怕鲁欢猛安人			
	承安五年庚申科	1200	**李俊民** 晋城(今属山西)人	**郭伯英** 上党(今属山西)人	**刘从谦** 安邑(今山西运城)人	
	泰和六年丙寅科	1206	**李　演** 任城(今山东济宁)人			
卫绍王	至宁元年癸酉科	1213	**商　衡** 济阴(今山东荷泽)人			
金宣宗	贞祐元年癸酉科	1213	**张　本**			
	贞祐三年乙亥科	1215	**李献能** 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人			
	兴定二年戊寅科	1218	**王　彪**			
	兴定五年辛巳科	1221	**斡勒业德** **刘　海** 姑置此年。兴州(今河北滦平西)人。			**麻九畴** 易州(今河北易县)人。经义科第一。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金哀宗	正大元年甲申科	1224	孛术鲁长哥 王鹗 东明(今属山东)人			
	正大四年丁亥科	1227	卢亚			
	正大七年庚寅科	1230	李塘			
元仁宗	延祐二年乙卯科	1315	护都沓儿 张起岩 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马祖常 光州(今河南黄州县境)人		马祖常
	延祐五年戊午科	1318	忽都达儿 居澧阳(今属湖南) 霍希贤 澧州(今属湖南)人			
元英宗	至治元年辛酉科	1321	泰普化 居台州(今浙江临海) 宋本 大都(今北京)人			
泰定帝	泰定元年甲子科	1324	八剌 又作捌剌 张益 西河(治今山西汾阳)人			王守诚 阳曲(今属山西)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泰定帝	泰定四年 丁卯科	1327	**阿察赤** **李翀** 颍州(今安徽阜阳)人	**刘思诚** 镇江(今属江苏)人	**徐容** 信州(今江西上饶)人	
元文宗	至顺元年 庚午科	1330	**笃列图** 居永丰(今属江西) **王文烨** 邹平(今属山东)人			
元顺帝	元统元年 癸酉科	1333	**同同** 居真定(今河北正定) **李齐** 蒲阴(今河北安国)人	**余阙** 居合肥(今属安徽) **李祁** 茶陵(今属湖南)人	**寿同海涯** 居绍兴(今属浙江) **罗谦** 穰县(今河南邓县境)人	
	至正二年 壬午科	1342	**拜住** **陈祖仁** 汴梁(今河南开封)人			
	至正五年 乙酉科	1345	**普颜不花** **张士坚**			
	至正八年 戊子科	1348	**阿鲁辉帖木儿** **王宗哲** 无极(今属河北)人			**王宗哲** 系三元及第者
	至正十一年 辛卯科	1351	**朵烈图** **文允中** 成都(今属四川)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元顺帝	至正十四年甲午科	1354	薛朝晤 牛继志 武强(今属河北)人			
	至正十七年丁酉科	1357	悦徵 王宗嗣			
	至正二十年庚子科	1360	买住 魏元礼 肃宁(今属河北)人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科	1363	宝宝 杨辑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科	1366	赫德溥化 张栋			
明太祖	洪武四年辛亥科	1371	吴伯宗 金溪(今属江西)人	郭翀 壶关(治今山西长治北)人	吴公达 丽水(今属浙江)人	俞友仁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	1385	丁显 建阳(今属福建)人	练子宁 新淦(今江西新干县)人	黄子澄 分宜(今属江西)人	黄子澄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	1388	任亨泰 襄阳(今属湖北)人	唐震 闽县(今福建闽侯)人	卢原质 宁海(今属浙江)人	施显 直隶常熟(今属江苏)人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	1391	许观 贵池(今属安徽)人,后改本姓黄。	张显宗 宁化(今属福建)人	吴言信 邵武(今属福建)人。或作吴慎言。	许观 系三元及第者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科	1394	张信 定海(今属浙江)人	景清 真宁(今甘肃正宁县)人,本耿姓,讹作"景"。	戴德彝 奉化(今属浙江)人	彭泰 凤翔(今属陕西)人。或作彭德。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太祖	洪武三十年丁丑科	1397	**陈郯**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上为春榜**	**尹昌隆** 泰和(今属江西)人	**刘仕谔**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宋琮** 泰和(今属江西)人。或作朱琮。
			韩克忠 武城(今属山东)人 **上为夏榜**	**王恕** 长清(今属山东)人	**焦胜** 乐平(今属江西)人	**任伯安** 归德州(治今河南商丘)人。或作伏伯安。
明惠帝	建文二年庚辰科	1400	**胡广**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赐名靖,后更原名。	**王艮**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李贯**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吴溥** 崇和(今属江西)人
明成祖	永乐二年甲申科	1404	**曾棨** 永丰(治今江西广丰)人	**周述**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周孟简**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杨相** 泰和(今属江西)人
	永乐四年丙戌科	1406	**林环** 莆田(今属福建)人	**陈全** 长乐(今福州市)人	**刘素** 永丰(治今江西广丰)人	**朱缙** 永丰(治今江西广丰)人
	永乐九年辛卯科	1411	**萧时中** 庐陵(治今江西吉安西南)人	**苗衷** 直隶定远(今属安徽)人	**黄旸** 莆田(今属福建)人	**陈燧** 临海(今属浙江)人。或作陈璲。
	永乐十年壬辰科	1412	**马铎** 长乐(今福州市)人	**林誌**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王钰** 诸暨(今浙江绍兴)人	**林誌**
	永乐十三年乙未科	1415	**陈循** 泰和(今属江西)人	**李贞** 南靖(今属福建)人	**陈景著**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洪英** 怀安(今属福建)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成祖	永乐十六年戊戌科	1418	**李骐** 长乐(今福州市)人，本名李马。	**刘江** 江宁(今南京)人	**邓珍**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董璘** 高邮(今属江苏)人
	永乐十九年辛丑科	1421	**曾鹤龄** 泰和(今属江西)人	**刘矩** 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县)人	**裴伦** 湖广监利(今属湖北)人	**陈中** 莆田(今属福建)人
	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科	1424	**邢宽** 无为州(治今安徽无为县)人	**梁禋** 宛平(今北京)人	**孙日恭** 丰城(今属江西)人	**叶恩** 临海(今属浙江)人
明宣宗	宣德二年丁未科	1427	**马愉** 临朐(今属山东)人	**杜宁** 天台(今属浙江)人	**谢琏** 龙溪(治今漳州市东南)人	**赵鼎** 黄严(今属浙江)人
	宣德五年庚戌科	1430	**林震** 长泰(今属福建)人	**龚锜** 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林文** 莆田(今属福建)人	**陈诏** 青田(今属浙江)人
	宣德八年癸丑科	1433	**曹鼐** 宁晋(今属河北)人	**赵恢** 连江(今属福建)人	**钟复** 永丰(治今江西广丰)人	**刘哲** 万安(今属江西)人
明英宗	正统元年丙辰科	1436	**周旋**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陈文** 庐陵(治今江西吉安西南)人	**刘定之** 永丰(治今江西广丰)人	**刘定之**
	正统四年己未科	1439	**施槃** 吴县(今属江苏)人	**杨鼎** 咸宁(今陕西长安县)人	**倪谦** 应天府上元(今南京)人	**杨鼎**
	正统七年壬戌科	1442	**刘俨**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吕原**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县)人	**黄谏** 高邮(今属江苏)人，后徙兰州。	**姚夔** 桐庐(今属浙江)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英宗	正统十年乙丑科	1445	**商辂** 淳安(今属浙江)人	**周洪谟** 长宁(今属四川)人	**刘俊** 宝鸡(今属陕西)人	**商辂** 系三元及第者
	正统十三年戊辰科	1448	**彭时** 安福(今属江西)人	**陈鉴**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岳正** 顺天府漷县(治今北京通县东南)人	**岳正**
明代宗	景泰二年辛未科	1451	**柯潜** 莆田(今属福建)人	**刘升** 永新(今属江西)人	**王俁** 武进(今属江苏)人	**吴汇** 新喻(今属江西)人
	景泰五年甲戌科	1454	**孙贤** 杞县(今属河南)人	**徐溥** 宜兴(今属江苏)人	**徐镐** 武进(今属江苏)人。或作徐辖。	**彭华** 安福(今属江西)人
明英宗	天顺元年丁丑科	1457	**黎淳** 华容(今属湖南)人	**徐琼** 金溪(今属江西)人	**陈秉中** 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夏积**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天顺四年庚辰科	1460	**王一夔** 新建(治今南昌市西)人。后复其本姓谢。	**李永通** 长宁(今属四川)人	**郑环**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陈选** 临海(今属浙江)人
	天顺八年甲申科	1464	**彭教**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吴钺** 昆山(今属江苏)人	**罗璟** 泰和(今属江西)人	**吴钺** 或作吴钺
明宪宗	成化二年丙戌科	1466	**罗伦** 永丰(治今江西广丰县)人	**程敏政** 休宁(今安徽芜湖)人	**陆简** 武进(今属江苏)人	**章懋** 兰溪(今属浙江)人
	成化五年己丑科	1469	**张升** 南城(今江西南昌)人	**丁溥**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董越** 宁都(今属江西)人	**费闾** 丹徒(今属江苏)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宪宗	成化八年 壬辰科	1472	吴宽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刘震 安福(今属江西)人	李仁杰 莆田(今属福建)人	吴宽
	成化十一年 乙未科	1475	谢迁 余姚(今属浙江)人	刘戬 安福(今属江西)人	王鏊 吴县(今属江苏)人	王鏊
	成化十四年 戊戌科	1478	曾彦 泰和(今属江西)人	杨守阯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曾追 泰和(今属江西)人	梁储 顺德(今属广东)人
	成化十七年 辛丑科	1481	王华 余姚(今属浙江)人	黄珣 余姚(今属浙江)人	张天瑞 清平(治今山东高唐)人	赵宽 吴江(今属江苏)人
	成化二十年 甲辰科	1484	李旻 钱塘(今浙江杭县)人	白钺 南宫(今属河北)人	王敕 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储巏 泰州(今江西泰县)人
	成化二十三年 丁未科	1487	费宏 铅山(今属江西)人	刘春 巴县(今属四川)人	涂瑞 番禺(今广东广州)人	程楷 乐平(今属江西)人
明孝宗	弘治三年 庚戌科	1490	钱福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刘存业 东莞(今属广东)人	靳贵 丹徒(今属江苏)人	钱福
	弘治六年 癸丑科	1493	毛澄 昆山(今属江苏)人	徐穆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罗钦顺 泰和(今属江西)人	汪俊 弋阳(今属江西)人
	弘治九年 丙辰科	1496	朱希周 昆山(今属江苏)人	王瓒 永嘉(今浙江温州)人	陈澜 宛平(今北京)人	陈澜
	弘治十二年 己未科	1499	伦文叙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	丰熙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刘龙 襄垣(今属山西)人	伦文叙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孝宗	弘治十五年 壬戌科	1502	**康海** 武功(今属陕西)人	**孙清** 武清(今属天津)人	**李廷相** 濮州(治今山东范县西南)人	**鲁铎** 景陵(今湖北天门县)人
	弘治十八年 乙丑科	1505	**顾鼎臣** 昆山(今属江苏)人	**董玘**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谢丕** 余姚(今属浙江)人	**董玘**
明武宗	正德三年 戊辰科	1508	**吕柟** 高陵(今属陕西)人	**景旸** 仪真(治今江苏仪征)人,著籍上元(今南京)。	**戴大宾** 甫田(今属福建)人	**邵锐** 仁和(今杭州杭县)人
	正德六年 辛未科	1511	**杨慎** 新都(今属四川)人	**余本**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邹守益** 安福(今属江西)人	**邹守益**
	正德九年 甲戌科	1514	**唐皋** 歙县(今属安徽)人	**黄初** 贵溪(今属江西)人	**蔡昂** 直隶淮安卫(今江苏淮阴)人	**霍韬**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
	正德十二年 丁丑科	1517	**舒芬** 进贤(今属江西)人	**伦以训**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	**崔桐** 海门(今属江苏)人	**伦以训**
	正德十六年 辛巳科	1521	**杨维聪** 固安(今属河北)人	**陆针**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费懋中** 铅山(今属江西)人	**张治** 茶陵(今属湖南)人
明世宗	嘉靖二年 癸未科	1523	**姚涞** 慈溪(今属浙江)人	**王教** 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徙家仪封(今河南兰考)。	**徐阶**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李舜臣** 乐安(治今山东惠民县)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 世 宗	嘉靖五年丙戌科	1526	**龚用卿** 怀安(治今福州市西北)人	**杨维杰** 固安(今属河北)人。或作杨惟杰。	**欧阳衢** 泰和(今属江西)人	**赵时春** 平凉(今属甘肃)人
	嘉靖八年己丑科	1529	**罗洪先**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程文德** 永康(今属浙江)人	**杨名** 遂宁(今属四川)人	**唐顺之** 武进(今属江苏)人
	嘉靖十一年壬辰科	1532	**林大钦** 海阳(今广东海安县)人	**孔天胤** 汾州(治今山西汾阳)人	**高节** 罗江(今四川德江县)人	**林春** 泰州(今江西泰县)人
	嘉靖十四年乙未科	1535	**韩应龙** 余姚(今属浙江)人	**孙升** 余姚(今属浙江)人	**吴山** 高安(今属江西)人	**许谷** 应天府上元(今南京市)人
	嘉靖十七年戊戌科	1538	**茅瓒** 钱塘(今浙江杭县)人	**罗珵** 泰和(今属江西)人	**袁炜** 慈溪(今属浙江)人	**袁炜**
	嘉靖二十年辛丑科	1541	**沈坤** 直隶大河卫(治今江苏淮安县)人	**潘晟** 新昌(今属浙江)人	**邢一凤** 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或作林一风。	**林树声**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初冒林姓,及贵复陆姓。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	1544	**秦鸣雷** 临海(今属浙江)人	**瞿景淳** 常熟(今属江苏)人	**吴情** 无锡(今属江苏)人	**瞿景淳**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	1547	**李春芳** 兴化(今属江苏)人	**张春** 新喻(今属江西)人	**胡正蒙** 余姚(今属浙江)人	**胡正蒙**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	1550	**唐汝楫** 兰溪(今属浙江)人	**吕调阳**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	**姜金和** 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	**傅夏器** 南安(今属福建)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世宗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	1553	**陈谨**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曹大章** 金坛(今属江苏)人	**温应禄** 乌程(今江苏吴兴)人	**曹大章**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	1556	**诸大绶**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陶大临**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金达** 浮梁(治今江西景德镇)人	**金达**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	1559	**丁士美** 直隶清河(今江苏淮阴县)人	**毛惇元** 余姚(今属浙江)人	**林士章** 漳浦(今福建漳州)人	**蔡茂春** 三河(今属河北)人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	1562	**申时行**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实录》作徐时行。	**王锡爵** 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	**余有丁**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王锡爵**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	1565	**范应期** 乌程(今浙江吴兴)人	**李自华** 嘉兴(今属浙江)人	**陈栋** 南昌(今属江西)人	**陈栋**
明穆宗	隆庆二年戊辰科	1568	**罗万化**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黄凤翔** 晋江(今属福建)人	**赵志皋** 兰溪(今属浙江)人	**田一俊** 大田(今属福建)人
	隆庆五年辛未科	1571	**张元忭**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刘瑊** 直隶苏州卫(今属江苏)人	**邓以赞** 新建(治今江西南昌西)人	**邓以赞**
明神宗	万历二年甲戌科	1574	**孙继皋** 无锡(今属江苏)人	**余孟麟** 江宁(治今南京)人	**王应选** 慈溪(今属浙江)人	**孙矿** 余姚(今属浙江)人
	万历五年丁丑科	1577	**沈懋学** 宣城(今属安徽)人	**张嗣修** 江陵(今属湖北)人	**曾朝节** 临武(今属湖南)人	**冯梦祯**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神宗	万历八年庚辰科	1580	**张懋修** 江陵(今属湖北)人	**萧良有** 汉阳(今湖北武汉市)人	**王庭撰** 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人	**萧良有**
	万历十一年癸未科	1583	**朱国祚**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人	**李廷机** 晋江(今属福建)人	**刘应秋**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李廷机**
	万历十四年丙戌科	1586	**唐文献**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杨道宾** 晋江(今属福建)人	**舒弘志** 全州(今属广西)人	**袁宗道** 公安(今属湖北)人
	万历十七年己丑科	1589	**焦　竑** 江宁(治今南京)人	**吴道南** 崇仁(今属江西)人	**陶望龄**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陶望龄**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	1592	**翁正春** 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史继偕** 晋江(今属福建)人	**顾天埈** 昆山(今属江苏)人	**吴　默** 吴江(今属江苏)人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科	1595	**朱之蕃** 茌平(今属山东)人	**汤宾尹** 宣城(今属安徽)人	**孙慎行** 武进(今属江苏)人	**汤宾尹**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	1598	**赵秉忠** 益都(今属山东)人	**邵景尧** 象山(今浙江宁波)人	**顾起元** 江宁(治今南京)人	**顾起元**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	1601	**张以诚** 青浦(今属上海)人	**王　衡** 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县)人	**曾可前** 石首(今属湖北)人	**许　獬** 同安(今属福建)人
	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	1604	**杨守勤** 慈溪(今属浙江)人	**孙承宗** 高阳(今属河北)人	**吴宗达** 武进(今属江苏)人	**杨守勤**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	1607	**黄士俊** 顺德(今属广东)人	**施凤来** 平湖(今属浙江)人	**张瑞图** 晋江(今属福建)人	**施凤来**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神宗	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	1610	**韩敬**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马之骐** 新野(今属河南)人	**钱谦益** 常熟(今属江苏)人	**韩敬**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	1613	**周延儒** 宜兴(今属江苏)人	**庄奇显** 晋江(今属福建)人	**赵师尹** 德化(今江西九江市)人	**周延儒**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	1616	**钱士升** 嘉善(今属浙江)人	**贺逢圣** 江夏(今湖北武昌)人	**林钎** 同安(今属福建)人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	1619	**庄际昌** 永春(今属福建)人	**孔贞运** 句容(今属江苏)人,系孔子后。	**陈子壮** 南海(今属广东)人	**庄际昌**
明熹宗	天启二年壬戌科	1622	**文震孟**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傅冠** 进贤(今属江西)人	**陈仁锡**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刘必达** 景陵(今湖北天门县)人
	天启五年乙丑科	1625	**余煌**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华其芳** 无锡(今属江苏)人。或作华琪芳。	**吴孔嘉** 歙县(今属安徽)人	**华其芳**
明思宗	崇祯元年戊辰科	1628	**刘若宰** 怀宁(今属安徽)人	**何瑞征** 信阳(今属河南)人	**管绍宁** 武进(今属江苏)人	**曹勋** 嘉善(今属浙江)人
	崇祯四年辛未科	1631	**陈于泰** 宜兴(今属江苏)人	**吴伟业** 直隶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县)人	**夏曰瑚** 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	**吴伟业**
	崇祯七年甲戌科	1634	**刘理顺** 杞县(今属河南)人	**吴国华** 宜兴(今属江苏)人	**杨昌祚** 宣城(今属安徽)人	**李青** 金坛(今属江苏)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明思宗	崇祯十年 丁丑科	1637	**刘同升** 吉水(今江西吉安)人	**陈之遴** 海盐(今属浙江)人	**赵士春** 常熟(今属江苏)人	**吴贞启** 宜兴(今属江苏)人
	崇祯十三年 庚辰科	1640	**魏藻德** 通州(今北京通县)人	**葛世振**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高尔俨** 直隶静海(今属天津)人	**杨琼芳** 句容(今属江苏)人
	崇祯十六年 癸未科	1643	**杨廷鉴** 武进(今属江苏)人	**宋之绳** 溧阳(今属江苏)人	**陈名夏** 溧阳(今属江苏)人	**陈名夏**
清世祖	顺治三年 丙戌科	1646	**傅以渐** 聊城(今属山东)人	**吕缵祖** 沧州(今属河北)人	**李奭棠** 大兴(今属北京)人	**李奭棠**
	顺治四年 丁亥科	1647	**吕　宫**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程芳朝** 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蒋　超** 江南金坛(今江苏金坛)人	**李人龙** 河间(今属河北)人
	顺治六年 己丑科	1649	**刘子壮** 黄冈(今属湖北)人	**熊伯龙** 汉阳(今湖北武汉)人	**张天植**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人	**左敬祖** 河间(今属河北)人
	顺治九年 壬辰科	1652	**邹忠倚** 江南无锡(今江苏无锡)人	**张永祺** 大兴(今属北京)人	**沈　荃** 江南青浦(今上海青浦)人	**张星瑞**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原为程可则，系南海(今广东广州)人，磨勘除名。
			麻勒吉 满洲正黄旗人。后改名马中骥。	**折库纳** 镶蓝旗人	**巴　海** 镶蓝旗人	**麻勒吉**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世祖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	1655	**史大成**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戴王纶** 沧州(今属河北)人	**秦钺**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秦钺**
			图尔宸 正白旗人	**查亲** 正红旗人。又名贾勤。	**索泰** 正白旗人	**查亲**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	1658	**孙承恩** 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	**孙一致** 江南盐城(今江苏盐城)人	**吴国对** 江南全椒(今安徽全椒)人	**张贞生** 庐陵(治今江西吉安)人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	1659	**徐元文** 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或云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初冒陆姓,及第后复徐姓。	**华亦祥** 江南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又名鲍亦祥。	**叶方霭** 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又作叶方蔼,未知孰是。	**朱锦** 江南上海(今上海市)人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	1661	**马世俊** 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	**李仙根** 遂宁(今属四川)人	**吴光**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陈常夏** 南靖(今属福建)人
清圣祖	康熙三年甲辰科	1664	**严我斯**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李元振** 海宁(今属浙江)人	**周弘** 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或作秦弘,疑误。	**沈珩** 海宁(今属浙江)人
	康熙六年丁未科	1667	**缪彤**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张玉裁** 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	**董讷** 平原(今属山东)人	**黄礽绪** 江南崇明(今上海崇明)人。或作黄仍绪,疑谬。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	康熙九年庚戌科	1670	**蔡启僔** 德清(今属浙江)人	**孙在丰** 德清(今属浙江)人	**徐乾学** 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或云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宫梦仁** 江南泰州(今江苏泰州)人
圣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	1673	**韩　菼**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王鸿绪** 江南娄县(今上海华亭)人。初名度心,因父名广心,后奏改今名。	**徐秉义** 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或云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韩　菼**
圣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	1676	**彭定求**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胡会恩** 德清(今属浙江)人	**翁叔元** 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	**彭定求**
祖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	1679	**归允肃** 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	**孙　卓** 江南宣城(今安徽宣城)人	**茆孝馨** 长兴(今属浙江)人	**马教思** 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祖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	1682	**蔡升元** 德清(今属浙江)人	**吴　涵** 石门(今浙江崇德)人	**彭宁求**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金德嘉** 广济(今属湖北)人
祖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	1685	**陆肯堂**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陈元龙** 海宁(今属浙江)人	**黄梦麟** 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	**陆肯堂**
祖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	1688	**沈廷文**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人	**查嗣韩** 海宁(今属浙江)人	**张豫章** 江南青浦(今上海青浦)人	**范光阳**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祖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	1691	**戴有祺** 江南金山卫(治今上海金山县)人	**吴　昜** 江南全椒(今安徽全椒)人	**黄叔琳** 大兴(今属北京)人	**张　瑗** 江南祁门(今安徽祁门)人

朝代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	1694	**胡任舆** 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人	**顾图河** 江南江都(今江苏江都)人	**顾悦履** 海宁(今属浙江)人	**裴之仙** 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	1697	**李蟠** 江南徐州(今江苏徐州)人	**严虞惇** 江南华亭(今上海淞江)人	**姜宸英** 慈溪(今属浙江)人	**汪士铉**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	1700	**汪绎** 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	**季愈** 江南宝应(今江苏宝应)人	**王露** 柘城(今属河南)人	**王露**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	1703	**王式丹** 江南宝应(今江苏宝应)人	**赵晋**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钱名世**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王式丹**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	1706	**王云锦** 江南无锡(今江苏无锡)人	**吕葆中** 石门(今浙江崇德)人	**贾国维** 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	**尚居易** 临潼(今属陕西)人
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	1709	**赵熊诏**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戴名世** 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缪沅** 江南泰州(今江苏泰州)人	**戴名世**
祖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	1712	**王世琛**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沈树本**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徐葆光** 江南吴江(今江苏吴江)人	**卜俊民**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	1713	**王敬铭** 江南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任兰枝** 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	**魏廷珍** 景州(今河北景县)人	**孙见龙** 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	1715	**徐陶璋** 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人	**缪曰藻**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傅王露**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李锦**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	1718	**汪应铨** 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人	**张廷璐** 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	**沈锡辂**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杨尔德** 嘉善(今属浙江)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圣祖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	1721	邓钟岳 东昌卫(治今山东聊城)人	吴文焕 长乐(今属福建)人	程元章 上蔡(今属河南)人	储大文 江南宜兴(今江苏宜兴)人
清世宗	雍正元年癸卯恩科	1723	于振 江南金坛(今江苏金坛)人	戴瀚 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人	杨炳 钟祥(今属湖北)人	杨炳
	雍正二年甲辰科	1724	陈惠华 安州(今河北安新)人	王安国 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	汪德容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王安国
	雍正五年丁未科	1727	彭启丰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邓启元 德化(今属福建)人	马宏琦 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	彭启丰
	雍正八年庚戌科	1730	周淦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沈昌宇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人	梁诗正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沈昌宇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	1733	陈倓 仪征(今江苏仪征)人	田志勤 大兴(今属北京)人	沈文镐 崇明(今上海崇明)人	陈倓
清高宗	乾隆元年丙辰科	1736	金德瑛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黄孙懋 曲阜(今属山东)人	秦蕙田 金匮(治今江苏无锡)人	赵青藜 江南泾县(今安徽泾县)人
	乾隆二年丁巳恩科	1737	于敏中 江南金坛(今江苏金坛)人	林枝春 福清(今属福建)人	任端书 江南溧阳(今江苏溧阳)人。或作江西溧阳,谬。	何其睿 赣州(今属江西)人
	乾隆四年己未科	1739	庄有恭 番禺(今广东广州)人	涂逢震 南昌(今属江西)人	秦勇钧 金匮(治今江苏无锡)人	轩辕诰 汶上(今属山东)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	乾隆七年壬戌科	1742	**金甡**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杨述曾** 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汤大绅** 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金甡**
	乾隆十年乙丑科	1745	**钱维城**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庄存与**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王际华**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蒋元益**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	1748	**梁国治**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陈枏**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汪廷屿** 江南镇洋(今江苏无锡)人	**郑忬** 江南靖江(今江苏靖江)人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	1751	**吴鸿**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钱学曙** 广昌(今属江西)人	**周澧** 嘉善(今属浙江)人	**周澧**
高	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	1752	**秦大士**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范槭士** 江南华亭(今上海淞江)人	**卢文弨** 余姚(今属浙江)人	**邵嗣宗** 江南太仓(今江苏太仓)人
	乾隆十九年甲戌科	1754	**庄培因** 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王鸣盛** 江南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倪承宽**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胡绍鼎** 孝感(今属湖北)人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	1757	**蔡以台** 嘉善(今属浙江)人	**梅立本** 江南宣城(今安徽宣城)人	**邹奕孝** 江南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或云江南金匮人。	**蔡以台**
宗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	1760	**毕沅** 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	**诸重光** 余姚(今属浙江)人	**王文治** 江南丹徒(今江苏丹徒)人	**王中孚** 诸城(今属山东)人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恩科	1761	**王杰** 韩城(今属陕西)人	**胡高望**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赵翼** 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陈步瀛**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	1763	**秦大成** 江南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沈初** 平湖(今属浙江)人	**韦谦恒** 江南芜湖(今安徽芜湖)人	**孙效曾**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	1766	**张书勋**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姚颐** 泰和(今属江西)人	**刘跃云** 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	**胡珊** 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
高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	1769	**陈初哲** 江南元和(今江苏吴县)人	**徐天柱** 德清(今属浙江)人	**陈嗣龙** 平湖(今属浙江)人	**徐烺**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	1771	**黄轩** 江南休宁(今安徽休宁)人	**王增**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范衷** 上虞(今属浙江)人	**邵晋涵** 余姚(今属浙江)人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	1772	**金榜** 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	**孙辰东**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俞大猷** 大兴(今属北京)人	**孙辰东**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	1775	**吴锡龄** 江南休宁(今安徽休宁)人	**汪镛** 历城(今属山东)人	**沈青藻**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又作沈青嘉,疑误。	**严福**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	1778	**戴衢亨** 大庾(治今江西大余)人	**蔡廷衡**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孙希旦** 瑞安(今属浙江)人	**缪祖培** 江南泰州(今江苏泰州)人
宗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	1780	**汪如洋** 秀水(治今浙江嘉兴)人	**江德量** 江南仪征(今江苏仪征)人	**程昌期** 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	**汪如洋**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	1781	**钱棨** 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陈万青** 石门(今浙江崇德)人	**汪学金** 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	**钱棨** 系三元及第者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	1784	**茹棻**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邵瑛** 余姚(今属浙江)人	**邵玉清** 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	**侯健融**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或作侯建融。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高宗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	1787	**史致光**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孙星衍** 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董教增** 江南上元(今江苏南京)人	**顾钰** 江南无锡(今江苏无锡)人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恩科	1789	**胡长龄** 江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	**汪廷珍** 江南山阳(治今江苏淮安)人	**刘凤诰** 萍乡(今属江西)人	**钱楷** 嘉兴(今属浙江)人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	1790	**石韫玉**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洪亮吉** 江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王宗诚** 江南青阳(今安徽青阳)人	**朱文翰** 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	1793	**潘世恩**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陈云** 宛平(今属北京)人	**陈希曾** 新城(今江西临川)人	**吴贻咏** 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又作吴贻永。
	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	1795	**王以衔**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莫晋**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潘世璜** 江南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王以铻**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七作王以衔。
清仁宗	嘉庆元年丙辰恩科	1796	**赵文楷** 江南太湖(今安徽太湖)人	**汪守和** 乐平(今属江西)人	**帅承瀛** 黄梅(今属湖北)人	**袁棣** 德清(今属浙江)人
	嘉庆四年己未科	1799	**姚文田** 归安(今浙江吴兴)人	**苏兆登** 沾化(今属山东)人	**王引之** 高邮(今属江苏)人	**史致俨** 江都(今江苏扬州)人
	嘉庆六年辛酉恩科	1801	**顾皋** 金匮(治今江苏无锡)人	**刘彬士** 黄陂(今属湖北)人	**邹家燮** 乐平(今属江西)人	**马有章** 通州(今江苏南通)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仁宗	嘉庆七年壬戌科	1802	**吴廷琛** 元和(今江苏吴县)人	**李宗昉** 山阳(治今江苏淮安)人	**朱士彦** 宝应(今属江苏)人	**吴廷琛**
	嘉庆十年乙丑科	1805	**彭浚** 衡山(今属湖南)人	**徐颋**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何凌汉** 道州(今湖南道县)人	**胡敬**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嘉庆十三年戊辰科	1808	**吴信中**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谢阶树** 宜黄(今属江西)人	**石承藻** 湘潭(今属湖南)人	**刘嗣绾** 阳湖(今江苏武进)人
	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	1809	**洪莹** 歙县(今属安徽)人	**廖金城** 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后改名廖鸿荃。	**张岳崧** 定安(今属海南省)人	**孔传纶**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嘉庆十六年辛未科	1811	**蒋立镛** 天门(今属湖北)人	**吴毓英**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改名王毓英。	**吴廷珍**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朱壬林** 平湖(今属浙江)人
	嘉庆十九年甲戌科	1814	**龙汝言** 桐城(今属安徽)人	**祝庆蕃** 固始(今属河南)人	**伍长华** 上元(今江苏南京)人	**瞿溶** 武进(今属江苏)人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科	1817	**吴其浚** 固始(今属河南)人	**凌泰封** 定远(今属安徽)人	**吴清鹏**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庞大奎** 常熟(今属江苏)人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	1819	**陈沆** 蕲水(今湖北浠水)人	**杨九畹** 慈溪(今属浙江)人	**胡达源** 益阳(今属湖南)人	**费庚吉** 武进(今属江苏)人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	1820	**陈继昌**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	**许乃普**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陈銮** 江夏(今湖北武昌)人	**陈继昌** 系三元及第者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宣宗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	1822	**戴兰芬** 天长(今属安徽)人	**郑秉恬** 上高(今属江西)人	**罗文俊**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	**吕龙光** 归善(治今广东惠阳)人
	道光三年癸未科	1823	**林召棠** 吴川(今属广东)人。姓或作杜,疑谬。	**王广荫** 通州(今江苏南通)人	**周开麒**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杜受田** 滨州(今山东滨县)人
	道光六年丙戌科	1826	**朱昌颐** 海盐(今属浙江)人	**贾　桢** 黄县(今属山东)人	**帅方蔚** 奉新(今属江西)人	**王庆元** 盐山(今属河北)人
	道光九年己丑科	1829	**李振钧** 太湖(今属安徽)人。姓或作朱,疑谬。	**钱福昌** 平湖(今属浙江)人	**朱　兰** 余姚(今属浙江)人	**刘有庆** 南皮(今属河北)人
	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	1832	**吴钟骏**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朱凤标** 萧山(今属浙江)人	**季芝昌** 江阴(今属江苏)人	**马学易**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道光十三年癸巳科	1833	**汪鸣相** 彭泽(今属江西)人	**曹履泰** 都昌(今属江西)人	**蒋元溥** 天门(今属湖北)人	**许　楣** 海宁(今属浙江)人
	道光十五年乙未科	1835	**刘　绎** 永丰(今属江西)人	**曹联桂** 新建(今江西南昌)人	**乔晋芳** 闻喜(今属山西)人	**张景星** 嵊县(今属浙江)人
	道光十六年丙申恩科	1836	**林鸿年** 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何冠英**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苏敬衡** 沾化(今属山东)人	**夏子龄** 江阴(今属江苏)人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	1838	**钮福保** 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	**金国均** 黄陂(今属湖北)人	**江国霖** 大竹(今属四川)人	**王振纲** 新城(今属河北)人
	道光二十年庚子科	1840	**李承霖** 丹徒(今属江苏)人	**冯桂芬**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张百揆** 萧山(今属浙江)人	**吴敬義**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宣宗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	1841	**龙启瑞**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	**龚宝莲** 大兴(今属北京)人	**胡家玉** 新建(治今江西南昌)人	**蔡念慈**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	1844	**孙毓溎** 济宁(今属山东)人。或作孙毓溎。	**周学浚** 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	**冯培元**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焦春宇** 太平(今属安徽)人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	1845	**萧锦忠** 茶陵(今属湖南)人	**金鹤清** 桐乡(今属浙江)人	**吴福年**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蒋超伯** 江都(今江苏扬州)人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1847	**张之万** 南皮(今属河北)人	**袁绩懋** 宛平(今属北京)人	**庞钟璐** 常熟(今属江苏)人	**许彭寿**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1850	**陆增祥** 太仓(今属江苏)人	**许其光** 番禺(今广东广州)人	**谢　增** 仪征(今属江苏)人	**邹石麟** 聊城(今属山东)人
清文宗	咸丰二年壬子恩科	1852	**章　鋆** 鄞县(治今浙江宁波)人	**杨泗孙** 常熟(今属江苏)人	**潘祖荫**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孙庆咸**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咸丰三年癸丑科	1853	**孙如仅** 济宁(今属山东人)。或作孙如瑾，疑误。	**吴凤藻**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吕朝端** 旌德(今属安徽)人	**吴凤藻**
	咸丰六年丙辰科	1856	**翁同和** 常熟(今属江苏)人	**孙毓汶** 济宁(今属山东)人	**洪昌燕**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马元瑞** 临清(今属山东)人
	咸丰九年己未科	1859	**孙家鼐** 寿州(今安徽寿县)人	**孙念祖**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李文田** 顺德(今属广东)人	**马传煦**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文宗	咸丰十年庚申恩科	1860	**钟骏声** 仁和(今浙江杭县)人	**林彭年**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	**欧阳保极** 江夏(今湖北武昌)人	**徐致祥** 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清穆宗	同治元年壬戌科	1862	**徐郙** 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姓或作金,疑误。	**何金寿** 江夏(今湖北武昌)人	**温忠翰** 太谷(今属山西)人	**李庆沅** 通州(今北京通县)人
	同治二年癸亥恩科	1863	**翁曾源** 常熟(今属江苏)人	**龚承钧** 湘潭(今属湖南)人	**张之洞** 南皮(今属河北)人	**黄体芳** 瑞安(今属浙江)人
	同治四年乙丑科	1865	**崇绮** 蒙古正蓝旗人	**于建章**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	**杨霁** 汉军正红旗人	**廖鹤年** 番禺(今广东广州)人
	同治七年戊辰科	1868	**洪钧**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黄自元** 安化(今属湖南)人。或作黄自在。	**王文在** 稷山(今属山西)人	**蔡以瑮** 萧山(今属浙江)人
	同治十年辛未科	1871	**梁耀枢** 顺德(今属广东)人	**高岳崧** 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郁昆** 萧山(今属浙江)人	**李联珠** 景州(今河北景县)人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	1874	**陆润庠** 无和(今江苏吴县)人	**谭宗浚** 南海(今广东广州)人。原名谭懋安。	**黄贻楫** 晋江(治今福建泉州)人	**秦应逵** 孝感(今属湖北)人
清德宗	光绪二年丙子恩科	1876	**曹鸿勋** 潍县(今山东潍坊)人	**王赓荣** 朔州(今山西朔县)人	**冯文蔚** 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	**陆殿鹏** 兴化(今属江苏)人
	光绪三年丁丑科	1877	**王仁堪**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	**余联沅** 孝感(今属湖北)人	**朱赓陶** 华亭(今上海淞江)人	**刘秉哲** 邢台(今属河北)人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德宗	光绪六年庚辰科	1880	**黄思永**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	**曹贻孙** 茶陵(今属湖南)人。或作曹诒孙。	**谭鑫振** 衡山(今属湖南)人	**吴树棻** 历城(今属山东)人。又作吴树芬。
	光绪九年癸未科	1883	**陈冕** 宛平(今属北京)人	**寿耆** 正蓝旗人	**管廷献** 莒州(今山东莒县)人	**宁本瑜** 休宁(今属安徽)人
	光绪十二年丙戌科	1886	**赵以炯** 贵阳(今属贵州)人	**邹福保** 元和(今江苏吴县)人	**冯煦** 金坛(今江苏无锡)人	**刘培** 乐亭(今属河北)人
	光绪十五年己丑科	1889	**张建勋**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又作张建瀛,疑误。	**李盛铎** 德化(今江西九江)人	**刘世安** 汉军镶黄旗人	**许叶芬** 宛平(今属北京)人
	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	1890	**吴鲁** 晋江(治今福建泉州)人	**文廷式** 萍乡(今属江西)人	**吴荫培** 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	**夏曾佑**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1892	**刘福姚** 临桂(今广西桂林)人	**吴世鉴** 钱塘(今浙江杭县)人	**陈伯陶** 东莞(今属广东)人	**刘可毅** 武进(今属江苏)人。原名刘毓麟。
	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	1894	**张謇** 通州(今江苏南通)人	**尹铭绶** 茶陵(今属湖南)人	**郑沅** 长沙(今属湖南)人	**陶世凤** 金匮(治今江苏无锡)人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	1895	**骆成骧** 资州(今四川资中)人	**喻长霖** 黄岩(今属浙江)人	**王龙文** 湘乡(今属湖南)人	**陈海梅** 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清德宗实录》卷三六六作"景榖"。

科别		公元	状元	榜眼	探花	会元
清德宗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	1898	**夏同和** 麻哈州(今贵州麻江)人	**夏寿田** 桂阳(今属湖南)人	**俞陛云** 德清(今属浙江)人	**陆增炜** 太仓(今属江苏)人。又作陆曾炜。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补壬寅恩科	1903	**王寿彭** 潍县(今山东潍坊)人	**左　霈** 汉军旗广东驻防	**杨兆麟** 遵义(今属贵州)人	**周蕴良** 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	1904	**刘春霖** 肃宁(今属河北)人	**朱汝珍** 清远(今属广东)人	**商衍鎏** 汉军正白旗人	**谭延闿** 茶陵(今属湖南)人

[制表　章爱先(唐五代十国两宋)　刘永海(辽金元明)
邵永忠(清)　杨寄林(说明文字)]

正续文献通考历朝登科记总目汇编后案

【说明】 正续文献通考指宋末元初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清乾隆间官修《续文献通考》和《清文献通考》、民国时刘锦藻所撰《清续文献通考》而言（此外尚有《清通考》作为蓝本的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自马氏《通考》起，始于《选举考》中列具唐、五代、宋《登科记总目》，后三书均沿其例，亦撰有辽、金、元、明、清《登科总目》。这九篇文献（清为二书，故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为界标，分作两篇），无不载列科次；除金朝外，均记进士的录取总人数，或标出会元与状元的姓名。由此纵贯而下，前后衔接，在公元622～1904年的历史跨度内，共载七百一十九科（此外当补辽朝一科及金朝二十一科），凡得进士十万一千二百余人（如表所示）：

朝代	存在年数	开科总次数	录取总人数	平均录取人数
唐	290	261	6460	25
五代	54	47	650	14
宋	320	118	40000 （内缺3科人数）	348 （按115科计算）
辽	210	57 （当增1科）	2435 （内缺2科人数）	43 （按55科计算）
金	120	20 （当增21科）		
元	98	16	1136	71
明	277	88	24600	280
清	260	112	26000	232
合计	1283	719 （当为741科）	101281	145 （按694科计算）

表中数字基本根据原文载述而统计得出，较为详确，颇能说明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同时也体现出该九篇文献本身固有的价值。它们既勾勒出了历代科举取士的基本线索和发展链条，又显现出了历

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状况和网上纽结；既展示了各朝进士考试的因革升降、盛衰隆替的轨迹，又凸现了每朝由少至多、自疏而密的进程；既揭示了华夏南北交流与聚合的态势，又反映了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实现各民族文化融合的情状；既显示了人才选拔的规模，又崭现了文化建设的气象。手此九篇文献，可对唐至清代进士开科的概貌了然于胸，并引发出对某些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故而汇为一编，以便读者深入研讨。

需要指出的是，这九篇文献并非完璧无瑕，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值得进一步研核的问题，即如《清通考》本系当代人修当代史，且距顺治、康熙、雍正为时未远，亦与《清实录》存在龃龉之处，更遑论其他了。综括起来，计有十端：

一是科次之衍。如《唐登科记总目》(下称《唐目》)所载唐高宗嗣圣二年(685)、武后光宅二年(685)、延载二年(695)、久视二年等。

二是科次之遗。如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及三年(678)，《唐目》俱言不贡举，清徐松《登科记考》则据《旧唐书》及墓志碑铭，列举登科进士姓名，予以究诘。

三是科次之讹。如《唐目》所载武后永昌二年(689)当作永昌"元年"之类。

四是文有脱落。如《唐目》所载武后长安四年(704)"四十一人"，其上依例却无"进士"二字。

五是文有错谬。如《唐目》所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进士三十三人，驳下十人，重试十四人"，当作"进士二十五人，驳下十一人，重试及第十四人"。

六是姓名之误。如《宋登科记总目》(下称《宋目》)，载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状元为王嘉，实应为徽宗第三子嘉王赵楷，且系榜眼而非状元，此属姓与名俱误者(即使《宋目》特不提其名姓，亦应作"嘉王"而非"王嘉")；又载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状元为张衡，实应为章衡，此属姓误者；又载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状元为赵建夫，实应为赵建大，此属名误者。

七是姓名之缺。如《宋目》对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省元空而

不书，而《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载，昌言为是年“贡部首荐”，则省元当为赵昌言。

八是人数之谬。如《宋目》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录取“进士七十七人”，《宋会要辑稿》(下称《会要》)第一百十册《选举七》作“三百七十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一百五作“三百七十九人”，《宋史·仁宗本纪一》作“进士、诸科及第一千七十七人”(诸科《宋目》作八百九十四人)，据此稍加比照，则知《宋目》所记“进士七十七人”，必误且甚。

九是人数之歧。如《宋目》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录取“进士二百五十人”，《会要·选举七》和《长编》卷二十六俱作“二百五十五人”，此为少于他书所记者；又《宋目》载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录取“进士五百四十一人”，《会要·选举八》作“五百三十七人”，《宋史·孝宗本纪一》作“五百三十八人”，此为多于他书所记者；又《宋目》载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录取“进士四百九十八人”，《会要·选举七》作“四百八十九人”，《长编》卷一百六十六作“五百四十三人”，《宋史·仁宗本纪三》则云，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千三百九人”(诸科《宋目》作五百五十人)，此为与他书所记多少互有较大出入者。

十是人数之缺。如《宋目》从宋理宗淳祐元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241～1274)凡十二科，仅咸淳四年(1268)戊辰科载有录取人数，甚至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高中状元，世有《宝祐四年登科录》流传至今，也付诸阙如。

以上十类问题的存在，即使把刻工致误的因素包纳进来，也无法表明这九篇文献特别是唐宋部分尽可信从。为增强各篇的信实度，提高它们的文献利用价值，兹据相关诸书订其讹误，列其异同，补其缺漏，附于当条之下，统称“后案”。为便于阅读，利于对照，科年之后加标公元，每篇篇末述其梗概。所据诸书则不出《附录·一览表》所列者。至若化腐朽为神奇，唯俟大雅。

唐登科记总目

高祖武德元年(618),上书拜官一人。

二年(619)、三年(620)、四年(621),不贡举。

五年(622),秀才一人,进士四人。

六年(623)进士四人。

七年(624),秀才二人,进士六人。

八年(625),秀才一人,进士五人。

九年(626),秀才二人,进士七人。(按,以上唐高祖时期共开五科,录取二十六人,另秀才六人。)

太宗贞观元年(627),秀才二人,进士四人。

二年(628),米贵不贡举。

三年(629),秀才二人,进士五人。

四年(630),秀才一人,进士九人。

五年(631),秀才一人,进士十五人。

六年(632),秀才一人,进士十二人。

七年(633),秀才二人,进士十三人。

八年(634),秀才一人,进士九人。

九年(635),进士六人。

十年(636),进士十一人。

十一年(637),秀才一人,进士八人。

十二年(638),秀才一人,进士十一人。

十三年(639),秀才二人,进士十七人。

十四年(640),秀才一人,进士五人。

十五年(641),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

十六年(642),不贡举。

十七年(643),进士十五人。

十八年(644),秀才一人,进士二十四人。

十九年(645),秀才三人,上书拜官一人。

二十年(646),秀才一人,进士三人。

二十一年(647),进士七人。

二十二年(648),进士九人。

二十三年(649),秀才一人,进士八人。(按,以上唐太宗时期共开二十一科,录取二〇五人;另秀才二十二人。)

高宗永徽元年(650),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

二年(651),进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举。

三年(652)、四年(653),不贡举,应制及第三人。

五年(654),进士一人。

六年(655),进士四十三人,应制一人。[按,清徐松《登科记考》(下称徐氏《记考》)卷二本条下云,"应制"下脱"及第"二字。]

显庆元年(656),进士三人。

二年(657),进士二十二人。

三年(658),进士十七人,诸科一人。

四年(659),进士二十人。

五年(660),进士十四人,上书拜官一人。

六年(661),进士五人,召拜官一人。

龙朔二年(662),进士八人。

三年(663),不贡举。

麟德元年(664),进士三人,诸科二人。

二年(665),进士并落下。

乾封元年(666),幽素举十二人。

二年(667),进士五人。

总章元年(668),进士二十六人。

二年(669),不贡举。

咸亨元年(670),进士五十四人。

二年(671)、三年(672),不贡举。

四年(673),进士七十九人。

上元元年(674),进士五十七人,重试及第十一人。

上元二年(675),进士四十五人,别敕二人,续试三人。(按,二人,徐氏《记考》云,"二"当作"四"。)

仪凤元年(676),不贡举,诸科四人。

二年(677),不贡举,上封拜官一人。

三年(678),不贡举,诸科一人。(按,徐氏《记考》云,《旧书·郑惟忠传》:"仪凤中进士举,授井陉尉。"而此数年皆言不贡举,恐《登科记》误。)

调露元年(679),不贡举。

二年(680),进士一人。(按,徐氏《记考》云,"一人"疑有误。)

永隆二年(681),进士一人。(按,徐氏《记考》云,"一人"疑有误。)

开耀二年(682),进士五十五人,重试及第十八人。(按,五十五人,徐氏《记考》云,《摭言》引作"五十一人"。)

永淳二年(683),进士五十五人。(按,以上唐高宗时期除仪凤年间不详外,共开二十三科,录取四五七人;另秀才一人。)

嗣圣二年(685),进士十三人,重试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684),进士十六人,上书拜官并诸科九人。

二年(685),进士五十九人。

垂拱元年(685),进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按,徐氏《记考》云,《登科记》又载嗣圣二年进士十三人,重试三十六人;光宅二年进士五十九人。按嗣圣二年、光宅二年,即垂拱元年也,《登科记》误。)

二年(686),进士四人。

三年(687),进士六十五人。

四年(688),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三十人。

永昌二年[当作元年(689)],进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诸科一人。

二年(690),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诸科五人。

三年(691),进士十六人。

长寿二年(693),进士十八人,减策及第二人。

三年(694),不贡举,诸科二人。

延载二年(695),进士二十二人。

证圣元年(695),不贡举,诸科一人。(按,徐氏《记考》云,《登科记》:"证圣元年不贡举,延载二年进士二十二人。"按证圣元年即延载二年,《登科记》误。)

天册万岁二年(696),进士二十七人,南郊举及第三人。

万岁通天二年(697),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人。

三年(698),不贡举,诸科二人。

圣历元年(698),进士二十二人。(按,徐氏《记考》云,《登科记》载万岁通天三年不贡举,神功二年不贡举,圣历元年进士二十二人。按万岁通天三年、神功二年,即圣历元年也。《登科记》误。)

二年(699),进士十六人,诸科一人。

三年(700),进士二十人。

久视二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人。(按,久视无二年,此条误。)

大足元年(701),进士二十七人。

二年,不贡举,诸科十人。(按,徐氏《记考》云,《登科记》:"大足元年进士二十七人,二年不贡举。"按大足无二年,《登科记》误。)

长安二年(702),进士二十一人。

三年(703),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四人。

四年(704),四十一人,续奏四人。(按,四十一人,其上当有"进士"二字。以上武则天时期共开十七科,录取四百三十七人。)

中宗神龙元年(705),进士六十一人,重试及第十二人,诸科二十九人。

二年(706),进士三十二人,诸科三十九人。

景龙元年(707),进士四十八人,诸科三人。

二年(708),进士四十人,诸科六人。

三年(709),不贡举,诸科八人。(按,以上唐中宗时期共开四科,录取一三二人。)

睿宗景云元年(710),进士五十二人。

二年(711),诸科五十六人。(按,徐氏《记考》云,是年亦取进士,《登科记》缺载。)

延和元年(712),进士三十七人。(按,徐氏《记考》云,《玉芝堂谈荟》引作"七十一人"。以上唐睿宗时期共开三科,其中有两科凡录取八十九人。)

玄宗先天元年(712),诸科二十七人。

开元元年(713),进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

二年(714),进士十七人,诸科十二人。

三年(715),进士二十一人。

四年(716),进士十六人,上书及第一人。

五年(717),进士二十五人。

六年(718),进士三十二人。

七年(719),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八人。

八年(720),进士五十七人。

九年(721),进士三十八人。

十年(722),进士三十三人。

十一年(723),进士三十一人。

十二年(724),进士二十一人。

十四年(726),进士三十一人。

十五年(727),进士十九人,诸科三人。

十六年(728),进士二十人。

十七年(729),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按,徐氏《记考》云,作"一"误。)

十八年(730),进士二十六人。

十九年(731),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

二十年(732),进士二十四人。

二十一年(733),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按,二十五人,徐氏《记考》云,《玉芝堂谈荟》引作"二十四人"。)

二十二年(734),进士二十九人,诸科九人。

二十三年(735),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五人。

二十四年(736),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

二十五年(737),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

二十六年(738),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739),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五人。

二十八年(740),进士十五人,诸科五人。

二十九年(741),进士十三人,诸科四人。

天宝元年(742),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按,二人,徐氏《记考》卷九作"四人"。)

二年(743),进士二十六人。

三载(744),进士二十九人。

四载(745),进士二十五人。

五载(746),进士二十一人。

六载(747),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一人。(按,二十三人,徐氏《记考》云,《玉芝堂谈荟》引作"二十二人"。)

七载(748),进士二十四人。

八载(749),进士二十人。

九载(750),进士二十一人。

十载(751),进士二十人。

十一载(752),进士二十六人。

十二载(753),进士五十六人。

十三载(754),进士三十五人,诸科一人。

十四载(755),进士二十四人。

十五载(756),进士三十三人。(按,以上唐玄宗时期共开四十三科,录取一一七八人。)

肃宗至德二载(757),进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东七人。

乾元元年(758),进士二十三人。

二年(759),进士二十五人。(按,徐氏《记考》云,《玉芝堂谈荟》引作"十七人"。)

三年(760),进士二十六人。

上元元年[当作二年(761)],进士二十九人。(按,以上唐肃宗时期共开五科,录取一二五人。)

代宗宝应元年(762),停贡举。

二年(763),进士二十七人。

广德二年(764),进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永泰元年(765),进士二十七人。

二年(766),两都共二十六人。

大历二年(767),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

三年(768),进士十九人,诸科三人。

四年(769),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二人。

五年(770),进士二十六人。(按,徐氏《记考》云,《玉芝堂谈荟》引作"二

十七人”。）

六年(771)，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

七年(772)，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四人。

八年(773)，进士三十四人，诸科五人。

九年(774)，进士三十二人。

十年(775)，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

十一年(776)，进士十四人。

十二年(777)，进士十二人。

十三年(778)，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人。

十四年(779)，进士二十人。（按，以上唐代宗时期共开十七科，录取三九五人。）

德宗建中元年(780)，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十七人。（按，二十一人，徐氏《记考》云，《摭言》引作“二十二人”。）

二年(781)，进士十七人，诸科二人。

三年(782)，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

四年(783)，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

兴元元年(784)，进士五人。

贞元元年(785)，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

二年(786)，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

三年(787)，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五人。

四年(788)，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六人。

五年(789)，进士三十六人，诸科六人。

六年(790)，进士二十九人，诸科三人。（按，三人，徐氏《记考》卷十二作“五人”。）

七年(791)，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

八年(792)，进士二十三人，诸科八人。

九年(793)，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八人。

十年(794)，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十六人。

十一年(795)，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八人。

十二年(796)，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

十三年(797),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

十四年(798),进士二十人,诸科九人。

十五年(799),进士十七人,诸科四人。

十六年(800),进士十九人,诸科八人。(按,十九人,徐氏《记考》云,据白居易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则"十九人"当作"十七人"。)

十七年(801),进士十八人,诸科八人。

十八年(802),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人。

十九年(803),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按,以上唐德宗时期共开二十四科,录取五八七人。)

顺宗永贞元年(805),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

宪宗元和元年(806),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十六人。

二年(807),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一人。

三年(808),进士十九人,诸科二十四人。

四年(809),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

五年(810),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二人。

六年(811),进士二十人,诸科十三人。

七年(812),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四人。

八年(813),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

九年(814),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一人。

十年(815),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按,十三人,徐氏《记考》卷十八作"十四人"。)

十一年(816),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四人。

十二年(817),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四人。

十三年(818),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三人。

十四年(819),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十二人。

十五年(820),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三人。(按,以上唐宪宗时期共开十五科,录取四一八人。)

穆宗长庆元年(821),进士三十三人,驳下十人,重试十四人。诸科三十八人。(按,徐氏《记考》云,"元年"之下三句当作"进士二十五人,驳下

十一人,重试及第十四人”。史文疎驳,未可依据。)

二年(822),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

三年(823),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九人。

四年(824),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按,以上唐穆宗时期共开四科,录取一〇四人。)

敬宗宝历元年(825),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三十二人。

二年(826),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二人。(按,以上唐敬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六十八人。)

文宗太和元年(827),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

二年(828),进士三十七人,诸科三十六人。(按,三十七人,徐氏《记考》云,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据此则是年为三十三人,《登科记》作三十七,误。)

三年(829),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二十六人。

四年(830),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七人。

五年(831),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六人。

六年(832),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

七年(833),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

八年(834),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一人。

九年(835),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

开成元年(836),进士四十人,诸科九人。

二年(837),进士四十人,诸科三人。

三年(838),进士四十人,诸科七人。

四年(839),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

五年(840),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八人。(按,以上唐文宗时期共开十四科,录取四二一人。)

武宗会昌元年(841),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六人。

二年(842),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

三年(843),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四人。

四年(844),进士二十五人,续放一人,诸科七人。

五年(845),进士二十七人,覆试落下八人,诸科五人。(按,徐氏《记考》云,落下八人,“八”当从《本纪》作“七”。)

六年(846),进士十六人,诸科五人。(按,以上唐武宗时期共开六科,录取一四三人。)

宣宗大中元年(847),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人。(按,徐氏《记考》卷二十二尚载"续放三人"。)

二年(848),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七人。(按,二十二人,徐氏《记考》卷二十二作"二十三人"。)

三年(849),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四年(850),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

五年(851),进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按,又三十人,据徐氏《记考》卷二十二,当作"又三人","十"字衍。)

六年(852),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九人。

七年(853),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八年(854),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五人。

九年(855),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

十年(856),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十一年(857),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十二年(858),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

十三年(859),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十四年(860),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按,以上唐宣宗时期共开十四科,录取四〇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861),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

三年(862),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四年(863),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一人。

五年(864),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九人。

六年(865),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八人。

七年(866),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七人。

八年(867),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人。

九年(868),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十年(869),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十一年(870),停举。

十二年(871),进士四十人,诸科九人。

十三年(872),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十四年(873),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十五年(874),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按,以上唐懿宗时期共开十三科,录取三九〇人。)

僖宗乾符二年(875),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

三年(876),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四年(877),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五年(878),进士三十人,诸科八人。

六年(879),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

七年(880),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四人。(按,十四人,徐氏《记考》卷二十三作"四人"。)

广明二年(881),进士十二人,续赐第二人。

中和二年(882),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按,二十八人,徐氏《记考》云,《唐才子传》引作"二十四人"。)

三年(883),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

四年(884),停举。

五年(885),进士三十五人,诸科二人。

光启二年(886),进士九人,诸科二人。

三年(887),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

四年(888),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按,以上唐僖宗时期共开十三科,录取三四七人。)

昭宗龙纪元年(889),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七人。

大顺元年(890),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一人。

二年(891),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六人。

三年(892),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

景福二年(893),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二人。

乾宁元年(894),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三人。

二年(895),进士二十五人,重放一十五人,落下十人。诸科三人。

三年(896),进士十二人,诸科四人。

四年(897),进士二十人,诸科三人。

五年(898),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

光化二年(899),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

三年(900),进士三十六人,诸科二人。(按,三十六人,徐氏《记考》云,《避暑录》:"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啖赐之。"此作"三十六人",未知孰是。)

四年(901),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三人。

天复二年(902)、三年(903),停举。

四年(904),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按,以上唐昭宗时期共开十四科,录取三三三人。)

[**哀帝**]**天祐**二年(905),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

三年(906),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四人。

四年(907),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二人。(按,以上唐哀帝时期共开三科,录取七十三人。)

〔原载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唐自高祖李渊开国,迄哀帝李柷被后梁朱温所灭,共历二十帝(在中宗、睿宗之际出现过武周政权),二百九十年(618-907)。其间自武德五年(622)起,共开进士科二百六十一次,录取六千四百六十人,另秀才二十九人,平均每科约二十五人,最高者为高宗咸亨四年癸酉科七十九人,最低者为高宗永徽五年甲寅科一人,且有全部不予录取的情况(高宗麟德二年乙丑科)。〕

五代登科记总目

梁太祖开平二平(908),进士十八人,诸科五人。

三年(909),进士十九人,诸科四人。

四年(910),进士十五人,诸科一人。

五年(911),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

乾化二年(912),进士十一人,诸科一人。(按,以上后梁太祖时期共

开五科，录取八十三人。）

[**末帝**]三年(913)，进士十五人。

四年(914)，停举。

五年(915)，进士十三人，诸科二人。

贞明二年(916)，进士十二人，诸科一人。

三年(917)，进士十五人，诸科二人。

四年(918)，进士十二人，诸科二人。

五年(919)，进士十三人，诸科一人。

六年(920)，进士十二人，诸科三人。（按，十二人，宋韩思《五代登科记》作“十三人”。）

七年(921)，停举。

龙德二年(922)，进士十四人，诸科二人。

三年(923)，停举。（按，以上后梁末帝时期共开八科，录取一〇六人。二主合计十三科，一八九人。）

唐庄宗同光二年(924)，进士十四人，诸科二人。

三年(925)，进士四人。

四年(926)，进士八人，诸科二人。（按，以上后唐庄宗时期共开三科，录取二十六人。）

明宗天成二年(927)，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九人。

三年(928)，进士十五人，诸科四人。

四年(929)，进士十三人，诸科二人。

长兴元年(930)，进士十五人，重试落下八人，诸科一人。

二年(931)，进士四人。

三年(932)，进士八人，诸科八十一人。

四年(933)，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一人。（按，以上后唐明宗时期共开七科，录取九十四人。）

愍帝长兴五年(934)，进士十七人，诸科一人。

废帝清泰二年(935)，进士十四人，诸科一人。

三年(936)，进士十三人。（按，以上后唐愍帝、废帝时期共开三科，录取四十四人。四主合计十三科，一六四人。）

晋高祖天福二年(937),进士十九人。

三年(938),进士二十人。

四年(939)、五年(940)停贡举。

六年(941),进士十一人,诸科四十五人。

七年(942),进士七人。(按,以上后晋高祖时期共开四科,录取五十七人。)

[**出帝**]八年(943),进士七人。

九年(944),进士十三人,诸科五十六人。

开运二年(945),进士十五人,诸科八十八人。

三年(946),进士二十人,诸科九十二人。(按,以上后晋出帝时期共开四科,录取五十五人。二主合计八科,一一二人。)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百五十五人。

隐帝乾祐元年(948),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949),进士十九人,诸科八十人。

三年(950),进士十七人,诸科八十四人。(按,以上后汉隐帝时期共开三科,录取五十九人。二主合计四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广顺元年(951),进士十三人,诸科八十七人。

二年(952),进士十三人,诸科六十六人。

三年(953),进士十人,内落下二人,诸科八十三人。(按,以上后周高祖时期共开三科,录取三十六人。)

世宗显德元年(954),进士二十人,诸科一百二十一人。(按,一百二十一人,宋韩思《五代登科记》作"一百二十二人"。)

二年(955),进士十六人,(按,此句下依例应增入"重试落下十二人"七字或"内落下十二人"六字。详见《五代会要》卷二十二《进士》、《登科记考》卷二十六《显德二至四年》。)

三年(956),进士六人,诸科二十九人。

四年(957),进士十人,诸科三十五人。

五年(958),进士十五人,内落下七人,诸科七十二人。

六年(959),进士十人,诸科五十人。(按,以上后周世宗时期共开六科,录取六十五人。二主合计九科,一〇一人。)

〔原载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三》。五代历时

五十四年(907－960)，有八姓称帝(后梁一姓，后唐三姓，后晋一姓，后汉一姓，后周二姓)。其间共开进士科四十七次，录取六百五十人，平均每科约十四人，最高者为后唐明宗长兴四年癸巳科二十四人，最低者为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乙酉科、明宗长兴二年辛卯科、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乙卯科，均仅四人。此外，十国中南汉(917－971)自高祖刘龚乾亨四年(920)始设铨选，开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制度，岁以为常。南唐(937－975)自元宗李璟保大十年(952)始开贡举，迄后主李煜降宋，凡十七榜，放进士及第者九十三人。后蜀(934－965)自后主孟昶广政十二年(949)，亦置吏部三铨、礼部贡举。〕

宋登科记总目

太祖建隆元年(960)，进士十九人，榜首杨砺。

二年(961)，进士十一人，榜首张去华。

三年(962)，进士十五人，榜首马适。

四年(963)，进士八人，榜首苏德祥。

乾德二年(964)，进士八人，榜首李景阳；制科一人。

三年(965)，进士七人，榜首刘察。

四年(966)，进士六人，榜首李肃；制科二人。

五年(967)，进士十人，榜首刘蒙叟。

六年(968)，进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务。

开宝二年(969)，进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970)，进士八人，榜首张拱；赐十五举未及第人司马溥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971)，进士十人，榜首刘寅。

五年(972)，进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973)，进士十一人，榜首宋准，再试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诸科九十六人。〔按，九十六人，《宋会要辑稿》(下称《会要》)第一百十册《选举七》作"一百一人"，《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十四作九十七人，并谓"自兹殿试，遂为常式"。〕

七年(974),停贡举。

八年(975),进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状元王嗣宗;诸科二十四人。(按,二十四人,《会要·选举七》、《长编》卷十六、《宋史·太祖本纪三》并作"三十四人"。)

九年(976),停贡举。(按,以上宋太祖时期共开十五科,录取一八八人。)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一百九人,省元(原佚其名),状元吕蒙正;诸科二百七人,十五举以上百八十四,凡五百余人。

三年(978),进士七十四人,省元(原佚其名),状元胡旦;诸科八十二人。(按,《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载昌言为是年"贡部首荐",则省元当为赵昌言。八十二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十九作"七十人"。)

四年(979),不贡举。

五年(980),进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原佚其名),状元苏易简。诸科五百三十四人。(按,一百二十一人,《会要·选举七》、《长编》卷二一并作"一百十九人"。又五百三十四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同卷作"五百三十三人"。)

六年(981)、七年(982),停贡举。

八年(983),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状元王世则;诸科二百八十五人。(按,二百三十九人、二百八十五人,《会要·选举七》各作"二百二十九人"、"七百六十四人",《长编》卷二四各作"百七十五人"、"五百一十六人"。)

雍熙元年(984),不贡举。

二年(985),进士二百五十人,省元陈充,状元梁颢;诸科六百九十九人。(按,二百五十人、六百九十九人,《会要·选举七》、《长编》卷二六俱各作二百五十五人、六百二十人。)

三年(986)、四年(987),不贡举。

端拱元年(988),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十人,覆试得进士、诸科七百人。又武成庙重试得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是年不临轩(按,据《会要·选举七》和《长编》卷二九所载统计,是年进士为一百六十人,诸科为八百二十人或八百一十人。)

二年(989),进士一百八十六人,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陈尧叟,状元同。(按,四百七十八人,《长编》卷三十作五百二十三人。)

淳化元年(990)、二年(991),不贡举。

三年(992),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孙何,状元同。(按,七百七十四人,《会要·选举七》作"七百四十七人",《长编》卷三三作九百六十四人。)

四年(993)、五年(994)、**至道**元年(995)、二年(996)、三年(997),并不贡举。(按,以上宋太宗时期共开八科,录取一四七七人。)

真宗咸平元年(998),进士五十人,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孙仅,状元同。

二年(999),进士七十一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孙暨,状元同。(按,七十一人,《长编》卷四四作"七十人"。)

三年(1000),进士四百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几、状元陈尧咨。(按,四百九人,《会要·选举七》作"三百六十五人",《长编》卷四六作四百一十四人。)

四年(1001),停贡举,制科七人。

五年(1002),进士三十八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王曾,状元同。(按,一百八十人,《会要·选举七》作"一百八十二人",《长编》卷五一作"一百八十一人"。)

六年(1003),不贡举。

景德元年(1004),不贡举。

二年(1005),进士二百四十七人,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刘滋,状元李迪。(按,二百四十七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五九作"二百四十六人"。)

三年(1006),不贡举,制科二人。

四年(1007),不贡举,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二百七人,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郑向,状元姚晔。(按,二百七人,《长编》卷六八同,《会要·选举七》作"三百七十人"。)

二年(1009),亲试东封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梁固。

三年(1010),停贡举。

四年(1011),祀汾阴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张师德。

五年(1012),进士一百二十六人,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原佚其名),状元徐奭。(按,三百七十七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七七作三百七十六人。)

六年(1013),停贡举。

七年(1014),亳州南京路进士二十一人,状元张观。

八年(1015),进士二百八十人,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悚,状元蔡齐。(按,二百八十人,《会要·选举七》、《长编》卷八四并作二百八十一人。又六十五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同卷作"三百六十三人"。)

九年(1016),停贡举。

天禧元年(1017),二年(1018),停贡举。

三年(1019),进士一百四十人,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戡,状元王整。(按,一百四十人,《会要·选举七》作"二百四十人",《长编》卷九三作一百六十二人。《会要》"二百"之"二",或系手抄时误"一"为"二"。)

四年(1020)、五年(1021)、乾兴元年(1022),并停贡举。(按,以上宋真宗时期共开十二科,录取一二五二人。)

仁宗天圣元年(1023),停贡举。

二年(1024),进士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吴感,状元宋郊。(按,三百五十四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一〇二作二百七十七人。又《宋史·仁宗本纪一》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宋郊,后改名宋庠。)

三年(1025)、四年(1026),停贡举。

五年(1027),进士七十七人,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按,七十七人,《会要·选举七》作"三百七十七人",《长编》卷一〇五作三百七十九人。又《宋史·仁宗本纪一》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一千七十七人"。)

六年(1028)、七年(1029),停贡举。

八年(1030),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1031),停贡举。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1032)、二年(1033),并停贡举。

景祐元年(1034),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

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黄庠,状元张唐卿。(按,四百九十九人,《会要·选举七》作"七百一十五人",《长编》卷一一四作"五百一人"。又四百八十一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同卷作"二百八十二人"。《宋史·仁宗本纪二》则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适与《长编》数合。)

二年(1035)、三年(1036)、四年(1037),并停贡举。

宝元元年(1038),进士三百一十人,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省元范镇,状元吕溱。(按,六百一十七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一二二作"四百十四人"。《宋史·仁宗本纪二》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适与《长编》数合。)

二年(1039)、**康定**元年(1040)、**庆历**元年(1041),并停贡举。

二年(1042),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杨寘,状元同。制科一人。(按,四百三十五人,《会要·选举七》作"四百三十六人",《长编》卷一三五作四百三十二人。)

三年(1043)、四年(1044)、五年(1045),并停贡举。

六年(1046),进士五百三十八人,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状元贾黯。(按,五百三十八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一五八作五百三十七人。《宋史·仁宗本纪三》则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五十三人"。)

七年(1047)、八年(1048),停贡举。

皇祐元年(1049),进士四百九十八人,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冯京,状元同。(按,四百九十八人,《会要·选举七》作"四百八十九人",《长编》卷一六六作五百四十三人。《宋史·仁宗本纪三》则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千三百九人"。)

二年(1050)、三年(1051)、四年(1052),并停贡举。

五年(1053),进士五百二十人,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徐无党,状元郑獬。(按,五百二十二人,《长编》卷一七四同,《会要·选举七》作"五百二十六人"。《宋史·仁宗本纪四》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千四十二人",则与《登科记》并《长编》数合。)

至和元年(1054)、二年(1055)、**嘉祐**元年(1056),不贡举。

二年(1057),进士三百八十八人,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实,状元张衡。是岁始定为间岁一科举 (按,张衡当作"章衡",《宋史》卷三四

七立有《章衡传》,言其嘉祐二年进士第一,《长编》卷一八五所载同。)

四年(1059),进士一百六十五人,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刘挚,状元刘辉。制科三人。(按,一百六十五人,《会要·选举七》与《长编》卷一八九并作"一百六十三人"。一百八十四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同卷作"一百七十六人"。《宋史·仁宗本纪四》云,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三百三十九人",则与《长编》数合。)

六年(1061),进士一百八十三人,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状元王俊民。(按,一百八十三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一九三作一百九十三人。《宋史·仁宗本纪四》云,赐进士、诸科及第同出身"二百九十五人",则与《长编》数合。)

八年(1063),进士一百九十三人,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状元许将。(按,一百九十三人、十一人,《会要·选举七》、《长编》卷一九八俱各作"一百九十四人"、"一百四十七人",与《宋史·仁宗本纪四》"赐进士、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数合。以上宋仁宗时期共开十三科,录取四五六八人。)

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二百人,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砺,状元同。始诏三岁一科举 (按,《长编》卷二〇四、《宋史·英宗本纪》并云赐礼部奏名进士、明经诸科及第出身"三百六十一人",与这里所列数字相差颇大。又是科省元或载为"舒亶",见《宋史》卷三二九本传及《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当从。)

四年(1067),进士二百五十人,诸科三十六人。省元许安世,状元同。时神宗已即位 (按,二百五十人,《长编》卷二〇九作"三百五人,《宋史·神宗本纪一》作"四百六十一人"。又三十六人,《长编》同卷作"二百一十一人"。此数与《登科记》所载进士二百五十人相加,则与《宋史》四百六十一人合。以上宋英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四五〇人。)

神宗熙宁三年(1070),进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陆佃,状元叶祖洽。明经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按,二百九十五人、四百七十二人,《会要·选举七》各作"三百五十五人"、"四百七十四人",与《宋史·神宗本纪二》赐礼部奏名进士、明经及第"八百二十九人"数合。)

六年(1073),进士四百人,诸科四十人,省元邵刚,状元余中。(按,四百人、四十人,《会要·选举七》各作"三百四十八人"、"二百一十七人"。《长编》卷二四三、《宋史·神宗本纪二》则俱云,赐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五百九十六人"。)

九年（1076），进士四百二十二人，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张嵲，状元徐铎。（按，四百二十二人，《会要·选举七》作“四百二十六人”。《长编》卷二七三、《宋史·神宗本纪二》则俱云，赐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五百九十六人”。）

元丰二年（1079），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先浚明，状元时彦。（按，《会要·选举七》、《长编》卷二九七并云赐进士、明经诸科及第出身者“六百二人”。）

五年（1082），进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经三人。省元刘概，状元黄裳。（按，《会要·选举七》谓得进士、明经凡五百九十二人，《长编》卷三二四云赐进士、明经共五百九十三人，则《登科记》明经“三人”必误甚。）

八年（1085），进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状元同。是年谅阴，不临轩 （按，四百八十五人，《长编》卷三五六作“五百七十五人”，《宋史·哲宗本纪一》云，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以上宋神宗时期共开六科，录取二四五五人。）

哲宗元祐三年（1088），进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状元李常宁。（按，五百二十三人，《会要·选举七》同，《长编》卷四〇九作四百八人。）

六年（1091），进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邹起，状元马涓。制科三人。（按，五百一十九人，《会要·选举七》、《长编》卷四五六并作“六百二人”。）

绍圣元年（1094），进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刘范，状元毕渐。制科三人，宏词科八人。（按，五百一十二人，《会要·选举七》作“五百一十三人”。）

四年（1097），进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状元何昌言。词科九人。（按，五百六十四人，《会要·选举七》作“五百六十九人”。）

元符三年（1100），进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鉴，状元同。是岁谅阴，不临轩 （按，五百六十一人，《宋史·徽宗本纪一》作“五百五十八人”，《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作“五百五十人”。李鉴，《会要·选举一》《石林燕语》卷四俱作“李釜”，当从。以上宋哲宗时期共开五科，录取二七六二人。）

徽宗崇宁二年（1103），进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阶，状元霍端友。

五年（1106），进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吴倜，状元**蔡薿**。是科为始

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从学校逐年贡士　（按，蔡襄，或作“蔡巍”，与《宋史》卷三五四其《本传》标名不合。）

大观三年（1109），进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魁李弥逊，状元贾安宅。（按，六百八十五人，《会要·选举七》作“七百三十一人”。）

政和二年（1112），进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师骥，状元莫俦。

五年（1115），进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崧卿，状元何栗。

八年（1118），进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状元王嘉。（按，何奎，《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作“何大圭”，并称其为晋陵人，当是。又王嘉，当作“嘉王”，系徽宗第三子赵楷。《会要·选举八》载，三月二十六日诏，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列传三·郓王楷》称，政和八年廷策进士，唱名第一。）

宣和三年（1121），进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齐愈，状元何涣。

六年（1124），进士八百五人。是年复省试　省元杨椿，状元沈晦。（以上宋徽宗时期共开八科，录取五五三七人。）

高宗建炎二年（1128），　以军兴分路类省试　进士四百五十一人，状元李易。四川、河北、京东进士八十七人。

绍兴二年（1132），进士二百五十九人，状元张九成。四川进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1135），进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远，状元汪应辰。四川进士一百三十七人。（按，樊光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要录》）卷九三作“郑厚”。汪应辰，原名汪洋，及第后赐改今名。）

八年（1138），进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黄公度，状元同。是年不亲策，引见正奏名，与四川类省奏名参定编排　（按，二百九十三人，《会要·选举八》作“二百九十五人”，《要录》卷一二〇作“三百五十九人”，《宋史·高宗本纪六》作“三百九十五人”。）

十二年（1142），进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状元陈诚之。（按，二百五十四人，《会要·选举八》、《要录》卷一四五并作“二百五十三人”。）

十五年（1145），进士三百人，省元林机，状元刘章。四川进士七十三人。

十八年(1148),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佐。四川进士二十三人。(按,三百三十人,《会要·选举八》作"三百三十一人"。据《绍兴题名录》,所多一人系将特奏名进士第一人俞舜凯计算在内。)

二十一年(1151),进士四百四人,省元郑闻,状元赵逵。四川进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1154),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埙,状元张孝祥。四川进士六十三人。(按,三百四十八人,《会要·选举八》、《要录》卷一六六、《宋史·高宗本纪八》并作"三百五十六人"。)

二十七年(1157),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张宋卿,状元王十朋。先时,四川类省道远、趁赴殿不及者,别奏名,是年无不到

三十年(1160),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刘朔,状元梁克家。四川进士十六人。(按,以上宋高宗时期共开十一科,录取三八〇六人。)

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问,状元同。是年不亲策,同绍兴八年 (按,五百四十一人,《会要·选举八》作"五百三十七人",《宋史·孝宗本纪一》作"五百三十八人"。)

乾道二年(1166),进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状元萧国梁。(按,四百九十二人,《会要·选举八》作"四百九十四人",《宋史·孝宗本纪一》作"四百九十有三人"。)

五年(1169),进士五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状元郑侨。(按,五百九十二人,《会要·选举八》作"三百九十一人,《宋史·孝宗本纪二》作"三百九十有二人"。)

八年(1172),进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学,状元黄定。

淳熙二年(1175),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颖,状元詹骙。

五年(1178),进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黄涣,状元姚颖。

八年(1181),进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状元黄由。

十二年〔当作十一年(1184)〕,进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状元卫泾。(按,三百九十五人,《宋史·孝宗本纪三》作"三百九十四人"。)

十四年(1187),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汤琦,状元王容。(按,以上宋孝宗时期共开九科,录取三八八三人。)

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按,五百五十七人,《宋史·光宗本纪》作"五百三十有七人"。)

四年(1193),进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按,以上宋光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九五三人。)

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五百丹六人,省元莫子纯,状元邹应龙。(按,五百丹六人,"丹"字衍,《宋史·宁宗本纪一》作"四百九十有九人"。)

五年(1199),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苏大璋,状元曾从龙。四川举士四人。

嘉泰二年(1202),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简,状元同。是年谅阴,不临轩 (按,四百三十五人,《会要·选举八》作"四百三十九人",《宋史·宁宗本纪二》作"四百九十有七人"。)

开禧元年(1205),进士三十八人,省元林执善,状元毛自知。(按,三十八人,《会要·选举八》、《宋史·宁宗本纪二》并作"四百三十三人"。)

嘉定元年(1208),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朱停,状元郑自诚。四川进士四人。(按,四百二十六人,《会要·选举八》作"四百二十五人"。郑自诚,《宋史·宁宗本纪三》作"郑自成"。)

四年(1211),进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状元赵建夫。(按,四百六十五人,《会要·选举八》作"四百六十一人"。赵建夫,《会要·选举八》、《宋史·宁宗本纪三》、《梦梁录》卷十七《状元表》并作"赵建大"。)

七年(1214),进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状元袁甫。(按,五百二人,《会要·选举八》作"五百四人"。)

十年(1217),进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陈埙,状元吴潜。

十三年(1220),进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邱大发,状元刘渭。

十六年(1223),进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胄,状元蒋重珍。(按,五百五十人,《会要·选举八》、《宋史·宁宗本纪四》并作"五百四十九人"。以上宋宁宗时期共开十科,录取四七三〇人。)

理宗宝庆二年(1226),进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会龙,状元同。是年谅阴,不临轩 (按,九百八十七人,《宋史·理宗本纪一》作"九百八十九人"。)

绍定二年(1229),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

五年(1232),进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叶大有,状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1235),进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杨茂子,状元吴叔告。〔按,四百六十六人,《宋史·理宗本纪二》作"四百五十四人",明王圻《续文

献通考》(下称王氏《通考》)卷四三《选举考·举士一》作"四百六十人"。〕

嘉熙二年(1238),进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缪烈,状元周坦。

淳祐元年(1241),进士〔三百六十七〕人,(按,总数原缺,据《宋史·理宗本纪二》补。)省元刘自,状元徐俨夫。

四年(1244),进士〔四百二十四〕人。(按,总数原缺,据《宋史·理宗本纪三》补。)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

七年(1247),进士〔五百二十七〕人,(按,总数原缺,据《宋史·理宗本纪三》补。)省元马廷鸾,状元张渊微。(按,张渊微,《梦粱录》卷十七《状元表》作"张渊徽"。)

十年(1250),进士〔五百一十三〕人,(按,总数原缺,据《宋史·理宗本纪三》补。)省元陈应雷,状元方逢辰。(按,方逢辰,原名方梦魁,及第后赐名逢辰。)

宝祐元年(1253),进士　　人,(按,总数原缺,不得其详。)省元丁应奎,状元姚勉。

宝祐四年(1256),进士〔六百一〕人,(按,总数原缺,据《宝祐四年登科录》及《宋史·理宗本纪四》补。王氏《续通考》作"六百五十九人",不知其所据。)省元彭方迥,状元文天祥。

开庆二年〔当作元年(1259)〕,进士〔四百四十二〕人,(按,总数原缺,据《宋史·理宗本纪四》补。)省元李雷奋,状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1262),进士〔六百三十七〕人,(按,总数原缺,据《宋史·理宗本纪五》补。)省元李珏,状元方山京。(按,以上宋理宗时期共开十三科,其中十二科录取六四三六人。)

度宗咸淳元年(1265),进士　　人,(按,总数原缺,不得其详。)省元阮登炳,状元同。是年谅阴,不亲策

四年(1268),进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跃龙,状元陈文龙。(按,六百六十五人,《宋史·度宗本纪》作"六百六十四人"。)

七年(1271),进士〔五百二〕人,(按,总数原缺,据《隐居通议》卷三十一《咸淳七年同年小录》、《宋史·度宗本纪》补。)省元刘梦荐,状元张镇孙。

十年(1274),进士　　人,(按,总数原缺,不得其详。)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按,以上宋度宗时期共开四科,其中两科录取一一六七人。)

〔原载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五》。宋自太祖赵匡胤代后周称帝，迄幼帝赵罡投海而死，共历十八帝，三百二十年(960－1279)。靖康之难(1127)以前，史称北宋(九帝一百六十七年)，其后则称南宋（九帝一百五十三年)。两宋凡开进士科一一八次，录取四万余人，平均每科约三百四十八人(按一一五科计算)，最高者为理宗宝庆二年丙戌科九百八十九人，最低者为太祖乾德四年丙寅科六人。析而言之，北宋共开科六十九次，录取近一万九千人，平均每科约二百七十五人，最高者为徽宗宣和六年甲辰科八百五人。南宋共开科四十九次，录取约二万一千余人(内缺三科人数)，平均每科约四百五十七人(按四十六科计算)。最低者为绍兴二年壬子科二百五十九人。以两宋视唐，其平均录取数则北宋约为唐代十倍尚有余，南宋更在唐代十八倍以上。〕

辽登科总目

圣宗统和六年(988)，赐及第一人。(按，此人名高举，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圣宗纪三》校勘记第十二条。)

臣等谨按，辽科目始见于统和，而《室昉传》称会同初，登进士第，则进士之来远矣。〔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亦云：契丹岁开贡部，琪举进士中第。时值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即辽太宗会同四年。〕

七年(989)八月，放进士高正等二人及第。

八年(990)，放郑云从等二人及第。

九年(991)，放进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一年(993)十一月，放进士王熙载等二人及第。

十二年(994)，放进士吕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三年(995)，放进士王用极等二人。

十四年(996)，放进士张俭等三人。

十五年(997)，放进士陈鼎等二人。

十六年(998)，放进士杨文立等二人。(按，杨文立，据《辽史·圣宗纪五》，当作"杨又玄"。)

十七年(999),放进士初锡等三人及第。(按三人,据《辽史·圣宗纪五》,当作"四人"。)

十八年(1000),放进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二十年(1002),放进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二年(1004),放进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四年(1006),放进士杨信等二十三人及第。(按,杨信,据《辽史·圣宗纪五》和《杨佶传》,当作"杨佶"。)

二十六年(1008),放进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1009),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

二十九年(1011),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

开泰元年(1012)五月,放进士史简等十九人及第。

二年(1013),放进士鲜于茂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1014),放进士张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五年(1016),放进士孙杰等四十八人及第。

七年(1018)十二月,放进士张克恭等三十七人及第。

九年(1020)十二月,放进士张仲举等四十五人。

太平二年(1022),放进士张渐等四十七人。

四年(1024),放进士李炯等四十七人。

五年(1025)十一月,试进士张昱等七十二人,各授官有差。

八年(1028),放进士张宥等五十七人。

九年(1029)十一月,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七人入朝,试以诗赋,皆赐第。(按,二十七人,《辽史·圣宗纪八》作"二十二人"。以上辽圣宗时期共开三十科,录取四七二人。)

兴宗景福元年(1031),御宣政殿,放进士刘真等五十七人。(按,刘真,据《辽史·兴宗纪一》,当作"刘贞"。罗继祖《辽史校勘记》谓,此系次年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之复出。景福元年即圣宗太平十一年,《辽史·杨晳传》载其太平十一年擢进士乙科,《杨绩传》亦称其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则罗氏之说不确。)

重熙元年(1032),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

五年(1036)十月,御元和殿,放进士冯立等四十九人。

七年(1038)六月,御清凉殿试进士,赐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

臣等谨按,《传》言赵徽中重熙五年甲科,王观中重熙七年乙科,则辽时科第,亦有甲乙之分也。

十一年(1042)六月,御清凉殿,放进士王实等六十四人。(按,王实,《辽史·兴宗纪二》作"王寔",当从。"寔"为其人名专用字,不可易之以"实"。)

十五年(1046)六月,御清凉殿,放进士王棠等六十八人。

十九年(1050)六月,御金銮殿试进士。(按,以上辽兴宗时期可考知者共开七科,录取三五〇人)。

道宗清宁元年(1055),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

五年(1059),御百福殿,放进士梁援等百一十五人。

八年(1062)六月,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

臣等谨按,《王鼎传》称清宁五年进士。(按,今人陈述《全辽文》附录二《作者索引及事迹考》谓,清宁八年状元王鼎与列传王鼎乃系同名异人。)

咸雍二年(1066),御永安殿,放进士张臻等百一人。

六年(1070)六月,御永安殿,放进士赵廷睦等百三十八人。

十年(1074)六月,亲出题试进士。

大康五年(1079)六月,放进士刘瓘等百一十三人。

九年(1083),御前放进士李君裕等五十一人。

大安二年(1086)五月,放进士张毅等二十六人。

六年(1090),放进士文充等七十二人。

八年(1092),放进士寇尊文等五十三人。

寿隆元年(1095),放进士陈衡甫等百三十人。

六年(1100),放进士康秉俭等八十七人。(按,以上辽道宗时期可考知者共开十三科,录取一〇一三人。)

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放进士马恭回等百三人。

七年(1107),放进士李石等百人。

九年(1109),放进士刘桢等九十人。

天庆二年(1112),放进士韩昉等七十七人。

臣等谨按,辽之进士皆汉人,契丹人无举进士之条。《传》载重熙中,耶律富鲁举进士第,帝怒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有违

国制，鞭之二百。然《天祚纪》载，耶律达实举天庆五年(1115)进士，而《纪》于五年又不云放进士，盖史之缺漏多矣。(按，耶律富鲁，旧作"耶律蒲鲁"。)

八年(1118)，放进士王翥等百三人。〔按，以上辽天祚帝时期可考知者共开六科，录取四七三人(内天庆五年人数缺)。〕

后耶律淳于保大二年自立，改为建福元年(1122)，放进士李宝信等一十九人，以医官李爽、陈泌十余人曾与大计，并赐进士及第，授官有差。淳卒，妻德妃称制，改元德兴(1122)，放进士李球等百八人。(按，以上北辽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一二七人。)

〔原载清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选举一》，文字略有删节。辽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经太宗耶律德光于大同元年(947)二月初一日改国号为大辽，迄天祚帝被金俘虏，共历九帝(在天祚帝末期保大二年曾出现极短暂的耶律淳北辽政权)，二百一十年(916－1125)。其间自太宗会同时(938－946)已岁开贡部，至圣宗统和六年(988)又诏命强化科举，后共开进士科五十八次(限于《登科总目》所载者)，录取汉人二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两科不详录取数，又契丹人规定不得应试)，平均每科约四十三人(按五十五科计算)，最高者为道宗咸雍六年庚戌科一百三十八人，最低者为圣宗统和六年戊子科、九年辛卯科各一人。〕

金登科总目

太宗天会十年(1132)，胡砺中进士第一。(按，宋人张棣于其所撰《金虏图经·取士》云：是年赵洞为词赋第一人，孙九鼎为经义第一人。又《大金国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三》载，天会七年(1129)秋，试举人于蔚州，辽人应词赋，两河人应经义。忻州进士孙九鼎为魁。再，据《金史》卷一二七《褚承亮传》及卷七四《宗望传》并李世弼《金登科记序》所述，金自天会四年(1126)即灭掉北宋前一年，便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安国寺试境内进士，时号"七十二贤榜"。此外，《金史·刘从益传》载其为天会元年(1123)词赋进士，《刘敏行传》载其登天会三年(1125)进士第，《翟永固传》载其中天会六年(1128)词赋科，《张浩传》载其天会八年(1130)赐进士及第，《金史·选举志一》且谓二年(1124)二月、八月凡再行、

则金太宗时期至少共开八科。）

熙宗天眷二年(1139)，石琚中进士第一。（按，《金史·杨伯渊传》载其天会十四年(1136)赐进士第，《金史·高德基传》、《丁昧仁传》、《程辉传》、《王蔚传》、《王翛传》、《杨伯雄传》、《牛德昌传》载其俱于皇统二年(1142)登进士第，《李晏传》、《张亨传》、《郭长倩传》载其俱于皇统六年(1146)登进士第，《董师中传》、《杨伯仁传》载其俱登皇统九年(1149)进士第，则金熙宗时期至少共开五科。）

海陵天德二年(1150)，吕忠翰中进士第一。（按，《金史·张汝霖传》载吕忠翰为贞元二年(1154)状元。金至海陵王，始定三年一科考。）

三年(1151)，杨建中中进士第一。

正隆二年(1157)，郑子聃以天德进士第三，复就是年御试，得第一。

是年中第者七十三人。又王彦潜、常大荣，皆海陵时进士第一。（按，王彦潜，据《金史·刘萼传》，其为天德三年状元。又据《贺扬庭传》，是年仍分词赋、经义两科，故王彦潜与杨建中并为状元，二人究属何科，已殊难确定，或许杨建中为词赋状元。再，《金史·马骐传》、《张晦传》、《路伯达传》、《李愈传》、《宋宸传》载其俱登正隆五年(1160)进士第，则金海陵王时期至少共开四科。既开四科，则常大荣当为正隆五年状元。）

世宗大定三年(1163)，孟宗献中进士第一。

十三年(1173)，策女直进士图克坦镒等二十七人及第。（按，图克坦镒，旧作"徒单镒"。）

十九年(1179)，张行简中进士第一。

又赵承元，亦大定时进士第一。（按，《金史·阎公贞传》、《许安仁传》载其俱登大定七年(1167)进士第，《李献可传》、《孙即康传》、《党怀英传》、《贾益谦传》载其俱登大定十年(1170)进士第，《王庭筠传》、《孙德渊传》载其俱登大定十六年(1176)进士第，《奥屯忠孝传》、《夹谷守传》、《蒲察郑留传》、《萧贡传》、《宗端修传》、《郭俣传》、《赵沨传》载其俱登大定二十二年(1182)进士第，《乌古论仲温传》、《蒲察思忠传》、《王质传》、《李革传》、《张炜传》、《高霖传》、《赵秉文传》载其俱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第，《卢庸传》、《裴满章传》、《耿端义传》、《张翰传》、《张明信传》、《王维翰传》、《高守约传》、《张毅传》、《胥鼎传》、《抹撚尽忠传》、《和速嘉安礼传》、《乌林答乞住传》、《完颜寓传》、《兀颜讹出虎传》、《粘割贞传》，载其俱登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第，则

金世宗时期共开九科，凡三年一科。再，大定十三年亦试汉人。《金史·贾铉传》、《孙铎传》、《邹谷传》等载其俱登是年进士第，可证。）

章宗明昌二年（1191），王泽中进士第一。

五年（1194），杨云翼中进士第一。

臣等谨按，是年韩玉中经义、词赋两科进士。

承安二年（1197），纳喇呼喇勒中进士第一。（按，纳喇呼喇勒，旧作"纳兰胡鲁剌"。）

又李俊民亦承安中进士第一，（按，实为承安五年（1200），见李俊民《庄靖集》卷八《题登科记后》。是年经义榜凡三十三人，李俊民为状元。词赋榜状元已不详。）商衡为**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特恩第一人。（按，《金史·刘从益传》载其登大安元年（1209）进士第，则金卫绍王时期共开二科。）

泰和六年（1206），李演中进士第一。（按，《金史·杨达夫传》、《张特立传》、《纥石烈鹤寿传》、《完颜仲德传》、《蒲察娄室传》载其俱登泰和三年（1203）进士第，则金章宗时期共开六科。）

宣宗贞祐元年（1213），张本中词赋进士高第。

三年（1215），李献能中词赋进士第一。

兴定二年（1218），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按，《金史·李献甫传》、《元好问传》载其俱登兴定五年（1221）进士第，《金史·选举志一》又载，兴定五年，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则金宣宗时期共开四科。再《元史》卷一九五《刘浚传》载其曾祖海，金进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于国难，子孙遂家河南，则刘海及第，亦或在金宣宗末期。）

哀宗正大元年（1224）五月，赐策论进士富珠哩察罕以下十余人，经义进士张介以下五人，词赋进士王鹗以下五十人皆及第。（按，富珠哩察罕，旧作"孛术鲁长哥"或"孛术论长河"、"孛术鲁长河"。）

四年（1227）六月，赐词赋、经义进士卢亚以下进士及第。

七年（1230）五月，赐经义、词赋李瑭以下进士及第。（按，以上金哀宗时期共开三科。）

〔原载清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选举一》，文字略有删节。金自太祖完颜旻（阿骨打）建国，迄末帝完颜承麟在蒙古和宋联合进攻下被杀，共历十帝，一百二十年（1115－1234）。其间自太宗天会元年（1123）始行科举，后共开进士科四十一次（限于本总目所载年份

及其他已考知者),录取总数则已无从统计(其对象包括词赋进士、经义进士、策论进士即女真进士)。海陵王正隆二年丁丑科七十三人,则均系词赋进士。《大金国志》卷三十五《天德科举》云:"大金国自太宗开辟之后,状元凡二十余人",与本总目所载基本相合,但与实际情况相去颇远。]

元登科总目

仁宗延祐二年(1315)三月,廷试进士,赐嗜呼图克岱尔、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按,嗜呼图克岱尔,旧作"护都沓儿"或"护都答儿"。)

五年(1318)三月,廷试进士,赐身图克岱尔、霍希贤等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按,身图克岱尔,旧作"忽都答儿"或"护都答儿"。以上元仁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一〇六人。)

英宗至治元年(1321)三月,廷试进士,赐达嚕噶、宋本等六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按,达嚕噶,旧作"泰普化"或"达普化"。)

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三月,廷试进士,赐巴拉、张益等五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按,巴拉,旧作"八剌"或"捌剌"。五十四人,《元史·泰定帝本纪一》作"八十四人",《选举志一》作"八十六人"。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十一《题杨廷镇所藏首科策题》云,迄元统元年凡七科,五百三十七人,则作"八十四人"为是。)

四年(1327)三月,廷试进士,赐阿怡齐、李黼等八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按,阿怡齐,又作"阿察赤"。八十五人,《元史·选举志一》作"八十六人"为是。以上元泰定帝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一七〇人。)

文宗至顺元年(1330)三月,廷试进士,赐笃列图、王文煜等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按,王文煜,《元史·文宗本纪三》及《选举志一》并作"王文烨",为是。)

顺帝元统元年(1333),廷试进士,赐同同、李齐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左右榜各三人赐进士及第。

臣等谨按,元之廷试,皆以三月,而顺帝以是年六月即位,十月改元元统,则廷试当必改期,《纪》缺未书。

至正二年(1342)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赐拜珠、陈祖仁及第,余出身有差。(按,拜珠,旧作"拜住"。)

五年(1345)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赐布延布哈、张士坚及第,余出身有差。(按,布延布哈,旧作"普颜不花"。)

八年(1348)三月,廷试进士一百八人,赐阿噜呼木特穆尔、王宗哲及第,余出身有差。(按,一百八人,《元史·顺帝本纪四》作"七十八人",为是。阿噜呼木特穆尔,旧作"阿鲁辉帖木儿"。)

十一年(1351)三月,廷试进士八十三人,赐图烈图、文允中及第,余出身有差。(按,图烈图,旧作"朵烈图"。)

十四年(1354)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赐薛朝晤、牛继志及第,余出身有差。

十七年(1357)三月,廷试进士五十一人,赐悦徵、王宗嗣及第,余出身有差。

二十年(1360)三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赐迈珠、魏元礼及第,余出身有差。(按,迈珠,旧作"买住"。)

二十三年(1363)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赐宝宝、杨辀及第,余出身有差。

二十六年(1366)三月,廷试进士七十二人,赐哈喇布哈、张栋及第,余出身有差。(按,哈喇布哈,旧作"赫德溥化"。以上元顺帝时期共开十科,录取六九九人。)

〔原载清官修《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选举一》,文字略有删节。元自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继灭南宋,迄顺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共历十一帝,九十八年(1271-1368)。其间自仁宗延祐二年(1315)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后共开进士科十六次,录取一千一百三十六人(包括蒙古和色目人,汉人南人),平均每科七十一人,最高者为顺帝元统元年癸酉科一百人,最低者为顺帝至正二十年庚子科三十五人。〕

明登科总目

太祖洪武四年(1371)三月,廷试天下贡士俞友仁等一百一十人,赐吴伯宗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一十人,《明太祖实录》卷六二、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六《选举考·举士四》(下概称王氏《续考》)并作"一百二十人"。〕

十八年(1385)三月,廷试黄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赐丁显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一年(1388)三月,廷试施显等九十七人,赐任亨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四年(1391)三月,廷试许观等三十一人,仍赐观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

观,贵池人,乡、会试俱第一,后复姓黄。

二十七年(1394)三月,廷试彭德等百人,赐张信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年(1397)三月,廷试宋琮等五十二人,赐陈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五十二人,王氏《续考》同,《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作"五十一人"。)

六月,廷试任伯安等六十一人,赐韩克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年有春榜、夏榜之号。(按,以上明太祖时期共开六科,录取九三三人。)

惠帝建文二年(1400)三月,廷试吴溥等一百十人,赐胡广、王艮、李贯三人进士及第,并授翰林院修撰,余赐进士出身有差。(按,一百十人,《皇明史概》卷七作一百一十八人。)

成祖永乐二年(1404)三月,廷试杨相等四百七十二人,赐曾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年(1406)三月,廷试朱缙等二百一十九人,赐林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九年(1411)三月,廷试陈燧等八十四人,赐萧时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帝北巡,仁宗监国。礼部会试得燧等八十四人,命送国子监读书,至是始廷试。

十年(1412)三月,廷试林誌等一百六人,赐马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三年(1415)三月,廷试洪英等三百五十一人,赐陈循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六年(1418)三月,廷试董璘等二百五十人,赐李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九年(1421)三月,廷试陈中等二百一人,赐曾鹤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二年(1424)三月,廷试叶恩等一百五十人,赐邢宽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明成祖时期共开八科,录取一八三三人。)

宣宗宣德二年(1427)三月,廷试赵鼎等一百一人,赐马愉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一人,王氏《续考》同,《明宣宗实录》卷二六作"一百人"。)

五年(1430)三月,廷试陈诏等一百人,赐林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年(1433)三月,廷试刘哲等九十九人,赐曹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明宣宗时期共开三科,录取三〇〇人。)

英宗正统元年(1436)三月,廷试刘定之等一百人,赐周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年(1439)三月,廷试杨鼎等九十九人,赐施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杨鼎,《明英宗实录》卷五三作"杨鼐"。施槩,王氏《续考》作"杨槩"。九十九人,《实录》同,王氏《续考》作"一百人"。)

七年(1442)三月,廷试姚夔等一百四十九人,赐刘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四十九人,《明英宗实录》卷九十作"一百五十一人",王氏《续考》作"一百五十人"。)

十年(1445)三月,廷试商辂等一百五十人,仍赐辂进士第一,余

及第、出身有差。

十三年（1448）三月，廷试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赐彭时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五十人，王氏《续考》同，《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四作"一百五十一人"。以上明英宗正统年间共开五科，录取六四九人。）

景帝景泰二年（1451）三月，廷试吴汇等二百一人，赐柯潜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一人，《明英宗实录》卷二〇二同，王氏《续考》作"二百人"。）

五年（1454）三月，廷试彭华等三百四十五人，赐孙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五人，《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王氏《续考》并作"三百四十九人"。以上明代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五五〇人。）

英宗天顺元年（1457）三月，廷试夏积等二百九十四人，赐黎淳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年（1460）三月，廷试陈选等一百五十六人，赐王一夔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王一夔，后复其本姓谢。《明史》卷一六五为其立传，仍标王一夔。一百五十六人，《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三同，王氏《续考》作"一百五十人"。）

八年（1464）三月，时宪宗已即位　以谅阴不御殿，传策试吴钺等二百四十七人，赐彭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明英宗天顺年间共开三科，录取六九七人。连天顺为一，则凡八科，一三四六人。）

七年二月礼部试日，火死者九十余人，英宗命俱赠进士出身，改期八月会试。至是，宪宗御西角门策之。

宪宗成化二年（1466）三月，廷试章懋等三百五十三人，赐罗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五十三人，《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作三百五十人，又载录取数为三百五十九人。王氏《续考》作"三百五十人"。）

五年（1469）三月，廷试费閎等二百四十七人，赐张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四十七人，《明宪宗实录》卷六五作"二百四十八人"。王氏《续考》作"二百五十八人"。）

八年（1472）三月，廷试吴宽等二百五十一人，仍赐宽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五十一人，《明宪宗实录》卷一〇二、王氏《续考》并作"二百五十人"。）

十一年（1475）三月，廷试王鏊等三百人，赐谢迁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人，《明宪宗实录》卷一三九、王氏《续考》并作"二百九十七

人”。）

十四年（1478）三月，廷试梁储等三百五十人，赐曾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五十人，王氏《续考》同，《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六作“三百五十一人”。）

十七年（1481）三月，廷试赵宽等二百九十八人，赐王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年（1484）三月，廷试储巏等三百人，赐李旻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三年（1487）三月，廷试程楷等三百五十一人，赐费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五十一人，《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八、王氏《续考》并作“三百四十九人”。以上明宪宗时期共开八科，录取二四五一人。）

孝宗弘治三年（1490）三月，廷试钱溥等二百九十八人，赐钱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钱溥，据《明孝宗实录》卷三六，当作钱福，即会元与状元为同一人。二百九十八人，王氏《续考》作“三百人”。）

六年（1493）三月，廷试汪俊等二百九十八人，赐毛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八人，《明孝宗实录》卷七三，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人”。）

九年（1496）三月，廷试陈澜等二百九十八人，赐朱希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八人，王氏《续考》同，《明孝宗实录》卷一一〇作“三百人”。）

十二年（1499）三月，廷试伦文叙等三百人，仍赐文叙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

十五年（1502）三月，廷试鲁铎等二百九十七人，赐康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七人，《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五作“二百九十九人”，王氏《续考》作“三百人”。）

十八年（1505）三月，廷试董玘等三百三人，赐顾鼎臣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三人，《明孝宗实录》卷二二二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人”。以上明孝宗时期共开六科，录取一八〇〇人。）

武宗正德三年（1508）三月，廷试邵锐等三百四十九人，赐吕柟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九人，《明武宗实录》卷三六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五十人”。）

六年(1511)三月,廷试邹守益等三百四十九人,赐杨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九人,《明武宗实录》卷七三、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五十人"。)

九年(1514)三月,廷试霍韬等三百九十六人,赐唐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九十六人,《明武宗实录》卷一一〇同,王氏《续考》作"四百人"。)

十二年(1517)三月,廷试伦以训等三百四十九人,赐舒芬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九人,《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七、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五十人。)

十六年(1521)五月,时世宗已即位 策试张治等三百五十人,赐杨惟聪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明世宗实录》卷二、王氏《续考》并载是科录取数为三百三十人。以上明武宗时期共开五科,录取一七七五人。)

十五年,治等试礼部中式,以武宗南巡,未廷对。至是,世宗御西角门策之。

世宗嘉靖二年(1523)三月,廷试李舜臣等四百一十人,赐姚涞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年(1526)三月,廷试赵时春等三百一人,赐龚用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一人,《明世宗实录》卷六二、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人"。)

八年(1529)三月,廷试唐顺之等三百二十三人,赐罗洪先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十三人,《明世宗实录》卷九九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二十名"。)

十一年(1532)三月,廷试林春等三百一十六人,赐林大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一十六人,《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六、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二十人"。)

十四年(1535)四月,廷试许谷等三百二十五人,赐韩应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十五人,《明世宗实录》卷一七四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二十人"。)

十七年(1538)三月,廷试袁炜等三百二十人,赐茅瓒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十人,王氏《续考》同,《明世宗实录》卷二一〇作"三百二十三人。")

二十年(1541)三月,廷试林树声等二百九十八人,赐沈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人,《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七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人",又云林树声后复本姓陆。)

二十三年(1544)三月,廷试瞿景淳等三百二十八人,赐秦鸣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十八人,《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四作"三百十七人",王氏《续考》作"三百有八人"。)

二十六年(1547)三月,廷试胡正蒙等三百一人,赐李春芳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九年(1550)三月,廷试傅夏器等三百二十人,赐唐汝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二年(1553)三月,廷试曹大章等四百一人,赐陈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四百一人,《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五、王氏《续考》并作"四百三人"。)

三十五年(1556)三月,廷试金达等二百九十六人,赐诸大绶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六人,《明世宗实录》卷四三三作"三百三人"。王氏《续考》作"三百人"。)

三十八年(1559)三月,廷试蔡茂春等三百三人,赐丁世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三人,《明世宗实录》卷四七〇同,王氏《续考》作"三百有二人"。)

四十一年(1562)三月,廷试王锡爵等二百九十九人,赐徐时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九人,《明世宗实录》卷五〇七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人。)

四十四年(1565)三月,廷试陈栋等三百九十四人,赐范应期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九十四人,《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同,王氏《续考》作"四百人"。以上明世宗时期共开十五科,录取四九三九人。)

穆宗隆庆二年(1568)三月,廷试田一俊等四百三人,赐罗万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四百三人,王氏《续考》同,《明穆宗实录》卷十八作"四百二人"。)

五年(1571)三月,廷试邓以赞等三百九十六人,赐张元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明穆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七九八人。)

神宗万历二年(1574)三月,廷试孙矿等二百九十九人,赐孙继皋

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年（1577）三月，廷试冯梦祯等三百一人，赐沈懋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一人，《明神宗实录》卷六十同，王氏《续考》作“三百十人”或“三百一十一人”。）

八年（1580）三月，廷试萧良有等三百二人，赐张懋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人，《明神宗实录》卷九七、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人”。）

十一年（1583）三月，廷试李廷机等三百四十一人，赐朱国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月，当作“二月”。三百四十一人，《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三、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五十名”。）

十四年（1586）三月，廷试袁宗道等三百四十五人，赐唐文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五人，《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作“三百五十一人”。王氏《续考》作“三百五十名。”）

十七年（1589）三月，廷试陶望龄等三百四十七人，赐焦竑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七人，《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九同，王氏《续考》作“三百二十名”。）

二十年（1592）三月，廷试吴默等三百四人，赐翁正春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人，《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六、王氏《续考》并作“三百名”。）

二十三年（1595）三月，廷试汤宾尹等三百四人，赐朱之蕃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人，《明神宗实录》卷二八三同，王氏《续考》作“三百名”。）

二十六年（1598）三月，廷试顾起元等二百九十二人，赐赵秉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二人，《明神宗实录》卷三二〇、王氏《续考》并作“三百人”。）

二十九年（1601）三月，廷试许獬等三百一人，赐张以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一人，《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七、王氏《续考》并作“三百名”。）

三十二年（1604）三月，廷试杨守勤等三百八人，仍赐守勤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八人，《明神宗实录》卷三九四作“三百名”。）

三十五年（1607）三月，廷试施凤来等二百九十八人，赐黄士俊等

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八人,《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一作"三百二人"。

三十八年(1610)三月,廷试韩敬等三百二人,仍赐敬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人,《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八作"三百名"。)

四十一年(1613)三月,廷试周延儒等三百四十四人,仍赐延儒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四人,《明神宗实录》卷五〇六作"三百五十名"。)

四十四年(1616)三月廷试,赐钱士升等三百四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二载,二月会试贡士凡得三百五十人。")

时吴江沈同和会试第一,同里赵鸣阳第六。同和素不能文,文多出鸣阳手,事觉,两人并谪戍。

四十七年(1619)三月,廷试庄际昌等三百四十五人,仍赐际昌进士第一,余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五人,《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作"三百五十人"。以上明神宗时期共开十六科,录取五〇九六人。)

熹宗天启二年(1622)三月,廷试刘必达等四百九人,赐文震孟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四百九人,《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作"四百人"。)

五年(1625)三月,廷试华琪芳等三百人,赐余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明熹宗时期共开二科,录取七〇九人。)

愍帝崇祯元年(1628)三月,廷试曹勋等三百五十三人,赐刘若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五十三人,《崇祯实录》卷一作"三百五十人。")

四年(1631)三月,廷试吴伟业等三百四十九人,赐陈于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九人,《崇祯实录》卷四作"三百人"。)

七年(1634)三月,廷试李青等三百二人,赐刘理顺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人,《崇祯实录》卷七作"三百人"。)

十年(1637)三月,廷试吴贞启等三百一人,赐刘同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一人,《崇祯实录》卷十作"三百人"。)

十三年(1640)三月,廷试杨琼芳等二百九十六人,赐魏藻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六人,《崇祯实录》卷十三作"三百人"。)

十五年(1642),特赐史惇等二百六十三人进士出身。

十六年(1643)九月,廷试陈名夏等三百九十五人,赐杨廷鉴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九十五人,《崇祯实录》卷十七作"四百人"。以上明思宗时期共开六科,录取一九五〇人。)

〔原载清修《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二》,文字略有删节。明自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在应天(今南京)称帝,经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迄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共历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1368－1644)。其间凡开进士科八十八次,录取近二万四千六百人,平均每科约二百八十人,最高者为洪武十八年乙丑科和永乐二年甲申科各四百七十二人,最低者为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三十一人。其中洪武三十年丁丑科,经三月廷试后录取五十二人,均系南方人,是为春榜,又称南榜。后由落第的北方举子联名上告取士不公,至六月经朱元璋亲自策问,又录取六十一人,均系北方人,是为夏榜,又称北榜。此科春夏榜实开明代按南北比例取士之先河,至洪熙以后遂成定制。而英宗正统十三年戊辰科,当时称前三名为儒释道,系因状元彭时属儒士圈内人;榜眼陈鉴乃为神乐观道士,四十尚未娶妻;探花岳正早年丧父,而被嫡母所不容,避居兴隆寺做过和尚。〕

清登科总目

[世祖]顺治三年(1646)三月,廷试李奭棠等三百七十三人,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七十三人,《清世祖实录》卷二五作"四百人"。)

四年(1647)三月,廷试李人龙等二百九十八人,赐吕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八人,《清世祖实录》卷三一作"三百名"。)

六年(1649)四月,廷试左敬祖等二百九十五人,赐刘子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五人,《清世祖实录》卷四三作"三百九十五名"。)

九年(1652)三月,廷试满州进士麻勒吉等五十人,赐麻勒吉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廷试张星瑞等三百九十七人,赐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满洲进士,据《清世祖实录》卷六三、《清史稿·世祖本纪

二》,当作"满洲、蒙古进士"。)

十二年(1655)三月,廷试满州进士查亲等五十人,赐图尔宸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廷试秦钺等四百四十九人,赐史大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五年(1658)三月,廷试张贞生等三百四十三人,赐孙承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月,据《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及《清史稿·世祖本纪二》当作"四月"。)

十六年(1659)九月,廷试朱锦等三百七十六人,赐徐元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徐元文,《清世祖实录》卷一二八,《清史稿·世祖本纪二》俱作陆元文。陆为其人冒姓,及第后复本姓徐。)

十八年(1661)四月,廷试陈常夏等三百八十三人,赐马世俊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清世祖时期共开八科,录取三一四三人。)

[圣祖]康熙三年(1664)三月,廷试沈珩等二百人,赐严我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人,《清圣祖实录》卷一一、《清史稿·圣祖本纪一》并作"一百九十九人"。)

六年(1667)三月,廷试黄仍绪等一百五十五人,赐缪彤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黄仍绪,《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作"黄礽绪",是。一百五十五人,《实录》同,《清史稿·圣祖本纪一》作"一百五十人"。)

九年(1670)三月,廷试宫梦仁等二百九十九人,赐蔡启僔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九人,《清圣祖实录》卷三二、《清史稿·圣祖本纪一》并作"二百九十二人"。)

十二年(1673)三月,廷试韩菼等一百六十六人,赐韩菼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五年(1676)三月,廷试彭定求等二百九人,赐彭定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八年(1679)三月,廷试马教思等一百五十一人,赐归允肃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召试博学鸿词,一等彭孙遹等二十名,二等李〔来泰三〕十名,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并给予职衔有差。(按,"二等李"下三字,据《清史稿》卷一〇九《选举四》补。此年博学鸿词科共取五十名,而非三十名。)

二十一年(1682)九月,廷试金德嘉等一百七十九人,赐蔡升元等

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七十九人，《清圣祖实录》卷一〇四、《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并作"一百七十六人"。)

二十四年(1685)三月，廷试陆肯堂等一百六十四人，赐陆肯堂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六十四人，《清圣祖实录》卷一二〇、《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并作"一百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1688)三月，廷试范光阳等一百四十六人，赐沈廷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年(1691)三月，廷试张瑗等一百五十七人，赐戴有祺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五十七人，《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并作"一百四十八人"。)

三十三年(1694)三月，廷试裴之仙等一百六十八人，赐胡任舆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六年(1697)七月，廷试汪士铉等一百五十人，赐李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九年(1700)三月，廷试王露等三百五人，赐汪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五人，《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八、《清史稿·圣祖本纪二》并作"三百一人"。)

四十二年(1703)五月，廷试王式丹等一百六十六人，赐王式丹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五月，当作"四月"。一百六十六人，《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二、《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并作"一百六十三人"。)

四十五年(1706)三月，廷试尚居易等二百九十人，赐王云锦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人，《清圣祖实录》卷二二四、《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并作"二百八十九人"，又王云锦俱作"施云锦"。)

四十八年(1709)三月，廷试戴名世等二百九十二人，赐赵熊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十一年(1712)三月，廷试卜俊民等二百七十七人，赐王世琛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月，当作"四月"。二百七十七人，《清圣祖实录》卷二五〇、《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并作"一百七十七人"。)

五十二年(1713)万寿恩科，十月廷试孙见龙等一百九十六人，赐王敬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九十六人，《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并作"一百四十三人"。)

五十四年(1715)三月,廷试李锦等一百九十人,赐徐陶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月,据《清圣祖实录》卷三六二及《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当作"四月"。)

五十七年(1718)三月,廷试杨尔德等一百六十五人,赐汪应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月,当作四月。一百六十五人,《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并作"一百七十一人"。)

六十年(1721)三月,廷试储大文等一百六十三人,赐邓钟岳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月,当作四月。以上清圣祖时期共开二十一科,录取三九七〇人。)

[世宗]雍正元年(1723)特恩开科,十月廷试杨炳等二百四十六人,赐于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年(1724)十月,廷试王安国等二百九十九人,赐陈熹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年(1727)四月,廷试彭启丰等二百二十六人,赐彭启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八年(1730)四月,廷试沈昌宇等三百九十九人,赐周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年(1733)四月,廷试陈倓等三百二十八人,赐陈倓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清世宗时期共开五科,录取一四九八人。)

[高宗]乾隆元年(1736)四月,廷试赵青藜等三百四十四人,赐金德瑛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召试博学鸿词,一等刘纶等五名,二等杨度汪等十名,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差。次年又补试博学鸿词,一等万松龄,二等朱筌等三名,如前例授官有差。(按,三百四十四人,《清高宗实录》卷十六同,《清史稿·高宗本纪一》作"三百三十四名"。)

二年(1737)特开恩科,五月廷试何其睿等三百二十四人,赐于敏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年(1739)四月,廷试轩辕诰等三百二十八人,赐庄有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1742)四月,廷试金甡等三百一十三人,赐金甡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一十三人,此与《清高宗实录》卷一六四所载廷试数

同,录取数《实录》与《清史稿·高宗本纪一》俱为三百二十三人。)

十年(1745)五月,廷试蒋元益等三百一十三人,赐钱维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五月,当作"四月"。三百一十三人,《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九、二四〇所载同,《清史稿·高宗本纪一》作"三百三十三人"。)

十三年(1748)四月,廷试郑忬等二百六十四人,赐梁国治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六年(1751)五月,廷试周澧等二百四十三人,赐吴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四十三人,《清史稿·高宗本纪二》所载同,《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八则载录取数为二百五十人。)

十七年(1752)皇太后万寿恩科,九月廷试邵嗣宗等二百三十一人,赐秦大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三十一人,此与《清高宗实录》卷四二四所载录取数同,《清史稿·高宗本纪二》则作"一百四十一人"。)

十九年(1754)四月,廷试胡绍鼎等二百四十一人,赐庄培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四十一人,此与《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二所载录取数同,《清史稿·高宗本纪二》则作"二百三十三人"。)

二十二年(1757)五月,廷试蔡以台等二百四十二人,赐蔡以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五年(1760)五月,廷试王中孚等一百六十四人,赐毕沅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万寿恩科,四月廷试陈步瀛等二百一十七人,赐王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八年(1763)四月,廷试孙效曾等一百八十八人,赐秦大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一年(1766)四月,廷试胡珊等二百十三人,赐张书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四年(1769)四月,廷试徐烺等一百五十一人,赐陈初哲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六年(1771)皇太后万寿恩科,四月廷试邵晋涵等一百六十一人,赐黄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七年(1772)四月,廷试孙辰东等一百六十二人,赐金榜等进

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十年(1775)四月,廷试严福等一百五十八人,赐吴锡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十三年(1778)四月,廷试缪祖培等一百五十七人,赐戴衢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十五年(1780)万寿恩科,五月廷试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七人,赐汪如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五十七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一〇六、一一〇七并《清史稿·高宗本纪五》俱作"一百五十五人"。)

四十六年(1781)四月,廷试钱棨等一百六十九人,赐钱棨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十九年(1784),廷试侯健融等一百二人,赐茹棻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年"下依文例当补"四月"二字。一百二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五、《清史稿·高宗本纪五》并作"一百十二人"。)

〔以上原载清修《清文献通考》卷五十二《选举六》〕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科,廷试顾铓等一百四十一人,赐史致光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四十一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九、《清史稿·高宗本纪六》并作"一百三十七人"。)

五十四年(1789)己酉预行正科,廷试钱楷等一百八人,赐胡长龄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八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七、《清史稿·高宗本纪六》并作"九十八人"。)

五十五年(1790)庚戌恩科,廷试朱文翰等九十七人,赐石韫玉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九十七人,此与《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清史稿·高宗本纪六》所载录取数同。)

五十八年(1793)癸丑科,廷试吴贻咏等八十一人,赐潘世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八十一人,此与《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二七、《清史稿·高宗本纪六》所载录取数同。)

六十年(1795)乙卯恩科,廷试王以铻等一百十人,赐王以衔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王以铻,《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七作"王以衔"。一百十人,《实录》并《清史稿·高宗本纪六》俱作"一百十一人"。以上清高宗时期共开二十七科,录取五三八四人。)

[**仁宗**]**嘉庆**元年(1796)丙辰恩科,廷试袁棚等一百四十四人,赐

赵文楷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四十四人,此与《清仁宗实录》卷五所载录取数同,《清史稿·仁宗本纪》则作"一百一人"。)

四年(1799)己未科,廷试史致俨等二百二十人,赐姚文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二十人,此与《清仁宗实录》卷四三、《清史稿·仁宗本纪》所载录取数同。)

六年(1801)辛酉恩科,廷试马有章等二百七十五人,赐顾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1802)壬戌科,廷试吴廷琛等二百四十八人,赐吴廷琛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年(1805)乙丑科,廷试胡敬等二百四十三人,赐彭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四十三人,此与《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二、《清史稿·仁宗本纪》所载录取数同。)

十三年(1808)戊辰科,廷试刘嗣绾等二百六十一人,赐吴信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四年(1809)己巳恩科,廷试孔传纶等二百四十一人,赐洪莹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六年(1811)辛未科,廷试朱壬林等二百三十七人,赐蒋立镛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九年(1814)甲戌科,廷试瞿溶等二百二十六人,赐龙汝言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二年(1817)丁丑科,廷试庞大奎等二百五十五人,赐吴其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廷试费庚吉等二百二十五人,赐陈沆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二十五人,《清仁宗实录》卷三五六、《清史稿·仁宗本纪》并作"二百二十四人"。)

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廷试陈继昌等二百四十六人,赐陈继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以上清仁宗时期共开十二科,录取二八二〇人。)

[宣宗]道光二年(1822)壬午恩科,廷试吕龙光等二百二十二人,赐戴兰芬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二十二人,此与《清宣宗实录》卷

三二、《清史稿·宣宗本纪一》所载录取数同。）

三年(1823)癸未科，廷试杜受田等二百四十六人，赐林召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六年(1826)丙戌科，廷试王庆元等二百六十五人，赐朱昌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九年(1829)己丑科，廷试刘有庆等二百二十一人，赐李振钧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二年(1832)壬辰恩科，廷试马学易等二百六人，赐吴钟骏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三年(1833)癸巳科，廷试许楣等二百二十人，赐汪鸣相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二十人，此与《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七《清史稿·宣宗本纪二》所载录取数同。）

十五年(1835)乙未科，廷试张景星等二百七十二人，赐刘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七十二人，《清宣宗实录》卷二六五所载同，《清史稿·宣宗本纪二》则作"二百七十六人"。）

十六年(1836)丙申恩科，廷试夏子龄等一百七十二人，赐林鸿年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八年(1838)戊戌科，廷试王振纲等一百九十四人，赐钮福保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九十四人，此与《清宣宗实录》卷三〇八、《清史稿·宣宗本纪二》所载录取数同。）

二十年(1840)庚子科，廷试吴敬羲等一百八十人，赐李承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廷试蔡念慈等二百二人，赐龙启瑞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廷试焦青宇等二百九人，赐孙毓溎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焦青宇，《清宣宗实录》卷四〇四作"焦春宇"，是。）

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廷试蒋超伯等二百十七人，赐萧锦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廷试许彭寿等二百三十一人，赐张之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十年(1850)庚戌科,廷试邹石麟等二百十二人,赐陆增祥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十二人,此与《清文宗实录》卷八所载录取数同。以上清宣宗时期共开十五科,录取三二六九人。)

[文宗]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廷试孙庆咸等二百三十九人,赐章鋆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年(1853)癸丑科,廷试吴凤藻等二百十三人,赐孙如仪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十三人,《清文宗实录》卷九二、《清史稿·文宗本纪》并作"二百二十二人"。)

六年(1856)丙辰科,廷试马元瑞等二百十六人,赐翁同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九年(1859)己未科,廷试马传煦等二百三十九人,赐孙家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三十九人,《清文宗实录》卷二八二、《清史稿·文宗本纪》并作"一百八十人"。)

十年(1860)庚申恩科,廷试徐致祥等一百八十九人,赐钟骏声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一百八十九人,《清文宗实录》卷三一七、《清史稿·文宗本纪》并作"一百八十三人"。以上清文宗时期共开五科,录取一〇四〇人。)

[穆宗]同治元年(1862)壬戌科,廷试李庆沅等一百九十三人,赐徐郙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年(1863)癸亥恩科,廷试黄体芳等二百人,赐翁曾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年(1865)乙丑科,廷试廖鹤年等二百六十五人,赐崇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七年(1868)戊辰科,廷试蔡以瑞等二百七十人,赐洪钧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七十人,此与《清穆宗实录》卷二三〇并《清史稿·穆宗本纪二》所载录取数同。)

十年(1871)辛未科,廷试李联珠等三百二十三人,赐梁耀枢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三年(1874)甲戌科,廷试秦应逵等三百三十八人,赐陆润庠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三十八人,《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五、《清史稿·穆宗本纪二》并作"三百三十七人"。以上清穆宗时期共开六科,录取一五八

八人。）

[德宗]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廷试陆殿鹏等三百二十四人，赐曹鸿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年(1877)丁丑科，廷试刘秉哲等三百二十九人，赐王仁堪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六年(1880)庚辰科，廷试吴树棻等三百三十人，赐黄思永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三十人，《清德宗实录》所载同，《清史稿·德宗本纪一》作"三百三十三人"。）

九年(1883)癸未科，廷试甯本瑜等三百八人，赐陈冕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八人，此与《清德宗实录》卷一六二并《清史稿·德宗本纪一》所载录取数同。）

十二年(1886)丙戌科，廷试刘培等三百十九人，赐赵以炯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十九人，《清德宗实录》卷二二七所载同，《清史稿·德宗本纪一》则作"三百三十九人"。）

十五年(1889)己丑科，廷试许叶芬等二百九十六人，赐张建勋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九十六人，此与《清德宗实录》卷二六九所载廷试数同，录取数则《实录》与《清史稿·德宗本记一》并作"三百三十一人"。）

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廷试夏曾佑等三百二十六人，赐吴鲁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二十六人，此与《清德宗实录》卷二八四所载录取数同，《清史稿·德宗本纪一》则作"三百三十六人"。）

十八年(1892)壬辰科，廷试刘可毅等三百十七人，赐刘福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廷试陶世凤等三百十四人，赐张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十四人，《清德宗实录》卷三三九、《清史稿·德宗本纪一》并作"三百十一人"。）

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廷试陈海梅等二百七十九人，赐骆成骧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陈海梅，《清德宗实录》卷三六六作"景援"。二百七十九人，《实录》同卷并《清史稿·德宗本纪二》俱作"二百八十二人"。）

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廷试陆增炜等三百四十八人，赐夏同和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四十八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清史稿·德宗本纪二》并作"三百四十二人"。）

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壬寅(1902)恩科,廷试周蕴良等三百十五人,赐王寿彭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三百十五人,此与《清德宗实录》卷五一六并《清史稿·德宗本纪二》所载录取数同。)

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廷试谭延闿等二百七十三人,赐刘春霖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按,二百七十三人,此与《清德宗实录》卷五三一并《清史稿·德宗本纪二》所载录取数同。以上清德宗时期共开十三科,录取三二〇六人。)

〔以上原载民国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七《选举四》,其后尚有载述文字,删略不录。清自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率兵入关,迄宣统退位,共历十帝,二百六十年。其间凡开进士正科、恩科一百一十二次,录取近二万六千人,平均每科约二百三十二人,最高者为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四百九十九人,最低者为高宗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八十一人。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是清代的最后一科,也是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结束的标志。〕　　〔杨寄林　汇校〕